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

1854年1月—1854年12月

著 作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常再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
ISBN 7-01-002530-4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757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三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0 月第 2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6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3.5 插页 10

字数:8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2530-4/A·227 定价:56.00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4 年 1 月—12 月所写的 87 篇文章。文章的绝大部分发表在美国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中一些文章作为社论发表,许多文章还转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专刊《纽约半周论坛报》和《纽约每周论坛报》上。部分文章发表在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

1854 年,反动政治势力继续统治着欧洲,革命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低潮,革命报刊遭到查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可能公开正面地阐述自己的革命理论,只能利用资产阶级进步报纸,通过对当时各种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来宣传革命思想、鼓舞群众和影响社会舆论。马克思一家移居英国以后,长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极端窘迫,为报刊撰稿对于维持家庭生活也有所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撰写通讯文章同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注意收集有关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因而他们所写的通讯往往受到舆论界的高度评价。同时,撰写通讯也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积累了材料,充实了研究的基础。马克思在 1854 年重新审阅和整理了过去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并且写下了《货币、信用、危机》手稿。恩格斯主要从事

军事问题的研究,撰写这方面的通讯。

本卷所收的政论文章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文章内容比较丰富,主要涉及当时欧亚两洲发生的重要政治、军事事件(如克里木战争和西班牙起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等等。

1853年爆发的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冲突在1854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英国和法国的介入,这一冲突演变为英法和土耳其为一方同俄国为一方之间的战争,即克里木战争,又称东方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注这场战争,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战争的原因和性质,评述战争各个阶段军事行动的进程,揭露各国统治阶级在战争期间的幕后外交活动,并且阐述了他们对克里木战争的立场。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支柱,因此他们在分析克里木战争背景和参战各国外交活动的一系列文章中总是首先集中揭露沙皇俄国妄图吞并土耳其进而称霸欧洲的野心。他们指出,沙皇政府要求维护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徒的宗教权力,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想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独霸统治,迫使土耳其政府听从沙皇的摆布。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通过剖析沙皇向西方强国暗示的共同瓜分土耳其的计划,揭穿了沙皇的阴谋诡计,指出沙皇的真实目的是在摧毁土耳其的现存统治权力之后,利用他同这个国家的正教会的关系以及同斯拉夫人的关系攫取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沙皇“将得到牡蛎肉,而西方各国政府则不得不满足于牡蛎壳。”(见本卷第213页)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揭露了英法统治阶级帮助土耳其抵御

俄国的伪善面貌。他们指出,英法两国政府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其目的只是想要削弱沙皇这个与英法争夺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控制权的竞争对手。英国政府在帮助土耳其的幌子下,不断在政治、军事、财政等各个方面加强对土耳其的干涉,这种干涉的结果只会加速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法国政府对俄宣战则是出于波拿巴的殖民主义立场和为了摆脱国内面临的危机。因此,他们认为,克里木战争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宗教争执”,或“自由和专制”的斗争,而是欧洲列强争夺私利的斗争。马克思在《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一文中写道:“土耳其人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西方盟友,不信任他们和敌视他们。土耳其人开始把法国和英国看作是比沙皇本人更危险的敌人,下面这两句话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他们要推翻苏丹和瓜分帝国,要把我们变成基督教居民的奴隶’。”(见本卷第 246—247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英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根本无意彻底摧毁沙皇俄国这个反动支柱,只想通过局部冲突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因而他们总是力图使战争局限在一定的地区范围之内,千方百计防止战争规模的扩大,唯恐战火蔓延到整个欧洲。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和欧洲民主运动利益出发确定了他们对克里木战争的立场。他们继续坚持 1848 年革命时期的策略,希望战争能够发展成具有全欧规模的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将成为“其他更激烈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战斗的序幕,即欧洲各国人民反对那些目前胜利的和自以为巩固的欧洲专制暴君们的战斗的序幕。”(见本卷第 655 页)在两篇《欧洲战争》、《战争》和《战况的进展》等文章中,他们明确地表述了关于通过革命战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现欧洲民主改造的思想。恩格斯形象地把沉寂已久的欧洲

革命比作欧洲五大强国之外的“第六强国”。他表示深信,这个“第六强国”将对战争的发展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在一定的时刻,它将会“以其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见本卷第8页)

恩格斯具有广博精深的军事知识。克里木战争爆发后,他注意观察战争的进展,研究参战各国发布的官方消息、报刊上的通讯报道以及从私人信件中获得的情报资料,及时写出有关战争全局和一些重要战役的评述,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本卷收入的军事评论文章,连同前后几卷关于克里木战争的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恩格斯时刻注意分析交战双方的作战方式和兵力对比。虽然不可能及时获得这方面的准确情报,但是通过综合性的分析,他仍然能够对某些军事行动的发展提出正确的预测和估计,甚至能够核实某些片面夸张的消息。

恩格斯对参战各国军队尤其是英国军队的状况进行了考察。他在《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一文中批评英国军队指挥管理部门存在许多严重弊病:领导不集中、实行买卖军官官衔证书制度、训练制度和操典陈旧等等。他认为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在于军队的领导墨守陈规,顽固坚持僵硬不变的制度,而英国政体的寡头性质更加重了这种制度带来的恶果。恩格斯通过对俄国军队的分析说明了国家的发达程度以及所处的环境对军队编制和作战方法的影响。他在评论法国军队时,指出了“御用军队”的危害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在革命遭受挫折、资本主义暂时繁荣稳定的年代,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对提高

人民群众的认识尤为重要。他们结合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所写的许多文章,从各种角度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同时,他们也在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对工人运动和革命的民主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立场。

马克思根据英国政府官员被迫向议会公布的他们同俄国沙皇政府之间的秘密信函以及“蓝皮书”中收入的资料和外交文件,对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等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英国政府的这些秘密外交文件一方面暴露了英国统治阶级对沙皇俄国的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态度,另一方面也揭穿了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背信弃义,英国政府不仅对沙皇俄国明目张胆的侵略意图采取纵容姑息态度,而且暗中同沙皇政府磋商瓜分土耳其的阴谋计划。针对英国政府“希望维持土耳其帝国”的谎言,马克思尖锐指出:“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没有潜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没有潜伏着革命,那么女王陛下政府会像哥萨克陛下一样把土耳其苏丹吞掉。”(见本卷第175—176页)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评论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主要有:《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议会辩论》、《议会的战争辩论》、《奥地利—普鲁士条约。——5月29日的议会辩论》等。马克思曾亲自旁听英国议会的辩论,对英国议会活动的特征有深刻的了解。他指出,议会中对各项政策问题的争辩都是为了装饰门面,欺骗群众。实际上,议会的两个派别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在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下,“每个党都宁愿让自己的政敌保持接替自己执政的能力,而不愿互相破坏政治‘声誉’,使统治阶级

的统治彻底垮台。”(见本卷第 62 页)马克思引用老科贝特的话揭穿了议会的实质,说议会只是对付国内沸腾着的激烈情绪的“安全阀”(见本卷第 316 页)。在评论议会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时,他还批判了英国自由贸易派代表人物科布顿和布莱特等人在议会中鼓吹的“和平论”,说他们是企图以假仁假义的伪装掩盖英国政府的对外掠夺政策。

英国的财政在这一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国库空虚,赤字庞大。为了弥补赤字,当时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提出了提高所得税税率等一套增加国库收入的措施。马克思在《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不列颠的财政》等文章中,对英国内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抨击,指出联合内阁的财政政策完全适应它的外交政策,提高所得税的税率就是炮击公众的钱袋,把战争重负转嫁到普通群众的身上。

在研究英国财政问题的同时,马克思注意到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不景气现象。他在文章中描述了英、法、奥地利等国的经济状况:工商业普遍停滞、企业破产倒闭、对外贸易缩减、失业人数增加等等。根据对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指出 50 年代初期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出现的萧条现象预示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到来。他在《不列颠的财政》以及 1855 年初发表的关于英国工商业危机的一些文章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正确预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同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建立了联系,移居英国以后,这种联系更加密切。他们不仅为宪章派报刊撰稿,还参加了宪章派的一些活动。1854 年,宪章派领袖琼斯等人为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倡议召开工人议会,以便讨论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马克思积极宣传琼斯的建议,

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报道工人议会情况的文章。马克思认为，不管工人议会的直接成果如何，这样一个议会的召开本身就标志着工人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工人议会邀请马克思作为名誉代表出席会议，马克思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出席，但他寄去了一篇祝词《给工人议会的信》，信中分析了英国社会的阶级对立状况，阐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并向英国工人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见本卷第 134 页）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评述了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的政策。他分析了法国实行对外侵略政策的根源，指出法国的国家信用面临崩溃，内部动荡不安，波拿巴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求助于对外战争：“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别无其他选择。”（见本卷第 109 页）马克思认为，法国统治阶级不加考虑地增发国债和提高赋税必将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即使战争能使波拿巴在国外赢得一定威望，结果也很可能加速他在法国统治的崩溃。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意志两个大邦普鲁士和奥地利给予巨大的关注。他们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采取摇摆不定的中立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中立政策是不能持久的，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鲁士和奥地利随时可能改变自己的政策，或者站到俄国一边，或者站到英法和土耳其一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否参加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德意志大邦中一个也没有参加战争，战争将局限于地区性的冲突，“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 1792 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见本卷第 7 页）

马克思尤其注意研究奥地利的对内对外政策，因为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有利的地位。他在《东方战争》、《奥地利的破

产》等文章中具体分析了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奥地利在 1854 年已经濒临破产边缘,虽然屡次发行公债,强行勒索,企图解决通货贬值的问题,然而财政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政府不得不转而依靠银行,以致银行变成了帝国的“真正主宰者”(见本卷第 119 页)。马克思指出,正是国内的财政困难决定了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立场:一方面,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俄国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和吞并土耳其,因为这将损害它的贸易,并会引起帝国内斯拉夫人的骚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听任俄国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这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一个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涡的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虽然奥地利帝国经济困难,在它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匈牙利境内潜藏着人民起义的危机,但它仍是不可轻视的,它拥有一支使交战双方都感到敬畏的军事力量,如果它能加入西方同盟,战争将会演变为整个欧洲反对俄国的战争,从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打开广阔的前景,有利于欧洲的民主改造和受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马克思深切同情饱受奥地利统治之苦的匈牙利和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指出,奥地利帝国的生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完全依靠对匈牙利和伦巴第的占有和掠夺,只要失去匈牙利和伦巴第,它的破产就不可避免。同时马克思批判了意大利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民族利己主义:“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就是这种狭隘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见本卷第 242—243 页)

在《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黑山》、《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等文章中,马克思追溯了东方纠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且说明了欧洲各国统治者如何利用宗教纠纷争

夺在东方的影响。对东方问题的深入探讨,使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看法:“波拿巴的篡位是现在东方纠纷的真正根源。”(见本卷第 71 页)马克思反对欧洲列强瓜分或吞并土耳其,然而与欧洲某些政治家相反,他并不主张保存封建的奥斯曼帝国。他认为,奥斯曼帝国是衰老的欧洲制度的基石,阻碍着欧洲的进步,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必将走向灭亡。

1854 年,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反动势力横行霸道。这一切激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由此爆发了 1854—1856 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这次革命运动,在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中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进展,分析了运动的性质和前景。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西班牙的革命。——希腊和土耳其》、《无聊的战争》、《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马德里报刊》、《西班牙的革命。——博马尔松德》等。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 19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

马克思关于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在本卷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对西班牙历史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西班牙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他认为,西班牙建立君主专制比较早,但长期保留地方自治,中央集权制迟迟不能生根,这是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作为社会统一的开创者而出现的……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着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见本卷第 510 页)在西班牙,君主专制建立

后,城市工商业不断衰落,国内交换逐渐缩小,地方独立性日益增强。不仅如此,君主专制还尽力阻碍由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易的多样性所产生的共同利益的发展,使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原则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共有—个挂名君主的一批治理不善的共和国。”(见本卷第 510 页)

在批驳沙多勃利昂的《维罗那会议》一书对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指责时,马克思指出,各国人民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具有共同的规律性,只是由于种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往往带有各自特殊的色彩。马克思认为,西班牙的特殊历史背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使西班牙革命具有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革命要想获胜,它本身就必须以王位追求者的身分出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见本卷第 583 页)因此,革命运动胜利以后,很快就会出现复辟。然而复辟的后果又将是矛盾的激化,以至毫无妥协的可能,最终必然导致一场新的革命。这种多次的反复表明了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和持久性。

马克思指出,西班牙革命的另一特点是革命运动必须同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他在谈到西班牙革命领导机构中央洪达的使命时强调说,任何政治机构,如果不能把保卫国家的现实和迫切任务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它就必然垮台。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西班牙反对波拿巴斗争的矛盾性质,指出“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点,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见本卷第 516 页)这种两面性进一步加深了西班牙革命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充分肯定西班牙人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热情地描述了西班牙人民如何自发地开展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和在斗争中表现出的令人难忘的生命力。他专门研究了广大群众参加的游击战争,总结了游击战各个阶段的特点。同时他也注意到当时西班牙人民仍然把摆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更换上,在政治上还没有达到要求亲自参与领导抵抗运动的觉悟水平。

通过对西班牙革命领导机构、领导成员和 1812 年宪法的分析,马克思说明了西班牙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局限性。马克思认为,中央洪达是一个组织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领的政权机构,它行动无力,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1812 年宪法尽管具有限制王权的进步倾向,但这部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却是保持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并且在宪法中还存在着对教权派横行时期的黑暗传统实行妥协的明显迹象。

马克思在论述西班牙革命的文章中继续阐发了必须重视团结农民的思想。西班牙农村居民落后保守,不了解斗争的意义,对革命运动往往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古旧风俗的仓库里是不足为奇的,不能因此而忽视争取农民的任务。他总结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仅仅限于“城市革命”(见本卷第 581 页),没有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结合起来,从而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严重削弱了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注意到西班牙 1854 年起义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特点: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比以前大大提高,工人不再轻易受骗上当,街垒战重新显示出强大威力等等。但是根据对西班牙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和几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

上的社会问题在西班牙这样一个资源尚未开发、人口也很稀少的国家中是谈不上的。”(见本卷第 488 页)后来,在总结 1854—1856 的革命运动时,马克思确信“下一次的欧洲革命将发现,西班牙已经成熟到能够同它合作。”(见《西班牙的革命》)1868—1874 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了 13 篇,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9 篇:《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俄国军队》、《欧洲战争》、《土耳其战争》、《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军舰和堡垒》、《革命的西班牙——九》、《(A)中央洪达》、《战况的进展》;附录 4 篇:《科堡家族》、《民众情绪的不同特点》、《发现得太晚了》、《工人议会纲领》。原收入第 1 版的《巴拉克拉瓦》一文,经考证不是马克思写的,未收入本卷。《英国资产阶级》一文,还不能确认是马克思撰写的,也未收入本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3 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杨彦君
陈慧生 沈红文

参加本卷军事著作部分译校工作的有：
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刘善继 潘嘉玢

参加编辑和资料工作的有：胡永钦
冯如馥 蒋仁祥 王栋华 章丽莉
刘洪涛 朱 羿 李 楠

全卷译文由陈慧生 杨彦君审定

目 录

前言	1—12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	3—8
卡·马克思 * 西方强国和土耳其	9—18
卡·马克思 * 东方战争	19—30
弗·恩格斯 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	31—34
卡·马克思 * 东方的战事。——奥地利和法国 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	35—41
卡·马克思 * 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	42—4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君士坦丁堡的设防。 ——丹麦的中立。——不列颠议会的成分。 ——欧洲的歉收	47—55
卡·马克思 * 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俄国 的战时财政	56—60
卡·马克思 * 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 ——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 ——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	61—68
卡·马克思 * 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 蓝皮书。——黑山	69—7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问题	77—81
卡·马克思	*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拿破仑的 计划。——普鲁士的政策	82—84
卡·马克思	议会辩论	85—99
卡·马克思	*2月22日的议会辩论。——波措 - 迪 - 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	100—109
卡·马克思	*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 暴动。——西班牙。——中国	110—117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破产	118—124
卡·马克思	*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	125—132
卡·马克思	*给工人议会的信	133—135
卡·马克思	工人议会	136—140
弗·恩格斯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	141—145
卡·马克思	希腊人暴动	146—148
卡·马克思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	149—160
卡·马克思	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	161—178
卡·马克思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	179—188
弗·恩格斯	喀琅施塔得要塞	189—197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	198—204
弗·恩格斯	俄国军队	205—21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	211—214
卡·马克思	议会的战争辩论	215—226
卡·马克思	*俄国和德意志大邦。——谷物价格	227—234
弗·恩格斯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	235—239
卡·马克思	*路西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	

纸论东方问题	240—244
卡·马克思 * 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 强国。——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	245—248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	249—252
卡·马克思 * 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 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俄国的文件	253—259
卡·马克思 * 炮击敖德萨。——希腊。——黑山 丹尼洛大公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	260—267
弗·恩格斯 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	268—271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财政	272—279
弗·恩格斯 辉煌的胜利	280—284
卡·马克思 *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在苏 格兰对领地的清扫	285—290
弗·恩格斯 战争	291—297
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 军需部等等	298—304
弗·恩格斯 军舰和堡垒	305—310
卡·马克思 * 奥地利—普鲁士条约。——5月29日 的议会辩论	311—316
卡·马克思 * 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多瑙 河战争。——经济状况	317—323
卡·马克思 * 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 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	324—331
弗·恩格斯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	332—34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土战场的形势	346—353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军的撤退 354 —358
- 卡·马克思 战争。——议会辩论 359 —368
- 卡·马克思 * 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
其条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369 —378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多瑙河战争 379 —384
- 卡·马克思 * 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
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
——瓦拉几亚 385 —393
- 卡·马克思 * 意大利的紧张。——西班牙事件。
——德意志各邦的立场。——英国法官 394 —404
- 卡·马克思 * 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
——杜尔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
内阁危机 405 —412
-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希腊和土耳其 413 —419
- 卡·马克思 议会的战争辩论 420 —427
- 卡·马克思 * 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 428 —440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无聊的战争 441 —446
- 卡·马克思 埃斯帕特罗 447 —455
- 弗·恩格斯 对俄国堡垒的攻击 456 —458
- 卡·马克思 * 撤出多瑙河两公国。——西班牙事件。
——丹麦新宪法。——宪章派 459 —466
- 卡·马克思 * 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波兰。
——西班牙人民的要求 467 —473
- 卡·马克思 * 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
——马德里报刊 474 —482

卡·马克思 * 西班牙的革命。——博马尔松德	483—489
弗·恩格斯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第一篇论文]	490—494
弗·恩格斯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第二篇论文]	495—499
卡·马克思 * 革命的西班牙	501—573
[一]西班牙的革命	503
[二]革命的西班牙	513
[三]	521
[四]	527
[五]	534
[六]	539
[七]	549
[八]	555
[九]	563
卡·马克思 (A)中央洪达	574—579
卡·马克思 * 西班牙一干涉(草稿)	580—584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反动	585—591
卡·马克思 战况的进展	592—597
卡·马克思 * 关于马志尼被捕的传说。——奥地利的 强制公债。——西班牙。——瓦拉几亚的状况	598—604
卡·马克思 * 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两公国的 局势。——西班牙。——不列颠的对外贸易	605—615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	616—625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	626—63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	633—63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 ——概评	638—642

弗·恩格斯	阿利马河会战	643—649
弗·恩格斯	俄国的军事力量	650—655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	656—661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役	662—670
弗·恩格斯	东方战争	671—681
弗·恩格斯	因克尔曼会战	682—687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役	688—69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战况的进展	696—703
弗·恩格斯	奥地利的军事力量	704—708

附 录

威廉·皮佩尔	科堡家族	711—713
厄内斯特·琼斯	·民众情绪的不同特点	714—717
厄内斯特·琼斯	发现得太晚了	718—723
工人议会纲领		724—739

注释		743—831
人名索引		832—913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914—917
文献索引		918—1011
报刊索引		1012—1024
地名索引		1025—1046

插 图

载有卡·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的《人民报》原版的一部分	134—135
----------------------------	---------

弗·恩格斯写作《喀琅施塔得要塞》一文时画的喀琅 施塔得地形图	195—196
燕妮和卡·马克思 1854 年 5—6 月寄给《纽约论坛报》 一组文章的记录	307—308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和因克尔曼会战的军队配置 的示意图	335—336
卡·马克思摘自西班牙历史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	505—506
卡·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未发表的手稿 的一页	538—539
卡·马克思《(A)中央洪达》一文第 1 页	575—576
1854 年克里木战区图	619—620
弗·恩格斯的《俄国的军事力量》一文的准备 材料的一页	654—655
弗·恩格斯的《东方战争》一文带有地图的准备材料 的一页	673—674

卡 · 马克思
和

弗 · 恩格斯

1854年1月—12月

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¹

久待解决的土耳其问题看来终于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再也不能仅仅采取外交手段，进行反复无常、畏首畏尾和毫无结果的活动了。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已进入黑海，企图阻止俄国舰队对土耳其舰队或土耳其沿岸地区的袭击。沙皇尼古拉早就宣称，这一类行动对于他将是宣战的信号。现在他会漠然置之吗？

不能期望联合舰队会立刻攻击并消灭俄国分舰队或摧毁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和海军造船厂。相反地我们可以相信，两国外交官给两位海军上将^①的指示的意图是尽可能避免发生冲突。但是，关于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行动的命令一旦下达，这些行动便不再服从外交官的愿望和计划，而服从它自己的规律，违反这些规律，就不免使整个远征军遭受危险。俄军在奥尔泰尼察被击败²，这决不是外交官的意图；但是既然奥美尔帕沙被允许有某种行动的自由，并且军事行动已经开始，那么敌对双方司令官的行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再受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控制了。

① 詹·邓达斯和弗·阿默兰。——编者注

因此,既然联合舰队已经由贝科兹停泊地起锚,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就会陷入一种无论是阿伯丁勋爵的和平祈祷,或者是帕麦斯顿勋爵同俄国的秘密勾结都不能使它们解脱出来的境地,它们只得在可耻的退却和坚决的战斗之间进行抉择。在目前情况下,像黑海这样使敌对双方军舰都难以隐蔽的狭窄而封闭的海面,恰好是几乎每日都难免发生冲突的地方。此外,指望沙皇尼古拉毫不抵抗地让自己的舰队被封锁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下一步便是欧洲战争,那么这很可能是以俄国为一方同以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发生这种事变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可能比较一下双方胜利的机会和作战的兵力。

但是俄国会不会孤立呢?奥地利、普鲁士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德意志各邦和意大利各国在这一场全面战争中将站在哪一方面呢?据说,路易·波拿巴曾告知奥地利政府:如果法国同俄国发生冲突而奥地利站在俄国方面,那么法国政府就将利用只需一点火星就足以重新燃起燎原烈火的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风潮,而且法国将试图恢复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这样的威胁也许能对奥地利产生影响,可能促使奥地利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持中立,但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不能指望它长久地袖手旁观。这种威胁既已公开说出,其本身就可以在意大利引起局部的起义,然而,这些起义只会使奥地利更依附于俄国,更听命于俄国。再说,这种拿破仑式的把戏不是已经演过一次了吗?³难道可以期望一个重新使教皇登上世俗的宝座并给那不勒斯王位准备好了后继者⁴的人,会给予意大利人以他们所要求的不亚于脱离奥地利而独立的东西——意大利的统一吗?难道可以期望意大利人民会一头栽进这个圈套吗?无疑地,意大利人深受奥地利统治之苦,但是他们未必会有强烈的愿望来帮助维护这个甚至在

法国本土也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的荣誉和第一个反对意大利革命的人的威望。所有这些情况,奥地利政府是知道的,因此可以推测,奥地利政府受本身财政困难的影响将比受波拿巴的威胁的影响大;同样可以相信,在决定关头,沙皇的影响在维也纳将占上风,并把奥地利拉到俄国方面去。

普鲁士企图重复它在 1780、1800 和 1805 年所玩弄的那套把戏⁵。它计划建立中立的波罗的海各国或北德意志各邦的联盟,而它居于盟主的地位就可以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可以投到许给它好处最多的那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些几乎总是可笑地以贪婪的、动摇的、怯懦的普鲁士政府投入俄国的怀抱而结束的。这一次普鲁士也难以逃脱它那往常的命运。它将向各方伸张它的触角,将公开拍卖自己而在两个阵营之间玩弄奸计,将滤出蠓虫吞下骆驼^①而丧失它所仅存的一点威望,将要受到打击而终于落到给价最少的人的手里,也就是说,这次将和以往各次一样,落到俄国的手里。对于俄国来说,普鲁士不是盟友,而是累赘,因为普鲁士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使自己满足,将设法先让自己的军队被歼灭。

在至少有一个德意志大邦卷入欧洲战争之前,战事只能在土耳其、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在这个期间,意义最重大的将是海战。毫无疑问,联军舰队能够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和俄国的黑海舰队;它们能够夺取并守住克里木,能够占领敖德萨,封锁亚速海并发动高加索山地居民。如果能够迅速而坚决地行动,这是再容易做到不过的了。假定这需要用开战后的头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再用一个月的时间联合舰队的蒸汽舰就可以到达英吉利海峡并让帆力舰接续其后。因为

①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3、24 节。——编者注

留在黑海要做的事情全部可以由土耳其舰队完成。为了在英吉利海峡装煤和作其他准备,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当这些蒸汽舰同法英两国在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的舰队会合以后,联军舰队便可以在5月底以前以保证攻击成功的足够数量的船只在喀琅施塔得停泊场出现。

在波罗的海将要采取的措施与在黑海所采取的措施一样是十分明显的,这些措施是:不惜任何代价同瑞典建立同盟;必要时,还得恐吓丹麦;派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在芬兰登陆,以发动芬兰的起义,并确保只有在该省重新同瑞典合并的条件下才签订和约。在芬兰登陆的部队可以威胁彼得堡,而舰队则可以炮击喀琅施塔得。的确,这个要塞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地。通向停泊场的深水航道几乎不容两舰并列通过,并且在通过时这些舰船的两舷不仅要受到设在主岛上的、而且要受到设在主岛周围小礁岩、浅滩和小岛上的炮台的轰击。不仅人员而且船只的某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如果在制订攻击计划时预先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决心牺牲某些舰船并且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计划的话,喀琅施塔得是一定可以攻克的。它的石质工事根本经不住对石墙破坏力最大的佩克桑重炮⁶的集中火力的轰击。装备有一整套这种火炮的大型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会很迅速地发挥不可抵御的威力,当然这时也得冒自己被击沉的危险。但是喀琅施塔得是俄罗斯帝国的锁钥,占领了它就会使彼得堡失去屏障,相形之下,损失三四艘螺旋推进式战列舰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敖德萨、喀琅施塔得、里加和塞瓦斯托波尔都失守,芬兰被解放,而敌军逼临首都城下,并且俄国的一切河流和港湾都被封锁的时候,俄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将变成束手无眼的巨人,除了根据敌人的杀声忽东忽西地用自己的笨重身躯去乱撞以压倒敌人以外,毫无办法可想。如果欧洲的海上强国能如此坚决而有力地行动,那么

普鲁士和奥地利就可能彻底摆脱俄国的控制，甚至会加入盟国。因为德意志这两大邦，只要感到国内安全，是乐于利用俄国的困难处境的。但是不可能期望阿伯丁勋爵和德鲁安-德路易斯采取这样坚决的措施。最高当局无意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而且，一旦爆发全面战争，统帅们将被束缚住手脚，变得无能为力。纵然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也会设法把它归于侥幸的成功，而且使它的后果尽可能对敌人无害。

在黑海的亚洲沿岸的战争可能因舰队的行动而迅速结束，但是在欧洲沿岸，战争将会继续进行，不会出现长时间的间歇。被驱逐出黑海并丧失了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不冒很大的危险，就不能渡过多瑙河（除非沿着去塞尔维亚的方向，在那里发动暴动），但是他们只要没有迫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以及后方和翼侧大批部队登陆的威胁而退出瓦拉几亚，就完全可以守住多瑙河两公国。如果没有全面的军事行动，俄军就无需撤出摩尔多瓦；只要霍京和基什尼奥夫两地能保障俄军同俄国本土取得可靠的联络，翼侧和后方的佯动毕竟是意义很小的。

但是当战争限于以西方强国和土耳其为一方向以俄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时，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1792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不过，一旦战争爆发，西方强国的消极怠惰和俄国的积极行动很快就会迫使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到那个专制君主^①方面。对于普鲁士，也许可以不必特别重视，因为它的军队，无论能力如何，很可能因傲慢而重蹈耶拿的覆辙⁷。反之，奥地利，虽然濒于破产，虽然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可能发生起义，它仍将是不可轻视的敌人。俄国本身则因为必须在多瑙河两公国和高加索边境保持驻军，占领波兰，并且要

^① 指俄国沙皇。——编者注

有部队保卫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彼得堡和芬兰,可用于进攻战的军队微乎其微。如果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我们总是假定普鲁士尚未被彻底击溃)在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脉能集中50—60万人,那么这已经多于根据合理判断所预期的数量。而对付这50万联合军队,单是法军就可以了,不过其将领在素质上不能比敌军将领差;在敌人中间,只有奥军才有真正名实相符的统帅。俄军的将军是不足惧的,而普军根本没有将军;他们的军官是些天生的中少尉。

但是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粮食匮乏又把它召上战场。从曼彻斯特到罗马,从巴黎到华沙和佩斯——到处都有它的存在,到处它都在抬头,从沉睡中醒来。它复苏的迹象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迹象在各地无产阶级的骚动和不安中都可以看到。只要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走出来,好像密纳发女神从奥林匹亚神的头脑中出现一样。这个信号将由快要到来的欧洲战争发出,那时,对于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正如同1792—1800年的情形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月
8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2月2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2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西方强国和土耳其

1854年1月10日星期二于伦敦

对于瑟美列先生泄露匈牙利王冠隐藏地点的责难⁹最初是由公认为奥地利警察当局机关报的维也纳《士兵之友》提出来的,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责难的虚伪了。

虽然无缘无故地供出自己的同谋不是警察当局的惯例,但是把嫌疑加在无辜的人身上,以包庇犯罪的人,倒是它的一个常用手法。如果奥地利警察当局能事先得到瑟美列先生的合作,他们决不会自动牺牲像他这样一位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如果秘密不是由科苏特先生的某一个代理人不慎泄露的(这决不是不可能的),我就只能怀疑这是由目前居住在巴黎的卡·鲍蒂扬尼伯爵出卖的。他是确实知道王冠隐藏地点这一秘密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而且他是其中唯一向维也纳法庭请求过特赦的人。最后这件事,我有理由认为,他不会否认。

不列颠总司令哈丁勋爵被劝收回了辞呈。关于诺福克公爵,《都柏林晚邮报》记者报道说,

“传出了一些宫廷轶事。据说,暂居宫廷某职、身膺国家最高世袭爵位的某

某高贵公爵在女王的筵席上多饮了一些香槟酒，于是在酒宴厅里失去了最高贵的平衡，并且连累女王陛下本人也遭了殃。发生这件令人不快的尴尬的事情以后，高贵的公爵辞了职，斯宾塞伯爵被任命为女王陛下宫廷的侍从长。”

爱尔兰旅¹⁰的经纪人萨德勒先生又呈请辞去他的内阁职务，这一次他的辞呈被阿伯丁勋爵接受了。自从在爱尔兰法庭上公开揭露他依靠卑鄙的手段钻入议会以后，他的这一地位就已变得很不稳固。由于这个不愉快的事件，“群贤内阁”¹¹对爱尔兰旅的控制就见得会加强了。

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德文郡的克雷迪顿发生的抢粮风潮¹²是人民对政府报纸和自由贸易派报纸所大肆渲染的繁荣的一种回答，这些报纸原来认为在辞送 1853 年旧岁时应当以此让自己的读者们高兴一番。

《祖国报》发表来自特拉佩宗特的通讯说，由于俄国“驻德黑兰的代办要求解除波斯沙赫的两个享有盛誉的大臣的职务，人民中开始骚动，近卫军司令声称，如果满足这样的要求，他将不能对社会的治安负责。根据这篇通讯，沙赫正是慑于人民中爆发出的对俄国的愤怒，才不得不恢复了同英国代办的联系”。

除去原来已经公开的大批外交文件外，现在又加上了驻君士坦丁堡的四强国大使于 12 月 12 日签署并共同递交土耳其政府的四强照会¹³以及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 12 月 30 日在巴黎签署的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新通报。仔细阅读四强照会之后，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当照会已被土耳其政府接受的消息传开后君士坦丁堡就人心惶惶；为什么 21 日发生了暴动；为什么土耳其的内阁不得不郑重声明，军事行动不会因恢复和平谈判而中止或受到影响。正是在背信弃义而又卑鄙怯懦的锡诺普大屠杀¹⁴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并使整个奥斯曼帝国一致发出复仇的怒吼之后九天，四强国冷冰冰

地邀请(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大使则是强迫)土耳其政府,以下列条件为基础同沙皇进行谈判:恢复过去的一切条约;苏丹赐予其基督教臣民以宗教特权的敕令应附有对每一强国(自然也包括沙皇)的新的保证;土耳其政府委派全权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政府允许俄国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座教堂和一所医院,并对列强(自然也包括沙皇)保证改进本国内部的行政制度。土耳其政府不仅不能因俄国人的强盗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而得到任何赔偿,相反地,俄国强迫土耳其戴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锁链将被锻打得更结实,而且对这个囚犯将比过去看管得更严。土耳其政府必须听任这个专制君主摆布,低声下气地向他保证实行关于给予本国基督教臣民以宗教特权的敕令,并向他保证改进本国内部的行政制度,从而把宗教保护权和民政管理的指导权同时交给了沙皇。作为对这种屈服的补偿,人们答应土耳其政府“尽快地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克兰里卡德勋爵曾把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侵犯叫做“强盗行径”)并且向它保证 1841 年 7 月 13 日条约¹⁵中的序言——这是对付俄国的可靠保证——将得到正式批准。

虽然这些无耻的“强国”表现了闻所未闻的卑鄙,竟在锡诺普会战以后几天就胁迫土耳其政府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是这种卑怯手段还是不能使它们摆脱困境。沙皇真做得过火,他绝对不能容忍欧洲任何强国稍稍触犯他所独占的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

《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发来如下报道:

“奥地利曾探询,俄国宫廷是否将反对欧洲任何一个强国获得对土耳其基督徒的保护权。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俄国不会允许任何其他强国插手正教会的问题,俄国与土耳其政府订有条约,将同它单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还在《旗帜报》上看到:

“尼古拉不准备接受非由土耳其君主本人直接提出的任何建议；这样他就否认了欧洲强国进行调停或干预的任何权利，——这是对那些强国的一种不能说是不应遭受的侮辱。”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通报中唯一重要的地方就是宣告联军分舰队已经进入黑海，目的是“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止俄国海军对土耳其领土或舰队作任何新的进攻”。**一事不重罚。事后人情。**在昨天的《纪事晨报》上刊登了该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 12 月 30 日的电讯，报道联合舰队已进入黑海。

《每日新闻》写道：

“舰队进入黑海，大概只是要做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所做过的事，就是什么事也不做。”

《新闻报》则报道说：

“英法两国舰队各有一艘军舰接到进入黑海并挂军使旗驶入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命令。军舰到达该地以后必须通知俄国海军上将：如果他驶出塞瓦斯托波尔港，将立即受到炮击。”

尽管俄国舰队在这个不十分适宜的季节以及在锡诺普会战中建立了光荣的功绩以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驶入黑海，但是沙皇不会让英法哪怕是暂时地把他从这个海域排挤出去，自从 1833 年以来，他就已经胜利地把它从这里排挤出去了¹⁶。如果他不以宣战来回答这个通知，就会丧失他的威信。《新普鲁士报》声称：

“俄国向英法宣战比俄土之间迅速媾和的可能性更大。”

就俄国无端进攻土耳其一事在纽里(阿尔斯特)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我很高兴，承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盛情给我寄来关于纽里大会

的报告,使我有机会向读者介绍这位绅士演说中最引人入胜的几句话。我已经不只一次地陈述过我对东方问题的观点,这里无需指出我无法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那些论点¹⁷。我只是想指出,下面的报道证实了他的观点:

“小瓦拉几亚的农民在瓦拉几亚兵士的支援下已经起来反抗俄国人。在卡拉法特四周以及沿多瑙河左岸的整个地带都行动起来了。俄国官员已经撤离图尔马尔。”

乌尔卡尔特先生讲了几句开场白以后接着说:

“在牵涉到我们与别国之间的最重大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与别国交往的问题上,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制度的指导,没有对人民的责任,没有对任何失职或任何犯罪的制裁。你们完全被剥夺了一切宪法规定的约束手段,因为你们不是被封锁了消息,就是只能听到歪曲的报道。因而,这种制度就是要使人民走入歧途,使政府腐化,并且使国家遭到危害。同时,你们都敌视这个最老奸巨猾、因循守旧、穷兵黩武、恬不知耻的政府,这个政府依靠了它力图颠覆的那些政府的帮助,为建立它威胁全世界的霸权开辟了道路,而我们目前处境的特点在于,正如过去在雅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国在这个具有最反对它的政策的代议机构的国家内部已经找到了或是说已造成了它的势力的主要工具。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对这类问题一无所知。美国有总统,他享有王权素有的特权。那里还有参议院,能监督行政权并预先了解行政法令。(听啊,听啊!掌声)在法国,曾多次指定议会委员会去研究国事;它们调阅文件,并召请外交大臣前去进行质询。那里的人民对得到的情报也是警惕的,至少是认真对待的;政府也同样是如此,因为这些问题决定着内阁和王朝的命运。在奥地利,至少还有一个了解自己臣仆行动的君主。在土耳其和俄国,情况是这样:其中一个国家是人民的意志制约政府,而另一个国家则是政府代表人民的意志。只有英国的国王没有权力,政府没有制度,议会没有监督权,人民一无所知。(听啊!听啊!)现在回过来谈谈目前的形势和我们面前的事实,首先我要告诉你们(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俄国没有力量进行威胁;它指望的只是虚张声势地把你们吓住;它根本不打算对土耳其作战,它没有钱打仗,甚至也没有准备好,它希望你们遏制土耳其,使自己能乘机占领土耳其的领地;而现在它还期望你们

迫使土耳其屈从那些将使奥斯曼帝国瓦解的无耻要求。(听啊！听啊！)正是由于你们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和你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分舰队的支援，俄国即将达到它的目的。在这里，我必须请你们注意我高贵的朋友切斯尼上校的声明，同时必须弥补他的一个疏忽。他说，从渡过普鲁特河以前的形势来看，土耳其比俄国强，但是他并没有向你们说明他现在和过去对土耳其人军事素质的高度评价。他说，即使目前由于你们的帮助俄国处于极大的优势，他仍然怀疑土耳其是否真的比俄国弱。对于土耳其不比俄国弱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只是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们的大使和分舰队都被召回；第二，土耳其不再软弱地依赖外国人。以后他又作了一个含含糊糊的声明，这个声明既然出于这样高的权威——在这些问题上再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就有可能产生不恰当的影响，或者遭到曲解。他说，目前，时机对于俄国可能是很有利的，因为多瑙河已经封冻，这使它有可能把它的军队调往保加利亚。但是它有多少兵力调往保加利亚呢？几个月来，在欧洲听到的一直是夸大的报道，有人煞费苦心地向我们宣传说，俄国集结了大量军队准备军事行动，目前估计军队人数达15万。人们也几乎相信15万人就足以占领土耳其了。不久以前我获得一个官方的消息，说渡过普鲁特河的军队人数总共只有8万，而其中因病死亡或住院的就有两三万人。我曾将这个消息寄给一家报纸，但是没有刊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消息难以置信。现在，俄国自己公布了一个消息，把军队的总数缩减为7万人。(掌声)假如不谈两个帝国调动自己全部军队后兵力的对比情况，那也应该明白，只用这样数量的军队，俄国是无意作战的。而土耳其有多少兵力用来抵抗呢？以前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之间土军人数不下18万，现在已增加到20万，他们的筑垒阵地十分坚固，而俄军人数已缩减，最多也不过5万人，并且因为挫折和潜逃，士气不振。关于土军的素质和他们比俄军优越的地方，你们已经听过贝姆将军的证言，而切斯尼上校也是一个目击者，他的话已经由引起整个欧洲惊讶、赞叹的事件证实了。请注意，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两个帝国力量的对比，而是其中之一即俄国的意图和行动方式。我认为，俄国不准备打仗；因为，一方面它没有准备好必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可以寄希望于英国内阁。俄国以前不想打，现在也不想打。还在战争开始之前，我就说过，俄国将在英国帮助下侵入并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为什么我能预见到这点呢？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知道了俄国的计谋，对于这种计谋，许多人都同我一样清楚，或许比我更清楚，而是因为我知道英国在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过，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不谈。切斯尼上校说，关键在于俄国配备在

普鲁特河对岸的预备队。最近他听到了许多关于这支预备队的消息。有人说，奥斯滕-萨肯为了雪奥尔泰尼察失败之耻，带了5万士兵完全以行军队形开到多瑙河。后来，5万人变成了18000人，而最有趣的是，连这18000人也没有到达目的地。(笑声和掌声)如果我们以切斯尼上校所说的75000人这一数字为准，减去死亡和患病的，还有5万人，再加上这支到处都出现的预备队18000人，那么最后总共也只有7万人去同已经作好坚固防御工事的20万人相抗衡，而且又是在山区和俄军一贯避免作战的季节。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上次战争即1828—1829年战争中的事件。那时土耳其正发生内乱。穆斯林相互屠杀，各地发生暴动，希腊举行起义，原先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歼灭，未受严格训练的新兵总共只有33000人。不列颠舷侧炮在纳瓦里诺港的猛烈轰击夺走了土耳其对黑海的控制权；而且那时得到英法支持的俄国在土耳其获悉宣战消息以前突然向土耳其攻击，直抵土耳其欧洲领地的中心。你们想，那时俄国估计需要调用多少兵力呢？216000人。(掌声)仅仅因为人们使用了欺骗手段，并且在英国大使(可惜，他已经回国了)的影响下，土耳其才不得已签订了由于突然攻击逼出来的阿德里安堡条约¹⁸。(听啊！听啊！)你们请看一下现在的土耳其，它团结一致，充满因热爱祖国、憎恨暴力而激发的英雄气概，它权力集中，资源丰富，可以征召举世无双的斗志高昂的30万名志愿兵，拥有在亚洲屡获胜利的训练有素的25万士兵，它拥有对黑海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绝对没有在锡诺普会战中失去，这点我立即就要谈到——，它有一支蒸汽舰队可以一无伤亡地、及时地把军队从帝国最遥远的地方运送到战场。从高加索积雪的山头到阿拉伯荒芜的沙漠，从非洲的原野到波斯湾——到处人们都义愤填膺，英勇不屈。(听啊！掌声)但是，正像上次战争中的纳瓦里诺会战¹⁹将哥萨克引入巴尔干一样，现在英国的螺旋桨可能甚至不经战争就把俄国古老的舰船引进达尼尔海峡。不过我讲的是俄国的意图。事情的实质也就在这里。今日的胜利应该在唐宁街^①取得，而不是在东方取得。然而，难道你们没有受到损害吗？难道今天到会的人中间有人没有受到严重的侵犯吗？有谁不是付出更多的钱去买面包，不是减少了就业的机会或是投资的机会呢？(听啊！听啊！)谁的税负没有增加？难道交易所街^②没有发生混乱吗？难道我

① 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是英国政府的所在地。——编者注

② 伦敦的一条街，是进行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场所之一。——编者注

们没有亲眼看到俄国军队的调动所引起的金融市场的混乱已经相当于 1847 年混乱的三分之二了吗？可是俄国根本没有作战的意图。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欧洲一些政府已经崩溃，暴动和混乱的前提已经产生了吗？可是俄国根本不想作战。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由于俄国调动了 7 万人的军队（这些军队要土耳其供养，也要大不列颠工人供养），奥斯曼帝国已为建立一支 50 万人的庞大军队而消耗殆尽了吗？这些情况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你们信任了那些轻信的人，他们认为，俄国非常强大，没有人能同它较量，而土耳其又是这样孱弱，给予任何支援也无济于事。我们真是生活在充满梦呓和神话的时代；我们不但能相信这一切，而且能够相信，俄国比联合起来对付它的全世界列强都要强大。《泰晤士报》对穆斯林军队估计过低，对法国陆军和英国海军也估计过低，它还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整个欧洲加上土耳其要想阻止俄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就像要阻挡北风吹入萨马尔马特平原一样。这种对欧洲的议论实际上正是针对土耳其的；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下去，土耳其定将灭亡。俄国调动了 7 万人，结果土耳其充满了恐惧和愤懑，英国恐慌得发抖，俄国也在发抖，它是狂笑得发抖。（笑声和长时间的掌声）我说过要回头来谈一下锡诺普会战¹⁴，或者如人们正确称呼的那样，小纳瓦里诺会战。我不想把这一不愉快的事件同我们的做法联系起来谈，——我们在这次事件中的做法并不比在其他事件中的做法更丢人——我之所以谈这件事，只是因为它说明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战一点也没有加强俄国，一点也没有削弱土耳其，而是恰恰相反。这次会战非常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有一切理由害怕土耳其人的勇敢。这里，我们看到了我国海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事迹：巡航舰靠向战列舰，指挥官们把火炬投入火药舱而为祖国牺牲。为了反抗这个在每一事件上，特别在这次事件上受到每个人憎恨和厌恶的政府，他们已做到了一切。请注意，土耳其的海军依然完整无损；没有损失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蒸汽舰。现在，如果外交官员被召回，土耳其对黑海的控制权就有了双倍的保证；正是这些人，而且也只有这些人，造成了所谓锡诺普惨剧。可是制造这场惨剧是别有用心的，是想以此鞭策巴黎和伦敦的掉队的驮载牲口，迫使它们将协议条件强加于交战双方。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我听到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说，如果英法希望由它们进行调停以保持和平，那它们是完全能胜任的。我知道他所说的是所有英国人的共同看法，然而，我听了仍然感到很可怕。谁给予你们权利到处横行，用武力强求和平？反抗侵略是一回事，进行侵略则是另一回事。（听啊！听啊！）即使为了拯救土耳其，你们除了向俄国宣战外，也不能进行干预。无论如何，你们进行干预会对俄国有利，而且会受

俄国的指挥,其结果是迫使土耳其接受把自己导向毁灭的条件……谈判的时候也许你们会建议土耳其废除它过去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以换取一种欧洲协议。这个建议实际上已经提出,而且受到那个一贯对荒诞现象欢呼的国家的欢迎。老天爷!欧洲协议!这就是土耳其所应期望的!你们的维也纳条约当然是一种欧洲协议,而结果又如何呢?这个协议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建立了波兰;而波兰的情况又怎样呢?当波兰灭亡的时候,你们的大臣又是怎样向你们讲这个条约的呢?他竟然这样说:‘它已使英国有权就波兰事件提出意见。’接着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在事件发生以前他已经提出抗议了,又说:‘可是俄国在这时持另一种看法了。’你们现在的协议情况也会是这样,俄国将持另一种看法了。(热烈的掌声)这些话都是在下院里说的,而且就是这位过去掌握波兰命运而今又掌握土耳其命运的大臣(帕麦斯顿勋爵)说的。不过现在有人预先告诫你们,而那时你们一无所知……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泰晤士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报道。其中谈到,我们驻波斯的公使同沙赫政府意见不一致,沙赫政府已经准备让步了,俄国公使突然插进来企图使争论尖锐化。请看,就在俄国把英国排挤出波斯的同时,英国却把俄国的统治强加于土耳其。这篇通讯还提到:一个外交代表团已经抵达德黑兰;阿富汗人非常愤怒;俄国的死敌多斯特-穆罕默德对自己的代表团劝说波斯支援土耳其一事的成败十分关切。你们大概还记得,十六年前,英国为了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向阿富汗人宣战,因为他是英国的敌人,是俄国的忠实盟友。也许,你们的政府相信了这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奇怪了,它不去同俄国作战,而同阿富汗人作战,这种做法恰恰是要把阿富汗人推入俄国的怀抱。可是,你们的政府没有相信这一点;当时它十分了解,多斯特-穆罕默德,正像现在可以看到的那样,是俄国的死敌,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的政府就向他进攻。真相已经查明,而在下院也已经证明,那些把多斯特-穆罕默德错误地说成是俄国盟友的文件完全是伪造的。英国公使本人把原件寄回国来公布了。(无耻!)这一切就是政府行动偷偷摸摸,而全国人民不明情况(这点我已说过)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后果。我看在我们的大会上没有一个人不是默认这次罪行的同谋者,也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漠视国事和国家的荣誉而堕落到奴隶的地位,虽然,他们还自以为是一个自由的人。(听啊!听啊!)请允许我告诉你们一些外国人对你们的看法。近来你们已经听到了许多关于德国人对宫廷的影响的话。你们或许想听听女王的德国堂兄们的意见,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如果德国倾向俄国,那么这正是英国造成的。请仔细听听下面的一段话:

‘只要英国和法国不干预土耳其的事务,土耳其就会胜利。相反,如果一味

奴颜婢膝的西方强国不能停止“调停”，即不能停止干预东方的事务，那么土耳其的命运就被注定了，而俄国的哥萨克不久就会成为全世界命运的主宰者！虽然在外交上有种种不轨行为，尽管土耳其错误地把杀人的匪帮当作自己的朋友，但是不幸的土耳其迄今的立场和态度毕竟是高尚的。看来，情况的确不妙！我时时担心联军舰队会炮击土耳其的首都，以挫伤它的斗志，强迫它可耻地投降。土耳其人真的可以这样说：“长期没有正义，长期受蒙蔽，可是我渴望着走向那真理的最高峰！”^①现在土耳其人的行为同英国在同样的情况下的行为真有天壤之别！他们是在“战斗”，而英国却在做强盗。请你们回忆一下《利马宣言》、入侵阿富汗、炮击哥本哈根、纳瓦里诺会战，再想一想土耳其目前的处境就够了。土耳其受到屈辱和威胁，甚至领土受人侵犯，受到“文明世界”的挑衅，可是土耳其在所有这些遭遇面前仍然是沉着、清醒、坚强、果敢而冷静。’

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出，你们热情地给我一个特权，使我能够发泄胸中的愤慨，并有机会预告今后将发生的事情，对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只能狂然叹息而已。请允许我描述一下你们目前的处境。现在不列颠有两个特点：它对国内来讲是个白痴，对外来讲是个狂人，是武装起来的狂人，它使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都遭到危险。就每个人来讲，你们不是这样的人，但是集合在一起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愿你们个人的洞察力能够苏醒，约束这个集体的狂人，直到你们可以治疗这有病的头脑——这个万恶之源的制度。”（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对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讲话，我可以补充一点：帕麦斯顿勋爵最近一次的功绩以及他所得到的人民对他的好感，即使不能使他成为正式的首相，也能使他成为实际的首相。²⁰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10 日

载于 1854 年 1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8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1 卷第 341 行。——编者注

卡·马克思

* 东 方 战 争²¹

1854年1月14日于伦敦

久待解决的东方问题看来终于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再也不能仅仅采取外交手段，进行反复无常和毫无结果的活动了。本月3日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已进入黑海，企图阻止俄国舰队对土耳其舰队或土耳其沿岸地区的袭击。沙皇尼古拉以前曾宣称，他将把这种行动看作是宣战的信号。那么，现在他会漠然置之吗？今天得到的消息说，法英两国的联合舰队正和土耳其海军第一分舰队共同把17 000名土军运往巴统。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这就像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一样，是一种战争行为，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

但是俄国会不会孤立呢？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这一场全面战争中将站在哪一方面呢？

据说，路易·波拿巴曾告知奥地利政府：如果法国同俄国发生冲突而奥地利站在俄国方面，那么法国政府就将利用只需一点火星就足以重新燃起燎原烈火的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风潮，而且法国将试图恢复意大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但是，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奥地利政府受本身财政困难的影响将比受波拿巴的威胁的影响大。

最近时期，贬值的纸币流通量不断增大，其次，政府不久以前采取了一项紧急措施，以法律规定它发行的纸币贬值 15%，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推断奥地利国库的情况。这种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也许是在征税方面的登峰造极的发明，因为这种做法就是税上加税。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奥地利 1854 年的预算在经常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 4 500 万弗罗伦，在特别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 5 000 万弗罗伦。奥地利决定第一百次发行公债，但是看来不会成功。它现在提出发行 5 000 万弗罗伦的公债，显然是为了支付到期的利息和应付其他一些刻不容缓的急需。

当联军分舰队即将进入黑海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货币兑换商们大忙了一阵，纷纷把纸币换成银币。持有 100 和 200 弗罗伦纸币的人们拥挤在这些兑换商的会计室里，力图挽救受到威胁的财产。然而在决定关头，圣彼得堡对维也纳的影响将占上风，使奥地利参加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并站到俄国方面。至于普鲁士，它仍企图玩弄 1780、1800 和 1805 年的那套把戏，即建立中立的波罗的海各国或北德意志各邦的联盟，而它居于盟主的地位就可以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可以投到许给它好处最多的那一方面。

毫无疑问，土耳其和欧洲的舰队能够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和俄国的黑海舰队；它们能够夺取并守住克里木，能够占领敖德萨，封锁亚速海并发动高加索山地居民。在波罗的海将要采取的措施与在黑海所采取的措施一样是十分明显的，这些措施是：不惜任何代价同瑞典建立同盟；必要时，还得恐吓丹麦；派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在芬兰登陆，以发动芬兰的起义，并确保只有在该省重新同瑞典合并的条件下才签订和约。在芬兰登陆的部队可以威胁彼得堡，而舰队则可以炮击喀琅施塔得。

这一切都决定于欧洲海上强国的行动是否坚决有力。

12月29日的《新普鲁士报》证实了俄皇命令帝国所有部队作好战斗准备的消息。他不仅从英国和法国银行提出了他的存款，而且命令在贵族中间进行募捐，并停止修建铁路，以便把腾出来的全部人力和财力用于战争的需要。

另一方面，法国比过去更加紧张地进行扩军备战；1852年的8万应征兵员总额中还没有征召的一半也征召入伍了。法国也早就打算发行2亿法郎（约合800万英镑）的公债，但是粮食匮乏、葡萄歉收、生丝减产、工商业普遍停滞、对2月底的支付的严重忧虑、国家有价证券和铁路股票跌价的趋势等等——这一切情况决不会有助于公债的发行。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政府今年准备把水兵和海军陆战队扩充到53 000人，即较去年议会通过的数字约多8 000人，而在德比勋爵内阁时期已经下令增加了5 000人。因此可以说，从1852年以来海军人数约增加13 000人。海军将有38 000名水兵和见习水兵，15 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锡诺普事件¹⁴终于真相大白。根据有关俄国和土耳其在锡诺普的兵力对比的消息看来，俄军比土军多三艘两层甲板蒸汽舰、一艘三层甲板舰和680门火炮。因此，锡诺普事件丝毫没有使俄国的力量增强，也丝毫没有使土耳其的力量减弱，而且可能正相反。这里我们看到了甚至在英国海军史上也从未有过的事迹：巡航舰靠向战列舰，指挥官们把火炬投入火药舱而为祖国牺牲。土耳其海军的主力依然完整无损，没有损失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蒸汽舰。不仅如此，根据最近的消息，俄国舰队最好的三层甲板舰之一、装备有120门火炮的罗斯季斯拉夫号被土军击沉了。此事一直被巧言掩饰，说罗斯季斯拉夫

号不是在战斗时而是在战斗后不久沉没的,但现在俄国人已公开承认了²²。这大大抵消了土耳其舰队的损失。如果确实有一艘三层甲板舰被击沉的话,那么可以推测,俄国其他舰船在战斗中也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伤,归根到底,锡诺普的胜利可能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埃及的帕沙一听到锡诺普惨剧,就下令立即装备六艘巡航舰、五艘轻巡航舰和三艘二桅横帆舰,以弥补土耳其舰队舰船的损失。

埃及的蒸汽巡航舰佩尔瓦茨-巴赫里号经过近五小时的战斗后被一艘比它大得多的俄国蒸汽巡航舰弗拉基米尔号击坏和俘获。它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好不容易地被拖到塞瓦斯托波尔后就立即沉没了。佩尔瓦茨-巴赫里号全靠轮机长英国人贝尔先生的帮助才到达塞瓦斯托波尔港,海军上将科尔尼洛夫曾经答应,如果他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便立即让他自由。但是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后,贝尔非但没有被释放,反而和他的助手们——轮机兵和锅炉兵一起被严密拘禁,每日只给三个便士的微薄口粮,而且俄国人还要他们在这严寒季节步行 80 英里到俄国内地去。在塞瓦斯托波尔担任指挥的缅施科夫公爵得到了沙皇和他的大臣们的赞许,后者对敖德萨的英国领事和圣彼得堡的英国大使的抗议置之不理。大家都已经知道,在锡诺普会战中,有两艘从事私营贸易开到该处的英国商船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无情地击沉了。下面是一家法国报纸发表的关于其中的一艘船被击沉经过的简明的报道:

“11月30日,从英国南部港口比迪福德开来的霍瓦德号二桅帆船,为奥地利驻锡诺普的领事皮伦茨先生卸完煤以后,停泊在该处装载压舱物,准备驶往法特萨装载谷物运往英国。突然俄国舰队出现了,它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也不给外国船只以离开危险区的机会,就对停泊在该处的土耳其舰队进行猛烈的射

击。只几分钟霍瓦德号以及港内的其他商船就全部被击沉了。”

这一粗暴地破坏国际法的行径在敖德萨的战报中竟然被大肆夸耀。同时，俄国报纸还用侮辱性的语言宣称，英国舰队不敢开进黑海，英国政府也不敢阻止俄国军舰利用英国的修船厂进行修理。

最近的邮件又给我们带来了有关近期亚洲军事行动的补充消息。看来，土军已经被迫全部撤出了俄国的亚美尼亚地区，不过，迫使他们撤退的那些会战的确切结果，尚不得而知。土耳其的一个军是沿着从阿尔达汉直通阿哈尔齐赫的大路进入的，而另一个军是在这以南，沿着从卡尔斯经亚历山德罗波尔（格鲁吉亚语为库马里）到梯弗里斯的道路前进的。看来这两个军都遇上了俄军。根据俄国的报道，这两路土军都被击溃，并损失了约四十门火炮；我们没有土耳其的官方战报，但是据一些私人的消息说，撤退的原因是必须转移到冬季营地。无疑，除了圣尼古拉堡外，俄国领土上的土军都撤退了，俄军追击土军，俄军前卫甚至大胆地进到距卡尔斯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但是在那里被击退了。此外，我们知道，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军团是从古老的穆斯林蛮风之源的亚洲各省征召来的，其中有大量的非正规军、勇敢强悍但不可靠的善于冒险的士兵、兵痞和库尔德斯坦的强盗；这个安纳托利亚军团同安分的、有纪律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鲁米利亚军团毫无共同之处；在鲁米利亚军团中，指挥官了解每天在他管辖下有多少士兵，是什么样的士兵；在这个军团里有军事条例和军事法庭可以制止个人的冒险欲望和掠夺习气。我们知道，在亚洲战役初期兵力奇缺的俄国人，后来得到中将奥勃鲁切夫第二指挥的第十三步兵师（16 000 人）和一支顿河哥萨克部队的增援；我们知道，他们控制住了山地居民，保持住了经过弗拉季卡夫卡兹穿越高加

索山脉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交通线以及由海上到这两地的交通线。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再加上土军的司令官阿卜迪帕沙不是一个叛徒便是一个傻子(他后来被召回;被派去接替他的是艾哈迈德帕沙),那么土军的失败就毫不足怪了,当然没有疑问,俄军的战报照例都是夸大的。

在多瑙河,俄军不久以前攻击了位于该河支流上的默钦堡。有一艘蒸汽舰和两艘炮艇开近这个堡垒,它们遭到猛烈的炮击;据说炮艇都被击沉,蒸汽舰也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赶紧退却。曾经发生过三四次小冲突,其中有的是在卡拉法特的两军前哨之间,有的是在多瑙河的俄军哨所和渡河偷袭的土军小部队之间。土军说自己在所有这些小规模的战斗中都占了上风。可惜土耳其没有更早地使用自己的非正规部队来更积极地进行这种小规模战斗,因为对他们来说,执行这种任务比执行其他任务更合适。这些部队完全可以应付裕如地抗击哥萨克,破坏敌人长达 300 英里因而必然很薄弱的前哨线,打乱俄军的计划,彻底侦察清楚敌人的一切活动,并且只要保持应有的谨慎和大胆,在每次遭遇战中就都能取胜。

刚刚收到的电讯说:

“本月 6 日土军一个师 15 000 人携火炮 15 门,向距卡拉法特不远、构筑有战壕的切塔泰阵地攻击,经过猛攻加以占领;俄军损失 2 500 人;从卡腊卡尔开来的俄军增援部队 18 000 人,在损失 250 人后,被迫退却。”^①

另一则电讯说,小瓦拉几亚大部分居民都奋起反对俄军;后者已在克拉约瓦实施戒严。

在此期间,俄国竭尽全力在世界各地,在英属印度的边境、在波

① 1854 年 1 月 13 日《泰晤士报》第 21637 号。——编者注

斯、在塞尔维亚、在瑞典、在丹麦等地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在波斯，英国公使和沙赫政府之间发生了分歧，后者正准备让步时，俄国大使插手进来，不仅竭力挑动沙赫对英国的愤恨，而且激起他对土耳其政府的强烈的敌意，并驱使他向土耳其宣战。但是，据说这个阴谋失败了，其原因是英国代办汤普森先生威胁说他将离开德黑兰，沙赫害怕会立即引起波斯人民反俄的怒潮，同时阿富汗外交代表团来到恫吓说，如果波斯同俄国缔结同盟，阿富汗人就要进占波斯领土。

大批俄国间谍一起出动涌向塞尔维亚各地。他们寻找过去以忠于被放逐的奥布廉诺维奇家族而出名的地方和人们，并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同一些人谈论年轻的米哈伊尔公爵，同另一些人谈论他的老父米洛什，在谈话中时而使他们觉得有希望在俄国的保护下扩大塞尔维亚的疆界，把现在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统治下的全部操塞尔维亚语的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伊利里亚王国，时而又威胁说，如敢反抗，就派大军侵入，把塞尔维亚完全征服。俄国尽管不断使用这类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仍然破坏不了塞尔维亚人和苏丹之间的关系。相反，贝尔格莱德正在等待接受君士坦丁堡发出的两道敕令：一道敕令是断绝塞尔维亚同俄国之间原有的一切联系，另一道敕令是把各个时期承认给塞尔维亚人民的所有特权肯定下来。在另一方面，俄国政府还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积极进行谈判，企图说服瑞典和丹麦政府在即将到来的欧洲冲突中站在俄国一边。俄国企图同这些国家缔结同盟的主要目的，在于封锁松德海峡和贝尔特海峡以对付西方强国。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俄国所得到的却是，瑞典、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缔结了武装中立的条约²³，和进行了显然用来对付俄国本身的武装准备。从瑞典发出的一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人们因为俄国未经宣战而无耻夺占的芬兰公国有可能归还这个斯堪的纳

维亚王国而感到欢欣鼓舞。至于丹麦,它的(不是人民的,而是宫廷的)态度还不很明确。甚至传闻现任的丹麦外交大臣将呈请辞职,而由雷文特洛-克里米尼尔伯爵这位以同圣彼得堡的宫廷有着密切联系而出名的人物继任。在法国,由于俄国的影响,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的问题²⁴取得了某些成绩;同时俄国也正千方百计地破坏英法政府之间的友好协约²⁵,并在它们之间散播不信任。某些接受基谢廖夫先生津贴的巴黎报纸企图使人们相信英国政府不是真心诚意的。我们也看到,接受布伦诺夫先生津贴的一家英国报纸也在怀疑法国政府是否真诚。另一个主要针对西方强国的打击是俄国禁止波兰输出粮食。

然而,西方强的外交活动丝毫不带有敌视俄国的性质。正相反,这些活动表现出一种倾向:千方百计地对正义敷衍搪塞,对罪行迁就妥协。现在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这样的行动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最近六个星期以来外交方面的主要事件有下列几点:维也纳会议²⁶重新召开了;会议参加者于去年12月5日拟定了议定书;法国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给路西德帕沙写了一封信;²⁷12月15日四大强国交给土耳其政府一份共同照会¹³,该照会于12月31日为苏丹接受;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向法国的驻各国外交代表发出12月30日通报,告知联军的舰队即将进入黑海。关于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读者大概在此之前已了解了它的内容。再没有什么比议定书中的下列论点更荒唐的了:

“俄皇所作的几次保证,排除了关于那位至尊的皇帝怀有妨碍奥斯曼帝国完整的任何意图的看法。”

也没有什么比议定书敦促土耳其同意签订三个月的停战协定更

有害的了。在可耻的锡诺普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两天以后,即12月5日,路西德帕沙写信给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告知锡诺普来的消息,并请求联军舰队进入黑海^①。12月12日,即路西德帕沙发出照会后一个星期,他收到两位大使非常冷淡的复照,复照中通知他说:

“联军分舰队的存在具有‘政治意义’,因而不具有军事意义,这是‘道义支援’,因而不是海军支援。”

于是,土耳其政府被迫接受12月15日的四强联合照会。这个照会对于土耳其政府因专制君主海盗式的行为所受的损失没有规定任何赔偿,而且主张重申过去的一切条约——凯纳吉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和其他条约²⁸,这些条约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是俄国从中取得欺骗、干涉、进犯和吞并的武器的武库。除此之外,这个照会还使沙皇如愿以偿,取得对土耳其的宗教保护权和行政指导权,因为在照会中写明,

“土耳其政府应当把它给予所有非伊斯兰教臣民的宗教特权的敕令的内容告知各强国,同时对每一强国作出适当的保证”^②,

而且土耳其政府应当宣布它更加有效地推行行政制度改革和内部改革的坚定决心。

虽然从这些新建议的字面上看来,是授权欧洲五强国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但实际上这种权利只给了俄国。这一协议的

① 《路西德帕沙请求英法联军的帮助》,见1853年12月26日《每日新闻》第2371号。——编者注

② 1854年1月10日《每日新闻》第2384号。——编者注

实质是：法国和奥地利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应当保护土耳其的罗马天主教徒，英国和普鲁士是信奉新教的国家，应当保护苏丹的新教臣民，而俄国则应保护信奉正教的臣民。但是，土耳其信奉天主教的还不到 80 万人，信奉新教的不到 20 万人，而信奉正教的却将近 1 000 万人，因此很清楚，沙皇实际上获得保护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权利。直到 12 月 19 日，即里扎帕沙和哈利勒帕沙进入内阁，因而保证了“主和派”或者说“亲俄派”的胜利以后，土耳其政府才接受了四强国的建议。

12 月 21 日，当内阁会议已经通知四国大使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的消息传开的时候，索弗特（大学生）就聚集起来呈递请愿书，抗议政府所作的决定，只是在逮捕了为首的学生以后才阻止了风潮发生。炽热的怒火席卷了君士坦丁堡，以致苏丹^①在第二天既不敢到国务会议厅，也不敢像平时一样在礼炮齐鸣和外国军舰全体舰员的欢呼声中驾临托普哈内的清真寺；而路西德帕沙则从自己的斯坦布尔的官邸逃到同苏丹宫室相邻的一座官邸去避难。第二天苏丹出告示，宣称不停止军事行动，于是公众情绪才稍稍平静下来。

在最近的阴郁的九个月中，西方国家的这些狡黠诡诈、畏首畏尾、莫名其妙的外交活动，几乎使公众再也无法忍耐，使人们对英国政府的诚意发生怀疑。由于无法理解西方强国这样长期容忍的原因，人们开始谈论在幕后的那些势力。传说纷纭，有人说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干预朝政，他不仅伴随他的身为君主的夫人参加枢密院的会议，而且还利用他的影响操纵负责的枢密顾问官的行动；他一方面利用机会参加女王同大臣们的会商，同时同法国除外的一切外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国宫廷(包括俄国宫廷)保持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另外一种传说是:法国旧王族的奥尔良派同波旁王朝的长系的“联合”,从英国宫廷那里得到了几乎同俄国宫廷一样的支持。为证明这一点,人们还指出了奈穆尔公爵在同“亨利五世”^①商谈后立即拜访了维多利亚女王宫廷的事实。

第四种传说是:经俄国同意,关于东方问题的谈判已经完全委托迈恩多夫伯爵的内弟布奥尔-绍恩施坦伯爵居中斡旋。这一传说被用来证明,英国政府从来不希望进行独立的、有效的谈判,而是表面上反对俄国,实际上从一开始便尽力促使俄国及其同盟者的阴谋得逞。人们确信罗巴克先生准备向下院而布鲁姆勋爵向上院提出科堡家族影响的全部问题。毫无疑问,目前科堡家族的影响问题几乎是首都人们的唯一话题。议会将于本月 31 日重新召开。

从 1809 年以来,这里还没有过像今年这样寒冷的冬天。但最可怕的并不是严寒,而是温度和天气变化无常。火车行驶极端困难;有些地方的交通似乎完全中断,而且就交通工具来说英国简直回到了远古的时代。为了减少由于积雪使商业文书的邮递受阻而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及防止出现因期票被不加解释地拒付而进行公证登记的情况,业已使用电报。尽管如此,伦敦有五百多张期票进行公证登记,这说明了严酷的寒冬给社会造成的混乱状态。报纸上满篇都是关于暴风雪造成可怕的船只遇难(特别是在东海岸)的消息。虽然不久以前公布的贸易、航行和岁入的统计表指出 1853 年开始的繁荣景象继续存在,但是严寒和生活必需品(主要是粮食、煤和油脂等)的涨价严重地影响了下层阶级的生活。饿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国内西

① 昂·尚博尔伯爵。——编者注

部的抢粮风潮目前正形成对北部同盟歇业的一种伴奏。

由于时间不够,关于贸易和商业的详细情况只好留待下次通讯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14 日

载于 1854 年 3 月 6 日《南非人
报》第 3 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²⁹

本报伦敦通讯员的通讯和欧洲报纸上的消息,使我们终于能够对俄土两军之间的一次长时间的会战作出全面的评估。这次会战的地点是卡拉法特以北九英里的一个不大的村庄——切塔泰。虽然在所谈的一系列血战中,土耳其军队表现了高度的勇敢精神并且获得了胜利,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就把俄军逐出瓦拉几亚而言,这些战斗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结果。原因是土军犯了错误,关于这一错误我们已不止一次提起读者注意。我们指的是土军为了切断通往塞尔维亚的道路而分兵派出一支部队到卡拉法特的做法,其实防止俄军侵入那一地区的最好保证应该是在鲁斯楚克和赫尔绍瓦附近保持强大而集中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会威胁任何一支西进的俄军的交通线,而如果在奥尔泰尼察或附近修建一座像在卡拉法特构筑的带有桥头堡的桥梁,就会使土军在多瑙河左岸站住脚。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条件,俄军也不可能在上游渡过多瑙河向塞尔维亚推进而不给土军造成从下游渡过多瑙河向布加勒斯特推进的机会。当然,我们这样说,是根据双方实际兵力的对比,而且认为土耳其的鲁米利亚军团在人数上对俄国的瓦拉几亚军团具有确定无疑的优势。

事实上,土军使用这种优势的方法恰好使自己的优势化为乌有,

并为自己的最终失败准备条件。他们不是把兵力集中在多瑙河下游,而是把兵力分散。他们一方面以 30 000—35 000 人占领维丁和卡拉法特,另一方面则把其余的部队留在多瑙河的中游和下游。土军配置在弧线上,而俄军则配置在这一弧线的弦上。因此俄军要把部队集中到指定的地点,只需通过较短的距离。不仅如此,俄军较短的路线通过的是平坦的地区,而土军较长的路线则要经过山地和许多山间急流。因此,土军的布防是极其不利的,然而他们仍采取这种布防,因为他们抱着一种陈腐的偏见,认为阻止敌人前进的最有效办法是横断他的去路。

12月20日奥美尔帕沙在舒姆拉得知俄军准备于1月13日向卡拉法特发动总攻。当时他还有二十二天的时间。但是根据卡拉法特同其他土军的驻地的相互位置,奥美尔帕沙除了可以从索非亚调来少量的预备队以外,看来不可能给卡拉法特增派援兵了。另一方面,俄军当时并没有从国内得到较多的补充兵力,——1月3日,到处都出现的奥斯滕-萨肯军还没有到达布加勒斯特,——却敢于把部队远远向西方集中,这一情况说明,或是天气情况和多瑙河的水情使土军不能在下流渡河,或是哥尔查科夫有其他根据确信该地区的土军不会有任何的行动。卡拉法特的土军奉命在俄军集结完毕以前向它们攻击。为此当时最正确的就是再次采取在奥尔泰尼察的做法²。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尽管是冬季而且有浮冰,卡拉法特的桥仍然安然无损,而下游也再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修建这种带有桥头堡的桥梁。是不是奥美尔帕沙得到了留在河右岸的命令呢?土军的行动这样自相矛盾,在采取了大胆机智的措施之后这样经常地出现最不可原谅的疏忽失策,这一切的背后必然是外交在起作用。无论如何,哥尔查科夫如果不是确信土军不会重复奥尔泰尼察那样的战法,

他就不会向卡拉法特前进一步。

俄军投向卡拉法特的兵力总数该有三万人左右,因为兵力再少于这个数字,他们就未必敢于攻击一个拥有一万守军、而且至少有一万人作为预备队或作为出击兵力的筑垒阵地。因此,俄军在这个地点至少集中了在瓦拉几亚作战的一半兵力。而分散在很长战线上的另一半兵力又能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抵御得了从奥尔泰尼察、锡利斯特里亚或赫尔绍瓦渡河而来的土军呢?如果保持维丁和卡拉法特之间的联系没有困难,那么在其他地点也可以渡河。这样,俄军由于阵地设在土军配置的弧线的弦上,便能在切塔泰战场上集中优势的兵力,而土军虽然早就知道敌人准备攻击,却无法加强他们在卡拉法特的那个军。土军既无法进行牵制行动以防止整个会战的发生,也得不到援助,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勇敢,指望在敌人集结完毕以前加以各个击破。但是甚至连这一点希望也很小,因为土军不能远离卡拉法特,而敌人兵力较少的任何一个军,却可以离开土军活动的区域。这样,土军战斗了五天,一般都是取胜的,但最后仍然不得不向卡拉法特周围村庄的工事退却,因为俄军在最后又得到了增援,形成了确定无疑的兵力优势。结果,俄军对卡拉法特的攻击很可能业已避免或推迟,而土军表现出不仅能在垒墙和壕沟掩护下,而且能在开阔地上出色地作战。关于交战的残酷程度可以从布加勒斯特发出的一篇通讯中看出,通讯谈到战斗中俄军一个步兵团被全歼,一个枪骑兵团只剩下 465 人。

俄军在奥尔泰尼察攻击了土军的堑壕阵地,而土军在切塔泰攻击了俄军的堑壕阵地。这两次土军都是胜利者,但是没有从胜利中获得任何实际的成果。奥尔泰尼察会战恰好是在停战公告从君士坦丁堡送往多瑙河前线时发生的,而切塔泰会战又同土耳其国务会议

接受西方盟国最近所强加的媾和建议³⁰的消息奇妙地巧合。在前一场合,外交上的阴谋诡计被武装冲突化为乌有,在后一场合,浴血奋战却由于同时进行的某些秘密外交活动而毫无成果。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 月
1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2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9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东方的战事。——
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
——君士坦丁堡的设防³¹

1854年1月20日星期五于伦敦

最近的邮件又给我们带来了有关近期亚洲军事行动的补充消息。看来,土军已经被迫全部撤出了俄国的亚美尼亚地区。不过,迫使他们撤退的那些会战的确切结果,尚不得而知。土军是沿着从阿尔达汉直通阿哈尔齐赫的大路进入的,而另一个军是在这以南,沿着从卡尔斯经亚历山德罗波尔(格鲁吉亚语为库马里)到梯弗里斯的道路前进的。看来这两个军都遇上了俄军。根据俄国的报道,这两路土军都被击溃,并损失了约四十门火炮;我们没有土耳其的官方战报,但是据一些私人的消息说,撤退的原因是必须转移到冬季营地。

只有一点是无疑的,除了圣尼古拉堡外,俄国领土上的土军都撤退了,俄军追击土军,俄军前卫甚至大胆地进到距卡尔斯一英里以内的地方,但是在那里被击退了。此外,我们知道,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军团是从古老的穆斯林蛮风之源的亚洲各省征召来的,其中有大量

的非正规军、勇敢强悍但不可靠的善于冒险的士兵、兵痞和强盗；这个安纳托利亚军团同严格的、有纪律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鲁米利亚军团毫无共同之处；在鲁米利亚军团中，指挥官了解每天在他管辖下有多少士兵，是什么样的士兵；在这个军团里有军事条例和军事法庭可以制止个人的冒险欲望和掠夺习气。我们知道，在亚洲战役初期兵力奇缺的俄国人，后来得到了中将奥勃鲁切夫第二指挥的 16 000 人和一支顿河哥萨克部队的增援；我们知道，他们控制住了山地居民，保持住了经过弗拉季卡夫卡兹穿越高加索山脉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交通线以及由海上到这两地的交通线。

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再加上土军的司令官阿卜迪帕沙不是一个叛徒便是一个傻子（他后来被召回并在卡尔斯被捕；被派去接替他的是艾哈迈德帕沙），那么土军的失败就毫不足怪了，当然没有疑问，俄军的战报照例都是夸大的。我们在《奥格斯堡报》上读到：

“11 月底，沙米尔拚命向南突围，企图与土耳其人建立直接联系，他的部队的人数是 10 000—16 000 人。人们断定，他的部队的精华——穆里德^①已被击溃。”

但是，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

锡诺普事件终于真相大白。俄国舰队最好的三层甲板舰之一——装有 120 门火炮的罗斯季斯拉夫号——被土军在那里击沉了。此事一直被巧言掩饰，说罗斯季斯拉夫号不是在战斗时而是在战斗后不久沉没的，但现在俄国人已公开承认了。这大大抵消了土耳其舰队的损失。如果确实有一艘三层甲板舰被击沉的话，那么可以推

① 意为“希望者”，“寻道者”，是苏非派教团修道的一般成员，完成一定的苦修功课后便成为托钵僧。——编者注

测,俄国其他舰船在战斗中也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伤,归根到底,锡诺普的胜利可能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看来土耳其人在海上打起仗来还真像土耳其人一样^①。埃及的蒸汽巡航舰佩尔瓦茨-巴赫里号经过近五小时的战斗后被一艘比它大得多的俄国蒸汽巡航舰弗拉基米尔号击坏和俘获。它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好不容易地被拖到塞瓦斯托波尔后就立即沉没了。这样看来,俄国人的战利品现在还等于零。事实上,俄国人没有能够从锡诺普会战中缴获一件战利品,这证明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以及俄国舰队在战后的狼狈状态。

有消息说,法英联合舰队和土耳其海军的第一分舰队正共同把 17 000 名土军运往巴统。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就是相当于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行动,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就在联合舰队开进黑海以前,据说沙皇曾命令黑海的所有俄国军舰返回塞瓦斯托波尔。12月24日敖德萨来信说:

“俄国亚速海区舰队司令官派了一个副官到塞瓦斯托波尔去说明他的处境如何危急。两个军(每个军拥有 12 000 人)都已作好开往塞瓦斯托波尔的准备,但是联军舰队在黑海的迅速出现这一消息使这次军事行动突然停止了。”

从最近收到的电讯中可以看出,俄军打算在本月 13 日,即俄历元旦那一天向卡拉法特的土军阵地发动总攻。他们已经调动了切塔泰(卡拉法特以北九英里的一个村庄)附近进入战壕的大约一万名士兵,但是他们没有能够集中自己的全部现有兵力,因为土耳其将军比他们先行动了一步。土耳其将军率领 15 000—18 000 名士兵向敌

^① 英文“like Turks”既有“像土耳其人一样”的意思,又有“残酷无情”的意思。——编者注

人的战壕强攻,在本月6、7、8、9和10日的几次短兵相接中取得了胜利,最后迫使俄军向克拉约瓦方面退却。俄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有1 000人阵亡,4 000人受伤。据电讯报道,“俄军指挥官”安雷普将军“和图伊农特将军均受重伤”。同时有消息说,10日在塞里姆帕沙(波兰人泽德林斯基)指挥下的土军又撤退到卡拉法特。一直作为关于这些极端重要事件的唯一消息来源的电讯就是这些。从那个最后宣称俄军撤到克拉约瓦,而土军则撤到卡拉法特的消息看来,恐怕敌对双方又犯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传说奥美尔帕沙让整个军在奥吕塔河和希尔河之间渡过多瑙河,从而对克拉约瓦的俄军的交通线造成威胁。但是,除了已经作好渡河的必要准备的唯一地点——卡拉法特以外,土军怎能在别的地方渡过满是浮冰块的多瑙河呢?

俄军在卡拉法特遭到的失败,从政治上来看也许比从军事上来看更为重要。这次失败加上联军舰队进入黑海,也就彻底排除了沙皇接受维也纳会议派往圣彼得堡的信使转达的关于和平的诚恳请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次失败的影响必定会立即促进邻近的塞尔维亚的民族派的加强,同时引起最近在贝尔格莱德趾高气扬的亲俄派的恐惧。诚然,亚历山大公爵和塞尔维亚人民群众是不会同意断绝他们的国家同苏丹的关系的,尽管大批俄国间谍一起出动涌向塞尔维亚各地,在各方面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寻找过去以忠于被放逐的奥布廉诺维奇家族而出名的地方和人们,并积极开展活动,同一些人谈论年轻的米哈伊尔公爵,同另一些人谈论他的老父米洛什,在谈话中时而使他们觉得有希望在俄国保护下扩大塞尔维亚的疆界,把现在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统治下的全部操塞尔维亚语的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伊利里亚王国,时而又威胁说,如敢反抗,就派大军侵入,把塞尔维亚完全征服。你们知道,目前住在维也纳的米洛什公

爵老早就是梅特涅的被保护人，而他的儿子米哈伊尔不过是一个1842年从塞尔维亚丢掉王位逃跑出来的俄国傀儡。同时，俄国在卡拉法特的失败还可以使奥地利消除这样的恐惧：俄军会在贝尔格莱德出现，并唤醒那些与俄军同一族系同一信仰的奥地利臣民，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他们在德国人统治下所受的侮辱。

关于奥地利，我可以顺便说，它终于打消了长期以来想发行新的公债的想法。关于它的国库状况，可以从该国政府不久以前把本国纸币贬值15%这一权宜措施看出来；这种财政手段只能同那些善于找窍门的法国造伪币大王的骗人诡计相媲美，后者在需要付款时，就使货币升值，而在需要收款时，则使货币贬值。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奥地利1854年的预算在经常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4500万弗罗伦，在特别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5000万弗罗伦。每当维也纳得到有火药气味的消息时，人们就拥进银行，把纸币换成银币。

大家都知道，法国也早就打算发行2亿法郎(800万英镑)的公债。但是，粮食匮乏、葡萄歉收、生丝减产、工商业普遍停滞、对2月底的支付的严重忧虑、国家有价证券和铁路股票跌价的趋势等等——这一切情况决不会有助于公债的发行。波拿巴没有能够在交易所里找到新公债的买主。因此只好采取政变前夕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派佩尔西尼到法兰西银行强行提取5000万法郎(1000万美元)，而用同等数目的国库债券作为“抵押”。在元旦那天真的这样做了。实行这一财政上的政变的结果是：有价证券的行市下跌到69%。正如现在官方报道的，政府将从法兰西银行得到用国库债券作抵押的200万或300万法郎的贷款。那些不知道元旦那天在法兰西银行大厅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人，自然不能理解这家银行怎么会同意提供交易所拒绝的贷款。

关于波斯的消息仍然互相矛盾。有的消息说，波斯军队正向埃尔祖鲁姆和巴格达推进，而另一则消息说，俄国的阴谋失败了，其原因是英国代办汤普森先生威胁说他将离开德黑兰，沙赫害怕会立即引起波斯人民反俄的怒潮，同时阿富汗外交代表团来到恫吓说，如果波斯同俄国缔结同盟，阿富汗人就要进占波斯领土。

根据在《祖国报》上发表的寄自君士坦丁堡的私人信件，国务会议已经决定在君士坦丁堡向陆一面构筑工事。据说，由欧洲一些国家和奥斯曼的军官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已经开始初步察看地形。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会使俄土战争完全改观，而且对于那些抱有僭称拜占庭帝国皇帝继承者的宿愿的人是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奥地利在巴讷特集结了将由将军施利克伯爵指挥的一个军的传说，德国报刊已予否认。

据柏林《通讯》报道，各级政府都已经收到作好动员后备军³²的准备的通令。

圣彼得堡方面已经向哥本哈根内阁提出把博恩霍尔姆岛让给俄国的建议。

《每日新闻》正确地指出：

“博恩霍尔姆岛可以成为波罗的海的马耳他岛或直布罗陀。该岛距松德海峡和哥本哈根只有一天的航程，它位于波罗的海的入口处。”

雷德克利夫勋爵送交塞瓦斯托波尔总督一份通知书，说联军分舰队已在黑海出现。通知书中指出这一次调动的唯一目的是“保卫奥斯曼的领土以防任何侵犯或敌对行动”，根本没有提到保卫奥斯曼舰队。

从巴黎、维也纳、柏林、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得到的消息都说

明了战争的前景，所以英吉利海峡两岸各个证券市场的价格普遍下跌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20 日

载于 1854 年 2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9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³³

1854年1月24日星期二于伦敦

俄国军队企图同时在整个战线——在默钦、久尔杰沃、卡拉法特——渡过多瑙河，这与其说是真正的进攻，不如说是侦察行动，因为哥尔查科夫将军未必敢于以他现有的力量来发动这样的进攻。

上星期六的《新闻报》(迪斯累里的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沙皇不久以前同某位“杰出的”英国人士在加特契纳举行会谈的简讯。几乎伦敦所有的日报都转载了这篇简讯，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有关俄国外交的陈词滥调以外，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沙皇“明确地宣称，缅施科夫的最后通牒并没有遭到伦敦的反对，而且英国政府在获悉土耳其政府可能接受最后通牒后，已承认这是圆满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切只能证明，关于土耳其政府的“可能的”意向问题，可怜的约翰·罗素受了布伦诺夫男爵的骗，而且土耳其政府拒绝立即接受缅施科夫最后通牒³⁴的责任无论如何不应当推在联合内阁身上。接着，沙皇告诉“这位杰出的绅士”说：

“锡诺普会战的胜利消息传到之后，卡斯泰尔巴雅克将军(法国大使)曾给他一封信，信的开头大致是这样写的：‘请允许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和军人，为了陛下的舰队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向皇帝陛下表示我的祝贺。’”

这里，我想指出，卡斯泰尔巴雅克是老牌的正统派，拉罗什雅克兰的亲戚，他当上将军不是由于在疆场上的功绩，而是由于在宫廷前厅中担任比较不冒风险的差事，由于狂热地信奉崇高的君主主义原则。波拿巴任命卡斯泰尔巴雅克为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以表示尊重沙皇个人的愿望，虽然他十分了解，卡斯泰尔巴雅克与其说会关心自己的名义上的君主的利益，不如说必定会同沙皇合谋来恢复波旁王朝。因此，这位卡斯泰尔巴雅克是“作为一个军人和基督徒”向沙皇祝贺这次无结果的锡诺普大屠杀的很合适的人物。据说沙皇讲过，“我不相信，拥有资产阶级议会的英国能够打一场辉煌的战争”。无疑，沙皇很了解他的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并且对欧洲中等阶级的下流卑鄙的灵魂有恰如其分的评价。最后，沙皇说得完全正确：一方面，他没有准备进行战争(因为他确信通过简单的威胁就能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另一方面，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那就是“无能之辈的战争”，这些人想竭力避免战争，却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最后，自己轻率地投入战争以掩盖自己的错误和保持自己的职位。

“社会舆论几乎有意把阿尔伯特亲王变成流言的牺牲品。最初流传的有利于某个政党的窃窃私语已变为高声怒骂，而意味深长的暗语已发展为明显的骇人听闻的捏造。每个有机会觐见女王的人，一定会在女王陛下那里遇到阿尔伯特亲王，这个事实很引起英国公众的赞许和尊重；但是，后来据说亲王出席女王同大臣们举行的会议；并且，还让大臣们注意到亲王的出席，尽管大臣们不希望讨论问题时有第三者在场，但又不得不这样做，甚至他们必须在亲王面前为自己的意见辩护，亲王实际上已妨碍他们同女王讨论问题；他不仅仅影响女王的意见，而且他由于有权同外国宫廷自由交往，也就在女王枢密院同外国君主

(也许是英国的敌人)的内阁之间开辟了一条不受检查的情报渠道，——总之，阿尔伯特亲王背叛了女王，他被控犯有叛国罪，最后，他以叛国罪被捕，并监禁于伦敦塔。这就是前两天不仅英国各地到处在议论，甚至某些人已经信以为真的事情。”

我从《旁观者》引证这一段是要向读者表明，帕麦斯顿的报刊是如何炮制流言，竭力要把一个可怜的目光短浅的年轻人作为负责的大臣们的替罪羊。阿尔伯特亲王是同欧洲大多数专制独裁政府都有关系的德国亲王。他在高升为大不列颠女王的丈夫以后，就把他的时间一部分用来养猪，一部分用来创制令人发笑的军帽，规划特别透亮的毫不舒适的标准公寓，筹办海德公园展览会和玩军事操练。他被公认为一个和气而不得罪人的、智力中下的人，一个多子女的父亲和温顺的丈夫。可是，近来却有人故意把他夸大成联合王国最有影响的人物和最危险的人物，说他根据俄国的秘密指示，在左右整个国家机器。亲王对宫廷事务是有直接影响的，而这种影响当然是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对此未必能有什么怀疑。亲王只能起亲王的作用，难道有谁竟这样愚蠢而不以为然吗？但是用不着我来提醒读者，不列颠的王权已被不列颠寡头政治削弱到了极其软弱无力的程度；例如大家都知道，威廉四世是俄国的死敌，而他却被他的外交大臣^①——辉格党寡头政治的成员——迫使去同土耳其为敌。如果不是指什么不清洁的绶带或用金银线做的星章这些微不足道的宫廷琐事，认为阿尔伯特亲王还能够做出一件违反内阁的意志的事来，该是多么荒谬！他的专制主义的倾向被利用来转移人民对那些负责的大臣的阴谋活动和叛国行为的注意。如果说这一切叫嚣和攻击有什么意义的

^① 亨·约·帕麦斯顿。——编者注

话,那么,这就是对君主制度的进攻。要是没有女王,也就没有亲王;要是没有王位,也就没有宫廷的影响。如果没有支持亲王的和亲王可以依靠的王位,那么亲王也就失去了权力。但是,请注意,那些最突出地表现自己“惊人的勇敢”、叫喊得最厉害、并且试图从阿尔伯特亲王身上捞取一笔政治资本的报纸,正是那些最卖劲地表示效忠王位和肉麻吹捧女王的报纸。^①至于托利党的报纸,那就不言而喻了。至于激进的《晨报》,正是这家报纸欢迎波拿巴的政变,并且在不久前攻击一家爱尔兰报纸,因为后者竟敢在女王访问都柏林时对她进行批评;也正是这家报纸指责法国革命者的共和主张,并且老是把帕麦斯顿勋爵描绘为英国的救主。整个这件事情都是帕麦斯顿的阴谋诡计。帕麦斯顿由于他的亲俄立场被揭露,又由于他反对新改革法案,³⁵已经失去了威望。反对改革法案的行动已把他的发霉的姜饼上的自由派金纸撕下来。但是,为了做一个首相或者至少做一个外交大臣,他需要威望。现在重新装出自由派的姿态,扮演一下受宫廷阴谋迫害的布鲁土斯角色,该是多好的机会!攻击女王的丈夫对于诱惑人民该是多好的食饵!他必将成为当代最有名望的国务活动家。要侮辱自己的同僚,痛斥他们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工具,促使宫廷相信必须按照帕麦斯顿自己提出的条件重用他,这该是多好的机会!托利党人自然支持这种叫喊,因为比起英镑和地产来(现在地产正急剧地从他们那里转到棉纺大王的手里),教会和王冠对他们又算得什么!当托利党人为了“宪法”和“自由”激烈攻击亲王时,哪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不是虔诚地拜倒在他们的脚下呢?

在曼彻斯特贸易协会年会上,主席阿斯皮诺尔·特纳先生谈到

^① 参看 1854 年 1 月 21 日《人民报》第 90 期。——编者注

罢工、同盟歇业以及一般工潮——他把这些情况恰当地描述为“兰开夏郡的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发生的内战”——的时候，声称：“曼彻斯特已经推翻国王暴政和贵族暴政，同样他们也必定能推翻民主的暴政。”

《新闻报》喊道：

“这无意中向我们供认了曼彻斯特学派³⁶的政策。在英国，国王至高无上——那就限制国王的权力。贵族政体阻碍我们——那就把它从路上搬开。工人闹风潮——那就把工人消灭。”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24 日

载于 1854 年 2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0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
中立。——不列颠议会的成分。
——欧洲的歉收³⁷

1854年1月27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通讯^①中已经指出，君士坦丁堡的设防是土耳其人能够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如果君士坦丁堡设防，同时相应地加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堡垒，土耳其或任何一个占有这个都城的强国都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国力量来保证自己的独立。没有比君士坦丁堡更容易设防的城市了。三角形地区只有一面，即向陆的一面，需要筑起绵亘的垒墙；向马尔马拉海的一面和向金角湾的一面都不需要构筑工事。在离要塞围墙适当距离的地方构筑一条向东伸展的为保卫佩拉、加拉塔和金角湾东北岸的单堡防线，可以同时用来加强要塞围墙，并阻碍敌人迂回要塞围墙，阻碍他们在位于佩拉和加拉塔后面瞰制市区的高地上构筑围攻工事。

① 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这样的要塞几乎是无法攻破的。它的交通线只有在达达尼尔海峡或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占领时才可能被切断；而在这种情况下，该城会立即失守。但是这两个极其狭窄的通道非常容易加强防务，使任何敌人的舰队都无法通过。从陆上进攻的俄军，将不得不依靠危险的海上交通线同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取得联系，而且未必能支持到拿下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俄军由于不断减员，会被城里守军和亚洲来的增援部队打败。

俄国对丹麦的中立声明²³的答复于本月20日送到了哥本哈根。据说俄国拒绝承认中立，而要求丹麦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据说，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法、英、普的大使^①立即同丹麦的大臣们举行了一次会议。现在我从非常可靠的方面获悉（不过我当然不能担保消息绝对正确），圣彼得堡内阁的抗议只是一种装模作样的手法，想以此促使其他强国尽快地正式承认丹麦中立的条件。有人告诉我，不久前，丹麦同英法举行过谈判，决定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军舰将占领松德海峡，而法国的一个军将占领石勒苏益格公国。厄斯特德大臣将这次的联合行动告诉了涅谢尔罗德伯爵。据说俄国为了破坏这次联合行动，曾暗示哥本哈根内阁作出一个中立声明。俄国现在假装表示反对；如果法英承认了丹麦的中立，那就不仅会破坏他们原定的计划，而且由于中立国船只运输的货物不受战争法规的限制，就可以保证俄国的商品通过波罗的海出口。

沙皇对普鲁士获得北海的奥尔登堡港提出的抗议是完全真实的，尽管据说柏林公众已对这位帖木儿的继承人到处进行干预的这种新的表现感到十分惊愕。

① 阿·多特扎克、安·布坎南和阿·奥里奥拉伯爵。——编者注

英国人^①说得对，业已举行的“曼彻斯特改革拥护者大会是一个大骗局”。颂扬阿伯丁的政策，侮辱土耳其，赞美俄国，反对一切对他国事务的干预——这几个涉及对外政策的话题就是曼彻斯特学派³⁶的惯用伎俩；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和其他一些“质朴而谦逊的人”一再地搬弄这些，希望在“近卫军骑兵司令部”^②找到“和平的拥护者”，并且希望在上院出现“同盟歇业”，以期出卖英国人民，并且以更低廉的价格拍卖他国人民。

科布顿先生的演讲无非是他在议会会议闭幕时的讲话的重述，而且是恬不知耻的重述。他纵情大谈特谈的唯一的 new 东西就是两个论点，一点针对法国，另一点针对美国。当十二月分子的业绩³⁸在英国激起愤怒的吼声的时候，此人在同法国缔结同盟方面起了出色作用，现在他却竭力破坏亲手做的事，嘲笑这个同盟，宣称它是“考虑欠周的”和“不适时的”。这就使人感到有些疑惑。

关于美国，科布顿先生声称，威胁英国商业和民族繁荣的伟大事业的是美国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是俄国的黩武政策。这怎么能符合他的职业自由贸易派的假仁假义的论断呢？——按照他的论断，一个民族的商业繁荣取决于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商业的发展，而两个工业发达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带危险性的竞争的见解乃是保护关税主义的“庸医”的谬论。这又怎么能符合下面的论点呢？

“英国以它的机器生产的魔力把两个遥远的半球永远用和平的纽带联合在一起，使欧洲和美洲处于不可分割的完全相互依赖之中。”

① 阿·贝·理查兹的笔名。——编者注

② 指英军总司令部，设在伦敦白厅的一座大楼里，这里原是近卫军骑兵司令部。——编者注

科布顿先生已经不止一次地为了转移英国人民对俄国的怀疑和仇恨而竭力使他们敌视美利坚合众国。1836年，俄国军舰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对一艘英国船只的掠夺，圣彼得堡内阁就多瑙河航行问题采取的财政措施³⁹，以及《公文集》发表的揭发性文件，引起了英国人民（主要是商业阶级）对俄国的愤懑。当时还是“文坛新手，还不惯于公开演讲”^①的科布顿先生发表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标题是：《俄国：医治恐俄病的良药。曼彻斯特一厂主著》^②。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证明说，“不用二十年，这种观点（即可怕的是美国繁荣的增长，而不是俄国的扩张政策）将成为英国人民普遍的观点，而且英国政府也将不得不加以承认”。在这本小册子中科布顿还写道：

“在探讨那些议论这个问题的人对俄罗斯民族抱敌对态度的种种理由时，我们非常惊奇而自信正确地发现，百年来英国的贵族统治已经使所有的阶级都感染上了统治者的那种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气（对温顺的俄国！）。假如圣彼得堡政府迁都波斯普鲁斯海峡之滨，那么用不了二十年，现在茅舍林立的土耳其首都就会成为一座富丽的欧洲城市；宏伟的建筑就会兴建起来，学术团体就会大量涌现，艺术也会繁荣昌盛。假如俄国政府真有这样的力量，它就不会再动干戈，而会采用铺设铁路、建造桥梁、促进资本积累、加速城市建设、弘扬文明和自由等等方法来同野蛮现象进行斗争。玷污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制度立即会被消除，而商业和保护生命财产的法律（例如，像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现在施行的一样）就会取而代之。”

① 亚·萨默维尔《科布顿的政策——英国内部的敌人。和平协会和它的好战性。科布顿先生和他的隐衷。历史故事》1854年伦敦版第36页。——编者注

② [理·科布顿]《俄国。曼彻斯特一厂主著》1836年爱丁堡版。——编者注

为了证明俄国的文明,并进而证明俄国有权占领土耳其,科布顿先生告诉他的感到惊奇的读者说,拥有10 000—15 000卢布的俄国商人不仅参加对外贸易,而且“免除体罚,并有权乘坐双套马车”。既然如此,我们对于俄皇不久前表示相信“拥有资产阶级议会的英国不能打一场辉煌的战争”这一点还能感到惊奇吗?1836年科布顿先生已经深深地意识到那些敢于指责主宰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政论家和演说家行为不端”,所以他在那本小册子的结尾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这些著作家和演说家是谁?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难道还能允许这些政治骗子一直这样无法无天地煽风点火、扰乱民心吗?”

我们以为,这些“政论家和演说家”正是拥有10 000—15 000卢布、可以乘坐双套马车、至少可以免除“体罚”的人。有些人至今一直认为科布顿先生的亲俄狂是他经常兜售的许多古怪想法之一,另一些人则把这点看成是他的和平论的必然结果。可是不久以前,有一位正确地自称为前反谷物法同盟⁴⁰的“文坛弩马,或者可以称为文坛笨驴”的某君^①向公众说,科布顿先生在写他的第一本小册子以前,“曾因私人商务在1834—1835年间到俄国去了一次,并且获益匪浅”,“1836年他的心和印花布都还在俄国”,而他对“英国的政论家、演说家、著作家、新闻记者”感到愤恨是因为他们批评了他的新主顾,俄国的尼古拉。

鉴于过几天就要重新召开下院的会议,所以我们认为提供一个关于不列颠议席的哪怕是很简单的统计,是适宜的。

① 亚·萨默维尔。——编者注

	所占席位	百分比
贵族亲属·····	103	17.0
爱尔兰贵族·····	6	
乡绅·····	266	41.3
文学科学界·····	20	3.0
陆、海军·····	30	4.6
财贸界·····	109	17.1
律师·····	107	17.0
工人·····	无	—

议席总计····· 641

下院中的爱尔兰贵族⁴¹是：蒂弗顿区——帕麦斯顿子爵；伯克郡——巴林顿子爵；格里姆斯比——安斯利伯爵；朴次茅斯——蒙克子爵；雷特福德——戈尔韦子爵；东约克郡——霍瑟姆勋爵。文学科学界人士：白金汉郡——本杰明·迪斯累里；爱丁堡——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格拉斯哥——商务统计学家麦格雷戈；珀斯郡——《西班牙艺术家史》等著作的作者威廉·斯特林；牛津大学——《国家与教会》等著作的作者威廉·格莱斯顿；艾尔斯伯里亚——《尼尼微城的遗址》等著作的作者奥斯丁·亨·莱亚德博士；韦斯特伯里——《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詹姆斯·威尔逊；萨瑟克——霍布斯等人著作的编者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赫特福德郡——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爱·利·布尔沃-利顿爵士；奥尔德姆——反谷物法同盟的作家威廉·约翰逊·福克斯；拉伊——《文明史》(毫无价值的)等著作的作者威·亚·麦金农；庞蒂弗拉克特两名——《旅途观感》等著作的作者理·蒙克顿·米尔恩斯和《东方之行》的作者本杰明·奥利韦拉；罗奇代尔——若干神学和政治学著作的作者爱德华·迈奥尔；苏

格兰的伦弗鲁郡——《希腊文学史》的作者威廉·缪尔；爱尔兰的韦斯特米斯郡——《弗兰契斯科·斯福察的生平》的作者威·波·乌尔卡尔特；惠特比——著名的铁路工程师罗伯特·斯蒂芬逊；博德明——医生威廉·迈克尔；利特里姆——外科医生约翰·布雷迪；是否能把约翰·罗素勋爵列入文学家一类，我不敢断定。

还有至少一百个议员，名义上是由自己选区选出的，其实都是由公爵、伯爵、侯爵、贵夫人以及靠自己在当地的势力去谋取政治利益的人指定的。例如，威斯敏斯特侯爵控制了总共有 2 524 名选民的切斯特城的两个席位；诺福克公爵——阿伦德尔的一个席位；萨瑟兰公爵——纽卡斯尔安德莱恩的两个席位；兰斯唐侯爵——卡恩的一个席位；菲茨威廉伯爵——莫尔顿的两个席位；里士满公爵——奇切斯特的两个席位；皮尔斯小姐——诺萨勒顿的一个席位等等。

从下面几个例子来看，就可以断定选民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以及当选的议员人数同居民总数之间的比例都是不恰当的。

伯克郡的居民总数为 170 065，而选民人数为 7 980。该区选入下院的代表共 9 名，可是总共有 230 308 名居民和 13 081 名选民的莱斯特郡却只有 6 个席位；有 407 222 名居民和 24 782 名选民的林肯郡，在下院中占有 13 个席位，可是总共有 1 886 576 名居民和 113 490 名选民的米德尔塞克斯只选出 14 名议员。有 2 031 236 名居民的兰开夏郡只有 81 786 名选民，并且在下院只占 26 个席位，可是总共有 163 723 名居民和 8 125 名选民的白金汉郡却有 11 名议员。总共有 336 844 名居民和 18 054 名选民的萨塞克斯郡选出 18 名议员，可是有 678 716 名居民和 29 667 名选民的斯塔福德郡却只选出 17 名议员。

选民人数和居民人数之间的比例是这样的：

在英格兰，郡的每个选民代表 20.7 个居民。

在威尔士，郡的每个选民代表 20 个居民。

在苏格兰，郡的每个选民代表 34.4 个居民。

在英格兰，城镇选区的每个选民代表 18 个居民。

在威尔士，城镇选区的每个选民代表 24.4 个居民。

在苏格兰，城镇选区的每个选民代表 23.8 个居民。

关于爱尔兰的资料还没有像英格兰和苏格兰那样完整。但是下列数字大体还接近 1851—1852 年期间的实际情况：

在爱尔兰的郡，每个选民代表 36 个居民。

在爱尔兰的城镇选区，每个选民代表 23 个居民。

欧洲粮食市场普遍发生的匮乏情况大致如下：在法国，并不像《通报》为了安定人心所说的只缺粮 1 000 万百升，而是大大超过 2 000 万百升，也就是超过 800 万英制夸特；马铃薯的缺乏不少于五年来平均产量的四分之一，酒、植物油、栗子更为缺乏。比利时和荷兰粮食产品大约缺少 400 万百升；根据保守的统计，莱茵区的几个省、普鲁士、瑞士缺粮 1 000 万百升以上。至于意大利，则只知道匮乏情况极为严重，即使概略的数字也很难确定。但是估计最低数字达 1 000 万百升；因此在西欧主要产粮区缺少的粮食至少是 4 400 万百升（1 700 万夸特）。英国缺粮已经知道在 500 万夸特以上，而根据某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统计资料来看，这只是小麦一项的数字。因此，仅仅西欧因去年严重的歉收至少缺粮 2 200 万夸特；如果再加上因其他谷类作物质量很差和歉收以及到处蔓延的马铃薯病害而少收（折合为小麦计算）至少 500 万夸特，这样缺粮总数就达到 2 700 万夸特。

至于是否可以指望国外市场输入粮食，根据贸易问题方面极有

权威的人士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

“波兰粮食收成极低;俄国歉收,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波罗的海各海港的粮价在我国缺粮的消息传到以前就已经十分昂贵。多瑙河地区虽然没有歉收,但是同敖德萨一样,由于向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法国大量出口粮食,存粮已经大大减少了。而美国连 200 万夸特也不可能拿出来。况且,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船只都用来运粮也不够运输现在全英国都知道的我们所缺的粮食的一半或将近一半。”^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
于 1854 年 1 月 26—27 日

载于 1854 年 2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0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阿·贝·理查兹]《粮食和饥荒》,见 1854 年 1 月 28 日《人民报》第 91 期。——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
——俄国的战时财政⁴²

1854年2月3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近卫军骑兵司令部大楼附近看到了去参加议会开幕式的女王的仪仗队。土耳其大使受到人们的热烈欢呼。阿尔伯特亲王面色苍白，街道两边的人群向他愤怒地发出嘘声；女王看到民众这样异乎寻常地不满，很少像往常一样向人们频频致意，只是一脸苦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①中我已经指出了反阿尔伯特运动的真正含义，证明这只是党派斗争的一种手段。但是公众的示威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因为这证明不列颠人民表面上的忠顺不过是一种因袭的形式，虚伪的礼貌，它是经不起轻轻一击的。这次示威说不定会促使王室解除内阁职务，因为内阁的反民族政策使王室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

当不久前奥尔洛夫伯爵去维也纳内阁的使命⁴³已经家喻户晓的

① 见本卷第42—46页。——编者注

时候,《泰晤士报》向它轻信的读者报道说,奥尔洛夫正是经常受沙皇派遣从事和平活动的人。可是用不着我来提醒你们,1833年春前往君士坦丁堡强迫土耳其政府接受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就是这个奥尔洛夫⁴⁴。现在他向维也纳内阁要求的是:允许将俄国的一个军从华沙取道匈牙利开往多瑙河战区。奥地利现在坚决要求土耳其政府将目前在多瑙河的土耳其司令官塞里姆帕沙、伊斯迈尔帕沙、奥美尔帕沙以叛教者和革命者的罪名加以免职,这可以认为是奥尔洛夫的维也纳之行的第一个成果。凡是了解土耳其过去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奥斯曼国家存在时起,它所有主要的陆海军将领、外交官员和大臣们一向是基督教的叛教者,是塞尔维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等。为什么不要求俄国也将它从欧洲各地收罗的、构成它在外交机智、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方面的全部家底的四五十个人一概免职呢?与此同时,奥地利在土耳其边境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集结了8万军队,并且派出了一个3万人左右的波希米亚军同他们会合。沙皇曾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俄国的名义并且为了俄国的利益调10万军队占领波兰,使驻防在那里的军队可以南调多瑙河两公国作战,据说普鲁士政府已拒绝执行沙皇的命令。

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①,我已经向你们谈过不久前奥地利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权宜措施:在缴税时把本国纸币贬值15%。意大利现在也在普遍实行这种巧妙的“税上加税”的方法。1月22日的《米兰官报》公布了奥地利财政大臣的命令,宣布“因纸币贬值,海关收税时应按票面贬低17%计值”。

至于俄国国库的问题,我已经在所谓东方纠纷开始时向读者警

① 见本卷第39页。——编者注

告过^①，不要听信那些广泛流传的谣言，说什么圣彼得堡银行的地下室藏有“秘密”珍宝，也不要听信那些令人发笑的夸张的话，说俄国似乎在一定的时刻可以动用大量钱财。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沙皇不得不从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提取他储存的金银，除此之外，还采取了欺诈的没收手段。帕斯凯维奇公爵通知华沙的贴现贷款银行说，它的资本将作为强制性贷款提出（虽然这家银行的章程规定，除地产之外，不得以任何保证条件贷款）。我们还听说俄国政府打算发行 6 000 万卢布的不兑换的纸币，以抵补军事费用。彼得堡内阁采用类似的计谋已经不是第一遭了。1768 年底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了抵补同土耳其作战用的开支，建立了一个据说是以发行凭票取款的可兑换的纸币为原则的阿西格那齐银行。^②但是，她装作疏忽，有意地忘记告诉公众，这些纸币将以什么货币兑换，而过了几个月才开始只用铜币兑换。由于另一个不幸的“意外”，这些铜币的面额又高于其所含金属的价值 50%，而且它们所以能按票面价值流通，仅仅因为数量很少，同时零售商业缺乏小额货币。可见，纸币的兑换原来不过是一种诡计。最初叶卡捷琳娜发行的票面 25 卢布的纸币不超过 4 000 万卢布；1 个纸卢布相当于按外汇行市折合英币 38—40 便士的 1 个银币，等于 100 多个铜戈比。1796 年，叶卡捷琳娜去世时，这种纸币增长到了 15 700 万卢布，也就是比最初的发行量增加了几乎三倍。伦敦的外汇行市从 1787 年的 41 个便士，降到 1796 年的

①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125—136 页。——编者注

② 指发行一种称为阿西格那齐的纸币的银行。——编者注

31个便士。在以后的两届政府执政期间发行量都增长很快；1810年纸币流通量达57 700万卢布，1个纸卢布只值 $25\frac{2}{5}$ 戈比，也就是等于1788年时的价值的 $\frac{1}{4}$ ，而1810年秋伦敦外汇行市降低，1个纸卢布不能像以前那样换38—40个便士，而只能换 $11\frac{1}{2}$ 便士。到1817年，按照古里耶夫伯爵的说法，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达83 600万卢布。由于关税和其他赋税都以银卢布计算，政府就宣布，阿西格那齐纸币按4:1的比例收受，从而也就承认贬值75%。那时纸币还在继续贬值，商品价格也在相应地上涨而且波动极大。这种情况甚至使政府也开始感到不安，不能不去借外债，以便使部分纸币回笼。到1821年1月1日，官方宣布纸币的数量已减少到64 000万卢布。后来同土耳其、波斯、波兰、希瓦等国进行的战争又使阿西格那齐纸币的数量增加，使外汇行市重新下跌，并且使一切商品价格大幅度地不规则地波动。直到1839年7月1日，由于有大量粮食向英国出口，外汇行市才得到了调整，那时沙皇发布一个告示，宣布从1840年7月1日起，全部阿西格那齐纸币必须都转换为见票即以足值银卢布（即38个便士）兑换的银行券。沙皇亚历山大过去曾宣布阿西格那齐纸币由税吏按4:1的比例收受；而沙皇尼古拉依靠转换的办法，似乎重新恢复了阿西格那齐纸币的全部价值。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奇怪的附加条件，即规定三张半旧票换一张新票。可见，虽没有宣布旧票贬值到它原有价值的28%，但是承认三张半旧票等于一张新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俄国政府在财政方面也像外交方面那样认真，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单是战争临近的威胁就足以使它重新陷入尼古拉几乎二十年来一直设法摆脱的财政困难。

欧洲政府一个跟着一个向自己心爱的臣民发出呼吁，要他们掏腰包。连沉着的荷兰的国王^①也向国会要求用 60 万银币来修筑工事和进行国防建设，并且说：“情况可能迫使他动员部分军队和派出他的舰队。”

如果采取某种巧妙的簿记方法可以帮助解决货币实际不足的问题，而把金库装满的话，那么不久前在《通报》上公布的法国预算的编制人大概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即使是巴黎最小的商人也不会不知道这样的事实：用最巧妙的数字分类决不能把自己的名字从债主的账本中勾掉，而且十二月二日的英雄^②认为民众的钱袋是取之不尽的，他已不加考虑地发行了国债。

最天真不过的是丹麦内阁在 1 月 17 日下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声明说，政府打算把改变丹麦根本制度和实施企盼已久的全国宪法（Gesamtstaatsverfassung）⁴⁵推迟到比较适当的时候。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1 月
31 日

载于 1854 年 2 月 20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00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威廉三世。——编者注

② 指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卡·马克思

*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
——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
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
——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⁴⁶

1854年2月7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非常认真地读完了《正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权利和特权》（这是人们对政府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⁴⁷的俏皮的称呼），并打算在最近向读者简要地评述一下这个外交上的迷宫。现在我只是肯定地说，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过比这更骇人听闻的表明政府的卑鄙和愚蠢的文献。让我们也回忆一下贝利先生在下院对这些蓝皮书的评价：

“至于说到消息，这些蓝皮书里有的是，但是请注意，这不是正式的消息，而只是从一本精心编写的、对政府乐意隐瞒的一切只字不提的蓝皮书中可以知道的东西。我这样讲是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喊声：“听阿！听阿！”，政府席上则发出笑声），我知道这个提交下院的关于外交问题的蓝皮书是怎样编写出来

的。”^①

我非常清楚，有一次有人责备帕麦斯顿勋爵歪曲了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文件，隐瞒了发出的紧急函件中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段落，甚至还故意捏造了一些段落，⁴⁸对此他作了如下的很机智的回答：

“先生，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接替我们的那两届我们的政敌的政府——其中有一届还执政五年——宣布这事实并把真正的文件公布出来呢？”^②

但是我同样地非常清楚，蓝皮书里这种诡计的秘密，恰恰就是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的秘密：每个党都宁愿让自己的政敌保持接替自己执政的能力，而不愿互相破坏政治“声誉”，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彻底垮台。而不列颠人却喜欢把这一套叫做发挥自己的光荣宪法的作用。

克兰里卡德勋爵曾经预告，他要在定于昨天举行的上院会议上建议讨论东方问题。因此，人们对这次会议抱有很大的期望，上院几乎挤得满满的。在昨天的《晨报》上，乌尔卡尔特先生甚至毫不犹豫地称克兰里卡德勋爵为民族派的未来领袖，他还提到在1829年只有克兰里卡德一个人反对俄国人越过巴尔干。但是乌尔卡尔特先生无疑忘记了，也就是这位高贵的侯爵在1839—1840年这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曾任帕麦斯顿勋爵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而且在1840年缔结单独条约以及同法国断绝关系⁴⁹这些事情上是勋爵的主要工具。

公众对辩论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克兰里卡德侯爵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声明说：“在维也纳某种类似谈判的东西看来还在继续，我很不

① 亨·贝利1854年1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8年伦敦版第97卷。——编者注

愿意引起可能妨碍上述谈判的和平结束的辩论”。

因此，他宣布，他打算一星期后就同一问题提出建议。高贵的侯爵只是问克拉伦登勋爵“是否收到了俄皇对维也纳建议的答复？”“给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大使发出的指示是什么？”克拉伦登勋爵回答说，他“今天下午才从维也纳得到关于事态的正式报告”。俄皇拒绝了维也纳的照会，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而本月2日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又拒绝了这一个反建议。

克拉伦登勋爵继续说：

“俄国提出的新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能把这些建议转交给君士坦丁堡，因此，关于这些建议就不必再提了。我没有根据认为将就此问题开始新的谈判。对于保持和平，我根本不抱希望。”^①

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他说：

“星期六晚上，布伦诺夫男爵在外交部拜会了我，并交给我一份照会，照会说，他从我那里收到的对于他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而提出的质询的答复，使他不能再继续保持外交关系，因此俄国同英国的外交关系断绝了。布伦诺夫男爵星期六晚上同我告别，但当时离开伦敦已经太晚了，据我所知，他应当在今天清晨离开。”^①

我们从电讯中得悉，基谢廖夫先生昨天已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官方的或者说政府的报纸报道说，驻伦敦的大使馆将要关闭，所有的俄国人都将离开英国。而我根据非常可靠的消息所了解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英国的俄国人只减少了大使一人，其余的全体人员都留在伦敦，由大使馆一等秘书贝格先生领导。关于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的情况，克拉伦登勋爵说：

^① 乔·克拉伦登 1854年2月6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因为布伦诺夫男爵是在星期六6点半来拜会我的，又因为我要事先同法国政府商量，所以当时已不可能向不列颠驻圣彼得堡的公使发出指示，但是我们已经同法国大使商量过这个问题，明天乔·西摩尔爵士和德·卡斯泰尔巴雅克将军都将接到指示，这些指示将使他们处于同这里的俄国大使一样的境况，两国同俄国的外交关系也将断绝。”^①

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重复了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的声明，而帕麦斯顿勋爵宣称，

“他打算提出一项把关于民军的各项法律归并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组织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民军部队，而募集的时期应由下院投票决定”。

英国军队将立即增加11 000人；此外，还应马上从海岸警卫队里调1 500人上船，作为新服役的船只的船员的预备队。女王已经颁布了命令：禁止向俄国输出任何军舰、军事物资和弹药。海军当局视察了泰晤士河畔的私营造船厂，查禁了两艘正在为俄国建造的舰船。以不列颠政府的名义在哥本哈根签订了供给总共11 000马力的蒸汽舰用煤的合同。海军上将查理·纳皮尔爵士将指挥新编的波罗的海舰队。

据官方报纸《维也纳日报》报道：

“政府已接到通知，说俄国已向四强国明确表示，俄国认为它已经不受它在奥尔米茨允诺的在多瑙河两公国保持守势的诺言的约束。”

关于奥尔洛夫伯爵在维也纳的使命所追求的目的，传说纷纭；看来其中最可靠的是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柏林通讯所谈到的传闻。这位通讯员写道：

^① 乔·克拉伦登1854年2月6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俄国邀请奥地利和普鲁士同它缔结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中立条约；俄国向它们建议，它们的中立宣言要宣告整个德意志联邦⁵⁰保持中立；俄国承诺在联邦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遭到攻击时帮助联邦，并且保证，战争结束时如果要领土作任何改变，必须充分考虑到德意志大邦在领土改变当中的利益，否则决不缔结和约。这个关于中立条约的建议，显然参考了1815年神圣同盟⁵¹的原则和条款。”

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可能作出的决定，我只能重述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讲过的意见^①。只要可能，奥地利将尽力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场，并且适当的时机一到它就会宣布站在俄国一边。另一方面，普鲁士可能又会错过放弃中立的适当时机，结果使自己重蹈耶拿的覆辙⁷。

我们从君士坦丁堡方面得悉，联合舰队已返回了自己在贝科兹的停泊地，而不顾参孙号代表大使们转交给它们如下的命令：

“大使们对海军上将们的出乎意外的决定感到惊讶，尤其是在目前，当装载供给安纳托利亚军团的弹药和其他物资的土耳其蒸汽舰舰队即将启航的时候。法英两国政府的命令正式地、明确地指示（的确是，但是这并非指起初给海军上将们的命令，而只是指刚刚接到的命令）联合舰队必须保卫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和领土。因此，再一次请两位海军上将注意这些按照应有的手续向他们发出的指令的严重性质。看来，海军上将们认为，不管他们所指挥的兵力配置在贝科兹或在锡诺普，交给他们执行的措施一样可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认为，即使舰队安然地停在马耳他和土伦，那些指令也能完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应当完全由他们考虑，由他们负责。”^②

大家知道，俄国的舰队停在靠近叶尼卡列海峡的卡法，从那里到

① 见本卷第4—8页。——编者注

② 《关于联合舰队开往贝科兹的报告》，见1854年2月6日《每日新闻》第2407号。——编者注

巴统的距离只等于巴统和贝科兹之间的距离的三分之一。试问，海军上将们是不是“不管它们配置在贝科兹或者在别的地方”，都能防止锡诺普事件在巴统重演呢？

大概你们还记得，沙皇的第一个文告曾指责苏丹把全欧的革命渣滓收罗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正当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向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表示，不能帮助他把这些渣滓的任何一部分组成志愿军团的时候，沙皇本人就首先建立了一支革命部队，即所谓希腊—斯拉夫军团，他的直接意图就是要煽动苏丹的臣民举行暴动。这支部队是在瓦拉几亚组成的，根据俄国的报道，它已有三千多人，对这些人，将不是像对瓦拉几亚人那样付给无期债券，而是答应每天给上校5杜卡特^①，少校3杜卡特，上尉2杜卡特，中少尉1杜卡特，士兵40分尼；武器由俄国供给。

然而，法国显然已经不再打算仅在纸上谈兵了。你们都知道，1851年的预备兵已经应征入伍，而最近几天已经从阿拉斯运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到梅斯和斯特拉斯堡。佩利西埃将军已经前往阿尔及尔，受命选拔几个不同的军去远征君士坦丁堡，约·伯戈因爵士和阿尔当上校已经前往那里作扎营的准备工作。

关于奥美尔帕沙率领的大军调动的传说，还有待证实，尽管实行这个措施未必会有更有利的时机，因为大家知道，俄国军队已经集结在布加勒斯特和卡拉法特之间的克拉约瓦。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不列颠议会的活动，虽然那里除了提出关于对外国船只开放沿海贸易的法案以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而这个提案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反对是丝毫无济于事的，因为

^① 14 - 19世纪欧洲通用的金币。——编者注

绝对不可能抗拒支配整个世界的现代贸易原则：在最廉价的市场上购买你所需要的一切。至于最廉价的船员在多大程度上能保卫人的生命和财产，最近泰勒号轮船的遇难⁵²已经作了证明。

在昨天下院的会议上，伊·巴特先生说 he 打算

“明天提出一项建议，要议院秘书在讲台上宣读今天《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和以前《都柏林自由人报》的一些报道，其中都指责下院的《爱尔兰的》议员拿职位卖钱。他还打算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上述报道中关于这种交易的说法”。^①

凡是还记得前一次会议规定过任何别的交易方式全是合法的人，都会明白为什么巴特先生只是对拿职位卖钱表示愤慨。从1830年起，唐宁街就处于依赖爱尔兰旅¹⁰的地位。正是爱尔兰议员任命和留用合乎他们心意的大臣。1834年他们把詹·格雷厄姆爵士和斯坦利勋爵撵出了内阁。1835年他们迫使威廉四世解散皮尔内阁而恢复墨尔本政府。从1837年大选直到1841年大选，尽管同这届内阁相敌对的不列颠的议员在下院占多数，但是爱尔兰旅的票数多得足以决定大局，使这个内阁仍然执政。建立联合内阁的也是爱尔兰旅。爱尔兰旅虽然有这种组阁的能力，但从来没有阻止过任何一次对爱尔兰的卑鄙无耻行为和对英格兰人民的不公正行为。1834—1841年的奥康奈尔时期是爱尔兰旅最强大的时期。它的强大力量被用来为谁的利益服务呢？爱尔兰旅的宣传鼓动始终不过是大叫大嚷地支持辉格党反对托利党，以便向辉格党勒索一些职位。任何一个稍微知道所谓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⁵³的人，都会承认这一

① 伊·巴特1854年2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见1854年2月7日《泰晤士报》第21658号。——编者注

点。根据这个协定,奥康奈尔虽然也可以大叫大嚷地反对辉格党,但是他必须投票赞成辉格党,条件是给他以在爱尔兰任命他自己的地方官的权利。现在是爱尔兰旅抛掉爱国主义假面具的时候了。现在是爱尔兰人民不再对英格兰人采取沉默的仇视,而追究自己的代表的罪责的时候了。

“艺术和骗术协会”⁵⁴最近玩弄花招,提出一个旨在“解决”英国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的反动议来破坏工人议会。在某高贵的勋爵主持下曾召开一个会议,邀请双方代表模仿路易·勃朗先生主持下在卢森堡宫召开的会议⁵⁵的方式讨论他们的不和。厄内斯特·琼斯先生代表工人阶级对这种欺骗提出抗议,老罗伯特·欧文向有教养的绅士们声明,不管用什么仲裁办法,用什么圈套或诡计,都永远不能填满那条把英国和任何一个国家里的两大主要阶级分割开来的鸿沟。大概不用多说,这个会议在成了一般人的笑柄之后解散了。第二天,伦敦的宪章派和外地的宪章派组织的代表举行了公开集会,会上一致通过了召开工人议会的提案,并定于3月11日在曼彻斯特开幕。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
6—7日

载于1854年2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
蓝皮书。——黑山⁵⁶

1854年2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丹麦同瑞典订立中立条约时，我就表示确信^①，与英法流行的看法相反，这个条约根本不能看作是西方强国的胜利，俄国假意反对中立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斯堪的纳维亚各报以及引述这些报纸的《泰晤士报》通讯员现在也一致表示同样的看法，并且宣称整个条约都出自俄国之手。

奥尔洛夫伯爵向维也纳会议提出的并已被它否决的建议是这样的：

- (1)恢复过去的条约；
- (2)俄国对土耳其的信仰正教的基督徒具有保护权；
- (3)将所有政治流亡者逐出奥斯曼帝国；
- (4)俄国拒绝接受任何其他强国的调停，只愿同被派往圣彼得堡

① 见本卷第48页。——编者注

的土耳其全权代表直接进行谈判。

关于最后一项，奥尔洛夫伯爵宣称准备实行妥协，可是维也纳会议拒绝了。会议究竟为什么拒绝呢？或者说，为什么俄皇拒绝会议的最后一些条件呢？其实双方的提议是一致的。恢复过去的条约这一项被确定了，俄国的保护权也被接受了，只是作了一点形式上的修改；既然最后一项俄国自己已经放弃，奥地利关于驱逐政治流亡者的要求⁵⁷也就不会成为俄国与西方决裂的原因。显然，俄皇现在的立场是他不能接受法英提出的任何条件，并且他一定要使土耳其屈从于他，而不管这会不会引起欧洲战争。

军界人士目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备战工作正在全面进行。布律阿海军上将已离开布雷斯特前往阿尔及尔，并将指挥一万人从这里上船；驻扎在爱尔兰的16个团的英军已奉命准备开往君士坦丁堡。这次远征只可能有两个目的：或者像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断言的那样，迫使土耳其人服从俄国；或者真的去与俄国作战。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使土耳其人遭受到同一个厄运。如果他们重新落到俄国手里，即使不是直接落到它手里，而是受它的破坏，那么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很快就会像当年没落帝国⁵⁸的权力一样，缩小到只限于首都周围地区。如果土耳其人受法英的绝对监护，那么奥斯曼人在欧洲领地的主权同样就会彻底丧失。

《泰晤士报》指出，如果我们要把战争的进行掌握在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就必须控制一切军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内阁将处于西方强国大使的直接领导下，土耳其的陆军部将受英法陆军部领导，而土耳其的军队也将归英法的将军们指挥。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将不复存在。

奥尔洛夫伯爵在维也纳全盘“失败”以后，现在回到了圣彼得堡，

他“得到的保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维也纳的电讯报道说，土耳其内阁发生了变动，因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已经辞职。《泰晤士报》不能理解，正当英法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主战派怎么会遭受失败。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天赐的”事变是英国联合内阁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制造的，我们知道，此人在其发表于蓝皮书中的报告中曾再三表示遗憾地说，“他目前还不能对土耳其内阁施加预期的压力”。

蓝皮书一开始就是关于法国在圣地问题上提出的要求的报告，这些要求还没有完全被过去的特惠条例⁵⁹承认，而且这些要求的提出显然是企图使天主教会压倒正教会。我完全不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如下看法：沙皇利用在巴黎的潜在影响，唆使波拿巴发起这场冲突，以便使俄国有借口为维护正教徒的特权而亲自出面干预。大家都知道，波拿巴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天主教派的支持，他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支持看作他篡夺政权成功的主要条件。波拿巴十分明白，天主教会法国的农村居民具有强烈的影响；正是农民不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愿意让他当皇帝。耶稣会士法卢先生是他成立的第一届内阁中最有势力的成员，而所谓伏尔泰信徒奥迪隆·巴罗只是该内阁的名义上的首脑。该内阁在波拿巴就任总统的当天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对罗马共和国的有名的远征。耶稣会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先生是波拿巴在准备推翻议会制度和 12 月 2 日政变时最得力的工具。1850 年，耶稣会的正式机关报《天主教全国联盟报》日复一日地要求法国政府采取积极步骤保护东方的天主教会的利益。波拿巴本来就想讨好和争取教皇，由他给自己加冕，所以当然有理由接受这种要求，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最忠于天主教的”⁶⁰法国皇帝。所以波拿巴的篡位是现在东方纠纷的真正根源。不过，当波拿巴一发现尼古拉

皇帝要把他的要求作为把他排除在欧洲教皇选举会议之外的借口时，他就聪明地收回了自己的要求，而俄国仍然如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的那样，很想利用它无力制造的种种事件。总之，历史上一个始终使人十分迷惑不解的现象是，奥斯曼帝国目前的危机是由天主教会与正教会之间的冲突引起的，而过去却正是这种冲突推动这个帝国在欧洲建立起来。

我现在还不想深入研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全部内容，而首先要探讨一下蓝皮书中讳莫如深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即奥土两国关于黑山的争吵。预先了解这件事情极其必要，因为这可以揭示俄奥协议消灭和瓜分土耳其帝国的计划是存在的，还因为英国把圣彼得堡宫廷同土耳其政府的进一步谈判交给奥地利的这一事实本身，使人对英国内阁在发生东方争端的整个期间的态度感到困惑莫解。由于没有任何关于黑山问题的正式文件，我就以刚出版的莱·弗·辛普森的著作《东方问题手册》^①为依据。

土耳其的扎布利亚克要塞（在黑山和阿尔巴尼亚接壤处）于1852年12月受到黑山部队的攻击。人们还记得，土耳其政府曾派奥美尔帕沙去驱逐侵略者。土耳其政府宣布封锁阿尔巴尼亚全部海岸。显然，这个措施只能是用来对付奥地利和它的海军，这也说明土耳其内阁相信黑山的叛乱是由奥地利挑拨起来的。

当时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了如下的一篇由维也纳寄来的日期标明为1852年12月29日的文章：

① 莱·弗·辛普森《东方问题：莱宁根伯爵使团和缅施科夫公爵使团访问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1854年伦敦版。——编者注

“如果奥地利真想支援黑山人，那么封锁也没有用。就是亚得里亚海有土耳其的舰队，只要黑山人下山，奥地利就能在卡塔罗供应他们枪枝弹药。奥地利既不赞成黑山人现在的入侵，也不赞成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基督徒中即将爆发的革命。奥地利经常表示反对压迫基督徒，而且是以人道的名义。它对待东派教会不得不保持中立。耶路撒冷最近的消息说明，那里多么猛烈地燃起了宗教仇恨的火焰。所以奥地利的活动家必然竭尽全力保持奥地利帝国的信仰正教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和平。”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首先，人们预料土耳其基督徒中肯定会爆发革命；其次，奥地利为俄国控诉压迫正教会准备了根据；第三，人们认为在“圣地”问题上的宗教纠纷会给奥地利提供保持“中立”的机会。

俄国就在那一个月递交土耳其政府一份照会，建议由俄国出面调停黑山问题。这一建议被拒绝了，理由是苏丹自己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俄国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正像在希腊革命⁶¹时一样：最初表示要保护苏丹去反对他的臣民，为的是一旦俄国的帮助不被接受，就保护苏丹的臣民去反对苏丹本人。

从1852年12月3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另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俄奥之间早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关于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协议。

“不久前才承认黑山独立的俄国，对事变未必会抱袖手旁观的态度。此外，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来的商业信件和旅行者都说，自沃伦到普鲁特河口的整个地带到处都是俄国军队，而且还不断有增援部队开到。”

就在那时，维也纳的报纸报道说，在奥土边境集结了奥地利的监视部队。

1852年12月6日斯坦利勋爵曾向马姆兹伯里勋爵询问黑山的事态，这位波拿巴的高贵朋友曾作了以下的声明：

“高贵的勋爵想询问最近在同阿尔巴尼亚接壤的名叫黑山的野蛮国家中政治关系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认为那里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个国家的首脑具有双重身分：他是这个国家正教会首领，又是世俗的国王。就他在教会中的地位而言，他处在被认为是整个正教会首领的俄皇的管辖之下。黑山首脑（我想他所有的先辈也一样）已习惯于由俄皇批准和承认他的主教的权力和称号。至于这个国家的独立，不管各种人对这种地位的好处持什么样的看法，但事实是：黑山作为独立的国家，已存在大约一百五十年了。虽然土耳其政府多次企图征服它，但是这种企图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目前这个国家所处的地位正像它大约二百年前所处的地位一样。”^①

当时托利党政府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在这次讲话中满不在乎地将奥斯曼帝国加以分割，把一向从属于它的一个国家同它分割开来，同时承认俄皇对于土耳其帝国臣民进行精神统治的要求。关于这两个寡头政治集团，除了他们争做蠢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土耳其政府对不列颠大臣的这一番话当然感到极大的不安，紧接着，在一家英国报纸上登出了一封1853年1月5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信：

“由于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上院竟声称黑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土耳其政府大为震惊。他这是为俄国和奥地利出力；这会使英国丧失一向享有的威望和信誉。土耳其政府和奥地利之间在1791年（在英国、荷兰和普鲁士的调停下）签订的西斯托夫和约的第一条中规定得很明确，对两国起来反对本国合法君主的臣民应予特赦；当时列举的土耳其帝国的叛乱臣民是塞尔维亚人、黑山人、摩尔多瓦人、瓦拉几亚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黑山人约有两三千，他们都缴纳哈拉志或者说人头税，并且在法院审理在君士坦丁堡居住的其他强国的臣民时，

^① 此处及以下至本文结尾的引文引自莱·弗·辛普森《东方问题：莱宁根伯爵使团和施施科夫公爵使团访问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1854年伦敦版。——编者注

黑山人一直被看成是土耳其的臣民,而且也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

1853年1月初,奥地利政府派了皇帝的侍卫长克耳纳·冯·克伦施坦男爵到卡塔罗观察事件的进展情况,就在那时,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代办奥泽罗夫先生也正向国务会议提出抗议,反对在圣地问题上向天主教徒所作的让步。1月底莱宁根伯爵到达君士坦丁堡,2月3日被允许单独觐见苏丹,并向他转交了奥皇的一封信。土耳其政府拒绝顺从他的要求,于是,莱宁根伯爵就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土耳其政府四天内答复。土耳其政府立即请求英法保护,而英法并没有给它任何保护,同时莱宁根伯爵也拒绝英法进行调停。2月15日莱宁根获得了他所要求的一切(第三条除外),他的最后通牒被接受了。最后通牒包括以下几条:

- 一、立即撤出黑山,并恢复战前的状态。
- 二、土耳其政府声明自己有责任保持克列茨克和苏托林纳地区的现状,并承认奥地利在内海的利益。
- 三、严格追究穆斯林反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基督徒的宗教狂热行为。
- 四、驱逐目前在与奥地利接壤的各省内的全部政治流亡者和叛变者。
- 五、向其合同被随意废除的那些奥地利商人支付赔款20万弗罗伦;在合同规定的整个期限内遵守合同。
- 六、向其船只和货物被非法没收的某商人支付赔款56 000弗罗伦。
- 七、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塞哥维那和鲁米利亚各地设立领事馆。
- 八、谴责1850年土耳其当局在流亡者问题上的行为。

据辛普森先生说,奥斯曼政府在同意最后通牒以前曾向英法公使送去一份照会,要求他们答应在发生对奥战争时给它实际的援助。“因为两国公使都不能作明确的担保”,土耳其政府才向莱宁根伯爵的坚决行动作了让步。

2月28日莱宁根伯爵回到维也纳,而缅施科夫公爵到了君士坦

丁堡。3月3日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询问时厚颜无耻地说，

“奥地利政府在回答我们提交的文件时，已经保证在这个问题上同英国政府持同样的观点；虽然他也不能说出这次协议的明确的条款，但是英法进行的干预很成功，而且他相信最后的分歧也已经消除。英国所采取的方针，就是劝告土耳其保持它的荣誉和独立……他自己认为，从正义、国际法、对我们盟国的忠诚这方面来看，同时从整个政策和权宜措施方面来看，保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是英国对外政策中重大的和决定的环节。”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2 月

10 日

载于 1854 年 2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1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洲战争问题⁶²

虽然纳什维尔号到达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有关战区的任何重要消息,但是让我们获悉了当前时局下的一个重大事实。^①那就是,现在,在驻巴黎和伦敦的俄国大使已经离开、驻圣彼得堡的英法大使已被召回、法英两国的海陆军已经集结待命立即行动的最后时刻,——就在这最后的时刻,这两个西方国家政府又建议俄国举行谈判,而且建议本身中就已包含了对俄国的几乎一切要求的让步。值得提醒的是,俄国的主要要求是承认它有直接同土耳其政府解决它所谓的仅仅涉及它同土耳其的争端而不受其他强国干涉的权利。现在俄国已被承认有这个权利。建议写在拿破仑的信⁶³中(该信另栏发表),归纳起来就是:俄国可以直接同土耳其谈判,但是它们之间签订的条约必须由四强国保证。这种保证缩小了让步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强国留下了在将来任何类似冲突中进行干涉的现成的借口。但是俄国的处境并不会因此而比现在更坏,现在沙皇尼古拉不能不看到他想瓜分土耳其的任何企图都要冒同英法交战的危险。可是,俄国能否得到真正的好处将取决于尚未签订的条约的性质;俄国现在已经看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出西方强国如何胆怯地力求避免战争，所以只要将自己的军队保持集结状态，照过去那样使用恐吓的手段，就足以在谈判时在所有条款上达到自己的目的。何况俄国外交使团几乎无须害怕同炮制那个著名的、失策的第一次维也纳照会⁶⁴的愚蠢的大使们^①进行争辩。

但是，究竟沙皇^②是接受这些建议，还是宁愿依靠自己的军队，目前还不得而知。他不能每五年这样备战一番，并在整个辽阔的帝国内调遣军队。备战的规模这样大，以致只有取得物质上非常大的好处才能弥补这方面的耗费。俄国居民的战斗热情被充分地激发起来了。我们曾看到一个俄国商人写的一封信的副本，他不是那种定居在莫斯科的许多德国、英国或法国商人中的一个，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俄国人，是神圣俄罗斯的真正儿子。他以经纪人的身分贮存着准备出售的英国货物。有人问他如果发生战争，这些货物是否有被没收的危险。这位老俄国人对于在这方面他的政府遭到诬蔑感到愤怒，加之他十分熟悉官方的用语，即所谓俄国与西方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是“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的伟大的捍卫者，因而他反驳说：

“谢天谢地，在我们俄国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区别还完全有效，因此你们的财产在这里如同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安全。我甚至还要劝你们把你们尽量多的财产转存到这里来，因为存放在这里可能比它现在存放的地点更保险。如果为你们的同胞担心，你们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你们的财产不安，就毫无必要了。”

① 约·费·威斯特摩兰伯爵、弗·阿·布尔克奈和亨·弗·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韦尔贝洛伯爵。——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也在最大规模地进行备战。法国的远洋舰队从布雷斯特被召回土伦,以便运送部队到近东去。根据各种消息来看,将派出4—6万人的军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非洲军队中抽调的。远征军中的猎兵将十分强大,并将由巴拉盖·狄利埃或圣阿尔诺指挥。英国政府准备派出大约18 000名士兵(22个团,每团850人),截至我们最后得到的消息发出的那一天,有一部分军队已经乘船前往总集合地点马耳他岛。步兵由轮船运送,而帆船则用来运送骑兵。应于3月6日在距希尔内斯不远的泰晤士河口集中的波罗的海舰队,将由15艘战列舰、8艘巡航舰和17艘小型舰船组成。这是英国人从上次战争⁶⁵以来所编成的最大的舰队;既然这个舰队的半数舰只一定是明轮式和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既然现在军舰的体积和舰上的火炮的威力比半世纪以前几乎增大50%,那么,波罗的海舰队可能拥有任何一国过去从未有过的最强大的武器装备。指挥这个舰队的将是查理·纳皮尔爵士。如果发生战争,没有人能比他更善于将炮口立即对准有决定意义的地点了。

在多瑙河上,切塔泰会战显然已使俄军推迟了进攻卡拉法特的时间。这五天的战斗使俄军认识到要夺取一座能够进行这种出击的营垒不是容易的事。也许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就连专制君主本人的圣谕也不足以迫使他的军队轻率地进攻了。从华沙派到那里去执行任务的工程长官希尔德将军的到达,看来甚至造成了同沙皇命令完全相反的结果,因为在一定距离上对工事的观察,已经完全足以使希尔德相信不是要仓促发动进攻,而是必须拥有比立即能调集的更多的兵力和重炮。因此,俄军继续在卡拉法特周围集结一切可能调遣的兵力,还在向那里运送攻城炮,据说,有72门炮已经运到瓦拉几亚。伦敦《泰晤士报》估计俄军兵力为65 000人,如果回想一下多瑙

河两公国内俄军的总数,我们认为这个数目似乎有些夸大。这一支俄军现在除哥萨克、猎兵和其他专业部队以外,有6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和大约300门野炮;军事行动开始前正式公布的总兵力为12万人。假定其损失,即伤亡和病员为3万人,留下的还有9万人,其中至少有35000人要用来防守多瑙河一线、担任重要城市的守备勤务和保障交通线。因此,用来攻击卡拉法特的最多只有55000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的阵地。俄军既不注意多瑙河全线,也不理睬奥美尔帕沙在舒姆拉的阵地,而把自己的主力甚至重炮都集中在极右翼,集中在使他们距离自己最近的作战基地布加勒斯特比土军距离该地还远的地点。因此他们的后方便暴露无遗了。更糟的是,俄军为了哪怕从后方稍微得到掩护起见,不得不分散兵力,因而在卡拉法特前面根本就没有那种保证他们取胜、从而证明整个这次机动正确的明显的兵力优势。俄军以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部队分散配置在主力的后面,而这些部队当然无力击退坚决的攻击。因此,不仅夺取卡拉法特是没有保证的,围攻者的交通线也有被攻击的危险。这个错误如此明显,如此严重,以致只有绝对确凿的事实才能使一个军人相信会有人犯了这样的错误。

仍然掌握优势兵力的奥美尔帕沙,如能率领譬如说7万人在鲁斯楚克和赫尔绍瓦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强渡多瑙河,那么俄军必定不是全部被歼,就是只好到奥地利去寻求庇护。奥美尔帕沙曾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集中这样数量的军队。既然现在河上已没有流冰,为什么他不强渡呢?为什么他甚至不重新占领奥尔泰尼察附近的桥头堡以便能随时出动呢?如果说奥美尔帕沙没有看出俄军因严重失策而给他造成的机会,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推测,他受到外交活动的约束。显然,他按兵不动一定是为了抵消联军舰队在

黑海的游弋。把俄军歼灭或驱逐到奥地利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会给缔结和约造成新困难。正是为了迎合这些投机外交家的阴谋诡计和不正当的活动,奥美尔帕沙才只好容忍俄军轰击卡拉法特,眼看着俄军把全部军队、全部攻城炮都置于他的打击之下,却无权利利用这一机会。事实上,如果俄军司令官^①没有得到完全肯定的保证而相信他的翼侧和后方不会受到袭击,我们认为他决不敢对卡拉法特采取行动。否则,不论他接到过什么样严厉的指示,他都会受到战地法庭的审判并被枪决。如果今天或至迟最近这几天轮船开到后,^②我们得不到奥美尔帕沙渡过多瑙河并向布加勒斯特进攻的消息,我们就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强国相互之间签订了正式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为了顾全俄国人在军事上的体面,势必牺牲卡拉法特,而且不允许土耳其使用唯一可靠的手段,即在多瑙河下游采取进攻行动的方法来保卫卡拉法特。⁶⁶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2月13—1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3月6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19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① 米·德·哥尔查科夫公爵。——编者注

②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

*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拿破仑的
计划。——普鲁士的政策⁶⁷

我们从伦敦非常可靠的来源得到了以下消息,这些消息如果属实的话,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欧洲的报纸只披露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以片面和歪曲的方式。

一、2月3日普鲁士内阁向巴黎和伦敦送去了如下的声明:

“(1)经奥尔洛夫伯爵说明以后,毫无疑问,在圣彼得堡内阁那里继续进行调停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普鲁士不再调停,调停的可能性不再存在了。

(2)已经在—个照会中通知奥尔洛夫伯爵,坚决拒绝他关于缔结正式的和具有约束力的中立条约的建议,普鲁士决定,即使没有奥地利的同意,自己也要坚守最严格的中立,并且决心在适当的时候用相当的武装来保证这种中立。

(3)普鲁士是否将和奥地利共同提出全面武装德意志联邦的建议——将取决于海上强国对德意志的态度。”

二、路易-拿破仑已派他的全权代表(布勒尼埃先生)携函前往都灵晋见皮埃蒙特国王^①和加富尔先生。函件内容如下: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塔拉、摩德纳在一定的时刻将会发生暴动。那时撒丁王

①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

国必须占领这些地方,把目前在那里进行统治的君主们赶走。拿破仑向皮埃蒙特国王保证将前三个公国,可能还有摩德纳都并给撒丁王国;⁶⁸但必须把萨瓦伯爵领地割让给法国作为补偿。英国可以说实际上已同意了这种安排,虽然十分勉强和感到不快。后来布勒尼埃先生继续在意大利旅行,最后到了那不勒斯,他的到达在那里引起了“非常痛苦的感觉”。他的使命是在意大利制造暴动,因为拿破仑真的相信自己不仅能使意大利起火,而且能划出火焰蔓延的确切界限。他预定把军队集中在以下地点:

- (1)萨瓦边境 10 万人;
- (2)梅斯 6 万人;
- (3)斯特拉斯堡 8 万人。

三、普鲁士并不反对在萨瓦边境集结 10 万法国军队,但是它认为把一支军队集中在梅斯,把另一支军队集中在斯特拉斯堡是对它的直接威胁。它仿佛已经看到,暴动席卷了巴登、黑森、符腾堡等地,十来万农民正在从南德意志向普鲁士边境挺进。所以它反对这两个措施,而普鲁士声明的第三项所暗示的就是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无论如何,到 3 月底,也可能在此之前,普鲁士将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战备状态。它打算根据情况征集 20—30 万人。但是,普鲁士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拿破仑坚持把两支军队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它将把自己的军队增加到 50 万人。据说,恐惧和惊慌失措的情绪笼罩着柏林内阁,国王及其大多数大臣原来都打算站在俄国一边,全靠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亲王的支持下,才使中立宣言得以通过(曼托伊费尔最初建议同英国结成正式同盟)。现在已经作出正式的内阁决议(Cabinets - Beschluss),根据这个决议,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在同一个晚上把王国境内,首先是莱茵普鲁士境内的所有比较著名的民主

主义者逮捕起来,并押送到东部的要塞,使他们不可能协助实现拿破仑的颠覆计划(die Umsturzpläne Napoleons!!)或者煽起广泛的人民运动。预定只要在意大利发生骚动,或者如果拿破仑把两支军队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个措施就立即付诸实行。据可靠的消息说,这个决议曾获得一致通过,虽然还没有规定在哪些可能的情况下内阁认为实行这个措施是适当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2 月
1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3 月 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2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议会辩论⁶⁹

1854年2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陆军和海军的预算都已提交议会。下一年度陆军的总人数规定为112 977人，即比上一年度增加10 694人。在国内外服役的陆军的总开支，在到1855年3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度内，为3 923 288英镑，其中不包括澳洲各殖民地的军饷和由东印度公司⁷⁰所担负的开支。总数为4 877 925英镑，这笔钱可以养活军官5 719人，军士9 956人，士兵126 925人。到1855年3月31日为止的年度的现役海军预算为5 979 866英镑，比上一年度增加1 172 446英镑。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费用为225 050英镑，增加了72 100英镑。全年拨款总额达7 487 948英镑。全体人员计有水兵41 000人，见习水兵2 000人，海军陆战队士兵15 500人，再加上116个辅助人员，共为58 616人。

上星期五晚上莱亚德先生声称，他打算促使人们注意东方问题，并且，正当下院议长准备离开议长席，以便议院能够讨论海军预算⁷¹的时候，他要求发言。刚过4点钟，所有的走廊里都挤满了人，5点钟，议员全部到齐了。整整消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空谈一些鸡毛蒜

皮的事情,显然使得议员和公众都感到厌烦。那些尊敬的议员们居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好奇心,为了参加大辩论的开场竟把晚餐推迟到8点钟,这种情况在下院议员们的议会生活中是少有的。

莱亚德先生的发言不断为掌声打断,他在开始时声称,政府使议员们处于如此异乎寻常的境地,以致他们很难确定自己的态度。在他们对要求支出的款项进行表决以前,政府应当说明,它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在质问政府打算做什么以前,他想问问它已经做了什么。去年他就讲过,如果政府采取了同我国更相称的姿态,它也许不会被卷入战争;而在他详细地研究了最近出版的多卷蓝皮书之后,他也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见解。他对来自各方的各种紧急函件的内容作了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内阁忽略了一些最明显的事实,没有正确了解最明显的倾向,相信了分明是虚伪的保证。他说锡诺普悲剧败坏了英国的声誉并且需要作出详细的说明,他还根据已公布的文件证明,如果没有不列颠政府发出的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命令,联军舰队的海军上将领们本来是能够防止这场灾难的,土耳其人自己也会避免这场灾难的。他根据政府最近的声明推断,政府仍旧想以战前状态为基础进行谈判,他谴责这种做法。他要求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他相信英国人民是会履行自己的义务的。

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以厚颜无耻的态度回答他说,议员们应当或者信任大臣们,或者把他们赶走。而“现在请不要让我们在蓝皮书上白白浪费时间”。

他说,政府受了俄国这个大不列颠的忠实老盟友的欺骗,但是“宽宏大量之心是不会轻易产生阴暗和恶毒的怀疑的”。这个老狐狸精,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狗腿子”和屠杀邦迪埃拉兄弟的刽子手⁷²,在谈到“宽宏大量之心”和“不会轻易产生怀疑”这些话的时候,真是

动听极了。

接着发言的是乔斯林勋爵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他们的发言在第二天登满了报纸，但是使当天晚上的议院空无一人。下一位发言人是罗巴克先生，他先替大臣们的行为辩解，说他们实在左右为难，但最后声称，现在是内阁清楚地说明它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了。约翰·罗素勋爵借口回答这个问题，站起来发言，他用辩解的口吻扼要说明了近来发生的意见分歧的背景，而当他看到这不会起作用时，便装模作样，表示愿意告诉议员们“内阁打算做什么”，虽然对此他自己可能并不是完全心中有数。据他说，内阁同法国不是通过缔结条约而是通过交换照会结成了某种非固定的同盟。英国和法国现在也建议土耳其缔结某种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政府未经它们两国的同意不得求和。沙皇的难以置信的背信弃义使内阁狼狈不堪。他（罗素）对保持和平的可能性感到失望。内阁恐怕得决定参战，因此他要求预算拨款比上一年度增加 300 万英镑。保密是战争取胜的条件，所以他现在不能告诉议员们，在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内阁打算做什么。由于他的发言的结尾部分，或者更加确切些说是戏剧性的部分，讲得有声有色，并流露出对沙皇这个“刽子手”十分愤慨，所以掌声雷动，热情洋溢的议院已经打算批准预算，可是迪斯累里先生却出来插了一手，他做到了把辩论推迟到星期一晚上继续进行。

昨天晚上又继续辩论，直到深夜两点钟才结束。

第一个发言的是科布顿先生，他预先声明他只谈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他煞费苦心，以蓝皮书作根据证明谁也没有否认的事实，即法国政府派拉瓦莱特先生完成关于圣地问题的使命，并迫使土耳其政府作出让步⁷³，因而引起了这场“令人伤心的争论”。当时有可能做皇帝的法国总统以天主教徒的名义向土耳其提出这些要求，大概是

想以此捞一笔小小的政治资本。因此俄国的最初一些措施可归因于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维也纳照会没有签字,这是盟国的而不是土耳其政府的过错,因为如果以从贝济克湾撤出舰队威胁土耳其政府的话,它是会立即签字的。我们将要进行一场战争,因为我们坚持让土耳其用照会通知俄国,说它拒绝为俄国去做那件我们想要求它为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即向我们提供关于更好地对待基督徒的保证。奥斯曼帝国绝大多数居民都十分关切地注视着俄国现行政策(例如目前在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的政策)的成就。他可以根据那些蓝皮书证明,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侮辱和迫害是不堪忍受的,——他主要是引证克拉伦登勋爵所写的显然是为沙皇辩白的一些紧急函件。克拉伦登勋爵在一份紧急函件中写道:

“土耳其政府应当作出决断:要么继续坚持错误的宗教原则,要么丧失盟国对它的同情和支持。”

科布顿先生因此问道:

“议院是否真的认为像土耳其的狂热的穆斯林那样的居民有可能放弃自己的宗教?而如果不彻底放弃《古兰经》的戒律,就根本不可能使在土耳其的基督徒同土耳其人平等。”^①

我们也可以问一下科布顿先生,在英国现行的国教和法律的条件下,能否使英国工人同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平等呢?

接着科布顿先生企图根据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一些不列颠代理领事的信件证明,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全都有不满情绪,有酿成大暴动的危险。

^① 理·科布顿 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那么让我们再问一下科布顿先生,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是否就不存在对本国政府和本国统治阶级的普遍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有很快酿成大革命的危险呢?如果德国、意大利、法国甚至大不列颠也像土耳其那样遭到了敌视它们政府并激起暴动情绪的外国军队的入侵,那么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像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那样长久地保持平静呢?

科布顿先生得出结论说,如果英国参加保卫土耳其的战争,那它就是为争取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居民的统治地位和反对该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战。俄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之间所进行的纯粹是宗教性的争执。英国同俄国休戚与共。它与俄国的贸易的规模非常庞大。它向俄国的输出总额现在只有 200 万英镑,但这只是俄国还奉行错误的保护关税主义所造成的暂时的结果。可是英国从俄国输入的总额达 1 300 万英镑。除了美国,英国同任何一个外国进行的贸易都不像同俄国的贸易这样重要。如果英国是作打仗的准备,它为什么把自己的陆军送到土耳其去而不是仅仅使用自己的海军呢?如果哥萨克主义和共和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什么普鲁士、奥地利、德意志其他各邦、比利时、荷兰、瑞典和丹麦等国保持中立,而法国和英国却要单枪匹马地去打仗呢?如果这是一个对整个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那岂不是应当设想,谁离危险地最近,谁就会第一个去打仗吗?科布顿先生在结束发言时声明,“他反对同俄国作战”。他认为,“最好是回到维也纳照会上来”。

约翰·曼纳斯勋爵认为,政府由于无所作为和过分自恃应当受到谴责。克拉伦登勋爵在他最初给俄、法、土三国政府的一些通知中,不是声明同法国一致行动,而是坚决拒绝同它合作,并且已使俄国政府知道英国将不同法国合作,这就促使俄皇给缅施科夫公爵发

出了引起整个灾难的命令。当英国最后通知说它打算在君士坦丁堡采取措施的时候,法国政府对女王陛下政府的真诚势必会有几分怀疑,这并不奇怪。不是英国劝土耳其政府拒绝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恰巧相反,而是苏丹的大臣们自己承担责任采取了行动,并且他们根本没有指望得到英国的帮助。不列颠政府在俄国人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之后进行的长期的外交谈判,使土耳其的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而给俄国帮了大忙。俄国不经宣战就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以防过去作为它压迫土耳其的实际工具的条约被废除。因此,现在,当土耳其已经宣战的时候,坚持以恢复这些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是不明智的。现在主要的和真正现实的问题是:政府加入这场可怕的斗争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政府总是泛泛地声明,应当维持土耳其的荣誉和独立;但是最迫切需要的是要使人们对这种声明的含义有明确的理解。

霍斯曼先生竭力驳斥科布顿先生提出的谬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土耳其现在是什么样子,而在于如果土耳其被并入俄国的版图之内,俄国将变成什么样子;问题在于俄国的皇帝是否也成为土耳其的皇帝?俄国只有一个公认的目标,这就是通过战争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它的目的是扩张领土。从俄国专制君主在这方面采取最初措施时撒弥天大谎起,直到在锡诺普进行残忍的大屠杀止,他的行为特点就是凶狠、诈骗和罪恶,这种罪恶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全部历史充满罪恶的国家的编年史中也是罕见的,尤其骇人听闻的是,沙皇极其粗暴地践踏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又亵渎地援引这一教义。相反地,预期的受害者的行为却令人钦佩。接着霍斯曼先生竭力用政府十分困难的处境替政府的摇摆不定的方针作辩护。他说,这就是政府在外交方面犹豫不决的原因。即使欧洲所有的内阁、所有谙练的外交

家都来反对这个专制君主,也无法使他的处境比现在我国大臣们的错误或者他自己大臣们的狡猾给他造成的处境更困难、更狼狈,并且他不费周折和不受损失就不可能摆脱这种处境。半年以前,尼古拉皇帝还是欧洲秩序和法制的主要支柱;而现在他已经撕下了假面具,作为一个了不起的革命者出现。沙皇在政治阴谋上破产,在亚洲的战争中失利,在多瑙河上又被土耳其人打垮,他真是已经濒于绝境,这太令人拍手称快了。目前英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就要做到只有在提供了将来不会再发生类似进攻的充分明确的保证的条件下才能缔结和约。他认为,恢复和平的条件之一就是,俄国应当赔偿它使土耳其遭受的损失,土耳其应当收复被夺去的领土作为物质保证。

德拉蒙德先生认为,英国将进行一场宗教战争,并且参加一次新的十字军征讨来保护已被毁坏得无处可坐的布永的哥特弗里德的坟墓。看来,罪魁祸首从一开始就是罗马教皇。英国对土耳其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而英俄之间的战争也不可能决出胜负,因为两国将长久地打下去,并且彼此永远不会给对方以任何危害。

“在目前这场战争中,除了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外,我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科布顿先生不久以前曾经建议打败俄国;如果他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会使英国避免许许多多的麻烦。事实上现在争论的是:应该由巴黎的还是彼得堡的服饰商来打扮圣墓上的偶像。现在英国政府发现,土耳其是他们的老盟友,没有它就不能够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是在他们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整个希腊王国以前,以及在纳瓦里诺会战¹⁹(德拉蒙德先生记得圣海伦斯勋爵曾把这次会战描述为大会战,只不过是没把致命打击加在应该打击的人身上)

以前,他们怎么没有发现这一点。当俄国人越过巴尔干半岛时,当英国能以自己的舰队给土耳其以有效援助时,他们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可是现在,在他们已使奥斯曼帝国陷入老朽不堪的阶段之后,却认为能够在保持均势的借口下使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支撑下去。德拉蒙德先生对出人意外地表现出来的对波拿巴的好感挖苦了一番,然后问道:应该由谁当陆军大臣?大家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是一只软弱无力的手在掌舵。发言人不相信,在现政府下面任何将军或海军上将能保全名誉。现政府为了讨好议院中的这一或那一派别,是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如果英国下定决心要打仗,那就应当打击俄国的“心脏”,而不是在黑海白白浪费炮弹。它首先应当宣布恢复波兰王国。发言人特别想知道政府打算干什么。德拉蒙德先生说道:

“政府首脑引以自豪的是他善于保守秘密,有一次他曾说过,他倒想看一看谁能够从他那里弄到他不打算提供的消息。这种说法使我想起了一次我在苏格兰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位苏格兰高地人到印度游历,回英国时带了一只能说会道的鸚鵡送给妻子作礼物。他的一位邻人不甘落后,到了爱丁堡,从那里为自己妻子带回了一只大猫头鹰。有人告诉他永远也不可能教会猫头鹰说话,他回答说:‘这话一点不假,可是请注意它身上蕴藏着的思维能力’。”^①

巴特先生说,内阁出席议会,对这样一个提案不作明确而详细的说明就请求军事拨款,这种情况自从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就法律意义上讲,英国现在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议院在对这些拨款进行表决时有权知道,是什么东西阻碍着对俄国宣战。在黑海的英国舰队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啊!海军上将邓达斯接到了把俄国船舰赶到俄国的一个港口去的命令;在同俄国还保持着和平关系的时候,如果他

^① 此处至 96 页的引文引自亨·德拉蒙德、悉·赫伯特、本·迪斯累里、约·罗素 1854 年 2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执行这个命令时击沉一艘俄国船，诸位大臣是否准备为这样的行为进行辩护呢？发言人希望有人出来说明，是否应当在如此令人屈辱的条件下支援土耳其，即它在同俄国缔结和约时应当受英国和法国的支配。如果英国的政策是这样，那么，现在要求议会投票赞成补充兵力就是为了奴役土耳其而不是为了保证土耳其的独立。巴特先生有点怀疑：大臣们是否只是为了准备缔结可耻的和约而在故作进行战争准备的姿态。

陆军大臣悉·赫伯特先生的极其庸俗而愚蠢的发言，简直不像一个联合政府的大臣在如此严重的关头能够讲得出口的。政府处在两团火焰中间；它怎么也弄不清议院本身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见解是什么。反对派方面的可敬的绅士们处于可以利用事实的优越地位；他们批评过去；而政府拿不出事实，它只能作一些关于未来的推测。它所以乐于参加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土耳其，不如说是为了抵抗俄国。这就是议院能够从可怜的赫伯特先生嘴里得知的“关于未来”的一切。不过他却透露了某种完全新颖的东西。据赫伯特先生说，“科布顿先生是反映我国人民中人数最多的那个阶级的情绪的代表”。当议院各个角落都驳斥这种说法时，赫伯特先生补充说：

“这位可尊敬的议员如果不是人数最多的阶级的代表，起码也是我国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代表。”

可怜的赫伯特先生！继他之后发言的是迪斯累里先生，就是说，一位真正的辩论家替换下了一个空谈家，这真令人高兴极了。

迪斯累里先生影射约翰·罗素勋爵于星期五晚上结束发言时的戏剧性的言论，一开始就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我一向认为，任何一国人民，特别是我国人民，如果他们真正知道是为为什么而战，那他们就会比被激昂的号召煽起的热情所驱使去进行战斗，并且被激动情绪冲昏头脑时，具有更加大得多的愿望和决心去承受战争状态所造成的负担，那种激动情绪也许一开始对某个大臣是有利的，但是几个月之后，就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难以设想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因灾祸而更加严重。”

1828—1829年的战争就是这样，在这次战争中英国站在俄国方面，而不是土耳其方面。目前的复杂局势和土耳其最近期间的狼狈处境，完全是由上述的英法联合对土战争造成的。当时没有一个下院议员真正知道英国为什么加入战争，或者它打击土耳其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因此，现在必须弄清当前这场战争的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从蓝皮书中才能知道。至于什么是目前局势的根源，这必须从这张桌上放着的许多紧急函件的字里行间去了解。这些紧急函件所阐述的政策准备了一个——按照大臣们的说法——足以使他们心向神驰的未来。因此发言人反对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的空论。赫伯特先生刚才反对只宣读这些紧急函件中的个别几页。可是迪斯累里先生不能答应向议院全部宣读这些蓝皮书。然而如果这位极可尊敬的绅士的反对意见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他显然只好这样做。根据所有熟悉东方问题的人的一致见解，以及根据他个人的见解，俄国没有任何意图想用强力征服奥斯曼帝国，它只是想依靠巧妙的政策和高明的手段来获得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居民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它会获得只有当它取得苏丹帝国的王位时才会拥有的全部权力。在这些谈判开始时，涅谢尔罗德伯爵本人在他的1853年1月和1853年6月的紧急函件中曾明确地阐述了俄国的政策。必须通过对构成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1200万人施加特别的影响，来取得对土耳其帝国的支配权。在俄国致不列颠政府的紧急函件中，不仅清楚地说明

了这个政策，而且同样直率地把实现这一政策的方法告诉了不列颠政府——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保持现行条约并对这些条约的精神加以引伸。由此可见，从这次重大争论刚刚开始时起，外交活动的根据就是凯纳吉条约²⁸。根据这项条约，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被置于苏丹的特殊保护之下。可是俄国在对这一条约进行解释时说，苏丹的基督教臣民被特殊地置于沙皇的保护之下。按照同一条约，俄国可以进行外交交涉，要求保护自己的新教堂（在贝伊奥格卢街的一座建筑物）；俄国把条约的这一条款解释为，俄国有权进行交涉，要求保护正教会的每一个教堂，自然也有权要求保护在苏丹领土内占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一切信仰正教的团体。这就是俄国对凯纳吉条约的直率解释。另一方面，从1853年1月8日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紧急函件中可以看出来，涅谢尔罗德伯爵曾通知汉密尔顿爵士，而后者又曾转告克拉伦登勋爵说：“必须以显示实力来支持俄国的外交”。根据这一紧急函件的说法，涅谢尔罗德伯爵相信这个问题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其根据是：“女王陛下驻巴黎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应当作出努力”。因此俄国当时就曾说明：显示实力只不过是一种显示而已；还是应当靠英国驻巴黎和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努力和平地达到目的。

迪斯累里先生继续说道：

“诸位先生，现在我想知道，在这样表述了目的，说明了方法之后，面临这样的外交策略，大使们是怎样对待这一套计谋的呢？”

无需乎谈论圣地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君士坦丁堡很快就得到了解决。甚至涅谢尔罗德伯爵在谈判刚开始时就表示惊奇和满意，而且说他承认法国有和解的意图。尽管如此，在整个这段时间

内，俄国军队却在土耳其边境集结，而涅谢尔罗德伯爵一直都对克拉伦登勋爵说，他的政府要求对正教会在耶路撒冷失去的特权给予等价的补偿，他的政府原来没有参与处理特权问题。当时还提到了缅施科夫公爵使团，这是可以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各种紧急函件中看得出来的。约翰·罗素勋爵上一次曾经说，涅谢尔罗德伯爵的行为很不诚实。另一方面，约翰·罗素勋爵自己又承认，涅谢尔罗德伯爵一直说，他的皇帝要求给予正教会等价的补偿；可同时他又埋怨，涅谢尔罗德伯爵从来没有对他们讲过他要求的是什么。

“坏透了的涅谢尔罗德伯爵！（笑声）俄国国务活动家的很不诚实的两面手法！（笑声）为什么高贵的勋爵不能搞到他所需要的情报？如果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不能提供有用的情报，那么他还呆在圣彼得堡干什么？”

如果说涅谢尔罗德伯爵从来没有对高贵的勋爵讲过他要求的是什么，那是由于高贵的勋爵从来不敢向他提出相应的质问。在谈判的这个阶段，大使们的责任就是向圣彼得堡的内阁提出直截了当的问题。如果俄国政府不能明确自己的要求，那么声明不列颠政府准备停止在巴黎和君士坦丁堡进行友好的帮助，是完全适宜的。当约翰·罗素勋爵辞职而由克拉伦登勋爵接替时，外交活动的性质就起了有利于俄国的变化。克拉伦登勋爵担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以后，必定给赴职的女王大使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拟出指示。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指示呢？在土耳其处于灾难深重、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教它进行内政改革和贸易改革。还开导它说，土耳其政府的行为应当极端温和而明智，也就是说，它应当同意俄国的要求。同时政府仍然不要求俄国对自己的意图作出明确的解释。缅施科夫公爵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克拉伦登勋爵接到了罗斯上校的令人万分焦虑的公函和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警告性的紧急函件之后，在他给

不列颠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的信中，谴责罗斯上校下令出动不列颠舰队，对法国海军上将受命开进希腊领海表示遗憾，并且以轻蔑的口吻教训法国说，“怀疑的政策既不明智也不稳妥”，并宣称他完全相信俄国皇帝愿意维护土耳其帝国的庄严保证。然后克拉伦登勋爵写信给自己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他完全相信，缅施科夫公爵使团所追求的目的，“不管怎样，都不会使苏丹政权或者苏丹领地的完整有什么危险”。不仅如此！克拉伦登勋爵甚至还对英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加以责难，说现在英国对东方的复杂局势感到忧虑的唯一原因，是一个时期内法国在圣地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因此涅谢尔罗德伯爵赞赏阿伯丁勋爵在使法国处于“孤立状态”方面所起的“beau rôle”[崇高作用]（在蓝皮书中译为“重要作用”）。4月1日英国从罗斯上校那里知道了俄国向土耳其提出的秘密协定。仅仅过了十天，斯特拉特福勋爵到达了君士坦丁堡，证实了罗斯上校所报告的一切。在这以后，克拉伦登勋爵于5月16日在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信中写道：

“俄皇所作的解释（蓝皮书中没有收入的解释）使我们有理由不必分担而是漠视与俄国南部的备战相配合的缅施科夫公爵的行动所必然在整个欧洲引起的忧虑。”

此后，涅谢尔罗德伯爵得以毫不客气地于6月20日通知克拉伦登勋爵说，俄国已经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在这个文件中，涅谢尔罗德伯爵声明：

“俄皇打算占领这些地方作为抵押，直到要求得到满足时为止；尽管如此他仍旧忠于他向英国政府所作的声明；在同伦敦内阁交换有关在开始谈判的同时进行备战的问题的意见时，他直言不讳地说可能有一天他不得不向英国求助，他赞赏英国政府所表现的友好意图，同时把英国政府的行为同法国的行为加以

对比,并把缅施科夫公爵后来的失利完全归咎于斯特拉特福勋爵。”

在这一切之后,克拉伦登勋爵于7月4日写了一个通报,依然指望俄皇的正直和温和,并引证了俄皇多次关于尊重土耳其帝国完整的声明。而7月28日他在写给斯特拉特福勋爵的信中说:

“如果法国和英国认真对待,完全能够打败俄国,不过土耳其在这个期间可能会被彻底摧毁,因此和平谈判是应当采取的唯一方针。”

但是迪斯累里认为,如果当时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那么现在也仍然是一个有力的论据。或者是政府表现了近乎病态性质的轻信态度,或者是它犯了纵容姑息的罪过。战争是女王陛下政府在最近七个月来进行谈判的结果。如果英国政府是出于轻信,那么俄国就是以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速了一场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可以使欧洲的独立、英国的安全和文明世界的安全得到保障的冲突。如果英国政府的行动是出于纵容姑息,那么这将是一场胆怯的战争,一场不坚决的、没有结果的战争,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场恰恰达到最初策划的结果的战争。4月25日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发表了虚伪的声明,说什么缅施科夫的使命是要处理有关圣地问题的争论,虽然他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接着迪斯累里先生简短地叙述了维也纳照会的经过,以证明内阁要么是十分愚蠢,要么是对圣彼得堡宫廷纵容姑息;然后他又转而谈论第三个时期,即从维也纳照会的失败到锡诺普会战¹⁴之间的这一个时期。当时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先生在公开会议上发言时,曾以极其轻视的口吻谈论土耳其。一些半官方的报刊也是这样。是土耳其人自己的毅力改变了土耳其的局势和命运,并且使内阁用另一种口吻讲话。但是奥尔泰尼察会战²刚一发生,轻信政策或者说纵容姑息政策就再次起了恶劣作用。然而锡诺普的大屠杀

还是引起了人们对土耳其的同情。各舰队已经接到了进入黑海的命令。但是它们是怎样行动的呢？它们竟开回博斯普鲁斯海峡！关于未来，约翰·罗素勋爵曾经非常含糊地叙述过英法同盟的条件。迪斯累里先生认为不应把保持欧洲均势同保持欧洲现在的领土划分混淆起来。意大利的未来主要决定于是否尊重这个真理。

迪斯累里先生作了上述精彩发言（自然我只是扼要地加以引证）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起来发言，但是遭到了惨败。他重复了他在上次会议闭会时讲话的一部分，他为内阁政策的辩护毫无说服力，而且竭力注意不说一句包含任何新消息的话。

后来根据詹·格雷厄姆爵士的建议，没有经过辩论就通过了海军预算的某些项目。

最后，这些热烈辩论的十分奇特之点是，议院完全没有做到迫使大臣们向俄国正式宣战或者说明英国将要参战的目的。无论议院或公众，都没有获知比这以前更多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消息。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2 月
21 日

载于 1854 年 3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2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2月22日的议会辩论。
——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
——西方强国的政策”

1854年2月24日星期五于伦敦

报刊上充满了大量的关于科苏特的“战争准备”和他可能实行的“调动”的无益空谈。然而我偶然从一个即将到君士坦丁堡去，并且曾同这位前执政者商量过自己的行程的波兰军官那里听说，科苏特劝他不要离开伦敦；并且表示很不赞成匈牙利和波兰军官参加当前的土耳其战争，因为他们将被迫或者投身于查尔托雷斯基的旗帜之下，或者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认为前者是与他的政策相矛盾的，后者是与他的原则相矛盾的。

迪斯累里先生对内阁的政策之巧妙揭露所造成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群贤内阁¹¹认为必须作一次事后的尝试：用一出小小的喜剧使事情不了了之。这出喜剧已经由大臣们和休谟先生在下院星期三上午会议上演出了。迪斯累里先生挖苦地说二者必居其一，不是病态的“轻信”，就是背叛性的“纵容姑息”。帕麦斯顿勋爵对此作了软弱无力的回答，最后说，他要撇开反对派转而呼吁由全国作出公正裁

决；于是像在“匹拉麦斯和雪丝佩的最惨酷的死”^①中扮演狮子的木匠史纳格那样，休谟先生就被挑选出来代表全国作答复。休谟先生在自己的整个议会生涯中，都竭力把反对派变得令人喜欢，他提出修正案是为了以后把它们收回，事实上，他成为所谓独立的反对派，即每一届辉格党内阁的后卫，只要辉格党内阁的正式拥护者刚一显露出动摇的迹象，它一定出来援救这个内阁。休谟是这个伟大议会的最佳“灭火器”。他不但是议会的最老的议员，而且是独立的议员，不但是独立的议员，而且是激进派，不但是激进派，而且是一个学究式的，大家所公认的看守国家钱袋的塞卜洛士；他的使命是在为了不到一个法寻而发生争吵时让好些英镑悄悄地失去。

正如休谟先生本人郑重声明的那样，在他的议会生涯中，他第一次不是为了斥责倒是为了赞成“预算草案”而发言。正如他本人没有忘记谈起的那样，这次异乎寻常的事件完全不可辩驳地证明，内阁撇开反对派的莫须有的诽谤转而呼吁由全国作出合理的裁决不是徒劳的，它受到的所谓轻信和纵容姑息的指责被郑重地取消了。他的论证是很有意思的。为了把大臣们从不是轻信就是纵容姑息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指责中解救出来，他证明大臣们在同俄国谈判中表现出了轻信。由此可见，他是明白帕麦斯顿勋爵的呼吁的真正用意的。内阁想竭力求得的，无非是取消蓄意背叛的指责。至于说到轻信，高贵的詹姆士·格雷厄姆爵士不是已经说过“宽宏大量之心是不会轻易产生怀疑的”吗？既然可能爆发的战争是大臣们自己在外交上失策的结果，那么战争自然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因此，休谟先生认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能巧妙地进行这次战争。在休谟先生看来，这次提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2场。——编者注

出来的军事预算比较小,这就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打算进行的战争的规模。帕麦斯顿勋爵自然对休谟先生代表全国作出的判决表示感激,而且为了进行回报,他发表了他自己关于国家文件的议论以饱自己听众的耳福。在他看来,在事情还没有混乱到公布文件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时候,文件不应当向议院和全国公布。这就是联合内阁在深思熟虑以后应有的事后英明。联合内阁的领导人帕麦斯顿勋爵不仅要冲淡政敌的发言所造成的印象,而且要取消他自己从议院转而向全国发出的戏剧性的呼吁。

星期二晚上,利物浦的议员霍斯福尔先生提出了下面的质问:

“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或者女王陛下政府在战争发生时打算采取的步骤,真的能够有效地阻止在中立国港口装备起来的私掠船攻击不列颠的船只吗?”^①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尊敬的绅士和议院应当明白,在目前情况下,对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作解释性的回答的。”^①

帕麦斯顿的私人通报《晨邮报》,在引证自己主人的这个回答时说:

“高贵的勋爵不对这个最棘手、最困难、目前可能是谈判内容的问题加以研讨,就不可能给予别的回答(不管政府对这件事是多么了解)。要使这个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就必须诉诸不愿意在我们这个文明的世纪恢复合法的海盗行为的各强国所具有的自发正义感。”^①

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的机关报宣称,“困难的问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说必须诉诸有关强国的“自发正义

^① 1854年2月23日《晨邮报》第25016号。——编者注

感”。如果备受赞扬的丹麦和瑞典之间的中立条约⁷³不是圣彼得堡内阁授意的，那么，不言而喻，这个条约就应当禁止在它们的港口装备私掠船。实际上，全部问题只可能涉及美国，因为波罗的海预定由英国的战列舰占领，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都完全操纵在英国和法国的手里。那么，在圣彼得堡内阁看来，如果土耳其战争引起了英俄战争，美国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根据1825年秋天波措-迪-博尔哥给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紧急报告⁷⁵，就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俄国当时决定入侵土耳其。同现在一样，俄国当时也是打算从和平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开始。波措-迪-博尔哥说：

“假定采取这个计划，那就必须以十分审慎的口气同土耳其政府进行会谈并向它保证，如果它不愿使自己卷入战争，皇帝愿意通过和解来消除这些分歧。”

波措-迪-博尔哥在列举了一切必须采取的步骤以后，继续说：

“最好是把所有这些行动都通知美国，以表明皇帝内阁的敬意，并且表明皇帝内阁对澄清美国的舆论甚至争取它的支持十分重视。”

波措-迪-博尔哥说，一旦英国同土耳其联合起来向俄国开战，

“它〈英国〉在封锁我们的港口时，将使用自封的在海上反对各中立国的权利。美国是不会容忍这样做的！这就会造成严重的分歧和危险的局势”。

现在，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正确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俄国的〉对外政策丝毫未变”^①；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也许从1853年

① 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1835年圣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页。——编者注

2月起，俄国已“把自己所有的行动都通知了美国”，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用甜言蜜语诱惑华盛顿内阁至少采取中立立场。同时它指望在同英国作战时可能发生关于“中立国的海上权利”的争论，这种争论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分歧和危险的局势”，并且使美国同圣彼得堡建立某种程度的公开的同盟。

既然我已经引用了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中最著名的一份紧急报告，那就顺便把关于奥地利的那一段也引出来。可以肯定，从1825年以来在加利西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发生了一些事件以后，这段话的内容也丝毫没有失去它的现实的意义。波措说：

“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采取威胁性的姿态，并通过我们的种种准备工作使它相信，如果它采取反对我们的行动，那么，一场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最猛烈的暴风雨就会降临到它的头上。要么梅特涅公爵向土耳其人宣布，我们进入多瑙河两公国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挑衅而采取的决策，要么他自己侵入对他更加合适的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省份。第一种情况，我们是会赞成的，第二种情况我们也是会赞成的。我们应当担心的唯一的事情，是公开宣布反对我们。如果梅特涅公爵是聪明的，他一定会避免战争，如果他想使用暴力，那他就要受到惩罚。对待一个处于像他那样情况下的内阁，像我们这样的政府，必要时会找出上千种途径来消除分歧。”

约翰^①勋爵的鼓动性的演说，关于英国的荣誉的喧嚣，对俄国的背信弃义所表示的巨大的愤慨，巡航于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城墙下的英国浮动炮台的幻影，炫示武力，军队虚张声势地登船——这些戏剧性的事件把公众弄得糊里糊涂，在他们的眼前搅起了一团迷雾，使他们除了自己的幻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蓝皮书已揭示了种种情况之后，如果还相信这个内阁不仅突然变成了战争内阁而

① 指约·罗素。——编者注

且变成了这样一个内阁，它同俄国除了能进行装模作样的战争，或者说，进行恰恰有利于佯装与之作战的敌人的战争之外，还能进行任何其他战争，——难道会有比这更大的自我欺骗吗？让我们来看看备战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

根本没有正式向俄国宣战。内阁不能公开说明战争的目的。军队登船要开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十分清楚。要求的拨款用来进行大战争是太少了，进行小战争又太多了。这个以擅长于为自己不遵守最庄严的诺言制造借口和为拖延最迫切的改革捏造理由而出名的联合政府，突然感到自己必须严格履行已匆忙地许下的诺言，而且提出了一项使举国惊讶的新改革法案，结果使这一深重的危机更加复杂。这一法案连最热烈的改革派也认为不合时宜，它不是在任何外部压力下提出来的，并且受到了各方面的最大的冷落和怀疑。他们的打算无非是要提出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国内问题来转移公众对于对外政策的注意，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竭力使公众对英国同外国的关系产生误解，这是相当明显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同法国缔结任何约束性的条约，但已通过“交换照会”制造了一个代用品。然而英国早在1839年就同路易-菲力浦的内阁交换过这样的照会，根据这些照会，联军舰队应当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阻止俄国单独一国或同别的强国一起干涉东方的事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交换照会的结果是出现了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和达达尼尔海峡条约。⁷⁶英法同盟是否认真严肃，这从下院昨天的会议上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来。你们在《通报》上可以看到，波拿巴威胁希腊暴动者，并且向奥托国王政府提出了相应的抗议。约翰·沃尔什爵士就这一点向内阁提出质问以后，约翰·罗素勋爵说：

“他一点也不知道法英两国政府关于上述问题的协议，他没有能够同外交大臣商谈这个问题。不过他的印象是法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而且肯定没有征得我国政府的同意或达成一致见解。”^①

不列颠政府如果真正打算同俄国开战，为什么极力避免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宣战方式呢？它如果打算同法国结成真正的同盟，为什么刻意回避结成国际同盟的合法的方式呢？关于德意志各邦，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声称，它们同英国缔结了同盟，而约翰·罗素勋爵则与他相反，在当天晚上就说事实上目前与这些邦的关系同东方开始发生纠纷的时候是一样的。按照大臣们的说法，他们现在正打算搞好同土耳其的关系并建议同它缔结条约。他们没有预先同土耳其签订条约，就派兵登船打算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我们从君士坦丁堡的一封来信中得知，土耳其政府的一个秘密代表曾奉命从维也纳到圣彼得堡去向沙皇建议私下和解时，我们一点也不应感到惊奇。那位来信人写道：

“土耳其人在认清了自己的假朋友的背叛和愚蠢以后，会设法同聪明的敌人结成同盟以进行报复，这是很合情理的。假朋友打算强加于土耳其的和解条件，其危害性比缅施科夫的要求要大十倍。”

至于英国内阁认为登船的军队要完成什么任务，这可以从联军分舰队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得到正确的了解。它们在进入黑海20天以后就回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以前不几天，有消息说：

“土耳其政府的大臣们考虑到不列颠大使提出的抗议，不得不把希腊报纸《博斯普鲁斯电讯》的编辑逮捕入狱，因为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声称，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不久一定会从黑海回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君士坦丁堡日报》的编辑受

^① 约·罗素 1854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权声明,两支舰队将继续留在黑海。”

俄国海军上将为了对英国和法国的海军上将们给他的暗示表示重视,于上月19日派了两艘蒸汽舰去炮击舍夫卡捷尔的土耳其人;俄国的蒸汽舰在特拉佩宗特所能看到的海域内进行巡航,而当时除了一艘英国军舰和一艘法国军舰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以外,联军分舰队在黑海没有自己的舰只。锡诺普会战以及舍夫卡捷尔遭到俄国蒸汽舰炮击——这是联军分舰队唯一可以夸耀的功绩。大使们和海军上将们之间的争吵弄到彼此的关系完全破裂。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竟拒绝接待邓达斯海军上将,而巴拉盖·狄利埃不让法国海军上将和他的军官参加一个正式舞会。但是,这种争吵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因为外交界的吹牛家,由于自己的紧急报告在伦敦和巴黎被发表使自己的名誉受了损害,显然要竭力挽回失去的威信,而不管这样做会损失多少军舰,牺牲多少水兵。

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发给大使们的公开的指令被发给海军上将们的一系列秘密指令撤销了,海军上将们的确不能执行自相矛盾的指令。既然在发指令以前没有宣战,指令又怎能不是这样的呢?一方面,他们受命攻击俄国舰只,迫使它们由黑海撤回塞瓦斯托波尔,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超越单纯防御。最后,如果是要打一场真正的战争,那么,不列颠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怎能把他设法使土耳其内阁中的主战派领袖穆罕默德-阿里帕沙被撤销陆军大臣职务,而以和事佬里扎帕沙来代替他,同时把海军元帅的职务交给路西德帕沙的亲信穆罕默德帕沙这件事描绘成一大胜利呢?

且看极其重要的另一点。只是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爆发了希腊人的暴动⁷⁷、暴动已蔓延到帖撒利亚和马其顿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和巴

黎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才开始登船。正如罗素、克拉伦登、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紧急函件所表明的,英国内阁一开始就迫切地等待这次暴动。这次暴动给英国内阁一个最好的口实,使它可以借口调解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而去干涉苏丹同他自己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纠纷。从天主教徒开始干涉 Greeks(我在这里只是在宗教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①)的事务的时候起,就可以有把握地指望欧洲土耳其的1100万居民同沙皇达成一致,沙皇在这种场合下就会真正成为他们在宗教上的保护者。在穆斯林和他们的正教臣民之间不存在任何教会宗派的纠纷,但是在宗教上对天主教徒的仇视可以说是土耳其境内信仰正教的各种民族之间的唯一的共同纽带。自从穆罕默德二世包围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起,自从希腊的海军上将、拜占庭帝国最有势力的人鲁卡·诺塔腊斯公开声明,他乐意在首都看到土耳其缠头的胜利,而不乐意看到罗马帽子的胜利的时候起,在这方面事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另一方面,曾经流传过一个匈牙利的预言,说只有消灭了可诅咒的异端的正教徒,只有土耳其人毁灭了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才能真正幸福。因此,西方强国对苏丹同其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的任何干涉都必定有利于沙皇的计划。如果奥地利打算像自己在1791年⁷⁸那样,借口要挫败俄国派在塞尔维亚的叛变性的阴谋而去占领这个公国,那结果也是一样。让我补充一点,伦敦传说举行暴动的伊庇鲁斯人曾得到从伊奥尼亚群岛来加入他们中间的希腊人的支持,英国当局没有阻挠这些希腊人,而且联合政府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在星期六的报上声称希腊人暴动的消息是一个令人非常高兴的事件。

① 英文“Greeks”(希腊人)一词也作“正教徒”解释。——编者注

我自己决不怀疑在联合内阁的这些大叫大嚷的备战后面隐藏着背叛的行为。当然,波拿巴进行这次战争是十分认真的。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别无其他选择。他已经不可能继续把拿破仑第一的残酷的专制同路易-菲利浦的那种卖身的和平政策结合起来了。他必须停止把一批一批的囚犯不断地流放到卡宴,如果他不敢同时把法国军队派到国外的话。但是,波拿巴的未加掩饰的企图和联合内阁的秘密计划之间的矛盾只会促使局势更加混乱。我根据这一切得出的结论,不是战争不会发生,而是相反地,战争将具有联合内阁的小人们连猜也猜想不到的那种可怕的规模和革命的性质。他们的背信弃义本身就是使局部冲突变成全欧战火的手段。

但是,即使不列颠内阁过去是那样真诚,就像它现在是那样虚伪一样,它的干涉终究只能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它如果不要求土耳其政府给予基督教臣民以保证,就不能进行干涉,而它如果不使土耳其政府灭亡就不能得到这些保证。甚至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君士坦丁堡的来信人,一个公开的亲土耳其分子,也不得不承认,

“西方强国要使土耳其帝国所有的臣民在世俗和宗教方面完全平等的建议,将会立即使帝国发生混乱和内战,从而使帝国彻底地、迅速地毁灭”。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2月
24日

载于1854年3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5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计划。——
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⁷⁹

1854年3月3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前一篇通讯中说过，查理·纳皮尔爵士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要归功于他曾公开表示不信任法国盟友，并且指责法国在1840年对英国的背叛行为，然而实际上那时英国政府是同尼古拉秘密勾结起来反对路易-菲力浦的。我还应该补充一句，黑海的第二个海军上将埃德蒙·莱昂斯爵士在他出任英国驻希腊公使期间，曾表现出他是法国的公开敌人，而且他由于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建议而被免去这个职务。这样，内阁通过自己的任免竭尽所能地不仅制造英法统帅之间的不和，而且制造海军上将们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之间的不和。

不能认为波拿巴在议会开幕时对议员们的演说中曾庆幸他同英国结成紧密的同盟是同这些事实矛盾的，更不能认为是推翻这些事实的。友好协约²⁵当然要比帝国礼仪⁸⁰的恢复更早些。波拿巴的演说中最精彩的地方不在于重弹路易-菲力浦的夸夸其谈的老调，也

不在于揭穿沙皇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而应该说在于他宣布他自己是德国的，特别是奥地利的保护人，反对它们国内外的敌人。

2月5日土耳其政府同西方强国的条约批准书(其中一条规定：土耳其政府未经四强国的同意不得同俄国签订和约)刚在君士坦丁堡交换过，四强国代表就同土耳其政府开始了关于土耳其基督徒今后地位的谈判。星期三的《泰晤士报》下面的报道透露出这次谈判的真正目的：

“土耳其帝国的某些地区根据苏丹的敕令和某些条约已经得到了在继续承认土耳其政府主权的条件下的充分的内部自治权，这些地区的状况可以作为今后可以推广的对双方都无损害的先例，而且也许可以为目前情况下的土耳其欧洲领地提供最好的解决办法。”

换句话说，联合内阁打算保持土耳其帝国欧洲部分的完整，办法就是把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鲁米利亚以及帖撒利亚变成像多瑙河两公国那样的国家。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这些条件，那么在土耳其军队取得胜利的时候势必引起土耳其人自己之间的国内战争。

现在大家都知道，维丁密谋⁸¹的被揭发只是促进了希腊人暴动，在布加勒斯特，人们在希腊人暴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认为暴动是既成事实。斯库塔里的帕沙正在集结自己的全部军队，以阻止黑山人同暴动的希腊人联合。

就不列颠政府目前的意图而言，英法的远征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欺骗行为。已经指定罗多斯托为法国人的登陆地点，埃内兹为英国人的登陆地点。埃内兹城是在多沼泽的海湾入口处的一个不大的半岛上，它的背后是马里查河谷的一片宽阔的沼泽地，毫无疑问这对营地的卫生情况是十分有利的。该城不仅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区域

以外,而且处在达达尼尔海峡区域以外,军队要抵达黑海,必需重新上船,尝尝逆海峡水流绕道航行 250 英里的滋味,或者穿过无路可行的地带走 160 英里,走这一趟就得花上两个星期。而到罗多斯托的法国人至少还在马尔马拉海上,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七天的路程。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部署下,军队目前能做些什么呢?军队或者开到阿德里安堡去掩护首都,或者在最糟的情况下,在色雷斯半岛地峡集中起来保卫达达尼尔海峡。《泰晤士报》就是这样说的,它还援引“权威方面的消息”,甚至还援引马尔蒙元帅的战略性意见来证明这一计划的英明。

用 10 万名法英士兵来保卫没有受到任何人威胁,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也不可能会受到威胁的首都!老实说,他们留在国内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

这一计划如果付诸实施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可以想出来的最坏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以一种最坏的防御战为基础,也就是在绝对无所作为中去寻找力量的源泉。如果说,这次远征主要是防御性的,那么只要给拥有这样的预备队的土耳其人以转入进攻的机会,或者至少是占领一个可能采取局部进攻的阵地的机会,显然是很容易达到这一目的的。可是,在埃内兹和罗多斯托,法英军队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最糟糕的是拥有许多蒸汽运输舰并得到 20 艘帆力战列舰组成的舰队支援的 10 万军队,本身就是一支能在黑海任何地区进行最坚决的进攻的力量。这一支力量应当既能占领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也能占领敖德萨和赫尔松,封锁亚速海,摧毁在高加索沿岸的俄国要塞,俘获俄国军舰并把它毫无损伤地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否则就是它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和自己作为作战部队的职责。拥护内阁的

人断言,这样的军事行动只有在这 10 万人在土耳其集中以后才能进行,并且说头几个师在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登陆只是为了迷惑敌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立即在黑海沿岸地区的某些据点登陆,也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经费。敌人是不会受骗的。只要尼古拉皇帝一听到这个大吹大擂的 10 万人大军远征的消息,他就一定会把他能抽出的士兵统统派到塞瓦斯托波尔、卡法、彼列科普和叶尼卡列去。你决不能先用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吓唬自己的敌人,然后设法使他相信,这支力量一点也不会对他有所损害。这个花招太容易看穿了,如果打算用这种可怜的手法来迷惑俄国人,那么不列颠外交在这里又犯了一个大错误。

因此我认为,策划这种远征的人只是打算明目张胆地背弃苏丹,借口要狠狠地吓唬一下俄国,实际上小心翼翼地设法使它受到尽可能小的损害。

如果英国和法国将占领君士坦丁堡和鲁米利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也许还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山,而俄国被允许加强它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阵地,那么,这看上去无非是要最后瓜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土耳其现在的处境比 1772 年还要坏。当时普鲁士国王为了诱使叶卡捷琳娜女皇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因为多瑙河两公国被占领有引起欧洲冲突的危险),曾建议对波兰实行第一次瓜分⁸²,这样可以补偿俄土战争的费用。我们还记得,当初土耳其政府投入对叶卡捷琳娜的战争,是为了保卫波兰不让俄国染指,而结果波兰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祭坛上的牺牲品。

联合内阁所实行的叛卖性的拖延政策,使得俄国密使有可能筹划、准备克拉伦登勋爵迫切期待的希腊人暴动。暴动于 1 月 28 日开始,据维也纳最近的紧急报告说,到 2 月 13 日已经达到十分危险的

规模。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的一些地区以及伊卢萨和德洛尼亚一些区域据说已经卷入暴动。有人说，埃维亚岛的首府埃格里波举行了暴动，其严重性不亚于阿尔巴尼亚的暴动。土耳其人放弃阿尔塔和亚尼纳这两个城市而由希腊人去占领。这个情况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瞰制这两个城市的要塞仍在土军手中，我们根据在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多次战争知道，最后占据这两个城市总是取决于占据要塞。孔泰萨湾和萨洛尼卡湾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沿岸一带将宣布戒严。我在前一篇通讯^①中曾指出，希腊人暴动令土耳其政府最为担心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会给西方强国以机会，不去同俄国人作战，而去干涉苏丹和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从而驱使信仰正教的基督徒同沙皇结成同盟。西方强国多么渴望抓住这个机会，这可以从同一班邮件带来的消息中看出：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约，而且英法大使派了两艘蒸汽舰去帮助土耳其人，与此同时，不列颠驻雅典的全权公使却通知奥托国王政府，英国将干预发生暴动的地区。《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在今天的报上从军事观点对暴动的直接结果作了十分清晰的说明：

“最近几天内，维丁的司令部里开始出现某种沮丧情绪，因为已宣布的增援部队接到了向相反方向开进的命令，他们现在正在去土耳其西南地区的途中。伊庇鲁斯的基督徒暴动的消息，在多瑙河一带的阿尔瑙特人⁸³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间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影响，他们吵闹着要求准许他们回家去。侯赛因贝伊准将和苏里曼帕沙准将已经丝毫不能影响自己的不受约束的军队。有人担心，如果试图用武力来控制他们，结果就会形成公开的叛乱。但是如果准许他们回去，那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就会把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劫夺一空。如果西部基督教居民的敌对运动具有更加危险的规模，那么土耳其军队的西翼将不得不退却，

^① 见本卷第 107—108 页。——编者注

这样一来，土耳其将遭到比联军舰队开进黑海给俄军的打击更加严重的打击。”

以上就是格雷厄姆、罗素、克拉伦登和帕麦斯顿为了替内阁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进行辩护而大肆吹捧的那种拖延政策的最初后果。他们在上星期五的夜晚收到消息说，沙皇不等英国召回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命令到达，就毫不客气地断然命令他离开，在这之后他们举行了两次内阁会议，一次在星期六，另一次在星期日下午。他们商议的结果是：用照会的形式容许沙皇再拖延三、四个星期，照会中说：

“要求沙皇在收到这一通知的六天内作出庄严的保证，答应命令自己的军队在4月30日或在此以前撤出多瑙河两公国。”

应当注意，即使照会遭到沙皇拒绝，也不会有宣战的危险。可以说，而且《泰晤士报》已经这么说了，尽管又容许了拖延，积极的备战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应当指出，一方面，由于西方强国决定直接参战，土耳其政府就不可能在多瑙河一带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而在这一地区每拖延一天都会使土耳其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因为这就会使俄国人有可能加强其前线的兵力，而且多瑙河军队后方的希腊暴动者会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实际威胁；另一方面，军队在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登陆会使苏丹感到为难，但绝对阻挡不住俄国人。

曾经谈妥不列颠的远征军将是三万人左右，法国的远征军将是八万人左右。如果在事件的进程中发现，奥地利假装同西方强国联合，只是想掩饰它同俄国之间的谅解，那么波拿巴势必对这种极不明智的分散自己军队的做法感到很后悔。

另一个暴动,也可以看作是有利于俄国的牵制行动,这就是西班牙的暴动⁸⁴。西班牙的任何运动都必然会引起法英两国之间的摩擦。我们从夏多勃里昂著的《维罗纳会议》一书中可以看出,在1823年,法国干涉西班牙是受到俄国唆使的。从1834年英法干涉⁸⁵的发起人是帕麦斯顿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这次使得两国间的友好协约终于破裂的干涉是由同一个原因造成的。“西班牙的婚姻”⁸⁶为推翻奥尔良王朝开辟了道路。在目前,“无辜的”伊萨伯拉被废黜会使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儿子蒙庞西埃公爵有可能对西班牙王位提出要求,同时也会使波拿巴想起马德里有一个时期曾经是他的伯父^①的驻在地。奥尔良家族会得到科堡家族的支持,但是也会遇到波拿巴家族的反对。因此,西班牙暴动决不是人民革命,而只能成为摧毁像英法同盟这样表面联合的有力工具。

据说,俄国、希瓦、布哈拉和喀布尔之间签订了同盟条约。

至于多斯特-穆罕默德(喀布尔的艾米尔),——1838年他曾向英国建议,如果英国政府认为需要的话,他可以处死沙皇派来的使节,使他自己同俄国结下不共戴天的世仇;再者,1839年英国远征阿富汗,他的王位被废除,他的国家遭到肆无忌惮的掠夺和蹂躏⁸⁷,——如果他现在想对英国,他的背信弃义的盟国进行报复,那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希瓦、布哈拉和喀布尔的居民是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而波斯人信奉什叶派的宗派教义,所以未必能够设想那些居民会同俄国——他们一向憎恨并且蔑视的波斯人的同盟者——联合起来,去反对被他们认为是一切正统教徒的最高首领的钵谛沙赫的公开同盟者——英国。

① 约瑟夫·波拿巴。——编者注

俄国很可能指望把中国的西藏和鞑靼^①皇帝作为同盟者,如果鞑靼皇帝被赶到满洲并且放弃中国本土的王位的话。你们都知道,汉族造反者开始了反对佛教的真正的十字军讨伐,烧毁寺庙,杀死和尚。⁸⁸但是鞑靼人信奉佛教,而承认中国主权的西藏是大喇嘛的所在地,被信仰佛教的人看作是圣地。因此,如果天王能够把清王朝赶出中国,以后他将不得不同鞑靼人的佛教政权进行宗教战争。由于佛教信仰盛行于喜马拉雅山的两边,英国不能不支持新的中国王朝,所以毫无疑问,沙皇将站在鞑靼族方面,唆使他们反对英国,并千方百计地在尼泊尔挑起宗教暴乱。从最近东方来的邮件我们知道,

“中国皇帝预见到北京会失守,曾命令各省总督把皇室收入交到热河——这是皇帝的旧的氏族领土和他现在在满洲的夏宫,在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的地方”。^②

总而言之,不久就要在汉人同鞑靼人之间发生宗教大战,这个战争一定会波及印度边境一带。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2 月

28 日和 3 月 3 日

载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403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这里使用的“鞑靼”这一名词,在 19 世纪西欧著作界普遍用来指居住在东亚的蒙古族、满族和突厥族。——编者注

② 1854 年 2 月 28 日《泰晤士报》第 21676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破产⁸⁹

尽管有着战争的威胁和迫切的需要,法国政府和奥地利政府至今都未能使战争的神经^①健全起来,就是说未能使财政状况得到巩固。虽然法国财政大臣隆重地设盛宴招待负责税收的政府官员、动产信用公司⁹⁰的领导人 and 巴黎的大银行家,可是这些资本家却无动于衷,抱着一种审慎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习惯于损害公共利益来满足私人利益,从国家那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好处。所以发行预定为两亿法郎的法国公债的条件至今没有肯定下来。

至于奥地利,那么毫无疑问,它对西方列强采取友好态度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希望以此恢复富豪们的信任并摆脱自己的财政困难。的确,维也纳的官方报纸刚刚透露了一点关于奥地利中立和同法国亲善的消息,又立刻刊载了使公众惊讶不已的一则关于打算把 600 万英亩的王室领地的很大一部分出卖的消息以及 1854 年 2 月 23 日的财政法令:规定强制流通的总数为 15 000 万佛罗伦的国家纸币必须交给国民银行,并逐步换为银行券。在转换完结以后,由国库发行的一切纸币将停止流通,而且不再发行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实行

^① 源于罗马谚语:金钱是战争的神经。——编者注

这种转换时，帝国政府向银行担保对交给它的国家纸币负责，并且保证向银行偿付为实行这种转换所需的一切开支；政府每年至少要支付1 000万弗罗伦来清偿因此所负的债务；政府用关税收入作抵押，以担保按时支付这些款项，而且按照收入的税款的金属货币比率向银行支付金属货币。同时，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银行有可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恢复金属货币支付。从银行方面来讲，为了使银行券的持有者随时能把银行券换为用金属货币支付的有息证券，银行开始发行完全与国家债券或证券相等的有息债券。此外，政府打算把所谓购买票据和预付票据收回，使它们完全停止流通。

把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转换为不能兑现的银行券，这既不会减少发行纸币的数量也不会提高其币值，而只能简化其名称。因为国家拥有它给予银行赎回纸币的那么多资金，所以，如果国家不知道它已经这样信誉扫地，以致只有依靠不是国有财产的银行才能恢复它的信用，那么它自己是会利用这些资金的。这样一来，奥皇对维也纳银行的高利贷者的依赖程度，随着他的政府的军事性质的加强而增长。1852年1月，他把格蒙登、奥塞、哈莱因的盐场抵押给他们了。1854年2月，他们取得了整个君主国的关税抵押权。银行一步步变成了帝国的真正主宰者，而政府则不过是名义上的主宰者而已。奥地利越是拒绝满足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要求，它就越要被迫向这个阶级中的一派——放债人的无限的专制屈服。

我们在上面已指出其实质的那个法令掩饰着要举借新债的企图，它表面上是要帮助银行券的持有者把银行券换为用金属货币支付的有息证券。1852年政府也曾保证用金属货币来支付各种小额款项和债款，但是由于税收所得全是国家纸币或银行券，政府不得不在伦敦和法兰克福签订了3 500万弗罗伦的借款契约。新的借款当

然会增加原有的赤字,增加了的赤字会导致增发纸币,而举借新债原是为了防止纸币过多和相应贬值的。政府虽然规定了金属货币支付和银行券支付之间的重大差额,但是这并不能消除银行券的恶劣声誉,就像把银行的流通手段增加 15 000 万不能使银行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恢复现金支付一样。政府必须按照征收关税时收入的金属货币比率用金属货币给银行付款;可是,大家知道,在奥地利,不仅农民而且大城市的居民都像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喜欢贮藏金钱;1850 年甚至贮藏铜币,而在 1854 年,所有税款全是用纸币缴纳的,虽然用纸币纳税要多缴 17%。

熟悉奥地利国库历史的人,不管在新法令的诺言中,或者现在采取的财政措施中,都找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奥地利是在玛丽-泰莉莎女皇统治时期当七年战争⁹¹快结束的时候第一次发行纸币的。最初那是一种可向国家当局兑换白银的银行票。1797 年,对法战争引起的财政困难迫使政府取消了兑换白银的制度。玛丽-泰莉莎女皇统治时期第一次的发行量为 1 200 万弗罗伦,而到 1809 年,银行票的总数达到了 1 060 793 653 弗罗伦,同时银行票的贬值达到了极点。1811 年 2 月 20 日政府公布了一项特别命令,规定银行票完全停止流通,并按照 100 兑 20 的比价赎回成称为维也纳货币的新纸币(赎回票据的名称由此而来)。政府宣布这些票据为国家的真正货币,并且许诺这种新的纸币决不超过兑换银行票所需要的数量。1811 年 5 月维也纳货币就已贬值 8%,并且发行了预付票据,其所以称为预付票据,是因为通过这种票据预付了 12 年的部分税款。第一次发行的预付票据实际上为数只有 4 500 万弗罗伦,为了在 12 年中赎回这些预付票据,规定每年从土地税中拨支 375 万弗罗伦。

但是由于进行战争,新的预付票据悄悄地接二连三地发行,结果

每一次都引起相应的贬值。1815年白银的贴水高达维也纳货币的400%。1816年6月1日,敕令宣布,国家今后绝不发行不兑现的纸币,正在流通中的纸币必须逐步收回,金属货币必须重新成为标准的流通手段。为了履行这些诺言,1818年1月18日毅然成立了享有特权的国民银行,国家同国民银行事先签订了协议,由银行赎回不兑现的纸币。然而,到1852年6月我们在一家官方报纸上又看到财政大臣发表声明:今后绝不会再有强制公债、特别税和货币贬值的现象;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在将来,奥地利的纸币定能毫无损失地兑换金属货币;目前打算发行的公债将用于收回国家纸币和偿还欠银行的国债。这些诺言的周期性的重复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它们是不可靠的。

在玛丽-泰莉莎时代,奥地利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发行它自己的可兑换金属货币的银行票,在兑换白银时甚至还要给贴水。1818年,为了赎回纸币,国家不得不乞灵于成立属于私人资本家财产的享有特权的银行;这个银行获得一种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的优惠,但是银行必须发行可兑现的银行券。1854年政府求助于银行,但是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像国家自己的纸币一样,也贬值了,不能兑现了。

虽然1815—1846年间奥地利经历了一个几乎是持续的和平和内部平静的时期,但是在这个很长的时期以后,第一个打击就显示出它不知所措。1846年2月底的克拉科夫起义和加利西亚骚动⁹²使国家的开支比1845年增加了1000万弗罗伦以上。军队的费用是开支增加的主要原因。1845年军队的费用为50624120弗罗伦,而1846年就增加了700万弗罗伦,同时帝国各省的行政费用也增加了200万弗罗伦。1847年,商业危机和农业歉收使税收大大减少了,然而,主要是由于意大利发生骚乱,军队的费用却增长到6400万弗罗

伦。这一年的赤字是 700 万弗罗伦。1848—1849 年整个省份的收入断绝,可是却要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投入军事费用。1848 年的赤字是 4 500 万弗罗伦,1849 年的赤字是 12 100 万弗罗伦。1849 年发行了 7 600 万弗罗伦的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三厘国库券。在此以前银行早就停止了金属货币支付,它发行的东西被政府宣布为不能兑现的。1850 年赤字为 5 400 万弗罗伦,而与普鲁士作战的危险使纸币贬值 60%。1849、1850 和 1851 年发行的国家纸币的总额为 21 900 万弗罗伦。1852 年的赤字比 1848 年增加了 800 万弗罗伦,比 1847 年增加了 4 600 万弗罗伦。1851 年的军事预算为 12 600 万弗罗伦,就是说正好比 1847 年增加了一倍。1852 年警察的费用为 900 万弗罗伦,即比 1848 年增加了三倍。而 1853 年警察和军队的费用又有增加。

不过,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解答奥地利怎样陷入了财政的困境,而在于说明它虽然陷于虚金本位和债务之中,为什么仍能避免公开的破产。1850 年国家收入为 19 600 万,比 1848 年增加了 7 400 万,比 1849 年增加了 4 200 万。1851 年的收入为 21 900 万,比 1850 年多 2 300 万。1852 年的国家收入达 22 600 万,比 1851 年增加 600 万。总之,国家的收入在不断地增加,虽然 1852 年的收入不像 1851 年增加得那样多,而 1851 年的收入又不像 1850 年增加得那样多。

收入增加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把撒丁的战争赔款和在伦巴第一威尼斯没收的财物⁹³这些特别收入撇开不谈,奥地利农民向土地占有者的转变,当然增加了农村纳税的能力和土地税的收入。同时由于撤销了财产继承法院,从而把贵族过去依靠他们的司法权而享有的收入转入了国库。从 1849 年起这方面的收入越来越多。其次,1849 年 10 月 29 日的特别命令所规定的所得税也使得收入大大

增加。在奥属意大利各省,由这种税提供的收入特别多。例如,1852年德意志和斯拉夫各省的所得税总共才增加了601 000弗罗伦,而仅意大利各省就增加了639 000弗罗伦。但是,使奥地利帝国免于正式破产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对匈牙利的征服以及对匈牙利征收与其他各省同等的捐税。

土地税可以说是整个奥地利税收制度的基础。1812年4月1日公布了一项敕令,弗兰茨皇帝在这个敕令中宣称,他决定在德意志、斯拉夫和意大利所有省份实行划一的土地税征收制度。敕令中有一条曾规定今后不得“因土地所有者或房产所有者的个人的地位”而免缴土地税,这个原则大体上已经实行。1834年在奥地利大公国实行了新的土地清册,这个公国是在奥地利君主国的世袭领地中新制度首先生效的地方。奥地利的伦巴第从查理六世以来就已具有很完善的土地清册,叫作Censimento Milanese。但是,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决不同帝国其他各省一样缴纳土地税和其他税。根据匈牙利宪法,拥有绝大部分土地的匈牙利地主免缴任何直接税,甚至别的省份都必缴的某些间接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也不缴纳。1846年,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军事边区⁹⁴的人口是14 541 958人,而君主国其他各省的人口是22 901 675人,这样,前几个省应提供全部收入的 $\frac{7}{18}$ 。但1846年,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只缴纳了2 300万弗罗伦,不到当年全部收入16 400万弗罗伦的 $\frac{1}{7}$ 。奥地利君主国的全部面积为12 123平方德里,其中匈牙利各省占5 855平方德里,也就是说占奥地利面积的一半。

约瑟夫二世皇帝恣意在匈牙利推行新制度,使匈牙利的地位同其他省份的地位相等,其主要目的是要使奥地利君主国集中化和完

全德意志化。可是这种做法对匈牙利的舆论却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以致约瑟夫二世在临终前担心匈牙利人会像尼德兰人一样起来造反⁹⁵。

莱奥波德二世、弗兰茨一世和斐迪南一世这几个皇帝都不敢重复这个危险的试验。自从匈牙利革命在俄国的干预下被平息以后，匈牙利宪法阻碍课税平均化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从来没有宣誓忠于匈牙利宪法，正因为如此他才取代斐迪南当了皇帝，他立刻在匈牙利实行了像在奥地利其他领土上已经实行的那种土地税。此外，从1850年10月1日起取消了匈牙利的边区税卡，奥地利君主国整个境内的关税就像其他赋税一样统一起来了。从1851年3月1日起在匈牙利也开始征收消费税并实行烟草专卖。1851年匈牙利各省，仅仅直接税就增加了1150万弗罗伦，而在1852年又增加了约800万弗罗伦。

我们由此可得出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奥地利帝国的生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依靠占有匈牙利和伦巴第；只要一失去匈牙利和伦巴第，这个国家的延缓已久的破产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
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3月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 军事预算

1854年3月7日星期二于伦敦

昨天上午10时,工人议会⁹⁷的代表在曼彻斯特的人民会堂开会。第一次会议当然只讨论了一些准备工作问题。斯托克波特的代表詹姆斯·威廉斯提议,伦敦代表詹姆斯·布莱附议,厄内斯特·琼斯支持,邀请马克思博士作为名誉代表出席工人议会会议。这项提案被一致通过。对于勃朗先生和纳多先生,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不管工人议会的直接成果如何,这样一个议会的召开本身就标志着工人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也许可以把二月革命后在巴黎卢森堡宫举行的会议看作是朝着同样方向努力的一个先例。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差别是很大的:卢森堡宫委员会⁵⁵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而工人议会是由人民自己发起成立的;成立卢森堡宫委员会的意图,是要把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成员从活动中心排除出去,使他们丝毫不能认真地参与国家的实际事务;最后,组成卢森堡宫委员会的代表完全是各种或多或少相当于中世纪行会和现代工会的所谓 *corps d'états* 即同业公会的会员;而工人议会则是全国范围的各行各业的工

人的真正代表机关。工人议会能不能取得成就,主要甚至完全取决于它是不是遵循这一原则:当前问题不在于所谓劳动的组织⁹⁸,而在于工人阶级的组织。

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工人阶级的奴隶地位,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保护和维持现行的劳动组织。因此,要改变现行的劳动组织,并用新的组织来代替它,人们就需要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不仅用于抵抗而且用于进攻的力量;但是要取得这样的力量,人们自己就需要组成一支拥有足以迎击敌军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军队。如果工人议会把自己的时间统统用在纯粹理论性问题的讨论上,而不是为真正建立全国范围的党开辟道路,那么,它就会像卢森堡宫委员会一样地遭到失败。

根据全国宪章协会⁹⁹章程,重新选举了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已经宣布,厄内斯特·琼斯、詹姆斯·芬伦(伦敦)和约翰·肖(利兹)按照规定被选入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任期六个月。

波拿巴在交易所订立借款契约的意图,由于巴黎资本家的消极抵抗而遭到破坏,所以波拿巴的财政大臣向参议院提出的预算包括如下的一条:

“为了国库以及同法兰西银行进行交易的需要,授权财政大臣发行一种定期偿还的有息国库债券。国库债券的流通总额不得超过25 000万法郎(1 000万英镑),但是,根据1833年6月10日的法令,转为偿债基金的国库债券不包括在上述总额内,国库债券也不能当作保证金交给法兰西银行和其他的贴现机构。”^①

^① 《关于授权财政大臣借款25 000万法郎的法律草案》,见1854年3月7日《总汇通报》第66号。——编者注

在补充条文中规定，“皇帝保留颁布法令增发债券的权利”，但法令需经参议院追认。

巴黎来信告诉我，这个建议使得整个中等阶级非常恐慌，因为，一方面国库债券不得超过 25 000 万法郎，而另一方面，又可以超过上述总额，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颁令增发多少就可以超过多少，而这样发行的债券还不能作为保证金交给法兰西银行和其他贴现机构。你们都知道，银行已经用国库债券垫付了它取自信托局的 6 000 万法郎。

十二月分子千方百计地利用战争的幽灵来排除尚在阻挠他们接近国库的一些最后的微小障碍。已经大大动摇的国家信贷即将瓦解的前景使中等阶级感到困惑，而建议增加盐税以及类似一些最不得人心的税，将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因此，无疑会使波拿巴在外国赢得一定的威望的战争，却很可能加速他在法国的崩溃。

我曾预言目前西班牙的困难很可能导致法英之间的严重误会，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报纸的如下报道得到证实：

“法兰西皇帝通过瓦列夫斯基先生问克拉伦登勋爵，如果伊萨伯拉女王被推翻，不列颠政府是否同意帮助他卡洛斯派王位追求者立为西班牙王。据说，克拉伦登勋爵回答道，幸好伊萨伯拉女王还稳稳地坐在王位上，在如此忠于君主制度的国家里，革命只是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发生；但是，即使西班牙爆发了革命，而且女王被推翻了，不列颠内阁也应该拒绝作出任何保证。

皇帝要立蒙泰莫林伯爵为王的建议，是由他不想让蒙庞西埃公爵夫人继承她姐姐的王位这样一个十分自然的愿望激发出来的；皇帝认为，让路易-菲力浦的儿子作为西班牙女王的丈夫作自己的邻居，是很不方便的。”

约翰·罗素勋爵在星期五的下院会议上宣称，他不得不把他的改革法案暂时收回，但是，如果在这期间向俄国皇帝提出的新建议被接受而使东方问题得到解决，这个法案将在 4 月 27 日提出审议。诚然，在沙皇对他的臣民的宣言以及给波拿巴的信¹⁰⁰公布以后，这种

解决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小了。然而，内阁的声明还是表明，提出改革法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联合内阁的外交能达到恢复俄国的战前状态的情况下，转移并缓和社会舆论。《晨报》（帕麦斯顿勋爵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对帕麦斯顿勋爵在他的内阁阴谋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作了如下的描写：

“阿伯丁勋爵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正的首相。女王的首席大臣实际上是帕麦斯顿勋爵。他是内阁的精神主宰。自从帕麦斯顿复职以来，他的同僚经常担心他又会突然改变他们的方针，他们对于那些据了解是他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自然不敢加以反对。因此，他总是为所欲为。上星期，有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帕麦斯顿阁下在女王陛下的内阁会议中的势力。当时新改革法案正式提交内阁审查，于是存在一个问题：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这个法案还是把它撤销。阿伯丁勋爵、约翰·罗素勋爵、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和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都赞成把这一法案提出来讨论。帕麦斯顿勋爵建议撤销这个法案，并且正像我们在几天以前描写的那样明确地表示，如果他在内阁遭到失败，他将在下院投票支持撤销这个法案。这次讨论或者说座谈的结果，是帕麦斯顿勋爵达到了目的。他的反对者——其中包括执政党在上院的领袖以及该党在下院的领袖——最后都屈服了。帕麦斯顿勋爵在上个星期取得的另一次胜利，就是任命查理·纳皮尔爵士为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官。大家都知道，无论约翰·罗素勋爵或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都反对这项任命，但是帕麦斯顿勋爵主张任命，结果还是任命了。因此，高贵的勋爵将在今天晚上主持在改革俱乐部举行的庆贺英勇的海军上将的宴会，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昨天晚上，格莱斯顿先生向议院提出了这一代人所不知道的新玩艺儿——军事预算。从他的发言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决定这样早把他的财政措施提交议院审查，目的就是预先说出战争对私人钱袋极不利的后果以抑制国内的战争狂热。他的发言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他要求的只是在战争突然结束时把即将离开不列颠海岸的 25 000 人弄回来所需要的那一笔款子。

他首先叙述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的实际收支状况。他强调指出，这一个年度还没有结束，因此一个月的收入只能是一个概算。到1853年4月18日截止的一年的全部收入的概算为52 990 000英镑，而这一年的实际收入达到了54 025 000英镑；可见，实际收入超过预计收入^①1 035 000英镑。另一方面，支出比概算节省了1 012 000英镑。因此，格莱斯顿计算出，如果不发生国家目前所遇到的特殊情况，这一年度的收入大约会超过支出2 854 000英镑。

然后，格莱斯顿谈到他提出的降低税收的措施的执行结果。关税尽管降低了，1853—1854年度的关税收入仍然达到了20 600 000英镑，而1852—1853年度的关税收入只有20 396 000英镑，即增加了204 000英镑。降低茶税带来的损失只有375 000英镑。把3便士至10先令的印花税降低为一种统一的1便士的税，没有造成预计的损失，而是增加了36 000英镑的收入。

接着，格莱斯顿谈到了上次会议通过的增加税收的措施的执行结果。在爱尔兰，所得税的征收由于种种情况被推迟了，但是要比原来估计多收2万英镑。由于扩大所得税的征收范围（由150英镑改为100英镑），在大不列颠要比预定的概算即25万英镑多收10万英镑。在苏格兰每一加仑酒精征收1先令的附加税，这项收入仅仅增加了209 000英镑，而根据概算，这项收入要增加278 000英镑。

另一方面，爱尔兰的酒精税的收入增加了213 000英镑，而他原来估计只增加198 000英镑。在整个财政年度中征收的遗产税不过50万英镑。以上就是格莱斯顿先生关于截至今年4月5日止的这一年度大不列颠财政状况的报告。

^① 原文中此处为“支出”(expenditure)。——编者注

1854—1855 年度收入概算如下：

收 入

关税	20 175 000 英镑
消费税	14 595 000
印花税	7 090 000
普通税	3 015 000
所得税	6 275 000
邮税	1 200 000
王室领地	259 000
过去的结余	420 000
其他收入	320 000

共收入

共收入	53 349 000 英镑
-----------	---------------

另一方面,支出概算如下：

长期国债	27 000 000 英镑
非长期国债	546 000
统一基金	2 460 000
陆军	6 857 000
海军	7 488 000
军械	3 846 000
军需	645 000
其他概算	4 775 000
民军	530 000
辅助人员	792 000
东方勤务	1 250 000

共支出

共支出	56 189 000 英镑
-----------	---------------

赤字

赤字	2 840 000 ①
----------	-------------

① 威·格莱斯顿 1854 年 3 月 6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格莱斯顿先生在谈到弥补赤字的方法以前，先列举了政府不打算建议下院通过的措施。他不愿意恢复他去年提出的并已取得法律效力的降低税收措施中涉及的任何一种税。他不同意不必要地恢复过去的政府已经免除的那些税。但是，如果现已投入的战争再拖延一年，他们未必能够长期地坚持这些降低税收措施。总而言之，他不打算建议提高间接税。他也不愿意发行公债，因为没有国家的财产状况像英国这样负债累累。最后，格莱斯顿先生在谈了以上这些开场白以后，进而谈到政府打算提出的建议。这里指的是在六个月内把所得税提高一倍和完全废除现行的把期票分为国内期票和国外期票的做法。汇票的税率，虽然不是平均分配的，现在平均每100先令是1先令6便士；他建议划一为1先令。根据他的计算，这一改变将增加6万英镑的收入。至于所得税，收入在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每英镑将从7便士增加到 $10\frac{1}{2}$ 便士，收入在100—150英镑的，每英镑将从5便士增加到 $7\frac{1}{2}$ 便士。同时，他建议，由议院通过一项提案，授权他在税款征收以前发行175万英镑的国库期票，这些国库期票用增加的所得税收入来偿还。最后，格莱斯顿先生竭力为他的旨在减少国债的最新措施辩护（没有完全成功），你们都知道，这些措施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了。

许多议员参加了这一报告以后的辩论，但是唯一值得指出的是迪斯累里先生的发言。他说，他丝毫不反对政府为了能够全力地（他希望能胜利地）进行即将来临的战争而认为自己必须负责提交议院表决的建议。但是，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他反对完全依靠直接税来进行这场战争。至于格莱斯顿先生报告中的第二部分，即有关国内目前财政状况和游资的部分，他认为很不明确，它不像财政报告，完全

不像在目前情况下提出来的报告。他认为目前的国库收支状况是有缺点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政府上台的时候,国库结存在 1853 年 1 月 3 日达到 900 万英镑。而过了一年,到 1854 年 1 月,就减少了一半。他估计,国库结存到 4 月 5 日将只有 300 万英镑,而支付国家贷款利息以及执行格莱斯顿的兑换计划的费用总共要 900—1 000 万英镑。极可尊敬的绅士说,用国库结存来支付是无济于事的,他宁愿把不足的数目列入赤字。迪斯累里坚持说,在目前做到完全的收支平衡十分重要,但是,现在发生的问题不在于要做到收支平衡还是要有些剩余,而在于要做到收支平衡还是要有很大的赤字;事实上,完全没有做到收支平衡,而是有了巨大的赤字,这个赤字是财政大臣从两个方面造成的。第一,他在币值提高的时候把国库期票的利息降低到 1.5%;第二,他执行了不妥当的兑换南海公司¹⁰¹ 股票的计划,这个措施不仅把他的结存消耗殆尽,而且给他留下了 200 万英镑的赤字。

在其他的议员提出了不太重要的意见以后,就结束了关于预算报告的审查,并且通过了决议。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7 日

载于 1854 年 3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3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

LONDON, SATURDAY, MARCH 10, 1854.

(Printed Fairly)

卡·马克思

*给工人议会的信¹⁰²

1854年3月9日于伦敦

索霍广场迪恩街28号

非常遗憾,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离开伦敦,因此不可能当面来表达我在接到要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工人议会的邀请时所感到的骄傲和感激的心情。这样一个议会的召开本身就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个伟大的事件的消息将会唤起欧美各地工人阶级的希望。

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统帅整批产业大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逐步地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不再有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

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

正因为这样,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具有足够能力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自己在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自己过去的惨痛斗争和现在的道义力量。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本身成为高尚的事业并使劳动产品增加到能够实现普遍丰富的程度创造了物质手段。

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劳动解放的另一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亲手创造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统统变成镇压他们自己的工具。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要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工人阶级并不缺少力量,而是需要把它的所有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如果工人议会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必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

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

忠实于你们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9 日

载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人民
报》第 98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工人议会¹⁰³

1854年3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统帅整批产业大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不再有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

正因为这样,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具有足够能力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自己在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自己过去的惨痛斗争和现在的道义力量。

伦敦的各种日报对工人议会的活动采取“回避政策”。它们希望以巨大的“缄默阴谋”来扼杀它。整整几个月来,它们发表的许许多多关于召开这种议会的计划是否有可能实现的文章已经使公众腻烦

了,而现在却有意只字不提工人议会已经出世,并且已经开始工作。这种以为只要假装看不见危险就能逃避危险的鸵鸟的才略在这个时代是不中用的。它们以后将被迫谈论工人议会,而且不管他们装作怎样漠不关心,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

下面是制定工人议会行动计划的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

“委员会认为,工人议会的任务是:

- 促使目前举行的罢工和同盟歇业在有利于工人的条件下胜利结束,采取措施使今后可以避免罢工和同盟歇业;
- 争取工人阶级在工作期间得到合理的待遇;
- 帮助妇女和儿童摆脱工厂的压榨;
- 筹集教育基金,禁止克扣工资和暗降工资。

委员会还认为,议会的任务是,尽力争取劳动者合理地分得自己劳动所创造的利润,首先是尽力使他们获得独立地支配自己劳动的手段以便完全摆脱雇佣奴隶制,委员会深信,筹集必要的活动资金是这方面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因此提出以下各项请你们审查:

1. 建立募集全国工人基金的制度;
2. 保管所募集的基金的措施;
3. 基金的使用和工人阶级权利的保障;
4. 群众运动的组织。

一 募集全国工人基金

(1)根据劳动价格的高低,每周从工资中扣除如下数目:

- 每周 4 先令以下—— $\frac{1}{2}$ 便士
- 每周 8 先令以下—— $\frac{3}{4}$ 便士
- 每周 12 先令以下—— 1 便士
- 每周 15 先令以下—— $1\frac{1}{2}$ 便士

每周 20 先令以下—— 2 便士

每周 30 先令以下—— 3 便士

每周 40 先令以下—— 4 便士

(2) 参加群众运动的各工人组织的负责人员将募集的款项送交运动理事会。

二 基金的保管

(1) 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员每星期把他们为群众运动募集的全部款项送交运动理事会,详细办法将在下面说明。被指定接收这笔钱的负责人员应立即把收款收据交给募集人。

(2) 理事会理事应把为群众运动募集的全部款项以理事会理事的集体名义存入银行(留于手头的不得超过 50 英镑);从银行提取全部存款或部分存款,必须交验载有经理事会法定多数理事签字的提取这笔钱款的决议的理事会记录。

(3) 按此手续提取的存款(除非少于 5 英镑)应该是纸币,纸币的号码应该记在可供审查的本子上,并在报上公布;取出的纸币应分成几份,委托理事会理事分别保管;提取大笔款项时,应分成相等的几份由每个理事保管。

(4) 受托保管部分上述钱款的每个理事应当开出一张领得相应一份钱款的字据,从银行提取的钱款事先必须根据理事会理事的人数分成相等的份数;如果他拒绝把他所保管的那部分纸币用于提取这笔款项的目的,便可立即根据他所立的字据对他进行追究,只有在他归还了那部分纸币后,字据才可作废;这种字据应存放在保险柜或保险箱中,保险箱应交给与此无关的可靠的人员(非理事会理事)负责保管,只有当理事会全体理事在场时,保管人员才允许取出字据。

(5) 为了支付或购置而从银行提取的款项,只有在理事会全体理事在场时,理事会才能支付。

三 基金的使用

(1) 募集的基金的用途如下:资助所有正在举行罢工的城市和地方,清偿过去和现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期间所欠的一切债务。对各城市的援助按失业人数的比例等量分配。这里也根据海船上粮食快完时所实行的每人得到相等的一份的原则,不管工资水平的高低,对每个人的救济应当相等。虽然对于现在的罢工工人和因同盟歇业被解雇的工人将一律给以资助,但是在将来将仅仅援助

那些承认和支持群众运动的团体。

(2)必须建立调整劳动价格的部门,为此每月必须公布关于有工人参加群众运动的一切生产部门所用的原料价格和劳动价格,以及产品出售价格和其他生产费用的资料。理事会应根据这些资料公布关于雇主利润的资料,它可以从雇主那里得到有关他们必须支付的任何特别费用和附加费用的资料。劳动价格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并且工资标准应该相应地确定下来。国家的农业部门也应该采取类似的办法。

(3)工人除了具有分享雇主的利润的不可争辩的权利之外,还具有另一种更高的权利,即支配自己劳动的权利。为了这一点,而且为了通过剥夺雇主占有剩余劳动的权力从而更有效地调整工资,群众运动的基金还应该用于购置土地。土地应该以非理事会理事的个人的名义购置,并根据土质,根据个人租用或大合作社企业使用等不同用途分成大小不同的农场。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应该属于群众运动,不得转让。土地应按照公平合理的租金短期出租,在租约中应该有专门的条文规定,不按约缴纳租金者将立即失去租赁权。租约中应有另一条规定,租赁者必须将租金付给下面将要提到的交接书所指定的受托人。出面购置土地的人必须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书规定租赁者不应把租金缴给他们,而应缴给当时群众运动理事会的理事。理事会理事应立写字据,保证在离职时如果不向他们的继任者签具有关所收租金的交接书,每人应向两位不是购置土地的人员缴5 000英镑的罚款;继任人应受同样的字据的约束。

(4)为了更好地保障工人独立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和避免劳动市场上出现过剩劳动,委员会还建议进一步把可利用的基金用于开设作为群众运动财产的合作社工厂、作坊、货栈。在这些企业工作的人员,应得到按照上述劳动价格标准调整的工资,和出售产品的纯利润的一半;另一半利润应列为群众运动的收入。每个合作社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应当由本合作社的工人选举产生,并经过理事会批准。每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对本企业的采购和销售进行调整,每月向理事会提出关于本企业的采购、销售、支付、亏损或赢利的报告。当对于工人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提出有充分理由的申诉时,工人有权撤换管理人员,选举新的管理人员,但是需经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多数通过。每个合作社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把本企业纯利润的一半送交理事会。群众运动为合作社企业购置的财产,应该同地产一样,置于妥善的保管措施之下。”①

① 1854年4月1日《人民报》第100期。——编者注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委员会的报告到第二部分为止已在工人议会星期三的会议上通过。参加制订这个群众运动行动纲领的委员会的有厄内斯特·琼斯、詹姆斯·芬伦、詹姆斯·威廉斯、阿伯拉罕·鲁宾逊和詹姆斯·布莱等先生。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10 日

载于 1854 年 3 月 2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3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¹⁰⁴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了，而且据说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这就是耗尽瓦拉几亚的最后资源的三个月出征中所作的努力和饱尝艰险的光荣结局。这就是看来完全忽视了最基本的战略原则而莫名其妙地向小瓦拉几亚进军的结果。为了夺取土军在多瑙河左岸所控制的唯一的桥头堡卡拉法特，俄军把自己的主力部队集中在极右翼，从而使已经削弱的中央和左翼在遭到敌人任何攻击时完全没有掩护，并且对于交通线和退路表现了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漠不关心。奥美尔帕沙没有利用俄军的这一失策，这只能说是因为我们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从中干预。至于俄军为什么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不得不可耻地撤退，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谈谈。

我们所以说他们不得不可耻地撤退，是因为在进攻开始前曾大吹大擂，结果只占领了一个起威胁作用的阵地，而最后竟偃旗息鼓，乖乖地撤退了，甚至没有试图进行一次认真的战斗；还因为在行动中充满了一连串错误和失策，除了使将领深信自己当了傻瓜以外，毫无所得；这一切是真正最可耻的。

现在我们来谈问题本身。

1853年底俄军在瓦拉几亚、摩尔多瓦、比萨拉比亚有以下的

部队：

(1)第四军(丹年贝尔格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除去伤亡,共约45 000人;

(2)第五军(吕德尔斯军)的一部分: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约15 000人;

(3)第三军(奥斯滕-萨肯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约55 000人。

除了非战斗人员和吕德尔斯军驻在敖德萨近郊的一个师(它必须执行守备勤务,所以不应把它计算在内)以外,共约115 000人。

到12月初,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国部队只有由丹年贝尔格和吕德尔斯指挥的部队。奥斯滕-萨肯军的移近,应该是大规模集中兵力向卡拉法特进攻的信号。奥斯滕-萨肯在布格河和普鲁特河的阵地应由从莫斯科开出、正在途中的第六军(切奥达耶夫军)接替。在同第六军会师以后,多瑙河军团约有17万人,如果西南各省的新兵能够直接派往战区,那么它将会更加增强。

但是俄国的总司令认为,只要115 000—120 000人就足以防守多瑙河沿岸从布勒伊拉到尼科波利斯的整条战线,并且可以分出足够的兵力集中,从极右翼去进攻卡拉法特。

当这个计划在12月底以前开始执行的时候,卡拉法特的守军恐怕不超过10 000—12 000人,在维丁还有8 000人,但是指望他们的支援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必须在不利季节渡过水势湍急的河流。然而由于俄军移动迟缓,哥尔查科夫公爵优柔寡断,更主要的是由于卡拉法特的司令官伊斯迈尔帕沙的机智和勇敢,土军得以向这个受威胁的地点调集4万人,把卡拉法特从一个无力抵抗两倍于守军兵力的敌军的攻击的普通桥头阵地,变成一个能够至少掩蔽3万人并

抵御敌人一切袭击(除了正规围攻以外)的要塞。有句话说得对,野战筑城工事构筑者的最大胜利就是迫使敌人为此而挖掘堑壕。如果俄军实际上没有这样做,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用这些最极端的手段也不可能在规定期限夺下卡拉法特。从此,卡拉法特将可以同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本策尔维茨的营垒、托里什韦德拉什的工事和卡尔大公在维罗纳城外的堑壕¹⁰⁵媲美,作为可以称之为筑城典范的野战筑城工事巨大成就之一,载入战争史册。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俄军进攻所采取的手段。他们运到克拉约瓦的攻城炮的总数可以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想夺取卡拉法特。我们顺便指出,用军事观点无法理解而只能用外交影响来解释的事情之一,就是奥美尔帕沙听任俄军把火炮调来调去而不加阻挠。俄军现在唯一的需要是要有足够的兵力以击退土军,保卫堑壕和炮队,并在缺口被打开时立刻向缺口强攻。这里,伊斯迈尔帕沙又采取了一个有毅力、有才干的统帅所应采取的行动。1月6日他在切塔泰的出击,他使兵力占优势的俄军终于失败的勇猛攻势,他在俄军继续集中兵力和以优势兵力把他完全封锁在小小的多瑙河半岛以前一直反复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总之,他对俄军正面上各个地点进行集中攻击以尽可能地各个歼灭敌人的防御方法,正是像他这样处境的统帅所应当做的,并且同奥美尔帕沙在奥尔泰尼察采取的消极防御,或在多瑙河下游驻守的整个时期内的懈怠不振、毫无作为形成有趣的对照。因为,如果奥美尔帕沙也曾在什么地方采取过小规模进攻,——看来,这些进攻并不是适可而止,只是盲目地、顽固地在同一地点继续好几天,甚至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仍然如此,——那么当需要调4—6万人渡过多瑙河展开行动时,这些小规模的进攻就算不上什么了。

到1月底俄军终于在卡拉法特周围集中完毕。在开阔地他们占了明显的优势,因而那里一定有三四万人。从115 000人中除去这三四万人,另外再除去防守布勒伊拉到海边一线所必需的20 000或25 000人,在整个大瓦拉几亚连守备部队在内还剩下将近50 000—65 000人,这支军队远不足以防守这样一条漫长的战线和与战线平行、在战线后面很近的交通线。甚至以不到65 000人的军队对任何据点进行猛攻,也能够将所有这些分散的俄军各个击破,最后彻底打败,并夺得俄军所有弹药库。奥美尔帕沙迟早会说明他为什么放过了这个机会。

总之,俄军虽然尽了自己一切努力,也不过勉强地在卡拉法特前面集中了足以击退土军前哨、然而不足以进攻要塞本身的兵力。他们几乎用了五个星期的时间才取得了这一暂时的、虚假的战绩。工兵部队的希尔德将军接到了攻占卡拉法特的明确命令。他来了,察看了并决定,在切奥达耶夫没有到达因而不能从中央和左翼调来生力军以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俄军五个星期来一直处于后方和翼侧完全暴露的危险境地,似乎是有意诱敌进攻,实际上他们对于这种进攻连一分钟也抵抗不住。五个星期以来奥美尔帕沙一直在威胁着俄军的翼侧和后方的阵地上不动,尽管他从这个阵地上不用眼镜和望远镜就可以看到俄军的弱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的确,在盟国庇护下进行的这一套现代作战方法是无法理解的!

突然有消息传到伦敦说,“俄军从卡拉法特全部撤退”。《泰晤士报》写道:“啊!这是我们的同盟者奥地利人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俄军的后方特兰西瓦尼亚所起的作用;这是同奥地利结成的光荣的同盟的胜利,也是光荣的阿伯丁政策的胜利。阿伯丁万岁!”但是在第

二天却出现了奥地利的郑重声明,说同奥地利不存在任何同盟,奥地利人至今没有说过,而且看来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支军队派到现在的驻地去。因此,现在大家根本弄不清俄军撤退的原因。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俄军试图在布勒伊拉和加拉茨之间的地区渡到多瑙河对岸,像 1828—1829 年那样直扑阿德里安堡。如果俄军同英法分舰队之间没有充分的谅解,这种进军在战略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听说俄军撤退的另一个原因。据说命令切奥达耶夫停止进军,是为了在敖德萨以北建立一个三四万人的兵营。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他就既不能替换普鲁特河和塞雷特河地区的任何部队,也不能增援卡拉法特城下的哥尔查科夫。因此,哥尔查科夫公爵就只得像他来时那样秩序井然地撤退了。俄军向卡拉法特进军的一出伟大的悲喜剧就这样结束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3 月
13 日

载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人民报》第 98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希腊人暴动¹⁰⁶

引起巴黎和伦敦很大不安的苏丹的希腊臣民的暴动，现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人们认为，再度暴动的可能性还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在仔细地研究了有关整个事件的文件以后，我们确信：暴动者全部都是品都斯山脉南坡的山地居民；除了黑山强盗中的虔诚教徒外，他们得不到土耳其其他民族的基督徒的同情；帖撒利亚平原的居民是还处在土耳其统治下唯一密集的希腊移民，他们怕自己的同胞比怕土耳其人更厉害。不应当忘记，这部分居民胆小怕事，甚至在希腊独立战争⁶¹时期也不敢起事。其余的大约 30 万希腊人，散居在土耳其帝国的各个城市，他们深受其他民族的基督徒的痛恨，以致凡是人民运动胜利的地方，如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所有希腊籍神父最终都被赶走而代之以本地牧师。

虽然这次希腊人暴动本身一般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从它使西方强国有了干涉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大多数欧洲臣民（其中希腊人只占 100 万，而信仰正教的其他民族却有 1 000 万人）之间关系的借口这一点来说，它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所谓的希腊王国的居民以及居住在伊奥尼亚群岛受不列颠统治的希腊人，自然认为自己的民族使命就是要在一切操希腊语的地方把土耳其人赶走，把帖撒利亚和伊庇鲁斯并入希腊人自己的国家。他们甚至还可能幻想恢复拜占庭，

虽然整个说来这是一个很机敏的民族,他们是不会相信这种幻想的。但是希腊人关于扩大民族国家和关于独立的这些计划,在当时是由俄国的阴谋活动挑起的(不久前揭露的阿塔纳西乌斯神父的阴谋⁸¹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得到山地强盗的支持,但没有得到平原农民的响应,——这一切同土耳其臣民的宗教权利问题没有任何关系,而人们却企图把这个问题扯进去。

我们从英国报纸以及舍夫茨别利勋爵在上院作的和蒙克顿·米尔恩斯先生在下院作的报告中得悉,不列颠政府由于(至少部分地由于)希腊居民的这些运动将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改善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处境。报告中清楚地指出,西方强国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就是使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或者意味着赋予穆斯林和基督徒以政治权和公民权,而不分教别,根本不考虑宗教问题。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国家同教会、宗教同政治的完全分离。但是土耳其国家同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是以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紧密结合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两位一体为基础的。对于土耳其帝国及其当权者来说,古兰经同是信仰和法律的源泉。但是在古兰经面前,怎么能使虔诚教徒和异教徒、穆斯林和莱雅^①平等呢?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新的民法典来代替古兰经,换句话说,就是破坏土耳其社会的结构,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

另一方面,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也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两位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

① 土耳其用语,从19世纪初起通常指受压迫的非伊斯兰教居民。——编者注

会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不记述一方的历史,就不能记述另一方的历史。在俄国也是两位一体占主导地位,尽管与拜占庭帝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教会变成了国家的纯粹的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在奥斯曼帝国,按照土耳其人的东方概念,拜占庭的神权政治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教区的牧师同时是法官、市长、教师、遗嘱执行人、税吏和世俗生活中到处都出现的总管,他不是仆人,而是各项工作的主管。这里可以对土耳其人提出的主要责难,并不是他们削弱了基督教教士的特权,相反地是在他们统治之下,教会的这种无所不包的暴虐的监护、控制和干涉竟然可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法耳梅赖耶尔先生在他的《东方来信》中非常有趣地描述了一位正教神父在听到他说天主教神父没有任何世俗权力、不承担世俗职责后如何惊讶的情况。这位正教神父惊呼:“那么我们天主教弟兄们怎么去消磨时间呢?”

因此很清楚:在土耳其实施新的民法典,即同宗教完全没有关系的并以国家和教会完全分离为基础的民法典,不仅意味着废除伊斯兰教,而且意味着毁掉在土耳其帝国存在的那种形式的正教会。难道会有人那么轻信,真的以为,不列颠现政府中那些反动的懦夫们会想到要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里担负起包括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这样巨大的任务吗?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他们只可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蒙蔽英国人民和欧洲人民。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1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3 月 2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3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¹⁰⁷

1854年3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目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大臣们被迫公布了他们上台后最初三个月中同俄皇来往的秘密信件¹⁰⁸以及关于1844年沙皇同阿伯丁勋爵会见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阿伯丁勋爵为了向《圣彼得堡报》应战而公布的。¹⁰⁹

现在我就从分析涅谢尔罗德伯爵送交女王陛下政府的、根据俄皇1844年6月访英之后发出的通报写成的《备忘录》开始。备忘录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最符合于保持和平的共同利益”。英国和俄国对于这个原则意见一致,因此共同努力来维持这种现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打扰土耳其政府,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外交上的争论去惊动它,非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究竟怎样才能有成效地执行这种“宽容制度”呢?第一,大不列颠不应当妨碍俄国可能准备对俄土条约作出的解释,相反地应当促使土耳其按照俄国对条约所作的解释行事;第二,应当容许俄国“经常地”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总之,对土耳其政府的宽容制度就等于与俄国同谋的制度。但是这个奇怪的建议表

达得很不坦率。

备忘录表面上说的是“一切大国”，但是同时分明在暗示，除了俄国和英国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大国。备忘录说，法国将“不得不按照圣彼得堡和伦敦之间取得协议的那种方式行事”。奥地利被描绘成地地道道的俄国附属物，既不是独立存在，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有的只是“按照完全一致的原则”同俄国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的政策。普鲁士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国，因而甚至没有被提到。因此，所谓一切大国无非是对圣彼得堡内阁和伦敦内阁的一种修辞性的说法；而应当由一切大国取得一致的行动路线也就是圣彼得堡制订的并且伦敦必须遵循的行动路线。备忘录说：

“土耳其政府总想摆脱它同其他大国缔结的条约使它承担的义务。它希望不受任何惩罚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指望各国内阁互相猜疑。它认为，如果它不履行它对某一内阁的义务，其他内阁会支持它，并且会使它摆脱任何责任。

重要的就是不让土耳其政府耽于这种幻想。每当它不履行自己对某大国的义务时，其他一切大国应当注意促使它认识自己的错误，严肃地规劝它正确对待向它提出正当补偿要求的内阁。

一旦土耳其政府察觉其他内阁都不支持它，它也就会屈服，这时所产生的争论将通过调停的方式得到解决而不会引起任何冲突。”^①

俄国正是按照这个公式要求英国支持它迫使土耳其根据旧条约作出新让步的政策。

“根据目前欧洲人们的思想情绪，各国内阁对于土耳其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宗教迫害不能漠然置之。应当经常使奥斯曼的大臣们认识到这个真理，并使他们确信，只有在他们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采取宽容与温

① 此处及以下引文均引自《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1854年伦敦版第5、6卷。——编者注

和态度的条件下，他们才能指望得到各大国的友谊和支持。

遵循这些原则，外国代表们的职责就是本着彼此完全一致的精神行事，如果他们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议，他们的抗议必须表现出真正的一致性，尽管不采取绝对命令的形式。”

俄国就是以这样温和的方式教训英国怎样支持它对土耳其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的要求。

俄国在如此规定了自己的“宽容政策”的前提之后，就不能向自己的亲密朋友隐讳：正是这种宽容要比任何侵略政策更加致命，它会非常可怕地促使奥斯曼帝国现有的各种“分解成分”增加起来，以致有朝一日“难以预料的情况会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那时各友好内阁将无力阻止这种崩溃”。接着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旦这种难以预料的情况使土耳其遭到不可挽回的灾难，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备忘录指出，一旦土耳其的崩溃即将来临，唯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英国和俄国“在采取行动之前事先取得谅解”。备忘录肯定地说，“对于这一点，在皇帝最近访问伦敦期间（在这位专制君主同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伯爵长时间的会谈中）已经原则上取得一致了。结果，俄英两国承担了约定的义务：如果土耳其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事件，双方应事先就必须共同遵守的方针达成协议”。

这个约定的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俄英两国应当就瓜分土耳其问题事先取得相互谅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即所谓俄国的第二个我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使法国“不得不”，也就是被迫按照它们的意图行事。这种相互谅解的必然结果就是把英国卷入对法的殊死战争，从而使俄国放手执行它自己对土耳其的政策。

备忘录一次又一次地着重强调那些会加速土耳其崩溃的“难以

预料的情况”。但是在末尾,这些隐晦的词句不见了,而代之以比较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预见到奥斯曼帝国必定会瓦解的话,英国同俄国就应该事先达成协议等等……”这样一来,唯一难以预料的情况就是俄国关于奥斯曼帝国必定会瓦解这种难以预料的声明。约定的义务所取得的主要之点就是俄国有权在一定的时刻预见土耳其的突然崩溃,并迫使英国进行谈判,对这种灾难即将到来达成相互谅解。

因此,在备忘录写好大约十年以后,英国得到了预期的通知说,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已经枯竭,现在它们必须着手履行原已商定的关于排除法国的协议,即背着土耳其和法国来策划阴谋。由于这个建议,就出现了圣彼得堡和联合内阁之间来往的一系列机密文件。

1853年1月11日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汉·西摩尔爵士向当时的外交大臣约·罗素勋爵送去了第一份紧急机密报告。1月9日晚间,他“荣幸地”在叶列娜大公妃(她屈尊邀请西摩尔爵士和夫人同皇室会见)的宫中见到了俄皇。俄皇和蔼可亲地走到他跟前,表示对联合内阁成立的消息甚感欣慰,并祝联合内阁长期执政;他请大使向年迈的阿伯丁转达他的祝贺,并尽力向约翰·罗素勋爵说明:

“现在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我,我和英国政府——要保持最好的关系,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像目前这么必要。”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在1853年1月讲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也就是备忘录所说的,“在土耳其问题上同俄国原则上完全一致”的奥地利,在黑山问题上公开地兴风作浪了。

沙皇说:“只要我们达成协议,别人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他以假慈悲的口吻继续说道:“现在土耳其的局势非常危急,可能会给我们大家招来很多

麻烦。”

沙皇讲了这些话之后，和蔼可亲地同汉·西摩尔爵士握手，仿佛要向他告别；但是汉密尔顿爵士“立即想到话还没有讲完”，于是“十分冒昧地”谦恭地请求这位专制君主“对土耳其问题谈得更明确一些”。

汉密尔顿爵士指出：“皇帝的谈话和态度尽管依然非常亲切，但是表明皇帝陛下不打算同我谈论他即将在南方举行的示威。”

必须指出，汉密尔顿爵士在1853年1月7日的紧急报告里就已经告诉不列颠政府：

“第五军已经奉命向多瑙河各省的边境推进，而第四军将奉命整装待发。”

他在1853年1月8日的紧急报告中也说过涅谢尔罗德曾经把自己对于“必须用武力示威来支持俄国外交”的意见告诉他。汉密尔顿爵士在紧急报告中继续说：

“皇帝在讲话开始时还有些拘谨，但是后来便直言不讳无拘无束地谈论起来，他说：‘现在土耳其的情况混乱得很；看来国家本身将要崩溃(menace ruine)；它的崩溃将是巨大的不幸，而现在十分重要的是，英国和俄国应就这个问题取得充分的谅解，两国中的任何一方，没有通知对方都不得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皇帝提高了声音说：‘瞧，在我们手中的是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我坦白地告诉您，如果在最近的某一天这个病人死去，特别是在作好一切必要的安排之前死去，这将是巨大的不幸。但是现在还不是同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这只熊的眼里，病人已经奄奄一息，应当吃掉他了。汉密尔顿爵士对于俄国医生的这种“难以预料的”诊断有些吃惊，他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仁慈的陛下，请允许我再讲一点。陛下说，这是一个病人，完全正确；但是请陛下恕我冒昧地说，强壮的仁者应当怜悯虚弱的病人。”

不列颠大使感到自慰，因为他觉得他同意沙皇对于土耳其和病症的看法，以及他关于应对病人采取宽大态度的要求，“至少没有触怒皇帝”。汉·西摩尔爵士关于他第一次同沙皇秘密谈话的报告就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这次面对面的谈话中他表现出是一个非常好的廷臣，但是他还是有足够的理智来用下面的话提醒自己的内阁，他说：

“提出这样一类的任何一个建议的目的，只是要使对方左右为难。这种左右为难似乎就在于：如果女王陛下政府不同俄国就土耳其突然崩溃时应当采取的措施问题取得谅解，那么一旦后果对英国不利，它就没有理由埋怨别人。反之，如果女王陛下政府参加讨论这些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么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容许灾难发生的因素，而它最关心的却是尽量延缓这种灾难的发生。”

汉密尔顿爵士用以下警句似的箴言来结束自己的紧急报告：

“概括起来大致如下：英国不得不期望同俄国达成密切的协议以阻止土耳其的崩溃——而俄国更愿意这种协议能造成足以引起土耳其崩溃的事件。”

乔·汉·西摩尔爵士在1853年1月22日给约·罗素勋爵的紧急报告中说，1月14日他再次同沙皇进行了秘密会谈，这次是“他单独晋见”沙皇。这位专制君主屈尊给英国大使上了一堂关于东方问题的课。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理想和计划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并不沉迷于此。相反地，他认为，对俄国来讲也许只存在一个危险，这就是进一步扩大它本来已经过于辽阔的领土。（读者该记得，我在摘引波措-迪-博尔哥伯爵的紧急报告时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土耳其的现状最符合俄国的利益。一方面，土耳其人已经丧失了军事上

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还有足够力量，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有足够力量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保证自己得到别国的尊重”。但是在这个帝国内恰好住有几百万基督徒，他必须关心他们，尽管这个任务可能是困难的，“棘手的”。他的权利、他的义务和他的信仰都同时要求他这样做。后来沙皇突然转到他关于这个病人、这个病得很重的人的比喻上来，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病人“在他们手中突然死去”（从他们身旁消失）。“如果在下一步的某种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

沙皇在对奥斯曼帝国即将到来的死亡作了这种新的暗示之后，紧接着要求英国根据“约定的义务”同俄国一道来考虑遗产问题。“但是他不暴露自己下一步的计划”，而宁愿以议会的用语来指出瓜分时应当注意的主要之点。

“我想把您当作朋友和君子来跟您谈谈。如果英国和我在这个问题上达成谅解，那么其他问题对于我是无关紧要的。别人怎么做，怎么想，对我都无所谓。因此我要开诚布公地跟您讲清楚，如果英国打算最近在君士坦丁堡确立自己的地位，我是不允许的。我并不是说你们一定有这种打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讲清楚为好；至于我，我也愿意保证不在那里确立自己的地位，就是说，作为占有者，因为作为占领者，我是不拒绝的；如果不事先采取措施，如果一切凭偶然，那么情势可能迫使我占领君士坦丁堡。”

这样，英国将被禁止在君士坦丁堡确立自己的地位。而沙皇却将那样做，即使不是作为占有者，至少也是作为暂时的占领者。不列颠大使感谢皇帝陛下这种直率的声明。然后尼古拉援引了他以前同威灵顿公爵的谈话——1844年的备忘录就是这次谈话的记述，也可以说是摘要。谈到沙皇对圣地的要求这个迫切问题时，不列颠大使表示了这样的担心：

“一旦出现俄国军队，就会有两种后果：一种是法国可能进行反示威；另一种更为严重，就是基督教居民举行起义，反对本来就因叛乱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大大削弱了的苏丹政权。皇帝向我保证，到目前为止他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n'ont pas bougé），而且他希望他的军队不需要前进一步。关于法国远征苏丹领土，皇帝陛下暗示，这种步骤会立即引起危机；荣誉感会迫使他毫不犹豫地立即派自己的军队进入土耳其；如果这样的行动会导致推翻土耳其苏丹（le Grand Turc），他只能对此表示遗憾，但是他认为这是迫于不得已而做的。”

这样，沙皇现在就为英国出了一道必须解答的课题，即制订一个取代奥斯曼帝国的“下一步计划”，并“就建立一个旨在取代现行制度的新制度的各种问题事先达成协议”。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如果这个题目答对了，还能够得到奖赏，最后，以父亲般的口吻告诫说：

“如果由于两个最关心土耳其命运的主要政府采取预防措施，欧洲伊斯兰教统治的消失所形成的空白能够得到填补而不用破坏普遍的和平，那么 19 世纪的文明将获得伟大胜利。”

在沙皇向英国提出这种要求之后，约·罗素勋爵出场了，他在 1853 年 2 月 9 日的紧急秘密函件中作出了答复。如果约翰勋爵充分了解沙皇的阴险计划——利用英国同他秘密谈判将来瓜分盟国一事而把英国置于一种令人怀疑的处境——他就会也像沙皇那样行事，只限于口头上答复布伦诺夫男爵，而不是向圣彼得堡发去正式的政府文件。在秘密文件提交议院以前，《泰晤士报》曾把约翰勋爵的紧急函件说成是对沙皇的提议的最强有力的、“愤怒的驳复”。可是《泰晤士报》在昨天收回了对约翰勋爵的颂扬，声明“那个文件不应受到以前因为消息不确切所给予它的赞扬”。约翰勋爵使《泰晤士报》感到恼火的是他在星期五下院会议上的声明，他说他没有向这家报纸提供消息的习惯，关于那篇提及他给乔·汉·西摩尔爵士的复信的文章，他只是在文章发表三天以后才读到。

凡是了解 1814 年以来所有英国大臣们(甚至包括坎宁在内)同俄国联系时的那种恭顺谦卑的语气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约翰勋爵的这份紧急函件可以算是这个矮子的英雄行为。

因为这个文件是对历史的卓越贡献,它能够说明谈判的进程,读者想必会乐意看到它的全文。

约翰·罗素勋爵致乔·汉·西摩尔爵士

(机 密)

1853 年 2 月 9 日于外交部

阁下!

您 1 月 22 日的紧急秘密函件已经收到并呈交女王。像以往一样,这次女王陛下也满意地注意到皇帝陛下的温和、坦率和友好愿望。女王陛下命我以同样温和、坦诚和友好协商的态度给以答复。皇帝陛下所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假设土耳其帝国可能崩溃,甚至即将崩溃,问题就在于:如果在下一步的某个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与其如此,那么预先作好应付事件的准备是不是更好一些。皇帝陛下说,这就是我希望您提请贵国政府注意的一点。女王陛下政府在研究这个重要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危机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一广泛的欧洲问题。关于圣地问题¹¹⁰确实发生了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同土耳其内部管理问题没有关系,关系更多的是俄国和法国而不是土耳其政府。土耳其人进攻黑山造成了奥地利和土耳其政府关系的某些不和;但这里涉及的也只是对奥地利边界的威胁,而不是对苏丹权力和安全的威胁;因此,没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的安宁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女王陛下政府还想指出,不能肯定地说,预期中的事件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当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签订条约来确定西班牙查理二世死后的继承制度时,他们是在为一件为时不远的事件作准备。西班牙君主的痼疾和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必然完结都使预期的事件无疑地很快就会到来。西班牙国王的死亡决没有因瓜分西班牙的条约而提前。关于上个世纪签订的预先决定托斯卡纳在美第奇家族的最后君主死后的命运的协议,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可能性却完全是

另外一种情况。这种瓦解也许会在二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分配苏丹所统治的领土，与同样鼓舞着俄国皇帝和大不列颠女王的那种对苏丹的友好情感未必相称。除了上述考虑以外，还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必然会加速它准备应付的事件的发生。如果不让奥地利和法国知道这个协议，那是不公正的，而且这种隐瞒行为也是同防止欧洲战争这一目标不相容的。事实上，皇帝陛下也不可能有这种隐瞒的打算。应当认为，只要大不列颠和俄国就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达成协议，并且决心执行这一方针，它们就会把自己的打算通知欧洲各大国。这样签订出来并且这样通知欧洲各大国的协议是不能长久保持秘密的；而关于这种协议的消息一传出来，除了使苏丹感到惊恐和疏远我们而外，同时还将煽动他的所有敌人加紧采取暴力行动，进行更顽强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确信，他们一定会获得最后胜利；而苏丹的将领和军队则会感到，任何暂时的胜利都不能够挽救他们的事业而不致最后垮台。这样，现在人们担心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将会出现并且日趋严重，而病人的朋友们的预见将成为病人死亡的原因。对于执行任何类似的协议所带来的危险，女王陛下政府恐怕用不着再作更多的叙述。王位继承权战争的例子充分证明，这种协议在强烈诱惑力驱使人们破坏它们的时候是不会受到多大尊重的。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保护者而不是作为占有者的这种地位将会遇到数不清的危险，既有来自他本国长期孕育的野心的危险，也有来自欧洲国家的猜忌的危险。最终的占有者不管是谁，恐怕都不会满意穆罕默德二世后裔们那种无所事事和萎靡不振的态度的。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由于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门，对于欧洲事务自然具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用来为俄国谋利益，也可以用来控制和限制它的实力。皇帝陛下正确而英明地说过：我的国家幅员广大，各方面都很美满，因此对我来讲，如果希望再扩大现有的领土和实力，那就是不明智的。他接着说：相反，对我们说来巨大的危险，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进一步扩大本来就已经很大的帝国版图。但是，一个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国家代替土耳其政府，则可能会使俄国皇帝或者他的继承人必须进行战争。为了防止欧洲冲突而采取的手段可能正是引起欧洲冲突的手段，因为无论英国、法国，可能还有奥地利，都不会愿意君士坦丁堡永远留在俄国手里。至于大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现在就声明，它没有任何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愿望。皇帝陛下对于这一点可以完全放心。政府还愿意提出这样的保证：如果事先没有同俄国皇帝磋商，决不签订任何为应付土耳其一旦崩溃而准备的协议。总之，女王陛下政府相信，皇帝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

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这个政策使他比起那些从完全不正当的侵略和瞬息的荣誉中寻求不朽业绩的最显赫的君主更加扬名于世。要使这个政策取得成功,最好是对土耳其表现出最大的宽容;使欧洲各大国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成为友好谈判的内容,而不是成为强制的要求;尽量避免举行威胁苏丹的陆海军示威;对于涉及土耳其和属于土耳其政府职权范围的问题的意见分歧,要根据大国相互的协议来解决,而不要强加于弱小的土耳其政府。除了预先提醒这些问题以外,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要按照欧洲各文明民族所普遍采用的公平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土耳其政府越是实施一视同仁的法律和公平的行政管理,俄国皇帝就越会认为没有必要实行他认为非常麻烦和不便的那种特殊保护,虽然毫无疑问,这种保护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您可以把这份紧急函件念给涅谢尔罗德伯爵听,如果认为适当的话,甚至可以把一份副本交给皇帝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您在呈交副本时,应该同时转达女王陛下所保证的友谊和信任,这是皇帝陛下的行动理应赢得的。

您的忠诚的

约·罗素

我不得不把这篇分析性文章的结论放在下一篇通讯中^①。但是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对以前的通讯作一点补充,向你们提供一些广大公众无法弄到的关于普鲁士的立场和计划的最新消息。

当俄国与英法同盟之间的冲突达到某种顶点时,尼古拉皇帝给自己在柏林的内兄^②发出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虽然英国和法国能够在海上使他遭受某些损失,但是他在陆上一点也不怕它们,因为到4月底他就能够调动60万大军投入战斗。其中20万他准备交给弗里德里希-威廉支配,如果后者答应进军巴黎并推翻路易-拿破仑的话。愚蠢的国王对这个计划是如此热中,以致曼托伊费尔为了劝

^① 见本卷第161—178页。——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止他作出这个保证竟花了三天的时间,关于那位国王就说这么多。

至于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这位普鲁士中等阶级引以自豪的“伟人”其人,我们只要看看他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先生所发的秘密指令,就对他的全貌了如指掌了,他的这些指令是在接到上述俄国来信的那个时候发出的,并且通过完全不同于本生先生获取我的私人信件的方式¹¹¹落到了我的手里。这些指令的傲慢的模棱两可的笔调暴露了这个学究兼军士的真面目,指令的内容大致如下:

“要好好地看一看刮的是什么风。如果您看到英国同法国结成紧密同盟并下定决心进行战争,那您就要坚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如果您看到英国在政策上摇摆不定,无意进行战争,那您为了国王即我的和您的君主的荣誉和尊严,就要勇敢地进行争辩。”^①

瞧,俄国专制君主把普鲁士看作一个区区小国难道不正确吗?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21 日

载于 1854 年 4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4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引自斐·拉萨尔 1854 年 3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卡·马克思

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¹¹²

1854年3月24日星期五于伦敦

尽管总的说来,约翰·罗素勋爵的紧急函件^①可以看作是对沙皇的建议——就可能发生的瓜分土耳其问题事先取得协议——的婉言谢绝,其中却包含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地方,我想请读者加以注意。约翰勋爵写道:

“没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的安宁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

但是,在汉·西摩尔爵士的秘密报告中,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沙皇曾建议向苏丹宣布类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只能认为,或者是罗素勋爵鼓励别人反对这个步骤,其用意是自己暗示要采取这个步骤,或者是汉密尔顿爵士的某些秘密报告被压下了,没有收集到提交议院的文件中去。尤其令人怀疑的是,仅仅16天以后,即1853年2月25日;克拉伦登勋爵在就任外交大臣时给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

① 见本卷第157—159页。——编者注

利夫勋爵发出了如下指令：

“阁下，请用谨慎而又不触犯苏丹尊严的态度开诚布公地向苏丹说明，是哪些原因使女王陛下政府担心奥斯曼帝国目前正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外国的抱怨有增无已，而土耳其政府不可能或者不愿意予以消除，土耳其的内政非常糟糕，执行机关日益软弱无能，这一切使得它的盟国近来改用了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语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可能引起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的普遍暴动并成为对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致命威胁，这将是女王陛下政府深感遗憾的一场灾难，但女王陛下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一点通知土耳其政府，某些欧洲大国也认为这种灾难是可能的并且已经临近。”（见蓝皮书《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第1卷第81、82页）

然而，难道这不是英国方面明确地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的安宁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吗？沙皇曾经非常不客气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说，他不允许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确立自己的地位，但他自己打算在那里确立自己的地位，即使不是作为占有者，至少也是作为保护者。约翰勋爵对这个横蛮无礼的声明如何回答呢？他以大不列颠的名义否认有“任何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愿望”。他却不要沙皇提供这种保证。他说：

“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保护者而不是作为占有者的这种地位将会遇到数不清的危险，既有来自他本国长期孕育的野心的危险，也有来自欧洲国家的猜忌的危险。”

是欧洲国家的猜忌，而不是英国的反对！至于英国，它不允许——不，约翰·罗素勋爵不敢用俄国对英国说话时所用的口吻对俄国说话，——它“不会愿意君士坦丁堡永远留在俄国手里”。它倒是愿意让君士坦丁堡暂时留在俄国手里。换句话说，英国完全同意沙皇本人所提出的建议。它不允许那些沙皇本人拒绝去做的事情，但是准备容忍沙皇打算去做的事情。

约翰·罗素勋爵不“愿意”把沙皇作为可能的保护者安置在君士坦丁堡，却用英国政府的名义声明，“如果事先没有同俄国磋商，决不签订任何为应付土耳其一旦崩溃而准备的协议”。这就是说，尽管沙皇向汉·西摩尔爵士说过，他已经同奥地利签订协议，而事先并没有同英国磋商，但是英国却保证在同法国签订协议以前一定同俄国磋商。约翰勋爵说道：

“总之，皇帝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

哥萨克陛下^①始终不渝地奉行的正是他即位时就已宣告的政策，也就是自由主义者约翰勋爵现在宣布为多么无私，对欧洲多么有益的政策。

在目前东方的纠纷中，明显而主要的争论之点就是，俄国要求对奥斯曼帝国内信仰正教的基督徒有宗教保护权。沙皇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说，“根据条约他有权照顾那几百万基督徒”，他“温和而谨慎地行使这种权利”，这使他“有时承担很不方便的义务”。约翰·罗素勋爵是否向他暗示过：这种条约并不存在，而且沙皇并没有这种权利，他无权干涉土耳其正教臣民的事务，就像英国无权干涉俄国新教臣民的事务或者法国无权干涉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人的事务一样呢？我们让罗素本人来说明吧：

“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要按照……公平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土耳其政府越是实施一视同仁的法律和公平的行政管理，俄国皇帝就越会认为没有必要实行他认为非常麻烦和不便的那种特殊保护，虽然毫无疑问，这种保护是义不容辞的，是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条约规定的。”

俄国对土耳其臣民的特殊保护权是条约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约翰勋爵说。而约翰勋爵是诚实人；约翰勋爵是用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说的，而且约翰勋爵是向专制君主本人说的。那么，英国同俄国还有什么争执呢？为什么要把所得税增加一倍呢？为什么要用备战来惊动全世界呢？约翰勋爵干什么在几个星期以前在议会中以珈桑德拉的态度和语调发表演说，大喊大叫装腔作势地痛骂沙皇背信弃义呢？难道他没有向皇帝说，皇帝要求专有的保护权“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吗？

联合内阁应当埋怨的当然不是沙皇的欺诈或者不坦率，恰恰相反，是他的无耻的坦诚，他竟然敢于对他们倾诉衷肠，使他们成为执行自己最隐秘的计划的工具，从而把唐宁街的内阁变成涅瓦大街皇帝陛下的私人内阁。有一个人信任你而对你说，他打算杀死你的朋友，并建议你同他事先商定分赃问题。如果这个人就是俄国皇帝，而你是英国大臣，那么你就不是把他拉到被告席上去，而是奴颜婢膝地感激他对你的高度信任，并像约翰·罗素勋爵那样，高兴地“注意到他的温和，坦率和友好愿望”。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圣彼得堡吧。

2月20日晚上，即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不过八天，在皇太子夫人——大公妃举行的招待晚会上专制君主走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身边，于是两位“君子”进行了以下的谈话：

沙皇：“怎么，您已经接到复信，明天应当把它交给我。”

汉密尔顿爵士：“我将荣幸地这样做，不过陛下知道，复信的内容和我曾经提请陛下注意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沙皇：“我听到这一点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贵国政府不正确地理解了我的

意图。我主要的不是想知道当病人快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而是想同英国商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做什么。”

汉密尔顿爵士：“但是，皇上，请允许我指出，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病人快要死了；国家不会死得这样仓促。如果不发生难以预料的危机，土耳其还会存在很长一个时期。皇上，正是为了预防一切可能引起这种危机的情况，女王陛下政府指望得到您慷慨的协助。”

沙皇：“我想告诉您，如果贵国政府竟然相信，土耳其还有什么生机，那么贵国政府必定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我向您再说一遍，病人快要死了。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情况把我们弄得措手不及。我们应当达成某种谅解。请注意，我并不要求签订条约或议定书。我所要求的只是一种大体上的谅解；君子之间只要这一点就够了。现在不多谈了。请明天来找我。”^①

汉密尔顿爵士“衷心地感谢皇帝陛下”，但是，当他刚刚离开皇宫客厅回到家里，便满腹狐疑。于是他坐近写字台，给约翰勋爵写这次谈话的报告。末了，他在信边写上以下值得注意的意见：

“情况大概只能是这样：皇帝如此坚持地谈到邻国即将崩溃，他心中必定早已认定，如果不是瓦解的时刻，至少也是引起瓦解的时刻已经临近了……但是，如果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没有取得某种大体上的然而无论如何是密切的相互谅解，他恐怕不敢这样武断。

如果我的怀疑有根据，那么皇帝的目的就是促使女王陛下政府同他的内阁和维也纳内阁共同制定一个彻底瓜分土耳其的计划，而不让法国插手。”^①

这个紧急函件于3月6日送到伦敦，那时克拉伦登勋爵已接替罗素勋爵担任外交大臣。大使的惊惶预告对这位胆小怕事的土耳其的情人的心灵产生的影响十分令人惊讶。克拉伦登完全知道沙皇不要法国参加而瓜分土耳其的背信弃义的计划，他却向法国驻伦敦大

^① 此处及以下引文均引自《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1854年伦敦版第5卷。——编者注

使瓦列夫斯基伯爵说，同法国相反，“他们倾向于信任俄国皇帝”，“不信任的政策既不明智，又不稳妥”，“尽管他希望英法两国政府始终共同行动。因为它们的政策和它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仍然应当坦率地说，法国政府最近以来的所作所为不是能指望获得这种所希望的结果的最好方法”。（见蓝皮书第1卷第93和98页）

还应当顺便指出，恰恰在沙皇开导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时候，伦敦的《泰晤士报》天天重复说，土耳其已陷入绝境，奥斯曼帝国正在土崩瓦解，它留下的不过是“土耳其人缠着头巾的脑袋”的幻影而已。

在皇帝在招待晚会上接见后的第二天早晨，乔·汉·西摩尔爵士应邀去谒见沙皇。他们之间进行了“1小时零12分的对话”。关于这次对话他在1853年2月22日的紧急函件中又向约翰·罗素勋爵作了汇报。

俄国皇帝一开始就要汉密尔顿爵士向他朗读约翰勋爵2月9日的紧急秘密函件。他说，这份紧急秘密函件中的声明当然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只能希望，声明再详尽一点”。他重复说，土耳其的灾难时时迫在眉睫，

“在任何时刻这个灾难都可能发生，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对外战争，或者是老土耳其党同‘主张按照法国方式进行新的表面改革’的党派之间的内讧，或者是大家知道的基督徒迫不及待地要抛掉穆斯林的枷锁而发起的暴动”。

他不放过机会来讲他那套已经讲滥了的大话，说什么“要不是他在1829年阻止了吉比奇将军的胜利进军，苏丹政权早就完蛋了”。然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派到土耳其去的20万人只有5万人生还；如果不是土耳其帕沙同外国大使们一起叛变，吉比奇的残部早已在

阿德里安堡平原被歼灭了。

他强调指出,他根本不要求有一个由英国和俄国完全同意的对苏丹管辖的领土预先作出处置的计划,尤其是两个内阁之间达成的正式协定,他只是要求某种大体上的谅解或者是交换一下意见,各方都秘密地讲明它不希望做的是哪些事情,

“哪些可能同英国的利益发生矛盾,哪些可能同俄国的利益发生矛盾,以便遇到这种情况时,它们都不采取损害对方利益的行动”。

通过这种消极的谅解沙皇会取得他所追求的一切。首先,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被俄国和英国确认为既成事实——尽管是以消极的和有条件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问题就全看沙皇怎样捏造事实,以便能够煞有介事地向英国宣布,预计的情况已经出现。其次,英国和俄国的秘密行动计划,无论怎样模糊和消极,都是在背着法国和不要法国参加的情况下拟定的,因而必然会使英法不和。第三,由于英国受到关于它将不做什么的这种消极保证的约束,沙皇就能大胆放心地制定他自己的积极行动计划。此外,很明显,双方商定在一定情况下它们将不允许对方做什么,其实就是以隐蔽的形式确认它们将允许对方做什么。这种消极的谅解只为这两方之中更狡猾的一方提供更多的方便。

感到困惑的汉密尔顿爵士嘟囔说:“陛下,您可否惠告我这种消极政策的本意。”起初沙皇忸怩作态不肯讲,但是后来假装屈服于温和的压力,发表了以下极为重要的见解:

“我不容许俄国人永久占领君士坦丁堡;我这样讲以后就要指出,君士坦丁堡永远不得落入英国人、法国人或者任何其他大国之手。而且我决不允许人们试图恢复拜占庭帝国,或者扩大希腊的版图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更不允许把土耳其分割成许多小共和国,使它变成科苏特、马志尼之流和欧洲其他

革命者的避难所。我宁愿发动一场战争,而且只要还有一兵一枪,就要继续打下去,不愿容忍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现。”

不要拜占庭帝国,不让希腊的版图大大扩展,不要小共和国的邦联,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要!那么他要什么呢?不列颠大使是用不着苦猜的。在对话过程中皇帝本人忽然道出了以下主张:

“实际上,多瑙河两公国是在我的保护下的独立国家;可以照旧不变。塞尔维亚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政体。保加利亚也是一样。看来,没有根据说明为什么这个地区不应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至于埃及,我完全理解这块领土对于英国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只能说,如果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分配帝国的遗产时你们占据埃及的话,我是决不会反对的。对于干地亚我也会这样说;这个岛也许对你们有用,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应属于英国。”

这样他就证明了,“一旦奥斯曼帝国瓦解,领土问题的完满解决并不像通常所想的那样困难”。他坦率地声明,他想做的是什么——瓜分土耳其,并且再清楚不过地描绘了这种瓜分的轮廓;无论是从说出来的或者是避而不谈的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埃及和干地亚——归英国;多瑙河两公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成为俄国的藩属;土耳其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地方他故意避而不谈)将并给奥地利;希腊的扩大“不宜过分”,譬如,可把下帖撒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并给它。君士坦丁堡应暂时由沙皇占领,然后成为由马其顿、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地区的残余部分组成的国家的首都。但是谁将成为这个小国(它或许还会扩大到包括安纳托利亚岛的某些部分)的最后占有者呢?关于这一点他没有说;但是人们都知道,他把这个位子留给了一个人物,这就是他的幼子^①,此人正渴望有自

^①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编者注

己的王国。而法国呢？难道它什么也得不到吗？或许如此！但是，不，它也将得到一份礼物，这就是——谁会相信这一点？——突尼斯。沙皇对汉密尔顿爵士说，“法国的目的之一是占领突尼斯”，因此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或许真的表现很慷慨，满足法国对突尼斯的胃口。

讲到法国，沙皇总是用一种特别引人注意的傲慢的轻蔑口吻。他说：“看来法国政府正竭力使我们大家在东方争吵。”至于他本人，那根本没有拿法国当一回事。

“从他这方面来说，他不大关心究竟法国认为在东方问题上采取什么行动路线是合适的；一个多月前他已通知苏丹说，如果苏丹需要他的支持来对抗法国的威胁，他完全愿意为苏丹效劳！”

皇帝继续说，总之，‘正如我已经对您说过的，我的全部希望，就是同英国取得充分的谅解，而且这不是对应该做什么，而是对不应该做什么取得谅解。只要英国政府同我取得了这种谅解，只要我同英国政府彼此完全信任，其余一切对我说来都无所谓’。”

“但是陛下，您忘了奥地利！”汉密尔顿爵士高声说道。

“啊”，皇帝使他非常吃惊地反驳道，“您应当懂得，我谈俄国，也就是谈奥地利；凡是对前者适合的东西，对后者也是适合的；在土耳其问题上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他谈俄国，也就是谈奥地利。关于黑山，他毫不含糊地声称，“赞同奥地利内阁所采取的立场”。

在以往的一次谈话中他把苏丹称为闹剧中的“土耳其苏丹”，而现在他则按保尔·德·科克的手法称呼他“这位先生”。那么他是多么宽宏大度地对待这位先生的呢？他仅仅把一个缅施科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而我如果愿意的话，本来可以把军队派到那里去——什么也阻挡不住它”；后来他在奥尔泰尼察和切塔泰证实了这一点，而

他的军队从卡拉法特光荣退却也证明了这一点。

哥萨克陛下^①在同汉密尔顿爵士分手的时候说：

“总之，请敦促贵国政府把这些事情再写一下，写得详细些，而且不要犹豫不定。”

3月7日，即这次非常有趣的对话（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独白）之后不久，涅谢尔罗德伯爵邀见了不列颠大使，并交给他一份“非常机密的、遵照皇帝陛下的圣谕拟就的备忘录，作为对约翰·罗素勋爵的通知书的答复或者说是评论”。涅谢尔罗德伯爵请他把这个“实际上是供他使用的”文件读一遍。为此，汉密尔顿爵士研究了文件。他先前没有找出过一个字眼来抗议俄国人^①对法国的蓄意侮辱，现在突然哆嗦起来了，因为他发现“备忘录是根据一种错误的印象拟出来的，那个印象显然就是：女王陛下政府在俄国和法国的争端中偏袒后者”。第二天一早他就急忙给涅谢尔罗德伯爵送了一封情书，向他保证说：

“在最近非常严肃的谈判期间，女王的顾问们不仅没有倾向于法国，如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而且相反，他们希望——在被迫(!)采取中立立场的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内(!!)——皇帝陛下的有根据的要求将得到充分满足。”

由于这封低三下四的信，汉密尔顿爵士自然“同总理大臣”有了另一次“非常友好而满意的谈话”。总理大臣安慰这位不列颠大使，说他误解了皇帝备忘录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绝不是指责英国袒护法国。涅谢尔罗德伯爵说：“这里无非是希望不列颠政府在呼吁皇帝宽宏大量和具有正义感的同时，也设法对法国大臣进行开导。”因而，“这里”仅仅是希望英国对这位卡尔梅克人^①卑躬屈节，而对法

^① 指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国人采取严峻专断的口吻。为了使总理大臣相信英国政府多么忠诚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的后一部分，汉密尔顿爵士向他宣读了约翰·罗素勋爵紧急函件中的一段，“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英国大臣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同法国政府说话的”。涅谢尔罗德伯爵发现，这超出了他最大胆的期望。他只是“感到遗憾，早先他没有掌握这样重要的证据”。

汉密尔顿爵士认为俄国答复约翰勋爵紧急函件的备忘录乃是“出自皇帝枢密机关而不是出自俄国总理办公厅的最出色的文件之一”。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细谈它，因为它只是扼要叙述了沙皇在“对话”中已经发挥的那些观点。备忘录竭力暗示不列颠政府，“磋商的结果无论是什么样的，两位皇帝都应保守秘密”。备忘录指出，沙皇的做法，“正如英国内阁自己承认的，一向是以宽大态度”对待土耳其政府。法国采取了另外的行动方针，从而迫使俄国和奥地利也采取威胁的行动。在整个备忘录中俄国和奥地利是相提并论的。其中明确地说，可能导致土耳其立即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圣地问题¹¹⁰，以及“正教徒因对天主教徒让步而感到受辱的宗教感情”。末了，备忘录宣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此次受命向皇帝转达的证明女王陛下的友谊和个人信任的文件”，同罗素紧急函件中所包含的保证是“同样珍贵的”。这些表明维多利亚女王对沙皇赤胆忠心的“证明文件”，被十分周密地瞒着不列颠公众，但是，它们或许很快就会在《圣彼得堡报》上发表出来。

汉密尔顿爵士在解释他同皇帝的谈话以及俄国人的备忘录时，再一次提醒自己的内阁注意奥地利的立场。

“假定两位皇帝在土耳其问题上业已达成协议或签订条约是一个确定不移并且已经得到公认的事实，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他们彼此承担了多少

义务。至于签订这项协议的方式,我认为不必多加猜测。

毫无疑问,这个协议的基础是在去年秋天两位皇帝的某一次会见中奠定下来的,以后,这个计划大概是在俄国驻奥地利宫廷公使迈恩多夫男爵的主持下制定的,他在圣彼得堡过冬,现在还在那里。”

在这些事情揭露出来以后,不列颠政府是否质问奥地利呢?不,它仅仅谴责法国。在俄国侵入多瑙河两公国之后,它指定奥地利充当调停人,从所有城市中挑选维也纳作为协商地点,让布奥尔伯爵指导谈判,而且直至今日仍然愚弄法国,硬要法国相信,在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而对俄国人进行的战争中,奥地利可以成为忠实的盟国——尽管不列颠政府在一年多以前就清楚地知道,奥地利同意肢解这个帝国。

3月19日汉密尔顿爵士的关于他和沙皇的对话经过的报告送到了伦敦。此时克拉伦登勋爵已经取代了约翰勋爵的职位,他竭力要超过他的前任。在得到这份沙皇已经认为没有必要掩饰自己对土耳其和法国的阴谋,而公开加以承认的令人惊异的报告之后四天,高贵的伯爵向汉密尔顿爵士发出了以下紧急函件:

“女王陛下政府感到遗憾的是,笼罩着巴黎的惊慌和愤怒促使法国政府下令把自己的舰队开往希腊领海;不过法国政府的处境在许多方面都同女王陛下政府的处境不同。据女王陛下政府所知,法国政府没有从俄皇那里获得有关他打算奉行的对土政策的保证。”(见蓝皮书第1卷第95页)

如果沙皇也曾告诉法国,“病人快要死了”,现在有了一个瓜分遗产的详细计划,那么,法国自然既不会感到惊慌,也不会对土耳其的命运、缅施科夫公爵使命的真正目的以及俄国皇帝维护他断言已经“没有生机”的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感到疑惑了。

在同一天,3月23日,克拉伦登伯爵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发出了第二份紧急函件,这份急件不是为蓝皮书而“编造”的,而是对从圣彼得堡送来的秘密报告的秘密答复。汉密尔顿爵士在他的关于对话的报告末尾提出了如下的明智的建议:

“我不揣冒昧地建议,在将发给我的紧急函件中写上一些要结束进一步研究,至少是结束进一步讨论那些极不适宜当作提供讨论的问题的调句。”

克拉伦登伯爵感到自己是最适于处理棘手局面的人,他根本不顾自己大使的警告而完全遵照沙皇的指示行事。他在紧急函件中一开头就声称,“女王陛下政府对皇帝希望继续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愿望表示欢迎”。皇帝“有权要求”英国政府“最开诚布公地表明意见”,因为他对他们“十分信任”,认为他们会帮助他肢解土耳其、出卖法国以及在奥斯曼的统治被推翻时帮助他镇压基督教居民企图成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任何活动。这位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继续写道:

“女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一旦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达成某种谅解是适合的或者是真正可能的,那么皇帝陛下的话将比任何可能签订的条约都更值得重视。”

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话都应当抵得上同他签订的任何条约;要知道,不列颠女王的法律顾问们早已声明同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由于俄国方面的破坏已经不再生效了。

“女王陛下政府仍然相信,土耳其仍然具有生机。”为了证明这种信念是真诚的,这位伯爵温和地补充道:

“如果皇帝关于土耳其帝国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的意见公布于世,土耳其帝国的崩溃一定比皇帝陛下所预料的甚至更快。”

这样，卡尔梅克人刚一讲出自己的意见，说病人快要死了，他就死了。这就是令人羡慕的所谓生命力！这里用不着吹耶利哥的羊角^①。只消皇上的尊口轻轻一吹，奥斯曼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女王陛下政府完全赞同皇帝的意见：由任何一个大国占领君士坦丁堡都同保持现有的力量均衡和维持欧洲和平不相容，并且应断然认为是不可能的；不存在恢复拜占庭帝国的因素；希腊一贯统治不当，不适于扩充它的版图；由于没有建立省或地区自治的基础，如果让土耳其各省各自为政或者允许它们成立单独的共和国都会造成无政府状态。”

请注意，对自己的鞑靼主子卑躬屈节并奴才般地重复主子的话的不列颠大臣，甚至恬不知耻地重复弥天大谎，说什么土耳其不存在“建立省或地区自治的因素”，然而正是地区和省的生活的大力发展使土耳其直到今日还能抵挡住国内外的极其残酷的打击。不列颠内阁既然赞同沙皇所提出的一切前提，也就承认沙皇有意从这些前提中作出的一切结论是正当的了。

英勇的伯爵继续说道，一旦土耳其帝国崩溃，“欧洲会议将是达到和平结局的唯一模式”。但是他害怕这样一个会议的后果，不是因为俄国诡计多端，——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把英国摆布得连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都感慨地说：“如果我在滑铁卢获胜，我也不会强迫英国接受更屈辱的条件。”——而是因为害怕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1815年条约必将修改，法国大概会甘冒欧洲大战的危险，以便摆脱它认为有损自己民族尊严的义务，这些义务既然是获胜的敌人强加于

① 根据圣经传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攻不破的城墙塌陷（《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编者注

它的,也就成为经常触怒它的根源。”

女王陛下政府“希望维持土耳其帝国”,不是要使它充当反对俄国的堡垒,也不是因为土耳其的崩溃会迫使英国反对俄国以保卫自己在东方的截然相反的利益。啊,不是的!——伯爵说道,——“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英国想维持土耳其帝国并非根据任何同东方问题有关的考虑,而是“由于它相信,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问题被提出来热烈讨论,都会成为西方纠纷的源泉”。因而,东方问题势必引起的不是西方强国对俄国的战争,而是西方强国彼此之间的战争——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正是这位写出这些话的大臣和批准这些话的僚僚,却欺骗我们,硬要我们相信,他们打算联合法国同俄国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由东方产生的问题引起”的,尽管“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勇敢的伯爵继续往前走。

用他的话来说,对法国战争应当是土耳其帝国瓦解和肢解的“必然结果”。他怎么会害怕这场战争呢?对法国战争本身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这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情况,这就是:

“在西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将具有革命的性质,而且包含着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审查,大陆各国政府当然对此毫无准备。

皇帝完全知道,社会的表层下面是经常处于发酵之中的物质,它们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可能爆发;因此,皇帝陛下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意见:第一响炮声可能成为造成一种甚至比战争必然带来的灾难还要危险的局势的信号。”

坦率的和平使者感叹道:“因此,女王陛下政府便产生了防止灾难的急切愿望。”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没有潜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没有潜伏着革命,那么女王陛下政府会像哥萨克陛

下一样把土耳其苏丹吞掉。

忠实于由汉·西摩尔爵士转来的俄国总理办公厅的指令的英勇的克拉伦登,在其紧急函件末了“呼吁皇帝宽宏大量和具有正义感”。

在我们这位伯爵于1853年4月5日发出的第二个紧急函件中委托汉密尔顿爵士通知俄国总理大臣: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已奉命返任;女王陛下的亲笔信使子爵的使命具有特殊的性质,因为人们认为,土耳其政府会比较乐于接受由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这样具有崇高地位、深谙土耳其问题的人提出的温和的忠告,即劝告土耳其政府以最宽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基督教臣民。”

就是这位发出这些特别指令的克拉伦登,在1853年3月23日的紧急密件中写道:

“对待基督徒并不残酷。土耳其政府对待这一部分臣民的宽大态度倒可以作为某些把土耳其蔑视为野蛮国家的政府的榜样。”

这个紧急密件承认,斯特拉特福勋爵是作为一个对苏丹施加压力的最机伶最听话的执行者而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而在当时内阁的文件上却把派遣他说成是对沙皇的强烈示威,因为高贵的勋爵早就在扮演俄国的私敌的角色了。

向议院提出的一批秘密文件的最后一个俄国的备忘录。尼古拉在备忘录中表示庆幸,因为万一东方发生非常事件,在那些首先应当避免的政治局面的问题上,他同英国内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备忘录上注明的日期是1853年4月15日。备忘录认为,“支持土耳其政府继续存在的最好办法是,不要以有损它的独立和尊严的方式提出过分要求来困扰它”。这恰恰是在缅甸表演自己的喜剧的时候。缅甸科夫曾于4月19日递交了一份无耻的“未经签署的

照会”，这份照会，正像克拉伦登伯爵在上院所说，使用的“幸好是在外交界非常罕见的语言”。这位阁下更加坚定地相信，沙皇决心温和地对待病人。当哥萨克侵入多瑙河两公国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联合内阁只找到了一个洞穴可以躲避这些揭丑的文件。他们硬说，缅施科夫公爵使命的明显目的是圣地问题¹¹⁰；而就瓜分土耳其交换意见，只涉及遥遥无期的未来。但是沙皇在他的第一个备忘录中已明确地告诉他们：土耳其崩溃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无根据的和幻想出的问题，或者十分渺茫的可能性”；英国内阁错了，它“认为黑山和圣地这两个问题是跟外交上通常碰到的那些困难问题没有区别的普通争执问题”；圣地问题“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变化”，并且导致“灾难”。内阁本身不仅同意，沙皇在圣地问题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同意，沙皇对苏丹的1 100万臣民享有“条约所规定的特殊保护权”。如果联合内阁没有迫使土耳其政府接受缅施科夫的要求，沙皇就根据1844年的备忘录的精神，根据这个内阁同他达成的协议以及他对汉·西摩尔爵士的口头声明——“他不允许别人跟他开玩笑”——来行动而打算搞死这位先生。这里不存在他对内阁的态度是否正确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内阁自己对待他的态度，甚至在目前，是否并不“完全正确”。每一个仔细读完这些文件的人都该清楚，如果这个可耻的内阁继续执政，则国外复杂局势的影响就足以把英国人民推向可怕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将把王位、议会和已经丧失了保持英国的世界地位的能力和意志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尽。

尼古拉通过《圣彼得堡报》向联合内阁提出了挑战——公布证明这个内阁的寡廉鲜耻的秘密文件，他的这一行动是恪守自己的箴言的：

“我痛恨那些反抗我的人；我鄙视那些为我效劳的人。”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24 日

载于 1854 年 4 月 11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05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¹¹³

1854年3月28日星期二于伦敦

终于宣战了。女王的诏书昨天已由阿伯丁勋爵和约·罗素勋爵分别在上院和下院宣读。诏书中说将要采取的种种措施是“反对俄国蚕食土耳其的积极步骤”。明天《伦敦官报》将公布正式的宣战书，议会将在星期五讨论对女王诏书的复文。

在英国发表宣言的同时，路易-拿破仑也向参议院和立法团发出了类似的文告。

布莱克伍德上尉已把英法两国的最后通牒送交沙皇，并于上星期六带回答复说，俄国根本不打算答复这个文件，这样一来，对俄宣战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布莱克伍德上尉的使命并不是毫无结果的。由于这一使命俄国赢得了三月份这个一年中对俄军最危险的时期。

沙皇和英国政府之间秘密往来的函件的公布，不仅没有激起公众对英国政府的愤懑，反而——真是不可思议——使得各种日报和周报祝贺英国有一个真正的民族内阁。但据我所知，将召集一个群众大会来使盲目的英国公众看清政府的真正行为。这次大会将于下

星期四在货栈街音乐厅举行,预料庞森比勋爵、莱亚德先生、乌尔卡尔特先生等人将参加这次大会。

《汉堡记者》刊载了如下一则简讯:

“据此间本月 16 日得自彼得堡的消息称,俄国政府准备公布有关东方问题的其他各种文件,其中包括阿尔伯特亲王的几封信。”

令人诧异的是,就在下院宣读女王诏书的那一个下午,政府在这次议会会议上遭到了第一次失败。尽管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关于强迫贫民迁返原居住地的法案¹¹⁴的二读仍以 209 票对 183 票的多数决定延期到 4 月 28 日进行。政府这次遭到失败,原因不在别人,而在帕麦斯顿阁下。

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

“这位阁下设法把他和他的同僚置于两团火焰(托利党和爱尔兰党)之间而不寄很大希望于让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我们得悉,本月 12 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三国同盟条约¹¹⁵,但是,尽管苏丹亲自向大穆夫提¹¹⁶提出请求,后者在乌里玛¹¹⁷团体的支持下还是拒绝作出批准关于改变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地位的条款的判决,认为这些条款违背古兰经的教义。看来,这个消息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使德比勋爵不得不发表下述声明:

“我只想表明自己的真诚希望:政府将发表一个声明来说明近日来流传的一则消息是否属实,这则消息说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之间订立的协定中包含一些规定我们具有保护权的条文,这种保护权至少会同我们曾加以反对的俄国的保护权一样受到指责。”

今天的《泰晤士报》说,政府的政策同德比勋爵的政策完全相反,还说:

“如果某种严重违抗这一政策的行为是大穆夫提或乌里玛的宗教狂热的结果，我们将感到非常遗憾。”

无论要了解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宗教当局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还是要了解目前土耳其政府在关于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问题(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是目前东方一切实际纠纷的根源)上所面临的困难，都必须先追溯一下这个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古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民族和两种国家——正统教徒和异教徒的民族和国家。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的民族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柏柏尔国家¹¹⁸的海盗船曾是伊斯兰教的神圣舰队。那么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的存在如何能同古兰经相容呢？

伊斯兰教法律规定：

“如果某个城市投降，其居民同意成为莱雅，即穆斯林君主的臣民，而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必须缴纳哈拉志(人头税)；他们和正统教徒达成停战协议，无论谁都不得没收他们的地产或房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旧教堂就是他们的财产的一部分，允许他们在这些教堂中举行祈祷仪式。但是不允许他们修建新教堂。他们只有权修缮旧教堂和恢复其坍塌的部分。各省总督定期派专员巡视基督徒的教堂和圣殿，检查是否有以修缮为名增添新建筑的情况。如果某个城市是用武力征服的，那么居民可以保存自己的教堂，但只是作为他们居住处或避难所，不允许在里面举行祈祷仪式。”^①

因为君士坦丁堡同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是投降

① 塞·法曼《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年巴黎版。——编者注

的,所以那里的基督徒在土耳其政府统治下享有作为莱雅而存在的特权。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个特权,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意把自己置于穆斯林的保护之下。因而,仅仅是由于基督徒应按照伊斯兰教法律服从穆斯林管理,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即他们的宗教首领,同时也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最高审判官。凡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我们看到有正教徒莱雅聚居的地方,根据法律,大主教和主教都是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并在宗主教的领导下管理向正教徒分派赋税的事宜。宗主教对自己的教徒的行为向土耳其政府负责。宗主教由于被授权审判本教的莱雅,他便把这个权力转托给都主教和主教在他们管辖的教区内行使,而他们的判决,土耳其政府的官吏和法官等等必须执行。他们有权判处罚款、徒刑、笞刑和流放。此外,他们自己的教会还赋予他们开除教籍的权力。除了罚款以外,他们还对民事和商业案件课收各种税款。教阶制度中的每个等级都有一定的金钱价格。宗主教为了获得叙任权向国务会议缴纳很重的贡赋,但他也把大主教和主教的职位卖给本教会的神职人员,而后者则靠出卖下级职位给别人并从教士身上征收贡赋而得到补偿。教士又把从上级那里买来的权力零售出去,并在他执掌的洗礼、结婚、离婚、遗嘱等事情上大做其生意。

从这个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土耳其对信仰正教的基督徒的宗教统治系统以及土耳其社会的整个结构都是以莱雅服从古兰经这点为基础的,而古兰经则把莱雅看作异教徒,也就是看作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一个民族,准许把教会和世俗权力集中在他们的教士的手中,因此通过世俗的解放来废除他们对古兰经的从属,也就是同时消除他们对神职人员的从属,并引起他们在社会、政治和宗教关系等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推入俄国的怀抱。

谁想用一部民法典来代替古兰经,谁就必须按照西欧的式样来改造拜占庭社会的全部结构。

穆斯林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于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穆斯林和信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因为古兰经把一切外国人都视为敌人,所以谁也不敢没有预防措施而到伊斯兰教国家去。因此,第一批冒险去同这样的民族做生意的欧洲商人一开始就力图保证个人享有特殊待遇和特权,后来,这种特殊待遇和特权扩大到他们的整个国家。这就是特惠条例⁵⁹产生的根源。特惠条例——这是土耳其政府发给欧洲各国的帝国文书,即特权证件,它允许这些国家的臣民通行无阻地进入伊斯兰教国家,在那里安安稳稳地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并按照本国的仪式进行祈祷。它和条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经过缔约双方对等磋商,不是在互利互让的基础上经双方同意的互惠条例。相反地,特惠条例是由其颁发政府单方面赋予的特许权,因此也可以由它自行决定废除。而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使它赋予某个国家的特权化为乌有,其办法就是把这些特权也赋予其他国家,或者完全废除这些特权,拒绝继续实施这种条例。特惠条例的这种不稳定的性质使它永远成为各国大使争执和埋怨的根源,为此无休无止地交换互相反驳的照会,而且每位新王即位时都要重新颁布敕令。

外国列强的那种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莱雅,而是对去土耳其旅行或者作为外国人在那里侨居的本教教徒的保护权,正是从这种特惠条例开始产生的。获得这种保护权的第一个强国是法国。1535年在苏里曼大帝和弗朗索瓦一世时代,1604年在艾哈迈德一世和亨利四世时代以及1673年在穆罕默德四世和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和奥斯曼政府之间签订的各个特惠条例,于1740年在

一本条约汇编中得到了修订、确认、重申和增补，这本汇编的标题就是《法国宫廷和奥斯曼政府之间的新旧特惠条例和条约。——公元1740年(希吉拉历1153年)修订和增补。由御前翻译秘书兼驻奥斯曼帝国宫廷首席翻译官德瓦尔先生译(经土耳其政府批准的第一个正式译本)于君士坦丁堡》。这个协定的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国有权保护一切传播法兰克宗教的寺院(不管这些寺院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一切到圣地去的法兰克朝圣者。

俄国是第一个在1774年把仿照法国的先例而取得的特惠条例列入条约的国家。这个条约就是凯纳吉条约²⁸。同样地,拿破仑在1802年认为,使特惠条例的存在和保持成为条约的一项条款,并使之具有相互约束的协定的性质是适当的。

圣地问题¹¹⁰同保护权问题又有什么联系呢?

圣地问题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信仰正教的基督徒的宗教团体和它们在圣土上占有的建筑物,特别是圣墓神殿的保护权问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的占有意味的不是所有权(这是古兰经拒绝给予基督徒的),而只是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决不排斥别的团体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祈祷仪式;占有者只有权掌管钥匙、修缮和进入庙宇、燃点圣灯、打扫屋舍、铺置地毯,此外没有其他特权,而这一切在东方乃是占有的象征。正如圣地对基督教来说至高无上,关于保护权的问题也同样至关重要。

圣地和圣墓神殿分别由天主教徒、正教徒、亚美尼亚教徒、阿比西尼亚教徒、叙利亚教徒和科普特教徒各自占有一部分。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觊觎者中发生了冲突,欧洲君主们认为这种宗教纠纷是一个有关自己在东方的影响的问题,于是他们便首先注意到了土地的主人——滥用自己职权的、狂热的和贪婪的帕沙们。奥斯曼政府和

它的官吏采用很麻烦的秋千法，处理问题时使天主教徒、正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轮流得到好处，向各方索取黄金，并拿他们所有的人来开心。土耳其人刚刚把承认其有权占有某一有争议地区的敕令授给了天主教徒，亚美尼亚教徒就带着更沉重的钱袋来了，转瞬之间就得到了一道相反的敕令。他们对正教徒也使用这样的策略。正教徒除了土耳其政府的各种敕令和它的官吏们的“哈德热茨”（指示）所正式确认的东西以外，还善于为自己伪造各种各样的获取权利的根据。有时，由于叙利亚的帕沙们和下级官吏们的贪得无厌和居心不善，苏丹政府的决议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这样一来就必须重新商谈，任命新的专员并再牺牲一笔钱。土耳其政府过去为了金钱而干的事情，现在由于害怕才去干，以便获得偏袒和保护。它向法国的要求和天主教徒的要求让步之后，赶忙又向俄国和正教徒作出同样的让步，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躲过它无力反抗的风暴。没有一处圣所，没有一座小礼拜堂，没有一块圣墓神殿的石头，不曾被用来挑起各基督教团体之间的争端。

我们发现在圣墓周围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教派，在它们的宗教野心后面隐藏着同样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角逐。

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居住着信仰各种宗教的民族：天主教徒、正教徒、亚美尼亚教徒、科普特教徒、阿比西尼亚教徒和叙利亚教徒。正教徒有 2 000 人，天主教徒有 1 000 人，亚美尼亚教徒有 350 人，科普特教徒有 100 人，叙利亚教徒有 20 人，阿比西尼亚教徒有 20 人，共计 3 490 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有 1 373 万正教徒，240 万亚美尼亚教徒和 90 万天主教徒，其中每一种教徒又分为若干较小的支系。我在上面谈到过的承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正教会同俄罗斯正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高宗教首脑是沙皇；它也同古希腊人的教会

根本不同, 后者的最高首脑是国王和雅典正教会议。同样, 天主教徒也分为罗马天主教徒, 希腊东仪天主教徒和马龙派; 亚美尼亚教徒分为格雷戈里派和亚美尼亚天主教派; 科普特教徒和阿比西尼亚教徒同样也划分为许多支系。在圣地的三大教派是正教会、天主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天主教会可以说主要是代表拉丁民族; 正教会主要是代表斯拉夫民族、土耳其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民族, 其余的教会则主要是代表亚洲和非洲民族。

不难想象, 所有这些互相敌对的人是怎样包围圣墓的, 僧侣们是怎样进行战争的, 而他们争夺的表面的对象是出自伯利恒岩穴的一个星状物、一块绣帷、一个圣殿的钥匙、一个祭坛、一个陵墓、一个宝座、一个圣枕——一句话, 任何一种可笑的优越地位!

要了解僧侣们的这样一种十字军征讨, 便必须首先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其次是他们的居住方式。

关于这一点, 一位旅行家不久以前叙述道:

“各民族的所有这些宗教渣滓彼此隔绝地生活在耶路撒冷, 他们互相敌视和忌妒; 这是一些流浪居民, 他们从朝圣者中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而又经常死于瘟疫和贫困。过了若干年, 欧洲人死去了或者回到欧洲去了, 帕沙和他们的近卫军到大马士革或君士坦丁堡去了, 而阿拉伯人则跑到沙漠里去了。耶路撒冷——这是每个来的人短时客居的地方, 但谁也不在那里定居, 在这个圣城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宗教中找到生活的来源——正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依靠每年到耶路撒冷来的 12 000 或 13 000 朝圣者的施舍过活, 天主教徒则依靠他们在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教友的津贴和周济过活。”^①

信仰基督教的民族除了自己的寺院和圣所之外, 在耶路撒冷还

① 塞·法曼《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 年巴黎版。——编者注

占有一些造在圣墓神殿旁边的矮小的住房或单人住所,其中居住着日夜守护着这个圣所的僧侣。履行这些职责的僧侣定期由教友替换。单人住所只有一道通向神殿内的房门;担任看守的僧侣的食物是从小窗口由外面送进来的。神殿的门经常锁着,由土耳其人看守,他们只是为了钱才把门打开,并且由于任性或者贪财而擅自把门关上。

马扎里尼说,教士之间的争吵总是最恶毒的。试设想一下这些教士吧,他们不仅都靠这些圣所为生,而且都一起住在这些圣所里!

为了透彻地了解这种情况,应当记住,天主教神父几乎完全是由罗马人、撒丁人、那不勒斯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他们全都忌妒法国的保护权,都渴望代之以奥地利的、撒丁的或那不勒斯的保护权;撒丁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都自封为耶路撒冷国王;还要补充的一点是,耶路撒冷的定居居民约有15 500人,其中有4 000穆斯林,8 000犹太人。穆斯林约占全部居民的四分之一,其中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摩尔人,他们当然在各方面都是主人,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没有影响他们的地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贫困和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最肮脏的地区,即锡安山和莫里亚山之间的一个叫作哈拉斯-耶胡德的地区(那里有他们的犹太教会堂),他们经常遭到穆斯林的压迫和排斥;他们受到正教徒的侮辱,受到天主教徒的迫害,仅仅依靠从他们的欧洲弟兄那里获得的微薄的施舍为生。但是这里的犹太人不是当地居民,而是出生于遥远的不同国家的人,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到耶路撒冷来,只是希望居住在约萨法特河谷,并在救世主应当出现的地方死去。一位法国作家说道:

“他们在忍耐和祈祷中等待死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莫里亚山，那里曾经矗立着所罗门神庙，他们不得走近这座山，他们为锡安山的不幸，为他们散居于世界各地而落泪。”①

英国和普鲁士在 1840 年任命了一位驻耶路撒冷的圣公会主教，他的明显的目的就是要使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结果这些犹太人更加苦难深重。在 1845 年，他受到了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和土耳其人的痛打和嘲弄。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使耶路撒冷一切宗教联合起来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原因。

现在我们很清楚，为什么基督徒在圣地共同进行祈祷仪式会变成各种不同教派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拚命的爱尔兰式的争吵；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神圣的争吵恰恰掩盖着不仅是各个国家而且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世俗的斗争，而在西欧人看来是如此可笑的、在东方人看来却是如此异乎寻常地重要的圣地的保护权问题，仅仅是经常出现的、始终被掩盖着的和永远不能解决的东方问题的一个阶段。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28 日

载于 1854 年 4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5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塞·法曼《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 年巴黎版。——编者注

弗·恩格斯

喀琅施塔得要塞¹¹⁹

从查理·纳皮尔爵士得到海军大臣的“宣战的绝对许可”，启程前往波罗的海的时候起，英国社会上比较乐观的人士就盼望很快会获悉喀琅施塔得被炮击、通向圣彼得堡的要冲被占领、也许(谁知道呢?)甚至不列颠国旗升起在俄国海军部大楼金光闪闪的尖顶上的消息。

这些希望是基于一种非常正确的想法之上的。这就是：喀琅施塔得，对于从波罗的海一带海上向俄国发动的任何进攻来说，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攻下喀琅施塔得，圣彼得堡就在你的脚下，俄国舰队就不复存在，而俄国就会降到彼得大帝以前的地位。尽管英国在波罗的海拥有树立这种功勋所必需的力量，如果它在进攻只有次要意义的据点所消耗的力量多于绝对必需的力量，那么它就会犯最大的错误，这对即将来临的两个或三个战役，也许都会造成决定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喀琅施塔得的决定作用，那么俄国人同样明白这种作用，而且他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个通向俄国的咽喉已被竖着上千门火炮的两三层防御工事护卫着。

大家知道，喀琅施塔得位于一个长约五英里的小岛的东南角上；这个岛掩护着芬兰湾的狭窄部分的入口，离涅瓦河口约十六英里。岛两侧大海几乎到处都很浅，只有两条航道可供海船航行。一条在

岛以北,离它的北岸约两三英里,有四英寻^①多深;航道在离岛的东端四英里处折向该岛,离东端只1 400码,但这里的深度减少了一英寻。可见,在这条航道上航行的任何军舰的火炮都打不到岛的东北岸;只有岛的西端和东端例外。所以只有岛的这两端构筑了工事,西端是叶卡捷琳娜堡垒、亚历山大堡垒和米哈伊尔堡垒,东端则是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垒墙和垒墙前面约1 000码的沙滩上构筑的两个炮台;然而其中较大的一个炮台据说已成废墟。在东部和西部防御工事之间,与岛之北岸平行离岸足有一英里的沙滩上还构筑了一个炮台,然而,这个炮台还是处于四英寻深的航道上的军舰的射程以外。

因此,北面这条航道由于全部远离防御工事,在航行上有很大的困难,并且由于它的东南端的深度大大变浅,应当认为不适于用来对喀琅施塔得进行任何认真攻击。在力量作某种程度的分散而不致引起致命后果的条件下,可以派遣几艘较轻型的舰船利用这条航道对该岛进行迂回;它们在压制了东炮台的不十分强的火力之后,就可能取得炮击喀琅施塔得城的极其有利阵地。在这个城内不仅有波罗的海俄国海军的主要的弹药仓库和造船厂,而且有许多私人的建筑木材,因此城内充满了易燃物,只要有几发炮弹命中就可能引起熊熊大火,在一夜之间把多年不断充实的海军仓库化为灰烬。有没有实际可能用足够数目的轻型舰船占领这样的阵地呢?只有结合重新测量水的深度来对情况作仔细的实地研究才能断定这个问题。是否值得采取这样的步骤?这一点将取决于力量的对比。我们在这里只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情报进行比较研究,从远离现场的外地说明哪些看来是可行的。

^① 1英寻等于1.83米。——编者注

这样一来,只有通向大停泊场和小停泊场(或叫作锚地)的南面航道才是主要的攻击方向。这条四英寻深的航道在岛的西北端海面上有几英里宽,在离内港两英里地方突然缩小到一英里宽,然后就成为一个锐角,角顶对着军港。在这地方,从奥拉宁鲍姆大沙洲到岛边的一个狭窄的浅滩横穿航道,使航道的最大深度减到 $3\frac{1}{2}$ 英寻。虽然只要挖泥船稍微动一动就足以除去这个浅滩,但是俄国人竭力保存着自己军港的这个天然工事。因此,这条四英寻深的航道(它的中部到处都不下 $4\frac{1}{2}$ 英寻,能保证最大的军舰通过)是到喀琅施塔得的主要接近路,而决战应在锐角的顶部展开,那里有一段一英里半长的水路宽度不到400码。

掩护这条航道的筑城工事は五花八门的:从彼得大帝时代的古老建筑物到最新式的、有上下两三层火炮的威力巨大的工事。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地点是靠过时的而且极不完善的筑城工事来掩护的:这正是喀琅施塔得的弱点。这些古老的工事是一些不大的棱堡工事;火炮配置在露天的胸墙后面,而穹窿的火炮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棱堡非常狭小,因此配置在上面的火炮的数量同棱堡正前方的大片面积比起来显得太少。此外必须指出,这些火炮的半数基本上是对着浅海域的,从这些地方来的最多不过是炮艇的攻击。但是这样的工事连炮艇也对付不了。

与此不同,现代化工事是按照蒙塔朗贝尔首次提出的原理修建的,这些原理经不同程度的改进已被普遍采纳,特别是运用在港口与海岸工事的修筑上。除喀琅施塔得以外,瑟堡和塞瓦斯托波尔也是广泛采用这些原理来修筑海港工事的实例。这些工事的特点是有上下两三层火炮,下层火炮配置在穹窿里,也就是说配置在不大的拱形

室里,这里是火炮和炮手防御敌人炮击的最可靠的掩蔽部。只有上层火炮配置在没有掩盖的胸墙后面,但是由于它们的位置高于最大的三层甲板舰的上层甲板,所以能很好地防御敌舰炮击。经受进攻考验的时候就可以证明这些堡垒是否修筑得足够坚固,经得住自己火炮发射的震动和敌人炮火的破坏力;如果经得住,它们就会是砸不破的硬胡桃了。

可以认为,在喀琅施塔得的航道区有三道筑垒线。

第一道线,即外线,呈半圆形,掩护着大停泊场的入口,也就是说掩护着四英寻深的航道上的宽度为一英里至半英里的那一段。这个阵地的右翼,即北翼是由下列工事构成的:彼得堡垒,这是位于岛上的离深水航道约1 400码的一个小型眼镜堡;臼炮台,也是在岛上,在往东半英里的地方,这个炮台可以看作几乎是无用的;康士坦丁堡堡垒,这是一个有威力的、背面闭合的眼镜堡,修筑在沙洲上,离深水航道的边沿1 000码,在臼炮台的正前方。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堡垒,配置有两层火炮共50门。它的作用是掩护外接近地;它能扰乱正在调整队形的舰队;但是,只要驶过这个堡垒,它的半数火炮就会失去效用。

构成第一道筑垒线的中心的是亚历山大堡垒(不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在岛北端的那个堡垒),这是一个半圆形的建筑,它矗立在三英寻深的海中,离深水航道宽度变狭成半英里的地方400码。这样一来,这个堡垒能从航道一侧扫射到另一侧。尽管在地图和航海图上它显得很小时,但是有三层火炮,不少于72门。如果这个塔形堡垒修筑得足够坚固,如果它的穹窿的通风设备良好而不致阻碍硝烟的排出,那就最少需要有两艘三层甲板舰才能对付它。

这座堡垒后面有一座古老的卫城,这是一个眼镜堡,它之无关重

要,从有了新堡垒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新堡垒遮断了该眼镜堡的火炮的半个射击扇面。

最后,左翼,即南翼是由里斯班克堡垒和炮台构成的,它们修筑在大停泊场入口以南。这座堡垒是上世纪修筑的,后又经过现代化的改建,因此现在它的部分火炮配置成两层,炮的总数增加到 50 门。但是,尽管如此,它比现代化的堡垒占的面积大得多,而它的对着停泊场方向的正面宽约有 300 码,并且可以受到来自深水航道区的部分火力和来自吃水浅的舰只在靠西半英里的 $3\frac{1}{2}$ 至 3 英寻深的海上所可能占领的阵地上的全部火力的纵向射击。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它的背后 600 码的地方修筑了里斯班克炮台,但是其位置很不适合于达到这个目的。里斯班克堡垒正好在亚历山大堡垒南面一英里的地方,这两座堡垒的交叉火力控制着大停泊场的入口。

要攻克第一道筑垒线本身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如果它背后的第二线不用远程炮火支援它的话。第二道筑垒线掩护着整个大停泊场,也掩护着小停泊场的入口。它是由两座侧射防御工事构成的:彼得一世堡垒(旧式的、修筑得不好、像一种冠堡的堡垒,位于亚历山大堡垒以东半英里,在 250 码的正面上总共只有 24 门火炮)和喀琅斯洛特堡垒(旧式的棱堡工事,有 5 个正面,其中两面对着浅海,因此是没有用的;尽管最长的对角线有 400 码,但火炮最多不过 36 门),最后,还有位于中央的商港的西防护墙。这道防护墙由喀琅施塔得岛伸展出来直达深水航道,与航道形成一个直角,航道在这里只有 300 码宽。在这道防护墙上配置了 70 门加农炮和 12 门臼炮,然而,有些炮配置位置不当,看来好像对舰船航行起不了什么作用。这道防护墙上的火炮同彼得一世堡垒的主要正面和喀琅斯洛特的两个正面结

合形成的交叉火力非常有效地掩护着大停泊场内半部；由于第一道线的火力和航道的狭窄，除了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任何舰船要占领良好的阵地并保持充分的兵力看来都是极端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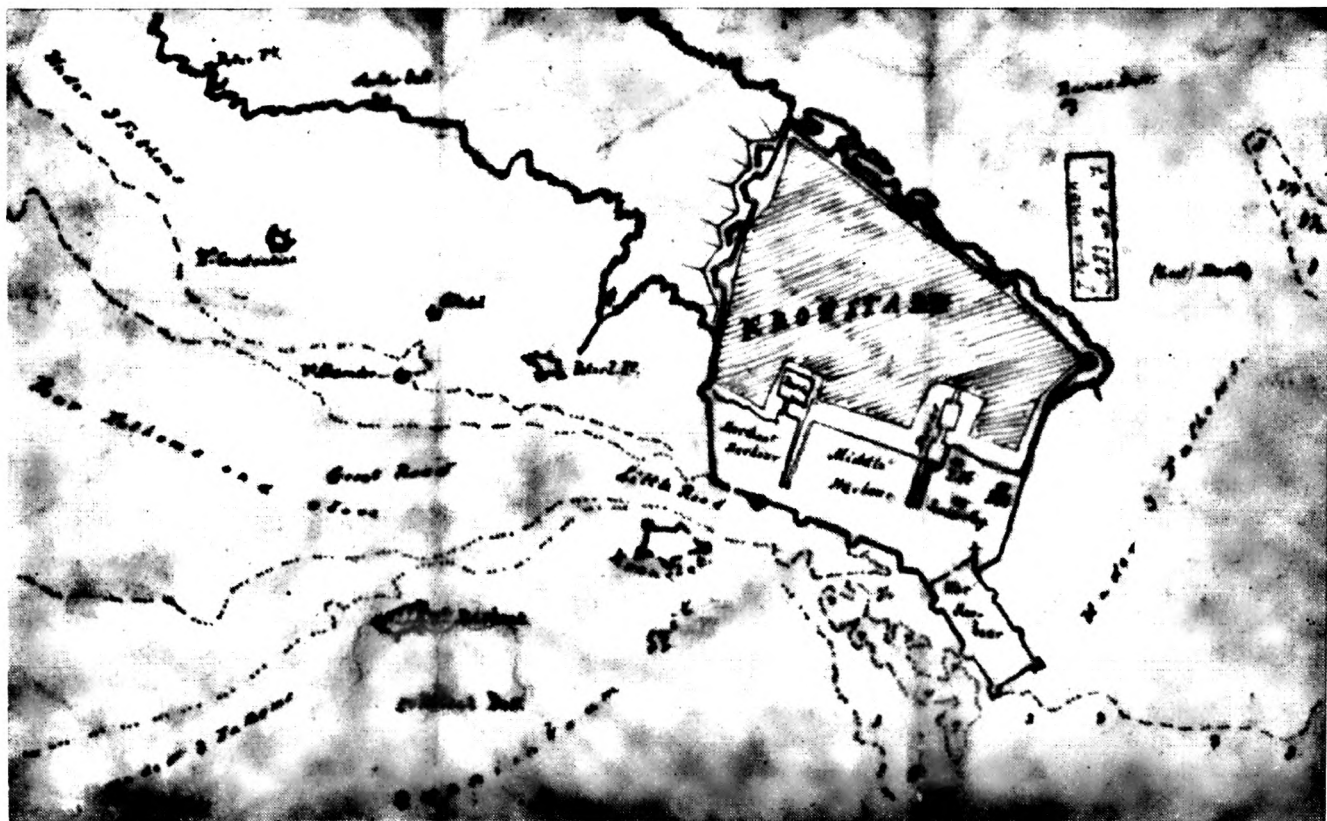
直接掩护小停泊场或者说内停泊场的第三道线，在航道南面是由喀琅斯洛特的第三个（东北的）正面，在航道东面和北面是由商港、中港和军港的垒墙构成的。军港的垒墙同中港的东端形成钝角，它可以用纵射火力控制着整个小停泊场，而商港和中港的南墙则用正面火力掩护它。这两座垒墙都由几座棱堡、垒门和其他凸起部来掩护其侧翼。由于航道在这里的宽度都不超过 250 码，战斗会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毫无疑问，不等到舰船深入这样远，喀琅施塔得就会不得不投降了。

缅施科夫堡垒是第三道线的中央工事和唯一可能实际上起一些作用的工事。它是商港南墙上西起的第一个棱堡。这个棱堡已经改建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塔楼，塔楼上的 44 门火炮分成为上下四层，这些火炮的半数以纵射火力控制小停泊场和大停泊场的大部分，但是另一半从它们的炮眼的方向来看，几乎毫无用处。四层火炮对这个建筑物不很坚固的基础来说是否过于沉重的问题，有待日后再看。

还必须指出，喀琅施塔得的向陆一面是由几个正规的棱堡的正面掩护的，要攻克这些棱堡，就需要组织一次正规的围攻；如果仅仅以舰队为作战基地，在小岛的沼泽地上作这种围攻是有很大困难的。要占领喀琅施塔得，只能从海上进攻。

不言而喻，我们只能根据最近的地形测量和军事报告的材料说明这些永备工事。近几年内也许有了某些变动，但是这些变动未必很大。

现在把上面所说的总结一下。对喀琅施塔得的任何攻击的成败都必须在大停泊场上决定，而在这个地段能有效抵御舰队进攻的工



弗·恩格斯写作《喀琅施塔得要塞》一文时画的喀琅施塔得地形图

事只是亚历山大堡垒、彼得一世堡垒、里斯班克堡垒、喀琅斯洛特堡垒的两个正面、海港的西防护墙和缅施科夫堡垒。它们总共可以用350门火炮同时向进攻的敌人开火,大多数火炮都有防护墙和拱顶作可靠的掩护,并且通过狭窄的炮眼进行射击。其他的炮台,或者是射向对着其他攻击点,或者是没有多大作用,或者是位于目标有效射程以外。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如果舰船本身要遭到来自海港的防护墙上、缅施科夫堡垒和喀琅斯洛特堡垒的侧射,那么能不能通过这条狭窄而复杂的航道调遣足够数量的舰只来对付防御工事的北正面和南正面的炮火并压制住它们呢?也许海军专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除非他们宁愿等待由实战来回答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在海军战术方面的有限的知识,应该说这里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螺旋推进式战列舰的优点能产生帆力舰和明轮式蒸汽舰看来都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再说一遍:喀琅施塔得的最大弱点是那些旧式的堡垒。虽然它们占有最有利的地位,占着可用面积的最大部分,但其火力效果可能是最差的。如果说里斯班克堡垒已经改建,那么彼得一世堡垒和喀琅斯洛特堡垒却仍然很不顶用。它们很容易被打哑,也许甚至被攻克,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被用来轰击该城。但是,舰船只要突入到亚历山大堡垒和里斯班克堡垒一线,就把该城置于射程之内了,如果它们的火力不过多地用以对付各堡垒的话,它们可以给该城造成巨大的损失。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3月底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俄文第2版第10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金融。

——普雷斯顿的骚动¹²⁰

1854年3月31日星期五于伦敦

所得税法案¹²¹通过了。约·帕金顿爵士明确地表示反对,尽管讲得十分乏味,但理由充分,他指出,不久前公布的蓝皮书和机密文件¹²²使人更加看清了财政大臣过去的财政政策。格莱斯顿先生于1853年4月18日提出一个和平预算¹²³,那时他应当完全确信战争已临近。在他发表声明前三天,联合内阁收到罗斯上校的一则消息说:

“缅施科夫公爵还没有让土耳其首相知道他的使命和要求的性质,就硬想得到首相的正式保证:不把缅施科夫的使命和要求泄露给不列颠和法国代表。”^①

联合内阁¹²⁴也从秘密函件中知道了皇帝^②有意除掉垂死的

① 约·帕金顿1854年3月30日在下院的演说,见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第21703号。——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人¹²⁵，以便不让他从自己的指缝中溜掉。这个爱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¹²⁶掌握了这一消息以后，跑出来对议会说：

“如果你们要实行所得税七年，那么我请求前两年每英镑只收 7 便士，其后两年每英镑收 6 便士，而最后三年每英镑只收 5 便士，然后所得税应该完全取消。”

读者想必还记得，格莱斯顿先生认为，所得税是战争的强有力的工具，而在这种和平时期则应予以废除。^①他这样说时已经知道，战争几乎不可避免，而且不到一年就必须把每英镑收 7 便士的税增加一倍。现在所得税是每英镑收 1 先令 2 便士。如果有人告诉我，精明过人的财政大臣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那么我将回答说，上星期一^②国家有价证券已经下跌，因为据证券商说，秘密文件的公布显然证实了沙皇坚决要实现他的计划，对他最肯定的保证也不能相信。“群贤内阁”的成员至少应该有证券交易所的成员那样的洞察力。

在联合内阁的精明博士邓斯·司各脱¹²⁷提出自己的兑换国家有价证券的财政计划时，他不顾已经得到的警告就这样地在“灾难”到来之时准备了国库的空虚。下面各个年份的国库结存是这样：

1844 —6 254 113 英镑	1849 —9 748 539 英镑
1845 —8 452 090 英镑	1850 —9[245 676] ^③ 英镑
1846 —9 131 282 英镑	1851 —8[381 637]英镑
1847 —8 457 691 英镑	1852 —8[841 822]英镑
1848 —8 105 561 英镑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69—76 页。——编者注

② 1854 年 3 月 20 日。——编者注

③ 方括弧里的数字是根据 1854 年 3 月 31 日《泰晤士报》发表的约·帕金顿的演说稿刊印的。——编者注

1853年初，格莱斯顿先生竟巧妙地将国库结存缩减到4 485 230英镑，而且很快就根本不会有结存了，因为这个很有办法的金融家不得不每股按100英镑的价格收回南海公司¹⁰¹剩下的股票，而这种股票在交易所里每股按85英镑都很难卖出去。

联合内阁的这种财政政策完全[适应]内阁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感谢”沙皇让他们了解他的瓜分计划；它完全[适应]内阁的议会政策，——这种政策经常向议会报告与内阁掌握的消息直接矛盾的[消息]；它完全[适应]内阁的军事政策，——这种政策强迫奥美尔帕沙在沙皇作好入侵准备以前不得采取行动，这种政策用轮船调运部队、用帆船调运马匹，把军官留在伦敦，让士兵在君士坦丁堡登陆，认为所有地方中最适于占领的正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敖德萨、克里木、芬兰、多瑙河口或者任何其他对俄国人构成威胁的据点，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打败哥萨克^①，而是为了在这一紧要关头让穆斯林和拜占庭的教士认识西方的法律和公民的平等。

尽管爱尔兰议员强烈反对，下院似乎决定继续审议钱伯斯先生的提案，并指定一个调查女修道院的活动和管理制度的委员会。钱伯斯先生的提案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那些被强行从父母和法定监护人身边夺走的女孩遭到隔离。英国中等阶级一想到女孩子被拐骗到女修道院去的可能性就发抖。但是，最近的一个事例表明，在女孩子们被拐骗去满足贵族的色欲或者供棉纺大王任意玩弄时，他们的正义感却变得非常迟钝。上周一个16岁的女孩子被诱骗离开了父母，进了一家兰开夏郡工厂，被昼夜扣在那里，在那里睡觉、吃饭，如同锁在监狱中一样。当父亲知道他的女儿出了事时，他未获准看望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女儿,而且被警察撵出了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工厂法遭到破坏,人身自由法、规定父亲有权保护自己未成年子女的法律、人身保护法所提供的权利被贬得一文不值。这是一桩粗暴的令人发指的拐骗事件。但是,当这位悲伤的父亲去找治安法官请求纠正时,他们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回答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能为力。”

托马斯·邓库姆先生提交了一份在24小时内有7600多名普雷斯顿市的居民签名的请愿书,控诉该市地方当局在执行维持安宁和秩序法时的所作所为。他声称,复活节假日之后他将立即提出关于成立一个调查此问题的委员会的提案。

“普雷斯顿的鼓动者是此次罢工的真正教唆者,他们妄想组成该地区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并成为工人议会⁹⁷的养父,他们终于被制止了。他们之中约有十余人被治安法官以阴谋罪逮捕、审讯,被保释以后又被送到利物浦巡回法庭受审。”

《晨邮报》这样报道了我因忙于其他的事而没有较早报道的一个事件¹²⁸。对一些领袖进行控告的根据如下:企业主们曾派人去曼彻斯特,说服那里的工人来普雷斯顿。这些工人大部分是爱尔兰人。普雷斯顿人在火车站迎接他们,看到他们悲惨不堪。大约54人被劝说去法默斯-阿姆斯^①,他们在那里一整天受到款待,晚上当他们同意返回时,15000人把他们热烈护送到火车站。其中七人被企业主留下,带回普雷斯顿,为的是证明考威尔先生及其同事搞阴谋。现在如果我们来谈这一事件的[真相],那么谁是真正的阴谋者¹²⁹就毫无疑问了。

1847年普雷斯顿的棉纺大王降低工资时曾郑重答应,只要生意

① 普雷斯顿罢工期间工人委员会的所在地。——编者注

变得兴隆就恢复原工资。1853年是一个繁荣的年度，他们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四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仍在工作的工人捐款支援他们。于是，厂主们共同密谋关闭自己的工厂，而且为了保证这一阴谋得以实现，他们签订契约每人将交付5 000英镑。于是工人们向兰开夏郡的其他城市呼吁，结果他们得到了支援。企业主们四处派遣特使，游说或怂恿其他城市的棉纺大王向自己的工人宣布同盟歇业，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他们不以此为满足，还开始大规模募捐，以对抗工人的类似行动。当发现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以后，他们派自己的代理人四出活动，引诱一些工人及其家属、女裁缝以及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习艺所的贫民来普雷斯顿。他们发现这种补充办法没有尽快出现所期望的效果，就试图挑拨人民破坏社会秩序。他们的卑鄙行动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他们禁止在马什集会，但是人民在黑石山脊以及其他禁止集会的地方举行了集会。他们招来上百名新的警察，让特别警察宣誓到职，调动了消防队，让军队整装待发，而且竟然宣读骚乱取缔令¹³⁰以挑起暴乱。这就是企业主们的阴谋，但是他们丝毫未能得逞。有人却不顾这些事实不控诉企业主搞阴谋而控诉工人搞阴谋。此外，还有一个情况证明企业主犯有密谋罪。某一个工厂的工人复工了。企业主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都要求作出解释。工人张贴通知，说他们在保持一定的工资水平的条件下复工了。企业主委员会威胁要对这家工厂的企业主^①采取措施，要求按照支持企业主同盟歇业的契约支付罚金5 000英镑。厂主于是说了一些直接与工人的通知相矛盾的话，这使企业主委员会退却了。如果说根据法律[签订]这种付5 000英镑的契约是阴谋，那么威胁强迫执

① 约·斯温森。——编者注

行这种契约就更加是阴谋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对工人领袖的起诉书本身是普雷斯顿法院的官员们阴谋制造的。根据《泰晤士报》本身的报道,官员编造并搜集证据,他们用单马车把他们的剩余的奴隶¹³¹不是送往市政厅,因为他们害怕招人注意,而是送到会议室,以便在那里炮制他们的证据,然后在黑夜的掩护下扑向他们选中的牺牲品。

但是,工人既不受人唆使破坏社会秩序,也没有被吓得[听从]普雷斯顿暴发户的指挥,他们的理智使兰开夏郡的这些小拿破仑的计谋破产了。

星期三晚上,在伦敦的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了公开集会,目的是让首都工人阶级有机会说出他们对普雷斯顿厂主的行为的意见。一致通过了以下两项决议¹³²:

“根据英国现任大法官罗尔夫^①男爵以法官的身分对法律所作的如下解释:

如果只说服人们,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除非得到一定的工资才工作,在某种条件下则不工作,并且只使用和平手段而不追求其他目的,那么这种行为不是非法的。

根据以下的情况:

普雷斯顿工人被卷入同自己雇主的冲突已有 30 个星期,他们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完全遵守秩序,以最和平的方式行动;

尽管有这样一些事实,工人委员会的四名^②委员还是以阴谋罪名受到了利物浦巡回法庭的审讯,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们使用暴力和进行恐吓,甚至也没有人在这方面控告他们。

因此,大会认为:普雷斯顿的厂主和官员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他们犯有滥

① 罗·蒙·克兰沃思男爵。——编者注

② 《人民报》上是:“十一名”。——编者注

用权力之罪；他们破坏了法律上的平等，同时也破坏了人身自由，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人民的一致谴责。

考虑到联合王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应用于坚持正义和维护权利，大会决心给目前处于困难条件下的普雷斯顿工人以特别的、经常的支援，诚挚地呼吁所有关心提高劳工地位的人同他们一起支持劳工的最大利益。”^①

伦敦大多数报刊都谴责普雷斯顿企业主的行为，但不是出自正义感，而是出自对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恐惧]。这些报刊担心工人阶级现在开始明白，压迫他们的单个资本家是以整个[国家]机器为后盾，为了打击前者，工人阶级[一定]要惩处后者。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3 月
31 日

载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纽约半
周论坛报》第 92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1854 年 4 月 1 日《人民报》第 100 期。——编者注

弗·恩格斯
俄国军队¹³³

致《每日新闻》编辑

先生：为了弄清我们的敌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对手，现在已经到了应当正视它的时候了。关于俄国实际的军事力量和潜力，众说纷纭。一些人估计过高，另一些人则估计不足，而真实情况看来仍然被帷幕掩盖着，能够揭开这个帷幕的不是什么《揭露俄罗斯的秘密》^①之类的书籍，而只能是现实的军事事件。

不过在我们西方的书刊中有大量只需要加以筛选和综合就可利用的宝贵资料。俄国自己所提供的这类资料也极其丰富。因为俄国的军事著作常常就像使用本国语言那样地使用法语和德语，甚至使用得更多。斯密特少校关于1831年波兰战役的重要著作和托尔斯泰上校关于入侵匈牙利的叙述就是例证。俄军军官用俄文写的军事著作显然比用外文写的著作逊色。米海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和布图尔林关于1812年战役的书，卢基扬诺维奇关于1828—1829年战役的书，以及诸如此类的著作，同我们通常在二流的法文历史著作

^① 查·弗·亨宁森《揭露俄罗斯的秘密》1844年伦敦版。——编者注

中看到的对战争的描写极为相似。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湮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事件的真相按照民族虚荣心的迫切需要被歪曲,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被作者在纸上取得的更大胜利弄得暗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贬低。这里很少有真正的军人所固有的那种认识,即认为战胜勇敢的敌人比战胜胆怯的敌人更光荣;这种认识使得例如威廉·纳皮尔爵士的著作《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成为不止是一个“军官”的而且是一个“绅士”的优秀著作。历史著作中所以存在这种文风,也许应该用必须保持俄国人的黩武热情来解释。但是,一旦作者选用了一种西方语言,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欧洲就要进行判断,而且西方具有的新闻公开性会很快把那些在俄国因为反对者没有答辩权而冒称为绝对真理的种种武断彻底抛弃。颂扬神圣的俄国及其沙皇的倾向依然如故,而手段的选择则越来越受到限制。必须更严格地遵循准确的事实;使用更稳妥的和实事求是的措辞;虽然企图进行通常很快就会不攻自破的歪曲,但至少还有足够的确实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往往使这样的书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此外,如果这本书是一个地位比较独立的人写的,那么它甚至可能是优秀的军事历史著作,斯密特的《波兰战争史》就是这种情况。

俄国军队的构成和编制是全欧洲军界所熟知的。这种编制极其简单——至少“作战军队”是这样,人们很容易了解它。真正的困难只是在于要弄清楚这种编制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这个军队有多少力量不仅存在于纸上,而且可以调去对付外部的敌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俄国军事著作是非常重要的。民族的自豪感不允许它们的作者在敌人取得局部胜利和进行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夸大俄军参战的人数。为了维护俄军的声誉,他们不得不揭示

俄军的实际兵力和正式公布的兵力之间的差额。在这方面，引用了官方花名册的斯密特的著作特别有用。相反，完全符合俄军在匈牙利的行动方式的托尔斯泰的《匈牙利战役》，看来，与其说是打算显示随时准备扑向革命西方的俄军的勇气，不如说是要显示它的有威胁性的优势兵力。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少有点把握可以判断至少是那部分直接威胁欧洲其他地区的俄国军队，那么要弄清楚舰队的真实情况就要困难得多。以后我们将收集我们所能找到的一切情报，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某些更加准确的情报，直到“查理”^①提供关于舰队的较精确的情报或寄来几个可供深入研究的典型事例。

要了解像俄国这样的国家的筑城工事系统，以及预设的防御和进攻的作战地区，当然是很困难的。海岸防御工事在某种程度上已在地图和平面图上作了标记，由于其本身的特点，把它们完全隐瞒起来是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虽然有许多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详情很少为人所知，却不大像某些人所感觉的那样神秘。但是，关于波兰的筑城工事，那些堡垒群——它们的存在本身暴露了进行进攻性战争和征服性战争的企图——，除了它们的建筑地点，人们知道的情况很少。欧洲的某些军事机关可能已用黄金从俄国官员那里得到了这些堡垒的平面图；如果真是这样，它们也不会把情报公开。如果波兰侨民能够弄到这些平面图——这对他们来说不应当是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把这些平面图公布出来就会使俄国受到比他们曾经造成的危害更要大得多的危害。

俄国军队由四大部分组成：作战大军，它的预备队，特种部队和

^① 海军上将查·纳皮尔。——编者注

地方部队,哥萨克(包括一切非正规部队而不管其来历如何)。

俄国所处的特殊条件要求一种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军事编制完全不同的军事编制。在东南方,从太平洋到里海,它的边境由沙漠和草原守卫着,只会受到杀人越货的游牧部族的攻击,在这些地方对付这些人,最好是使用大体与之相似的部队;在高加索,它必须同顽强的山地部族打仗,同他们斗争的最好方法是把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明智地结合起来;它的西南和西部边境,要求有一支按照欧洲最正规的编制建立起来的、用它可能不得不与之作战的西方军队的同等武器装备起来的大军直接参战。但是在一个资源只得到部分开发的国家里,不可能经常按照战时编制保持这样一支军队,因而一部分士兵不得不休假回家充当准备作战的预备队。俄国军队的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组成的。

俄国军队的这种编制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瓜分波兰⁸²时期,经过以后几次瓜分波兰、征服黑海、同法国的几次大战而逐步得到发展。1830年波兰革命后,它达到了现在这样的完善状态。

作战大军几乎全都配置在俄国的欧洲边境上,它主要是瓜分波兰、同法国的战争和波兰革命的产物。它的双重任务是:保持对帝国西部比较文明的和非俄罗斯的部分的统治;对西欧摆出乌云压顶之势,准备随时电闪雷鸣般地进行突然袭击。过去这项任务完成了多少,或者不如说有多少没有完成,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当前的战争中,这项任务能够完成多少,我们很快就要进行研究。

作战大军或现役陆军(作战部队)^①由11个军组成:1个近卫军,1个掷弹兵军,6个步兵军,和3个预备骑兵军。

^① 括号里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词汇。——编者注

全部编制都是拿破仑所实施的体制的翻版。上述的前8个军正好相当于法国在伟大战争期间的军。近卫军和掷弹兵军看来是要专门用于建立总预备队,骑兵军则计划用来发挥某些特殊的决定性作用,为此,当年拿破仑总是握有大量这种部队和炮兵作为预备队。这样,上述的前8个军虽然名为步兵,但由于它们本身的编制,全部配备了骑兵和数量众多的炮兵。每一个军都有配备齐全的司令部、工兵、运输浮桥和弹药辎重队、炮场和独立作战的军队所需的其他一切装备。近卫军和掷弹兵军的步兵力量比其他几个步兵军弱,每个团只有3个营而不是4个营。另一方面,近卫军的骑兵和炮兵的力量相当强大,不过预计在战斗队形中,它们的大部分将并入骑兵和炮兵的总预备队。第一骑兵军和第二骑兵军全部由重骑兵和马匹牵引的炮兵(正规的轻骑兵配备给步兵军)组成;第三骑兵军或龙骑兵军有特殊的编制,因为这些龙骑兵像以前一样既要用于步兵作战,又要用于骑兵作战,所以他们组成各兵种的预备队,同时具有骑兵所特有的机动性和运动速度。这一点能否做到还有待证实;所有其他军队几乎全部和普遍把龙骑兵变为普通骑兵的经验,是一种不大有利的征兆。上述思想甚至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无论龙骑兵军和近卫军营都配备骑工兵、地道兵和架桥队,俄国制度的崇拜者大肆赞扬的这项规定,现在也同样需要实际经验来检验。

可以补充一点:这种包括师、旅、团的11个军的编制不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也不单纯是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相反,上一次土耳其战争^①,波兰战役,入侵匈牙利,以及现在同土耳其的战争都表明:和平时期的部署完全着眼于战争,以致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向边境调动,

① 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编者注

都不需要把一个师、一个旅或一个团从一个军调配给另一个军。这是一种巨大的军事优势,是俄国人向来几乎总是处于临战状态的结果。其他一些比较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临战时发现,它们的军事机器的每一个轮子和滑车都已经生锈,全部传动装置都运转不灵。不管军、师、旅的编制看起来多么完善,都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以便尽快把军队调往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司令、将军和参谋人员都要重新任命,要把一些团从一个旅调到另一个旅,从一个军调到另一个军,以致当军队集结起来去打仗时,指挥官是七拼八凑的,他们一般互不相识,既不了解自己的上级,也不了解自己的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都会强烈感到虚荣心受到刺激;但是只好指望这个崭新的机器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这无疑是一种劣势,尽管这种劣势的影响在西方的军队里比在俄国军队里要小得多。只有经常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才能避免这种劣势(从1848年起奥地利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因此它的各个军也有相当稳固的编制);但是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较高水平,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会使它们的文明发展要求可能给它们带来的这种劣势和任何其他劣势得到弥补。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4月
3—11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7年俄文第2
版第44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 洲 战 争¹³⁴

在昨天早晨到达的北极号带来的欧洲消息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证实了俄国人以将近5万人的兵力,编成3个军,在哥尔查科夫公爵、吕德尔斯将军和乌沙科夫将军直接指挥下强渡多瑙河下游,并占领了土耳其多布罗加地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属于保加利亚省,是一个狭小的平原,它西面和北面由多瑙河环绕(多瑙河在切尔纳沃德向北弯转,在到达河口前形成一个大河湾),东面是黑海。这个地区大部分是沼泽地,并且经常闹水灾。这里构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如:巴巴达格、伊萨克察、默钦、图尔恰的工事,有消息说它们已被俄军占领。但是,本报的消息灵通的伦敦通讯员认为这只不过是证券投机商的臆造。在多布罗加平原和土耳其内地之间伸展着作为屏障的巴尔干山脉。俄国人并没有比这次行动之前更加接近君士坦丁堡,也没有由于这次行动而对土耳其人取得更多的优势。实际上很显然,这是一种纯粹防御性的行动,这只说明他们打算撤出瓦拉几亚最西部的地区。他们在瓦拉几亚的全部兵力为7个步兵师,1个留驻在伊兹梅尔的后备师,而在它们的后面有由3个师组成的切奥达耶夫军,目前这个军可能已开抵雅西。8个师加上骑兵大概不过11万人。如果注意到英法的一个军可能在黑海西北岸登陆,给俄军后方

造成威胁,那么很显然,夺取多布罗加的目的是在尽量少丧失地盘的情况下保障俄军翼侧的安全。在这里要保证使他们免遭切断危险的态势只有两种方法,或者径直向塞雷特河地区退却,使多瑙河下游成为一道以福克沙尼、加拉茨和伊兹梅尔为据点的防线;或者完成到多布罗加的突进,把他们的前线移至库斯坦杰、赫尔绍瓦、奥尔泰尼察和布加勒斯特一带。这样,图拉真垒墙、多瑙河、阿尔杰什河就成为第一道防线,布泽乌河成为第二道防线,塞雷特河成为第三道防线。毫无疑问,后面这个计划是最好的计划,因为他们在一侧放弃了地盘,却在相反的一翼赢得了新的地盘,使退却成为向前推进,而且还保持了俄军的军事声誉。占领多布罗加会缩短俄军的战线,即使敌军在阿克尔曼或敖德萨附近登陆,也使俄军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向德涅斯特河畔的霍京撤退。不过,关于导致俄军态势发生这些变化的种种机动的详情还需要继续等待。

其次,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希腊王国将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支持希腊人的暴动,国王和王后^①已到边境去鼓励暴动者。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希腊和得到联军支持的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已经几乎不可避免,这即使不会大大加剧普遍冲突的危险,也会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沙皇本人通过普鲁士提出了新的和平建议。¹³⁵尼古拉提出,如果同盟国能使土耳其颁布完全解放其全体基督教臣民的法令,冲突就可以解决。在那种情况下,他将在联军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时着手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如果这些条件早一些公开提出,就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毫无

① 奥托一世和阿马利亚。——编者注

疑问,那种解放正是同盟国所希望的,并且由于苏丹政府的两位要员^①拒绝接受甚至部分的解放,苏丹^②已不得不将他们免职。¹³⁶但是,现在这种建议恐怕已经不能防止战争了;因为已向联军舰队增派了一支法英军队,而在新的命令发出和到达之前,查理·纳皮尔爵士大概已经攻打并夺取了奥兰群岛。不过,也许这一建议的意义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毫无疑问,我们从下一班轮船将得到关于这件事的详尽的消息。

在整个这种头绪纷繁和捉摸不定的形势中,看来只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这个伊斯兰强国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在走向灭亡。土耳其基督徒的解放,不论是通过和平让步还是诉诸武力,都会使伊斯兰教从一种政治权力降格为一种宗教教派,并彻底破坏奥斯曼帝国的旧基础。这样不仅会完全证实沙皇关于奥斯曼帝国已病入膏肓的论断,而且还会为了治病切断病人的咽喉。在这次手术之后,苏丹可能在政治上形同虚设而仍留在自己祖先的宝座上,但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却需要到别处去寻找。为什么俄国专制君主会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自己的西方敌手悄悄地解决问题,原因十分清楚。他想要在土耳其尽可能实现最彻底的革命,而且使这种革命完全服从于他的利益。在现存的统治权力被这样摧毁之后,沙皇同这个国家的正教会的关系以及同斯拉夫人的关系实际上会使他握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将得到牡蛎肉,而西方各国政府则不得不满足于牡蛎壳。这样的结局是可能的,虽然现在看来似乎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信,还有相当多隐蔽的因素,它们即

① 利法特帕沙和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编者注

②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刻就要闯进来,以便对这次伟大斗争的发展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沉寂已久的欧洲革命将发挥多大的领导作用乃是本半球的政治家们正在竭力回避的问题,然而尽管他们感到不快,人们还是很快就会提醒他们注意这个问题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4月3—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4月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议会的战争辩论¹³⁷

1854年4月4日星期二于伦敦

英国悲剧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这使法国人如此地反感,以致伏尔泰曾经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¹³⁸。但是莎士比亚从来没有把念英雄剧的开场白的任务交给丑角。这个发明留给了联合内阁。阿伯丁阁下扮演的角色就算不是英国的小丑,至少也是意大利的潘塔隆。眼光短浅的人以为,一切伟大的历史运动好像终究都会变成滑稽戏,或者至少变成平庸的事。但是这样来开场,正是一出名为《对俄战争》的悲剧所独具的特色,这出悲剧的开场白已经于星期五晚上在议会两院同时朗诵了;两院同时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内阁对女王陛下诏书的复文,打算在昨天午后把这个复文呈交端坐在白金汉宫宝座上的女王。上院的情况用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克拉伦登勋爵阐明了内阁的观点,德比勋爵阐明了反对派的观点。一个讲的是执政者的话,另一个讲的是在野者的话。

阿伯丁勋爵,这位领导政府的高贵的伯爵,这位沙皇的“厉害的”亲信,路易-菲力浦的“可爱的、真挚的、卓越的”阿伯丁,庇护九世的

“尊敬的绅士”，虽然在结束他的说教时用的是通常的哀求和平的声调，但是在他发言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再引得议员们哄堂大笑，因为他不是在向俄国宣战，而是在向伦敦的一家周报《新闻报》宣战。马姆兹伯里勋爵反驳了高贵的伯爵；被威廉·科贝特称为“愚蠢的老妇”的布鲁姆勋爵发现，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并不轻松”；本着自己的基督教精神设法把不列颠的殖民地变成惨绝人寰的地狱的格雷伯爵，竟提醒不列颠人民说，谈论战争时的声调和情绪以及对沙皇和他的哥萨克表现出的敌意，是不符合一个基督教民族开始战争时所应有的精神状态。哈德威克伯爵认为英国所拥有的手段不足以和俄国海军相抗衡；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兵力不应当少于 20 艘装备齐全、士兵满员和船员训练有素的战列舰，而且不应当像过去那样用一伙刚刚招募来的士兵去作战，因为作战时在战列舰上的这样一伙人是最糟糕不过的。兰斯唐侯爵出来为政府辩护，他希望战争很快结束并且取得最后胜利，因为（这足以表明这位高贵的勋爵的想象能力的特征）“这并不是一场会引起极严重后果的和极难结束的王朝战争”。

经过这场愉快的、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的谈话，对女王诏书的复文便无异议地被通过了。

我们从这次谈话中所获悉的新消息仅限于克拉伦登勋爵的几个官方声明和关于 1844 年的秘密备忘录的来历。克拉伦登勋爵声明，“当前同法国达成的协议只限于交换纯属有关军事行动部署的照会”。因而，目前英法之间不存在任何条约。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他说，前者将保持武装中立，而后者将保持完全中立，但是“在这样一场即将在两国边境爆发的战争中，两国都不可能保持中立”。最后，他声明说，“如果能够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享有平等权利和自由”，即将来临的战争结束时所获得的和平才是光荣的和平。

我们知道,谢赫^①由于拒绝作出判决来批准承认权利平等的条约已经被撤换了;君士坦丁堡的老土耳其居民非常愤懑;而从今天收到的电讯中我们得知,沙皇已向普鲁士声明说,如果西方强国能够迫使土耳其政府接受这种条约,他就准备把自己的军队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他所希望的只是推翻奥斯曼的统治。如果西方强国打算代替他去做这件事,他自然也不会冒失得同它们打起仗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秘密备忘录的来历,这是我根据德比、阿伯丁、马姆兹伯里和格兰维尔等人的发言综合出来的。备忘录“应当是俄国、奥地利和英国之间为了对土耳其问题作出某种安排而达成的临时的、有条件的和秘密的协定。尽管根本没有取得法国的同意,法国却必须赞成这种安排”。马姆兹伯里勋爵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这个备忘录:它是沙皇、阿伯丁伯爵、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之间秘密磋商的结果。正是听了阿伯丁的忠告,沙皇才同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进行商量。在阿伯丁勋爵和他的反对者之间存在这样一个争议的问题:这个备忘录是沙皇于1844年访问英国回到圣彼得堡后由涅谢尔罗德伯爵拟定的呢,还是作为对皇帝通报的笔录由英国大臣们自己拟定的。

阿伯丁伯爵与这个文件的关系,同一个大臣与一个官方文件的普通关系不同,这一点,按照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说法,可以由另外一个没有提交给议院的文件来证明。这个备忘录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不应当让其他强国知道,尽管阿伯丁肯定地说,他已经把它的“实质”通知了法国。对此沙皇无论如何是一无所知的。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赞同并批准了备忘录。备忘录并没有通知皮尔内

① 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编者注

阁和提交内阁讨论,当时德比勋爵是这个内阁的成员之一。备忘录没有和外交部的普通文件放在一起,而由历任外交大臣亲自保管,在外交部也没有任何副本。德比勋爵虽然在1844年是皮尔内阁的成员,但是他在就任时根本不知道关于备忘录的事。阿伯丁伯爵离任时把装有备忘录的小匣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后者又把潘多拉的盒子¹³⁹交给了他的继任人格兰维尔伯爵,而格兰维尔伯爵,据他自己说,他是根据俄国大使布伦诺夫男爵的要求在马姆兹伯里伯爵就任外交大臣时把这个盒子交给了伯爵。但是,这时文件上原来的签署看来是被更改了,或者确切地说,被贗造了,因为格兰维尔伯爵在把它交给马姆兹伯里伯爵的时候说明,这是作为俄皇、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勋爵磋商的结果而由布伦诺夫男爵拟定的备忘录,根本没有提到威灵顿公爵的名字。这种不正确的说明,除了企图把备忘录说成只是大使的普通札记,而不是从圣彼得堡总理办公厅发出的正式文件,以便抹煞它的重要性之外,想不出有其他任何动机。

俄国对于这个文件非常重视,在马姆兹伯里勋爵就任48小时之后,布伦诺夫男爵就拜访了他,并问他是否读过这个文件。但是马姆兹伯里当时还没有读过,因为文件在几天以后才交给他。布伦诺夫男爵向他力陈阅读这个文件的必要性,他说,这个文件是理解同俄国的一切谈判的关键。然而,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德比政府的成员谈过这个文件,显然他认为托利党政府太软弱太不稳定,不能执行俄国的政策。1852年12月德比政府辞职了,1月11日,联合内阁成立的消息刚刚传到圣彼得堡,沙皇就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足以证明他认为群贤内阁¹¹愿意根据这个备忘录行事。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最权威的见证人——他们都担任过大不列颠的首相或外交大臣——在上院作了最有损政府名声的揭露。

备忘录中说的“约定的义务”是某个英国外交大臣同俄国秘密商定的，不仅未经议会批准，而且也瞒着他自己的同僚，其中只有两个人晓得这个秘密。这个文件十年来都没有交给外交部，而由历任外交大臣秘密保管。每当一个外交大臣退出舞台的时候，俄国大使就出现在唐宁街，并通知继任人说，他必须仔细研究一下协定——根本不是由国家的合法代表，而是由内阁的某个大臣和沙皇签订的秘密协定，并遵循圣彼得堡总理办公厅拟就的俄国备忘录所规定的行动路线。

如果这还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如果这还不是阴谋和叛国，如果这还不是同俄国串通，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些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同时，从这些揭露中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罪犯们太平无事，他们虽然被证实犯有同俄国不断密谋的罪行，却能够在同俄国公开作战时继续掌握着政权；我们还知道，为什么议会反对派纯粹是只想打扰他们而不想控告他们的骗子。1844年以来的历任外交大臣，以及历届政府都是同谋犯，自从他们不去控告自己的前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那个神秘的小匣的时刻起，他们就成了同谋犯。单是掩盖秘密这一点就使他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对议会隐瞒阴谋使每一个人都成了阴谋的参加者。法律认为窝主与盗匪同罪。因此无论怎么审判，不仅联合内阁，还有它的对手，不仅现任的大臣们，还有他们所代表的议会党派，不仅这些党派，还有英国的统治阶级都会陷于毁灭。

顺便指出，在上院中唯一值得提及的发言是德比伯爵的发言；但他对备忘录和秘密往来的函件的批评——关于下院的辩论情形我也可以这样说——并没有超出我以前在详细分析这个致命的备忘录和这些绝非寻常的往来函件时^①所谈到的那些内容。

^① 见本卷第149—160、161—178页。——编者注

“宣战权——这是国王的特权，真正的特权；女王陛下如果召集议会并通知他们说，她认为必须进行战争，那么这就不是下院讨论战争是否失策的适当时机。在这种情况下，议院的职责就是团结在女王周围，并利用以后的一个适当的和符合宪法的时机来讨论导致战争的那项政策。”

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的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下院全体议员也是这样说的，而现在《泰晤士报》用了整整十七栏的篇幅来刊登对这项政策的评述。为什么？正因为这不是“适当的时机”，因为他们的空谈总是毫无结果。然而，莱亚德先生应当算例外，这位先生直截了当地声明：

“如果议院听取他的意见后确认，大臣们的行为使议会会有必要提出质问，那他不会推诿由此而承担的义务，并准备请大臣们早日指定时间让他提出质问。”

现在你们该明白，为什么《泰晤士报》要开始怀疑莱亚德先生的亚述发现的真实性了。¹⁴⁰

约·罗素勋爵在下院宣读了对女王诏书的复文，他和克拉伦登勋爵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当他读到完整、自由、独立、文明等字眼时用了一种特殊的声调，这种声调使他博得了比较普通的听众的掌声。

莱亚德先生在回答时犯了两个极大的错误，使他本来非常精彩的发言的效果遭到了损害。第一，他企图证明在联合内阁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因素——俄国因素和英国因素，阿伯丁派和帕麦斯顿派，其实这两个派别除了向俄国阿谀逢迎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方式以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区别。一派领袖不了解俄国，所以拥护俄国，另一派领袖虽然了解俄国，但还是拥护俄国。前者因此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而后者则是它的秘密代理人。前者因此是无偿地为俄国效劳，而后者则是有报酬地为俄国效劳。前者的危险性比较少些，因为他公开违背英国人民的感情；而后者则会造成致命的祸害，因为他把自

己装成对俄国的民族仇恨的体现者。至于莱亚德先生，我们只好假定，他不了解他认为是同阿伯丁对立的那个人。而对于运用这种对比的迪斯累里先生，这种原谅就不成立了。没有人比这位反对派领袖更了解帕麦斯顿勋爵，他还在 1844 年就声明过，对英国的利益说来，从来还没有一位大臣的外交政策比这位高贵的勋爵的政策更具有危害性。莱亚德先生的第二个错误是，他硬说《泰晤士报》是地地道道的阿伯丁派机关报，因为《泰晤士报》在秘密往来的函件到后两三天就用其中的材料撰写社论，企图说服全国同意在圣彼得堡策划的无耻勾当，其中最突出的是去年二三月间所登载的那些社论。如果莱亚德像帕麦斯顿勋爵那样，认定这些材料是俄国驻伦敦大使馆提供的，那他会做得好些，他就有可能同时指控《泰晤士报》和外交部都是圣彼得堡内阁的机构。

我认为，《泰晤士报》实际上比联合政府更有力量，不是由于它所持的见解，而是由于它所披露的构成这些秘密函件的叛国性质的事实，因此我把莱亚德先生谴责这家报纸的声明全部转引在这里。

“第一份密件英国是在 1853 年 1 月 23 日收到的，当月 26 日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本人所提到过的那些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份密件是在 1853 年 2 月 6 日收到的，当月 11 日，即四天以后，《泰晤士报》上又发表了本人现在要引用的一篇专论，其中的一段说：‘我们并不认为，俄国的目的或政策是加速东方的一场灾难；英国将再度诚挚地为缓和一触即发的危局而效劳。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要延长土耳其人在欧洲的粗野和衰朽的权力，就得付出代价，把发达的省份和众多的基督教居民交给野蛮的暴政；如果文明和基督教能够补偿奥斯曼的征服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将感到高兴。’

此外，1853 年 2 月 23 日的《泰晤士报》在对土耳其的衰竭状况作了种种评论后声称：

‘土耳其政府政治上极端衰朽，现任统治者中根本没有能干的和正直的人才，穆斯林人口日渐减少，国库已趋空虚，同时它又统治着南欧某些最肥沃的区

域,最优良的港口和最奋发有为、聪明睿智的人民,这形成了某种可笑的对照……很难了解,这样巨大的无可置疑的罪恶竟然能够在如此长久的时期内被政治家们当作相对的善良而加以保护;尽管我们也知道在如此庞大的帝国的领土上进行任何变革都会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看到(不是惊惶不安地而是满意地看到)一个时期的来临’——《泰晤士报》从何得知这个时期即将来临呢?——‘那时候像土耳其政府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继续统治像它现在统治着的这样的国家了。或许,这个时期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遥远;或许,明智的国务活动家应当准备对付这种他们无法继续无限期地推迟的结局了。我们并不认为而且也无意暗示,奥地利和俄国目前已经有了任何一种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要求的计划,或者可能会背着其他欧洲强国制定这种计划。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当《泰晤士报》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缅施科夫公爵作为特使从圣彼得堡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所负的特别使命是代表尼古拉皇帝声明,他作为正教首脑不能接受也不允许东派教会接受不久前法国大使所得到的关于圣地上的圣殿问题的敕令所规定的条件。’

关于缅施科夫公爵使团的第一个消息包括在2月14日和21日收到的汉·西摩尔爵士的紧急报告中。必须指出,1853年3月6日又接到一份紧急报告,谈到了俄皇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全盘计划。前面已经指出,对这个紧急报告的答复直到3月23日才送出;3月13日以前内阁一次会议都没有举行,虽然政府的某些成员七天前就已收到了皇帝的建议。这个建议直到3月13日才交给他们的同僚,然而却早就交给了《泰晤士报》,因为在3月7日,即在接到紧急报告后的第二天早晨——当时除了两三位内阁成员以外不可能有人知道这份报告,外交部的职员也根本不可能见到,——在《泰晤士报》上就发表了一篇专论,(听啊!听啊!)其中提到:

‘对于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和欧洲强国同东方的关系这些问题,善于思考的政治家和独立自主的报刊或许应当认真想一下并表述自己的意见,尽管这些意见所指出的实现相应的计划现在还不受欢迎,还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国务活动家不得不处理日常事务,不得不经常认清所谓国家必要性的职责,因此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一种新的或独创的思想事先没有被公众的头脑和理智所接受,他们大概也就不能把它付诸实施。’

恳请高贵的勋爵注意下面的一些话,因为这些话同勋爵提出的反对意见有关:‘因此,我们丝毫不感到惊奇,约翰·罗素勋爵在提到不久前在土耳其,特别是在它的欧洲边境发生的争端时,竟表示不同意近来人们对这个问题所提出

的那些观点,而且在议会中以一个官方负责人的庄重态度重复了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古老的神话。但是,我们却不受这类意见的影响。’

该文作者怎样知道高贵的勋爵不同意呢?(听啊!)文章继续写道:

‘因此,我们不同意约·罗素勋爵的意见,好像除了必须考虑在土耳其帝国被瓜分的情况下应当做些什么而外,对于欧洲说来目前不可能有更大的灾难。’

希望议院注意下面这段话,因为它们和俄皇的话几乎如出一辙:

‘我们认为,如果在作出这样的考虑以前就开始分割土耳其,这将是更加大得多的灾难。’(听啊!听啊!)这些话简直是一模一样的。该文作者继续写道:

‘我们在这里只能表示惊奇,一个国务活动家竟能一时把在土耳其帝国一旦崩溃时应当奉行的政策和导致瓜分波兰的政策混为一谈。毫无疑问,关于国家必要性的论据对于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和独立依然是有效的。但是这种论据面对着许多否定因素,它实际上只是意味着害怕去解决重大和复杂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成见十分奇怪,近年来尤其变本加厉,以致连讨论问题本身的尝试在某些人士看来都是政治腐化的行为和对各个国家赖以联系的一切法律的破坏。’

下一篇文章发表于3月10日。也许议院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明《泰晤士报》撰稿人一字不差地使用了紧急报告中的用语;而现在将要读到的文章会消除在这方面的任何怀疑。3月10日《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缅施科夫公爵此行负有更明确的外交使命。我们有理由认为,比起莱宁根伯爵得到的指令来,缅施科夫公爵得到的指令带有比较和解的性质。’

类似的词句在汉·西摩尔爵士2月21日的紧急报告中可以找到:

‘那位阁下(涅谢尔罗德伯爵)希望使我确信,缅施科夫公爵将接到的指令带有和解的性质。’

文章继续写道:

‘我们敢说,当代国务活动家往往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当他们不得不处理某些大地方的文明、恢复基督教曾经一度在全欧洲享有的优越地位、保证千百万人的日益增长的福利的问题时,他们能够同意的唯一权宜之计就是,用缠头把土耳其人打扮起来,并继续认为它仍然是力量和绝对权力的象征。’

3月19日内阁举行了会议,讨论了3月6日收到的紧急报告,3月23日发出了对紧急报告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女王陛下政府不得不坚持约翰·罗素勋爵2月9日紧急函件中所制订的原则和政策,但仍然乐于赞同皇帝

进一步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愿望。’

当天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可以找到克拉伦登勋爵的紧急函件中的一些句子，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们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现状及其前景的看法同约·罗素勋爵所持的和他告知下院的观点不一致。我们的看法同我国过去在某些场合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不同，也同大多数伦敦报刊并不那么出色地或成功地加以维护的体系根本不同。’

不列颠报刊可以引为光荣的是，尽管没有那种曾经动摇过殖民大臣的地位而且几乎把内阁推翻的犀利文笔，然而它没有支持《泰晤士报》的观点。《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的末尾写道：

‘他（皇帝）曾经声明说，他所希望的是同我国保持良好关系和博得我国的信任。他在这方面的行动将是对他的保证的考验；而且他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像以往一样继续同不列颠政府合作的态度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他对土耳其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温和态度和善良愿望。’

就在《泰晤士报》宣布它企图使不列颠公众容忍瓜分土耳其的一番努力没有成功的那一天，拖延了整整 16 天的对紧急报告的答复送到了圣彼得堡。（听啊！听啊！）没有必要再从《泰晤士报》上摘录一些引文来麻烦议院了。”^①

布莱特先生支持科布顿先生，为的是使帕麦斯顿勋爵能再次用咒骂俄国和假殷勤地维护战争政策的办法来为自己博得声誉。帕麦斯顿在发言中的一个地方说：

“但是，我想，凡是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密切关注欧洲事态发展的人都知道，俄国对土耳其的观点不是昨天也决不是不久以前形成的。（听啊！）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俄国坚定不移的政策就是争取至少占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随后再占领它的亚洲部分。这个政策始终如一地坚持执行着，从来没有被忽略过。遇到机会就前进，遇到阻碍就后退，但这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下一次机会。（听啊！听啊！）拖延日期决不是安抚俄国并促使它放弃自己计划的妥当办法。

^① 奥·亨·莱亚德 1854 年 3 月 31 日在下院的演说，见 1854 年 4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1704 号。——编者注

它的政策就是始终不忘一个目标——不匆忙行事，不因过早地掠取它窥伺的东西而失去目标，但密切注意其他欧洲国家政府的路线并利用可能出现的每一个机会朝着它妄想达到的终极目标迈进，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①

如果把帕麦斯顿勋爵的这个声明同他在 1829、1830、1831、1833、1836、1840、1841、1842、1843、1846、1848 和 1849 这十年发表的声明对照一下，那么就可以看出，这次声明与其说是对布莱特先生的回答，不如说是对他自己过去的政策¹⁴¹的回答。但是，正当这个狡猾的敌人用对俄国的猛烈攻击来获得公众的同情的時候，另一方面他又以下述意见来博取沙皇的欢心：

“先生们，难道我因为俄国政府奉行这样的政策而指责它吗？用合法手段执行的扩张政策是这样一种政策，你可以认为它对你说来是危险的而谴责它，你可以认为它是有损其他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的政策而反对它，但是只要执行这个政策时使用的光明正大的、不加掩饰的和公开承认的手段，不隐瞒，不规避，不欺骗，这种政策就不能成为谴责奉行它的政府的理由。可是，我很遗憾地说，俄国政府在最近各项事务中所奉行的路线，不是那种能够证实它是公开承认和大胆宣布自己政策的公开明确的路线。”^①

但是，正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的那样，对俄国政府可以提出的唯一责难，恰好就是它的无可救药的坦率。因此，帕麦斯顿是通过仅仅指责俄国没有做的事情，来充分证明它实际上已做了的事情是正确的。

迪斯累里先生对秘密文件提出的批评像往常一样是聪明的，但并未达到目的，因为他声明说，批评是不合时宜的，他之所以要向议院发表演说，唯一的目的是支持对女王诏书的复文。令人懊丧的是，

^① 亨·帕麦斯顿 1854 年 3 月 31 日在下院的演说，见 1854 年 4 月 1 日《泰晤士报》第 21704 号。——编者注

像他这样一个天才人物竟然出于地位和党派政治策略这样卑鄙的动机不仅在议会中,而且在自己的颇负盛名的报刊《新闻报》上向某一个帕麦斯顿大献殷勤。

在昨天的议院会议上,詹·格雷厄姆爵士说,已接到关于舰队驶入黑海,正在瓦尔纳附近的消息。

阿伯丁勋爵在上院说,他打算在本月 11 日(星期二)建议议院会议延期到本月 27 日(星期四)举行。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4 日

载于 1854 年 4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5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俄国和德意志大邦。
——谷物价格¹⁴²

1854年4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克拉伦登勋爵昨晚在上院宣称，“他有理由认为”有4 000名俄军从敖德萨乘运输船出发在多布罗加登陆的消息是不确实的。他不知道俄国舰队已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几乎一直是处在英国或法国蒸汽舰的监视之下。关于传说联军舰队没有行动的问题，他不得不说：只有投入整个联军分舰队，才能对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进行封锁，但在气候恶劣的时期，这样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他认为，让舰队停泊在贝科兹是明智的。《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同意克拉伦登勋爵的这种见解，此外，还提示了他提出这种策略的真实原因。自从关于“解放基督徒”的谈判公开以后，担心君士坦丁堡发生暴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了。因此，在有足够的陆军，即一支足以平定土耳其人的陆军到达以前，把舰队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极其“不明智的”。

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宣称，希腊人的暴动应由雅典宫廷负责，因为它起初是秘密地，而现在则公开地支持暴动。

这个星期议院的辩论，除了对穆尔先生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任命亨·斯托纳为维多利亚殖民地法官一事的建议的争论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据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这位斯托纳在1853年斯莱戈选区选举时犯有贿赂罪，议院决定成立这个专门委员会。不过，对斯托纳先生的追究只是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已经分裂的爱尔兰旅的两个派别¹⁴³之间斗争的一种借口。至于格莱斯顿先生的伪装神圣的党羽和他的皮尔派拥护者们被吸引和卷入这出爱尔兰丑剧中的程度如何，这可以从《晨邮报》的下述评论中看出来：

“在所提交的信件、传布的流言和最近几个星期向议会委员会提出的证据中，有许多令人非常怀疑的地方：参加联合内阁的皮尔派在前些时候不断雇用一些代理人来影响爱尔兰许多地区的选举，并且为此提供大量金钱。名声特别坏的是纽卡斯尔公爵……可以肯定，曾举行过（看来是根据他的指示）一次会议来讨论提拔那些搞选举工作的人员的问题。”

《每日新闻》今天发表了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不过其内容只是有关军事行动的协定。西方强国非常注意在条约中不写明自己“援助苏丹”的真正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他的威胁性机构就地强加于人的，可是却被说成是土耳其政府的自愿行动。

梅克伦堡公爵前往柏林的和平使命，除了给普鲁士国王多添一个疏远西方同盟的借口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我接到来自柏林的消息，说俄国只有在国王保证重新命令瑞典港湾司令遵守旧的规定，即在海岸炮火射程内至多允许四艘外国军舰抛锚停泊的情况下，才同意承认瑞典的中立声明。这个命令同瑞典和丹麦一致同意的中立的条款有重大的差别，因此预计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西

方国家之间将重开谈判。斯德哥尔摩正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俄国人将不再占领奥兰群岛，将拆除自己在那里的工事，并且运走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今天接到的电讯说，这一步骤已经付诸实施。

奥地利驻在匈牙利东南地区的监视部队现在完全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并已进入给它们指定的各个阵地。集中起来需要 10—12 天。德国报纸一般认为，一旦奥地利积极加入俄国一方，这支部队会被派去从翼侧向土耳其军队进攻，而且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奥地利人只有通过梅哈迪亚或贝尔格莱德才能深入土耳其，在梅哈迪亚，他们的前面有土耳其军队，而在贝尔格莱德，他们将同土军拉开的左翼防线处于一条线上。因此非常可能的是，如果奥地利人怀着敌意进入土耳其，那么他们就会从贝尔格莱德通过克鲁舍瓦茨和尼什向索非亚推进。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土军从维丁直接南下到索非亚的路程还是比较短的。

在普鲁士贷款委员会向下院提出的报告中，阐明了普鲁士在东方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并且发表了尚未被英国报刊掌握的某些外交文件，因此我打算从这个报告中摘引一些重要的材料。

1 月底，在奥尔洛夫伯爵向奥地利宫廷提出有关建议的同时，俄国驻柏林大使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由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三国宫廷签订一个共同的议定书。在这个议定书草案的序言中提出，制定这个共同协议的动机是，希望三国在欧洲和平面临着威胁的情况下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调整三国之间以及三国同西方强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草案包括以下三点：

(1) 两个德意志大邦正式保证，在英法积极参加俄土战争的

情况下，遵守最严格的中立；并且声明，在西方强国对它们再次施加压力或进行威胁时，如有必要它们决心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中立。

(2)三国将把法国或英国对奥地利、普鲁士或德意志其他任何一个邦的领土的侵犯，看作对本国领土的侵犯，并将根据情况和共同的军事协定(这个军事协定现在正由赫斯将军和普鲁士陆军大臣在柏林拟定)相互援助，抵抗侵略。

(3)俄国皇帝重申自己的保证：他愿意尽快结束战争，如果这符合他的尊严和他的国家的理所当然的利益的话。但是鉴于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改变土耳其的现状，因此陛下保证，如果要在这一点上同海上强国达成某种谅解，那么，不事先同自己的德意志同盟者协商，就不作任何决定。

除这个草案外还有涅谢尔罗德伯爵发出的一份紧急函件，这位总理大臣在信中提醒普鲁士和奥地利注意长时期以来一直就是欧洲盾牌的三国同盟的重大意义。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皇帝陛下认为自己不得不向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发出真诚的呼吁。他们的共同利益要求他们必须把对待如此重大事件的立场明确规定下来。他强调指出西方强国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同时提请注意它们对德意志各邦的利益所采取的蔑视态度。而俄国却不是这样。它准备单独挑起战争的重担，而不要求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作出牺牲或提供援助。两个大邦和整个德意志的幸福取决于它们的联盟。用这样的办法它们可以阻止危机蔓延，也许还可以加速危机的解决。其次，俄国的急件分析了德意志大邦可能采取的三种互相排斥的立场：同俄国联合行动对付海上强国，同海上强国联合起来反对俄国，以及严格遵守中立。至于同俄国联合，那么沙皇并没有这种需要；至于反对沙皇，那

么只要德意志大邦不愿屈服于西方强国的威胁,也没有可能。如果这样做,则是意味着屈从侮辱性的需要并最后导致悲惨的未来。本土不可攻破的俄国,它不怕任何军事侵略,也不怕更为有害的革命精神的侵袭。如果同盟者们离开它,那么它懂得怎样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并且会作好安排,以便今后没有它们的援助也行。(涅谢尔罗德先生的紧急函件是用德文写的,他担心把它译成别国文字会是一件极端棘手的难事。兹抄录最后一句原文作为他德文写作的一个例句:Wenn seine Alliierten es verliessen, so würde es sich gesagt sein lassen, sich auf sich selbst zurückzuziehen und sich so einrichten, ihrer in Zukunft entbehren zu können.)但是沙皇完全信赖他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那种他所深知的感情,信赖他们的早已通过血的洗礼(Bluttaufe)和不可否认的原则的一致性同俄军建立了联系的英勇的军队。因此俄国内阁认为只有第三种选择是值得德意志各邦宫廷考虑的道路,是符合于他们的利益,并有助于(因为给他们保留了调停人的身分)实现俄国的特殊愿望的道路。当然,这种中立不能是暧昧不明的,或者是十分短暂的,或者是待机行事的,因为这种态度将被各交战国,特别是俄国认为是敌意的中立。这种中立最好应以在艰难的时刻不止一次地保证了普遍安定和世界和平的原则(神圣同盟的原则)为依据。德意志大邦的职责就是在必要时依靠武器来实行他们的政策所依据的这些原则。如果两个海上强国之一(法国)有对德意志侵犯的意图或进行侵犯,那么另一个国家(英国)就一定会立即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么俄国无论如何都会全力以赴地支持德意志。

这个建议起初在柏林遭到拒绝,过几天又在维也纳遭到拒绝。当时还扮演着独立的国务活动家角色的曼托伊费尔在给圣彼得堡发

去的一份紧急函件中说,俄国虽然假装不需要普鲁士的援助,但是以表示恢复三国同盟的愿望来间接地要求这种援助。曼托伊费尔还说,“至于俄国并不害怕的革命精神,普鲁士也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了”。这位充当反革命首领而“拯救了”普鲁士的独立大臣,并不能掩盖他对于把没有匈牙利的普鲁士同奥地利相提并论这一点的恼怒。

正当普鲁士这样夸耀自己的安全时,在报告中提到的其他一些文件都证明在2月的最后几天奥地利把四强公约草案交给了普鲁士。普鲁士在3月5日的急件中拒绝了 this 草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大邦同时声明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政府仍然认为四强达成协议是顺利解决纠纷的最好办法。因此连奥地利也不得不放弃可以结束两个德意志大邦模棱两可的态度的公约。

普鲁士3月16日的急件中包括下列一段重要内容:

“普鲁士内阁注意到奥地利为维护自己东南边境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当然,普鲁士同德意志其他各邦一样,必须保护本身的特殊利益;但是这不应排斥同奥地利取得谅解。相反地,只要维护德意志利益需要的话,普鲁士准备进行协商。为此普鲁士期待着关于下列问题的通知:

- (1)奥地利是否打算为保证它边境地区的安宁而占领邻近的土耳其地区?
- (2)奥地利是否想占有这些地区作为和平恢复以前的抵押?
- (3)奥地利是否有意积极参加战争?”^①

对于普鲁士来说,要弄清楚为维护德意志的利益需要做些什么,以及为了缓和西方强国(而决不是俄国!)对奥地利所施加的压力普鲁士能否做些什么事情等问题,完全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

^① 奥·冯·曼托伊费尔《给……韦伯洛夫伯爵的急电》,见1854年4月6日《科隆日报》第96号。——编者注

答复。

3月14日,普鲁士政府和奥地利政府分别给德意志各邦宫廷送去两封彼此完全相反的通函。普鲁士的通函宣称,日益逼近的战争将纯属局部的性质。相反地,奥地利却坚持这样的看法:战争的发展很可能非常深入地影响到奥地利本国的事务。只要情况允许,它将不参加战争,但仍然必须考虑参加的可能性。这里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同样涉及德意志各邦。因此帝国内阁希望,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宫廷把自己的力量同奥地利的力量联合起来。那时德意志联邦必将表明,除了它目前采取的防御立场外,它还不知道在这一问题上如何起积极的作用。一旦西方强国同俄国真的宣战,奥地利就会发表新的宣言。如果还有防止目前威胁欧洲的危险继续增长的任何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就只能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与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一起采取联合行动。

前述报告中包括的最后一个但绝非最不值得注意的材料是,曼托伊费尔先生对委员会成员所提问题的忧郁的回答:俄国丝毫没有把自己的瓜分方案告诉普鲁士政府。

最后,我们从这个文件中知道,维也纳会议²⁶的骗人把戏根本没有结束。相反地,这个文件引用了普鲁士首相的话,认定新的议定书正在草拟,其中将确定**四强国之间要经常相互谅解**。

谷物市场上的价格又上涨了。不久以前法国和英国的谷物价格下降的原因是投机商的活动发生了困难,他们由于资本不足和银根吃紧不得不抛售谷物,以致市场上商品过剩。另一个原因是商人、磨坊主和面包商以为将有大批谷物运来欧洲各港口,因而把自己的全部储备用光。因此我依旧认为,价格还远未到达最高峰。毫无疑问,在谷物市场的可能储备上,还从来没有一年有过像今年这样错误的

和虚妄的推测,这些错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贸易派报纸的伪善言词的激励而产生出来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7 日

载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05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¹⁴⁴

当最初得到俄军占领多布罗加的消息时,以及在他们渡过多瑙河的真正意图能够从他们后来的行动中看出来以前好久,我们就说过,俄军这次机动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改善他们的防御阵地。他们从那时起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以及对方所采取的步骤,都证明事实确是如此。俄军派往多布罗加的兵力有四—五万人,根据可靠的消息判断,这些部队并没有越过切尔纳沃德至库斯坦杰一线。看来他们向锡利斯特里亚对面的卡拉腊什派遣了同样多数量的兵力(如果不是更多的兵力的话),他们企图威胁这一要塞,并在条件有利时向它攻击。俄军把配置在布加勒斯特西面的部队,除后卫外全部撤走。而后卫由于无力在卡拉法特前面继续支持下去,大概是向多瑙河对岸的塞尔维亚境内实行了小规模进军,其目的显然是要表明俄军对塞尔维亚的中立抱蔑视态度,并观察一下,少数穿军服的俄国人的出现会在塞尔维亚农民中引起什么反应——或者甚至可能是为了给奥地利占领这一国家制造借口。

毫无疑问,我们不久将会听到俄军撤离整个小瓦拉几亚的消息。那时他们的阵地又将如何呢?他们的正面将由特尔戈维什泰经奥尔泰尼察和卡拉腊什通向切尔纳沃德,再过多瑙河由切尔纳沃德到黑

海边的库斯坦杰。实际上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阵地。对俄军来说也确是如此,尽管缩小正面本身对他们是有利的。同时,这也说明俄军部队向左移动了,因此原来在正面延长线上的退却路线,现在已位于正面之后并且同它垂直。两个月以前,奥美尔帕沙只要在锡利斯特里亚和赫尔绍瓦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渡过多瑙河,就可以切断俄军的退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除非是派遣部队在德涅斯特河口附近登陆,或许能做到这一点。俄军这次机动的主要好处就在这里,甚至把多布罗加的一个军按长方形配置(一面和敌人的坚固阵地相连接,另一面靠海,其余两面是多瑙河的两个弯曲部,而且总共只有三座桥梁可以用来联系、增援或撤退)而造成的危险,也不能抵消这一好处。

但是,俄军的有利之处也只限于这一点。他们所得到的只是能退不能攻的阵地。在奥尔泰尼察到切尔纳沃德的一段正面前是多瑙河,只有几个地点可以渡河,而且这些地点,不是有设在较高的对岸的威力强大的炮台防守,就是有像锡利斯特里亚那样的永久性要塞防守。往下,由切尔纳沃德到海边的一段是卡拉苏湖泊和沼泽地、图拉真垒墙(这里的所有关口都重新改建得适于防御)、库斯坦杰要塞,而在翼侧,即在黑海上则有联军的舰队。在多瑙河以及图拉真垒墙的南面是比较荒瘠的地区,大部是高地,纵横交错着由无数河流形成的陡峭的狭谷,没有任何桥梁。当然,这一地区不能认为是军队无法通过的,但是只有在军队坚信会到达有利的阵地、只会遭遇兵力薄弱的敌人而且通过后可以找到大量粮秣的情况下,才会去通过它。但是,当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俄军从图拉真垒墙向巴扎尔吉克以及从奥尔泰尼察和图尔图凯向腊兹格勒进攻,那么他们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来封锁锡利斯特里亚和监视鲁斯楚克。他们在这样削弱了自

己的兵力以后,通过这一难以通行的地区到腊兹格勒和巴扎尔吉克去,那时他们会到达什么地方呢?他们就会直接处在巴尔干山脉的支脉面前,这些支脉截断了他们的作战方向,而他们必须分成几支独立的部队,沿几条不同的道路通过。假设他们试图这样做,那么这几支独立的部队就有被从舒姆拉来的、兵力集中的敌军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切断敌军的退路。我们甚至假定俄军克服了这一切障碍,而且,比如说,有10万人到达瓦尔纳和舒姆拉的附近地区,那时又将如何呢?舒姆拉的地形不仅可以使4万土军抵抗10万进攻部队,而且可以使这支优势兵力甚至无力抵挡数量上居劣势的土军出击。同时舒姆拉还可以掩护瓦尔纳,而瓦尔纳的另一翼侧又有联军的舰队掩护。瓦尔纳和舒姆拉合起来所形成的阵地,甚至比1848年拉德茨基元帅受皮埃蒙特人和意大利起义者四面围攻时所防守的维罗纳到莱尼亚戈的阿迪杰河阵地还要坚固得多。不仅如此,同舒姆拉和瓦尔纳相呼应的,还有位于敌人翼侧方向上的鲁斯楚克和锡利斯特里亚,尽管它们本身看来薄弱,但是只要土军的主力还能从舒姆拉朝这两个方向出击,它们就不可能受到有效的攻击。这两个要塞都在多瑙河岸,锡利斯特里亚对着俄军现在的阵地中央偏右之处,而鲁斯楚克则在它的右翼。只有在河的右岸才能将它们封锁住,这就是说,围攻部队应当直接配置在这两个要塞和舒姆拉之间,而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奥美尔帕沙正把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往舒姆拉。因此,任何围攻鲁斯楚克和锡利斯特里亚的军队都必须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要对付这两个要塞的守军,而且要对付集中在舒姆拉的、至少占全部土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另一方面,如果俄军经巴扎尔吉克进攻,那么同样需要足够的兵力,以便在开阔地上对抗舒姆拉来的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二的兵力。此外,俄军必须分兵封锁瓦尔纳,

至少要从北面,可能时还要从南面封锁,因为如果封锁不住瓦尔纳就不能夺取它,如果夺取不下瓦尔纳,俄军就不可能越过巴尔干。此外,如果再考虑到保障从鲁斯楚克到瓦尔纳漫长战线上各个军之间的交通线以及保障补给所必需的兵力,那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为了顺利地进攻舒姆拉和瓦尔纳——土军在巴尔干半岛东部防御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据点——俄军的兵力必须比土军在舒姆拉所能集中的兵力多一倍以上。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土军的行动是非常明智的。撤离多布罗加这件事,第一次清楚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奥美尔帕沙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这一地区及其要塞是不值得坚守的。这位土耳其将军不是坐以待毙,容忍人员和物资遭到损失,而是立即命令他的部队在保证人员和物资安全的情况下,只要一有可能,就放弃各个据点,退向图拉真垒墙。因此,虽然俄军表面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但土军却给他们以重创,而且在敌人反击之前,占领了自己的真正的防御阵地。土军只在重要据点以及可以得到主力或黑海上的舰队支援的地点才留有守军。因此在必要时,土军在瓦尔纳和舒姆拉之间至少可以集中八九万人,而且如果将由于无端的政治上的惊慌失措而派往卡拉法特的一部分兵力迅速调回,可以集中的兵力数量还可以增加。但是俄军要以两倍于这一数目或者更多的兵力渡过多瑙河是不可能的,至少在这次战役中如此。我们说这番话时,是假定俄军企图坚决进攻,而且我们没有把英法辅助部队可能开到的情况估计在内,如果他们开到,那么俄军越过巴尔干的任何尝试都是不理智的。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因为很有必要了解目前交战双方的真实情况。现在实际情况是,如果战争只在俄土两国之间进行,那么虽然土耳其因外交上的拖延而失去了进攻所必需的优势,至少在

今年,君士坦丁堡不会遭到俄军侵入的威胁。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4 月
13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4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6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路西德帕沙的照会。
——意大利报纸论东方问题¹⁴⁵

1854年4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传英法两国政府终于互换了攻守同盟条约的文本。条约包括五项条款，内容不详。

奥普之间的条约还没有签订——分歧在于普鲁士宫廷中有一部分人不同意占领俄属波兰的边界。

4月6日为纪念希腊独立周年在雅典举行了“Te Deum”^①仪式。西方强国的大使们没有参加这一仪式。同一天《雅典观察家报》公布了国王的16道敕令。国王接受全部企图投向暴动者方面去的21个军官的辞呈，他们当中有将军、上校和其他军阶的军官。第二天雅典获悉暴动者在阿尔塔附近遭到惨败。发生战斗的地点本身就表明，暴动没有什么进展，到目前为止，暴动中只牺牲了一些居住在希腊王国边境地区的希腊农民。

① 祈祷，在进行祈祷时唱“Te Deum laudamus”（“赞美我主”）。——编者注

读者大概还记得,1827年俄、英、法三国大使曾要求土耳其政府从希腊召回所有土耳其人,不管他们是否已在那里定居。在土耳其人拒绝这样做的时候,就发动纳瓦里诺会战¹⁹来强迫他们服从。现在,土耳其政府向希腊人发布了类似的命令;路西德帕沙致希腊大使梅塔克萨斯先生的照会和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给不列颠领事们的通令都还没有在伦敦报纸上发表,因此我从4月5日的《君士坦丁堡日报》上把这两个文件译了出来。

“外交大臣路西德帕沙对梅塔克萨斯先生的照会的复照

1270年7月3日(1854年4月1日)于君士坦丁堡

我读了您在3月26日送交的关于您决定离开我国首都的照会。鉴于土耳其政府就当前事件所提出的公正的抗议没有得到希腊政府的满意的答复,而且土耳其政府的代办已不得不奉命离开雅典,所以阁下也离开本市,那是适宜的。因此,我根据您的请求,特将您的护照送给您。由于从今天起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陷于中断,我们决定,设立在我帝国各省的希腊领事馆以及希腊领事应立即撤回。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商人以及其他希腊臣民也应离开君士坦丁堡;但为保护希腊贸易的利益起见,我们给予他们滞留15天的期限。对于那些居住在外地的希腊人,这个期限将自他们接到离境命令之日算起。业已证实,对我国边境诸省的侵犯,不是出于任何疏忽,而是出于希腊政府的姑息。尽管帝国政府完全有权扣留并没收停泊在我国港口内的一切船只,以抵偿我们所遭受的极其重大的物质损失,但我的至尊的皇帝认为,在仅仅涉及希腊政府的事情上不使希腊臣民遭受任何损失,更合乎他宽厚的本意。只有当希腊政府恢复比较符合正义的精神并尊重各项国际权利和国际法的准则时,才能对这次暴动所造成的损失这个问题进行研讨。因此,所有希腊船只在规定期限内都可以不受阻碍地返回祖国。政府已下令各有关部门协助生活特别困难的希腊臣民离境,并对病人和体弱者尽可能给予方便。(最富于基督教精神和最文明的奥地利政府是以完全不同的姿态来处理这类事情的,驱逐泰辛人的事件¹⁴⁶就是一例。)我认为,有必要重申,迫使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完全是希腊政府,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应全部由希腊负责。

路西德帕沙”

根据这道命令,3 000名希腊人已于4月5日在君士坦丁堡登船,据悉,士麦那的帕沙已对居住在该城的希腊人发布了命令。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向不列颠驻土耳其和希腊的领事们发出的通报如下:

“1854年4月1日星期六于君士坦丁堡

阁下!我已得悉,侵入土耳其边境各省的希腊人正唆使苏丹的希腊臣民举行叛乱,他们宣称,法国和英国政府准备支持他们推翻苏丹政权。同时我还知道,他们采取类似手法,为的是使人相信,一旦土耳其政府由于同希腊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而宣布准备将土耳其的希腊臣民逐出苏丹领土,法国和英国大使将对他们一律加以保护。因为这些推测会使人产生错觉,使那些心地善良的人陷入迷途,罪恶地加重任何战争状态必然带来的灾难,所以我急于要向你们切实说明,这些说法毫无根据。谁要是哪怕只有一瞬间相信如此明显、如此违背常识和事实的臆造,那他一定是十分无知和轻信。然而遗憾的是,在那些宣传手段不很发达的国家里情况正是这样。你们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在苏丹反抗残酷的和不法的侵略的崇高举动中,英国和法国是完全站在苏丹这一边的。由此必然得出结论,两盟国政府对于一个只是要使俄国获益、甚至根本不是自发性质的运动只能表示愤慨和憎恨。这一运动归根到底会使土耳其政府和它的盟国处于困难境地,它除了使那些为了极其虚幻的空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遭到毁灭外,决不会有别的前途。当然,我们怜恤那些由于残暴的和无原则的政策而遭受苦难的无辜的家庭;但是我们既不能同首领们保持任何关系,也不能掩饰一伙无知的人的行动使我们产生的情绪。务请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把本通报的内容告诉那些容易相信本通报所驳斥的谬论的人。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

除了德国人之外,对东方纠纷的结局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因此,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党派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想法不是没有意义的。为此我翻译了都灵《同盟报》上的一篇文章,它向你们说明了意大利立宪党¹⁴⁷的观点。看来,这个党完全准备牺牲匈牙利,以恢复意大利的独立。奥地利帝国长

寿的秘密就是这种狭隘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

“英国报纸竭力想使人们把当前的对俄战争看成似乎是争取欧洲的自由和独立的战争，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重视的只不过是英国的贸易利益而已；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话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劝告我们意大利人要乖乖地呆着，要我们懂得，奥地利迟早总会变得讲点人道的。可见，至少他承认了，奥地利目前是丝毫不讲人道的。尽管如此，慈悲为怀的英国为了‘欧洲的自由和独立的胜利’正在力争同奥地利结成同盟。至于法国的报刊，它们是不自由的。报刊在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查封的威胁之下，只能重复政府喜欢听的话。除此以外，法国报纸不善于广泛阐述当前的问题，它们太喜欢赶时髦了。德国的自由派报纸在俄国所造成的极大恐惧的压力下写作，只要想想俄国在德意志两个最重要的邦获得了多大的影响，就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了。可是我们究竟希望什么呢？意大利的独立。但是，只要还在谈论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以维也纳条约为基础的欧洲的均势，那么很自然，我们就还是应当对这种完全违反我们愿望的现状感到庆幸。俄国究竟图谋什么呢？图谋消灭奥斯曼帝国，从而消除现状的均势，并修改欧洲地图。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有人可能说，俄国希望按照它自己的主张修改欧洲地图。然而正是这种情况可能对我们有利，因为不管是法国、英国或德国都不会容忍一个已经拥有太大的领土和影响的帝国再扩大它的领土和影响。因此，它们就不得不寻求反对俄国的支柱。而能够成为这个支柱的只有奥地利。对于奥地利，西方强国不得不慷慨万分，答应把从奥尔绍瓦起到黑海止的整个多瑙河流域，以及多瑙河下游的多布罗加和通向巴尔干的要冲都给它。那时归奥地利占领的土地将有：

- (1) 居住着和奥地利本土民族同源的居民的广大地区；
- (2) 对于德国贸易非常必需的一条大河的整个流域。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从防御目的看来，奥地利将不再需要意大利；它集中统治的除了现有的 300 万南方斯拉夫人和大约同等数量的达契亚-罗马尼亚人而外，还将加上大约 600 万南方斯拉夫人和 400 万达契亚-罗马尼亚人。

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两个庄严的奇谈怪论。如果你们所理解的独立是一个民族享有根据自己的原则管理自己的自由，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那么这种独立已经被凯纳吉条约²⁸大大地破坏了，并在不久前同西方强国签订的条约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colpo di grazia)。根据这项条约，土耳其已经不是由苏

丹统治而是由西方强国统治,从穆斯林和基督徒、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时起,从占居民五分之四的莱雅能够携带武器之时起,土耳其就不再存在了,一种改造已经开始,而这种改造除非通过暴力,通过严重的骚乱,通过四百年来一直互相敌视的两个教派之间的斗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不想再多听关于土耳其独立的高调,这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而领土完整呢!难道不是法国和英国按照同俄国达成的协议从土耳其夺走了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贝奥蒂亚、福基斯、阿卡纳尼亚、埃托利亚、内格罗庞特岛^①等地在内的有一百万居民的希腊王国吗?不是它们又是谁呢?难道不是法国夺走了阿尔及利亚¹⁴⁸?难道不是法国、英国和俄国让埃及半独立吗?难道不是英国人在十五年前占领了红海上的亚丁吗?难道又不是英国人正在覬覦埃及吗?难道奥地利不也是在覬覦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吗?既然大家一致反对这种现状,而现状也无法自动保持下去,那又为什么要谈保持现状呢?

因此,我们认为,俄国想消灭土耳其是打了一个好主意;而西方强国打算反击俄国的蚕食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些强国真正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就应当抛弃它们用以掩盖自己真面目的虚伪的外交手腕,而下决心消灭土耳其并且修改欧洲地图。这就是它们应当作出的决断。”^②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18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6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即埃维亚岛。——编者注

② 奥·比安基·乔维尼《俄国和土耳其》,见 1854 年 4 月 12 日《同盟报》第 138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
和西方强国。——英国
小麦销售量的缩减¹⁴⁹

1854年4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们从《普鲁士通讯》中得知，著名的本生男爵并非奉召回国，而是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延长了休假。阿尔文斯莱本伯爵受命做他的临时代理人。

瑞典议会制宪委员会以 12 票对 11 票的多数决定，各大臣由于不久前研究简化税收制度问题时的表现，一律要受王国最高法院的审讯。

据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领事梅罗尼先生报告，奥地利人应当预料到：如果他们把军队开进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将以武力来抵抗他们。

本月 3 日梅塔克萨斯先生离开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在不到 14 天的期间内他的四—五万同胞也离开了。没有一个大使馆愿意暂时代替他办理日常事务。奥地利大使拒绝的理由是：既然法国和英国是

希腊的保护国，那么它们的使领馆有责任在此期间充当希腊的代表。普鲁士也不接受，因为奥地利已经拒绝了。英国和法国的大使声明在这个时候要他们充当梅塔克萨斯先生的代表是不适宜的。那些小国的代办则认为竭力回避表示同情或反感才是上策。因此，梅塔克萨斯先生只好把自己的一个随员留下。然而不久发现这位代理人滥用土耳其政府授予他的权力，尽力地把护照发给希腊的莱雅，使他们有可能加入阿尔巴尼亚起义者的队伍。因此希腊使馆的职能被完全取缔，而把签发护照的事宜交给由两个土耳其人和两个莱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办理。

与此同时公布的一项通告声称：希腊王国的任何一个臣民，如果愿意做苏丹的臣民，只要他找到两个有声望的人担保他行为端庄，就可以获得批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公开威胁说要在临走前火烧和洗劫该城，因此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土耳其士兵日日夜夜进行巡逻，在佩拉的大街上架着 50 门火炮。从日落到午夜，城内或郊外的行人和车马都必须点灯；而午夜以后禁止任何通行，并且特令禁止粮食外运。信奉天主教的希腊人在佩拉的天主教主教担保的条件下，被允许留下。这些蒂诺斯岛、安德罗斯岛和锡罗斯岛出生的人大都属于家仆等级。海德拉岛居民上书土耳其政府，强烈谴责希腊人暴动，同时恳求政府不把反希腊人的一般措施扩大到他们身上。帖撒利亚地区特里卡拉的土耳其帝国属下的希腊臣民也派了代表团，请求土耳其政府立即保护他们免受希腊强盗的迫害，这些强盗把整座整座的村庄焚毁，而对居民，则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到边界附近去受极为残酷的折磨。

土耳其人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西方盟友，不信任他们和敌视他们。土耳其人开始把法国和英国看作是比沙皇本人更危险的敌人，下面

这两句话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他们要推翻苏丹和瓜分帝国，要把我们变成基督教居民的奴隶。”联军不在瓦尔纳以北而在君士坦丁堡南面登陆，现正在加利波利构筑工事来专门对付土耳其人。这座村庄所处的地带是一个由地峡与大陆相连的狭长的半岛，它很适合作侵略军的据点。过去热那亚人就是从这里向君士坦丁堡的正教皇帝进行挑衅的。此外，正统的穆斯林对新的谢赫的就任表示愤慨，因为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正教教士的工具；同时，土耳其人开始普遍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情，即宁愿满足尼古拉的单一要求，也不愿做一伙贪得无厌的强国的玩物。

对联合内阁的不满和它的作战方法所引起的民愤是这样强烈，甚至连《泰晤士报》也不得不进行选择：要么使自己的发行量受到损失，要么停止逢迎群贤内阁¹¹，并且认为在星期三那天的报上猛烈抨击内阁是适当的。

《晨邮报》驻魁北克记者写道：

“英国太平洋舰队十分强大，足以占领俄属美洲部分沿岸地区的所有俄国堡垒和据点（这样的堡垒、据点在国内是没有的），以及他们在福克斯群岛、阿留申群岛和千岛群岛到处拥有的堡垒和据点，——这一切形成一个从美洲海岸至日本的链条。这些岛屿盛产毛皮和铜，气候温和，某些岛屿拥有优良的港湾靠近没有好港湾的亚洲大陆，只要能占领这些岛屿以及俄属美洲部分，我们在太平洋的影响必将大大增长，而且正好是在太平洋各国开始具有它们按理早就该有的作用的时期。我们的舰队可能在锡特卡岛上的新阿尔汉格尔斯克遇到有力的抵抗，这里是个天然形成的有利阵地，同时构筑有坚固的工事，架了六七十门火炮。岛上约有1 500人，其中约500人是守军，还有一所建造过很多军舰的造船厂。其他大多数据点都只有50—300人，其中少数筑有相当结实的工事。假使我们占领了这些地方，而法国希望得到一些领土作为对此的补偿的话，可以让它占据堪察加及其毗连的海岸。”

《官报》上登载的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集镇销售小麦的数字，

表明小麦销售量比 1853 年同期有了惊人的缩减,而这一点可以作为确定以往每次粮食收成数量的标准。

小麦销售量如下:

1 月	2 月	3 月
1853……532 282 夸特	345 329 夸特	358 886 夸特
1854……266 477 夸特	256 061 夸特	227 556 夸特

上周销售 36 628 夸特,而 1853 年同一周内则销售了 88 343 夸特。总之,这些数字说明三个月内销售的小麦比 1853 年同期几乎少了 50 万夸特,同时异常显著地证明了最近一次收成很差。

《马克巷快报》报道:

“到现在为止,国外的充分供应,使人们没有严重地感到本国供货不足;目前还有大量小麦和面粉正在从各国运往英国途中;但是,能否指望在下一次收成之前必须熬过的这段时间内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输入呢?美国已把它海港里储备的全部都给我们了;虽然我们不怀疑它在遥远的西部还有大量储备,但是把这些储备运到东海岸,再从那里运到英国,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费。欧洲北部港口旧有的储备几乎已一扫而光,而对俄战争又排除了继续从黑海和亚速海得到供应的可能性。我们把上述这一切想法提供给读者们研究,不再作进一步解释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7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¹⁵⁰

昨天到达的大西洋号轮船带来了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在黑海对俄军进行第一次真正攻击的消息。英国的蒸汽巡航舰怒涛号似乎是挂着军使旗驶向敖德萨,以便接运英法领事离开敖德萨,当他们刚一上船,就遭到岸上的射击。英国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军使旗的权的不负责任的侵犯,必须立即予以报复。俄国人这方面则坚持说,在领事们登上船后,军舰仍然停留在港内,使军官们有可能把防御工事画下来,因此,射击的唯一目的是制止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不管是什么情况,英法的海军将领们决定应采取行动,于是派了强大的力量去袭击该城。看来这次军事行动进行得并不很漂亮,因为,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官方的通报,但根据现有的消息,在压制海岸炮台的炮火,使停泊在港内的少数几艘商船起火并且摧毁离海岸不远的沃龙佐夫公爵的府邸的过程中,几艘英国军舰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坏。敖德萨城本身,由于座落在小山顶上,距离海岸较远而安然无恙。这样报复之后,军舰又撤走了。看来,邓达斯海军上将接受了他的一个军官的已在伦敦发表的信件中向他提出的建议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这就是:凡事都不要过于认真,困难和危险的事情切勿插手。

在多瑙河方面,除了俄军已完全撤出小瓦拉几亚和正准备对锡

利斯特里亚要塞实行强攻外,没有任何新的消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对岸集中了大量炮兵,并且有消息说,正准备迅速调遣大约三万人渡河来参加这次进攻。这个消息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计划不是不可能的。它成功的把握有多大是另一个问题。锡利斯特里亚无疑是所有的土耳其大要塞中最薄弱的,在易于步兵突破的距离内,被一些就我们所知自上次战争^①以来没有设防的高地控制着。而正是这个在1810年经四天强攻后失守的锡利斯特里亚,却在1828—1829年经受住了长达十个月之久的两次封锁,并在正规的围攻开始后坚持了35天,在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可通过的缺口之后坚持了九天。这个经历过种种不同命运的要塞,可以说它的坚固性和防御能力是令人无法估量的。¹⁵¹

假设锡利斯特里亚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强攻下将会失守,这决不意味着为敌人扫清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为了进攻舒姆拉和瓦尔纳,敌人必须在锡利斯特里亚附近至少留下6000人的兵力,只有这样,锡利斯特里亚才可以成为夺取另一个位置比较适宜的据点的桥头堡。敌人大概不会去进攻舒姆拉,因为即使占领了这个极好的设防营垒,他们也只是使对方丧失了一个极好的阵地,但并没有为自己获得同样的阵地。舒姆拉封锁了俄军进入巴尔干的通道,不过即使它被攻占,也并没有给俄军打开这条通道。

舒姆拉的重要意义在于:瓦尔纳是通向小巴尔干的锁钥,而舒姆拉又是通向瓦尔纳的锁钥。瓦尔纳的防御工事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缺点是很多的——,但在守军满员的情况下,围攻这个要塞需要投入两三万人。除此之外,还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去掩护执行围

^① 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编者注

攻任务的部队,以免受到来自舒姆拉设防营垒的偷袭——因为土军可以在那里集中自己全部兵力——,否则围攻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1828年,瓦尔纳守军在要塞围墙被攻破两个可通过的缺口之后坚守了三个星期;而当时的情况是,俄国舰队控制着黑海,土耳其人没有任何能够反击围攻者的军队。现在我们假定,锡利斯特里亚已被夺取,瓦尔纳和舒姆拉正面的许多极难克服的河川防线已被强渡,而且瓦尔纳已被封锁,俄军是否可能留下足够的兵力来制止舒姆拉发挥作用呢?在舒姆拉的土耳其人能够不仅对围攻瓦尔纳的敌军,而且在多瑙河方向,至少对俄军的一条交通线采取行动,从而逼迫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兵力调离主力部队,使主力部队最终可能被削弱到危险的程度。

即使瓦尔纳失守,如果奥美尔帕沙执意继续留在舒姆拉的据点,准备俄军一犯错误就加以利用,帕斯凯维奇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帕斯凯维奇拥有的唯一的交通线同时受到舒姆拉方面的军队和黑海上的联军舰队的包围和威胁,他会敢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吗?如果我们根据他在亚洲和波兰的勋业加以判断的话,他肯定不会。他是一个几乎过分小心谨慎的将军,是一种在军事上慢性子的人,他身上没有任何拉德茨基那样的性格。如果他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会认为这种机动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前任吉比奇1829年到达阿德里安堡附近时曾陷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这样,我们甚至不考虑英法军队在色雷斯登陆,也不设想联军舰队会有比迄今更多的作为,也就是说,假定他们几乎无所作为,我们也可以说,俄军要想旗帜招展、军乐齐鸣地径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土耳其得不到援助,俄军就终究会到达那里。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过,只有一些时髦的军事著作家除外,因为他

们作出判断并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权利反对暴力”则必胜、在“正义的事业”中不可能犯错误这种信念。

应该补充一点,不列颠军队在波罗的海比在黑海更少作为。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4 月
2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5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8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
——奥地利—普鲁士条约。
——俄国的文件¹⁵²

1854年4月28日星期五于伦敦

最近从土耳其来的可靠消息完全证实了《论坛报》对俄国人撤离卡拉法特、占领多布罗加以及对希腊人暴动性质的看法。

《劳埃德氏杂志》证实了这样的传说：俄国人解除了对卡拉法特的包围，并且撤出小瓦拉几亚的行动已告结束。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最新的消息也证实俄国人没有向前推进，而是相反地在加强多布罗加的防御。

至于希腊人暴动，《通报》昨天登载了4月21日来自维也纳的一封信：

“希腊人暴动没有在伊庇鲁斯蔓延，但它的真实性质开始显露出来了。如果说有人可能曾经认为基督教和民族利益决不是空泛的借口，那么希腊王国的希腊匪邦首领们的行为就会消除此类谬见。大家都知道，从开始进行这场斗争之时起，格里瓦斯和克萨韦拉斯就为由谁领导暴动者这个问题争执起来。这两

个首领一直单独行动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一切机会相互攻讦，尤其是格里瓦斯，他自封为基督徒莱雅的解放者，但给他们带来的只是掳掠和纵火。苏利奥人决定禁止某些希腊首领进入自己领土，他们特别谴责格里瓦斯。上月初这位首领曾请求在希腊首主教德尔文齐斯塔那里栖身，但第二天使用暴力劫走了主人的财物和妻子。为了向这种兽行报仇，首主教去找阿卜迪帕沙，请求允许在他手下当差。而格里瓦斯的抢劫技艺在梅佐沃表现得最为高明。这个被俄国人的宣传迷惑了的城市，主动地给这位‘大元帅’格里瓦斯打开城门。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基督教居民勒索了20万皮阿斯特‘爱国’捐。这个数目还不十分大，人们也就缴纳了。可是格里瓦斯没有就此止步。他亲自访遍该城所有最有名和最富裕的居民，劝他们把自己所有珍贵的金银财宝也以捐献的形式交出来。这种敲诈勒索的做法激起了不满，进行得既不顺利，也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于是格里瓦斯又忽然想出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可以说是抢劫技艺的杰作。他借口奥斯曼军队迫近梅佐沃，宣称为自卫起见必须把几乎整个城市焚毁，因此让居民们及其家眷到该市大教堂集合。很快就在那里聚集了差不多4000人。格里瓦斯预料到，他们会随身携带金钱、珠宝和最贵重的东西，这样，他就可以把梅佐沃的财富搜罗殆尽。于是，他把那些人小批小批地放出，交给他的手下人去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迄今为止在伊庇鲁斯暴动中起了最主要作用的这位希腊首领的丰功伟绩就是如此。当时格里瓦斯对土耳其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焚毁城市后他退往拉多维茨方向的阿海洛奥斯河。在伊庇鲁斯，除亚尼纳和培拉特以外，梅佐沃原是最繁荣的城市，现在它变成了一片废墟，它的居民变得一贫如洗。只有大约100幢房屋未被毁坏。”^①

据传科苏特和马志尼打算到君士坦丁堡来，为此，路西德帕沙发表声明说，不允许他们踏上土耳其国土。

建立波兰军团一事据说没有遭到法国和英国大使的反对，但碰到了另一种阻碍。维索茨基将军把一份有几千签名、授权他全权代表很大一部分波兰侨民的文件呈递给土耳其政府和雷德克利夫勋爵。另一方面，上校扎莫伊斯基伯爵（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侄儿）也

^① 1854年4月26日《总汇通报》第116号。——编者注

呈递了有许多人签名的类似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另一部分波兰侨民授权他全权代表他们办事。英国大使考虑到他们各执一端,为了调和双方的要求和对立,并能同时利用维索茨基和扎莫伊斯基为自己效劳,便提议不建立一个而建立两个波兰军团。

4月17日帕斯凯维奇元帅到达雅西并在当天前往布加勒斯特。

据《汉诺威日报》报道,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攻守同盟条约¹⁵³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1.奥地利和普鲁士互相保障它们德意志的和其他的领地(in und ausserdeutschen Besitzungen),对两大邦中任何一大邦的进攻,将被另一大邦视作对自己的进攻。

2.奥地利和普鲁士有互相支援的义务并在必要时采取联合进攻,如果缔约一方认为德意志的利益处于危急之中,而另一方也同意这种看法的话。需要给予支援的特殊情况,在作为本条约组成部分的一个单独条款中另行规定。为保证条约的效力,在一定的规定期限内,将使适当的军事力量处于准备状态。关于这种期限以及部队的数量和使用方法将另行商定。

3.邀请德意志联邦全体成员参加这个攻守同盟并遵照联邦法所规定的义务给这个同盟以支援。”

你如果把这些条款同涅谢尔罗德伯爵向普鲁士宫廷提出的中立建议的措词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还必须指出,条约实际上仅仅符合防御政策的需要,如果实行进攻政策,一切决策还得由各有关宫廷决定。

本月25日普鲁士第一议院根据该院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发行3000万塔勒公债的提案。曼托伊费尔先生所提供的内阁对此事作出的解释是很典型的,它说明普鲁士外交喜欢用爱国的花言巧语和荒谬的豪言壮语来掩饰自己内在的软弱,所以我把这个文件全部引出来。曼托伊费尔先生说:

“俄土之间产生的，后来波及西方强国的纠纷，是人所共知的。普鲁士政府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和利益，认为调解这些纠纷和消除分歧是适当的。但它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仿佛某种灾星操纵了这个问题。很多本来有助于恢复和平的尝试并没有得到什么效果——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做得不合时宜和方法不当。于是争执便发展成了战争这种极端行为。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保证维持和平所作的努力，可以说为恢复谈判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维也纳会议²⁶的主要目的。在这次会议上普鲁士政府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和平。它本着和解的精神（作为尼古拉皇帝的“和平使者”）但又以坚定不移的态度行事，同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大邦的地位（和俄国皇帝在他的秘密信件中所说的一模一样）。正因为普鲁士政府（对于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份和改换门庭）没有利害关系，因为它无私的（uninteressiert）立场已为其他强国公认，所以它也能够坦率和果断地说话。敌对双方对它的倡议和努力时而表示感激，时而表示遗憾。然而政府不想离开它既定的道路。独立是任何大国存在的首要条件。普鲁士政府善于维护这种独立，为和平而行动，并不因这个或那个强国对它的行动是否赞赏而有所顾忌（总之这就是对大国的独立所下的精确定义！）。当局势越来越恶化时，政府认为除了为维护和平而作出巨大努力之外，它有责任首先考虑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利益。为此目的，它已与奥地利签订了条约。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也将加入这个条约。因此，我们可以切实地指望能与奥地利和全德意志进行合作。政府认为，这种合作是对德意志各邦最可靠和最有效的保障。在结成这个紧密的同盟的同时，以前普、奥同西方强国在维也纳会议的基础上缔结的协定仍然有效。普鲁士并不像英国报刊所说的那样已经同西方强国疏远了。和西方强国的这种协定至今仍然有效。确认该协定的议定书已经由普鲁士大使签署，但是还不能呈交议院。这四强国保持着自己先前的立场并将继续为恢复和平而努力，尽管其中两国开始了军事行动（而这就证明战争是烟幕，和平谈判才是西方各国内阁要做的实事）。至于说到俄国，圣彼得堡内阁最近提出了一些比较友好和表示愿意和解的建议，它虽然现在对和平只抱微弱的希望，但毕竟为新的和谈打开了大门。普鲁士政府已表示自己准备到最后一分钟也对和平抱有希望。只要和平还有最后一线希望，普鲁士绝不放弃自己的一切尝试和努力（Mühen）。对于普鲁士有决定性的时刻一旦到来（发抖吧，拜占庭！），政府将毫不迟疑，绝不犹豫和毅然决然地行动起来。普鲁士必须准备好迎接这一时刻。它的话将具有更大的分量，因为它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当俄国和土耳其发生冲突时，西方强国表示了强硬态度，支持了奥斯曼政府。当时普鲁士没有受

委托充当仲裁人。除了某个第三国的权利遭到破坏外，它最为关心的是本国国民的安宁。它本身在东方问题上的利害关系不像奥地利那样直接，奥地利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奥地利坚决请求普鲁士不要拒绝与它合作。普鲁士和奥地利所追求的目的是：限制双方过分的、妨碍和谈的要求。正是它们的努力促成了维也纳会议的召开，这个会议被公正地看作是值得庆幸的事件。我国政府不能忽视仍然使自己可以对西方强国施加良好（对俄国来说）影响的这件事情。它是联系这些国家的纽带，还有助于谋求和平。至于四强国给俄国政府的照会的草案，那么不应忘记，俄国一直不承认该会议，同时不能忘记，由于新情况的出现，这个草案已成为土耳其所不能接受的了。新的维也纳议定书（这是曼托伊费尔先生所披露的很重要的一点）为普遍和平，至少为防止普鲁士和德意志参加战争，提供了新的办法。早些时候奥地利曾提出要求，即建议德意志联邦议会遵守严格的中立，普鲁士也必须遵守严格的中立，对此，政府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认为不能表示同意。它不能牺牲独立强国的地位和放弃自主决策的自由。况且，如果实行这样的中立，我们就可能给其他强国提供对我们采取敌对立场的借口，如果它们认为这样的立场适合自己的利益的话。现在各西方强国的处境按照它们的约定（维也纳议定书¹⁵⁴）已发生极大的变化。在最坏的情况下，和平将不能实现，但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国会避免战争所引起的一切严重灾祸；这是巨大的、无法估价的好处。（假如谁能理解这样的抉择，我准备给他的敏锐性以应有的赞扬。）俄国与西方强国之间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使得普鲁士不得不考虑到它作为大国的地理位置（与其说大，不如说是长），准备采取必要的手段，用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不管怎样，政府面对过去是不畏缩的（如果这话有什么所指，那就是，它并不以自己的过去为耻），同时为它能有机会公开畅抒己见而感到高兴。”

不言而喻，委员会认为这一番解释令人非常满意。

《圣彼得堡报》刊载了下面一些新文件：

“警察司命令

1854年4月15日

兹奉皇帝陛下旨意，命令如下：海军和近卫军部队的退伍士兵，凡自认为身

体健康、精力充沛者，如愿再度服役，可享有近卫军和陆军退伍军官之待遇。

将军衔侍卫长 加拉科夫”

“给政府化了的参政院的指令

为了加强芬兰湾沿岸的防御手段，应建立桡桨战船后备队，特命令如下：

1. 组织四个新的桨手队；
2. 此种部队将由在圣彼得堡省、诺夫哥罗德省、奥洛涅茨省和特维尔省征募的志愿人员组成；
3. 责成由海军部长官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大公殿下以及帝国产业大臣、皇室地产大臣和内务大臣组成之委员会采取措施来建立此特种部队。

尼古拉

1854年4月14日”

“海上非常后备军条例

一、建立海上非常后备军的目的及其编制：

1. 成立海上非常后备军，是为了充实担任防卫芬兰湾沿岸任务的桡桨战船后备队；
2. 该后备军由四个战斗队组成；其编制和内部机构由海军部确定；
3. 任何人，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可参加此后备军。

二、征募办法：

4. 自愿加入海上非常后备军者必须提供合法身分证，农奴则必须持有农奴主发给的特别许可证；
5. 志愿人员在圣彼得堡向海军部检察署报名，在各省城向各省长官报名，在各县城向各地方警察当局报名；
6. 报名者必须呈交身分证，以换取一张特定的证件，应将身分证转送到其持有者前往报名的海军部检察署。如果必要时，可提前发给一月薪饷，并在证件上注明；
7. 责成地方警察当局严格督促志愿人员前往圣彼得堡，并予以多方协助。

如志愿人员生病,应给予关照。

〈第8和第9两点无关重要。〉

三、服役条件:

10. 凡愿意参加海上非常后备军者从向检察署报名之日起可以领到:
 - (a) 月薪八银卢布。
 - (b) 与正规海军士兵同等的给养。
 - (c) 农民式的服装。准许志愿人员留农民式的胡须和头发。
11. 服役期限到 1854 年 11 月 1 日为止;
12. 期满后对任何一个志愿人员不得加以阻留;
13. 立功者奖赏办法与正规军同;
14. 当志愿人员在炮艇协助下获得‘战利品’时,他们可按有关分配的规定分享应得之份;
15. 志愿人员如果伤残,享受与士兵同等之权利;
16. 责成地方当局和村社对志愿人员的家属予以特别照顾。

康斯坦丁

基谢廖夫伯爵

佩罗夫斯基伯爵

德米特里·比比科夫”

不可能找到比上面引用的文件对俄国的描绘更好的了:皇帝、官僚、农奴、农民式的胡须、警察、海上非常后备军、村社、陆地和海洋——这是“整个俄罗斯”的全景。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4 月
27—28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7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炮击敖德萨。——希腊。——
黑山丹尼洛大公的呼吁书。
——曼托伊费尔的演说¹⁵⁵

1854年5月2日星期二于伦敦

一再大肆吹嘘要实现的对敖德萨的炮击终于进行了。但是迄今为止所收到的电讯很少而且非常不详细,因此还不能加以评论。据最可靠的消息,这次炮击于4月22日开始,23日暂停(这一天向城防司令送去一份劝降书),24日又恢复。有的报道说城市很大一部分已被完全摧毁;又有的报道说只有堡垒受到燃烧火箭和爆炸弹的毁坏。某些方面人士甚至断言这次炮击根本没有任何结果。有些电讯报道说击毁了八艘俄国船,当然是商船,因为在敖德萨没有俄国军舰。据4月26日敖德萨发来的最后电讯说,整个联军舰队就在这一天早晨离开了。

为了制造对这一事件的舆论,法国政府刚刚在《通报》上发表了海军上将阿默兰最近向海军大臣所作的报告中的以下一段话:

“英国蒸汽巡航舰怒涛号于4月6日驶往敖德萨,要求接运领事和因战火

逼近而希望离开这个城市的英法臣民……虽然在巡航舰和登陆艇上都挂有军使旗，俄国炮台在登陆艇离开防波堤后不久便背信弃义地向它打了七发炮弹……我同邓达斯海军上将正在讨论对这种野蛮行为进行报复的方法。”

俄国人对于整个事件有另一种说法。他们断定，派遣挂有军使旗的船只是侦察他们的防御工事的一个借口。不久前复仇号军舰以递交急件为名驶抵塞瓦斯托波尔港，而实际上是为了描绘港口内炮台的分布图，这使沙皇大为震怒，——更何况英国报刊对这一功绩的大事渲染已证实了这种估计。因此发布了今后要向一切在俄国港口出现的船只开炮的命令。《比利时独立报》发表了披露这些事情的一封信，这封信表面上是一位俄国军官自敖德萨发出的，但很可能是基谢廖夫先生亲自写的。

“3月27日(4月8日)清晨6时，没有挂军使旗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蒸汽舰怒涛号驶近敖德萨的检疫港的防波堤。尽管军港司令得到过向一切英国军舰开火的命令，但是他还是决定暂缓执行命令，估计这艘蒸汽舰可能还不知道英国已经宣战。怒涛号抛了锚，放下了小艇，派它挂着军使旗向岸边驶去。军港司令立刻派自己的副官去见小艇上的军官。这个军官声明说，他被派来接运英法两国的领事。当时他被告知，这些先生早已离开敖德萨，因此他应立即离开；这样小艇就被放到了船上，军使旗也取下了，但是并没有起锚，蒸汽舰上的军官们都开始绘制炮台的图样。当时为了阻止怒涛号这样做，向它放了空炮，而怒涛号竟置之不理，因此向该舰的一个轮子打了一炮。怒涛号立即撒走了。”

英法舰队在对俄国港口采取敌对行动以前，先要等待俄国人提供“借口”。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占领这个港口，只是向它发射了好几排炮，这的确太可笑了。

大约在怒涛号奉派执行任务的同一时候，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敖德萨的来信证实，俄国政府没收了所有存放在仓库中的粮食，而根

本不顾这是外国商人的私人财产。一共没收了 80 万俄石粮食。此外，俄国政府还命令外国商人提供 15 万个麻袋和 15 000 辆货车，以便把没收的粮食运往内地。总督在答复抗议时说，正是西方强国的政策促使俄国政府采取这种极端行动，而且只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使这些财产免遭愤怒的居民的抢劫。留在敖德萨的中立国家的领事提出抗议以后，总督最后同意对没收的商品不给钱，而发给物主简单的收据。

下面是从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报纸上摘录的一段话：

“整个城市挤满了从芬兰逃出的难民，其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躲避俄国人强行征兵而从奥兰群岛逃出来的（显然奥兰群岛仍旧被俄国人占据）。俄国舰队非常缺乏水兵，当局[穷凶极恶地]不分老少地抓人，一些家长在夜间被匆匆忙忙地带走，一刻也不容耽搁。结果，为了躲避这种暴政，人们阖家带着全部家当逃往瑞典。”

上月 23 日《圣彼得堡报》刊载了沙皇给臣民的告示，其中说同西方强国的这场战争是正教会反对异教徒、为解放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教友而进行的战争。

今天的巴黎《新闻报》上刊登了下面这篇文章：

“我们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记者向我们报道了不久前被揭发的俄国阴谋的重要细节，关于这一阴谋的侦讯刚刚结束。侦讯清楚地表明，俄国早就在制造危机，使病人被自己的医生亲自送进坟墓。侦讯证明，厄尔斯纳男爵打入土耳其警察局供职，以便更好地欺骗自己的监视人。他每月得到 1 000 皮阿斯特。尽管他很狡猾，但是他玩的两面派手法还是这样被揭露了：他结交了在土耳其供职的一位医生阿斯卡先生，认为他可靠，便坦白地对他说，虽然他从土耳其警察局领取薪俸，但从来没有停止为俄国服务。据厄尔斯纳先生说，俄国打算从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招募一支 6 万人的阴谋者军队，准备根据预定的信号举行暴动，决定性的打击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领导这个城市的阴谋活动的是一个叫哈里逊（金雀花王朝）后裔的英国人。阿斯卡先生假装赞

同厄尔斯纳的意见，然而把他的情况暗中告诉了土耳其警察局。早就怀疑厄尔斯纳的警察局，对他加强了监视，并且发现他经常定期地向哥尔查科夫公爵送报告。最后警察局截获了一份报告。厄尔斯纳尽管一般说来行动很谨慎，却不慎把这份报告拿给阿斯卡先生看（阿斯卡马上向土耳其警察局的一个密探帕拉梅里先生作了汇报），并且当着阿斯卡的面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拉吉斯克兹（他是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同厄尔斯纳和他的同谋者保持着联系）。从拉吉斯克兹身上搜出了这封信，它成为一个物证。后来又查明，厄尔斯纳同希腊商船船长君士坦丁有过协议，他们曾商定再吸收 40 名希腊船长，这些人必须在指定的日期把弹药运到君士坦丁堡，并供应首都希腊居民举行暴动所必需的物资。君士坦丁不仅同厄尔斯纳保持经常的联系，而且同希腊驻土耳其大使梅塔克萨斯先生保持经常的联系。俄国上校博迪纳罗夫担任厄尔斯纳和哥尔查科夫公爵之间的联络人。”

在《奥格斯堡报》上出现了一些非常敌视俄国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因为该报迄今为止一直非常热心地捍卫俄国利益；同时，大家都知道，它是听命于奥地利内阁的。这些文章说，由于汉·西摩尔爵士的秘密信件中所揭发的事情，奥地利不再对俄国承担义务。一篇文章写道：

“俄国的行动使奥地利不得不向圣彼得堡提出抗议，而圣彼得堡在接受抗议书时态度非常傲慢，对待维也纳内阁非常无礼，以致自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每份新的紧急报告都引起痛苦的感觉。由于缺乏应有的尊重和敬重，门斯多尔夫伯爵不得不请求任命他担任旅长以免去他在圣彼得堡的职务，尽管他个人没有理由抱怨。”

结果，他的职务由埃斯特哈济伯爵接替。在另一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当俄国皇帝到奥尔米茨时¹⁵⁶，他对待布奥尔-绍恩施坦伯爵非常无礼，甚至可以说是进行侮辱，大家都觉察到了这一点，涅谢尔罗德和迈恩多夫为此感到非常难堪。〈我要提醒一下读者，涅谢尔罗德惯于挑拨他的至尊的主子干这

种傲慢无礼的事情,然后再对此表示惋惜。)年轻的皇帝亲眼见到人们怎样对待他的大臣,他忘记不了这件事。汉·西摩尔爵士的信只能促使更快地作出皇帝陛下早已认可的决定(抵抗俄国对奥地利的蚕食)……奥尔洛夫伯爵在驻维也纳期间拒绝代表他的君主承担在任何条件下尊重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责任。”

《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特别强调指出:希腊人暴动必然会导致希腊的革命,即导致民族派同俄国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帕沙在保加利亚的残酷镇压会使人民向往俄国。请允许我举出一些事实说明希腊对西方强国的态度。在《马赛新闻》上可以读到4月17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一则消息:

“居住在雅典的欧洲人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凌辱。甚至有人拿棍棒来殴打他们,而希腊的宪兵根本不制止这种行为。上月15日,法国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前驻雅典的法国领事的儿子加斯帕里先生被打倒在地上,当时有三个宪兵在场,竟然袖手旁观。就在同一天,其他法国人得到警告说,预定要受‘惩罚’的96个‘法兰克人’的名单已经拟妥。由于这种暴行,英法两国的代表向奥托国王政府提交了一个联合照会,说明对任何伤害英法侨民的行为都将立即索赔23 000德拉马。4月12日又向希腊政府送去了最后通牒,限期在五天内,即在17日以前答复。在这个最后通牒中,要求奥托国王赔偿法国人所遭受的损害,严厉谴责暴动,以及弥补由于姑息而造成的罪恶。谁也没有期望国王会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大使们在接到否定的答复以后,决定同该政府彻底断绝一切关系,同时根据承认希腊王国的议定书中的条款¹⁵⁷,以英法两国的共同名义任命自己为希腊行政官。”

希腊政府向驻各国外交代表发了通令,为希腊不久前在同土耳其政府发生争执时所采取的行为辩护。据帕伊科斯先生说,土耳其政府最近对待希腊臣民的一些措施是由于土耳其对不再具有把希腊看作是土耳其的一个省的特权感到恼怒而引起的,这也正是土耳其二十年来对希腊进行阴谋活动的根本原因,帖撒利亚和伊庇鲁斯的

暴动只是这种活动的借口。

4月28日维也纳《新闻报》刊载了丹尼洛大公向黑山人首领发出的呼吁书：

“我希望你们，黑山人，永远以我们的胜利的祖先（他们遗留给我们自由，我们为此在全世界面前感到骄傲）为榜样，表现得像希腊人和其他民族那样的英勇。因此，我想向已经入伍的士兵讲这番话，以便了解我是否能够信赖他们，并且我命令每个首领把本族的人召集起来。每一个士兵都应当自动地申述他是否愿意跟随我去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国家的共同敌人——土耳其人作战。你们首领们应该接收所有的志愿者，并把报告寄交采蒂涅我处。我要求所有不愿意英勇牺牲的人留在家里。跟随我去的人必须忘掉自己的妻子儿女，忘掉世界上他所爱的一切。我要告诉你们——我的勇敢的的人民和你们——我的教友们：不愿意同我一起去死的人大可不必离开原地；因为我知道，一个跟随我去作战的人要比50个胆小鬼宝贵得多。我号召所有心还没有变冷的勇敢的人，所有决心为祖国、为正教会、为神圣的十字架而毫不犹豫地去流血的人们同我共享光荣和美誉。我们不愧是战胜了三个土耳其大臣，打败过法国军队并攻占过苏丹的要塞的黑山先辈的儿子。我们决不出卖自己的祖国，决不放弃我们祖先的光荣，让我们以神圣的上帝的名义去战斗吧。

丹尼洛

1854年3月16日于采蒂涅”

在《阿格拉姆报》上可以读到一则消息：黑山各族首领为了响应对狂热的黑山流民发出的这个号召，召集了年轻的战士，向他们宣读了呼吁书，随后便有4000个人在圣坛前宣誓：“为信仰和祖国”不战胜便战死。不能不承认，这一运动同普鲁士独立战争¹⁵⁸（柯尼斯堡的多纳将军和整个普鲁士忠实者联盟¹⁵⁹都非常虔诚地纪念这次战争）的口号和愿望耐人寻味地相似。黑山人通过尼克希奇向黑塞哥维那的进攻将由丹尼洛大公亲自指挥。在南方经过扎布利亚克（向阿尔巴尼亚）的进攻将由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将军指挥。

《阿格拉姆报》写道：

“山地居民得到很好的弹药供应，并且这两个军都将拥有 12 门三磅半的加农炮。”

开始战斗行动的信号将由直接从圣彼得堡得到指示的柯瓦列夫斯基上校发出。

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得到了 3 000 万塔勒后，解散了两院，并发表了一篇演说，现在我从中摘引一段最有代表性的话：

“先生们！你们批准这项贷款，这就使政府有可能沿着过去所走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条道路就是：同奥地利和整个德意志保持完全一致（in voller Einigkeit），并且同其他强国一致；而且还有可能保持普鲁士在解决目前欧洲的重大问题时所应有的地位。”

请允许我指出，在英国报纸登载的关于这篇演说的电讯报道中，把“同其他强国一致”误译为“同西方强国一致”。普鲁士抱有更大的目的。它希望在同似乎是交战的双方一致的条件下商谈和平措施——同谁商谈呢？

就在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解散议院的那一天，他又有幸在自己的党的会议上发表了第二篇演说。这篇演说比上面引用的那些官场行话要精确得多、动听得更多。这篇演说是最出色的普鲁士现代作品。它可以说是普鲁士国务活动家的才能的萌芽。

他说：“先生们，有一个词被大家用滥了，这个词就叫作自由。我并不否定这个词，但是我的座右铭是另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服务（Dienst）。先生们，在这里开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上帝和皇上服务，我引以自豪的是我能为这样的皇上服务。服务这个词正在把分散在整个德意志国土上（in deutschen Gauen）的普鲁士国家团结在一起。这个词应该把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尽管我们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为皇上服务，这就是我的旗帜，同时也是在这里开会的

所有的人的旗帜,当代的救星就在这里。先生们,为皇上服务万岁。”^①

曼托伊费尔是对的,因为现在除了为皇上服务的普鲁士以外没有其他的普鲁士。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5 月
2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8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奥·冯·曼托伊费尔 1854 年 4 月 27 日在党团的告别宴会上的演说,见 1854 年 5 月 1 日《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第 102 号。——编者注

弗·恩格斯

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¹⁶⁰

欧罗巴号带来的报纸和信件证实了早先报道的关于炮击敖德萨的消息。现在收到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具有官方性质,对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港口的防御工事被破坏,两个火药库被炸毁,12艘俄国小战舰被击沉,13艘运输船被捕获,而联军舰队的损失是8人被击毙,18人受伤。人员伤亡不多,说明这决不是丰功伟绩。炮击之后舰队驶往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认为,他们将发现,要破坏塞瓦斯托波尔完全是另一回事。

从多瑙河的战场上传来了关于奥美尔帕沙取得对吕德尔斯将军的决定性胜利的新消息。但是,除了经由维也纳这个制造证券交易骗局的大工厂转来的电讯^①之外,我们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其他消息。按照这个说法,土耳其人以7万人的兵力,在锡利斯特里亚和位于多瑙河沿岸切尔纳沃德上游大约十英里的拉索瓦之间的一个地方,赶上了吕德尔斯。当奥美尔帕沙从正面压迫俄军时,专门派去进行迂回的另一个军便从翼侧去攻击他们,这样他们就在两面火力夹

① 《俄国人的失败》,见1854年5月4日《泰晤士报》第21732号。——编者注

攻之下被击溃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奥美尔帕沙怎么能够如此迅速地把那么巨大的兵力集中在锡利斯特里亚下游的某一地点,以致使吕德尔斯措手不及。¹⁶¹根据事前的最新情报,他的军队的全部力量——包括必须保障漫长的正面战线的守备队在内,总数不会超过12万人——集中在舒姆拉,距离所说的会战地点几百英里。要从那样长的距离之外把7万人调到战场,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们再说一遍,这是可能的。下一班轮船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消息,说明这是否属实。^①

希腊人暴动⁷⁷又一次受挫,但是不能认为因此暴动已被彻底镇压下去。没有疑问,一些士兵和指挥人员将重新起来进行斗争,至少会在边境地区对土耳其军队进行骚扰性的游击战,这是否会成为某种颇为严重的威胁,要取决于各种情况。正如我们的读者在另一栏中看到的^②,在土耳其内部,希腊人和俄国人的一个广泛的密谋已经酝酿成熟;由于偶然的情况,它的一切线索都被土耳其政府所掌握了。⁸¹但是,还可能发生不会被任何事件在中途打断其进程的其他类似的密谋,同时,同盟国不断地对希腊朝廷进行威胁,并派军队在土耳其登陆,好像是要把这个国家彻底据为己有。虽然根据法国大使^③的建议,派了一支部队向北开往可能随时发生冲突的瓦尔纳,但是这些军队的大部分仍然留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不过,联军的主力是否这么快就发动进攻战还值得怀疑。这一点要在司令官们^④到达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②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指该报同一天发表的《希腊人暴动》一文。——编者注

③ 阿·巴拉盖·狄利埃。——编者注

④ 菲·詹·拉格伦和阿·圣阿尔诺。——编者注

君士坦丁堡之后才能决定。

在波罗的海,查理·纳皮尔爵士仍然留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没有攻击俄国任何一个沿海要塞。看来使他担忧的是俄国人打算在浅水域和芬兰湾岛屿间用来攻击他的一支小炮艇队。纳皮尔已派人去英国寻求吃水浅的小蒸汽船,这种船能够追击炮艇,直至它们的隐蔽处。另一方面,根据一家柏林报纸驻圣彼得堡通讯员的报道^①:俄国宫廷担心喀琅施塔得不能抵抗预计不列颠 Rough and Ready^②会实行的攻击,担心港湾里的军舰即使为了检阅,也不能顺利地进行机动和射击;而且俄国甚至正在进行准备以便抵抗对方陆军在这个地区登陆。

但是,在法国军舰也抵达波罗的海之前,不大可能实行任何进攻。之后,喀琅施塔得大概会得到首先遭受炮击的殊荣。它是被占领还是被破坏,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在联军对它采取这种破坏手段的情况下,它的陷落是不足为奇的。

西方强国自以为奥地利正在转向它们方面,并因剑桥公爵在皇帝^③婚礼上受到殷勤接待而欢欣鼓舞。然而,从普鲁士却没有收到类似的令人快慰的消息。总的说来,德国还是站在原先的立场上,而同盟国没有希望吸引德国参加有利于自己的任何事业。毫无疑问,

① 指《国民报》发表并由1854年5月3日《泰晤士报》第21731号转载的简讯。——编者注

② 对19世纪英国士兵的戏谑的称呼。在滑铁卢战役中,因为上校拉夫(Rough)成功卓著,威灵顿公爵使用这个英雄的姓氏称他为“Rough and Ready”(“鲁莽的,但时刻准备行动的”),这次战役以后,这一称呼成了普通的用语。——编者注

③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奥地利会占领塞尔维亚和已经爆发反对苏丹的真正起义的黑山^①，然而正如我们早已指出的^②，这种占领仅仅是走向瓜分土耳其的又一步骤，实际上更加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它的敌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5 月
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5 月 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8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参看本卷第 260—267 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28—29 页以及本卷第 100—109、110—117 和 161—178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财政¹⁶²

1854年5月9日星期二于伦敦

虽然炮击敖德萨这一毕竟并非十分重大的事情给公众的心灵以很大的刺激,但是目前另一种炮击给公众的心灵的影响更加强烈,这就是对公众钱袋的炮击。在分析格莱斯顿先生昨天在下院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财政状况的报告之前,必须首先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他所实行的财政措施。

迪斯累里先生在任大臣时,曾把国库期票的利息降低到每天 $1\frac{1}{4}$ 便士,即低于以往任何时候。但是格莱斯顿先生一心想超过他的前任,进一步把利息降低到1便士,而没有注意到,迪斯累里先生降低国库期票利息时,货币十分充足而且不值钱,但在格莱斯顿先生打算超过他的对手时,货币很少而且非常值钱。因此,这位伟人不得不支付300万英镑以兑换国库期票;如果他不去干涉,这些国库期票还会按照原来的利率继续流通。不仅如此!政府还没有来得及依靠使国家大受损失的办法偿清国库期票,就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重新发行期票。这就是牛津诡辩家的卓越天才的第一个明证,他总认为

在他一个人身上似乎集中了全部天才，因为群贤的联合内阁抓住财政计划问题推翻了托利党政府，这样也就是宣布财政是联合内阁政策的最强有力的一个方面。

格莱斯顿先生并不以短期国债的这些措施为满足，他在长期国债上又进行了一个更不寻常的试验。1853年4月，他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关于转换南海公司¹⁰¹股票和其他国家有价证券的十分复杂的计划，预计在半年到一年之后他不得不付出950万英镑。有人曾十分公正地指出，他这么做的时候，已经得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的紧急密件以及罗斯上校和肯宁安领事的警告，这些消息使他对于俄国政府的敌对意图和欧洲战争的临近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了。大概读者还记得，就在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他的计划的时候，我曾预言，它会失败，而且它将使政府在此财政年度结束时不得不举借500万或600万英镑的债。^①我这样断言时，决没有考虑到东方的纠纷。此外，格莱斯顿先生计划的不切实际的形式未必能迷惑证券交易所里的那一伙投机分子；不需要有特别的远见卓识，就可以预言必将发生歉收，因为淫雨使播种面积比往常大大减少了；而收成不好势必引起国内黄金和白银的外流；金银外流当然不会制止已经出现的金融市场上利息提高的倾向，而在金融市场上利息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如果认为给国家提供贷款的人肯让自己的有价证券的利息降低，或者认为他们不会积极抓住格莱斯顿先生的试验给他们提供的机会，坚决要求按票面价值偿付自己的有价证券，以便在第二天把得到的这笔钱再拿去进行投资以获取纯利，那是十分可笑的。事实上，在财政年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62—86页。——编者注

度结束时，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按照票面价值支付南海公司的分年偿还的债券 600 万英镑，如果不是他干预的话，这种债券目前在证券交易所里每 100 英镑只值 85 英镑。这样一来，他不仅没有任何必要而花费了 600 万英镑的国家资金，而且，由于采取这一壮举，国家遭受了至少 100 万英镑的实际损失；而国库的结余在 1853 年 4 月有 780 万英镑，到 1854 年 4 月战争的期间已经降到只有 2 778 000 英镑，即减少了 500 多万英镑。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这个失败了转换计划，是政府现在不得不努力克服的一切财政困难的根源。格莱斯顿先生在 3 月 6 日，即在宣战前 24 天说，他的全部措施的基础是要在年内筹出资金以应付目前的开支；还说 he 已采取了种种措施，只用现有的金钱去应付战争负担，根本不必谈论在金融市场上寻找贷款的问题。这番话他在 3 月 22 日重复过，甚至在 4 月 12 日又重复一遍。然而在 4 月 21 日议会休假期间却发出正式通告说，需要贷款，因此将发行 600 万英镑的国库债券。读者们大概还记得，国库债券是格莱斯顿先生发明的，并且是和他的转换计划同时提出的。

普通国库期票是一种为期 12 个月的债券，通常在期满时兑换或者偿还，而且期票的利率是随着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波动的。相反地，国库债券的利率在几年之内是固定的，它是一种分年偿还的定期债券，通过简单的背书即可随手转让，买方或卖方都无需任何花费。总之，可以称它们为铁路债券的仿制品。格莱斯顿先生在 1853 年第一次发明这种债券时，得到了发行 3 000 万英镑债券的权力，他如此赞赏自己的发明，以致认为这 3 000 万英镑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而且其实际价值将大大超过票面价值。但是“公众吞下 40 万英镑稍多一点就饱了，这大约等于格莱斯顿估计所需总额的七分之一”。格莱斯顿先生为了筹集他所需要的 600 万英镑贷款，发行了流通期为四年、

五年和六年的三类国库债券。为了使这些债券更容易为交易所接受,他决定对还没有收上来的分期付款的款项支付利息。他设想,债券按票面价值出售,利息三厘五,他认为新式债券具有极不寻常的好处,这相当于10—16%的股息。在开始认购时就发现,1858年还本的第一类债券总共只售出了80万英镑,其他两类即1859年和1860年还本的债券,根本没有人要。还不仅如此。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减价推销自己的商品,按98.75%的最低价格出售,并再加上几个月的利息;这样一来,他不是维持南海公司的三厘股票,而简直是按四厘利息借债,因而损失15%的资本和25%的利息。尽管作了这些让步,他仍然遭到了彻底失败,因为他不得不把认购债券期限延长到本月8日,而且从原先要求600万英镑降低到“令人可笑的区区之数”200万英镑。这次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格莱斯顿先生的商品既不适用于长期的投资,也不适用于短期用途;因为在1858年和1860年还本,在目前情况下是十分成问题的;最后,因为当市场利率提高之时,在几年之内利率固定不变的债券不会像利息必然随着币值的增加而提高的国库期票那样被人欣然接受。

格莱斯顿先生把三类不同的国库证券投入市场,他还嫌不够,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下院提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甚至三个或四个预算方案。为了有别于前任财政大臣,他在3月6日即财政年度结束前,作了关于财政状况的报告,据他说,这是为了使全国清楚地了解国家的当前形势。他告诉下院说,预算中的结余为300万英镑,但是由于形势十分严峻,政府不得不增加600万英镑的开支,因此在今年要准备好应付300万英镑的赤字。在这之后,还不到两个月,他又向下院要求大约700万英镑,虽然早在3月份他就完全能够准确地计算出他要向公众索取多少钱。

他要求的新追加的预算拨款如下：

海军	4 550 000 英镑
陆军	300 000 英镑
炮兵	650 000 英镑
补充的民军	500 000 英镑
意外开支	2 100 000 英镑
<hr/>	
共 计	8 100 000 英镑

海军、陆军和炮兵的预算，已经在星期五晚上被一致批准了。我要简单地说明一下要求拨款的各种项目：有 30 万英镑用于增加 14 799 名陆军官兵，这就会使陆军的名额比去年增加 40 493 人，即达到 142 000 人。炮兵的追加预算总共 742 132 英镑。海军的追加预算总共达 4 553 731 英镑（其中包括一部分炮兵的追加预算），可以列成下表：

1. 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薪金，因为海军补充了兵员 11 000 人，即 2 500 名海岸警卫队士兵和 8 500 名志愿兵
- 461 700 英镑
- (一) 支付超役 6 个月 5 000 名水兵的薪金，应当在 1885 年 3 月 31 日年度结束时支付
- 110 000 英镑
- (二) 支付 2 500 名海岸警卫人员和现在服役于舰上的索具兵的超出水兵薪金部分的额外薪金
- 51 700 英镑
- (三) 用于征募 5 000 名后备水兵
- 220 000 英镑
- (四) 到 1855 年 3 月 31 日止超役 6 个月的 5 000 人的给养
- 80 000 英镑
- (五) 追加储备粮，给养运费以及几种粮食和给养涨价的支出
- 50 000 英镑

(六)在舰队中服役1年的5 000名补充兵员的 种种给养等	100 000 英镑
(七)白厅和萨默塞特宫 ¹⁶³ 各机构因战争需要而增添的 办事员的工资	5 000 英镑
(八)国内几个海军机关、粮食机关和医疗机关中 额外的工资	2 000 英镑
(九)国外海军机关的技师和其他人员的额外工资	1 000 英镑
2. 用于海军的补给	697 331 英镑
(一)购置蒸汽舰的用煤和其他燃料	160 000 英镑
(二)购置用于替换已经发给舰队的物品的储备品	40 000 英镑
(三)蒸汽机的购置和修理,因为已经决定,预 备舰队中应当以蒸汽舰为主	252 674 英镑
(四)购买蒸汽舰、炮艇等等	244 657 英镑
3. 造船厂的新建、改造和修理	7 000 英镑
4. 药品和医疗器材	30 000 英镑
5. 其他各项供应	6 000 英镑
<hr/>	
共 计	1 457 031 英镑 ^①

二

有些项目虽然已经列入海军预算内,但与其说是属于海军不如说属于陆军,这些项目包括:

1. 按月支付的包括蒸汽舰在内的船只运费,
购买船只以及租用8艘新蒸汽舰和
86艘帆力舰,其中包括装载骑兵的75艘
巡航舰
2. 租用装运军队及其给养的船只的运费,因
为政府已经租用18艘蒸汽舰和86艘帆
力舰,租期1年

① 这个总数不包括(二)、(三)、(四)三项,这三项列入第二类总数。——编者注

共 计 3 096 700 英镑

总 计 4 553 731 英镑①

格莱斯顿先生打算用下列办法新增加一些税收,即继续加倍征收所得税直到战争结束,把麦芽消费税从2先令9便士提高到4先令,把苏格兰的酒类消费税每加仑提高1先令,把爱尔兰的酒类消费税每加仑提高8便士,并把本来要在今年7月5日实行的降低食糖的消费税的措施推迟实行。关于酒类、麦芽和食糖的决定很快就通过了。

酒类消费税的提高不会增加税收,因为它使酒类的消耗量大大降低。新的麦芽消费税是对持照营业的小酒店主和他们的顾客的一种惩罚,因为他们的正式喉舌《晨报》曾表现自己是那么热烈地拥护战争。食糖的消费税一定使今年的腌汁和蜜饯发苦。至于所得税,大家十分清楚,4月18日,即收到罗斯上校和肯宁安领事的关于俄国备战的信件三天以后,格莱斯顿先生曾经宣称,七年之后所得税将不存在了。大家同样十分清楚,格莱斯顿在3月6日曾宣称,加倍征收所得税只要实行半年就够了。格莱斯顿先生或者是古往今来最无远见、目光短浅的财政大臣,或者是他故意装作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误导、迷惑和蒙蔽公众。

不列颠的公众不仅必须为对俄战争、为格莱斯顿先生的庸医骗术和拘泥细节的小聪明而付出费用,还不得不供给沙皇以进行对英

① 这份统计表是马克思根据詹·格雷厄姆1854年5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编制的,演说见1854年5月6日《泰晤士报》第21734号。——编者注

战争所需的资金,正如约翰·罗素勋爵在星期五晚上所说的那样,不列颠政府将继续偿还被载入了维也纳条约的所谓俄荷贷款协定¹⁶⁴中规定清偿的借款的本息;条约的主要条文之一规定,波兰应当保持独立的立宪王国,克拉科夫应成为受保护的自由城市,欧洲各河流,因而也包括多瑙河,应实行航行自由。

对爱尔兰人是否忠诚的怀疑看来是很大的,因为帕麦斯顿勋爵宣称,女王陛下政府今年不打算招募爱尔兰人加入民军。就是这个帕麦斯顿曾以约翰勋爵没有把民军法推行到爱尔兰去而激起了爱尔兰的愤怒为借口,推翻了罗素内阁。大臣们在铁路法案上遭到实际的失败,这个法案只包括为了这个问题而召开的议会委员会所建议的条款一小部分。因为铁路的老板们强有力地组织起来了,英勇的卡德威尔先生宁肯代表内阁撤回他原来的法案,用另一个由铁路公司经理们自己制定的法案来代替它,这个法案既没有给经理增加任何义务,也没有规定比现行规章更严格的规章。当这个法案在议院里讨论时,除了那些身为议员的铁路公司的经理外,没有任何人出席。

一家周刊写道:

“看来,大臣和议会既不能保护股票持有人的财产和旅客们的口袋,也不能保证公众的人身安全不受铁路公司的侵犯,因为铁路公司硬说它们有权任意处理这些贵重的东西。”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5 月
9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8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辉煌的胜利¹⁶⁵

英国报纸对于沙皇奖励奥斯滕-萨肯将军在最近一次联军舰队同保卫敖德萨港的筑垒工事守军之间的战斗中所起作用一事,恣意发表了大量尖酸刻薄的评论。它们认为,在这次战斗中联军获得了全胜,而敌人的狂欢只不过是俄国人吹嘘和沙皇撒谎的又一个例子。我们对沙皇或奥斯滕-萨肯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尽管后者无疑是一个聪明而果断的人(他是指挥在多瑙河两公国的一个军的另一位奥斯滕-萨肯将军的兄弟¹⁶⁶),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对敖德萨的这一次胜利的真实情况进行略微认真的分析,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弄清到底是哪一方自吹自擂和造谣欺骗,是有好处的;何况到目前为止,这是联军和俄军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我们了解一些情况的战斗。

从双方公布的正式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军舰队在敖德萨出现的目的,是要求总督交出停泊在该港的英、法、俄的所有船只,作为射击不列颠军使旗的赔偿。联军明知这样的要求是不会得到任何答复的,因此他们显然已准备好以武力来夺取他们所要求不到的东西。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那就是说不管他们如何重创敌人,他们也是遭到了真正的失败。

当时的形势究竟是怎样的呢？从俄国政府任命奥斯滕-萨肯为紧靠多瑙河军团后方的广大地区的长官这一命令本身，以及奥斯滕-萨肯把自己的指挥地点选在敖德萨城这一事实，都表明俄国人是多么自然地而且正确地重视这个地点。正是在敖德萨，敌人的登陆可能使俄军遭受最大的损失。敌人在那里不仅可以得到一个大城市的一切资源，而且可以得到全欧洲的粮仓；到了这里，他们距离在土耳其作战的俄军的交通线和退却的路线也最近。在这种情况下，联军的两位海军上将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大量的守军防守，以他们现在所能派出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去登陆的任何尝试都将立即破产。但是不派兵登陆，不占领敖德萨，——如果不能占领城市，哪怕只是短时间占领港口也好，——他们就不能指望解救被扣留在那里的英法船只。实现这个目的的唯一希望，就是对这个城市进行最猛烈的炮击，使任何部队继续在城内停留都有危险，然后再试图解救自己的船只。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非常宽阔的街道和广场，而且可能中弹起火的建筑物占地较少的大城市进行炮击，能否达到这一目的是令人怀疑的。因此，海军上将们应当了解，如果奥斯滕-萨肯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是无力坚持这一要求的。但是他们认为，在军使旗受到射击以后，必须对敖德萨采取某种行动，于是他们就开始行动了。

敖德萨的海口在岸边由六座大概拥有 40—50 门二十四磅和四十八磅火炮的炮台防守。其中参加战斗的只有两三座炮台，因为进攻者一直在其余炮台的射程以外。联军用来对付这些炮台的有八艘蒸汽巡航舰，舰上约有 100 门火炮，但是由于这次战斗的特点只能使用一边舷上的火炮，联军在火炮数量上的优势就大大减弱了。从口径来看，双方火炮的威力显然大致相等，因为二十四磅的火炮虽然不

如三十二磅的长管炮,但四十八磅的重炮同不能使用全装药的、发射爆炸弹的五十六磅和六十八磅的火炮无疑是相等的。最后,军舰比胸墙更容易被攻击,军舰的运动使瞄准不精确,这些都使得岸防炮处于比舰炮优越的地位,甚至当舰炮在数量上占更大优势时也是如此。石勒苏益格的埃肯弗德战斗(1849年)¹⁶⁷就是一例。在那次战斗中,共有10门火炮的两座炮台击毁了一艘装备有84门火炮的军舰,打坏并俘获了一艘有48门火炮的巡航舰,还击退了两艘装备精良的蒸汽舰的攻击。

总之,由于参加这次战斗的只有岸防炮和八艘蒸汽舰,即使把战斗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英法两国火炮的射程较远、射击比较准确的情况估计在内,也只能说这次战斗大致上是势均力敌的。因此,破坏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许多小时炮击的唯一战果,是击毁了俄军两门火炮。最后,联军向前推进并改变了战术。他们不再对炮台的石墙射击,开始用炮弹和燃烧火箭轰击港口内和港口周围的俄国舰船以及军事建筑物。这样做收到了效果。现在瞄准的目标已相当大了,以致每一发炮弹都能落在某个易受攻击的地方;不久,一切都淹没在火海中。位于防波堤顶部的那座抵抗得最顽强、一开始就受到主要攻击的炮台后面的军火库爆炸了。这次爆炸以及火势向周围蔓延,终于迫使炮台内的守军撤退了。同往常一样,这一次俄军炮兵又显示出他们本领很差,却非常勇敢。他们的火炮和霰弹看来质量很低,而且火药的威力很小。

其实,整个战斗的结果也就只有这些。在防波堤顶部的俄军炮台的四门火炮的火力被压制了,所有其他的炮台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军火库爆炸的破坏力并不特别大。根据军火库紧靠炮台后面这一情况判断,显然它是只供这一座炮台使用的,其中只储存一天

的弹药,四门火炮每门约60—100发炮弹;如果减去当天可能已经消耗的炮弹数,那么可以说那里所剩的不超过300发炮弹。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判断其他设施遭到损失的程度;联军当然无法查明这次损失,而俄军则极力缩小所遭受的损失。但是,从俄国人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被烧毁的船只并不是英法两国的报道所断言的军舰;可能,这是几艘商船加上一些运输船只和政府的客轮。此外,以前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在敖德萨有什么俄国军舰。

在战斗期间,有两艘法国商船和一两艘英国商船逃出了港口。直到今天还有七艘英国商船被扣留在那里。因此,“英勇的”海军上将领们没有能实现自己的要求,既然他们没有获得积极的战果,只击毁了六座炮台中的一座而不得不退却,那么他们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进攻被击退了。他们的人员伤亡非常少,但是有几艘军舰的舰体被击伤,而且法国蒸汽舰沃邦号被炽热的炮弹击中起火,不得不暂时退出战斗。

这就是不列颠报纸所说的“从敖德萨传来的光荣消息”,而在英国人心目中也抵消了海军上将邓达斯过去的一切失策。不仅如此,这次战斗竟大大鼓舞了英国人的斗志,以致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海军上将领们确信自己的火炮在射程方面大大优于俄军的火炮,毅然决定轰击塞瓦斯托波尔;实际上,他们确实到了那里,并发射了几发炮弹。但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因为无论什么人,只要一看塞瓦斯托波尔的平面图就会了解,对这个城市和港口的任何进攻(不管是不是进行炮击),如果不想成为在海湾外一次仅仅是装样子的战斗,那么就必须在狭窄的水域内、甚至在野炮的射程内进行。

我们对这种枯燥无味的叙述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英国同行们对这次战斗(他们的进攻被彻底击退,而预定目的又完全没有达到)

的大吹大擂,同他们过去对战争进程所作的评论和推断的总的腔调很少有什么区别。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我们认为,历史必将公正地写下,战争最初阶段的特点是充满造谣、诡辩、欺骗、外交手腕、军事吹嘘、谎言等手段,在这方面英国和俄国是一模一样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5 月
1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6 月 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9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¹⁶⁸

1854年5月19日星期五于伦敦

今天报上登载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攻击”的电讯,看来这次攻击像对敖德萨的炮击一样(在这次炮击以后,双方都宣称自己胜利了),是一次光荣的英勇事迹。根据所描述的情况看来,这一次攻击是使用“远射程”炮轰击,目标是外围工事。要攻击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和城市本身,如果不进入港湾和逼近城防炮台,无论用什么射程的火炮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大量登陆部队的支援,要占领这个城市一般也是不可能的。这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很清楚,而且所有的军事权威都承认这一点。因此,必须把这场战斗(如果它确实已经发生了的话)的英勇事迹看成是虚假的,其目的是使被敖德萨的胜利激发了爱国热忱的头脑简单的人受到鼓舞。

法国政府派布雷先生到希腊去执行特别的任务。随同他前往的有福雷将军指挥的一个旅,他受权要求奥托国王立即偿付法国在1828年借给希腊政府的一亿法郎贷款的全部利息。如果遭到拒绝,

法军就要占领雅典和王国的其他一些地点。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所叙述的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清扫领地的过程，由于这种清扫，本世纪前半期有千千万万的人被从祖居的土地上赶走。¹⁶⁹这种清扫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是以无愧于这个模范国家的有美德的、高雅的、笃信宗教的、仁慈的贵族的那种毅力进行的。那些无保护的居民的房子不是当场被烧掉，就是被捣毁。去年秋天，在诺伊德特的尼加特庄园里，根据大地主的命令，向受人尊敬的、诚实的、爱劳动的唐纳德·麦克唐纳的房子进行了袭击。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不能迁移；但是管理人和他的一伙帮凶把麦克唐纳的六个都不满15岁的孩子赶出去了，把房子捣毁了，只剩下他妻子病床上方的一块不大的屋顶。

麦克唐纳被逼疯了。他被医生宣布为精神病患者；现在他到处徘徊，在被烧毁和捣毁的住房的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他的饥饿的孩子们围着他哭哭啼啼，然而他不认识他们。他四处游荡，得不到帮助和关照，因为他患的是文静的精神病。

两个即将分娩的已婚妇女亲眼看着自己的住房被捣毁。她们多日在露天下过夜，结果两人倍受痛苦，都早产了，弄得精神失常；现在她们带着自己的一大群孩子——无助又无望的低能儿——到处流浪。这是揭露所谓的不列颠贵族阶级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甚至孩子们也由于受惊和受迫害而精神失常了。在诺伊德特的杜恩，被赶出自己住所的贫农佃户栖息在一座旧仓库里。深夜，地主的代理人包围了这座仓库，并放火把这座无家可归的穷人正借以栖身的仓库烧掉了。人们发狂地从火中逃出来，有些人吓疯了。《北方旗帜报》写道：

“一个男孩完全疯了，因此不得不把他隔离；他常从床上跳起来叫喊‘火！火！’，并要周围的人相信，在燃烧着的仓库里还有大人和小孩。天黑以后，他一看到火光就害怕。正是杜恩这种骇人的景象——仓库燃烧着，照红了四周，一些吓得半疯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旁边东奔西窜——使他失去了理智。”

贵族就是这样来对待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完全有劳动能力的贫农的。现在请听一听贵族的教区的慈善事业吧。现在我根据格拉斯哥的唐纳德·罗斯先生和《北方旗帜报》的材料举出以下的事实：

1. 寡妇马瑟森，96岁，每月从斯凯岛斯特拉斯教区只领到2先令6便士；
2. 默多·麦金托什，36岁，14个月前被大车压伤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他有妻子和七个从1岁到11岁的孩子；他每月从斯特拉斯教区只领到5先令；
3. 寡妇赛米尔·坎伯尔，77岁，住在斯凯岛布罗德福德一间半倒塌的破屋里，她每月从斯特拉斯教区领到1先令6便士。她抱怨说，这一点钱不够用，教区当局拖延了很久以后，才把她的补助金增加到每月2先令；
4. 寡妇麦金农，72岁，她从斯凯岛斯特拉斯教区每月领到2先令6便士；
5. 唐纳德·麦克杜格尔德，102岁，住在诺伊德特。他的妻子77岁，两人身体都很弱。他们每人每月从格伦埃尔格教区只领到3先令4便士；
6. 玛丽·麦克唐纳，寡妇，93岁，卧病在床。她的丈夫服兵役时失去了一支胳膊，20年前去世。她每月从格伦埃尔格教区领到4先令4便士；
7. 亚历山大·麦基萨克，53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他的妻子40岁，有一个双目失明的18岁的儿子和四个不满14岁的孩子。格伦埃尔格教区每月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6先令6便士，平均每人每月不到1先令；
8. 安格斯·麦金农，72岁，他的妻子66岁，有病，他们每人每月领到2先令2便士；
9. 玛丽·麦基萨克，80岁，身体很弱，双目完全失明，每月从格伦埃尔格教区领到3先令3便士。她要求增加，视察员回答说：‘别人比你领得还少，你要求增加怎么不害羞’，视察员说完以后就再也不听她说的话了；
10. 珍妮特·麦克唐纳，也叫麦吉利夫雷，77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她每月只领到3先令3便士；
11. 凯瑟琳·吉利斯，78岁，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她每月从格伦埃尔格教区只领到3先令3便士；

12. 玛丽·吉利斯,也叫格兰特,82岁,已经有八年卧病在床,她每月从阿德纳默汉教区领到28磅粗面粉和8便士。济贫所的视察员已经有两年没有到她那里去了;她得不到医疗,也得不到必要的衣服和食品;

13. 约翰·麦凯钱,86岁,卧病在床,住在阿德纳默汉教区奥赫阿克雷,教区每天给他1磅粗面粉,每月给他8便士。他没有衣服,也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4. 尤恩·麦卡勒姆,93岁,有眼疾。在阿盖尔郡的纳普代尔教区,我发现他在克林楠运河两岸求乞。他每月领到4先令8便士,他没有衣服,得不到医疗,没有燃料,没有住房。这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一个可怜的叫化子;

15. 凯特·麦克阿瑟,74岁,卧病在床,她孤单地住在纳普代尔教区的达纳迪。她每月除了从教区领到4先令8便士以外,什么也没有。医生从来不到她那里去;

16. 珍妮特·克尔,也叫麦卡勒姆,寡妇,78岁,健康状况不好;她每月从格拉斯里教区领到6先令。她没有住房;除了这点现金补助外,得不到任何其他帮助;

17. 阿奇博尔德·麦克劳林,73岁,住在阿品教区,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他的妻子同他一样丧失了劳动力;他们每人每月从教区领到3先令4便士补助金,他们既没有燃料、衣服,也没有住房。他们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简陋不堪的破屋里;

18. 寡妇玛格丽特·麦克劳德,81岁,住在洛克布鲁姆教区的科伊加克,她每月领到3先令;

19. 寡妇约翰·马更些,81岁,住在洛克布鲁姆教区的阿拉普尔;双目完全失明,身体很弱;她每月只领到2先令;

20. 寡妇凯瑟琳·麦克唐纳,87岁,住在基尔布兰登教区的卢英岛;双目完全失明,卧病在床。她每月领到7先令生活费,其中包括付给助理护士的费用。她的住房倒塌了,但是教区不答应给她房屋,她睡在毫无遮盖的外屋的地上。视察员拒绝给她任何帮助。”

但是残暴行为还不止这些。不久以前在斯特拉斯卡伦发生了一次屠杀事件。一大批被逼迁暴行和可能再次遭受逼迁弄得精神失常的妇女,听说有一批该郡的政法官员要来驱逐佃户,就聚集在街头。然而来的并不是政法官员,而是税吏;税吏们得悉他们的身分被误解

了时，便将错就错，冒充政法官员，说来这里是为了叫居民迁移并说非迁移不可。妇女们开始激动起来，官员们就用子弹上膛的手枪威胁她们。至于以后的情况，在唐纳德·罗斯先生的信中作了描述，他是从格拉斯哥抵达斯特拉斯卡伦的，并在这个地方逗留了两天以收集消息和探望伤员。他1854年4月15日在泰恩市的皇家旅馆写的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所收集的消息证实了郡长的可耻行为。他没有事先向人们提出警告，说要派警察来对付她们。他没有宣读骚乱取缔令¹³⁰。他甚至没有给她们以散开的时间；相反，他带着自己的队伍手持木棍向她们逼近，高喊：‘滚开！’紧接着又喊：‘狠揍她们！’随后立刻出现了一幕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情景。警察开始用沉重的木棍打这些不幸的妇女的头部，把她们击倒在地上，在她们倒地之后又打她们，践踏她们，野蛮地朝她们身上乱踢一气。不久整个地面上染满了鲜血。倒卧在血泊中的妇女和儿童的喊声震撼了天地。一部分被警察追击的妇女跳进了水深流急的卡伦河，认为它比警察和郡长要仁慈一些。一些妇女的头发被警察的木棍一束一束地打落下来；一个女孩遭到了木棍野蛮的毒打，从肩上打掉了一块约7英寸长、 $1\frac{1}{4}$ 英寸宽、 $\frac{1}{4}$ 英寸多厚的肉。一个少女只是一个旁观者，就遭到三个警察的追打，他们打她的前额，砍伤了她的头，而在她倒在地上以后又踢她。医生从伤口里取出了一块被凶狠的警察打进伤口的头巾布。少女背上留下的靴钉的痕迹仍清晰可辨。现在在斯特拉斯卡伦还有十三个妇女由于遭到警察的摧残而处于危险状态中。其中三个人情况很不好，医护人员认为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根据这些妇女的外貌、她们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我所收集的医生的诊断书，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受伤的人中能够康复的不超过一半；所有哪怕是能活下去的人，也将在身体上保留着她们所遭到的极端残暴的迫害的可悲的证据。在伤势特别严重的人中有一个孕妇。她并没有站在郡长对面的人群中，而是站在颇远的地方，并且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她也遭到了警察的毒打和脚踢，她的情况非常危险。”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遭到袭击的妇女有18人。郡长姓泰勒。
这就是1854年不列颠贵族阶级的面貌。

地方当局和政府商定,只有在停止对普雷斯顿治安法官和棉纺大王的的活动进行调查的条件下,才能停止对考威尔、格里姆肖和普雷斯顿罢工¹²⁸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司法追究。正是根据这一协议,停止了对普雷斯顿治安法官和棉纺大王的调查。

邓库姆先生拖延了两星期才向议院提出成立调查普雷斯顿治安法官活动的委员会的建议,据说就是根据上述协议。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5 月
19 日

载于 1854 年 6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9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战 争¹⁷⁰

我们终于有必要来报道“英国水兵”的功绩了。纳皮尔海军上将的舰队经过八小时的炮击后,摧毁了古斯塔夫斯韦恩堡垒(瑞典文的音译,意思是古斯塔夫堡垒或要塞)并俘获守军 1 500 人。这是对俄罗斯帝国领地的第一次严重攻击,同松弛的、沉寂的敖德萨战事比较,它至少证明,查理·纳皮尔只要有可能,就不打算牺牲自己的荣誉和祖先的荣誉。古斯塔夫斯韦恩堡垒位于形成芬兰西南角的半岛的顶端,并在所有航行于芬兰湾的船长所熟悉的汉科灯塔附近。堡垒的军事意义并不大,只保卫着很小一片水域和陆地,因此进攻的舰队可以毫无危险地把它留在后方。根据守军的数量判断,堡垒本身也不会很大。但是,关于俄国波罗的海沿岸防御的实力和价值,目前甚至连英国海军部和陆军部也毫无所知,因此,我们在得到详细情况以前暂不对这件事的战术意义作任何评论,也就情有可原了。

我们现在只能说,八小时的炮击证明俄军的防守虽然不是非常巧妙,也是很勇敢的,并且预示着他们在防守这一海湾内的头等要塞时,将进行比预料顽强得多的抵抗。另一方面,1 500 人被俘对于俄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损失(这等于多瑙河上平均每两天因疾病而损失的人数)。但是这些俘虏将使纳皮尔非常难办。他究竟怎样处

理他们呢？不管他们是否作了保证，他都不能放走他们，而可以遣送他们的最近的地点是英国。要保证顺利地运送这 1 500 人，至少需要三艘战列舰或多一倍的蒸汽巡航舰。这一战果本身会使他的行动迟滞两三个星期。此外，没有登陆部队，他怎能扼守已夺得的领土呢？假如他不再一次减少每一艘舰上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名额，从而再度削弱本来人力就已不足的舰队，我不知他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想提一下目前在不列颠报刊上已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的一个问题，——当然，这种讨论照例是太迟了。

不列颠的报刊突然发现，一支舰队无论怎样强大，如果不载有足以用来登陆和扩大战果的部队，那它的作用就是很小的；仅仅靠舰队对沿岸要塞射击，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得到很不完整的胜利。一直到上月末，不论是指导战争的英国官方人士还是指导英国舆论的官方人士，似乎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同时，现有的全部军队和运输工具都已经用于黑海；受命开往波罗的海的陆军一共只有 2 500 人的一个旅，而这个旅一个人都没有出发，连司令部本身还根本没有组织起来！

法国人同样是缓慢得可怜。他们的波罗的海舰队，——人们还记得杜科大臣大言不惭的报告：“陛下命令装备第三支舰队；陛下的命令业已执行！”——这一支本应该在 3 月中旬就准备起碇并由 10 艘战列舰编成的声势浩大的舰队，实际上还只有不超过 5 艘战列舰，它们现在正同巡航舰和小型舰船一起沿着大贝尔特海峡缓慢地前进。这些舰船由布雷斯特到达那里整整用了三个星期，虽然一直刮着西风。所谓为了波罗的海远征集结 15 万人，必要时集结 20 万人到圣奥梅尔大兵营的计划，写在纸上已经三四个星期了，但事实上连一个旅都还没有集中。其实法军很容易从他们的沿岸守军中抽

调 10 000—15 000 名步兵和野战炮兵,而不必兴师动众、装腔作势地建立什么大兵营。还有,到哪里去找运输工具呢?必须租用英国的商船;以法国舰队的航行速度计算,这些商船需要 4—6 个星期才能相继到达战区。然而部队应在什么地方登陆,集中旅和师,组织司令部和军需机构呢?联军陷入了循环论证:要在波罗的海地区拥有可以登陆的军队,就必须先夺得可以用来集中并组织军队进行攻击的岛屿或者半岛;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得先在当地拥有登陆部队。不过,只要有一位具备必要的陆战知识、足以指挥陆军的优秀的海军上将,就不难摆脱这种困境。无疑查理·纳皮尔完全可以胜任,因为他已多次在陆上作战。但是,既然最高权力掌握在阿伯丁^①手中,既然有四个不同的部干预军务,既然陆军同海军经常对立,既然英法联军相互忌妒对方的荣誉和舒适,怎么能期望有什么行动上的统一呢?

因此,在 6 月底以前,不可能把有任何战斗力的陆军调到波罗的海地区;如果在今后四个月中战争不能结束,和约不能签订,那么就必须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战果,——必须把军队、火炮、舰船和粮食全部运回或者遗弃在当地,而俄军在冬季的七个月中将再次控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今年不可能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俄军进行重大的和有决定意义的进攻。太迟了!只有瑞典同西方强国联合,后者才能在波罗的海地区拥有在芬兰进行冬季战役的作战基地。但是,在这里又陷入了循环论证,——当然,这同上面谈到的一样,只有对于怯懦者才是如此。如果你不派遣一支陆军并占领芬兰的一部分领土,不用行动向瑞典证明自己是真心

^① 本文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刊出时,此处增加了“和帕麦斯顿”几个字。——编者注

诚意的，怎能期望瑞典同你联合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确保瑞典成为作战基地，又如何能向波罗的海派遣那支部队呢？

实在说，拿破仑大帝这个采用大胆、果断和歼灭性的作战方法杀戮过千百万人的“刽子手”^①，同领导这次对俄战争的那些优柔寡断的“有国务活动家风度”的领导人比较起来，堪称讲人道的模范，因为如果这些领导人还继续像过去一样地行动，那么最终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要大得多。

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黑海的情况，那么我们会发现，联军舰队怎样在塞瓦斯托波尔前面对这个要塞的几个无足轻重的外围工事进行毫无损伤的远距离射击练习，以寻欢作乐。据报道，四天以来，大部分舰船一直就在作这种无聊的游戏；而俄军因为仅有 12 艘适于航行的战列舰，所以在这个期间始终没有出港，这使阿默兰海军上将惊愕不已（见他在 5 月 1 日和 5 日的报告）¹⁷¹。这位海军英雄阅历很深，理应记得当年法国分舰队不仅曾被兵力弱得多的英国分舰队封锁，甚至在港内遭到过袭击¹⁷²。其实，以为兵力较弱的俄国分舰队会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让数量上多一倍的舰船把它击溃、击沉，从而抵偿它在锡诺普犯下的“可恶罪行”，这种期望未免过高了！

在同一个时候，两艘战列舰（螺旋推进式蒸汽舰）和七艘蒸汽巡航舰正在开往切尔克西亚。它们的任务是侦察克里木海岸，然后破坏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堡垒。但是，在攻击堡垒时只准三艘蒸汽巡航舰参加，另外四艘奉命一结束对克里木的认真的侦察，便立即返回舰队。据我们所知，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仍为俄军占领的三个堡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649—679 页（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和前景）。——编者注

全——阿纳帕、苏呼姆-卡列和列杜特-卡列，——都相当坚固，并且都构筑在瞰制海面的高地上（列杜特-卡列除外）。因此，派出的兵力是否足以完成这些任务，很值得怀疑，何况在舰船上没有登陆部队。海军少将莱昂斯指挥的分舰队应该在这个时候同切尔克斯人，特别是同他们的首领沙米尔取得联系。至于莱昂斯少将应该同沙米尔联系些什么，还没有确实的消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可能给沙米尔运去最急需的东西——武器和弹药，因为执行作战任务的军舰上没有多余的仓位装载货物。两只装载着这类有价值的东西的破商船或者帆船，比五艘军舰毫无实效的精神支援要更受欢迎。同时，我们知道，土耳其舰队正开往同一目的地，这次它运去的是用以武装切尔克斯人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因此，联军的两支舰队在执行着同一任务，而彼此互不知道。这就是计划和行动的高度统一！也许，一支舰队还会把另一支舰队误认为是俄国舰队，那时两支舰队彼此射击，切尔克斯人将有一场好戏可看！

与此同时，联军的陆军也在加利波利和斯库塔里自得其乐，消耗了大量浓烈而甘美的当地葡萄酒，其中偶尔没有喝醉的那些人被派去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工事所选择的地点和构筑的质量使这些工事不是永远不会遭到攻击，就是根本无法防守。无论不列颠政府或者法国政府都从来无意使它们的朋友尼古拉遭受重大损失，如果这一点还需要证实的话，那么只要看看联军是怎样消磨时间就够了，这连瞎子也可以看清楚。为了给军队远离战场找借口，联军统帅们命令他们构筑横贯整个色雷斯半岛地峡的野战工事绵亘防线。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法国工兵都知道，在构筑野战防御工事中几乎在一切场合都不宜采用绵亘防线。但是在加利波利的英法军队仍然采用绵亘防线，而且构筑工事的地区有三分之二位于敌人可能从中出击

的高地的控制之下。然而,至少要像蜗牛爬行那样前进,才能把这种慢慢腾腾的作战方式维持下去,因此据传有 15 000 名法军正开往瓦尔纳,——去做什么呢?说是作为该地的守军。在那里又干些什么呢?无非是让他们患热病和疟疾死去。

如果对战争的指导多少有一点理智,那么统帅们都应该知道,土军恰恰缺少英法军队所擅长的那种在开阔地机动作战的本领,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善于防守城墙、垒墙、甚至缺口以抵抗敌人的强攻,在这一点上无论英军或者法军都不能和他们相比。由于这个缘故,同时又因为土军所防守的瓦尔纳做出了任何一个要塞迄今从未做到的事情,——也就是当垒墙被打开了三个适于强攻的缺口以后,仍支持了 29 天之久,——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未经严格训练的土军由瓦尔纳调出来,派到开阔地上去对付俄军,同时把训练有素、长于攻击而不善于长期防御的法军派去防守瓦尔纳的垒墙。

另有报道称,所有这些调动无非是一种欺骗,说大的事件正在酝酿中。联军完全无意在巴尔干作战;他们要在舰队协助之下在俄军后方建立丰功伟绩;他们要在敖德萨登陆,切断敌人的退路,并在敌人的后方同特兰西瓦尼亚的奥军会合;此外还要派遣部队到切尔克西亚;最后,他们要派出 15 000—20 000 人从陆上强攻塞瓦斯托波尔,而舰队则夺取港口。只要回顾一下这次战争的全部历史过程和战前的外交谈判,你一定会对这些传闻一笑置之。这些消息是在勒鲁瓦(通常叫作圣阿尔诺)元帅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不久从该地传开的。凡是知道这位可尊敬的先生的经历的人^①,都会从这些吹嘘中

^① 本文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刊出时,此处增加了一句话:“我将设法把这些材料寄给你们”。——编者注

认出这位在当军官时曾被三次革职、但仍以善于吹牛而攀踞目前高位的人物。

简明地说,目前的战争形势如下:英国,特别是法国,“虽然并不是情愿地,但又无可奈何地”被迫把大部分兵力投入东方和波罗的海,也就是放在整个军事部署的两个突出的翼侧上,这一部署的最近的中心是法国。俄国则打算牺牲它的沿海地区、舰队和一部分军队,以便把西方强国完全吸引到这个同一切战略原则相违背的调动里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一旦必要数量的法军被派到远离本国的地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就会声明它们站在俄国一边并立即以优势兵力直取巴黎。如果这个计划实现,路易-拿破仑将没有任何军队来抵御这个突击。但是还有一支力量,它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可以“动员起来”,同时它还能“动员”路易·波拿巴和他那些卖身投靠的侍臣,就像它以前曾经动员了许多统治者那样。这支力量可以抵抗所有这一类入侵;它已经一度向联合的欧洲表明了这一点。这支力量就是革命,它是不会在需要它行动的时候迟疑怯步的,这请放心。

卡·马·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5 月
22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27 日《人民
报》第 108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 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¹⁷³

1854年5月26日星期五于伦敦

即使东方战争不会有任何别的好处,它至少会使已故的威灵顿公爵的军事荣誉部分地失去光彩。凡是在这个被过高评价的统帅还活着的时候就熟悉英国的人一定还记得,那时哪怕把拿破仑看作是一个在某方面同战无不胜的“铁公爵”相匹敌的军人,都会被认为是对英吉利民族的侮辱。这位光荣的公爵在实际上至少统率英国军队四十年之后,现在已经去世并安葬了。在实施指挥的过程中,没有谁比他更具有独立性或者说更缺乏责任感。这位“公爵”曾是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无论国王还是女王,对于涉及他的工作范围的事情都不敢有所异议。“铁公爵”饱尝了几十年通常为幸运的庸碌之辈所享受的荣耀和舒适(这同拿破仑这样的天才人物通常所遇到的悲剧性突变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以后,与世长辞了,英军的指挥权也落到了别人手里。他死后大约十八个月,英军要和俄国人打仗了,就在第一团士兵准备登上军舰以前,人们才发现“铁公爵”留下的这支军队

根本不能执行任何战斗任务。

总的说来,这位“公爵”尽管也具有英国人的健全理智,但在许多方面目光短浅、智力贫乏。谁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德意志盟友在滑铁卢决战中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多么不公平,他把胜利的全部功劳攫为己有,但是要不是布吕歇尔及时赶到的话,这个胜利就会变为失败。他顽固坚持英军中的种种陈规陋习和怪诞做法,对一切批评的回答是“这些陈规陋习和怪诞做法使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胜利者”,这和他保守的信念是完全一致的,即认为一定程度的传统的怪诞做法和腐败,对于适当地发挥宪法的“无与伦比的职能”是十分必要的。尽管他在紧急关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还善于作一些让步,在军事方面他却越发顽固地死抱着陈旧的观点和传统的保守愚蠢的做法不放。他在世时,在英国军队中,除了炮兵纯粹技术上的改进外,就没有作过一件重大的改进。然而,在这里绝对不能忽视制造业和机械科学的高速进展。因此,就算英国军队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炮兵兵器,炮兵的组织累赘的程度也不比其他兵种轻些,至于说到制服、一般装备和组织编制,英国军队没有一个项目不是落在任何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军队的后面的。

我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一种情况,这就是英国的军事领导权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集中在政府的某一个部门里。有四个各自为政而又互相妨碍的部门。有一个陆军大臣,他不过是一个出纳员兼会计。在近卫军骑兵司令部^①里有一个总司令,属他管辖的是步兵和骑兵。有一个军械总长,他指挥负责军械事务的军官们,并管理军队的兵

① 指英军总司令部,设在伦敦白厅的一座大楼里,这里原是近卫军骑兵司令部。——编者注

器。还有一个殖民大臣，他负责派遣军队到海外各属地并且调度这些军队的作战物资供应。除此以外还有军需部；最后，为了统管驻印度的部队还委派一个驻该帝国的总司令。只是在威灵顿死后这种管理上的不合理才成为公众议论的对象，因为1837年议会委员会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遵照他的命令被束之高阁了。现在战争爆发了，这种管理制度到处都显得不得力，但人们又反对改变它，因为担心会完全破坏办事的秩序和常规。

为了说明这种制度产生的混乱现象，我以前曾举出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团为了两件东西不得不向不同的各自为政的部门交涉。比如，制服由一个特命的上校发给，而军大衣则由军械局发；武装带和背包由近卫军骑兵司令部发给，而火器又由军械局发。任何一个国外基地的军官、军械主任、仓库主任和军需官都或多或少地各自为政，并且各自向国内的不同的各自为政的部门负责。此外，还保留着像“管理制服的上校”这样一种畸形的现象。每一个团里有一个上校级的军官，他的职责是从国库领取一定数目的款项作为本团的被服费，但他只把一部分用于预定目的，其余的被他用作对自己奔波劳碌的报酬。

由于买卖军官官衔证书，军队中的所有高级职位几乎全由贵族把持。一个军官在当上几年中尉、上尉和少校以后，有权购买新近出现空缺的更高的军衔，只要没有另一个资格较老的同级军官同他竞争就行。这样一来，有现钱的人就能够迅速晋升，因为他的许许多多资历较长的同事没有足够的钱在空缺出现时立即购买。显然，这样的制度大大缩小了使用有才干的人来补充军官队伍的范围。因为高级军官的提拔和录用差不多只取决于资历或贵族关系，从这个圈子里选用军官必然会将大量有才干、有知识的人排斥于高级指挥岗位之外。毫无疑问，大量英国军官关于军事科学的一般的和比较带有

理论性方面的知识所以少得如此可怜,主要应该归咎于这种制度。

就同士兵人数的比例来说,军官的人数过多。在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像在英军部队里那么多的金银饰绦和带穗肩章。因此军官们无事可做,由于他们的团体观念与任何研究工作都不相容,他们把自己的光阴消磨在各种放荡的娱乐上,他们认为如果真要打仗,他们天生的勇敢精神和“女王陛下的操典”将完全足以引导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在乔伯姆建立野营¹⁷⁴的时候,凡是比浸透伦敦市俗习气的既可怜又狂热的雇佣作家对演习稍多一丁点判断能力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军官是平庸无能之辈,——那些雇佣作家对自己平生首次见到的每一个不平常场面都大加吹捧。

操典和训练制度非常陈旧。部队的机动性异常差,因为各种动作都很复杂、缓慢,而且一成不变。英军把旧的横队运动方法作为一切战术动作的主要形式,它保持这种方法的时间比奥军还要久;在地形允许采用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有人所共知的少量优点,但是可以对付这种运动方法的办法却不少,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本身仅仅适用于非常特殊的条件。展开成纵队(尤其是连纵队)的方法为大陆上最优秀的军队所采用,它能保证大得多的机动性,而且在需要时又能同样迅速地构成横队队形。

英国士兵的武器由优质材料精工制成,但是在很多场合被旧式条例弄糟了。旧式大口径滑膛枪做得不错,但大大超过了应有的重量。老式不伦瑞克式线膛枪本也不坏,但它已被更好的枪所取代了。不久以前才使用的普里切特式线膛枪被认为是改进了的法国米涅式线膛枪,它也许是最优良的武器,然而只有在一番激烈斗争后当局才迫不得已采用了它。就是现在,它的使用仍毫不正规并且非常混乱,一个团的一半使用滑膛枪,而另一半使用线膛枪,这造成了整个装备

上的混乱现象。骑兵使用的马刀样式好,比大陆上各国军队的马刀更便于砍劈和刺杀。马匹也是一流的,但是骑手和装备太重。野战炮兵的兵器是世界上最好的,在某些方面也非常简便,可是这些兵器的口径和重量的大小搞得非常纷繁,因此也需要种类繁多的弹药。

相反地,英国士兵的制服和一般装具却是世界上最别扭的。紧束着脖子的高而硬的衣领;使人显出一副可怜相的、紧身的、带燕尾形后襟的上衣,裁剪拙劣,穿着十分不舒服;窄裤子;式样丑陋的大衣;难看的便帽或高筒帽;还有那些连普鲁士人也不能赞赏的子弹带及背包——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近来众多报纸纷纷评论的题目,因此不必赘述了。但是不应忘记,英国士兵穿着这些似乎是故意弄得十分不舒服的制服,却不得不肩负比世界上任何士兵都多的重荷。同时,好像是为了把“机动性”作为军队的最高原则,给军队还加上了一支任何其他军队中所没有的庞大的辎重队,这主要是军需机关笨拙不灵的过错,像这样的团辎重队,特别是这样多的军官行李,只有在土耳其和印度才能看到。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支军队在到达土耳其时是怎样行动的。法国军队由于不断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证明有效的一切改进措施列入了自己的军事制度中,他们一登陆,就把一切安排得舒服妥当。他们随身带的东西虽然不多,但都是必需的,缺少的东西很快就凭法国士兵天赋的会想办法的才能予以补足。这个制度甚至在路易·波拿巴和圣阿尔诺集团的欺诈统治时期也是执行得无可非议的。而英军呢!他们比自己的军需物资还早到加利波利;他们比兵营所能容纳的人数多三倍;没有为登陆作任何准备,没有行军用的烤面包炉,没有真正负责的管理机构。命令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现象达到了最惊人的,或者更确切些说,可笑的地步。他们中间许多老中士或下

士在卡弗尔人的丛林中或印度河赤热的平原上能很舒适地安置下来,而在这里,他们却束手无策。任何别的军队的指挥官在一次战役中所实行的改进措施都只是为该战役进行期间制定的;各个团一旦分开行动时,女王陛下的老式操典又重新成为唯一的准则,于是战役中获得的管理经验便都丢掉了。

这就是“铁公爵”以铁一样的顽固所坚持的光荣的制度,这种制度必然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他曾经靠这种制度在比利牛斯半岛上打败了拿破仑的将军们¹⁷⁵。英国士兵的确可以因自己光荣的“铁公爵”感到自豪,因为他赏赐给了他们种种恩惠:他们穿着勒得紧紧的皮制胸甲,负荷着六七十磅的东西在保加利亚草原上跋涉,疟疾发作时常常曳足而行,由于军需官们的玩忽职守和不善于经营而弄得给养不足。

公爵的传统做法必然产生的可悲后果,由于英国政体的寡头性质而变得越发严重,在这种政体之下,最重要的职位都委派给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议会中的支持对现时掌权的升官发财者也许是需要的,但他们缺乏最起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就拿联合内阁的军械秘书贝尔纳-奥斯本先生来说吧。任用贝尔纳-奥斯本先生是对梅费尔激进派¹⁷⁶的一个让步(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人物是威·莫尔斯沃思爵士,霍布斯的著作的“谦虚的”出版者)。贝尔纳-奥斯本先生

“……喜欢拾人牙慧,
就像鸽子啄食青豆,
一碰到天赐的机会,
就要卖弄他的伶牙俐齿。
他是个智慧的裨贩,
宴会里,市集上,到处向人兜卖。”^①

①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5幕第2场。——编者注

贝尔纳-奥斯本先生以卖弄生花之舌为生,但他未必能区别一般的滑膛枪和米涅式线膛枪。然而,他却是女王陛下议会中的军械秘书。

读者也许还记得,不久前奥斯本请求议会给军械局拨款,以便生产陆海军需用的小型枪械。他说美国官办工厂制造的武器比私营工厂的便宜,又说,在英国由于承包商不按商定的时间交付武器,多次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按照芒茨先生的建议,下院推迟表决,先委派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探索一条最经济、最迅速和最满意的途径使女王陛下军队获得火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现在已经公布了,它作出了些什么结论呢?报告说,私营厂商不能按合同要求的时间供应武器,“是由于军械局对制成的武器采取吹毛求疵的验收方式以及把一支滑膛枪的许多组件的零件分别交给不同承包商制造的惯例”。报告接着说,“军械局似乎完全不了解美国制造滑膛枪的价格,同时也不知道那里采用机器生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而且从未见过美国官办工厂制造的火器”。

最后,我们从报告中得知,“政府打算兴建的工厂,在今后一年半以内连一枝滑膛枪也生产不出来”。

从议会报告中所作的这些摘录,足以说明联合内阁的特设军械秘书奥斯本先生的业务能力了。一爪可以知狮。

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5 月

25 日

载于 1854 年 6 月 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0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军舰和堡垒¹⁷

由于在当前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取决于前者的舰队与后者的威力强大的海岸堡垒较量的结果，现在人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些针锋相对的进攻和防御手段的实力对比。像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这样坚固的要塞，是否只要能派去配有若干门火炮的若干艘军舰就可以攻克，这被认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我们想要提出的看法是，迄今为止，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在面临考验之时，表现得并不完全像我们在战前常常听说的那样不堪一击。过去有人说俄国军队只是纸上之兵；我们发现，他们的行军速度像从前那样十分缓慢，不过他们毕竟在相当良好的状态下几乎全员到达了作战地点。特别是在黑海的俄国舰船，据说船造得不好，船员配备很差；但是，在追击怒涛号时，俄军的两艘俄国造的巡航舰几乎比英国的蒸汽舰行驶得还要快，无论是它们的建造还是操作都令“海上霸主”称羨不已。如果不通风的穹窿和经不住自身炮火震动的石墙（人们总是使我们以为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的工事可能是这样）实际上竟也像舰船和士兵一样出色的话，一旦进攻它们时，很多真正的约翰牛必定会大失所望。

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俄国海军基地中心,都以现代军事科学所能提供的技术构筑了最牢固的防御工事。这两个地方令人望而生畏,主要是由于采用了上世纪法国工程师蒙塔朗贝尔伯爵的体系。蒙塔朗贝尔设计的加强陆地和海上堡垒的办法是:修造大型石质建筑以代替其火炮仅形成一条火力线的简单垒墙,这些大型石质建筑都修成两层、三层,有时甚至六层,其中每一座建筑都覆以防爆破的圆顶,并配备有同等数量的火炮,通过狭窄的射击孔向外射击。他的体系的细节、设计者对其原理的部分夸张、别人提出的反对理由,——当然不能在这里加以讨论。但是,由上下各层火炮配置成的两三条火力线所发挥的火力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一切现代工事只要有可能,几乎都采用这个体系。法国的瑟堡,意大利的亚历山德里亚,德国的埃伦布赖特施泰因、林茨、柯尼斯堡和乌尔姆都是蒙塔朗贝尔的某些基本原理经过或多或少改进后的应用。人们已经发现,配备有两层或三层火炮的大穹窿被改造得非常好,可用作单个的堡垒,特别是用作海岸防御工事,在这样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必须以相等的炮火抵挡从两层或三层甲板舰舷侧喷出来的钢铁洪流。因此,瑟堡、布雷斯特以及几乎所有的大军港,都配备有若干至少是两层的穹窿炮台;在塞瓦斯托波尔,几乎所有的炮台都配置成三层;在喀琅施塔得,配置成一层、二层、三层,有两个堡垒的层数甚至多达四层。

这种新式工事迄今还没有受到过一次真正攻击的考验,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它们的实际防御能力持怀疑态度。而且,这种新堡垒的构造的每个细节都大大地冒犯了那些认为在筑城方面不可能超过沃邦和科尔蒙太涅的人的全部观念,所以,就是在今天,也还有众多优秀的士兵、水兵甚至工程师对新堡垒抱根本不屑一顾的态

North America
 1. 2nd May Military
 2. 3rd May
 3. 9th May Financial
 4. 16th May Military
 5. 19th May
 6. 23rd May
 7. 26th May
 8. 30th May
 9. 2nd June
 10. 6th June
 11. 13th June
 12. 15th June

燕妮和卡·马克思 1854 年 5—6 月寄给《纽约论坛报》
 一组文章的记录

度。就连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也是如此。在法国,在讨论巴黎的城防工事方案时,科尔蒙太涅派的观点被采纳了。但是,那些偏见最盛行的地方莫过于英国。在英国,绝大多数军官理论知识极端贫乏,而又极其厌恶学习。他们的旧手册没有超出科尔蒙太涅的观点;也许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蒙塔朗贝尔这个名字;英国军队的组织编制不欢迎任何改进,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教育方面的;公爵^①只要有办法就坚持不在军队中实行丝毫的变更;英国军队的服装、演习和观念都比其他任何国家陈旧,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因此,特别是在英国军官当中,可以发现有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以为约翰牛无所不能,一支英国舰队就能占领喀琅施塔得,不管它多么坚固,同时他们还认为喀琅施塔得毕竟不是非常坚固的,因为它是按照那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体系修建起来的,那个体系有把一切权威论著搞乱并迫使军界名流也得从头学起的危险。

毫无疑问,只要有一张很好的平面图,了解一下地形,对按照旧体系修建的棱堡的垒墙和壕沟侦察一下,就不难相当准确地估计出它的坚固程度;但是,对于新型的堡垒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这不仅是因为它们还没有经过战争的检验,而且还因为修建时经过诸多细致周密的考虑,所以仅靠从外部侦察一下,得到的也只能是有关其坚固程度的一个并不可靠的线索。首先是砖石结构的强度,即经受敌军的射击和经受穹窿在开火时引起的震动的能力。其次是穹窿的通风,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因为人员被浓烟窒息而使全部火炮在最关键的时刻变成哑炮。还有射击孔的构筑,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有最低一层超出水平面的高度,以及其他等等问题。在目

^① 阿·韦·威灵顿公爵。——编者注

前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对一个堡垒的整体需要先有详尽的了解,然后才能就其真正的防御能力作出判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喀琅施塔得还是塞瓦斯托波尔,设计和施工上都可能有某些较大的缺陷,即使如此,也绝对必须把它们看作是第一流的堡垒,只有异常强大、指挥有方、勇敢果断的海军力量才能攻克。因此,对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的进攻都是一次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意义的事件,无论其结果如何,军事科学中现在一些有争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可望得到解决。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5 月
2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6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0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奥地利—普鲁士条约。
——5月29日的议会辩论¹⁷⁸

1854年5月30日星期二于伦敦

《泰晤士报》对于不列颠的将军下令禁止“本报记者”随不列颠军队采访,感到非常愤慨。如果这次战争是认真进行的战争,那么反对这种措施就是愚蠢的了,因为威灵顿公爵的紧急函件曾一再埋怨说,拿破仑可以通过英国报纸把关于他威灵顿的军队预计的调动和部署的情报转达给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将军。事实上,这种命令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英国公众对远征军的背叛阴谋茫无所知。苏丹在十二月二日的英雄们的压力下所颁布的、并已在各个清真寺宣读的一道禁止土耳其人谈论任何政治的命令,可以作为不列颠的将军的那道命令的很好的补充。但为什么土耳其人在这方面的情况会比英国公众本身好一些呢?

在昨天下院的会议上,布莱克特先生问约·罗素勋爵,在最近的维也纳议定书¹⁷⁹上,大不列颠有没有对1854年4月20日的奥普条约第一条表示承认或赞同。这一条规定缔约国

“相互保障它们对德意志和非德意志的领土的占有，因此，对这两个大邦中的一个的大邦的领土的任何进攻，不管这种进攻来自何处，都将被看成是对另一个大邦的领土的进攻”。

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议定书没有对奥普条约的这个第一条表示任何特别的承认或赞同。”^①不管是否表示了特别的承认，反正我们在昨天法国的《通报》上读到，

“最近的维也纳议定书把英法关于目前战争的协定同奥普关于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条约联结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把目前英法同俄国的战争与可能发生的奥普维护俄国的战争联结在一起了，总之，这个议定书是西方强国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稳稳地占有波森、加利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保证。约翰·罗素勋爵接着还承认，这个议定书

“有确认和保持各次维也纳议定书制定的原则——土耳其帝国的完整和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趋向”。^①

实际上这是重新约定保持战前状态。西方强国不能夸口说，根据这个议定书，它们取得了对俄国的某种优势；因为奥普条约明确地规定：

“可能引起缔约的两个大邦采取进攻或防御行动的，第一是多瑙河两公国并入俄国，第二是俄国人进攻或越过巴尔干。”

这两个条件显然是俄国自己强加于人的。俄国一开始就表示过，它根本不打算并吞多瑙河两公国，它只想保持住它们作为满足它

^① 约·罗素 1854年5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的要求的“物质保证”。面对29 000名左右法军而越过巴尔干——俄国的作战计划中从来没有这种打算；俄国的计划的唯一目的不过是保证自己的军队在多瑙河右岸有几个要塞作为桥头堡，以便经常有可能侵入保加利亚。我们顺便指出，《泰晤士报》在提到这个新的议定书的时候，满希望西方强国也许能把奥地利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因为普鲁士现在“分明”受着“俄国代理人”的操纵，而《纪事晨报》则甚至对于奥地利有多少诚意表示绝望。要是大拿破仑，就会迫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同俄国结成公开的联盟；而小拿破仑则让俄国强迫他同德意志各大邦结成联盟，这个联盟使他的军队尽可能远地离开自己的军事行动基地。

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米尔恩斯先生的质询时说：

“法国已经命令大约6 000人的军队去占领比雷埃夫斯；大约一个星期以前离开英国的一个英国步兵团同样是派去占领比雷埃夫斯的。”^①

这个措施是由于希腊政府同俄国的勾结造成的。军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才应当占领雅典。我们在今天法国的报纸上读到：

“奥托国王接受了最后通牒，并且答应只要结束占领，就使马夫罗科尔扎托斯内阁返回。否则，他决定把自己的政府转移到内地，并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到那里去。”

这种抉择并不是一句空话，这从约·罗素勋爵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

“如果希腊国王不赞同本国人民的要违反中立国义务的尝试，那他就会从派去的军队那里得到保卫，并且得到迫使人民履行这种义务的手段。另一方

^① 约·罗素 1854年5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面,如果我们从希腊政府那里得到的庄严的保证竟然是不真诚的,那么,这些军队就可能会别有用途。”

由此可见,不管希腊政府怎样做,希腊总是要被占领。

《泰晤士报》有点气忿地报道说:

“日前罗马、雅典和君士坦丁堡——古代世界的这三个伟大首都的守备部队大部分都是法军。”

老拿破仑习惯于占领现代世界的首都。而小拿破仑则满足于舞台式的大场面,把自己的军队分散到一些无关重要的国家,把自己的精锐部队塞进这么多死胡同里。

昨天在议院的晚间会议上,撤回防止贿选法案引起了小约翰、迪斯累里和布莱特三人之间的一场非常滑稽可笑的争吵。迪斯累里先生指出:

“政府在会议期间提出了七个重要的法案。关于这七个法案中的三个法案,政府遭到了失败。另三个法案被撤回去了,而关于第七个法案,政府遭到了重大的、尽管是部分的失败。关于彻底修改定居法的法案¹¹⁴、关于苏格兰国民教育的法案和关于全部修改议会誓词的法案,政府都遭到了失败。政府撤回了现在这个防止贿选的法案;撤回了关于完全改变文职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法案;撤回了关于议会改革的法案。牛津大学改革法案只有修改得面目全非,才会被议院通过。”

如果政府对于通过这些法案并没有抱什么希望,那就不该把它们提出来……有人说,政府没有原则,但有“群贤”,人们可以指望,既然每个大臣都牺牲了自己个人的信念,那么这种英雄主义至少会给公众带来某种好处。

约翰勋爵大发雷霆,但这并没有使他的回答增加什么力量。他把被否决的和已经撤回的法案的优点吹嘘了一番。他补充说,不管

怎样,议院并没有站到迪斯累里先生及其朋友那一边。迪斯累里先生指责政府在执行对外政策中不是轻信就是姑息,但他从来也不敢询问议院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他装出不愿妨碍政府备战的样子;然而他还是提出一项使政府没有进行战争的手段的提案。这项提案被一百多票的多数否决了。迪斯累里先生自称主张解放犹太人,但他对关于犹太人权利的法案¹⁸⁰是否支持,要看情况而定。

这个回答使这位可怜的下院领袖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比第一次更为猛烈的新的攻击。迪斯累里先生说:

“好像高贵的勋爵认为,对他没有下台我感到惊奇。恰好相反,如果他下台了我倒会感到异常惊奇。(哄堂大笑)这位高贵的勋爵只有遭到更多次的、可能是更惨重、更彻底的失败之后,才会感到有必要走这一步。(掌声)我对高贵的勋爵太了解了。我充当他的反对派的时间太久了。我看到他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太多了。我曾多次看到他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以后,仍然怀着他那令人不胜钦佩的爱国精神和坚定态度执掌政权。(掌声和笑声)关于战争,政府曾向议会表示,一定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文件摆到桌上来。然而实际上,政府把其中最重要的文件隐瞒起来,如果不是《圣彼得堡报》作了揭露,全国就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经过这些揭露之后,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已经不容作任何假设,而只得断定,政府的确犯了姑息或者轻信的罪过。我相信,不久这一点就会成为全国普遍的看法。”

然后,迪斯累里先生开始为德比勋爵的政府辩护并证明当时约翰勋爵所持的反对立场带有“党派性”。约翰勋爵牺牲惨重:

“他为了紧紧拥抱一向轻视他的才能、公开斥责他的活动的那些老仇敌,而脱离了他一生中的忠实同事。他丧失了信任,——我可以这样说,——他几乎使那个有历史意义的政党停止存在,而这个政党的信任对于像高贵的勋爵这样一个人来说,应当是同女王的宠爱一样可贵。(掌声)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忠实于伟大的原则,决心实行伟大的措施。但是现在,他的措施一个一个地破产了,他仍然执掌着政权。至于自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态度,迪斯累里先

生明确地、断然地表示反对高贵的勋爵所作的论断。”

实际上迪斯累里使约翰·罗素勋爵除了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解并把联合的继续说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以外，就别无良策了。

布莱特先生认为：

“高贵的勋爵在辩论中遭到了失败。政府的成分既然如此，所以从它组成的第一天起就很清楚，它不可能为国家谋福利。他想起了下院的一位很机智的绅士，高贵的勋爵和整个政府的一位好朋友曾说过，内阁若能不管政治，就会干得很出色。政府过去所采取的也大致是这样的方针。除了自由贸易以外，在任何问题上，政府既不能向议院提出建议，指导议院，也不能控制议院。十分明显，人们客气地称之为下院领袖的这位高贵的勋爵，实际上并不领导议院，议院也不跟着高贵的勋爵走，政府提出的种种法案总是遭到最不客气的否决。你既然把我们推入了战争，就应当把我们从战争中拉出来。我们不愿意承担责任。这就是政府给我们造成的处境。政府在破坏和摧毁土耳其的国家制度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摧毁我国的议会制度。”

请问：这种制度有什么用？内政问题不能提，因为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国家处在战争状态，军事问题也不能谈。那么还保存议会干什么呢？老科贝特揭穿了这个秘密：作为对付国内沸腾着的激烈情绪的安全阀。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5月
30日

载于1854年6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3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
——多瑙河战争。
——经济状况¹⁶¹

1854年6月2日星期五于伦敦

已经决定成立特别陆军部，现在的大问题就是要了解谁可能被挑选来担任其大臣。至今一直身兼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两职的纽卡斯尔公爵，早就表示很不愿意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职位；而且根据《纪事晨报》的口气来看，他打算无论如何要继续主掌陆军部。今天的《泰晤士报》第三次建议任命帕麦斯顿勋爵。

“由帕麦斯顿勋爵担任陆军大臣来领导我国的武装力量反对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宿敌的俄国，当然要比他同教区会议和下水道委员会争吵不休更为合适。”

《每日新闻》也推荐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昨天的《先驱晨报》上，登载了一篇乌尔卡尔特先生揭露这整个阴谋的文章。不管怎样，对“战争”说来，唐宁街的这些举动比在加利波利和斯库塔里的历次军事示威有更大的意义。

也许你们还记得，有人曾企图使公众产生一种希望，以为远征军司令官们一到君士坦丁堡就会立即采取紧急的和坚决的措施。5月18日，圣阿尔诺元帅、拉格伦勋爵和土耳其陆军大臣前往瓦尔纳，5月20日要在那里同奥美尔帕沙和海军将领举行军事会议。昨天伦敦收到一份电讯，说“在瓦尔纳军事会议上，决定把联军从加利波利调往阿德里安堡”。同时《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披露了在瓦尔纳会议上所决定的整个作战计划。《泰晤士报》说：

“这次会议显然是当俄军在帕斯凯维奇公爵指挥下对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发动猛攻的时候举行的，因此，联军的高级军官们完全能够决定支援这个要塞所必需采取的措施。”

正因为如此，他们命令部队从加利波利开往阿德里安堡去支援锡利斯特里亚；**正因为如此**，他们作出了下面这个英勇的决定：

“假若仅仅为了击退俄军对那些保卫多瑙河右岸的要塞的进攻而使土耳其军队冒一场总会战的危险是不适当的……同样地，把联军的相当一部分军队调往沿岸地区去立即同俄军的前哨发生冲突也是不适当的。”

换句话说，联军的将军们已经决定：决不阻止俄军硬行攻占多瑙河右岸各要塞。《泰晤士报》承认，这种作战计划“可能使自然感到不耐烦的公众失望”；但是另一方面，该报又发现“这些筑垒据点实际上不过是土耳其阵地的外围工事，决不是它的主力所在”。以前，我们听说过，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只是土耳其的外围工事，土耳其把它们让给俄军不见得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又听说，土耳其也可以放心地把保加利亚让给俄军。

“巴尔干才是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堡垒，如果俄军在继续前进中遇到多得可怕的种种新障碍，那么他们付出重大的损失去占领外线工事是不会得到什么好

处的。他们在巴尔干以北的这个地区越向前推进，他们的处境就越糟糕……入侵的军队会在攻击多瑙河沿岸的筑垒据点和敌人的分散部队的过程中耗尽自己的力量；而与此同时，保卫主要阵地的部队仍然是比较精力充沛和未受损失的。”

毫无疑问，只要吃牛肉的一伙人^①能够避免同敌人相遇，他们的部队就总是精力充沛的。但是，如果俄军在巴尔干以北地区不再前进，而满足于占领作为通往保加利亚的咽喉的要塞和多瑙河两公国，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那时又怎样使他们从这些地区撤走呢？

“在巴尔干防线后的欧洲军队，正准备在适当时机以不可抵抗的力量转入进攻，在这次战役的最后几个月中定能把敌人消灭。”

这种不可抵抗的进攻，由于多瑙河要塞都是由俄军占领，当然是异常轻松的，而联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阴雨季节将会毫不费力地办到。

诚然，《通报》报道说，奥美尔帕沙正准备援助锡利斯特里亚。可是《纪事晨报》对刚才引证的那篇《泰晤士报》的文章感到不满，它指出：

“制定这个计划的人，看来是希望那时奥地利的外交会促使沙皇满足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不断取得的胜利，把自己的军队撤回去；另一方面，大概人们在指望，一旦俄国人在巴尔干继续前进，奥普条约所预料的遥远的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立即出现。”

但是，《通报》发布这样的新闻，显然是想使巴黎人保持良好的情绪；而《纪事报》评论《泰晤士报》的计划时所用的方式，只是增加了这

^① 原文是“beef-eating allies”——对英国近卫军的讽刺性称呼。——编者注

种可能性：这也是联合内阁的计划。另外一些消息更证实了这种推测。《纪事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在5月18日的报道中指出：

“多瑙河在盛夏不见得会有什么战役，因为这时候由于患热病和其他疾病而死的人会比由于其他原因而死的人更多。”

此外，内阁的报纸《地球报》昨晚也刊登了一篇同《泰晤士报》的那篇文章的精神完全一样的文章。《地球报》报道说，第一，目前在土耳其的联军“只有”45 000人——29 000名法军和16 000名英军；在下一栏接着说，第二，俄军在锡利斯特里亚附近只有9万人，而土耳其的正规作战部队达104 000人。但是《地球报》认为，这个将近15万人之多的土耳其、法国和英国的军队总数，不足以阻止9万俄军占领保加利亚的要塞，更不必说三支强大的舰队可能提供的配合了。《地球报》认为土军或联军同俄军作战纯粹是多余的，因为“季节将同他们作对”。《地球报》在叙述联军司令官们搞出来的作战计划时，甚至比《泰晤士报》更进了一步，它说：

“不管多瑙河各要塞的命运如何，必须集中适当力量，使侵略者不能继续推进，并对他们的冒失进攻加以惩罚。”

这里清楚地向我们证明，英法在最近的维也纳议定书¹⁷⁹上同意了奥普条约。它们决定把多瑙河各要塞和保加利亚让给俄国，只有俄国继续推进才会进行战争。

在最初15 000名俄军渡过普鲁特河侵入摩尔多瓦的时候，人们劝土耳其按兵不动，据说是因为土耳其反正不能阻止这个15 000人的非常厉害的力量把瓦拉几亚也占领去。后来俄军果然占领了瓦拉几亚。当土耳其政府宣战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同俄军作战，因为已经是冬天了。春天到来以后，奥美尔帕沙却奉命不得发动任何攻势，因

为联军还没有到来。他们到来以后,已经什么也不能做了,因为已经是夏天了,而夏天是一个对健康不利的季节。等到秋天到来,而那时又会发现,“要开始一个战役又已经太晚了”。这种方法,《泰晤士报》称之为战略和战术的配合;这家报纸认为,战术的实质,是牺牲军队以保存“精力充沛的”后备力量。同时请你们注意,自从这种把戏在反对派报刊面前和不列颠广大公众面前玩弄以来,《晨报》和《泰晤士报》就一直竞相愤怒谴责普鲁士、丹麦和瑞典没有同西方强国“联合起来”!至于所有小国为什么都倒向俄国方面,这不是没有非常重大的根据的,——比如从丹麦政府报刊的口气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纪事晨报》驻哥本哈根记者写道:

“内阁中的执政党用来压服民族派的那种威胁就是:英国对丹麦一直是背信弃义的;如果丹麦同西方强国联合起来,那么10万普鲁士军队,也许还要加上奥地利一个军,就会把日德兰半岛直到艾德河洗劫一空并把丹麦全部领土占领。”

联合内阁可能期待并且一定在期待,由于自己曾经认认真真地为俄国的“正义事业”效过劳(在外交、军事和其他方面),它至少会得到专制君主某种认认真真的答谢。但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联合内阁从专制君主那里受到的大量的凌辱,达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甚为过分的程度。为了说明俄国宫廷对自己假想的敌人抱怎样一种高傲的蔑视态度,我把不久前在《北方蜜蜂》上发表的一篇某个伪托俄国梯尔泰的人撰写的寓言给你们译出来。寓言的语言和结构之所以简单浅显,是因为那是诗人写给那些不大开化的人看的,这正像《圣彼得堡报》之所以用一种讽刺的委婉口吻批评阿默兰海军上将最近关于敖德萨的报告,是因为这种批评是写给欧洲外交家看的。寓言的标题是:《山鹰、叭喇狗、公鸡和兔子》。内容如下:

“一只又大又壮的雄健的山鹰，站在高耸入云的山岩之巅，眺望着远在波罗的海那边的整个世界(Weit hinterm Belt die ganze Welt)；它就这样安安详详地站着，满足于自己那点微薄的饮食，不屑到下面山谷中去多猎取食物，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取得一切东西。叭喇狗忌妒地望了山鹰一眼，就对公鸡说：‘作我的伙伴吧，让咱们联合起来——你是为了报仇，我是出于忌妒——把这只山鹰扔下去。’说干就干，它们上路了，一路上它们商量着怎样征服山鹰最好，公鸡说：‘停一停！你瞧瞧它的脚爪，瞧瞧它的翅膀——谁要想试试它们的力气，那就但愿上帝帮助了；我不只一次听到我的前辈在诅咒，他们为自己遭到山鹰翅膀打击的悲惨命运而痛哭。’叭喇狗说：‘这是真的，但是咱们要用巧计来捉山鹰。咱们派兔子走近它。它一定会抓住兔子，这时，你就使出你十分擅长的又叫又跳的本领来转移它的注意，并且装出你要同它打架的样子，当咱们这样把它的注意力引开并把它的爪子缠住的时候，我就从后面向它进攻，这样一来，它就无法防卫，它马上就会被我锋利的牙齿咬个稀烂。’这个计划很合公鸡的心意，它就在附近担任起了望哨来了。叭喇狗跑进树林，大声狂吠，把兔子朝着正在安静地等着的山鹰跟前赶去。兔子吓得丧魂落魄，很快冲向山鹰爪下。忠实于盟约的公鸡离开原地，跟着兔子飞跑，啊呀！真丢人！山鹰原地不动，只是振一振翅膀，根本不屑抓兔子，用一支翅膀把它撵开，用另一支翅膀正好拍打公鸡，公鸡再也不动，也不叫了。大家都知道兔子爱跑；且看它失魂落魄地跑，一直跑到海里，然后咽了气。山鹰看见肥肥的叭喇狗在远处搞鬼——有什么能够逃过山鹰的眼睛呢？山鹰发现了这位藏在灌木丛后面的英雄。它展开了巨大强壮的翅膀，雄健地腾空而起。叭喇狗汪汪地叫，急急忙忙地逃跑。可是白费劲，已经晚了。山鹰从空中直向它扑下来，把利爪扎进了叛徒的背部，于是叭喇狗倒下了，并被撕成了碎片。”

由于丰收在望，又因为没有投机倒把，上周粮价略有下跌。然而回升是必然的，因为，“根据与此有关的一切材料看来，应该认为农民的储备比常年这个时候少得多”(《马克巷快报》)。但泽、斯德丁和罗斯托克等地的消息都一致证明，现有储备很少，郊区农民没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可卖的了，只有用高价才能指望从这些地区运来一些粮食。法国种植者提供的谷物，大概也没有增加，而国内市场上的小麦

的供应，未必能够满足消费的要求。

我还从私人的消息来源获悉，《泰晤士报》关于曼彻斯特周围工厂区的营业状况的报告总的说来是不符合实际的，除了伯明翰以外到处都是营业不振。《曼彻斯特卫报》证实了这一点，还补充说，有那么多数量的罢工工人复工，一定会使价格下跌。

至于詹·格雷厄姆爵士上星期一^①在下院会议上宣布的措施，即对阿尔汉格尔斯克港不予封锁，《先驱晨报》用下面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评论说：“阿尔汉格尔斯克有一所房子属于财政大臣名下”。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6 月
2 日

载于 1854 年 6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0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应为 1854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编者注

卡·马克思

*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
——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
经济状况。——圣阿尔诺¹⁸²

1854年6月9日星期五于伦敦

科苏特在设菲尔德的演说是他居留英国期间发表的历次演说中最有内容的一次；然而不能不指出这次演说的缺点。其中讲述历史的地方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例如，认为土耳其的衰落开始于索比斯基援助奥地利首都¹⁸³，这是毫无根据的。哈麦尔的研究^①无可辩驳地证明，土耳其帝国这一组织在那个时期已经处于瓦解状态，并且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奥斯曼的强盛时代就已经快要终结了。说拿破仑放弃从海上进攻俄国的念头，不是因为他没有舰队以及英国人使他未能掌握海洋上的霸权，而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种说法也同样是不正确的。说如果英国同奥地利结成联盟，匈牙利就会同俄国

① 约·哈麦尔《奥斯曼帝国史。根据以前未曾利用的手稿和档案编写》1827—1832年佩斯版第1—10卷。——编者注

结成联盟,这种威胁是非常轻率的。第一,这给政府的报纸提供了武器,《泰晤士报》也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武器,给所有的革命者都加上俄国代理人的“罪名”。第二,这种话出自他这个人之口是很奇怪的,因为他的政府早在1849年就表示可以把匈牙利王位让给俄国皇太子。最后,他怎么能否认,他的这种威胁,不管是在他倡导下还是在别人倡导下,如果一旦变成现实,那就是对马扎尔民族的存在宣判了死刑,因为匈牙利的很大一部分居民是斯拉夫人。把同俄国的战争说成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同样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目前就会成为自由的代表人物。撇开这一点不谈,公开宣布的进行战争的全部目的正是要保持强国均势和维也纳条约——恰恰是那些要消灭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条约。

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在伯明翰发表了比平常更激烈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又一次指责联合内阁背叛。但是,这个寡头政体的联合内阁是建立在腐烂透顶的议会基础上的,既然乌尔卡尔特先生同准备消灭这个基础的唯一政党势不两立,那么他所有的演说就像对老天讲的一样,很少能达到目的。

约翰·罗素勋爵昨天晚上在下院宣布即将成立一个特别的陆军部,但是这个部不应把组成现在军事部门的各种机构合并进去,只是在名义上对所有这些机构进行监督。这一变更的唯一优点就是多设了一个大臣职位。关于任命,昨天《晨邮报》报道说,内阁中的皮尔派¹⁸⁴占了上风,纽卡斯尔公爵将任新的陆军大臣,而殖民地则交给约翰·罗素勋爵来管。昨天傍晚出版的《地球报》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补充说,由于约翰勋爵很可能表示拒绝,乔治·格雷爵士将被任命为殖民大臣。尽管皮尔派的报纸仍然装作不知道最后决定,但是帕麦斯顿派的报纸今天证实说,纽卡斯尔公爵和乔治·格雷爵士已

经得到了任命。

《晨邮报》就奥地利的“绝对要求”写道：

“我们有根据认为，俄国不会以沉默来对待奥地利的通知，也不会加以拒绝，所以，如果我们不久知道，俄国准备在奥地利为了进行谈判而安排签订一个停战协定的条件下，接受奥地利关于从土耳其领土完全撤退的建议，我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今天的《纪事晨报》也承认，“这个通知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但该报补充说，不应把它看成是最后通牒，它是用通常的有礼貌的语言表达的，而且只有在俄国完全不理睬这个通知的时候才会发生决裂。如果俄国作出模棱两可的回答或者作出局部的让步，那么新的建议和谈判就会随之而来。

我们暂且假定《晨邮报》的推测是正确的，并将得到实现；显然，奥地利的效劳只会促成订立另一个对俄国有利的停战协定。很可能，某种类似的东西已经考虑好了，它是以设想锡利斯特里亚那时将会陷落，而且“沙皇的名声和荣誉”将会得到保持为根据的。然而，如果锡利斯特里亚守住了，土耳其人的英勇终于迫使联军违背自己的司令官和政府的愿望而投入军事行动，那么整个计划就会破产。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使这场大战中经常发生的疏忽和失策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那就是英国报刊和公众在估计西方强国和德意志大邦建立联盟的重要性和现实性时所表现的那种可笑的踌躇不决的态度。奥地利刚刚提出使大家都满意的“绝对要求”，大家就因获悉奥地利君主和普鲁士君主举行了会见而感到忧虑，这次会见，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对西方强国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贸易部上月的统计表已经公布，结果不如前几个月那样好。出

口的申报价值比 1853 年同期减少了 747 527 英镑。同曼彻斯特市场有关的商品情况最为不妙；而且亚麻纺织业、毛纺织业、丝纺织业也都呈现萧条状态。

从伯明翰的斯特奇先生等出版的这一期每月通报中，我们得知小麦发芽和分蘖情况不佳，关于这一点是这样报道的：

“因为种子价格高，每一英亩土地播下的种子也就比常年少，而且因为播种所用的去年的小麦质量差，今年的收成看来不如假设去年收成较好时可能达到的收成那样好。”

《马克巷快报》谈到这个消息时指出：

“这种推论我们觉得是非常可能并且值得注意的，因为质量坏的种子难以长出在比较好的条件下可能长出的那种茁壮的苗来。人们将特别关心庄稼的生长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由于 1853 年严重歉收，不但在英国而且几乎在世界各地，粮食储备都减少到了极点。今后粮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气而定；现在麦价太高，不足以刺激投机，虽然，今后三个月从国外输入的粮食非常可能比过去少得多，但是，如果不发生任何事情使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收成前景感到不安的话，那么还拥有剩余粮食的人就自然会尽快把这些粮食脱手，而磨坊主和其他人大概都会按照现做现吃的办法行事……同时应当注意，全国总的说来缺乏小麦。”

现在你无论在伦敦哪条街上走，都会看见人群聚集在那里看爱国画，上面画着几个有趣的人物：“文明的三个救星”，即苏丹、波拿巴、维多利亚。为了使你们能够充分认清那些在已经“拯救社会”以后现在又被托付拯救文明的人们是些什么人物，现在我把关于他们的最高统帅圣阿尔诺元帅的特写继续下去¹⁸⁵。

著名的七月的日子^①把雅克·勒鲁瓦（原名）即雅克·阿希

^① 指 1830 年法国七月资产阶级革命。——编者注

尔·勒鲁瓦·德·圣阿尔诺（现名）从他的债权人的掌中救了出来。于是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困难问题：他应当怎样利用当时法国社会由于旧制度突然崩溃而陷入普遍混乱的环境。阿希尔没有参加那三天的战斗；他连冒充参加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这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被严严实实地关在圣佩拉日耶的单人牢房里。因此，他不能够仿效当时其他许多冒险家，冒称自己是七月战士之一而要求某种奖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制度的成功看来也绝对不利于巴黎的放荡不羁的人中的这个著名的无赖，他一直声称忠实地信仰正统主义，根本没有参加过“自助者天助之”会（他这个没有先见之明的缺陷因他成为“Dix-Mille”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而得到弥补）¹⁸⁶，也没有在伟大的“十五年的喜剧”中扮演过任何角色。然而，阿希尔还是从他旧日的老师欧·德·普[拉代尔]先生那里学会了一点作即兴诗的本事。他大胆地来到陆军部，冒称自己是复辟时期出于政治动机而退职的军士。至于他被赶出国王近卫军，被科西嘉军团开除，以及离开了开赴殖民地的第五十一团等情节，都被随随便便地说成是他具有奔放的爱国热情和曾受到波旁王朝迫害的证明。诚然，履历表证明他的话是假的，但是陆军部假装相信他的话。当时许许多多军官不愿向路易-菲力浦宣誓而纷纷退职，以致有许多缺额需要补充，因此，任何一个公开背弃正统主义的人，不管其转变的动机是什么，都被视为对篡位者政府的宝贵支持。于是阿希尔就被派到第六十四常备团，但并不是没有受委曲：他只是恢复了军士职位，没有像其他在复辟时期退职的军官那样得到提升。

岁月和名誉晋升终于使他得到了中尉头衔。同时他还得到了一个表现他那种奴颜婢膝的变节者的特殊才能的机会。1832年，他的

团队驻扎在帕尔特奈，处于正统派在旺代省举行暴动的中心。他同聚集在贝里公爵夫人周围的一些前国王近卫军的旧关系，使他有可能把军人的职责同警探的职责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同他在伦敦赌场和巴黎下流地方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天才非常相适。贝里公爵夫人被犹太人多伊茨出卖给梯也尔先生而在南特被捕了，阿希尔奉命把她押解到布莱，在那里他应当在毕若将军指挥下担任看管她的狱吏之一。他热切希望不放过公开表明自己对保卫王朝利益极度热心的机会，但做得太过火了，他竟然接受警察局交给他的卑鄙的任务，并且粗暴地对待公爵夫人，使毕若本人感到愤慨。但是毕若无权解除这个副官的职务，因为他是警察局专门派来看管公爵夫人的，他直接受警察局长若利先生的领导，而且归根到底主要是听命于内务部，而不是陆军部。这位未来的英法联军最高统帅扮演了接生婆的角色：当时他的特殊使命是用证人的证词说明并证实公爵夫人已经怀孕，怀孕的被揭发使旧制度的拥护者遭到了致命打击。由于这样一种品质，圣阿尔诺先生的名字第一次见之于《通报》。我们在1833年5月的《通报》上读到：

“阿希尔·德·圣阿尔诺先生，今年34岁，通常住在巴黎，是毕若将军的军需官，他受命以他的正式身分签署一项证明公爵夫人于1833年5月10日在狱中生了一个孩子的文件。”

勇敢的圣阿尔诺继续充当狱吏，并乘轻巡航舰押解公爵夫人到巴勒莫。

阿希尔回到法国以后，成了全团取笑的对象和替罪羊。他遭到其他军官们的仇视，被开除出他们的俱乐部，他为人们公开对他表示的极端轻蔑的态度所苦恼，好像被全团关入了隔离所，他不得不到当

时正好在贝多上校领导下在巴黎组建的阿尔及利亚外籍军团¹⁸⁷里去避难。这个外籍军团完全可以叫作欧洲军队中的十二月十日会。臭名昭著的暴徒、破产的冒险家、各国的逃兵、欧洲军队所有的渣滓组成了这支精锐部队的核心，这支军队完全有资格取名为罪犯的避难所。没有任何境遇比这种军队的这伙人更能使阿希尔的天才发挥得那样充分，这种军队的正式使命使得警察管不着它，而这种军队的成员的品质扫除了通常限制着正规军军官的种种路障。阿希尔尽管在各方面都很挥霍，对于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勇敢和才能却很吝啬，所以他在外籍军团第一营中尉这个不高的军衔上继续混了四年，一直到1837年8月15日在一次新的名誉晋升中才被授予上尉的军衔。不幸的是，在法国军队中各连的财务是由上尉掌管，上尉负责发放士兵薪饷和军需。财务正是我们现在的这位阿希尔最薄弱的地方；于是在他被提升以后不过几个月，他掌管的财务就出现了惊人的亏空。监察长德·吕利埃尔先生查出了这种盗用公款的行为，坚持要惩办上尉。给部里的报告已经写好了，眼看就要付邮，德·圣阿尔诺先生眼看就要永远完蛋了，而这时他的长官贝多先生被自己部下的绝望处境感动了，他出来过问这件事，并且使得吕利埃尔将军的怒气平息下去了。

圣阿尔诺有一种他所特有的报恩方式。他在政变^①的前夕被任命为陆军部长以后，便下令逮捕贝多将军并把吕利埃尔将军从军官的名册中除名。吕利埃尔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把这封信散发给巴黎的朋友们，并且发表在比利时的报上：

①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编者注

“1837年，吕利埃尔将军不想使勒鲁瓦·德·圣阿尔诺上尉名誉扫地，所以没有剥夺他的军职。1851年，陆军部长勒鲁瓦·德·圣阿尔诺虽然不能败坏吕利埃尔将军的名誉，但是剥夺了他的军职。”^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6月
9日

载于1854年6月24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411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① 1852年1月29日《法兰西简报》第5号。——编者注

弗·恩格斯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¹⁸⁸

前一个时期尽是一些不值得评论的军事行动,因为采取这些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出于战略战术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外交和议会方面的考虑;经过了这段时期以后,终于出现了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和强攻这样一个有军事意义的行动。

这次强攻表明:俄军继续握有主动权,并且到目前为止,土军、联军陆军和舰队的行动仍为对方的行动所左右。联军舰队本能地、不由自主地被塞瓦斯托波尔可靠的掩蔽地点内的俄国舰队吸引;由于没有陆军的帮助就不能攻击这个要塞,结果联军舰队就被一支在船只数量和质量上都差得多的舰队牵制住而不能自由行动。甚至高加索沿岸堡垒的守军在英法蒸汽舰的眼皮子底下及时撤退,也表明俄军决心尽可能长久地掌握主动权。在战争中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能掌握主动权,就证明部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占有优势,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却的情况下,除了决战失败以外,这也可以维持士气。正是这种主动权,既把威灵顿那支被数十万法军包围在西班牙的小小的军队团结起来,又使它在历时五年的战争中成为一切事件的中心。你可能被迫退却,你可能被击败,但是只要你能够左右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你就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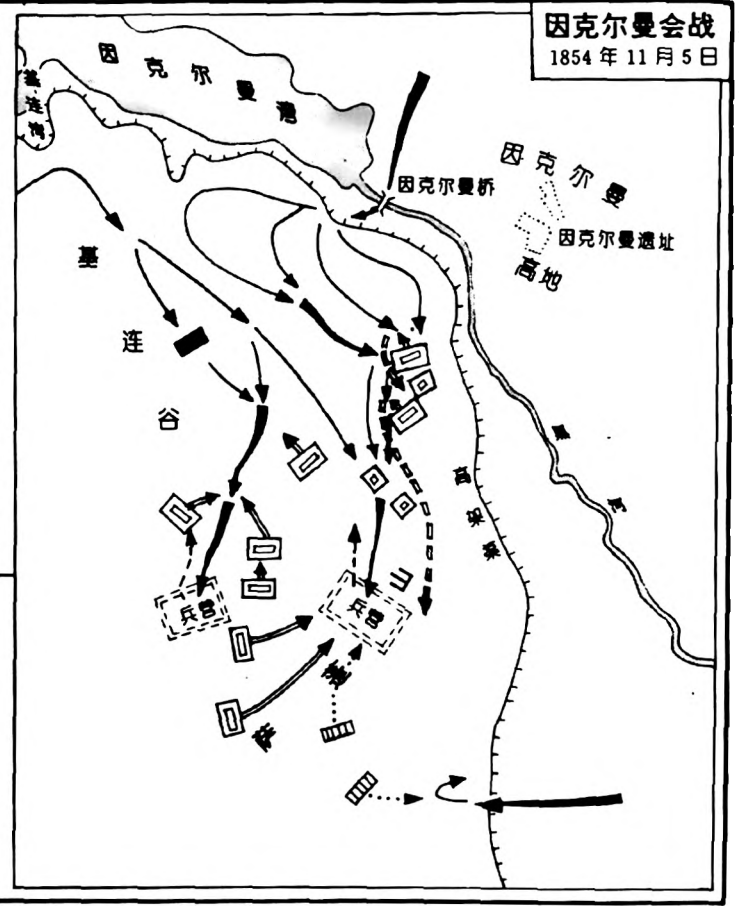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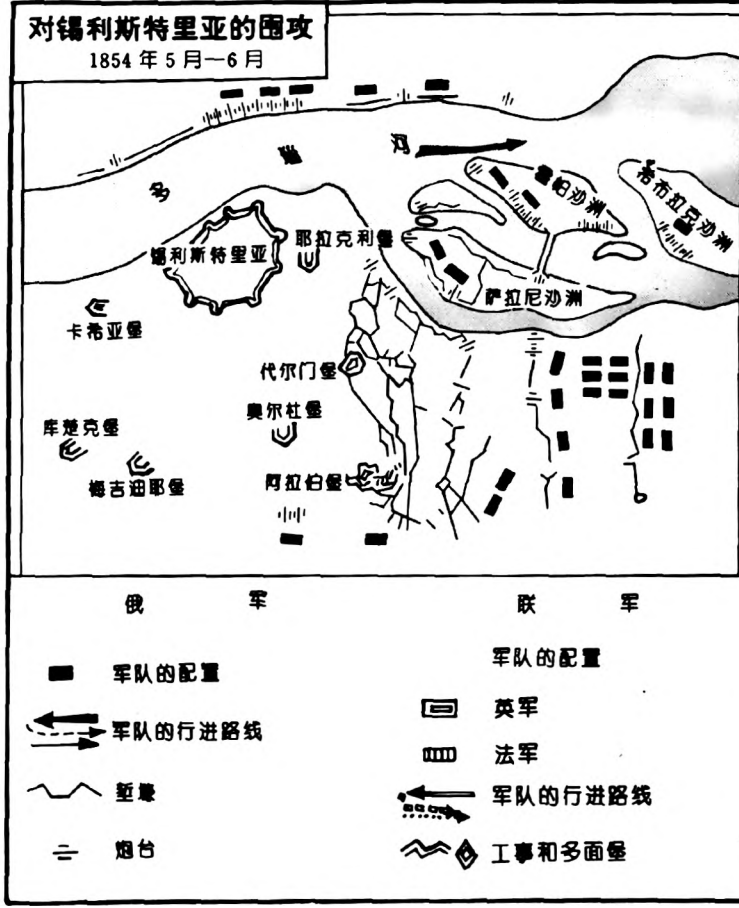
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个士兵和整个军队都将感到自己比对方高出一筹。此外,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攻击是俄军从完成多瑙河地区的占领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前进行动。开入多布罗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御,这既是为了缩短战线,同时也是攻占多瑙河口的一个步骤。而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攻击,则不仅是大胆的行动,而且是估计得极为正确的行动。

在1828—1829年,当时统治着黑海的俄国人为了首先攻占瓦尔纳而置锡利斯特里亚于不顾,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攻占瓦尔纳就开辟了一条通往俄国本土的新的海上交通线。尽管如此,锡利斯特里亚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地点,他们在越过巴尔干之前,必须先夺取它。但是在目前联军舰队统治着黑海的时候,瓦尔纳对俄国人来说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意义,于是锡利斯特里亚和舒姆拉就成了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现在瓦尔纳对于俄军仅具有间接的重要性,因为夺取它以后,他们并不能得到一个好的作战基地,只不过使敌人丧失一个可以称作海岸桥头堡的阵地;在这个桥头堡的掩护下,敌人可以利用舰船突然集中相当数量的军队来采取某种特别作战行动。例如,丹麦人在1849年把普鲁士军队诱到日德兰半岛以后,突然把一支强大的部队海运到腓特烈西亚附近的海岸桥头堡,仅以一次出击就消灭了留在要塞前面准备进行围攻的、优秀的但薄弱得多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部队。¹⁸⁹因此,如果说退出了黑海的俄军不占领瓦尔纳就决不能穿过巴尔干的话,那么他们至少不占领锡利斯特里亚就不能进攻瓦尔纳。

但是在目前看来,这些推断都是次要的。没有奥地利的帮助,俄国休想在它目前的敌人的眼前穿过巴尔干。现在锡利斯特里亚对于俄军具有头等的防御意义;意义如此重大,以致不夺取它,俄军就可

以认为今年的战役失败了。锡利斯特里亚的位置正对着俄军从久尔杰沃经卡拉腊什和切尔纳沃德到库斯坦杰的阵地的中心。既然在这一阵地的前面有坚强的要塞体系,既然奥美尔帕沙坐镇舒姆拉像蜘蛛在它的网里监视着猎取对象的每一个动作一样,既然在卡姆奇克河和代夫尼亚河可能出现联军,那么,俄国用于多瑙河战争的军队在无外援的情况下将很少可能染指色雷斯盆地(这个盆地的青翠景色曾经诱惑过越过巴尔干山脉的吉比奇的疲乏的士兵)¹⁹⁰。俄国在奥地利没有同它联合以前,或者在它的最厉害的敌人——英法军队没有因某种情况而遭到削弱或被迫撤走以前,至少在今年只能单纯防守它目前已夺得的领土。防御战需要有野战防御工事体系或者(在可能时)永备防御工事体系。现在锡利斯特里亚掌握在敌人手中,俄军除多布罗加的一些小型堡垒之外没有任何永备工事,并且一旦瓦拉几亚失守这些小型堡垒就会毫无用处。俄军可能修复布勒伊拉和鲁斯楚克的一些工事,并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建立一个营垒,但是在他们没有占领锡利斯特里亚以前,他们真正可用的第一道防线将远在后方,即在塞雷特河—福克沙尼—加拉茨—伊兹梅尔这一线上。

假定锡利斯特里亚是在俄军手中,那么军事形势便会立刻不同。锡利斯特里亚是俄军作为多瑙河桥头堡的一个最好的地点。它位于多瑙河河湾的内角上,对上述用途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位置。在西北方面有一个大沙洲,上面横贯着一条通向卡拉腊什的堤坝。大沙洲瞰制着要塞以西的平原,距那里 1 000 码,这个距离对于向堑壕进行纵射和向纵队进行炮击是足够近的了。在东面有两个小沙洲,从这里可以扫射东面的接近地,水浅时在沙洲上构筑的临时炮台,将会极严重地威胁围攻者。因此,北面受到攻击的土军在防御时所不能利用而不得不让给敌人的那一部分领土,倒成了俄军炮兵对从南面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和因克尔曼会战的军队配置的示意图

进攻的敌人进行侧射的一个很好的阵地。这样，暴露给攻击者的正面仅仅是以锡利斯特里亚为顶点的三角形的底边，换句话说，只是南面向陆地的那一面；所以土军或联军至少在瓦拉几亚仍为俄军掌握时，休想大举进攻锡利斯特里亚。

但是主要的优点与其说是战术上的，不如说是战略上的。俄军占有多布罗加和锡利斯特里亚，就可以控制多瑙河并可根据情况或从图拉真垒墙方面或从锡利斯特里亚采取短促的进攻行动。敌人在兵力上如不比俄军多一倍，要在锡利斯特里亚以西任何一个地点渡河，都不能不把舒姆拉暴露给俄军。至于在锡利斯特里亚以东渡河，那根本谈不上，因为最近的渡口为赫尔绍瓦，而要到达那里，得首先占领卡拉苏河的各个阵地，然后才能占领赫尔绍瓦，而赫尔绍瓦可以有力地抵挡住陆上的攻击，却极其容易被河上的敌人攻破。

因此，俄军占领锡利斯特里亚以后，多布罗加的堡垒对他们就有了重大的意义。他们获得一个双重的轴心，可以围绕它自由机动而不致使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即使敌人用二比一优势的兵力，可以在奥尔泰尼察或久尔杰沃附近渡河占领布加勒斯特并把俄军击退到雅洛米察河彼岸，但要有把握地向比萨拉比亚坚决进军，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仍然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锡利斯特里亚真正陷落以前，俄国人即使在瓦拉几亚没有一兵一卒，也可以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占有者。总之，俄军占有锡利斯特里亚就等于说可以多占领瓦拉几亚六个月，而六个月后已到冬季，那时在这个地区是根本不能进行任何围攻的，这就等于把俄国人的统治又延长四个月。占领锡利斯特里亚就是赢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而从锡利斯特里亚撤退差不多就是整个战役的失败。

这样一来，不管怎样玩弄外交手腕，怎样贿赂、怯懦和犹豫不决，

由于战争固有的必然性，我们总算达到了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要么置锡利斯特里亚于不顾，那么它的陷落将成为可以用数学方法准确计算出来的事实；要么联军前往救援，那就将发生决战，因为俄军如果从锡利斯特里亚城下不战而退，就不能不涣散自己的军心，丧失自己的威信，看来，他们也是不准备这样做的。

没有一个要塞曾经遭遇过像锡利斯特里亚那样变幻莫测的命运。1810年，俄军经过九天的围攻和五天坚决的强攻后夺取了它。1828年，虽然要塞的情况完全和从前一样，但俄军于7月21日用陆军围攻它，8月10日又增加了36艘炮艇。然而攻城炮在9月才到达，并且没有弹药，因此不能发动正规的进攻。11月10日，由于冬季来临和多瑙河上出现浮冰，俄军不得不解除围攻。在退却中组织涣散、士气沮丧的俄军遭到守军猛烈的追击；俄军的一部分攻城炮被遗弃在炮位上，其余的被在拉索瓦方向上追击的土军缴获。第二年，吉比奇又去进攻，在把土军从俄军前一年构筑的战壕和多面堡逐出以后，于5月17日包围了要塞。他们大概没有经过任何事先的准备便把31门重炮配置在距城约900码的高地上并开始轰击。5月26日，在距围墙约600码处配置了破坏敌人火炮的炮队，同时构筑了第二道平行壕，第三道平行壕于6月4日筑成，而在6月12日开始向斜堤顶推进。17日，在一处通过了斜堤，但是整个行动直到26日即在距主墙30码的壕沟边设置好了五个炮队以后才完成。同时，在目前围攻中指挥工程作业的希尔德将军，曾大规模地进行了他最擅长的地道爆破。埋在外岸和主墙下面的大包炸药在6月21日爆炸，立刻炸开了一个可通行的缺口，在6月25、27、28和29日又相继爆炸，要塞终于在29日投降了。要不是那些迷信的、未经正规训练的士兵被地下爆炸吓得丧魂落魄，看来当时也不是非投降不可。在整个被

攻击的正面和第二道垒墙的后面筑有二重堡,即一道新的战壕,要占领它无疑又需进行地道爆破或炮兵轰击。这样,这个令人惊异的要塞,虽然与1810年相比毫无改善,却在敌人掘壕后支持了35天,在主墙被打开能通行的缺口后支持了九天。它迫使俄军在炮击中消耗了3万发炮弹,在地道爆破中消耗了336英担^①火药。

由于财政的困难和埃及的战争,土耳其人在阿德里安堡和约¹⁸以后对这个重要据点竟没有加以照顾,以致直到1836年,不仅1829年被打开的缺口没有完全修补好,壕沟没有清除,甚至连1810年强攻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苏丹当时曾考虑修建独立堡垒,但这个主意在相当一段时期没有实现。现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情况已完全不同,这主要应归功于在土军中服务的普鲁士军官格拉赫上校的努力。原来构造上就有缺点的要塞看来未必能作很大的改进,但是在高地上构筑的独立堡垒已经显示了它们的作用。要塞形成一个半圆,其直径沿着多瑙河岸,长约1800码。要塞有十个棱堡面,平均每个长500码。其构造同16和17世纪所有的土耳其要塞一样,存在着意大利旧式筑城所固有的全部缺点:幕墙长;棱堡不大而且狭窄;侧面短,几乎不能掩护壕沟;壕沟本身很浅(深度不超过八英尺);没有隐蔽路;只有顶端高出外岸顶部刚四英尺的简陋斜堤。围墙本身高八英尺,厚二十英尺,用土筑成。内岸和外岸的高度,按壕沟深度计算为八英尺。壕沟本身由于位置较高,必然是干燥的。在幕墙前面甚至连眼镜堡都没有。这便是1836年前的锡利斯特里亚。此外,在距围墙600码处,有一连串向南延伸的高地瞰制着要塞,这就使上述防御上的缺点更严重了。这些高地是保加利亚台地的支脉,台地有非

^① 1英担等于112磅,或等于50.8公斤。——编者注

常平坦的顶部,延伸到距城 1 500 码处,然后向河流方面缓斜而下,它的一面是狭窄的小支流,一面是高地,为炮队提供了一个正射和纵射用的优良的梯阶阵地。曾在 1836 年视察过这个要塞的毛奇少校(上面叙述的具体材料便是从他论 1829 年战役的著作中引来的)发表过以下意见:

“如果不在高地上增建四个独立堡垒,不在对面的大沙洲上构筑一个桥头堡,就不能使锡利斯特里亚具有坚强防御的能力。”^①

在属于瓦拉几亚的那个沙洲上构筑桥头堡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土耳其人根据和约规定已经撤出瓦拉几亚;但是现在堡垒已经筑成,而且,如果我们消息灵通的话,这些堡垒差不多正是构筑在毛奇少校所指出的那些地方。

究竟格拉赫上校在消除要塞主墙缺点方面可能采取了什么措施,这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大概可以不必怀疑:他至少构筑了隐蔽路,并在幕墙中央开了射孔,以便沿所有最受威胁的、防御薄弱的正面上的壕沟射击。至于四个独立堡垒,它们的结构模式目前我们还一无所知,但鉴于格拉赫上校是普鲁士人,并且节省费用是土耳其政府的一大宗旨,我们可以说,这些堡垒很可能是按照目前欧洲大陆几乎到处采用,特别是在普鲁士采用的那种体系建筑起来的,就是说,这些堡垒是顶部平坦的方形堡或八角堡,每隔一个角筑有射孔。它们的位置可以根据形成为台地向城市方向突出的末端并为三个雏谷隔开的四个地角来确定。它们和主墙的距离平均应为 1 500 码,因此要塞的火力不能对它们进行很有效的掩护。但这也不是绝对必要

^① 卡·毛奇《1828 年和 1829 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 年柏林版第 206 页。——编者注

的,而且在离城较近的斜坡上,看来也没有任何地褶可用来很好地掩蔽堡垒,使之不受台地边缘的瞰制。

除了这些永备工事以外,格拉赫上校还在台地上构筑了临时性的土质工事,叫作阿拉伯堡,位于两个中央堡垒之前约1 000码处。根据一些报道,我们可以推断还筑有其他的野战多面堡,以便形成一道外围堡垒线,这样一来,前后共有三道防线。但是阿拉伯堡仍然是这些阵地的锁钥,必须先夺取它才有可能接近内围堡垒线。这样的工事配置使锡利斯特里亚有了巨大的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因为正规攻击只有从要塞的南面进行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所以守军如有15 000—18 000人,便可以派出大批兵力出击。担任出击的部队可以在独立堡垒后面的斜坡上找到很好的掩蔽阵地,从这些阵地他们可以沿着维谷接近敌人而不被发觉。因此,在阿拉伯堡遭到强攻时,决定会战成败的与其说是这个堡垒的守军,不如说是由锡利斯特里亚出击的部队。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次围攻本身的情况。

自4月底以来,俄军不时从多瑙河对岸炮击锡利斯特里亚。5月,他们开始在城市对面的大沙洲上,在通向卡拉腊什的堤坝附近挖掘正规的接近壕,到5月10日把炮队沿河岸配置完毕。11日,对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并对北部正面进行了平射。5月12日,再次进行炮击,当时刚刚到达的孟加拉炮兵中尉内史密斯观察了炮击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主要目标是东北部,或者说是特申盖尔梭堡,土军从这里进行了特别猛烈和非常准确的还击。据说相反地俄军打得很不认真,在城市中发现的大量榴弹,竟连信管上的帽盖都没有取下就发射了,所以既不能燃烧,也不能爆炸。这样的疏忽,虽然在战役开始时的野战中进行快速射击时是常见的,但是在射击速度总是较慢的攻城炮击中却是闻所未闻的。这

种疏忽说明,俄军是多么急于打发掉他们的弹药。此外,在夜间,俄军还在锡利斯特里亚以东希布拉克沙洲上安置了一个炮队。(1829年,他们在这个地点有两个炮队)。这个炮队的四门炮大概是用来对整个北部正面进行纵射的。

自5月13日到16日,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行动,至少在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到。很可能俄国将军们发现炮击达不到夺取土耳其要塞的目的(这是他们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便准备在右岸进行攻击。因此,5月16日在锡利斯特里亚以东架了一座桥,两万人由桥上过了河,据说很快又有从多布罗加调来的两万人和他们会合。俄军为了把兵力集中在锡利斯特里亚和图尔图凯的方向上而进行了总的调动,因为一旦决定在右岸进行攻击,便需要兵力作掩护,以防备驻在舒姆拉的奥美尔帕沙和可能在瓦尔纳登陆的英法军队的袭击。

5月19日,对阿拉伯堡进行了首次侦察;大批部队集中在火炮射程以外不远的地区,散兵线开始向前推进。穆萨帕沙在短时间的炮击后向台地派出了一队巴希布祖克¹⁹¹,击退了这些散兵。5月20日,俄军重新出动,这次出动作为单纯的侦察,未免声势过大,而作为真正的进攻,又嫌不够有力。21日,对阿拉伯堡进行了第一次攻击,详细情形虽不知道,但俄军受到很大损失后被击退了。逃到土军方面的两个俄国军官报告说:敌军兵力达九万人,由三个军编成(这同实际符合,就是第三、四、五军),由康斯坦丁大公指挥。最后这一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康斯坦丁正在指挥在芬兰的海陆军和海岸防御。关于次日打算再度进行攻击的消息,没有被事实证实。俄军已作好战斗准备,但是没有向堡垒接近。以后,我们又没有得到至5月26日为止的战况的消息。5月27日拂晓,俄军以极大的兵力重新进攻阿拉伯堡。三次发起猛攻,但三次都受重创而被击退。

土军的报告称,俄军 1 500 人被击毙,3 000 人受伤,这可能有些夸大,但还不是十分不可信的。帕斯凯维奇决定按照苏沃洛夫的方法夺取堡垒,他在第二天早晨再度使纵队作好攻击准备。看来伤亡惨重,谢尔万将军阵亡,上校小奥尔洛夫伯爵眼部中弹,后来死去^①,另一个上校身负重伤。俄军自己承认死 186 人,伤 379 人,但这个数字显然还不到实际损失的三分之一;从他们投入攻击的大量兵力来看,他们可能遭到的伤亡至少是 2 000 人。

当天夜间土军进行大规模的出击,突然袭击了俄军的防地,驱逐了他们,并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损失(据报告,为 1 500—1 800 人)。由于这一次出击成功,以及由于俄军在最后一次猛攻中尽管出动骑兵来督促部队前进并阻止他们退却,仍然没有能够使他们同敌人进行格斗,帕斯凯维奇公爵不得不放弃以白刃格斗夺取堡垒的企图。毫无疑问,这个多面堡的防御不仅是这次而且甚至是历次俄土战争中最光辉的战绩之一。在这个地形上可以用极大的兵力进行攻击,而俄国人也不是那种肯错过机会而不把他们所能使用的兵力都投入强攻的人。因此,俄军方面在数量上一定占有极大的优势,要击退他们,土军不仅要有很大的勇敢精神,而且要有计划周密、行动协调的出击。如果俄军面对的是 1829 年的土军,也许已经攻占了要塞,这一点大概可以不必怀疑。他们目前屡次的失败说明,土军,至少一部分土军,既在战术和军事科学方面有了长进,又丝毫没有丧失自己的勇敢精神。就这方面来说,阿拉伯堡的防守和切塔泰会战是整个战役中最出色的事件。

至于俄军的攻击,没有什么优点可谈。看来,帕斯凯维奇十分急

^① 小奥尔洛夫上校受重伤但未死亡。——编者注

于夺取锡利斯特里亚,以致他甚至没有时间采取为达到这个目的所绝对必需的一些措施。他的犹豫不决是大家一眼就可看出的。首先,他试着进行炮击,虽然他应当知道,这样做对一个土耳其城市是多么无济于事。炮击只能使俄军耗费大量弹药,或许只能在靠河这一面的围墙上打开一个缺口,而那里距宽1 000码的多瑙河天堑很近,根本别想进行强攻。于是俄军便攻击陆上防线,但是看来既没有压制住阿拉伯堡的火力,也没有做过一次真正的尝试去破坏这个堡垒的防御工事。在苏沃洛夫的后继者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这位大俄罗斯将军所说的:“枪弹是笨蛋,刺刀是好汉”,如果这话对于能穿透阿尔卑斯山脉(也是这位英勇的军事权威说的)的俄国刺刀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对于老是有无法克服的射击偏差的俄国枪弹来说毫无疑问就更正确了。因此,虽然命令强攻,进行强攻,反复强攻,但总是徒劳无功。结果是,规模不大但构造坚固的土耳其堡垒的土质胸墙,比苏沃洛夫所刺穿的阿尔卑斯山的花岗石还要结实,土耳其的炮弹和枪弹并不像俄军的炮弹和枪弹那样是笨蛋。结果,帕斯凯维奇将不得不回到老规矩上来:在未压制住要塞的火力和摧毁其防御工事以前,决不能进行强攻。因此,大约在5月30日或者31日便开始正规围攻,而帕斯凯维奇最后还是求助于“枪弹笨蛋”。

但是不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1829年的名将希尔德将军出场了,他发誓要用他那个地道爆破来粉碎这个要塞,并且要在几天内完成。用地道爆破对付野战工事,这是陷入绝境的敌人在军事上彻底失望和暴怒的最终表现。如果必须使用地道爆破,保证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通过斜堤。但在通过斜堤以前,应当压制住对方的火力,而这就是说要开掘一条、两条或三条平行壕并配置相应的炮队。

实际上,地道爆破是围攻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它的开始。如果希尔德不打算在约二十平方英里的地区开凿地道或者在多瑙河下面挖掘隧道,他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正规围攻。和苏沃洛夫的说法相反,枪弹是必不可少的。

对阿拉伯堡的正规围攻无疑地会在几天内结束,因为这个堡垒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且长期的防御会过多削弱守军。但是,这意味着至少要对两个堡垒采取正规围攻,然后再对城市本身进行正规围攻。不管俄军在围攻中多么草率行事,他们能够完成上述行动的最短时间无疑要五个星期。要是土军的粮食和弹药充足,又不遇到任何意外的情况,在7月初以前,要塞可以说是安全的。当然,我们假定堡垒的坚固程度是中等的,而围墙也不过分陈旧。不过,既然1829年锡利斯特里亚在敌人掘壕后还支持了三十五天之久,那么在它有了新的改进,而且有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官,一位经验丰富的炮兵司令和一支头等的守军的情况下,在1854年至少也可以支持同样长的时间。假使能够得到联军援助,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战役必定使俄军完全失败;如果不是更糟的话。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6月

10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6月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土战场的形势¹⁹²

昨天傍晚亚美利加号邮轮的到达带给我们的欧洲通讯和几捆报纸,完全证实了关于俄军已从锡利斯特里亚城下的堑壕中被逐走,以及随后从瓦拉几亚退往塞雷特河一线的消息。我们获悉,奥军根据上月14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条约¹⁹³,无疑地即将开入俄军撤出后的瓦拉几亚地区。就我们所知,这一在当前情况下对沙皇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是在梅特涅公爵的直接指导下发生的,他实际上重新控制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对外政策。^①

且不谈俄军由瓦拉几亚撤退和奥军进驻该地这一奇妙的巧合,单是如何决定、如何进行以及最后如何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这种做法,就足以表明这里起作用的决不是纯军事的考虑。从俄军的官方报告(其中发表了截至5月28日下午为止的战况,仅在死伤人数上与土军的公报不同)中可以看出,俄军行动非常仓促,他们是在实际上深信不可能用强攻夺取锡利斯特里亚以后才竭力破坏外围工事,并且这次进攻比俄军围攻史上的任何一次进攻都更为鲁莽,更不科学。关于5月28日—6月15日的军事行动,我们只收到了一

^① 这一段文字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些极其零星的报道,因而无法详细地叙述事件的经过;但俄军在反复拚命地攻击时,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负伤和致残:帕斯凯维奇、希尔德(后来截去一条腿)、哥尔查科夫、吕德尔斯以及奥尔洛夫(眼部中弹)。这个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俄军曾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这个要塞,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任务。他们对整个行动实施的方式,与其说是进行常规的现代战争,不如说是采取帖木儿在库尔德斯坦夺取城市时的野蛮方法。另一方面,十分明显,英勇而巧妙的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在盟国方面和在奥斯曼帝国的国务会议方面,引起了同样的惊愕。读者们也许记得,大约在六个星期以前,联军的指挥官①在瓦尔纳会见时曾发现巴尔干山脉是土耳其的天然屏障;现在,许多英国报纸对锡利斯特里亚没有得到法英军队一兵一卒的救援这个事实不仅承认,而且引以为荣。最后,决不能否认:锡利斯特里亚是军事上极其重要的地点,这个要塞的命运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俄军在放弃围攻而突然向塞雷特河退却后,已经丧失了他们在今年和去年所夺取的全部领土。

不过还必须指出,我们英国的许多报纸过分夸大了俄国人这次失利的程度。当然只有最容易受骗的人才会相信,6月13日锡利斯特里亚守军的出击和据传从奥美尔帕沙那里得到的2000名援军使俄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并迫使9—10万人在15000人面前逃走。根据我们的判断,俄军的突然退却同他们的突然进攻一样是神秘莫测的。这只有用俄国和奥地利事先达成了由奥军占领瓦拉几亚的协议才能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从《纪事晨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6月10日(即奥土条约缔结前四天)揭露这个阴谋的通讯中发现

① 阿·圣阿尔诺和菲·詹·拉格伦,见本卷第318页。——编者注

的下面一段话就特别值得注意：

“土耳其人认为，外交活动正在玩弄他们，企图把锡利斯特里亚让给俄国。这个猜疑为这里收到的消息证实，消息说在维也纳正在准备新的议定书，据我了解，其中似乎已把锡利斯特里亚的陷落看作既成事实；现在当俄国的军事上的荣誉感得到满足的时候，奥地利便认为进行武装干涉参与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其办法是占领俄军将要撤出的多瑙河两公国。”

因此，如果俄军及时攻占锡利斯特里亚，那就一切顺利。而现在，虽然俄军没有能够满足沙皇的军事上的荣誉感，但是根据与奥地利的协定，也只好颇不光彩地撤退了。在俄军退过塞雷特河时，奥军就向塞雷特河和多瑙河前进，这样，他们就处于俄国人同土耳其人及其同盟者的中间。奥地利人处在这个地位，成了争端的调停人，不让任何一方前进。俄军留在摩尔多瓦，而维也纳会议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忙于拟制议定书，这样，俄军就可以赢得冬季的时间。如果会议一无所成（无疑，结果必然如此，因为俄皇已从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得到另一笔3700万美元的贷款）^①，俄军在多瑙河和塞雷特河以北的地位也将比它原先在布加勒斯特和库斯坦杰之间的战线巩固一倍。此外，如果把在锡利斯特里亚前面、在保加利亚境内的俄军兵力（他们目前正向塞雷特河以北撤退）同在巧妙部署的情况下能起作用的联军兵力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联军即使煞费苦心，也不可能阻挠奥俄的这种相互配合。

在欧洲的黑海沿岸同土军和联军作战的俄军兵力由13个步兵师组成：第三军的三个师、第四军的三个师、第五军的一个师、第六军的三个师和三个预备师。此外，在这个地区还有第三、第四、第五和

^① 见本卷第370页。——编者注

第六轻骑兵师以及第三、第四和第五炮兵师。这些部队几乎达到主要的作战军队的一半,据官方资料,其中每一步兵师有 16 000 人,每一骑兵师有 5 000 人,每一炮兵师有 160 门火炮;全部约 25—26 万人,包括辎重队和兵营勤务人员在内。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俄国军队在匈牙利战争^①时的实际情形来判定它的人数,那就应当认为俄军一个步兵师不会超过 13 000—14 000 人,并且骑兵和炮兵的人数也要相应减少。因此,俄军先后开入多瑙河两公国的部队实际上应当减少到 21 万人左右,并且其中至少还要除去战斗减员和因病死亡的 20 000—25 000 人。如果我们回忆一下 1828—1829 年疟疾在俄军中造成的大量减员,并拿俄国外科医生在《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发表的通讯来比较,我们认为,俄军的损失达到总人数的 8—10% 这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这样一来,俄军只剩下 18 万人左右可以支配使用了。

弄清这支军队中的多少兵力可用于对锡利斯特里亚作战,这是很有意思的。大量部队要用以保护战线后方的交通线和仓库,布加勒斯特和多布罗加战线必须占领。要派出兵力掩护部队的两翼和一部分正面。如果我们除去为完成这种任务所需的 6 万人,那么用来围攻锡利斯特里亚并掩护这一行动的兵力净剩 13 万人。而且这只能是偏高的,而不是偏低的估计。但是由于锡利斯特里亚位于大河附近,围攻的部队就不可避免地要分成几路,以便从四面包围要塞。其次,必须在北岸配置强大的预备队,以便在失利时接应从南岸退回来的部队。最后,占领南岸(即右岸)的部队也要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负责围攻和抗击被围者的出击,另一部分则负责掩护围攻部队

① 指沙俄军队 1849 年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编者注

并击溃可能派来援救要塞的敌军。这样,为了占领左岸和在右岸进行围攻大约需要 35 000—40 000 人。因此,俄军可用来同解围的敌军进行积极的野战的兵力为 8 万人,这就是俄军在保加利亚境内锡利斯特里亚周围 10—20 英里半径内可能投入战斗的最大限度的兵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联军有多少兵力可以同目前的 18 万俄军相对抗。驻扎在舒姆拉的土军,不久前的报道说,约有 8 万人,但是他们缺乏在开阔地作战所需的任何条件,据拉格伦勋爵和法军参谋部官员最近的报告说,军官的素质很差,总的说来,其现状根本不容许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不想核对,同时现在也不可能核对这些报道是否正确。但只要说这是联军对土耳其主力军队的状况的官方意见就足够了。从那时起,土军便由卡拉法特派往鲁斯楚克,据说那里建立了一个可容 4 万人的兵营。这种把整整一个军搁置不用的策略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要不是战争的指挥权完全操在外交家手中的话,这个军如果不开往鲁斯楚克而开往布加勒斯特,就能够迫使俄军立即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如果除去鲁斯楚克目前的守军以及舒姆拉的守军和预备队,那么土军是否能在开阔地集结 5 万人去执行他们的当前任务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按西方军事权威的估计,一个英国兵或法国兵至少可以抵得上两个俄国兵,那么联军仍然要有 65 000 人的一支军队,才能够同俄军占领军势均力敌。因此,联军在瓦尔纳集结起这样的兵力以前,除极端需要的情况之外,不会投入战斗。

其实,联军是非常谨慎的,他们没有马上把这样大的兵力投入战场,以免往后失掉逃避积极行动的借口。除目前正在开往土耳其的 15 000—20 000 人(包括几乎所有的炮兵和骑兵)以外,目前在

土耳其的英法军队，一共不过 8 万人。不管是否有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运输船只的数量非常有限，因而如果部队单由海道向瓦尔纳运送，那就需要多次往返航行。但是，“根据最近的最正确的消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记者这样说，“到目前为止仅有 12 000 名英法士兵由海道运送，法军主力正由加利波利向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缓慢地前进”。因为道路非常不好而且军队的粮食供应非常困难，所有这些就使得他们的声名狼藉的圣阿尔诺将军一直留在瓦尔纳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待命开拔。我们可以确信他决不会错过利用国务会议内的任何阴谋的机会，以便攫取巨款中饱他那无底的私囊。关于英军两个师仍然留在斯库塔里的消息，我们也是由上述记者那里得到的，他说：“他们看来还没有准备好出发，虽然整个运输船队停泊着等待装载他们”。

根据这一切事实，每个人都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盟国小心翼翼行事，以免直接破坏俄奥之间目前的协议。因为如果盟国想要做到这一点，只需采取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达到目的，那就是或者在波罗的海结成英国瑞典同盟，给辅助部队提供作战基地，便于他们进入芬兰和从陆上迂回斯韦阿堡和喀琅施塔得两个要塞；或者对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进行海陆联合攻击。至于第一个可能性，我们很有趣地看到：伦敦《泰晤士报》在不到三星期以前还坚持认为必须把黑海分舰队派到波罗的海，现在却主张只封锁波罗的海各港湾而立刻把大部分波罗的海舰队调回黑海，突然变成了占领克里木的积极拥护者。也正是这家报纸，对纳皮尔在法国舰队同他会合之前不可能有所作为曾经装腔作势地表示遗憾。现在，当这个会合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却又认为，归根到底，今后什么事也不会做，英法舰队最好还是再作一次经过卡特加特海峡、拉芒什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到黑海

的航行。如果注意一下这两个舰队的会合已经花了多少时间,以及它们与海军上将邓达斯指挥下的部队会合又将需要花多少时间,那就可以完全明了,这些建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波罗的海或者在黑海什么事也不做。

俄军如果不算在锡利斯特里亚出乎意外的失败,那么他们遭受重大损失和充满危险的唯一地点便是高加索,虽然关于这点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消息。他们放弃了黑海东岸的几乎所有的要塞,但这不是由于害怕联军舰队,而是为了加强他们在格鲁吉亚的兵力。据说,俄军通过达里亚尔峡谷撤退时,前卫和后卫突然遭到大批山地居民的攻击,而且前卫被消灭了,本队和后卫受到很大的损失而被迫退却。同时,塞里姆帕沙的军队也由圣尼古拉堡垒推进到奥苏尔格特,并迫使俄军撤出该要塞,在这以前,俄军是常常从那里扰乱并威胁土军的;这个胜利保障了塞里姆帕沙同在卡尔斯的土军主力之间的交通线。如果回忆一下正是这同一支部队在冬春两季都非常可怜地毫无作为,那么俄军的机动至少证明,他们感到自己在格鲁吉亚的地位已不是不存在危险,迫切需要从沿海地区调兵增援。如果在达里亚尔战败的消息是真实的,或者哪怕部分是真实的,那么就应该得出结论:沃龙佐夫军队的退路已被切断,他们必须设法在梯弗里斯建立巩固的基地以便坚守到今年冬季(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不然就得考虑不惜任何代价冲过这个峡谷。无论如何,采取这一行动也比向里海退却好,因为通往里海的峡谷比达里亚尔峡谷不知要危险多少倍。但是关于这类问题,只有从这些地方得到更全面和更可靠的消息以后,我们才能够比较确切地加以评述。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认为,俄国由于最近的几次行动,的确得到了两次胜利,一次是霍普公司的贷款,另外一次是奥地利同土耳其的条约;同时它也遭到了一

次失败,即在锡利斯特里亚的失败。至于这些胜利能否造成永久的优势以补偿失败的耻辱,那要在将来才能见分晓。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6月16—2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7月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5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军的撤退¹⁹⁴

俄军在土耳其的撤退，比我们预料它可能做的要彻底得多，而且比目前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来看所需要的那种撤退还彻底。看来，沙皇对奥地利皇帝承担的义务以及他给俄国将军们发布的命令，都包括要求俄军全部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在土耳其领土上不留俄国的一兵一卒，而强大的奥军则立即代替俄军，把不久前还彼此厮杀的两国军队隔开。但是，如果以为俄军的撤退是由于他们在锡利斯特里亚的失败造成的，或者对英国报纸的吹嘘信以为真，那就错了。这些英国报纸把这次失败描绘成覆灭，并且一心要全世界相信，从要塞出击的 15 000 人或者至多 17 000 人能够把 10 万名或者至少 9 万名敌兵打跑。俄军毫无疑问地被击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坚决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这正是他们轻率的、考虑不周的和违反军事科学的混乱的攻击——虽然这些攻击进行得非常勇敢——所应得的结果；土军作战异常英勇果敢，表现出相当的军事技巧，因而使这次反围攻永垂史册；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相信，正是他们才迫使敌人撤围。事实上，据最可靠的消息说，在守军最后一次猛烈的出击后，俄军仍继续坚守左岸的炮台，并利用它们向要塞射击，但是某些电讯夸大其词地报道说，这些炮台在那次出击中被守军

攻占。事实的真相显然是，俄军最后从锡利斯特里亚周围撤退，只不过是因为沙皇同奥地利曾约定俄军在一定期限内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他曾命令俄军先要攻占锡利斯特里亚，以便保留着至少曾取得过一次胜利的威望离开土耳其；可是军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于是他们只好蒙受失败的耻辱而撤退了。但是，这次撤退并不是在敌人追击下溃逃。俄军也许甚至采用正规的围攻也攻占不了锡利斯特里亚；可能，他们在这一战役中什么也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退到塞雷特河；不过，他们仍然比联军（土军和其他军队）强大，至少在防御方面要强得多。此外，他们还不曾同联军交过锋，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决战。因此无可争辩，俄军向普鲁特河撤退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奥美尔帕沙和他在土耳其的同盟者的优势兵力或高明的战略所产生的军事上的需要。

但是，如果说俄军实际上是被从锡利斯特里亚城下赶跑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那么，看不到这场战争一般说来对俄军不利，而奥地利的干涉给他们提供了改善处境的最好办法，同样是错误的。这里我们不是指俄军在奥尔泰尼察、切塔泰、卡腊卡尔或锡利斯特里亚的一连串失败，——这些都是较小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土军给俄军以打击，而俄军则从未能给予土军以同样成功的打击。所有这些冲突加在一起也没有产生决定性的或极其严重的结果。可是，在亚洲俄军的赌注肯定输了，这种失利现在有变成彻底失败的危险。俄军在黑海沿岸的许多要塞现在只剩下两座；而在内地，沙米尔和他的山地居民不仅肃清了附近的山地和谷地上的可恨的俄国人，而且还切断了沃龙佐夫伯爵同俄国的联系，并在南面同土军一起行动，向梯弗里斯进发，其兵力之大可能迫使伯爵交出俄国所有那些得来如此不易、而守卫又如此艰难的外高加索领地。对沙皇来说，丧失这些以大量

鲜血和金钱换得的地区,比起在土耳其决战的失败来,也许是更大的耻辱;毫无疑问,只要他的军队回渡普鲁特河,他立即会派出可以从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防线上抽出的部队去收复高加索的各山口并支援沃龙佐夫。沙米尔的胜利很可能促使俄国接受奥地利提出的关于从多瑙河两公国撤退的要求。

在使战争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且更加复杂化的这桩重大交易中,奥地利处于体面而有利的地位。这是它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也是它的军事力量使交战双方敬畏的证明。它作为交战双方的朋友进行干涉。俄军乖乖地退走,给它让出了地方;而土耳其政府完全按照法国和英国的主意,在允许奥地利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条约上签字。因此,它是一个得到交战双方同意而进行干涉的武装的调停人。因为每一方都认为这种干涉对自己一方有好处。西方强国公开宣称,这是一个对它们有利的行动;而根据有关这一行动的协议(事实证明,早在全世界知道必将出现这样的事情以前,以及在帕斯凯维奇的军队在锡利斯特里亚遭到回击以前,在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之间就已达成协议了),无疑俄国也认为这是一个对它有利的行动。究竟是谁受骗呢?奥地利打算出卖哪一方呢?

当然,奥地利和任何其他强国一样,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它的利益要求俄国不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不控制多瑙河口和黑海,因为奥地利与那个地区进行着大宗的、日益增多的贸易。此外,俄国并吞土耳其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土地,都会在奥地利帝国内的斯拉夫人中间引起骚动,因为在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拥护泛斯拉夫主义,主张同俄国结成同盟。因此很明显,奥地利是决不会同意俄国并吞土耳其的,除非它自己从其他地方同时获得等量的领土和霸权作为补偿,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奥地利的政策是完全同

情沙皇而反对法国和英国的；它真正的方针将始终是反对西方强国。俄国由于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而罪有应得地蒙受了耻辱，这在维也纳是不会引起不安的；然而奥地利永远不会听任俄国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哈布斯堡王朝会失去一个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涡的朋友。我们认为，这一简短的论述已概括了支配着维也纳内阁在今后战争发展中的行动的全部动机。奥地利将来可能出卖交战的一方，或者双方，这完全决定于奥地利的利益和王朝利益的需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俄军撤退和停止侵犯，并把退出的地区转交给奥地利这一事实，使奥地利立即承担了一项义务：防止今后再发生伤害俄国的事件。奥地利可能与盟国保持名义上的友谊，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奥地利将设法使盟国今后对沙皇的一切行动都遭到失败。可以相信，它将为此去做除真正宣战以外的任何事情，——宣战这一手段它无论如何是不敢贸然采取的。因此，它必然要执行出卖西方强国的政策。在允许奥地利军队占领土耳其某些地区的条约中，西方强国是受骗的一方，在战争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它们总有一天会发现这一点。

显然，英国首相阿伯丁勋爵的计划是战争不应再继续下去，而应当按照奥地利的愿望，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现在就着手解决这场冲突，可能要把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由俄国移交给哈布斯堡王朝。不过，我们可以不必认为，由于阿伯丁勋爵在那次臭名远扬的发言中所作的自我揭露以及接着的议会辩论（辩论详情我们在今天本报上另有报道^①），这一计划已经破产了。被这些揭露出来的事实所激动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辩论详情指马克思《战争。——议会辩论》一文，见本卷第359—368页。——编者注

的英国人民,在没有得到比只是恢复原状更重要的某种结果来补偿他们因战争而支出的巨额费用以前,是不会同意缔结和约的,至少在目前是不会同意的。他们认为必须打垮俄国,使它不能很快地重新破坏世界的安宁;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建立某种例如攻占喀琅施塔得或塞瓦斯托波尔那样的赫赫战功。不得到这种有形的战绩以弥补参战的代价,他们是不会同意缔结和约的。他们的这种情绪大概会引起内阁的立刻更换,并使战争继续下去。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俄国将受到比它过去所受的更加沉重的打击,——除非土耳其人和切尔克斯人在没有西方任何援助的情况下能夺取俄国的外高加索各省。从阿伯丁勋爵辞职后可能在伦敦掌权的人物自战争爆发后直到今天的所作所为来看,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将在阿伯丁勋爵现在所主张的并因此而失掉职位的同一基础上缔结和约,那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到目前为止,奥地利的外交是成功的;很可能最后的胜利也属于它。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6月17—2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7月1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战争。——议会辩论¹⁹⁵

1854年6月27日星期二于伦敦

布加勒斯特的俄国《通报》正式宣布，遵照圣彼得堡的命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包围已经解除，久尔杰沃已经撤军，全部俄军即将回渡普鲁特河。《泰晤士报》昨天在第二次增刊中发表了该报驻维也纳记者拍回的类似的电讯：

“俄国皇帝出于对奥地利这个老盟友的深深的尊敬，接受了它的要求，已命令自己的军队回渡普鲁特河。”

约翰·罗素勋爵昨天在下院晚间会议上证实了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包围已经撤除的上述说法，但是他还没有收到俄国答复奥地利要求的官方消息。

由于奥地利的干预，土军和俄军之间将树起一道壁障，这道壁障将保证俄军顺利撤退，使他们有可能加强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木的守军，甚至重新同沃龙佐夫的军队取得联系。此外，当盟国拒绝默认简单地恢复战前状态（也许沙皇作一些有利于奥地利的微小让步）的时候，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神圣同盟的恢复就可以说是一个

既成事实。

但是,据说是梅特涅发明的这一整套绝妙的“解决办法”,现在被老阿伯丁的饶舌和帕麦斯顿的阴谋粉碎了。

大家该记得,在最近一次内阁改组中,企图任命帕麦斯顿勋爵主持陆军部——成立这个部的要求主要是由帕麦斯顿派的报刊提出的——的努力失败了,皮尔派¹⁸⁴纽卡斯尔公爵担任了高贵的勋爵所垂涎的新职。看来这次失败提醒了帕麦斯顿勋爵:早就该解散整个内阁了。于是他选中阿伯丁勋爵发表的反驳林德赫斯特勋爵的考虑欠周的发言¹⁹⁶作为借口,掀起了反对内阁首脑的真正的风暴。所有英国报刊都立刻抓住了那个发言,但是值得补充的是,《先驱晨报》还在那次发言之前就已公开指出有一个反对阿伯丁勋爵的阴谋。莱亚德先生于上星期五在下院发了言,宣布他将在下星期四提出下述决议案:

“女王的首席大臣所使用的言词蓄意要在公众心中引起对战争的任务和目的的重大怀疑,并缩小光荣和持久的和平的前景。”^①

这个决议案有两个弱点:第一,它违反宪法而且很容易被驳倒,因为它违背禁止下院议员批评上院中的发言的议会规则;第二,它仿佛要把首相就某一问题发表的言论同联合内阁的全部活动区分开来。尽管如此,上述决议案却使阿伯丁勋爵如此惶恐不安,以致在它被宣布后两小时,他就即席发言,并以异常激动的口气声明,

“下星期一(也就是说比莱亚德先生早三天)他将建议议院查阅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后他致俄国的紧急函件的副本,并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不久前

① 奥·亨·莱亚德 1854年6月23日在下院的说明,见1854年6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776号。——编者注

他在上院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所受到的曲解。”^①

大家对莱亚德先生的决议案会使阿伯丁勋爵离开内阁这一点如此深信不疑,以致《晨报》——举个例说——都已经公布了将接替他的内阁的名单,其中包括担任内阁首相的约翰·罗素勋爵和担任陆军大臣的帕麦斯顿勋爵的名字。不难想象,昨天晚间上院的会议吸引了非常多的爱看热闹的兴致勃勃的贵族阴谋家,他们都渴望看到阿伯丁勋爵如何摆脱他颇为困难和尴尬的处境。

在概述阿伯丁勋爵的发言和克兰里卡德侯爵对他的攻击之前,我应当先追述一下两位发言人都特别提到的时期和情况,即1829年阿伯丁勋爵担任不列颠外交大臣的时期。当时,海军上将葛伊甸指挥下的俄国舰队正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萨罗斯湾和埃内兹湾以及埃德雷米特湾和士麦那湾,从而违背了1815年圣彼得堡内阁和伦敦内阁之间签订的协定:俄国不得在地中海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种封锁会损害不列颠在黎凡特的贸易,使当时英国的通常是迟钝的舆论鼎沸起来,反对俄国和反对内阁。于是,俄国大使利文公爵和马图舍维奇伯爵同威灵顿和阿伯丁举行了会谈。利文公爵在1829年6月1日(13日)从伦敦发出的紧急报告中对会谈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说明:

“大约一小时后(在同威灵顿公爵进行了不能使这位俄国外交官完全满意的谈话以后)同阿伯丁勋爵进行的谈话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还不完全了解我同首相的谈话,而在获悉谈话的详细内容之后,他就极力设法冲淡在谈话开始时他的言词可能给我们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他再三保证说,英国从来无意借故同俄国争吵,如果说英国内阁力图劝说我们放弃对埃内兹湾的封锁,那么它只是想防止有人提出令人厌烦的要求以及巩固两个内阁之间的良好关系;

^① 乔·阿伯丁1854年6月23日在下院的声明,见1854年6月24日《泰晤士报》第21776号。——编者注

我们有或许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的理由来庆幸我们从这种愉快而经常的协调中得到的好处。他自认为他能把保持这种协调一致看得比封锁埃内兹湾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暂时利益更重要；但是他担心，圣彼得堡没有很好地了解英国内阁的立场，人们把他有时提出的异议，例如，在刚刚处理完毕的事件上提出的异议，都归咎于恶毒的意图和敌对的观点，但这种意图和暗计同他的精神实质和政策都大相径庭。但是，另一方面，他发现自己处境微妙。舆论随时准备大肆攻击俄国。不列颠政府不能经常与之对抗，而且在同民族偏见密切相关的〈海商法〉问题上向舆论挑战是危险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指望得到正在反对它们〈民族偏见〉的英国内阁的好感和友情。

我回答他说：我知道舆论在英国的分量，我已看到，几天之中它在起变化。在这次战争中舆论反对我们，因为它认为我们是侵略者，虽然我们遭到了侵犯；因为它指责我们企图推翻奥斯曼帝国，虽然我们声明，这并非我们的目的；最后，因为它认为我们奉行我们自己所反对的那种野心勃勃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使舆论了解真相是纠正舆论的最可靠的办法。

阿伯丁勋爵回答我说：事情并不完全像我所说的那样；舆论反对我们是因为在英国舆论通常都热烈地支持辉格党人，然而，不列颠内阁绝非不希望我们胜利；相反地，它希望我们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它知道，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这场战争只能看作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因为它的后果无法预料！在结束谈话时，这位英国大臣发表了长篇议论以证明我们把他不可能有的意图强加于他了，最后他声明说，伦敦内阁希望，战争的结束能够使俄国得到光荣和利益。”^①

令人奇怪的是，阿伯丁勋爵的对手中谁也不认为援引这个紧急报告是恰当的，尽管这个报告对于阿伯丁勋爵在阿德里安堡条约¹⁸签订以前那个时期的行为揭露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致这位阁下在这个条约签订以后所写的一个紧急秘密函件中的任何内容都丝毫不值得重视了。公开上面引用的那个紧急报告，就会一举摧毁阿伯丁勋爵在昨天发言中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他的有力的辩护只能

^① 《公文集·外交评论》1843年第1卷第1号。——编者注

是公开地反过来责备帕麦斯顿勋爵，因为全部“争吵”只是在这两个彼此勾心斗角的俄国老仆役之间进行的。

阿伯丁勋爵在开始时声明，他既没有什么要收回的，也没有什么要驳斥的，他只是想作一点“解释”。有人错怪他要邀草拟阿德里安堡条约之功，他没有草拟这个条约，倒是曾经反对这个条约，上院从他现在建议公布的这个紧急函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个条约使他和他的同僚感到如此惊恐，以致这个条约的存在使政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改变了它的全部政策。政策的这种改变表现在哪里呢？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以前，无论是他，阿伯丁勋爵，或者是威灵顿公爵，在这个问题上都遵循坎宁的政策，他们从未想到要把希腊建成一个独立王国，而只是想把它建成一个诸如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之类的在土耳其政府保护下的藩属。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之后，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在他们看来是如此危急，土耳其帝国的存在是如此不稳定，以致他们建议把希腊从一个藩属变成一个独立王国。换句话说，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约已大大促使土耳其衰落，于是决定把土耳其的若干省份肢解出来，以抵消这个条约的危险后果。“改变”就在这里。

尽管他们对这个条约可能引起的后果的惊恐被夸大了，但是，阿伯丁勋爵毕竟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条约是十分不祥和极端有害的。他当时曾说过，“俄国并没有由于这个条约而获得广大的领土”，甚至现在他还争辩说，俄罗斯帝国最近五十年来并没有像林德赫斯特勋爵所断言的那样在欧洲大大扩展了版图。（在高贵的勋爵看来，比萨拉比亚、芬兰和波兰王国似乎都不是它获得的大块版图。）但是，正如他在1829年12月的紧急函件中所说的，虽然俄国获得的领土不大，但这些领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的使俄国“单独控制了多瑙河的航行，有的使俄国控制了亚洲的一些港口，这些港口虽然不大，但在

政治上很重要”。(俄国人在高加索获得的大片领土又从阿伯丁勋爵的脑海中消失了。)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断言阿德里安堡条约是俄国方面政策改变的开始,自从条约签订以来,俄国与其说力图获得领土,不如说力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意图的改变。“撒旦只是变得比过去更聪明了。”俄国曾同查理十世商量妥了一个通过一系列条约而不通过引起惊恐的占领来吞并土耳其的计划,这一事实竟被默默地忽略了。阿伯丁勋爵也认为不宜提到:俄国甚至还在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²⁸(他把它们当作俄国政策改变的证据)签订以前,早在1827年就向法国和英国承担了义务,即不打算利用对土战争来攫取新领土;而且,如果没有英国的许可,俄国就不可能在1833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

往下,阿伯丁勋爵声称,他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持续25年的和平,像通过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而做到的那样,那我们就不会是做了错事”这句话,被人曲解成了他想回到类似阿德里安堡条约这样的条约去。其实他只是想说,

“如果他们通过签订——战争中的运气使他们能够签订——某项条约,能够保证25年和平,那么,从人类事务的变幻莫测来看,他们就不会是做了错事,他从未建议恢复战前状态,他也不反对恢复战前状态。在宣战以前,他们所期待和希望的,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保持现状,土耳其政府也同意这一点,而这比他们有权期待的东西要多得多。但是,从宣战之时起,整个问题就完全改变了,一切都取决于战争本身……谁也不能说他们最终会离开现状多远,因为这取决于不受他们绝对控制的种种事件。他想要说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应当得到保证,得到切实的保证。”^①

① 乔·阿伯丁1854年6月26日在上院的演说,见1854年6月27日《泰晤士报》第21778号。——编者注

应当如何保证呢,这一点阿伯丁勋爵就不可能说了,因为这也取决于战争中的种种事件。

有人认为,他对俄国进攻的危险表示某种怀疑或者不相信,而实际上他非常担心俄国进攻土耳其,虽然,他对俄国进攻欧洲的危险并没有感到很大的不安,而且,“这种不安还在逐日减少”。他认为法国比俄奥两国加起来还强大。然后这位高贵的勋爵抱怨“他所遭到的极端荒谬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事实上在国内再没有比他更伟大的和平拥护者了,然而恰好就是他的热爱和平使他特别适宜于以最强有力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

“他的同僚会承认,他个人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要求迅速前进,并把联军的兵力集中在巴尔干半岛上,以便支持奥美尔帕沙的英勇的军队,并向奥地利伸出手,使它有可能更积极地参与军事行动。”^①

这就是阿伯丁始终不渝地坚持的方针。他在回答博蒙特勋爵的质问时说,“虽然我过去是梅特涅公爵的挚友,但是自从我执政以来,即最近 18 个月中,我和公爵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直到几天以前一位女友告诉我说,她打算写信给梅特涅,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转告公爵;就此我说:‘请向他转达我衷心的问候。’”

阿伯丁的发言大体上被议院嘉许地接受了,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内阁成员反驳克兰里卡德侯爵(帕麦斯顿勋爵的原驻圣彼得堡大使,他一心想当外交大臣但没当上)对他的挖苦的回答,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出来证实阿伯丁是第一个极力主张打一场恶仗的人。

克兰里卡德侯爵特别详细地谈到了阿伯丁参加草拟阿德里安堡

^① 乔·阿伯丁 1854 年 6 月 26 日在上院的演说,见 1854 年 6 月 27 日《泰晤士报》第 21778 号。——编者注

条约这件事,谈到了他以往政治活动的总的情况以及他在目前执政过程中的过失。他说,阿伯丁勋爵在几个月前拒绝把紧急函件通知两院的其他议员,现在为了一己私利,纯粹出于个人的动机把它公开。但是这个紧急函件同高贵的勋爵在1829年9月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之后,于同年12月向圣彼得堡发出的紧急函件完全不同。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他给英国大使发出的是些什么指令,他为了阻止这一条约的签订又采取了哪些步骤。当时统率驻阿德里安堡的俄军的将军手下最多不过有15 000名士兵,而且从这个数目中还要减去已完全丧失战斗力的5 000—6 000名伤病员。另一方面,率领着25 000名阿尔巴尼亚士兵的土耳其将军就驻在附近。俄国将军只给土耳其人一个很短的期限来决定签字还是不签字,因为他知道,如果给土耳其人一个长的期限,他的真实情况就可能被人发现。因此,他只给土耳其人不过五天到八天的时间。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大臣邀请法英两国大使和普鲁士公使来商讨对策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英国大使遵照阿伯丁勋爵的指令建议尽速签订这个条约,而这个条约现在却被高贵的勋爵说成是极端有害的东西。

有一个情况是高贵的侯爵不想提起的,这就是正因他的朋友、当时在野的帕麦斯顿勋爵尖锐地攻击阿伯丁勋爵,指责他过分反俄,才迫使阿伯丁下令签订条约。

侯爵然后又责骂首相,说他一向是欧洲各国专制政府的最热心的、最坚定的和最有力的拥护者,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回顾了葡萄牙、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历史,暗示阿伯丁曾经反对1834年著名的四国同盟¹⁹⁷。的确,需要有老辉格党勋爵的十足的厚颜无耻才能在这个时候吹捧比利时的光荣,吹捧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吹捧欧洲因四国同盟而得到的普遍幸福,而对于四国同盟,帕麦斯顿在自己的辩护词

中曾不顾真相地说,这不是他自己而是达来朗出的主意。

关于目前这场战争的战况,克兰里卡德说道,作战计划是由俄国最高军事当局于去年12月制定的,不列颠政府被告知这个计划,计划规定不单要占领多瑙河两公国,而且要越过多瑙河,占领锡利斯特里亚,包抄舒姆拉并进军巴尔干。高贵的勋爵掌握了这个情报,却来到议院大谈和平,而不透露内阁在2月底或3月初以前那段时期内给陆军部发出的命令。

如果克兰里卡德勋爵愿意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是怎样回答迪斯累里先生的,而克拉伦登勋爵在上院又是怎样回答他本人的,他也许不会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仅仅责备阿伯丁勋爵一个人玩忽职守,而不同样指责他的辉格党朋友,虽然整个内阁都应当受到指责。

侯爵感叹道:

“如果政府在15个月前就采取了适当的——他甚至想说是光明磊落的——方针,那么战争就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这正是迪斯累里先生向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话。

最后,侯爵竟如此荒谬绝伦,以致把联合内阁的一切失误,内阁在议会中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所遭到的接二连三的失败都归咎于阿伯丁勋爵个人,而且只归咎于他一个人。他竟没有记起,还在这个内阁刚刚组成的时候,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都认为内阁如果不公开一切立法问题,不放弃一切政治手腕,就连六个星期都支持不下去。

布鲁姆勋爵发表了一个愚蠢的演说,表示他对阿伯丁勋爵的第一个发言很满意,对他的第二个发言更加满意。在他演说之后这个议题便结束了。

这一整个事件的严重后果是,在维也纳草拟的秘密议定书等于一纸空文。因而敌对行动和战争将继续下去,可是人们却如此确信战争会很快结束,以致尽管在市场上已有了大量公债,统一公债还是上涨了3%,而且在军人俱乐部已有人打赌说,战争不会超过四个星期。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6 月
27 日

载于 1854 年 7 月 8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12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马德里的起义。——
奥地利—土耳其条约。——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¹⁹⁸

1854年7月4日星期五于伦敦

早在意料之中的马德里的军队起义,终于在奥当奈尔将军和杜尔塞将军的领导下爆发了。¹⁹⁹法国政府报纸急急忙忙地向我们报道说,根据它们收到的电讯,西班牙政府已经克服了危局,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对这次起义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并报道了起义者的宣言的《纪事晨报》驻马德里记者说,起义军撤出首都只是为了同阿尔卡拉的驻军汇合,如果马德里形势仍然不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抵达萨拉戈萨。如果这次运动比不久前这个城市里的起义²⁰⁰更顺利的话,那就会使法国改变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引起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可能还会影响到西班牙和美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纠葛。

看来,不像我以前从伦敦和曼彻斯特交易所发表的公告中所获

悉的那样^①，新的俄国贷款的协议还没有由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最后签订，这些银行家没有借给俄国国库任何款项。他们只同意请欧洲的各个交易所通过发行债券提供这项贷款，自己则不承担任何风险。据说，这次贷款能否成功十分值得怀疑，同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人们对它很不热心。汉堡的参议院禁止它由官方报价，据《纪事晨报》报道，英国外交代表和领事已经向不列颠臣民发出通告，警告他们不得认购“旨在进行反对女王的战争”的债券。

关于俄军从锡利斯特里亚撤围后的去向，各种消息的说法不一。《通报》说俄军已撤到普鲁特河后面，而维也纳的《新闻报》却断定，没有任何依据可以令人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看来，恰恰相反，俄军目前甚至还不打算撤出瓦拉几亚，因为利普兰迪将军占领了普洛耶什蒂和金皮纳的阵地，并把前哨布置在罗瑟土姆山口的入口处，而经过斯洛博齐亚，沿多瑙河左岸撤退的主力部队，据说已驻扎在布勒伊拉一带。另一方面，占据多布罗加的吕德尔斯军还没有放弃图拉真垒墙防线，即使继续撤退，该军也未必会交出默钦和伊萨克察。据说，一批生力军正不断地开往摩尔多瓦，看来，俄军计划在那里集结大量兵力。帕纽亭将军率领的军已经从波多利亚开到这里，补充兵员正在从比萨拉比亚向这里开拔。在上摩尔多瓦的雅西、罗曼和博托沙尼之间，俄军全部兵力据说达到六万人，还有两万人的一个师驻在卡缅涅茨附近。《东德意志邮报》报道：“帕斯凯维奇声称，他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弃多瑙河口。”俄军解释说，他们所以撤退只是因为多瑙河上游发生了时疫。

奥军的行动目前还完全不清楚。据传说，科罗尼尼的那个军已

① 见本卷第348页。——编者注

奉命在奥尔绍瓦登船,以便顺河而下到达久尔杰沃,然后从那里开赴布加勒斯特。奥地利政府机关报《意大利信使报》报道,这一行动的目的只是要占领瓦拉几亚的中立地带;同时,我们还获悉,俄国拒绝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纪事晨报》登载的一则电讯说:

“俄皇在答复奥地利要求的复文中表示愿意同四强国谈判除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特权问题以外的一切问题。关于特权问题,他只想同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不允许四强国干涉。他也拒绝对撤离多瑙河两公国作出任何保证。”

由于这一拒绝,奥俄之间很可能发生一场装样子的战争。这种战争最终会变成一场类似有名的布龙采尔事件²⁰¹那样的著名的决斗。当布龙采尔事件结束了1850年普奥之间装样子的战争的时候,各报还在着迷地猜测这次“中欧危机”的可怕后果。我们不打算对奥地利现行政策可能含有的意图作类似的推测,而是要看一看真正存在的6月14日的奥土条约。这个条约已经正式全文公布了。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奥土之间的关系以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人民与土、奥或其他外国的关系;令人奇怪的是,受外交家们左右的欧洲舆论完全忽略了后者。

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奥地利皇帝应当采取一切手段——外交谈判的以及其他的手段,争取外国占领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必要时,甚至动用适当数量的军队来达到这个目的。”^①

据此,奥地利皇帝有权不用事先向俄国宣战,就可以调任何数量的军队进入瓦拉几亚。这样一来,土耳其的一个藩属就会遭到攻击

① 此处及以下条文均引自1854年7月30日《泰晤士报》第21783号。——编者注

而变为奥地利统治下的反对土耳其的中立领地。第二条规定：

“军队行动的指挥权仅属于帝国总司令。而他应注意将他所采取的行动适时地通知奥斯曼军队的总司令。”

按照这条协议，奥地利人不仅摆脱了土耳其对他们决定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的一切控制，而且还取得了土耳其总司令在瓦拉几亚领土上所能采取的一切行动的绝对控制权，他们只要通知土耳其总司令他们打算占领某个据点，就足以阻止土军开赴那里。如果考虑到除多布罗加这块狭窄的地方之外，多瑙河两公国是土俄军队之间唯一可能的战场，那么，奥地利的介入无非就是阻止土耳其扩大胜利并惩罚入侵者。

第三条规定：

“奥地利皇帝必须根据与奥斯曼政府达成的共同协议，尽可能快地恢复多瑙河两公国的法定秩序——根据土耳其政府在该地区的内部管理方面所赋予的特权而产生的那种法定秩序。但是，以此种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地方政权不得把自己的职权扩大到对帝国军队实行任何控制。”

这样一来，奥地利皇帝就为自己保留了只要他认为可能就恢复法定秩序的充分自由；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完全仿效俄国将军布德贝格那样，重新组织地方政权只不过是使它们受奥地利军事管制法的管制。

第四条规定：

“奥地利宫廷必须同俄国宫廷缔结任何不是以承认苏丹主权和苏丹帝国的完整为出发点的和解协定。”

第五条补充规定：

“一旦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宫廷签订和约而使本协定的目的得以实现，奥地利皇帝将尽可能快地采取措施，撤出他的军事力量。有关奥地利撤军的细节将与土耳其政府专门协商。”

按照这两条的前一条，奥地利保留了同俄国缔结协定的权利，只要协定根据维也纳照会⁶⁴中所确定的维持现状原则就行。按照后一条，奥地利答应不是在它同俄国缔结协定之后，而只是在俄国同土耳其签订条约后才撤出它的军队。“物质保证”已经不再稳稳当当地直接操在俄国手中，它正在转到奥地利手中，奥地利被授权保持它——经土耳其政府的同意——直到土耳其赞同“两个帝国宫廷之间的和解”为止。

第六条规定奥地利人有权甚至不给予形式上的偿付而将俄国人撤走后留在多瑙河两公国的剩余物品据为己有。这项协定的好处只有在德国才能够理解，那里的人民已经习惯于把奥地利驻军作为一种对自己的革命罪的惩罚来接受，而且奥地利驻军在1849—1850年间曾把那里的整片地区劫掠一空。

这个条约实质上就是把多瑙河两公国转让给奥地利并使土耳其不再对它们行使宗主权。因此，土耳其人像以前俄国人一样，公然侵犯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土耳其人无权把多瑙河两公国宣布为俄国的行省，同样也无权把它们让给奥地利占领。

土耳其政府要求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拥有宗主权是根据1393、1460和1511年的三个条约。1393年瓦拉几亚和土耳其之间的条约包括以下几条：

第一条 我们，即巴耶塞特等本着对隶属于我们不可战胜的帝国的瓦拉几亚十分宽厚的精神，和它的在位的国君共同决定，这个国家将继续根据它本国的法律进行统治，瓦拉几亚国君将有充分的自由自行选择方式和时机同邻邦宣战或媾和。

第三条 国君(基督徒)由大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

第四条 瓦拉几亚国君每年必须给帝国国库纳贡 500 土耳其皮阿斯特。”

1460 年瓦拉几亚国君乌拉德五世和穆罕默德二世签订的条约规定：

“第一条 苏丹同意并且保证由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保护瓦拉几亚和防御任何敌人的进犯，而仅仅要求对这个主权公国拥有宗主权，它的地方长官为此必须向土耳其政府纳贡 1 万杜卡特。

第二条 土耳其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公国的地方行政，任何一个土耳其人无明显原由，均不许进入瓦拉几亚境内。

第三条 地方长官照旧由大主教、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选举应由土耳其政府认可。

第四条 瓦拉几亚人民仍享有行使本国法律的自由，它的地方长官享有对其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宣战或媾和的权力，他们不为自己的任何行为向土耳其政府负任何责任。”^①

第三个条约就是 1511 年的条约。摩尔多瓦在条约中承认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并为自己换取到比瓦拉几亚所取得的甚至更加有利的条件。

俄土之间签订的条约当然不能使摩尔多瓦人和瓦拉几亚人自己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条约失效，因为这两国人民从来没有跟俄国人进行过谈判，也没有授权土耳其政府代他们进行谈判。此外，值得指出的是，俄国本身在阿德里安堡条约中已经承认上述那些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第五条规定：

“鉴于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已通过签订条约承认土耳其政府的宗主

① 迪·布拉蒂亚诺《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文件》1849 年伦敦版第 26 页。——编者注

权,而俄国既已保障它们的繁荣(!),因此,不言而喻,它们继续享有它们签订的条约所授与它们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①

上述几个条约没有被后来的任何条约所取代,因而现在依然有效,根据这些条约可以得出结论,多瑙河两公国是两个承认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的主权国家,它们在土耳其政府保卫它们不受任何外敌侵犯,同时决不干涉其内部管理的条件下向土耳其政府纳贡。土耳其人非但无权将瓦拉几亚交给外国占领,而且他们自己无明显原由也不得进入瓦拉几亚境内。不仅如此,由于土耳其人这样违反了同瓦拉几亚人签订的条约而丧失了宗主权,俄国人在瓦拉几亚人向他们提出请求时,甚至可以援引被土耳其违反的条约来论证自己有权将奥地利人赶出两公国。而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俄国的政策一贯是鼓励,甚至迫使土耳其人损害瓦拉几亚人的权利,以便在他们之间煽起敌意,从而给自己制造干涉的借口。比如说,1848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年春天,几个贵族向摩尔多瓦国君呈递了请愿书,要求进行某些改革;在俄国领事的影响下,不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连写请愿书的人也被投入了监狱。这个做法所引起的骚动就成了俄国人于6月25日越过边境向雅西推进的借口。同时,瓦拉几亚国君仿效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政府的做法,答应瓦拉几亚贵族自由派的要求,进行了若干改革。这是6月23日的事情。不用说,这些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但是,它们完全破坏了俄国依据在1829年占领期间颁布的并为上述改革废除了的根本法²⁰²而取得的一切影响。代替这个根本法的宪法废除

^① 《俄军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1849年伦敦第2版第10页。——编者注

了农奴制并把农民耕种的一部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而地主可以从国家领取赔偿费，以补偿他们放弃的土地和他们所失去的农民的劳动力。后来，在位的国君在俄国人的怂恿下放弃了王位，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来主持国事。而我们已经指出无权干涉两公国的内部事务，并且没有抗议俄国人进入摩尔多瓦的土耳其政府竟派遣苏里曼帕沙率领土耳其军队进入瓦拉几亚并发表了威胁性的苏丹告居民书；这些措施自然是国务会议在俄国影响之下采取的。瓦拉几亚人出来迎接帕沙和土耳其人并同他们结成盟友。于是签订了一项协定：临时政府将由公国总督府接替，后者开始时由六人组成，以后改由三人组成。这个政府得到了帕沙的承认，而且应帕沙的要求，也得到外国领事的承认。新宪法经过了某些修改之后也被苏丹批准了。

当时，俄国政府在向全欧洲发出的宣言中愤怒谴责瓦拉几亚人民，指责他们建立了共和国并宣布了共产主义。1848年8月1日，大批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向布加勒斯特进发。苏里曼帕沙突然被土耳其政府召回；苏丹拒绝接见应他本人的邀请前来君士坦丁堡的瓦拉几亚代表，而9月25日，傅阿德埃芬蒂率领土耳其军队到了布加勒斯特城下，声称此行纯粹是为了消除俄军侵入这个公国的任何借口。布加勒斯特城和城郊的十多万居民听信了土耳其人的话，不带武器，穿上节日服装，以僧侣为首，出城欢迎他们。傅阿德埃芬蒂让他们派代表团到他的兵营，以便向他们下达他的指令。布拉蒂亚诺先生在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说：

“代表团刚刚来到傅阿德埃芬蒂那里就被捕了；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以急行军奔向布加勒斯特，土军骑兵的铁蹄践踏了把土耳其人当作朋友而出城欢迎的和平居民，撕毁了他们的旗子，折断了他们的十字架，炮击路上见到的兵营和城内的整个街坊区，用霰弹射击兵营里的瓦拉几亚士兵，迫使他们投降和缴械，

还杀死病员；军队进城后，大肆抢劫、屠杀以及干下许多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①

俄国全权代表杜阿梅尔将军就在这里随同土耳其军队一道行进，并且实际上指挥着土耳其军队。在他后面俄军跟着开到；结果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²⁰³。这个条约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恢复了俄国拟定的根本法，即所谓的法规，而这正是奥地利目前承诺在瓦拉几亚恢复的那种现状。

很明显，如果奥美尔帕沙现在率领他的常胜军进入瓦拉几亚，那么接受了不久前的全部经验教训并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人，就会恢复 1848 年宪法，而“共和国、共产主义”等 1848 年全部产物都会随之复活。没有人会相信，奥地利会比俄国更喜欢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土耳其政府一定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才会勉强地再次破坏自己同瓦拉几亚人签订的条约。虽然它根据经验知道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能施加这种压力的只有英国大使。因此，回忆一下同一个雷德克利夫勋爵以及他在唐宁街的上司在 1848—1849 年对俄国人和土耳其人损害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权利的态度，是很有趣味的。

1848 年 6 月，当俄国军队初次越过摩尔多瓦国境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回答忠实不变的达德利·斯图亚特的质问时说：

“俄国部队开进摩尔多瓦没有得到圣彼得堡内阁的命令；它的目的只是维持或建立秩序，没有必要时它将撤出；它进入国境曾得到国君的许可，无意占据

① 迪·布拉蒂亚诺《关于多瑙河两公国问题的文件》1849 年伦敦版第 10—11 页。——编者注

这块地盘。”①

1848年8月,当俄军再次渡过普鲁特河开往布加勒斯特,而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已派遣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国务会议曾向英法两国大使征求过意见并从雷德克利夫勋爵那里得到这样的建议:采取俄国所规定的政策方针。

10月,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共同占领瓦拉几亚时,俄国人追查一个瓦拉几亚军官一直追到布加勒斯特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的寓所,后者和傅阿德埃芬蒂一起就此事提出了抗议。土耳其政府知道这次受辱以后,声明它不愿意再跟俄国人打交道,并且命令它的军队回渡多瑙河,以便不再充当俄国人在多瑙河两公国的同谋。同时,土耳其政府威胁说要向各大国提出一项严正的抗议并且要提供一份说明多瑙河两公国发生的全部事情的详细备忘录。那位大使再次出面干涉,并打消了土耳其政府的这些意图。

最后,当1848年俄土的联合占领具有恐怖统治的性质,并且当瓦拉几亚非正规军指挥官马吉埃罗孤军抵抗的时候,他被劝说撤到喀尔巴阡山以北,“不列颠总领事在向他劝告时指出,他的军队的出现会使外交活动陷于瘫痪,不过他的国家不久将会得到公正对待”。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
4日

载于1854年7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① 《俄军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1849年伦敦第2版第17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多瑙河战争²⁰⁴

大约八十年前,当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常胜军从土耳其手中陆续夺得了现在改称为南俄罗斯的那些省份时,诗人杰尔查文在一次诗兴勃发时(在这种时候他通常是对女皇帝国的荣誉——如果不是对那位女皇本人的美德的话——及帝国无可置疑的伟大庄严大加歌颂),写了著名的两行诗,就是现在我们仍可以从这两行诗中集中地看到沙皇政策的傲慢和自负。他写道:

俄罗斯啊,同盟对你有什么用?
迈步前进,全世界就是你的!①

假如俄罗斯果然能够迈步前进,这些话甚至在今天也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进程遭到极其严重的阻碍。因此,至少在目前它不得不推迟一下夺取全世界的计划。不过特别伤害它尊严的是,在它顺原路返回时,它不仅征服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甚至对于誓欲夺取的多瑙河上普通要塞锡利斯特里亚的锁钥阵地,都只好让它们原封不动地留下。而且更惨痛的是遗留下了约五万同胞的骸骨,他们

① 加·罗·杰尔查文《占领华沙颂》。——编者注

都是在这场战役中战死和病死的。

从军事观点来看,围攻锡利斯特里亚无疑是这次战争开始以来最重要的军事事件。正由于俄军没有能够夺取这个要塞,这个战役对他们说来就完全失败了,这为他们现在正进行的向塞雷特河对岸的撤退增加了耻辱和沙皇的不快。关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前几个阶段,我们已向本报读者作过详细的,我们希望,也是清楚的分析;现在,在终于得到太平洋号轮船带来的俄国公报以后,①我们就可以对任何一方都公允地从头至尾把这一整个行动研究一番。除了俄国公报(它写得清晰、明白、有条不紊,不过在内容上有很多遗漏的地方)以外,现在我们还有内史密斯中尉(属孟加拉炮兵)给伦敦《泰晤士报》写的一篇报道②。这是一份完整的围攻日志,其中有许多有趣的情节,但写得相当粗糙,有时日期也不确切。应当指出,我们以前对围攻提出的那些看法和结论,都被这些更近更详细的报道完全证实了,只有一个细节有出入:土军并未放弃阿拉伯堡的防守,而我们在围攻的最后阶段曾估计土军将不得不放弃它。同样很清楚,俄军的行动比我们所预料的还要轻率。起初,他们从东面的多瑙河低地对要塞展开正规攻击,希望能完全绕过那些同要塞隔开的堡垒,并立刻在锡利斯特里亚的主墙上打开缺口。如果说这个尝试有某种优点的话,那么这个优点也只在于它新奇。它可能是第一个在这种不仅侧面被敌人控制,而且还被后面的敌人筑有工事的高地瞰制的地形上构筑堑壕和接近壕以攻打要塞的例子。但是以后,俄军便对这些高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② 查·内史密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见1854年7月1日《泰晤士报》第21782号。——编者注

地进行了另一次非正规攻击,并且攻击进行得如此巧妙,以致虽然侦察和强攻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数千名俄军在侦察和强攻中被击毙或致残,还是不得不对这些高地发动正规围攻。关于俄军这种高超的打法,我们不想再说什么,现在来谈谈围攻时期的详情。

6月1日,俄军从多瑙河左岸又运来一批攻城炮,组成了攻击阿拉伯堡的炮队。土军挖掘了竖井并在堡垒的外岸和斜堤下面埋放了炸药。6月2日,锡利斯特里亚守军的司令官穆萨帕沙被炮弹打死。傍晚,俄军在阿拉伯堡的一个棱堡下进行了一次爆破。既然他们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能够到达斜堤顶,所以炸药无疑是埋得不很准确的。距离和最短抵抗线肯定算错了,结果这次爆破不仅没有使土军的防御工事受到损失,反而向后爆炸,石头和土块雨点般地落进俄军的堑壕。这时作好攻击准备的强攻部队正集中在堑壕中,因此,这些雨点般的石块会对他们起什么作用也就很容易想象了。至于俄军封锁要塞的效果低到什么程度,根据下面事实便可以判断出来:在这一天,5 000名土耳其非正规部队从锡利斯特里亚以西的腊兹格勒突入了这座被围的城市。

从6月4日至8日继续进行攻击阿拉伯堡的掘壕作业。俄军到达了斜堤,大胆地把地道挖到斜堤顶,不过俄军对它的炮火掩护很弱。他们开始在壕沟下面埋放炸药,一直埋到棱堡的内岸。当这种作业正在进行时,帕斯凯维奇元帅在9日又采取他那难以理解的显示威力的行动,即以31个步兵营、40个骑兵连和114门野炮对要塞进行大规模侦察。至于他希望从这种行动中得到什么,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说明的。看来这是显示威力的行动之一,采取这些行动仅仅是希望找机会采取重大行动或者至少使敌人相信抵抗是无益的。但是对于土军,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影响。相反地,他们派出了4 000名

骑兵迎击俄军。据俄军公报称,这些骑兵被彻底击溃了,但内史密斯肯定说,在这次战斗中他们缴获了俄军的60匹战马。同时,帕斯凯维奇不但没有在这次侦察中获得好处,反而被土耳其球形弹侦察上了,这颗炮弹使他负了伤,他不得不被送到雅西。

10日,围攻达到了关键时刻。希尔德寄予最后希望的大包炸药爆炸了。它确实在阿拉伯堡的前棱堡上炸开了一个可以通行的缺口。俄军发起了强攻。但是,正如他们所应当预料到的,土军早在主墙后不远的地方构筑了有壕沟的二重堡,即第二道胸墙,当俄军接近这里时,就被迫停止前进并遭到致命的射击。强攻部队前进一旦受阻,那就是说,这支部队被打败了,因为敌人的火力有围墙的掩护和火炮的支持,距离又近到每发必中的程度,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迫使攻击者退却。因此,俄军不得不从他们所打开的缺口仓促退却,土军一直跟踪追击到俄军的堑壕,并破坏了一部分围攻工事。这次攻击是俄军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最后一次重大的行动。如果说在停止围攻的命令到达以前,围攻在表面上和形式上仍在继续,那么这只是为了不失面子而已。12日,封锁已非常不严,以致来自舒姆拉的一些欧洲军官毫无困难地进入了要塞。

俄军从5月19日起开始在低地挖掘堑壕,22日以七个炮队开始轰击阿拉伯堡。次日,又增加了15门火炮对付这个堡垒。尽管如此,俄军的报告说,对阿拉伯堡的正规攻击是在5月31日才开始的。看来,这说明在21日和22日配置的炮队只担任第一线任务,而装备重炮也仅仅为了对堡垒进行纵射。自5月31日至6月10日,俄军炮队推进到距堡垒一百码以内的地点,即从第一道平行壕推进到斜堤脚下的第三道平行壕。既没有通过斜堤,也没有构筑堑壕式炮台,但是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俄军挖掘了通向斜堤坡的地道,以便在斜堤

顶埋放炸药。

从所有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阿拉伯堡不过是规模虽大但不能进行长期坚持的野战临时防御工事,所以,侯赛因帕沙指挥的包括四个步兵营和 500 人非正规部队的守军的行动,当然值得大加赞扬。远射程火炮轰击九天、在暴露的堑壕中停留十一天、两次地道爆破和四五次强攻,这一切都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像阿拉伯堡这样一个普通的外围工事能够支持这样久,确实在战史上难以找出第二个例子。与它最相近的例子是普军的 1807 年科尔贝格防御战和法军的 1813 年但泽防御战。²⁰⁵

在整个围攻期间,奥美尔帕沙根本没有设法支援或解救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点,这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从他给维丁总督萨米帕沙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当俄军向多瑙河左岸退却时,他确实正准备前来援救锡利斯特里亚。

他在这封信里写道:

“您知道,我已把我们所有的部队集合在舒姆拉前线,准备去援救要塞。六个骑兵团和三个炮队已从舒姆拉向那个方向开拔。俄军知道了这个行动以后,带了他们的全部炮兵仓促退到左岸。在围攻要塞的 40 天中,他们被击毙的有 25 000 人。”^①

至于俄军现在打算做什么,还无法断定。据某些维也纳报纸报道,他们企图在布泽乌河对岸占领阵地,但是,这些报纸又断言,俄军是由于害怕奥军才撤退,而布泽乌河的阵地也同样被奥军迂回包围。如果俄军企图扼守摩尔多瓦,奥军就会从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方面迂回。但是,如果俄国驻波兰的部队同驻波多利亚和沃伦的前多瑙

^① 1854 年 7 月 9 日《总汇通报》第 110 号。——编者注

河军团及时会合,也可以反过来迂回包围奥地利,而使加利西亚的东北部一直到桑河和德涅斯特河为止的地区处于俄军的打击之下。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政治上的原因不谈而假定奥地利准备同联军一起进攻俄国,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奥地利可能出动 20—25 万兵力同联军一起行动,而联军则拥有大约 10—12 万土军和 6 万英法军队。为了对抗这些兵力,俄国可以出动多瑙河军团的四个军和它们的预备队,除去一定的伤亡,约有 20 万人。帕纽亭指挥的第二军,以及三个骑兵后备军和一些步兵预备队加上由新兵组成的增援部队,总共可能有 18 万人左右。因此,俄国的全部兵力可达 35 万人,其中还须除去克里木和南俄某些地区的守军。此外,为了防守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还须留下近卫军、掷弹兵和第一军——15 000 人左右的芬兰军未计算在内。把一切都考虑进去,那么交战双方兵力的相差就不是大得连俄国仅进行适当的防御也没有取得某些胜利的希望。

如果像最近的外交报道以及奥地利在摩尔多瓦边境毫无行动所表明的那样,奥地利除了在交战双方之间充当调停人外别无其他意图,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摩尔多瓦或者在比萨拉比亚,今年内都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7 月

5 日和 1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3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
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
的新公债。——瓦拉几亚²⁰⁶

1854年7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们现在收到的关于马德里军队起义的消息，仍然是矛盾百出、零星片断的。所有马德里的电讯，当然都是政府的消息，也同登在《日报》上的公报一样，是值得怀疑的。我能向你们提供的，是就我手边的贫乏材料写的一篇评论。

读者们大概还记得，奥当奈尔是2月被女王流放的将军之一；他拒不服从而在马德里躲藏起来，并且从自己的避难所同马德里的守备部队，特别是同骑兵总监杜尔塞将军，保持秘密通信。政府知道了他还留在马德里，而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和新卡斯蒂利亚军区司令官拉腊将军在6月27日夜间接到了关于由杜尔塞将军领导的策划中的起义的警告。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或者镇压萌芽状态的起义。因此杜尔塞将军能够在28日毫不费劲地借检阅为名集中了大约2000名骑兵，并且在奥当奈尔的陪同下带领这批骑兵一起出城，打

算劫持住在埃斯库里亚尔的女王。但是计划没有成功,当起义军在首都四郊布防的时候,女王在内阁首相圣路易斯伯爵的陪同下于29日到达马德里,并在那里进行检阅。埃查圭上校和“亲王团”的400名士兵,也参加了起义,他们带来了团部的钱袋(袋中有100万法郎)。29日晚,从马德里派出了一支由拉腊将军率领的纵队,包括七个步兵营、一个骑兵团、一队骑兵宪兵队和两个炮兵连,以便迎击驻扎在本塔-德尔圣埃斯皮里图和维卡尔瓦罗村的叛军。30日,两军进行了战斗,关于这次战斗的情况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拉腊将军写给陆军大臣并在《日报》上发表的官方报告,第二种是登在《巴约讷信使报》上的报道,第三种是《比利时独立报》驻马德里记者——这次战斗的目击者的报道。官方报告可以在所有的伦敦报纸上看到,根本站不住脚。拉腊将军在报告中,一会儿说他向起义军进攻,一会儿又说他遭到起义军的进攻;一会儿说他抓到了俘虏,一会儿又说他失掉了俘虏;他声称取得了胜利,回到了马德里——最后,他让起义军控制了战场,但使“敌人”付出了尸横遍野的代价,而他自己的损失总共只有30人受伤。

《巴约讷信使报》对作战过程作了如下的报道:

“6月30日早晨4时,凯萨达将军率领两个旅离开马德里去进攻叛军。战斗没有继续多久,凯萨达将军受到了有力的还击。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集中了马德里的全部守备部队(附带说一下,这支守备部队大约有7000—8000人)于傍晚7时出击。战斗立即开始,而且几乎不停地一直继续到晚上。受到人数众多的起义军骑兵威胁的步兵,列成了方队。加里戈上校率领几个骑兵连十分猛烈地进攻其中的一个方队,而且打散了这个方队,但是他受到由五门火炮组成的伪装起来的炮兵连的炮火的袭击,炮兵连的霰弹打散了他的骑兵连。加里戈上校落到了女王军队的手里,但是奥当奈尔将军毫不犹豫立刻集中了自己的骑兵连,十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步兵,把他们的队伍打散,救出了加里戈,缴获了五门火炮。女王军队受到这一打击后,便向马德里撤退,并在晚上8时到了马德里。女王军队的一个将军梅西纳受了轻伤。在这场激战中,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

现在,我们来看看《独立报》上发表的7月1日从马德里发出的报道。该报道似乎是可信的。

“本塔-德尔圣埃斯皮里图和维卡尔瓦罗是激战的战区,激战中女王军队被击退到康乐饭店一侧。在各个据点上依次组织的三个方队,按照陆军大臣的命令都自行解散了。在雷蒂罗那一边组织起第四个方队。起义军的十个骑兵连在奥当奈尔和杜尔塞两将军的亲自指挥下进攻了它的中央(?),同时游击队攻打了它的翼侧(?) (既然是向方队进攻,就很难理解,记者指的中央(!)和翼侧(!)是什么意思)。起义军曾两次冲击炮队,但是都被霰弹打退了。起义军显然想夺取摆在方队各个角落上的一些火炮。然而夜晚降临了,于是政府军队排成梯队向阿尔卡拉门撤退,在那里一个仍然可靠的骑兵连受到隐蔽在斗牛场后面的起义军的枪骑兵的突然袭击。起义军趁这次突袭所引起的混乱状态,缴获了留在后面的四门火炮。双方的损伤大致相等。起义军的骑兵受到霰弹的重大损伤,但是他们的枪骑兵几乎消灭了女王的一个团和骑兵宪兵队。最新的消息报道,起义军得到了来自托莱多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增援。甚至传说纳尔瓦埃斯将军今天将到巴列卡斯,杜尔塞、奥当奈尔、罗斯·德·奥兰诺以及阿尔梅罗等将军将在这里接待他。在阿托查门附近挖好了堑壕。好奇的人群挤满了火车站,从这里可以看到奥当奈尔将军的前哨。但是,马德里的所有城门都有严密的戒备……”

同日下午3时。起义军的大量兵力占领了离马德里三英里的巴列卡斯镇。政府今天在等待外省的军队,特别是国王营的到来。如最新的消息可靠的话,这一部分军队已经加入起义。

下午4时。现在,几乎全部守备部队都离开马德里向巴列卡斯进发,以迎击信心百倍的起义军。商店全关闭了。雷蒂罗的卫队和所有政府机关的警卫队都匆忙地武装起来了。我刚才知道,守备部队有几个连昨天加入了起义军。指挥马德里守备部队的有康普萨诺将军(有人说他已经向起义军投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比斯塔埃尔莫萨将军和陆军大臣布拉塞。政府等待的援军,到现在还没有到来;但是第四基干团和第一骑兵团据说已经离开巴利亚多利德,正以急行军向马德里进发。关于由图龙将军率领的布尔戈斯的守备部队,据说也肯定在这样做。再有,里韦罗将军亲自率领大军离开了萨拉戈萨。由此看来,将要发生更激烈的流血冲突。”

到7月6日止，没有从马德里来的报纸和信件。只有《通报》登载了一则7月4日发自马德里的简短的急电。

“马德里和外省仍然平静无事。”

据一则私人消息说，起义军现在在阿兰胡埃斯。如果《独立报》的记者本月1日所预言的战斗是政府取得了胜利，那就不会连信件、报纸和公报都没有。尽管马德里已经宣布戒严，《人民呼声报》、《民族报》、《西班牙日报》、《西班牙报》以及《时代报》又重新出版了，而且没有预先通知政府，政府只是从它的检察官那里才得悉这一不幸的事实。在马德里被逮捕的人中，有银行家安东尼奥·吉列尔莫·莫雷诺先生和何塞·曼努埃尔·科利亚多先生。还下令逮捕纳尔瓦埃斯元帅的挚友西霍拉·塞维利亚诺·富恩泰斯-德杜埃罗侯爵。蒙先生和皮达尔先生都受到监视。

判断这一起义的一般性质，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说，起义不像是进步派²⁰⁷干的，因为圣米格尔将军——该派在军界中的代表——还若无其事地蹲在马德里。相反地，从种种消息来看，阴谋的主谋多半是纳尔瓦埃斯，而克里斯蒂娜女王——她的影响近来由于女王的宠臣圣路易斯伯爵而大大降低了——也参与了这个运动。

除了土耳其以外，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为欧洲了解得那么少，那么不正确。无数次的地方起义和军事叛乱，已经使欧洲习惯于把西班牙看成执政官时代的罗马帝国。这同有些人对土耳其的判断一样错误和肤浅。这些人认为土耳其这个国家的生命枯竭了，因为近百年来土耳其的正史尽是宫廷政变和近卫军的叛乱。这种误解的根源说来简单，那就是历史学家们不是从这些国家的外省和地方组织中，而是从宫廷年鉴中寻找这些人民的生命力的源泉。

我们通常称之为国家的那个范围内发生的变动，很少涉及西班牙人民，而西班牙人民也完全把这个有限的领域交给宫廷的宠臣、将军、冒险家和少数所谓国务活动家的反复无常的热情和渺小的阴谋去摆布了，直到现在他们很少有理由对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后悔。对于西班牙现代史，就其性质来说，它应当得到一种与迄今作出的完全不同的评价。我要在我以后的一篇通讯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指出下面一点：如果比利牛斯半岛的纯粹的军事叛乱发展成普遍的起义，那丝毫也不奇怪，因为政府最近的财政法令²⁰⁸把税吏变成了作用十分重大的革命宣传员。

目前，决定战争命运的是奥地利。如果奥地利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的军队开进瓦拉几亚，那只是因为它在等待俄国皇帝的答复。正如电讯所报道的，哥尔查科夫已经到达维也纳，他带来了不祥的答复。6月3日送出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第一次在《科隆日报》上登出来。奥地利要求的主要段落如下：

“奥地利皇帝认为停止俄国军队在多瑙河彼岸各国的推进以及得到俄国皇帝关于停止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期限——我们希望不会太遥远——的明确表示是有意义的。俄国皇帝在英明地权衡了向他提出的所有理由以后，一定会意识到这一意义。我们决不怀疑，尼古拉皇帝是希望和平的；因此，他一定会寻找办法来结束日益成为奥地利和德意志国内不安的根源的状况。我们相信，他不希望无限期地占领或者提出我们不能接受的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条件，而迫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得不自己考虑采取措施来保护在目前情况下受到如此重大威胁的利益。”

目的在于支持奥地利“要求”的普鲁士照会²⁰⁹最后这样说：

“国王希望，皇帝同意把争论的问题移到能够实际解决的基础上，以便采用限制和规定双方行动的确切范围的办法，促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我们至尊的国王希望俄国皇帝本着与这种措施所体现的精神相一致的思想，接受目

前的措施,希望我们以及维也纳内阁以与问题的重要性相一致的关切心情等待着俄国皇帝的答复,能够使国王不致迫于加在他身上的义务和责任,采取痛苦的不得已的行动。”

东方军团的总司令赫斯将把他的大本营设在切尔诺维茨。维也纳的《士兵之友》刊载了赫斯将军的小传:

“冯·赫斯元帅于1788年生在维也纳,1805年加入久洛伊团任少尉,1815年底任中尉参谋,1822年是中校,被任命为都灵的军需官。从1829年起是上校,1831年被任命为上意大利的机动军的军需官。1842年得到了中将军衔,1848年被任命为拉德茨基军队参谋长。1848年进军曼图瓦、库尔塔托内和维琴察的计划以及1849年以诺瓦拉会战而结束的短期战役的计划,就是他制定的。”

关于公开承认的奥地利占领瓦拉几亚的意图,我要引用奥地利各报自己说的话。

奥地利在联邦议会的代办处的机关报《法兰克福邮报》指出:

“奥地利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必须最坚决地促进和平的恢复,用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办法实际上把交战的双方分开,并且占据它们之间的最重要的据点。如果俄国人退到普鲁特河以东,土耳其人及其盟国就不能够越过多瑙河了。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每一方都已经取得了某些经验,并且丢掉一定的幻想(俄国人丢掉自己的军事上占优势的幻想,海上强国丢掉自己的海军强大无比的幻想),那就很明显,目前局势就会使和平谈判的恢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劳埃德氏杂志》指出:

“现在争论的领土即多瑙河两公国,可置于某个中立国的保护之下。这样,土耳其军队就不可能占领普鲁特河两岸的阵地。武装调停人就会站在西方强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防止它们在多瑙河两公国冲突起来。这样,在最重要的战区就会实际上停战。如果真的还存在着和平的可能,那么这一措施就会加速和平的到来。不论圣彼得堡,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有丝毫怀疑:奥地利决定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是为了保证和平,同时这一决定也是防止全面战争的最

后一个可行的措施。”

最后，我们在柏林出版的《斯彭讷报》上看到这样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有消息证实，四大国的大使即将在维也纳再召开一次会议，第一，是为了了解奥地利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签订的公约，并宣布这一公约同过去的会议的议定书是一致的；第二，是为了商谈修改4月9日维也纳议定书所规定的原则，通过修改，这些原则可以成为将来的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为目的的预防行动的积极基础。”

与此同时，奥地利利用这一情况制定了新的公债计划，官方就发行公债问题发布了如下公告：

“1. 公债总数暂定为35 000—50 000万弗罗伦。如果认购额达到了这个数目，债款将视认购数额在三年、四年或五年内偿还。

2. 发行价格规定为95银行票。

3. 利率为5%，并且以硬币偿还。

4. 认购不带强制性质；帝国政府将通过各省现行政权激发臣民的爱国心。

5. 公债用作偿还国家欠银行的总数约为8 000万的债务，以恢复银行票的发行市。剩余（把总额的五分之四叫作剩余，真是太聪明了）将作为未来几年预算的来源。”

当然，《劳埃德氏杂志》肯定地说，现在计划采取的（几乎是第一次！）这一宏伟的财政措施将永远结束目前奥地利通货贬值的现象。读者都记得，在这个世纪，几乎每次发行奥地利公债的时候提出的都是这个借口。但是在这个宏伟的措施中，有几点也许是读者看不到的，因为这几点在上面所引的公告里被煞费苦心地省略了。关于这一方面，昨晚的《地球报》写了如下的话：

“这次公债将成为全国性的，就是说，每个纳税人都应当按照纳税的多少认购公债。开始时采用道义上的压制办法，以后就实行具体的强制措施。因此，

事实上这一措施就等于立即再征一次税，只不过答应这笔钱以后将偿还罢了。”

有趣的是，这一宏伟措施所提出的理由以及实行的方法，都与导致了一场革命的西班牙不久以前的几项命令十分相似。

在我的最近一篇通讯里^①，曾请你们注意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和他们的状况，同时驳斥了所谓外交冲突是由于这些权利遭到破坏才产生的论调。在巴黎的《世纪报》上，刚刚刊出了小瓦拉几亚的梅赫丁茨地方官巴尔布·比伯斯库先生写给土耳其政府外交大臣的报告。在这里，我们终于听到保护多瑙河两公国人民的呼声，而“文明的维护者”却是以十分可耻的冷淡态度对待多瑙河两公国人民的命运的。报告一开始就说：

“俄国人为了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的消极抵抗进行报复，从小瓦拉几亚撤退时，竟干出最丑恶的暴行和破坏活动。俄国人抢走了国库中的现金、政府的印信和档案以及教堂里的圣物。他们在离开前，把过去的无数次征用中幸存的牲畜杀掉，并且不是把牲畜带走，而是留下来腐烂，这只能使人民感到他们残酷和可恨。”

关于当时流传奥地利人即将进入瓦拉几亚的传说，比伯斯库先生指出，“即使是最友善的外国军队，对于它占领的国家也总是一种负担”。他说，瓦拉几亚不需要奥地利人；它自己就能提供5万名受过军训、有纪律的战士。在瓦拉几亚的17个省中，每个省目前都有3000名宪兵、林务官、猎兵以及过去的士兵，他们只是需要武器，以便一听到信号就向俄国人猛攻。他最后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缺少的只是武器；如果在你们的军火库里武器不足，在法国、英国和

^① 见本卷第373—378页。——编者注

比利时的许多工厂里武器多得很,我们准备出钱买。武器!阁下,只要有武器,不要三个月,多瑙河两公国就不会留下一个俄国人,土耳其政府将会看到一支由10万罗马尼亚人组成的力量,他们同奥斯曼人一样热切地渴望驱逐和惩罚他们共同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可怜的梅赫丁茨的地方官不懂得,奥地利正是为了阻止瓦拉几亚人武装起来,阻止他们同奥斯曼人一起驱逐和惩罚俄国人,才使瓦拉几亚人屈服于自己占领之下。

根据伦敦小市民报纸报道,查理·纳皮尔爵士企图把沙皇的海军将领诱出喀琅施塔得,使他们离开掩蔽部,据说,他们在掩蔽部的花岗石围墙的后面,对着英法舰队“发抖”。但是,为什么英国海军不离开自己的木制掩蔽部,以便在俄国人认为最如意的陆地上同俄国人斗争呢?应当指出的是,不管英国人怎样吹牛,俄国人还是走出了塞瓦斯托波尔并且把怒涛号“打伤了”。

巴拉盖·狄利埃被任命为应当在本月14日上船去波罗的海的一个师的指挥官。英国应当提供运送6000人的船只。同样数目的军队以及一个野战炮兵连将乘法国船。如果加上菲埃隆上校指挥下的一支海军陆战队,那么整个波罗的海师的实有战斗兵力将有13000—14000人。同时从马赛装运军队去黑海的工作尚未停止;很明显,使法国解除武装的过程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安全”程度。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

7日

载于1854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3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意大利的紧张。——西班牙事件。
——德意志各邦的立场。
——英国法官²¹⁰

1854年7月14日星期五于伦敦

查理爵士^①已从喀琅施塔得悄然回来了，除了几名英勇的水手死于霍乱之外，无一伤亡。为了使公众保持良好的情绪，现在有必要在塞瓦斯托波尔重演同样的滑稽剧：在敖德萨，人们已经看见联军舰队的50艘军舰“开往”该地。

法军原订今日在加来登船，现已延期到本月20日，据说是为了等待西班牙事件的发展。

布德贝格将军逼迫多瑙河两公国的居民发表声明，感谢尼古拉皇帝占领他们的国家使之免受“残忍和野蛮的土耳其人”的蹂躏。本月5日离开君士坦丁堡，13日抵达马赛的幼发拉底号带来一则重要的消息说，俄国人根本没有撤出多布罗加，“赫赫有名的”路西德（不

① 查·纳皮尔。——编者注

幸的)①帕沙重新担任了外交大臣。

据7月8日来自克拉科夫的消息说,帕斯凯维奇公爵已抵达他在立陶宛领地的戈梅利城堡,将不再参加目前的战役。另有消息说,不仅他本人被免职,而且他的作战计划也被否定了;这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已经开始向摩尔多瓦退却的俄军,按照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命令又在向前推进,据说他打算在布加勒斯特正面集结强大的兵力。因此,目前俄军的部署是这样的:它的右翼在雅洛米察河上游一直伸展到特兰西瓦尼亚山脉,在那里它用24门重炮扼守泰梅什山口;它的中路从福克沙尼延伸到布加勒斯特;它的左翼在吕德尔斯的指挥下驻扎在布勒伊拉;而外左翼在乌沙科夫指挥下驻在多布罗加。

从战区发来的最新消息说,大批土军(4万人,其中有12000名联军)已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久尔杰沃。法国报纸报道,苏利纳河口附近的俄国据点曾遭到联军舰队派出的军舰的炮击并已被摧毁;不过,这个消息恐怕与波罗的海的博马尔松德再次被炮击和被摧毁的故事属于同一类型。圣阿尔诺元帅在东方的军事行动似乎引起了土伊勒里宫内的某种忧虑,害怕它的规模会太大。总之,有消息说,法国政府已经派出了一位专门的视察官——当然是财政方面的——去制止他的过分的热心(*son excès de zèle*)。

在意大利,政府也好,民众也好,都令人惊奇地紧张起来。皮埃蒙特的陆军大臣拉马尔摩拉将军发布了关于在萨瓦、圣莫里斯、亚历山德里亚、甚至在撒丁岛上建立兵营的命令。无限期休假的大批士兵已应召归队。同时,在亚历山德里亚和卡萨莱的要塞里正在积存

① “不幸的”原文为“wretched”,“路西德”原文为“Reshid”,它们的发音相近。——编者注

储备品。另一方面，拉德茨基元帅也发布了关于在维罗纳和沃尔塔之间建立兵营的命令，那里每天有两万多士兵在接受小规模作战 (*petite guerre*) 的训练。在科多尼奥、卡萨莱、普斯泰伦戈和伦巴第的一些城市因食品价格昂贵而发生了骚乱。约有 200 人被捕并被押送到曼图瓦。据那不勒斯的来信说，那里曾经大规模地进行逮捕；在西西里岛也这样，卡拉法伯爵的儿子就囚禁在那里。炮弹国王^①正在采取非常措施在陆上和海上武装起来。他已命令加埃塔要塞作好战斗准备以防万一。他宣布，全欧洲正流行鼠疫，因此对一切入境船只要进行严格的检疫。从葡萄牙、格拉斯哥和撒丁王国来的一切船只要经过十天检疫期，从托斯卡纳和罗马国家来的船只要经过七天检疫期。因为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施行这样的限制，所以任何船只的自由入境都是少有的例外。对于经陆路入境的外国信件要执行对鼠疫流行的国家来的信件所采用的一切预防措施。与教皇国的交通可以经过蒙特卡西诺和索拉，也可以经过阿布鲁齐山，不过，大概很快就会沿整个国境建立防疫线。

该从马德里经过波尔多的最近的邮件，到昨天晚上还没有到达巴黎。据说，王国军队仍在继续追击叛军，已经追上叛军并且即将消灭他们。最初我们听说，叛军正向埃斯特雷马杜拉逃跑，企图退到葡萄牙边境。现在我们听说，他们正在前往安达卢西亚的途中，这一情况表明叛军并没有下决心很快离开自己的祖国。从私人的来信中知道，塞拉诺将军率领 300 名骑兵加入了叛军，而《日报》报道只是他一个人加入了。在马德里到处传说国王的一个团 (*del Rey*) 已经投到起义军方面。《纪事晨报》记者还报道说，加入起义军的另有各兵种

①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的 200 名军官、驻扎在托莱多的各团的几个连和马德里志愿者的两个营。《日报》说，奉命追击叛军的一个师在 7 月 5 日晚上从马德里出发，它包括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两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由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支队，这个师是在比斯塔埃尔莫萨将军指挥下出征的，但是，第二天，他就被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接替。7 月 7 日的王国法令任命圣罗曼将军在布拉塞将军离职期间代行陆军大臣的职务。《日报》报道，该师已到达滕布莱克并正沿着瓜迪亚纳河谷向雷阿尔城方向移动。同一天，布拉塞发出告叛军士兵和军士书，号召他们回到他们的旗帜之下，并以女王的名义向他们保证既往不究。我们在《巴约讷信使报》上看到如下的一段消息：

“根据最近我们得到的消息，奥当奈尔将军正向巴尔德佩尼亚斯推进。王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已在滕布莱克地区集结。奥当奈尔将军正在利用空隙时间来训练他那一支由 2 000 名骑兵，六门火炮和 800 名步兵组成的小部队。”

奥当奈尔和杜尔塞的呼吁各有不同：前者援引 1837 年的宪法²¹¹，而后者援引古老的卡斯蒂利亚的起义权利——可以举行起义反对违背加冕誓言的君主。在巴伦西亚建立共和主义游击队，这是一个新的特点。本月 6 日收到的消息说，有些城市和乡村已经起来反对政府，其中包括阿尔西拉、哈蒂瓦和卡尔莱特。退休上校奥罗斯科已率领一支武装队伍进入卡尔莱特，没收了全部枪枝，并出告示号召居民参加运动。政府已派出骑兵、步兵和国民近卫军特遣队去镇压巴伦西亚的起义。

关于俄国给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照会²¹²，《比利时独立报》提出了一种完全新的说法。根据这家报纸——它可以看作是在布鲁塞尔的已退休的俄国外交家的私人通报——的说法，俄国的照会没有直接交给奥地利内阁，而是交给了哥尔查科夫公爵，他把一份副本转交给

冯·布奥尔先生,同时表示相信奥地利要求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只是意味着建议停战,因为奥地利不可能希望撤退的俄国军队遭到联军的袭击。可见,奥地利的意愿只是停火。这样,土、英、法军就不得不放弃任何向前推进的行动和任何对俄国的新的敌对行动。关于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问题,照会强调说,俄国绝对必需在这些地方保持某些战略据点才会去参加签订和约,否则,它同联军比起来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照会否认俄国有依靠上述战略性的占领来威胁奥地利的任何意图。从这些前提出发,照会表示俄国愿意在下面的基础上参加新的和平谈判: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俄国政府从来无意加以侵犯);正如4月9日的议定书所规定的那样,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和伊斯兰教臣民一律平等;最后,修改涉及海峡的公约。照会承认各强国对土耳其的基督教徒有共同保护权;但是,在俄国对信仰正教的基督徒的保护权问题上,《比利时独立报》上的文章指出,照会中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这就给作不同的解释留下了充分余地。这家报纸报道,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口气比照会本身更为和缓。他的紧急函件不是俄国最后的态度;为了促使奥地利开始新的谈判,他可能受权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不过,本月9日维也纳内阁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独立报》,或者更正确地说,布伦诺夫男爵说:

“目前,我们不应当无视这样一个情况:无论圣彼得堡的意图如何,一个小小的意外事件,一个实际的军事行动,英法联军对喀琅施塔得,或者更可能的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次进攻,甚至占领奥兰群岛,都必然会改变这些意图并且使反对作任何让步的一派占上风。”

无论如何,普鲁士对这次俄国照会是满意的,并把它看作是恢复谈判和阻止奥地利人进入瓦拉几亚的手段。就连《通报》也认为,普

鲁士反对奥军进驻是维也纳宫廷重又犹豫不定的原因。另一方面，假仁假义的《纪事晨报》报道说：

“在柏林人们确信，普鲁士宫廷所承担的保卫奥地利领土不受侵犯的约定义务，使它有权抗议俄国的任何新的挑衅。”

另外，大家知道，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条约²¹³明确规定，两大邦之中的任何一大邦在确信另一大邦打算采取的军事步骤的必要性以前可以按兵不动。因此，奥地利也许很想和西方强国共同行动，但它却发现自己被普鲁士的抗议所钳制。我个人确信，所有这些可能性，北方三强国早就已经共同研究过了，甚至为奥地利设下的新的困难，目的也不过是要使它占领瓦拉几亚的行为具有英勇抗俄的外观。打一场像 1850 年奥普战争那样的小规模的假战争，可能也由这个协议规定了，因为它只会有助于在缔结和约时使奥地利的意见更具有决定意义。必须注意到，《奥地利通讯》明确表示，除了可能侵犯俄国现有领土这一项，奥地利在所有各项上都同意西方强国的政策。

在判断奥地利的立场时，注意一下根据 6 月 22 日的质问而现在提交下院的《塞尔维亚政府对奥地利占领的抗议书》²¹⁴是很重要的。这份抗议书是塞尔维亚政府交给土耳其政府的。抗议书一开头就指出“奥地利依照它认为塞尔维亚政府同俄国还是同土耳其保持或多或少的友善关系，而对塞尔维亚政府采取相应的态度，它总是答应塞尔维亚帮助保护这个多瑙河公国边境不受任何敌人进犯”。后来，在塞尔维亚边境上集结了重兵。塞尔维亚政府曾“直接向维也纳内阁和间接向土耳其政府”询问，“奥地利的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奥地利作了支吾搪塞的答复，然而土耳其政府和西方强国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却声明他们完全不知道奥地利炫耀武力的目的，

甚至他们似乎也同塞尔维亚政府一样感到不安和怀疑。“贝尔格莱德的帕沙仍然没有得到指令,或者更正确地说,他有的还是以前给他的指令,根据这些指令,他应当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任何军事干涉,看成是针对奥斯曼帝国本身的敌对行动,因此应当全力予以反击。”奥地利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西方强国,它在贝尔格莱德的代理人开始作出关于它的意图的令人满意的保证。同时,维也纳内阁通知塞尔维亚政府说:有关的军事措施不包含对塞尔维亚的任何敌意;奥地利只希望保卫本国边境;它只有在俄军进入塞尔维亚领土或者那里发生反对合法政权的暴动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干涉;所以,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它的干涉还是友好性质的,目的是援助政府和合法政权。奥地利的保证没有使塞尔维亚政府放心。塞尔维亚政府认为,奥地利一方面会装模作样进行调停,另一方面却以和西方强国共同援助奥斯曼帝国为借口采取单独行动。总之,塞尔维亚政府猜测奥地利企图制造它声称力求防止的那种混乱。因为奥地利的备战活动一天比一天具有威胁性,所以塞尔维亚政府和伊塞特帕沙在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共同采取了积极的步骤,防止任何可能使奥地利成为目前塞尔维亚命运的主宰者的阴谋。正是为此目的,阿齐兹帕沙起初被派往维也纳,而现在又到了君士坦丁堡。同时,与土耳其代表共同采取了各种国防措施。奥地利提出了可能使它干涉塞尔维亚的两个理由:(1)俄国人入侵和(2)塞尔维亚发生叛乱。第一个理由是荒谬的,因为战场距离塞尔维亚太远了,即使俄国人企图侵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军队也完全能够加以反击。如果需要援军,塞尔维亚宁愿要别的援军,也不要奥地利的援军。

“塞尔维亚民族对奥地利极不信任,甚至可以说怀有仇恨,所以奥地利人进入塞尔维亚会立即被每个塞尔维亚人视为迫在眉睫的危险,莫大的不幸,塞尔

维亚人会千方百计地跟奥军作斗争；整个民族会全力以赴地抵抗向来被认为是贪婪的化身的敌人，这种贪婪驱使奥地利试图随便以什么为借口在塞尔维亚施加利己的影响。”^①

至于说国内的叛乱，那只是由于奥地利的干涉，才会使人担心。塞尔维亚将永远忠实于土耳其政府。

“塞尔维亚政府所要求的一切，不外是希望今后能荣幸地得到土耳其政府至今所表示的那种信任，希望塞尔维亚不被置于奥地利占领之下，这种占领将是无穷的灾难的原因和开始。在这种条件下，塞尔维亚政府完全负责维持塞尔维亚的社会安宁和秩序。”^①

塞尔维亚的这份抗议书同时清楚地表明，瓦拉几亚人民多么热情地期望奥地利人开进瓦拉几亚。

关于小国对英国采取中立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敌对的态度，任何人只要留意英国目前对俄国采取的军事行动、英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掠夺性远征以及为了使瓦尔纳附近的军队不能进行任何战斗而采取的种种措施（要知道，驻土耳其的不列颠军队的医疗救护队直到现在才刚刚乘喜马拉雅山号军舰离开南安普敦），他就不会感到奇怪。因此，瑞典明确宣布它决定保持中立，不同西方强国采取共同步骤；丹麦和荷兰作为德意志联邦⁵⁰的成员表示可以同意奥地利5月24日的通报，但要明确这个通报只意味着保持绝对的中立和致力于恢复和平。

弯街的治安法官贾丁先生审理了一桩远比波拿巴在布洛涅的演说或查理从喀琅施塔得光荣退却更使伦敦轰动的案件。一个名叫派

^① 《塞尔维亚政府对奥地利占领的抗议书》，见1854年7月13日《晨报》第19675号。——编者注

特曼博士的德国人，遭四天禁闭之后被押解到法庭，被指控为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不适于自由行动。财政部法务官雷诺先生要求公众和报界人士退出去，于是，案件也就在法官的私人办公室内极为秘密地进行审理。被告的朋友，下院议员奥特韦先生愤怒地抗议不许他参加审理的做法，后来他被允许参加了；律师路易斯先生也提出要求并得到允许作为被告的律师参加。路易斯先生质问，为什么不经法官审讯就把派特曼博士在重罪犯牢里关了四整天。贾丁先生答复说，他得到两位医生签署的关于被告精神错乱的证明书，因而他不得不将被告送到疯人院，路易斯先生请求法庭让他提出相反的证据，但是，贾丁先生拒绝考虑任何延搁案件的建议，因为他要根据他现有的证据办事。于是路易斯先生声明，他将向上一级司法机关上诉，那里审理案件不会有偏见，并且将听取双方申诉。他现在要告诉他的当事人，不对控告作任何回答，哪怕是法官要求他回答。奥特韦先生对整个审讯的片面性表示抗议并且声明，他将向下院披露整个案件，并且要求对派特曼博士曾经在审前被拘押并被关进疯人院的详情作出交待。被告又被解到科尼哈奇^①。

现在，我们将今天《晨报》刊登的不久前刚刚把派特曼博士从贝德勒姆^①解救出来的医生派西沃先生的声明附在下面：

“派特曼博士是一位德国教授，曾先后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和哈雷大学求学。他是曾经为乔治三世作战，在服役期间去世的一位汉诺威军官的儿子，又是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里珀塔男爵的继子。大约在30年前，他来到了英格兰，在很快就熟习了我国寄宿学校和学院现行的腐败透顶的教学制度之后，便到牛津和剑桥去讲授这一主题的课程。1835年，他被介绍给诺曼比侯爵，在侯爵保护下到了爱尔兰。因为诺曼比夫人已经为马尔格雷夫勋爵找到了教师，她就把

^① 精神病院的名称。——编者注

派特曼博士介绍给一位爱尔兰贵族，后者请他当自己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七个月后，发现大儿子深深地爱上了家中的萨克森出生的女仆，并使她怀了孕。年轻人的母亲请求派特曼博士帮助她把这位姑娘打发回德国，但博士拒绝干预这桩事。他辞去这家的的工作并在都柏林开始公开讲学。1836年3月，这个萨克森姑娘来到这里，这时她已经在贵族庄园生了孩子，境况十分贫困。不久之后她告诉派特曼博士说，她打算雇请律师控告贵族的儿子诱奸她，而且他将会被传唤去当证人。派特曼博士于是决定去拜访诺曼比侯爵的管家并同侯爵家关系非常密切的非普斯上校。派特曼博士几次前去拜访这位非普斯——诺曼比的兄弟和阿尔伯特亲王的现任秘书，但都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答复，也没有被接见。最后，他被带到都柏林的治安法官斯塔德特先生那里，斯塔德特先生根据那个非普斯的证词，没有任何其他说明派特曼博士破坏社会秩序的证据，就在1836年5月把博士送进了疯人院。在诺曼比勋爵当爱尔兰总督期间，根据一个叫利顿的医生的证明，派特曼博士被转送到迪安·绥夫特医院，而按照这个医生的意见，这个证明根本没有说派特曼博士精神失常。九个月后，经过圣巴特里克大教堂的首席神父道森博士的交涉，他被从医院放出来。此后经道森博士介绍，他在都柏林皇家协会讲学并被福蒂斯丘勋爵家雇用。当阿尔伯特亲王来到英格兰时，派特曼博士曾请求亲王让他到一个图书馆任职，允许他实施他的学校改革。萨塞克斯公爵和派特曼博士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后，指示他的图书馆管理员允许派特曼博士自由出入他的图书馆。在这之后，派特曼博士向阿尔伯特亲王递交了申请，并附上他的证明书和自己的11本著作。亲王对申请不予答复，最后，派特曼博士请求亲王接见，或者退还证明书。大概正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牛津向女王开枪，而一位在亲王逗留波恩期间（在波恩他和派特曼博士在同一位导师指导下学习）同亲王关系密切的女士又从德国来了。宫廷紧张不安，而派特曼博士的倔强引起了怀疑。有人把这一切都报告了内务大臣诺曼比侯爵（派特曼博士曾经控告侯爵不公正地把他关进都柏林疯人院）；在1840年6月的一个早晨，一名便衣警察被派去把派特曼博士从他在白厅的公寓中抓走。诺曼比勋爵召见了他的兄弟非普斯上校，值班的治安法官根据上校的证词命令把派特曼博士押到贝德勒姆，他在那里被关了14年。他在那里的行为一贯非常好；从没有被隔离过，也从来没有服过任何药物。他专心于改善对病人的护理和组织能够接受他的讲解的病人学习。被释放以后，他根据朋友的建议向女王递交了呈文；他以为现在可以自由行动无须担惊受怕了，于是在上星期六到白金汉宫的皇家教堂去，参加那里的祈祷仪式，以便女王注意到他。然而他在

那里又被逮捕了。”

这个例子可以向各位读者表明，在自由的英国引起宫廷神经过敏，以及与闻道貌岸然的英国贵族的家丑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13—14 日

载于 1854 年 7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4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
——杜尔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
——英国的内阁危机²¹⁵

1854年7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7月13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在人员上同最近几次著名的会议稍有不同的会议。这一天，奥地利首相布奥尔伯爵设宴招待俄国特使哥尔查科夫公爵，这位特使的任务是掩护驻多瑙河两公国的总司令哥尔查科夫公爵的立场。除了俄国使馆的人员以外，出席宴会的有：在阿尔宁伯爵缺席时任普鲁士代办的弗莱明伯爵、瑞典大使曼斯巴赫将军、丹麦大使比列-布腊赫伯爵、荷兰大使德·海克伦先生、希腊国王的被驱逐的秘书德·温特兰德先生，还有比利时的公使和外交使团的团长奥沙利文·德格拉斯伯爵。总之，你们可以看到公开在俄国旗帜下行动的人员的一大张名单。班贝格当然也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²¹⁶，但这些伟大的人物的名字没有被列出来。

英国的官方报纸无法掩盖自己由于奥地利发出让科罗尼尼伯爵停止向瓦拉几亚推进的命令，以及由于送交巴黎和伦敦的紧急函件

(这些紧急函件说,俄国建议接受4月9日的议定书中的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但是要作某些保留)而产生的焦虑不安情绪。半官方的《奥地利通讯》认为,尽管俄国的建议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其中的确有值得西方强国注意的东西。《泰晤士报》、《纪事晨报》以及《观察家报》聊以解嘲地说,这一切都是普鲁士的过错。如果还需要什么来加深宴会所产生的印象的话,那么俄国部队的重新部署就充分证明俄国是多么相信奥地利的意图。我们在《新普鲁士报》这一柏林的俄国通报上,读到最近俄国部队在多瑙河两公国的调动的情形:

“按照哥尔查科夫公爵的一道命令,几天以前发布的一切命令都已取消。曾经命令从布加勒斯特撤走守备部队并且退出布加勒斯特;丹年贝尔格将军本应当在最近几天内同宪兵队一起离开该城,并且在福克沙尼设立后卫的大本营。按新的命令,现在应当守卫住奥尔泰尼察—布加勒斯特—布泽乌—福克沙尼这条战线。”

我们从其他方面获悉,俄国骑兵重新向奥吕塔河左岸的斯拉蒂纳前进。撤离布加勒斯特的意图是多么认真,这可以从为了运出这个城市中的档案而采取的严格措施看出来,据说,档案里有一些使得戈夫宫^①名誉扫地的文件。

俄国人的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稀奇古怪,互相矛盾的行动,都是土耳其军队对外谈判的不合时宜的干扰引起的。正如维也纳外交家先后作出的安排,都被土军在奥尔泰尼察、切塔泰和锡利斯特里亚的功勋推翻了一样,他们不久以前的骗局也被奥美尔帕沙军队的全面推进粉碎了。

“那些狡猾的信口发誓的坏东西——那块耗子咬过的霉腐的陈年干酪奈斯

① 彼得一世在彼得堡附近修建的供沙皇消夏的住所。——编者注

托尔和那头狗狐乌利斯——定下的计策，简直不值一颗乌莓子！……所以那些希腊人都像野蛮人一样胡作非为起来，计策权谋把军誉一起搞坏了。”①

要是星期六你在伦敦街头走走，就会听到所有的报贩子都在喊：“英国、土耳其、法国军队在久尔杰沃大胜俄军，联军占领了布加勒斯特。”

当我谈到新内阁的危机问题的时候，你们慢慢就会弄清楚为什么会这么扬扬得意地发布消息。至于英法联军在久尔杰沃会战中的联合行动，我们根据截至本月4日瓦尔纳寄来的定期邮件得悉，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据7月13日维也纳的最新消息说，辅助部队正在经舒姆拉向鲁斯楚克迅速前进，法军的一个师于8日到达鲁斯楚克，英军的一个师于9日才到达那里。然而8日早晨4时结束的久尔杰沃会战是在7日拂晓开始的，在这天中午停止了几个小时以后重新开始，一直继续到8日早晨。因此法国或英国的任何部队，都未能参加。土军发现有八门俄国加农炮坏了，于是立即在久尔杰沃周围挖战壕。尽管土军从鲁斯楚克及其附近岛屿发射了榴弹，但是该城并未遭受损失。在俄国军队撤退以后，奥美尔帕沙发出通告，号召居民保持安宁，因为他们的城市再没有什么危险了。占领久尔杰沃的是很小的一支正规军，土军的主力都驻扎在该城四周以及多瑙河的三个岛上。奥美尔帕沙驻在久尔杰沃，赛义德帕沙驻在鲁斯楚克。土军控制了沿多瑙河左岸从久尔杰沃到奥尔泰尼察的公路。

至于第二次会战（据说在这次会战后接着就会占领布加勒斯特），法国的《通报》自己说，不过是土军给久尔杰沃到布加勒斯特的路上的弗勒泰什蒂附近的俄国后卫一个小小的挫折。《通报》还说，

①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第5幕第4场。——编者注

英法 25 000 人的一个军已同土军会师，联军的兵力总共大约有 6 万人；哥尔查科夫公爵指挥着大致相等的兵力；可能发生决定布加勒斯特命运的大会战。弗勒泰什蒂是一个大约离久尔杰沃 12 英里、离布加勒斯特 30 英里的很小的筑垒据点。据《通报》说，这个地方的会战是在本月 11 日进行的，而据《辩论日报》说是在 14 日进行的，据说，俄军在这场战斗中有 700 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将军。

最近从君士坦丁堡到马赛轮船带来消息说，英国惊骇号蒸汽舰占领了多瑙河的苏利纳河口。据说，惊骇号进入停泊场，击毁了俄军的工事，打散了他们的守军，并且捉住了他们的司令官。我认为，这一消息还需要更可靠的消息加以证实。

英国报纸报道了任何法国报纸都没有转载的一个传闻，说什么莱昂斯海军上将正在阿纳帕前面巡航，以便支援布律阿海军上将远征，据说，布律阿的船上有 7 000 人用于登陆。

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信件说，土耳其政府按照英法大使提出的意见，看来已经同意立即恢复同希腊的贸易关系，条件如下：(1)希腊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支付军事费用并赔偿暴动者在最近进行掠夺造成的损失；(2)希腊应在两个月内签订它一直拒绝的通商条约。这一条约承认土希两国之间目前存在的边界。

没有来自波罗的海的消息。《汉堡记者》对英国到芬兰海岸进行掠夺性远征的结果以及在芬兰人中造成的印象，作了如下的描述：

“业已证实，在布拉赫斯塔德和于莱奥堡被焚毁以后，俄国政府充分理解住在两个海湾沿岸的芬兰人的情感，它已命令把武器分发给有战斗能力的居民，使他们能够抵抗英军舰队登陆的任何新尝试。已经批准立即成立两个芬兰猎兵营，每营为 1 000 人，将在奥布、瓦萨和于莱奥堡等地区招募。其他各省也应逐步建立更多的猎兵营。”

奥地利的公债正像我预言过的^①，已经变成一种勒索。现在，全部公债将由帝国各领地分摊。例如，上奥地利应当认购 11 500 万弗罗伦，下奥地利应当认购 1 500 万弗罗伦，维也纳应当认购 250 万弗罗伦，匈牙利应当认购 7 000 万弗罗伦等等。如果说俄国皇帝没有为自己搞到什么东西，那么他至少是促使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同臣民在财政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普鲁士人不得不在 8 月 1 日缴纳提高了的所得税。据说波拿巴也在计划再发行 5 亿法郎的公债，由于葡萄和小麦的收成的前景以及已经到来的一——特别是西班牙起义后在里昂——商业停滞，这次发行公债对法国将产生不小的影响。联合内阁也打算让英国人掏一掏腰包，并且在最近一周内就要实行。

西班牙起义显然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可以从杜尔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中看出来；杜尔塞是埃斯帕特罗的支持者，奥当奈尔是纳尔瓦埃斯的坚定追随者，也可能暗地里是克里斯蒂娜女王的坚定拥护者。奥当奈尔深信目前单靠宫廷革命不可能使西班牙各城市动作起来，于是突然把自由派的原则拿出来作幌子。他的文告是在离雷阿尔城不远属于拉曼查的曼萨纳雷斯镇发表的。文告说，他的目的是保存王位，但要排除权奸，严格遵守根本法，改善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减轻税赋，文职按功提升，实行地方分权制并在广泛的基础上成立国民军。文告建议委托各省洪达和马德里的议会大会审查各种法律。杜尔塞将军的文告是用更有力的词句写的。文告说：

“再没有什么进步派和温和派了。我们都是西班牙人，都是 1822 年 7 月 7 日的人们的追随者。恢复 1837 年的宪法，支持伊萨伯拉二世，终身流放女王的母亲，撤消现在的内阁，恢复我国国内的和平——这些就是我们不惜任何代价

① 见本卷第 391—392 页。——编者注

极力追求的目的,我们要在光荣的战场上让叛徒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将对他们的应受谴责的荒唐行为加以惩罚。”^①

据《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说,在马德里曾经查获了许多文件和信件,似乎它们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起义者的秘密目的是宣布王位空缺,把伊比利亚半岛合并成一个国家,把王冠授与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唐·佩德罗五世。《泰晤士报》对于西班牙起义的亲切的关心以及上面说到的唐·佩德罗同时来到英国,似乎事实上说明科堡家族的某种新阴谋正在策划之中。西班牙宫廷显得十分惊慌,因为已经试遍了各种各样的内阁的组合;曾经求助于伊斯图里斯以及马丁内斯·德·拉·罗萨,但是没有结果。《巴约讷信使报》硬说,蒙泰莫林伯爵收到起义的消息后立即离开了那不勒斯。

奥当奈尔已进入安达卢西亚,他的军队分三个纵队越过了莫雷纳山:一队经过拉卡罗利纳,一队经过波索布兰科,一队经过德斯佩尼亚佩罗斯。《日报》承认,布塞塔上校突然占领了昆卡,因此起义军得以同巴伦西亚取得联系。在这个省里,除了阿尔西拉(政府军在那里遭到了惨重失败)以外,目前起义还席卷了四五个城市。

有人又证实说,在卡泰罗尼亚的雷乌斯出现了动乱,而《巴约讷信使报》补充说,在阿拉贡也发生了混乱。

“你喜欢英明的
拿破仑的严峻的脸孔?
你喜欢英国用帕麦斯顿勋爵
来反对你?”^②

^① 多·杜尔塞……《文告》,见1854年7月17日《辩论日报》。——编者注

^② 1854年7月17日《每日新闻》第2445号。——编者注

人们用这首歌谣歌颂法国军队在加来登船。

为了真的用帕麦斯顿勋爵来反对沙皇，从上星期六到星期一巨大的运动震撼了伦敦，以便由帕麦斯顿来代替纽卡斯尔公爵的职务。无论在政府阵营中或者在反对派阵营中，人们的心情再次十分紧张。大家已经知道，新的陆军部的预算将在星期一晚上提交议院，有人要抓住这一机会给联合内阁以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不败的帕麦斯顿安插到陆军部里去。

“星期六下午将近2点召开了内阁会议。大臣们直到3点才到会。除了外交大臣因谒见女王未能到会外，所有大臣都到了。克拉伦登勋爵直到4点才来到他的同事们当中。会议一直开到6点半，会后，阿伯丁勋爵立即到王宫去谒见女王陛下。”

从《先驱晨报》的这段令人不安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些“重大的”事件使托利党人产生了多么大的希望。约翰·罗素勋爵在星期一把拥护他的人请到白厅¹⁶³去，迪斯累里先生也召集了反对派议员。有179位绅士到了白厅，他们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期待着罗素将要向他们进行重大的披露。他们十分可悲地受了议会中的斯库伊尔斯的欺骗，这个人冷淡地向他们宣称：对军事预算草案进行表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期望他们沉着而且举止适当，

“内阁很快又会需要更多的钱来继续进行战争，因此，信任或者不信任联合内阁的问题，将在下周由议院表决这笔钱的问题时决定。”^①

既然没有让他与闻克拉伦登勋爵的秘密，他就无法告诉他们关于外交方面的情况。结果，罗素在这次会议上拯救了整个联合内阁；要知道，如果投信任票是由于陆军部的预算草案而采取的，那么失败

^① 1854年7月18日《每日新闻》第2446号。——编者注

就意味着帕麦斯顿对纽卡斯尔的胜利；然而，要是由于整个军事预算草案而投不信任票，这就会是托利党对联合的辉格党和皮尔派的胜利，——意外的情况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陆军部的表决，是昨天晚间议院在十分平静、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罗素和帕金顿说出了大量令人讨厌的关于目前军事指挥管理的状况的陈词滥调。

遗憾的是，女王顽固的反对使帕麦斯顿没有进入陆军部，因为如果把他安插到该部，激进派现在还用来维护英国对外政策的最后一个欺骗性的借口就会破产。

当奥特韦先生在上星期五的下院会议上说，他打算把派特曼博士的遭遇通知议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从座位上站起来，声称他准备对任何问题作出解释，而且一切都会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可是派特曼博士却在《晨报》上发表了一封信，这封信证明，虽然在其他方面他从来不是疯子，他仍然相信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宽宏大量，他恳求他们准他回德国，——也就是做他们希望做的事。

所谓的激进派报纸的卑鄙的奴颜婢膝也在它对这一史无前例的案件保持绝对沉默中表现出来：根据盖有封印的上谕²¹⁷把一个人埋了18年，只不过因为他不幸知道了一点点关于王室和贵族同某些德国女仆的暧昧关系。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

18日

载于1854年8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47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

——希腊和土耳其²¹⁸

1854年7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古老的卡斯蒂利亚谚语说：“Ne touchez pas à la Reine”（不要触犯女王）；然而，胆大包天的穆尼奥斯夫人和她的女儿伊萨伯拉老早就越出了甚至卡斯蒂利亚时代历届女王的一切权利，以致打破了西班牙人民的忠君偏见。

1843年的起义²¹⁹持续了三个月，1854年的起义到现在刚刚延续了三个星期。内阁解散了，圣路易斯伯爵逃跑了，克里斯蒂娜女王企图逃往法国边境，而在马德里，无论军队或者城市居民，都表示反对政府。

从这一世纪初起，除了北部各省周期性爆发的为维护各省和各地方的特权的运动以外，西班牙的历次革命运动都十分相似：每一次宫廷阴谋都伴随着军事叛乱，而军事叛乱必然引起地方起义。这个现象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知道，人民的生活没有越出各行省的界限，因此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家的范围以内，军队是能够在全国范围

内抵抗宫廷的唯一力量。第二，西班牙的特殊形势和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²²⁰造成了一些条件，使西班牙民族的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力量只能集中在军队里。因此，民族情感的唯一表现（在1812年和1822年²²¹）是出自军队；因此，民族的最活跃的部分总是把军队当作一切民族起义的自然工具。然而，在1830—1854年的动荡不安的年代，西班牙城市居民已经逐渐认识到，军队已经不再维护民族的事业，而变成了觊觎宫廷军事监护人之职位的野心家争斗的工具。因此我们看到，1854年的运动甚至与1843年的运动也大不相同。人民决没有把奥当奈尔将军的叛乱看作反对宫廷统治势力的阴谋，何况这次叛乱是受到退职的宠臣塞拉诺的支持的。因此城市和农村都不肯响应马德里骑兵发出的号召；在这种情况下，奥当奈尔将军为了不陷于孤立和遭到失败而不得不完全改变自己行动的性质。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告中提出同样是反对军队最高当局的三点：召开议会，成立节俭政府，组织国民军；最后一个要求是由于城市渴望摆脱军队控制以恢复独立而提出的。因此，事实上，这次军队起义之所以得到了一次人民起义所能得到的支持，只是因为它服从了人民起义的条件。军队起义是否将不得已而恪守这些条件并履行这些诺言，还尚待观察。

除卡洛斯派²²²外，一切党派——进步派²⁰⁷、1837年宪法²¹¹拥护者、1812年宪法²²³拥护者、联合派（要求兼并葡萄牙的人）和共和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对于有关共和派的消息，应该特别慎重，因为这些消息都是要经过巴黎警察当局的检查的。除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外，军人领袖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埃斯帕特罗一听到奥当奈尔取得胜利的消息，马上就结束了他在莱加内斯的隐退生活，而且宣布自己是运动的领袖。但是凯撒—纳尔瓦埃斯刚听到关于自己的老庞培上阵的消息，马上就表示要为女王效劳；他的建议被接受

了,他将组织新内阁。从我在下面谈到的细节可以看出,决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军队采取了主动行动,在有些地方他们只是不得不屈服于不可遏止的人民的压力。

除了我在前一篇文章^①中谈到的巴伦西亚的起义外,在阿利坎特也发生过起义。在安达卢西亚的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哈恩发生过起义。在旧卡斯蒂利亚的布尔戈斯发生过;在莱昂的巴利亚多利德发生过;在比斯开的圣塞瓦斯蒂安和维多利亚发生过;在纳瓦拉的托洛萨、潘普洛纳和吉普斯夸省发生过;在阿拉贡的萨拉戈萨发生过;在卡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塔拉戈纳、莱里达和赫罗纳发生过;据说在巴利阿里群岛也发生过起义。据卡塔赫纳7月12日来信说,穆尔西亚也将发生起义,信中说:

“根据当地军事总督发布的命令,卡塔赫纳有枪和其他武器的居民,都必须在24小时内把它们送交民政当局。根据法国领事的要求,政府已准许居住在该地的法国人像在1848年那样把武器交给领事馆。”^②

在所有这些起义中,只有四处值得具体谈一谈,这就是:比斯开的圣塞瓦斯蒂安的起义,卡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的起义,阿拉贡首府萨拉戈萨的起义和马德里的起义。

在比斯开,起义是市政府发动的;在阿拉贡,是军人发动的。当响起要求武装人民的声音时,圣塞瓦斯蒂安的市政府宣布支持起义。城市立即武装起来。直到7月17日,当地两营驻军才被说服参加起义。城市居民和军人联合起来以后,有1 000名武装市民在一些军

① 见本卷第410页。——编者注

② 《马萨尔雷多将军……7月19日巴约讷[电]》,见1854年7月20日《总汇通报》第201号。——编者注

队协助下向潘普洛纳进发并且在纳瓦拉组织起义。正是圣塞瓦斯蒂安的武装市民的来到，促进了纳瓦拉首府的起义。萨瓦拉将军后来参加了运动并动身去巴约讷，号召不久前在萨拉戈萨遭到失败而逃到那里去的科尔多瓦团的士兵和军官马上回到祖国来，到圣塞瓦斯蒂安同他汇合。据一些消息说，后来他到马德里去投效埃斯帕特罗；同时另一些消息说，他已前往萨拉戈萨，以便同阿拉贡的起义军汇合。巴斯克各省的司令官马萨尔雷多将军拒绝参加维多利亚的起义，被迫跑到法国去了。萨瓦拉将军的军队共有波旁团的两个营和一营枪骑兵，一队骑兵。在叙述巴斯克各省的事件的结尾，我要告诉读者一件有典型意义的事情：被任命为吉普斯夸省总督的巴拉斯特基准将，是埃斯帕特罗过去的副官之一。

在巴塞罗那，起义显然是由军人发动的，但是根据我另外得到的消息判断，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于自愿是很可怀疑的。7月13日下午7时，驻扎在圣巴勃罗兵营和布恩苏塞索兵营的士兵，在人民示威的感召下，宣布了起义，口号是：女王万岁！宪法万岁！处死大臣！打倒克里斯蒂娜！他们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并且同群众一起沿河堤前进，然后停在宪法广场上。由于不被军区司令官信任而在前六天被禁止离开巴塞洛内塔营房的骑兵也宣布了起义。从这时起，全部驻军就都转到人民方面来了，当局采取任何抵抗都已经不可能。在整个压力之下，军事总督马尔切西将军到10时也让步了；而在深夜，卡泰罗尼亚军区司令官也宣布他决心站到运动一边。他到了市政府广场并且向聚集在那里的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7月18日组成了洪达，参加洪达的有军区司令官和其他著名人士，提出的口号是：“宪法、女王、道德”。后来从巴塞罗那传来的消息说，根据新当局的命令，有几名工人因为破坏机器、侵占财产被枪决了；又说在邻近

城市开会的共和派委员会委员被逮捕了；不过不应忘记，所有这些消息都是经“十二月二日政府”之手发出来的²²⁴，而这个政府的使命就是诬蔑共和派和工人。

在萨拉戈萨，据说起义是军人发动的，然而这个说法被另外的消息推翻了，这个消息说这里立即作出决议，组织国民军。无论如何现在可以肯定，而且马德里《日报》也已确认，在萨拉戈萨起义发生前，蒙泰萨骑兵团的150名士兵，去马德里途中在托雷洪（离马德里5里格^①）宿营的时候哗变，离开了他们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带着该团的钱箱于7月13日晚到达马德里。士兵们在上尉巴拉伊班的指挥下骑马前往韦特，据估计，他们打算在昆卡同布塞塔上校的队伍汇合。至于说到马德里（据说埃斯帕特罗和萨瓦拉将军正分别率领“中部军团”和北部军团向马德里进发），这个靠宫廷过活的城市最后才参加起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7月15日的《日报》仍发表了陆军大臣的公报，公报硬说，叛军正在逃跑，军队的效忠热情正在增长。圣路易斯伯爵对马德里的形势似乎作了很正确的估计，他曾对工人说，奥当奈尔将军和无政府主义者会使他们失掉任何工作，而政府如果胜利，将雇用全体工人从事公用事业工程，每天工资6雷阿耳^②（0.75美元）。圣路易斯想用这个花招把最容易煽动的一部分马德里居民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来。不过他的成功也像1848年巴黎《国民报》派的成功²²⁵一样。他用这个方法获得的同盟者，不久就变成了他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换取他们支持的资金第六天就用光了。拉腊将军（总督）的禁止散布任何关于起义进展情况的消息的文告表

① 英国旧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3英里或4.83公里。——编者注

② 西班牙古代银币。——编者注

明,政府是多么害怕首都发生起义。再有,布拉塞将军的策略看来只限于竭力防止起义者同军队有任何接触,以免军队受到感染。据说,奥当奈尔将军最初的计划预定在极便于骑兵行动的拉曼查平原迎战政府军。然而同安达卢西亚的几个主要城市保持联系的前宠臣塞拉诺的来到,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于是立宪派的军队决定离开拉曼查到哈恩和塞维利亚去。

我们要顺便指出,布拉塞将军的公报很像受到弗朗索瓦一世嘲笑的16世纪西班牙将军的日日命令,很像受到弗里德里希大帝讥笑过的18世纪的命令。

很明显,这次西班牙的起义一定会成为英法政府分歧的原因;一家法国报纸说,奥当奈尔将军在起义以前曾藏在英国大使官邸,这个消息未必会减轻波拿巴对英国的疑虑。在波拿巴和维多利亚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恼人的事情。波拿巴期望在他的军队在加来上船的时候能同女王会晤,可是女王陛下却没有理会他的期望,这一天她拜访前王后阿梅莉亚去了。其次,当英国大臣们在议会中被质问为什么没有在白海、黑海、亚速海进行封锁的时候,他们把同法国结盟当作辩护的借口。波拿巴对这一点的答复是在《通报》上宣布封锁上述几个海面,而不等得到英国的正式同意。最后,因为法国军队搭乘的完全是英国船,在法国造成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波拿巴公布了指定用于这一目的的法国船只的名单,而且使用了这些船。

土耳其政府交给四大盟国的代表一份关于许可希腊商船重新进入土耳其港口的照会。这次许可的有效期为两个月,条件就是希腊政府不作出任何可能使土耳其政府取消这种许可的行动。如果在这个期限内,希腊政府没有给土耳其满意的补偿,土耳其政府有权恢复原状。希腊船只在土耳其港口将服从地方当局的命令,而且不能向

其他国家申请保护。在两个月内应谈判达成缔结协定和通商条约的基本原则。土耳其政府由于在希腊人暴动中受到巨大损失而要求的赔款数目,应根据被派往各地进行调查的委员会的仲裁报告确定,委员会由法国人、英国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组成。

沙米尔从土耳其政府正式得到了切尔克西亚和格鲁吉亚军团大元帅的称号。

在法军中服务的三个译员在瓦尔纳被枪决,因为发现他们同俄国人有关联。其中两个是希腊人,一个是亚美尼亚人。在处决前,其中有一个吞下了有损声誉的文件。

本月16日,有人从赫曼施塔特告诉我们,在弗勒泰什蒂附近还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关于联军到达鲁斯楚克的消息,当然是虚构的。在目前情况下,联军全部目的就是阻止得胜的土军的——用《泰晤士报》的说法——野蛮的残暴行为。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
21日

载于1854年8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4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议会的战争辩论²²⁶

1854年7月25日星期二于伦敦

在上星期四晚间举行的下院会议上,约·罗素勋爵在答复迪斯累里先生的质询时声称,女王陛下曾有意下令向议院颁发诏书,有鉴于此,他打算在星期一提出投票表决300万英镑拨款的提案;成立一个筹款委员会是没有必要的。约翰勋爵没有答复迪斯累里先生提出的关于今年议会秋季会议是否举行的问题。关于拨款的提案在昨天举行的两院会议上分别被一致通过。

在上院,阿伯丁勋爵提出投票表决拨款的提案时所作的发言是在他担任首相以来使我们饱尝耳福的一切发言中最短、最枯燥无味的一次。他说,他不能不申请300万,并且他确信各位议员阁下不会表示异议。他们在看法上可能有分歧,但是他们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必须赞同一切最能导致战争早日顺利结束的措施”。为此目的,首先要求“英法同其他强国共同作出积极的顽强的努力”。阿伯丁勋爵没有说明他是否指军事或外交的努力;他甚至没有把俄国排除于英法应当与之共同行动的“其他强国”之外。由于议会即将休会,保证政府有钱用尤其重要。也许在高贵的议员当中有人宁肯

把钱托付给别人,而不愿意托付给他,然而这种任性的愿望不应该妨碍对问题的讨论。问题,而且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就在于对 300 万英镑进行表决。

一向以信口开河这种特殊的天才著称的埃伦伯勒伯爵“认为,现在是建议政府在与战争无关的一切民政管理部门中厉行节约的大好机会”。

哈德威克伯爵认为,在波罗的海有一支准备应付任何意外情况的非常强大的舰队,在黑海也有这样一支舰队,而这是历来从英国派出的最大的一支军队。他不知道政府打算怎样使用这些兵力,所以他呼吁各位高贵的议员批准所要求的拨款。

在野的辉格党人菲茨威廉伯爵反对“把我国说成是欧洲税负最重的国家;相反地,应该说,我国人民的税负比欧洲集团的其他任何部分都轻得多”。如果高贵的勋爵的这番话说的是勋爵们,而不是人民,那他是说对了。“至于说到我的那位领导政府的高贵的朋友的讲话”,在类似的场合从来还没有发表过一次讲话,“人们可以非常正确地说,它几乎没有向议院提供任何一个新的思想”,而高贵的勋爵应当清楚地知道,议院在思想方面的要求是怎样的。菲茨威廉伯爵想从阿伯丁勋爵那里了解到,他如此热心于与之共同行动的“其他强国”是哪些国家?也许是奥地利?他担心的是,英国政府会受这个国家的怂恿,认定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和维护多瑙河的航行自由这类次要问题可以成为签订和约的充分理由。(这种担心是可笑的,因为,阿伯丁勋爵自然不会受任何人的怂恿而提出过分的要求。)伯爵还想知道,应当怎样理解土耳其的完整?应当理解为阿德里安堡条约¹⁸所规定的内容呢,还是理解为其他什么东西?最后,他指出,他们处于非常奇怪的地位,因为议会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政府意图的消息。

由于所有这些考虑，他将投票赞成拨款。

随着就任内阁职务的希望更加渺茫而脾气日益乖戾的克兰里卡德侯爵，要求哪怕多少解释一下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和自从申请上述拨款以来采取了什么样的方针，以报答他至今对内阁所表现的无比的容忍；他希望多少知道一点关于战争的情况和前途以及本国与盟国的相互关系。已取得某些成就的是土耳其人，而不是不列颠政府和不列颠的武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去吹嘘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英国水兵的英勇精神。至于与盟国的关系，他有朝一日将提出关于公布土耳其和奥地利最近签订的条约，以及其他有助于阐明当前形势的文件的议案。

“从广泛流行的传闻中可以看出，由于不列颠政府的压力和劝说，国务会议和土耳其公使不久前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虽然国务会议以前是非常反对这样做的。根据协议，奥地利军队应当开进多瑙河地区并占领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奥地利在千钧一发之际不是从速投入战斗，反而畏缩不前并开始新的谈判，这是怎么回事呢？发言人还希望知道维也纳会议²⁶是否还在继续和会上正讨论些什么问题。总而言之，他认为英国过分依赖德意志大邦。

为了证明奥地利“应当”是最好的盟国，克拉伦登勋爵指出了俄国正在包围奥地利的整个领土并对它进行威胁等情况。奥土条约还不可能提交议院，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经批准的条约文本。克拉伦登勋爵认为，使议院相信奥地利同英国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已经不远这一点是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打保票”。不过从对奥地利的总的评价和他本人掌管外交部这一点来看，各位议员阁下是可以作出最令人快慰的结论的。克拉伦登勋爵曾因散布最无耻的

谎言两次被人揭穿，现在自然期望人们绝对相信他的保证：

“政府无意恢复原状，也无意满足于仓促达到的和平，这种和平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休战，它将使重新开战成为不可避免。”

议员们在出色地显示了他们本身的高度文化教养之后，自然把话题扯到国民教育的问题上去——关于上院，我们就谈到这里。

在上院进行辩论期间，下院在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直到获悉阿伯丁勋爵发表的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的演说的消息才结束。约翰·罗素勋爵立刻感觉到有必要造成一种相反的印象。

当政府打算要求第一次追加拨款时，它调动了“威武壮观的”波罗的海舰队；在要求第二次追加拨款时，它以著名的炮击敖德萨事件作为理由；现在被选作口令的是塞瓦斯托波尔。

约翰勋爵首先充分肯定议院在慷慨支持政府第一次请求拨款时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感谢议院至今十分明智地没有给政府制造难题。这样就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即保证得到了大批船只和人员。英国现在拥有 17 艘一、二、三级蒸汽舰，17 艘帆力战列舰和 57 200 名海军人员，而在 1853 年 1 月 1 日，只有 1 艘蒸汽舰，11 艘帆力战列舰，33 910 名海军人员。此外，在土耳其沿岸地区还部署了有三万多名士兵的军队，“其中许多人不久前驻扎在瓦尔纳”。这就是当时的军事力量。至于军事行动，它们还

“刚刚开始，而目前只能说土耳其军队创造了勇敢精神的奇迹。现在谁也不会说，俄皇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垮整个奥斯曼强国。除了土军的辉煌功绩之外，这次战争的可夸耀之处就是法英两国军队的完全协调一致”。

接着，约翰勋爵转到请求表决拨款的问题，他说，他不可能向议员们确切地说明需要多少钱。军需、炮兵和交通运输可能要花费二

百来万；此外，土耳其军队的一个庞大的分队可能并入不列颠军队，并向不列颠政府领取薪饷。总的说来，他请求议院拨款不是根据什么详细的估算，而是供政府“不时之需”。

高贵的勋爵说，奥地利甚至比法国或英国更关心保卫土耳其。沙皇一旦确立了他对多瑙河两公国的统治并在土耳其赢得了占优势的影响，就会完全控制奥地利政府。但是，为了正确地评判奥地利，必须记住它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俄军可以从好几个方面逼近奥地利首都，而另一方面，在一些奥地利属下的王国局势很不安定，如果参战，那对奥地利来说是很危险的。因此，它的政策是只要有可能，就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久前，它曾给俄皇发出一份照会，俄皇的答复不能说是含糊其词的。

“第一，俄国不准备规定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期限。它认为，既然已经宣战，英国和法国既然已经参战，并且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兵力超过了俄国，而俄国舰队又不离开本国的港口，那么作为战场的只有多瑙河两公国和多瑙河航道，在这里俄国可以指望重建均势并以它的武器的优良取得胜利。因此，它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撤出多瑙河两公国。”

除了允许土耳其参加欧洲音乐会这一项以外，俄国曾经愿意接受4月9日的议定书中所陈述的原则。至于说奥地利下一步的行动，约翰勋爵认为它目前的政策是错误的，同时他又不能相信它会背弃它所签订的协议。根据与西方强国和土耳其签订的这些协议，奥地利必须参与反击俄国的行动。然而，它很可能企图重新获得圣彼得堡的更为有利的保证。盟国当然不能控制奥地利政府机关，同样，奥地利也不能控制普鲁士国王。可见，所有强国正处在共同抵御俄国的最有利的地位。

然后，约翰勋爵又详尽地，兴高采烈地来叙述英国和法国打算采

取的措施。土耳其的完整同在多瑙河两公国恢复原状是不相容的。他说：

“然而，阁下，俄国的阵势还从另一方面威胁着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我指的是一个坚固要塞的建立，这个要塞构筑得十分内行，在技术上尽量做到难以攻克，而且在它的港口内还有一支准备随时顺风开往波斯普鲁斯海峡的非常庞大的战列舰舰队。我认为这种阵势对土耳其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任何和约只要让俄皇保持这种威胁性阵势都不可能被认为是明智的。（热烈鼓掌）我们将像以往一样，准备跟法国政府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我有一切理由认为，法皇政府在这一点上同我们是完全一致的。”（鼓掌）

关于迪斯累里先生提出的举行秋季会议的提案，约翰勋爵“拒绝接受这个议院的成员提出的任何限制大臣们自由的条件”。

如果一一转述休谟、班克斯、奈特、阿尔科克之流对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那是令人厌倦的，也是多余的。

科布顿先生听信了约翰勋爵的话并且以为他把议院变成了军事委员会，所以竭力设法说明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木。他提出英国是否和一些反对民族独立的政府结成了同盟的问题，也就触及一个更有趣味的议题。人们以为战争是有益于被压迫民族的，他们是大错了；相反地，战争是为了使束缚匈牙利和意大利于奥地利统治之下的锁链更加牢靠。议院里有一些可尊敬的但是上当受骗的先生，他们

“埋怨政府没有很好地进行战争，说政府应当指派另外的人来领导陆军部，甚至有时说，应当由另外的人来领导政府。他们所盼望的是帕麦斯顿勋爵。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利益。可是，我从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两个最伟大的领袖的口中听到，他们不仅不把希望寄托在这位高贵的勋爵身上，相反地，他们知道，当这位高贵的勋爵有可能给予他们以道义上的支持的时候，他甚至不肯费举手之劳来维护他们。如果说英国现政府里有一个人是这两位

领袖最不信任的人,那么这个人正是这位高贵的勋爵。我不认为高贵的勋爵觉察到以他的名义制造的大骗局,幸而,现在骗局已经戳穿了”。

莱亚德先生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只是重复了他们以前的发言,所不同的是,达德利勋爵对“帕麦斯顿”这个名字的魔力的信仰“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留给迪斯累里先生的就是一口气把约翰勋爵的肥皂泡般的言论吹破。他引用锡诺普会战¹⁴和去年秋季休假期间发生的其他壮举简要地论证了他关于举行秋季会议的建议,他承认,关于即将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和占领克里木的消息使他感到惊奇、困惑和惶恐不安。约翰勋爵辩驳了几句,但仍坐在席位上;可是,坐下来的迪斯累里先生硬要他解释清楚。约翰勋爵终于站了出来,用一种谦卑而含糊的声调说:

“我只能说我刚才所说的话:依我之见,不能容许俄国保持它所采取的那种威胁性阵势,即在塞瓦斯托波尔拥有这样庞大的舰队。”

在促使约翰勋爵作出这番供认后,迪斯累里先生作了 he 历来最尖酸刻薄的一次发言。这个发言很值得全部读一遍(发言的详细内容刊登在下面关于大不列颠的消息一栏中)^①。他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真的,我们听了这番话以后,如果还把阿伯丁勋爵的政策和他的一些同僚的政策精细地区分开来——正像人们时常做的那样——那是很不公正的。我不崇拜,也不拥护阿伯丁勋爵,然而我也不崇拜那种牺牲一些阁员来保全另一些阁员的议会政治。在我对面的这位高贵的勋爵就他所说过的话作了解释之后,可以看出,他在俄国问题上的政策本质上和阿伯丁勋爵的政策毫无区别,而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这一点毕竟会使英国人民感到有些满意。就是说，我们内阁里没有分歧；这次会议终于可以在大臣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结束；而作战是为了渺小的目的，伟大的政治意图可以导致毫无价值的、微不足道的结果，看来在这一点上联合政府是一致的。”

帕麦斯顿勋爵的诙谐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在迪斯累里先生讲话和其他许多声称自己曾被约翰勋爵的第一次发言弄糊涂了的下院议员发言之后，请求拨款的提案被表决通过了，但附带一个条件：辩论今晚将继续进行。同时，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宣布，他打算上奏女王，“恳请陛下在她能够向议院提供关于同其他强国的相互关系，以及陛下对她被卷入的斗争的看法和展望的更全面的情报以前，不要下令议会休会”。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5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奥地利的政策。
——下院的战争辩论²²⁷

1854年7月28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①中,已经向你们分析了6月14日的奥土条约,并且指出,这个外交上不寻常的交易的目的在于:第一,给联军不渡过多瑙河和不跟俄军接触提供借口;第二,阻挠土军重新占领整个瓦拉几亚并迫使他们从已占领的瓦拉几亚的部分领土上撤走;第三,在多瑙河两公国恢复1848年俄国强加于罗马尼亚人的旧的反动制度。现在我们果然从君士坦丁堡方面得知,奥地利已经声明抗议奥美尔帕沙渡过多瑙河的意图;它要求取得独占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以及不仅向英法军队,同样也向土军封锁该地区的权利。关于这项抗议,土耳其政府据说已经命令奥美尔帕沙目前不要渡过多瑙河,但是原则上拒绝承认奥地利独占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从自己的老

① 见本卷第371—373页。——编者注

师和保护者帕麦斯顿勋爵那里学会了一点东西的不幸的路西德帕沙,当然不会认真反对这种做法:实际上容许他在原则上拒绝的那些事情。可以认为,奥地利已经破坏了并在事实上废除了6月14日的条约,因为在俄军向三个方向溃退,并且没有立即退到塞雷特河左岸而把翼侧和后方暴露在奥地利的攻击面前的时刻,奥地利并没有进入瓦拉几亚。但是应当想到,根据这个著名的条约的条款,奥地利既没有义务立刻进入多瑙河两公国,也没有义务在一定期限内离开多瑙河两公国,更没有义务迫使俄国人在规定的某一期限内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现在有消息说,奥地利人的确正在进入小瓦拉几亚,而俄国人正在把自己的军队调离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并在福克沙尼集中,但是,这只是说明奥地利人不是在把俄国人挤出大瓦拉几亚,而是决定把土耳其人驱逐出小瓦拉几亚从而阻碍他们在奥吕塔河两岸的军事行动。显然,当时除非把土耳其军队逐出它所占领的地区并由英法军队(他们尽力避免同俄军冲突,并使土耳其人处于被包围状态)来占领保加利亚,想不出更好的计划以引起土耳其军队的暴动,这一点从英法统帅部联合告保加利亚居民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告居民书几乎是从布德贝格、哥尔查科夫之流那里逐字抄来的。我早已向你们预言过,西方强国将为进步事业效一次劳——使土耳其这个衰落的欧洲制度的基石革命化。

奥地利不仅反对土耳其人占领土耳其地区的放肆行为,而且要求恢复现在居住在维也纳的两位国君的权利:冯·布鲁克先生已经通知土耳其政府,两位国君应当同首批奥地利军队一道返回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路西德帕沙答复说,土耳其政府将讨论恢复两位国君的权利是否适宜的问题,但冯·布鲁克先生坚持要履行条约的第三条,即应当恢复旧政府。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曾请诸位注意这项

条款^①的模棱两可的措词。路西德帕沙反对说，在土耳其政府确信这两位国君没有违背他们作为忠诚的臣民的责任以前，不可能恢复他们的权利。土耳其政府对摩尔多瓦的吉卡公爵没有很大意见，但是瓦拉几亚国君施梯尔贝的行为曾经具有强烈的挑衅性质：他曾以最可耻的方式表明他支持俄国，所以土耳其政府非驱逐他不可。于是，冯·布鲁克先生便请苏丹作主，后者召开了非常会议，制订出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两个国君暂时复位，同时土耳其政府任命一个高级专员负责调查他们的行动，然后再作最后决定。不言而喻，路西德并不真正反对的吉卡公爵重新掌政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摩尔多瓦仍在俄国人的手中。相反地，被土耳其政府亲自赶走并被斥骂为俄国代理人的施梯尔贝公爵的复位却是真正的恢复权利，因为俄国人已经撤出了瓦拉几亚的一部分领土，其余部分看来也将很快撤出。

可是，奥地利的外交活动并不只这一些。我们在昨日的《晨邮报》上看到一则7月19日的贝尔格莱德电讯：

“昨日从君士坦丁堡接到立即停止进一步武装和一切军事演习的命令。据私下透露，下一个命令就是裁军。这些消息立即被转告给亚历山大公爵。”

看来，这就是土耳其政府对于塞尔维亚抗议奥地利占领的答复。不幸的土耳其政府就这样失去抗击它的公开的敌人的可能性，同时被卷入对它自己忠实的藩属的敌对的篡夺活动中。土耳其政府用6月14日的条约撕毁了它同多瑙河两公国的协定，它将用裁军的命令破坏塞尔维亚的根本法。²²⁸同一个政治上的步骤既会使土耳其军队

^① 见本卷第372页。——编者注

发生暴动，又会把塞尔维亚和多瑙河两公国推向俄国的怀抱。奥地利要求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结果竟是土耳其人被禁止进入这两个公国，而奥地利吹嘘的备战竟是塞尔维亚的裁军。

愚蠢的奥地利，既然成了沙皇和他的英国同谋者手中的简单工具，也就不过是准备着将使它本身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的普遍革命的因素，对这个革命的到来，只有戴维·乌尔卡尔特这样的空想主义的反动分子才会感到懊丧。

读者已经知道了在意大利最先开始的那些运动。报纸正在报道热那亚、摩德纳和帕尔马等地的风潮。但是，依我看，费拉拉发生的事件比其他一切事件更像 1848 年的普遍起义。

我一开始就对傲慢的和遭到破产的奥地利政府发行的爱国自愿公债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这一点读者从布格尔男爵不久前告伦巴第的忠诚臣民书中可以看出来。他告诉他们，伦巴第应摊的自愿公债共达 4 000 万弗罗伦，相当于 10 440 万法郎；如果按人口分摊，每人摊到 40 法郎。《同盟报》写道：

“这个自愿公债正在变成大规模的勒索：每个省，每个自治村，每个人都应当自愿支付规定的份额。”

为了使人对这种自愿公债的真正意义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布格尔男爵的告臣民书最后说：

“很显然，如自愿公债失败，那就要从土地、资本、商业和工业的各项收入中按最适当的比例征收特别的强制军税。”

在星期一下院会议上枢密院院长兼下院领袖^①借口要详尽地

① 约·罗素。——编者注

陈述内阁的意图作了一次发言,可是六个小时之后,他就同一个地方把他所讲过的话完全收回了,这在议会史上是空前罕见的。晚上7时他宣布:塞瓦斯托波尔遭到炮击,已经被彻底摧毁并且已经从俄国手中夺下;午夜1时15分,他宣布俄国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可能损失了一艘或两艘战列舰,而“俄国目前的威望和地位决没有受到影响”。在六小时的过程中,小约翰^①在下院议员面前骂人、摆架子、恐吓、喧嚷、吹牛皮、胡闹、道贺和瞎扯,在六小时的过程中,他强使议员们沉迷在“愚人的乐园”里,但是,迪斯累里先生只是寥寥几句尖刻话,就把这个肥皂泡捅破了,使假狮子不得不重新把习用的小羊皮披在自己的肩上。对内阁来说,这是一个“耻辱日”,但是它使它的300万英镑的提案通过了。

星期二的会议就斯图亚特勋爵关于议会暂不休会的提案进行了辩论。议员们对拨款案已经表决批准了;不得不对内阁投信任票。因为极可尊敬的议员们完全了解这一切,所以出席会议的议员不多,辩论冷冷清清,内阁比任何时候都嚣张,而达德利·斯图亚特的提案被一致否决了。内阁千方百计把它自己的耻辱变成对下院议员的胜利。这对议会来说是一个“耻辱日”。不过,由于沃龙佐夫的内兄弟不列颠陆军大臣赫伯特先生对军事行动所作的辩护,由于海军大臣贝克莱的轻率发言和小约翰关于英国内阁的内部情况的傲慢讲话,会议还是值得注意的。

赫伯特先生,长着一个小脑袋瓜儿的前青年托利党人,为了答复人们对不能令人满意的军需机构的抱怨,极力赞扬军需长官菲尔德,说菲尔德无疑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因为大约50年前他曾得

^① 约·罗素。——编者注

到“铁公爵”^①的信任并在他手下担任过很高的职务。赫伯特先生用“军队的最好的军需官”的经过粉饰的报告和一些法国军官不得不说的恭维话来驳斥报纸记者们的令人不快的通讯。他只字不提军队完全没有运输工具,没有骡子,也没有马匹来运输军队从瓦尔纳和代夫尼亚向多瑙河转移时所必需的行李和用水以及其他许多行军时所必需的东西。他只字不提军队缺乏购买粮秣的经费。他没有反驳这样一个事实:军需部只是在许多师出发之后和舰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才成立的。他不敢反驳这种说法:据拉格伦勋爵本人说,由于军需部工作的糟糕,他的军队已经在一个地方停留近两个月而无法前进,虽然他们同饥饿不堪的敌人距离很近,几乎可以听见对方的炮声。

沃龙佐夫公爵的机灵的內兄弟也以同样的手法排除了对于炮队的装备的抱怨。他费尽唇舌对他本人而不是别人提出的关于在土耳其军队中只有一些六磅的火炮的指责作了答复,可是他竭力回避这样的事实:军队里没有攻城炮,几乎没有骑兵这个在瓦拉几亚平原作战最必需的兵种来支援步兵,在瓦尔纳一个4万人的军甚至不能配备40门火炮去对付俄军,而俄军每个4万人的军却拥有120门火炮。

沃龙佐夫的內兄弟在回答对政府供应军队必需的武器方面所表现的漫不经心提出的指责时,愤愤不平地为统帅部辩护,似乎后者是无可非议的。

至于不幸事件以及为何这些不幸事件全都发生在英国军队中(在法国远征军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极可尊敬的赫伯特先生回答说,第一,的确有一只载运第六龙骑兵团的部分人员的船被

① 阿·韦·威灵顿。——编者注

烧毁了，然而船长，“一个高贵的老人，在面临人们所能遇到的最可怕的死亡时，却不顾船员们的请求，拒绝离船。一直到后来，可惜呀！来不及了，他终于殉职了”。低能的下院议员们对这种毫无意思的回答报以赞许的呼声。至于老虎号的损失²²⁹，他把这算作意外事件。“而波罗的海上的严重灾难，——唉，它只能说明我国水兵的有勇无谋”。

然后，长着小脑袋瓜儿的先生转而回答是否“我国海军和陆军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结果？”这一问题。他极力吹嘘“对俄国港口的全面的、有效的和无法突破的封锁”。这种封锁是如此有效，以致例如有8艘俄国军舰虽然遭到炮击，经历了战斗和重重困难，仍然从塞瓦斯托波尔到达了敖德萨。这种封锁是如此有效，以致俄国在波罗的海上的贸易继续在大规模进行，俄国商品仍然在伦敦出售，只是价格略高于战前；敖德萨的贸易完全跟去年一样，甚至对黑海和白海的名义上的封锁还是几天以前由波拿巴强迫英国人进行的。

然而，姓赫伯特的高贵的青年人大声说道，英国政府做过的事还不只这些。难道英国政府没有使俄国无法利用黑海运输军需，没有切断俄国出海的一切通道吗？不过他完全忘记了，英国政府让俄国人控制了多瑙河四个月；它让俄国人仅用15 000人就占领了欧洲的谷仓——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它把自己眼皮子底下的多布罗加的丰富牧群放弃给了俄国人，它阻挠土耳其舰队在锡诺普消灭俄国分舰队。

英国人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给了不小帮助，因为他们既是土耳其军队的后备部队，也就使土耳其军队能够利用每个士兵和每门火炮以抗击入侵军队。

需不需要提醒读者，当俄国人还没有能够在两个公国集结优势

兵力的时候，英国政府一直阻止奥美尔帕沙利用他的军队的数量上的优势和最初的胜利成果？英国军队还干了些什么呢？

“俄国在构筑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的堡垒线上花了多少英镑？可是在一个短暂的战役中，所有这些像一条链子锁住切尔克西亚的坚固要塞，除了一个堡垒之外，都落入了英国人或他们的盟国的手中。”

沃龙佐夫！沃龙佐夫！难道你忘记了，当人们在会议一开始就建议你攻占这些堡垒的时候，你拒绝这样做，也就使俄军能够把这些堡垒的守军移到塞瓦斯托波尔？你所占领的仅是俄军自己打算放弃的那些堡垒，而唯一没有摧毁、也没有占领、甚至没有去进攻的“例外”，正好是唯一值得占领的、是俄军认为唯一应当守住的堡垒并且是唯一使你同切尔克斯人联系的堡垒——阿纳帕。

赫伯特先生的乏味的饶舌达到了顶点，他硬说，英国参加了光荣的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这次保卫战不仅英国自己不派兵救援，而且还不许奥美尔帕沙救援），因为在阵亡者中有一个叫巴特勒上尉的年轻人。关于活着的内史密斯中尉，当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其实，巴特勒上尉是在政府拒绝派他到锡利斯特里亚以后才去那里的，因而赫伯特元帅现在尤其有一切理由称赞他的行动。至于说内史密斯中尉，他是属于那种即将被逐出不列颠兵营的人物，而且他是以新闻记者的身分到锡利斯特里亚的。

由于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攻击政府没有购置吃水量只有三英尺并装备一两门重炮的蒸汽舰，在赫伯特将军之后发言的贝克莱海军上将就请高贵的勋爵“教会造船督察如何建造这样的蒸汽舰”。这就是辉格党的英勇的海军上将对于海军部如不设法搞到大量炮艇，如何装备一支波罗的海舰队的问题的答复。英勇的贝克莱和他的学识渊博的造船督察与其向一无所知的受欺编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

爵讨主意,还不如求教于瑞典和俄国的海军部。

我们已经谈过了文雅的赫伯特和英勇的贝克莱就不列颠作战情况所作的辩护。现在来谈谈这位贝克莱脱口而出的真心话。如果说前一天晚上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肥皂泡被小约翰吹破了,那么在这一天晚上关于喀琅施塔得的肥皂泡也因贝克莱的发言而破灭了。既然在多瑙河两公国的战斗将由奥地利单枪匹马地进行,那么,对于“任何国家都不曾拥有过和派出过的配备有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佩克桑重炮和其他杀伤力极大的武器的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来说,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英勇的贝克莱从英勇的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①的信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能率领这支强大的舰队从事任何活动,因为对喀琅施塔得或斯韦阿堡的任何进攻都意味着必然的灭亡。”^②

不仅如此。威武的贝克莱一面陶醉于这支最强大的舰队无所不能的想法,一面继续嘟囔说:

“科学知识之渊博在一切人之上的查兹海军上将也这样写道:‘经过从灯塔上的两天的观察并对堡垒和舰只的周密的察看,我深信,对我们舰艇的火力来说,堡垒太坚固了,无法攻破。它们全是大块大块的花岗石。要进攻停在那里的敌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②

关于纳皮尔,威武的贝克莱最后说:

“从来还没有一个不列颠军官得到过这样充分的可以随意行事的自由活动。政府不但没有缚住他的手,相反,还千方百计地鼓励他前进”——从博马尔

① 查·纳皮尔。——编者注

② 莫·弗·贝克莱 1854 年 7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松德到喀琅施塔得和从喀琅施塔得到博马尔松德。①

托利党人希尔德亚德先生指责说：“他有生以来还从未听到过这样不谨慎的讲话”，贝克莱讲话时像一个赤裸裸的俄国代理人；一切关于喀琅施塔得的高谈阔论终究都是得到他的默许的。为应付这种指责，英勇的贝克莱部分地收回了他的不谨慎的讲话，甚至说，纳皮尔所谈的只是目前他只有舰艇而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从纳皮尔离开英国海岸时起，我就一再说，没有陆军，没有同瑞典的同盟，就不可能在波罗的海取得任何成就，这个见解也博得一切科学知识渊博的军人的赞同。

现在我来谈谈这次难忘的辩论中的最后一点，即约翰·罗素勋爵的趾高气扬的讲话。300万的期票一拿到手，他就变得如此厚颜无耻，就同20小时前他在迪斯累里的冷嘲热讽的打击下如此羞愧赧颜一样。

“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他昨晚所作的发言。”对于某些人企图在阿伯丁和阿伯丁的同僚之间制造“不愉快的分歧”，他要告诉他们：

“至于战争方面的一般措施，通常被称作内阁的女王陛下的那些顾问们已经详细地讨论了这些措施；对于所作的各项决定，阿伯丁勋爵的全体同僚和这位高贵的勋爵都同样向议会和国家负责。”②

实际上，他竟敢——不过不冒任何危险——对议院说：

“如果我们配做女王的大臣，那么，我们就有权斟酌召开或不召开议会会

① 莫·弗·贝克莱 1854年7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约·罗素 1854年7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议；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配享有这种权利，我们就不再配做女王的大臣。”

旁听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英国议会会议之后，我得承认，1848年我在《新莱茵报》上斥责柏林和法兰克福议会是议会生活的最可悲的表现²³⁰，是一个错误。

如果拿沃龙佐夫的英国内兄弟的声明，拿罗素的平淡无味的吹牛以及《泰晤士报》社论的吼叫同《泰晤士报》驻瓦尔纳附近不列颠兵营记者7月13日的最新报道中的下面这段话比较一下，读者是会感到兴趣的：

“昨晚所有人都确信很快就要缔结和约了，因为据报道，奥地利公使和布朗将军曾经共进午餐，而这位公使正从舒姆拉——他在那里同奥美尔帕沙进行过长时间会谈——前往瓦尔纳，他将在那里同拉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元帅进行磋商。据报道，剑桥公爵已宣布，骑兵于11月前返回英国，步兵于5月前返回英国。当然不能肯定，目前我们是否处于战争状态，联军真是交战的一方还是他们在土耳其登陆后只作了作战的姿态。我们的阅兵、检阅、演习和检查都同在萨托里和乔伯姆进行的一样是并无恶意的、无害于人的，而我们在陆上的全部行动仅仅是：第一，卡迪根勋爵的侦察性袭击，第二，派出几个工程师和工兵到锡利斯特里亚和鲁斯楚克，第三，向该地派去几个法国架桥兵，第四，再向鲁斯楚克派去一个连的工兵和150名水兵，架设此岸到岛屿和从岛屿到对岸之间的桥。”

英国没有巴士底狱，但是有疯人院，完全可以根据盖有封印的上谕²¹⁷把任何一个不合王室心意的或有碍某个家庭和谐的人关进去。这一点在星期三辩论派特曼博士的案件^①时，已经由奥特韦先生充分证实，而他得到了亨利先生的支持。帕麦斯顿勋爵，这位罗马公民²³¹和“不列颠臣民的权利和特权”的著名的维护者只用了寥寥几

① 见本卷第401—404页。——编者注

句话就把问题压下了。帕麦斯顿甚至没有肯定说派特曼真是个疯子，而只是说，“看来，他自以为有权向政府提出某种要求”而且正打算以非常令人厌恶的方式向女王，或者更正确地说，向一个匿名要人——阿尔伯特亲王提出这种要求。科堡家族无孔不入，目前他们想使西班牙人民完全受自己支配。政府的《地球报》说：

“这是有关博士的权利和女王的权利的问题，我们深信，议会内外没有一个人会在判断这些权利时摇摆不定。”

因此，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在这个自由的极乐国度被公开焚毁，是不足为奇的。

在同一个星期三晚上，还演出了一出议会的小喜剧。在上星期五的会议上，巴特先生提出了一项禁止不列颠臣民买卖俄国政府的有价证券、违者受惩处的提案，这个提案只涉及俄国政府在这次战争时期所签订的贷款。不列颠政府没有提出这样的法案，但又不敢反对，因为波拿巴已经在《通报》上发表了一则不确实的消息，说什么不列颠政府和他一致认为认购俄国债券是非法的。因此帕麦斯顿支持巴特先生的提案，但是遭到了《经济学家》杂志的聪明的编者、财政部次官威尔逊先生的相当不客气的反对。于是这位在星期一为联合内阁辩护、星期二一言不发从而事实上保证了联合内阁的成功的帕麦斯顿，在星期三便不能放过机会重新扮演内阁的“受气的女人”的角色。他以男性西维拉的神态抑扬顿挫地讲话，好像他完全受他的自发的爱国热情支配，而他这个被自己官方地位的严酷的需要所束缚的可怜人，在前两个晚上却不得不压制这种热情。极可尊敬的受骗的先生们照例以欢呼声淹没了他以下的话：

“这个法案只不过是肯定不列颠臣民不应向俄国人提供作战费用这一原

则。财政部次官提出的理由是想说明我们应当废除叛国法,类似的论据纯粹是胡说八道。”

必须指出,正是这个人,他 24 年来一直把俄荷贷款协定¹⁶⁴强加于英国,而目前是内阁中最有影响的阁员,这个内阁仍然在为这种贷款还本付息,从而向俄国提供“作战费用”。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7 月
28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5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无聊的战争²³²

自从土军两个步兵营组成的一支不大的部队成功地从奥尔泰尼察对岸的图尔图凯附近渡过多瑙河,在那里构筑起野战工事,并且当俄军向他们攻击时,他们经过一场非常激烈、但规模不大的战斗(这次战斗作为这次战争的第一次冲突而获得了奥尔泰尼察会战²的赫赫大名)而把俄军击退以来,已经快一年了。当时,土军是单独同俄军对抗的,在他们后面既没有英军或法军作预备队,甚至也不能指望联军舰队的任何支援。虽然如此,他们仍在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的奥尔泰尼察附近扼守阵地达两星期之久,而在卡拉法特附近扼守了整整一个冬季。

从那时起,英国和法国对俄国宣战了。诚然,联军建立了各种业绩,可是,人们对这些业绩不是没有怀疑。黑海分舰队、波罗的海分舰队和将近十万英法陆军,在那里援助土军或者为土军牵制敌人。但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结果不过是奥尔泰尼察附近那种战事的较大规模的重复而已,而胜利似乎比去年更小了。

俄军包围了锡利斯特里亚。他们在围攻中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反而是勇敢的。他们日复一日地遭到挫败,但这不是因为对方用兵高明,也不是因为巴特勒上尉和内史密斯中尉这两位英国军官在场(按《泰晤士报》的说法,是他们拯救了锡利斯特里亚)。不是这样,俄

军遭到失败是由于土军的十足无知，土军甚至不知道堡垒或者垒墙在一定的时刻不能再扼守下去，而继续死守着敌人企图夺取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座小丘。此外，俄军遭到失败还由于自己将领的昏庸无能，由于霍乱和热病的流行，以及由于威胁其左翼的联军和威胁其右翼的奥军对他们的精神上的压力。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指出，俄国军队从来不善于进行正规围攻，对锡利斯特里亚军事行动的拙劣指挥，证明俄军从那时以来没有任何进步。就这样，俄军遭到了失败，不得不极其可耻地溜走了，不得不在最有利的季节，在被围守军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外援的时刻，停止对这个极不完善的要塞的围攻。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百年难遇。不管俄军在秋季将采取什么行动，这个战役是已经失败了，而且是可耻地失败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锡利斯特里亚解围了。俄军退到多瑙河左岸。他们甚至准备放弃多布罗加，并且正在逐步实现这个计划。赫尔绍瓦和默钦的工事被拆除了。看来俄军打算以塞雷特河作为防线，不过要守卫的不是他们的占领区，而是本国领土。狡猾的老克罗地亚人奥美尔帕沙（他“为了职责”可以缄口不言，也可以信口胡说，在这方面他不比别人逊色），立刻把一个军派到多布罗加，把另一个军派到鲁斯楚克，这样就同时包围了俄军的两翼。当时，本来可以有另外的比这好得多的做法，但看来可怜的老奥美尔对土军和联军了解得比我们清楚。可采取的正确军事行动应是让军队穿过多布罗加或者从卡拉腊什附近向敌人交通线挺进，不过当我们看到一切情况以后，就不能再非难奥美尔错过了好机会。我们知道，他的军队给养很坏，几乎得不到什么供应，因此不能进行远离基地的或者开辟新作战线的迅速移动。如果用足够的兵力进行这样的移动，那么会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果；但是对一支半饥半饱而且要通

过不毛之地的军队来说，这样的移动是不能胜任的。我们知道，奥美尔帕沙曾去瓦尔纳向联军的将军们求援，当时这些将军率领75 000名精兵驻在距多瑙河只有四天行程的地方；但是无论圣阿尔诺或拉格伦，都不认为有必要把部队派到可能同敌人相遇的地方去。因此，奥美尔迄今所做的已是尽其最大可能了。他把25 000人派往多布罗加，亲自率领其余的兵力向鲁斯楚克进发。在这里，他的部队接连越过了许多沙洲，一直到渡过多瑙河为止，随后又突然向左行进，从背后夺取了久尔杰沃，并从这里赶走了俄军。第二天，俄军在久尔杰沃以北的高地上集结，在这里遭到了土军的攻击。一场血战发生了，从竞相以首先战死为荣而且如愿以偿的英国军官的数量来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战斗。这些英国军官一个个中弹而死，但这无论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认为土耳其士兵仅仅因为看见英国军官阵亡就变得不可战胜，那是荒谬的。不管怎样，在那里仅仅配备了前卫（由科雷万团和托木斯克团编成的一个旅）的俄军被击败了，土军巩固了在瓦拉几亚境内多瑙河岸上的地位。他们立刻着手构筑工事，而且无疑地能够构筑起坚固的阵地，因为有英军工兵同他们在一起，并且他们自己在卡拉法特也已经证明，他们是满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但是土军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前进一步。那位在过去八个月内竭力扮演局外人角色的奥地利皇帝马上出面干涉了。因为曾经答应过他，由多瑙河两公国供养他的军队，他现在想使这种诺言兑现。土军在那里干什么呢？让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吧。因此，君士坦丁堡就发出了命令，叫土军从多瑙河左岸撤回，让奥地利士兵在“整个这块地区”为所欲为。外交高于战略。不管会产生什么结果，奥地利一定要在边境外占领几码土地来保卫自己的边境；为了这个重要目的，甚至那些从军事观点看最为必要的措施也应退居次要地位。此外，

难道奥美尔帕沙不是奥地利的逃兵吗？奥地利决不健忘。在黑山它曾经妨碍过奥美尔帕沙的胜利前程，现在它又重复同样的做法，要使这个变节者感到自己对那合法的君主还负有臣民的义务。

详细分析这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是毫无益处的。就战术观点来看，这些战斗行动并没有多大意义，它们只是些简单的、直线的正面攻击。双方军队的移动与其说是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不如说是由于外交上的需要。很可能，战役会在没有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结束，因为在多瑙河上完全没有作好大举进攻的准备，至于我们已经听厌了的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行动，看来将被推延到冬季，到那时，又不得不推到来年。

欧洲一切抱有保守观点的人，看到东方问题无法解决，似乎也应改变自己的观点了。请看，整个欧洲不能解决这个细小的争端，过去60年的情况表明，它确实也无能为力。最后，法国、英国和俄国投入战争。战争进行了六个月，但直到现在，除了因错误而引起的战斗或规模极小的战斗以外，还没有真正交战。瞧吧，在瓦尔纳城下驻扎着八九万英法士兵，他们由老威灵顿的前军务秘书^①和法国元帅^②指挥（说实在的，这位元帅最突出的功绩是在伦敦当铺里建立的）；可是法军什么也不做，而英军也尽力在这方面帮他们的忙；大概因为这种行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十分隆重，所以舰队也开到巴尔奇克的停泊场看一看这两国军队中哪一个更会最有风度地来享受这悠哉游哉的乐趣。然而，虽然到目前为止联军只是坐吃土耳其军队所指望的储粮，而且两个月来在瓦尔纳天天无所事事，但他们仍未作好履行自己职责的准备。如果指望他们援救，那么锡

① 菲·詹·拉格伦。——编者注

② 阿·圣阿尔诺。——编者注

利斯特里亚也许要到明年5月中旬才能解围。正是这些军队征服过阿尔及利亚¹⁴⁸，并在一个最复杂的战区里研究过作战理论和实践；也正是这些士兵曾在比保加利亚野蛮得多的国家里作战——在印度河的荒漠上同锡克教徒以及在南非的丛林中同卡弗尔人作过战，²³³——而现在这些士兵却束手无策，毫无用处，什么事也做不了，而且还是在—一个输出谷物的地区呢！

然而，如果说联军的所作所为十分拙劣，那么俄军的情形半斤八两。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而且也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将会遇到怎样的抵抗。但他们究竟作出了什么成绩呢？什么成绩也没有作出。他们没有能够从土军手里夺得一寸他们所力争的土地，没有能够夺取卡拉法特，而且无论在哪一次战斗中都没有能够打败土军。要知道曾在米尼希和苏沃洛夫的指挥下占领了由顿河到德涅斯特河黑海沿岸地区的也是同样的俄军！然而希尔德不是米尼希，帕斯凯维奇也不是苏沃洛夫，虽然俄国士兵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都更能忍受鞭笞，但是如果经常退却，就是这样的士兵，也会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失去他们的坚毅性。

真实的情况是：保守的欧洲——这个“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的欧洲，这个君主、封建主和有钱人的欧洲（无论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国家中怎样不同），——再一次暴露出它是完全虚弱无力的。即使欧洲腐朽了，战争也应该唤醒其中的健康因素，也应该重新发掘出潜在的力量。毫无疑问，在25 000万人中间，应该不乏有勇之人，因而至少可能打一次像样的仗，使双方都能得到在战场上运用智慧和力量所取得的那种荣誉。可是不然，不仅资产阶级的英国和波拿巴的法国不能进行真正的、坚决的、顽强的战争，甚至俄国这个受无神论的和使人软弱的文明影响最少的欧洲国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土军善于采取突然的进攻行动,也适于在防御时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不善于运用大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因此,一切都变得虚弱无力,双方相互承认自己虚弱,似乎各方也都预料到对方会承认自己虚弱。如果目前这样的政府存在下去,那么这个东方战争还可以继续 30 年而仍然得不到什么结果。

但是,当整个欧洲的当权派表现出无能的时候,在这个大陆的西南角却兴起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立即显示出毕竟还存在另外的比官方的力量更积极的力量。无论西班牙起义的性质和结果如何,我们都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它与未来的革命的关系将同 1847 年瑞士和意大利的运动与 1848 年革命的关系²³⁴一样。在这次起义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情况:第一,自 1849 年起实际上统治着大陆的军队从内部分裂了,它为了对抗政府,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放弃执行维持秩序的使命。纪律教会军队认识自己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反过来又削弱纪律。第二,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成功的街垒战。自 1848 年 6 月²³⁵起,无论哪里筑起的街垒都没有发生过作用。街垒战作为大城市居民抵抗军队的形式,似乎根本达不到目的。这种偏见现在已被驳倒了。我们再次看到了获得胜利的,不可攻破的街垒。咒语已被破除。新的革命时代已经有可能到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欧洲各国政府的军队在实际战争中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又被起义的城市居民击败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7 月 29 日—8 月 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8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5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埃斯帕特罗²³⁶

一切革命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他们却让自己沉湎于对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不容易才争得的一切权力和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代表或者被认为是代表的人。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人民惯于在社会危机时刻把他们背在自己的背上,而以后就很难摆脱掉他们,就像航海家辛伯达很难摆脱掉用两腿紧紧夹着他的脖子的凶恶的老头子一样。埃斯帕特罗便是这样一类人。你要是问一个属于所谓进步派²⁰⁷的西班牙人,埃斯帕特罗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是什么,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埃斯帕特罗体现伟大的自由派的统一;埃斯帕特罗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他来自人民;他的声望完全为进步派的事业服务。”^①

的确,他是一个工匠的儿子,一直爬到了西班牙摄政的职位;他参加军队时是一个普通的士兵,离开军队时是一位陆军元帅。但是,

① 《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48年马德里版第72页。——编者注

如果说他是伟大的自由派的统一的象征,那么,这只是统一过程中把一切极端中和起来了的一个并无重要意义的阶段。至于谈到进步派的声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它由这一整个派别转到他一个人身上之时起,便不存在了。

埃斯帕特罗的伟大是暧昧的和异常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说明,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朋友们用寓言式的老生常谈来支吾搪塞,而他的敌人们则暗示他的私生活上的某种特点,说他不过是一个幸运的赌徒。可见,不论朋友或敌人,都未能找出这个人本身与他的声誉和名望之间的任何逻辑联系。

埃斯帕特罗在军事上的功绩之成问题,正像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之不成问题一样。在德·弗洛雷斯先生编著的一部篇幅很大的埃斯帕特罗传记²³⁷中,大肆吹嘘他在查尔卡斯、拉巴斯、阿雷基帕、波托西和科恰班巴等省在莫里略将军(当时受命使南美各国回到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指挥下作战时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和指挥艺术。然而他被人称为“阿亚库乔之将”以及他的部下被人称为“阿亚库乔之兵”——影射阿亚库乔会战²³⁸的失败使西班牙彻底丧失了秘鲁和南美洲,这足以说明他在南美洲的武功在他的同胞的易于激动的头脑中所留下的总印象。总之,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英雄,他的这个历史性的绰号不是由于胜利,而是由于失败得来的。在同卡洛斯派²²²的七年战争中,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大胆攻击而使自己声名卓著,他的对手纳尔瓦埃斯正是由于进行这样的攻击很早就获得了铁打勇士的称号。他无疑具有一种最能利用细小的成功的天才,但是,如果说马罗托把王位追求者的最后的军队出卖给了他,那只不过是碰上了好运,而1840年卡夫雷拉的暴乱只不过是一次为时已晚的使卡洛斯派的僵尸复活的尝试²³⁹。当代西班牙的历史学家和埃斯帕特罗的

崇拜者德·马尔利安尼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七年的战争只可以同10世纪时高卢的小领主之间的封建主义争斗相比,那时成功并不是胜利的结果。²⁴⁰另一个不幸之点是,在埃斯帕特罗在西班牙的所有功勋中给公众的记忆留下最鲜明的印象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失败,对一个自由的英雄说来至少也是非常奇怪的行动。他以炮击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这两个城市而闻名。一位著作家说,如果西班牙人想把他描绘成玛尔斯,那么这个神扮演的就是“城墙摧毁者”的角色。²⁴¹

当1840年克里斯蒂娜被迫放弃摄政职位而逃出西班牙的时候,埃斯帕特罗不顾进步派非常大的一部分人的愿望,攫取了议会制范围内的最高权力。他在自己周围安置了一些奸党并且摆出了军事独裁者的姿态,实际上不想超出普通立宪君主的水平。他对温和派²⁴²的宠爱胜过对旧日进步派的宠爱,后者除少数例外,都被撤职了。他既没有安抚自己的敌人,又逐渐疏远了自己的朋友。他既没有勇气打碎议会制的枷锁,又不知道怎样接受它,怎样利用它,或者怎样把它变成行动的工具。在他独裁的三年中,由于无止境的妥协,革命精神逐步磨灭了,进步派内部的分歧竟然达到了如此尖锐的程度,以致温和派只要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就可以把全部政权夺回去。这样一来,埃斯帕特罗的威望一落千丈,连他任命的驻巴黎大使也串通克里斯蒂娜和纳尔瓦埃斯反对他;他智穷谋竭,竟至无法对付他们的可耻的阴谋,即路易-菲力浦的渺小的诡计。他对自己的处境如此缺乏了解,以致当舆论正要找寻口实来毁灭他的时候,他竟然轻率地去反对舆论。

1843年5月,当他早已威信扫地的时候,他仍然让林纳赫、苏尔瓦诺和他的军事奸党中的其他一些成员留在他们的职位上,尽管人

们强烈要求他把这些人撤职；他解散了掌握着众议院中的大多数的洛佩斯内阁，并且顽固地拒绝对被流放的温和派分子颁布大赦，可是当时议会、人民和军队本身都一致要求大赦。这种要求充分表明了所有的人对他的统治都感到厌恶。于是，声讨“暴君埃斯帕特罗”的风暴突然震撼了整个半岛；这个运动，就其发展的速度来说，只有目前的运动可以同它相比。温和派和进步派为了摆脱摄政这一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了。这个危机使他措手不及，当大难临头之时，他毫无准备。

纳尔瓦埃斯同奥当奈尔、孔查和佩苏埃拉一起，带着很少的人在巴伦西亚登陆。他们一开始就行动迅速、精力充沛、有智有勇，而且决心很大。而埃斯帕特罗却举棋不定、十分迟缓、优柔寡断、懈怠无力。当纳尔瓦埃斯解除了对特鲁埃尔的包围而向阿拉贡进发时，埃斯帕特罗离开了马德里，在阿尔瓦塞特莫名其妙地白白耽误了好几个星期。当纳尔瓦埃斯在托雷洪把塞奥昂纳和苏尔瓦诺所率的一个军争取过来并向马德里挺进时，埃斯帕特罗才最后同范哈伦会合，对塞维利亚进行无济于事的和令人愤慨的炮击。然后，他迅速撤离一个个的阵地，每退一步都有部队叛逃，一直到最后到达海边为止。当他在加的斯登船的时候，这个还保留着他的党羽的最后一个城市，也用声讨来向它的英雄诀别。在这次灾难期间住在西班牙的一个英国人，对埃斯帕特罗的由伟大到败亡作了一个清晰的描述：

“这不是一场激战后的倏忽间的大崩陷，而是从马德里到雷阿尔城，从雷阿尔城到阿尔瓦塞特，从阿尔瓦塞特到科尔多瓦，从科尔多瓦到塞维利亚，从塞维利亚到圣玛丽亚港，再从圣玛丽亚港到辽阔的大洋的一步一步的、未经任何战斗的、缓慢的倾倒。他从被崇拜为神降低为受到热诚拥护，从受到热诚拥护降低为受到爱慕，从受到爱慕降低为受到尊敬，从受到尊敬降低为遭到冷淡，从遭到冷淡降低为遭到轻蔑，从遭到轻蔑降低为遭到憎恨，由于遭到憎恨而坠入了

大海。”①

埃斯帕特罗怎么会又变成人们所称的国家救星和“革命之剑”了呢？如果不是十年的反动统治使西班牙在纳尔瓦埃斯的残暴的独裁和取代埃斯帕特罗的女王宠臣们的桎梏下备受痛苦，这件事就会完全不可理解。漫长的残酷的反动时期，十分适合于使在革命中遭到失败而垮台的人物恢复名誉。一个民族的想象力越大——哪儿有比南欧民族的想象力更大的想象力呢，——他们用体现革命的人物来对抗体现专制的人物的愿望就越强烈。因为他们不能马上凭空塑造出这样的人物，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过去运动中已经死去的人物挖掘出来。难道纳尔瓦埃斯本人不是想要靠牺牲萨尔托里乌斯而赢得声望吗？7月29日凯旋地进入马德里的埃斯帕特罗并不是实在的人；他只是一个幽灵，一个虚名，一种回忆。

应该公道地回忆一下，埃斯帕特罗除自命为君主立宪主义者以外，从来没有自命过其他什么东西；如果对这点有过怀疑的话，那么在看到他流亡期间在温莎城堡和英国统治阶级那里所受到的热诚接待，这种怀疑也就应当烟消云散了。当他到达伦敦时，以威灵顿公爵和帕麦斯顿为首的全体贵族都成群地到他的寓所去。阿伯丁以外交大臣的身分邀请他去谒见女王；伦敦市长和市政官在市长官邸举行盛宴欢迎他；当人们知道这位西班牙的辛辛纳图斯从事园艺来消度余暇的时候，没有一个植物学会、园艺学会或农学会不热心请他当名誉会员。他成了这个首都的真正的红人。1847年底的大赦召唤西班牙的流亡者回到祖国，而埃斯帕特罗被伊萨伯拉女王下旨任为参

① 特·麦·休斯《1845年西班牙真相》1845年伦敦版第1卷第17页。——编者注

议员。但是，他只是在维多利亚女王邀请他和他的夫人赴了宴，同时给了他空前的荣誉，让他们在温莎城堡内度了一夜之后，才离开了英国。我们相信，环绕他身上的这种荣光的确与埃斯帕特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英国在西班牙的利益的代表者这一估计有某种关系。对埃斯帕特罗所显示的尊敬也的确有点像是对路易-菲力浦的示威。

他一回到西班牙，就被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一个又一个的祝贺弄得应接不暇，而巴塞罗那市还派出一个特使去为巴塞罗那 1843 年的不当行为向他请罪。但是从 1846 年 1 月到最近事变的这一倒霉时期内，有谁听说过提到他的名字？在备受侮辱的西班牙的这个死寂的时期，他是否曾坚决说出自己的主张呢？谁知道他有过哪怕一次爱国抵抗的行动呢？他非常泰然地隐居在他在洛格罗尼奥的庄园内，栽花种菜，等待时机。直到革命找到他的时候，他才投奔革命。他所做的超过了穆罕默德。他等待山岳向他走来，而山岳也果真走来了。不过，有一件例外的事必须提一下。当二月革命^①爆发，欧洲的大地震随之而来时，他怂恿德·普林西佩先生和另几个朋友出版了一本名为《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小册子，其目的是提醒西班牙，它仍然是这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人物的栖身之所。由于法国的革命运动很快低落下来，这位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人物又被人遗忘了。

埃斯帕特罗生于拉曼查省的格拉纳图拉，而且像他的赫赫有名的老乡^②一样，他也有他的固定观念——宪法，和他的托博索的达辛尼亚——伊萨伯拉女王。1848 年 1 月 8 日，当他从英国流亡回到马

① 法国 1848 年的二月革命。——编者注

② 唐·吉珂德。——编者注

德里的时候，受到了女王的接见，他向女王告别时说：

“当您无论是需要一只手来保护您，或者需要一颗心来爱慕您的时候，请陛下召唤我。”^①

现在女王陛下召唤他了，她的游侠骑士也真一叫就到，他出来平息革命的浪潮，以骗人的镇静来麻痹群众，在宫廷里给克里斯蒂娜、圣路易斯和亲信们以避难之地，并大声宣称他对天真的伊萨伯拉所说的话坚信不疑。

大家知道，这位可信赖的女王——据说人们发现她的容貌和留下不好印象的斐迪南七世的容貌一年比一年更加惊人地相似——是在1843年11月15日宣布成年的。同年11月21日，她才满13岁。受洛佩斯之命做了她三个月监护人的奥洛萨加，组成了一个为奸党和在纳尔瓦埃斯初次胜利的影响下刚选出的议会所不喜欢的内阁。他想解散议会，并且争取到了一道由女王签署的授予他这样做的权力的敕令，但是其颁布日期空缺着。11月28日晚间，女王亲手把这个文件交给了奥洛萨加。29日晚间，他又和女王会谈了一次；但他刚一离开她，一位副国务大臣便来到他的官邸，通知他说他已被撤职，并且索回他强迫女王签署的敕令。奥洛萨加原是一个律师，为人极其机灵，他是不会这样轻易上当的。直到第二天，当他把敕令至少给一百个议员看过，证明女王签署的字迹是正常的以后，他才把这个文件退了回去。12月13日，新任首相冈萨雷斯·布拉沃召集两院的议长、马德里的主要名流、纳尔瓦埃斯、圣克鲁斯侯爵和其他人去谒见女王，使女王陛下得以就11月28日晚间她

^① 《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48年马德里版第58页。——编者注

和奥洛萨加的会见经过作了一次说明。这位天真的小女王把他们带进她接见奥洛萨加的那个御室，并且为了训诫他们，非常生动、但有些过火地表演了一幕小剧。她模拟奥洛萨加怎样闯上门，怎样扯住她的衣服，怎样逼她坐下，怎样执着她的手，怎样强迫她在敕令上签字，一句话，怎样侵犯了她的帝王的尊严。冈萨雷斯·布拉沃在她表演时记下了她的叙述，在场的人都仔细看了上述的敕令，敕令的签字看起来是由一只颤抖的手签上的，而且有涂改的痕迹。因此，根据女王的庄严的声明，应判奥洛萨加以侮辱皇上的重罪，不是处以四马分尸之刑，至少也得终身流放到菲律宾群岛。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奥洛萨加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接着就是 17 天的议会辩论，辩论所引起的轰动，比英国有名的卡罗琳王后诉讼案件²⁴³所引起的轰动还要大。奥洛萨加在议会里的辩护词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女王的话应当毫无怀疑地相信，那我就回答说：不！罪状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有，那么女王的话像其他任何话一样是证词，而我也可以用我的话来加以反对。”^①

在议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奥洛萨加的话比女王的话更有分量。后来他逃到葡萄牙，以躲开被派去谋杀他的刺客。这就是伊萨伯拉在西班牙政治舞台上的初次的轻跃舞步，是她的诚实的初次证明。也就是同一个小女王，现在埃斯帕特罗呼吁人民相信她的话，并且他这位“革命之剑”在经过 11 年的“造谣学校”^②的熏陶之后，表示愿意

① 特·麦·休斯《1845 年西班牙真相》1845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80 页。——编者注

② 理·谢立丹的著名喜剧剧名。——编者注

向她献出“保护的手”和“爱慕的心”。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8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对俄国堡垒的攻击²⁴⁴

看来,联军(法军和英军)终于准备真正进攻俄国了。帝国的前哨据点(奥兰群岛上的和黑海岸塞瓦斯托波尔的据点)必定先后甚至同时遭到攻击。在西欧甚至传说,奥兰群岛上的据点已经在短时间的炮击后被占领了。不过这些消息还需要证实。而且很可能是过早的估计。关于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还没有官方消息说行将开始,但是伦敦《泰晤士报》肯定地说,这个攻击将要开始,首都的人们也都相信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在瓦尔纳上船的只有法军和英军的两三个师,虽然估计他们将编入克里木远征军,但是他们也完全可能被用来围攻亚洲的俄国要塞阿纳帕。随着下一班轮船到达,这方面的疑团就可能消失。^①

从军事观点来看,对博马尔松德的攻击将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对蒙塔朗贝尔体系的穹窿式城防工事的第一次考验。根据要图和平面图来判断,这些堡垒虽然比赫尔辛福斯、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堡垒小得多,但是它们既可抵御军舰轰击,又同样可以抵御陆上攻击,而且它们都是严格遵照蒙塔朗贝尔的原则构筑的。对付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军舰的主要防御工事是一座爆炸弹所不能破坏的长堡，它配备大约100门火炮，并有防止侧射的临时性土质工事作为掩护；有两座巨大的塔楼（一座配备30门火炮，另一座配备10门火炮）来瞰制它，并且从后方掩护它。军舰通常主要是攻击主堡，而陆军是进攻塔楼。根据最近的材料来看，博马尔松德的守军比我们过去推测的要少得多：计有三千人多一点。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海上和陆上的攻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互相配合和支援，而不仅仅是同时开始，因为从海上攻击必须靠硬攻，这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胜负，而从陆地上对石质工事的任何攻击都必须预先进行工程作业，构筑至少一道平行壕和几座炮台，因而就需要时间。然而，这类问题只能就地解决。无论如何，从军事观点来看，人们对夺取博马尔松德的关注甚至比对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关注大得多，因为这可能有助于解决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只不过是久已制定的军事原则被顺利实行而已。

计划中的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主要由陆军进行，而舰队的行动几乎只限于对港湾进行完全的封锁。所以，整个行动就是从陆地和海上两方面封锁这个在向陆的一面设防不够坚固的海港。我们无法了解在城市和海湾的南面俄军可能构筑了什么工事。但是他们已构筑了多面堡和防线，联军只要不愿作出特别重大的牺牲，就必须对这些多面堡和防线进行正规的围攻，这一点恐怕是不能怀疑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大海湾以北正对着市区的高地上，构筑了一座永备的而且从各方面看来都构筑得很好的工事——一座巨大的四角形堡垒，每一面都有宽而深的壕沟，所有的突角上都配置白炮。这个高地是该城附近唯一从其他高地炮击不到、而本身又瞰制海湾和对面斜坡的制高点。当然俄军将在这里进行主要的抵抗。但是进攻者如

果没有夺下这一工事,即使攻占了南区的全部岸防工事,也未必能守住市区和港口。至少在这里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正规的围攻作业。大海湾的长度(由康士坦丁角到海湾东端)约为八英里;即使认为塞瓦斯托波尔市区和工事所占的面积不大,要从陆地上对它们进行封锁,联军仍然必须构成一个长达 22—24 英里的半圆形包围圈。而且,联军在所有各点都应有足够的兵力以抵御守军的出击和可能集中在联军后方的俄军的攻击。虽然我们不了解俄国可直接和间接用于防守黑海要塞的兵力有多少,但是上述的一些细节表明,要夺取这样一座要塞,将需要不少的部队。此外,克里木草原的致命的气候也将成为联军危险的敌人。在当前的攻击中,岸防炮台对俄军很难有任何作用,这就大大缩小了整个这次行动的军事意义,使之仅仅成为一次很大规模但决不是空前规模的围攻。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资料提到,用于这次行动的军队数量超过 10 万人,其中包括土耳其部队。如果考虑到上述全部情况,这样一支军队似乎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8 月
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8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撤出多瑙河两公国。——西班牙
事件。——丹麦新宪法。
——宪章派²⁴⁵

1854年8月8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月28日，哥尔查科夫公爵率领自己的主力军穿过了离克卢格雷尼约六英里的伊拉瓦村，于29日继续向福克沙尼推进。索伊莫诺夫将军指挥的前卫是由第十步兵师的八个营、托木斯克和科雷万的几个猎兵团和大公—皇太子的一个骠骑兵团组成的。这支前卫预定于本月1日在乌雷什蒂和克勒萨尼渡过雅洛米察河，这两个地方都已经架了桥。估计本月中可以到达福克沙尼。

土耳其军队分三路纵队前进。中路于7月29日到达克卢格雷尼；30日，土军前卫的侦察兵已出现在离布加勒斯特两英里的格林纳附近，按照预定计划，奥美尔帕沙的大本营应于8月1日设在格林纳。右翼沿阿尔杰什河往奥尔泰尼察到布加勒斯特的方向前进。左翼于28日到达莫吉纳附近，它应当取道斯拉蒂纳前往布加勒斯特。

《军报》说：

“看来俄军的撤退与其说具有政治性质，不如说具有战略性质。俄国将军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自己的部队集中在良好的阵地上，在多布罗加吃了苦头，在多瑙河左岸又吃了土军的苦头以后，现在他们在这里能够得到休整。他既靠近自己的给养基地，又继续占领着去年掠夺的很大一部分土地。而且，他还占据着甚至对优势兵力说来都具有威胁性的阵地。”

7月26日，布德贝格男爵发表了如下的告瓦拉几亚居民书：

“全俄国皇帝陛下，波兰王，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的保护者和一切信奉正教的人的保护者，已经决定暂时把帝国军队从对健康不利的多瑙河地区撤回，使他们驻扎在对健康有利的丘陵地区。敌人目光短浅，认为我们撤退是由于害怕他们，因此企图攻击我们撤退的军队。但是，总司令哥尔查科夫公爵刚刚发出反击的命令，他们就可耻地逃跑了，丢下了武器和弹药，这些武器和弹药都被我们英勇的士兵缴获了。当比较有利的季节到来时，我们将拿着武器回到你们这里来，以便永远把你们从野蛮的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为了使敌人不至认为我们是在他们面前逃跑，我们的撤退将小心谨慎，不慌不忙地进行。”①

有趣的是，1853年，同样是在7月，俄国人根本不认为这个季节对占领瓦拉几亚是不利的。德国报纸上发表的一封加拉茨来信说：

“保加利亚的一些住户正在从多布罗加不断地向外迁移。大约有1000户赶着15万头牲畜在列尼附近渡过了河。”②

俄国人借口避免土耳其人进行报复，号召居民实行的这种“自愿的向外迁移”，按性质来看，倒非常像奥地利的“自愿”公债。《纪事晨报》驻维也纳记者报道说，这些住户

“知道了他们将在摩尔多瓦修筑堡垒以后，都想返回家园，但是哥萨克用武

① 1854年8月7日《总汇通报》第219号。——编者注

② 1854年8月5日《纪事晨报》第27337号。——编者注

力强迫他们到福克沙尼去，现在他们正在那里挖战壕”。①

马德里的街垒刚刚按照埃斯帕特罗的要求清除掉，反革命就急急忙忙采取行动了：反革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让克里斯蒂娜女王、萨尔托里乌斯和他们的同谋不受惩罚。接着成立了由温和派的奥当奈尔担任陆军大臣的内阁，同时全部军队都交给纳尔瓦埃斯的这位老友掌握。在内阁名单上有帕切科、路汉、唐·弗朗西斯科·圣克鲁斯这样一些名字，他们都是纳尔瓦埃斯的人所共知的拥护者，此外，帕切科还是臭名昭彰的1847年内阁²⁴⁶的成员。另一个是萨拉查，他所以被任命仅仅因为他是埃斯帕特罗童年的朋友。为了酬答人民在街垒和广场上遭到的血腥屠杀，授予了拥护埃斯帕特罗的将军们和奥当奈尔的温和派朋友无数的勋章。为完全封住报纸的嘴铺平道路，恢复了1837年的新闻出版法。据说，埃斯帕特罗打算不召开制宪议会，而只根据1837年宪法（据一些人说，甚至是根据纳尔瓦埃斯修改过的宪法）召开议院会议。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所有这些措施和即将采取的其他措施获得成功，在马德里附近集中了大批军队。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反动势力采取行动的突然性。

街垒司令官们最初到埃斯帕特罗那里去就内阁的人选问题向他提了几点意见。埃斯帕特罗喋喋不休地解释他从各个方面遇到的困难，企图为他提出的任命进行辩护。但是人民的代表看来对他的解释很不满意。与此同时，传来了在巴伦西亚、卡泰罗尼亚和安达卢西亚发生了共和派骚动的“令人非常不安的”消息。从埃斯帕特罗批准各省洪达继续行使职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他已不知所措。他也不敢解散马德里的洪达，虽然他的内阁已经组成，并且已经就职。

① 1854年8月5日《纪事晨报》第27337号。——编者注

根据小拿破仑的要求，沙尔腊斯上校已被赶出比利时。《比利时独立报》驻巴黎记者报道了炮弹国王^①王位的追求者缪拉特亲王(他认为这个王位是缪拉特家族的法定遗产)所写的并由他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已被译成了意大利文。

丹麦内阁仍然坚决拒绝向西方强国提供能使它们的军队在波罗的海过冬的港口和登陆地点。但是，这并不是丹麦政府对那些起来反对丹麦的保护者——俄国皇帝——的西方强国表示轻蔑的唯一方法。丹麦政府面对着西方强国的舰队和陆军，毫不动摇地实行了它策划已久的完全是为了俄国利益的政变。7月26日，在哥本哈根公布了一个政府文件，标题是：“丹麦君主国一般事务方面的宪法”。奇怪的是，英国报纸几乎完全没有理睬这个措施。因此，我现在把丹麦这个新宪法的最重要条款列举出来：

第一条 丹麦君主国的王位继承按1853年7月31日的法律确定。

第五条 凡没有明确规定属于某一部门的事务，均属君主国的一般事务。

第六条 君主国的总支出超过收入时，按下列比例补偿：丹麦担负60%，石勒苏益格担负17%，荷尔斯泰因担负23%。

第七条 君主国的一般事务由议会管理。

第八条 现届议会完全由国王任命的议员组成。将来的议会议员应当部分地由选举产生。

第十条 那时议会将由50名议员组成；其中20名由国王任命，30名按下列比例选举：18名由丹麦各界代表会议选出，5名由石勒苏益格各州选出，6名由荷尔斯泰因各州选出，1名由劳恩堡骑士等级选出。

第十一条 1849年6月5日颁布的丹麦王国的根本法只适用于该王国的事务。

第十五条 议会议员的年薪为500塔勒。

①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第十六条 议会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会期由国王的命令规定。

第十七条 议会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但是国王可以改变会址。

第十八条 议会的工作由国王任命的主席主持。辩论可以使用德语或丹麦语；决议必须用丹麦文书写。

第十九条 议会的工作是保密的。

第二十一条 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改变或废除全君主国的任何共同捐税，也不得举借任何国债。

第二十二条 除了联合君主国的财政以外，议会对一切事务只有发言权。”^①

同一天颁布的法令规定在 1854 年 9 月 1 日召开议会，而在另一个法令中公布了国王任命的议员，被任命的都是宫廷的达官显贵和丹麦国旗骑士团的骑士。

通过这次新的政变达到了以下几个主要目的：废除丹麦的根本法和代议机关，建立了一个便于宫廷和政府得到它们需要的足够数目款项的机构。

厄内斯特·琼斯又到各工业区去作宣传旅行，以便鼓动它们投入宪章运动。在他访问过的哈利法克斯、贝克普和其他地区，通过了如下的递交议会的请愿书：

“在 1854 年 7 月 30 日（星期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贝克普的国民谨向在议会开会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极可尊敬的下院议员呈递请愿书如下：

你们的请愿者长时期仔细地观察了现在女王政府大臣们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并且根据冷静的观察深信，在这两方面他们都根本不值得国家的信任。

你们的请愿者深信，只要这些人继续管理国家事务，国内状况就不会有所改善，对外的威力也不会显示出来。

所以，你们的请愿者请求你们极可尊敬的议院奏请女王，敬请女王陛下解除她现在的顾问们的职务，并且召唤那些更符合时代进步精神、更符合我们时

^① 《关于实施丹麦君主国为议会事件而制定的法律的命令》，见 1854 年 8 月 4 日《总汇通报》第 216 号。——编者注

代要求的人来辅佐她。

你们的请愿者恳求接受上述各点。”^①

星期天，在贝克普的迪尔普利-摩尔举行了群众大会，这位鼓动家在会上发表的演说是他生平所发表的最出色的演说之一；其中有几段值得贵报予以转载：

“行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现在进入了英国的宪章运动自衰退以来不曾有过的复兴时期，我们争得宪章的时刻终于临近了……”

你们进行过反对降低工资的斗争，但是徒劳无益；饥饿迫使你们造反；贫困是你们的老师，而饥饿则是你们的教练；每经过一次失败，你们的聪明才智就提高一步。起初你们采用的方法是组织联合会和举行罢工，你们以为这些方法会使你们获得解放，但是你们忘记了，既然劳动资料不属于你们所有，你们就没有与资本家抗衡的手段，他们万无一失地收好自己的钱袋，眼睁睁地瞅着你们的肚皮，看谁能坚持得最久。你们原以为缩短工作时间会好一点，而且有人对你们说，如果每个工人少工作两小时，就可以为完全没有工作的人找到两个小时的工作。但是，你们忘记了，当你们争取到把工作时间缩短百分之一，垄断资本家采用机器装备的程度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以后，你们求助于合作社。你们了解到一个伟大的真理，劳动的解放应当依靠合作社，但是你们忽略了保证这种解放的手段。如果你们进行生产，你们就需要市场；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要卖出去，你们就需要一个想买这种东西的人，——但是你们忘记了，你们眼前没有这样的人。合作社开始生产了，但是市场在哪里呢？你们究竟在哪里找到市场呢？怎样才能使贫者变成富者，使他们能够成为合作社生产的产品的购买者呢？对于不列颠的加利福尼亚人来说，他们的黄金就在地面上，染黄了田野上的滚滚麦浪。瞧瞧你们脚下吧！在这里，在你们所坐的绿草如茵的堤岸上；在这里，在你们所站的宽广的田野上，——在这里蕴藏着自由，在这里蕴藏着合作社，在这里蕴藏着高额工资，在这里蕴藏着繁荣与和平！我们不列颠现在有1 500万英亩公有土地，有2 700万英亩未开垦的草

^① 《贝克普居民给议会的请愿书》，见1854年8月5日《人民报》第118期。——编者注

原。根据希腊神话，当海格立斯同大地的儿子巨人安泰斗争时，海格立斯常常把他摔在地上，安泰每次都倒在母亲怀里，从母亲身上汲取新的力量，因而跳起来比以前更加有劲。海格立斯窥破了这一点，就把他举到空中，结果便战胜了他。

垄断组织-海格立斯也正是这样使劳动巨人同产生了他的大地分离开来，用竞争的魔爪把他紧紧掐住，使之变得软弱无力，无依无靠，像穆罕默德的坟墓一样吊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只是更接近后者！

究竟怎样才可以接近大地呢？有人对你们说，为了这个目的根本不需要政权。是谁这样说的呢？莫非是缩短工作日 10% 运动、十小时工作日运动、缩短工作时间运动、限制机器运动、丧葬会社运动、合伙运动、慈善团体运动、政教分离运动、教育运动、市政运动以及其他种种运动的领袖说的？‘运动’多么纷繁，而我们却还没有运动起来。不需要政权吗？可是，为什么这些人又那样喜欢围绕着政客蒂德·普拉特跳舞，为什么他们把哀求的代表团派到政客帕麦斯顿那里去并向政治性的议会呈递请愿书呢？为什么要向政治王位卑躬屈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也应当争取政权！只有这些人才劝你们为你们的敌人争取政权。可是我要劝你们去争取自己的政权。我告诉你们一个伟大的真理：

宪章是万应灵丹。

是谁反对我们呢？首先是联合内阁。联合内阁是什么呢？是那些一个也单独站不住脚的派别的领袖。这十来个人极其软弱无力，自己不能站立，因此，他们互相依靠，而他们加在一起最后也抵不上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联合。还有谁反对我们呢？反对托利党，它也许能赶走他们，可是不敢这样做，因为它知道，它自己也将被赶走，以后便会出现大洪水，在这场洪水中连挪亚本人也不能挽救统治阶级。还有谁呢？土地贵族，他们把四分之三的领地按照三分之二多一点的价格抵押出去，——这是能够镇压人民的多么强大的力量啊？38 000 名破产的地主和 30 万在高额地租、狩猎法和地主暴虐的压迫下呻吟的农场主。还有谁呢？还有由于自己卑鄙地热衷于竞争而濒于破产的工业巨头，——他们很快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工厂了。这是要从你们脚下把自由的基础捣毁的强大的势力！剩下的是什么人呢？工人和小店主。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在妥协的基础上把他们联合起来。我本人过去始终反对这种联合，因为在选举权问题上的妥协只能加强金钱利益和改善阶级立法。但是，现在实行联合的时候终于来到了，现在既不需要妥协，也不需要叛卖。小店主很快就会成为民主派。据说，通往工人头脑的道路要经过他的胃。是的！可是，通往小店主的心脏的道路却要经过他的口袋。他每少拿一先令，就获得一种新的思想。破产向他揭示出真理……

我们敌人的道义力量就这样被消灭，而我们则获得新的同盟者。我们敌人的物质力量也在消失。沙皇曾对这一点表示关心！在爱尔兰还剩下不到1 000名士兵！在英格兰已经没有常备军，而只有民军！那是什么民军啊！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民军中开小差现象之多弄得‘追捕的喊叫’已经无济于事，于是把专门的通告分发到甚至逃兵曾呆过一星期的每一个小教区，每一个地方，看用暴力和恫吓能否迫使他们归队。我祝贺政府拥有自己的新的军队。总而言之，战场是干净的，——对人民有利的时机到来了。不要由此设定，我指的是暴力。不是！绝对不是！我们指的是伟大的、和平的道义运动。但是，如果说我们指的是道义力量，那么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敌人也指的是这种力量。

英国已经开始在考虑和倾听。在这以前，它听到的是波兰的战鼓声和匈牙利的马蹄声。在这以前，它听到的是米兰的叫喊声和巴黎的欢呼声！但是，在目前的暂时的沉寂中，英国开始听到它自己的骄傲的心脏的跳动声，——并且高呼：‘我也要完成一桩事业——消灭敌人和夺取战场。’^①

大会主席指出有警察局的监视人和其他人员到会，希望政府雇用的这些人在报告中对会上的讲话不要进行任何歪曲。对这个警告，厄内斯特·琼斯说道：

“至于我个人，我丝毫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随便他们说去好了。我进行鼓动就像战士投入战斗一样，——置生死于枪林弹雨之中：或者倒下、牺牲，或者活着、取胜，因为我是一个民主战士。”^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月
8日

载于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① 厄·琼斯1854年7月30日的演说，见1854年8月5日《人民报》第118期。——编者注

卡·马克思

*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
——波兰。——西班牙人民的要求²⁴⁷

1854年8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昨天的《通报》报道说，

“俄国驻维也纳公使通知奥地利内阁说，尼古拉皇帝已下令全部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尽管有了这一声明，布奥尔伯爵仍于本月8日跟布尔克奈男爵和威斯特摩兰勋爵交换了照会，根据照会可以看出，奥地利像法国和英国一样认为必须要求俄国保证不再制造破坏欧洲安宁的纠纷，而且除非获得这些保证，在普遍和平没有恢复之前不同彼得堡内阁缔结任何协定”。

这些保证应当是什么样的，可以从今天的《泰晤士报》看出来。第一，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第二，以全欧的保护权代替俄国的保护权；第三，

“修改海峡条约并采取必要措施使俄国的海上优势缩减到不致威胁土耳其的生存和黑海海域及多瑙河口的航行自由的限度”。

《通报》的消息基本上由克拉伦登勋爵在昨天上院会议上的声明证实了。从其他方面我们也了解到，俄军的司令部已转移到布泽乌，

俄军四个团已渡过普鲁特河，奥地利政府方面也撤销了调几个军去增援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加利西亚边境上编排成梯队的各个部队的命令。

战史上未必有过比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更奇特的行动了。事实是，这种行动只能从外交的，而不能从战略的观点上找到解释。正如《论坛报》已经讲过的，奥地利和俄国拟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旦沙皇的虚荣心由于夺得锡利斯特里亚而得到满足，奥地利人就应当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在一项条款中已预计到俄国失败的可能，根据这项条款，奥地利在俄国失败时也应当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因此，在俄国人解除对锡利斯特里亚包围的前一天，土耳其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条约¹⁹³，规定奥地利有权进入瓦拉几亚。条约有三个目的：不让土耳其进入多瑙河两公国；“沿整个奥地利边境建立一道防止革命瘟疫的防疫线”；最后，保证俄军安全退却。我们从克拉伦登勋爵的供认中可以把握地得出结论说，这个条约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强加于土耳其政府的——国务会议同时颁布了一项命令，让俄国人在撤退时不受追击。可见，俄军从多瑙河的仓促撤退如果不是俄奥协定规定好的，那就无从解释了。奥地利人原定7月3日把军队开进瓦拉几亚。为什么他们又延期了呢？原来他们在争取土耳其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让步：首先是关于应在瓦拉几亚建立的政体问题；其次是关于把土耳其人排挤出他们自己的领地问题。随后奥地利人声明，他们占领瓦拉几亚并不意味着宣战。克拉伦登勋爵说：

“6月底，当俄军准备撤出瓦拉几亚时，奥地利政府派了赫斯将军司令部的一位军官通知联军各司令官说，奥地利政府打算代表苏丹并且为了恢复苏丹在该地的权力而占领瓦拉几亚的一部分领土；但是，奥地利人将不是作为交战的一方进入该地，因为奥地利同俄国不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它还未收到它向俄国

提出的要求的答复。”①

奥地利的这种极不明智的坦率引起一场混乱，于是需要再度延期。接着是忌妒奥地利在多瑙河扩张势力范围的普鲁士提出抗议。虽然这两个大邦都是俄国的工具，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妨碍他们经常互相忌妒，这一点充分表现在1850年的“马铃薯战争”²⁴⁸中。如果乌尔卡尔特先生仔细读过当年的华沙议定书²⁴⁹，他就不会产生把普鲁士突然变为反对俄国的欧洲堡垒的妄诞念头。

已经开始撤退的俄军一看到奥地利错过有利的时机，便又折回来重新向多瑙河推进，因为，如果在奥地利采取行动以前就从瓦拉几亚撤退完毕，那么以后他们就没有任何借口进入这个公国了。可是这时鲁斯楚克的一位土耳其将军②——用《泰晤士报》的话说——“想象”俄军正在全线撤退，于是向久尔杰沃进军并给他们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不可能实现任何重新占领多瑙河一线的企图。由于这次失败，俄军不得不认真考虑撤退问题；促使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是他们发现：土耳其的所谓盟国不可能再消极下去，英国政府将不得不顺从它的军队和公众而采取某些反对俄军的行动。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增强了俄军在比萨拉比亚和克里木的防御力量。例如，我们从一则电讯中得知，俄军在比萨拉比亚和赫尔松的几个团即将火速调往克里木，并由驻摩尔多瓦的几个团来接防。

可以预料到，土军不会坐失良机。本月6日，他们的前卫在伊斯肯德贝伊的指挥下进入布加勒斯特，土耳其将军在土耳其的敌人1853年进入这个城市的一周年纪念日接见了瓦拉几亚首都的代表团。

① 1854年8月11日《泰晤士报》第21817号。——编者注

② 奥美尔帕沙。——编者注

这样奥地利人又错过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并且丧失了进入瓦拉几亚的虚假借口。此时再去占领必然会使他们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因此,当奥地利报纸痛斥土耳其人向布加勒斯特进军的行动违反了条约时,英国官方报刊却痛斥奥地利人自己由于行动迟缓和愚蠢而使制订得如此周密的计划化为泡影。例如,星期四的《泰晤士报》就写道:

“奥地利人由于拖延失去了在多瑙河两公国能够取得的地位的全部利益。奥美尔帕沙利用了这个机会并且紧跟着撤退的敌人前进。瓦拉几亚的大部分土地现在已被苏丹的军队占领。多瑙河从奥尔绍瓦到加拉茨一线已在他们的手中,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哪一个外国能要求土耳其司令官退出他按照主人的权利并且依靠他的军队的英勇所占领的地区。”

现在留给奥地利人去做的,就只是占领摩尔多瓦。

7月30日从君士坦丁堡来的电讯提到的几乎全是计划中的对克里木的远征。一支由20艘舰艇组成的分舰队在布律阿海军上将的指挥下并在布朗和康罗贝尔两位将军的随同下,于7月21日离开巴尔奇克去侦察从阿纳帕到塞瓦斯托波尔一带的海岸。27日,这支舰队返回原地。康罗贝尔和布朗返回后立即前往瓦尔纳,向圣阿尔诺和拉格伦勋爵报告他们执行任务的结果。英法军队分散在瓦尔纳和库斯坦杰之间,以便于在不同的港口登船。看来,登船已在7月29日或30日完成。土耳其舰队已经驶入黑海,全部英法海军必定已经在瓦尔纳所处的纬度的海域集中了,因为在本月1日该地集结了大批军用运输船。关于这些军队的使命,《南方日报》说:

“一些人谈到阿纳帕和附近的要塞,说在这些要塞中总共驻有大约两万人,攻占这些要塞立即就可以在阿布哈兹、切尔克西亚同克里木之间建立交通线;这样一来,切尔克斯人就会很容易地参加对克里木的任何进攻。另一些人认为进攻的目标将是敖德萨,目前该地集中的守军约四万人;联军将要在这一带修筑工事以便过冬,同时一方面威胁比萨拉比亚,另一方面威胁克里木。第三种观

点认为，尼古拉耶夫将成为进攻点，因为该地有俄军的军火库，而且该地位于东临第聂伯河、西临布格河的三角形地区。”

多布罗加已被俄军完全放弃，现在已由 36 000 名土军和法军占领。土军驻扎在巴巴达格，据说已接到进攻图尔恰的命令，而法军也将进攻加拉茨。

据传，俄国人在苏利纳河口建设的一个小镇（先前就已经遭到部分破坏）在 7 月 16 日被英国蒸汽舰喷火号和维苏威号完全摧毁，除一座灯塔和一所教堂之外，其他建筑物无一幸免。

在白海，英国人在奥涅加湾海岸的某个地点登陆并毁掉了一个村庄。

黑海的弗拉基米尔号事件²⁵⁰引起了《泰晤士报》对邓达斯海军上将的猛烈攻击，《先驱晨报》对此作了如下的回答：

“查理·纳皮尔爵士在波罗的海上可以让斯韦阿堡舰队畅行无阻地驶到它的停泊地，可以让汉科修筑坚固的工事，从而使它经受得住任何袭击，可以容许浮标被去掉因而使船只搁浅，而《泰晤士报》对他却不置一词。但是，对于邓达斯海军上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从本月 9 日巴黎的来信中知道，东方的军队将增加 5 万名法国军人。如果战争不会带来任何别的好结果，那么至少能使法国摆脱掉十二月分子的军队。

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俄皇自从在土耳其受挫以来已经重新开始使用波兰王的封号，这一封号他在匈牙利取得胜利后曾经当作废物加以舍弃，因为他以为波兰的合并已是既成事实。我们在维也纳《新闻报》发表的 8 月 1 日的华沙来信中读到：

“据说，沙皇行将前往华沙，这表明将在民族权利方面对波兰人作某些让步。据

说,将召开 1832 年的波兰王国组织法²⁵¹中提到过的著名人士会议。据说,将重新开办公共教育机构,将颁布在官方法令中使用波兰文、每年公布收支情况和波兰人有权批准直接税的命令。同时还传说,波兰军队将重新建立起来,但是由俄国军官指挥。第四次新兵招募工作刚结束,居民们还从来没有过这样重的负担。”

我们在 8 月 7 日的《杜塞尔多夫日报》上也读到:

“据华沙消息,波兰王国的总督里迪格尔将军曾建议波兰贵族首领向国王呈递一份要求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请愿书。”

形形色色的党派提出过解决波兰问题的许多办法,但是像这位俄国将军所建议和规定的这种解决办法,是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过的。

哥本哈根来的消息说,低能的丹麦国王在内务大臣德·蒂利希先生的陪同下已乘船前往卡尔斯克鲁纳同瑞典国王会晤。蒂利希是俄国的最狂热的拥护者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两国国王会晤的目的是要恢复所谓北方武装中立这个与俄国共同签订的公约⁵。如果丹麦和瑞典打算对俄国保持中立,那么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对英国和法国也打算持同样的立场,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几天以前,丹麦的炮兵司令梅萨将军在检阅国民自卫军的炮队时发表了一篇非常激昂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暗示说,国王号召国民自卫军的炮队同陆军的炮兵部队一起来共同保卫斯堪的纳维亚祖国的日子可能已经不远了。

议会将于明日休会。

“这一次议会会议值得注意之处在于解决问题的拖拉,正如克里木战役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军事行动的迟缓一样。”

几天以前,《喧声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正在紧张作战的西班牙人民和在他们上空互相拥抱的两个骑手——埃斯帕特罗和奥当

奈尔。《喧声报》把仅仅作为革命的开始的现象错当作革命的结束。奥当奈尔和埃斯帕特罗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这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斗争,而且是军事首领和人民之间的斗争。任命斗牛士普切塔为屠宰场的总管、成立奖励街垒战参加者的委员会以及指定两个法国人皮若尔和德尔马为当前革命的历史编纂者,这一切对政府都没有多大裨益。奥当奈尔希望根据 1845 年法律²⁵²选举议会,埃斯帕特罗希望根据 1837 年宪法²¹¹选举议会,而人民却希望根据普选权选举议会。人民拒绝在政府政纲发表之前放下武器,因为在曼萨纳雷斯宣布的政纲^①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了。人民要求取消 1851 年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²⁵³、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提出财政报告、废除一切铁路建设的合同和其他有关公共工程的欺骗性的合同以及由特别法庭审判克里斯蒂娜。她两次试图逃走均因遭到人民的武装抵抗而失败了。《论坛报》开出了她必须偿还国库的如下账目:从 1834 年到 1840 年期间她作为摄政女王非法获得的 2 400 万,她出国三年从法国回来后得到的 1 200 万和从古巴国库提取的 3 500 万。这个账目还是相当客气的。要知道,当克里斯蒂娜 1840 年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她带走了巨额款项和西班牙国王的几乎全部珠宝。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11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409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
——马德里报刊²⁵⁴

1854年8月15日星期二于伦敦

《科隆日报》报道：

“美国政府经过多年的谈判后宣称不愿续订它同丹麦之间的现存条约，如果该条约的第五款不改为允许一切美国船只自由通过松德海峡的条款的话。同时美国政府拒绝给予任何补偿。丹麦在美国的这些措施的威胁下向其他强国求援，据说普鲁士政府表示愿意派遣两万士兵去保卫松德海峡。”

因为松德海峡征收的关税对哪个国家也没有像对普鲁士那样重，所以据说是普鲁士采取的这项措施，是再符合普鲁士政策的精神不过的了。总而言之，即令这不是实情，也算想得好。

法兰克福议会经过长期讨论公布了新的新闻出版法和结社法。结社法干脆禁止任何政治性的会议或集会，新闻出版法则规定了巨额的保证金，规定任何出版物的发行均需经政府的许可并且取消了由陪审法庭审理有关破坏新闻出版法的案件。

普鲁士政府中止了对拖延已久的柏林革命者的密谋²⁵⁵案件的

审理，因为检察官宣布揭发被告的主要证人——亨策先生——“值得怀疑”。这位亨策就是那个在科隆案件²⁵⁶中，根据他的证词而使我的许多朋友在1852年被判徒刑的人。但是现在已经不是1852年了。普鲁士政府可能也不愿意冒险让它所有的警探再遭痛骂，以及让人们在反革命恐怖已经不能再威胁人民的时候在首都追忆起科隆案件。

8月1日，塞尔维亚政府派了一个信使带着准备好的对土耳其政府指令的答复前往亚历山大公爵正在进行水疗的布雷斯托瓦茨。这项答复经公爵签署后即刻发往君士坦丁堡。答复推说因为塞尔维亚面临许多危险，所以不能裁军，但是指出，为了尊重奥地利的愿望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军事演习已经停止。根据贝尔格莱德的总督伊塞特帕沙本人的请求，他已被召回国。他的继任者尚未公布。

据报道，有一万名土军占领着布加勒斯特；但同时，我们在今天的《通报》上读到，奥地利等奥美尔帕沙对卡利克上校的最近通知的答复一到，就要命令奥地利军队进驻多瑙河两公国。当布奥尔伯爵接到哥尔查科夫公爵关于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通知时，他答复说：“奥地利军队将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但这种占领对俄国并无任何敌意”。

1854年议会的休会又使东方问题回到1853年议会休会期间所处的那个阶段。维也纳会议²⁶又将开始工作，以便使积极的活动完全停顿，使舆论受到迷惑，并让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又有可能在议会复会时说：君子之心是不会轻易产生怀疑的。应当指出，这次骗局不是出自奥地利，而是出自英国自己，这点你们可以从《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的报道中看出：

“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通知布奥尔伯爵说，他们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建议召开维也纳会议，答复据说是：再没有能令帝国宫廷更高兴的事了。”

作为会议中新的谈判的基础的是维也纳照会⁶⁴的一个新方案，即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对涅谢尔罗德先生的最近通知的复文；这个通知的要点与我在最近的一篇通讯中根据对《泰晤士报》上列举的条件的分析而预料的内容没有多大的不同，这里没有一字提到向土耳其、甚至是向盟国赔款的事。俄国所夺取的对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应当变为由欧洲夺取的保护权；对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的“保护权”也应当同样处理；土耳其的胜利成果应当只限于奥地利在多瑙河上的自由航行以及对1841年的条约¹⁵的有利于各强国而不利于土耳其的修改。

克拉伦登勋爵星期四的发言（其要点我已经报道过了）是对英国内阁在东方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揭露。克拉伦登直言不讳地说：

“我想提醒你们，在四个多月以前，即3月29日就宣战了，当时大家都以为——我这里指的不是女王陛下的政府，而是英法两国那些最有才干、最有经验的军官，——俄国正想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谁也不认为，俄国既然在多瑙河以北集结了重兵，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集中了大量的必需物资，却无意南进——相反地，大家都认为，俄国确实有意这样做。虽然我们并不怀疑土耳其人的闻名的骁勇，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相信他们能够抵抗受过良好训练而数量上又占优势并由一些最有经验的将军指挥作战的俄国军队，何况，我们只知其名的唯一的土耳其将军——奥美尔帕沙，当时还没有遇到使他此后获益匪浅的那种可以奠定他的不朽的名望和声誉的机会。法国政府和我们对这一点如此深信不疑，以致约·伯戈因爵士和法国的一个富有经验的工程部队军官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设法防卫这个首都和达达尼尔海峡；人们认为，他们的使命的意义是如此重大，整个战役计划和这次使命如此息息相关，以致拉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元帅都耽擱下来，以便能够亲自和被派去执行这个使命的军官们交谈。后来，联

军便开赴匆匆构筑了庞大工事的加利波利。他们开赴君士坦丁堡,时刻不忘必须保卫达达尼尔海峡。”^①

可见,当时盟国的全盘计划是让俄国长驱直入占领土耳其各省,而让联军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英法军队拖延时间和进行种种被误解的调动的原由。土耳其军队的英勇打乱了俄、英、法三国的这一计谋当然是“出乎意料的”。

在目前的西班牙革命爆发前几个月,我曾告诉本报的读者说,俄国的影响正在激起半岛上的骚动。为此,俄国并不需要直接的代理人。它有突然对伊萨伯拉女王和西班牙宫廷的可怕的失道寡义表示愤怒的《泰晤士报》——炮弹国王^②、奥地利的“年轻的希望”^③、尼古拉和乔治四世的拥护者和朋友——为它效劳。此外,还有一些英国内阁的外交代表,而亲俄派大臣帕麦斯顿用几幅半岛上的科堡王国的图画²⁵⁷,就能毫不困难地将他们迷惑住。现在可以肯定,不是别人,正是不列颠大使把奥当奈尔藏在自己的府邸,并说服现任财政大臣、银行家科利亚多支付奥当奈尔和杜尔塞发动声讨所需的款项。如果谁对俄国真的已经插手半岛事务有怀疑,我可以提醒他回想一下莱昂岛事件。1820年,在加的斯集结了大批军队准备开赴南美殖民地。驻在岛上的军队突然宣布拥护1812年宪法,其他地方的军队纷纷效法。我们现在从参加维罗纳会议²⁵⁸的法国大使夏多勃里昂那里获悉^④,俄国曾经怂恿西班牙远征南美洲,并强迫法国进军西班牙

① 乔·克拉伦登 1854年8月10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③ 弗兰茨-约瑟夫。——编者注

④ 参看弗·夏多勃里昂《维罗纳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两卷集)1838年巴黎版。——编者注

牙。另一方面，我们从美国总统的咨文²⁵⁹中得悉，俄国曾向他保证要阻止对南美洲的远征。因此，不用太多的判断力就可以推断出莱昂岛上起义的主谋者。但我也可以举出另一个说明俄国对西班牙半岛上的骚动非常关切的例子。德·马尔利安尼先生在他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9年巴塞罗那版)一书中，为证明俄国没有理由反对西班牙的立宪运动，这样写道：

“在涅瓦河上可以看到向宪法(1812年)宣誓并从俄国皇帝的手中接受旗帜的西班牙士兵。拿破仑在对俄国进行的罕见的进军中，曾把拘留在法国的西班牙战俘编成一个特别军团，法军失败后，这个军团投向俄国阵营。亚历山大盛情地接待了这些西班牙人，让他们驻扎在彼得戈夫，皇后常去看他们。有一天，亚历山大命令他们集合在封冻的涅瓦河上，让他们宣誓效忠西班牙宪法，同时授给他们皇后亲手绣制的旗帜。从那时起命名为‘亚历山大皇帝’军团的这个军团，在喀琅施塔得登船并在加的斯登陆。这个军团1821年在奥卡尼亚举行了争取恢复宪法的起义，证明了他们对涅瓦河上的誓言的忠诚。”

俄国在比利牛斯半岛通过英国进行阴谋活动，同时却在法国面前谴责英国。譬如，我们在《新普鲁士报》上就读到英国背着法国策动了西班牙革命这种说法。

在西班牙引起骚动对俄国有什么利益呢？在西方进行牵制，挑起英法之间的分歧，最后引诱法国进行干涉。英国的亲俄派报刊已经报道，法国六月起义者在马德里修筑了街垒。在维罗纳会议上也有人曾经对查理十世说过类似的话：

“西班牙军队所创造的先例，已为葡萄牙人效法，并推广到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而且在各地树立了军队干涉改革措施和以武力强迫本国接受某些法律的危险榜样。皮埃蒙特发生起义后，法国的里昂和其他地方立即就发生了追求同样目的的运动。第四十五团的25名士兵在拉罗谢尔参加了贝尔通的密谋。革命的西班牙把一些可怕的捣乱分子再转给了法国，于是两国的民主派便携手共

同反对君主制度。”^①

我们是说西班牙革命是由英国的亲俄派制造的吗？绝不是。俄国只是在知道革命危机已经来临的时候促进混乱。但是，此后开展的真正的人民运动总是同样地既反对俄国阴谋又反对本国政府的专制行为。1848年瓦拉几亚的情形是这样，1854年西班牙的情形又是这样。

英国的狡诈在英国驻马德里大使豪登勋爵的行动中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在离开英国返任之前召集了持有西班牙债券的人，号召他们迫使政府满足他们偿付债券的要求，如果遭到拒绝，就宣称他们将完全拒绝贷款给西班牙商人。他就这样给新政府制造了困难。他到马德里后，立即向街垒战的死难者捐了款，以此来博得西班牙人民的好感。

《泰晤士报》指责苏莱先生为了美国现政府的利益策动了马德里的起义。苏莱先生绝没有在《泰晤士报》上写过文章反对伊萨伯拉二世，赞成兼并古巴的党派也没有从革命中捞到什么好处。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倒是德拉孔查将军被任命为古巴岛的军事总督这件事。这位将军曾经是阿尔瓦公爵同苏莱先生的儿子决斗时的助手之一。如果以为西班牙自由派多少同意英国自由派科布顿先生的放弃殖民地的看法²⁶⁰，那就错了。1812年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把选派代表的单一制列入新法典来保持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²⁶¹。1811年，西班牙人甚至装备了一支由在西班牙当时唯一没有被法国占领的省份加利西亚招募的几个团组成的大规模武装力量，以便把他们的南美政策同强制手段结合起来。不放弃所有属于西班牙的殖

^① 《西班牙危机》1823年伦敦第2版第59—60页。——编者注

民地几乎是这个宪法的最重要的原则，今天的革命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社会活动家的行为都没有像在这次为了“道义”而发动的革命中表现得这样无耻。组成西班牙现政府的旧党派（埃斯帕特罗派和纳尔瓦埃斯派）的联合，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分赃——官职，地位，薪俸，头衔和勋章——上面。杜尔塞和埃查圭已经到了马德里，塞拉诺也请求允许他来，以便在掠夺中得到各自的一份。在温和派和进步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大争吵：前者的罪状是委任了所有的将军，后者的罪状是委任了所有的政治领袖。为了平息“贱民”的激愤，斗牛士普切塔从屠宰场总管提升为警察局长。就连十分温和的《人民呼声报》也流露出失望情绪。

“如果将军们和领袖们拒绝升官，树立大公无私的崇高榜样和遵守革命所宣布的道义原则，他们的行为就会更加令人钦佩。”

分赃的卑鄙无耻也反映在大使职务的分配上。我不打算谈奥洛萨加先生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他在1843年作为埃斯帕特罗驻这个宫廷的大使时，曾同路易-菲利浦、克里斯蒂娜和纳尔瓦埃斯勾搭在一起搞阴谋；也不打算谈亚历山大罗·蒙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他在1844年当过纳尔瓦埃斯的财政大臣，以及里奥斯-罗萨斯被任命为驻里斯本大使和帕斯托尔·迪亚斯被任命为驻都灵大使——他们两个都是温和派的极其低能的分子；我只打算谈谈冈萨雷斯·布拉沃被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一事。他是西班牙的腐败的化身。1840年，他创办了《闲谈》杂志。一种类似马德里的《笨拙》的杂志。他在这里对克里斯蒂娜进行了极其激烈的攻击。过了三年，对官职的追逐使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温和派。纳尔

瓦埃斯在需要一个顺从的工具时，曾利用他作西班牙首相，后来，一当不用这个人也行的时候，就一脚把他踢开。布拉沃作首相时，曾任命一个叫卡拉斯科的财政大臣，这个人简直抢劫了西班牙的国库。他让他的父亲这位先前在财政部担任过不大的职务、后来因营私舞弊而被驱逐的人当了财政部次官布拉沃还让他的妹夫，普林西佩剧院的一个常客，当了女王的侍从。当有人指责他变节和贪污腐化时，他回答说：“始终如一的人不可笑吗？”而这个人竟然被选作道义革命的大使。

与当权派的这种玷污西班牙运动的丑闻相反，人们高兴地听到，人民至少已经迫使这些家伙把克里斯蒂娜交付议会处置并同意召开没有参议院的、因而不是根据 1837 年或 1845 年的选举法²⁶²召集的国民制宪议会。政府还不敢制订一部它自己的选举法，而人民则一致要求普选权。在马德里选举国民自卫军时，选出的全是激进派²⁶³。

各省都处于一种有益的无政府状态；各地纷纷成立了洪达，并且在进行活动，每个洪达都颁布有利于本地方的法令：这个洪达取消烟草的专卖，另一个洪达废除了盐税。走私者大肆活动，而且活动得比较顺利，因为他们在西班牙是唯一没有被瓦解的力量。在巴塞罗那，士兵们忽而发生内讧，忽而同工人冲突。各省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对革命事业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它使首都无法控制革命事业。

目前马德里出版的报纸有《西班牙报》、《新闻报》、《民族报》、《时代报》、《人民呼声报》、《西班牙日报》、《论坛报》、《希望》、《伊比利亚日报》、《天主教徒》、《国民军报》、《独立报》、《国民自卫军报》、《埃斯帕特罗派》、《同盟报》、《欧罗巴日报》、《旁观者》、《自由党人报》和《革命回声报》。《先驱报》、《人民杂志》和《信

使报》已经停刊。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14—15 日

载于 1854 年 9 月 1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17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博马尔松德²⁶⁴

1854年8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国民议会报》、《泰晤士报》和《辩论日报》的社论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纯粹俄国式的党派，或者是俄国一科堡式的党派，或者是立宪的党派都对西班牙革命的进程感到不满。由此看来，西班牙好像有某种好机会，虽然表面上情况与此相反。

本月8日，同盟俱乐部²⁶⁵代表团进谒埃斯帕特罗，向他呈交了要求实行普选权的请愿书。同样内容的请愿书纷至沓来。因此在内阁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的辩论。但是拥护普选权的人同拥护1845年选举法²⁵²的人一样遭到了失败。马德里《日报》公布了定于11月8日召开议会的法令；在法令的前头有一段致女王的说明。选举将按略加修改的1837年法律²¹¹进行。议会应当是一个制宪议会，因为参议院的立法职能已经废除了。1845年的法律中有两项条款仍然有效，即关于建立选举 mesas（主持投票和公布选举结果的机构）的方法和议员人数（每35 000人选举一名议员）。这样一来，议会将拥有420—430名议员。根据内务大臣圣克鲁斯的通令，选民登记工作应当在9月6日前完成。在各省的代理机构对选民名单进

行审核后,选民名单将在9月12日最后确定下来。选举定于10月3日在各选区的中心举行。从10月16日起开始在各省省会统计选票。如果对选举结果有争议,需要重新投票,应于10月30日以前举行投票。在说明中毫不含糊地说:

“1854年的议会同1837年的议会一样,应当保全君主制度;它应当成为王位和国民之间的新的纽带;这些目的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无可争议的。”^①

换句话说,政府禁止讨论关于王朝的问题;由此《泰晤士报》作出了相反的结论,它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或者要当今的王朝,或者根本不要任何王朝;不用说,后一种结局使《泰晤士报》无限伤心,并打乱了它的一切计划。

1837年的选举法规定只有拥有房产、缴纳 mayores cuotas(国家征收的船舶税)和年满25岁的公民才有选举权。此外,享有选举权的还有西班牙历史和高等艺术科学院的成员,神学、法学和医学科系的博士、硕士,神父会会员,教区主教和他所辖的教士,有两年资历的法官和律师,取得某一军阶的现役或退役军官,有两年服务期限的内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身为某一科学院成员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家,各种官办教育机构的教授和教员。这个法律还规定剥夺不缴纳国家或地方税者、破产者、由于道德方面的缺陷或不够公民资格而被褫夺权利者和所有被判刑的人的选举权。

的确,这项法令没有规定普选权,反而取消了议会对王朝问题过问的权力。然而连这样一种议会应当做什么也还不清楚。1812年西班牙议会没有讨论君主制度的问题,是因为这种制度徒有其名,国

^① 1854年8月17日《总汇通报》第229号。——编者注

王好多年来就不在西班牙。1837年议会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首先必须废除君主专制制度,然后才谈得上讨论君主立宪制的问题。至于谈到总的情况,《泰晤士报》完全有道理埋怨说,西班牙没有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因此只要那里继续保持着“无政府”状态(没有这种局面,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甚至在首都打败了革命也丝毫不能解决各省的问题。

不言而喻,西班牙革命有某些它所特有的因素。例如,抢劫和革命活动相结合——这种结合在反抗法国侵略的游击战中开始形成,后来,在1823年被“保皇派”和1835年以后被卡洛斯派²²²承袭下来。因此关于下卡泰罗尼亚的托尔托萨发生大骚动的消息是不会令人感到惊奇的。这个城市的人民洪达在7月31日的呼吁书中说道:

“可惜的杀人匪帮,借口要求取消间接税,占领了城市并践踏了一切社会法规。它的手段就是掠夺和烧杀。”

不过,洪达迅速恢复了秩序:市民自己武装起来了,并及时赶来救助当地力量薄弱的守备部队。受命追究和惩办7月30日肇事者的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这个情况自然使反动报纸可以借机大唱道德的高调。但是这些报纸这样做是多么无理,这从《巴约讷信使报》的消息中就可以看出:卡洛斯派已经在卡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等省,确切地说,也就是在过去卡洛斯派战争期间他们的主要巢穴所在的那些邻近山区举起了自己的旗帜。正是在卡洛斯派当中最先出现了一伙盗贼,即一群自称是国内某个受迫害政党的党徒的抢劫者。从维里阿特时期以来,所有的西班牙游击队总有点土匪习气;但是最普通的土匪自封为游击队,这还是卡洛斯派的新发明。托尔托萨事件的参加者无疑就是这一类人。

莱里达、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的情况是严重的。前两个城市拒绝同巴塞罗那联合起来，因为在那里军人占了上风。但是，看来，甚至孔查也不能对付那里的风暴，而他的位置应当由杜尔塞将军接替，因为人们认为这位将军不久前所获得的声誉对于克服困难能够提供更多保证。

秘密团体在马德里恢复了活动；它们像在 1823 年²⁶⁶一样领导着民主派。它们竭力劝说人民提出的首要要求是，从 1843 年以来的所有大臣都应提出自己的报告。

政府正在收购在街垒战那天被人民夺去的武器。它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原来在起义者手中的 2 500 枝滑膛枪。1843 年马德里的总督“阿亚库乔之兵”唐·曼努埃尔·萨加斯蒂现在复职了。他发出了两份文告，一份致居民，一份致国民军。他在文告中宣布将坚决镇压一切骚动。解除萨尔托里乌斯走卒的各种职务的工作进行得很快。这或许是西班牙唯一进行得很快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所有各个党派都表现得同样敏捷。

萨拉曼卡并未被监禁，不像以前传闻的那样。他在阿兰胡埃斯被捕，但不久就被释放，目前在马拉加。

民众施用压力控制着政府，这一点已由下列事实得到证实：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在他们的几个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撤换和精简。这种事在西班牙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联合派，即科堡—布拉干柴派²⁶⁷非常软弱。不然它为什么要对来自葡萄牙的致马德里国民自卫军的一封贺函这样大叫大嚷呢？只要稍微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这封贺函（从里斯本《进步报》发出的）同王朝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它只不过是我们在 1848 年运动中已经熟悉的一种兄弟般的问候。

西班牙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财政状况,尤其是萨尔托里乌斯的关于今年提前六个月缴纳税款的法令。当革命爆发的时候,尽管任何一个公务部门都没有支款,而且,有好几个月专款没有专用,但所有国家钱库都是空虚的。例如,在各个关卡征收的路捐,根本没有用来维修道路。公共工程的专门拨款情况也是这样。在检查公共工程专款使用情况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工程开支的收据而是宫廷宠臣的收据。大家知道,掌管财务早就是马德里最有油水的业务了。1853年西班牙的预算如下:

王室费和亲王年费	47 350 000	雷阿耳
立法	1 331 685	雷阿耳
国债利息	213 271 423	雷阿耳
内阁首相	1 687 860	雷阿耳
外交部门	3 919 083	雷阿耳
司法部门	39 001 233	雷阿耳
陆军	278 646 284	雷阿耳
海军	85 165 000	雷阿耳
内务部门	43 957 940	雷阿耳
警察	72 000 000	雷阿耳
财政部门	142 279 000	雷阿耳
养老金	143 400 586	雷阿耳
教会	119 050 508	雷阿耳
特别开支	18 387 788	雷阿耳

共计 1 209 448 390 雷阿耳^①

尽管有这样的预算,西班牙仍然是欧洲征税最少的国家,而且任

^① 原文此处为 1 209 708 742 雷阿耳。——编者注

何地方的经济问题都不像这儿这样单纯。因为西班牙各自治机关按照传统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所以精简官僚机构在这儿困难比较小，在关税改革和合理利用尚未出卖的国有土地方面情形也是一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在西班牙这样一个资源尚未开发、人口也很稀少(总共1 500万居民)的国家中是谈不上的。

你们从英国报纸上可以知道不列颠军队在博马尔松德的初步战绩。从来没有任何光辉业绩可供报道的可怜的报刊，现在对10 000名法军战胜2 000名俄军感到欣喜若狂了。我不打算来谈这些光荣业绩，而想认真考虑一下占领属于斯德哥尔摩郊区而不是圣彼得堡郊区的一个岛屿将会产生的后果。法国《世纪报》报道说，瑞典将立即同西方强国一道对俄国采取积极行动，这条消息已被许多报纸引用。它的真实性如何可以从下述事实判明：瑞典签订武装中立条约正是当它能够在芬兰的沼泽和森林中顺利作战的时候。现在，当作战的有利时机已经过去的时候，它会改变自己的政策吗？英国和法国已经拒绝了国王奥斯卡尔要求提供金钱和领土方面的保证作为他同意参加战斗的条件。此外，如果瑞典真的打算参战的话，那么瑞典政府关于裁减一整个分舰队的命令又该怎样解释呢？这次被裁减的有战列舰查理十二世号和奥斯卡尔亲王号，巡航舰德西雷号以及轻巡航舰格弗勒号和托尔号。

现在，当博马尔松德所处的纬度的海面即将封冻的时候，占领博马尔松德不会有什么意义。在汉堡普遍认为继博马尔松德之后将占领里加。这种看法的根据是射手号舰长希思科特上尉写给英国驻梅梅尔领事哈茨利特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本月10日以前一切外国船只都要离开里加湾。

据说普鲁士正在大力支持同俄国接壤的国境线上的战时禁运品

走私,同时准备同西方强国断绝关系。柯尼斯堡、但泽、科尔贝格和斯维内明德等港口的司令官已接到加强各该港口武装的命令。

挪威和瑞典的最有权威的报纸声明说:

“除非俄国被击溃、波兰被恢复这一点已有确定的绝对的把握,加入盟国并作巨大牺牲就是过于狂妄的举动。否则的话,即使将芬兰交给瑞典也只是一种骗局和圈套。”

同时应当记住,所有这些北欧国家政府都同本国人民有冲突。例如,在哥本哈根情况是这样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决定根本不参加议会的选举,而就在这个时候哥本哈根的选民们向上院议员马德维博士递交了一封呼吁书,建议他不要接受出席议会的委托书,因为国王的敕令违反了丹麦宪法并且损害了丹麦人民的权利。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18 日

载于 1854 年 9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7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²⁶⁸

[第一篇论文]

联军终于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夺取了博马尔松德。8月3日和4日，法军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兰群岛登陆；10日包围了要塞；在以后三天中构筑了炮台，架设了火炮；14日开始射击；15日以强攻夺取了两个圆形塔楼，一个是法军攻下的，另一个是英军攻下的；16日经过短促的战斗后，这个大型穹窿堡垒投降了，在这次战斗中，联军几乎没有什么伤亡。进展如此迅速，真可说是锐不可当。根据我们原先掌握的全部材料判断，本来认为夺取这个要塞必须通过正规围攻，至少得构筑一道平行壕，还需要进行两星期左右的接近壕作业。甚至早就吹嘘联军步兵只要用刺刀猛攻就足以使石墙粉碎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不围攻毕竟是不行的，而且这种令人疲惫的行动大概要持续两个星期之久。

因此，既然在包围要塞后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开始掘壕后的第六天就攻击成功，那么自然可以推论：围攻者所遇到的困难比他们料想的小得多。究竟是什么使他们的攻击变得容易了呢？关于这一

点,我们在未接到有关围攻的详细报告以前,当然只能猜测;不过,有许多情况可能是对他们有利的。很大一部分守军是芬兰人,一部分甚至是奥兰群岛的本地人。不用说,他们对俄国不会抱有很高的爱国热忱。如逃兵的报告可信的话,倘若有可能,他们甚至决定根本不进行抵抗。看来,岛上的居民在确信联军真的要攻击博马尔松德以后,便把联军当作使他们摆脱俄国桎梏的救星来欢迎,肯定给联军提供了各种情报,并从各方面给予帮助。但是,归根结底,主要原因一定是要塞本身在构筑方面存在某种严重的缺点。由于我们不可能得到要塞平面图,所有关于要塞的情况都是根据略图和要图以及一些非内行的(至少在工程方面如此)因而必然非常含糊不清的记述材料而来的,加之略图和记述材料的细节又有许多互相矛盾之处,所以我们不打算分析这个缺点究竟是什么。

然而,按要图来看,两个圆形塔楼在一定程度上可用火力彼此从侧面掩护;但由于在任何圆形工事中火炮必须作环形配置,火力必然非常分散,所以工事越小,因而容纳的火炮越少,那么火力的分散程度就越大,射击效果就越小。因此蒙塔朗贝尔特别注意不要采用这种塔楼,除非每一塔楼能得到左右相邻塔楼和后方主堡的有力支援而弥补火力分散的缺点。如果五六个这种塔楼能把火力集中于一点,那么原来非常分散而薄弱的火力就变得非常密集而有效了。此外,蒙塔朗贝尔知道得很清楚,在围攻的最后阶段,当发动强攻时,对付攻击者最有效的火力是步兵火力。因此,他不仅规定在塔楼内要有步兵的防御设施,而且通常还构筑一种隐蔽路或堑壕把各个塔楼连接起来,这种堑壕不仅保障通行的安全,而且可供步兵射击时使用。我们刚好有阿拉伯堡的例子来证实这种堑壕的用处。阿拉伯堡的整个侧面全靠这种堑壕来防护,从而保障了人数很少的阿尔瑞特

人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俄军的攻击。最后，蒙塔朗贝尔还尽量使塔楼完全避免遭受突然袭击。他在塔楼的周围挖掘了壕沟，构筑了隐蔽路，有时干脆就把塔楼作为内堡，即作为坚固的大型多面堡的最后预备阵地来使用。这是他最成熟的、显然也是最正确的设计。近代一切筑有蒙塔朗贝尔式小型塔楼的工事差不多都采用了这种设计，只是多少作了一些修改。为了使攻击者更难于接近塔楼，他还极其巧妙地构筑了整个塔楼的底层或地窖以供步兵防御之用。

然而，在所有这些方面，俄军似乎都有着严重的缺陷。强攻火力的持续时间是20—30小时，这样的时间用来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哪怕用三十二磅加农炮来轰击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要塞石质工事的质量没有达到一般工事的标准。因此可以认为，塔楼是由士兵利用云梯爬进炮眼，炸开塔门以后攻下的。而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就是掩护塔楼翼侧的火力非常薄弱，看来这个大型堡垒在后方并没有炮台支援塔楼，所以每个塔楼仅仅得到另一塔楼从侧面的掩护。从要图上看得很清楚，堡垒附近的地形起伏极大，强攻部队可以利用地褶隐蔽地进到十分靠近的地方，因而上述缺点就显得更为严重了。其次，就要图和事实判断，俄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预防突然袭击。在塔楼的周围，看来根本没有多面堡，而俄军构筑在塔楼前的那些多面堡又几乎没有抵抗就放弃了。据说每一塔楼的四周都掘有壕沟，但是肯定非常浅，同时没有适于步兵防御的构筑。联军只要一攻下塔楼，被塔楼控制的这个大型堡垒就必然落于联军之手。因而它很可能仅在形式上抵抗一下就陷落了。

这些工事被短暂的围攻所攻克，如果就这一点来加以判断，可以认为，当初的建筑者根本没有考虑过敌人从陆上大举进攻的可能性。他们在建筑这两个塔楼时，肯定只注意到抗击敌人海军陆战队的攻

击,而且要抗击的海军陆战队,充其量也不过两三千人,不能集中足够的力量进行强攻或把正规围攻进行到底。因此,防御力量最强的是向海的一面,而设有塔楼的向陆的一面的防御力量则只是虚有其表。其实,这次战斗的结果表明,甚至1 000名海军陆战队就可能在好几个月前以强攻夺占塔楼,从而迫使主堡投降了!

至于强攻,无论法军或英军,一定都进行得很好。英军是有名的强攻能手;强攻是他们惯用的方法,并且运用起来几乎一贯得心应手。法军比较喜欢在开阔地向敌军发动攻击;而在围攻时,由于他们思虑缜密,宁愿遵循按部就班的、具有法国特点的沃邦围攻法。但是这一次,就连他们也显然被英国一员老将的毅力吸引住了。在博马尔松德的英军中有一位叫琼斯的老将军,他超过了沃邦,在攻击巴达霍斯、罗德里戈城和圣塞瓦斯蒂安的勇敢顽强的守军时,竟在器材几乎不足一半的情况下巧妙地将预定的围攻期限缩短了约三分之一。琼斯将军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他与同行中的其他人不同,不是把围攻仅仅看作是一种考试仪式,要让总工程师通过考试,并且在整个军队面前证明他对于正规围攻的全部规定以及沃邦的《要塞围攻法》的一切原则记住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他不认为整个军队只是为了—些工程师而集合到现场,在他们表演魔术时来保护他们。琼斯将军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工程师。他非常了解英国兵,知道他们能做什么。这一次迅速、坚决而又没有大事声张地在规定期限的一半时间内攻下博马尔松德,与突破和强攻西班牙要塞的情况极其相似,指挥者只能是老将琼斯,而不会是其他人。法军是决不会想到用这种方法夺取要塞的。这种方法同法国人的气质不符,它过于直截了当,太缺乏温文尔雅的风度了。但是,他们无法非议这个人的威望,因为早在50年前他就以他们为对手,试验了非正规的攻取要塞的方

法,并证实了这种方法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的。不过当他们进行强攻时,其坚决性看来并不亚于英军。

奇怪的是,从彼列科普和奥恰科夫到华沙和比斯特里察河,一直以善于强攻而自豪的俄军,每一次企图以强攻夺取野战工事都被击退了,而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战斗中,甚至用正规围攻也未能夺下野战工事,而且还不得不撤退,尽管该要塞并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另一方面,在这次战争一开始,土军就以强攻夺取了俄军的永备工事——圣尼古拉堡垒,而现在著名的博马尔松德要塞也被攻占了,它发挥的作用只勉强抵得上一道暴露的堑壕。还必须指出,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英法舰队在这次胜利中没有发挥任何重大的作用。看来,舰队力求离穹窿炮台远些。

但是,联军这次胜利的性质却是这样: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里大概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无论如何,向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大规模远征的部队还没有乘船出发,并且已经宣布将再推迟几个星期。而那样就会为时过晚,因此,联军威武的士兵们在瓦尔纳兵营历尽艰难以后所迫切需要的冬季休整和喘息机会便有了保证。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8 月
2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9 月 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7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²⁶⁹

[第二篇论文]

报刊上关于夺取博马尔松德详情的报道仍使用含混不清、不切实际的语言。实际上我们无法知道破城炮队的配置地点距堡垒有多远,舰只在海上攻击时停泊在何处。出乎意料之外,甚至在联军攻占堡垒之后,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堡垒构造的任何新的材料。事实上,几乎对所有的重要问题都避而不谈,以便让公众只欣赏对这次战争行动绘声绘色的描述,而并不了解其实际情况。甚至官方报道也如此草率,以致不可能研究清楚,法军在夺取特采(当地写法)堡垒时是否进行了强攻,因为似乎除了指挥官外几乎任何人都没有进行抵抗。

我们所获得的有限材料正同我们根据要图所作的判断相同:两座塔楼都建筑在起伏相当大的地形上,因而雏谷、斜坡和岩壁形成了几乎直通到塔楼的壕沟边的天然接近壕。联军可以方便地配置在这些雏谷里,俄军的霰弹只能从他们的头上飞过而打不到他们。这样一来,联军便有了把炮队配置在目标附近的可能,因而从围攻开始时就用了通常在围攻最后阶段才使用的那种炮队,即破城炮队。俄

军把工事构筑在这种地形上,而且又没有把工事前至少 600—800 码以内的地面加以平整,根据这种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来自陆地的严重攻击的可能性。看来,破城炮配置在离堡垒不超过 500—600 码的地方,因为法军是用十六磅加农炮射击的,一般认为这种火炮即使从 100—150 码的距离上发射也不足以在城墙上打开缺口。然而,在 26 小时的炮击之后,塔楼已遭到相当的破坏,再经 12 小时的轰击即可把整个正面破坏。英军轰击诺蒂奇堡垒用的是 6 门三十二磅加农炮,每门炮重 45 英担。

根据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论海军炮》一书所讲的,这种火炮使用规定的七磅装药,在 400—500 码距离内发射的实心弹对坚实的橡树的贯穿力为 2—2.5 英尺。法军十六磅加农炮的实心弹使用五磅装药时,在 400—500 码的距离内对橡木工事的贯穿力为 1.5—2 英尺。如果英军像所能推测的那样把装药量至少增大到八磅,那么,在火炮增加一倍并且口径增大一倍的情况下,英军在不到 12 小时的时间内就打开了工事的一面,这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海上攻击,那不过是一种牵制行动。只有佩勒姆舰长一人利用此机会进行了一次科学实验。他使用 10 英寸长管旋座火炮,以破城射击所需的那种连续性和均匀速度,尽可能固定不变地向同一点射击。这种 10 英寸的长管炮是英国海军中最好的火炮。它很重(95 英担),因而在用六十八磅的实心弹射击时可以使用十六磅的装药。甚至在 500—600 码的距离上发射,这种实心弹的破坏作用也比破城炮队迄今通常使用的十八磅或二十四磅炮弹的作用大得多;只要使用得当,这种火力定会产生巨大的效果。结果,佩勒姆舰长连续不断的射击很快就揭露了俄国花岗岩要塞的秘密。只用几发炮弹就使围墙的外层坍下了一大片,围墙看来像是一整块的花岗石,而实

际上只不过是围墙的外面砌上一层花岗石,其厚度同高度和宽度完全不相称。再加几发炮弹,连旁边的石板也崩坍下来了,然后就是一大堆乱砖碎石哗啦啦从墙上滚下来,暴露出要塞的心脏。于是一切都很清楚:“花岗石”只是外表;只要砌在内岸的比较薄的石板一旦被炮弹击碎,里面就再没有任何坚固的石质工事能阻挡炮弹了。其实围墙不过是一层夹墙,中间填的是碎石、沙子和其他一些既不坚固又无附着力的东西。既然主堡是这样筑成的,那么毫无疑问,塔楼的砌造质量也不会好,因此,塔楼如此迅速地被打开缺口,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可是,就是这些抵御能力如此薄弱的围墙,竟以其雄伟的外表使整个英法舰队几乎惊呆了近四个月之久!不过,查理·纳皮尔爵士看到这些工事原来是用什么材料筑成的以后所感到的失望,怎么也不能与沙皇在得知他那耗费巨资的“花岗石”究竟是什么东西以后所感到的失望相比。在陆地攻击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我们已经谈到过要塞周围的起伏地形,它不仅是在火炮射程以内,而且还在滑膛枪射程以内。万塞讷团的猎兵就利用了这种地形,爬到很近的地点,隐蔽在树桩、巨石、岩壁等等后面,然后对穹窿的炮眼猛烈地射击。在400—500码的距离内他们的线膛枪百发百中;而且向一边倾斜的像隧道一样的炮眼,使每发击中炮眼的枪弹一直进入穹窿底部的中央部位;因此不难想象,这对装填要塞炮的炮手们是多大的惊扰。

看来,俄军对防备这种线膛枪射击的最简单的措施也完全忽略了。他们也有猎兵。为什么他们不把猎兵配置在塔楼顶的胸墙的后面居高临下对敌人的猎兵进行射击呢?显然,博马尔松德的芬兰猎兵并不乐意为神圣的俄罗斯的荣誉而战。而且,法军除使用了三门攻城炮以外还使用了几门白炮和三门榴弹炮。白炮对爆炸弹无法炸

穿的塔楼顶进行曲射,以便使坠力和爆炸力结合起来摧毁它。但是看来这种射击的效果不大。法军的榴弹炮则对炮眼进行平射。在400—500码这样近的距离上,用长管的二十四磅青铜榴弹炮发射直径六英寸的炮弹,每三发肯定有一发可命中像炮眼这样的目标;而每一发命中目标的炮弹就意味着一个炮手班和一门火炮失去作战能力。可见这种射击该是非常有效的。

总之,我们看到,博马尔松德的花岗石围墙无非是俄国人的骗局,是在薄薄的石砌层里面的一堆乱砖碎石,不可能在稍长的时间内经受住准确而连续的射击。如果说建筑围墙的人欺骗了尼古拉,那么尼古拉也毕竟成功地利用了这些虚有其表的工事欺骗了联军,使联军在整个战役中一直畏缩不前。总的说来,俄军的防守相当差,其原因可能是芬兰部队十分公开表现出来对俄国不忠的情绪。联军攻击的特点是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决性,这一点显然应归功于琼斯将军。在火炮的转移和架设方面所必须克服的一些困难,虽然被查理·纳皮尔爵士过分夸大了,但无疑也是巨大的。法军在攻击中使用了口径太小的攻城炮和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有很大用处的臼炮,但是他们用火炮和线膛枪对炮眼进行的平射却值得大加赞扬。英军和往常一样使用了能运到战场的最重的火炮,进行了暴露的、直接而有效的射击,经受了困难,并以其素有的顽强精神在敌人的火力下坚持作战,没有无谓的忙乱,但也没有特别新奇的表现而达到了目的。

博马尔松德被攻下了,但现在又产生一个问题:怎样处理它?根据来自汉堡的最后消息来看,在海军将领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远征军的司令官们和主要指挥官们已经决定,如果瑞典不愿以向俄国宣战为代价占领博马尔松德,联军就将破坏一切工事并撤离该岛。如

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奥兰群岛的远征就决非《通报》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军事行动,而是纯外交性的措施,目的是把瑞典拖进来同这样一些强国结成危险的同盟,这些强国的友谊,按布莱特先生说:“在一年内带给土耳其的灾难,是俄国即使在野心最大的时候也从未想象过的”。瑞典的宫廷正犹豫不决,瑞典的报界在号召人民谨防那些“带来礼物的丹纳士人”^①,但是瑞典的农民已经通过了请愿书,内容是议院应当请求国王永不再使奥兰群岛重新落入俄国手中。农民的请愿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我们不久就会得到要塞被炸毁的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8 月
2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9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8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2 部第 49 行。暗指拉奥孔劝特洛伊人勿中木马计的忠告。——编者注

卡·马克思

*革命的西班牙²⁷⁰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8 月
25 日—11 月 14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9 月 9
日、10 月 20、27、30 日, 11 月
24、25 日, 12 月 2 日和 1855 年
3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79、4214、4220、4222、4244、
4245、4251 和 4345 号; 载于
1854 年 9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 419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一] 西班牙的革命

目前西班牙的革命看来具有持久的性质,于是,正像本报驻伦敦记者所报道的,富裕阶级和保守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流亡到法国去避难。①这也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采取过1848年风行一时的在三天之内从头到尾完成一次革命的现代法国方式②。西班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比较复杂而持久的。三年,看来是它给自己规定的最短期限,虽然西班牙的革命周期有时甚至延长到九年。例如,本世纪第一次西班牙革命从1808年延续到1814年,第二次革命从1820年延续到1823年,而第三次革命从1834年延续到1843年。这次革命将延续多久,将如何结束,就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也难预测;但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土耳其和正在进行战争的俄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西班牙这样使善于深思的观察家感到如此浓厚的兴趣。

西班牙的起义正像它们向来反对的宫廷宠臣的权势一样,是由来以久的现象。例如,15世纪中叶,贵族举行叛乱反对国王胡安二世和他的宠臣唐·阿尔瓦罗·德·卢纳。在15世纪还发生过更严重的变乱,反对国王亨利四世和他的权奸头子唐·胡安·帕切科·

①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作过改动。——编者注

② 指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编者注

比列纳侯爵。17世纪里斯本人民把瓦斯孔塞卢斯这个西班牙驻葡萄牙总督手下的萨尔托里乌斯碎尸万段²⁷¹，菲力浦四世在巴塞罗那的宠臣圣科洛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一世纪末，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马德里人民起义反对贝莱普什伯爵夫人、奥罗佩萨伯爵和梅加伯爵这一伙王后权奸，因为权奸对运入首都的一切货品都课以重税，然后分吞税款。人民前往王宫，强迫国王走到阳台上亲自斥责王后权奸。然后群众又涌向奥罗佩萨伯爵和梅加伯爵的官邸，把这些官邸抢劫一空，烧个干净，同时要捉拿官邸主人，但是他们侥幸逃走了，以终身流亡的代价保住了性命。15世纪起义的原因是亨利四世的宠臣比列纳侯爵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订立了卖国条约，把卡泰罗尼亚割让给法国。三个世纪以后，查理四世的宠臣、他的王后的宠幸“和平公爵”曼努埃尔·戈多伊，于1807年10月27日同波拿巴签订关于瓜分葡萄牙和允许法国军队开进西班牙的枫丹白露条约，引起了马德里人民反对戈多伊的起义，接着就是查理四世退位、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即位、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以及随之而爆发的独立战争。可见，西班牙独立战争从反对以唐·曼努埃尔·戈多伊为代表的权奸的人民起义开始，是同15世纪的内战从反对以比列纳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一样的。1854年的革命也是从反对以圣路易斯伯爵为代表的权奸的起义开始的。

尽管西班牙不断爆发起义，但直到本世纪没有出现重大的革命，如果不算查理一世或者说查理五世（德国人这样称呼他）统治时期的神圣同盟战争²⁷²的话。一般说来，后者是在西班牙摄政阿德里安红衣主教（佛来米人）庇护下的一个宫廷集团的行为直接引起的，这个集团进行无耻敲诈，高价卖官鬻爵，而且还公开以法庭判决做交易，使卡斯蒂利亚人恼怒得忍无可忍。反抗佛来米人的权奸，只是运动

(Comparative Politics)

London 1854 May 2nd

- 1) Review (X. 2)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ondon. 1854
- 2) Review (X. 2)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ondon. 1854
- 3) Review (X. 2)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ondon. 1854
- 4) Review (X. 2)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ondon. 1854
- 5) Review (X. 2)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ondon. 1854
- 6) Review (X. 2)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ondon. 1854
- 7) Review (X. 2)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ondon. 1854
- 8) Review (X. 2)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ondon. 1854

的表面。这个运动在根本上是要保住中世纪西班牙的自由不受当代专制制度的侵犯。

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格拉纳达的合并天主教徒斐迪南和伊萨伯拉一世统治之下为西班牙的君主国创造了物质基础,在这以后,查理一世企图把这个还是封建的君主国改变成专制的君主国。他立刻向西班牙自由的两根支柱,即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²⁷⁴进攻;议会是古哥特人的咨议会的改变形式,地方自治机关几乎直接由罗马时代传下来,具有罗马自治市所固有的世袭原则和选举原则相结合的特点。关于地方自治,意大利、普罗旺斯、北高卢、大不列颠的城市和一部分德国城市同西班牙当时的城市很相似;但是无论法国的三级会议²⁷⁵或者中世纪英国的议会都不能同西班牙的议会相比。在西班牙王国形成中有过特别有利于限制王权的条件。一方面,在同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在不同时期收复并成为独立的王国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人民的法律和习俗。土地的逐渐收复主要是由贵族进行的,这就大大加强了贵族的势力,同时削弱了王权。另一方面,国内的城镇获得重大意义,因为居民不得不共同住在设防的地方,以免遭受摩尔人的不断侵犯;同时西班牙的半岛地形以及同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经常来往,促进了沿海地区第一流商埠的形成。早在14世纪,城市代表就成为议会中最有势力的一部分,与僧侣和贵族的代表并列。还应该指出,半岛经过了将近八百年的顽强斗争才缓慢地从摩尔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使半岛到完全肃清领土上的敌人的时候具有了与当时的欧洲完全不同的特点;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北部盛行的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风俗习惯,南部盛行的是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

当查理一世从德国(他在德国登极)返回西班牙的时候,议会便

在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以接受他效忠于古法典²⁷⁶的宣誓并给他加冕。²⁷⁷查理拒绝出席,却派了自己的代表去,要他们去接受议会效忠于国王的宣誓。议会不准这些代表参加会议,并通知国王说,假如他不出席,不对国家法典宣誓,他将永远不被承认为西班牙的国王。查理对这个要求让步了;他来到议会,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带着很不愉快的脸色宣了誓。这时候议会对国王宣布:“陛下,您要知道,国王不过是领薪俸的国民公仆。”这就是查理一世同城市互相敌对的开端。查理阴谋活动的结果是,在卡斯蒂利亚爆发了许多次起义,成立了阿维拉神圣同盟,联合起来的城市在托德西利亚斯召开了议会会议。1520年10月20日,议会向国王发出了“反对滥用王权的抗议书”,查理对这个抗议的回答是,剥夺所有出席托德西利亚斯会议的代表的人身权力。内战已不可避免,起义的市民号召拿起武器;他们的士兵在帕迪利亚的指挥下占领了托雷洛瓦通要塞,但是最后在1521年4月23日在比利亚拉尔会战中被优势的兵力彻底击败。首要“谋叛者”的头滚落在断头台上,西班牙古老的自由也从此不复存在了。

当时各种情况都有利于日益增长的专制权力。各省之间的不团结,分散了它们的力量;但是,给了查理最大帮助的是贵族和市民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抗,它帮助查理削弱了贵族和市民双方。我们已经谈到,从14世纪起,城市在议会中的势力就很大了,而从天主教徒斐迪南的时代起,圣友会(Santa Hermandad)就成为城市用来反对那些责备城市破坏了古老的贵族的特权和司法权的卡斯蒂利亚贵族的有力武器。²⁷⁸因此贵族热心地支持查理一世消灭神圣同盟的意图。查理摧毁了同盟的武装反抗后,就致力于缩小城市的自治特权;城市的居民、财富和重要性迅速减少,因而很快就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影

响。于是查理回过头来对付曾经帮助他压制城市自由而本身还具有不小政治作用的贵族。由于欠发军饷而引起的兵变,使查理不得不于1539年召开议会,以便议会同意给他一笔钱。议会对于他以前把补助费滥用于违反西班牙利益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慨,因此拒绝拨款。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而当贵族坚持要求免税的特权时,查理宣布,要求这种权利的人不得参加议会,而且真的把这些人开除出议会。这对于议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以后议会会议纯粹是举行宫廷仪式。古代议会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僧侣,早从天主教徒斐迪南时代起就站在异端裁判所的旗帜之下,并且早就不把自己的利益同封建的西班牙的利益看作一体了。相反地,由于有了异端裁判所,教会已成为专制政体的最令人畏惧的工具。

如果说在查理一世统治以后,西班牙政治和社会的衰落表现出土耳其帝国的最坏时期可耻的长期的腐化所具有的一切征兆,那么在这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古代自由至少已经安葬在华丽的坟墓中了。这是瓦斯哥·努涅斯·巴尔博亚在达连湾海岸、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皮萨罗在秘鲁升起卡斯蒂利亚国旗的时代,这是西班牙的势力独霸欧洲的时代,是伊比利亚人的南国的想象为黄金国、骑士功勋和世界君主国的灿烂幻景所迷惑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信仰行动²⁷⁹的凶焰中消失了。

但是,在经过了先是哈布斯堡王朝以后又是波旁王朝的将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以后(要压制人民有这两个王朝中的任何一个就足够了),西班牙的地方自治或多或少还是保留着,怎样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在这个比任何其他封建国家都更早产生了纯粹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中央集权制却一直不能生根,这又怎样解释呢?回答这些

问题并不困难。16世纪正是大的君主国家形成的时代,它们在各个地方都是随着两个相互敌对的封建阶级——贵族和市民——的没落而产生的。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作为社会统一的开创者而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各种社会成分都在其中搀合在一起发挥作用,这就使得城市愿意接受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而不要中世纪的地方自治。在西班牙则恰恰相反,贵族政治虽趋于衰落,却保持着自己的最恶劣的特权,城市虽已丧失自己的中世纪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现代城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自从君主专制建立以来,城市就在不断衰落,苟延残喘。这里不打算说明那些破坏西班牙商业、工业、航海业和农业的政治情况或经济情况。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指出事实本身就足够了。随着城市工商业生活的衰落,国内交易缩小了,各省居民的来往减少了,交通工具被弃置了,大路也日益荒废失修。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地方生活,各省和各个自治体的独立性,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最初是由西班牙的地形造成的,后来又由于各省分别从摩尔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组成独立的小国而历史地发展起来),——所有这些现象现在都由于使国民活动的泉源枯竭的经济变革而最后得到加强并且固定下来。君主专制不仅在西班牙遇到了本性就同中央集权抵触的物质因素,它还尽力阻碍由全国性的分工和国内交易的多样性所产生的共同利益的发展,而这种共同利益正是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的法律原则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因此,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一批治理不善的共和国。在不同的省份里,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统一的法

律由总督和省长任意解释；尽管存在专制制度，政府并不禁止各省保存不同的法律和习惯，不同的币制，不同颜色的军旗和各自的税制。东方专制制度只有当地方自治和它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时才触动地方自治，但是当地方自治使它不必亲自做某些事情并使它省却实际管理的麻烦的时候，它是乐意让这种制度存在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拿破仑像所有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么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同小可地大吃一惊。根据枫丹白露条约，他争取到让他的军队开进马德里；通过把王室一家引诱到巴约讷会见，强迫查理四世收回退位诏书，接着又强迫查理四世把领地让给他；拿破仑又威胁斐迪南七世，强迫他发表了同样的声明。查理四世和王后以及“和平公爵”被送到贡比涅，斐迪南七世和他的弟兄们被幽禁在瓦朗赛城堡以后，拿破仑把西班牙的王位授予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接着在巴约讷召集了西班牙洪达，并把他准备好的一部宪法²⁸⁰赐给洪达。他在西班牙的君主国中只看到被他牢固幽禁的可怜的王室而没有看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他完全相信，他已经把西班牙攫为己有了。但是在他的突然袭击以后不几天，他就接到了马德里起义的消息。的确，缪拉特屠杀了近千人，把这一次暴动压下去了。但是当这次大屠杀的消息在全国传开的时候，在阿斯图里亚斯又爆发了起义，并且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我们要指出，这个第一次自发的运动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而“上等”阶级却温顺地屈从于外国的压迫。

西班牙就这样准备好了它的现代革命历程，并进入了标志着本世纪西班牙发展特征的斗争。以上我们简单列举的各种事实和势力，现在仍旧决定着西班牙的命运并指引着西班牙人民奋斗的方向。

我们叙述这段历史,正是因为它不仅对于评价目前的危机而且对于评价西班牙在被拿破仑侵占以来所做的和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必要的。迄今将近 50 年的这段时期不乏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确实是全部近代史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教益的篇章之一。我们希望,西班牙人民书写的即将载入史册的新篇章,对于他们自己和对于全世界,都不是没有价值和没有好处的。^①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二] 革命的西班牙

我们已经简单地向读者介绍了西班牙早期的革命史,以便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评价那些使得这个国家目前为全世界瞩目的事件。更令人感到兴趣的而且对于了解当今时代也许具有同样意义的,是随着波拿巴家族被驱逐而兴起的并使西班牙王位重归于迄今仍在位的王室的伟大的民族运动。但是,为了正确地评论这一运动和运动中的英勇事迹以及被认为几乎气数已尽的人民所表现的令人难忘的生命力,我们应当回溯到拿破仑进攻这个国家的最初时期。产生整个事件的真正原因,可能首先是1807年7月7日签订的蒂尔西特条约²⁸¹,据说那个条约是在库拉金公爵和达来朗又签订了密约以后才臻于完成的。条约发表于1812年8月25日马德里《日报》上,其中包括下列条款:

“第一条 俄国应当占有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并且在它认为适宜的范围内扩张它在亚洲的领土。

“第二条 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和葡萄牙的布拉干柴王室退位,两国王位将让给波拿巴家族的亲王。”

如果这个条约是真实的(对它的真实性没有什么人反驳,甚至在不久前发表的约瑟夫·波拿巴国王回忆录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那它就是1808年法国入侵西班牙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可以认为,西班牙当时的骚乱似乎就是通过秘密的线索同土耳其的命运联结在一

起的。²⁸²

紧接着马德里大屠杀和巴约讷交易以后,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安达卢西亚和巴伦西亚同时爆发了起义,而法国军队占领了马德里,在这时候,波拿巴假借口实占领了北部的四个要塞——潘普洛纳、圣塞瓦斯蒂安、菲格拉斯、巴塞罗那;一部分西班牙军队早已调往菲英岛参加进攻瑞典的战役;最后,各方面的当局——军事的、宗教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和贵族都劝谕人民顺从外国占领者。但是有个情况抵消了这一切困难处境。当时多亏拿破仑,国家摆脱了国王、王室和王国政府。这样一来,本来会束缚西班牙人民表现自己天生的毅力的枷锁被打碎了。在自己国王的统治下和在平常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民是怎样无法抵抗法国人,已经由1794年和1795年的不光彩的战争²⁸³证明了。

拿破仑把西班牙最显要的人物召到巴约讷,以便亲自把新的国王和宪法交给他们。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来到了。1808年6月7日,国王约瑟夫在巴约讷接见了西班牙大贵族代表团,斐迪南七世的亲密朋友印范塔多公爵代表大贵族对约瑟夫说了这样的话:

“陛下:西班牙大贵族一向以效忠于自己的国王闻名,现在陛下也会同样得到他们的忠心和爱戴。”^①

卡斯蒂利亚的王政会议向可怜的约瑟夫郑重地宣告:“他是天授君权的那一家族的主要后裔。”率领军队代表团的帕尔凯公爵的颂词是同样卑躬屈节的。第二天,同样是这些人发表了文告,谕令全体人民忠于波拿巴王朝。1808年7月7日,91个出身显贵的西班牙人

① 威·沃尔顿《1808—1836年底的西班牙革命》1837年伦敦版第1卷第115—116页。——编者注

在新宪法上签了字,其中有公爵、伯爵、侯爵和各教团的首领。在讨论这个宪法时,引起他们反对的仅仅是废除他们的古老特权和免税权一项。以前在斐迪南七世的内阁中任职和担任宫廷官吏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约瑟夫的第一届内阁和担任第一批宫廷官吏。上层阶级的一些代表把拿破仑看成上天赐来复兴西班牙的人物,另外一些人则把他看成反对革命的唯一支柱;谁也不相信这是进行民族抵抗的好机会。

因此,从西班牙独立战争一开始,上层贵族和旧官员就失去了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任何影响,因为从斗争一开始,他们就背弃了资产阶级和人民。一方面是 A francesados(亲法派),另一方面是民族。在巴利亚多利德、卡塔赫纳、格拉纳达、哈恩、桑卢卡尔、拉卡罗利纳、罗德里戈城、加的斯和巴伦西亚的最著名的旧官员(总督、将军和其他被认为是法国代理人 and 民族运动的障碍的著名人物)都成为激愤的人民的牺牲品了。各地原来的政权都被改换了。在 1808 年 3 月 19 日起义几个月以前,马德里就发生过骚动,要把 El Choricero(香肠贩子——戈多伊的绰号)和他的可恨的走狗赶下台。这个目的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这样,国内革命就按照人民群众所希望的那样并在与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看起来,整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巴;这个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拥护旧的制度、习惯和法律而反对拿破仑的合理的革新;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热的,因为它拥护“圣教”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被自己的法国教友的命运吓坏了的僧侣,为了自保便激起人民的这种

情绪。骚塞说：

“爱国主义火焰因加上迷信的圣油而燃烧得更旺了。”^①

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动性质相结合的特点，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在人民的想象中，国王是被大盗虐待和幽禁的传奇式的王子。民族过去的最令人神往、最得人心的时代，是同十字架对新月^②的战争的神奇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并且很多下层人民都习惯于穿托钵僧的服装，寄食于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产业。一个西班牙作家唐·何塞·克莱门特·卡尔尼塞罗在1814和1816年发表了以下著作：《拿破仑——欧洲真正的唐·吉珂德》、《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恢复异端裁判所是合理的》²⁸⁴。看一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可以了解我们在各省洪达的宣言中所看到的西班牙革命的这一特点，所有这些宣言都歌颂国王、圣教和祖国，有的甚至对人民这样说：

“他们对彼岸世界的希望面临破灭，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③

但是，如果说浸透了宗教和政治偏见的农民、内陆小城市的居民和无数穿僧袍和不穿僧袍的托钵僧，构成了民族派的大多数，那么在这一派中还有一个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看成西班牙政治和社会复兴的信号的活跃的、有势力的少数。这个少数是由港口、商埠和

① 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1823年伦敦版第1卷第301页。——编者注

② 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的象征和旗帜。——编者注

③ 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1823年伦敦版第1卷第305页。——编者注

某些省会的居民组成的,这些地方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作家、医生、律师甚至僧侣(比利牛斯山脉也没有阻挡住18世纪哲学对他们的影响)的支持,这个少数派变得强大了。1795年发表的根据卡斯蒂利亚王政会议的命令而草拟的关于改进农业和关于土地法的著名的霍韦利亚诺斯备忘录可以看作是这一派人的真正宣言。^①最后,少数派中还有资产阶级青年,例如大学生,他们热烈地接受了法国革命的理想和原则,有一个时期甚至希望依靠法国的支持来复兴祖国。

在只涉及共同保卫祖国的问题的时候,民族派的两大组成部分还能十分和谐。在他们还没有在议会、在即将制定新宪法的斗争舞台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对立也没有表现出来。革命的少数派为了鼓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毫不犹豫地求助于旧的民间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偏见。如果说这种策略对于民族反抗的当前目的是适当的,那么到了旧社会的保守派开始利用这种偏见和人民热情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反对革命者的真正的、最终的计划的时候,这种策略终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少数派的致命伤。

斐迪南在按照拿破仑的要求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成立了以唐·安东尼奥亲王为主席的最高政府洪达。但是就在5月,这个洪达就不存在了。那时中央政府没有了,起义城市成立了自己的洪达,这些洪达受各省首府的洪达领导。其实这些省洪达就是独立的政府。因

① 参看加·霍韦利亚诺斯《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卡斯蒂利亚最高王政会议的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见《霍韦利亚诺斯全集》1840年巴塞罗那版第7卷。——编者注

为它们每一个都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奥维耶多的代表洪达宣布主权完全转入它手中,它对波拿巴宣战,而且派代表团到英国去签订停战协定。以后塞维利亚洪达同样做了这一切。有趣的是,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在形势的逼迫下同英国结成了同盟,虽然西班牙人一向把英国看成比土耳其苏丹好不了多少的最坏的异端的化身。由于受到法国无神论的攻击,他们竟投入大不列颠新教的怀抱。因此也不奇怪,斐迪南七世回到西班牙后,在恢复神圣的异端裁判所的命令中说:

“那些同样地感染了仇恨神圣的罗马教会的情绪的各个不同教派所属的外国军队留驻在西班牙,是西班牙宗教的纯洁性受到玷污”的原因之一。^①

这么突然出现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各省洪达,曾承认塞维利亚最高洪达有某种权威(不过,是极微小的、极不肯定的权威),因为自从马德里被外国人占领,塞维利亚就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首都。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联邦政府,由于对立利益的冲突、地方的互相猜忌和竞争势力的存在,这种政府对于集中军事指挥和统一战斗行动的要求是很不适合的。

这些单独的洪达所发表的告人民书反映了突然从长期沉睡中醒来、像受到电击似地投入狂热的活动的人民的十分强大的英雄力量;但同时这些告人民书仍然不能摆脱曾使西斯蒙第有理由给西班牙文学加上“东方的”这个形容词^②的那些毛病:过分夸张的辞藻,过分的

① 约·比格兰《从古代到1809年的西班牙历史》1823年巴黎版第3卷第324页。——编者注

② 西斯蒙第《论南欧文学》1813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4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做作和吹嘘以及夸夸其谈。这些告人民书同样明显地表现了西班牙性格所特有的幼稚的虚荣，难怪洪达成员都自封为“殿下”，都穿上华美的制服。

说到这些洪达，还应当指出两个情况：一个情况表明到起义开始时人民的觉悟水平是很低的，另一个情况对革命进展是有害的。洪达是由普选产生的；但是“下层阶级的高度热诚表现为顺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选那些出身比他们高贵的人，亦即省里的贵族和乡绅，此外还有教士以及极少数资产阶级名流。人民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无力量的，自己的主动性仅仅表现为迫使上层阶级抵抗侵略者，而不要求亲自参与领导这个抵抗运动。例如在塞维利亚，“人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求教区教士和女修道院院长开会选举洪达代表”。因此洪达里面全是些凭过去的社会地位选举出来的、完全不像革命领袖的人物。另一方面，人民在委任这些掌权者时，根本没有想到限制他们的权力和确定任期。而洪达，当然只考虑扩大权力和延长任期。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每当革命洪流有泛滥的危险的时候，这些革命初期人民热情的第一批产物一直是阻挡革命洪流的堤坝。

1808年7月20日，也正是约瑟夫·波拿巴进入马德里的这一天，卡斯塔尼奥斯迫使杜邦将军和韦德耳将军指挥的14 000名法国士兵在拜伦放下武器，又过了几天，约瑟夫不得不从马德里撤退到布尔戈斯。此外还发生了两件大大鼓舞西班牙人的事情：一件是帕拉福克斯将军把勒费弗尔赶出了萨拉戈萨，另一件是罗曼纳侯爵率领一支7 000人的军队到达拉科鲁尼亚，这支军队不顾法国人的阻挠，从菲英岛开来援救祖国。

在拜伦会战以后，革命达到了顶点，承认了波拿巴王朝或者聪明

地保持沉默的那一部分上层贵族,现在都出来参加人民事业,而这对人民事业的好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三]

各省洪达分掌政权,使西班牙抵抗住了拿破仑法国入侵的第一个打击,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使国家的抵抗能力倍增,而且因为这使侵略者弄不清应当打击的方向;实际上,法国人在发现到处都是西班牙人的反抗中心的时候,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尽管如此,在拜伦投降和约瑟夫从马德里撤退以后不久,各地就开始感到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各省洪达之间的争执达到了异常剧烈的程度,例如,卡斯塔尼奥斯将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阻止了塞维利亚向格拉纳达进军。结果法国军队取得了恢复元气和占据坚固阵地的机会,尽管当时法国军队(除去贝西埃尔元帅的那支部队以外)都溃退到了埃布罗河一线,只要奋力追击,本来可以很容易击溃它,至少是把它赶出国境。但是,全国对洪达之间的猜忌的抗议以及对指挥官的漫不经心、玩忽职责的抗议,主要是由梅尔兰将军对毕尔巴鄂的起义的残酷镇压²⁸⁵引起的。迫切需要使军事行动配合一致;确信拿破仑马上会率领从涅曼河、奥得河和波罗的海沿岸募集的常胜军卷土重来;需要有一个中央政权来同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订立同盟条约以及维持同西班牙的美洲属地的联系并从那里征收赋税;在布尔戈斯存在着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及必须建立自己的圣坛来对抗外国的圣坛,——就是这些原因迫使塞维利亚洪达勉勉强强放弃了自己的不明确的、实际上是虚有其名的最高权力,并建议各省

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中央洪达,同时各省洪达应保持对有关地区的内部管辖权,

“但是以必须服从中央政府为条件”。^①

这样在1808年9月26日即恰好是俄国君主和德国各邦君主在爱尔福特向拿破仑屈膝的前夕²⁸⁶,由各省洪达35名代表(西班牙本土34名,加那利群岛1名)组成的中央洪达在阿兰胡埃斯召开了会议。

军队的命运在革命时期比平时更鲜明地反映国民政府的真正本质。负有把侵略者驱逐出西班牙的使命的中央洪达,自己却被胜利的敌军从马德里赶到塞维利亚,又从塞维利亚赶到加的斯,在那里得到不光彩的下场。中央洪达的政绩就是打了一系列可耻的败仗、西班牙各军团被消灭以及最后正规的军事行动变成个别的游击活动。西班牙贵族乌尔基霍于1808年4月3日曾这样对卡斯蒂利亚军区司令官库埃斯塔说:

“我们西班牙是由不同种类的材料建造起来的哥特式建筑;在西班牙有多少省就有多少不同的势力、特权、法律和习惯。西班牙根本没有欧洲称为公益精神的那种东西。这些原因将阻碍我国建立起结构巩固的、能够把我国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任何中央政权。”^②

这样,如果说西班牙在法国入侵时期的实际情况给建立革命中心造成了最大障碍,那么中央洪达的组成情况本身便使得洪达不能

① 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1823年伦敦版第1卷第619页。——编者注

② 多·普拉特《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第352页。——编者注

克服国家所遭到的可怕危机。洪达要成为一个执行机关,它的人数太多了,并且完全是偶然拼凑起来的,要想具有国民公会²⁸⁷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单单中央洪达的权力是从各省洪达授予的这个情况就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野心、恶念和任性的利己主义。省洪达的成员正像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总的来说,是根据他们在旧社会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建立新社会的能力选举出来的。由各省洪达派到中央洪达的也是一些西班牙大贵族、高级僧侣、卡斯蒂利亚显贵、过去的大臣和高级文武官员,而不是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人物。由于力图做到合法和保持高贵身分,西班牙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中央洪达的两个最卓越的成员是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当时的两大派就是分别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他们两人都曾遭到戈多伊的迫害,过去都当过大臣,而现在都成了羸弱不堪的人,在保守的西班牙制度的刻板 and 拘泥的成规中老迈衰朽了,而西班牙制度的那种拘守礼仪的、繁文缛节的迂缓早在培根时代就很闻名了,培根有一次曾感叹地说过:“让死神从西班牙来找我,那它就会来得很晚的!”^①

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是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是在18世纪法国革命以前就开始了的;前一个是平民官吏,后一个是贵族慈善家。弗洛里达布朗卡是以庞巴尔、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执行者;霍韦利亚诺斯是“人民之友”,他希望通过精心制定的经济法令和对崇高学说的文字宣传来使

^① 转引自何·马·德·托雷诺《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1835年马德里版第2卷第122页。——编者注

人民得到自由。两人都反对封建传统,因为一个企图使君主政权摆脱封建传统,另一个则谋求使市民社会摆脱封建传统。他们各自在国家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和他们的观点一样,是不同的。弗洛里达布朗卡曾以查理三世的首相资格执掌国家政权,他的统治随着他所遭到的反抗的增强而越来越专横暴虐。霍韦利亚诺斯在查理四世时曾任过很短时期的大臣,但他不是以大臣资格而是以学者资格,不是用法令而是用文章来取得他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影响的。弗洛里达布朗卡在时代的风暴把他推上革命政府的首脑地位的时候,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他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唯一东西就是对专制制度的信仰和对人民自发性的怀疑。弗洛里达布朗卡在作为代表被派往马德里的时候,曾给穆尔西亚的市政府留下一份秘密抗议书,宣称:他只不过是向暴力让步,并且害怕人民谋害;他之所以特地签署这份抗议书,是希望约瑟夫国王永远不要责怪他接受人民的委任状。他没有满足于恢复自己壮年时代的传统,而修改了一些过去他的政府采取的现在看来过于轻率的措施。例如,当初他曾把耶稣会士驱逐出西班牙²⁸⁸,现在他刚成为中央洪达的成员,就让他们获准“以私人资格”回来。如果他也认为从他统治以来发生了某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只在于:赶走了弗洛里达布朗卡大伯爵并剥夺了他的全部权力的戈多伊,现在又由这同一个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所取代,并轮到自己被赶走了。被中央洪达选出来做主席,被洪达的多数派承认为毫无缺点的领袖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中央洪达中的有影响的少数派的领袖霍韦利亚诺斯也已经衰老了,由于当年戈多伊使他受到长期痛苦的监禁,他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但是,就在他精力最旺盛的黄金年代,他也并不是一个进行革命活动的人,确切些说,倒是一个过于讲究手段因而从来不能把事业

进行到底的好心的改革家。如果在法国，他也许会走得和穆尼哀或者拉利-托朗达尔同样远，但决不会多前进一步。如果在英国，他会是一个有声望的上院议员。在起义的西班牙，他可以向朝气蓬勃的青年提出一些主意，但在实际活动方面，连弗洛里达布朗卡的那种温顺的顽强精神也没有。这位贵人没有完全摆脱贵族的偏见，因而具有强烈的像孟德斯鸠那样崇尚英国的倾向；他似乎是要证明，如果西班牙也可能出现具有普遍观念的智者的话，那只会是例外，而且要以损害西班牙人只有在本地事业中才表现出来的个人毅力为代价。

然而，在中央洪达里还有以萨拉戈萨的代表唐·洛伦索·卡尔沃·德·罗萨斯为首的少数人，他们赞同霍韦利亚诺斯的改革观点，同时他们也推动革命活动。但是，由于人数太少而且知名度太低，他们没有力量把洪达这一辆缓慢的国家马车从西班牙礼仪的深辙中拖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领的政权机构，担负着完成革命和战胜拿破仑的使命。如果说它的行动十分无力而它的宣言却气势磅礴，那么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诗人唐·曼努埃尔·金塔纳受到中央洪达的赏识，被委任为秘书，并受托起草宣言。

卡德龙笔下的高傲的英雄把世袭的封号当成真正的伟大，在通报自己时，令人讨厌地列举了自己的一切封号；洪达也是这样，它首先忙于取得与自己高贵地位相称的头衔和荣誉。洪达主席得到了“殿下”的尊称，其他成员得到了“阁下”的尊称，而包括全部成员整个洪达得到了“陛下”的尊称。洪达成员都穿上了好像将军服一样的特别制服，佩上画有新、旧大陆的胸章，并给自己规定年俸为120 000雷阿耳。起义的西班牙的领袖们认为，要神气十足地、体

面地走上欧洲历史舞台，他们便必须穿上戏装，这是地地道道的西班牙老派人物的观念。

叙述洪达内部历史和它的施政细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这里只回答两个问题。洪达对西班牙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对保卫祖国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就能够说明 19 世纪西班牙各次革命中很多直到目前神秘难懂的问题。

开始时，中央洪达的多数成员认为，镇压最初的革命狂热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因此洪达加强了过去对付报刊的审查制度，并委任了一位新的异端裁判所首席裁判官，幸好，法国人没有让他去执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当时西班牙的大部分不动产都以死手权固定下来（贵族的地产只能继承，教会的地产不可转让），洪达还是下令中止已经开始了的出售死手财产的现象，甚至扬言要修改涉及业已出售的教会地产的私人契约。洪达承认国债，但不采取任何财政措施来使预算摆脱由于轮流上台的腐败政府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庞大债务，来改革人人皆知的不公平、不合理、负担沉重的财政制度，以及粉碎封建制度枷锁而为民族开辟新的生产资源。

[四]

早在菲力浦五世时代, 弗朗西斯科·贝尼托·索莱达就说过: “西班牙的一切不幸都起源于西班牙的 togados(法官)”^①。而卡斯蒂利亚王政会议是西班牙的有害的司法等级中的最高一级。王政会议是在唐·胡安和亨利的动乱时代²⁸⁹产生的, 菲力浦二世发现它是异端裁判所的一个应有的补充机构, 因而加强了它的作用。这个王政会议利用这个时期的灾难和后来几个国王的软弱无能, 把各种各样的权力都攫取并集中到它的手中, 而且把当时西班牙各个王国的立法者和最高行政机关的职权都纳入自己的最高司法职权之内。因此按权力来说, 王政会议甚至超过了法国的议会, ——除了它从来没站到人民这边以外, 在很多方面同法国议会是相似的。王政会议既然是旧西班牙最有威力的政权机关, 当然也就是新西班牙和不久前产生的有削弱王政会议最高权威的危险的人民政权的死敌。王政会议既然位于司法系统的最高等级, 成为保护那里一切弊端和特权的化身, 自然也拥有全部由西班牙司法制度产生的无数具有权威的利益。因此它是革命决不能与之妥协的一种力量; 革命本身要想不被

① 贝·索莱达《历史和政治纪要。揭示笃信基督教的路易十四的思想, 以使西班牙摆脱因合法国王查理三世而蒙受的不幸》1703年维也纳版第147页。——编者注

这个力量消灭,就必须消灭这个力量。正像我们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王政会议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拿破仑,由于这种叛变行为,它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但是中央洪达在开始执政这一天,竟愚蠢地把它成立一事通知王政会议,并要求王政会议宣誓效忠于自己;同时洪达宣布,在得到王政会议的效忠誓词以后,要把誓词散发给王国的其他所有政权机关。这种引起整个革命派公开谴责的轻率步骤向王政会议表明:中央洪达需要它的支持;于是王政会议振作起精神来,在几天假装犹豫之后,便心怀恶意地表示服从洪达,但在它宣誓效忠的同时就表现出它的反动意图,具体说就是建议洪达根据第三法规第二节第十五条²⁹⁰把机构成员减少到三五人,从而自行解散,并下令封禁各省洪达。在法军回到马德里,并解散了王政会议以后,中央洪达还不以自己的第一次失策为满足,竟愚蠢地恢复这个会议,即成立了联合会议——王政会议同古代历届王政会议残余的重新结合。这样一来,洪达主动地为反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这个机关同洪达本身相抗衡,一直用阴谋诡计来给洪达制造困难和障碍,挑唆洪达采取最反人民的措施,然后又摆出一副激于义愤的姿态,在愤激的群众面前侮辱洪达。不言而喻,先是承认然后是恢复王政会议的中央洪达,是没有能力在西班牙的司法体制方面或在完全不适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方面进行任何改革的。

尽管参加西班牙起义的主要是民族分子和宗教分子,然而在起义的头两年曾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倾向;这一点从当时所有省洪达的宣言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些甚至大部分是由特权阶级代表人物草拟的宣言也没有忽略谴责旧制度和许诺进行根本改革。这一点从中央洪达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央洪达在1808年10月26日第一个告人民书中说:

“由一些最庸碌无能之辈实行了二十年的暴政，把国家带到了灭亡的边缘；仇恨和争执使国民脱离了政府，不久前还受压迫、受屈辱的国民，意识不到自己力量的强大，而在制度方面和法律方面又都找不到防止政府为非作歹的保障，便认为外国人的统治还没有这个坑害他们的可恶的暴政那样可恨。这种总是反复无常而且几乎总是不公正的独裁统治，拖延得太久了；国民的耐性、国民对秩序的热爱和国民的一片忠诚长期被糟蹋；现在到了应当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法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此各个部门都必须进行改革，洪达将要建立各种主管部门委员会，一切有关政府和当局的文书应当送交这些委员会。”①

洪达 1809 年 10 月 28 日在塞维利亚发表的宣言中说：

“低能腐朽的专制制度为法国人的暴政开辟了道路。听任在这个国家里重复以前的种种恶行，就等于把你们送到波拿巴手中一样，是一种滔天罪行。”②

中央洪达看来进行了一种最新奇的分工：霍韦利亚诺斯派被允许宣告民族的革命意图并记录成文，而弗洛里达布朗卡派却有权直接予以否定，并以反革命行动抵制革命空想。不管怎样，对我们重要的是，根据省洪达对中央洪达的承认，可以证明一个经常被否认的事实，即在第一次西班牙起义时期是有革命意图存在的。

至于中央洪达如何利用国民的善良意志、形势的逼迫和直接危险的存在所提供的改革机会，这可以根据中央洪达派到各省去的专员对各该省的影响来判断。一位西班牙的作家直率地告诉我们，中央洪达苦于人才不足，因此竭力把优秀的成员留在中央，把那些能力很差的人派到外地去。这些专员被授权主持各省洪达和代表中央洪达全部职能。关于这些专员的活动，我们只举几个例子：罗曼纳将

① 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1823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634、637—638 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1827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497—498 页。——编者注

军,因为他永远来回行军,并且总是在他刚好不在的时候才发生战斗,所以西班牙士兵称他为朝圣侯爵。这个被苏尔特打败、并被赶出加利西亚的罗曼纳,以中央洪达专员的身份来到了阿斯图里亚斯。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借口同奥维耶多省洪达争吵,因为奥维耶多省洪达采取的坚决的革命措施引起了特权阶级的仇恨。他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省洪达,以自己的同伙取而代之。奈将军听到这个一向同心协力抵抗法国人的省份里发生了这些争执,就立刻进军阿斯图里亚斯,把朝圣侯爵赶出去,进入奥维耶多,并把这个城市洗劫了三天。1809年底法国人撤出加利西亚以后,我们的这位侯爵和中央洪达专员便进入拉科鲁尼亚,把一切公务大权集于一身,撤销了在起义时纷纷成立的区洪达,任命了军事总督来代替它们,并且威胁说要追究这些洪达成员,实际上的确对爱国者进行了追究,同时又对那些投靠敌人的家伙非常宽大,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是一个恶毒的、无能的、反复无常的蠢货。究竟加利西亚省洪达和区洪达的过错在哪里呢?它们曾下令毫无例外地在一切阶级和一切人中进行普遍征兵;它们向资产阶级和地主征税;它们降低国家官员的薪俸;它们命令宗教团体把自己金库中的现款交由洪达支配。总之,它们采取了革命措施。自从这位大名鼎鼎的朝圣侯爵来到以后,阿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这两个以普遍抵抗法国人著称的省份,只要没有受到入侵的直接危险,就不再参加独立战争了。

在巴伦西亚,当人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可以处理自己一切事务的时候,似乎出现了新的前景,但是这里的革命精神也被中央政府的势力摧残了。中央洪达不满足于把这个省置于一个叫做唐·何塞·卡罗的将军领导之下,派去了“自己的”专员拉瓦索拉男爵。这位男爵指控省洪达不服从上级的某些命令,并撤销了省洪达的一个

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曾经合理地停止了对空缺的主教、圣职和骑士首领的任命,而把这里省下的收入拨归军医院使用)。因此中央洪达和巴伦西亚洪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巴伦西亚后来在苏舍元帅的自由主义治理时代就不再有所作为;因此在斐迪南七世回来以后,竭力拥戴斐迪南七世为国王,以对抗当时的革命政府。

在加的斯这个当时西班牙最革命的地方,中央洪达专员、愚蠢的爱虚荣的比列尔侯爵的到来,引起了1809年2月22日和23日的起义,这次起义如果不是及时地转变为独立战争,可能会造成极惨痛的后果。

中央洪达在任命自己的专员时表现出深思熟虑,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洛桑诺·德托雷斯先生派到威灵顿那里去当代表,此人一面自甘卑贱地对这位英国将军阿谀逢迎,一面又秘密地通知洪达说,将军抱怨粮食不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威灵顿发现这个卑鄙家伙的两面手法以后,就羞辱他而把他赶出了自己的军营。

中央洪达所处的条件极有利于执行它在告西班牙人民书中所宣布的任务:

“在这可怕的危机中,你们向独立迈进一步就不能不同时向自由前进一步,这似乎是天意。”^①

当洪达掌握政权的时候,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旧的政权或者不存在了,或者暗自投敌了,或者由于敌人的命令解散了。在拯救祖国的名义下,任何把财产和政权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社会改革,洪达没有不可以实行

^① 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1827年伦敦版第2卷第497页。——编者注

的。洪达有着同当年法国的公安委员会²⁹¹一样的幸运,即国内的激变有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作后盾;不仅如此,中央洪达面前还摆着某些省洪达在形势逼迫下表现出大胆的主动精神的范例。但是中央洪达不仅仅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赘,而且实际地起了反革命的作用:它恢复旧的政权,重新铸造已被打断的锁链,它到处扑灭革命火焰,它自己无所作为,又妨碍别人有所作为。中央洪达在塞维利亚的时候,甚至英国托利党政府都认为需要在1809年7月20日向洪达发出照会,坚决抗议洪达采取反革命方针,“担心洪达会窒息公众的热情”。有人说过,西班牙忍受革命的一切苦难而得不到革命的力量。假如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的话,那就是它对中央洪达所作的致命的判决。

由于还没有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了解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我们认为就更加有必要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央洪达的统治下,才有可能把保卫国家的现实和迫切任务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就像一个幽灵碰撞到实际生活一样必然垮台。议会所处的环境完全相反:被赶到了比利牛斯半岛的尖角上、被法国占领军割断同王国的主要部分的联系有两年之久的议会,只代表观念上的西班牙,而真实的西班牙已被占领或在进行战斗。在议会治理期间,西班牙分成了两部分。在莱昂岛有思想而无行动,在西班牙的其他地方则有行动而无思想。反之,在中央洪达时期,需要有最高级政府的特殊软弱、无能和恶意,才能使西班牙战争同西班牙革命脱离。同法国和英国著作家所说的相反,议会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革命派,而是因为它们的先行者是反动派,错过了革命行动的适当时机。现代西班牙著作家虽然对英国和法国批评家很恼火,但是看来无力驳倒他们,所以直到今

天还得忍着痛苦去听德·普拉特神父的刻薄话：

“西班牙人民很像喜欢挨揍的斯加纳列尔的妻子。”^①

^① 多·普拉特《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第224页。——编者注

〔五〕

中央洪达未能保卫祖国,因为它未能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它既然意识到本身的软弱、它的政权的不稳固和它的极其不得人心,那么除了采用不体面的诡计和无聊的阴谋以外,还能采取其他什么手段去克服将军们在一切革命时代所共有的勾心斗角、互相忌妒和骄横自负呢?既然洪达对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经常怀有恐惧和猜疑的情绪,我们就可以充分相信威灵顿在1809年9月1日写给他哥哥韦尔斯利侯爵的信中所说的话:

“就我对中央洪达的行动的观察,我非常担心它在分配自己的力量时,考虑更多的不是军事防御和战斗行动,而是政治阴谋和为了达到微小的政治目的。”^①

在革命时期一切从属关系都松弛了,只有使将军们严格服从国民纪律才能恢复军纪。正如中央洪达由于其不合理的体制从来无法控制将军们一样,将军们也总是无法控制士兵,因此直到战争结束,西班牙军队始终没有达到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一般水平。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因缺乏粮食、被服和一切军需物资而更加严重了,因为军队的士气,按拿破仑的说法,完全取决于它的物质条件。中央洪达不

^① 威·沃尔顿《1808—1836年底的西班牙革命》1837年伦敦版第1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能按时给军队供应,因为可怜的诗入金塔纳所写的宣言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而为了强制执行他们的法令,他们必须采用曾被中央洪达谴责过的各省所采用的那些革命的措施。甚至宣布无人特殊和无人例外的普遍征兵制和准许一切西班牙人担任各级军官,也是省洪达的功劳而不是中央洪达的功劳。如果说西班牙军队的失败是由中央洪达的无能和反革命性造成的,那么这些灾难又转过来使政府更加沮丧,并使政府招致人民的鄙视和怀疑,从而更加依赖骄横而又无能的军事首领。

西班牙的正规军虽然到处失败,还是到处都出现。它被击溃了二十多次,却永远准备着迎击敌人,而且在失败以后往往以更大的力量重新出现。打它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很快就跑掉,人员伤亡通常很少,而对丢失战场又不在乎。哪怕队伍溃退到山谷,他们一定会重新集合起来,在得到新的增援之后,又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刻出现,他们即使不能抵抗法国军队,至少也能使之不断地调动,不得不分散兵力。西班牙人比俄国人幸运,他们甚至不必去死以求死而复生。

1809年11月19日奥卡尼亚附近的溃败是西班牙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正规战;从这时以后他们就只进行游击战了。放弃正规战的事实本身就证明,全国政府中心在地方中心面前黯然失色了。在正规军的惨败成为经常现象的时候,各地都出现了游击队,人民群众几乎不理睬全国范围内的失败,为自己的英雄在地方上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在这一点上,至少中央洪达也像民众一样产生了错觉。“《日报》对游击队活动的报道比对奥卡尼亚会战的报道更详细些。”

游击队抵抗拿破仑就像唐·吉珂德用矛枪对抗火药一样,只是结果不同而已。《奥地利军事杂志》(1821年第1期)说:

“这些游击队真像随身带着自己的作战基地，每一次对他们作战都因作战目标不知去向而结束。”

游击战的历史应当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整省整省的居民拿起武器进行游击战，如在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在第二个时期，由西班牙军队的残部、从法军中开小差的西班牙人和走私者等等组成的游击队，不依赖任何外国势力，根据自身的直接利益，把战争作为自己的事业进行下去。幸运的机会和情况经常使整个整个的区集合在他们的旗帜下。只要游击队是这样组织起来，他们整个说来并不显得可怕，但是对法国人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为真正武装人民奠定了基础。每当出现缴获战利品的机会或计划好一次联合行动的时候，人民群众中最积极和最勇敢的分子便出来参加游击队。游击队根据自己当前的任务，或者神速地扑向俘获对象，或者严阵以待。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整天窥伺着警戒的敌人，以便截获一个通讯兵或者缴获军需品。小米纳就是这样抓到了约瑟夫·波拿巴任命的纳瓦拉总督，而胡利安就是这样俘掳了罗德里戈城司令官。战斗刚一结束，就各走各的路，武装的人们马上向四方散去，参加战斗的农民镇静地回到自己平日的劳动中去，“甚至他们外出都没有被人发觉”。结果所有道路的交通都被封锁了。敌人成千上万，但一个也发现不了。派通讯兵出去没有不被抓走的，运送军需品没有不被截获的，总之，法国人的每一个行动都被几百双眼睛盯着。同时又不可能一下子消灭这种组织形式。法国人不得时刻戒备着对付这些出没无常的敌人，这些敌人看不见，又到处存在，因为每一个山头都是他们的掩蔽所。德·普拉特神父说：

“把法国人弄得精疲力尽的不是会战，也不是战斗，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不断骚扰，这些敌人遭到追击就立刻在人民群众中消失，不久又以新的力量重新

出现,寓言中被蚊子折磨得要死的狮子,就是法国军队的真实写照。”^①

在第三个时期,游击队仿效了正规军的方式,他们的队伍增加到3 000—6 000人,不再同整个的区紧密联系,而落入几个利用游击队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首领手里。游击队体制上的这种变化使得法国人在战斗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人数增长了队伍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神出鬼没,现在游击队经常遭到意外的袭击,经常被打败,被打散,而且在长时期内无力骚扰法军。

把游击战的三个时期同西班牙的政治史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三个时期体现政府的反革命情绪使人民热情逐步冷却下来的相应的阶段。游击战是以全体居民群众的起义开始的,然后由依靠整个的区为后盾的游击队继续进行,最后则导致非正规部队的形成,这些非正规部队或者沦为强盗匪帮,或者变成正规团队。

同最高政府失掉联系,纪律松懈,经常失败,六年间骨干不断形成、解散而又重新组合,这一切情况必然使整个西班牙军队具有御用军的特性,并且同样地可以使它变成领导者手中的工具或鞭子。将军们自己不可避免地或者参加中央政府,或者同它闹翻,或者搞阴谋反对它,而且总是用武力来左右政治。例如,库埃斯塔(似乎后来他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各次会战中的失败越多而越受到中央洪达的信任)就是靠与王政会议共同策划阴谋和拘捕中央洪达中的莱昂代表起家的。中央洪达的成员莫尔拉将军把马德里弃给法军以后,自己就投到波拿巴主义者的阵营中去了。无赖朝圣侯爵也是中央洪达的成员,他同吹牛家弗朗西斯科·帕拉福克斯、恶棍蒙蒂霍以及兴风作

^① 多·普拉特《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第202—203页。——编者注

浪的塞维利亚洪达共同密谋反对中央洪达。卡斯塔尼奥斯、布拉克、拉比斯瓦尔(奥当奈尔家族中的一员)三位将军在议会的治理期间相继作为摄政并且不断玩弄阴谋,最后,巴伦西亚军区司令官唐·哈维埃尔·埃利奥干脆把西班牙交给了斐迪南七世去随意支配。毫无疑问,御用军的要素,在将军中比在他们的军队中滋长得更加浓厚。

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游击队从基干军的优秀军官中得到了一部分像波利埃尔、拉西、埃罗勒斯和比利亚坎帕这样的指挥官,基干军后来也从过去的游击队的领袖中得到了像米纳、恩佩西纳多等等这样的指挥官;因此军队和游击队又是西班牙社会的最革命的部分,因为他们来自一切阶层,包括所有没有受过中央政府的使人消沉的影响的、刚烈的、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年;这些青年摆脱了旧制度的桎梏,其中的一部分如列戈等是在法国当过几年俘虏之后回国的。因此对于西班牙军队在后来的时局动荡中所起的影响——无论是在它发起革命的时候或者是它以自己的御用军特性损害革命的时候——我们都不必感到奇怪。

至于游击队,显然他们经过了多年流血战斗,养成了流浪的习惯,有强烈的仇恨心,好报复,爱劫掠,因而在和平时期他们必然成为最危险的暴徒,随时准备以任何政党或任何原则的名义,为那些能够提供优厚军饷和抢劫机会的人奔走卖命。

[六]

1810年9月24日在莱昂岛召开了非常议会;1811年2月20日会议迁往加的斯举行;1812年3月19日议会颁布了新宪法;1813年9月20日议会会议结束,距会议开幕已经三年了。

这届议会是在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情况下召开的。从来没有一个立法议会的代表是来自世界上这样不同的地区,从来没有一个立法议会妄想控制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如此广大的领土,如此多样的种族和如此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但是,整个西班牙几乎都被法军占领着,议会本身实际上被敌军切断了同全国的联系并被赶到了一小块土地上,不得不在包围着它、兵临城下的敌军面前进行立法工作。议会当时应该在莱昂岛上的遥远的角落为新西班牙奠定基础,就像他们的祖先过去在卡瓦丹加和索夫拉韦山区所做的那样²⁹²。1812年的宪法,后来在维罗纳会议上被全欧洲的君主们痛斥为雅各宾主义的最煽惑人心的发明的这部宪法,正是在僧侣的和专制的古老西班牙似乎完全投入反对革命的神圣战争时期的产物,这个奇怪的现象如何解释呢?另一方面,这同一部宪法,当遇到波旁王朝的一个活人时,它就突然不见了,像幻影一样(西班牙的历史学家说它像梦幻一样)消失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说这个宪法的产生是一个谜,那么它的死亡同样是一个谜。为了揭开这个谜,我们现在打算先简单地考察一下西班牙人曾两次(最初是1820—1823

年,以后是1836年)企图实施的这部1812年宪法。

1812年宪法共有384条,包括以下10章:(1)西班牙国家和西班牙人;(2)西班牙领土、宗教、政府和西班牙公民;(3)议会;(4)国王;(5)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和司法部门;(6)省和自治体的内部管理;(7)赋税;(8)国家武装力量;(9)国民教育;(10)宪法的遵行和修改宪法的程序。

宪法虽然根据以下原则:

“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实质上是国民,因此制定根本法的权力绝对只属于国民”,

但是宪法又宣布分权制,根据这个分权制,“立法权同时属于议会和国王”,“执行法律权属于国王”,而

“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方面法律的运用完全属于法庭,在任何情况下,议会或国王都不得行使司法权,不得干涉待判决的案件,或命令重判已经确定的判决”。

国民代表的选举以人口为基础,每七万居民选一名代表。议会由一院即众议院组成,议员由普选产生。全体西班牙人除了家仆、破产者和罪犯以外,都享有选举权。1830年以后,不会阅读书写的公民不得享受选举权。但是选举是间接的,因为选举分三级:教区、区、省。议员没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诚然,根据第九十二条,“当选为议员必须具有从私人不动产中取得的一定的年收入”,但是第九十三条把第九十二条的实行日期推迟到议会在将来的会议上宣布这一条开始实行的时候。国王没有解散议会和命令议会休会的权利;议会每年于3月1日在首都开会,不需要召集,会议至少连续开三个月。

议会每两年选举一次,任何议员不得连续在两届议会中连任,也

就是说只有间隔两年后才能再度当选为议员。议员不得申请并接受国王的奖金、津贴和荣誉称号。国务大臣、枢密官和一切宫廷官员不能当选为议员。由政府雇佣的国家官员不能被他执行职务所在的省选为议员。为了抵补议员的开支,各省应当按照本届议会在任期的第二年为下届议员规定的数目支付议员日薪。议会不得在国王在场时进行辩论。如果大臣代表国王要向议会传达某种意见,他们可以在议会认为适当的时候并以议会认为适当的方式到场,可以发言,但举行表决时不得在场。国王、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和摄政者都必须在议会面前宣誓遵守宪法,议会决定王位继承顺序方面可能产生的一切实际上和法律上的问题,以及必要时选出摄政者。一切有关攻守同盟、援外补助金和通商的条约,在批准前都要经议会同意,议会可以准许或禁止外国军队进入王国境内,明令设置或撤销宪法所规定的司法机构中的职务,以及设置或撤销国家官职;议会每年根据国王的建议确定平时和战时陆海军的员额,向陆军、海军和国民军的一切部门发布命令;确定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按年确定赋税,必要时可以举借国债,决定一切有关货币和度量衡的问题;规定国民教育的总计划,保障新闻出版的自由,采取措施监督大臣切实尽职等等。国王只有中止审议一项法案的否决权,他可以在连续两次议会会议期间行使这种否决权,但是如果同一法案被下一年的议会第三次提出并且通过,那么就等于得到了国王的同意,而国王也必须同意。每次会议结束前,议会任命七人组成常设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在议会下一次会议召开以前在首都进行工作,有监督严格遵守宪法和执行法律的全权;常设委员会应向议会的下一次会议报告一切被发现的违法事件,在紧急时期有权召开议会的非常会议。国王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离开王国。国王结婚也要得到议会的许可。王室的每年收

入总额由议会规定。

枢密院是国王下面的唯一的私人会议,大臣不得参加,枢密院共有 40 名成员,其中有 4 名僧侣代表,4 名西班牙大贵族,其他是重要的行政官员,这些人全部都是国王从议会提出的 120 人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但是任何现届议员都不能担任枢密官,任何一个枢密官都不能接受国王给的职务、荣誉称号或任命。没有最高法院认可的充分理由不能解除枢密官的职务。议会规定枢密官的薪俸,国王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必须听取枢密官的意见,教会职务和司法职务的人选由枢密官提名。涉及司法部门的条款规定:撤销一切旧的法院,建立新的司法机构,成立最高法院以审理被弹劾的大臣和处理一切有关枢密官、法官等的免职和停职的案件。任何案件没有预先证实已经经过调解都不得审理。废除刑讯、强迫罚款和没收财产。除军事法庭和宗教法庭以外,撤销一切特别法庭,但对军事法庭和宗教法庭的判决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为了进行城市和自治体的内部管理(凡是没有自治体的地方,应由至少拥有 1 000 人口的区组成自治体),成立由警察局长(*corregidor*)担任主席并由一名或几名治安法官、市政官和参事官组成的地方自治机关,同时这些人员全部由普选产生。任何实际上由国王雇用和任命的国家官员都不能被选为治安法官、市政官或参事官。担任市政职务是尽社会职责,没有正当理由任何人也不得推卸。市政机关在省代表团的监督下履行自己的职责。

各省的政治管理由国王任命的总督(*gefefe politico*)负责。总督同代表团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担任代表团的主席,代表团由各区在普选应届议会时选出。省代表团由七名委员组成,由一名议会支薪的秘书协助。代表团每年会期不得超过 90 天。按照代表团的权力和职

责来看,它们相当于议会的常设委员会。地方自治机关和省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在就职时都要宣誓忠于宪法。至于纳税,全体西班牙人毫无例外地都要根据自己的财产按比例纳税,以应国家开支。除港口和边境外,撤销一切海关。所有西班牙人毫无例外都要服兵役,并且除正规军外,各省还根据人口和条件由各省居民组成国民军。最后,1812年宪法从生效之日起八年内甚至在细节上都不得更改、增添或修正。

议会在拟订这一幅西班牙国家的新蓝图时,自然了解到,这样一部现代的政治宪法同旧的社会制度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议会公布了一整套从根本上改造市民社会的法令。例如,议会废除了异端裁判所,取消了封建主司法权和一切与之有关的独占、禁止和剥夺的封建特权,例如:狩猎权、捕鱼权、森林和磨房的使用权等等,只有当初通过购买而取得的以及可以赎回的权利例外。议会废除了全国的什一税,停止任命一切与执行神职无关的教会职务,采取了步骤来取消寺院和没收其财产。

议会曾打算把西班牙的广大荒地、王室领地和自治体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出卖这些土地的一半以清偿国债,把另一部分分成小块分给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作为爱国酬金,把第三部分也是分成小块无偿地分给那些渴望得到土地但又无力购买土地的贫农。议会准许在牧场和其他土地上围篱(以前是禁止这样做的)。它废除了禁止把牧场变成耕地或把耕地变为牧场的不合理的法律,普遍地使农业摆脱了以往专横的不合理的规章。议会废除了一切有关租佃契约的封建法律,也包括这样一条法律:有长子继承权的继承者可以不承认前辈所订立的租佃契约,因为契约在承诺者死去后就被认为失效了。它取消了所谓圣地亚哥的祷礼,一种古老的贡税,就是由某些省

的农民贡纳一定数量的上等粮食和上等酒,主要是用来供养大主教和圣地亚哥神父会。议会颁布了实施高额累进税的法令,如此等等。

保住已经开始起义的美洲殖民地是议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议会承认美洲和欧洲的西班牙人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宣布没有任何例外的大赦,颁布了反对压迫美洲和亚洲土著人的命令,废除了所谓 *mitas*, *repartimientos*²⁹³ 等等,取消了水银垄断权,并且在欧洲第一个废除了奴隶贩卖。

1812年宪法一方面遭到责难,例如斐迪南七世本人(见他1814年5月4日的敕令)就责难它纯粹是由一批不顾西班牙历史传统的幻想家移植到西班牙土地上来的1791年的法国宪法²⁹⁴的复制品。另一方面,例如德·普拉特神父在《现代的西班牙革命》一书中则认为议会毫无必要地死抓住从西班牙古法典²⁹⁶抄来的、属于国王权力受到大贵族的非常特权限制的那一封建时代的陈旧条文。

实际情况是:1812年宪法是翻版的古法典,但这是按法国革命的精神理解的、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的古法典。例如起义的权利一般认为是1793年雅各宾党的宪法的最大胆的创造之一²⁹⁵,其实起义权在索夫拉韦的古法典中就出现了,那里起义权叫结社权。这种权利在卡斯蒂利亚的古宪法中也有。根据索夫拉韦法典,国王没有事先得到议会的同意,不得媾和,不得宣战,也不得缔结条约。应当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监督严格遵守宪法的七人组成的议会常设委员会,在阿拉贡早就有了,在这个君主国各主要议会联合成一个单一的议会时在卡斯蒂利亚也建立过。直到法国人入侵的时候,在纳瓦拉王国还有类似的委员会。至于成立由国王从议会提出的120人名单中确定人选并由议会支薪的枢密院,那么这个1812年宪法的唯一的创造是宪法的制订者回忆起西班牙君主国各个时代的宫廷权奸的

致命影响而提出的。枢密院的设立,是为了抵消宫廷权奸的作用。此外,过去也存在过类似的机关。例如在斐迪南四世时代,总有卡斯蒂利亚各城市指派的 12 名代表在国王身边担任枢密官,而在 1419 年,城市代表抱怨说,他们的全权代表不再被准许参加王政会议了。高级官员和宫廷官员不得参加议会以及议员不得接受国王赐予的荣誉称号或者职务,初看起来似乎是从 1791 年宪法抄袭来的,并且似乎是从 1812 年宪法所承认的现代分权制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我们不仅在卡斯蒂利亚古宪法中见过类似的先例,而且我们知道,起义的人民不止一次地打死过那些接受国王的称号和职务的议员。至于议会在国王年幼时指定摄政的权利,卡斯蒂利亚的古议会在 14 世纪长期有未成年国王在位的时期就经常行使。

诚然,加的斯议会剥夺了国王向来行使的召开和解散议会以及命令议会休会的权力;但是正是国王扩大自己特权的这种方式,使议会已形同虚设,因此取消国王的这种权力的必要性就十分明显了。以上举出的事实足以证明,1812 年宪法的最明显的特点——竭力限制王权的倾向(这种倾向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戈多伊的可鄙的专制使人记忆犹新,一想到它就令人厌恶),是渊源于西班牙的古法典。加的斯议会不过把这一监督权从特权等级的手中转到国民代表机关的手中。古法典如何使西班牙国王恐惧,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当 1805 年需要新编一部西班牙法律全书时,国王发出一道敕令,命令删除前一版本中所包含的以及由于君主国软弱而国王不得不同自己的诸侯订立损害国王主权的协议的那一时代所保留的一切封建权利的遗迹。

假如由普选产生议员是新事物,那么不应该忘记:1812 年议会和所有的洪达都是由普选产生的;因而限制普选就是侵犯人民已经

争得的权利；最后，也不应该忘记，在西班牙几乎所有不动产都以死手权固定下来的时代，实行财产资格上的限制，会剥夺大部分居民的选举权。

把人民代表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议院中，绝对不是像好唠叨的英国托利党人所说的那样，是1791年法国宪法的翻版。我们的读者已经知道，^①从查理一世(查理五世皇帝)的时候起，贵族和僧侣就失掉了他们在卡斯蒂利亚议会中的席位。但是甚至在议会分为代表不同等级的**brazos**(支派)的时期，议会除了席位分开之外，也是在一个共同会场里开会，而且在一起表决。在直到法国入侵时议会还在起实际作用的少数几个省份中间，诚然纳瓦拉还保持着按等级召开议会的旧习惯，但是在巴斯克各省，十分民主的会议就连僧侣代表也不准参加。而且，即使僧侣和贵族还保持自己的可憎的特权，他们也早已不是作为古议会的结构的基础的那种独立政治团体了。

加的斯议会规定把司法权同行政权分开，这早在18世纪就是西班牙最开明的国务活动家所要求的；由于对王政会议的共同憎恨，人们从革命一开始就了解到，必须把司法机关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宪法中有关地方自治的一节，正像我们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纯粹是西班牙的产物。议会只是恢复了旧的地方自治制度，但是消除了它的中世纪的特点。至于说到省代表团(它在省的内部管理方面具有像地方自治机关在自治体的行政管理方面那样的权力)，议会是仿照法国入侵时期在纳瓦拉、比斯开和阿斯图里亚斯还存在着类似机关而设立的。议会废除免服兵役权，不过是承认了独立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战争时期已经普遍流行的惯例。废除异端裁判所同样不过是认可了既成事实,因为这个神职机关虽然由中央洪达恢复了,但是它不敢恢复自己的职权,那里的神职成员在识时务地等待更好的时机,薪俸到手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取缔封建性弊端,议会甚至连霍韦利亚诺斯于1795年代表马德里经济协会向王政会议提出的著名的报告书中所主张的改革都没有完全做到。

18世纪后半叶奉行开明专制主义的大臣弗洛里达布朗卡和康波曼内斯早在这方面采取了某些步骤。此外也不应该忘记,与议会同时活动的,还有马德里的法国政府,它在所有被拿破仑军队占领的省份里彻底消灭了一切寺院的和封建的机构,建立了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波拿巴派的报纸把起义完全说成是英国利用僧侣和异端裁判所的支持而进行的阴谋和收买的结果。同这个外国人的政府抗衡对议会的决议产生了怎样的良好影响,可以从以下一点看出来:甚至中央洪达在1809年9月宣布召开议会的法令中也对西班牙人这样说:

“诽谤我们的人硬说我们在为维护我们的腐败政府的积弊和根深蒂固的恶习而斗争。你们要让他们看到,你们是在为祖国的幸福和独立而斗争,从现在起,你们不愿意再听命于独夫的朝令夕改和反复无常”等等。^①

另一方面,在1812年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出18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教权派横行时期的黑暗传统实行妥协的明显迹象。只要引证第十二条就够了。根据这一条

“西班牙国家的宗教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的、使徒的和罗马天主教的教,即唯一的真正的宗教。西班牙国家以英明的、公正的法律保护它,禁止信

^① 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1827年伦敦版第2卷第482页。——编者注

奉其他任何宗教”。

第一七三条要求国王在即位时向议会作如下的宣誓：

“叨蒙上帝恩泽并根据西班牙君主国的宪法而为西班牙的国王，我，凭着万能的主和神圣的福音书起誓，我将保卫和维护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的和使徒的教，而决不容许在西班牙王国有其他任何宗教。”

这样，根据对 1812 年宪法的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就得出以下结论：1812 年宪法绝对不是 1791 年法国宪法的盲从的模仿，而是西班牙精神生活的独特的产物，它恢复了古老的民族的制度，进行了 18 世纪最著名的著作家和国务活动家大声疾呼地要求的改革，并且对公众的偏见作了必要的让步。

[七]

有一些情况促使西班牙最进步的人士在加的斯会合。当举行选举的时候,运动还没有平静下来,而由于中央洪达不得人心,选民都把视线转向中央洪达的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有很大一部分是本国的革命少数派。出席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几乎都是卡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最民主的省份的代表;莱昂、巴伦西亚、穆尔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的代表要在三个月以后才能到达。在最反动的内地各省,除了个别例外,不准进行议会选举。在旧西班牙的各个王国、城市和小镇,法国军队不准举行选举,而在新西班牙的海外各省,议员又不能及时来到,因此就从许多为了躲避战争而逃难到加的斯的人中间,从许多南美人、商人、土著以及其他一些由于好奇和办理私事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们中间,补选了一些人作为上述地方的代表。这样一来,这些地方的代表就是一些要比在当地举行选举所能选出的代表更倾向革新,更富有18世纪思想的人。最后,议会在加的斯召开这一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个城市早就以西班牙王国中最激进的城市著称,它与其说像西班牙城市,不如说像美洲城市。本地居民挤满了议会大厅的旁听席,每当反动派的反对立场表现得太可恶的时候,他们就从外面施加威胁和压力,加以抑制。

不过,如果认为议会的大多数是拥护改革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议会分为三派:奴才派、自由派(这些派别的名称已从西班牙传

遍整个欧洲)和“美洲派”²⁹⁶;美洲派依自己的特定利益为转移,有时同这一派一起投票,有时同那一派一起投票。奴才派人数最多,但是对于作为少数派的自由派的积极、奋发和热情却十分赞赏。占奴才派多数的教会代表随时准备牺牲国王的特权,一则由于他们没有忘记教会同国家对立,一则也是想猎取声望,从而保持本阶级的特权和陋习。在辩论普选权、一院制、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中止否决权等问题时,教会派总是联合自由派中最民主的部分来反对英国宪法的拥护者。教会派的成员之一卡涅多神父,即后来的布尔戈斯大主教和无情迫害自由派的人物,对穆尼奥斯-托雷罗先生(也是神父,不过属于自由派)说过以下的话:

“您容许国王保持极大的权力,但是您身为教士,就必须维护教会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国王的利益。”^①

自由派不得不同教会派妥协,这一点我们在1812年宪法的某些条款中已经看到了。当讨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时候,神父们宣称新闻出版自由是“违反宗教”的。经过热烈辩论并宣布任何人都无权不经特别许可而公开表示自己的信念的原则以后,议会一致通过了加有“政治的”一词的修正案,结果这项自由被削去一半,同时根据特伦托公会议²⁹⁷的决定,一切有关宗教问题的作品仍旧由教会检查。1813年8月18日,在通过了惩办一切谋叛宪法的人的法令后,又通过一项法令,宣布任何旨在迫使西班牙国家放弃罗马天主教的阴谋者将被看作叛国者而处死刑。在圣地亚哥的祷礼被取消后,又通过了一项补救性的决议,宣布圣特雷萨为西班牙的庇护女神。此外,自由派

① 曼·马尔利安尼《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9年巴塞罗那版第47页。——编者注

还注意到,在宪法颁布以前不提出和通过关于废除异端裁判所、什一税、寺院等的法令。但是正是从这时起,议会内的奴才派和议会外的教士的反对活动,已经变得不可抑制了。

在了解了足以说明 1812 年宪法的产生和特点的情况以后,还得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斐迪南七世一回国,宪法就不经反抗而突然销声匿迹了。世界上很少见到这样可耻的景象。1814 年 4 月 16 日斐迪南来到巴伦西亚,

“欢腾的人们把自己套在他的马车上,用各种言语和动作表示自己情愿戴上旧的枷锁。他们高呼:‘国王的绝对权力万岁!打倒宪法!’”^①

所有大城市的所谓大广场本来都已改名为宪法广场,而且竖有刻着这些字的石碑。在巴伦西亚,这块石碑被换上一块“临时的”木碑,上面写着“斐迪南七世王家广场”的字样。在塞维利亚,群众罢免了全部现任官员,而推选其他人担任旧政权所设的职务以代替他们,并且要求新的当局恢复异端裁判所。从阿兰胡埃斯到马德里,斐迪南的车子都是被人们拉着走。当国王下车的时候,群众把他举起来,得意扬扬地让聚集在王宫前面的广大人群看,然后把他抬到他的寓所。在马德里议会大厦的大门顶上,原来有青铜铸的用大写字母构成的“自由”这个词;一伙人急忙向大厦跑去,要挖掉这个词;他们架起梯子,从石壁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挖,当每个字母被扔到大街上时,那些观众一再欢呼。接着人们又尽可能地把大量的议会记录、自由派的报纸和小册子集中起来,同时他们排成游行队伍,以宗教团体、黑衣僧和白衣僧为前导,把这些文件都堆在市内一个广场上焚

^① 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1832 年版第 3 卷第 899 页。——编者注

化,作为一种政治上的信仰行动²⁷⁹,然后举行大弥撒,高唱“赞美我主”作为教会取得胜利的感恩表示。但是,也许比城市平民(他们一部分是被收买的,而且像那不勒斯的流浪汉²⁹⁸一样宁愿接受国王和僧侣粗暴的统治,而不愿接受资产阶级的适度的制度)的这些无耻示威更重要的事情是,奴才派在第二次普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13年9月20日制宪议会改为普通议会,并于1814年1月15日将会址从加的斯迁往马德里。

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说明了革命派自己怎样唤起并加强了人们的旧有偏见,企图利用这些偏见作为反对拿破仑的武器。以后我们又看到,中央洪达怎样在唯一能把社会改造和保卫国家的措施结合起来的时期,竭力阻止二者结合,并压制各省的革命愿望。加的斯议会的情况则相反,它在自己的存在期间有很长一段时期同西班牙失掉了一切联系,在法国军队离开以前,甚至不可能使自己的宪法和带根本性的法令让人民知道。议会的出现可以说是事后了。它发现社会处于疲惫、衰竭、苦难的状态,——这是完全在西班牙领土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战争中,军队老是在运动,今天的政府很少能维持到明天,而在整个西班牙,从加的斯到潘普洛纳,从格拉纳达到萨拉曼卡,几乎六年当中没有一天停止过流血。决不能期望这样一个社会会对任何政治宪法的抽象优点非常敏感。但是当1812年宪法第一次在马德里和其他法军撤出的省份公布的时候,人民群众毕竟还是“欢欣鼓舞”地欢迎它,因为人民群众总是希望只要更换一下政府他们就可以一下子摆脱社会灾难。一旦发现宪法并没有这种神奇的力量,迫切的期望也就变成了失望,而这些热情的南方人从失望到仇恨只不过一步之隔。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情况特别使人民对立宪制度失去好感。议会

颁布了惩办亲法派即约瑟夫派^①的十分严厉的法令。议会之所以颁布这些法令部分地是迫于人民群众和反动派(后者当他们逼出来的法令刚一实行,就立刻转过来反对议会)渴望复仇的压力。当时一万多个家庭因此被放逐。一大批小霸主急忙回到法军撤出的各省,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专横政权,开始用侦查、起诉、关押、异端裁判所审讯等手段来对付每一个归附法国人、接受法国人的职务和向法国人购买国家财产等等的人。摄政者不是以和解与谨慎的方式使法国政权易于过渡到民族政权,而是竭力加重困难,挑起在这种政权变化时必然产生的激动情绪。但是为什么摄政者这样做呢?为的是制造口实要求议会停止实行1812年宪法,他们说这部宪法起了极其有害的作用。我们要顺便指出,所有摄政,这些议会任命的最高行政机关,往往都是由议会和议会制定的宪法的最坚决的敌人组成的。产生这个奇怪事实的原因很简单:在任命行政机关的时候,美洲派总是同奴才派联合起来,他们认为削弱这个机关是美洲殖民地脱离宗主国而赢得独立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们相信,要达到这个目的,光有行政机关和主权议会之间的一般的意见分歧是不够的。议会对地租以及对工商业收入实行单一直接税也在人民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引起更大不满的是禁止约瑟夫·波拿巴时代铸造的一切西班牙硬币流通并命令持有者兑换国币的不合理法令,以及禁止法国货币流通,和公布法国货币兑换国币的汇率。由于这一汇率同1808年法国人规定的法国货币和西班牙货币的汇率相差太大,许多人蒙受了很大的损失。这项不合理的措施也刺激已经高涨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更加上涨。

对推翻1812年宪法和恢复旧制度最关切的阶级——大贵族、教

^① 指约瑟夫·波拿巴的拥护者。——编者注

士、修道士和法官——不放过机会把当时人民的愤慨情绪(这是因为不满在西班牙实行立宪制度所造成的不幸局面)推向顶点。这就是为什么奴才派在 1813 年普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

国王担心的只是军队会有某些严重的反抗,但是埃利奥将军和他的军官违背了他们对宪法所作的誓言,在巴伦西亚宣布斐迪南七世为国王,对宪法一字不提。其他军事指挥官很快就效法了埃利奥的做法。

斐迪南七世在 1814 年 5 月 4 日的敕令中宣布解散马德里议会,并废止 1812 年宪法,同时他声明自己非常厌恶专制政体,答应按照旧的合法的形式召开议会,规定合理的新闻出版自由,等等。他履行诺言采用的是同西班牙人民对他的欢迎相称的唯一方式:他废除了议会的一切法令,恢复了过去的一切制度,恢复了神圣的异端裁判所,号召被他祖父赶走的耶稣会士回来,把洪达、议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最著名的成员遣送到战船上、非洲监狱或流放地,最后是,下令枪决最著名的游击队领袖波利埃尔和德·拉西。

[八]

1819 年间,在加的斯近郊集中了一支远征军,它的使命是为西班牙重新征服起义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现任大臣莱奥波多·奥当奈尔的叔父恩里克·奥当奈尔——拉比斯瓦尔伯爵被任命为指挥。过去几次对西属美洲的远征,由于从 1814 年以来曾葬送了 14 000 人,并且是以最齷齪、最残忍的方式进行的,曾引起军队的极端反感,而且常常被看作是除去不满部队的恶毒手段。有一些军官如基罗加、洛佩斯·巴尼奥斯、圣米格尔(当前西班牙的拉斐德)、奥达利和阿尔科·阿圭罗等便决定利用士兵的不满情绪,摆脱桎梏并宣布 1812 年宪法²²²。拉比斯瓦尔在被邀请参加密谋时,曾答应领导这个运动。密谋的首领们和他共同约定 1819 年 7 月 9 日举行远征军的总检阅,在这个时候发动一次决定性的突击。拉比斯瓦尔真的出席检阅了,但是他没有履行诺言,反而下令将参加密谋的部队解除武装,逮捕了基罗加和其他首领并派信使给马德里送报告,夸说他防止了一场最惊人的灾难。于是他升了官并获得了勋章,但是宫廷了解事件的更确切的情况以后,便撤销了他的指挥官职务,并命令他回首都。此人正是那位在 1814 年国王回到西班牙时派自己的参谋带着两封信去见斐迪南的拉比斯瓦尔。因为当时距离国王太远,无法观察到国王的动向并使自己的行动同国王保持一致,于是,拉比斯瓦尔从设想国王会宣誓效忠 1812 年宪法出发,在一封信中把

这部宪法大事颂扬一番。相反地,在另一封信中他把立宪制度描绘成一种无政府的混乱不堪的制度,祝贺斐迪南废除这个制度,并表示他和他的军队愿意为反对叛乱分子、煽动分子以及王权和宗教的敌人而斗争。参谋递上了第二封信,波旁王朝欣然接受了。

尽管在远征军中已经显露出暴动的征兆,以当时的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圣费南多公爵为首的马德里政府,仍然执意保持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和无所事事的态度,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加速远征或者把军队分散到各港口城市去。然而,当时驻扎在拉斯卡韦萨斯-德圣胡安阿斯图里亚斯第二营的指挥官唐·拉斐尔·德·列戈同监狱里逃出的基罗加、圣米格尔和莱昂岛上的其他军事长官约好同时开始行动。列戈的处境是最困难的。拉斯卡韦萨斯这个小镇三面紧靠着远征军的大本营:在乌特雷拉有骑兵司令部,在莱夫里哈有第二步兵师司令部,而在阿尔科斯有一个侦察营,总司令和司令部也在这里。尽管驻扎在阿尔科斯的那个营在人数上比阿斯图里亚斯营多一倍,列戈仍然在1820年1月1日出其不意地举行了袭击,逮捕了总司令及其司令部人员。当天,列戈就在这个小镇宣布了1812年的宪法,推举了临时镇长,他不满足于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还把侦察兵争取到了自己方面来,而且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在博尔诺斯的阿拉贡营,从博尔诺斯进击赫雷斯,又从这里进击圣玛丽亚港,每到一处都宣布了宪法,直到他打到莱昂岛(1月7日)为止,在莱昂岛,他把战俘收容在圣彼得堡垒。基罗加和他的拥护者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用同样出其不意的袭击夺取苏阿索桥和莱昂岛,而若无其事地一直等到1月2日列戈的使者奥尔特腊给他们送来关于攻克阿尔科斯和俘获司令部人员的正式情报。

由基罗加担任总指挥的革命军的全部兵力不过5 000人,它在

进攻加的斯城门受挫后,就被围困在莱昂岛上了。

圣米格尔说:“我们的处境是异乎寻常的;革命 25 天来毫无进展,没有丧失也没有赢得一寸土地,它成了政治上最奇特的现象之一。”^①

各省似乎都处于昏睡之中。1 月就是这样过去了。1 月底,列戈担心莱昂岛上的革命火焰会熄灭,于是不顾基罗加和其他首领的劝告,组织了一支 1 500 人的机动纵队,一直在比它强大十倍的军队的追击下穿过了安达卢西亚的部分地区;并且在阿尔赫西拉斯、龙达、马拉加、科尔多瓦和其他城市宣布了宪法;所到之处,受到居民的亲切欢迎,但是没有在任何地方促成重大的起义。可是,追击他的军队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毫无结果地来回行军,看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避免同他的小股军队接触。政府军的行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列戈从 1820 年 1 月 27 日开始的远征在 3 月 11 日结束了,这时他被迫遣散了还跟着他的为数不多的一批人。他的小股部队的瓦解不是因为决战,而是因为疲惫、同敌人的频繁的小冲突、疾病和开小差所造成。同时,岛上起义军的情况也极为不妙。他们一直受到海上和陆上的封锁,而在加的斯城里,每一个支持他们的事业的表示都被当地守军镇压下去了。3 月 11 日,列戈在莫雷纳山解散了他的曾为宪法而斗争的队伍,而 3 月 9 日,斐迪南七世却在马德里被迫宣誓效忠宪法,这样一来,列戈恰好在对自已的事业最后绝望的两天之前真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列戈纵队的进军重新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省都满怀希望,热切地注视着 he 的一举一动。人们的心被列戈大胆出击、进军神

^① 埃·圣米格尔《西班牙内战》1836 年马德里版。——编者注

速和击退顽敌所激动,便想象他得到了胜利和人民大众的增援,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事实。关于列戈进军的消息,传到最远的省份就更夸大了,于是这些距离举事地点最远的省份首先表示支持 1812 年宪法。西班牙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到就连假消息都足以引起革命的程度了。要知道,1848 年的大风暴也完全是假消息引起的。

在加利西亚、巴伦西亚、萨拉戈萨、巴塞罗那和潘普洛纳等地相继爆发了起义;恩里克·奥当奈尔,也就是被国王派去抗击列戈远征的拉比斯瓦尔伯爵,不仅表示愿意去武装征讨列戈,而且表示要消灭他的小股军队并且活捉列戈本人。他只请求任命他为拉曼查省驻军指挥官并供给他个人需要的钱。国王亲自交给他一小口袋金币和给拉曼查驻军的相应的命令。但是,拉比斯瓦尔一到达奥卡尼亚就当上了军队的指挥官并宣布了 1812 年宪法。他倒戈的消息使马德里的舆论大为振奋,这里一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刻爆发了革命。于是,政府开始跟革命方面谈判。在 3 月 6 日的敕令中,国王提出召开按 *Estamentos*(等级)组成的古议会,但是对这道敕令任何人——旧君主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不满意。他从法国回国时也许过同样的诺言,但没有兑现。3 月 7 日夜间,马德里举行了革命的示威游行。《日报》在 3 月 8 日发表了斐迪南七世答应宣誓效忠 1812 年宪法的敕令。国王的敕令说:

“让我们全体,首先是我,真心诚意地走上宪法的道路。”

3 月 9 日,人民占领了王宫,国王只是在恢复了 1814 年的马德里地方自治机关并在它面前宣誓效忠宪法之后,才保全了自己。他并不在乎作出假的誓言,因为他身旁永远有一个忏悔神父,准备彻底宽恕他的一切可能的罪孽。与此同时,成立了咨询性洪达。它的第

一个法令就是释放政治犯并号召政治流亡者回国。这时监狱大门打开了,首届立宪内阁的成员从监狱里走向王宫。组成首届内阁的卡斯特罗、埃雷罗斯和奥·阿尔圭列斯等就是 1814 年的蒙难者和 1812 年的议员²⁹⁹。由于斐迪南的父亲查理四世退位而产生的高兴是在斐迪南即位时出现的热情的真正源泉,同样地由于斐迪南七世退位而产生的高兴是宣布 1812 宪法时万民欢腾的源泉。至于宪法本身,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宪法拟定好,就已经没有可以宣布它的国土了。对大多数西班牙人民来说,宪法好像古代雅典人所崇拜的未知神一样。

目前,英国著作家显然是为了影射当前的西班牙革命,一方面断言 1820 年运动仅仅是一种军事密谋,另一方面又断言它完全是俄国阴谋的产物。这两种说法都是同样荒谬的。关于军事暴动,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它遭到失败,革命却赢得了胜利。另外,应当揭开的谜并不在于 5 000 名士兵的密谋,而在于这个密谋得到了拥有 35 000 人的军队和拥有 1 200 万人的最忠诚的国民的拥护。革命所以从军队中开始,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要知道,在西班牙君主国的一切机构中,只有军队在独立战争中完全起了变化和受到革命的熏陶。至于说俄国的阴谋,俄国曾经在西班牙革命中插过手;在所有欧洲国家当中,俄国第一个通过 1812 年 7 月 20 日在大卢基签订的条约承认了 1812 年宪法³⁰⁰;它第一个煽动 1820 年革命,第一个向斐迪南七世告发革命,第一个在半岛几个地点点燃反革命的火炬,第一个在欧洲面前郑重地对革命提出抗议,最后还迫使法国发动了对这次革命的武装干涉。这一切都是不可否认的。当时俄国大使泰季谢夫先生无疑是马德里宫廷中最显赫的人物,是宫廷权奸的秘密首领。他把一个下流的恶棍安东尼奥·乌加尔泰引进了宫廷,并使他成为

那些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在朋党中发号施令的僧侣和侍从的头目。乌加尔泰依靠泰季谢夫的帮助被任命为去南美的远征军总指挥，圣费南多公爵又依靠乌加尔泰的帮助被任命为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乌加尔泰向俄国购买了一批破旧船只供远征南美之用，为此他获得一枚圣安娜勋章。危机刚开始时，乌加尔泰阻挠斐迪南和他的弟弟唐·卡洛斯亲自到军队中去。他是圣费南多公爵采取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和一些措施的幕后指使者，这些措施引起一位在巴黎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于1836年作出如下评价：

“人们不能不相信，政府本身在提供推翻现存制度的手段。”^①

如果再加上美国总统在他的咨文中²⁵⁹赞扬俄国向他保证不容许西班牙干涉南美殖民地事务这一件怪事，那么对俄国在西班牙革命中起的作用就没有丝毫疑问了。然而，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是否说明1820年革命是俄国挑起的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事实只说明，俄国曾阻止西班牙政府去对抗革命。革命迟早必将推翻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的教权的君主制度，这可以从下面得到证明：(1)从1814年起一个接着一个的密谋；(2)正统派入侵西班牙时期，昂古莱姆公爵手下的法国专员德·马蒂尼亚克先生的证词；(3)另一个不容否认的证词——斐迪南七世本人的证词。

1814年，米纳打算在纳瓦拉发动起义，曾经发出了第一个反抗的信号，号召拿起武器，并且进入潘普洛纳要塞，但是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追随者，逃到法国去了。1815年，独立战争时最负盛名的游击

① 《对1820—1823年和1836年西班牙革命的批判分析》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41页。——编者注

英雄之一波利埃尔将军在拉科鲁尼亚宣布了宪法。他被斩首了。1816年,理查打算在马德里逮捕国王。他被绞死了。1817年,律师纳瓦罗因为宣布1812年宪法而和四个同谋者在巴伦西亚的断头台上牺牲了。同年,无畏的拉西将军以同样的罪名在马略卡岛被枪决。1818年,维达尔上校、索拉上尉和其他一些在巴伦西亚宣布宪法的人兵败被杀。莱昂岛上的密谋只不过是1808—1814年多少英雄好汉抛头颅洒热血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的最后一曲罢了。

德·马蒂尼亚克先生在1832年,即死前不久发表的《西班牙及其革命》^①一书中说道:

“自从斐迪南七世恢复专制政权以来已经两年了,而由于人类渣滓所构成的宫廷权奸的作怪,剥夺人权的现象还继续存在。整个国家机器完全颠倒过来:到处是漫无秩序、凋敝和混乱——捐税十分不公平,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借债不讲信用,国家最急迫的需要无法满足,军队没有薪饷,法官依靠受贿度日,腐败无能的行政当局无力改善什么东西,甚至无力维持现状。因此,人民怨声载道。新的立宪制度受到大城市、工商阶级、自由职业者、军队和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表示反对它的只有僧侣,而农民对它茫然无知。”^②

这就是在破坏这个新制度上出过大力的人物之一的死前供状。斐迪南七世在1817年3月1日、4月11日、6月1日^③和1819年11月24日等敕令中完全证实了马蒂尼亚克先生的话,而且他这样来结束他的哀叹:

① 此书的作者应是曼·马尔利安尼。——编者注

② 让·德·马蒂尼亚克《1823年西班牙革命和干涉的历史概述》1832年巴黎版第1卷第160页。——编者注

③ 原文此处的时间顺序为:1817年6月1日、1817年3月1日及4月11日。——编者注

“民怨沸腾，响彻耳际”。

这说明，用不着什么泰季谢夫去发动西班牙的革命。

[九]

德·夏多勃里昂先生在他的《维罗纳会议》一书中指责1820—1823年的西班牙革命只不过是人们穿着卡斯蒂利亚服装在马德里舞台上拙劣地模仿法国的第一次革命而已。他忘记了,从封建社会状态中产生的、正在向着资产阶级文明发展的不同国家人民的斗争,除了带有因种族、国家、语言、各时代的风俗习惯和装束而形成的特殊色彩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不同的地方。他的责难使我们想起了那个总是觉得所有迷人的姑娘都是模仿她自己妙龄时代风姿的愚蠢的老太婆。

拥护和反对1812年宪法的书多如牛毛。1820年这部宪法的宣布,引起了旧社会的成见和利益与新社会的要求和渴望之间达三年之久的斗争。现代国家在它们的复兴时代最初制定的一切宪章的特点就是不能实行,1812年宪法给自己深深地打上了同样的印记。在产生这些宪章的革命时代,它们不能实行,这并不是因为这段或那段条文,而只是因为它们的立宪性质。在立宪时代,它们也不适宜,因为其中充满了大量与社会复兴的曙光不可分离的虚妄之谈。例如,1791年的法兰西宪法在当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反动的,然而,在1830年它却被认为犯了雅各宾主义的罪。为什么这样?这是因为,在1791年,王权和它所代表的旧社会的统治势力,还没有经历过使它们能够同新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并在这些因素当中获得地位的变

革。当时需要的是挫败旧社会抵抗的革命行动，而不是一部批准不可能实现的同旧社会妥协的宪法。相反地，在1830年，当君主立宪制已成为可能时，不言而喻，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解放。这时，1791年宪法就像是带煽动性的与时代相悖的东西。这一说法对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同样适用，但是毕竟应该把1791年的法国和1820年的西班牙区别开来；1791年的宪法只是在两年的革命进军之中佯称要停一下，而1812年的宪法则要完全取代革命。头一天还在实行东方专制制度的西班牙，一天后却要实行以君主为首的民主制度。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只有在西班牙的历史中才会出现。当斐迪南七世在1823年以及在1814年恢复专制权力时，他大笔一挥便把无统治者的革命时期的一切成果勾销了。革命者方面也以同样的方式行动。1854年，西班牙人民又开始拥护被他们在1843年赶下台的埃斯帕特罗。1814年，革命因斐迪南拒绝宣誓效忠加的斯宪法而终止。1820年，革命又以强迫他宣誓效忠同一部宪法而开始。他重新召开了两年前被他解散的那个议会，还任命了在1814年被他放逐或囚禁的那些人当大臣。西班牙的一切党派都同样顽固地从他们本国的史书中撕掉那些不是由他们自己撰写的篇章。由此就出现了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这些骇人听闻的强求，这一连串无止境的、不间断的争斗。由此也就出现了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或许会遭到挫折，但决不会沦为灰心丧气，消沉气馁。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一届立宪内阁（可以认为唐·奥古斯丁·阿尔圭列斯是它的领导人）是由1814年的殉道者组成的。总的说来，殉道者是非常危险的政治人物。他们好像时而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失败而感到羞耻；时而又妄自夸大过去的功绩而得意扬扬；他们

由于勇气受挫而喜欢渲染自己的能力；他们往往宣称，随着他们的当政，革命时代已经结束；从他们的复出这一事实可以想象出革命的正统主义者或正统的革命者的性格；他们对于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对手的那些新人极端忌妒；他们常常在对反革命的畏惧和对无政府状态的忧虑这两种情绪之间摇来摆去；他们迫于形势而同反革命妥协，为的是不使自己被无政府状态冲走，或者不致看到他们一向称之为进步的真正界限的东西被废除。阿尔圭列斯内阁就是如此。从它成立到议会举行会议的这四个月期间，国家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被暂时停止了。各省和首都成立了洪达，出现了由秘密团体支持的公共俱乐部，第一次出版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不受限制的报纸刊物，起草了慷慨激昂的请愿书，谱写了爱国歌曲，建立了一些立宪纪念碑，举行了一个国家重新获得自由时必定会举行的兴高采烈的示威游行，但是并没有发生报复行为，没有犯罪事件，而且还表现出宽宏大量——这对惯于恣意妄为的南方人来说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议会终于在 1820 年 7 月 9 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议员们选举塞维利亚的大主教唐·何塞·埃斯皮加为议长。斐迪南七世就像在地方自治机关面前做过的那样，在他们面前把手搁在《福音》上宣誓遵守加的斯宪法。他说：“一旦人民不应遭受的过度的苦难促使人民明确表达出长期受压抑的愿望，我就立即遵循他们所指明的方针，并宣誓效忠 1812 年议会通过的宪法。从现在起，国王和人民都拥有了各自的合法权利。我的决定是自由的和自愿的。”斐迪南七世是一个暴虐的懦夫，一只胆小如兔的老虎，一个对权力贪得无厌又不会行使权力的人，一个觊觎专制权力以便能够把它抛弃给自己的侍从的亲王。不过，他有一样东西值得骄傲，那就是他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伪善

本领。他在获胜的敌人面前拼命羞辱自己，从中得到某种满足，因为他已决定要在适当时机用更加令人震惊的背信弃义行为来洗雪耻辱。当他是拿破仑的阶下囚时，他低声下气地对拿破仑给他提供的庇护表示感激，并乞求波拿巴家族把一个公主嫁给他。当波拿巴和他商议恢复他的西班牙王位时，他在一封阿谀奉承的信中郑重声明，如果他对他的恩人皇帝陛下忘恩负义的话，他将是最卑鄙的人，并将成为欧洲的笑柄；而与此同时，他又写了一封密信给马德里的摄政政府，告诉他们，他一旦获得自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叛法兰西皇帝。1820年7月9日，当他重新宣誓效忠宪法，声称他的“决定是自由的和自愿的”时，西班牙伯爵^①和蓬斯先生已经在巴黎以他的名义同马松阁派³⁰¹，也就是同阿图瓦伯爵（后来是查理十世）及其党羽商谈取消这一部宪法的手段了。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些时刻，例如在颁布1823年9月30日法令时，他以最庄严的方式许下虚假的诺言，仅仅是想要享受一下违反这些诺言的乐趣，而别无其他的目的。他把反对革命这一重要任务完全交给旧制度的拥护者，而他自己则用各种办法来给他们撑腰打气，但在内心却有所保留，即如果他们时运不济的话，就否认同他们有关系，如果他们被击败的话，就不动声色地把他们交给他们的敌人去发泄愤怒。对于他人的痛苦，再没有哪一个人像他那样以斯多亚主义的态度漠然处之。鉴于他所居的官职，他只限于用戏谑宪法的办法来表示他对宪法的憎恶。比如，有一天晚上，他给内阁首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他已任命孔塔多尔将军为陆军大臣。大臣们在军人名册上找不到孔塔多尔的名字，当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孔塔多尔

^① 指西班牙的卡洛斯。——编者注

竟然是一个已达 84 岁高龄、早已根本不能服役的前骑兵连长时，他们大吃一惊。被如此傲慢无礼地愚弄了的大臣们提交了辞职书。斐迪南成功地调解了这一冲突后，提议让马丁内斯·罗德里格斯将军代替孔塔多尔，此人也像他的前任一样鲜为人知。再次进行了棘手的调查，结果查明马丁内斯在巴达霍斯时曾因一个火药桶爆炸头部受了重伤，从那次事故以后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在施展消极的厚颜无耻和积极的卑怯畏缩这些诈术方面可以说是行家里手的斐迪南七世，从不惧怕挑起一场灾难，因为他已决定要对危险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手段。

议会中的多数派是由加的斯议会议员即宪法的起草者和他们的拥护者组成的，而少数派则是由那些曾经密谋恢复宪法的人组成的。多数派把宪法的宣布看作是革命的终结，而少数派则把这看作是革命的开始；前者控制着政权，而后者仍在努力夺取政权；1812 年的自由派与 1820 年的自由派即温和派²⁴²和激进派²⁶³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 1812 年的自由派在议会中占优势，那么 1820 年的自由派则在俱乐部、报纸刊物和大街上占上风。如果说前者支配着行政机构，那么后者则依靠岛^①上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实力由于一些没有参加军事叛乱的团的加入而得以增强，他们仍集结在安达卢西亚，由列戈统率，基罗加已被作为议员派往议会。为了摧毁激进派的据点，陆军大臣阿马利亚斯侯爵解散了岛上的军队。在此之前，列戈已被调离了他的部队，借口是他已被任命为加利西亚的军区司令官。岛上这支在西班牙配得上军队这个名称的唯一部队刚被解散，在卡斯蒂利亚和西班牙北部就出现了第一批“信军”³⁰²匪帮。

① 指莱昂岛。——编者注

列戈应他的拥护者们的秘密召唤,于8月31日突然出现在马德里,他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人们用狂热的欢呼和洋溢的热情迎接他,而内阁则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场大灾难。他们决定把他流放到奥维耶多去——岛上的其他几名军官也被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了。虽然列戈对这种专横的放逐行为没有反抗,但是大臣们害怕他在夜间离开马德里时可能发生暴动,因此下令卫戍部队全副武装占领重要地区,并在马德里的各条大街上到处架起了大炮。而第二天,阿尔圭列斯也在议会上提议应该采取措施来对付民众集会,这项提议受到托雷诺和马丁内斯·德·拉·罗萨的热情支持。从这一天(1820年9月7日)起,两个自由派公开决裂了,革命运动出现了倒退。1848年革命后最初几个星期在欧洲出现过的那种对秩序的狂热、对无休止的鼓动的抱怨、对民众情绪激昂的每一迹象的愤懑焦虑——这种种情绪现在立刻攫住了半岛上的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

议会第一次会议于1820年11月9日结束。和自己的忏悔神父维克多·萨埃茨一起退到埃斯库里亚尔去的斐迪南七世,认为这是伸出他的触角的适当时机。他不顾宪法的规定,便以一道国王的敕令,不经责任大臣副署签名,任命卡尔瓦哈尔将军接替比戈德特将军为新卡斯蒂利亚的军区司令官和马德里的司令,然而比戈德特将军拒绝把他的职位交给卡尔瓦哈尔。认为自己吃了败仗的内阁现在求助于当初正是遭到它迫害的那个党派。它起用了俱乐部的领袖人物并毕恭毕敬地接受了马德里地方自治机关坚持要国王回到马德里的措辞激烈的请愿书。在议会闭幕期间代行其职能的常设委员会也草拟了一份类似的请愿书。卫戍部队和民军进入戒备状态,俱乐部的会议变成了长期会议;老百姓对国王发出了带侮辱性的威胁;一些日报公开鼓吹造反,看来,群众马上就要前往埃斯库里亚尔接回国王。

斐迪南七世屈服于这场风暴的压力，撤销了他的令人厌恶的敕令，免去了他的反自由派忏悔神父的职务，于1820年11月21日携全家回到了马德里。他回来时的情景就像路易十六和他一家于1789年10月6日被迫从凡尔赛回到巴黎时的情景一样³⁰³。

内阁如果不撤销后来公开声称自己是专制君主制热诚拥护者的阿马利亚斯侯爵的陆军大臣职务，并把岛上的军官提升到各个指挥岗位上去作为对1820年的自由派的公正补偿的话，就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列戈被任命为阿拉贡的军区司令官，米纳被任命为加利西亚的军区司令官，而贝拉斯科则被任命为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区司令官。殉道者内阁由于在对反动势力的畏惧和对无政府状态的担忧这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竟弄到在所有党派面前都威信扫地了。至于王室，用一位彻头彻尾的正统派的话来说，它的地位“仍旧不稳，这是由于它已无法控制的保皇党人的轻率的狂热所造成的”。

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1821年3月1日)，国王完全用一个政治演说家的语调和手势来进行表演。他不满足于仅仅宣读内阁为他起草的演说，他对他们起草的讲稿加以修改，使之具有革命的意义，并且对一些最关键的段落，如有关叙述奥地利入侵那不勒斯³⁰⁴的段落，抹上更耀眼的色彩，从而使大臣们感到迷惑不解。有一阵大臣们异想天开地以为他们已改变了斐迪南七世的信念，但是不久，他们便醒悟了。斐迪南在结束演说时对他的大臣们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说他们使他遭受威胁和侮辱，如果政府拿出宪法所要求的和议会所希望的那种毅力和魄力，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国王的立宪演说只不过是解散内阁，并任命一个新内阁的前兆。使全国感到万分惊讶的是，新内阁中没有一个人倾向于新制度，没有一个人在前届政府中不曾扮演专制暴政的代理人的角色。

新内阁首脑费利乌先生从前是利马一个民军团的中尉和代表秘鲁出席 1812 年议会的议员,甚至在加的斯议会时代他就已经享有了唯利是图的狡猾的阴谋家的名声。外交大臣巴尔达希从前是一个与专制内阁首脑有关系的外交官。过去任卡斯蒂利亚市政参议员的佩莱格兰也夸耀说,他曾完全献身于神圣同盟的事业。这个甚至不能奢望在议会中有任何影响的内阁自称,它的目标是“恢复秩序和制止无政府状态。”于是,激进派再次被调离指挥岗位,全部权力都交给了奴才派;重要的职位都被委托给那些以仇恨现行制度而著称的人。在半岛上曾经出现的一切保皇党的阴谋都被罩上了一层帷幕,那些几乎全被人民投入监狱的阴谋策划者都被政府释放了。卡塔赫纳伯爵莫里略将军这时刚从大陆^①回来,他在那里因为残暴、独断专行、缺乏正直而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他还狂热地进行了一场六年之久的残杀同胞的战争³⁰⁵。他回国时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在那里他亲自参与了马松阁派的阴谋。巴黎的极端派报纸把他描绘成一个要恢复国王旧日的权利并破坏议会权力的人。当他到达马德里的时候,内阁对他毕恭毕敬、推崇备至,并任命他为马德里市和马德里省的司令。奴才派显然正期待这项任命以进行政变。一个有坚强毅力和强烈的正统派观点的将军唐·何塞·马丁内斯·圣马丁,以首都总督的身分同莫里略联合起来了。当马德里似乎笼罩在莫里略制造的恐怖之中时,卡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成了激烈争夺的场所。加的斯、塞维利亚和巴达霍斯爆发了公开起义,拒绝承认政府官员,宣称除非解散内阁,否则他们将拒绝服从国王的任何命令。国王在 1821 年 11 月 25 日发布的一份文告中号召议会制止这些骚乱。议会在一份由

① 此处指南美。——编者注

唐·何塞·玛丽亚·卡拉特拉瓦起草的复文中谴责了加的斯和塞维利亚发生的事情,但坚持要解散已经失去全国信任和“继续执政的道义力量”的内阁。尽管议会已投了不信任票,但是直到1822年3月1日新议会召开前48小时,斐迪南都认为不必任命一个新内阁。

新议会进行选举的时候,由于政府实行反革命方针和流传着奥地利准备进行武装干涉以阻止实施在那不勒斯宣布的西班牙宪法的消息³⁰⁶,同时由于“信军”匪帮在半岛各地掠夺征讨,人民群众的愤怒正在不断增长。因此,1820年的自由派,此时已称为激进派,当然获得了压倒多数。一个温和派评论说,“新立法机构中的压倒多数一无所有,因而什么也没有失去”。他们几乎全部来自资产阶级中的平民阶层和军队。他们和他们的前任之间的区别仅仅从以下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那就是后者推举塞维利亚的大主教为他们的议长,而前者则让拉斯卡韦萨斯的英雄——唐·拉斐尔·德·列戈坐上了议长席。

由1820年议会的前议员组成的新内阁,是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建立的,他接管了外交部。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此后在天真的伊萨伯拉的统治下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从前是短命的1814年马德里议会的议员;在反动时期曾遭到迫害;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温和派,西班牙最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家之一,他历来都是基佐的空论派³⁰⁷的忠实信徒,这些先生们的温和就在于他们具有一种固定的概念,即向人们的让步应当具有特别温和的性质。他们因建立了和旧制度的各种各样弊端与传统掺合在一起的自由派贵族政治和资产阶级最高统治而得意扬扬。受到法国驻马德里的连续两任大使——拉瓦尔·德·蒙莫朗西公爵和拉加尔德伯爵——极为殷勤的款待、讨好和阿谀奉承的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打算对1812年宪法进行

修改,成立贵族院,授与国王绝对否决权,规定下议院议员的财产资格和对报刊进行限制。从1834年到1836年,这个不可救药的空论家有幸目睹了他在1822年搞出的早产宪法的实施和废除。法国外交家们告诉他,土伊勒里宫会赞成建立与法国当时存在的制度相似的制度,而他自认为国王不会不喜欢一部曾使路易十八能为所欲为的宪章。然而,国王却用花言巧语欺骗了这位自命不凡的温和派,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他曾打算把马丁内斯直接从宫廷送上断头台。

按照权奸和内阁之间商定的计划,对一切阴谋活动都假装看不见,对混乱状态也任其到处蔓延,这样一来,日后就可以在法国的帮助下推行秩序,并为国家制定一部温和的宪章,能使它的起草者们享有永久的权力和势力并把特权阶级争取到新制度一边来。因而,与自由派的秘密协会²⁶⁶针锋相对,成立了一个以温和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秘密协会,即阿尼略协会,协会成员的行动要和内阁保持一致。在皇家卫队中分发了大量钱财,但是,当城市治安警察向内阁告发这一情况时,却受到了一顿奚落,因为内阁把这一报告看作是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征兆。驻扎在安达卢西亚的皇家胸甲骑兵团已经完全堕落了。在阿尼略协会成员被派去担任政治长官的各省,令人惊惶不安的报道四处流传。与此同时,各法庭都接到了秘密指令,要它们对可能归它们审理的一切密谋案件予以宽大处理。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在马德里掀起一场暴乱,以便和巴伦西亚的暴乱相呼应。1814年的变节者、当时被囚禁在该城的埃利奥将军,打算充当西班牙东部反革命的首领。只有一个团的巴伦西亚卫戍部队非常拥护埃利奥,因而对立宪制度怀有敌意。在议会会议上,贝特朗·德·利兹议员恳请大臣们把这支部队从巴伦西亚撤回,当大臣们拒不理睬时,他对他们提出了弹劾。举行暴乱的日期约定在(1822年)5月的最后一天即

圣斐迪南节。宫廷当时在阿兰胡埃斯。按照约定的信号，卫兵们冲上街头，他们在阿兰胡埃斯的暴徒的支持下，聚集在王宫前，大声高喊“我们的君主的绝对权力万岁！打倒宪法！”然而，这场骚乱立即被赛亚斯将军平息了。同时爆发的巴伦西亚团的叛乱，在经过一场民军和士兵之间的流血战斗之后也没有成功。阿兰胡埃斯和巴伦西亚的失败只起到了激怒自由派的作用。各地的党派都准备进行自卫。到处都动荡不安，只有大臣们仍在这场宣告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混乱中袖手旁观。

卡·马克思

(A) 中央洪达³⁰⁸

1808年9月26日(阿兰胡埃斯)——

1810年1月29日^①

应该预料到,在法军撤出马德里以后,拿破仑很快就会统帅更加强大的军队卷土重来。因此,共同的防御措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大家都感到,各省洪达的多头政治,应该让位给一个中央政府,因为拜伦会战³⁰⁹获胜之后它们之间的争吵越演越烈。但是,渴望保持自己已掌握的权力的各省洪达决定接受塞维利亚洪达³¹⁰的建议:由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中央政府,同时各省洪达保持对各自管辖区域的内部管辖权。这样,由各省洪达的三十四名代表组成的中央洪达³¹¹于1808年9月26日在阿兰胡埃斯召开会议,执政至1810年1月29日。中央洪达被入侵者从马德里赶到塞维利亚,又从塞维利亚赶到加的斯。当中央洪达从阿兰胡埃斯的王宫命令打仗的时候,法军已经占领了索莫山隘口;当它从塞维利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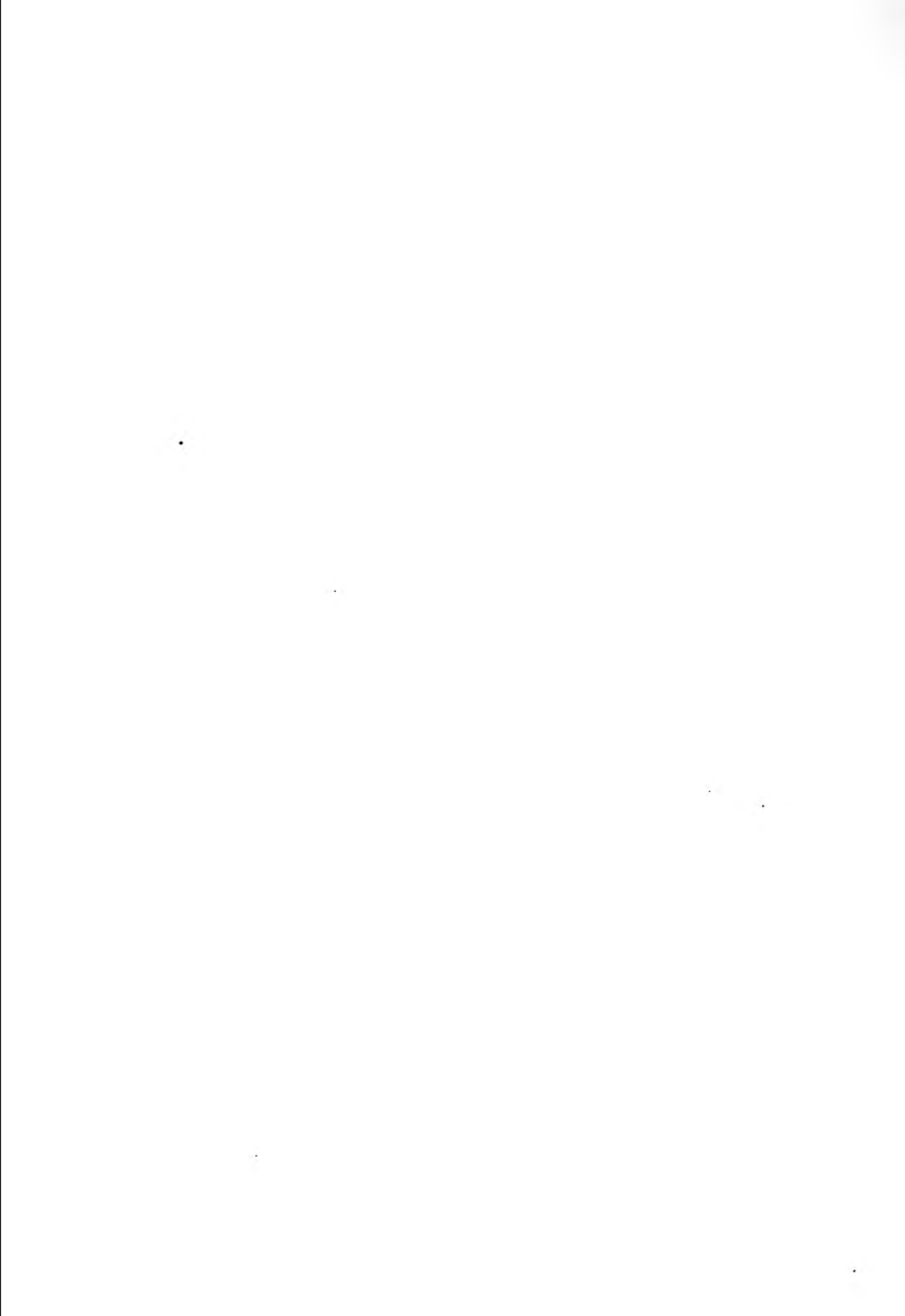
①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1809年1月,弗洛里达布朗卡)”。——编者注



A. L. ... 28 April 1887 (London) ... 1887

33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consisting of several paragraphs. The text is dense and appears to be a letter or a report. It contains various words and phrases, some of which are underlined or written in a different style. The handwriting is cursive and somewhat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slant and density of the script.



有力的宣言来宽慰人民的时候,莫雷纳山隘口已经失守了,苏尔特的军队已经拥进安达卢西亚。

当“陛下”——洪达僭取了这样的尊称^①——从塞维利亚逃跑的时候,加的斯成了唯一的避难所,如果阿尔布凯克公爵不把自己的军队调往加的斯,而是服从中央洪达的命令开往科尔多瓦,那么他自己的军队就会被切断,加的斯就会向法国人投降,西班牙的任何中央政权都会完蛋。在中央洪达执政期间,西班牙军队从地面上消失不见了。屈辱的失败接连不断,毁灭性的奥卡尼亚会战(1809年11月19日)是西班牙人最后一次阵地战,从此他们只能进行游击战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例外地遇到了英勇的抵抗,那也不是来自战场上的正规军,而只是来自被包围的城市,如萨拉戈萨和赫罗纳。

西班牙独立战争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往事对评价中央洪达已经足够了。把法国军队从西班牙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是建立中央洪达的主要目的,然而它显然没有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军队的成就在革命的条件下比平时更能反映出中央政府的性质。放弃正规战而采取游击战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全国中心在地方抵抗中心面前消失了。全国政府的垮台应该如何解释呢?

中央洪达的组成本身根本不符合它所承担的任务。洪达要成为一个专制政权,它的人数太多了,并且完全是偶然拼凑起来的,要想具有国民公会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单单中央洪达的权力是由各省洪达授予的这一情况就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自治倾向、恶念和任性的利己主义。中央洪达成员中两个最杰出的代表——查理三世的开明专制政府的八十高龄的大臣弗洛里达布朗卡和

^① 见本卷第522页。——编者注

好心的改革家霍韦利亚诺斯,后者由于在选择手段方面过于拘泥而从来没有把事情干到底——当然是无法克服国家所遭到的可怕危机的。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和不能稳定地保持对人民的控制,中央洪达经常处于恐惧状态,并且对它必须委以军事指挥权的将军们持怀疑态度。中央洪达的成员莫尔拉将军把马德里弃让给拿破仑后,投到了波拿巴主义者的阵营里。库埃斯塔先是拘捕了中央洪达中莱昂的代表并制定了恢复原先军区司令官³¹²的权力和皇家最高上诉法院的复辟计划;后来似乎他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各次会战中的失败越多而越赢得政府的信任。洪达不信任罗曼纳将军和拜伦会战的胜利者卡斯塔尼奥斯将军的充分根据是他们两人对它的公开敌意,前者通过他1809年10月4日于塞维利亚发表的告国民书表现出这种敌意,后者则通过成为摄政府的成员这一行动表现出这种敌意。阿尔布凯克公爵这个大概在当时所有西班牙将军中唯一能够进行大战的人,看来特别具有军事独裁者的一切危险的特性——这个理由就足以撤销他的一切重要指挥职务。我们可以充分相信威灵顿公爵在1809年9月1日写给他哥哥韦尔斯利侯爵的信中所说的:

“就我对中央洪达的行动的观察,我非常担心它在分配自己的力量时,考虑更多的不是军事防御和战斗行动,而是政治阴谋和为了达到微小的政治目的。”^①

西班牙的第一个人民的政府似乎因为预感到军人必定会在国内动乱中起卓越的作用而被吓倒了。由于自己的组成情况而丧失一切真正革命力量的中央洪达,不得不求助于搞小阴谋,以便钳制自己的

① 威·沃尔顿《1808—1836年底的西班牙革命》1837年伦敦版第1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将军们的权势。另一方面,因为无法同人民强烈要求的压力相对抗,它常常迫使将军们在那些只有经过最慎重的长期防御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采取仓促的行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9 月
22 日以前

第一次用原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西班牙——干涉³¹³

(草 稿)

……革命的旗帜，巴列斯特罗斯军队，这支军队在其长官投降之后，仍然集中在马拉加以北 10 里格^①的普列戈。

他^②在第二次加的斯远征³¹⁴时，被莫利托尔将军的一支部队俘虏，并被交给圣徒匪帮押解到马德里，在 11 月 7 日斐迪南返回首都前四天被处决。

“Non por su culpa caia Riego:

Traicion

D'un vil Borbon!”

(列戈之死，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个无耻的波旁分子的出卖。③)

① 英国旧长度单位，1 里格约等于 3 英里或 4.83 公里。——编者注

② 拉·列戈-涅努斯。——编者注

③ 特·麦·休斯《1845 年西班牙真相》1845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224 页。——编者注

斐迪南到达马德里时受到了信军³⁰²匪帮的军官的迎接和祝贺；他们走后，斐迪南向他的宫廷侍从感叹说：“这还是那些狗，只是脖套不同罢了。”

修士的人数在1822年达16 310人，而在1830年已增到61 727人，这就是说八年中增加了45 417人^①。从马德里《日报》上，我们看到，从1824年8月24日到9月24日的一个月间，就有1 200人被枪杀、绞死、肢解，而当时对付康姆尼罗斯³¹⁵、共济会会员等的野蛮法令还未公布。塞维利亚大学已被封闭许多年，取而代之的是一所训练斗牛的国立学校。

弗里德里希大帝同陆军大臣谈话时问道，在他看来，欧洲哪一个国家是最难摧毁的？当大帝看出这位大臣有些惶惑时，就替他回答说：

“那就是西班牙，因为它自己的政府多年以来就千方百计地想摧毁它，但总是枉然。”^②

弗里德里希大帝似乎预见到了斐迪南七世王朝。

1820—1823年革命的失败是容易解释的。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城市革命。而无知懒散、崇尚豪华的礼拜仪式的农村居民，只是这种他们实在不理解的党派斗争的消极的旁观者。在少数省份，农村居民破例积极参加了斗争，但是他们往往站在反革命一方——这个事实在西班牙这个“古旧风俗的仓库，保存着别处早已遗忘和废弃的一切东西的储藏所”是不足为奇的。这个国家在独立战

① 在手稿中，后面涂去了“职业乞丐”一词。——编者注

② 约·布拉姆森《关于西班牙北方的评论》1823年伦敦版第52页。——编者注

争时期,农民还带着从阿尔汉布拉宫的军火库中取来的马刺,并且使用远在15世纪战争时使用过的精美的古式的戟和矛。此外,西班牙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农民只要自己那可怜的茅舍门上方有一块石刻的贵族徽记,就自命是贵族,因此一般的农村居民虽然一贫如洗、屡遭掠夺,却从没有感到那种使封建欧洲其他各国农民甚为愤慨的强烈的屈辱之情。在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个人——莫里略将军和圣米格尔都承认革命派不懂得如何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联系起来。对革命确实怀有同情的莫里略从加利西亚写信给昂古莱姆公爵说:

“如果议会批准封建主权利法,从而剥夺大贵族的领地以利民众,殿下将会遇到为数众多的具有爱国情绪的难以对付的大军,他们将会自己组织起来,就像在同样情况下在法国发生过的情形那样。”^①

另一方面,圣米格尔(见他的《西班牙内战》1836年马德里版)说:

“自由派的最大错误,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民对新法律所抱的态度是冷漠的或敌对的。议会所颁布的许多旨在改善人民物质状况的法令,不能像客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迅速奏效。无论减少一半什一税,或者变卖寺院的田产,都无助于改善下层农民阶级的物质状况。相反,后一个措施由于把土地从能宽容体察的僧侣手里转到精打细算的资本家手中,引起了地租的提高,倒使老佃农的状况恶化。因此,已经因神圣的教会财产的转让而感到痛心的这个人数众多的阶级的迷信观念,在物质利益受到损害的影响下就更加严重了。”

革命的市民们既然这样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便不得不在反

① 《对1820—1823年和1836年西班牙革命的批判分析》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299—300页。——编者注

对大贵族、农村僧侣、宗教势力和代表所有这些社会腐朽分子的国王的斗争中，完全依靠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军队在革命阵营中这样僭取来的地位本身，加上这个军队脱离群众，就已经把他们变成一种对利用他们的人有危险而对他们本应打击的敌人无害的工具。最后，上层资产阶级，即所谓的温和派，不久便对革命事业冷淡了，后来也就背叛了革命事业，他们幻想可以凭借法国的干涉而取得政权，从而不费什么努力，不让平民染指，独享新社会的成果。

1820—1823年革命的积极成果，不应仅仅归结为促使相当广泛阶层的人民扩大眼界并使他们具有新的特性的一次大发酵。第二次复辟³¹⁶也是革命的产物，社会的腐朽分子在这次复辟中采取了同西班牙的民族生存决不相容的形式。复辟所做的主要事情是把敌对局面推进到如此尖锐的地步，以致任何妥协都毫无可能，一场血战不可避免。用利物浦勋爵本人的话来说，从来没有一次广泛的政治变革比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更少使用暴力，更少流血。因此，当我们看到1833—1843年的内战³¹⁷用火和剑消灭了西班牙社会中的腐朽分子^①，从而以凶狠野蛮的行为使自己背上恶名时，我们不应当把这个时代的残酷无情归咎于西班牙民族的某种特性，而应当归咎于曾在法国造成恐怖统治的同一环境力量。当法国人集中了，从而缩短了恐怖统治的时候，忠于自己传统的西班牙人却分散了，因而延长了恐怖统治。按照西班牙的传统，革命派就是把王位推翻了，也未必能取得胜利。在西班牙，革命要想获胜，它本身就必须以王位追求者的身份出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19世纪的西班牙当它能够使革命具有14世纪内战的形

① 在手稿中，后面涂去了“封建主和君主的政权”。——编者注

式时,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革命。正是斐迪南七世把一个君主的名字——伊萨伯拉的名字——给了革命,同时他又使唐·卡洛斯,这个奉行信仰行动²⁷⁹的唐·吉诃德,同老反革命结合起来。斐迪南七世的本性是至死不改的。既然他一生中都用虚伪的诺言欺骗自由派,他在临终时会不再玩欺骗奴才派的游戏吗?³¹⁸在宗教方面他永远是一个怀疑论者!他怎么也不能相信,竟然有人——哪怕是圣灵——会愚蠢到说出真话来。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11月
14日—21日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3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反动³¹⁹

1854年9月1日星期五于伦敦

由于维卡尔瓦罗的几个团进驻马德里，政府的反革命活动更加嚣张。用严厉苛刻的1842年补充法装饰起来的1837年带有限制性的新闻出版法³²⁰的恢复，绞杀了无力支付规定的保证金的那一部分“煽动性”报刊。24日，《街垒之声报》以《最后街垒》为标题出版了最后一号，因为该报的两个编辑被捕了。同一天，一家名为《议会报》的新的反动报纸代替了它。这家报纸的发刊词说：

“唐·圣米格尔军区司令官阁下对我们的友谊使我们深感荣幸，他惠然表示愿意为本报撰文。他的文章将用他的姓名的起首字母署名。本报领导人将努力保卫已战胜腐败政权的弊端和暴政的革命，但是他们只在制宪议会的范围内竖立自己的旗帜，重大的战斗正是应当在这里进行。”

这里指的是为伊萨伯拉二世和埃斯帕特罗而进行的重大的战斗。读者可能会记得，就是这位圣米格尔，曾经在各报刊举行的宴会上说，报刊除了它自身、常识和民众教育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良方，它是刀剑、苦役、流放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消灭的机构。可是就在他表示愿意为报刊撰文的那一天，他对剥夺他所珍惜的新

闻出版自由的法令,却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

在取消新闻出版自由之后,紧接着也是根据女王的敕令取消了集会的权利。在马德里,俱乐部被解散了,在各省,洪达和公安委员会²⁹¹,除内阁承认为“代理机构”的以外,也一律被解散了。根据内阁的法令,同盟俱乐部²⁶⁵被封闭了,尽管几天前埃斯帕特罗已同意担任它的名誉主席——这是伦敦《泰晤士报》枉费苦心竭力加以否认的一个事实。这个俱乐部曾经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内务大臣,指责马德里总督萨加斯蒂先生侵犯了新闻出版自由和集会的权利,坚持要求把他撤职。圣克鲁斯先生答复说,他不能指责一个国家官员采取了内阁会议所认可的措施。结果掀起了一场大风波;但是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宪法广场,事情也就平息下来了。一些小报刚被查封,那些至今一直维护萨加斯蒂的大报就开始同他争吵。为了堵住《人民呼声报》的嘴,就任命它的主编科拉第先生为大臣。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圆满,因为不能把所有的编辑都安插到内阁里去。

然而,反革命派的最大胆的举措是在内阁会议答应将克里斯蒂娜女王交由制宪议会处置之后允许她到里斯本去——对于这种背信行为,他们企图用提前没收克里斯蒂娜在西班牙的领地的办法来加以掩盖。大家知道,这些领地只是她的财产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样,克里斯蒂娜就很便宜地逃走了,现在我们得知圣路易斯也安全地到达了巴约讷。在这件事情上最有趣的是作出上述决定所采取的方式。26日,一些爱国者和国民自卫军人员集会讨论如何保障社会的安宁,他们指责政府摇摆不定和犹豫不决,并且决定派代表团找内阁,要求把克里斯蒂娜赶出宫去,当时她正在宫中策划扼杀自由的阴谋。非常可疑的是,埃斯帕特罗的两个侍卫官和萨加斯蒂本人也支持这个提议。结果内阁召开了会议,而会议的结果却是克里斯蒂娜

悄悄地溜走了。

25日,女王由她的所谓丈夫和阿斯图里亚斯亲王陪同在普拉多^①散步时,第一次公开露面。但是看来人们对她极其冷淡。

受命起草关于萨尔托里乌斯内阁倒台时的财政状况报告的委员会,在《日报》上发表了这个报告,并以财政大臣科利亚多先生的说明作为它的前言。根据这一报告,西班牙现在的短期国债总计3 300万美元,赤字总额达5 000万美元。看来,甚至连政府的特别资金也提前使用了好几年,而且已经挥霍完了。哈瓦那和菲律宾的收入已经提前两年半支用了。从发行强制公债收得的款项已经无影无踪了。阿尔马登的水银矿已经提前抵押了多年。应当存放在金库的余款不见了。用于军队轮换的经费也没有了。购进烟草应付而未付的款项达7 485 692雷阿耳。用于公共工程的5 505 000雷阿耳账款也没有清付。按照科利亚多先生的说法,必须立即偿还的债务为252 980 253雷阿耳。他所提出的弥补这个亏空的办法是地道的银行家的办法,即:恢复平静和秩序,继续征收所有的旧税和举借新债。埃斯帕特罗听从了这个意见,以许诺严格奉行温和派政策为条件,从马德里的主要银行家手里得到了250万美元。从他最近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愿意履行这个诺言。

不应当认为这些反动的措施完全没有遭到人民的反抗。当8月28日人们知道克里斯蒂娜出走之后,街垒又筑起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法国《通报》刊载的从巴约讷来的一则电讯的话,那么

“军队和国民自卫军一起攻占了街垒,并把运动镇压下去了”。

^① 马德里的街心花园。——编者注

这就是早产的革命政府注定要陷入的恶性循环,这些政府承认它们以前各届反革命政府所借的债务为国家债务。为了能够偿还这些债务,它们必须继续征收旧税和举借新债。为了能够举借新债,它们必须保证“秩序”,就是说必须亲自采取反革命的措施。这样,新的人民的政府就一下子变成了大资本家的奴仆和人民的压迫者。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正是这样,它为了偿付它欠资本家的利息,不得不征收恶名昭著的四十五生丁税和没收储蓄银行的存款^①。《西班牙真相》一书的英国作者说:

“西班牙革命政府至少还没有堕落到采取美国所实行的那种声名狼藉的拒不偿付主义。”^②

事实是:如果先前任何一次西班牙革命哪怕有过一次拒绝偿付债务,声名狼藉的圣路易斯政府就会找不到任何一个银行家肯向它提供贷款。不过我们这位作者也许认为,借债是反革命的特权,而还债则是革命的特权。

看来,萨拉戈萨、巴伦西亚和阿尔赫西拉斯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们那里取消了使它们感到厌恶的一切捐税。

政府不满足于派遣布拉沃·穆里略为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它还派了冈萨雷斯·布拉沃赴维也纳担任同样的职务。

8月27日,星期日,马德里区召开了竞选大会,以便通过全体市民投票任命负责监督首都选举的委员。在马德里有两个选举委员会——自由派联合会和商业联合会。

① 关于这两项措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5、27页。——编者注

② 特·麦·休斯《1845年西班牙真相》1845年伦敦版。——编者注

上述种种反动征象，在熟习西班牙历次革命历史的人看来，并不像肤浅的观察家看来那样可怕，因为西班牙革命总是从召开议会开始，而召开议会往往是解散政府的信号。另外，在马德里只有少数军队，国民自卫军也至多不过两万人，其中只有近半数人有像样的武装，而大家知道，人民已拒绝服从交出武器的号召。

尽管女王流泪，奥当奈尔还是解散了她的卫队，因为正规军忌妒这个部队的特权：一个以擅长弹吉他和演唱优美而动听的赛吉迪利亚歌曲见称的戈多伊竟然能够从这个部队青云直上而成为国王的侄婿，一个仅以个人长处见称的穆尼奥斯也成了太后的丈夫。

在马德里，一些共和派散发了如下的伊比利亚联邦共和国宪法。

第一章 伊比利亚联邦共和国的组织条例

第一条 西班牙和它的岛屿同葡萄牙联合组成伊比利亚联邦共和国；国旗的颜色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现用国旗结合而成；共和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

第二条 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它是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均不得擅自行使最高权力；

第三条 法律是国民意志的表现；法官由人民通过普选任命；

第四条 凡年满 21 岁的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均为选民；

第五条 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死刑一律废除；一切案件均应由陪审法庭审理；

第六条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流亡者被没收的地产，应予归还；

第七条 按收入比例征税；只征收一种税，即普遍直接税；废除一切间接税、入市税和消费税；同样废除政府对盐和烟草的专卖，废除印花税、营业执照捐和兵役捐；

第八条 保障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保障受教育、经商和信仰自由；每个教派都应支付本教教士的薪俸；

第十三条 共和国的行政分为联邦、省、市三级。

第二章 联邦行政

第十四条 联邦行政由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委员会由中央联邦会议任免;

第十五条 联邦行政的管辖范围包括:国际关系和商务关系,度量衡和币制的统一,邮政,武装力量;

第十六条 中央联邦会议由各省各选出九名代表组成,代表由普选产生,并受选民的指示的约束;

第十七条 中央联邦会议是常设机构;

第二十条 每当制定一项法律时,认为此项法律必要的行政机关须将草案送交联邦审查;由中央联邦会议审查者须在六个月以前送交,由省立法机关审查者须在三个月以前送交;

第二十一条 任何人民代表,如不遵守选民的指示,即交付审判。

第三章 是关于省和市的行政的,其中规定了同样的原则。这一章的最后一条规定:

“不得再有任何殖民地,殖民地须改变为省,并依省的原则治理。奴隶制度应予废除。”

第四章 军队

第三十四条 武装全体人民,组成国民自卫军,其中一部分为机动队,一部分为地方国民军;

第三十五条 机动队由21—35岁的独身男子组成;其军官由军事学校学员中选拔;

第三十六条 地方国民军由35—56岁的全体公民组成;军官通过选举任命;他们的任务是地方自卫;

第三十八条 炮兵部队和工程兵部队以志愿应募的方式征募,它们是固定的,驻守沿海和边境的要塞;内地不得设置要塞。

第三十九条是有关海军的,其中包括类似的规定。

第四十条 撤销各省的司令部和军区；

第四十二条 伊比利亚共和国屏弃一切征服性战争，并将争端交给同争执问题无利害关系的各国政府裁决；

第四十三条 不得设置常备军。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9 月
1 日

载于 1854 年 9 月 16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18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战况的进展³²¹

沙皇^①的答复³²²已一式两份分别送交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答复中,列举了西方强国所坚持的各点,予以拒绝,并说明了拒绝的原因。接着,沙皇说,考虑到德意志两大邦的利益,他已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出了他的部队;他将命令他的军队回渡普鲁特河,然后等待可能出现的其他的敌对进攻或和平建议。

据说,本月6日在维也纳召开了由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主持的内阁会议,会上认定,奥地利和西方强国所要求的保证遭到拒绝不能成为对俄国开战的理由,但是,在盟国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未见分晓时,奥地利将坚持这些条件,并将保持中立地位。

以下刊登的是来自维也纳的消息。不过,它所依据的只是报上的一封信件而不是什么权威的报道:

“自从接到了尼古拉皇帝给西方强国的答复后,看来普鲁士很想重新参加它曾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的欧洲音乐会。据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已提议签订一个新的议定书,其中应体现8月8日维也纳照会^②的精神,正如以前在维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467页。——编者注

也纳会议上制订和签署的一个文件体现了四月条约³²³一样。”^①

以下是普鲁士致俄国的照会的内容：

“8月13日于柏林

致驻圣彼得堡的韦尔特男爵

在本月5日我的紧急函件中我有幸给您附去一份我写给国王陛下驻巴黎和伦敦代表的紧急函件的副本，其中指示他们把我们对俄国6月29日和30日答复³²⁴的看法通知英法两国的内阁，并且向他们表示，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承认其中有谅解的幼芽与和解的成分。尽管我们没有收到巴黎或伦敦对这些建议的直接答复，但是他们向我们发出了一些机密的口头通报，这些通报表明与我们自己所采取的步骤颇相径庭，因此我们不能对自己隐瞒；法国和英国对俄国的辩白所持的观点和我们自己的观点根本不同，绝不可能有共同的出发点。按照西方强国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俄国军队长期驻扎在多瑙河两公国，所以他们认为圣彼得堡内阁所做的和平姿态没有任何实际价值。而且，在英法看来，圣彼得堡内阁没有完全同意4月9日的议定书¹⁵⁴中所规定的原则，因为它根本没有提到保证的问题，而按照上述议定书，应当求得这种保证，以便把土耳其的继续存在与欧洲总的均势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巴黎和伦敦的内阁已通知我们，他们认为这种保证必须包含几个基本要点，它们——当然可按照事态进展的要求加以修改——应作为任何和平谈判或停止敌对行动谈判所必不可少的基础。随后，法国和英国代表在致维也纳内阁的内容相同的照会³²⁵中阐明了这些要点，而后者在复照中已表示予以采纳。奥地利内阁在把这一步骤通知我们时说，它认为这些要点是4月9日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原则的自然结果，因此，它觉得它不可能十分热情地劝告圣彼得堡内阁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要点，我受国王^②之命让您，男爵，竭尽全力支持奥地利内阁的这一步骤。我们的尊敬的国王认为这是出自为双方进行谈判和停止敌对行动铺平道路的真诚愿望。陛下还认为其目的就是要促成这一结果。陛下在充分了解上述照会中提出的全部四个要点，并把它们与俄国最近所作的辩白的精神加以比较之后，认为他找不到任何与他尊敬的妹夫^③所发表的、准

① 1854年9月7日《泰晤士报》第21840号。——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备作为友好协商的出发点的声明不一致的东西。俄国皇帝无疑也会认为,必须防止将来发生种种不愉快的和危险的事件——在俄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看来,这种事件都涉及构成多瑙河两公国和塞尔维亚的公法的那些法律;皇帝陛下对这些国家的有见识的担心并不会妨碍他承认,欧洲强国对这些国家的特权作出集体的保证是有好处的。多瑙河上的自由航行与俄国的商业利益是一致的,尽管多瑙河口自由航行的障碍还未完全消除,但是皇帝的高尚的感情和他的内阁的多次声明使人毫不怀疑他将尽快消除这些障碍的决心。关于苏丹^①的基督教臣民的特权问题,不仅皇帝陛下在对4月9日议定书表示同意时已经宣布,他赞成各强国对我们的教友的状况给予同等的和集体的关心这一原则,而且在圣彼得堡内阁前些时候就这个问题致柏林内阁的声明中也十分明确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并且,既然俄国皇帝经常公开地宣称维护苏丹的独立和主权与他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所以皇帝陛下将不会不与各强国共同努力,使提高基督徒莱雅的地位与奥斯曼政府的利益协调一致,其办法就是保证后者的主动权,因为这是它拥有独立和尊严的必要条件。最后,1841年7月13日的条约是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以致缔约各方对条约进行修改原则上大概不会遇到任何困难;俄国作为黑海沿岸的强国,似乎甚至被特别邀请参加审查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男爵,这些总的考虑使我们尊敬的国王急切地希望圣彼得堡宫廷接受上述要点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因为这些要点是由奥地利和伦敦、巴黎的内阁共同拟定的。因此,请您利用您刚到圣彼得堡皇帝就赐予您的莫大荣幸,以及涅谢尔罗德伯爵对您的信任,促使帝国内阁相信: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作出的决定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结果;他们会给欧洲开辟无限的和平前景;当他们向自己的最恶毒的诽谤者清楚地证明究竟哪一边具有真正的和平愿望时,他们就必定会战胜诽谤俄国政策的人。男爵,我无须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急切地等待着您关于已收到并已着手处理此紧急函件的消息,您应立即使此紧急函件的内容让涅谢尔罗德伯爵知悉。

请接受我的敬意。曼托伊费尔。”^②

有人建议要在4月20日签订的奥普条约中增加一个补充条款,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编者注

② 1854年9月6日《泰晤士报》第21839号。——编者注

其内容现在还未公开。对条约所提出的修改和补充须得到德意志联邦议会承认。无论如何,条约的第一款,即缔约国双方相互保证领土不受侵犯,将不会变更。

根据以上情况作出的推测已引起了一些注意。据推测,联邦议会将在短期休会后举行的会议上,应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宣布4月20日签订的条约因补充条款而失效。因此,考虑到奥地利已与西方强国达成了协议,将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相信俄国将会接受的新的和平方案。

尼古拉和教皇之间的积极的秘密谈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据现在透露的消息,沙皇期望改变对波兰的罗马天主教徒的态度并对在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徒作出让步。他正在这样策划反对法国的阴谋。据《意大利信使报》报道,沙皇打算宣布他的第三个儿子尼古拉为波兰国王,因为他是正教徒,人们认为他必须在关于波兰天主教徒的问题上给教皇一些使之安心的保证。

博马尔松德的一切防御工事都已遭到破坏,军队重新登船。几艘蒸汽巡航舰仍在各岛屿之间巡航,巴拉盖·狄利埃和尼埃尔两位将军7日还在但泽。此外别无其他新闻。

8月30日的君士坦丁堡来信说,英军近卫军和第二十八、四十二、四十四、七十九和九十三团已在瓦尔纳登船,轻步兵师和卡迪根勋爵的师正在待命。拉格伦勋爵于9月2日在瓦尔纳登上卡拉多克号船。远征军预定在巴尔奇克集合,法军将在那里以及布尔加斯乘船。远征军的陆军兵力为:英军25 000人,法军26 000人,土军20 000人。约翰·伯戈因爵士将军已抵达那里担任指挥。拿破仑亲王和剑桥公爵已去瓦尔纳同他们的团会合。据说军队士气高昂。霍乱几乎彻底消灭了。

9月3日来自鲁斯楚克的报告说,所有运载部队的船只已于2日离开瓦尔纳开往巴尔奇克。从本月1日起,军队的给养将送往克里木。圣阿尔诺元帅已发布命令说,要攻占和据守塞瓦斯托波尔作为和平的保证。假设围攻于9月中开始,可望在11月底攻下此地。

俄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已接到通知说,除非敌对的军事行动使得再次集中兵力成为必要,否则俄军的大部分将于9月20日以前撤出摩尔多瓦,其余部分在10月初以前撤出。奥军从四个地点进入了多瑙河两公国,即瓦拉几亚的罗瑟土姆、普雷代亚尔和博伊察,以及摩尔多瓦的比斯特里察。奥尔美帕沙继续沿布泽乌下面的卡拉苏河岸集中其主力部队,他从那里威胁布勒伊拉和加拉茨。

8月1日,一支强大的英法炮舰队驶入多瑙河支流苏利纳河,另一支炮舰队即将驶入基利亚河口附近,以便保持航行畅通。

俄国人正在准备,一旦他们被迫放弃敖德萨、列尼、布勒伊拉、加拉茨和伊兹梅尔的话,就烧毁这些城市。他们已备好了易燃物,切断了水的供应,并烧毁了灭火机。他们已发布命令:敌人以优势兵力在哪里出现,就把那里的城市和村庄烧为灰烬。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准备正在不停地进行。所有刑事犯都被释放并被编队去修筑港口炮台。200名重罪犯仍带着镣铐,被派去搬运弹药。

塞瓦斯托波尔的总督利用封锁无效之机,取下一些蒸汽舰的桅杆,使之不易被发现,并派它们往返布格河口的尼古拉耶夫,从那里运回了相当数量的补给品、弹药、火炮,甚至部队。塞瓦斯托波尔一个新修的内堡就是用这样运来的枪炮装备起来的。

奥尔美帕沙已发布通令,解散巴希布祖克¹⁹¹,包括那些领取联军薪饷的人,这些恶棍们实在是积习难改。

前几天在敖德萨当着安年科夫总督的面试用了虎号巡航舰运来

的两门佩克桑重炮。在第四次射击时，一门炮爆炸，炸死了一名炮手，炸伤了其他几个人。

9月2日，英国蒸汽舰海鸥号和法国蒸汽舰普罗米修斯号开进了卡塔罗港。指挥官们说，他们到此的原因是希望获得关于黑山人计划入侵的消息。

一艘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蒸汽舰俘获了一艘瓦拉几亚舰只并已把它带入港口。他们已把最近在埃雷利烧毁的三艘土耳其商船的船长送到君士坦丁堡。

根据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建议，库尔西德帕沙（盖昂将军）终于取代穆斯塔法帕沙被任命为亚洲军队的主要指挥官。盖昂早就该受命担任此职，但他那时拒绝，现在也仍然拒绝背叛基督教。伊斯迈尔帕沙，一位在保卫卡拉法特时表现十分杰出的土耳其军官，也被任命为亚洲军队的高级指挥官。英国政府已派出皇家工兵部队的威廉斯上校作为特派员，法国也将委派一位职位相当的军官。威廉斯上校作为负责绘制土耳其和波斯之间的边界线的英国特派员，为对这些地区作地形测量曾在帐篷中度过了三年。

据巴黎《新闻报》报道，在亚洲的俄国部队在劫掠了巴亚泽特之后已撤回到埃里温。

伪装成贝都因人的一些俄国间谍已在大马士革被捕。

我们从雅典得知，奥托国王明确拒绝给土耳其以任何赔偿。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9 月
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9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9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马志尼被捕的传说。——
奥地利的强制公债。——西班牙。
——瓦拉几亚的状况³²⁶

1854年9月12日星期二于伦敦

报纸纷纷报道马志尼在巴塞尔被捕的各种传说。我从一位友人那里得到如下的消息：马志尼的确在苏黎世被两名宪兵逮捕，但是仅仅几小时之后，他就逃掉了。为这次逃跑提供了便利的是另一个意大利人，此人在同一个时间在另一个地方冒充马志尼让人抓起来了。当局被这个巧计弄得糊里糊涂，就连德律埃先生本人也从伯尔尼打电报到日内瓦说不必继续搜捕了，因为马志尼已经被监押了。有人揣测代替马志尼被捕的人可能是萨菲，但有些人说这是一位名叫蒂尔的匈牙利军官。

8月31日的《米兰官报》满意地指出，帕维亚市政委员会在8月28日的会议上决定认购20万弗罗伦的国民公债。跟这个消息相反，一家非官方报纸发表了该委员会的真正决议，原文如下：

“帕维亚市政府将认购为帕维亚市规定的必须认购的数额，但它这样做不

是作为本市的代表，也不是单纯作为认购者，而只是作为一个管理机构，因为它从属于行政权，根据 1830 年通令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行政权，而且它必须执行总督 8 月 7 日给它的命令。”

在特雷维索，自愿公债也完全是在直接胁迫下认购的。从的里雅斯特委员会的通告中可以看出，甚至在这个对奥地利充满忠臣感情的城市里，对公债的认购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十分普遍的，这种情形奥地利报纸作了如下的描述：

“本市又认购了 100 万国民公债。市长特此宣布：此数额将由至今从未认购或认购额不符合本人财产状况的人分摊。同时，规定 9 月 6 日为自愿认购的最后限期。市政委员会希望全体市民从速享受公债提供的利益，何况委员会在上述期限过后将被迫采取强制手段。”

反动报刊对西班牙政府最近的措施仍然不满；它们抱怨再次跟革命妥协。例如，《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写道：

“埃斯帕特罗还在 8 月 7 日就宣称：‘按照马德里人民的愿望，里安萨雷斯公爵夫人不得离开首都，不管是白天或者夜间，或者采取任何一种秘密方式。’只是在 8 月 28 日，克里斯蒂娜女王在被拘留 21 天之后才获准在大白天招摇过市地离开。然而，政府如此软弱，竟然同时下令没收她的财产。”

《辩论日报》现在希望撤销这个命令。但是，该报的希望在目前情况下恐怕比它过去对波拿巴不要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³²⁷的微小希望更难实现。奥维耶多的总督已经开始没收克里斯蒂娜在阿斯图里亚斯省的煤矿。谢罗、朗格雷奥和皮埃罗-科里尔等地的矿场经理已经接到命令，让他们呈递报告并且把他们的行政管理事宜交给政府。

至于说到“大白天”，——按《辩论日报》的说法，克里斯蒂

娜是在这样的時候离开的——这家报纸的消息是很不灵通的。克里斯蒂娜女王离开她的住处后，在死一般寂静中走过了走廊，因为刻意安排好不让任何人碰见她。驻扎在王宫院内的国民自卫军也不知道她会离开。整个计划制定得如此机密，就连应负责护送女王的加里戈也是在出发的时刻才接到命令。已经离开马德里 12 英里，护送队才知道自己担负的使命，当时加里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得他的部下没有对女王采取无礼举动或立即返回马德里。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们只是在穆尼奥斯夫人离开两小时后才获悉所发生的事情。根据《西班牙报》的说法，克里斯蒂娜于 9 月 3 日上午到达了葡萄牙边境。这家报纸说，她一路上情绪很好，但她的公爵有点忧郁。克里斯蒂娜和这位穆尼奥斯的关系只有从唐·吉诃德对桑乔·潘萨提问的答话中才能被人理解。桑乔·潘萨问道，他既然能够使公主为之倾倒，为什么爱上了达辛尼亚这样一个低贱的村妇。尊敬的骑士回答说：

“有人问一位被一群高贵的、阔绰而又聪明的崇拜者包围的太太，为什么她挑了一个普通庄稼汉作她的情夫。这位太太回答说，‘要知道，我看上他，是因为他懂的哲学比亚里士多德懂的还多。’”^①

从《科隆日报》和《比利时独立报》上摘来的材料可以看出一般反动报刊对西班牙事态的看法。前一家报纸写道：

“根据一位消息灵通而又可靠的记者（他本人是奥当奈尔和温和派的拥护者）的说法，事态是令人焦虑的，各派之间并未停止深刻的冲突。工人阶级在鼓动者的影响下处于不断激动的状态。”

^①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第 1 部第 25 章。——编者注

《独立报》写道：

“西班牙君主制的未来正受到严重威胁。所有西班牙的真正爱国者都一致认为必须结束革命的狂热。诽谤者和构筑街垒者对埃斯帕特罗和他的政府的激愤，并不亚于对圣路易斯和银行家萨拉曼卡的激愤。但是，老实说，不能要这个狭义的民族对这类过火行动负责。不应把马德里的人民同喊叫‘处死克里斯蒂娜！’的暴徒等量齐观，不应让他们对居民中间流传的所谓‘圣路易斯、克里斯蒂娜及其同谋者的盗窃行为’的卑鄙的诽谤言论负责。马德里的1800个街垒和巴塞罗那的极端共产主义的示威，表明外国民主主义对西班牙农神节^①的干扰。非常肯定，许多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流亡者参加了目前还激动着半岛的令人遗憾的事件。非常肯定，西班牙即将陷于社会的烈火之中；它的直接后果将是丧失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宝岛古巴，因为它使西班牙无力同美国人的野心或者任何一个苏莱和桑德斯的爱国精神进行斗争。是西班牙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是文明欧洲的一切诚实的人共同努力敲起警钟的时候了。”

当马德里的居民看到，马德里政府8月28日违背了8月7日许下的诺言，它废除自由集会权并恢复要每个出版者交纳4万雷阿耳保证金和300雷阿耳直接税的1837年新闻出版法³²⁰，这时当然用不着外国民主主义插手把他们煽动起来。如果说各省还在继续发生不确定的不坚决的骚动，那么，除了缺少革命行动的中心之外，我们还能找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吗？自从所谓的革命政府落入埃斯帕特罗的手中之后，没有出现过一个是有利于各省的法令。各省都看到，这个政府已被圣路易斯时代的那种阿谀、倾轧和争权夺利的气氛包围。围着政府打转的仍然是同一帮人——从菲力浦时代³²⁸起就一直折磨着西班牙的灾星。

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一号9月6日的马德里《日报》。该报刊

① 即狂欢节，这里贬义地借喻喧嚣胡闹。——编者注

载了奥当奈尔的报告，其中宣布的拥有军衔和荣誉称号的人数不胜数，以致每三个将军中只能有一个担任实际职务。将军多如牛毛的这一祸害，使西班牙从1823年以来就吃尽了苦头。人们本来期望颁布一项法令消除这种灾祸。但结果什么也没有。在这个报告后颁布的法令是成立一个咨询性的军事洪达，由政府任命一些目前未在军队中担任任何职务的将军们组成。这些人除了平常的薪俸之外，还将领到：中将——5 000 雷阿耳，元帅——6 000 雷阿耳。曼努埃尔·德拉孔查将军被任命为这个领干薪的军事洪达的主席。同一号《日报》报道了又一次大批授与勋章和职位等等，似乎第一次的分别论功行赏还没有完成使命。圣米格尔和杜尔塞获得了查理三世大十字勋章；萨拉戈萨洪达拟定要发给的一切奖金和临时性的奖章都得到确认并有所增加。但是，这一号《日报》的最出色的部分是宣布本月11日恢复对公债的偿还。如果西班牙人民对自己革命政府的这些成就还不感到心满意足，那就真是愚蠢极了！

不久前从瓦拉几亚回来的旅行者报道了这个公国的极为艰难的状况。大家知道，多瑙河两公国为了偿付俄国1848—1849年的占领费，已经负债1 400万法郎。在最近一次占领期间，这笔款项由俄国将军们征收去了。俄国人是在把所有金库（教区金库、修道院中心金库和市政委员会金库）抢掠一空之后才撤退的。他们用这些金库的现金偿付他们按合同从瓦拉几亚的土地占有者和农民那里得到的军需品。但是对于在农业国中关系十分重大的交通工具，对于木柴、煤炭和干草等等则根本不付钱，而是干脆征用。结果，多瑙河两公国的国库非常空虚，以致某些教区委员会濒于破产。而且，许多被改作军医院之用的房屋和贵族由于害怕土耳其人抢劫而交托给了俄国人的大量财产还未算在内。

一封于8月29日从雅典寄来的书信说：

“国王继续拒绝付给土耳其任何赔款。对西方国家军队的仇恨日益增长，已有些法国士兵受到人民的虐待。”^①

不妨向读者讲一讲关于希腊村社怎样由于英国的影响而解体、人们怎样把卡波·迪斯特里亚强加于它们以及全体希腊人民怎样被帕麦斯顿勋爵的鬼蜮伎俩弄得斗志沮丧的一段离奇古怪的历史。不列颠政府的诚意甚至在目前它对希腊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也通过它对卡利尔吉斯将军的支持充分暴露出来了，——此人同卡波·迪斯特里亚一样，在俄国出生、长大并且长期居住。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不列颠政府终于盼到了他们蓄谋已久的事件——在土耳其境内，如果不是在其欧洲部分至少是在安纳托利亚爆发革命。我们已经从来自罗得岛的消息获悉，在该岛对岸善战的土耳其山地部族泽贝克人已实行暴动。《君士坦丁堡日报》8月20日报道说，这个地区的混乱状况日益发展。因为没有正规军队，所以叛乱者不断从山上下下来袭击村庄，征收什一税，抢劫居民和商队，奸污妇女并且打死一切反抗他们的人。他们在门泰谢省胡作非为得最厉害。省长被迫从艾登逃到蒂雷。代尼兹利已落入他们手中，而出发去向总督报告情况的穆夫提萨希布埃芬蒂蒂被抓，和他的同行者一起被砍了头。参加暴动的人成千上万。这种紊乱局面的发生是因为那些责难土耳其政府压迫土耳其人并屈从俄国的巴希布祖克¹⁹¹从卡尔斯和巴亚泽特返回。

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欧洲，就可以看到在西班牙、意大利、丹

^① 1854年9月11日《科隆日报》第252页。——编者注

麦、多瑙河两公国、希腊和土耳其亚洲部分爆发革命的征兆；甚至在瓦尔纳的法军部队里，也响起了“猢猻们滚蛋！”的喊声。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4 年 9 月
12 日

载于 1854 年 9 月 30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419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
两公国的局势。——西班牙。——
不列颠的对外贸易³²⁹

1854年9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们在昨天的《通报》上看到以下一则电讯：

“特拉皮亚9月7日讯，法军和土军已于5日离开瓦尔纳。英国舰队将在蛇岛附近同他们会合。天气好极了。”

这第一批远征军所以迟迟不能出发，是因为波斯普鲁斯海峡出现的强烈风暴一直持续到8月27日。27日当东北风转向的时候，运输船才得以离开君士坦丁堡进入黑海。蛇岛(İsade Adessi)是一个峭壁重叠的小岛，它离比萨拉比亚海岸不远，几乎正对着多瑙河口；方圆不过三英里。9月5日才出发的军队要到9日以后才能登陆。

在《通报》上一篇分析这次远征的前景的文章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通报》写道：

“如果，如果驻扎在克里木的俄军的数量比我们根据迄今得到的消息所能

估计的要大得多；如果塞瓦斯托波尔的现有兵力能够进行持久防御；如果遇到季节所造成的困难；最后，如果俄国能抽调一支大军来增援克里木，那么，这一次我们就只好重新登船，等到春天再来进攻塞瓦斯托波尔了。”

总之，如果这支“拥有大量的毁灭手段的强大舰队”在途中碰到稍微严重的障碍，它就会立即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碰不到这些障碍，那么这无论如何不是联军的过错，因为关于这次拖到有利季节的最后几天才举行的远征，早在好几个月前沙皇就知道了。至于法国水兵们是否信任自己的指挥官，这一点可以从《奥格斯堡报》上刊登的君士坦丁堡来信的下面这段话看出来：

“在舰队中，人们通常都把圣阿尔诺称为弗洛里瓦尔——这是他在巴黎昂比居滑稽剧院初次登台时所用的假名。”

根据汉堡和哥本哈根的最新消息，有一部分法国军舰、运输船和士兵已经过贝尔特海峡驶回法国。波拿巴派的《立宪主义者报》对博马尔松德事件进行了揭露：

“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不希望对海军的耿耿忠心进行的奖励被取消，这种奖励是舰队在波罗的海经过这样长久而艰辛的航行之后所应得的。”

因而，对博马尔松德进行炮击仅仅是为了让舰队开心和对军官们的烦躁和无聊情绪的让步。《通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上的这两点简短的暗示，比英国官方报纸的所有那些夸夸其谈的社论更能揭示战争的性质。

沙皇已下令把所有参加构筑博马尔松德堡垒的工程师逮捕起来。他们将被交付法庭审判。他们被控的罪名之一是，工事本应全部用纯花岗石修建，然而，在它们塌陷以后发现，围墙中间填的完全是沙子和碎石。芬兰湾沿岸所有要塞的司令官都接到圣彼得堡的命

令,要求最仔细地检查这些要塞的构筑情况,并立即将检查结果上报。现在可以肯定,汉科海角的古斯塔夫斯韦恩堡垒是由俄军自己炸毁的,当时巴拉盖·狄利埃和琼斯将军正在它的前面进行侦察。俄军担心敌人会攻击奥布,于是他们炸毁古斯塔夫斯韦恩堡垒以便利用堡垒的部队来守卫奥布。

在从波罗的海转到其他问题之前,我不妨在这里引述《晚报》上的下面一条消息:

“一位哥本哈根的记者断定说,丹麦政府于8月16日授权沙夫纳先生安设从北美经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和挪威通向哥本哈根的电报线路。26日从斯德哥尔摩到马尔默的线路已经开通,全长686700码。”

伦敦的一部分报纸今天登载了一则关于沙米尔在离梯弗里斯不远的某地获胜的电讯。法国和德国的报纸没有提到这个事实。9月4日土军在默钦附近渡过多瑙河,并占领了位于这个要塞和布勒伊拉之间的一个岛屿。多瑙河上土耳其分舰队的很大一部分舰船也在默钦抛锚。土军应在本月5日占领布勒伊拉。8月30日敖德萨墙上张贴的克鲁森施特恩将军的告示很值得注意;告示警告居民说,如果军队认为必须烧毁城市以保卫国家,届时全市居民不得阻挠,违者严惩不贷。俄国人也在比萨拉比亚各个地区发布命令说,一旦敌人逼近,应将城市和乡村烧毁。这道命令尤其令人可笑,因为俄国人知道得很清楚,对他们的撤退,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人同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人一样不会感到惋惜。

我已经写过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民军被编入俄军服役时的情况。今天英国报纸报道了8月28日在布德贝格先生和罗马尼亚民军的军官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的详细经过;菲利佩斯科上尉最后当面向俄国将军声明说,瓦拉几亚人认为苏丹是自己的唯一的宗主国君

主。当然，他被逮捕了，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两个敢于用同样方式进行反抗的军官弟兄。下面是今天巴黎《新闻报》发表的关于8月29日（这一天俄国在多瑙河两公国的战役终于如此光荣地结束了）事件的报道：

“菲利佩斯科上尉和其他两名敢于违抗布德贝格将军命令的军官的被捕，引起了摩尔多瓦民军的强烈愤慨，使他们更加不愿在俄军中服役。29日，在快到规定检阅的时间，统领马夫罗科尔扎托斯来到政府宫对面的骑兵兵营。当他发现兵营已空空如也时，他感到十分惊愕。士兵们不但没有给马备鞍去接受检阅，反而扔掉了武器和行装，设法从马厩中逃跑了。这位碰壁的统领急忙赶到炮兵兵营，在那里等待他的是新的意外。火炮还架在操场上的原地，但是人不见了。马夫罗科尔扎托斯已经绝望地想到自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了。然而他重新集合起了三十来个人，他虽然因气愤和恐惧而发抖，却命令他们套马把火炮运到原定检阅的场地。但他们喊叫道：‘用武力把我们带走吧，我们不服从俄国人的命令。’他们一面这样喊叫，一面把兵营的大门关起来了。这时操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的鼓声，这是奥斯滕-萨肯的全师人马，包括有12个步兵营，1个龙骑兵团和3个炮兵营。在截断了交通联络之后，全师在操场上整好队，并且把政府宫和摩尔多瓦骑兵兵营完全封锁起来。60名被追回来的摩尔多瓦骑兵列队站在兵营前面。他们面对着12000名俄国士兵，其中有步兵、骑兵和炮兵。奥斯滕-萨肯在布德贝格将军和一大批随从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俄军散开成纵队，上好刺刀，高呼‘乌拉’，在自己的将领面前列队行进。然后他们在离摩尔多瓦骑兵150码远的地方排成一个方队。他们接到了装子弹的命令。俄国士兵画了画十字执行了。他们奉命瞄准60名摩尔多瓦骑兵。在他们瞄准好了之后，奥斯滕-萨肯带着随从人员走近这群摩尔多瓦民兵，号召他们跟着他的队伍前进，并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就把他们通通枪毙。对他的训谕的回答是几分钟的沉默。聚集在操场上的人群都感到十分恐怖。这时，一名摩尔多瓦人走出队列，用沉着的声调向俄国将军说话。他说：‘我们是摩尔多瓦士兵，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我们的祖国，而不是为外国人作战。你们想把我们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决不跟你们走。’‘你们可以打死我们，但是我们决不跟你们走’。——60名士兵异口同声地重复着。奥斯滕-萨肯听到这个大胆的回答后命令他们下马并放下武器，好像要立刻下令处死。他们已做好牺牲准备，就听从了。刹那间成千士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向他们扑去并把他们俘虏了。俄国士兵在完成这一战斗功绩以后，便开到摩尔多瓦炮兵兵营，那里的30个人还在继续关着大

门。俄国士兵捣毁了大门，冲进兵营里面；于是展开了一场搏斗，炮兵由于寡不敌众也被俘虏了。他们在遭到种种凌辱和死亡威胁之中被匆匆押走。但是他们泰然自若，只有其中一个 22 岁的年轻旗手，两眼冒着怒火走近弗兰格尔将军，敞开胸膛，喊道：‘这儿是我的胸膛，如果你敢，就用子弹射穿它吧。’将军不敢。这位旗手和他的战友们被解除了武装，并在两排刺刀的押送下解往雅西门外的奥斯滕-萨肯兵营。他们的结局如何，谁也不知道。至于头一天晚上被捕的三名军官，很多人都担心他们将被枪毙。同一天晚上俄军包围了摩尔多瓦步兵团驻扎的营地，但是他们发现那里只有 150 个士兵，其余的都逃跑了。雅西居民大声痛骂自己的保护者。配备有 3 个炮兵连的 12 000 名俄军，俘虏了 60 名骑兵、30 名炮兵和 150 名步兵并把他们解除了武装——这就是俄军在多瑙河两公国进行的战役中唯一值得纪念的胜利。”

我在过去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奥美尔帕沙发出的关于禁止公布赫斯将军的奥地利宣言的命令。现在我们已了解到为什么发出这道命令：因为上述文告号召瓦拉几亚当局凡事只能同奥军指挥官商量。奥美尔帕沙让赫斯将军知道，他最好不再干涉瓦拉几亚的民政管理问题，这属于他（奥美尔帕沙）的职权范围。赫斯将军发表文告的目的不过是试探一下他可以走得多远，所以他对引起异议的地方表示道歉，并且为了使奥美尔帕沙相信原来是发生了错误，就给他送去了德文原文，在德文原文中只是建议瓦拉几亚当局就同奥军有关的问题与他的副官商量。奥地利将军波波维奇于 9 月 3 日率领奥军先头部队进入布加勒斯特并立即开始扮演海瑙的角色，他也被奥美尔帕沙抵挡住了。总的说来瓦拉几亚的居民是否欢迎奥军占领，这可以从今天的《每日新闻》摘来的一段消息中看出：

“奥军沿途经过的许多村庄都被居民抛弃了，他们带走了自己的全部财物，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将不得不提供粮食或运输工具而换回纸币，其实际价值只等于票面价值的一半。结果奥军的食物只好从二十甚至三十英里外的布加勒斯特运来。”

正是由于在多瑙河两公国所干的坏事——**英国外交的结果**——清醒的《经济学家》才提到美国外交在欧洲所犯的某些相对而言十分轻微的错误，勾划出区别英美两国外交的如下的界限：

“现在，我们并不怀疑，美国也同我国一样不乏具有绅士的感情和强烈的礼仪意识，并且明确认识到对他人的责任的人。但是我们之间的差别，我们的美国弟兄的不幸就在于，在大西洋彼岸，这样的人既不选举政府，又不为国家定调子，**也不指导报刊的语言**。在我们这里政权掌握在有教养的人和上层阶级手中。在美国是群众在统治；是平民篡夺了国家的声望和权利；是他们左右言论和行动，是他们选举政府，并且政府必须为他们效劳；是他们支持报刊，而报刊必须迎合他们；简单地说，无论做什么和写什么都要为了他们。”

英国证券投机商的走狗就是这样写的，好像英国外交不是坏事干尽，好像那些由《经济学家》编辑威尔逊先生和他的上司格莱斯顿先生指定的“绅士们”，在议会面前并没有被揭发从事诈骗、赌博作弊和盗窃的勾当。

从西班牙来的消息非常少。本月8日马德里的咨询性洪达彻底解散了。塞维利亚洪达是在对中央政府的反动政策表示了坚决抗议之后才解散的。卡泰罗尼亚的民主派发表了一个反对普里姆将军的宣言，因为后者为了能参与分赃从土耳其送去了效忠现政府的声明。普里姆因曾在1843年围攻菲格拉斯城堡而招致了卡泰罗尼亚人的仇恨。在围攻中由于阿梅特利尔指挥的比较小的一队守军英勇保卫该城堡，围攻部队非常恼火，因而干出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谈到普里姆，当时人们说他是一个“被偶然成就和他所获得的伯爵称号和中将军衔冲昏头脑的可笑的爱虚荣的人物”。

《时代报》报道说，9月7日在阿兰胡埃斯国民自卫军同一支尚不知是卡洛斯派还是共和派的队伍打了一个小仗。尽管反动派的胜

利看来既迅速、又确定，但反革命派报刊仍然流露出忧心忡忡：西班牙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

我从刚刚发表的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中摘引出下述材料^①：

1831、1842 和 1853 年不列颠和爱尔兰产品和
工厂制品出口申报价值一览

(单位：英镑)

	1831	1842	1853
输往国家			
俄国, 北部和黑海沿岸港口	1 195 565	1 885 953	1 228 400
瑞典和挪威	115 707	334 017	556 183
丹麦	92 294	194 304	569 733
普鲁士	192 816	376 651	579 588
汉诺威和汉撒同盟	3 642 952	6 202 700	7 565 493
荷兰		3 573 362	4 482 955
和	2 082 536		
比利时)		1 099 490	1 371 817
法国	602 688	3 193 939	2 636 330
葡萄牙	975 991	947 855	1 210 411
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	80 698	64 909	124 971
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	597 848	322 614	1 360 719
加那利群岛	33 282	54 564	107 638

^① 1854 年 9 月 9 日《经济学家》第 756 期第 977 页。——编者注

续表

	1831	1842	1853
输往国家			
意大利：			
撒丁地区			1 112 447
托斯卡纳公国			639 794
教皇国	2 490 376	2 494 197	207 491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639 544
奥地利占领地区			637 353
希腊			135 315
土耳其	899 100	1 489 826	2 029 305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179 510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	375 551	306 580
埃及	122 832	221 003	787 111
摩洛哥	426	41 952	75 257
法属塞内加尔冈比亚	—	—	1 725
非洲西岸	234 768	459 685	617 764
爪哇和苏门答腊	285 296	306 132	558 212
菲律宾群岛	39 513	47 019	386 552
中国	519 443	969 381	1 373 689
古巴	663 531	711 938	1 124 864
海地	376 103	141 896	133 804
美国和加利福尼亚	9 053 583	3 535 381	23 658 427
墨西哥	728 858	374 969	791 940

续表

	1831	1842	1853
输往国家			
新格拉纳达 	248 250	231 711	450 804
委内瑞拉 			248 190
巴西	1 238 371	1 756 805	3 186 407
乌拉圭 	339 870	969 791	529 883
布宜诺斯艾利斯 			551 035
智利	654 617	950 466	1 264 942
秘鲁	409 003	684 013	1 246 730
其他国家	215	7 223	912 662
出口总值	26 909 432	34 119 587	65 551 579
输往不列颠属地			
诺曼底群岛	324 634	364 359	470 107
直布罗陀	367 285	937 719	670 840
马耳他	134 519	289 304	297 906
伊奥尼亚群岛	50 883	83 600	116 567
南非	257 245	369 076	1 212 630
毛里求斯岛	148 475	244 922	385 879
东印度	3 857 969	5 169 888	8 185 695
香港			357 908
澳大利亚	403 223	998 952	14 513 700
北美殖民地	2 089 327	2 333 525	4 898 544

续表

	1831	1842	1853
输往不列颠属地			
西印度	2 581 949	2 591 425	1 906 689
其他属地	39 431	18 675	347 787
输往不列颠属地总值	10 254 940	13 261 436	33 382 202
输往不列颠属地和外国总值	37 164 372	47 381 023	98 933 781

《经济学家》挑选 1842 年来展示从那时开始实行的自由贸易³³⁰的优点,但是,它以素有的坦率忘记了,1842 年是贸易萧条的一年,而 1853 年才是最繁荣的一年。如果说英国出口的增长是自由贸易的魔法所造成的,那么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应当是英国向执行严格保护关税制度的国家,例如俄国和法国的出口数字的比较,况且从俄国进口增加得最多,俄国受不列颠自由贸易的影响最大。现在我们发现,向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都缩减了。

向俄国出口 1853 年为 1 106 767 英镑

1831 年为 1 195 565 英镑

向法国出口 1853 年为 2 636 330 英镑

1842 年为 3 193 939 英镑

不列颠在 1854 年 8 月 5 日前的七个月中的出口总值比 1853 年同期增加了,因为五金的价格上涨了;而不列颠的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出口却大大缩减了,这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1853	1854
	(单位:英镑)	(单位:英镑)
亚麻织品	2 650 150	2 456 953

亚麻纱·····	646 578	581 752
丝织品·····	965 345	834 275
卷丝·····	132 689	120 890
毛织品·····	3 741 261	3 731 453
棉织品·····	15 515 224	14 762 981
棉纱·····	3 897 080	3 838 393

棉织品的数字缩减更有说服力,因为其出口数量增加了,而货款收入减少了。1854年出口了981 994 130码棉织品,还不算花边和绸布,而1853年只出口了969 293 663码。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9月
15日

载于1854年10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³³¹

看来,法军和英军终于可能采取行动,给俄国的实力和威望以严重打击,因而我们怀着新的兴趣来注视联军向塞瓦斯托波尔推进(有关的最新消息在另一栏里另有详细报道)^①。当然,法国和英国报纸正大肆吹嘘这次行动,如果相信这些报纸的话,那么这次行动就是军事史上空前的壮举了;但是这欺骗不了那些了解事实、记得这次远征开始时莫名其妙的拖延和毫无意义的遁词以及远征前和远征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的人们。即使这次行动的结局是光荣的,它的开端也是非常可耻的。

让我们看看联军在土耳其活动的经过吧。起初,这些十分英勇但又极其谨慎的勇士们打算在达达尼尔海峡西面的埃内兹湾登陆,而且要在查明毫无危险以后才接近半岛。可是,在他们建立这个英勇功绩之前,他们竟鼓起出乎意外的勇气,冒险在色雷斯半岛上的加利波利登陆了。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在较短期间内筑好横断半岛的防御工事,从而给自己建立起最必需的东西——作战基地。在这期间,土军却在多瑙河上一一直同那个一在瓦拉几亚出现就成为联军玩

^① 括号里的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弄巧妙手段的借口的可怕的敌人对峙着，并且应该说，相当成功地抵御了敌人。随着更多的船只和部队的到达，发现达达尼尔海峡和半岛不能全部容纳下他们。这样一来，伦敦和巴黎双方所拟定的高明计划就出现了新的缺陷。一部分军队这时不得不冒险在最暴露的地点——君士坦丁堡登陆！为了改善处境，他们立刻着手构筑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幸好，他们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因而也就达到了主要目的：不是争取时间，而是消磨时间。后来又发现，不冒很大的危险就可以把一个师派到瓦尔纳，去驻守那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在1828年光荣地保卫过瓦尔纳的土军从那时起想必已相当地掌握了欧洲军队的训练内容，以致不能再信赖他们保卫这样一个地点了。于是派了一个师到瓦尔纳去，接着又派去了一两个师。最后，当再没有借口可以把军队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联军的全部大军才从容不迫地集中到瓦尔纳。这正是发生在奥地利军队像酝酿着暴风雨的乌云一般突然在俄军的翼侧和后方出现的时候，因此也正是联军的作战基地出于种种政治考虑临时由君士坦丁堡突然转移到特兰西瓦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时候。如果不是这样，可以断言，在保加利亚决不会看到联军。这可以由联军在锡利斯特里亚被围期间的行动来证明。谁都知道，那里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在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的紧急关头，对其中一方稍助一臂之力，就可以十拿九稳地使它占上风。而在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围攻时刻，两万英国兵和三万法国兵——“两军的精华”——却停留在距这个要塞仅数日行程的地方，衔着烟斗，悠闲地养精蓄锐，准备同霍乱作斗争。如果不是这种疾病在俄军中造成了可怕的死亡，如果不是一小群隐蔽在四面受到炮击的壕沟中的阿尔瑙特人⁸³表现出惊人的勇敢精神，锡利斯特里亚也许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一支军队，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援救自己的

盟友,却这样胆怯地见危不救,这在战史上是无前例的。对克里木的任何远征、任何胜利都不能够洗去法英两军统帅身上的这个污点。试问,如果老布吕歇尔在到达滑铁卢的两天前于利尼遭受失败以后,存心像拉格伦和圣阿尔诺那样干,那么在滑铁卢的英军会得到什么结果呢?³³²

在阿拉伯堡战壕中作战的一小群阿尔瑙特人,在灵活、机智和作战顽强方面完全可以同俄国人媲美。俄军不是被前来解救要塞的什么军队击退到多瑙河以北的。他们本身的愚蠢、保卫者的英勇、热病、奥军在德涅斯特河和联军在代夫尼亚的消极的压力(因为谁能预料他们会这样行动呢?)——这才最后迫使俄军撤除围攻,中止整个战役,放弃多瑙河两公国和多布罗加。联军的将军们在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以后,当然想利用这种胜利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不过必须符合他们迄今运用得很成功的战略方针的要求。因此,卡迪根勋爵便率领不列颠骑兵向多瑙河一带作侦察性的进军。在这次进军中,他的骑兵没有见到俄军,却损失了许多马匹,而且除了疾病和嘲笑以外一无所获。那位主要是由于1851年12月2日背叛国民议会而出名的埃斯皮纳斯将军³³³,则率领自己的一个师去多布罗加,而他的全部成绩,就是几个精锐步兵团有一半被霍乱摧毁了,而且把病菌带到联军兵营。从此以后,霍乱就在瓦尔纳联军兵营里广泛地流行起来,这是联军巧妙的战略手法应得的惩罚。成千的士兵还没有见到敌人便死去了;他们像苍蝇一样倒毙在他们曾经安闲平静地度过比较舒适的生活的兵营里。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士气低落、对指挥官不信任和组织涣散,——这种情况在英军中不像在法军中那样严重,因为英军受害较轻,忍耐力较强,而法国的民族性格使法军比较容易受这种影响的左右,在他们的长官使他们无所作为的时候更是如此。

不过,法军内部实际发生的骚动显然是1849年以来军队处于不正常情况下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教导那些曾把它从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拯救出来的法国兵,要把自己看作是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救星。路易·波拿巴把他们看作恢复帝国的工具,娇纵他们。士兵一贯受到纵容,学会了发号施令,而忘记了应当服从。由于教导他们要把自己看得比平民百姓高一等,所以他们很快就形成一种看法,认为自己至少不比自己的长官差。人们不惜一切努力要把他们变为御用军队,但历史总是教导人们,御用军队就是蜕化了的军队。他们开始是对平民百姓发号施令,然后就企图使自己的将军服从自己的意志,而最后是得到严厉的惩罚。

现在让我们看看瓦尔纳的情况。当整营整营的士兵们在灼热的沙滩上,在霍乱病中痛苦地挣扎时,老兵开始拿现在指挥他们的这些冒险家同当年成功地率领他们进行非洲远征³³⁴的老长官相比较,尽管当代没落帝国⁵⁸的英雄们对这些远征是那样地摆出一种鄙视的神情。非洲比保加利亚更热,撒哈拉沙漠甚至比多布罗加令人讨厌得多。但是在征服非洲的整个时期,死亡率从来没有像在代夫尼亚安适驻军时或者在库斯坦杰周围进行轻松的侦察性进军时那样高。卡芬雅克、贝多、尚加尔涅、拉莫里谢尔曾经在危险得多的情况下指挥过他们,但遭受的损失却小得多;当时埃斯皮纳斯和勒鲁瓦·圣阿尔诺还是无名之辈,后来他们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卑劣无耻才得以升迁。因此,非洲部队最优秀的代表朱阿夫兵³³⁵,这些参战最多因而火药味闻得最多的人们,就群情激愤,一致高呼:“A bas les singes! Il nous faut Lamoricière!”(“猢猻们滚蛋!我们要拉莫里谢尔!”)。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这位装腔作势模仿伟大的过去的角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许已经感到朱阿夫兵的喊声是自己“灭亡的开始”。这

个喊声在瓦尔纳产生了魔力。可以说，它便是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

经过了这次夏季战役，或者更正确地说，经过了由加利波利到斯库塔里、由斯库塔里到瓦尔纳、由瓦尔纳到代夫尼亚和阿拉丁以及由这里返回瓦尔纳的游览以后，不可能希望我们会真正相信联军统帅部用来解释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的远征最后又这么仓促地开始的那一套托词。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些托词的价值如何。据说，拖延时间是因为法国的攻城炮兵没有来到。但是，当霍乱引起骚动，勒鲁瓦·圣阿尔诺看到他必须立刻毫不延迟地摊出王牌来的时候，他便要求君士坦丁堡调拨土耳其的攻城炮兵和弹药，而且这一切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都准备妥当，并装上了船；如果这时法军的攻城炮兵纵列还没有到达，那也会不等它就启航。但是，要知道土耳其的攻城炮兵整装待发已经不止一个月了，这就证明，过去的一切拖延都是不必要的。

由此可见，这次 600 艘轮船、6 万名士兵、3 个攻城炮兵纵列以及天知道有多少门野炮的大吹大擂的克里木远征，根本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和事先经过科学研究的高明行动的结果，只不过是为了使勒鲁瓦·圣阿尔诺免于被部下杀死而仓促决定的轻率行为。可怜的老拉格伦勋爵秉性软弱，不会站出来反对，特别是如果再拖延下去，他的军队也会陷入法军目前那种纪律松弛和悲观失望的状态。一位德国著作家^①说的**命运的嘲弄**不仅发生在过去的历史上，在当代仍然有之，现在可怜的拉格伦勋爵成了它的牺牲品。至于勒鲁瓦·圣阿尔诺，从来就没有人把他看成一位总司令。他是个老资格的绅士打扮

^① 乔·威·弗·黑格尔。——编者注

的扒手团伙的成员,臭名昭彰的女贼窝里的常客,是那个受“债务而不是义务”逼迫而进行布洛涅远征³³⁶的人的真正追随者,尽管实行了书报检查制度,在好议论是非的巴黎,人们对他的品格和历史还是了解得很透彻。人们非常熟悉这位曾两度被撤职的中尉,这位在非洲当财务官时曾盗窃团部金库的上尉。无论他在克里木有什么建树,他的最光荣的功勋仍是窃取女房东的毯子向一家伦敦当铺顺利地远征以及接着向巴黎巧妙地退却。但是威灵顿公爵的副官长,这位终生致力于理论研究和深入钻研参谋勤务的可怜的拉格伦,无疑是真正相信了圣阿尔诺替自己行为所作的辩解。于是咄咄怪事的责任全部落到他的身上:整个战役规划得如此科学,进行得如此巧妙,以致一万人(几乎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还没有见到敌人就送了命;所有这些经过周密考虑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不利的季节即将来临之时向克里木进行仓促的远征。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命运的嘲弄”更辛辣的了。

尽管如此,远征仍可能是成功的。联军几乎是应该得到这种报酬的,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比联军迄今所采取的作战方法更令人轻视了。为了对付在这一战役中吃败仗的敌人,竟然那么忙乱,那么小心翼翼,进行了那样无穷尽的研讨策划!而这一战役的着眼点不是消灭敌人,却是保存自己的军队。这也许就是联军对自己作出的最无情的判决。但他们现在还没有到达塞瓦斯托波尔。他们已在叶夫帕托里亚和旧堡登陆。从叶夫帕托里亚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还要走 50 英里,从旧堡到塞瓦斯托波尔还要走 20 英里。他们的重炮应在旧堡附近卸载,以免陆上转运困难;因此卸载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虽然还没有得到关于俄军兵力的确切情报,但是俄军的兵力相当大,足以在塞瓦斯托波尔四郊的大多数地点造成对联军兵力的优势,这

一点是可以不必怀疑的。丘陵地和伸入陆地约十英里的港湾使联军刚一企图包围要塞便不得不把战线拉得很长。一个坚决的指挥官要突破这样的战线是不难的。我们当然不知道,要塞的陆上防御工事如何;但是根据我们对老缅施科夫的了解,可以设想他没有白白浪费时间。

从英国报纸的报道和联军所选的作战方向来看,我们可以预料,首先攻击的目标将是北面山岗上瞰制着城市的堡垒,俄国人把它叫做北部要塞,也就是北堡。

这个堡垒只要构筑得稍许坚固一些,那么它就可以进行长期抵抗。这是一个大型四角堡,是根据蒙塔朗贝尔的多边形筑城体系即侧防暗堡体系筑成的;它的两侧由低的穹窿工事防卫,这些穹窿位于四角形每一边的中央附近,筑在壕沟深处,可以向左和向右对壕沟射击。这类工事的优点,是在敌人把堑壕挖到壕沟边以前,不会受到敌人炮火的直接轰击。由于这种工事紧靠主塞,可以作为用于进攻的强有力的出击据点和基地,而这种工事的存在本身,就迫使联军把主要行动局限于港湾的北岸。

博马尔松德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俄国要塞真正经受考验之前,对它们是无法作任何肯定的评述的。因此目前根本无法确定克里木远征的胜利把握究竟多大。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如果战事形成持久局面,如果冬季的到来又引起疾病流行,如果联军也像过去在锡利斯特里亚那样,把兵力消耗在轻率的、未加准备的攻击上,那么法军,很可能还有土军,都将瓦解,就像法军在瓦尔纳曾经经历的和土军在亚洲屡次经历的那样。英军肯定维持得久些,但是,就是训练最好的军队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这是联军的真正危险,并且如果由于俄军的抵抗,情况的确发展到这一地步,那么在胜利的敌人面前撤

退上船,将是十分危险的事。远征很可能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第二次瓦尔赫伦。³³⁷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9 月
2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0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0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克里木的消息³³⁸

本报今天上午充满了惊人的消息^①：克里木血战，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它的一些主堡被破坏，俄国舰队大部分被歼灭，缅施科夫公爵最终投降，他那支被击溃并几乎全部被歼灭的军队的残部也已被俘。如果这些消息完全属实，那么几乎40年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血战，也没有过孕育着如此重大后果的军事事件。至于这些消息的确实程度如何，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仔细地把官方的和确实可靠的消息与非官方的和值得怀疑的消息加以甄别，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因此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消息分为两部分：有关9月20日阿利马河会战的消息和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根据拉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元帅的报告，9月20日联军攻击了阿利马河南岸高地上的俄军营垒，并迫使俄军退却。英军缴获两门火炮，而法军在报告中丝毫没有提到战利品。法军损失约1400人，英军损失的人数相同。俄军总数为45000—50000人，损失4000—6000人。这些报告显然是在充满初战胜利之喜悦的情况下写成的。关于俄军有50000人

① 这句话有可能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参加阿利马河会战的报道,同较早的关于俄军在克里木整个地区最多不过 45 000 人的消息大有出入。如果考虑到在野战工事被攻占时火炮几乎不可能撤走的这一情况,那么在这样一座装备“大量重炮”的营垒中缴获的两门火炮,看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战利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圣阿尔诺元帅没有提到法军缴获火炮的事。

就算缅施科夫在阿利马河的营垒内集中了 45 000—50 000 人,这又证明什么呢?或者是他拥有比原来预计的多得多的军队,因而能够把这样大的兵力用在开阔地上;或者是塞瓦斯托波尔的向陆一面的工事非常薄弱,以致他除了在开阔地上击败联军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保卫要塞;最后,或者是他犯了极大的错误,竟把部队派到开阔地上作战,以致部队受到惨重失败而士气涣散。

根据较早的报道,阿利马河营垒内的俄军不超过 10 000 人。他们可能得到增援,但要使他们的数量达到 25 000—30 000 人,俄军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既然在阿利马河附近,即距登陆地点 15 英里处有 50 000 名俄军,那么,他们在联军登陆时却不攻击,这又怎么解释呢?

在联军登陆的旧堡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有三条河,由于河谷较深,这三条河在军事上形成了三道阵地。距塞瓦斯托波尔最近的是黑河,它流入塞瓦斯托波尔湾的东部。北堡防护着海湾的北岸,而这条小河,更确切地说,它的很深的河谷,在城东形成一道天然的壕沟。显然,这里是最后一道重要的防御阵地。第二条河——卡查河,在北堡以北数英里处由东向西流;最后,从这里再往北约 12 英里是阿利马河。不论这三道防线在战术上能提供什么优越条件(这不在当地是无法判断的),很难想象俄军会从中选定第一道,亦即最远的那道防线作为可能决定塞瓦斯托波尔命运的决战场所。但是联军没有骑

兵主力部队,这也可能促使俄军向阿利马河营垒派出一支大部队,因为他们 在骑兵方面拥有暂时的优势,可以不必担心敌人骑兵对翼侧的攻击。此外,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后无法使用骑兵的想法也可能促使他们这样做。

如果作更仔细的分析,俄军在阿利马河的失败从战术上就更没有那么严重了。俄军不喜欢背面敞开的工事。他们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总是喜欢在打算进行顽强抵抗的地点构筑闭合的方形堡。只要攻击已经开始,要从这种方形堡内撤出火炮是不可能的。甚至在那些背面敞开的、术语称为眼镜堡的工事里,也几乎不可能在强攻的敌人面前撤走火炮。因为如果正当敌人攻击时撤走火炮,那么防御就失去武器,如果敌人已经冲过壕沟,那就没有人能在敌人近距离的火力下把火炮从土垛或炮座上拖下来,并且套马运走。

“只要工事不能继续坚守,配置在工事中的火炮就算丢失了。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迫使敌人 为它们付出最高的代价。”^①

迪富尔将军在他的野战筑城教科书中就是这样说的。俄军只损失两门火炮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并没有坚守营垒到最后一人,而且说明最多不过一两座工事真正是联军用白刃冲击攻占的。其余的工事未必用刺刀防守过,而且看来都是在敌人强攻纵队到达壕沟以前就放弃的。俄军显然是在骑兵掩护下秩序井然地退却的,他们利用了联军的骑兵部队不能迅速渡过阿利马河、越过各雏谷的这一有利条件。但是,他们保存了几乎全部火炮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在敌人以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的队伍中造成混乱以前,他们就已经停止作战了。

^① 吉·昂·迪富尔《野战实际作业教科书》1825年柏林版。——编者注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在阿利马河南岸高地上所获得的胜利的全部情况,这是本月1日英国在礼炮齐鸣和钟声震响中郑重宣告的胜利,是9月30日星期六晚10时市长勋爵在铜号声中在皇家交易所宣布的胜利,也是在各剧院所欢庆的、被伦敦《泰晤士报》说成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感恩祈祷的预期效果的胜利。记者们报道说,圣阿尔诺曾经爬不上马。历史学家说,拿破仑在滑铁卢会战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可能,阿利马河的胜利正是导致滑铁卢会战失败的那些情况造成的。

现在谈谈第二部分有关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更加惊人的消息。伦敦收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个消息是9月28日从布加勒斯特用电报发来的。这则电讯说,联军从海陆两方面进行联合攻击后,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据说这个消息首先是由塞瓦斯托波尔开往君士坦丁堡的一艘法国轮船带出的,这艘轮船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它在海上遇到的开往瓦尔纳的另一艘法国轮船。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要塞是在9月25日攻占的,这一消息在26—27日的那个夜间可以带到瓦尔纳,28日中午可以送到布加勒斯特,因为瓦尔纳距布加勒斯特100英里稍多一点儿,信使24小时就能赶到。波拿巴就是根据这一消息编写告布洛涅兵营书的(告兵营书我们另外发表)^①。但实际上,9月30日以前没有一个信使到达过布加勒斯特。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第二个消息,至少从地理上来看是合理的。但它只是在波拿巴宣读告布洛涅兵营书的那一天才从布加勒斯特发出。奥地利政府在10月1日下午6时收到并由土耳其驻伦敦公使在10月3日转交《泰晤士报》的这则电讯,在同一天登在《通报》上,并附有

① 括号里的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说明：

“这个消息是由布奥尔先生转告法国政府的，他并委托许布纳尔先生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向法国皇帝祝贺法军在克里木的辉煌胜利。”

应当指出，这个重要的消息完全是根据从君士坦丁堡派往奥美尔帕沙处的信使的口述，这个信使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见到奥美尔帕沙，就前往奥美尔帕沙的驻地锡利斯特里亚。据这个信使说，塞瓦斯托波尔已被占领，俄军 18 000 人被击毙，22 000 人被俘，康士坦丁堡堡垒被摧毁，其余堡垒都被占领，800 门火炮被缴获，6 艘俄国军舰被击沉，而缅施科夫公爵率领保全下来的军舰退向海湾深处，并声称他宁可炸毁它们，也决不无条件投降。联军给他六小时的考虑时间。君士坦丁堡将张灯结彩庆祝十天。

根据我们对奥兰群岛上的俄军工事的观察，以及联军阿利马河胜利的情况来判断，塞瓦斯托波尔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内投降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难道能够想象，这是在打了败仗后仍能幸运地把几乎全部火炮保存下来，并且由这一战役中最勇敢的俄国指挥官率领的 5 万人的军队吗？难道可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在城市受到第一次攻击后就会放下武器吗？不过，这次战争中确实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和不寻常的特点，因而我们必须准备好“应付一个接一个的意外情况”，就像拿破仑在 1807 年接到塞巴斯蒂亚尼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紧急报告时一样。联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做了能做的一切来为自己准备一次空前的失败。为什么命运不可以赐给他们一次无可比拟的辉煌胜利呢？历史总是捉弄人的。它可能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奇闻，即让那个刚刚在一年前离开“垂死的人”的首都时还骄傲地自信可以吞下整个帝国的年迈的俄国罗多芒特³³⁹，被监禁在博斯普鲁

斯海峡的一个简陋的小塔楼里。对于这次战争的主谋者和发起人，这个骄傲自负的缅施科夫来说，如果作为俘虏被送回到君士坦丁堡，这又是多么无情的惩罚！

如果土耳其信使的话是真的，克里木战役的经过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9月14日和16日联军没有遇到抵抗就在旧堡附近登陆；19日开始进军；20日在阿利马河会战胜利，并于25日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

从利物浦开出的下一班轮船是阿非利加号，它直接驶往本埠，不在哈利法克斯停靠。它在星期五以前未必能够到达，因此在这以前，我们没有希望得到任何有关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的确实消息。也许，暂时相信土耳其信使所说的全部情况是最适当的，不过我们希望，听信这个消息的人不要陷入我们的朋友路易·波拿巴在这件事情上在布洛涅陷入的那种有失体面的处境。读者们可以在本报另一栏里看到，^①这位皇帝在几天前举行的一次阅兵时，非常富于戏剧性地用明确而肯定的语言宣布了塞瓦斯托波尔已被攻占的消息。当时他可能把自己当作真拿破仑在向自己的部队宣布一次巨大的胜利。但是使这位侄儿遗憾的是，他的伯父从来不需要宣布自己的胜利，因为他亲自率领部队作战，而且他的士兵们亲眼看到敌人怎样逃跑，因而并不需要任何证实。更加遗憾的是，路易·波拿巴忍不住要公布的这个消息，当晚就被布洛涅兵营的司令官作了另一番说明，后者在墙上张贴通告说，收到了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的报告，但是否确实，不能保证。这样一来，法国皇帝陛下的布洛涅司令官竟纠正了皇

① 本段的头两句话以及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作过改动。——编者注

帝本人的话！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我们收到的 10 月 3 日法国政府的最新官方报纸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并没有证实。可是，上述消息仍可能是真实的，因而我们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确实的消息。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0 月
2—3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0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1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³⁴⁰

有一句英国谚语说：“捉住鞑靼人！”³⁴¹可是不仅英国人，而且法国人和奥地利人都反被鞑靼人捉住了。如果我们对《论坛报》和它那些注视目前克里木战役进程的读者们没有跟别人一道被捉住这一点表示有些满意，我们也许会得到原谅。

当我们刚刚听到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这一离奇的故事时，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消息的各个来源，并以军事科学的资料为根据，企图证明^①，继阿利马河胜利（不管这个胜利具有多么大的决定意义）之后，这个作为整个战役主要目标的要塞未必会那样快投降。记得我们还判定了这一事实：联军根本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俄军带着自己所有的火炮秩序井然地撤退了。而且最后我们特别强调指出，这整个消息并不是依据关于阿利马河会战的官方报告，而完全是根据一个给奥美尔帕沙送秘密紧急报告的鞑靼人的口述。因此，当获悉令人震惊的“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消息无非是一个爱开玩笑的鞑靼人在布加勒斯特报道的关于阿利马河胜利的异想天开的夸大说法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突然。喜欢戏剧性效果的路易-拿破

^① 见本卷第 627—633 页。——编者注

仑却在布洛涅宣布了这个消息，而英国的小店主——这些人类杰出的标本——便盲目地信以为真。英国报刊一向表明自己不愧为这个阶级的喉舌，看来，在英国只要一提起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名字，就会使得大家欣喜若狂。我们的读者也许记得，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结束时，约翰·罗素勋爵曾声明，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原属英国政府的计划；虽然这个声明在同一次会议上就被收回了，但是它在五个钟头里，用迪斯累里先生当时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曾使极可尊敬的议员们欣喜若狂。据统计，伦敦《泰晤士报》至少发表了九篇社论，在这些社论里，不管是出于诚心还是假意，全都洋溢着那股欣喜若狂的气息；看来，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怂恿查理·纳皮尔爵士对喀琅施塔得或斯韦阿堡发动冒冒失失的进攻。这家报纸似乎被荣誉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已经开始——当然是臆想地——向波罗的海的普鲁士沿岸，以及向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和里窝那的托斯卡纳大公进行炮击。这家报纸真的在准备同全世界开战，当然也要同“其余的人类”开战。

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陆上防御工事的真实情况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确切预测，这座要塞究竟能坚持多久。阿利马河的胜利几乎肯定地表明，塞瓦斯托波尔将被攻占；因为这次胜利一定提高了联军的士气，同时也是预防疾病——他们在克里木要对付的最危险的敌人——的良药，有消息说，疾病已经发生了。但是，如果把联军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想象得如同进咖啡馆那么容易，就未免有点愚蠢了。

在识破了攻占这座要塞、毙伤 30 000 人、俘虏 22 000 人这一史无前例的大骗局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指望真正官方文件至少将会提供一些清楚和翔实的情报。然而 10 月 5 日伦敦《官报》的号外上刊登的、今天上午本报好几栏转载的报告，归根到底仍然含糊其辞。老实说，它漏洞百出，——这是因为它肯定是由帕麦斯顿外交学派的

代表人物之一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搞出来的。首先,这个紧急报告据称是在9月30日下午3时30分从布加勒斯特发往英国,可是雷德克利夫勋爵从君士坦丁堡签发它的日期却是9月30日晚上9时30分;这样一来,在从君士坦丁堡发出此紧急报告以前六个小时布加勒斯特便收到它了。其次,紧急报告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9月20日和28日之间在克里木发生的事情,只是说:

“28日早晨联军各部在巴拉克拉瓦建立了作战基地并准备立即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亚加米农号(海军上将莱昂斯在此舰上)和其他军舰在巴拉克拉瓦海湾。在这个地方卸下攻城的辎重非常方便。”

英国报纸认为这个紧急报告是可靠的,便自然地作出这样的结论:联军通过别利别克和北区后攻克了塞瓦斯托波尔湾后面的一些高地,沿直线进入巴拉克拉瓦海湾。这里应该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军队在占领了瞰制塞瓦斯托波尔的高地以后悄悄地顺另一面斜坡下去,向距离11英里的另一海湾挺进,只是为了去“建立作战基地”,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海军上将莱昂斯以一部分舰队包围赫尔松涅斯角,以便获得一个安全的港口,它既靠近塞瓦斯托波尔,又便于卸下我们一直认为仍未卸下的攻城炮,这倒是令人完全可以相信的。不言而喻,卸火炮时必须要有支部队进行掩护,而这支部队不是由主力在旧堡附近登陆后抽出,就是由那些从君士坦丁堡和瓦尔纳渡海过来的预备队抽调一部分组成。

新的紧急报告接着说:

“缅施科夫公爵在战场上统率20 000人,等待援军。”

英国报纸由此得出结论:9月20日和28日之间俄军在战斗中一定损失了25 000—30 000人,这是由于报纸和拉格伦勋爵都同

样认为俄军有 45 000—50 000 人参加了阿利马河会战。我们以前就已说过^①，我们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些数字，并且一直认为缅施科夫公爵指挥的野战军士兵不超过 25 000 人；现在查明，我们的估计同俄国人自己公布的数字相符。

紧急报告中还说，“阿纳帕筑垒据点已被俄军焚毁，其守军正开往战场”。我们不相信这个消息是正确的。假如缅施科夫公爵正在等待任何援军及时赶到的话，那么最恰当的做法是从彼列科普调遣，而不是从距离将近两百英里之远的阿纳帕调遣；假如他不能指望从彼列科普得到援军，而从处于黑海的另一边的阿纳帕抽调守军，那就是愚蠢之至，因为这样一来除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外，还把在高加索的最后一个堡垒也牺牲了。由此可见，不管这个官方的紧急报告中的全部“情报”怎样，我们仍然得把阿利马河会战看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重大事件。但是，关于这个事件的详情至今仍然欠缺，而且纽卡斯尔公爵现已预告英国公众，在 10 月 9 日星期一以前不要指望得到详情。我们除拉格伦勋爵的官方电报报告以外所知道的情况可归结如下：伦敦当铺的英雄圣阿尔诺元帅在作战那天“身体微感不适”——（不知其他英雄是否也如此？）——主要指挥权落在拉格伦勋爵手中，英军损失了不是 1 400 人，而是 2 000 人，其中有 96 名军官，并且已有运载伤兵的六艘蒸汽舰开到了君士坦丁堡。

奥美尔帕沙的军队从布加勒斯特和瓦拉几亚经过鲁斯楚克、锡利斯特里亚和奥尔泰尼察向黑海沿岸地区移动，看来可以证实克里木的联军统帅部要求增援的传说。但是土军这次撤离瓦拉几亚，也可以说是因为奥地利想让他们远离通往比萨拉比亚的各条大道，只

^① 见本卷第 627—628 页。——编者注

给他们留下经过多布罗加的那条不能通行的道路。

虽然英国公众确实表现了空前的轻信态度,但是应该指出,伦敦的交易所几乎没有受这种普遍热情的支配,国家证券上涨没有一次超过0.625%。但在巴黎国家证券一下子上升了1.5%,这样的上升,同滑铁卢失败后出现的10%的上升比较起来,毕竟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可见,如果这场骗局是有人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制造的,——这是可能的事情,——那也完全没有获得它的制造者们所期望的伟大成果。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10月5—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0月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5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

——概评³⁴²

1854年10月6日星期五于伦敦

英国人在本周内的激动和疑虑是难以形容的。上星期六，市长在铜号声中在交易所宣读了关于阿利马河会战胜利的紧急报告，而在全中国则流传着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全世界都受了骗。拿破仑在布洛涅向自己的军队宣布了此事，英国和法国的报纸都为这个令人兴高采烈的事件发表了社论，奥地利皇帝向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祝贺胜利，但是他谨慎地未提到塞瓦斯托波尔；各处举火庆祝胜利，礼炮轰响。不久我们就知道了引起这样的兴奋和欢跃的紧急报告的情况，实际上其来源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一个鞑靼人（即一个土耳其信使）从君士坦丁堡来到布加勒斯特，给奥美尔帕沙送来一份紧急报告，这位将军不在，报告应原封不拆转交给他，因此，我们无从知道报告的内容。但是据信使说，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城里已装置彩灯并有命令要连续悬挂十天。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塞瓦斯托波尔已被攻占，还讲了一些只有土耳其或伦敦

的信使在小酒馆里可能讲出的详细情节。他说击毙了18 000名俄军,但只缴获了200门炮,——虽然在要塞内共有500多门炮;当然还有22 000名俄军被俘虏——因为大家知道,守备部队总共有4万人左右。起初舰队被包围,然后一部分被击沉,缅施科夫公爵打算把自己同其他一部分军舰一起炸毁,如此等等。

可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并没有把这样重要的事件通知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而法国政府也没收到任何紧急报告。然而消息实在是太好了,不能不相信它,因此人们也就相信它了。虽然,第二天从圣彼得堡发来一则消息,提到了缅施科夫公爵9月26日的紧急报告,说在阿利马河会战后他正往辛菲罗波尔方向撤退,但是各报仍然认定,这是打印上的错误,发出紧急报告的真正日期是9月20日,而没有立即放弃关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那个令人高兴的假消息。不过今天英国公众清醒过来了:关于没有围攻就占领了大要塞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原来是一场无情的骗局,这将使报纸以后要谨慎从事。

在西班牙,不仅在马拉加(我在最近一篇通讯中曾指出,共和派在这里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甚至在埃斯帕特罗住过很多年的洛格罗尼奥也发生了骚乱;电讯还报道说,在哈恩破获了一桩共和派的密谋,唐·恩里克王子(女王低能的丈夫的兄弟)被放逐到巴利阿里群岛去了。但是,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所引起的激动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谁也不去注意西班牙。

在丹麦,10月2日议会开幕。国王发表了向会议挑衅的御前演说。这个演说引起了表示维护宪法的口哨声和呼喊声。《法兰克福报》再次报道说,盟国决定重新考虑1852年5月8日签订的著名的条约³⁴³,根据条约,丹麦王位的继承权最后正式转让给了俄

国皇帝。乌尔卡尔特一直反复让公众注意这个有损于欧洲外交威信的文件，看来，他的努力现在终于成功了。假使这则消息一般是可信的话，西方强国这一行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争取不同意上述议定书的普鲁士与西方强国结盟。值得注意的是，帕麦斯顿过去把这个议定书（像1840年的条约³⁴⁴一样）看作是对付俄国的一种手段，而目前取消它又应该理解为对俄国的一种敌对行为。

有消息说，奥地利给圣彼得堡送去了一份照会，再次提出四个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并指出沙皇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将被弗兰茨-约瑟夫看作是开战的理由。这是在克里木获得的胜利的结果之一。

下面的评论是针对《经济学家》不久前所载的一篇文章发表的，我们把它从斯密斯先生和查理先生的商业通告中摘引出来：

“从对俄贸易的观点来看，战争开始后所作的种种声明或暗示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家》上星期六所提出的论点。必须注意到，这家周刊属于财政部次官之一（威尔逊先生）所有，因此我们想提起大家注意的那些意见，可以看作是半官方性的。《经济学家》阐述了彼得堡的外汇兑换率，并指出由于我们和普鲁士进行贸易的结果，普鲁士必然会把不列颠的黄金提供给俄国作军费；它说，我国政府预料到了这一切，但认为事情的这种状况毕竟是两害之中的轻者。《经济学家》接着说，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后‘我们将独占黑海及其沿岸，并成为多瑙河的主人。但在这个时候俄国也许会占据我们武力所不及的阵地以便考验英国的耐性，因为在这样的阵地上俄国只能受到贸易的影响，而且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民族利益是否会要求我们很快实行不同于我们过去所实行的另一种政策。我们将发现我们封锁港口是徒劳无益的，只要我们的货物还得通过邻国中介才能找到销路；只要我们允许普鲁士靠当中间人而发财，使我们对俄国海岸的封锁能被轻而易举地打破等等……因此，如果根据总政策考虑必须重新研究关于加强封锁和限制陆上与海上贸易到何等程度的问题，等等。’《经济学家》以极郑重的警告的口吻总结说，‘那么一心想从事这样的冒险事业（如供给俄人以资本以便在冬季购买应在来年送到那里的货物）的人不妨考虑考

虑一个问题：在俄国战役的第二年可能要采取与在第一年被认为最明智和最合适的政策截然不同的政策。’

未必需要指出由此得出的结论（我们郑重地建议朋友们仔细研究一下全文的内容）：盟国决定在明年把禁止陆上贸易作为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而且为了阻止资本家从事即将被禁止的贸易，政府极其关切地允许财政部的一位次官非常及时地使我国商人了解政府的意图，以免他们一意孤行而招致严重的后果。星期六脂油的价格与星期五大体持平。很可能，要不是我们所谈到的《经济学家》上的这篇文章，今天的价格会受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影响而跌落，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重要要塞被攻克会使俄国皇帝同意缔结协定。但我们的意见正好相反：这个灾难只能激怒沙皇，迫使他在别的方面寻求报复。十分明显，在他还没有被迫放弃自己的大城市的时候，他可以认为自己并没有被彻底打败，因此在他未陷入绝境以前，他宁愿孤注一掷也不会让步。所以我们认为，除非真正把《经济学家》认为盟国打算施行的那个方针付诸实现，这个战争可能要延续许多年。”^①

10月5日的《通报》报道，根据波拿巴的命令，最近三年来被囚在贝勒岛的巴尔贝斯被无条件释放了，因为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强烈地希望十二月政变的文明战胜俄国的文明³⁴⁵；顺便指出，前一文明不久前在雅典表现为1849年六月的日子的重演³⁴⁶，当时法国的丘八在那里抓住了一个“令人讨厌的”报纸出版者，焚毁了他的书籍和信件，最后把他投入了监狱。巴尔贝斯今后不再是法国的一个革命领袖了。他声明同情法国军队，不管他们是为了什么事业和在谁的指挥下作战，这样一来，他就必然使自己向俄国人看齐，同他们一样对本国参战的目的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长时期以来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一直在相互争夺对革命法国的真正的领导权。巴尔贝斯不断地诬蔑布朗基，说他有勾结政府的嫌疑。关于他们两人中谁是和谁不是革命者的问题，巴尔贝斯的信和波拿巴的命令提

^① 1854年10月7日《人民报》第127期。——编者注

供了答案。³⁴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年10月5—6日

载于1854年10月21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4215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弗·恩格斯

阿利马河会战³⁴⁸

关于阿利马河会战的官方消息终于收到了，今天本报刊载了司令官们的报告和目睹这次会战的英国记者和一些海军军官的详细报道。^①所有这些材料基本上证实了我们根据有关这次会战的最初的一些电讯所得出的结论。看来，事实是这样的：

在距海岸约三英里的地方，阿利马河弯成半月形，两角指向北方。河的南岸，大部分是高约 300 英尺的悬崖，在这里像一个半圆形的剧场，稍稍向河面方向倾斜。俄军选择了这个左右都有台地边缘的断崖掩护的斜坡作为阵地。如果遭到挫败，俄军的优势骑兵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掩护部队沿平坦的台地退却，同时这上面几乎到处都可以撤走炮兵。从台地到河流的半路上，斜坡构成了梯形的阶地，俄军在这里配置了步兵主力，左面有险峻不可攀越的悬崖作掩护，右面也有同样险峻的悬崖，还有阶地上的一个多面堡和制高点上进行纵射的一个重炮队作掩护。海军上将阿默兰断定这个炮队是由 12 门三十二磅炮组成的，但是这样重的火炮在退却时如何运走（无疑是运

①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走了),却是这位军官所未能解释的一个谜。

俄军阵地前面的葡萄园和岩崖构成的交错起伏的地形,对防御是有利的,加上鹿砦和其他人工障碍物,对攻方就更加困难了。不过由于这个地区树木不多,这些障碍物未必特别可怕。在俄军背后的高台地上和两翼配置了他们的预备队和骑兵。在正面,散兵配置在阿利马河的对岸,占据着阿利马村和布尔柳克村。

联军在9月20日向这个坚固的阵地前进,法军在右,英军在左。清晨,法军派博斯凯将军的一个师(第二师),会同土军八个营沿海岸前进,在舰炮掩护下从那一侧攀登悬崖,从而迂回俄军的左翼。英军本应对敌人右翼采取同样的行动,但不可能得到舰船的掩护,而且在台地上他们对面是敌人的骑兵主力,因而,这部分攻击计划没有实现。但是博斯凯指挥的法军成功地攀登了台地的峭壁,而且当这个高地上的俄军遭到舰船上的重炮轰击时,拿破仑亲王指挥的法军第三师向俄军左翼运动。不久,俄军的中央和右翼都遭到了英军的攻击。同拿破仑亲王的师并肩前进的是德·莱西·伊文思爵士(曾在西班牙卡洛斯派战争时期指挥过英籍军团³⁴⁹)指挥的英军第二师。支援他的是英格兰将军(第三师)。联军的极左翼是乔·布朗爵士指挥的英国轻步兵师,支援该师的是剑桥公爵指挥的近卫师。预备队(乔·卡思卡特爵士的第四师和卢肯伯爵的骑兵师)在左翼的后卫内机动使用,以便粉碎敌人迂回翼侧的一切企图。

看来,这次会战的特点是:会战的开始阶段,即全线进行互射并在射击的掩护下进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机动的时期,非常短促。事实上,俄军阵地已经判断得很清楚,并且俄军强大的炮兵又如此配置,以致稍长时间的互射对联军来说不仅无益而且简直有

害。既然英军走在法军后面，看来法军一度不得不处在这种扰乱性射击下；但是，后来法军纵队和英军散兵线开始缓慢而稳步地通过了他们面前难以通行的地段，把俄军从阿利马村和布尔柳克村驱逐出去（退却部队把布尔柳克村烧光，使联军不能利用它作为掩蔽地点），渡过了河，并且毫不延迟地冲向高地。在葡萄园内以及在断崖和鹿砦之间的许多地方发生的战斗很像1848年在维罗纳和斯蒂维耶雷堡之间发生的战斗³⁵⁰。正规地前进是不可能的；密集而不成队形的、主要是各自为战的大批散兵给自己打开了通向俄军防守的第一个阶地的道路。这时，博斯凯将军使他的一个旅在台地上站住了脚，从这里威胁了俄军的左翼；为了援助他，派出了第四师（福雷师）的一个旅，同时以福雷师的另一个旅增援拿破仑的师。这样，法军占领了严重威胁俄军左翼的阵地。在俄军的右翼，乔治·布朗爵士夺取了俄军的多面堡——这是阶地上俄军这一部分阵地的锁钥。虽然俄军预备队从高地上发动攻击，一度逐走了英军，但由于苏格兰士兵（剑桥公爵的师）进行了攻击，最终还是守住了这个工事。因此，俄军的左翼被迂回，右翼被突破。中央遭到正面的攻击后，只好沿坡而上向台地方向退却；俄军到达台地以后，由于拥有骑兵和骑炮兵，又处于特别适于这两个兵种行动的地形，也就不怕任何严重的攻击了。但是俄军的左翼在遭到博斯凯迂回的时候大概发生过某些混乱。法国对这个问题的报道是一致的，同时，缅施科夫的马车在那里落入法军之手这个事实也完全证实了他们的报道。另一方面，俄军能够运走他们的全部火炮，甚至包括右翼炮队的重攻城炮（法军连一门火炮都没有缴获，英军只缴获三门，并且可能是已被击毁的），这个情况说明退却总的说来是井然有序的，同时证明缅施科夫在优势刚刚转到对方就立即停止战斗的

决定是英明的。

看来,联军作战是很勇敢的。历史上很少有几次会战像这次那样,军队几乎是不间断地、缓慢地却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而且完全没有通常那些使大多数大会战具有戏剧性的变化莫测和偶然事件。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不管怎样,联军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同时也证明联军的将军们在报告中极端夸大了俄军的兵力。我们现在回转来谈谈这个问题。

联军的指挥才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与其说依靠了将军们的才智,不如说依靠了军队的勇敢和舰队的支援。这可以说是一次简单的、寻常的、具有纯粹战术性质而特别缺少任何战略特点的会战。博斯凯的翼侧机动是一个很自然的主意,而且由那些在阿特拉斯隘路学会这种机动方法的非洲军团的士兵很好地完成了。英军突破了俄军的右翼,战斗得率直而顽强,看来各团和各旅的良好机动也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不过,英军成前后两道散兵线进攻的单一形式所以被破坏,只是由于地形障碍,而不是由于旨在欺骗敌人或者使敌人措手不及的大规模机动。

缅施科夫公爵很好地选择了自己的阵地。但是,看来他没有像他能够做到的那样去利用自己的骑兵。为什么在左翼不配置骑兵,趁孤立的博斯凯旅刚开始整队时就把它从悬崖上赶下去呢?停止会战、把部队撤出火力圈、撤走炮兵和整个退却,看来都进行得非常巧妙,这些行动给他的指挥才能所带来的荣誉比胜利给联军将军们的指挥才能所带来的荣誉还要大。

至于参加会战的兵力,联军方面除炮兵外在战场上有三个法国师和四个英国师,同时一个法国师和一个英国师以及全部骑兵留作预备队,派去增援博斯凯但在战斗结束后才到达的八个土耳其营没

有计算在内。因为法军把较强的部队留在瓦尔纳,而且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比英军大,所以可以认为在会战当日英法各师的兵力几乎相等——每个法国师约6 000人,而每个英国师约5 500人。这样,实际上作战的步兵将近4万人,并有预备队约16 000人,其中包括土军;看来,这同关于远征军兵力的报道是相符的(除去病员和外出的部队)。按圣阿尔诺元帅的说法,俄军的兵力为两个基干师(第十六和第十七师)和两个预备旅(由召回的归休兵组成,即第十四和第十三旅),此外还有猎兵第六营。如果各旅所属的营数齐全,总共应有49个营。每营以700人计算(在这次战争中每营一般不多于此数,虽然在匈牙利战争中每营多50人),总共有34 300人。这个数字和我们的资料提供的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及其四郊的正规陆军的总数相近,并且很可能至少有五六个营留作这个要塞的守军,因此俄军参加会战的兵力可能是三万名步兵,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大致可靠的。据说,俄军有骑兵6 000名,当然其中有许多不过是些哥萨克。联军兵力的这一明显优势,使胜利失去过分的荣誉,而读者从我们引自英国报纸的材料中看到,人们正企图把这种过分荣誉看作是这次胜利造成的。看来,双方都表现了同样的勇敢;当然,无论联军的将军们怎样夸耀自己的胜利,但他们也决不会设想他们在胜利后能够既不遇到障碍,也不遇到抵抗而旌旗招展、军乐喧天地直接开进塞瓦斯托波尔。

会战的结果虽然在精神上对联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未必能够使俄军产生严重的沮丧情绪。这次退却同吕岑或包岑会战³⁵¹后的情况相似;如果缅施科夫能够像布吕歇尔在卡茨巴赫河会战³⁵²前所做的那样,巧妙地从巴赫奇萨赖的侧防阵地拖住联军,那么联军还会认识到,这种毫无结果的胜利不会给胜利者带来多大的好处。缅施

科夫仍然会以雄厚的兵力威胁他们的后方,而在他们没有再一次把他打败和最后把他赶走以前,他仍然是可怕的敌人。现在几乎一切都决定于双方援军能不能到来,一方面联军从预备队中抽调,另一方面俄军从彼列科普、刻赤和阿纳帕的部队中抽调。谁能够首先取得数量的优势,谁就能够给对方沉重的打击。但是缅施科夫有一个优越的条件:他可以在任何时间放弃进攻而退却,而联军却被束缚在他们的仓库、兵营和辎重所在的地方。

目前,塞瓦斯托波尔虽然一面被围,但看来并没有危险,因为联军的兵力优势还不足以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但是,如果联军能在缅施科夫的补充部队开到以前,先得到一支两万人的援军,——根据昨天晚上我们从哈利法克斯的电讯中得到的尼亚加拉号轮船带到的消息来看,这几乎是肯定的^①,——那么许多问题都可能在数日内得到解决。不能希望像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要塞,在一旦遭到严重的、坚决的攻击时能面对野战堑壕坚持两星期之久。全部预备队都已由瓦尔纳乘船出发,并且应在10月4日或5日到达,尽管由哈利法克斯发出的电讯没有提到到达的日期;^②因此,不管怎样,塞瓦斯托波尔未必会在10月16日或18日以前被攻克。也许在开阔地采取积极的战斗行动,能使它多坚持一些时候;但是,除非缅施科夫及其在联军后方的机动部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优势,除非联军因时疫而大量减员,否则塞瓦斯托波尔必将被攻克。根据俄军的准备情况和士气来看,可以相信,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只有在拚命的抵抗和惊心动魄的血战之后才会失守。当然,强攻和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残酷情况从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②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某些方面说将会胜过阿利马河惨象。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0 月
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1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俄国的军事力量³⁵³

我们完全可以暂时让约翰牛和笨伯雅克³⁵⁴为阿利马河会战的“光荣胜利”和预料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而狂欢。在多瑙河和克里木的战争，不管对盟国和欧洲资产阶级自由派阵营有多大关系，对俄国是没有很大意义的。这个国家的重心决不会受到它的可能的结局的影响，然而对于联军，在克里木失败和被迫退却，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削弱他们的地面作战能力，和使他们的士气受挫，他们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重振士气。

最近，我们收到了有关俄军兵力分布和最近调动的可靠消息，不妨把这些消息汇集在一起，看一下已经参战的俄军兵力同俄军总数相比占多小的一部分，其余的兵力又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大家知道，俄军大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①

一、主力军队

近卫军和掷弹兵组成的精锐部队 2 个军，有 76 个步兵营、92 个骑兵连、228

① 引自奥·冯·哈克斯特豪森《军事强国俄国及其历史、统计、人种和政治关系》1852 年柏林版第 12—25 和 42—45 页。——编者注

门火炮。

6个基干军,有300个步兵营、192个骑兵连、672门火炮。

3个骑兵军,有176个骑兵连和96门火炮。

共计376个步兵营,460个骑兵连,996门火炮。

二、地区军队

芬兰军,有12个步兵营。

奥伦堡军,有10个步兵营。

西伯利亚军,有15个步兵营。

高加索军,有55个步兵营、10个骑兵连、180门火炮。

高加索军的预备部队,有36个步兵营、2个骑兵连,有火炮。

高加索基干军,有47个步兵营,有骑兵连和火炮。

共计175个步兵营,12个骑兵连,180门火炮。

三、哥萨克和其他非正规部队

约700个骑兵连,32个步兵营和224门火炮。

四、预备部队

1. 内勤部队约50个营(不包括残废兵)和77个惩戒队。

2. 主力军队的预备部队:近卫军和掷弹兵各团中的第四、第五和第六营,基干军各团中的第五和第六营,这就是说,前者24个团中每团有3个营,后者72个团中每团有2个营,共计有216个营。

所有这些预备部队已经征召服兵役并已全部编成,因而已经开始用最近一次征召的30万人给各团编组第七和第八营;因此,上述216个营可以列入总数,这样就有726个步兵营、472个正规骑兵连、

700 个非正规骑兵连和大大超过 1 000 门的火炮。关于骑兵和炮兵预备部队的编组情况,在俄国国外人们不知其详,所以没有包括在这个总数里。

幸好,这个数目实际上并没有表面上那么骇人。要确定俄国真正能用于欧洲战争的军队人数,就必须从总数中除去西伯利亚军、内勤部队和至少一半的哥萨克;那么,剩下的约有 650 个步兵营、472 个正规骑兵连和 350 个非正规骑兵连以及约 1 200 门火炮。这些部队少说约有 52 万名步兵、62 000 名骑兵和 3 万名哥萨克,也就是总共 60 多万人,他们分布在从里海沿黑海和波罗的海到白海的整个边界上。

从对土耳其的战争开始以来,在帝国南部边界陆续参加作战以对抗联军的有下列部队:

1. 第三、第四和第五基干军及其部分预备部队,但大部分预备部队还在途中。
2. 三个高加索军的全部。
3. 第一基干军的两个师(该军兵力的三分之二),预备部队不在内。
4. 在克里木的第三骑兵(龙骑兵)军的一部。

战役开始前,这些部队共计约为 24 万人,但是现在至少已减到 184 000 人;其中 84 000 人可以算它是比萨拉比亚军团,54 000 人在克里木或正向那里调动,46 000 人在高加索。

到 8 月底,在波罗的海地区有:

在芬兰的第六军的预备部队	16 800 人
芬兰军	12 000 人
近卫军及其预备部队	66 800 人
在雷瓦尔的掷弹兵军的一部分	10 000 人

共 计 105 600 人

在波兰或向那里调动的有：

掷弹兵军的其余部分及其预备部队	55 000 人
第一军和第二军及其预备部队	120 000 人
哥萨克和各军的骑兵	30 000 人
各种预备部队	25 000 人

共 计 230 000 人

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约为 575 000 人，这个数目加上奥伦堡军（在阿斯特拉罕）、1 个预备队骑兵军以及驻在白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部队，就得出上面所说的总数。驻波兰的部队中，约 3 万人在行军途中，约 2 万人担任华沙的守备部队，约 10 万人占领了旧波兰王国境内的维斯瓦河右岸，并且约有 8 万人作为预备队驻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的沃伦和波多利亚地区。因此，俄军的主力，包括精锐的近卫团和掷弹兵团在内，都集中在由圣彼得堡到霍京一线，即沿帝国西部边界一线。但是这些阵地看来并没有很重大的意义。由一个近卫师替换下来的掷弹兵部队离开了雷瓦尔，并同其余两个近卫师一起开往波兰；这两个近卫师所属的每个团有 4 个营，只有第五和第六营留在彼得堡。所以，在西部的军队已经超过 27 万人，并且开来同他们会合的还有迄今根本没有参加过作战的 3 个预备队骑兵军的大部分；这将使在西部的军队达到 30 来万人。

现在军队的配置已经改变。占领波兰王国东南部的 10 万人渡过维斯瓦河沿奥地利边界占领了阵地。驻沃伦的 8 万人已推进到波兰，使军队沿这个边界构成绵亘的一线。近卫军、掷弹兵（随着部队到达的情况，可能还有骑兵军）则在后方占领中央阵地。在冬季，由

于波罗的海结冰,可以从那里再临时抽出一些部队。到5月,用来编成各团第七和第八营(即新编营,共计192个营,13—14万人)的新兵,就会受到足够的训练来接替他们的位置。

因此,很明显,尼古拉很少为帝国南部发生的事担心,因为他可在波兰最好的战略阵地上集中30多万人。这也确实是最好的阵地。它像楔子一样插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中间,从翼侧包围着它们,而它本身又有军事艺术同自然相结合所能提供的最坚强的防御手段作为掩护。拿破仑深知被维斯瓦河及其支流环抱的这个地区的军事价值。他在1807年战役中曾把这个地区当作自己的作战基地,直到夺得但泽为止。但是他一直没有注意在这里设防,结果在1812年退却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俄国人,特别在1831年以后,却做了他们前人所忽视的事情。莫德林(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华沙、伊万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构成一个完整的要塞体系,它在战略的配合方面是举世无双的。溃败的部队只要获得给养,便可利用这一体系抵抗比自己强大一倍的敌人,而要切断整个这一地区的补给线,那是一件从来没有人试图要做的事。熟悉这个地区的一位德意志军事著作家说过:整个这一复杂的要塞体系,说明俄国人的企图与其说是防御的,不如说是进攻的。建立这一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所在地区的防御,而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向西方进攻的基地。

仍然有人相信,如果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尼古拉将请求议和!但是俄国连三分之一的王牌都还没有用上,暂时失去塞瓦斯托波尔和舰队,对这个巨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塞瓦斯托波尔也好,舰队也好,对他都不过是小玩意。俄国完全明白,对它有决定意义的战场不在敌军能登陆的沿海地区,而在大陆内地,因为在这里可以调动大军集中作战,而不致在徒劳无益的海岸防御中分散兵力去对付随时都

能逃逸的敌人,俄国可以丧失克里木、高加索、芬兰、圣彼得堡和所有这样一些边区,但是只要不触及它那个以莫斯科为心脏而以设防的波兰为右臂的躯干,它是丝毫用不着让步的。

可以说,1854年的主要军事行动不过是将载入1855年编年史的民族大战的小小序幕而已。只有当俄国在西部的大军同奥地利军队彼此对抗或者互相携手开始行动时,我们才会看到同拿破仑的历次大规模战争相似的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并且还有可能,这些战斗只是其他更激烈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战斗的序幕,即欧洲各国人民反对那些目前胜利的和自以为巩固的欧洲专制暴君们的战斗的序幕。

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10月
1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10月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23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3卷翻译

弗·恩格斯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³⁵⁵

在阿利马河会战以后，联军在克里木的主要成就就是拉格伦勋爵由阿利马河向巴拉克拉瓦的著名的侧敌行军；他通过这一行军，把战役的明显目标从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改变为对俄国要塞的一部分（而且是较薄弱的一部分）进行突然袭击；当然，这次行动预定要消灭俄国舰队、破坏造船厂和军火库，但是也包括联军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就立刻撤退。整个行动表明，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放弃对要塞的北部正面，即瞰制整个要塞和唯一能使攻击具有决定意义的北部正面的攻击；因而，这就是远征军公开承认没有能力完成自己计划中规定的任务：完全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然而，像我们以前所报道的，人们正是用了无数充满夸张词句和含糊空话的篇幅，把这次行军吹嘘成指挥艺术的最杰出表现。就连在当地派有记者的伦敦各大报纸，也只是在一个月以后，而且看来是得到政府的暗示以后，才透露了真情。例如，伦敦《泰晤士报》只是在10月28日才第一次公布了真实情况，它谨慎地暗示：到目前为止，整个战役的任务看来只完成了一小部分，而海湾北面的堡垒，如不自愿投降，就很难攻下。当然，《泰晤士报》希望这些堡垒会彬彬有礼地投降，因为一旦要塞的主要部分被攻占，一切附属工事就一定要投降。事实上，不是北堡依靠塞瓦斯

托波尔城,而是塞瓦斯托波尔城依靠北堡,而且恐怕单凭我们同行的议论,是不足以攻取这样坚固的要塞的。

不管怎样,自从上面谈到的这次“光荣的行军”以来,联军没有作出一点多少值得夸耀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够责难我们的英国同行对这次行军如此大吹大擂^①。至于这次围攻的经过,目前还属于大概连他们自己也宁愿尽量少谈的话题。但是,既然我们决心要不偏不倚地对待上述事项,我们也就不必那样谨小慎微。事实是,在这场本来已经够奇怪的战争中,这次围攻是最奇怪的事情之一。看来,这次战争中的特点,就是深信野战工事是不可攻占的。首先从奥尔泰尼察说起,俄军在那里用旧式的炮击法进行了几小时的轰击,然后对工事实行强攻,但是没有成功。在卡拉法特,俄军甚至不敢攻击。在锡利斯特里亚,简单的土质工事挡住了进攻者的主要突击,并且当这种工事几乎已被夷为平地时,它仍然在抵御敌人猛烈的攻击。还有,现在在塞瓦斯托波尔,一条简单的野战工事线竟荣幸地看到自己面前有大量的破城炮队和比攻打最完善的要塞所用的还要多得多的重火炮。这次围攻非常突出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假如拿破仑看见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纷纷架起八英寸和十英寸口径火炮的炮队,他定会哈哈大笑。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

联军约在10月1日占领了阵地,但是在8日或9日才开始挖掘堑壕,而且直到17日才开炮。这次拖延的原因是火炮未能更早地运到当地。它们总共只需要通过四五英里的路程,而且地面坚硬,很少起伏,有一段还是已经铺好的不坏的道路。但是没有驮载的牲口。

^①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作过改动。——编者注

在牲畜比任何地方都多的克里木,竟然没有驮载的牲口!是呀,从黑河的高地可以看见在拜达尔盆地有许多犍牛,其数量之多足以把整个联军舰队拖过山岗而有余。但是拜达尔盆地是哥萨克自由通行的地方,联军骑兵去袭击时可能遇到这些可怕的敌人。此外,联军应当与当地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去掠夺他们的财产。英国报纸企图以这些遁词来掩盖事实的真相:拉格伦和康罗贝尔虽然从南面封锁了塞瓦斯托波尔,但本身又被缅施科夫的警戒部队封锁在黑河边。^①而且情况正是如此,这一点只要用下述事实就可以证明:根据迄今为止的最新报道,联军士兵被迫食用咸肉,因为他们不可能得到鲜肉了。

10月3日,俄军5个营在因克尔曼附近渡过黑河,而且他们被允许自南面进入要塞,“因为这对联军只会有利”。多么别开生面的战法!被说成已遭到击溃、士气低落和垂头丧气的敌人却在联军眼皮下面把3000人派进塞瓦斯托波尔。敌人想必可能有某种理由这样做。如果敌人有理由把这些部队派去,那么拉格伦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客客气气地让他们进去。他认为这个地方会拥挤不堪,尽管有什么根据还不清楚。不管怎样,俄军除了防线以内有四平方英里的地区外,还有整个北岸和在它后面的全部地区,在十分钟内便可以把一切多余的部队调往那里。把仅有一面被封锁的地方说成拥挤不堪,这无论如何是荒谬透顶的。

在最初得知登陆的消息时,我们曾说过,如果战役拖延下去,时疫将是联军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时疫正在猖獗,至少就英军而言,由于护理工作做得很糟,情况更加严重。的确,由于这一原因,病员很

^① 这句话经《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作过改动。——编者注

少得到照顾,以致拉格伦勋爵不得不对医务人员严厉申斥。但是情况还不仅如此。医官在君士坦丁堡,药品的储备在瓦尔纳,而病员在巴拉克拉瓦。对于路易·波拿巴不久前在布洛涅所侈谈的新军事论点,即任何一支军队要占领良好的阵地,都必须配置成三角之势,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实例吗?随着季节转冷,疾病加剧了,团队人数逐渐减少,——英军一个团出征时是1 000人,现在有战斗力的士兵不会超过600人,——而军事行动仍然那样迟缓地进行。最高统帅部的陈规旧套——四十年和平环境中训练的成果,是不可能被这些小事动摇的。让军队毁灭吧,只要能根据女王陛下的条例夺下塞瓦斯托波尔就行了!

在通常的围攻中,围攻者总是竭力使先头炮队尽量接近敌人的工事,六七百码就算是很远的距离了。然而根据拉格伦的说法,在像这样一次的大规模围攻中,并且围攻的又多半是简单的野战工事,就应当用相反的方法。敌人让我们接近到700码以内,但是我们决不当做敌人所希望的事情,这便是拉格伦的说法。于是他把自己的炮队配置在2 500和3 000码的距离上——如果战报留有可疑之处的话,对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相信。以后,他接近到1 500和1 200码,并且对于为什么不开火这个问题,他终于说:破城炮队要想进行有效的射击,应配置在距准备打开缺口的工事三四百码的距离上!在远距离的炮队内一定有兰开斯特炮³⁵⁶和十英寸的远射程炮,因为英国炮兵显然有这样的见解,即这些火炮像望远镜一样,只适用于远距离。的确,完全适用于海军炮兵的这种远距离射击,在应用于陆军炮兵时造成的混乱和虚假现象超过了它带来的实际好处;这些可笑的炮队便是例子。

激发出这种种天才和聪明智慧的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岸工事,是

由下列几部分组成的：在西面（法军在这一面攻击）有卡兰亭炮台凸出的一个或两个正面。它的后面是带射孔的垒墙，这道垒墙一直延伸到卡兰亭湾的尽头，它的终点是筑在山岗上的圆形塔楼，这个塔楼是周围土质工事的内堡。从这里到港湾的尽头筑有约三英尺厚的垒墙，它从西南面环绕着塞瓦斯托波尔。这段垒墙尽管很容易整修好，但据说完全不适宜于防御，因此在它前面另有不大的土质工事作掩护。由港湾的尽头向东到军港（英军攻击的正面），如果不算和上述塔楼相类似的周围有眼镜堡作掩护的两个塔楼，总的说没有什么正规的防御工事。此外，这里还有一些不正规的土质工事，如果相信比达尔夫上尉发表的在当地绘制的草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这一切只构成了一个极寻常的营垒。不管怎样，这些草图中只标出了一道由背后不设防的工事构成的防线；这里没有俄军非常喜欢的闭合式多面堡。但是很难相信，全部情形就是这样。如果的确只需要夺取这一道防线的话，英军也许早就用白刃战把它攻下了。后面必定还有第二道多面堡防线。

俄军在全部分工事里都配有海军重炮，这是他们能够最充分发挥这些火炮的效用之处。但是他们的射击技术极差。他们日夜不停地用这些火炮射击敌人，而一百发炮弹只有一发命中目标。可能正是这种拙劣的射击促使拉格伦勋爵把堡垒挖在3 000码远的安全距离上。据报道，经过联军舰队和陆军三天的炮击后，英军在自己的攻击正面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法军在攻击正面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一当他们打开缺口，就应开始强攻。如果我们不是从可靠方面得知联军在多远距离上配置他们的炮队，那么用200门如此大口径的火炮需要三四天才能粉碎这些防御工事的抵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就是我们对迄今获得的结果所能报道的一切，不管这些行动

的结局如何,可以肯定地说,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在战史上将是独一无二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0 月
30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1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3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役³⁵⁷

今天本报刊载了波罗的海号轮船昨天带来的克里木战区的消息，它们充满一种新的情绪，这无疑将使本报读者感到震惊。在这以前，英国报刊的评论和英法记者对战争进程和前景的论述，一贯带有傲慢和过分自信的特色，而现在却流露出惶惶不安的感情，甚至有些惊慌失措。现在大家都承认联军过去宣扬的那种对敌优势并不存在。塞瓦斯托波尔比预料的要坚固，缅施科夫这位将军比预料的更有才干，而他的军队也比预料的要强得多。法军和英军现在不是一定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有可能遭到可耻的失败。这就是本报驻利物浦记者——一位有爱国热情和抱有本国人的偏见的英国人——所表达的情绪，英法两国政府十分坚决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这种情绪。它们拚命地努力，以求加速向塞瓦斯托波尔增援。联合王国已经派出了最后的一兵一卒；许多轮船用于运输。5万名法军开赴前线，并希望都能及时赶到战场，参加最后的决战。

本报在星期六曾刊登大量文件，主要是有关围攻的起初各阶段以及舰队之间的局部成功的、但总的说则是不顺利的合作等问题；今天我们补充发表关于利普兰迪对巴拉克拉瓦附近的联军猛烈攻击的公报和战斗行动进一步发展的综合报道，应当承认，这些战斗行动对

联军都是很不利。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就可以看出,联军处境虽然困难,甚至极其艰险,正像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那样,但是未必像本报驻利物浦记者所感到的那样严重。我们并不认为有比被迫撤退和登轮回国更糟的情况在威胁他们。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仍然没有失去以死拚的强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可能性。但是不管这种可能性怎样,我们认为夺取之事早该在英法本土的援军到达克里木以前就确定了。战役显然到了转折点;进行的调动、出现的错误和疏忽,使战役的性质已经明确,使它的结局也已经预先注定。我们已经有了关于主要事件的不容争辩的可靠情报,现在可以对交战的整个进程作一简要的叙述。

现已查明:当联军在旧堡附近登陆时,缅施科夫指挥的部队只有42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团以及一些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则是由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组成的。这42个步兵营属于第十二、第十六及第十七步兵师。假定每营满额时是700人,那就共有步兵29400人,连同2000骠骑兵以及哥萨克、炮兵、工兵和地道兵,这支部队共有32000人。缅施科夫以这样的兵力是不能阻挠联军登陆的,因为如果阻挠登陆就会使自己预备兵力不足的部队处于联军舰队炮火之下。只有可以牺牲一部分兵力的大军,才能派出一些部队进行小规模军事行动:突击和夜袭敌人正在登陆的部队;但是俄军在这时却需要每一个士兵去进行当前的决战。此外,俄军的步兵又最不适于小规模军事行动,他们成纵队以密集队形作战时才能发挥威力。至于哥萨克,他们的作战规模又太小了,只有掠夺的机会越多,作战才越有效。同时,看来克里木战役证明:最近30年来使哥萨克逐渐转变为正规部队的做法挫伤了他们个人的进取精神,并且把他们弄得已经既不适于非正规勤务,又不适于正规勤务。看来,他们现在既

没有在前哨内或独立部队内执行勤务的能力,也没有在队列内向敌人攻击的能力。因此,俄军保存每一刀每一枪用于阿利马河会战是很正确的。

在这个河岸上,32 000名俄军遭到了55 000名联军的攻击。兵力对比几乎是一比二。当联军已有将近三万人投入战斗时,缅施科夫便下令退却。当时参加战斗的俄军不到两万人,如果企图继续扼守阵地,俄军势必要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结果就不是退却,而是被粉碎。当联军由于巨大的兵力优势已胜利在握时,缅施科夫就停止了会战,用预备队掩护退却,并克服了博斯凯的迂回运动在他的左翼所引起的一度混乱,“秩序井然地”撤离了战场,既未受到追击,也未受到惊扰。联军辩解说他们没有骑兵可以用来追击,但是,就我们所知,俄军只有两个骠骑兵团,——无论如何比联军的骑兵要少,——所以应当承认这种辩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像措恩多夫、埃劳、博罗季诺等会战³⁵⁸一样,俄军步兵虽然已被击败,但仍然证明卡思卡特将军对他们的评价是正确的,这位曾指挥一个师同俄军作战的将军公开说:俄军“是不会惊慌失措的”。

但是,如果说俄国步兵保持了沉着和镇定,缅施科夫自己却完全惊慌失措了。联军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加上攻击时出乎意料的坚决勇猛精神,一度打乱了缅施科夫的计划,使他打消了向克里木内地退却的念头,而向塞瓦斯托波尔以南运动,准备扼守黑河地区。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误。如果他从阿利马河的高地观察联军的全部阵地,就完全可以准确地估计出敌人的兵力,最多也不会有5 000人的误差。他应当知道:虽然联军在数量上占有相对的优势,但是还不足以既留下军队监视塞瓦斯托波尔,又同时向克里木内地追击。他应当知道:如果在沿海一带联军同他的兵力对比是二比一,那么在辛菲

罗波尔附近,他便能以二比一的兵力对抗敌人。尽管如此,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却退向塞瓦斯托波尔以南。不过在他没有遇到联军半点阻碍而完成了这次退却,并使部队在黑河南岸的山岗上休息了一两天以后,他决定纠正自己的错误,其办法就是由黑河向巴赫奇萨赖进行冒险的侧敌行军。这种做法违背了战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有希望获得很大的成果。既然已经在战略上犯了错误,那就很难避免错误的后果。这时,问题只在于是对这种后果忍受到底有利呢,还是再来第二次然而已经是有意识地进行的不正确的运动来避开这种后果有利?我们认为,在这种场合,缅施科夫在敌人活动范围内大胆地进行侧敌行军,从而终止在塞瓦斯托波尔周围不合理的“集中”配置,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平庸的战略家和墨守陈规的将军们之间的这次交战中,两个敌对军队的运动都采取了在战争中从未见过的形式。侧敌行军像霍乱流行似的,在对垒双方蔓延。在缅施科夫决定从塞瓦斯托波尔向巴赫奇萨赖侧敌行军的同时,圣阿尔诺和拉格伦也想从卡查河向巴拉克拉瓦运动。俄军后卫和英军前卫在马更些庄园(它是用后来成为俄国海军上将的一个苏格兰人的名字命名的)附近遭遇,很自然的,前卫击溃了后卫。因为我们已经在《论坛报》对联军的侧敌行军的总的战略特点进行了评述,所以现在没有必要再来重复。

10月2日或3日,塞瓦斯托波尔被围,联军占领了缅施科夫刚刚放弃的那些阵地。从此,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便开始了,战役也随之进入新阶段。在这以前,联军占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舰队掌握着制海权,保障了登陆。登陆以后,他们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无疑有较高的战斗素质,这就保证了在阿利马河取得胜利。但是,现在已开始形成军队脱离自己的基地在敌国作战

时迟早必然出现的那种均势。诚然, 缅施科夫的军队仍然没有露面, 但是它的存在使联军不得不把预备队正面向东配置在黑河。因此, 围攻部队本身便大为削弱, 在数量上只比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稍占优势。

缺少毅力、组织不严(特别是英国陆海军各主管部门的协作方面)、地形困难, 而主要的是英国后勤部门和作战部门中那种无法克服的墨守陈规的习气, 使真正的围攻战推迟到 10 月 9 日才开始。在这一天, 终于在距俄军工事 1 500—2 500 码的远距离上挖掘了堑壕。这样的事情在以往的任何围攻中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到过。它证明俄军仍然能够争夺要塞四周至少一英里以内的地区, 而且的确扼守到 17 日。那天早晨, 围攻作业已推进到使联军可以开炮的距离。假如没有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消息说: 由于将在 10 月 25 日攻下塞瓦斯托波尔, 现在举国欢腾, 那么炮击很可能还要再拖延几天, 因为联军在 17 日那天根本没有做好开炮的准备。上述消息当然激起了军队的斗志, 并且为了安定军心, 便不得不开炮。结果是联军以 126 门火炮对抗 200 或 250 门火炮。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屡次用来稳定舆论的沃邦的著名原理却说:

“围攻是一种可以像数学那样精确地计算出结果的军事行动, 如不受外来因素的妨碍, 它只是时间问题。”^①

这个著名原理是以这位工程师的另一原理为基础的, 那就是:

“在围攻时, 攻击的火力是可以取得对防御火力的优势的。”^①

然而在这里, 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 情况恰恰相反: 在开始射

^① 1854 年 10 月 30 日《泰晤士报》第 21885 号。——编者注

击时攻击的火力绝对弱于防御的火力。后果立刻显示出来：俄军在几个小时内就迫使法军炮队沉寂了，并且整日同英军炮队进行了几乎是势均力敌的战斗。为了转移俄军的注意力，联军进行了海上攻击，但是进行得并不比陆上好，也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法国军舰攻击卡兰亭堡垒和亚历山大堡垒，以支援对这些堡垒的陆上攻击；如果没有这种支援，法军无疑会遇到还要激烈得多的回击。英国军舰攻击了海港的北部，其中包括康斯坦丁堡堡垒、电报局炮台和在康斯坦丁堡堡垒东北临时构筑的炮台。邓达斯海军上将，这个谨慎的人，命令自己的舰队在距堡垒 1 200 码处抛锚，——他显然是赞成远距离射击的。但是，在军舰同岸防炮台的战斗中，军舰如不能进到距炮台 200 码或者更近的距离，以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获得较大的效果，就一定要打败仗，这是早就明确了的问题。总之，邓达斯把自己的舰队置于毁灭性的炮火之下，如果不是埃德蒙·莱昂斯爵士赶来援救，他一定会遭到大败；看来当时莱昂斯几乎是违背了命令而率领三艘战列舰尽可能地接近康斯坦丁堡堡垒，使堡垒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同时他自己也受到了损失。由于英法海军将领们的报告直到现在只字不提堡垒的实际破坏情况，我们不得不认为，在这里，也和博马尔松德一样，蒙塔朗贝尔式岸防工事——堡垒与穹窿炮台——能够经受住数量多一倍的舰炮的轰击。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现在可以肯定，这些堡垒暴露的石质工事正如已部分地在博马尔松德证明的那样，经不住架设在岸上的海军重炮 24 小时的破坏射击。

在这件事情以后，法军几乎好几天完全停止了射击。英军因为炮队配置得距俄军防线较远，同时比起他们的盟友来拥有口径较大的火炮，所以能够继续射击，并且迫使俄军一个石质多面堡的上层火

炮停止射击。海上攻击没有继续进行,这是对穹窿堡垒表示敬畏的最好证据。俄军进行的防御使阿利马河会战中的胜利者大为清醒。在每门被击毁的火炮的位置上换上了新的火炮。白天被敌人的火力破坏的每个射孔,在夜间又修好了。在土工作业方面,当联军没有采取措施以获得优势以前,双方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拉格伦勋爵发出的“顾惜城市”的可笑的命令取消了,于是炮击开始了,对集结的部队的集中轰击和它所起的骚扰作用,看来使守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此外,在炮队前面还派出了散兵,利用各种掩蔽物瞄准射击俄军的炮手。同在博马尔松德一样,米涅式线膛枪起了很大的作用,重炮和米涅式线膛枪在几天内杀伤了大部分俄军炮手。水兵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他们是守军中使用重炮最熟练的人。于是,不得不采用被围守军的常用手段,即步兵在幸存的炮手指导下使用火炮。但是很容易设想,他们的射击几乎丝毫不起作用,因此围攻者就有可能使堑壕越来越接近要塞。据报道,他们在距外围工事 300 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三道平行壕。我们还不知道,在这道平行壕里配置了什么样的炮队;现在只能指出:在正规围攻中,第三道平行壕总是挖掘在被攻击的工事的斜堤脚附近,也就是距壕沟五六十码左右的地方。如果这个距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被加大了,那么我们只能认为这证实了某些英国报纸的看法,即防线的没有规则不但使英国工程师们无法发挥创造才能,而且把这些绅士们弄糊涂了,因为这些绅士们虽然能够按照所有的现成规则摧毁正规棱堡的正面,但是一旦敌人不按照在这个问题上公认的权威所制定的规则行事时,他们便束手无策了。

既然决定从南面攻击,就必须使平行壕和其中的炮队指向一个或者至多两个明确规定的防御方面的正面。应当集中力量攻击两个

(最多三个)相邻的外堡。这几个堡垒一经破坏,其余的外围工事就会失去作用。如果联军采用这种方法,集中全部炮兵轰击一点,那就会立刻很容易地取得巨大的火力优势,并且大大缩短围攻的时间。根据平面图和地图来判断:从卡兰亭堡垒起到内湾末端止的正面,也就是法军现在攻击的正面,可能是最适于进攻的正面,因为破坏这一正面以后城市本身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联军拥有的130门火炮本来可以保证在这个狭小的正面很快造成火力优势。但是,联军没有这样做,他们希望英军和法军各自独立行动,结果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围攻法,就是使长达三英里多的垒墙都同时受到炮击。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听说过攻方竟会让守方一下子在寻常的棱堡工事和眼镜堡内让全部250门火炮同时参加战斗。要知道,一个棱堡正面未必能够容纳20门以上的火炮,而在一般的围攻中能够参加防御的正面不会超过三四个。除非联军的工程师们以后能够为自己这种奇怪的战法找出很有力的论据,否则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能找出防御方面最弱的地点,为了不使这些地点漏掉,只好对全线进行射击。

在这期间,双方都开来了援军。利普兰迪对联军前哨进行的骚扰性的并取得局部成功的攻击表明:俄军还拥有比缅施科夫带到巴赫奇萨赖去的更雄厚的兵力。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雄厚到足以进行一次解围的会战。考虑到围攻者所取得的胜利,考虑到随着围攻者向城墙接近,防御者的损失将按几何级数日渐增大,考虑到防御者仍然坚守着外围工事,而要塞围墙的防御显然已经削弱,我们可以期待在11月9—15日期间出现决定性的结果:不是城市的南区陷落,就是联军遭受决定性的失败而被迫放弃围攻。但是必须指出,这样的预言总是随情况而定的,而这些情况在离开战场这样远的

地方事前是无法完全估计到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1 月
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1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4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东方战争³⁵⁹

从欧洲来的阿非利加号轮船给我们带来了三天的消息,但其中除谈到许多伤病员被活活烧死在一个医院里的惨事和其他一些非笔墨所能形容的灾难以外,没有任何重要的战区新闻。关于11月5日那次激烈而没有明确结果的会战,波罗的海号轮船曾带来过简短的消息,现在我们又得到了拉格伦勋爵的简短的报告,但还没有得到与会战或目击实况的记者惯常的详细和生动的报道。^①由于战争中的困难增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多,在英国和法国不安的情绪很严重——比表面上所能看到的严重得多。塞瓦斯托波尔坚决拒绝向在勇敢和牺牲精神方面比自己毫不逊色的联军投降,被认为是很大的凶兆。今天本报另栏所载的摘自伦敦《泰晤士报》的消息,^②表明情绪已在变化,疑虑开始滋长,这种疑虑会被有些人误以为是绝望的最初征兆。因为缺乏有关5日会战的详细材料,我们对这次会战还无法评论,所以今天只能谈谈这次会战以前有关围攻的一些事件。

10月25日,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的缓慢单调局面第一次被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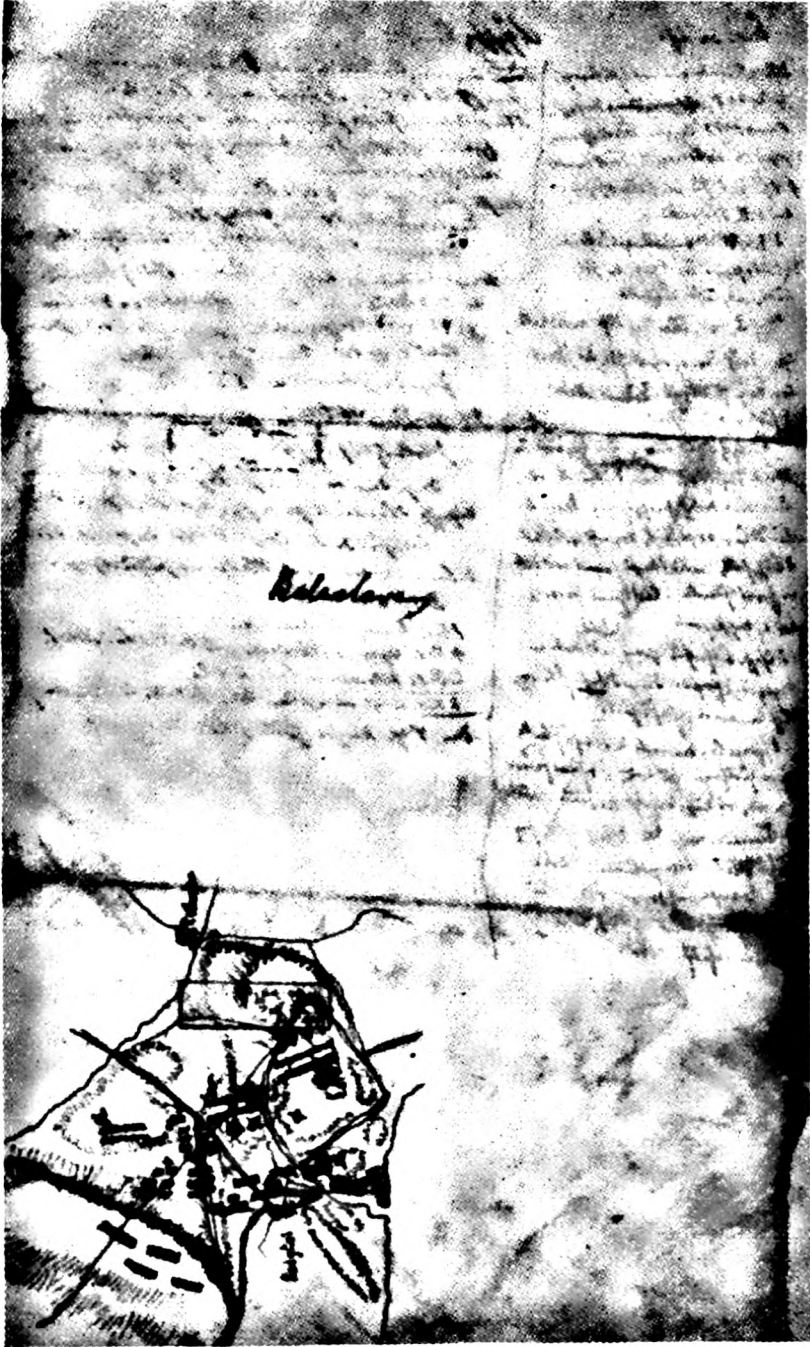
① 本文开头这段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②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剧性的事件打破。在这一天，俄军攻击了掩护围攻部队的联军阵地；并且由于这一次双方比较势均力敌，结果和阿利马河会战完全不同。实际上，这次作战行动与阿利马河会战互为补充：这次参加战斗的几乎全是骑兵，而在阿利马河会战中骑兵事实上根本没有参加。俄军这次是进攻者而不是防御者，联军则拥有阵地坚固这一个优越条件。诚然这次会战也几乎和阿利马河会战一样，双方不分胜负，但优势属于俄军。

在塞瓦斯托波尔湾以南的赫拉克利亚半岛和克里木草原之间，有一片丘陵地从流入塞瓦斯托波尔湾的黑河口向西南伸展。这片丘陵地的西北面缓缓朝塞瓦斯托波尔倾斜而下，朝巴拉克拉瓦的东南面则大部是峭壁悬崖。对于占领半岛的联军来说，这个丘陵地是天然的防御阵地，可以用来对付任何企图解围的俄军。但是不幸得很，英军的“作战基地”，舰队使用的主要港口和补给品的集中地都在巴拉克拉瓦，而巴拉克拉瓦则位于这个丘陵地东南约三英里处。因此必须把巴拉克拉瓦包括在防御体系内。巴拉克拉瓦周围是一连串极为参差不齐的高地，这些高地从上述丘陵地的南端沿着海岸向正东和正西伸展，并且几乎同所有的克里木丘陵一样，向西北的一面逐渐倾斜，而向东南的一面则是陡峭的悬崖。在这两群高地形成的夹角里是一片略带起伏的平原，平原向东逐渐隆起，以陡坡终于黑河河谷。

这片平原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丘陵和小高地相交错，它们向西北和东南伸展，把我们称为赫拉克利亚丘陵地的那块地方同南海岸的山地连接起来。在巴拉克拉瓦以东和东北约三英里处的那块高地上，联军构筑了由四个多面堡组成的第一道防线，这些多面堡掩护着通往巴赫奇萨赖和黑河上游的道路，它们是由土军防守的。第二道



弗·恩格斯的《东方战争》一文带有地图的
准备材料的一页

野战工事线是正对着巴拉克拉瓦构筑的，一直伸展到由沿海高地和赫拉克利亚丘陵地构成的夹角的尖顶，而赫拉克利亚丘陵地由驻扎在附近的法国博斯凯将军的师防守。由此可见，尽管英军步兵、海军陆战队和水兵所防守的第二道防线与法军多面堡防线相连接并得到后者的翼侧掩护，而突出在前面约两英里由土军防守的第一道防线则不仅得不到任何支援，而且令人奇怪的是，这道防线的位置还不同可能出现敌人的道路相垂直，而是几乎在这条道路的延长线上，这样俄军就可能逐一夺取这四个多面堡，夺一个就占住一个，而这些多面堡不可能互相进行大力支援。

联军在巴拉克拉瓦这一面的阵地由土军驻守，他们在多面堡即第一道防线内进行防御；巴拉克拉瓦附近的高地由英国海军陆战队驻守；在巴拉克拉瓦以北的谷地内驻有第九十三苏格兰步兵团和几支由痊愈的伤病人员组成的部队。再往北是英国骑兵的营地，而在赫拉克利亚高地上则驻有博斯凯将军的步兵师的前卫。

10月25日晨6时，利普兰迪将军率领俄军对上述阵地进行攻击。他指挥的混成师内有6个步兵团（第聂伯团、亚速团、乌克兰团、敖德萨团、弗拉基米尔团、苏兹达尔团、第六猎兵营和1个黑海哥萨克营，共25个步兵营）、3个骑兵团（第十一和第十二骠骑兵团和枪骑兵混成团，共24—26个骑兵连）、约两个哥萨克团和70门火炮，其中包括30门十二磅火炮。

利普兰迪将军派格里贝将军率领第聂伯团三个营通过他左方的隘路去占领科马雷村，在这个村的前面便是第一个也是最坚固的一个多面堡。格里贝将军占领了这个村，看来他的三个营极为平静地在那里度过了那一天，因为在以后关于会战的报道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他们。

起先顺着黑河接着沿一条乡村道路前进的主力纵队到达了由巴赫奇萨赖通往巴拉克拉瓦的大道,在这里遇到了土军占领的多面堡。因为第一个多面堡非常坚固,所以利普兰迪将军首先进行炮击,然后派出强攻部队。散兵线掩护着成连纵队进攻的亚速团第一、第二和第三营,这三个营还得到了在两翼成密集纵队进攻的亚速团第四营和第聂伯团的一个营的支援。在猛烈的抵抗之后,多面堡被攻克了;土军在堡内留下了170名死伤人员,这个事实,同英国报纸上恶意的论断相反,证明土军对这个多面堡的守卫是英勇的。而仓促构筑的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多面堡则几乎未经战斗就被俄军占领,到早晨7点钟,联军的第一道防线便完全落到了俄军手中。

土军放弃这些多面堡可能有利于破除自奥尔泰尼察和锡利斯特里亚会战以来就普遍认为土军英勇非凡的极端迷信;不过英国将军和英国报纸这一次的做法还是不体面的,他们突然对土军大发雷霆。其实应受叱责的与其说是土军,倒不如说是那些竟这样不合理地构筑防线又不注意及时完工的工程师们,和那些使第一道防线处于毁灭性的打击之下而不予任何援助的指挥官们。

像苏格兰人那样坚定沉着但是动作缓慢的第九十三苏格兰步兵团的士兵,是逐渐投入战斗的,而且在多面堡已被攻占之后才通过高地前来援助。被俄军骑兵追歼而逃散的土军终于能够在苏格兰人的两翼重新整好队形,后者力求避开俄军火力,卧倒在尚为联军占领的全部阵地之前的一个不大的地褶的棱线后面;土军只是在左翼得到一个骑兵师的支援。这时,俄军在筑有多面堡的高地上展开成战斗队形;左翼是亚速步兵团,它的右面是乌克兰步兵团,再右是敖德萨步兵团。这三个团占满了多面堡中间的空地,占领了联军过去的第一道防线。在敖德萨团右面,略带起伏的平原有利于骑兵行动。俄

军把两个骠骑兵团派到了这里，他们正面对着调到这里来的英国骑兵，双方相距约两英里。苏兹达尔团、弗拉基米尔团、部分炮兵和刚刚到来的枪骑兵留作预备队。

当第九十三苏格兰团得到一营痊愈的伤病人员和土军增援之后开始抵抗俄军时，俄军的骠骑兵就向它攻击。但是在骠骑兵还没有来得及前进时，英军的重骑兵旅就向他们猛扑过来。七八百英国龙骑兵奔向俄军，击溃了他们；如果考虑到英军数量上的绝对劣势，这一次攻击就是有记录以来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攻击之一。数量比英军多一倍的俄军骠骑兵瞬间便被冲散了。被派来攻击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几个俄军骑兵连，遭到了沉着的苏格兰士兵在 15 码距离上的齐射而四散逃窜。

如果说土军败逃了，那么英军这时却得到了荣誉。苏格兰士兵甚至还没有列成方队便迎击骑兵的勇敢精神，以及英军重骑兵勇猛的攻击，——这的确是可以自豪的事情，何况还是在援军到达以前做的。但是这以后，第一师（由剑桥公爵指挥）和第四师（由卡思卡特指挥）以及法国的博斯凯师和非洲猎骑兵旅开到了。部队列成战斗队形，只有这时才说得上是两军相遇。当博斯凯师在赫拉克利亚高地摆好阵势以后，利普兰迪把弗拉基米尔团和苏兹达尔团派到骑兵后的高地上组成极右翼。

两军相距在射程以外，因此射击差不多停止了，但突然某种还没有弄清楚的误会使英国轻骑兵投入了没有意义的最后遭到了失败的攻击。当时卡迪根伯爵曾接到进攻的命令，几秒钟后他便率领轻骑兵旅沿阵地对面的谷地而上，这个谷地两侧都有高地作掩护，而高地上已经配置了集中火力对准下面的地区的炮队。全旅共有 700 名骑兵；当他们接近斜坡而进入射程之内时，就遭到那里的火炮和步枪的

射击。于是，骑兵旅就向谷地上端的炮队冲锋，冒着 20 码距离内的火力，砍倒了炮手，击溃了再次冲锋但来势不猛的俄军骠骑兵；当他们正要折回时，俄军枪骑兵却突然从翼侧向他们冲锋。这些枪骑兵刚刚靠近，就立即攻击已经疲乏的英军骑兵。英军虽然曾获得局部胜利，这一次却不得不退却，并完全被俄军击溃，当然，这是俄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和英军疏忽大意因而毫无目的地直接进入大量炮兵的交叉火力之下的结果。700 名英军骑兵中，生还而保持战斗力的恐怕不到 200 人。在没有得到生力军补充以前，这个轻骑兵旅可以认为已被歼灭了。

如果没有从两翼支援轻骑兵的两次战术机动，英军的失败可能还要惨重，也许无一人生还。在右翼，卢肯勋爵曾命令重骑兵旅面对俄军炮队进行佯攻。该旅向前驰骋了几分钟，在俄军火力下大约伤亡了十人后就迅速折回。但在左翼，属于世界上优秀骑兵之列的两个法国非洲猎兵团看到他们的盟军受挫，就赶去援助。他们向高踞在弗拉基米尔步兵团对面的丘陵上从翼侧射击英国轻骑兵的俄军炮队冲锋，瞬间就突入炮兵阵地，砍死了炮手，然后在完成任务以后就撤退了；即使弗拉基米尔团的步兵不立即向他们冲来，他们也是会撤走的。

这一次，大家又看到了在这一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并且是我们不只一次地指出过的英军作战方法。英军起初犯了错误，以后又没有决心采取违反战术规则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错误后果的那种行动。但是，法军猎兵却立即感到需要如何行动。在他们守卫的那个翼侧上俄军骑兵没有冲锋，因为法军猎兵已抢先进行了勇猛的攻击。斯卡利特旅长的谨慎的“重”骑兵只进行了佯攻，这当然不足以阻止俄军枪骑兵对骠骑兵翼侧的攻击。如果他们也像法军一样

进行冲锋，俄军枪骑兵很快就会退回去的。但是当英军轻骑兵旅奉命勇敢作战的时候，重骑兵却奉命谨慎行事，结果轻骑兵旅便覆灭了。

战斗到此告终。俄军破坏了距联军最近的两个多面堡，并固守住其余的两个。他们保住了夺得的地段，而拉格伦勋爵则不敢向俄军进攻，命令加强第二道多面堡防线，并只限于防守这些多面堡。第一线就这样失守了。

在这次战斗中，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行动值得大加赞扬。正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在展开成横队的情况下迎击骑兵，只把右翼的一个连向后调动构成拐子形，不到决定时刻不射击，然后又如此沉着地进行射击，——这只有极少数的、具有步兵所需的最优良素质的部队才能做到。奥军和英军大概是唯一能够经受这种考验的军队；也许还有一些经过多年服役的俄国部队可以算在里面，虽然我们不记得，他们曾在什么时候遇到这种考验，并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上述战斗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英法骑兵对俄国骑兵的优势。联军三个旅的兵力和俄军三个团几乎相等；如果他们不是陆续地而是同时投入冲锋，并能得到调到前面的炮兵和全部进行攻击的步兵的支援，那么利普兰迪和他的部队就有从陡坡上被赶下黑河的极大危险，会遭到布吕歇尔在卡茨巴赫河³⁵²给法军安排的那种命运。

两军兵力大致如下：俄军有 25 个步兵营，最多只有 14 000 人，其中大部分参加过阿利马河会战；骑兵 24 个连，大概不超过 2 400 人，大部分由莫斯科和卡卢加调来；此外，尚有大约 1 000 名哥萨克；炮队有 70 门火炮。

联军步兵由英军第一、第四师的主力 and 法军博斯凯师的主力组成；此外，还有一些土军。土军的数量只能根据关于已登陆的土军步

兵营的材料粗略地估计,一开始有十个土军步兵营参加克里木远征,根据10月18日拉格伦勋爵的报告,以后又有六个营在巴拉克拉瓦登陆。因为这些兵力没有编入围攻的部队而且又未远离巴拉克拉瓦,所以他们应当是全部参加了上述战斗,尽管在退出多面堡以后在报告中就没有再提到他们,并被认为不值一提。总之,如果我们认为英军是6 500人,法军是3 500人,土军至少是6 000人,那大概不会有很大出入。这里还要加上巴拉克拉瓦的多面堡内约1 0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由此可见,全部步兵为17 000人;如果不算土军,则为11 000人。至于骑兵,两个英国骑兵旅约为1 400人(在英国战报中仅公布了士兵的数目),非洲猎兵不少于800人,共约2 200人。炮兵数量不详,无论如何比俄军要少,但是质量上远远超过他们。

整个说来,我们认为,这次联军至少与俄军势均力敌,他们占有便于撤退的有利阵地,并且本来可以用骑兵和步兵同时进行勇猛的攻击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是阿利马河会战那样没有结果的胜利,而是可以使他们避免11月5日那次血战的胜利。而现在,联军甚至没有弥补他们所受到的全部损失;由于过分的勇敢和过分的谨慎的奇怪的结合,由于不适当的勇猛和不适当的怯懦的奇怪的结合,由于忽视军事科学原则的冲动和放过有利战机的学究式的谨小慎微的奇怪的结合,由于联军一切行动所特有的那种所行非所需和所行非其时的奇怪做法,他们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中完全被打败了。

根据11月5日会战的材料,我们目前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次会战是我们认为应在11月5—10日期间发生的那种危机的开始。正像我们早已说过的,——伦敦《泰晤士报》现在也这样说

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给养和援军的输送。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1 月
1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1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4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因克尔曼会战³⁶⁰

这一场血战发生在11月5日,但是伦敦在11月23日才收到联军统帅和主要报纸记者的报告。关于会战的非常简短的报道是最近两艘轮船带到美国的,但这些报道都不够详细,不能使我们对战斗的性质作出较为满意的判断。但是今天由太平洋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使我们有可能刊载有关整个会战的最详细的报道,其中包括拉格伦、康罗贝尔和缅施科夫的报告,以及伦敦《泰晤士报》和《先驱晨报》特派记者的出色的、生动活泼的通讯(这两家报纸在战地都有很能干的撰稿人)。由于有了这一切和其他一些文件,我们便可以分析会战的进程,使读者能够对这次会战有一个公正和明智的看法。

像普鲁士军队在耶拿⁷一样,在因克尔曼对面的英军配置在只有沿着几条隘路才能从正面接近的高地上。英军像普军一样,没有注意占领自己极左翼的高地,而缅施科夫像拿破仑在耶拿会战时一样,向这个高地派出了他的一部分军队,于拂晓前占领了面对着敌人翼侧的阵地。显然,俄军企图利用这种情况以其主力向英军翼侧猛攻,在占领的高地上展开,并在英军进行十分危险的、但为变换正面所必不可免的机动时,随着英军各师的接近,逐个地将它们消灭,或者用术语来说,逐个对它们进行“卷击”。拿破仑当时就是利用这种机动

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败了虽然行动笨拙迟缓而且指挥恶劣、但在当时仍然是大陆旧军队中最好的一支军队。掌握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出现的以及拿破仑本人运用的新作战方法的军队在行动上的迅速,促成了这一大胆攻击的胜利。而这一次,在因克尔曼,缅施科夫却企图以行动笨拙、迟缓的军队按同样的方法袭击行动积极、运动迅速的英法军队,因此得到了同耶拿会战相反的结果。

英军在占领阵地时所表现的疏忽对于他们的指挥官来说是非常可耻的。既不占领黑河南岸的山岗,又不在这个重要的阵地上构筑野战工事,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英军指挥官完全了解,俄军正集中几千人准备向这个阵地进攻。我们已经指出,俄军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种疏忽,在丘陵地的北端占领了山岗,并用重型野炮轰击英军的阵地。英国报纸断言,俄军在战场上有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加农炮,但是这只能证明这些报纸在炮兵问题上十足无知。英军将自己的火炮从巴拉克拉瓦运到堑壕里的经验应使它们明白: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加农炮不能用于野战,何况还是为了突然的夜间袭击。事实上,它们所说的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加农炮是口径与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加农炮相似,但实际上是轻型野炮的榴弹炮,并不比英军的野战榴弹炮重。这种榴弹炮用小装药发射空心弹,并且主要靠增大射角来增加射程,其口径能够大于发射实心弹的加农炮。二十四磅的榴弹炮在重量和射击效果上相当于六磅的加农炮,而所谓三十二磅榴弹炮(口径约六英寸)则相当于十二磅加农炮;这两种榴弹炮在俄军中是属于这两种口径的加农炮连的。这就表明:无知和民族虚荣心在编造英雄事迹和宣扬民族战功方面是怎样不谋而合的。

到这时为止,一切都还是有利于俄军的。他们的指挥才能远远胜过拉格伦勋爵。他们的计划是出色的,并且执行得也很好。他们

占领了一个重要的据点并迂回了敌人的翼侧。准备向英军拉得很长的和薄弱的防线的最弱处进攻的俄军,在数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看来这可以使他们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俄军还不完全清楚,他们在同什么样的士兵作战。英军尽管受到突然袭击,却镇静地变更了正面,由面向东转而面向北,并且以猛烈的火力迎击攻击的纵队。于是开始了阿尔布埃拉会战³⁶¹以来欧洲所未有过的会战,在前一会战中英军坚毅果敢,以损失四分之三兵力的代价在指挥官的刚愎自用几乎已使英军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重新赢得了胜利。的确,在因克尔曼进行的白刃战,比过去两支最勇敢的军队彼此厮杀了六年的整个比利牛斯半岛战争²²⁰期间进行的白刃战还要多。从6点半到9点半,英军约8 000人抵抗住俄军的猛攻,而根据俄军自己报道,他们至少有3万人参加这次猛攻。英军在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俄军的常以生力军进行的攻击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坚毅精神,是值得大加赞扬的;除拉德茨基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几营以外,在欧洲恐怕没有其他任何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应当指出:有利的阵地更鼓舞了这种勇敢,因为阵地朝东的正面上是无法攀登的高地。而北面,在俄军占领的山岗同这些高地之间也隔有几条峡谷,这些峡谷形成通往英军阵地的许多隘路。因此,任何一支进攻的俄军纵队都必须通过受到英军炮兵猛烈射击的地区,必须以密集的队形前进,并且只有到达山顶时才能展开。原来已被炮兵火力削弱、而在向敌接近时又被步兵火力削弱的俄军纵队,爬上了山顶,但是在他们还没有能够展开以前,射击和白刃冲击就又把他們赶下去了。在这次战斗中发现:在近距离上米涅式线膛枪的子弹比一般滑膛枪子弹有巨大的优越性;一般的滑膛枪子弹的侵彻力只能勉强射死一个人,而米涅式线膛枪的一发子弹却常常射死四五个人,使俄军的大纵深的纵队遭受极大的损失。

当英军各师开到的时候,会战就全面展开,正面也更宽了。未能迅速前进的俄军以其左翼攻击英军阵地的最初的正面,而右翼试图冲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有一部分占领了英军的高地,但是他们不能形成正规的战线。他们企图包围并各个歼灭英军的小部队。战斗很激烈,虽然英军艰苦奋战,但如果不是法军的博斯凯师赶到,他们就会在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被歼灭。法军的朱阿夫兵³³⁵和外籍军团¹⁸⁷攻击并粉碎了俄军的左翼,而非洲猎兵则趁机猛冲,于是俄军步兵被迫退却了。就这样,14 000人的联军,虽然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战胜了3万人的俄军;不过大家公认,就俄军单个士兵来说,都打得很好,并且我们看到,就进攻计划来讲,他们的指挥能力比联军高明得多。

那么他们为什么失败了呢?应当指出,参加会战的俄军大部分是由曾经在围攻锡利斯特里亚时被击溃而士气低落的残部编成的,而且丹年贝尔格军,继过去的奥斯滕-萨肯军以后,当然是目前俄军中最糟的一个军。但并不是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会战失败,不仅仅是由于英军的勇敢,而主要是由于俄军进行这次会战的方法。这是欧洲的作战方法对俄国的作战方法的胜利。这就是这次会战的特点。

俄军指挥官是从借用拿破仑最有名的会战的经验制订一个很好的进攻计划开始的(因为任何一个俄国将军,甚至连苏沃洛夫在内,都没有独创的思想,而苏沃洛夫的唯一的独创精神就是直接的进攻)。然后,他就以最稳妥的方法着手实现这个计划,他在敌人翼侧占领了阵地。战略机动完成后,开始战术动作。这时,科学的、在研究过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作战方法,根据西方文明制订的作战方法,一下子都被抛弃了,于是就公然蛮干起来。这一支拥有许多

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的出色军队，这个阅兵操练方面的模范，竟然如此笨拙、如此不善于散开队形和以小部队进行战斗，以致它的军官只能用一大批密集的人群向敌人猛冲。一切战术机动的思想都放弃了：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所能作的一切。这一个稠密的人群，由于非常密集，当然就成了炮兵求之不得的最理想的射击目标；与此同时，成稀疏的横队卧倒在山顶后面的英军，却遭不到敌人的射击，他们用球形炮弹向俄军大纵深的纵队猛烈射击，每次齐射都打死三四十人，而米涅式线膛枪的子弹则像雨点一样飞向敌人，几乎没有一发子弹不射中这样大的靶子。这种密集人群的简单的猛攻本来足以突破联军的队列，但是在这里俄军遇见了惯于对付这种作战方法的敌人。英军在印度战争时期学会了如何抵挡密集的人群、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密集人群的猛攻。虽然俄军比锡克教徒或俾路支人高明得多，但是既然俄军采用锡克教徒的战术，那么惯于战胜拥有六倍或八倍优势的锡克教徒或俾路支人的军队，当然就能抵挡住三倍优势的俄军的攻击。当俄军纵队爬上山顶时，他们的队形已经被炮火破坏和打乱，所以英军在 50 码距离上的又一次齐射和白刃冲击就足以把他们打垮了。以后，当俄军人数增多时，英军就像拿破仑的方队在金字塔附近屹立在马木留克兵中间³⁶²一样，屹立在包围他们的俄军人群中。英军由于充满了只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士兵才能具有的自信心而表现得毫不动摇，又加上占有装备和火力的优势，这就决定了会战的结局。俄国兵的射击技术比任何国家的士兵都坏，他们已经在这里表明了这一点，否则他们准能把这里的英国兵全部击毙。

因克尔曼会战的特点和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表明，俄军步兵的荣誉正在消失。它表明，不管俄国怎样进步，西方无论如何仍以比

它快一倍的速度前进,而且它不可能战胜西方军队,不仅在兵力相等时如此,甚至在占有像因克尔曼会战中这样的优势时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联军的运输船只在黑海遭到惨痛的损失,我们可以说,在英国和法国的将领不犯很严重的错误的条件下,无疑这次会战便足以使联军在克里木取得最终胜利。我们还没有关于这次运输船只惨遭不幸的详细材料,而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仅仅是根据本报驻利物浦代理人恰好在太平洋号轮船启航前接到的伦敦电讯。^①我们还不知道,最后一批船只是载运部队还是只载运粮食和军火,但是既然电讯没有提起,也就可以推想它们没有载运部队。但是,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派往克里木的大量部队覆没,那么,自然势力给予联军的打击的确要比敌人给予他们的打击沉重得多,而塞瓦斯托波尔城下的联军在能够给他们派遣新的援军以前,就可能由于疾病和敌人不断的袭击而被消灭。

德意志大邦所采取的立场,对于联军是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威胁。现在奥地利似乎第一次真正有意同西方强国决裂而同沙皇联合,而整个德意志将跟着它走。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须怀疑的,这就是战争具有巨大的惊人的规模并席卷整个欧洲的时刻现在已经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1 月
27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2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6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① 后半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弗·恩格斯

克里木战役³⁶³

自从激烈的因克尔曼血战以来，在克里木战役中，没有发生过一次从军事观点看来多少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不过，冬季已经到来，而塞瓦斯托波尔尚未攻占，这个事实使战争具有了一个新的特点；现在，回顾一下从远征军登陆以来的种种事件的过程，以便判断这次战争将在何种时机和情况下开始今后的新发展，这将是适时的。不过，首先必须对我们以前所作的关于最近一次难忘的会战的评论稍加补充。已全部刊登于本报的①关于这个事件的官方消息，充满着不寻常的矛盾，并且缺乏真知灼见。拉格伦勋爵的报告显然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在报告里混淆了自己部队面向黑河的正面和面向塞瓦斯托波尔的正面，把自己阵地的同一翼侧，时而称为右翼，时而称为左翼，因此根据这个文件根本无法弄清事实的真相。康罗贝尔的报告含糊不清，又简单，因此完全无用。至于《俄国残废者》刊登的所谓缅施科夫的报告，只要将它同缅施科夫公爵以前的报告加以比较，任何人都立即可以看出这个报告是出自另一个人的手笔。显然，尼古拉发现过去给报界的自由已经足够了，而且像

① 这几个字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正人君子那样讲实话丝毫不能防止军队的失败，所以他认为还是恢复说谎的老办法为妙。根据皇帝的意志，一些事件的正常的过程也被任意歪曲。他的解围援军向围攻者发动的失败的进攻变成了被围者的胜利的出击。原因很明显：任何出击的部队一经达到了出击的目的，就必然要返回自己的工事；因此，退却就得到辩解，并且被说成是自然的事，但是如果正确地叙述事实的真相，那么，失败的耻辱就会无法掩盖了。

应当说，尼古拉有一切理由对人民掩盖这次会战的真相。自纳尔瓦会战³⁶⁴以来，俄军还从来没有蒙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如果考虑到纳尔瓦会战时的俄军和因克尔曼会战时的俄军之间，即1700年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一群乌合之众和1854年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就应当承认，相比之下纳尔瓦会战还算是俄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所遭到的第一次惨败，这个民族的果敢精神使它甚至在失败中学习如何取得胜利。因克尔曼会战则是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国在温室发展中正在衰退的某种征兆。在一个不开化的国家里为了维持堂皇的文明外貌所作的人为的进展和不断的努力，看来已经使俄国筋疲力尽，使它染上了类似肺癆的病症。在近百年来的所有会战中——从奥斯特利茨和埃劳³⁶⁵到锡利斯特里亚，俄军一直显示出他们是优秀的士兵。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遭到的失败，都是可以解释的；如果说这些失败可能玷污统帅们的声望，也决不能玷污军队的荣誉。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如果说巴拉克拉瓦会战显示了联军骑兵的优越性，如果说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战总的说来显示出联军炮兵的巨大优越性，那么俄国的步兵则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荣誉。因克尔曼会战也确定了这一点。非常令人奇怪，在单个俄国步兵奋战得可

能比任何时候都勇敢的这次会战中，俄国步兵部队却丧失了自己的声誉。无论是俄军方面还是联军方面，极端平庸是这次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本特点，而这一特点从没有像这一次表现得这样明显。每次行动和每个步骤都导致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打算进行的是突然袭击，却变成了整个战役，甚至还是冬季战役。进行了一次会战，但胜利的果实像昙花一现，不到一个星期就从胜利者手中消失了。要进行的是使用重攻城炮夺取未设防的城市的战斗，但在攻城炮运到以前，未设防的城市却变成第一流的营垒。发动了围攻，但在快要胜利的时机，又不得不放弃围攻，因为开来了一支解围援军，但这支援军却吃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为了与这支解围援军作战而占领的筑垒阵地，由于正面狭小，反而成为解围援军变围攻者为被围者的手段！这一系列的努力、战斗、土工作业、计划和改变计划竟花费了十个星期；冬季来临了，而双方的军队，特别是联军，却完全没有作好过冬的准备。所有这一切的唯一的結果，便是双方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战役的结局仍然是遥遥无期和胜负未定。

联军从第一次登陆到 11 月 5 日为止，投向克里木的兵力不超过 25 000 名英军、35 000 名法军和 10 000—15 000 名土军，即总数 70 000—75 000 人。当远征开始时，就不能期望从英国和法国再调出更多的补充兵力；几个步兵营和骑兵连正在途中，但已包括在上述数字里。即使在短时间内还可能调来一些部队，那也只能是土军；而土军尽管经过了切塔泰和锡利斯特里亚会战，无论是联军的指挥官还是士兵，仍然对他们毫不信任。因此，远征军中真正可靠的只有 6 万名法军和英军，实际上，只有他们才应当算在数内。但是对整个战役来说，这支军队为数太少了，而对突然袭击来说，

又过多了。当时，不可能很快地把他们装上舰船，而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又足以使俄军预有戒备。如果说奥军的存在可确保多瑙河两公国和保加利亚不致遭到俄国的侵犯，那么奥军的存在同样可确保比萨拉比亚和敖德萨不致受到任何严重的威胁；因为奥军的阵地就在这两个作战方向的翼侧和后方，所以任何军队要想向前推进，都不可能不处于奥军的打击之下。这样一来，俄军似乎相信，所有这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进攻塞瓦斯托波尔；除了它以外，只有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这两个俄国海军造船基地无论如何还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很清楚，俄军在克里木的准备必然是步步紧跟着联军的准备而进行的。在这次预定的突然袭击终于变成目前的竟按照最不正规的方式所进行的（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正规战役以前，事实正是如此。

尽管俄军在阿利马河地区受到优势极大的兵力的攻击，联军仍然不得不让它秩序井然地撤离战场，这时联军才初次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最初的计划被打破了，突然的袭击失败了，必须作好应付另一类意外事件的准备。这时，联军开始犹豫不决；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最后才决定向巴拉克拉瓦进军，于是以占领坚固防御阵地为有利的想法战胜了认为可能迅速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想法（北区瞰制着整个城市，因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同时，缅施科夫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仓促地向塞瓦斯托波尔行军，又同样仓促地折向巴赫奇萨赖。随后是联军的围攻。过了19天，第一道平行壕的炮队才开始射击，而从此以后，双方始终是大致上势均力敌的。围攻进行得十分缓慢，而且也不是稳扎稳打。堑壕内繁重的作业和使人疲劳的战斗警戒勤务，严重地折磨着那些被异乡的气候和致命的疾病削弱了的人们，因此，联军的队伍在非常迅速地缩小。他们的指挥官们几

乎没有设想会遭到战役中的通常的损耗，所以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损失深感意外。卫生和军需勤务，特别是英军的卫生和军需勤务混乱不堪。联军从自己的阵地上即可看到富饶的拜达尔盆地，那里有他们所急需的丰富的物资，但是，他们不敢冲进该地！他们不可能迅速获得增援，而俄军却从各方面开来。就在这时发生了10月25日的会战。俄军占了上风，联军三分之一的骑兵被歼。接着是11月5日的会战，结果俄军被击退，但联军也遭到了他们不能再次经受的那样的损失。在这以后，无论是俄国的解围援军还是盟国的围攻部队都行动消极。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如果说还在进行，那也不过是走形式而已。没有人会相信，联军自11月5日以来那种软弱无力而又毫无计划的射击能使城防工事受到什么破坏，或者甚至能阻碍俄军修复被毁的工事。如果恢复围攻，那么就得起头做起，所不同的只是联军的炮队可能比第一次围攻开始时向俄军工事多推进几百码而已，而这也只有当俄军在来自因克尔曼方向的不断攻击的支援下，其要塞火力不比联军火力强、并且没有摧毁突出在前面的联军炮队时才有可能。

现在，在12月初，联军已面临严寒的冬季。他们缺少为度过这寒冷多雨的季节所必需的衣服和其他物资；尽管已得到援军，而且援军还在继续开来，但是他们的兵力仍然很弱；他们在人员方面已经受到巨大的损失；他们已被卷入对所要达到的目的和采用的方法事先既未料到而又毫无准备的斗争中；他们除了感到自己的士兵在个人方面和战术方面都优于敌人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简直是毫无所得。目前，他们大概已经得到两万人的援军，主要是法军，而且还在等待新的补充；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第一次向土耳其运输联军时曾有过多少困难和拖延了多长时间，同时也回想一下，运输第一批部

队的船只几乎全部被留下,必须为现在受命开往东方的几个师另找船只,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在上述两万人到达以后,克里木的联军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再得到大量的补充。因此,联军目前的兵力约为55 000—60 000人,其中三分之一就在不久以前还过着舒适的守备部队的生活,他们还必须经受严重的考验,然后才会习惯于克里木的冬季艰苦的野营生活。事实上,自英法的运输船只在11月13日惊人的风暴中遇险后,这些补充兵力可能证明不是对联军的加强,而是一种负担。但是,决不能说,这次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最周密的计划之下也是不能预见和无法防止的意外事故。那一天的风暴,完全是个季节性的风暴,而联军舰队所遇到的灾难可以说也是恰逢其时。经过三个月令人苦闷和无法理解的拖延以后,克里木远征军出发的时间本身就预示着暴风雨和灾难,预示着船只、乘员、士兵和军需品的损失。不仅如此,人们还曾不止一次地警告过这次不寻常的战役的策划者,指出这么晚的季节在黑海航行必然会遇到不幸。因此,他们应对所有这一切负责,甚至对11月13日的遇险负责,这次遇险使联军险遭拿破仑的军队在莫斯科战役中所遇到的命运。据伦敦《泰晤士报》推测,11月13日在克里木的各个地点联军损失近千人,其中“落入哥萨克手中的人数尚未计算在内”。该报还报道说:

“排水量为2 700吨的最好的新螺旋推进式蒸汽舰亲王号最近开往巴拉克拉瓦,船上载有第四十六团、为围攻部队准备的全部冬服(其中包括四万件军大衣、法兰绒军服、内衣、袜子和手套)、牛肉、猪肉和其他食品、斯库塔里用的医疗器材以及继续围攻用的大量炮弹。所有这一切全部损失了。载有900吨火药的坚毅号也已沉没。看来,继续围攻和保障部队度过严冬所需的一切物资在一瞬间都遭到毁灭。即使我们仅以坚守塞瓦斯托波尔前面高地上的阵地为满足,那也无法应付最凶恶的敌人——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十分明

显的。”

虽然克里木几乎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孤立部分，虽然派去抵抗联军的军队在联军只有 35 000 人时没有能够把他们击退，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肯定地说，这 6 万联军足够抵挡住将来俄国可能用来与他们作战的全部兵力。俄国在克里木有 6 个步兵师和 1 个预备师，即大约 100 个营的兵力（海军陆战队和水兵除外，双方的这两种兵力我们都没有计算在内）。这 100 个营中有一半在多瑙河地区经过了 18 个月的艰苦奋战，因此其总数未必超过 5—6 万人。参战中的全部俄军，包括骑兵、野战炮兵和哥萨克在内，比联军大约只多 10 000—15 000 人。但是如果吕德尔斯军，即 49 个营计 20 000—25 000 人（因为他们也留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多瑙河）开往彼列科普的消息属实，如果在该方向上还在集结一些新编成的预备部队，那么俄军很快就会得到进行大规模的突击的有利时机；而且，在指挥能力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时，精神、体力和战术方面的优势都只能起一定的作用，所以，战争的结局如何，还非常值得怀疑。同时，如果异常寒冷的冬季将使一切军事行动停止的话，那么，这显然是联军无法忍受的。

对克里木形势的上述看法只是证明我们在听到奥地利已与西方强国联合³⁶⁶的消息时的怀疑和犹豫是有根据的。很明显，我们所详细说明的情况，并不能使维也纳内阁摆脱它通常所持的犹豫不决的态度。另一方面，英国内阁的地位不巩固，加之在东方的巨大失败都迫切需要以某些别处的表面成绩来掩饰，因此，有充分理由要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协定吹嘘为一个了不起的攻守同盟。可能，在这方面我们错了，但是我们的读者知道我们所以坚持这种看法的原因，而且时

间也将表明,这种大肆吹嘘的奥地利与盟国的联合究竟是事实,还是专门为了在最近这次议会会议上使用的一种手段。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2 月
4—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2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7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战况的进展³⁶⁷

奥斯特利茨的太阳已经西沉了。在纪念十二月二日那天³⁶⁸，塞瓦斯托波尔本应有一场大会战；这是在巴黎秘密透露出来的，也是人们信以为真的消息。但是，根据康罗贝尔将军 12 月 3 日的报告：

“大雨倾盆，交通已经中断，堑壕积满了水，围攻作业和一切其他作业均已停止。”^①

迄今在黑河俄军占有进攻优势，联军占有防御优势；而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则恰恰相反。换句话说，俄军在黑河有足够的力量掌握主动权，而联军则不然，虽然它们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然而，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有足够力量进行围攻的联军却面对一支在数量上和自己相等的守备部队，因此，围攻部队虽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但是没有什么显著进展。看来，力量的对比会很快发生变化；显然，联军很快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把俄军从黑河赶走。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自己在因克尔曼上游阵地的俄军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他们或者采取迂回，到北堡附近的有战壕防护的营地驻扎下来，或者将主力退入本国

^① 1854 年 12 月 4 日《泰晤士报》第 21915 号。——编者注

腹地,在那里联军不可能长驱直入地追击他们。联军在2月以前未必能集结必需的兵力包围北方营地或者追击向巴赫奇萨赖以北退却的俄军。联军未必有力量对在辛菲罗波尔一带进入战壕的军队发动第二次会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联军都不能不退回黑河,而且只要塞瓦斯托波尔不因对南区的强攻而陷落,这样的拉锯战大概要继续整整一冬。但是,因为大西洋号轮船给我们带来的有关围攻的消息十分贫乏,^①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是不大可能的。实际上,从巴黎《通报》发表的和伦敦各报转载的12月7日的消息中,我们只知道联军突然占了上风并在洪水以后仅仅两天就“几乎完成了对城市的包围”。这个不真实的消息显然是捏造的,为的是转变有关12月2日的未能兑现的预言所造成的印象。

不久前,我们发表过关于俄军的总数和俄军配置的消息^②。当时我们指出,在这将近75万人的兵力中,目前仅仅有三分之一在作战,其余三分之二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威胁奥地利。从那时起,尽管向克里木派了增援部队,但形势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调去援救塞瓦斯托波尔的第四军,即丹年贝尔格军,是从多瑙河军团中抽调的,在这之前,它在这里得到过补充。我们可以称之为军团的集结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将近30万人的俄军西线主力部队在位置上发生的唯一重大变化就是:它的左翼向比萨拉比亚和德涅斯特河中游延伸了一点;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必需的话,它可以在多瑙河军团余部从比萨拉比亚撤退的时候给予接应。此外,西线的主力部队或许派了两个师去克里木以及少数增援部队去多瑙河,但是,总的说来,它的兵

①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51—656页。——编者注

力依然如故；看来，从雷瓦尔抽调的第三近卫师和某些预备部队的开到，已经补上了这个缺额。

然而，多瑙河军团可以说是完全瓦解了，并且降低为一支纯粹示威性的军队，它配置在比萨拉比亚，是为了尽可能久地保持俄国占领的外观。由于利普兰迪以及随后的丹年贝尔格被调走，这个军团失去了整个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如果从余下的5个师（第七师、第八师、第九师、第十四师和第十五师）中除去驻守沿岸地区和守卫从宾杰里和伊兹梅尔到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一带的要塞所必需的兵力，再算上两次多瑙河战役中所遭受的重大伤亡，可以推测，这5个师所能提供的野战兵力不超过15 000人。他们配置在沿岸附近，而在沿岸的任何地方俄国防御力量（在大陆内部十分强有力）都显得非常薄弱。必须保卫为数众多的要塞和仓库不受敌军舰队的袭击，这也就是这5个师的30 000或35 000人中不到一半能用于野战的原因。

多瑙河军团的解散，就像俄军所采取的多数重大的战略措施一样（因为通常只是在实行这些措施时才开始发生错误），是非常成功的一步。自从英军和法军深深陷进克里木起，在多瑙河就没有任何力量与俄军对峙了。奥美尔帕沙的军队，由于两次战役中的伤亡，又没有得到过一次补充，现有兵力已不到4万人，它已经被西欧的外交活动削弱到这种地步，以致没有足够的兵力用来包围伊兹梅尔；更谈不上调出一个军去掩护这次围攻或在野战中击退俄军。此外，对比萨拉比亚的进攻，几个月前曾是非常有效的牵制行动，现时在军事上将毫无意义，因此，奥美尔帕沙的军队现在被调到克里木。这样一来，唯一能够在西南威胁俄军的力量，是为数约27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它占领着加利西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多瓦。对这支军队必须

加以牵制,因为如果它起而反对俄国,那么俄国就不得不放弃比萨拉比亚,甚至是布格河以西的整个地区,并且不得不从波兰要塞区的进攻基地或者从基辅和第聂伯河地区的防御基地出发作战。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多瑙河的军队都有可能被截断并不得不在南部草原上为自己寻找基地,而这在能够饲养大批牛羊但供养不了人的地方是难以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奥地利站到俄国方面或者将它的中立的刺刀指向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那时,要么波兰的军队在先把一个强有力的军调到多瑙河之后,作为奥地利人的预备部队开进德国,要么奥地利的大批兵力开向多瑙河并大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无论是哪种情况,在多瑙河上保持一支比单纯的示威性军队更加强大的独立的军队都是多余的。

至于奥地利是否参战,我们当然只能完全凭猜测来说了。大肆宣扬的据说是奥地利在12月2日和英法两国缔结的同盟条约,不过是为英国议会设下的圈套,这个条约一公布,我们就曾向读者们指出过这一点。

女王在御前演说中谈到这个条约时指出:

“我满意地告诉诸位,我和法国皇帝一起同奥地利皇帝签订了一项条约。我预期它会给共同事业带来莫大的益处。”^①

但是,阿伯丁迫于德比勋爵的再三质问,只好说:

“我们只想指出,议院会满意地获悉女王陛下签订了一项她(应指老阿伯丁)期望会带来重大好处的条约。”^②

① 1854年12月12日《泰晤士报》第21922号。——编者注

② 乔·阿伯丁1854年12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阿伯丁的答复能给人的满意之处仅此而已。在下院，迪斯累里先生迫使约翰·罗素勋爵向前跨了一步，勋爵坦率地承认：被说得天花乱坠的同盟条约既不是条约，也不是同盟。他公开承认，这个条约没有让奥地利承担任何义务，却要西方强国与奥地利结成攻守同盟，如果后者决定对俄宣战的话；此外，还要西方强国承担必须在年底前根据著名的四项条款向俄国提出媾和条件的义务。这样一来，奥地利最后可以“毫不背信弃义地”摆脱同盟，只要“在最后时刻”宣布它不同意西方强国对四项条款所作的解释。约翰·罗素勋爵对12月2日的著名条约作了这番解释之后，伦敦和巴黎的股票即刻跌价了。

一年以前，联合内阁硬说它容忍锡诺普大屠杀¹⁴是为了取得同德意志各邦的联盟。现在，同它们之中的一个邦签订一个假条约，作为对不列颠军队的覆没，而不是对土耳其舰队的覆没的赔偿。最近几天的德国报纸甚至向我们证明，不列颠议会的开会维也纳会议的幽灵再现的信号，维也纳会议准备再次开动它的笨重的机器。

然而，按约翰·罗素勋爵的说法，既然奥地利宣布它可能被迫参加对俄国的战争，既然俄军陈兵奥地利边境附近的事实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就可以暂且认为，奥地利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甚至包括普鲁士，有意参加到西方强国这边来。俄国对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准备呢？

如果1812年进攻俄国的大陆军队比俄国在4月或5月在它的国境上可能看到的军队要软弱得多；如果那时英国是它的盟国，而不是它的敌国，那么俄国现在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这种想法：深入它的国土的军队越多，他们迅速被歼灭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它现有的作战部队为当时的三倍。

我们完全不是想用这点来说明“神圣的俄罗斯”是不可摧毁的。

相反,我们认为,就军事力量来说,光一个奥地利就完全可以和俄国较量,而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起来,如果光从军事胜利的可能性来看,完全能够迫使俄国接受不光彩的和约。像德意志这样面积不大、但人口稠密到有4 000万人的国家是能够成功地对付幅员辽阔但人口分散、有6 000万臣民的俄国的。拿破仑当年十分明确地规定了从西面进攻俄国的战略计划,如果他不是迫于各种非战略性的情况而背离了这个计划,俄国的统治和它的完整便会在1812年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个计划就是:向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挺进,在该地构筑一道防线(包括修筑工事、仓库和交通线),夺取德维纳河上的俄国要塞,而把进军莫斯科推迟到1813年春天。政治上的原因促使他在年底放弃了这个计划,这是因为军官们强烈不满冬季驻扎在立陶宛,同时也是因为他盲目地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他向莫斯科进军了,而结果是人所周知的。法国军需部的组织不善和士兵缺乏寒衣分外加重了这次惨败。如果当时对这些事情予以更多的注意,拿破仑在败退时仍然可能会在维尔纳亲自率领一支在数量上比俄国能用来追击他的军队多一倍的军队。他的错误是明显的;但这些错误并不是无法补救的。他到达莫斯科的事实以及查理十二世向波尔塔瓦的进军都证明,这个国家是能够攻入的,虽然攻入这个国家是困难的。至于说到在俄国腹地维持一支常胜军的问题,那全要由作战线的长短,基地的远近和安危而定。从莱茵河到埃劳和弗里德兰的拿破仑的作战线,如果从漫长的作战线给军队的积极活动带来的损失的观点来看,则相当于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我们假定在第一年内就占领了波兰的各个要塞)到莫斯科的作战线。而在这一假定中还没有算进直接作战基地将推进到维切布斯克、莫吉廖夫和斯摩棱斯克的情况;没有这些准备工作,向莫斯科进军当然是冒险的。

俄国无疑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中心省份——俄罗斯民族的心脏和支柱——的人口和欧洲中部的人口相等。在波兰,也就是在组成俄属波兰王国的五个省内,人口的平均密度也是如此。俄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莫斯科省、图拉省、梁赞省、下诺夫哥罗德省、卡卢加省、雅罗斯拉夫尔省、斯摩棱斯克省和其他省——构成大俄罗斯的心脏并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继续向南,是人口同样稠密的小俄罗斯的一些省份——基辅省、波尔塔瓦省、切尔尼戈夫省、沃罗涅日省和其他省。这样的省共有 29 个;这些省份的人口密度比德国小一半。人口稀少的只是东部和北部的一些省份和南部草原,在西部,即在旧属波兰的一些省份——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和格罗德诺省——的部分地区,由于布格河(波兰的)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广阔的沼泽地,人口也很稀少。但是进攻军队在后方有波兰、沃伦和波多尼亚的盛产粮食的平原,在前面和战场上有俄罗斯中部的平原,只要把供应工作安排得稍微好一点并从俄国人那里学会怎样使用当地的运输工具,给养是丝毫不用担心的。至于 1812 年所发生的退却军队实行坚壁清野的问题,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沿作战方向一带及其紧邻地区;如果拿破仑当时不是匆忙地从斯摩棱斯克发动进攻,从而使自己受到在极短时期内结束战役的约束,他就会在他的四周找到丰足的粮食。但是,因为他操之过急,所以未能在距离进军线路不远的地方取得足够的粮食,而当时他的粮秣队看来的确害怕深入到村落稀少的针叶树的大森林里去。他的军队只要派出强大的骑兵部队去筹集粮食并利用当地为数众多的各种兽力车,就可以保证自己有各种必要的粮食;这样,莫斯科也未必再次焚毁。但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也不妨碍向斯摩棱斯克撤退,而在那里军队会找到一个有着一切必要供养的准备良好的作战基地。

但是这里要解决的不仅是军事问题。这一类战争还必定由政治活动来收尾。德国向俄国宣战可能是俄国重建波兰的信号。尼古拉当然不会放弃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各省；但是，波兰王国、加利西亚、波森，也许还有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可以组成一个幅员相当大的王国。但是谁敢说这样重建起来的波兰会有多长的寿命呢？有一点毋庸置疑：所有自命为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活动家的人近四十年来所夸耀的那种对波兰的表面的热情是会完结的。继之而来的必定是俄国对匈牙利的呼吁；即使马扎尔人会动摇，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匈牙利的三分之二的居民是斯拉夫人，他们把马扎尔人视为当政的和独揽大权的贵族。另一方面，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会毫不动摇地恢复匈牙利的旧宪法，以便把匈牙利从革命欧洲的地图上勾销。

这一切充分说明，奥地利加入西方同盟和发生全欧反对俄国的战争的可能性，会打开多么广阔的具有军事和政治意义的前景。如果作相反的设想，那么明年春天也许会看到整队向西方强国进军的一支 150 万人的大军，以及向法国边境挺进的奥普军队。而那时，战争必将不再是它的现在的领导者所能掌握的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2 月 14—1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 月 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7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奥地利的军事力量³⁶⁹

有趣的是,最近六个月专门研究奥地利的态度的英国报刊,竟然从未给我们报道什么确实的材料来说明奥地利在认为需要确定它的政治路线时能够投入交战一方起决定作用的实际军事力量。伦敦各家日报在同奥地利结盟还是同它公开决裂为好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但是这些报纸虽然代表着自诩为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民族的舆论,却从来不屑于研究细节和统计数字,而这些细节和统计数字不仅在贸易和政治经济方面,而且在国家政策方面都是采取一切明智措施的基础。事实上可以认为,主持英国报刊的人,就像那些认为买到军阶就已尽了军人天职的英国军官一样,都是些无知愚昧之辈。有一家报纸肯定说,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如何都必须同奥地利保持同盟,因为奥地利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另一家报纸宣称,同奥地利结盟毫无益处,因为它的全部力量都要用去镇压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但是无论哪一家报纸都不愿费力去了解奥地利的实际军事力量究竟如何。

原来按一种繁琐和旧式体制进行指挥管理的奥地利军队,于1849年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它在匈牙利的失败或在意大利的胜利对于这次改组起了同样的促进作用。军队的指挥管理摆脱了旧的传

统的限制。这个国家的军队在刚刚镇压了首都的革命和外省的内战之后,马上就按正规的战时编制编组,把部队成功地分为固定的旅、师、军,就像过去的拿破仑军队和目前俄国的作战部队的做法一样。在意大利战争和匈牙利战争时期,77个步兵团(猎兵部队除外)和40个骑兵团配置得非常分散,以致同一时间不仅同一个团的一部分营,甚至同一个营的一部分连在意大利,而另一部分却在匈牙利。现在已将它们合编为固定的部队,以免再出现类似的混乱情况,并确保对部队进行正规的指挥管理。根据这一新的计划,由12个军和2个骑兵军组成的奥地利军队共编为4个军团。每一个军团不仅包括所有3个兵种,而且还有完全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足以保障战备所需的武器装备。第一军团由第一、二、九军编成,通常配置在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各省;第二军团由第五、六、七、八军和骑兵第二军编成,第三军团由第十、十一、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军编成,它们通常驻防匈牙利和斯拉夫各省;第四军团仅由第四军一个军编成,驻意大利。

每个军有2—3个步兵师、1—2个骑兵旅、4个预备队炮兵连和必要的架桥队、军需和医务人员。骑兵军有2个师,相当于4个骑兵旅或8个骑兵团,并附有适当数量的轻炮兵连。步兵师有2个旅和2—4个骑兵连,每旅有5个营和1个步炮连。

因此,根据我们上面所述,奥地利全部军事力量是77个步兵团(猎兵部队除外)、40个骑兵团和14个野炮团(要塞炮兵除外)以及工兵等。步兵共有62个基干团和14个边屯步兵团、1个猎兵团和25个猎兵营。每个基干团包括5个野战营和1个后备营,即28个野战连和4个后备连。每个野战连220人,每个后备连130人。这样,每个基干团的5个野战营总共应为5964人,而62个团,包括后备部队在内,共计369800人。边屯步兵共14个团,每团2个野战

营和1个后备营,即12个野战连和4个后备连。野战连有242人,其中有22名猎兵。因此,一个边屯步兵团有3850人,全部14个团共计55200人。猎兵编成1个七营制团(共32个连,其中包括后备连)和25个营(共125个连,其中包括后备连),每连202人,共为32500人。因此步兵总数为47万人。

奥地利的骑兵由16个重骑兵团(8个胸甲骑兵团和8个龙骑兵团)和24个轻骑兵团(12个骠骑兵团和12个枪骑兵团)组成。在骑兵的编组方面很成功地利用了奥地利帝国内各民族作战能力的特点。胸甲骑兵和龙骑兵几乎完全是德意志人和波希米亚人。骠骑兵都是匈牙利人,枪骑兵都是波兰人。在步兵中这样区分则并不是特别有利的。通常是以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编成精锐的掷弹兵营,以蒂罗尔地区的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和施蒂里亚地区的人编成猎兵营;边屯步兵绝大部分由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他们也同样非常适于当轻步兵。

重骑兵每团有6个野战连和1个后备连,每连194人。轻骑兵每团有8个野战连和1个后备连,每连227人。全部野战骑兵如不算后备连,共计62500人,如把它们计算在内,则为67000人。

炮兵由12个野炮团、1个岸防炮团和1个火箭团组成。奥军没有骑炮兵。在他们称为骑炮兵的部队中,炮手是乘马车转移的。每个野炮团有4个骑炮连(六磅炮连)和7个步炮连(4个六磅炮连和3个十二磅炮连),后备连没有计算在内。每连8门火炮。岸防炮团不编成固定的炮兵连,只区分为普通的营和连,用来守卫海岸防区。火箭团有18个连,每连有8个火箭发射管。这样,奥地利的炮兵总共有1056门火炮和144个火箭发射管。除此以外,要塞炮兵的8个营约有10400人,技术部队有4500人。工兵约

有 16 700 人。

除上述野战部队、后备部队和守备部队外,奥地利还有一种为执行专门勤务而编成的独立部队。虽然它们不当作野战部队使用,但可以防止因抽调野战部队人员而往往使步兵营减员为步兵连,骑兵团减员为骑兵连。3 个卫生营、辎重部队和各个军内作为传令兵使用的骑兵队就是这种部队。不久以前,英国军队在编成司令部直属骑兵队时,也采取了这种办法。奥地利军队的野战部队共约 476 000 人,拥有 1 140 门火炮。再加上后备部队、技术部队、司令部、守备部队和警察部队(宪兵队)等,奥地利军队的总数约为 62 万人。

奥地利的士兵服役八年,然后还要服两年预备役。采取这种制度,可以经常保持预备兵员,一旦发生战争,几乎有 12 万人可以征召入伍。每个军事边区⁹⁴居民从 20 岁到 50 岁都要服兵役。因此,作战部队为 55 000 人的军事边步兵,可以扩充 15—20 万人。1849 年,至少有 15 万军事边区居民在军队中服役。因而当时军事边区所剩的人数很少,一切农活都得由妇女去做。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担保这些材料都是正确的)可以说,奥地利的军事组织使它有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就拥有 60 万军队,而且可把多达 30 万的兵力集中在任何一点,同时无须紧急征召,也不会对国家生产力有什么特别损害,便可再提供约 20 万老兵的预备兵员。

俄国军队的编组是立足于可以在其编制内容纳更多的兵员。俄国的人口是 6 000 万,奥地利的人口是 4 000 万。不过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奥地利只要征召预备兵员就可以把军队扩充到 80 万人以上,但是俄国要达到这一数字,则不仅必须动用全部预备兵员,而且还必须进行一次征兵,征召的人数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四年征兵的

总和。

弗·恩格斯写于 1854 年 12 月
21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5 年 1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8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附 录

威廉·皮佩尔

科堡家族³⁷⁰

英国的公众舆论对阿尔伯特亲王表示极大的愤慨，指责他把自己的势力从皇家的客厅和卧室扩展到了内阁会议，甚至将政府有关重大的东方问题的秘密泄露给他的德国亲友。人们指控他忠于俄国的利益，反对战争，对法国人的联合²⁴抱极冷漠的态度。甚至传说，这种不正当的和违反宪法的干预政治的行为将被提交下次议会会议讨论，著名的罗巴克先生届时将充当控诉人。人们指责说，阿尔伯特亲王之所以做这一切，如果不是为了进一步扩张其家族势力的话，至少也是为了巩固科堡家族在整个欧洲占据的各种地位。

这些科堡家族是些小诸侯，属于德国各统治家族的许许多多的分支之一，他们的共同起源可追溯到查理大帝的骁勇的宿敌萨克森人维蒂金德。他们的一个主要分支现定居在沿图林根林山两侧延伸的青山之中，在科堡和哥达公爵领地，被指控的女王丈夫的哥哥就在这里进行统治。这个君主国拥有约 185 平方英里土地，大约 15 万居民。每年国家税收总额为 16 万美元，每年都会有财政赤字，还有一笔 170 万美元的旧债。武装力量由 1 500—2 000 人组成。国土总的说来很肥沃，灌溉和耕种都很好。科堡家族曾是相当好战的家族，其中的一人在上个世纪两位皇帝同土耳其人的几次战争中曾是德军

中一位杰出的指挥官。在德国最近的骚动期间³⁷¹，现任公爵在他参加的荷尔斯泰因和丹麦之间的战争³⁷²中表现得颇有勇敢的激情。他作为志愿者指挥一部分军队，并为俘获丹麦的盖菲昂号巡航舰作出了贡献，这艘战舰现在是普鲁士海军的主力。然而，这次战役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德国皇位已经空缺，法兰克福议会正在到处寻求继位人。科堡家族一心想在这场受人欢迎的荷尔斯泰因战争中用剑来赢得黄袍。

但是，这个家族突出的资质似乎主要在于为欧洲的一些皇家血统提供养育人。科堡家族总的说来都是相貌英俊、精力充沛、身材匀称的人。首先开始这一新生涯的是现在被称为欧洲君主中的乌利斯的比利时的莱奥波德。他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叔叔，据说也是其政治顾问。莱奥波德现年 63 岁，年轻时与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女儿、可能成为王位继承人的夏绿蒂·奥古斯塔公主结婚。但公主于 1817 年去世了。莱奥波德的第二个妻子是路易-菲力浦的女儿，她去世已近两年。莱奥波德的儿子兼继承人最近与一位奥地利的女大公结婚。阿尔伯特亲王幸运地步其叔叔的后尘。他生于 1819 年，在波恩大学毕业后出外寻找出路，并在皇家寓所温莎城堡住了下来。他的一个叔叔 1816 年与一个富有的匈牙利女继承人科哈里公主结婚，婚后生下了几个儿女：第一个是斐迪南，已故的葡萄牙女王玛丽亚·达·格洛丽亚的丈夫，葡萄牙的现任摄政王；第二个是奥古斯特，他娶了路易-菲力浦的女儿克莱门蒂娜公主；第三个是维多利亚公主，现在是奈穆尔公爵的妻子。阿尔伯特亲王的一个姑母于 1796 年嫁给了尼古拉皇帝的哥哥康斯坦丁大公，后于 1820 年离婚。她在瑞士住了近四十年，享受俄国支付给她的可观收入。她现年 72 岁。阿尔伯特的另一姑母是肯特公爵的妻子；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这一

皇家婚姻就是在两个表兄妹之间缔结的。

从所有这些不同家族的通婚中不难看出科堡家族的利益是什么,以及他们会在哪个方面施展自己的影响。增强拿破仑的力量从而威胁比利时的独立对他们来说不合适。他们必定要谋求尼古拉的好感,无论如何要避免会给其家族带来危害极大的后果的普遍战争。

威·皮佩尔写于 1854 年 1 月
5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2 月 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9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厄内斯特·琼斯

* 民众情绪的不同特点³⁷³

欧洲的东部和西部都出现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特点。在土耳其和西班牙，民众情绪的新的、但极为不同的特点正在展现出来。一种怀疑、不信任和敌视自己的西方盟国的情绪正在占据土耳其人的头脑。他们开始把法国和英国看作是比沙皇本人更危险的敌人，下面这两句话反映了一种普遍看法：“他们要推翻苏丹和瓜分帝国”，“他们要把我们变成基督教居民的奴隶”。必须指出，这些指控看来有些道理。他们不在瓦尔纳以北，而在君士坦丁堡南面登陆，现正在加利波利构筑工事，好像是来专门对付土耳其人。这座村庄所处的地带是一个由地峡与大陆相连的狭长的半岛，它很适合作侵略军的据点。过去热那亚人就是从这里向君士坦丁堡的正教皇帝进行挑衅的。真正的穆斯林对新的谢赫的就任表示愤慨，因为他只不过是正教教士的工具，而且一种强烈的情绪在土耳其人中间弥漫：与其成为一伙贪得无厌的强国的玩物，不如屈从尼古拉的单一要求。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编了一个寓言。他们说：“缅施科夫来到君士坦丁堡，要来《古兰经》。他看着这本书，对一些段落作了记号，然后说：‘把这些抹掉。’英国人和法国人随后来了，也要来《古兰经》。他们读完之后说：‘把这本书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中去。’”

奥地利正在扑向塞尔维亚,希腊觊觎帖撒利亚和伊庇鲁斯,法国觊觎埃及——英国则觊觎加拿大及附近岛屿。它们要获得这些地方,就得作出妥协,让俄国不仅仅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土耳其人说:“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给沙皇呢?不,如果我们屈从于他,从而赶走了我们可恨的和背信弃义的盟友,他连这些地方的一半也不会从我们手里夺取。”

同时,巴尔干北部地区的给养已完全耗尽;可能从南方运去的补给品实际上已被截留,用来供应法国和英国的士兵。联军来时的装备如此之差,尽管已经到达的人数不多,却不得不借土耳其人的帐篷。他们需要至少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向北行进到瓦尔纳那么远,而如果走海路的话只需几天就能到达;这是他们不打算与俄国人交战,而想堵土耳其人之嘴的明显证据。法国和英国的军官无精打采,他们已建立的唯一功绩就是把一些贫穷的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托钵僧赶出了在加利波利的修道院,而让自己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土耳其人正在驱逐希腊居民——奥托国王的臣民。约5万人将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及附近地区;这是一种不明智的措施,因为那些人只会加强希腊暴动的势力。俄国大军位于多瑙河右岸,瓦尔纳的帕沙的要塞里只有3000人,而要守住要塞需12000人。

土耳其的非正规部队在撤退中犯下了可怕的暴行,他们一面撤离一面烧毁了库斯坦杰城。然而,俄国人似乎已决定,在军事行动扩大到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之后,他们将打防御战,把进攻作战的艰巨任务抛给自己的敌人,尽可能让敌人去与饥饿和疾病作斗争,在盟国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在土耳其人头脑中制造对它们的不信任情绪。

瓦拉几亚的福克沙尼及那里所有的俄国商店、医院和弹药库全部被烧毁。

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时刻，剑桥公爵正在巴黎欢宴。现在他不走海路，而一定要经过维也纳走陆路，在那里，他将在新的庆宴和舞会中迁延时日。奥地利皇帝的婚礼即将在近日内举行，他派驻巴黎的大使已离开岗位以便在婚礼上献殷勤。

亚洲的土耳其军队正在缓慢地重新组建，但是可怕的大雪使沃龙佐夫公爵的军队无法行动。俄国舰队仍然稳稳地控制着黑海，并且刚刚取得一个最辉煌的胜利，即在两艘英国巡航舰实际在场的情况下把自己全部守军从切尔克西亚的一些要塞调走。

在波罗的海，俄国舰队分散在各个港口。沙皇正设法在喀琅施塔得的炮火掩护下把他的舰只重新组合，9艘战列舰正准备离开斯韦阿堡。我们将看到海军上将纳皮尔是否会拦截它们。几艘俄国商船已被海军上将普卢姆里奇俘获作为战利品。

在西欧，形势看起来非常令人鼓舞。在法国，到处有不满情绪，不幸的是，这是以痛苦作为代价的。贸易极度萧条，物资缺乏现象仍很严重。法国政府试图加以隐瞒的一个不祥的事实是，非洲的部队在马耳他登陆时用被禁止的革命歌曲《马赛曲》来回答英军乐队演奏的《天佑女王》^①！

但是本周最重要的运动发生在西班牙。上周我们报道了巴塞罗那40 000名工人的罢工，以及军队对非武装的运动的镇压。从那以后，教堂和工厂都燃起了大火；罢工领导人向工人发表了呼吁书，声明他们曾劝说工人复工，期望工人的痛苦将得到解救。由于这种期

^① 英国国歌。——编者注

望已经落空,他们现在号召工人们再次罢工,并且信赖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己的武器。5 000支滑膛枪已运到滨海阿雷尼斯。惊恐的当局释放了所有被囚禁的人,但有十二人除外,人民则坚决要求也释放这些人。在萨拉戈萨,到处发生可怕的骚动。为平息骚动,政府对军事犯实行了大赦。但是最大的功绩是王后和国王立下的,他们为十二个老嫗和十二个老翁洗了脚,之后又侍候他们吃饭。不过,王后对帕尔马公爵遭到暗杀十分惊恐,于是放弃了步行去教堂的打算。

西班牙的财政危机前所未有。圣费南多银行发生严重的挤兑,政府为了克服自己的困难,要求人民提前交一个季度的税。

美国挑起了关于古巴的争端,看来下决心要利用西班牙的困境。作为回击,西班牙人下令对每一个奴隶都要进行登记,以制止贩卖奴隶,并允许输入各种各样的自由劳工。他们甚至暗示说他们宁愿解放奴隶,使古巴成为另一个圣多明各,也不让它落入美国人之手。

厄·琼斯写于 1854 年 4 月 21
日

载于 1854 年 4 月 22 日《人民
报》第 103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厄内斯特·琼斯

发现得太晚了³⁷⁴

当眼光锐利的事变观察者看穿当权者的可恶的欺骗手段时，人们却往往嘲笑揭露这种手段的人！民众总是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而他们的朋友可能是他们的朋友。政府讲几句温和的话，或者采取一项狡猾的政策，就会多么轻而易举地消除被统治者的愤怒，使他们失去判断力！如果内阁被迫进行一场违反自己意愿的战争，它们会以坚强有力而受到称赞。如果在耍了种种无耻的欺骗手段之后，它们被迫让自己的军队去打仗，而它们的英勇的士兵又打赢了，——那么获得荣誉和赞扬的是谁呢？不是迫使它们这么干的人民，而是被迫这么干的内阁；不是作战的士兵，而是那帮卑鄙的官员，他们迫使士兵在难以想象的不利条件下作战，并遭受只要早些行动就可完全避免的损失。人民就是这样容易上当受骗，他们不相信“伟大人物”可能是些大坏蛋。他们大声问道：“为什么王公贵族们要背叛我们呢？”为什么？为了不让他们臭名昭著的统治被人们推翻。为了防止人民在任何地方起来造反，——否则他们就会到处起来造反。为什么？因为现存的统治是一种残害人的灵魂和躯体，败坏道德，扭曲才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贬低多数人的人格的艺术。因为现存的统治是对上帝和人进行有组织的反叛的胜利。因为现存

的统治是使最少数人得利而使绝大多数人受苦的学问。因为，用具有民主倾向的路德的话说：“什么是‘伟大人物’？——就是大骗子，他们靠人民的轻信和苦难养肥自己。大家都知道，王公和窃贼是同义词。”因为，如果他们中的一人被揭露而垮台，——如果自由之树被种植在一个死去的暴君心中，——每个民族就都会急忙冲去摘取果实。你们相信那些在国内进行压迫的人能真心实意地反抗外国压迫者吗？的确——在不存在民主、人民愚昧无知的时代和国家中他们可能那样做。俄国可以大胆地发动战争，而不用担心内部出事。奥地利、英国、普鲁士、法国、丹麦、瑞典和德意志各小邦却不敢。它们进行战争是要诡计和搞骗局，它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对人民卑鄙的欺骗。

当帕麦斯顿和阿伯丁，罗素和他的同僚在这些专栏中被揭露时，多少人不愿相信我们所谴责的欺骗手段！现在由于法国军队（拿破仑的皇位依赖这支军队的忠诚）兵变的威胁已迫使我们的统治者采取积极行动，又有多少人会成为卑鄙的辉格党—自由党阴谋集团的愚弄对象！

让可怕的前车之鉴告诉读者，只要不列颠政府还是由纯粹的阶级立法所任命的，它们现在、过去和将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英国作为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盟友参加了七年战争⁹¹。法国是英国和普鲁士的对手。这时，英国出现了也许是自从尤尼乌斯写了那些著名的信件³⁷⁵和威尔克斯使贵族和圭尔夫家族^①为他们的地位而担忧以来最强有力的民主运动。布特勋爵是“我们的大臣，舒瓦泽尔公爵是路易十五的大臣，贝勒岛元帅指挥法国军队。

① 18世纪中叶的不列颠皇族。——编者注

法国人被击败而退出了威廉斯塔爾，并撤过了富尔达河。胜利正等待着盟国的军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革命是奇怪的事情，最近法国的变化披露了法国档案中的以下事实，这些事实已由法国人民公布出来。当时不列颠政府希望和平；当时圭尔夫家族为汉诺威王朝担忧，尤其是，贵族在开始遍及英国民众的民主行动面前，以及在导致伟大的爱尔兰起义的骚动面前心惊胆战。因此，英国大臣布特勋爵写信给法国大臣舒瓦泽尔公爵，指责他使法军这么容易气馁并撤过了富尔达河；告诉他说，“除非你们打败我们，否则我们不敢缔结和平条约。为什么你们让自己被打得如此惨败呢？”，布特勋爵还要求公爵让贝勒岛元帅和法军再次向前推进，而英军则应上他的当，被他击败！这一谅解是如此之彻底，以致法国将领们——当时正和我们作战的将领们——是在接受英国内阁从伦敦发给他们的命令！

以上通讯是现在从《法国外交事务档案》中摘录出来的。

人们发现得太晚了。如果在那时(1762年)就已发现，如果威尔克斯和他的朋友当时能证实这些事，那就会发生一场革命，圭尔夫家族会像受惊的老鼠那样被赶回他们的奴才主义的和压迫的德意志小巢穴中去。但是，相反，当违反了内阁的意愿取得胜利时，大臣们却以有魄力而受到赞扬；当因为这样无耻的背叛而导致挫折和失败之后被迫缔结和平条约时，大臣们又以他们的谨慎和温和而受到赞扬！世事就是这样。

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不是从拿撒勒，而是从辉格党—自由主义和贵族的民主中)，我们将从另一个侧面即假激进派酒鬼福克斯那里举一个背叛的例子。这个人于1792年向俄国的叶卡捷琳娜派出私人大使，劝告她占领并瓜分波兰，并告诉她如果皮特试图阻止的话，立即就会被赶下台！这是最近在《马姆兹伯里勋爵日

记)中揭露出来的。

现在你们对“我们的”政府可以说些什么呢？把我们的军队派到战场，并指导敌方将军怎样消灭他们！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而进行战争；随后又与敌人私下达成谅解：敌人将不会受伤害，而他们自己的军队将被击溃。可以肯定，恰恰就好像是现在的政府对土耳其说：“不要抵抗俄国”；同时又对俄国说：“继续打吧！渡过普鲁特河，乘其不备而占领之”。就好像当土耳其决心进行战斗时，他们对土耳其说：“我们将派出援军；在我们到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同时又对俄国说：“我们将让他们静待很久，以便你们能够集结优势兵力”。就好像他们对奥美尔帕沙说：“让锡利斯特里亚陷落吧”；同时又对俄国说：“继续围攻——这个地方不会得到解救”。就好像他们派出一支舰队到波罗的海，并与沙皇达成秘密谅解：舰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就好像当人民鼎沸起来时，他们对沙皇说：“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我们在哪儿进攻才能使你们受到的伤害最小呢？”沙皇回答说：“博马尔松德！”就好像当法军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进攻时，事先曾与尼古拉安排好，让俄军占据坚强的阵地，他们用很小的损失就能守住它，而对方只有付出巨大的伤亡才能夺取它。就好像他们有意不派骑兵（骑兵可以像步兵一样地用船运送，并代替某些无用的步兵），以便使俄军可以几乎不受损伤地撤退，使他们的100门大炮只损失了三门！！就好像那时安排好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周围散步，“完全没有料到”15 000名俄军遇上了英军，英军遇上了25 000名俄军，而双方都试图避开对方。就好像经双方同意，联军要让塞瓦斯托波尔北部的要塞（它们是最重要的）留在俄军手中，——这些要塞邻近俄国，易于俄军进行增援，并且还控制着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市、港口和南部的要塞，因而这些地方对联军来说变得难以防守；然而，如

果联军占领了该港口北部的要塞，他们就插入了塞瓦斯托波尔和俄国之间，能切断俄国的任何增援。就好像联军给沙皇以设防的时间（在夏季塞瓦斯托波尔沿陆地一侧几乎完全没有设防），并把进攻推迟到不利的季节，用舞会、刺刀和疾病确保了我们的失利，而且事先已与敌人达成协议，也许在猛攻南部的几个堡垒和堑壕之后，他们将回到舰上，而俄军则向正在撤退的联军舰队打上最后几炮，就立即重新占领和修复被破坏的工事。就好像——就好像——什么呀！简单地说，就好像现在的贵族—保皇派—自由派政府是按所有贵族—保皇派—自由派和托利党以前一贯采取的同样方式行事。全部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指责任何人。毫无疑问，阿伯丁勋爵对战争中的惨状痛心疾首；这就是我们英勇的士兵没有军医、药品和绷带的原因。毫无疑问，帕麦斯顿打算摧毁专制主义；这就是他把波兰、克拉科夫、匈牙利、葡萄牙、伦巴第、那不勒斯、西西里、罗马、威尼斯，以及奥地利、普鲁士、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荷尔斯泰因的人民白白奉献给专制君主们的原因——尽管他是“科苏特的知心朋友”。毫无疑问，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热爱意大利的爱国者；尽管他根据他们的书信罗织重罪（这是低劣的窃贼和最堕落的奸细的行为），卑鄙地把他们中最高尚的人出卖给了刽子手⁷²。毫无疑问，罗素执行的是一项强有力的政策；尽管他呼吁要恢复原状；随后又加以否认；随后又说要占领塞瓦斯托波尔；随后又否认自己的话；随后又认为英国是迫于法国的兵变而启航、进军和战斗；当被问到我们为什么而战和他的看法是什么时，他又说我们没有固定的目标，必须依靠军队的阵势和战役中发生的事件来决定！这是承认自己愚蠢透顶、无耻又无能的前所未有的自白。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体面的人”；但是我们越早摆脱他们

就越好,为了我们英联邦的崇高荣誉,最好让一个布莱克式的人物来指挥我们的舰队,让一个克伦威尔式的人物来统帅我们的陆军,让一个汉普敦式的人物来主持我们的议会。

厄内斯特·琼斯

厄·琼斯写于 1854 年 10 月
26 日以前

载于 18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
报》第 130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工人议会纲领³⁷⁶

1. 建立募集全国工人基金的制度。
2. 保管所募集的基金的措施。
3. 基金的使用和工人阶级权利的保障。
4. 群众运动的组织。

一 募集全国工人基金

(1) 根据劳动价格的高低, 每周从工资中扣除如下数目:

半日劳动的童工.....	$\frac{1}{4}$ 便士
每周 4 先令以下.....	$\frac{1}{2}$ 便士
每周 8 先令以下.....	$\frac{3}{4}$ 便士
每周 12 先令以下	1 便士
每周 15 先令以下	$1\frac{1}{2}$ 便士
每周 20 先令以下	2 便士
每周 30 先令以下	3 便士
每周 40 先令以下	4 便士

- (2)参加群众运动的各工人组织的负责人员将募集的款项送交运动理事会。

二 基金的保管

- (1)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员每星期把他们为群众运动募集的全部款项送交运动理事会,详细办法将在下面说明。被指定接收这笔钱的负责人员应立即把收款收据交给募集人。
- (2)理事会理事应把为群众运动募集的全部款项以理事会理事的集体名义存入银行(留于手头的不得超过50英镑);从银行提取全部存款或部分存款,必须交验载有理事会五分之四理事签字的提取这笔钱款的决议的理事会记录。
- (3)按此手续提取的存款(除非少于50英镑)应该是纸币;纸币的号码应该记在可供审查的本子上,并在报上公布;取出的纸币应分成几份,委托理事会理事分别保管;提取大笔款项时,应分成相等的几份由每个理事保管。
- (4)受托保管部分上述钱款的每个理事应当开出一张领得相应一份钱款的字据,从银行提取的钱款事先必须根据理事会理事的人数分成相等的份数。如果他拒绝把他所保管的那部分纸币用于提取这笔钱款的目的,便可立即根据他所立的字据对他进行追究,只有在他归还了那部分纸币后,字据才可作废;这种字据应存放在保险柜或保险箱中,保险箱应交给与此无关的可靠的人员(非理事会理事)负责保管;除非有五分之四的理事会理事在场,否则保管人员不能允许取出字

据；正式指定的人员可凭这种字据要求付款，他们应开具书面保证，如果他们违约，愿受制裁。

- (5) 为了支付或购置而从银行提出的款项，如超过 50 英镑，只有在理事会全体理事在场时，理事会才能支付。

三 基金的使用

- (1) 资助所有承认或今后可能承认群众运动的那些正在或将要举行罢工和实行同盟歇业的城市和地方。对各城市的援助按参加罢工或因同盟歇业被解雇的人数的比例等量分配。根据海船上粮食快完时所实行的每人得到相等的一份的原则，不管工资水平的高低，对每个人的救济应当相等。特殊情况将在群众运动的组织一节做出说明。为了筹备一笔专用基金以清偿过去十二个月中因罢工和同盟歇业而欠下的债务，以及筹备一笔基金以维护今后可能遭到雇主解雇的工人，每个人在参加群众运动时应当交纳 1 便士，而且只要他或她仍然是群众运动的会员，每季度均应交纳 1 便士。
- (2) 必须建立调整劳动价格的部门。为此每月必须公布关于有工人参加群众运动的一切生产部门所用的原料价格和劳动价格，以及产品出售价格和其他生产费用的资料。理事会应根据这些资料公布关于雇主利润的资料；它可以从雇主那里得到有关他们（雇主）必须支付的任何特别费用和补充费用的资料。劳动价格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整，并且工资标准应该相应地确定下来。国家的农业部门也应该采取类似

的办法。

- (3)工人除了具有分享雇主的利润的不可争辩的权利之外,还具有另一种更高的权利,即支配自己劳动的权利。为了这一点,而且为了通过剥夺雇主占有剩余劳动的权力从而更有效地调整工资,群众运动的基金还应该用于购置土地。土地应该以非理事会理事的个人的名义购置,并根据土质,根据个人租用或大合作社企业使用等不同用途分成大小不同的农场。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应该属于群众运动,不得转让。土地应按照公平合理的租金短期出租。在租约中应该有专门的条文规定,不按约缴纳租金者将立即失去租赁权。租约中的第四条规定,租赁者必须将租金付给下面将要提到的交接书所指定的受托人。出面购置土地的人必须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书规定租赁者不应把租金缴给他们而应缴给当时群众运动理事会的理事。群众运动理事会的理事应立写字据,保证在离职时如果不向他们的继任者签具有关所收租金的交接书,每人应向两位不是购置土地的人员缴5 000英镑的罚款;在规定的时间内,即任职期满时,他们如果不向他们的继任者签具有关所收租金的交接书,就应交出这笔罚款,有关的细则将在群众运动的组织一节做出明确规定。

所购土地的地契应存放在负责保存群众运动钱款的人员手中,除群众运动的工人议会会议(由不少于30个已组织好的、并且事先已得到承认的群众运动支部的代表组成)特意指定的人员外不得交给任何人。每块土地都应以两个人(非理事会理事)的名义购置;这两个人在将第一份地契存放在负责保存群众运动钱款的人员手中之前不得再购置第二

份土地。

- (4)为了更好地保障工人独立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和避免劳动市场上出现过剩劳动,应将可利用的基金用于开设作为群众运动财产的合作社工厂、作坊、货栈。

在这些企业工作的人员,应尽可能地得到按照上述劳动价格标准调整的工资,和出售产品的纯利润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利润应列为群众运动的收入。

每个合作社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应当由本合作社的工人选举产生,并经过理事会批准。

每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应对本企业的采购和销售进行调整,每周向理事会提出关于本企业的采购、销售、支付、亏损或赢利的报告。当对于工人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提出有充分理由的申诉时,工人有权撤换管理人员,选举新的管理人员,但是需经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多数通过。每个合作社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按月把本企业纯利润的三分之二送交理事会。群众运动为合作社企业购置的财产,应该同地产一样,置于妥善的保管措施之下。

四 劳 动 立 法

群众运动还应运用其力量争取适当限制劳动时间;限制在工厂中雇用女工,同时彻底禁止在矿山和工厂中雇用童工;争取废止解雇通知、罚金、降薪以及其他各种不合理的削减工资方式等残暴制度;废止实物工资制,取消工厂中禁止工人交谈的制度和拘留工人的惯

例,以及各工业部门现行的各种压迫工人的非人道做法。

五 群众运动的组织

(1) **会员资格**:关于缴纳会费问题前面已有详细说明;每一个参加群众运动的会员从开始缴纳会费起就有权投票选举出席工人议会的代表,选举全国的群众运动的负责人员和其所在支部的负责人员;但是,如果拖欠缴纳会费一个月(除非证明是由于失业或生病),则将丧失其会员资格。

(2) 理事会签发下面这种形式的募款单:

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

支部 每周募款单

(募集人每周应将所募集的全部钱款送交群众运动理事会,理事会应在下星期一将印好的收款单据交给募集人,由募集人交会员审阅。理事会每周在一份公开报纸上公布收款清单,清单上写明交款的支部和负责人员的名字。)

姓名	一般基金			债务基金和维护基金		
总计				总计		

签字:

募集人:

收 据 格 式
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

我们,收据签字者,即群众运动理事会,于 18 年 月 日从
支部财务委员和书记 先生处收到 支部交
来的金额 。

签名

理事会

(3)理事会:群众运动领导机构分为以下几个部门,每个部门由一名专职书记领导:

1. 管理农业的部门。
2. 管理工业的部门。
3. 负责分配的部门。
4. 负责调整劳动价格的部门。
5. 援助罢工、同盟歇业和劳动立法的部门。

上述几个部门组成理事会和财务委员会,他们的建议须经委员会多数投票通过;但在执行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时,除已经规定的那些财务问题外,各部门自行负责,各自独立。

(4)农业书记负责监督地产的购置和管理,以及与地产有关的一切。工业书记履行类似的职权,负责监督群众运动所建立的一切工厂、作坊等。负责分配的部门的书记应当调节商品的交换和向合作社货栈及市场运送商品,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事宜。负责调整劳动价格的部门的书记应当收集、整理和公布已经规定的一切有关工资价格的细则。援助部门的书记应当管理与罢工、同盟歇业、劳资冲突以及劳资间在劳动立

法上的各种问题有关的一切事宜。理事会每年由会员选举一次,其任期从每年3月18日开始。理事会理事的提名时间从2月10日到3月1日,选举一律在3月10日以前进行。如果其中任何一天为星期日,则按第二天计算。第一任理事会由工人议会任命。理事会理事可以连任。如果对理事会全体理事或任何理事不满,由不少于30个支部正式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工人议会,有权解散理事会或解除受到谴责的任何理事的职务。理事会的办公地点设在伦敦。

- (5)工人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工人议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开会地点在上次议会闭幕时确定,或者由工人议会的非常会议确定,非常会议如由理事会召开,其会址由理事会决定,如由会员要求召开,其会址由会员决定。工人议会应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召开,理事会必须为此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理事会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召开特别会议;群众运动的多数会员如要求召开工人议会,理事会必须根据要求随时召开。
- (6)工人议会的代表由群众运动的会员在公众集会上选举产生;召开公众集会的通知应在会前四天发出。
- (7)**地方支部的组织**:各支部的会员有权选举本支部的负责人员,包括一名书记、一名财务委员和若干名募集人,由这些人组成支部委员会。
- (8)各支部如因规模较大而有需要时,应分成若干地方小组,并向每个小组委派一名募集人。
- (9)与群众运动有联系的每个工会应被认为是一个支部,按它自己的规章行事。

(10) **负责人员的报酬**:理事会的每个理事每周领取 1 英镑 16 先令的报酬,旅行费用除外。

(11) 每个募集人领取其所募集钱款的百分之五作为报酬,但所得报酬不得超过每周 1 英镑 16 先令。

(12) 支部书记按照下面所附表格每周向理事会报告一次本支部中各个行业的劳动价格、原料价格、商品的销售价格等等:

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

供调整劳动价格参考的报告表

支部

行业名称	每周工资			原料价格			劳动费用			外加费用			销售价格		

18 年 月 日

书记:

签字:

(13) 支部书记的报酬由其所在支部决定和支付。

(14) **理事会的职责**:在下列条件下援助所有罢工和同盟歇业:

1. **正在进行的罢工和同盟歇业**:援助那些曾经向工人议会派出代表的罢工和同盟歇业。

2. **今后的罢工和同盟歇业**:

(a) 今后不援助那些在罢工或同盟歇业前其参加者没有加入群众运动的罢工或同盟歇业。

(b)不援助事先未经理事会批准的罢工；为此授权理事会在罢工不可避免时进行协调，使它们不致互相干扰，从而破坏共同的目的。

3. 罢工期间的救济：罢工或同盟歇业期间所提供的援助数量，由理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男孩和女孩其年龄在十二岁以下者，得到的数量是成人数量的三分之一，年龄在十二岁至十六岁者，得到的数量是成人的二分之一。

六 劳动的调节

(1)工人在为现在的资本家雇主阶级工作时，其所获的劳动报酬应为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纯利润的一半。为了做到这一点，应根据理事会认为稳妥的和切实可行的方法，逐渐提高工人的工资或所得的利润。

(2)理事会赞成合作耕种土地制度，而不赞成个人耕种土地制度。在前一种情况下，土地由理事会自己的负责人员和工人耕种；同在工业部门中一样，工人所得为纯利润的三分之一。

(3)群众运动各工业部门雇用的人一般说来应是原来就熟悉这种职业的人，但从事商业的人和其他适合于从事农业的工人也可被雇用。

(4)凡个人欲租用土地者，可被安置在单个面积不超过五英亩的农场中，但他们除缴纳其作为群众运动会员每周应交的会费外，还必须按照下面的条件每英亩缴纳××，即向群众运动缴纳相当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的租金；采用抽签办法确定安置地点。

(5)购置供个人租用的土地只能使用这笔基金。

(6)应在农场内为租户建造房屋,为此租户须缴纳适当的租金。建造房屋的费用或由专用基金支付,或由群众运动的一般基金支付。在前一种情况下,租金将纳入专用基金,在后一种情况下,租金应归入一般基金。

(7)租种土地者应使其农场有储备。必要时,可给予贷款,使他能够应付可能遇到的第一次意外情况;但是无论如何决不允许他转让其农场。

(8)贷款应以宽松的分期付款的办法偿还,每期交付的款项应按照租用农场的大小和贷款的数额加以调节。这种贷款每英亩不得超过 $\times\times$ 。

(9)这样购置的土地应当抵押给群众运动。理事会有权代表群众运动作为抵押贷款人。应利用这笔预付的钱款再购置一些土地,从而使每个捐款人都能通过抽签得到安置。理事会应根据具体情况填补空白。

(10)有关土地抵押契约等的保管办法应与购置土地时所采用的办法完全相同。

七

从每个个体租户缴纳的租金中拨出一定的百分比,即百分之 $\times\times$,用于建立一个人寿保险部门。捐款人如坚持每周按分级捐款表捐款则可在该部门获得保险。捐款表应合理地拟定并应得到确认,以保证付款率。理事会应为该部门定出一个合理的、正式的捐款

表。

人寿保险部门面向一般大众，不管是否群众运动的会员。

这样募集的基金应尽量慎重地投于土地，而不投于工业。用人寿保险基金购置的土地应用于建立合作农场，而不租给个人，以便不仅促进合作原则的发展，而且使投入的资金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八

理事会应自行决定在它认为合适的地方为群众运动建造房屋，从而使合作社工厂等部门的工人和农业生产者能够不依赖资本主义房东而住在群众运动的住宅中。理事会应自行决定是建造农舍式的住宅，还是建造模式化的公寓。

九

土地、工业等方面的合作社企业的管理人员的报酬应由工人和理事会来评议和决定。

十

第一任理事会应临时指定，其任期至下届工人议会开会截止。

十一

兹正式任命下列五人为理事会成员：

詹姆斯·芬伦，伦敦。

阿伯拉罕·鲁宾逊，威尔斯登和桑顿。

詹姆斯·威廉斯，斯托克波特。

约瑟夫·霍格，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乔治·哈里逊，诺丁汉。

名誉理事(有权提出决议案和修正案,但无投票权):厄内斯特·琼斯先生。

十二

本届议会建议下次会议研究一下群众运动保管它自己的基金是否适当的问题。

十三

任命下列人员为宣传员,同时规定他们的活动路线,责成他们尽快开始执行他们的使命:

詹姆斯·芬伦,西部各郡。

阿·鲁宾逊, 北部各郡。

詹姆斯·威廉斯, 中部各郡。

十四

人寿保险部门的职责暂由负责分配的部门代理。

十五

工人议会休会至 8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诺丁汉重新开会。

厄内斯特·琼斯	}	伦敦
詹姆斯·布莱		
亨利·杰弗里斯		
詹姆斯·芬伦		
E.C. 克罗珀	}	曼彻斯特
约翰·赛尔		
约翰·佩茨勒		
约翰·牛津	}	伯明翰
威廉·杰克逊		

- 约翰·韦斯特雷
 约翰·麦克莱恩
 普林斯·汉弗莱斯
 莫蒂默·格里姆肖 } 普雷斯顿
 华莱士·比弗
 约翰·马修
 乔治·考威尔
 约翰·鲁宾逊, 科克斯霍, 陶器区
 威廉·埃米特, 宾利和基斯利
 詹姆斯·威廉斯, 斯托克波特
 阿伯拉罕·鲁宾逊, 威尔斯登和桑顿, 约克郡
 约翰·弗莱明, 贝德福德
 詹姆斯·坎迪利特 } 北兰开夏郡, 鞋匠
 詹姆斯·斯密斯
 乔治·坎迪利特, 海德
 乔治·布鲁尔, 托基
 E. 蒂兹韦尔, 霍沃思, 约克郡
 H. 赫德森, 利克
 伊萨克·福格, 利克
 约瑟夫·霍格 } 纽卡斯尔
 乔治·斯托巴特
 詹姆斯·布赖尔利, 棉布、皮革染工, 曼彻斯特
 本杰明·阿姆菲尔德, 唐克斯特
 威廉·威尔逊, 克鲁克
 威廉·希尔, 斯泰利布里奇

M.麦夸尔
乔治·扬
约翰·斯密斯 } 兰开夏郡、柴郡等地的桥牌室工人
乔治·哈里逊, 诺丁汉
埃德温·戈尔德林, 巴恩斯利
威廉·普尔, 埃克塞特
约瑟夫·雷德福, 拉德克利夫和皮尔金顿
马修·肖, 贝里
瑟真·麦克尔赫伦
纳多
马克思博士
路易·勃朗
弗兰克·多布森

写于 1854 年 3 月 7—1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4 年 4 月 1 日《人民报》
第 100 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3 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欧洲战争》一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许多篇军事评论中的一篇。

1854年1月5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由于生病,他无法按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供稿,请恩格斯下周替他写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由恩格斯自己决定。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的请求,于1月8日撰写了这篇评论,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议题,主要是恩格斯获悉了1854年1月3日夜至4日英法舰队进入黑海的消息。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阐明了克里木战争的进程和前景以及共产主义先锋队在这场战争冲突中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月13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月14日从利物浦出发,1月31日抵达纽约,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2号;在纽约出版的德文周报《改革报》于1854年2月3日和4日转载了文章的德译文。——3。

- 2 指奥尔泰尼察会战。1853年10月28日土耳其军队在卡拉法特构筑了防御工事以后,11月1日和2日驻扎在奥尔泰尼察附近的其他土耳其军队渡过多瑙河并在那里建起了坚固的桥头堡,这个桥头堡直接威胁着俄军的联络路线。11月4日俄军企图将土耳其军队从他们所占有的阵地赶出去,结果失败了。——3,32,98,441。
- 3 指1796—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时期法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当时,法国政府利用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奥地利的压迫所进行的共和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意大利建立了许多实际上藩属法国的小国,并把意大利的某些地区直接并入法国。——4。
- 4 1849年7月3日根据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决定,法国对罗马共和国进行

了武装干涉,结果罗马共和国被消灭,教皇恢复了世俗的权力。

路易·波拿巴有意扶持拿破仑的元帅约·缪拉特(1808—1815年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拿破仑·吕西安·沙尔·缪拉特为那不勒斯国王。——4。

- 5 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争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权战争时期(1778—1779年),普鲁士指望沙皇政府的援助,避免决战。这就加强了俄国的地位,俄国在签订和约时充当了调停人,获得了干涉德意志联邦内部事务的权利。此后俄国和奥地利之间缔结了防御同盟,普鲁士的全部计划遭到了沉重打击。

1780年3月11日俄国叶卡特林娜二世针对英国发表了武装中立宣言,宣言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抗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进行自由贸易,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确实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在这一宣言的基础上,俄国于1780年与普鲁士、丹麦、瑞典、荷兰和奥地利等国组成了武装中立联盟并签订了公约。1800年又重申并补充了1780年武装中立宣言的原则。

1805年,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同盟战争期间,普鲁士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结果自己被欧洲其他国家孤立起来。按照1805年11月3日的波茨坦条约规定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应承担在俄国与法国之间进行调停的义务,一旦调停不成功则应加入反法同盟。然而普鲁士并未履行这一义务,当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获胜以后却于1805年12月15日与法国签订了申布伦条约,普鲁士曾企图成立一个北部各国的联邦也未能成功。拿破仑军队在粉碎了同盟后,于1806年也击溃了普鲁士。——5、472。

- 6 佩克桑重炮是法国将军昂·约·佩克桑在1822年发明的一种海军用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6。
- 7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会战中被法军击败,同一天,在拿破仑的元帅路易·尼古拉·达武的指挥下,法军在奥尔施泰特击溃了普鲁士军队的主力,这两次失败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这两次会战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7、682。
- 8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全文引用了乌尔卡尔特在纽里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词。

自从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一文发表以后，乌尔卡尔特便一直在寻求与马克思交往的机会，他曾寄给马克思几篇自己的文章并请求与马克思晤面。

1854年1月9日，马克思收到了乌尔卡尔特寄给他的纽里大会的报告，这是乌尔卡尔特为抗议土耳其黑海舰队在锡诺普会战中被俄军击毁而发表的演说词。乌尔卡尔特的演说尖锐地抨击了英国和法国在东方冲突中所采取的政策。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直接采用了这篇演说词，仅在文章前后加了一些文字，以表明自己与乌尔卡尔特所持立场的原则性区别（参看1854年1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月10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大西洋号轮船1854年于1月11日从利物浦出发，1月27日抵达纽约，载于1854年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88号上。——9。

- 9 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科苏特及其拥护者将斯提芬国王的王室宝物隐藏在奥尔绍瓦地区，其中包括斯提芬国王那顶历代奥地利皇帝即位时加冕用的王冠。1853年9月8日奥地利政府发现了秘藏宝物的地点，于是纷纷谣传是某某人泄露了秘密。1853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根据该报驻伦敦记者阿·普尔斯基提供的情况，错误地把这件事归罪于匈牙利革命家贝·瑟美列。——9。
- 10 爱尔兰旅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议会中由奥康奈尔领导的爱尔兰议员组成的派别，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托利党和辉格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学派一起能改变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能够决定政府的命运。——10、67。
- 11 拜贤内阁是对阿伯丁联合内阁（1852—1855）的讽刺性称呼。参加这个内阁的有辉格党和皮尔派的代表。这个内阁之所以能够在执政党和托利党反对派在下院中席位彼此相等的条件下存在，是因为得到了所谓爱尔兰旅，即在英国议会中拥有60多人的爱尔兰议员团的支持。阿伯丁组阁时给予三个爱尔兰议员以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爱尔兰旅的分裂（见注143）。——10、100、199、218、247。

- 12 据1854年1月9日《泰晤士报》第21633号报道：1854年1月6—9日，因粮价暴涨，德文郡的克雷迪顿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抢粮风潮，几天之内风潮几乎蔓延到全郡。参加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捣毁了粮店。这次抢粮风潮遭到武装镇压。——10。
- 13 四强照会指英国、法国、奥地利及普鲁士四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3年12月12日联合签署，并于1853年12月15日递交土耳其政府的联合照会。四强国向土耳其政府表示愿意进行调停以恢复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和平，并提出如下几项最重要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恢复俄土之间先前一些条约的效力，以敕令保障基督徒在土耳其的特殊权利。土耳其政府于同年12月31日对这一照会作了答复。——10、26。
- 14 指1853年11月30日在锡诺普发生的俄土海战，即锡诺普会战。俄国黑海分舰队查明土耳其司令部准备派一个区舰队把军队和装备运往高加索沿岸，当俄方在锡诺普海湾发现土耳其区舰队后，便在海军中将巴·斯·纳希莫夫的指挥下对这个区舰队发动攻击并将它消灭了。土耳其军队在这次海战中损失惨重，有15艘军舰被击毁，区舰队司令、海军元帅阿·奥斯曼帕沙被俘。俄国在锡诺普的胜利促使英法两国更快地参加了反俄战争。——10、16、21、98、426、700。
- 15 指1841年7月13日以土耳其为一方，俄、英、法、奥、普五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第二个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所有国家的军舰通行。公约废除了1833年签订的对俄国有利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1、476。
- 16 指俄国和土耳其于1833年7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友好共同防御条约，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见注28）的秘密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土耳其必须按照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12。
- 17 英国政论家、前外交官戴·乌尔卡尔特从19世纪30年代初起，通过他的杂志《公文集》，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有关欧洲强国进行秘密外交活动的文件，其中许多文件揭露了多年来英国对外政策实际领导人帕麦斯顿的外交活动的内幕。

马克思在揭露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活动方面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他在1853年撰写的一组抨击性的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93—476页)中,除了采用其他史料外,还引用了乌尔卡尔特在杂志上发表的文件。马克思撰写的有关帕麦斯顿的部分文章也被乌尔卡尔特印成单行本。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过乌尔卡尔特,并坚决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把他称作是“乌尔卡尔特分子”的诬蔑性言论。马克思经常强调指出他的立场和乌尔卡尔特的立场有着原则性区别。乌尔卡尔特要求保存并巩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竭力主张通过革命的途径来解决东方问题,并认为必须使处于土耳其压迫下的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获得独立。在本卷刊载的其他文章中,马克思指出了,乌尔卡尔特本人是最害怕革命的反革命者,是与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唯一能够消除英国寡头政治的腐朽透顶的议会基础的政党背道而驰的人。——13。

- 18 阿德里安堡条约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于1829年9月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多瑙河口和附近岛屿以及黑海东岸自库班河口以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归俄国;土耳其必须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自治,给予它们自己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负责保证;此外,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并颁布敕令使塞尔维亚的自治合法化。——15、339、362、421。
- 19 纳瓦里诺会战是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一方的会战。英法俄联合舰队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土耳其司令部因拒绝停止残杀希腊居民而展开的这次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覆没,并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15、91、241。
- 20 指帕麦斯顿短期辞去内务大臣职务(1853年12月16—24日)。帕麦斯顿采取这种蛊惑性作法是企图以内阁首脑身分重新掌权(参看马克思《帕麦斯顿辞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2卷第634—638页)。——18。
- 21 《东方战争》一文是马克思专门为《南非人报》写的。该报在卡普施塔德(开普敦)用英文和荷兰文两种文字出版。马克思于1853年12月通过他

- 的妹夫约·卡·尤塔被邀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可能于1854年1月14日、2月14日和3月14日给编辑部共寄去三篇通讯稿,只刊载了一篇。这篇通讯于1854年3月6日发表在这家报纸的英文版上,未署作者姓名;本文经编写后同时发表在该报的荷兰文版上。——19。
- 22 关于土耳其军队击沉俄国战列舰罗斯提斯拉夫号的消息刊载于1854年1月9日的《泰晤士报》第21633号。据俄国的官方文件(《巴·斯·纳希莫夫给亚·谢·緬施科夫的关于锡诺普海战的报告》和《巴·斯·纳希莫夫分舰队在锡诺普海战中的舰船损伤报告表》)所称,罗斯提斯拉夫号在锡诺普海战后重新回到塞瓦斯托波尔停泊场进行修理。——22。
- 23 丹麦、瑞典和普鲁士之间就保持海上武装中立问题进行了协商。丹麦和瑞典于1853年12月15日达成了在波罗的海发生战事时严格保持武装中立的协定。——25、48、103。
- 24 指1850年路易-菲力浦死后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正统派和幼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进行联合的一次尝试。1853年底,法国王位追求者正统派尚博尔伯爵和奥尔良派的代表奈穆尔公爵举行了会晤。——26、713。
- 25 “友好协约”(Entente cordiale)指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英之间建立的名为“友好协约”的同盟关系。虽然说是“友好协约”,但无论在30年代还是以后时期,英法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不止一次地尖锐化。——26、110。
- 26 英、法、普三国的代表和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于1853—1854年在维也纳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议的宗旨在于调停俄土之间的纠纷。在多次召开的会议上意见逐步趋于一致,并拟定了四国对俄国和土耳其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成为召开1855年维也纳会议和签订1856年巴黎和约的基础。——26、233、256、422、475。
- 27 指1853年12月5日英、法、普三国代表与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的旨在调停俄土之间冲突的议定书。
- 法国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年12月12日给土耳其外交大臣路西德帕沙的这封信(载于1853年12月31日《每日新闻》第2376号)指出,法英舰队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证明法英政府对土耳其的友好愿望,一旦沙皇政府试图派兵在土耳其领土登陆,这两个强国的舰队将起而

保卫奥斯曼帝国。——26。

- 28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1768—1774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774年7月21日签订的和约。根据条约，俄国获得了南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包括金布恩要塞在内)以及亚速、刻赤、叶尼卡列等城市，并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必须给予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特别是在第十四项条款中，规定在君士坦丁堡建一座正教教堂。

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18。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于1833年7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友好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和土耳其一旦和任何国家发生战争，双方均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个条约的秘密条款，见注16。——27、95、184、243、364。

- 29 《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一文原是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一篇通讯的一部分。

1854年1月18日，马克思写信请恩格斯在20日之前就切塔泰会战写一篇文章，马克思同时在信中简要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

恩格斯于1月19日写完这篇文章，他除了利用了当时报刊上的所提供的有关材料之外，还利用了自己原来所写的几篇对克里木战局进行分析的文章，本文中有的段落几乎引用了马克思在信中阐述其观点的原话。

1月20日马克思在恩格斯阐述切塔泰会战的那部分文字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对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分析，写成一篇通讯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月20日，星期五。文章随阿拉伯号轮船于1月2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2月4日抵达哈利法克斯。编辑部将这篇通讯分成两个部分，给恩格斯阐述切塔泰会战的那部分加了概括性文字，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7号上。——31。

- 30 指1853年12月15日四强国给土耳其的照会(见注13)。土耳其在1853年12月31日的复照中提出它同意在英、奥、法、普四国的调停下举行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1)维护和保障土耳其领土的完整；(2)俄军撤出多瑙

河两公国；(3)恢复和遵守1841年的伦敦公约；(4)尊重苏丹的主权。1854年1月13日召开的新的维也纳大使会议同意了这些条件，然后将这些条件通知了沙皇政府。——34。

- 31 《东方的战事。——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一文原是马克思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一篇通讯的一部分。

1854年1月19日，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要求就切塔泰会战撰写了一篇文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就当时的一些事件增添了部分内容。在分析锡诺普海战，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状况以及塞尔维亚和波斯发生的事件时，马克思利用了他于1月14日为《南非人报》撰写的通讯中的部分材料（见注21）。

笔记本上对这篇通讯注明的日期是：1月20日，星期五。通讯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半岛号轮船于1月2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2月4日抵达哈利法克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这篇通讯分为两个部分，恩格斯写的那一部分作为社论（见本卷第31—34页），马克思写的内容较多的这一部分作为通讯同时发表在1854年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7号上（参看注29）。——35。

- 32 后备军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编成的一支武装部队。按照普鲁士法律的规定，只有在战时才能征召后备军。——40。

- 33 1854年1月21日伦敦的《新闻报》发表了一篇简讯，报道了沙皇与一位杰出的英国人士之间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马克思撰写的《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这篇通讯就是从评论这一事实入手的。

在这篇通讯中，马克思阐明了在不允许对政府事务和军事决策施加影响的借口下挑起的这场反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诽谤运动的真实意图。威·皮佩尔曾于1月6日受马克思之托在《科堡家族》一文（见本卷第713—715页）中，对科堡王室的政治活动及谱系状况作了分析，继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马克思又在自己撰写的这篇通讯中揭露了挑起反对阿尔伯特亲王运动的真正策划者正是帕麦斯顿勋爵。

在撰写这篇通讯的时候，马克思利用了几天前宪章派周报《人民报》匿名发表的厄·琼斯撰写的《亲王》一文。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月24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4年1月

25日从利物浦出发,于2月9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2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0号上。——42。

- 34 指缅施科夫以特使身分在君士坦丁堡期间(1853年2月28日—5月21日)代表沙皇政府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沙皇要求承认他对土耳其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并且力图使这一点用适当的外交条约肯定下来。——42。
- 35 1854年2月,约·罗素提出了一项英国选举制度的新的改革法案,提议农村选区和城市选区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凡年薪达100英镑以上,或有50英镑以上存款的人,都可以享有选举权。——45。
- 36 曼彻斯特学派又称自由贸易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这一学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46、49。
- 37 1854年1月25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请你用英文书面说明你的意见。法文报纸上写道,土耳其人想从陆地加固君士坦丁堡。这是不是对俄国的一个决定性打击?况且,君士坦丁堡同本帝国的亚洲和欧洲海岸都有海路联系,因而人员和粮食的运入决不可能中断。”恩格斯大概于1月26日将自己的意见写好以后于同一天送交马克思,马克思于1月27日将这部分内容放在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论述丹麦中立问题的通讯之前,因此,这篇通讯的第一部分显然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此外,1854年1月23日召开的英国自由贸易派年会,即所谓改革拥护者大会促使马克思重新讨论科布顿的观点。马克思在1854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科布顿时说:“科布顿,这个‘普通’而‘质朴的人’,因为最近一次演说而大丢其脸。他表明,他本人和那些向他鼓掌的‘普通的人’,都不配管理英国。战栗教徒布莱特只承认内战。科布顿发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同俄国的相似,因为在俄国有杰米多夫家族,在英国以德比家族,这种发现对某个普法尔茨-纽施塔特的革命庸人说来倒是相称的。”在

写作这一部分时,马克思使用了当时在伦敦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原曼彻斯特学派的活动家亚·萨默维尔的文章《科布顿的政策——英国内部的敌人》所提供的素材。

即将重新召开的英国议院的会议促使马克思对英国议会制度及以这一制度为基础的选举制度进行分析。在写作这一部分时,马克思首先引用了自由派周报《旁观者》附刊所提供的资料。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月27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1月28日从利物浦出发,于2月13日抵达桑迪胡克,发表在1854年2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4号上。——47。

- 38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以后在法国对民主派进行追捕。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从引伸的意义上使用了“十二月分子”一词。“十二月分子”原意是指“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其核心人物是巴黎的流氓无产者。该会因纪念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这一组织作过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84—187页)。——49。

- 39 指沙皇政府1836年3月2日颁布的命令。这个命令规定在多瑙河的支流苏利纳河上设立俄国检疫所,检疫所实际上起着控制这一段河流船来往的关卡的作用。——50。

- 40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维护英国大地主的利益自1815年起实施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争取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方的斗争中曾经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同盟即不再存在。——51。

- 41 根据英国以前的惯例,在当时的大约100个爱尔兰贵族(1801年合并前在爱尔兰领到土地的英国地主)中有26个选入上院;其余的人可以选入下

院。——52。

- 42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就奥尔洛夫伯爵奉命前往维也纳执行外交使命一事分析了尼古拉一世为争取奥地利对俄国保持友好中立而作的种种努力,紧接着马克思又分析了俄国的财政状况。

1853年,博蒙-瓦西子爵的著作《1853年维也纳会议以来欧洲各国的历史》第6卷出版以后,欧洲便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俄国拥有巨大的财政储备。对于这种说法,马克思早在1853年当年就撰文进行过研究。在本文中马克思以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第2卷提供的材料为依据指出,数十年来俄国的财政处于困境,由于爆发了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这种状况只会加剧。为了阐述这一点,马克思还利用了1850年9月对这部著作所作的摘录。

笔记本上对本文注明的日期是:1月31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1月3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2月16日抵达波士顿。因为2月4日从利物浦出发并于2月16日抵达哈利法克斯的加拿大号轮船的邮件与马克思的这篇通讯是同一天到达纽约的,或许是考虑到这篇通讯提供的信息具有现实意义,《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日期更改为“1854年2月3日,星期五”。

此外,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没有涉及1月31日以后公开的资料,因而可以说马克思的文章完稿于1月31日。文章发表在1854年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7号上。——56。

- 43 1854年1月底到2月初,阿·费·奥尔洛夫奉尼古拉一世之命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在维也纳举行了谈判。奥尔洛夫的使命是以俄国保证绝对不侵犯奥地利的领土并负责敦促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联邦也同意提供这一保证作为条件,换取奥地利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冲突时保持友好的中立。另外,沙皇建议奥地利共同保护土耳其一旦解体而在巴尔干可能建立的国家。由于在东方问题上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存在矛盾,奥尔洛夫的使命没有胜利完成。——56。

- 44 1833年5至7月阿·费·奥尔洛夫以尼古拉一世的特使和俄军(协助土耳其苏丹马茂德二世镇压叛乱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里)总司令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了谈判。谈判的结果,是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见注28)。俄国在外交上的胜利使英俄

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57。

- 45 全国宪法指在1854年年初讨论并在1854年7月26日颁布的丹麦王国的新的根本法(见本卷第462—463页)。这部宪法以削弱王国各组成部分(丹麦本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的自治权的办法来加强它们对丹麦王权的依附。这部新的根本法遭到强烈的反对,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根本法遂被废除。——60。
- 46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首先分析了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接着对1854年2月6日展开的议会辩论进行评论并进一步探讨了他曾在1月31日的通讯中所谈到的奥尔洛夫出使维也纳的目的。此外,马克思还阐述了英国议会中持自由派观点的爱尔兰议员,即所谓“爱尔兰旅”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同时还揭露了艺术与手工业协会阻止宪章派召开工人议会的企图。

英国政府于2月2日将题为《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的蓝皮书提交议会的上下两院。这份蓝皮书内包括了1850年5月20日至1854年1月24日的这段时间在内的788份秘密外交公文。英国政府想以此来证明自己在东方冲突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同时还想促使俄国接受英国联合法国、奥地利及普鲁士在1853年12月5日维也纳照会中提出的有关调停的建议。这份蓝皮书因其篇幅及所涉及的内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本文中分析了这份蓝皮书的前两部分,以后又在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许多篇通讯中继续对蓝皮书进行了分析。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2月7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1854年2月8日从利物浦出发,于2月20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2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8号上。——61。

- 47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此处是指蓝皮书《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议会两院。》1854年伦敦版。——61。

- 48 1839年,关于英国驻喀布尔全权代表白恩士和阿富汗王多斯特-穆罕默德谈判的报告提交议会。1838年,英国政府曾以这个报告为依据在帕麦

斯顿的敦促下向阿富汗宣战。1839年经议会查明,一些最重要的公文被从文件专辑中抽掉了,这就使人有可能误认为1838年多斯特-穆罕默德执行的政策是明显的反英的政策。——62。

- 49 指法国未参加签订1840年7月15日伦敦公约。40年代初由于土埃战争的爆发使东方问题尖锐化,各强国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加剧了。1839年,苏丹军队进攻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里在1831—1833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强国由于害怕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坚持于1839年7月27日向苏丹提出联合照会,建议土耳其政府接受所有大国的援助。但是,由于英法争夺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英、俄、奥、普四国于1840年7月15日背着法国签订了关于各国在军事上援助苏丹的若干措施的伦敦公约。法国寄希望于穆罕默德-阿里,不久便被迫放弃了穆罕默德-阿里。——62。
- 50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1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有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丹麦国王以荷尔斯泰因公爵的身分,尼德兰国王以卢森堡大公的身分参加了德意志联邦的联邦议会。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这就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会议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于1850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65、401。
- 51 神圣同盟是拿破仑失败以后,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参加同盟的除了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还有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该同盟是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势力的联盟。——65。
- 52 指开往墨尔本的英国轮船泰勒号沉没事件。这次灾难于1854年1月21日发生在朗贝岛一带(都柏林附近),调查结果表明,泰勒号全体船员均是技术不熟练的水手。——67。

- 53 指英国议会里爱尔兰旅以及爱尔兰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领袖丹·奥康奈尔与辉格党的领袖们于1835年2月签署的协定。因谈判在伦敦利奇菲尔德勋爵的府邸举行,所以这个协定被称为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67。
- 54 “艺术和骗术协会”是马克思对1754年成立的、带有慈善性质的艺术和手工业协会的称呼。19世纪50年代,这个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促进艺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酬劳那些对“解决穷人就业、扩大商业贸易、使国家财富增长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人”。1853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为了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见注97),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1854年1月31日,协会举行会议,参加者约有200名属于各个派别的人。会上厄·琼斯试图提出一个承认工人享有罢工权利、谴责同盟歇业的决议案,但琼斯的发言遭到禁止,琼斯及其支持者于是离开了会场。这次会议成了空谈同盟歇业、罢工和工资水平等问题的会议。——68。
- 55 指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法国临时政府在工人压力下成立的。1848年2月28日,巴黎工人要求临时政府采取组织劳动的措施并设立劳动部。临时政府中大多数成员予以拒绝,路·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以退出政府相威胁。多数派由于害怕爆发新的起义而作出让步,同意成立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由路·勃朗主持工作。这个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又称卢森堡宫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研究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是,委员会既无经费又无权力,实际活动仅限于调停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由于路·勃朗采取妥协政策,调解常常有利于企业主。1848年5月16日该委员会被撤消。——68、125。
- 56 马克思曾在1854年2月7日的文章里分析了题为《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的蓝皮书,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马克思从莱·弗·辛普森新近出版的著作《东方问题:莱宁根伯爵和缅施科夫公爵率团访问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摘引了许多有关奥土两国因争夺黑山而发生的冲突,以及莱宁根伯爵出使君士坦丁堡的发人深省的事实,这些事实都是蓝皮书讳莫如深的。在论及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时,马克思首先进一步分析了奥尔洛夫伯爵受尼古拉一世的委派向维也纳会议提出的几点建议。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2月10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

- 件随欧罗巴号轮船于1854年2月1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2月25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13号上。——69。
- 57 1849年奥俄两国政府要求土耳其政府引渡1848—1849年革命被镇压后逃亡到土耳其的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者。英法两国害怕俄国在土耳其的势力增强,便对奥俄两国施加压力,这一要求最后被撤回。——70。
- 58 没落帝国(Lower Empire)一词在历史文献中是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现在已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70、621。
- 59 特惠条例(“特惠”一词源于拉丁文 capitulare)是规定给予东方国家(其中包括土耳其)中的欧洲各国臣民以商业上的优惠和特权的文件(见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本卷第179—188页)。——71、183。
- 60 “最忠于天主教的”是教皇因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1479—1516)将摩尔人驱逐出西班牙有功而赐予的一个封号,后来被罗马教皇经常用来称呼西班牙的国王。马克思在这里讥讽地使用了这个封号。——71。
- 61 指1821年春发生的希腊人暴动。这次暴动是由希腊爱国者的各秘密协会(赫特里)组织的。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希腊大陆而且爱琴海各岛的居民都奋起反抗土耳其的外来统治。1821年底暴动者解放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1822年1月21日,临时国民议会召开,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通过了资产阶级的宪法,组成了以亚·马夫罗科尔扎托斯为首的政府。土耳其苏丹由于光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参加暴动的希腊人,便求助于它的藩臣,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里,要求双方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希腊人。在暴动之初,神圣同盟各强国,其中包括沙皇俄国对暴动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一方面看到希腊人的斗争到处获得极大的同情,而另一方面主要是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于是承认了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它以军事上的援助及外交上的支持。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取得的胜利对希腊赢得独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家。但是根据欧洲各强国的统治集团的决定,把反动的君主制度强加给了希腊人民。1829年3月22日,1830年2月3日和1832年5月7日的伦敦会议(1827—1832)议定书的签订最后确立了希腊王国的独立。——73、146。

62 本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 1854 年 2 月 9 日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一篇文章,写作时间是 1854 年 2 月 13 日。恩格斯曾在 1 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分析了克里木战争的进程与前景,而本文则是进一步阐述相互对峙的俄土两军在多瑙河战场上所处的战略地位。2 月 14 日,马克思在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前加了一段对拿破仑第三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信的评论以及俄国商人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有关这封信的内容估计是乌尔卡尔特为马克思提供的。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2 月 14 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纳什维尔号轮船于 1854 年 2 月 16 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 3 月 5 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本文发表之前在原通讯稿上多处插入承上启下的文字和段落。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4 年 3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19 号上。——77。

63 指 1854 年 1 月 29 日拿破仑第三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信。这封信载于 1854 年 2 月 14 日巴黎的《总汇通报》,转载于 1854 年 3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19 号。——77。

64 第一次维也纳照会是恩格斯对俄土之间的折衷协定草案的称呼。这个草案由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拟定,1853 年 7 月 31 日在维也纳法、英、普三国大使会议上通过。照会规定苏丹必须遵守库楚克 凯纳吉条约(1774 年)和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 年)并维护奥斯曼帝国正教会的权利,保证其特权不受侵犯。按照会议的决定,照会应先送交沙皇,经沙皇同意,再送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照会的内容,但保留按照自己的意见解释这个照会的权利。土耳其苏丹则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见和附带条件作为同意签署这个照会的先决条件,而沙皇政府认为这些修正意见和附带条件都是他不能接受的。——78、373、476。

65 指 1793—1815 年英国对法国的战争。——79。

66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增加了一段文字:“在另一栏目里,本报驻伦敦记者暗示他不愿相信这种背叛行为,但事实胜于雄辩,理智最终必须承认这些事实。在西方强国采取这样不顾一切的措施以求摆脱战争以后,很难设想,还有什么事情它们做不出来。”编辑部这里所说的驻伦敦记者指阿·普尔斯基。——81。

- 67 马克思在分析欧洲各强国对东方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时,特别注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立场。在这方面,拉萨尔 1854 年 2 月 10 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为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在国际关系中危机日益加剧,而英法两国正在大规模备战的形势下,马克思对拉萨尔揭露的事实进行了研究,并利用这些材料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这篇通讯。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2 月 17 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尔卑斯号轮船于 1854 年 2 月 18 日从利物浦出发,于 3 月 7 日抵达波士顿。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4 年 3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22 号上。——82。

- 68 撒丁王国(1720—1861)由皮埃蒙特、撒丁、萨瓦、尼斯、利古里亚,以及热那亚组成,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83。

- 69 1854 年 2 月 20 日英国议会就英国在东方冲突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继续进行辩论,在这之前,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奥·亨·莱亚德曾于 2 月 17 日提出了辩论的建议。这一事实促使马克思撰写了这篇通讯。

从本文报道的方式以及对会场气氛的描述可以推断,2 月 17 日的议会会议召开时马克思曾亲临会场。他根据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作的阐述与《泰晤士报》的报道不大一致。例如,对资产阶级激进派议员约·阿·罗巴克的发言,《泰晤士报》就没有转载原话,也没有本文中马克思加了着重号以示强调的那句话。在分析 2 月 20 日议会辩论时马克思依据的是《泰晤士报》的速记记录。

由燕妮·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对本文注明的日期是:2 月 21 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大西洋号轮船于 1854 年 2 月 22 日从利物浦出发,于 3 月 8 日抵达纽约,发表在 1854 年 3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22 号上。——85。

- 70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 1600—1858 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1661 年公司控制了它所占地区的主权,它拥有军权,立法权以及铸币权。18 世纪,它推行了残酷的殖民战争,扩张势力范围,排挤其他国家而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由于公司的官员营私舞弊危及了公司的统治,英国议会从 1773 年起多次对其权利加以限制。在工业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下,1813 年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3 年它的一切贸易特权均被取消。

1853年通过的关于东印度公司基本权利的法律使其垄断权进一步受到了限制。——85。

- 71 根据英国议会沿用的议事程序,在讨论某些重大问题时,下院可以宣布自己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这等于不公开的会议;在这种会议上,执行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职务由下院议长专门指定主席名单中的某一议员担任。在讨论有关抵补国家开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下院的会议即为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85。
- 72 1844年,英国内务大臣格雷厄姆授权邮政主管部门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并将这些信件的内容透露给那不勒斯和奥地利政府。在检查过程中,除其他人的信件以外还发现了邦迪埃拉兄弟写给马志尼的信,信中叙述他们为了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族和奥地利的统治而举行起义,以及决定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计划。当年6月在进行这次远征时,参加者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86、724。
- 73 1851年5月,法国大使拉瓦莱特侯爵到达君士坦丁堡,向苏丹转交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一封信,波拿巴在信中提出了关于无条件尊重耶路撒冷天主教会的一切权利和特权的要求。苏丹于1852年2月9日颁布敕令承认从前一系列法土条约所规定的法国的权利。而俄国也采取外交手段为正教会争取同样的特权;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俄法两国在东方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这就使得俄法关系十分紧张,而成为以后克里木战争的起因之一。——87。
- 74 马克思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开始分析西方各强国在东方冲突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本文继续分析这一问题。有关2月22日英国议会辩论的报道以及原俄国外交家波措-迪-博尔哥伯爵的秘密紧急报告于1854年2月5日在《维也纳劳埃德氏报》的公开发表,促使马克思选择了这样的议题。本文中马克思摘引并加以评论的君士坦丁堡来信估计是乌尔卡尔特为他提供的。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2月24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854年2月25日从利物浦出发,于3月8日抵达哈利法克斯,发表在1854年3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5号上。——100。

- 75 指1825年10月16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措·迪·博尔哥给总理大臣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1825年8月18日涅谢尔罗德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要求俄国驻外使节就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对俄政策以及俄国应采取的政策发表意见。波措·迪·博尔哥在他的紧急报告中分析了各强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进而建议俄国对土耳其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这份紧急报告载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3年巴黎版。这个文件集于1853年7月在巴黎首次出版。——103。
- 76 马克思这里说的反对法国的神圣同盟是指1840年英国孤立法国的外交活动,见注49。
达达尼尔海峡条约,即1841年7月13日签订的伦敦公约,见注15。——105。
- 77 指1854年1月爆发的希腊居民的暴动。这次暴动席卷了许多并入土耳其帝国版图的希腊地区。暴动者要求同希腊合并,希腊也曾派兵前往暴动地区。土耳其政府依靠1854年5月占领了部分希腊地区的英法武装力量的支持,于当年6月镇压了这次暴动。——107、269。
- 78 1788—1790年奥土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于1789年占领了塞尔维亚。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压力下,奥地利于1791年在西斯托夫(斯维什托夫)与土耳其缔结了和约。和约规定,奥地利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一切地区。——108。
- 79 在本篇通讯中,马克思根据英国报刊所提供的素材分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的登陆计划;希腊人暴动的消息;西班牙萨拉戈萨爆发的起义以及远东的事件。在对军事战略进行分析的时候,马克思很可能接受了恩格斯对他的指点。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2月28日,星期二。文章随华盛顿号轮船于1854年3月1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3月16日抵达纽约。由于3月3日寄出的文章随阿拉伯号轮船15日就抵达哈利法克斯,因此,《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马克思在3月3日寄出的文章中阐述有关英法两国与土耳其关系的那部分(马克思本来是把这部分放在研究奥地利国家财政问题的有关段落之前的)抽出来放在2月28日撰写的这篇文章

- 之前,而原先2月28日这篇文章中有关英国海军上将查·纳皮尔的叙述则有可能被删去了。文章发表在1854年3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0号上。——110。
- 80 暗指1852年12月2日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一事。——110。
- 81 1854年1月,君士坦丁堡有消息报道,警察局破获了一起希腊人的密谋活动,希腊正教教士阿塔纳西乌斯在维丁被捕。西欧各日报报道说,这次密谋的首要人物是巴·厄尔斯纳,此人以前曾是俄国将军亚·尼·吕德尔斯的副官。这次密谋的主要目的是发动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起义。——111、147、269。
- 82 普鲁士利用波兰的软弱以及俄国在俄土战争(1768—1774年)中的困难,促成了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波兰领土的29%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瓜分。——113、208。
- 83 阿尔瑙特人是以往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到了19世纪也用来称呼土耳其军队中的精锐部队,因为部队中主要是招募来充当雇佣军的阿尔巴尼亚人。——114、618。
- 84 指1854年2月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爆发的起义。这次起义的领袖是奥当奈尔将军的朋友霍尔,起义的主力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保守派。尽管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反动势力嚣张,激起人民不满,但市民对此却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因此政府得以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霍尔将军在战斗中丧生。——116。
- 85 1834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签订了一个条约,即所谓四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反对专制的“北方强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却使英国有可能借口在军事上援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以反对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从而巩固它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这是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116。
- 86 1846年英国和法国围绕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同唐·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的婚姻问题,以及路易莎·费南达公主同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幼子蒙庞西埃公爵的婚姻问题进行了外交斗争。由于伊萨伯拉没有直系继承人,蒙庞西埃公爵便成了第一批西班牙王位追求者中的一个。

法国外交的这一胜利引起当时支持法国反路易·菲力浦政府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英国强烈的不满,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报复。——116。

- 87 1838年,由于多斯特·穆罕默德(阿富汗的艾米尔)拒绝同英国结成反对伊朗和俄国的同盟,英国不能把阿富汗变成执行自己的政策的工具,于是决定用军事干涉的办法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并扶植自己的走狗舒扎沙赫为王。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几乎把阿富汗全国抢劫一空,1839年8月占领了喀布尔,俘掳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1841年11月的人民起义,英国军队被击溃并被歼灭。1842年,英国人再一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果也完全失败。——116。
- 88 1851—1864年中国爆发了反对清朝腐败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者建号太平天国,因此,这次起义也被称作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建立乡官、圣库制度;反对孔孟思想,对外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的政策,否认不平等条约。整个起义席卷了全国18个省,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外国的侵略势力。——117。
- 89 1854年2月23日奥地利财政部公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必须将国家纸币兑换成国民银行的银行券。这一事实促使马克思撰写这篇通讯,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财政状况作进一步的分析。在此之前,马克思已在1854年2月3日写的通讯中简要地分析过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状况以及俄国战时的财政状况。那时,马克思就对研究这一问题的某些专著十分熟悉,例如:约·李·贺业尔所著的《奥地利财政史论丛》(1848年维也纳版),《奥地利财政支出及管理概况》(1849年维也纳版)。他还摘录了1853年匿名发表的文章《奥地利金融货币的现状》中的部分资料供研究之用。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可能是奥地利财政部直接出版的,至少是受财政部的委托撰写的,发行单行本的目的,可能是维也纳当局试图让公众舆论,尤其是欧洲金融界对它采取的重新获得信用贷款的举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3月3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号轮船于1854年3月4日从利物浦出发,于3月15日抵达哈利法克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中叙述其他时事问题的段落与分析奥地利财政状况的段落分开,将那部分抽出来加到了2月28

日撰写,随华盛顿号轮船于3月16日抵达纽约的那篇通讯中(见本卷第110—117页),而本篇则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3号上,未署马克思的名字。——118。

- 90 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由贝列拉兄弟在1852年开办并为同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银行,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该公司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于1867年宣告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118。
- 91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的战争:一方是英国、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1763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而告结束。法国被迫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的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并确立了其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120、719。
- 92 1846年2月在波兰各地准备举行以波兰民族解放为目的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由于贵族阶级分子的背叛以及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总起义遭到破坏,只有个别地方爆发了革命。2月22日起义者仅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共和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赋税的宣言。1846年3月克拉科夫起义被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镇压下去。在克拉科夫起义的同时,1846年2—3月在加利西亚也爆发了大规模的乌克兰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了起义的农民与支持克拉科夫起义的波兰小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煽动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克拉科夫起义之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农民运动。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121。
- 93 根据1848年8月6日奥地利与撒丁王国(皮埃蒙特)在米兰签订的和约,皮埃蒙特应付给奥地利7500万古尔登的赔款。
1853年奥地利政府在伦巴第和威尼斯没收了流亡在外的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财产。——122。

- 94 军事边区指16—19世纪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军事边区居民必须服兵役以保卫边防。——123、707。
- 95 1789年在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发生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起义,即所谓布拉班特革命,此次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独立的比利时民族国家。起义于1790年底被奥地利军队镇压。——124。
- 96 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工人议会会议,同一天在伦敦,英国的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向议院提出了军事预算。这两件事促使马克思撰写了这篇通讯。

马克思对工人议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描述可能利用了厄·琼斯寄给他的一封信的内容,琼斯显然在信中还正式邀请马克思以名誉代表的身份出席其他几次会议。马克思在分析格莱斯顿提出的关于预算的建议时利用了1854年3月7日《泰晤士报》刊登的有关议会的报道。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3月7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4年3月8日从利物浦出发,于3月23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3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5号上。——125。

- 97 由于1853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提出了成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把工联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联合起来,而首先是使全国各地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工人议会由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的群众大会和参加“群众运动”的工联的会议推选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开幕,1854年3月18日闭幕。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议会名誉代表的马克思曾给议会写了一封信(见本卷第133—135页),在3月10日的会上琼斯宣读了这封信。马克思在信中指出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马克思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狭小圈子的一种尝试,是向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迈进了一步。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反对政治斗争,不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主张。同时,1854年夏季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广大工人群众参加运动起了不利的影晌。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125。

- 98 指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傅立叶及其追随者们所提出的,通过改良和所谓“劳动的组织”的方式和平地改造社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空想计划。路·勃朗在他所著的《劳动组织》一书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现存的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126。
- 99 全国宪章协会于1840年7月成立。这个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参加的人数达到5万人。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由全体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在协会的活动中,协会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统一,大多数宪章派领袖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思想。宪章派在1848年遭到失败以后,在厄·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成员的领导下50年代初曾试图在革命的基础上复兴宪章运动。他们为贯彻人民宪章以及1851年4月宪章派大会所宣布的纲领进行了斗争。50年代后半期,宪章运动逐渐衰落。1858年该协会停止了活动。——126。
- 100 指1854年2月21日尼古拉一世同法英断绝外交关系的宣言;此外,尼古拉一世在1854年2月9日给拿破仑第三的信中拒绝在东方问题上作任何妥协。——127。
- 101 南海公司是1712年前后在同南美和太平洋各岛进行贸易的幌子下在英国成立的,其真正目的是进行国家证券的投机。该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多特权和垄断权,包括国家有价证券的发行权,开展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1720年公司宣告破产,欠下了巨额国债。1853年格莱斯顿曾按照自己提出的财政改革计划,把这家公司的股票利息从3%降低到 $2\frac{3}{4}\%$,并通过收购这些贬值的股票来抵偿一部分国债。——132、200、273。
- 102 这是马克思于1854年3月9日写给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人议会的贺信,也是他接到工人议会邀请他作为名誉代表参加会议的信后写的复信。厄·琼斯于3月10日在会上向与会代表宣读了这封信的内容。马克思的这封贺信被收入会议记录并在1854年3月18日《人民报》第98号上公开发表。——133。
- 103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继续向北美先进的群众介绍工人议会召开的经过情况。这是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马克思首先重申了他在给工人议会的贺信中已经指出的关于工人议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基本思想,接

着未加任何评论地直接公布了工人议会运动纲领的草案,这是工人运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行动准则。行动纲领的第一部分包括三点内容,是由制订纲领的委员会起草,于1854年3月8日提交工人议会讨论的。将本文正文中所涉及的这部分内容与《人民报》发表的纲领草案相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使用的显然是厄·琼斯直接寄给他的纲领草案的抄件。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3月10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3月1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3月28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9号上。——136。

- 104 这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54年3月13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一篇文章。1854年3月11日,马克思曾为此专门写信给恩格斯,信中说:“如果你能为星期二写点军事方面的东西,那就给我帮了大忙。”

俄军夺取土耳其军队控制的桥头堡卡拉法特的企图失败以后,总司令哥尔查科夫公爵率领军队迅速撤退。俄军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西欧报界纷纷作出反应,评论各不相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了俄军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及其在战略上的影响。

由于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工人议会会议,厄·琼斯作为领导者十分忙碌。显然他当时向马克思提出了为《人民报》撰稿的请求,马克思于是将手头这篇恩格斯分析俄军撤离卡拉法特的文章提供给了这家报纸,文章于3月18日在该报上发表。

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后将他自己撰写的研究希腊人暴动的原因的文章与恩格斯的的文章合并成一篇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3月14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富兰克林号轮船于1854年3月15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3月29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这篇通讯分成了两部分,有关分析俄军撤离卡拉法特那部分以及研究希腊人暴动原因的那部分分别作为该报社论发表。本篇发表在1854年3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0号。——141。

- 105 本策尔维茨(即维尔本)营垒是在七年战争期间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命令于1761年修建的。

托里什韦德拉什工事位于里斯本西北部(在葡萄牙境内塔霍河和大

西洋海岸之间),是1810年为掩护里斯本免受法国进攻,根据威灵顿的命令而修筑的。

维罗纳工事是奥地利大公卡尔的军队在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战争(1850年)时期修筑的,位于离维罗纳不远的地方。

在上述三次战争中这些阵地都没有被敌人攻占。——143。

- 106 马克思先前曾在两篇通讯中简要阐述了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臣民暴动的过程和前景(见本卷第107—109、113—114页)。1854年3月初,马克思计划就这一问题专门写文章进行分析,最初他打算请恩格斯写,他在1854年3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要替我给《论坛报》准备点什么东西,也许可以谈谈希腊革命?”后来他又亲自于3月14日写了这篇文章。马克思的作者身分可以从他1854年4月22日和5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得到证实。促使他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几天前舍夫茨利勋爵在上院以及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蒙·米耳恩斯在下院的报告中向英国政府呼吁,考虑到希腊人发生暴动,应采取一些措施以改善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的处境。

马克思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利用了雅·菲·法耳梅赖耶尔的著作《东方来信片断》第1卷(1845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马克思曾在一年前作过此书的摘录,但是,他最主要的还是采用了当时《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

马克思原本是将这篇文章与上一篇(见本卷第141—145页)合为一篇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3月14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富兰克林号轮船于1854年3月15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3月29日抵达纽约。《论坛报》编辑部将有关希腊人暴动的这部分单独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9号上。——146。

- 107 在这篇通讯中,马克思分析了1854年3月17日英国政府向两院出示的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的第五和第六部分。马克思早就怀疑英国政府在公布这份重要的外交公文集时隐瞒了一些主要的段落(见本卷第61—62页),而这一事实被1854年2月9、10和11日巴黎的《总汇通报》发表的42份关于东方问题的法文公文所证实。这些文献还全部完整地以《法国和俄国。东方问题》为题于1854年2月在巴黎出版发行。直到彼得堡内

闹以苛刻的方式驳斥罗素勋爵 1854 年 2 月 17 日在议院的发言,英国政府才不得不继续把蓝皮书发表出来,英国政府在蓝皮书上所玩弄的全部花招因此而真相大白。1854 年 3 月 2 日,俄国政府的机关报《圣彼得堡报》针对罗素勋爵的讲话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在 3 月 3 日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彼得堡内阁致其大使和各国外交使节的备忘录。备忘录的附录中收入了两份未发表过的涅谢尔罗德伯爵 1853 年 8 月 1 日致俄国驻巴黎公使尼·德·基谢廖夫的紧急函件,这是对巴黎《总汇通报》公布的通告信作出的答复。由于备忘录收入的这些公文中暗示了彼得堡内阁与英国政府之间早就有过秘密协商并达成了协议,因此,英国政府迫不得已于 1854 年 3 月 17 日向议会两院出示了英国驻彼得堡大使乔·汉·西摩尔关于 1853 年初与尼古拉一世的几次会谈以及 1844 年涅谢尔罗德伯爵送交的备忘录(东方问题蓝皮书的第五和第六部分)等秘密信件。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3 月 21 日,星期三。文章作为邮件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 1854 年 3 月 22 日从利物浦出发,于 4 月 4 日抵达纽约,发表在 1854 年 4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45 号上。

据阿·克路斯 1854 年 4 月 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篇通讯还由威·李卜克内西译成了德文发表在《巴尔的摩警钟报》上。——149。

- 108 指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英国外交大臣关于西摩尔和尼古拉一世于 1853 年初就土耳其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秘密往来公文。马克思在本文和本文后面的一篇文章《秘密外交函件的往来》(见本卷第 161—178 页)中对谈判的进程和英国政府在谈判中所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作了详尽的分析。——149。
- 109 这里指 1854 年 3 月 2 日《圣彼得堡报》就约·罗素勋爵 1854 年 2 月 17 日在下院的发言(见本卷第 87 页)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暗示沙皇政府和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问题上狼狈为奸,并引用了 1853 年西摩尔的秘密往来的函件和 1844 年的备忘录作为证据。——149。
- 110 圣地问题是希腊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一个多年的纠纷。纠纷的核心是争夺巴勒斯坦圣地:伯利恒的耶稣诞生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管辖权。这里所说的俄国、法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圣地的纠纷,是 1850 年由路易·波拿巴挑起的。他为了巩固自己在东方的地位,在君士坦丁堡支持天主教派的要求。沙皇俄国保护当地正教教会的特权,并以

此为借口干涉土耳其内政,达到占领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并最终占领墨西拿海峡的目的。双方的实际目的都是争夺近东霸权。摇摆不定的土耳其政府起初对法国的要求让步,但在1853年5月4日,当俄国特命全权公使缅施科夫到达土耳其时,土耳其政府又被迫同意特别保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与此同时,苏丹在英法两国大使的支持下,拒绝了尼古拉一世关于承认他是奥斯曼帝国正教居民的保护者的要求。圣地纠纷演变成激烈的外交冲突,成为导致克里木战争的原因之一。——157、171、177、184。

- 111 指普鲁士政府经常对马克思进行监视。在50年代,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在英国当局的协助下曾是监视马克思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在和恩格斯来往的信件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的信件遭到暗中检查。——161。
- 112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继续分析了英国政府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的第五和第六部分。笔记本上对本文注明的日期是:3月24日,文章作为邮件随欧罗巴号轮船于1854年3月25日从利物浦出发,于4月8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0号上。——161。
- 113 促使马克思撰写这篇通讯的原因是英国和法国对俄宣战以及当时发生的与此有关的几个事件。1854年3月28日伦敦《泰晤士报》在报道宣战一事的同时也报道了3月12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了一项条约。3月27日,德比勋爵在上院提醒人们注意当时流传的一则消息,说英、法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中包含了有关土耳其基督教臣民保护权的条文。这一事件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有关土耳其基督教臣民保护权的问题。在撰写这篇文章时,马克思利用了他于1854年春天摘录的塞·法曼的著作《基督教会在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
- 这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注明的日期是:1854年3月24日,星期五。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3月28日,星期二,此外马克思曾利用了1854年3月27日和28日报刊的通讯报道,这两点都明确地表明这篇通讯的写作日期是3月28日。文章作为邮件随海尔曼号轮船于1854年3月29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4月14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4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4号上。——179。
- 114 按照英国从1662年起实施的定居法,对于向任何教区济贫所申请救济的贫民,可以根据法院的决定强迫他们迁返原籍。1854年2月10日提交下

院的禁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强迫贫民迁移的法案未被议会通过。——180、315。

- 115 三国同盟条约是1854年3月12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同盟国有义务在海军和陆军方面给予土耳其军事援助,而土耳其未经英法同意不得同俄国进行和谈并签订和约。——180。
- 116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权威。负责就个人或法官所提出的询问提出意见,这种意见有时在疑难案件中起决定性作用。——180。
- 117 乌列玛是中近东伊斯兰教国家中神学家和法学家的最高等级。这个等级掌握着诉讼程序及一切宗教机构和学校的管理权;乌列玛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180。
- 118 柏柏尔国家是19世纪对地中海沿岸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称呼。——181。
- 119 欧洲及北美各大报纸曾对俄土战争作过详尽的报道,由于英法两国对这场战争的干预而使人们以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关注着行家对战况作出评论。在作出种种努力对公众舆论施加积极的影响的同时,马克思还建议并支持恩格斯谋求一份撰写军事通讯文章的工作。1853年12月14日,马克思曾向恩格斯提出建议,由恩格斯本人署名撰写有关路易·波拿巴的文章并把文章送到《每日新闻》、《观察家》或《威斯敏斯特评论》,以送到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每日新闻》为最好。马克思还指出,恩格斯可以通过这类文章“在伦敦报界赢得一种地位”,使他有可能“控制报界”等等,然而撰写披露炮兵中尉路易·波拿巴的文章的计划未能实现。1854年3月底恩格斯为《每日新闻》撰写军事评论一事进入协商阶段,估计是由于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军事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所以,恩格斯请求他的一位熟人,即《每日新闻》国民教育问题撰稿人约·瓦茨提供必要的信息并予以推荐。恩格斯还于3月30日给《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写信自荐为该报撰写军事述评的文章,他提出“可以每周寄去一篇文章,占一两栏篇幅”,同时还寄去了这篇《喀琅施塔得要塞》作为试用文章。他在信中写道:“我愿给你寄去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全面论述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论述它们的组织,目前的人数和战斗力(在可以

弄清楚的范围),并对波罗的海、黑海、多瑙河和波兰疆界的战场、军事行动及防线,包括要塞体系在内,作出军事述评。这次所附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文章,是这组文章中的一篇,可以按次序推迟发表。”虽然赫·季·林肯最初接受了恩格斯的请求和提议,但最后为《每日新闻》撰稿一事受阻,恩格斯最终收回了自己这篇文章。1854年3月23日,恩格斯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将于次日把文章寄给《每日新闻》编辑部,但是实际上直到3月30日这篇文章才作为给《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的信的附件寄出,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没有任何资料保存下来,只能说恩格斯是在3月23日至30日这段时间完稿的。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恩格斯利用了1853年9月28日伦敦出版的以及由詹·怀尔德绘制于1854年3月29日并在伦敦出版的喀琅施塔得地形图。在论述蒙塔耶尔的沿海和港口防卫体系时,恩格斯主要利用了他私人所藏的阿·冯·察斯特罗的《永久性筑城艺术的最优秀体系和风格手册》(1839年,莱比锡版)一书。

本文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189。

- 120 马克思写作这篇通讯的起因是1854年3月30日英国议院下院召开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再次讨论济贫法、定居法以及有关提高所得税的法律的提案。由于英国政府对俄宣战,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提出了加倍征收所得税的法律草案,与此同时,济贫法委员会负责人马·塔·贝恩斯辞职一事又轰动一时。同样是在3月30日这一天,曾参加过宪章运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托·斯·邓库姆在下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普雷斯顿工厂区状况的请愿书,此事促使马克思描述了这个工业区8个月来工人罢工的经过情况,在写作这篇文章时,马克思主要采用了《人民报》时事报道所提供的素材。估计本文还曾论及不久前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本人也已收藏的华·威尔克斯的文章《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事实和言论的比较》。马克思在1854年4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华盛顿·威尔克斯著的《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这本书包括两个时代。在第一个时代,华盛顿·威尔克斯最无耻最愚蠢地抄袭了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在第二个时代,他靠蓝皮书把乌尔卡尔特的《俄国的进展》一书中关于匈牙利的一章加以扩充增补。不管这本劣作是多么可怜,也不管这个家伙在一切问题上是多么无知——剽窃者的真正的无知,——但他却靠这本书钻进了伦敦的各种大会,受到乌尔卡尔特及其一伙的庇护,并且被视为伦敦的

‘社会活动家’”。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3月31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大概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4月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4月14日抵达哈利法克斯。文章在英国参与俄土战争的消息传来之后不几天抵达纽约,与另外两艘轮船,即北极号和亚细亚号运送的邮件同一天到达,这些邮件带来了4月5日和8日的消息。可能出于这种原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仅仅保留了马克思这篇文章中有关英国财政问题以及普雷斯顿罢工经过的论述,其他部分全部删去。这篇文章于1854年4月21日在《纽约半周论坛报》第929号上发表。一篇国外发来的通讯仅仅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这是很异常的,因此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已于1854年4月18日左右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晚报版上刊登过了。

这篇文章是根据唯一可以找到的有破损的报刊照像复制品刊印的,正文中方括号里的文字不一定十分确切。——198。

- 121 所得税法案是格莱斯顿因英国即将参加克里木战争而提出在6个月内把所得税率增加一倍的提案。1854年3月27日,英国向俄国宣战,所得税法案于30日三读后通过。——198。
- 122 指英国政府公布的蓝皮书《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1854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两篇文章(见本卷第149—160、161—178页)中曾对这份蓝皮书中的材料作过分析。——198。
- 123 关于格莱斯顿1853年4月18日提出的预算的详细说明,见马克思的文章《菲格斯·奥康瑞尔。——内阁的失败。——预算》、《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67—74、75—84页)。——198。
- 124 指1852—1855年乔·阿伯丁的联合内阁,亦称“群贤内阁”,参看注11。——198。
- 125 垂死的人是尼古拉一世同英国公使乔治·汉·西摩尔在1853年1月9日和以后的几次会谈中用来指土耳其的一个用语(《来往公文集》第五部分第877页)。——199。

- 126 “爱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是马克思对格莱斯顿的称呼。皮由兹派是19世纪30—60年代英国教会的一个教派,以它的创始人之一,牛津大学神学家皮由兹的名字而得名,格莱斯顿属于该派;马克思在强调格莱斯顿的伪善时,常常称他为“爱献殷勤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81页)。下面一段话是马克思根据帕金顿1854年3月30日在议院的讲话(发表于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援引的1853年4月18日格莱斯顿在议院的发言片断。——199。
- 127 “精明博士”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的绰号,因其论证机敏而得名。马克思在这里采用这一绰号讽刺性地称呼格莱斯顿。——199。
- 128 指普雷斯顿罢工,这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的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之一。1853年8月,普雷斯顿和四郊的棉纺织厂的织布工和细纱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0%,得到了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持。企业主联合会为了对付罢工,1853年9月宣布了同盟歇业。在3万名普雷斯顿工人中大约有2万5千人停止工作。这次罢工运动的特点是得到了其他城市工人的支援,普雷斯顿工人因此而坚持了36周之久。1854年2月同盟歇业已停止,但罢工还在继续。为了破坏罢工,企业主联合会开始把爱尔兰和英格兰习艺所的工人运到普雷斯顿。1854年3月,罢工的领导人被捕。由于基金耗尽工人被迫复工,5月罢工结束。关于普雷斯顿罢工的起因进程及其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81—382、482—485、509—510和537—538页及本卷第289—290页。——201、290。
- 129 马克思在下面接着引用的是1854年3月25日《人民报》第99号发表的厄·琼斯的文章《普雷斯顿的棉花巨头。——谁是真正的阴谋者?》中的实际材料。——201。
- 130 骚乱取缔令是英国1714年颁布并于1715年生效的一项法令。该法令明文规定,禁止12人以上的一切“骚乱性集会”。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若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解散,则可使用武力。——202、289。
- 131 指企业主为破坏罢工而招募到普雷斯顿的工人(1854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1694号)。——203。

- 132 这个决议的原文马克思引自1854年4月1日《人民报》发表的文章《兰开夏郡领导者的控诉》。按当时的实际情况,4月1日的《人民报》在3月31日晚上出版,所以马克思在这天晚上写的这篇文章中利用了这份报纸。——203。
- 133 由于克里木战争爆发,恩格斯致信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的编辑赫·季·林肯,表示愿意为该报撰写军事评论,并于3月30日将《喀琅施塔得要塞》作为试用文章(见本卷第190—198页)寄给了该报编辑部,1854年4月3日以后,应该报编辑部的请求,又寄去《俄国军队》一文,这篇文章应当是有关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的一组文章的头一篇。这篇文章排版后,恩格斯大约在1854年4月12日收到校样,并附有该报编辑赫·季·林肯的信件,林肯在信中询问了恩格斯同意为该报撰稿的条件。恩格斯对给《每日新闻》撰稿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指望能经常给《每日新闻》撰稿从而摆脱商务活动并迁居伦敦。但是,从恩格斯1854年4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当赫·季·林肯得知恩格斯的观点以后,就以非常客气的态度取消了原先的协议,其理由是,恩格斯撰写的“文章太专门了,虽然他们很愿意采用,但是力不从心”,并劝恩格斯向军事报纸投稿。本文所论及的俄国军队的构成和编制的情况,恩格斯主要参考了奥·冯·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军事强国俄国及其历史、统计、人种和政治关系》(1852年柏林版)。本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4卷。用英文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3卷第123—128页。——205。
- 134 1854年3月22—23日,俄军以三个军的兵力强渡多瑙河。恩格斯在前面分析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见本卷第141—145页)一文中曾暗示过俄军有可能渡过多瑙河。当时,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曾在1854年3月29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在你写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的文章中,你对这一行动的解釋是,鉴于英法军队的到来,打算在敖德萨建立一个阵地。但是,根据最近消息看来,对面的俄军似乎已经横渡或曾想横渡多瑙河。也许明天会有更详细的消息,因此,你可以在后天以前寄给我一点这方面的东西。”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还告诉恩格斯,他对《论坛报》随意处置他的文章提出了抗议,“禁止把军事文章以外的其他东西抓去当社论”。几天以后,4月4日马克思又告诉恩格斯,“重要的是,正是在现在,你不要不管我

同《论坛报》的事情而自己在《每日新闻》上开火。……因此，首先必须再诱使他们刊登一篇军事文章作为社论。”

恩格斯未能很快按马克思的要求写出一篇有关的通讯来，他于1854年4月3日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俄军横渡多瑙河的防御性特征。马克思将这封信的有关段落译成了英文，加上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以前曾叙述过的关于希腊人暴动和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解放问题的有关论述（见本卷第146—148页）形成一份草稿，又将这份草稿与分析1854年3月31日议会辩论的文字（见本卷第215—226页）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4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北极号轮船于1854年4月5日从利物浦出发，于4月16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把这篇文章分成好几部分，有关分析3月31日议会的战争辩论的那部分文字作为伦敦通讯刊印出来，未署名（见本卷第215—226页）。本篇文章在1854年4月17日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社论发表之前有好几段被编辑部抽出来作为该报的通讯发表。编辑部对这篇文章的原稿所作的改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段——头两行以及“但是，本报的消息灵通的伦敦通讯员认为这只不过是证券投机商的臆造”这句话是编辑部加的。这一段的绝大部分，从“实际上很显然……”一句直到末尾都是恩格斯写的，它和恩格斯1854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原文几乎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334—335页）。这一段的其余部分是马克思写的。

第二段，把它和《议会的战争辩论》一文的第四和第五段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编辑部也是任意处理马克思的材料，虽然要确定作了多大改动比较困难，但是它加进下面这句话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这些条件早一些公开提出，就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毫无疑问，那种解放正是同盟国所希望的。”这一段中的最后一句话“毫无疑问，我们从下一班轮船将得到关于这件事的详尽的消息”也是编辑部加的。

第三段，从内容来看，许多地方同马克思所写的《希腊人暴动》、《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以及后来写的《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见本卷第146—148、179—188和245—248页）等论文有相同的地方。

四个星期以后，马克思曾在1854年5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

指出恩格斯这些战略观点的重要性,他写道:“我发现,你的军事文章(关于《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多布鲁甲的形势)正在得到辉煌的证实。”——211。

- 135 1854年3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请求尼古拉一世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以避免冲突。尼古拉一世在复信中表示同意撤军,条件是西方强国必须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徒得到解放并把自己的舰队撤出黑海。关于这次谈判的消息,马克思是从1854年4月4日《泰晤士报》第21706号发表的材料中得到的。——212。

- 136 由于法国、英国和土耳其1854年3月12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土耳其政府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伊斯兰教的谢赫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和最高立法院主席利法特帕沙反对在土耳其基督教徒的地位问题上作任何妥协,因而被免职。——213。

- 137 1854年3月31日英国议院上下两院就对俄战争一事展开了辩论,这一事实表明,在对俄宣战以后,联合内阁一直抱着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态度。马克思在1854年4月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英国政府采取的这一立场在公众中产生的影响时说:“关于内阁‘背叛’的议论开始在这里的庸人中流传开来。如果这些老爷们胆敢再玩弄一次1840年和1846年那样的手法,那么这一次是不会白白过去的。”这一事实促使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对3月31日的议会辩论进行分析并继续探究在前面的文章里(见本卷第149—160和161—178页)已分析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的第五和第六部分。同时马克思原原本本地追述了1844年俄国内阁秘密备忘录的来历。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4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北极号轮船于1854年4月5日从利物浦出发,于4月16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5号上。

1854年4月20—22日纽约的周报《改革报》刊登了这篇文章的德文译文,标题是《议会的战争辩论》。——215。

- 138 伏尔泰在为悲剧《塞米拉米达》(1749年)所写的题为“论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的序言中谈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时说:“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喝醉的野人的幻想产物。但是在这些对现在仍然使英国戏剧变得如此荒谬和野蛮的形式的粗暴破坏中间,你会发现在《哈姆雷特》中除了稀

奇古怪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无愧为最伟大的天才的崇高思想。”——215。

- 139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出于好奇打开了关着各种各样灾祸的盒子,于是这些灾祸被散布出来。——218。
- 140 指1854年4月3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编辑部在这篇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莱亚德在下院的发言,并对他作为亚述考古学家的活动表示怀疑。莱亚德在考古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1848—1849年在伦敦出版的《尼尼微遗址》和1853年在伦敦出版的《尼尼微和巴比伦》。——220。
- 141 马克思在1853年10月至12月初写的一组抨击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93—476页)中对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作了详尽的分析。——225。
- 142 普鲁士贷款委员会向下院提出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普鲁士在东方冲突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这一报告的公开发表促使马克思于1854年4月7日撰写了这篇文章。文章继续分析了两个德意志大邦在克里木战争中采取的互不统一的中立政策,而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前面发表的通讯中就已论及(见本卷第82—84页)。在撰写这篇文章时,马克思主要利用了1854年4月6日《科隆日报》上发表的普鲁士贷款委员会报告中所提供的素材。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7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854年4月8日从利物浦出发,于4月20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4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9号上。

或许本文在分析奥地利和普鲁士政策时还有一段利用《泰晤士报》驻维也纳通讯员的报道进行论述的文字。在本文发表之前《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这部分文字抽出来加进了另一篇社论,发表在同一期报纸上。——227。

- 143 1852年12月成立阿伯丁联合内阁时,阿伯丁首相给予爱尔兰旅(参看注10)的三个成员——基奥、萨德勒和蒙塞尔大臣职位,因而引起了一些爱尔兰议员的强烈抗议,导致该旅发生分裂。站在支持政府的爱尔兰议员一边的是天主教上层僧侣、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害怕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高涨的大地主。以达非为首的爱尔兰旅的另一部分人依靠的是争取政府在爱尔兰实行新土地租佃法的爱尔兰富裕佃农阶层(参看注 11)。——228。

- 144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继续探讨了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的军事策略,这一问题在先前的文章中已作过分析(见本卷第 77—81 和 141—145 页)。文章研究了俄军采取渡过多瑙河以及派兵进入多布罗加的军事行动形成的新的战略地位。而早在俄军采取这一行动的真正意图明确地显露出来之前很久,恩格斯就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明确地指出,俄军的意图是为了巩固其在多瑙河战场上的防御地位(见本卷第 211—214 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再次着眼于战略的各个视角并根据那段时间内俄军兵力移动的情况来证明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恩格斯这篇写于 4 月 13 日的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4 月 14 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半岛号轮船于 1854 年 4 月 15 日从利物浦出发,于 4 月 25 日抵达哈利法克斯。编辑部将本文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4 年 4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65 号上。——235。

- 145 促使马克思撰写这篇通讯的原因是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日趋紧张以及都灵的《同盟报》刊登的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土耳其外交大臣路西德帕沙在 1854 年 4 月 1 日的一份照会中宣布了中断与希腊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并命令将希腊大使安·梅塔克萨斯逐出君士坦丁堡并将所有苏丹的希腊臣民逐出奥斯曼帝国。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在同一天以政府的名义向英国驻土耳其和希腊的领事们发布的通令中表示无条件地赞同土耳其的这一举措并拒绝今后对苏丹的希腊臣民提供任何保护。

马克思在撰写本文时利用了这两份伦敦的报纸尚未公开发表的文件,继续阐述了以前曾经阐述过的希腊人暴动的经过及其特点(见本卷第 107—108、113—115、146—148 和 212—214 页)。由于斯·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这份通令与以往关于保护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许诺截然相反,所以马克思根本用不着去评论它。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4 月 18 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 1854 年 4 月 19 日从利物浦出发并于 5 月 1 日抵达纽约,发表在 1854 年 5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68 号上。——240。

- 146 1853年初,奥地利政府把5000多名原籍为瑞士泰辛州的人赶出伦巴第,引起了奥地利与瑞士的冲突。奥地利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是,1853年2月的米兰起义是居住在泰辛的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策划的。经过长期外交谈判,直到1855年3月,奥地利政府才允许被驱逐的泰辛人返回原地。——241。
- 147 意大利立宪党在本文中是指在争取意大利统一的运动中以卡富尔为首的自由派,即所谓温和派;该党代表保皇派自由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的利益,力争在萨瓦王朝的庇护下自上而下地达到意大利的统一。该党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因而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其他国家的援助之上。1853—1854年,该党促使皮埃蒙特站在英法一边参加克里木战争,从而希望在实现意大利统一时取得英法两国的支持。皮埃蒙特于1855年参战。——242。
- 148 1830年6月法国政府开始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卜杜·卡迪尔的领导下进行了激烈的武装抵抗。——244、445。
- 149 在这篇通讯里马克思再次论述了希腊与土耳其的矛盾尖锐化的问题。马克思之所以重提这一问题并再次阐明在这一纠纷中,作为希腊保护国的英国和法国所采取的立场,其原因显然是由于《科隆日报》对新近君士坦丁堡事件所作的报道,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在三天前就已开始讨论了(见本卷第240—244页)。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了西方强国及其同盟国土耳其之间正显露出来的分歧,报道了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并对英国人民对联合内阁及其作战方法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进行了评论。从本文的某些段落来看,马克思曾与厄·琼斯就以上问题进行过讨论,因为他们的观点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马克思甚至有可能将他写的这篇通讯的草稿在寄往纽约之前就提供给了琼斯的《国外文摘》。
-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21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4月22日从利物浦出发,5月5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72号上。——245。
- 150 1854年4月19日,马克思写信请求恩格斯“就哥尔查科夫今天的报告(载《泰晤士报》)和《北方蜜蜂》关于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的报道”替他“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但是,恩格斯在4月21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

并没有谈及这一问题,而是许诺4月24日将寄去一篇稿子:“假如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星期一将寄去一篇关于横渡多瑙河的文章。”关于俄军横渡多瑙河的战略意义,恩格斯已经在1854年3月30日致季·林肯的信中有所分析。在写作本篇通讯的过程中,恩格斯利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毛奇的著作《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25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华盛顿号轮船于1854年4月26日从南安普敦出发,轮船在驶往纽约的途中,因遇温切斯特号轮船沉没,华盛顿号的全体人员投入了援救工作而推迟了许多天,直到5月14日才抵达目的地。估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根据5月3日启程5月15日抵达的大西洋号轮船带来的最新消息,加上了一段对联军舰队炮击敖德萨的消息的评述,作为该报的社论发表在1854年5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0号上,这个最新消息也同时刊登在该报的“战争”栏内。——249。

151 关于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历史的详细情况,参看本卷第338—339页。——250。

152 马克思的这篇通讯在继续报道希腊人暴动的同时还报道了有关打算在土耳其建立波兰军团的消息。此外,马克思还详细地介绍了1854年4月20日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攻守同盟条约的主要条款以及普鲁士首相曼托伊费尔在议院的讲话,并对此作了评论,指出了德国两个大邦在东方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文章的结尾摘引了巴黎《总汇通报》转载的《圣彼得堡报》刊登的芬兰湾俄国海上非常后备军的条例。

这篇写于4月27—28日的通讯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28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加拿大号轮船于1854年4月29日从利物浦出发,于5月10日抵达哈利法克斯,发表在1854年5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79号上。——253。

153 奥普条约于1854年4月20日在柏林签订。——255。

154 指1854年4月9日英国、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在维也纳举行的例会上签署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签字国不得在调停俄国和土耳其冲突的问题上单独行动,并拟定了以下几点作为未来协议的基础: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给予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以不妨害苏丹独

立和主权的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以及寻求在调整土耳其政治关系时保证欧洲的均势的必要保障。——257、593。

- 155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披露了1854年4月22日英法海军联合舰队与俄国海军之间在敖德萨展开炮战前的实况。此外,这篇文章还探讨了对欧洲各强国奉行的政策所持的各种观点。普鲁士首相曼托伊费尔在两院会议上发表的两次演说促使马克思再次分析了他以前曾在许多文章中分析过的两个德意志大邦在东方冲突中所采取的政策。本文还转引了《马赛新闻报》从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独立报》转载的消息,并再次评论了希腊对西方强国的态度。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2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大西洋号轮船于1854年5月3日从利物浦出发,于5月15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5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0号上。——260。

- 156 1850年11月29日,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签订了奥尔米茨协定,在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放弃了以它自己为首统一德意志的企图,并同意恢复德意志联邦。——263。
- 157 指1830年2月3日签订的伦敦议定书,法国、英国和俄国在这份议定书中承认了希腊的独立。参看注61。——264。
- 158 普鲁士独立战争指拿破仑军队在俄国溃败后德意志人民展开的反对法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斗争中,统治阶级和执政王朝千方百计地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并利用人民的斗争来巩固德意志的封建反动制度。——265。
- 159 忠实者联盟(Treubund)是1848年底普鲁士保皇派在柏林建立的沙文主义组织。——265。
- 160 1854年5月1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写的一篇通讯将随5月5日开往纽约的轮船寄出,信中写道:“在星期五最近的这一班轮船开出之前,我替你再写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军事文章或其他文章。从政治方面看,回到我们就这一问题所写的第一批文章上来,现在也是时候了,因为在这里事件也清楚地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希腊人暴动的顽强性和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明显的困难处境最终证明,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开始骚动起来,土耳其帝国正迅速走向自己的末日。”恩格斯的这篇通讯写于1854年5月4日。他利用了当时报刊的新闻报道所提供的素材。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5日。因为邮件迟到了,估计文章是随欧罗巴号轮船于5月6日从利物浦出发,于5月19日抵达纽约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这篇通讯发表之前在原文中多处增加了一些文字。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5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4号上。——268。

- 161 恩格斯对奥美尔帕沙在切尔纳沃德附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的可靠性的怀疑几天之后完全得到了证实。1854年5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通讯员从维也纳寄来的文章。文章认为1854年4月18日及19日发生的是敌对双方的一次普通的武装冲突,俄军伤亡的数字被夸大了。——269。

- 162 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在下院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财政状况的报告引起了争论,这一事实促使马克思于1854年5月9日撰写了这篇通讯,对联合内阁采取的种种财政措施进行分析。这篇通讯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于同年3月就开始讨论的英国财政问题的续篇(见本卷第128—132和198—200页)。

本文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9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富兰克林号轮船于1854年5月10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5月22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5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86号上。

与马克思先前已经发表的分析英国财政政策的文章一样,这篇通讯在美国也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阿·克路斯就此事致信马克思说,美国共和党的机关报《纽约时报》已将这篇通讯的主要段落摘引出来写成该报的一篇社论发表。——272。

- 163 白厅是伦敦以一座旧王宫命名的街道,是海军部、财政部、内务部以及外交部等政府机构的所在地。

萨默塞特宫是1549年萨默塞特公爵的宫殿,座落在伦敦斯特兰德区附近。19世纪成为海军舰队和医院监察总署,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总署以及审计署的所在地。——277,411。

- 164 指俄国、英国和尼德兰的代表1815年5月19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赔偿俄国把拿破仑军队驱逐出荷兰和比利时各省的军事费用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英国和尼德兰政府必须以赔偿的形式向荷兰霍普公司的银行家清偿俄国借的一部分债款(各付2500万荷兰盾)和1816年1月以前尚未偿

还的这一债款的利息。但协定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一旦比利时的一些省脱离尼德兰,就将停止还债。1830年革命和独立的比利时国家成立后,尼德兰政府停止了付款。但是,1831年11月16日帕麦斯顿代表英国政府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承认英国过去的财政债务的新协定。——279、440。

- 165 1854年5月中旬,燕·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由于马克思病情严重,无法按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供稿,信中写道:“他根本不能写东西,他迫切地请您,亲爱的恩格斯先生,在星期二以前仍给他寄一篇文章来,以便这个星期不像上星期那样,又完全落空。不然,亏空就太大了。”恩格斯于5月15日撰写了这篇文章,分析了1854年4月22日英法联军舰队和敖德萨港炮兵守卫部队之间的战斗,这场战斗的由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面的文章中已作过论述(见本卷第260—262和268页)。英法报刊认为这场战斗是联军大获全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是这样认为的:“炮轰敖德萨看来是俄军挑起的。如果英军不让陆军在那里登陆,我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大成绩,——也许只不过是使这里的庸人平息一下,他们由于战争日益使捐税和公债增加而对联军舰队按兵不动极端愤怒;也有可能,尼古拉需要这样一种示威,以便使他的‘告人民书’更加激烈。”(1854年5月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恩格斯的看法完全与马克思一致,他在信中说:“同盟者由于他们的军旗受到侮辱而不得不炮轰敖德萨。看来,炮轰并没有造成很大损失,而且因为他们既没有登陆,又没有占领城市,所以,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失败。散布的谣言神奇极了,说什么‘他们已向塞瓦斯托波尔开航了’。”(1854年5月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在本篇文章中,恩格斯将这期间英、法、俄官方公布的关于这场战斗的报告作了比较,写作过程中可能还使用了詹·怀尔德5月2日在伦敦出版的地图《敖德萨的城市和港口》。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16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北极号轮船于1854年5月17日从利物浦出发。在轮船驶往美国的途中遇到险情,邮件转至5月20日从利物浦开出的亚细亚号轮船,于6月1日抵达纽约。本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6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98号上。——280。

- 166 此处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这里是同一位德·叶·奥斯滕-萨肯将军,他是驻守多瑙河的第三军指挥官,后来(从1853年12月起)又担任防守从布格

河到多瑙河的沿岸地区的军队的指挥官,他的司令部设在敖德萨。——280。

- 167 埃肯弗德战斗是丹麦和普鲁士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1848—1850年)中的一次战役。——282。

- 168 原定于1854年4月28日开始在议院举行的讨论禁止强迫贫民迁返原居住地的法案的会议再次延期,这一事实促使马克思撰写了这篇通讯。马克思就此讲述了以前曾经描绘过的爱尔兰和苏格兰居民的处境以及清扫领地的经过情况。文章中使用的素材均取自厄·琼斯1854年5月13日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19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854年5月20日从利物浦出发,于6月1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6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95号上。——285。

- 169 指关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清扫领地的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和第12卷第170—176页)。

马克思接着引用的是1854年5月13日《人民报》社论中的事实材料。——286。

- 170 这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54年5月22日撰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英法联军在波罗的海、黑海以及多瑙河战场上进行的战争作了阶段性总结,从战略的角度探讨了今后战争的发展过程。当时英国报界就攻占古斯塔夫斯韦恩堡垒一事作过报道,这是恩格斯选择这一议题的原因。

显然厄·琼斯再次请求过马克思为宪章派的机关报撰稿,马克思将恩格斯写的这篇通讯也寄给了《人民报》,该报在发表时加了按语:“为了腾出篇幅刊登目前侨居英国的一位欧洲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撰写的这篇天才的作品,我们不得不放弃一般性的时事报道。”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23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海尔曼号轮船于1854年5月24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6月8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将它作为社论发表。——291。

- 171 指阿默兰海军上将在1854年5月1日和5日给法国政府的关于联军舰队炮击敖德萨后在黑海的行动的报告。报告的摘要载于1854年5月21日

的《总汇通报》。——294。

172 指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加海战,英国舰队在霍·纳尔逊的指挥下击败了具有优势兵力的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维护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也粉碎了法国入侵英国的计划。——294。

173 1854年5月22日,马克思在信中向恩格斯请求道:“我希望这一个星期你还能替我给美国作一点事,因为我现在完全不能写东西,这个糟糕的病已使我损失了六英镑,真叫人不痛快。”第二天,即5月23日,燕·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又提出了这一请求。恩格斯于5月25日撰写了这篇文章,马克思于5月26日收到。

英法两国作为土耳其的同盟国对俄宣战以后,为了作出准确的报道,理应像分析俄国军队的编制和组织(见本卷第205—210页)那样,对英国的军队也作一番分析,更何况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军事行动以及向土耳其联合派出远征军已暴露出在军备、组织编制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和缺陷。联合内阁想成立一个独立的陆军部,用这个部门取代原来那四个互相牵制的兵力管理部门,从而使军队管理状况有所改善。联合内阁的这种打算曾在英国的报刊上展开过讨论。恩格斯在5月22日的文章里就已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了(见本卷第291—297页)而本文则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26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尼亚加拉号轮船于1854年5月27日从利物浦出发,于6月6日抵达哈利法克斯,发表在1854年6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2号上。——298。

174 1853年6月21日至8月20日为了准备对俄战争,英军在离伦敦不远的乔伯姆城郊外举行了大规模的野营集训和军事演习。——301。

175 指1808—1814年期间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威灵顿公爵领导的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军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303。

176 梅费尔激进派是对英国的假激进派(威·莫尔斯沃思、拉·贝尔纳·奥斯本等人)的称呼。他们是支持自由派的一部分英国贵族。梅费尔是伦敦海德公园以东的一处豪华居住区,建有许多贵族的私邸。——303。

- 177 恩格斯在1854年3月30日给伦敦自由派日报《每日新闻》的编辑赫·季·林肯的信中,自荐为该报的军事专栏撰稿,他表示,要对“从海上攻击岸防炮台有多少成功的把握”作一番透彻的分析。由于他研究过防御工事修筑技术的历史,并具备海上炮兵战斗的理论和实践的知识,所以他深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英法联军与兵力强大的俄国海军防卫部队之间相互较量的结果。此外,造船技术的改进和炮兵技术装备的完善能使海上进攻手段的能力超过海岸防卫。本文研究了海上进攻与海岸防卫的关系,这也是恩格斯由来已久的打算,本文也是对分析进攻敖德萨一战(见本卷第280—284页)的补充。在写这篇文章时,恩格斯利用了他没有发表的草稿《喀琅施塔得要塞》。马克思将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与探讨1854年4月20日奥普同盟条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5月29日议会辩论(见本卷第311—316页)的文章合并在一起。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30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4年5月3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6月11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文章分成两部分,恩格斯写的这部分以《军舰和堡垒》为题作为社论于1854年6月13日发表在该报第4104号上,而马克思撰写的分析5月29日议会辩论的那部分(见本卷第314—316页)则在头一天即1854年6月12日作为伦敦通讯发表在该报第4103号上。——305。

- 178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1854年5月30日寄出的那篇通讯的一部分,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通讯(见本卷第305—310页)发表之前抽出来的。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是因为报纸上报道了1854年5月23日签订维也纳议定书的新闻。这份议定书规定了英法两国对1854年4月20日缔结的奥普同盟条约的态度,议定书签订一事在5月29日下院的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5月30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4年5月3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6月11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6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3号上。——311。

- 179 指1854年5月23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英、法、奥、普四国代表例会的议定书。关于维也纳会议,见注26。——311、320。

180 关于犹太人权利的法案指为能使犹太人通过选举进入下院,罗素勋爵于1853年2月24日在下院提出《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法律限制》的提案。这一提案被下院通过,但被上院否决。马克思在《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51—657页)一文中曾提到过这一提案。——315。

181 在这篇通讯中,马克思根据报界对由联军高级将领参加的瓦尔纳军事会议的报道分析了《泰晤士报》刊登的作战计划。马克思在1854年6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昨天的通讯稿中,我对星期四那一号《泰晤士报》所登的军事计划嘲弄了一番。”马克思在论述的时候,附着进一步讨论了内阁和议会把英国兵力的四个管理部门集中起来并为一个陆军部的决议。最后,马克思还评论了英国各工业区工业和商业状况,这些情况可能是恩格斯为他提供的。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6月2日。文章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号轮船于1854年6月3日从利物浦出发,于6月13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05号上。——317。

182 促使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选择这样的议题的原因是当时涉及英国国内政策发生的许多事件以及奥地利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一事。1854年6月3日,维也纳内阁向彼得堡方面发出了关于撤离多瑙河两公国(这是1854年4月20日的奥普条约所规定的)的最后通牒。奥地利政府要求彼得堡内阁,不要让俄国的军队强渡多瑙河,俄国军队一旦撤离多瑙河两公国时应予以通报。奥地利采取的这些外交措施促使马克思继续探讨在先前的文章中已经研究过的奥地利对东方冲突所采取的政策。除此之外,他分析了英国贸易部的统计表并披露了议会通过辩论作出的关于成立陆军部的决定,同时他还继续对拿破仑第三的陆军大臣及在东方冲突中法国派出的远征军的总司令圣阿尔诺元帅的生平作了概括的描述,在此之前,他曾于6月6日撰写了有关圣阿尔诺生平的文章,但《论坛报》未予发表。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6月9日。文章作为邮件随加拿大号轮船于6月10日从利物浦出发,于6月21日抵达哈利法克斯,发表在1854年6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4号上。——325。

183 指土耳其军队1683年9月12日在维也纳附近被奥、德、波三国军队歼灭,从而扼制了土耳其人向中欧推进。站在奥地利一方的波兰军队在扬·

索比斯基指挥下在这个会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25。

184 皮尔派是联合在罗·皮尔爵士周围的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引起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9世纪50年代，皮尔派在议会中是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小型的政治集团。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政府(1852—1855年)。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325、360。

185 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看出，1854年6月6日，马克思曾写了一篇关于圣阿尔诺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未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过。——327。

186 “自助者天助之”会是1824年在法国成立的温和的自由派的政治团体。许多七月王朝的活动家(基佐、巴罗和拉斐德等人)和一批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弗洛孔、哥特弗里德和卡芬雅克等人)都参加了这一团体。

“Dix - Mille”(“一万射手”)会是对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十二月十日会”(见注38)的讽刺性称谓。

“一万射手”语出斯巴达国王阿革西拉乌斯二世。公元394年，他在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联盟之间进行的科林斯战争中，被迫停止对小亚细亚的波斯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他被“一万波斯射手”逐出了亚细亚。波斯的金币上铸有射手的像，因此“射手”暗指金币，即对方用金币行贿，收买人心。——328。

187 1831年路易·菲力浦一世将流亡者、投敌叛变者和冒险家等人纠集在一起组成了外籍军团。外籍军团被派往法国的殖民地，镇压那里的独立运动，因其作战时凶残而臭名昭著。——330、685。

188 在获知准备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消息时，恩格斯就已在1854年4月24日撰写的文章(见本卷第249—252页)中，从战略上分析了这一军事行动；在围攻正式开始后，恩格斯又在许多篇通讯中连续对攻克土耳其在多瑙河上的这一要塞的各个战役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分析(见本卷第346—358和379—384页)。恩格斯在1854年6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在谈及本文时说：“明天寄给您一篇关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有份量的文章。

这篇文章必将引起人们的注意。”撰写这篇文章时恩格斯曾拟了一份初稿，初稿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描述锡利斯特里亚要塞的结构以及1828—1829年对要塞围攻的情况，撰写这部分时，恩格斯主要取材于毛奇的著作《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初稿的第二部分是恩格斯本人根据新闻报道按时间顺序编纂的截止到1854年5月31日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日志，主要取材于《泰晤士报》驻多瑙河奥美尔帕沙司令部军事通讯员查·内史密斯的报道。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6月13日。文章作为邮件随大西洋号轮船于1854年6月14日从利物浦出发，于6月25日抵达纽约。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6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15号上。——332。

- 189 指1849年6月6日的腓特烈西亚之战。见恩格斯《德国来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56—459页）。——333。
- 190 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军于1829年第一次越过巴尔干山脉的情景。——334。
- 191 巴希布祖克是18—19世纪土耳其非正规部队的名称。这个部队由来自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小亚细亚好战的各部族的人组成，以缺乏纪律、残忍和抢劫成性而著称，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这支部队大约有6万余人。——342、597、604。
- 192 恩格斯于1854年6月10日开始讨论俄国围攻土耳其锡利斯特里亚要塞的军事行动，他原本打算再写一篇文章继续分析这个问题并交6月17日那班轮船送往纽约，他在1854年6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本来打算今天给你写得详细些，但是已经太晚，因此只能告诉你一声，原来想写一篇关于力量对比和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撤围的可能性的文章，今天已经写不成了。为此需要翻阅许多旧东西，而你由于夫人有病自然很难为星期二这班轮船写出一篇文章，所以我当尽量努力，到时炮制出一点什么来”。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顾不得夫人疾病缠身，只好亲自来写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6月16日。文章可能随欧罗巴号轮船于1854年6月17日从利物浦出发，于6月30日抵达纽约。但是，

7月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刊登这篇与笔记本上记录的题材相符的文章。相反,7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的社论《俄土战场的形势》从内容上看与笔记本上记载的6月16日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要点相一致。或许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是随华盛顿号轮船,于6月21日从南安普敦出发7月5日抵达纽约的,或许《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推迟到了7月8日。

编辑部对这篇文章随意地作了处理。它把6月16日马克思写的这篇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与6月23日寄出的那篇通讯的一部分(见本卷第354—358页)合起来作为社论发表在7月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5号上,标题为《俄土战场的形势》,与此同时,它把这篇文章里有关圣阿尔诺以及涉及丹麦的文字全部删去,在重新组合成的这篇社论之前加上了一段编辑部自己写的报道。7月8日波罗的海号轮船带来了有关撤出摩尔多瓦的消息,因此,后来《纽约半周论坛报》以及《纽约每周论坛报》再次发表这篇社论时,《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原来加进去的那部分文字有所改动。——346。

193 指1854年6月14日奥地利和土耳其签订的奥土条约。条约规定,在俄军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后,奥地利有权占领这两个公国。——346、468。

194 1854年6月15日,恩格斯曾答应马克思在6月20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文章。因为恩格斯在当月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都要为北美的报纸写通讯,所以《俄军的撤退》这篇文章可能是6月17日写的,而马克思收到文章的时间是6月20日,这一点在马克思6月21日的信中得到了证实。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这封信中说:“你的文章在两三点之间及时到达。但是因为我只等到两点,两点以后必须出城去办家务事,而我的妻子又从附信中看到,文章不能这样寄出,所以就把文章留下了。我将在写星期五的文章时利用它,不过在这以前请你为我再补充几点,如果没有时间,就尽管写短些:

(1)昨天《每日新闻》的土耳其通讯中有什么新闻?你是否知道有关[5月]28日到[6月]13日事件的详细情况(据我所知,这些天已经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虽然是一些片断)?

(2)切尔克斯亚沿岸的迂回运动中有什么值得从军事观点提出的东

西?关于沙米尔的消息当然需要进一步证实。

(3)关于奥军进入瓦拉几亚的问题,从军事观点看有什么可以谈的?”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6月23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6月24日从利物浦出发,于7月5日抵达哈利法克斯。

恩格斯是否能够像马克思要求的那样对文章作些补充,这一情况未能得到证实。然而从内容上对《俄军的撤退》和《俄土战场的形势》这两篇文章加以分析后,可以证实,马克思6月23日寄出的文章其内容包含了対以上三方面题材所作的详细的论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随意从编辑上处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把对第一个题材进行阐述的文字从6月23日的文章中抽出来,可能将这部分内容加到了6月17日或21日寄出的那篇文章里(见本卷第346—353页),本文则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6号上。——354。

- 195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再次分析了议会对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展开的辩论。促使马克思选择这一题材的原因是,1854年6月26日,英国内阁首相阿伯丁在上议院发表了讲话。1854年6月19日在上议院的会议上,林德赫斯特勋爵尖锐地抨击了俄国政府对土耳其所采取的政策,并指责英国政府对俄国采取的犹豫不决的态度。当时阿伯丁针对林德赫斯特所作的发言在议会反对派中间以及新闻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这也促使人们极其关注阿伯丁即将作出的辩护性的发言。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把阿伯丁在最近东方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他作为英国外交大臣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比较。

在写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利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俄国驻英国大使利文公爵和马图舍维奇伯爵1829年6月1日给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秘密紧急报告,这是马克思从《公文集·外交评论》中摘引的。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6月27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1854年6月28日从利物浦出发,于7月8日抵达纽约,由于这次在途中耗费的时间较短,因此,文章得以在当天,即1854年7月8日午后《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5号的晚报第2版上发表,标题是《欧洲的形势》。7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再次发表时增加了一段文字。——359。

- 196 指1854年6月19日上院讨论东方问题时阿伯丁为反驳林德赫斯特的讲话而作的发言。林德赫斯特当时是托利党反对派的代表,他尖锐地抨击了沙皇政府在对土耳其的关系上的政策,并指责联合政府作战不坚决。阿伯丁在发言中替沙皇政府的政策辩护。——360。
- 197 指1834年4月签署所谓四国同盟条约的国家,即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参看注85。——366。
- 198 马德里爆发的军队起义,新闻媒介对多瑙河战场发生的事件所作的报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外交谈判促使马克思撰写了这篇通讯。1854年6月14日奥地利和土耳其签订了奥土条约,7月3日《泰晤士报》全文公布了这一条约的内容,马克思在撰写本文时利用了这份文献,同时还利用了许多有关文献的摘录,尤其是1391年、1460年和1511年三个条约的摘录,这些材料都出自迪·布拉蒂亚诺编纂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问题的文件》(1849年伦敦版)。此外,马克思还从1849年在伦敦匿名发表的《俄军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及他自己的藏书《关于罗马尼亚恢复的历史,或1848年瓦拉几亚事件的回忆》(1851年巴黎版,让·埃利亚德-勒杜莱斯库著)中挪用了一系列资料。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7月4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富兰克林号轮船于1854年7月5日从利物浦出发,于7月17日抵达纽约附近的长岛,发表在1854年7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4号上。——369。

- 199 指1854年6月28日在马德里发生的军事政变。从1854年春天起,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反动势力横行霸道激起了人民的不满;议会因企图反对政府颁发的关于提前6个月缴税的法令而被解散之后,群众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奥当奈尔将军和杜尔塞将军抱着个人目的,力图推翻圣路易斯的专政而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为了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而不得不答应在征税方面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他们还答应肃清权奸,召开议会,组织国民军并实行其他改革。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引起了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过程中,以埃斯帕特罗将军为首的进步派于1854年重新取得了政权。但是,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一边,从而使以奥当奈尔为首的极端反动的集团于1856年7月又重新掌握了政权。——369。

- 200 指1854年2月萨拉戈萨的守备部队起义。见注84。——369。
- 201 这是对1850年11月8日普奥两国前哨部队之间的一次小规模战斗的讽刺性称谓。为争夺德意志领导权而交战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涉库尔黑森内部事务的权利以镇压那里爆发的起义;由于奥地利得到了沙皇政府外交上的支持,普鲁士被迫让步。——371。
- 202 俄土两国于1829年签订的阿德里安堡条约(见注18)中的一条规定,俄国军队占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直到土耳其支付赔款为止(占领继续到1834年)。土耳其必须承认多瑙河两公国的自治权并给予他们自选国君的权利。这里所说的根本法,就是1831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贵族和僧侣会议根据沙皇政府拟定的方案通过的组织规程。按照这个规程,把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了大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把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选出的终身国君。从前的各种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都保存了下来,政治权力集中在地主手中。同时,组织规程规定了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允许农民从一个占有者转到另一个占有者,禁止刑讯。1848年革命期间,组织规程被废除。——376。
- 203 巴尔塔利曼尼条约是1848年俄国和土耳其在派军队进驻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镇压革命运动以后于1849年5月1日签订的公约。根据这一公约,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的危险完全被消除时为止(外国军队直到1851年才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并暂时实行苏丹根据同沙皇的协议任命国君的原则;条约还规定,如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应采取包括再一次进行军事占领的一系列措施;与此同时,在这两个公国又恢复了组织规程(见注202)。——377。
- 204 在前面的通讯中恩格斯已经分析过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战役并对多瑙河战场上的兵力布署以及成功地攻克土耳其要塞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而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俄军却突然撤退,这一消息促使恩格斯撰写了本篇通讯。他在1854年7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附上为明天写的一篇关于战争的第一阶段的文章。”在撰写本文时,恩格斯利用了一份1854年6月1日至12日有关这一战役的日志。这些日志中的资料都是恩格斯从官方的报道中整理出来的。恩格斯在本文中对交战的双方的报告作了认真细致的比较。本来马克思是决定把这篇文章作为邮件随

1854年7月7日从利物浦开往纽约的轮船寄出的,但他直到7月11日才将恩格斯7月5日写的稿件寄出。他在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刚刚收到你的文章,恰好我自己正忙于炮制关于西班牙的胡说(指《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见本卷第385—393页)。因此把你的文章推迟到星期二,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有皮佩尔当我的秘书,而星期二我却找不到人当秘书。”马克思在寄走本文之前,在恩格斯叙述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文字前面增加了一段文字,同时还补充了一些从报纸上获得的最新消息,例如,奥美尔帕沙给萨米帕沙的信就是从1854年7月9日的《总汇通报》上摘录的。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7月11日,星期一,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4年7月12日从利物浦出发于7月24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手稿上加了一句话。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在该报1854年7月25日第4139号上。——380。

- 205** 1806—1807年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中,大多数普鲁士的要塞在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下都不战而降,只有奈·冯·格奈泽瑙指挥的科尔贝格驻军顶住了法军以优势兵力对它实行的长达两个月的包围。

1813年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德俄军队包围了法军占领的但泽城,对它实行了11个月的包围。在该城被迫投降之前,法军在拉普将军的指挥下顶住了三次围攻。——383。

- 206** 1854年7月4日马克思就马德里爆发军队起义的事件作了报道(见本卷第369页),在本文中,马克思依然关注着伊比利亚半岛发生的这场革命运动,他对截止到当时的所有关于这次起义的消息报道作了清理并详细地加以评价。紧接着马克思还利用了《日报》上提供的素材补充了有关多瑙河战场战斗进程以及奥地利立场的消息。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7月7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尼亚加拉号轮船于1854年7月8日从利物浦出发,于7月18日经哈利法克斯,至7月20日上午抵达终点港波士顿。文章发表在1854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36号上。——385。

- 207** 进步派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它所依靠的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军官、官员和贵族。他们的基

本要求是实现君主立宪制。1854年,由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年),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取得了政权。在革命过程中,面对日益发展的人民群众运动,进步派越来越畏缩不前,并向反革命作了让步,这样就为在西班牙建立反动制度扫清了道路。——388、414、447。

208 指西班牙政府关于提前6个月缴纳土地税和工业税的法令。这一法令于1854年5月19日颁布,5月20日在《日报》上刊载后,成为报界讨论的热门话题。——389。

209 指1854年6月12日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曼托伊费尔给驻彼得堡公使韦尔特男爵的急件。——389。

210 马克思在本文中继续报道了多瑙河战场的战斗进程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革命事件。他尤其关注在东方冲突中两个德意志大邦所采取的中立政策以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立场。此外,本文还以派特曼事件为例揭露了英国贵族在司法方面所表现的专横态度。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7月14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7月15日从利物浦出发,于7月27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7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42号上。——394。

211 1837年的宪法是1834—184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于1837年6月18日通过的新宪法。这部宪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自由派贵族之间妥协的结果。这部宪法赋予议会独立召开会议的权利,但同时保留了国王的否决权和解散议会的权利。下院选举资格被放宽,下院的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由国王从专门选举团向他提出的名单中任命。宪法承认天主教是西班牙国教。这部宪法存在到1845年。——397、414、473、483。

212 指涅谢尔罗德伯爵1854年6月29日给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哥尔查科夫公爵的紧急函件;这份紧急函件是俄国政府对奥地利坚决要求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答复。根据1854年6月14日奥土条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应由奥地利军队占领。马克思引用的是《比利时独立报》1854年7月12日关于这份紧急函件的报道,当时这份紧急函件尚未全文发表。——397。

- 213 指1854年4月20日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签订的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两国有义务在俄国拒绝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兵而继续在巴尔干进军时共同对俄作战。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俄国的文件》一文(见本卷第253—259页)中对这一条约作了详尽的分析。——399。
- 214 指1854年4月17日《塞尔维亚政府就奥地利军队侵入本公国问题给土耳其政府的备忘录》。1854年6月20日,在英国下院就备忘录一事提出询问,1854年6月22日要求公布这个文件的书面质问被送交下院。——399。
- 215 马克思在获悉俄国与在东方冲突中坚守中立的一些欧洲国家再次进行外交谈判时撰写了这篇通讯,文中再次阐明了奥地利在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同时马克思还对有关多瑙河两公国形势的一些互相矛盾的消息作了评论。马克思撰写这部分内容时除了利用英国和法国的报刊外,主要利用的是1854年7月17—18日布鲁塞尔出版的《比利时独立报》提供的资料。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了英国对内政策危机重重的现象。
-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7月18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阿尔卑斯号轮船于1854年7月19日从利物浦出发,7月31日抵达波士顿,估计于8月2日,最迟在8月3日一早,在随加拿大号轮船运送的邮件之前抵达纽约。文章发表在1854年8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47号上。——405。
- 216 指1854年5—6月参加在班贝格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诸多德意志邦(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腾堡、巴登、黑森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和拿骚)的代表。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参加1854年4月20日的奥普条约(见本卷第255页)。——405。
- 217 盖有封印的上谕(*lettres de cachet*)是指以法国国王名义或受法国国王委托拟定并盖有封印的公文,凭此上谕可以不经判决就把人投入巴士底狱或其他国家监狱,甚至驱逐出境。自路易十四以来这种上谕主要被用来逮捕或放逐政敌。1789年6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这种盖有封印的上谕。——412、438。
- 218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概括叙述了截止到7月21日报道的有关西班牙将军

莱·奥当奈尔 霍里斯和多·杜尔塞 加赖领导的军人起义以及紧接着这一事件发生在西班牙许多省市的起义的消息。由于西班牙的各个政党和派别都公布了自己的纲领性要求,因此马克思有足够的材料对运动的特点和前景进行分析和阐述。本文还报道了有关东方冲突的最新消息。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7月21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加拿大号轮船于1854年7月22日从利物浦出发,于7月31日经哈利法克斯在8月2日上午抵达终点港波士顿。由于当时《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还有一篇马克思于7月18日撰写的稿件(见本卷第405—412页)未发,于是这篇文章于8月4日才发表在该报第4148号上。——413。

219 指1843年5月纳尔瓦埃斯将军、孔查将军和其他一些人为了反对进步派领袖埃斯帕特罗的独裁而发动的反革命军事叛乱。这次政变得到一部分不满意独裁者政策的进步派的支持。1843年7月30日,埃斯帕特罗逃离西班牙;温和派的领袖之一纳尔瓦埃斯依靠大土地占有者,成了实际上的独裁者,从此在西班牙建立了长期的反动统治,直到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413。

220 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或西班牙战争,是英国和法国之间于1808年—1814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同时,在整个半岛上展开了西班牙人民和葡萄牙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法国占领的战争。——414、683。

221 1812年是指这一年通过的加的斯宪法(见注223)。

1822年是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顶点时期。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1822年夏天保皇派的阴谋被粉碎后,革命运动的左派——激进派(escaltados)的代表取得了政权。里埃哥是激进派的领袖之一,他们得到了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军官,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以及工人的支持。关于革命军队的作用,见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见本卷第501—573页)。——414。

222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于1833—1840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演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

争,由此引发了1834—1843年资产阶级革命。——414、448、485。

- 223 1812年宪法是1812年3月19日议会在加的斯市通过的,故又名加的斯宪法。宪法限制了君主制度,宣布国民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赋予由普选产生的一院制的议会以立法职能。议会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获得了广泛的权利。宪法规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税和普遍义务兵役制。各省组织了地方国民军。整个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造。宪法虽然实行了西班牙国内生活的民主化,但保持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1814年,由于反动派取得胜利,加的斯宪法被废除。19世纪上半叶这部宪法是许多欧洲国家自由主义立宪运动的一面旗帜。——414、555。
- 224 “十二月二日政府”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解散立法议会发动政变,在法国建立的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体。关于巴塞罗那事件的消息载于1854年7月19日法国《总汇通报》,该报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正式机关报。——417。
- 225 1848年3月,由纠集在《国民报》周围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操纵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黎筹办了一些国家工场,企图使这些工场的工人成为它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工具。这种分裂工人阶级的企图并未得逞,1848年六月起义期间国家工场的工人成了起义者的核心。——417。
- 226 1854年7月24日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就罗素勋爵提出的拨款提案进行辩论,这是自英国参加俄土战争以来提出的第三个特别拨款提案。马克思在本文中对此事作了报导。这篇文章是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以及马克思本人亲临会场所获得的印象写成的,写作时间是1854年7月25日上午或午后,因为马克思在25日当天下午和晚上又作为旁听者列席了议会会议。
-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7月25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大西洋号轮船于1854年7月26日从利物浦出发,于8月25日抵达纽约。文章在发表之前,《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增加了一句与该报的另一则消息有关的话。文章发表在1854年8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0号上。——420。
- 227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写于1854年7月28日,文章进一步讨论了1854年6月14日签订的奥土条约,同时继续报道了英国议会有关战争问题的辩

论,有关议会辩论的情况马克思在7月25日已开始撰写通讯进行报道(见本卷第420—427页)。由于议会下院于7月24—25日召开会议时马克思本人亲临会场,所以他的报道能够将他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的事实详细地反映出来,这是当时《泰晤士报》的报道未能做到的。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7月28日。文章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号轮船于1854年7月29日从利物浦出发,于8月8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8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2号上。——428。

- 228** 1804—1813年以及1815年起义后,在俄国的支持下,根据1826年的阿克尔曼条约,塞尔维亚被承认为在土耳其统治下的自治公国。塞尔维亚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拥有司法权和自己的学校。阿德里安堡和约(见注18)再次重申了阿克尔曼条约的规定。——430。
- 229** 英国蒸汽巡航舰老虎号在侦察黑海海岸时于1854年5月12日在敖德萨附近触礁;该舰遭到炮击,损伤严重,水兵被俘,舰身被焚毁。——434。
- 23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和第6卷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438。
- 231** 暗指帕麦斯顿在1850年英希两国关于英国籍的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的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1847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焚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将一支舰队派往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1850年6月25日帕麦斯顿在议会的发言为这一行为进行辩解,他把英国国民比作古罗马公民,声称必须维护英国国民的威望。帕麦斯顿当时使用的“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这句话是古罗马的习惯用语,它表明在古罗马时代罗马公民享有特权和崇高的地位。——438。
- 232** 1854年7月27日,马克思写信请求恩格斯“为星期二写点东西”。恩格斯收到信后于7月29日撰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对他曾经作过报道的多瑙河战场上的几次军事行动作了回顾和总结。他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报纸的时事报道。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稿件后,于1854年8月1日又增加了部分内容,他把西班牙起义这一事件(见注199)放在欧洲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分析。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1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联合号轮船于1854年8月2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8月16日抵达纽

约。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0年8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9号上。——441。

- 233 锡克教徒是16世纪在旁遮普地区(印度北部)的一个教派。锡克教徒关于人类平等的教义成了从17世纪末展开的农民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掠夺者的斗争的思想体系。后来,锡克教徒分化出封建的上层,它的代表领导着这个在19世纪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一系列邻近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1845—1846年以及1848—1849年,英国曾两度对锡克教徒进行血腥的侵略战争,结果建立了英国在旁遮普的统治,从而使整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从1811年起,英国断断续续地在开普地区对科萨各部族进行掠夺性的“卡弗尔战争”(卡弗尔人是19世纪通用的对居住在非洲东南部的各部族的统称)。1853年,科萨各部族根据和约被迫割让一部分领土给英国殖民者。——445。

- 234 指1847年11月瑞士爆发的宗德崩得战争和1848年1月意大利的巴勒莫人民起义。参看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05—515页)。——446。

- 235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起义,法国资产阶级关闭了国家工场,致使13 000名工人因失业而没有收入。起义遭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这次起义的失败是欧洲各国反革命进攻的信号。——446。

- 236 在西班牙进步派领袖、原西班牙摄政者(1841—1843年)巴·埃斯帕特罗被任命为西班牙的政府首脑几天之后,于1854年8月4日,马克思撰写了这篇文章。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主要利用了有关埃斯帕特罗的一部传记以及特·麦·休斯《1845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的作品》这两部著作中的有关资料。马克思曾经作过这两本书的摘录。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5日,星期五。实际上,当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应该是8月4日。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8月5日开往哈利法克斯,邮件于8月18日早晨抵达波士顿,再由铁路转运的这艘亚美利加号轮船运送的邮件于当天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文章原稿的结尾处加了一句话:“让我们的读者来判断一下西班牙革命是否会有积极的结果。”马克思认为这句话是“最

愚蠢的”；同时，从马克思 1854 年 10 月 10 日给恩格斯的这封信中还能看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这篇文章的改动很大，删去了不少文字，马克思信中指出：“该报完全删掉了我对一般宪法英雄们所讲的那些俏皮话，因为它嗅出了，在‘蒙克—拉斐德—埃斯帕特罗’三重唱后面隐藏着对高贵的‘华盛顿’的某种影射。”

本文作为社论发表在 1854 年 8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61 号上。——447。

- 237 西班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何·塞·弗洛雷斯的四卷集著作《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于 1843 年在马德里出版。马克思引用的是这部著作的第 2 版；第 2 版的第 1 卷和第 2 卷出版于 1844 年，第 3 卷和第 4 卷出版于 1845 年。——448。
- 238 阿亚库乔（秘鲁）会战是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1810—1826 年）中最大的一次会战，发生在 1824 年 12 月 9 日。在这次会战中，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军队几乎使西班牙军队全军覆没，结果建立了独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并保证了南美洲的独立。——448。
- 239 1839 年 8 月 31 日，卡洛斯派军队总司令马罗托将军和王国军队的统帅埃斯帕特罗在韦尔加拉签订了协议，结束了西班牙内战。当时卡洛斯派的军队被解散，而唐·卡洛斯则在 1839 年 9 月 14 日被迫迁居法国。由于卡洛斯派的卡夫雷拉·格里尼奥将军企图继续顽抗，该派于 1840 年 7 月被彻底击溃。——448。
- 240 马克思显然是指 1849 年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马尔利安尼《现代西班牙政治史》一书。大约是 1854 年 7 月马克思开始作马尔利安尼这本书的笔记，他所作的摘录记在 1854 年的三个笔记本内。——449。
- 241 马克思援引的是特·麦·休斯匿名出版的著作《1845 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的作品》1845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4—15 页的部分内容，后面是马克思引自同书的第 10—16 页以及第 17 页的部分内容。——449。
- 242 温和派（moderados）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一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以及某些官僚集团的利益，由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自由党分裂而成。40—50 年代，该派的领袖之一是 1843 年反革命军事叛乱

(见注 219)的组织者和后来成为西班牙事实上的独裁者的纳尔瓦艾斯将军。在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54 -- 1856 年),温和派与进步派结成联盟,然而却提出了自己的符合君主立宪派利益的纲领性要求,它反对任何资产阶级改良并同最反动的势力妥协。——449、567。

243 指1820年英国发生的国王乔治四世和被控告为对丈夫不忠实的卡罗琳娜王后的离婚案。——454。

244 英国的舰队在波罗的海上对俄国的海上要塞博马尔松德举行进攻的第一批消息传来以后,恩格斯于1854年8月7日撰写了这篇文章,继续探讨了海上舰队和海岸防卫部队交战的前景,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前面的文章中已进行过讨论(见第280—281和305—310页);同时,本文还对成功地攻击博马尔松德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要塞的军事行动进行了预测和分析。1854年8月8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他及时收到了恩格斯写的军事评论,并将他自己当天写好的国际时事述评以及英国对内政策的部分论述与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并在一起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8日,星期二。文章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1854年8月9日从利物浦出发,于8月19日抵达纽约。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恩格斯写的那部分军事评论第一段处加了一句话。这部分作为社论单独发表在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上,标题可能是编辑部加的;而马克思写的内容较丰富,篇幅也较长的那部分则发表在同一天报纸上(见本卷第459—466页)。——456。

245 1854年8月8日马克思将一篇通讯稿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这篇通讯是马克思将自己写的一篇时事述评与恩格斯写的军事评论合并而成的。编辑部收到文章后将马克思写的这部分单独发表了(参看注246)。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报道了多瑙河战场战况的进展;西班牙反革命行动的第一个步骤;丹麦颁布了新宪法;同时还报道了《人民报》刊登的有关厄·琼斯在英国东北部工业区进行宣传旅行的消息。他详细摘录了琼斯在贝克普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琼斯在演说中阐明了宪章派左翼的基本原则和政治要求。本文发表在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上。——459。

- 246 在纳尔瓦埃斯将军专政时期(1843—1854年)曾接连不断组成许多内阁。马克思这里是指由华·弗·帕切科·古铁雷斯·卡德龙领导的反动内阁,该内阁于1847年3月组成,1847年8月解散。——461。
- 247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报道了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经过,从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俄军的这一军事行动。在论及这一问题的同时,马克思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奥地利在东方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上。此外,本文还分析了波兰问题,阐述了在当时的形势下丹麦和瑞典采取的中立政策,并对发生在比利牛斯半岛的革命事件的进展作了评论。
-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11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854年8月12日从利物浦出发,于8月24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6号上。——467。
- 248 “马铃薯战争”是人们对1778—1779年奥普之间争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权的战争的讽刺性称呼,因为这次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都不外是想剥夺对方的粮食储备。
- 马克思在这里把1850年秋天因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发生的奥普冲突称为“马铃薯战争”(参看注201)。——469。
- 249 指1850年10月26—28日华沙会议期间,由俄皇尼古拉一世,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以及普鲁士首相勃兰登堡伯爵共同签署的议定书。——469。
- 250 指俄国军舰弗拉基米尔号在黑海的行动。1854年8月初,弗拉基米尔号从塞瓦斯托波尔驶往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袭击了英国轮船塞克洛普号,击沉了几只土耳其船,它没有遭到英法舰队的反击,安然返回了塞瓦斯托波尔。——471。
- 251 拿破仑第一被推翻以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决定将波兰王国置于沙皇的统治之下,波兰王国的范围是不包括波森、加利西亚公国和自由市克拉科夫在内的波兰领土。1831年沙皇军队镇压了反对民族压迫的11月起义之后,波兰王国在形式上有了自己的宪法,1832年这部宪法又被所谓组织法所取代,而组织法也并未实施。——472。
- 252 1845年,议会批准了关于修改1837年宪法的法律;根据新法律,选举资格

的限制更为苛刻,王权享有任命参议员的无限权利,废除了议会毋须君主的特别准许召开会议的权力,议会所审查的问题其范围由国王确定。——473、483。

- 253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之间的条约签订于1851年3月16日,并于1851年10月经议会批准。按照这个条约,西班牙王国必须从国库开支天主教僧侣的经费,停止没收教会的土地并归还修道院在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34—1843年)被没收的但尚未出卖的土地。——473。

- 254 在1854年8月8日和11日撰写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分析了当时国际上发生的事件(见本卷第459—473页),在本文中马克思对这两篇文章涉及的问题进一步展开了评论。

从1854年8月2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了解到,马克思在本文中之所以报道了柏林法庭中止了对柏林革命者密谋案件的审理是因为他从迈耶尔的信中获知了这一消息。此外,马克思在自己对西班牙革命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伊比利亚半岛革命的进展放在东方冲突这一大背景下来分析。

马克思在撰写本文时主要利用了乌尔卡尔特的著作《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以及他对马尔利安尼《现代西班牙政治史》一书以及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西班牙危机》所作的摘录。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15日,星期二。但是,大概在8月14日马克思就已经写完了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因为他引用了8月14日《总汇通报》上刊载的消息。文章作为邮件随华盛顿号轮船于1854年8月16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8月31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9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2号上。——474。

- 255 所谓“柏林革命者的密谋”是警察当局的挑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2—35页)。——474。

- 256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共产主义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

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3—6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以及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和563—570页)。——475。

- 257 暗指1845年提出的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堂弟列奥波特·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结婚的计划。这个计划将加强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的地位。帕麦斯顿1846年担任外交大臣后积极支持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参看注86)。——477。
- 258 维罗纳会议是1822年10—12月神圣同盟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会议通过了法国对革命的西班牙实行武装干涉以及奥地利继续占领那不勒斯和撒丁王国的决定。会议还谴责了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外来统治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477。
- 259 指美国总统詹·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单方面提出的,反对神圣同盟所谓侵犯拉丁美洲国家企图的咨文。——478、560。
- 260 科布顿是自由贸易派(见注36)的领袖之一,自由贸易派代表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缩减国家的一切非生产性的行政管理费用。他们认为与占领殖民地和管辖殖民地有关的费用也属于此类应缩减的费用。科布顿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英国是一个工业最发达的强国,可以用较廉价的商品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占领任何市场。——479。
- 261 根据1812年西班牙宪法第四章规定,西班牙殖民地的居民除黑人外,均可取得西班牙国籍并享有和西班牙本国居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其中包括选举本地的代表参加议会的权利。制定宪法的西班牙自由派,企图用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表面上的平等来阻挠席卷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战争。——479。
- 262 指1837年宪法和1845年宪法。
1844年间,西班牙议会举行选举,纳尔瓦埃斯将军的拥护者们在选举中获胜。议会于1845年取消了1837年宪法(见注211),重新颁布了一部宪法(见注252),作出了提高选举等级的规定。——481。
- 263 激进派,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步派(见注207)。马克思在这里指第四次

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年)时期的西班牙共和派。——481、568。

- 264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继续对西班牙革命和欧洲战况进行报道。1854年8月12日马德里政府机关报公布了一道法令,法令宣布,定于当年11月8日举行西班牙议会选举。欧洲各重要报刊纷纷转载了这一法令并对此作出评论。马克思借此机会介绍了1837年选举法的内容。

在撰写本文时,马克思利用了特·麦·休斯《1845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的作品》这部著作的材料,1854年5—7月他曾对这本书作过摘录。同时马克思还利用这些摘录的材料,描述了西班牙的游击队的活动以及西班牙国家的财政状况。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18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欧罗巴号轮船于1854年8月19日从利物浦出发,于9月1日抵达波士顿。从马克思在笔记上所作的记载来看,估计《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原稿的部分内容删去,同时加进了英国攻占俄国要塞博马尔松德的消息,而报道这条消息的通讯是太平洋号轮船于9月3日带来的,编辑部把这篇通讯的写作日期确定为1854年8月21日。本文发表在1854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4号上。——483。

- 265 同盟俱乐部是西班牙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产生的民主组织之一。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共和主义者,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非格拉斯、彼-依-马尔格里和奥伦斯等人。这个组织要求实行普选权,主张信仰、出版、集会、请愿自由,以及废除间接税和死刑,同时要求武装全体人民。然而,它所提出的这个纲领完全忽略了土地问题。1854年底随着反动势力的猖獗,俱乐部被封闭(见本卷第586页)。——483、586。

- 266 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除了西班牙革命的俱乐部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联合城市资产阶级、军官和城市下层代表人物的秘密协会。这些协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善于进行秘密活动的组织和分会,对政府和议会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协会中最著名的活动家有列戈-努涅斯、圣米格尔-巴列多和阿尔普恩特等人。——486、572。

- 267 科堡-布拉干萨是葡萄牙的执政王朝。

联合派是指那些主张在比利牛斯半岛建立统一的君主国的人。——486。

- 268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以前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分析了英法联军成功地攻克博马尔松德要塞的战斗,在本文中,恩格斯根据时事报道继续对联军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进行分析。

本文的写作时间是1854年8月21日,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22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4年8月23日从利物浦出发,于9月3日抵达纽约,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4号上,括号里的副标题是该报的编辑所加。——490。

- 269 恩格斯撰写的这篇文章是分析英法联军攻占俄军海上要塞博马尔松德的军事行动的最后一篇。在写作的过程中,恩格斯利用了《泰晤士报》通讯员有关夺取博马尔松德的报道,本文的写作时间是1854年8月28日。马克思于8月29日在这篇文章后面加进了自己撰写的有关奥地利军队开进瓦拉几亚以及英法联军驻扎在瓦尔纳的情况等部分内容。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29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圣路易斯号轮船于1854年8月31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9月12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马克思本人写的那部分内容抽出来,将恩格斯论述夺取博马尔松德的这部分作为该报的社论,发表在1854年9月13日第4182号上,括号里的副标题是该报的编辑所加。——495。

- 270 《革命的西班牙》是马克思在1854年8月25日至12月8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一组文章,共9篇。头7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854年8月25日至11月14日,由该报编辑部分成9篇作为社论发表。其余2篇马克思分别于1854年11月22日和12月8日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见注313)。

马克思当时密切注视着欧洲革命运动的一切征兆,尤其重视1854年夏季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他认为西班牙革命具有特殊性,对于推动欧洲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早在50年代初期,马克思就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殖民地的历史发展状况作了一系列有关著作的摘录。1851年8--9月,他已摘录了威·希·普雷斯科特有关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著作。1852年马克思开始学习西班牙文,为此他曾向威·沃尔夫借用西班牙语语法书;1854年他开始勤奋地钻研西班牙

文学和历史,5--7月间他作了第一本有关西班牙历史的笔记,这类为研究西班牙革命所作的笔记共5册,全部被保存了下来。马克思在撰写《革命的西班牙》这组文章时使用了20余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作者的著作提供的资料。

《革命的西班牙》这组文章第一篇完稿于1854年8月25日,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8月25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8月26日从利物浦出发,于9月7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9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9号上。编辑部在文章发表之前加进了两段话。马克思在1854年10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们收到了关于西班牙的一组文章的第一篇,——这纯粹是一篇论及1808年以前情况的序言——,却以为这就是全部,并给文章加上了一句完全不伦不类、但却是善意的结束语,……。”

第二篇文章完稿于1854年9月5日,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9月5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大西洋号轮船于1854年9月6日从利物浦出发,于9月19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9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2号上。

第三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9月22日,星期五。起初马克思打算把这篇文章交1854年9月20日开往纽约的轮船送走,但是,当他收到恩格斯交北极号轮船于9月20日送走的关于亚洲战争的文章之后,就停止了这篇文章的写作。9月22日文章最后完稿时,他又对一些段落进行了修改,充实了一些他在这期间对西班牙历史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后获得的资料。因此,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作为邮件随加拿大号轮船于1854年9月23日从利物浦出发的,于10月6日抵达纽约。文章发表在1854年10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4号上。

第四篇文章完稿于1854年9月29日,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9月29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欧罗巴号轮船于1854年9月30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0月12日抵达波士顿。《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原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作为这组文章的第四篇发表在1854年10月27日该报第4220号上,第二部分作为第五篇文章发表在1854年10月30日该报第4222号上。

第五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0月20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号轮船于1854年10月2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1月3日

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原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发表前加了一句话，作为这组文章的第六篇发表在1854年11月24日该报第4244号上；第二部分作为这组文章的第七篇发表在1854年11月25日该报第4245号上。

第六篇文章完稿于1854年11月3日，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1月3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854年11月4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1月16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本文作为这一组文章的第八篇发表在1854年12月2日该报第4251号上。

第七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1月14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1854年11月15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1月26日抵达纽约，然而，《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直到1855年3月23日才将本文作为这组文章的第九篇发表在1855年3月23日该报第4345号上。——501。

- 271 从1581年到1640年，葡萄牙由西班牙国王统治，国王委派总督进行管理。总督夫人萨瓦王朝的玛格丽特及其宠臣米格尔·德·瓦斯孔塞卢斯的独裁统治导致了1640年的起义，起义的结果使西班牙的外来统治被推翻，布拉干柴王朝上台执政。——504。
- 272 神圣同盟战争(1520—1522年)是卡斯蒂利亚各城市(自治城市)反对查理一世专制制度的起义。起义最初所提出的主要要求带有争取保持城市的封建特权的性质，从1521年起，由于城市下层群众和部分农民被吸引到运动中来，起义具有反封建的性质。1521年4月24日在比利亚拉尔战役中起义者被击败，他们的失败对巩固专制体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520年7月在阿维拉成立了起义城市的神圣同盟(即洪达)，9月同盟被迫迁往托德西利亚斯，11月又迁往巴利亚多利德，在那里成立了议会。参加议会的有10个城市的代表。——504。
- 273 在马克思摘有西班牙问题的材料的一本笔记本的首页上，他曾亲笔记下了自己研究过的部分著作。以下是经辨认后确定的部分书目：
- (1)帕里什(H.H.)。希腊君主国的外交史。1838年伦敦版。
 - (2)梯叶里(奥·)。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1853年巴黎第2版第2卷。
 - (3)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和趋向的札记。1846年马德里版。

(4) 西班牙革命, 评论。1820—1836年。1836年巴黎版。

(5) 西班牙危机。1823年伦敦第2版。

(6) 1845年西班牙真相。1845年伦敦版第2卷。

(7) 德·马尔利安尼先生。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9年巴塞罗纳版。

(8) 普林西佩。埃斯帕特罗, 他的过去等等, 1848年马德里版。——

505。

274 西班牙地方自治机关(Ayuntamiento), 在推翻阿拉伯人统治, 争取西班牙解放的斗争时期(8—15世纪)曾起过很大的政治作用。在16世纪自治城市起义被镇压以后(见注272), 地方自治机关丧失了其民主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恢复地方自治机关是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民主要求之一。1812年的宪法和1820年议会曾一度规定了恢复地方自治机关。——507。

275 法国的三级会议是中世纪代表各等级的一个机构。1302年起, 会议由国王召集。三级会议由牧师、贵族和市民组成, 商讨国家大事并批准征收特殊的税项。由于专制体制的巩固, 三级会议逐渐丧失其意义, 从1614年开始, 三级会议停止召开。1789年5月三级会议第一次重新开始举行会议, 1789年6月17日根据第三等级代表的决议, 由三级会议的代表组成了国民议会, 国民议会于7月9日宣布改为制宪代表大会, 成为革命的法国最高机构。——507。

276 古法典是对9—13世纪形成的西班牙各地方法的统称, 是规定在自治、司法、课税和兵役等方面给予城市和村镇特殊权利和特权的文献。在西班牙中世纪以及近代的历史上, 古法典作为特有的制订法律依据曾经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限制了封建势力的专横, 但同时又促进了地方割据的发展。——508, 544。

277 指1518年1—2月在巴利亚多利德召开的卡斯蒂利亚议会, 议会旨在宣誓效忠于国王查理一世, 同时接受查理一世遵守法典的誓言。

这里所涉及的时间有误, 实际上, 议会是在1519年查理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并于1520年前往德国即位以前召开的。——508。

278 圣友会(Santa Hermandad), 即神圣的埃尔曼达德, 是1476年由伊萨伯拉

- 一世建立并拥有很大特权的城市联盟组织,由卡斯蒂利亚、莱昂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所有的“埃尔曼达德”联合组成。“圣友会”在从政治上剥夺维护专制制度的上层贵族的权力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5世纪末“圣友会”失去了其重要作用。——508。
- 279 信仰行动是中世纪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公判仪式,教廷圣职部官员和西班牙国王都在隆重的仪仗护侍下亲自参加。异端裁判所法官责令被控人承认错误并公开宣布放弃异端,此行动称为“信仰行动”;如有不肯作此行动者则被宣布“交付世俗政权”处死。事实上,无论作与不作,被控人皆一律判刑,且多以火刑处死。——509、552、584。
- 280 1808年7月西班牙贵族的代表在法国巴约纳城召开会议(巴约纳议会),通过了拿破仑第一为西班牙制订的宪法。根据宪法,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得到了几乎无限的权力。他指定西班牙贵族代表参加新建立的参议院并任命了近半数的议会议员。根据宪法规定,实行公开审讯,废除刑讯,取消国内关税。天主教被承认为唯一的国教。这部使波拿巴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得到巩固的巴约纳宪法,促使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解放斗争更加激烈,资产阶级革命(1808—1814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11。
- 281 即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513。
- 282 参看《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第246—247页。这里所涉及的材料引自该书的出版者迪卡斯所作的注释。引文部分,即《条约》的第一条及第二条引自该书第247页。——514。
- 283 指西班牙参加第一次反共和制法国的同盟战争(1793—1795年)。1793年西班牙军队在几次获胜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西班牙因而被迫于1795年7月在巴塞尔同法国签订了单独和约。——514。
- 284 卡尔尼塞罗《拿破仑——欧洲真正的唐·吉珂德,对拿破仑和他的哥哥约瑟夫的各种敕令的批判的、爱国的、讽刺的评论,共分两部分,五十章,一个热爱祖国的西班牙人的著作》1813年马德里版第1—6卷;《评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的历史》1814—1815年马德里版第1—4卷;《合理地恢复宗教裁判所和驳廖伦特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事记〉一书》

1816年马德里版第1、2卷。——516。

- 285 1808年8月毕尔巴鄂人民举行起义反对法国占领者。起义遭到梅尔兰将军的残酷镇压,他的军队曾以强攻夺下了这个城市。——521。
- 286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于1808年9月27日--10月14日在爱尔福特会晤。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的国王和其他许多讨好拿破仑的德国君主出席了谈判期间举行的庆祝会。——522。
- 287 这里指类似法国国民公会的代表会议。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之后建立的,由全国所有男性居民(家仆除外)选举产生,共有750名代表。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国民公会废除了法国的封建关系,并采用革命的恐怖政策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公会变成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1795年10月25日国民公会被解散。——523。
- 288 1767年耶稣会士被驱逐出西班牙;这个决定是根据西班牙王政会议检察长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建议而实施的。——524。
- 289 指14—15世纪卡斯蒂利亚国王的统治:亨利二世(1369—1379年);胡安一世(1379—1390年);亨利三世(1390—1406年)和胡安二世(1406—1454年)。——527。
- 290 指13世纪在卡斯蒂里亚和莱昂制订并于1348年起生效的西班牙法典的有关规定;起初这部法典与古法典(见注276)并存,直到16—17世纪才起主导作用。——528。
- 291 公安委员会是1793年4月6日由法国国民公会成立的。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公安委员会是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委员会丧失了自己的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532、586。
- 292 718年西班牙军队在阿斯图里亚斯山区的卡瓦丹加山谷打败了阿拉伯人。这一胜利的结果,使阿斯里图里亚斯山区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独立国家,它成为反对阿拉伯占领者的堡垒之一。

在索夫拉韦,即阿拉贡北部山区的一块不大的地方,继阿斯图里亚斯之后不久,也形成了一个反抗阿拉伯占领者的中心。——539。

- 293 Mita 指强迫印第安人到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金矿和银矿手工业工场以及建筑工地劳动。

Repartimiento 指把印第安人和廉价的劳动力分配给殖民者,让其从事农业或采矿劳动。——544。

- 294 1791 年的法国宪法是资产阶级制宪议会通过的,它确立了法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保证了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它给予国王全部行政权和否决权;它把公民划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这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居民的政治权利。由于 1792 年 8 月 10 日的人民起义推翻了王权,这部宪法被废除。——544。

- 295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以后,在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召开了国民公会,制定了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是 18—19 世纪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一部宪法。1793 年 4 月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被作为这部宪法的导言。这里所指的是导言第 35 条的内容。这一条规定:“如果政府破坏人民的权利,起义即为全体人民和任何一部分人民的最神圣的权利和最必要的义务。”——544。

- 296 奴才派(serviles)是对西班牙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的称呼。这个集团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808—1814 年)期间反对任何资产阶级的改革并维护专制的君主政体;以后,奴才派成为斐迪南七世的宫廷权奸,而在斐迪南七世的晚年,该派又把自己的利益和斐迪南七世的弟弟唐·卡洛斯结合在一起。

自由派(Liberales)代表西班牙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提出以 1812 年宪法(见注 223)为纲领。自由派采取的政策的主旨是铲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赖以产生的经济的、社会的以及体制上的基础。

“美洲派”(Americans)是对代表西班牙殖民地进入制宪议会的议员的称呼。“美洲派”在议会里时而支持奴才派,时而支持自由派。——550。

- 297 特伦托公会议是 1545—1563 年在特伦托和博洛尼亚召开的天主教大会。会议谴责新教并通过一系列有关天主教会决定,其中包括宣布教皇的权力是会议的最高权力并加强主教的权力。这个会议的决定成为反对宗

- 教改革运动的封建的天主教反动派的拥护者的纲领。会议产生的主要后果是对异教徒和持自由思想的人进行迫害,并强化了教会的审查作用。从1559年起公布了禁书的目录,1571年设立了禁书目录审查会议,在梵蒂冈负责对禁书进行审查。——550。
- 298 那不勒斯的流浪汉是对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称呼,他们经常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552。
- 299 1814年3月22日斐迪南七世回到西班牙。1814年5月2日斐迪南七世发布了一项宣言,废除了1812年宪法,消灭了1808—1814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成果;革命志士被投入监狱,其中许多人被处死。——559。
- 300 1812年7月20日,俄国政府和加的斯议会代表在大卢基就俄国和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的友好同盟关系以及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问题签订了一个条约。俄国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从而也就承认了加的斯议会和它制订的宪法的合法性。——559。
- 301 马松阁派指以阿图瓦为首的极端反动派。马松阁是土伊勒里宫的建筑之一,1815年复辟以后是阿图瓦伯爵的府邸。——566
- 302 “信军”是天主教专制主义集团(阿波斯托尔教派)所组织的部队的称号,这支部队1822年在卡泰罗尼亚、纳瓦拉和比斯开以“信仰战争”为口号发动反对革命政府的武装叛乱,并将一大部分因循守旧的农民动员起来投入反革命的行动。1823年,法国武装干涉时期,“信军”站在干涉者方面作战。——568、581。
- 303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年10月5日和6日从巴黎向凡尔赛进发的革命人民群众与国王近卫军发生了流血冲突,迫使路易十六返回巴黎,从而粉碎了宫廷在凡尔赛准备的反制宪议会的阴谋。——569。
- 304 1820年11月19日及1821年1月26日至5月12日在神圣同盟召开的特罗保会议和莱巴赫会议上,经梅特涅公爵提议,会议作出决定,通过军事干涉来镇压两个西西里岛王国自由派的资产阶级革命,于是1821年3月23日奥地利派遣军队占领了那不勒斯。——569。
- 305 1815年4月国王费南德七世为了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曾派遣远

- 征军前往南美,远征军首先对南美洲北部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1821年底之前,这支远征军一直由莫里略将军统率。——570。
- 306** 1820年7月13日斐迪南一世(1751—1825)曾发誓要以西班牙1812年宪法为依据为两个西西里岛王国制订一部宪法,自由派的资产阶级革命遭到镇压以后,这部宪法宣告失效。——571。
- 307** 空论派指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弗·皮·吉·基佐为主要代表的“基佐学派”,其代表人物还有雅·尼·奥·梯叶里(1795—1856)、弗·奥·玛·米涅(1796—1884)、路·阿·梯也尔(1797—1877)以及茹·米希勒,他们揭示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在许多著作中阐述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参看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约·魏德迈的信)。马克思于1843年至1844年第一次在巴黎居留期间就对基佐和梯叶里的著作产生了兴趣。1850年,他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了一篇详细的评论文章《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61—266页),1854年马克思还对梯叶里的著作《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况》作了大量的摘录(见1854年6月2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571。
- 308** 本文是马克思撰写的《西班牙革命》一组文章的第三篇的草稿。写作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罗·骚塞的《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和威·沃尔顿的《西班牙革命》,马克思曾于1854年8—9月作过这两部著作的摘录。这份初稿有多处作过改动和增删。马克思最初打算将《西班牙革命》的第三篇文章交1854年9月20日启程的北极号轮船送走,因此,可以推断这份初稿在9月19日已经撰写完毕。马克思在收到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关于亚洲战争”的文章之后,没有寄出《西班牙革命》的第三篇文章,而是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交9月20日启程的北极号轮船送走,这艘轮船在驶往纽约的途中遇险,于9月27日沉没。9月22日,《西班牙革命》第三篇文章最后脱稿时,马克思对初稿的部分文字进行了加工处理。此外,还将文章的个别段落加进了《西班牙革命》的第四篇文章,这第四篇文章是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分成两部分发表的。——574。
- 309** 在拜伦会战中,由卡斯塔尼奥斯·阿拉贡尼将军率领的西班牙军队击败了杜邦将军和韦德尔将军指挥的由14 000名士兵组成的法国军队,并迫使

其于1808年7月22日投降。这是拿破仑军队第一次受重挫,对西班牙以及后来其他欧洲各国抗击拿破仑的斗争起了极大的精神上的作用。马克思对拜伦会战在1808—1814年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了评价,详见本卷519—520页。——574。

- 310 在建立中央洪达之前,塞维利亚洪达名义上是最高洪达。——574。
- 311 中央洪达是由35名代表组成的,西班牙本土的代表34名,加那利群岛的代表1名。——574。
- 312 军区司令官是西班牙16世纪制定的军队最高职称。军区司令官掌握州、区或国家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权力。——578。
- 313 马克思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组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文章,共9篇。这组文章中有7篇被编辑部分成9篇发表,还有两篇未公开发表过,本文即是其中一篇文章的片断。

1854年11月22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只要你有可能,就请在星期五把文章寄出,因为星期二我写了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在目前情况下一星期写两次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可以证实,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完稿于1854年11月21日。马克思本人在笔记本上对本文注明的日期是:11月21日,星期二;对另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注明的日期是:12月8日,星期五。从笔记本上对文章内容的记载情况来看,本文仅是当时寄出的文章的一部分,写作时间大概在1854年11月14—21日之间,写作时利用的主要是马克思有关西班牙历史的第4和第5本笔记摘录的资料。

本文作为邮件随联合号轮船于1854年11月22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12月9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其草稿片断被保存下来了。——580。

- 314 第二次加的斯远征指1823年8月9日列戈-涅努斯的进军。1823年8月,列戈-涅努斯从被法军包围的加的斯到达马拉加,打算率领一支由4000名爱国者组成的部队从这里突围前往卡泰罗尼亚,当时埃斯波斯-米纳将军正在那里和干涉者进行顽强的斗争。列戈-涅努斯试图将已经停止抵抗的巴列斯特罗斯军队发动起来归并于自己手下,但未能成功,于是,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向卡塔赫纳且战且走。在赫雷斯城下,他的部队

被兵力强大得多的法军击溃；9月15日，列戈·涅努斯被俘。

第一次加的斯远征是列戈·涅努斯在1820年1月27日至3月13日的进军。这次进军尽管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却成了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见本卷第552—558页）。——580。

- 315 康姆尼罗斯是对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建立的西班牙的秘密政治联盟（西班牙康姆尼罗斯联盟）成员的称呼。这一组织共有7万人，他们是1821年由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激进派，尽管其中许多人来自社会较高的阶层，但是康姆尼罗斯却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益。康姆尼罗斯主张与反革命进行最坚决的斗争，1822年7月皇家卫队的起义被镇压以后，康姆尼罗斯在司法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强烈要求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的清算。在革命被镇压之后，康姆尼罗斯遭到最残酷的迫害并停止了活动。——581。
- 316 指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在1820—1823年革命被镇压后在西班牙的复辟。斐迪南七世政权的第一次复辟是在1814年拿破仑第一失败之后。——583。
- 317 指1833—1840年的卡洛斯派战争和1834—184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参看注219、222）。——583。
- 318 1832年9月，身患重病的斐迪南七世撤销了1830年关于西班牙王位必须由其幼女伊萨伯拉继承的敕令；斐迪南病愈后，又恢复了继承王位的权利，他的这种作法完全符合1789年卡洛斯四世作出的关于取消所谓萨利继承法的决定。萨利继承法于1713年由菲力浦五世实施，此项法律规定，王位继承者只能从男性继承人中产生。斐迪南七世这种恢复其幼女继承权的作法使支持他弟弟唐·卡洛斯的奴才派（见注296）的期望落空。——584。
- 319 由于报纸报道了通过革命掌握政权的西班牙进步派领袖埃斯帕特罗的政府采取了反革命行动这一消息，马克思撰写了这篇文章。《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对这一事件大加赞扬，费·冯·普尔斯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声称，西班牙革命已经结束。马克思在本文中则作出了与这类论调完全不同的评价。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9月1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

件随尼亚加拉号轮船于1854年9月2日从利物浦出发,于9月12日抵达哈利法克斯,再转铁路运输,于9月15日抵达纽约。本文发表在1854年9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85号上。——585。

320 1854年8月21日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签署实施了一项法律,使1837年10月17日的出版法,包括1842年7月9日的补充法重新生效。1837年的出版法取消了对出版物的初步审查规定,却要求支付很高的保证金,并规定作者严格对自己的出版物负责。以后通过的几项法律对1837年这一法令作了补充,使其更加严厉苛刻。1852年,初步审查规定重新实施,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出版自由事实上重新被取消。这里可能指的是1852年的法律,而不是1842年7月9日的法律。——585、601。

321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对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东方冲突中采取的外交策略的新步骤作了评论;他还根据当时各报的报道,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了同盟国派兵远征克里木的种种准备工作;本文还全文转载了普鲁士致俄国照会的内容,从这里可以间接地看出,马克思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强调指出柏林内阁采取的亲俄的中立政策上。马克思曾在许多文章里分析过普鲁士在东方冲突问题上采取的这种立场。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9月8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号轮船于1854年9月9日从利物浦出发,于9月21日抵达纽约。从笔记本上记载的文章内容来看,有关论述西班牙的那部分文字可能在发表前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抽出来了。本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9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0号上。——592。

322 指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伯爵1854年8月26日致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哥尔查科夫公爵以及1854年8月26日致俄国驻柏林公使布德贝格男爵的紧急函件。——592。

323 指1854年4月9日,英国、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在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议定书,参看注154。——593。

324 指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伯爵1854年6月29日致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哥尔查科夫公爵以及1854年6月30日致俄国驻柏林公使布德贝格男爵的紧急函件(参看注212)。——593。

325 1854年7月22日法国和英国政府在内容相同的照会中拟定了四点作为

俄国和土耳其今后和谈的依据。在这份提交维也纳会议的四点议程中,除了要求对欧洲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加以保证之外,还要求保证船只在多瑙河口自由航行以及复审 1841 年 7 月 13 日关于黑海海峡的伦敦公约,同时表示打算在不侵犯苏丹主权的情况下,共同促进土耳其基督教徒的解放。——593。

- 326 在这篇通讯中,马克思对有关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措施的报道进行了评述,马克思的观点与报界的舆论截然不同,那些报道认为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革命是外国的密谋者们一手煽动起来的。此外,马克思还报道了马志尼被捕的消息;分析了帕维亚、特雷维索,的里雅斯特以及瓦拉几亚的财政状况,并继续讨论了在前面的通讯里已经着手讨论的希腊的政治局势。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9月12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海尔曼号轮船于1854年9月13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9月29日抵达纽约,发表在1854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7号上。——598。

- 327 1852年1月22日路易·波拿巴下令没收奥尔良王族的财产。——599。

- 328 马克思把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1556—1598),菲力浦三世(1598—1621),菲力浦四世(1621—1665)的统治时期统称为菲力浦时代。——601。

- 329 在获悉联合舰队的部分兵力离开瓦尔纳的消息以后,马克思撰写了这篇通讯。马克思根据法国和英国报纸的时事报道提供的素材讨论了即将登陆的远征军获得成功的前景;分析了英法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上的行动,以及奥地利军队进入瓦拉几亚之后多瑙河两公国的局势。1854年9月9日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贸易和航运报告以表明实行自由贸易的优点,马克思在本文中引用了这一报告的内容,阐述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9月15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9月16日从利物浦出发,于9月28日抵达哈利法克斯,发表在1854年10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98号上。——605。

- 330 指1842年在英国实行的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的税率改革。这次改革降低

了粮食和许多其他进口商品的关税,但是提高了所得税,以此作为对国库损失的补偿。——614。

- 331 1854年9月22日,马克思写信要求恩格斯写一篇通讯,交9月27日开往纽约的轮船送走。

西欧各报刊载了远征克里木的英法联军登陆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联系英法联军的这一行动阐述了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的经过及其政治背景。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9月26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联合号轮船于1854年9月27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10月11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原稿中插入了一句话,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10月14日该报第4209号上。——616。

- 332 1815年6月16日,拿破仑的军队和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在利尼(比利时境内)附近进行了会战。普军虽然战败,但布吕歇尔率领他的军队摆脱了法军的追击,与在滑铁卢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法军本已胜利在望,但因普军的来到终于失败。——618。

- 333 指埃斯皮纳斯将军在路易·波拿巴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851年12月1—2日夜晩,埃斯皮纳斯指挥的团的一个营奉命担任法国国民议会的警卫;埃斯皮纳斯因接受了波拿巴主义者的贿赂,于12月2日派兵占领了国民议会开会的大厦,从而促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获得成功。——618。

- 334 指法国在19世纪30—40年代为征服阿尔及利亚以及镇压阿卜杜尔·卡迪尔领导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而进行的殖民战争。——621。

- 335 朱阿夫兵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一支殖民地部队,起初由当地人和法国人组成,后来全部由法国人组成,但仍保持原有的东方服饰。——621、685。

- 336 指路易·波拿巴企图在1840年8月6日发动政变。他乘波拿巴主义情绪在法国抬头之机,于8月5日率领一伙阴谋家在布洛涅附近的海滨登陆,路易·波拿巴本人身着拿破仑第一的服装于次日潜入布洛涅,企图在当地守军中煽起暴动。路易·波拿巴的这一政变企图未能得逞,他被判处

无期徒刑,但是,1846年5月25日他化装成泥瓦匠逃到了英国。——623。

- 337 指第五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战争期间英国舰队于1809年远征斯海尔德河口。英军在占领瓦尔赫伦岛以后,未能扩大战果,4万名登陆部队因饥饿和疾病损失了1万人左右,因而被迫于1809年12月从瓦尔赫伦岛撤退。——625。

- 338 1854年10月初西欧各国纷纷传来所谓攻占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消息,这在后来被证明是耸人听闻的谣传。恩格斯就这一事件撰写了这篇通讯,将当时公开报道的各种消息进行了比较,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写于1854年10月2日。马克思根据10月3日晨报的消息,对恩格斯的文​​章作了补充。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0月3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波罗的海号轮船于1854年10月4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0月16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原稿上多处插入了部分文字,并作为该报社论发表在1854年10月17日的第4211号上。——626。

- 339 俄国罗多芒特是对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亚·谢·缅施科夫讽刺性的称呼。罗多芒特是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一诗中的主人公之一,善于吹牛。——630。

- 340 1854年10月5日,英国政府机关报《官报》专门出版了号外对所谓联军攻占了俄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辟谣。恩格斯针对这一谣传于1854年10月5日当天撰写了这篇文章,事实上,恩格斯在前面的文章里就已表示了对这一消息的怀疑,马克思对本文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0月6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10月7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0月20日抵达纽约。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将这篇文章分成了两部分,在现有的这一部分中插入了一句话,并作为该报社论发表在1854年10月21日第4215号上;而另一部分则作为该报的通讯发表在同一天的报纸上。——633。

- 341 “捉住鞑靼人!”是一句英国谚语,意为“遭遇顽敌”,“强中更有强中手”,这里转义是“找错人”、“碰壁”的意思。因鞑靼人善骑且熟悉地形,常被土耳

其人雇来充当信使。鞑靼人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传递了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虚假消息,此后鞑靼人传递的消息就被看成是不可靠的、不为人所相信的消息。——633。

- 342 本文与前一篇文章(见本卷第 634—638 页)原是马克思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一篇通讯,马克思于 1854 年 10 月 6 日将文章送交阿非利加号轮船运走。编辑部将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为社论发表,另一部分,也就是本文作为通讯发表在同一天报纸上。参看注 340。——638。
- 343 指 1852 年 5 月 8 日由俄、奥、英、法、普、瑞典等国代表和丹麦代表共同签订的关于丹麦君主国的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条约的基础是 1850 年 7 月 4 日上述伦敦会议参加国(除普鲁士以外)通过的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丹麦王室的领地(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在内)的不可分割的原则。伦敦议定书中提到,俄国皇帝(作为 1762 年曾经以彼得三世这个名字统治过俄国的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的卡尔·彼得·乌尔利希公爵的后裔)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尼古拉一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让位给被宣布为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蒂安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以后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不复存在时要求继承丹麦王位提供了口实。——639。
- 344 指 1840 年 7 月 15 日由英、俄、奥、普四国签订的关于各国对土耳其苏丹实行军事援助的若干措施的伦敦公约(参看注 49)。——640。
- 345 指拿破仑第三于 1854 年 10 月 3 日发布的命令。按照这个命令,因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群众的革命活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巴尔贝斯(从 1850 年起他就被关入贝勒岛上的监狱)被无条件释放。发布这个命令的理由是截获了巴尔贝斯在 1854 年 9 月 18 日所写的一封私人信件,巴尔贝斯在信中表示欢迎对俄国作战并“为了文明”而祝愿法军胜利。1854 年 10 月 5 日的《总汇通报》刊登了这项命令的全文和信件的内容摘要。巴尔贝斯获释后在 1854 年 10 月 11 日给《总汇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他承认那封信确实是他写的,同时声称“法兰西的伟大始终是他的信仰”,但是又说他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波拿巴政体的敌人。此信曾载于民主派的报刊,1853—1855 年由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先后在泽西岛和伦敦出版的周报《人·世界民主主义报》也于

1854年10月18日刊载了此信。此后不久巴尔贝斯离开法国,不再参加政治活动。——641。

346 指1849年6月13日的事件。这一天反政府的和平示威游行被驱散;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报刊编辑部出其不意地横遭搜查,编辑部的负责人被拘留。——641。

347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增加了一段文字:“关于一支美国舰队,即两艘巡航舰、三艘轻巡航舰和两艘蒸汽舰为了赢得对美国的让步而进入萨马纳海湾,以及关于另一支舰队从纽约开赴格雷敦的消息是英国人从牙买加岛获悉并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200名被囚禁的俄国军官、兵士和他们的家眷被押送到德文郡的一个监狱。海军陆战队的兵士,不论在海上或陆上,现在都允许留胡子。女王和她的宫廷现在在苏格兰群山中的巴尔莫勒尔。10月4日特派信使把一份关于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电报送到巴尔莫勒尔,这个消息轰动了王宫。在博马尔松德附近缴获的可供2000名兵士使用的武器已交到伦敦塔军火库。”——642。

348 在这篇通讯中,恩格斯继续分析了在前面的两篇文章里已经分析过的阿利马河会战的情况。促使恩格斯撰写本文的主要原因是报刊上发布了有关会战的官方消息,这些消息为恩格斯全面地描述战争的过程提供了十分翔实的素材。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1854年10月9日。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后称赞这篇文章是“出色而有充分论据的批判性文章”。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0月10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华盛顿号轮船于1854年10月11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10月24日晚抵达桑迪胡克。《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本文发表时加进了几句话。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该报1854年10月26日的第4219号上。——643。

349 英籍军团是西班牙卡洛斯派战争期间(见注219)在英国招募的支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政府的部队的名称。这支部队约有1万人,在伊文思将军的指挥下参加了西班牙1835—1837年的军事行动。——644。

350 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1848年4月和5月皮埃蒙特军队和奥地利军队

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战斗。——645。

- 351 1813年5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和俄普联军之间在吕岑(萨克森地区)进行了会战;同年5月20—21日联军和法军在包岑(萨克森地区)进行了会战。在这两次会战中,拿破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迫使俄普联军退却。尽管拿破仑一世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然而在战略上并未获胜。——647。
- 352 1813年8月26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在布吕歇尔指挥下,在卡茨巴赫河(西里西亚的一条河)会战中采取巧妙的策略使法军在遭受重创以后被迫仓皇退却。——647、679。
- 353 阿利马河会战以后,舆论界越来越关注俄军兵力的准确状况,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于1854年10月16日撰写了这篇文章,分析了俄国陆军的兵力部署及其实力的现状。早在当年4月恩格斯就为《每日新闻》撰写了《俄国军队》一文,当时这家报纸未将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恩格斯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撰写本篇通讯的。此外,恩格斯在叙述俄国陆军的兵力调动以及分布情况时还利用了1854年间他从各种报刊上搜集整理的详细材料。马克思认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对俄国的兵力作了令人叹服的计算”,同时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草稿上对有关英法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这一军事行动作了一些补充。
-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0月17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4年10月18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0月30日抵达纽约。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10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23号上。——650。
- 354 恩格斯在这里采用这两个讽刺性的绰号来称呼英法两国庸俗的市民阶层。——650。
- 355 1854年10月25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星期五以前能赶出一篇军事文章”。恩格斯于1854年10月30日写完了这篇文章,第一次详细地讨论了英法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过程和前景。阿利马河会战以后,尽管欧洲各主要城市纷纷发布消息指出所谓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一事实属谣传,但是,英国报刊仍然预料俄国的这一要塞将很快被攻克。恩格斯的态度则不同,他以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目击

者,英国军官迈·安·比达尔夫以及《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所描述的事实,分析了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的现状以及首次对它进行围攻的经过。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0月31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大西洋号轮船于1854年11月1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1月12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本文发表之前作过两处改动,将它作为社论发表在該报1854年11月15日第4236号上。——656。

- 356 兰开斯特炮是以其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的英国8英寸椭圆形螺旋膛火炮,首次被英国人用于克里木战争,后来未被广泛使用。——659。

- 357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对克里木战区所进行的战争作了阶段性的总结。在撰写本文时,恩格斯利用了俄军总司令以及《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报告所提供的材料。马克思在收到恩格斯的稿件后称赞这篇“文章很出色”。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1月10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加拿大号轮船于1854年11月11日从利物浦出发,由于轮船在途中与另一艘船发生相撞事件,直到11月22日才抵达哈利法克斯。因为延误了发稿的时间,因此《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恩格斯的原稿开头和中间部分加进了欧洲报刊最新报道的几段文字。本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1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46号上。——662。

- 358 这里列举的是几次最激烈的会战,在这些会战中俄国军队表现了高度的勇猛和顽强。

1758年8月25日俄普两军之间展开的普恩多夫会战是七年战争(见注91)中的大会战之一。普军的多次进攻都因俄军的顽强反击而失败。尽管双方损失惨重,但却难分胜负。

1807年2月7—8日法国军队和普俄联军之间的普鲁士埃劳(东普鲁士)会战是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最严酷的会战之一。拿破仑虽然损失惨重,但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拿破仑把俄军阻截在俄国边境的企图未能成功。

1812年9月7日的博罗季诺会战是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会战中拿破仑军队损失一半左右,俄军损失三分之一以上,尽管俄军当时被迫放弃了莫斯科,但会战结果却使战争向有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并为拿破仑军队的失败准备了条件。——664。

- 359 1854年11月10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请他自己决定写一篇文章交11月

14日或18日开往纽约的轮船寄走。恩格斯于11月16日写好了这篇描述发生在巴拉克拉瓦的战斗的文章。在写作的过程中,恩格斯主要利用的是他拟写的一份内容丰富的初稿,在这份初稿中,恩格斯将参加战斗的指挥官们所作的官方报告进行了对比,将参战的兵力列在一份表格里,并对战斗的各次行动作了一张示意图。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1月17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阿非利加号轮船于1854年11月18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1月29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原稿上增加了部分文字。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11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49号上。——671。

- 360 1854年11月22日马克思写信请求恩格斯:“只要有可能,就请在星期五把文章寄出,因为星期二我写了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在目前情况下一个星期写两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的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放过一篇文章,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好的。”大概于11月27日恩格斯才把文章写好。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恩格斯主要利用了11月23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一篇报道。马克思在收到本文时立即回信给恩格斯,信中说:“由于不细心,你为星期二写的出色文章中缺了头两页。但主要内容都包括在后五页中,这样,仅仅是在文风方面有所损失。”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1月28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太平洋号轮船于1854年11月29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2月13日上午抵达桑迪胡克。由于文章原稿缺少头两页,估计开头部分的文字是马克思写的,编辑部在收到稿件后曾作过改动。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1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61号上。——682。

- 361 阿尔布埃拉会战是1811年5月16日在西班牙的阿尔布埃拉由贝雷斯福德将军指挥的英国、西班牙及葡萄牙联军与由苏尔特元帅率领的法国军队之间展开的会战。在威灵顿公爵的统率下联军围攻了被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围攻一直延续到6月初,由于伤亡惨重,苏尔特元帅率领的法军前去增援。这次会战以拿破仑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684。

- 362 指1798—1801年法国军队远征埃及期间一次战斗的情景。1798年7月21日拿破仑在金字塔附近与埃及的马木留克兵交战。拿破仑将其军队编成方队,把敌方置于两处火力中间,以这种方式几乎全歼了敌军的兵

力。——686。

- 363 恩格斯在前一篇文章里描述了因克尔曼会战,本文通过分析这期间施缅科夫公爵、拉格伦勋爵以及康罗贝尔将军的官方报告对这一会战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1854年11月13--14日由于海上风暴的袭击对运输船只起了相当大的破坏作用,恩格斯因此在文章中分析了英法两国派往克里木的远征军在军需和给养方面遇到的重重困难。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完稿于12月4日,马克思于12月5日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作了补充,他还根据《泰晤士报》报道的有关素材,加进了法国、英国和奥地利于12月2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内容以及海上风暴造成危害的详细情况。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2月5日,星期二。文章作为邮件随华盛顿号轮船于12月6日从南安普敦出发,于12月24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文中加了一句话,并对最后一段文字作了删节。本文作为社论发表在该报1854年12月27日第4272号上。——688。

- 364 纳尔瓦会战是北方战争(1700—1721年)期间的第一次战役,于1700年11月30日在纳尔瓦进行,交战的双方是彼得大帝的俄国军队和查理十二的瑞典军队。瑞典军队袭击了俄军并攻占了俄军带有防御工事的军营。——689。

- 365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奥军队(第三次同盟)和法军之间在奥斯特利茨进行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

普鲁士埃劳会战,见注358。——689。

- 366 1854年12月2日英国、法国、奥地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三国不得单独与俄国进行谈判,不允许俄军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同俄国谈判的基础应当是四项条款。——694。

- 367 1854年12月8日,马克思请求恩格斯撰写一篇通讯,交12月13日开往纽约的轮船送走。他在信中写道:“过一个星期,我要写关于议会的东西。还是一定请你在星期二之前把文章寄给我,以便在星期五(那时我将出期票)之前我能指望再得到两英镑。在这之前我已经好几次没有寄文章了。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写写奥地利的兵力。”恩格斯直到12月14

目才把文章写好,他从战略上分析了东方冲突的前景。在写作的过程中,恩格斯利用了1854年在莱比锡匿名出版的《从历史和战略的角度看俄国……》等著作提供的材料。马克思于1854年12月15日收到恩格斯这篇文章后又作了一些补充,对议会就法国、英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展开辩论一事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2月15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854年12月16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2月31日抵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在发表之前在原稿上加了一句话。

马克思在信中提议写的有关奥地利兵力的文章恩格斯是在一周后完成的。

本文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6号上。——696。

- 368** 1854年12月2日是路易·波拿巴政变三周年和他称帝的二周年;这一天也正是拿破仑·波拿巴宣布为法国皇帝的纪念日(1804年12月2日)和同它重日的奥斯特利茨会战纪念日(1805年12月2日)。——696。

- 369** 本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提议下撰写的。奥地利与西方强国结成联盟之后,舆论界关注的焦点又重新集中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即奥地利政府是否真正参加对俄战争或者仍然固守其反对俄国的“中立”立场。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在前面的文章里从对外政策的角度作了初步探讨。

恩格斯于1854年12月21日写完这篇文章。早在1851年恩格斯就在他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49—679页)一文中谈到了奥地利军队的编制和实际的兵力。恩格斯所具备的有关当时奥地利军队指挥调配以及作战艺术的知识得益于他对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史所作的研究。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2月22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加拿大号轮船于1854年12月23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855年1月3日抵达哈利法克斯。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55年1月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81号上。——704。

- 370** 这是一篇关于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家族史概况的文章,估计是在马克思生病期间,委托威·皮佩尔所写,完稿于1854年1月5日。这篇文章写作的政治背景是当时掀起了一场反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

特亲王的运动(参看本卷第42—46页《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一文)。

这篇文章在笔记本上注明的日期是:1月6日,星期五。文章作为邮件随尼亚加拉号轮船于1854年1月7日从利物浦出发,于1月23日抵达哈利法克斯,作为社论发表在1854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1号上。——711。

371 指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12。

372 指1848—1850年期间德国和丹麦之间的战争。——712。

373 厄·琼斯这篇文章写作的日期大约是1854年4月21日,写作过程中,琼斯曾利用了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通讯(见本卷第245—248页《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实际上琼斯在一系列国际政治问题上表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关于土耳其对英国和法国的态度这一问题上,他所阐述的观点与马克思在那篇通讯中所表述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此外,琼斯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俄国的军队由于渡过了多瑙河并进入了多布罗加因而巩固了自己的防御地位,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有所不同。——714。

374 1854年10月,马克思曾告诉恩格斯,他当时正潜心研究一个一直被很多人所忽视的事实,即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英国大臣们,即便在过去也从事了与他们在官方场合下所主张的政策背道而驰的秘密外交活动。马克思在1854年10月1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从以下摘自巴黎外交部档案文件中有关七年战争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英国大臣们即使在打仗期间,以及在有关战争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同敌人勾结在一起的。”可以肯定,马克思把对恩格斯讲述的这些材料也提供给了琼斯。琼斯利用这些材料并综合了恩格斯论述阿利马河会战的一些观点写成了文章,于1854年10月28日发表在宪章派的周报《人民报》上。文章中有几处内容不大确切,文章发表以后,有一位读者曾询问揭露这些事实的材料来源,报纸编辑部在1854年11月18日《人民报》第133号的短评中仅仅重复了已经发表过的内容,由此可见,琼斯显然不知道材料的原始出处,而那些材料实际上都是从马克思那里获知的。——718。

- 375 1768—1772年间,英国著名的政论家菲·弗兰西斯以“尤尼乌斯”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信件,以大量的事实无情地抨击了英国政府、英国议会以及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明争暗斗的种种伎俩,1772年尤尼乌斯的信件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作者在书中除了要求政治制度民主化之外,还要求恢复英国政论家约·威尔克斯应有的权利。威尔克斯于1763年在其出版的报纸《北不列颠人》上抨击乔治三世的议会演说,因而被逐出下院并遭逮捕,以后又不得不逃往法国。1768年回国后,威尔克斯曾多次参加竞选并入选,但每次政府事后都声称威尔克斯的入选无效,直到1774年,第五次入选时才得以进入议会。“威尔克斯案件”因之而成为测定英国日益尖锐的政治危机的标尺。——719。
- 376 1854年3月6—18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工人议会,会上推选出了制订工人议会行动纲领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厄·琼斯、詹·芬伦、詹·威廉斯、阿·鲁宾逊及詹·布莱组成。3月8日,委员会将草案的第一部分(包括三点内容)提交工人议会讨论,其余的部分(总计五点)将在协商会议上提交咨议会讨论。“工人议会纲领”于1854年3月18日经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并以全体代表(也包括未在场的名誉代表)的名义于1854年4月1日发表在《人民报》上。马克思认为制订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以名誉代表的身分在纲领上签了字。估计琼斯曾将纲领的第一部分寄给了他,于是他将这一部分内容全部写进了他1854年3月10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通讯中(见本卷第136—140页《工人议会》)。——724。

人名索引

A

- 阿巴思诺特, 约翰 (Arbuthnot, John 1667 — 1735) —— 苏格兰医生和作家, 讽刺作品《约翰牛传》(1712)的作者。—— 305、309、651。
- 阿拔斯一世, 阿拔斯帕沙 (Abbas I [Abbās Pasha] 1813 — 1854) —— 埃及的帕沙 (1849 — 1854)。—— 22。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 — 1860) —— 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 — 1830 和 1841 — 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 (1834 — 1835)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 — 1855)。—— 4、7、10、49、92、97、128、144、149、151、152、179、215 — 221、226、293、357 — 367、411、420 — 423、426、437、451、700、721、724。
- 阿卜迪帕沙 (Abdi Pasha 生于 1801 年) —— 土耳其将军, 1853 年任高加索土军司令; 1854 年参与镇压希腊起义。—— 24、36、254。
- 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 (Abd-ul-Medschid I [Abdul Medjed] 1823 — 1861) —— 土耳其苏丹 (1839 — 1861)。—— 11、12、25 — 28、66、73、75、90、94 — 97、108、113 — 115、146、149、156 — 159、161 — 163、166、169、176、180、213、228、242、244、246、265、271、311、327、371、372、376、430、468、470、594、608、716。
- 阿德里安·戴德尔 (Adrian Dedel 1459 — 1523) —— 查理五世的教师, 1515 年起为宗教大法官, 1517 年起为红衣主教, 1520 — 1521 年为西班牙执政者, 1522 年起为罗马教皇, 称阿德里安六世。—— 504。
- 阿尔伯特,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 (Albert, Prinz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819 — 1861) ——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 28、42 — 46、56、180、403、412、439、713 — 714。
- 阿尔布凯克公爵, 何塞·马里亚 (Albuquerque, José Maria, duque de 死于 1811 年) —— 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 (1808 — 1814); 曾任驻伦敦大使 (1811)。—— 577、578。

- 阿尔当, 保尔·约瑟夫(Ardant, Paul-Joseph 1800 --1858)——法国军事工程师; 曾任陆军上校, 1855年起为将军, 1854年奉命赴土耳其执行军事任务。——66。
- 阿尔圭列斯, 奥古斯丁(Argüelles, Agustin de 1776 --1844)——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自由党人;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的参加者; 曾任内务大臣(1820—1821), 议会议员(1822—1823)。——559, 564, 568。
- 阿尔科·阿圭罗, 菲利浦(Arco Agüero, Felipe 1790—1821)——西班牙军官, 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 革命激进派领袖之一。——555。
- 阿尔科克, 托马斯(Alcock [Alcox], Thomas 生于1801年)——英国政治活动家, 初为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425。
- 阿尔梅罗-佩尼亚兰达(阿尔梅罗), 弗朗西斯科, 内尔维翁侯爵(Armero y Peñaranda[Armero], Francisco, marqués de Nervión 1804—1867)——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387。
- 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韦尔贝洛伯爵,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Arnim-Heinrichsdorf-Werbelow, Heinrich Friedrich Graf von 1791—1859)——普鲁士外交家, 曾任勃兰登堡内阁外交大臣(1849)和驻维也纳大使(1845—1848, 1851—1858)。——78, 256, 405。
- 阿尔瓦公爵, 哈科沃·路易斯(Alba, Jacobo Luis, duque de 1821—1881)——西班牙贵族,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欧仁妮·蒙蒂霍的姐姐玛丽亚·弗朗西斯科的丈夫。——479。
- 阿尔文斯莱本伯爵, 阿尔布雷希特(Alvensleben, Albrecht Graf von 1794—1858)——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1835—1842年为财政大臣, 1844年辞去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内阁成员职务, 1849年起为第一议院议员。——245。
- 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Arif-Hikmet-Bei 生于1786年)——伊斯兰教的谢赫(1846—1854)。——213, 217。
- 阿里夫贝伊(Arif-Bei 1786—1866)——伊斯兰教的谢赫(1854—1858)。——247, 716。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432, 631。
- 阿连德-萨拉查(萨拉查), 何塞(Allende Salazar[Salazar], José 1802—1893)——西班牙将军, 进步党人, 1854年任海军大臣。——461。

- 阿马利亚斯侯爵(Amarillas, marqués de las)——西班牙国务活动家;1820年任陆军大臣。——567、569。
- 阿马利亚(Amalie 1818—1875)——希腊王后,奥托一世的妻子。——212。
- 阿梅莉亚——见玛丽-阿梅莉亚。
- 阿梅特利尔-德卡夫雷尔,纳尔西索(Ametller y de Cabrer, Narciso 死于1877年)——西班牙陆军上校,1834—1844年是共和党人和进步党人在卡泰罗尼亚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参加西班牙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611。
- 阿默兰,弗朗索瓦·阿尔丰斯(Hamelin, François-Alphonse 1796—1864)——法国海军上将,1853—1854年是地中海和黑海舰队总司令,后为海军大臣(1855—1860)。——3、65、86、97、107、260、281—283、294、318、321、644—647、668、692。
- 阿姆菲尔德,本杰明(Armfield, Benjamin)——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阿齐兹帕沙(Aziz Pasha [Azziz Pasha])——土耳其将军,1854—1857年是贝尔格莱德的土耳其军事总督。——400。
- 阿斯卡(Aska)——土耳其医生。——262。
- 阿塔纳西乌斯(亚纳纳西)(Athanasius)——保加利亚东正教神父。——147。
- 阿图瓦伯爵——见查理十世。
- 埃查圭,拉斐尔,塞拉略伯爵(Echagüe [Echague], Rafeal, conde del Serrallo 1815—1887)——西班牙将军,温和派;曾参加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军长。——386、480。
- 埃雷罗斯,曼努埃尔·加尔西亚(Herrerros, Manuel Garcia)——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加的斯议会议员(1810—1813),曾任司法大臣(1808—1814和1820)。——559。
- 埃利奥,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Elio, Francisco Javier 1767—1822)——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14年曾帮助斐迪南七世建立专制制度,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因策划反动暴乱被处死。——538、554、572。
- 埃利亚德-勒杜莱斯库,让(Héliade-Radulesco, Jean)——瓦拉几亚政治活动家,1848年瓦拉几亚革命的参加者。——375—378。
-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Earl of 1790—1871)——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

- 1844), 海军首席大臣(1846),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 爱·罗·埃伦伯勒男爵的儿子。——421。
- 埃罗勒斯男爵, 华金(Eroles, Joaquin, baron de 1785—1825)——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时期(1808—1814)是游击队指挥官, 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保皇派领袖。——538。
- 埃米特, 威廉(Emmett, William)——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埃斯波斯-米纳, 弗朗西斯科(Espoz y Mina[Mina], Francisco 1781—1836)——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时期(1808—1814)为游击队领袖, 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和1833—1840年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的参加者。——538、569。
- 埃斯帕特罗, 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 进步党领袖; 政府首脑(1839—1841和1854—1856), 西班牙摄政(1841—1843)。——409、414—417、447—455、461、472—473、480、483、564、585—587、600—602、640。
- 埃斯皮加, 何塞(Espiga, José)——西班牙神学家; 1820年为塞维利亚大主教。——565、571。
- 埃斯皮纳斯, 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 1854年任多布罗加驻军师长, 1854—1855年在克里木任旅长, 在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曾任内务大臣五个月, 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任师长。——622。
- 埃斯特哈济·冯·加兰塔伯爵, 瓦伦廷·拉迪斯劳斯(Esterházy von Galántha, Valentin Ladislaus Graf 1814—1858)——奥地利外交官, 1854—1858年任驻俄国公使。——263。
- 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 [Ahmet I] 1589—1617)——土耳其苏丹(1603—1617)。——183。
- 艾哈迈德帕沙(Ahmed Pasha)——土耳其将军, 1853—1854年任高加索土军司令。——24、36。
- 爱德华, 肯特公爵(Edward, Duke of Kent[Kent] 1767—1820)——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父亲。——714。
- 安蒂莫斯六世·约翰尼德斯(Antimos VI Joannides 1790—1878)——君士坦丁

- 堡的希腊东正教总教长(1852—1853、1853—1855和1871—1873)。——182。
- 安东尼奥·帕斯夸尔·波旁(Antonio Pascual Bourbon 1755—1817)——西班牙亲王,马德里中央洪达(1808年4月奉斐迪南一世之命成立的)主席;查理三世的儿子。——517。
- 安雷普-埃尔姆普特伯爵,约瑟夫(Анреп-Эльмпт, Иосеф, граф 1798—1860)——俄国将军,1853—1854年任多瑙河驻军指挥官。——38。
- 安年科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Анненко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9—1865)——俄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1848—1854年为国务委员,1854—1855年任新罗西卡和比萨拉比亚总督。——260—261、280、597。
- 安斯利伯爵,威廉·理查(Annesley, William Richard, Earl of 1830—1874)——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52。
- 昂古莱姆公爵,路易·安东(Angoulême, Louis-Antoine, duc d' 1755—1844)——法国亲王,1823年曾指挥法国军队镇压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查理十世的儿子。——560、582。
- 奥勃鲁切夫(奥勃鲁切夫第二),亚历山大·阿法纳西耶维奇(Обручев[Обручев II], 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俄国将军。——23、36。
- 奥布廉诺维奇王朝——塞尔维亚公国王朝(1817—1842和1858—1882),后为皇朝(1882—1903)。——25、38。
- 奥布廉诺维奇,米哈伊尔(塞尔维亚的米哈伊尔)(Obrenović Michailo[Michail from Servia] 1823—1868)——塞尔维亚大公(1839—1842和1860—1868)。——25、38、39。
- 奥布廉诺维奇,米洛什(Obrenović, Milos 1780—1860)——塞尔维亚大公(1817—1839和1858—1860)。——25、38。
- 奥达利,佩德罗(O'Daly, Pedro)——西班牙军官,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西班牙革命(1820—1823)的参加者。——555。
- 奥当奈尔-霍里斯(奥当奈尔),莱奥波多,卢塞纳伯爵和得土安公爵(O'Donnell y Jorris[O'Donnell], Leopoldo, conde de Lucena y duque de Tetuán 1809—1867)——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派的领袖之一;曾任古巴总督(1843—1848),陆军大臣(1854—1856);政府首脑(1856、1858—1863和1865—1866);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间任西班牙远征军总司令。——369、385—387、397、409、410、414、417、418、450、461、472—

473、477、555、589、601、603。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116。

奥尔洛夫伯爵,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граф 1786—1861)——俄国将军、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代表俄国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任出席巴黎会议(1856)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参议院议长和大臣委员会主席(1856年起),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废除农奴制。——56、64、70、82、229、263。

奥尔洛夫公爵,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Орл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нязь 1827—1885)——俄国将军和外交家,曾参加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1854);屡任俄国驻欧洲国家的代表。——343、347。

奥尔特腊(Oltra)——西班牙军官,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556。

奥古斯特·路德维希·维克多,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奥古斯特)(August Ludwig Victor, Prinz von Sachsen-Koburg-Gotha [Auguste] 1818—1881)——玛丽·克莱门蒂娜·卡罗琳·莱奥波迪娜·克洛蒂尔达(奥尔良的)的丈夫,斐迪南·格奥尔格·奥古斯特,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儿子。——714。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翼领袖。——67。

奥里奥拉伯爵,阿尔丰斯(Oriola, Alphons Graf von)——普鲁士外交官,1854年任驻哥本哈根大使。——48。

奥利韦拉,本杰明(Oliveira, Benjamin)——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52。

奥罗佩萨伯爵,艾曼努埃尔·华金(Oropesa, Emanuel Joaquin, conde de 1642—1707左右)——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大臣(1685—1691和1698—1699),1699年人民起义后被驱逐出西班牙。——504。

奥罗斯科(Orozco)——西班牙军官,曾参加西班牙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397。

奥洛萨加,萨卢斯蒂亚诺·德(Olozaga, Salustiano de 1805—1873)——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进步党领袖之一,曾任驻巴黎公使(1840—1843和1854),政府首脑(1843);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449、453、480。

奥美尔帕沙——见拉塔什·米哈伊尔。

- 奥沙利文·德格拉斯伯爵,阿尔丰斯·阿尔伯·昂利(O'Sullivan de Grass, Alphonse Albert-Henri, comte 1798—1866)——比利时外交官,1837—1866年任驻维也纳公使。——405。
- 奥斯本——见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
- 奥斯卡尔一世(Oskar I [Oscar] 1799—1859)——瑞典和挪威的国王(1844—1859)。——228、472、488、499。
- 奥斯滕-萨肯(Остен-Сакен, Д. Э.)——俄国将军,俄国驻多瑙河两公国某军军长,1853年12月起任布格河到多瑙河沿岸驻军指挥官。——280。
- 奥斯滕-萨肯,德米特里·叶罗费耶维奇(Остен-Сакен, 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南方军团司令(1853—1854),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1854年底—1855年初)。——15、32、142、260、280—282、609、610、686。
- 奥特韦从男爵,阿瑟·约翰(Otway, Sir Arthur John, Baronet 1822—1912)——英国政治活动家,50年代是托利党人,议会议员。——402、412、438。
- 奥托一世(Otto I [Otho] 1815—1867)——巴伐利亚亲王,希腊国王(1832—1862)。——105、114、212、264、285、313、405、598、604、717。
- 奥泽罗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Озе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817—1900)——俄国外交官,1852—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代办。——75。

B

- 巴尔贝斯,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 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后流亡荷兰,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642。
- 巴尔博亚,瓦斯哥·努涅斯(Balboa, Vasco Nuñez 1475—1517)——西班牙航海家和征服者,第一个横穿巴拿马地峡到太平洋海岸的欧洲人。——509。
- 巴尔布·比伯斯库——见施梯尔贝公爵,巴尔布·德米特里·比伯斯库。
- 巴尔达希-阿萨拉(巴尔达希),欧塞维奥(Bardaji y Azara [Bardaji], Eusebio 1776—1842)——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1821—1822年任外交大臣,1837年任内阁首脑。——570。
- 巴拉盖·狄利埃伯爵,阿希尔(Baraguay d' Hilliers, Achille, comte 1795—

- 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1870年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3、11、26—28、32—33、79、107、114、242、254、269、393、476、608。
- 巴拉斯特基(Barastequi)——西班牙军官,埃斯帕特罗的副官。——416。
- 巴拉伊班(Baraiban)——西班牙军官,曾参加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417。
- 巴列斯特罗斯,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 (Ballesteros, Francisco López 1770—1832)——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曾任陆军大臣(1815);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1820—1823)。——580。
- 巴林顿, 威廉·凯佩尔(Barrington, William Keppel 生于1793年)——英国贵族,议会议员。——52。
- 巴罗, 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 (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71。
- 巴特, 伊萨克(Butt, Isaac 1813—1879)——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2—1865);60年代是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的辩护人,1871年起为爱尔兰自治派的领导人。——67、92、439。
- 巴特勒, 詹姆斯·阿默尔(Butler, James Armar 1827—1854)——英国军官,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参加者。——435、441。
- 巴耶塞特一世 (Bayezid I [Bajazet] 1347—1403)——土耳其苏丹(1389—1403)。——373。
- 班克斯, 乔治(Bankes, George 1788—185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官员。——425。
- 邦迪埃拉, 阿蒂利奥(Bandiera, Attilio 1810—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86。
- 邦迪埃拉, 埃米利奥(Bandiera, Emilio 1819—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

- 而被处死(1844),阿·邦迪埃拉的弟弟。——86。
- 鲍蒂扬尼伯爵,卡斯梅尔(Batthyány, Kásmér Graf von 1807—1854)——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任匈牙利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法国。——9。
- 鲍姆加特纳男爵,安德烈亚斯(Baumgartner, Andreas Baron von 1793—1865)——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科学家;曾任财政大臣(1851—1855)。——57,121。
-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国。——330,622。
- 贝尔(Bell)——英国工程师。——22。
-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52—1858)。——303,304。
- 贝尔通,让·巴蒂斯特(Berton, Jean-Baptiste 1769—1822)——法国将军,拿破仑第一的历次远征的参加者,反对波旁王朝的起义失败后被处死。——478。
- 贝格(Бегр)——俄国外交官,驻伦敦公使馆一秘(1842左右—1854)。——63。
- 贝克莱,莫里斯·弗雷德里克·菲茨哈丁(Berkeley, Maurice Frederick Fitzhardinge 1788—1867)——英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大臣(1833—1839和1846—1857)。——189,432,435—437。
- 贝拉斯科(Velasco)——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20年为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军事总督。——569。
- 贝莱普什,玛丽·约瑟法·盖尔特鲁黛(Berlepsch, Maria Josephe Gertrud 死于1723年)——西班牙女王纽堡的玛丽-安娜的宫中御前女官,1699年人民起义之后被逐出西班牙。——504。
- 贝勒岛公爵,沙尔·路易·奥古斯特·富凯(Belle-Isle[Belleisle], Charles-Louis-August Fouquet, duc de 1684—1761)——法国元帅,曾任陆军大臣(1757—1761)。——722。
- 贝雷斯福德,威廉·卡尔(Beresford, William Carr 1768—1854)——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曾任

- 葡萄牙军队指挥官。——685。
- 贝里公爵夫人, 玛丽·卡罗琳·斐迪南达·路易莎(Berry, Marie-Caroline-Ferdinande-Louise, duchesse de 1798—1870)——正统派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 1832年企图在旺代发动暴乱推翻路易-菲利浦一世。——328—329。
- 贝利, 亨利·詹姆斯(Baillie, Henry James)——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会议员。——61。
- 贝姆, 约瑟夫(Bem, 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 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 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 入伊斯兰教, 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 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14。
- 贝特朗·德·利兹(Bertrán de Liz)——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19世纪20年代为激进派领袖。——573。
- 贝西埃尔, 让·巴蒂斯特(Bessières, Jean-Baptiste 1768—1813)——法国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521。
- 本生男爵, 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Freiherr von 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官, 政论家和神学家, 曾任驻梵蒂冈的代表(1824—1839)和驻伦敦公使(1842—1854)。——160、245。
- 比安基·乔维尼, 奥雷廖(Bianchi Giovini, Aurelio 1799—1862)——意大利新闻工作者。——244。
- 比比科夫, 德米特里·加甫里洛维奇(Бибиков, Дмитри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792—1870)——俄国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2)的参加者; 曾任国务委员(1848—1855)和内务大臣(1852—1855)。——259。
- 比伯斯库公爵, 乔治(Bibescu, George, Fürst 1804—1873)——瓦拉几亚国君(1842—1848)。——375。
- 比达尔夫, 迈克尔·安东尼(Biddulph, Michael Anthony 1823—1904)——英国工程师和军官, 后为将军, 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一书(1854)的作者。——661。
- 比弗, 华莱士(Beever, Wallace)——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比戈德特, 加斯帕尔(Vigodet, Gaspar)——西班牙政论家, 自由主义者, 1820年为新卡斯蒂利亚军事总督。——568。

- 比格兰, 约翰(Bigland, John)——英国历史学家。——518。
- 比利亚坎帕, 佩德罗(Villacampa, Pedro 1776—1845)——西班牙军官,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时期(1808—1814)为游击队领袖, 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的参加者。——538。
- 比列-布腊赫伯爵, 亨利克(Bille-Brahe, Henrik, Graf 1798—1875)——丹麦外交官, 驻维也纳公使(1849—1851和1852—1862)。——405。
- 比列尔(Villel)——西班牙贵族, 1808年为中央洪达委员。——531。
- 比列纳——见帕切科, 胡安, 比列纳侯爵。
- 比诺, 让·马蒂亚尔(Bineau, Jean-Martial 1805—1855)——法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公共工程部长(1849—1851), 财政大臣(1852—1855)。——60, 126。
- 比斯塔埃尔莫萨伯爵, 安赫尔·加尔西亚·洛伊戈里(Vista Hermosa [Vistahermosa], Angel Garcia Loygorri, conde de 死于1887年)——西班牙将军, 1854年指挥政府军力图镇压西班牙革命, 失败后逃往国外。——387, 397。
- 彼得大帝——见彼得一世。
- 彼得一世, 彼得大帝(Петр I,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 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189, 191, 690。
- 彼得罗维奇, 丹尼洛——见丹尼洛一世·彼得罗维奇·涅哥什。
- 毕若·德·拉·比贡利, 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c, Thomas 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 奥尔良党人, 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 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 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 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 1841—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 1848—1849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8—1849)。——329。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4, 71, 91, 215。
- 别布托夫公爵, 大卫·奥西波维奇(Бебутов, Давид Осипович, князь 1793—1867)——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408。
- 波波维奇, 提摩太乌斯·冯(Роповић [Ропович], Timotheus von 1795—1867)——奥地利将军, 1854年为布加勒斯特军事总督。——610。
-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 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Charles André], 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 科西嘉

- 人：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驻伦敦大使(1835—1839)。——103—104、154。
- 波克兰，让·巴蒂斯特——见莫里哀。
- 波拉德-乌尔卡尔特，威廉(Pollard-Urquhart [W. P. Urquhart], William 1814—1871)——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议会议员。——53。
- 波利埃尔——见迪亚斯·波利埃尔，胡安。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 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 Plon-Plon et Prince rouge 1822—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596、645。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116、519。
- 波拿巴，约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仑第一的长兄，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西班牙国王(1808—1813)。——116、504、511—514、536、553、578、600。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28、43、328、509、513、556、580。
- 伯德，T. O' M. (Bird, T. O' M.)——英国新闻工作者，《泰晤士报》驻维也纳的通讯员。——114、227。
- 伯恩施托尔夫伯爵，阿尔布雷希特(Bernstorff, Albrecht Graf von 1809—1873)——普鲁士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公使(1854—1861)，外交大臣(1861—1862)，驻伦敦大使(1862—1873)。——592。
- 伯恩斯，亚历山大(Burnes, Alexander 1805—1841)——英国军官，英国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策划者之一；1836—1838年在喀布尔执行特殊使命，1839—1841年任喀布尔英军司令部顾问，1841年喀布尔发生起义时被杀。——17。
- 伯戈因从男爵，约翰·福克斯(Burgoyne, Sir John Fox, Baronet 1782—1871)——英国将军，军事工程师，1868年起为元帅；1854—1855年在克里木任英军军事顾问和工程兵指挥官。——66、476、596。
- 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古斯塔夫(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 Gustav Graf von 生于 1820 年)——普鲁士外交官, 1854 年任驻巴黎公使馆秘书。——593。
-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 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68、125、741。
- 博迪纳罗夫(Бодинаров)——俄国将军。——263。
- 博蒙特男爵, 迈尔斯·托马斯·斯泰普尔顿(Beaumont, Miles Thomas Steypl-tone, Baron 1805—1854)——英国地主, 自由派, 上院议员。——365。
- 博宁, 爱德华·冯(Bonin, Eduard von 1793—1865)——普鲁士将军和国务活动家, 曾任陆军大臣(1852—1854 和 1858—1859)。——230。
- 博斯凯, 皮埃尔·约瑟夫·弗朗索瓦(Bosquet, 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法国将军, 1856 年起为元帅, 30—50 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为法军师长(1854), 后为军长(1854—1855)。——645—647、665、674、678、680、686。
- 布奥尔-绍恩施坦, 卡尔·斐迪南·冯(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von 1797—1865)——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 驻伦敦公使(1851—1852), 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29、263、398、405、467、475、631。
- 布德贝格男爵, 安德烈(Будберг, Андрей, барон 1817—1881)——俄国外交官, 曾任驻柏林公使(1852—1856 和 1858—1862), 维也纳公使(1856—1858)和巴黎公使(1862—1868)。——229。
- 布德贝格男爵,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Будберг,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барон 1798—1876)——俄国将军, 1853—1854 年为驻多瑙河两公国的特派专员。——372、394、429、460、608、609。
- 布尔克奈伯爵, 弗朗索瓦·阿道夫(Bourqueney, François-Adolphe, comte de 1799—1869)——法国外交官,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41—1844)和大使(1844—1848), 驻维也纳公使(1853—1856)和大使(1856—1859); 1856 年代表法国参加巴黎会议。——78、467、476。
- 布尔沃, 爱德华·乔治, 利顿男爵(Bulwer, Edward George, Baron Lytton 1803—1873)——英国政治家和作家, 辉格党人, 1852 年起为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殖民大臣(1858—1859)。——52、

- 布尔沃-利顿, 爱·利·——见布尔沃, 爱德华·乔治, 利顿男爵。
- 布格尔男爵, 弗里德里希(Burger, Friedrich Baron von)——奥地利外交官, 曾任驻伦巴第总督。——431。
- 布坎南, 安德鲁(Buchanan, Sir Andrew 1807—1882)——英国外交官, 1853—1858年任驻哥本哈根公使。——48。
- 布拉蒂亚诺, 迪米特鲁(Brătianu[Bratiano], Dimitru 1818—1892)——罗马尼亚国务活动家, 曾参加瓦拉几亚 1848 年革命, 革命失败后侨居法国和英国; 1881 年任罗马尼亚政府首脑。——374、376—377。
- 布拉干柴王朝——葡萄牙王朝(1640—1853)和巴西王朝(1822—1889)。——513。
- 布拉干柴-科堡(科堡-布拉干柴)(Braganza-Coburg[Coburg-Braganza])——葡萄牙王朝(1853—1910), 布拉干柴王朝的分支。——486。
- 布拉克, 华金(Blake, Joaquin 1759—1827)——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 1810 年任摄政会议主席, 1814 年斐迪南七世回国后反对专制制度。——538。
- 布拉姆森, 约翰(Bramsen, John)——英国历史学家。——581。
- 布拉塞-圣马丁, 安塞尔莫·德·西加(Blaser y San Martin, Ancelmo de Ciga 1813—1872)——西班牙将军, 曾任陆军大臣(1853—1854)。——385—387、397、417、418。
- 布拉沃——见冈萨雷斯·布拉沃, 路易斯。
- 布拉沃·穆里略, 胡安(Bravo Murillo, Juan 1830—1873)——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属于温和派; 曾任政府首脑(1851—1852)和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4)。——588。
- 布莱, 詹姆斯(Bligh, James)——19 世纪 50 年代宪章运动领袖, 1854 年工人议会参加者。——125、140、739。
- 布莱克, 罗伯特(Blake, Robert 1599—1657)——英国海军上将,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克伦威尔的助手; 50 年代在英国西班牙战争中任舰队司令, 曾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作过斗争。——725。
- 布莱克特, 约翰·芬威克·伯戈因(Blackett, John Feanwick Burgoyne 1821—1856)——英国议会议员。——311。
- 布莱克伍德, 亨利·斯蒂文森(Blackwood, Henry Stevenson 生于 1819 年)——英国外交信使。——179。

- 布莱特, 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 棉纺厂主, 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 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 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43、49、88、224、314—316、499。
- 布赖尔利, 詹姆斯(Brierley, James)——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布兰特, 亨利希·冯(Brant, Heinrich von 1789—1868)——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俄国近年来的政策和军队》一书的作者。——207、243、379、536—537、655。
- 布朗, 乔治(Brown, George 1790—1865)——英国将军,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1808—1814)和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 1860—1865年任爱尔兰军总司令。——438、470、645—646。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 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 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 同年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无期徒刑;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 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 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 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 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642。
- 布勒尼埃, 亚历山大·阿纳托尔·弗朗索瓦·昂利, 勒诺迪埃男爵(Brenier, Alexandre-Anatole-François-Henri, baron de la Renaudière 1807—1885)——法国外交官, 曾任外交部长(1851), 驻那不勒斯公使(1855—1856和1859—1860); 1861年起为参议员。——82。
- 布雷, 尼古拉·普罗斯佩(Bourée[Bourrée], Nicolas-Prosper 1811—1886)——法国外交官, 曾任驻贝鲁特领事(1840—1850), 1853—1854年率特别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 1855年任驻波斯公使, 1859年任驻希腊公使。——285。
- 布雷迪, 约翰(Brady, John 生于1812年)——英国医生, 议会议员。——53。
- 布卢默, 克里斯蒂安·阿尔布雷希特(Bluhme, Christian Albrecht 1794—1866)——丹麦国务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4)和首相(1852—1853)。——26。
- 布鲁尔, 乔治(Brewer, George)——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布鲁克男爵, 卡尔·路德维希(Bruck, Karl Ludwig Freiherr von 1798—

- 1860)——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1851),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3—1855),财政大臣(1855—1860)。——10、11、26、28、429。
-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 Henry Peter, 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文学家;辉格党人,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29、216、367。
- 布鲁诺,乔尔丹诺(Bruno, Giordano 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唯物主义者 and 无神论者;发展了泛神论的、辩证的世界观,哥白尼关于宇宙构造的学说的拥护者;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被宗教裁判所烧死。——474。
- 布鲁图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45、164。
-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冯,瓦尔施塔特公爵(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von, Fürst von Wahlstat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1793—1794年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1806和1813—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299、621、648、680。
- 布律阿,阿尔芒·约瑟夫(Bruat, Armand-Joseph 1796—1855)——法国海军上将,1854年为黑海分舰队司令,1855年为黑海舰队总司令。——71、408、470。
- 布伦诺夫伯爵,菲利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граф 1797—1875)——俄国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公使(1840—1854和1858—1860)和大使(1860—1874);出席1856年巴黎会议的俄国代表团成员。——26、42、63、64、77、94、97、98、156、218、219、398。
- 布塞塔(Buceta)——西班牙陆军上校,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1854—1856)。——410、417。
- 布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Bute, John Stuart, Earl of 1713—179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761—1762年任内务大臣,1761—1763年任首相。——722。
- 布图尔林,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Бутурлин,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1790—1849)——俄国军事史学家,1812年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205。

C

查尔托雷斯基公爵, 亚当·耶日 (Czartoryski, Adam Jerzy, Fürst 1770 — 1861)——波兰大地主, 19 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 曾任俄国外交大臣 (1804 — 1806); 1830 — 1831 年波兰起义时为临时政府首脑, 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 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100、254。

查理——见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 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 查理大帝 (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 — 814)——法兰克国王 (768 — 800) 和皇帝 (800 — 814)。——713。

查理一世——见查理五世。

查理二世 (Carlos II 1661 — 1700)——西班牙国王 (1665 — 1700)。——157、504。

查理三世 (Carlos III 1716 — 1788)——西班牙国王 (1759 — 1788)。——524、554、577、603。

查理四世 (Carlos IV [Charles IV] 1748 — 1819)——西班牙国王 (1788 — 1808)。——504、511、524、558。

查理五世 (Charles V 1500 — 1558)——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19 — 1556), 西班牙国王 (1516 — 1556), 称查理一世; 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504 — 509、516、546。

查理六世 (Charles VI 1685 — 1740)——罗马帝国皇帝 (1711 — 1740)。——123。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 — 1836)——法国国王 (1824 — 1830); 被 1830 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364、478、566。

查理十二世 (Charles XII 1682 — 1718)——瑞典国王 (1697 — 1718)。——488、702。

查兹, 亨利·杜西 (Chads, Sir Henry Ducie 1788 — 1868)——英国海军上将, 1854 — 1855 年任波罗的海分舰队指挥官。——436、496。

察斯特罗, 亨利希·阿道夫·冯 (Zastrow, Heinrich Adolf von 1801 — 1875)——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军团司令。——192、305、306、456 — 457、492、625、668。

D

- 达来朗-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德, 贝内文特亲王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 (1797—1799、1799—1807 和 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 (1814—1815) 的代表, 驻伦敦大使 (1830—1834)。——366、513。
- 戴维斯, 亨利·温特 (Davis, Henry Winter 1817—1865)——美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 1852年起为辉格党人, 后为美国党(无所知者党)人, 1860年后为共和党人; 众议院议员 (1855—1861 和 1863—1865)。——565。
- 丹尼洛一世, 彼得罗维奇·涅哥什 (Danilo I, Petrović Njegoš 1826—1860)——黑山大公 (1852—1860)。——74、265。
- 丹年贝尔格,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 (Данненберг,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时期在多瑙河和克里木任第四军团司令。——142、406、686、698。
- 道格拉斯, 霍华德 (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著有炮兵、筑城学和军事桥梁方面的著作。——496。
- 道森 (Dawson)——英国医生。——403。
- 德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比克斯塔夫的) 斯坦利勋爵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殖民大臣 (1833—1834 和 1841—1845), 内阁首相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21、67、180、215—219、315、700。
- 德尔马 (Delmas)——在西班牙的法国侨民。——473。
- 德尔文齐斯塔 (德文齐斯塔) (Derventzista [Deventzista])——希腊神学家, 1854年起为大主教。——254。
- 德拉蒙德, 亨利 (Drummond, Henry 1786—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92。
- 德鲁安-德路易斯, 爱德华 (Drouyn de Lhuys, Édouard 1805—1881)——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40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 1851年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 (1848—1849、1852—1855 和 1862—1866) 和驻伦敦大使 (1855); 1855年是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7、10、12、

26、476。

德律埃,昂利(Druey, Henri 1799—1855)——瑞士国务活动家,激进主义者,联邦委员会委员(1848—1854),司法和警务部长(1848年起),1850年为瑞士联邦主席。——599。

德瓦尔(Deval)——法国外交官,18世纪中叶为驻君士坦丁堡公使馆成员。——184。

邓达斯,詹姆斯·惠特利·迪恩斯(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英国海军上将,克里木战争期间任英军地中海舰队总司令(1852—1855年1月)。——3、65、86、92、107、249、261、281、308、352、471、668。

邓库姆,托马斯·斯林斯比(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40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议会议员。——201、290。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 John 1265左右—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著有《牛津文集》。——199。

狄更斯,查理(Dickens, Charles 笔名波兹 Boz 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411。

迪福(Dufau, P.-A.)——法国法学家。——544、563。

迪富尔,吉约姆·昂利(Dufour, Guillaume Henri 1787—1875)——瑞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47年率领联邦军队击溃宗得崩德军队;1848—1849年为国民院议员;写有筑城学、炮兵和战策方面的著作。——629。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42、52、87、93—100、132、157、220、221、226、272、275、314、367、411、420、425、426、432、437、635、701。

迪亚斯——见帕斯托尔·迪亚斯。

迪亚斯·波利埃尔,胡安(Diaz Porlier[Porlier], Juan 1775—1815)——西班牙将军,自由主义者,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战争时期曾指挥游击队,企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后被处死。——538、554、561。

- 蒂德·普拉特——见普拉特,约翰·蒂德。
- 蒂尔,伊什特万(Türr, 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军官,意大利和德国的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土耳其;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站在联军一边;参加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1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599。
- 蒂利希,弗雷德里克·斐迪南(Tillish, Frederik Ferdinand 1801—1889)——丹麦国务活动家,保皇派,曾任内务大臣(1851—1852、1854和1864—1865)。——472。
- 蒂兹韦尔(Tidswell, E.)——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杜阿梅尔,亚历山大·奥西波维奇(Дюгам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Осипович 1801—1880)——俄国将军和外交官,1842—1848年负特别使命出使多瑙河两公国。——377。
- 杜阿梅尔伯爵,维克多·奥古斯特(Du Hamel, Victor Auguste, comte 1810—1870)——法国历史编纂学家。——558、581。
- 杜邦·德莱唐伯爵,皮埃尔·安东(Dupont de l'Étang, Pierre-Antoine, comte 1765—1840)——法国将军,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8年在西班牙拜伦会战中率部队投降。——519。
- 杜尔塞-加赖,多明戈(Dulce y Garay, Domingo 1808—1869)——西班牙将军,属于温和派,曾领导1854年马德里的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369、385—387、397、409、477、480、486、603。
- 杜科,泰奥多尔(Ducos, Théodore 1801—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海军大臣(1851—1855)。——260、292。
- 杜韦尔日耶,让·巴蒂斯特-玛丽(Duvergier, Jean-Baptiste-Marie 1792—1877)——法国法学家,《法国法律汇编》的出版者。——544、564。
- 多布森,弗兰克(Dobson, Frank)——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1。
-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Долгоруков,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князь 1816—1867)——俄国外交官,50年代任驻波斯公使。——10、17、25。
- 多纳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埃米尔(Dohna, Karl Friedrich Emil Graf zu 1784—1859)——普鲁士将军,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2—1815

- 年在俄军中供职,1842—1854年为驻柯尼斯堡的普军指挥官。——265。
- 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uhammad Khan [Dost-Mahomed] 1793—1863)——阿富汗艾米尔(1826—1839和1842—1863)。——17、116。
- 多特扎克,阿道夫(Dotézac, Adolphe 1808—1889)——法国外交官,驻哥本哈根公使(1848—1869)。——48。
- 多伊茨(Deutz)——329。
- 多泽罗夫——见奥泽罗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E

- 俄国的喀德邻——见叶卡捷琳娜二世。
- 厄尔斯纳(Oelsner)——263。
- 厄斯特德,安德斯·桑德(Oerstedt, Anders Sandoe 1778—1860)——丹麦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1853—1854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48。
- 恩里克二世(Enrique II 1333—1379)——卡斯蒂利亚国王(1369年起)。——527。
- 恩里克三世(守丧人)(亨利三世)(Enrique III el Doliente [Henri III] 1379—1406)——卡斯蒂利亚国王(1390年起)。——527。
- 恩里克四世(阳萎者和慷慨者)(亨利四世)(Enrique IV el Impotente y el Liberal [Henry IV] 1425—1475)——卡斯蒂利亚国王(1454—1465和1468—1474)。——504。
- 恩里克·奥当奈尔——见拉比斯瓦尔伯爵,恩里克·何塞·奥当奈尔。
- 恩里克·玛丽亚·费南多(波旁的)(唐·恩里克)(Enrique Maria Fernando de Borbón [Don Enrique] 1823—1871)——西班牙王位继承者,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54—1856)支持共和派。——640。
- 恩佩西纳多,马丁·胡安(Empecinado, Martin Juan 1775—1825)——西班牙农民,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时期(1808—1814)为游击队领袖,后为将军,曾参加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因企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制度而被处死。——538。
- 恩斯特第二(Ernst II 1818—1893)——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1844—1866)。——713。

F

-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

- 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1848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148。
- 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勒德·皮埃尔(Falloux, Frédéric-Alfred-Pierre, comte de 1811—1886)——法国政治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场的策划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71。
- 法曼，斯塔尼斯拉斯·玛丽·塞扎尔(Famin, Stanislas-Marie-Cesar 1799—1853)——法国外交官和作家。——181、186、188。
- 范哈伦，安东尼奥，佩拉坎普斯伯爵(Van-Halen, Antonio, conde de Peracamps 死于1858年)——西班牙将军，进步派，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以及1820—1823年和1834—1843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843—1847年随同埃斯帕特罗流亡国外。——450。
- 菲埃隆，雅克·阿梅代·菲利浦(Fiéron, Jacques-Amédée-Philippe 生于1796年)——法国将军，曾参加克里木战争。——393。
- 菲茨赫伯特，阿莱恩，圣海伦斯男爵(Fitzherbert, Alleyne Baron St. Helens 1753—1839)——英国外交官，1783—1787年任驻彼得堡公使。——91。
- 菲茨威廉伯爵，查理·威廉(Fitzwilliam, Charles William, Earl of 1786—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53、421。
- 菲尔德(Filder [Fielder] 生于1790年)——英国将军，1854—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军需司令。——432。
- 菲利浦二世(Felipe II [Phili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527、602。
- 菲利浦三世(Felipe III 1578—1621)——西班牙国王(1598—1621)。——602。
- 菲利浦四世(Felipe IV [Philip IV] 1605—1665)——西班牙国王(1621—1665)。——504、602。
- 菲利浦五世(Felipe V [Philip V] 1683—1746)——西班牙国王(1700—1746)。——527。
- 菲利蒙(Philimon)——希腊新闻工作者，19世纪50年代为雅典报刊编辑。——642。
- 菲利佩斯库(菲利佩斯科)(Phillipescu [Phillippesco])——瓦拉几亚军官。——608—609。

菲普斯, 查理·博蒙特 (Phipps, Sir Charles Beaumont 1801—1866)——英国军官, 曾为爱尔兰总督的侍卫官 (1835—1839), 1846 年为王室御马官, 1847 年起为阿尔伯特亲王的秘书。——403。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 (1835—1848)。——124。

斐迪南四世——见费南多四世。

斐迪南五世 (天主教徒) (Ferdinand V le Católico 1452—1516)——卡斯蒂利亚国王 (1474—1504) 和执政者 (1507—1516), 阿腊贡国王, 称斐迪南二世 (1479—1516)。——507、509。

斐迪南七世——见费南多七世。

斐迪南 (天主教徒)——见斐迪南五世 (天主教徒)。

斐迪南-奥古斯特-弗兰茨-安东,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 (Ferdinand August Franz Anton, Prinz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816—1885)——葡萄牙国王 (1837—1853), 称斐迪南二世, 王国摄政 (1853—1855); 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的丈夫。——714。

斐迪南·格奥尔格·奥古斯特,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 (Ferdinand Georg August, Herzog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785—1851)——在奥地利服役期间为将军; 斐迪南-奥古斯特-弗兰茨-安东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维克多, 萨克森-科堡-哥达的父亲。——714。

斐迪南多二世,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o II, Ferdinand II, 绰号炮弹国王 King Bomba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和西西里国王 (1830—1859)。——396、462、477、635。

费多罗夫 (Федоров)——1854 年任敖德萨总督。——260、280。

费利乌, 拉蒙 (Feliu [Feliu], Ramón)——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1821—1822 年为内阁成员。——570。

费南多四世 (斐迪南四世) (Fernando IV [Ferdinand IV] 1285—1312)——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 (1295—1312)。——545。

费南多五世 (天主教徒)——见斐迪南五世 (天主教徒)。

费南多七世 (斐迪南七世) (Fernando VII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 (1808 和 1814—1833)。——453、484—485、504、511、514—518、531、538、540、544、551、552、554—561、564—572、581、584。

芬伦, 詹姆斯 (Finlen, James)——英国政论家, 宪章派, 1852—1855 年为宪章派

- 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26、140、738、739。
- 弗莱明伯爵, 阿尔伯特·弗里德里希 (Flemming, Albert Friedrich Graf von 1813—1884)——普鲁士外交官, 驻维也纳大使馆参赞(1854—1859)。——405。
- 弗莱明, 约翰 (Flemming, John)——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为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弗兰茨一世 (Franz I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 称弗兰茨二世。——119、123、124。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75、119、124、264、270、354、372、389、443、477、592、631、639、641、700、718。
- 弗兰格尔伯爵,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Graf von 1784—1877)——普鲁士将军, 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 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 1856年任陆军元帅; 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610。
- 弗兰西斯——见弗兰茨一世。
- 弗兰西斯一世——见弗朗索瓦一世。
- 弗兰西斯 (尤尼乌斯), 菲利浦 (Francis [Junius], Sir Philip 1740—1818)——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722。
- 弗兰西斯-约瑟夫——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 弗朗索瓦一世 (Franço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183、418。
- 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 马里亚·费南多 (Francisco de Asis, Maria Fernando 1822—1902)——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丈夫。——587、640。
- 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472、640。
- 弗里德里希大帝——见弗里德里希二世。
- 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大帝 (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113、143、418、523、581、721。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57、83、159、228、232、390、424、593。
- 弗里德里希-约西亚斯, 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亲王 (Friedrich Josias, Prinz

- von Sachsen-Koburg-Saalfeld 1737 — 1815)——奥地利陆军元帅。——713。
- 弗洛雷斯,何塞·塞贡多·德(Flórez, José Segundo de 生于 1789 年)——西班牙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埃斯帕特罗的历史》一书的作者。——448。
- 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何塞·莫尼诺(Floridablanca, José Monino, conde de 1728 — 1808)——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曾任大臣(1777 — 1792);实行过一系列进步的改革;反对 18 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08 年为中央洪达主席,曾企图阻止 1808 — 1814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523 — 524、529、547、577。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Arouet 1694 — 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71、215。
- 福蒂斯丘伯爵,休(Fortescue, Hugh, Earl of 1783 — 1861)——英国国务活动家,爱尔兰总督(1839 — 1841)。——403。
- 福格,伊萨克(Fogg, Isaac)——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 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 — 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782、1783 — 1806)。——722。
- 福克斯,威廉·约翰逊(Fox, William Johnson 1786 — 1864)——英国政治家、传教士和政论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52。
- 福雷,埃利·弗雷德里克(Forey, Elie-Frédéric 1804 — 1872)——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 — 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1854 — 1855 年任克里木法军指挥官;1855 年 4 月被任命为奥兰省(北非)总督;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师长。——285、645。
- 福思-鲁昂男爵,亚历山大(Forth-Rouen, Alexandre, baron)——法国外交官,1836 — 1841 年任驻里约热内卢公使,1853 — 1854 年任驻雅典公使。——264、408。
- 福特,理查德(Ford, Richard 1796 — 1858)——英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写有关于西班牙革命史的著作。——582。
- 富克斯,格奥尔格·冯(Fuchs, Georg von)——德国作家。——344。
- 傅阿德埃芬蒂——见穆罕默德-傅阿德帕沙。

G

- 盖昂, 理查·德博弗尔(Guyon, Richard Debaufre 1803—1856)——英国军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任匈牙利革命军将军, 革命失败后加入土耳其军队, 被封为库尔西德帕沙, 1853 年任高加索土军指挥官。——597。
- 冈萨雷斯·布拉沃, 路易斯(González Bravo, Luis 1811—1871)——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温和派领袖之一, 曾任政府首脑(1843 和 1868), 内务大臣(1865—1868), 1868 年起追随卡洛斯派。——453、454、480、588。
- 戈登, 罗伯特(Gordon, Sir Robert 1791—1847)——英国外交官,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1828—1831)和驻维也纳(1841—1846)特命全权大使,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阿伯丁的弟弟。——15、366。
- 戈多伊·阿尔瓦雷斯·德·法里亚·里奥斯·桑切斯·萨尔索萨, 曼努埃尔·德, 和平公爵(Godoy Alvarez de Faria Rios Sánchez Zarzosa, Manuel de, duque de Alcudia 1767—1851)——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查理四世的大臣, 西班牙实际上的执政者(1792—1798 和 1801—1808), 1795 年起受封为“和平公爵”; 曾帮助法国人占领西班牙, 1808 年被人民起义赶下台。——504、511、515、523、524、545、589。
- 戈尔德林, 埃德温(Goldering, Edwin)——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 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1。
- 戈尔韦子爵, 乔治·爱德华·阿伦德尔(Galway, George Edward Arundell, Viscount 1805—1876)——英国贵族,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52。
- 哥尔查科夫公爵,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нязь 1793—1861)——俄国将军, 曾任多瑙河俄军司令(1853—1854), 南方军团总司令(1854 年 9 月—1855 年 2 月), 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1855 年 2—12 月); 波兰王国总督(1856—1861)。——3、32、42、81、141、142、145、211、263、347、395、406、408、429、459、460。
- 哥尔查科夫公爵,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нязь 1798—1883)——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 外交大臣(1856—1882), 总理大臣(1867—1882)。——389、398、405、467、475。
- 哥特弗里德(布永的)(Godefroy de Bouillon[Geoffrey de Bouillon]约 1060—1100 年左右)——下洛林公爵(1076—1100),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的

- 首领之一；耶路撒冷国王(1099—1100)。——91。
- 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Georgi Petrovič 1827—1856)——黑山将军，丹尼洛·涅哥什的亲戚。——265。
- 格拉赫，弗里德里希(Grach, Friedrich 1812—1854)——普鲁士军官，1841年起在土耳其供职，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的领导者之一。——339—341。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52、98、128—132、198、199、228、272—278、323、611。
- 格兰维尔伯爵，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of 1815—1891)——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和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和1886)，枢密院院长(1852—1854、1855—1858和1859—1865)。——217、218。
- 格雷伯爵，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Earl of 1802—189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陆军大臣(1835—1839)，陆军大臣兼殖民大臣(1846—1852)；查·格雷的儿子。——216、300。
-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325。
- 格雷厄姆，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和1852—1855)，内务大臣(1841—1846)。——67、86、94、99、101、106、115、128、226、275、323、475、724。
- 格里贝(Гриббе)——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674。
- 格里姆肖，莫蒂默(Grimshaw, Mortimer 约生于1827年)——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1853—1854年普雷斯顿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1854年工人议会的参加者。——290、740。
- 格里瓦斯，泰奥多拉基斯(Grivas, Theodorakis 1796—1862)——希腊政治活动家，1854年希腊起义的领袖之一。——253、254。
- 格罗夫纳，罗伯特勋爵，伊伯男爵(Grosvenor, Lord Robert, Baron Ebury 1801—1893)——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68。

葛伊甸, 洛金·彼得洛维奇——见海登伯爵。

古里耶夫伯爵, 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Гурьев,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раф 1751—1825)——俄国国务活动家, 曾任财政大臣(1810—1823)。——59。

古铁雷斯·德拉孔查(孔查), 何塞, 哈瓦那侯爵(Gutiérrez de la Concha[Concha], José, marqués de la Habana 1809—1895)——西班牙将军, 1850—1852和1854—1859年任古巴军事总督, 镇压古巴民族解放运动; 1868年为首相。——479。

古铁雷斯·德拉孔查(孔查), 曼努埃尔, 杜埃罗侯爵(Gutiérrez de la Concha[Concha], Manuel, marqués del Duero 1808—1874)——西班牙将军, 温和派; 1854年任军事洪达主席, 镇压西班牙革命(1854—1856)的组织者之一。——450、486、603。

圭尔夫家族——不列颠皇族。——721—722。

H

哈布斯堡王朝——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1273—1806年, 其间有间断)、西班牙王朝(1516—1700)、奥地利皇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346、357、509。

哈茨利特(Hartslet)——英国外交官, 曾任驻梅梅尔领事。——488。

哈德威克伯爵, 查理·菲利浦·约克(Hardwicke, Charles Philip York, Earl of 1799—1873)——英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216、421。

哈丁子爵, 亨利(Hardinge, Henry, Viscount 1785—1856)——英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5年起为陆军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1815)的参加者, 曾任陆军大臣(1828—1830和1841—1844), 印度总督(1844—1848年1月), 英军总司令(1852—1856)。——9。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 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 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 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 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 写有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206—210、305、651—652、655、664、691。

哈里逊(Harrison)——262。

哈里逊, 乔治(Harrison, George)——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38、741。

- 哈利勒帕沙(Halil Pasha 死于1856年)——上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多次任大臣职务;1854—1855年为海军大臣。——28。
-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约瑟夫(Hammer-Purgstall, Joseph 1774—1856)——奥地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1796—1835年担任近东方面的外交职务;写有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109、113、324。
- 海登伯爵,路德维克·西吉斯蒙德·文森特·古斯塔夫[葛伊甸,洛金·彼得洛维奇](Геиден Людвиг Сигизмунд Винсент Густаф [Гейден, Логин Петрович], граф 1772—1850)——俄国海军上将,荷兰人,1827年指挥波罗的海舰队的分舰队,完成对地中海的远征,并参加了纳瓦里诺海战(1827);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任地中海俄国海军总司令。——361。
- 海克伦男爵,雅科布(Heeckeren, Jakob, Baron van)——荷兰外交官;30年代任驻彼得堡公使,1842—1876年任驻维也纳大使。——405。
- 海瑙男爵,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 Freiherr von 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曾任总司令(1849),率领奥地利军队去镇压匈牙利革命。——610。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60、413。
- 汉弗莱斯(Humphries, Prince)——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1。
- 汉密尔顿——见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
- 汉普敦,约翰(Hampdon, John 1594—164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反对专制独裁,革命斗争的参加者,在国内战争中牺牲。——725。
- 豪登——见卡拉多克,约翰·霍巴特,豪登男爵。
- 和平公爵——见戈多伊·阿尔瓦雷斯·德·法里亚·里奥斯·桑切斯·萨尔索萨,曼努埃尔·德,和平公爵。
- 赫伯特,悉尼·利男爵(Herbert, Sidney, Baron of Lea 1810—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1845),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1)。——93、432、436。
- 赫德森(Hudson, H.)——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赫勒尔, 伊西多尔 (Heller, Isidor 1816—187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作家; 卡·路·冯·布鲁克的私人秘书。——263。
- 赫鲁廖夫, 斯捷潘·亚历山大罗维奇 (Хрулёв, Степ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07—1870)——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多瑙河和克里木驻军指挥官, 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参加者。——408。
- 赫斯男爵, 亨利希·海尔曼·约瑟夫 (Heß, Heinrich Hermann Joseph Freiherr von 1788—1870)——奥地利将军, 后为元帅, 曾参加镇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 1854—1855 年任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奥军总司令, 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马真塔会战失败后, 统率奥军 (1859 年 6—7 月)。——230、390、468、610。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623。
- 亨策, 尤利乌斯 (Hentze, Julius 1816 左右—1873)——普鲁士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最迟从 1851 年 5 月起成为警探,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原告证人。——475。
- 亨利四世 (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 (1589—1610)。——183。
- 亨利四世——见恩里克四世。
-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伯爵, 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 波尔多公爵 (亨利五世)。
- 亨利, 约瑟夫·沃纳 (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商业和交通大臣 (1852 和 1858—1859)。——438。
- 亨宁森, 查理·弗雷德里克 (Henningsen, Charles Frederic)——英国作家。——205。
- 洪秀全 (1814—1864)——太平天国革命领袖。——117。
- 侯赛因贝伊 (Hüseyn Bei [Hussein Bey])——土耳其将军。——114。
- 侯赛因帕沙 (Hussein Pasha)——土耳其将军, 1854 年为锡利斯特里亚保卫战指挥官。——383。
- 胡安一世 (Juan I 1358—1390)——卡斯蒂利亚国王 (1379—1390)。——527。
- 胡安二世 (Juan II 1405—1454)——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国王 (1406—1454)。——503、527。
- 胡利安——见桑切斯, 胡利安。

- 怀尔德,詹姆斯(Wyld, James)——英国测绘学家和制图学家。——189—197、281—282。
- 怀斯,托马斯(Wyse, Thomas 1791—1862)——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39—1841),驻雅典公使(1849—1862)。——114、264、408。
-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 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52、303。
- 霍格,约瑟夫(Hogg, Joseph)——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38、740。
- 霍普公司(Hope & Co.)——英国的一家贸易公司,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设有分公司。——348、352、370。
- 霍瑟姆男爵,博蒙特(Hotham, Beaumont, Baron 1794—1870)——英国将军,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议会议员。——52。
- 霍斯福尔,托马斯·贝里(Horsfall, Thomas Berry 生于1805年)——英国煤矿主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托利党人。——102。
- 霍斯曼,爱德华(Horsman, Edward 1807—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5—1857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90。
- 霍韦利亚诺斯-拉米雷斯,加斯帕尔(Jovellanos y Ramirez, Gaspar 1744—1811)——西班牙国务活动家、作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继承者,持重商主义观点;反对西班牙的封建教权制度;曾任司法大臣(1797—1798),1808—1810年为中央洪达左翼少数派的领袖。——517、523—525、529、547、578。

J

- 基罗加,安东尼奥(Quiroga, Antonio 1784—1841)——西班牙军官,自由主义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555—557、567。
- 基谢廖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Кисел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0—1869)——俄国外交官,曾任驻巴黎大使(1851—1854)。——26、63、77、261。
- 基谢廖夫伯爵,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Киселе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раф 1788—187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将军,1812年为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29—1834年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俄国行政当局

- 首脑, 1837—1856年任国家产业大臣, 1856—1862年任驻巴黎大使。——75、259。
- 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奥尔良党人; 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 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571。
- 吉埃米诺伯爵 (Guilleminot, comte de)——法国外交官; 1828—1829年任驻土耳其大使。——366。
- 吉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伯爵, 伊万·伊万诺维奇 (Дибич-Забалкан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раф 1785—1831)——俄国元帅, 原籍德国, 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任总司令, 曾指挥俄国军队镇压 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166、251、334、338、366。
- 吉卡公爵, 格里戈尔·亚历山大 (Ghica [Ghika], Grigore Alexandru, Fürst 1807—1857)——摩尔多瓦国君(1849—1853和1854—1856)。——429—430。
- 吉利斯, 凯瑟琳 (Gillies, Catherine)——287。
- 吉利斯, 玛丽 (Gillies, Mary)——288。
- 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塔, 格雷戈里 (Garcia de la Cuesta, Gregorio 1741—1811)——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522、537、578。
- 加富尔伯爵, 卡米洛·本索 (Cavour, Camillo Benso, conte di 1810—1861)——意大利国务活动家,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和领袖; 撒丁王国政府首脑(1852—1859和1860—1861), 实行在萨瓦王朝霸权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 支持拿破仑第三的政府, 1861年起任第一届意大利政府首脑。——82。
- 加拉科夫,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 (Гал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1802—1863)——俄国将军, 彼得堡警察局长(1852—1856)。——258。
- 加里戈, 安东尼奥·马里亚 (Garrigo, Antonio Maria)——西班牙军官, 曾参加 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386、601。
- 加斯帕里 (Gaspari)——法国外交官, 1854年是驻雅典大使馆成员。——264。
- 贾丁 (Jardine)——伦敦治安法官。——401—402。
- 剑桥公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 (Cambridge, George William Freder-

- ick Charles, Duke of 1819—1904)——英国将军,曾任驻克里木英军师长(1854),英军总司令(1856—1895)。——270、438、596、645、646、678、718。
- 杰尔查文,加甫里拉·罗曼诺维奇(Державин, Гаврила Романович 1743—1816)——俄国诗人,古典主义的代表。——379。
- 杰弗里斯,亨利(Jeffris, Henry)——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39。
- 杰克逊,威廉(Jackson, William)——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39。
- 捷舍(Teme)——俄国海军军官,博马尔松德保卫战的参加者。——495。
- 金塔纳,曼努埃尔·何塞(Quintana, Manuel José 1772—1857)——西班牙诗人和政治活动家,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的拥护者,曾参加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1808—1810年任中央洪达的秘书。——525、535。
- 久洛伊,费伦茨,毛罗什-纳梅特和纳达什卡伯爵(Gyulay [Giulay], Ferenc, Graf von Maros-Németh und Nádaska 1798—1868)——奥地利元帅,匈牙利人,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曾任陆军大臣(1849—1850),1859年意大利战争初期指挥奥地利军队,在马真塔战败。——390。
- 君士坦丁(Constantinos)——希腊船长。——263。

K

喀德邻二世——见叶卡捷琳娜二世。

- 卡波·迪斯特里亚伯爵,乔瓦尼·安东尼奥(Capo d'Istria, Giovanni Antonio Graf 1776—1831)——希腊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年在俄国供职,任外交副大臣(1815—1822),曾参加维也纳会议(1815);后任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后被外国间谍所谋杀。——604。
- 卡德龙·德拉巴卡,佩德罗(Calderó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525。
- 卡德威尔子爵,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Viscount 1813—1886)——英国政治活动家,最初归属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领袖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279。
- 卡迪根伯爵,詹姆斯·托马斯·布鲁德内尔(Cardigan, James Thomas Brudenell,

- Earl of 1797—1868)——英国将军, 1854 年任克里木英军骑兵旅长。——438、596、620、678。
-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Karl-Ludwig-Johann 1771—1847)——奥地利大公, 元帅, 在历次对法战争(1796、1799、1805 和 1809)中任总司令, 曾任陆军大臣(1805—1809)。——143。
- 卡尔第三(帕尔马公爵)(Carlo III [Duke of Parma] 1823—1854)——帕尔马公爵(1849 年起)。——719。
- 卡尔尼塞罗, 何塞·克莱门特(Carnicero, José Clemente)——西班牙作家, 写有西班牙历史方面的著作。——516。
- 卡尔瓦哈尔, 托马斯·何塞·冈萨雷斯(Carvajal, Tomás José González 1753—1834)——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1820 年任马德里驻军司令官和新卡斯蒂利亚军事总督; 斐迪南七世的支持者。——568。
- 卡尔沃·德·罗萨斯, 洛伦索(Calvo de Rozas, Lorenzo)——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的参加者, 萨拉戈萨防御战(1808)的组织者, 中央洪达委员, 加的斯议会的倡导者之一。——525。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30—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 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法国陆军部长(1848 年 5—6 月), 镇压巴黎六月起义, 曾任政府首脑(1848 年 6—12 月), 立法会议员(1849—1851);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622。
- 卡夫雷拉-格里尼奥, 拉蒙, 莫雷利亚伯爵(Cabrera y Grinó, Ramón, conde de Morella 1806—1877)——西班牙将军, 1833—1840 年和 1872—1876 年内战时期为卡洛斯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448。
- 卡拉多克, 约翰·霍巴特, 豪登男爵(Caradoc, John Hobart, Baron Howden 1799—1873)——英国外交官, 驻马德里公使(1850—1858)。——418、477、479。
- 卡拉法伯爵(Caraffa, conte)——396。
- 卡拉姆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俄国历史学家和作家, 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编纂学家。——103。

- 卡拉斯科, 奥古斯丁(Carrasco, Agustin)——西班牙经济学家;曾任财政大臣(1844—1846)。——481。
- 卡拉特拉瓦, 何塞·玛丽亚(Calatrava, José Maria 1781—1847)——西班牙政治活动家,曾任司法大臣(1824)。——571。
- 卡利尔吉斯, 德米特里(Kalergis, Demetrios 1803—1867)——希腊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21—1829年曾参加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的解放斗争,1854—1855年为陆军大臣。——604。
- 卡利克, 安东(Kalik, Anton 生于1818年)——奥地利军官,1854年在多瑙河两公国执行外交使命。——475。
- 卡列哈·德尔·雷伊, 费利克斯·玛丽亚, 卡德龙伯爵(Calleja del Rey, Félix Maria, conde de Calderón 1750—1820)——西班牙将军,西班牙驻墨西哥部队指挥官,墨西哥总督(1813—1816)。——556。
- 卡罗, 何塞·本图拉(Caro, José Ventura 1742—1809)——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08—1809)。——530。
- 卡罗琳(Caroline 1768—1821)——英国王后(1820—1821),乔治四世的妻子。——454。
- 卡洛斯(老卡洛斯), 唐, 玛丽亚·伊西多尔(波旁的)(Carlos, Don, Maria Isidore de Borbon 1788—1855)——西班牙王位追求者,1833—1840年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期间,曾企图夺取王位,斐迪南七世的弟弟。——414、448、560、584、645。
- 卡姆马腊诺, 萨尔瓦托雷(Cammarano, Salvatore 1801—1852)——意大利演员、艺术家和剧作家。——256。
- 卡涅多, 阿隆索(Cañedo, Alonso)——西班牙神父,加的斯议会议员。——550。
- 卡思卡特, 乔治(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3—1814)和滑铁卢战役(1815),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645、665、678。
- 卡斯塔尼奥斯-阿拉贡尼, 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 拜伦公爵(Castaños y Aragoni, Francisco Xavier, duque de Bailén 1758—1852)——西班牙将军,在拜伦会战中任西班牙军队指挥官;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519、521、538、578。
- 卡斯泰尔巴雅克侯爵, 巴塞勒米·多米尼克·雅克·阿尔芒 (Castelbajac, Barthélemy Dominique-Jacques-Armand, marquis de 1787—1864)——法国将

- 军, 正统主义者; 1850—1854 年任驻彼得堡公使, 1856 年起为第二帝国参议员。——43, 64, 77。
- 卡斯特罗——见佩雷斯·德·卡斯特罗, 埃瓦里斯托。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64, 414。
- 凯萨达-马泰乌斯(凯萨达), 赫纳罗, 米拉瓦列斯侯爵(Quesada y Matheus [Quesada], Jenaro, marqués de Miravalles 1818—1889)——西班牙将军和国务活动家, 1854 年任马德里军事总督。——386。
- 坎伯尔, 赛米尔(Campbell, Samuel)——287。
- 坎迪利特, 乔治(Candelet, George)——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 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坎迪利特, 詹姆斯(Candelet, James)——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 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坎宁——见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 坎宁, 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政治活动家, 外交官, 托利党领袖, 议会议员,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 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 和 1822—1827), 首相(1827)。——157, 363。
- 康波曼内斯伯爵, 佩德罗·罗德里格斯(Campomanes, Pedro Rodriguez, conde de 1723—1803)——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开明君主制度的拥护者; 曾任财政大臣(1762—1791)。——547。
- 康罗贝尔, 弗朗索瓦·塞尔坦(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法国将军, 1856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30—40 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4 年 9 月—1855 年 5 月), 克里木战争和奥意法战争期间任军长,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六军军长, 在梅斯被俘。——470, 659, 661, 667, 668, 683, 689, 697。
- 康普萨诺, 弗朗西斯科(Campuzano, Francisco)——西班牙将军, 1854 年任马德里驻军指挥官。——387。
- 康斯坦丁——见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
- 康斯坦丁——见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 1814 年起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和波兰总督。——714。
-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国大

- 公,海军元帅,1850年任国务会议委员、海军条令修改委员会主席和军械临时委员会主席,1852年任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853年任代理海军大臣,1855—1881年任海军大臣,1857年任农民事务机密委员会委员,1860年任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1862—1863年任波兰王国总督;尼古拉一世的次子。——258—259,342。
- 考莱伯爵,亨利·理查·查理·韦尔斯利(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巴黎大使(1852—1867)。——95,97,166,171。
- 考威尔,乔治(Cowell, George)——英国工人,宪章运动活动家,1853—1854年普雷斯顿大罢工领导人之一;曾出席工人议会(1854)。——201,290,740。
- 柯瓦列夫斯基,叶戈尔·彼得罗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гор Петрович 1811—1868)——俄国军官、作家和外交官;1853年任驻黑山专员,后来在多瑙河(1853—1854)和克里木(1854)的俄军司令部任职。——266。
- 科堡——见萨克森-科堡-哥达。
- 科堡-布拉干柴——见布拉干柴-科堡。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216,316。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主义者,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43,49—51,87—93,224,425,479。
- 科策布,威廉·冯(Kotzebue, Wilhelm von)——俄国外交官,原籍德国,1849年任驻布加勒斯特领事。——375。
- 科尔蒙太涅,路易·德(Cormontaigne, Louis de 1696左右—1752)——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写有关于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306。
- 科尔尼洛夫,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黑海舰队参谋长(1849—1853),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阵亡。——22。
- 科尔特斯,埃尔南(Cortés, Hernán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阿兹台克人(墨西哥人)国家的征服者(1519—1521);1522年任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和军事总督。——509。

- 科哈里——见玛丽·安东尼·加布里埃莱·冯·科哈里。
- 科克,沙尔·保尔·德(Kock, Charles-Paul de 1794—1871)——法国作家,著有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169。
- 科拉第,费南多(Corradi, Fernando 1808—1885)——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人民呼声报》主编。——586。
- 科利亚多,何塞·曼努埃尔(Collado, José Manuel)——西班牙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进步派,曾任财政大臣(1854—1856)。——388,477,587。
- 科罗尼尼-克龙贝格伯爵,约翰·巴蒂斯特(Coronini-Cronberg, Johann Baptist Graf von 1794—1880)——奥地利将军,1854年任驻多瑙河两公国奥军军长。——370,405。
- 科斯坦达(Костанда)——俄国上校,1854年锡利斯特里亚会战的参加者。——342。
-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9,100,167,254,324,724。
- 克尔,珍妮特(Kerr, Janet)——288。
- 克耳纳·冯·克伦施坦男爵,弗里德里希(Kellner von Köllenstein, Friedrich Freiherr von 1802—1883)——奥地利将军,1849年起为皇帝弗兰卡-约瑟夫一世的侍卫长。——75。
- 克洪,罗伯特·吉尔摩(Colquhoun, Robert Gilmour 1803—1870)——英国驻布加勒斯特总领事(1834—1858)。——378,640。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官,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1847—1852),曾镇压爱尔兰1848年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63—64,88—89,95—98,108,113,115,127,161,165,170—176,215,216,220,224,227,367,411,422,467,468,476。
- 克莱门蒂娜——见玛丽·克莱门蒂娜·卡罗琳·莱奥波迪娜·克洛蒂尔达(奥尔良的)。
- 克兰里卡德侯爵,乌利克·约翰·德·伯格(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Marquess of 1802—1874)——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辉格党人;爱尔兰的

- 大庄园主；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38—1841)、邮政大臣(1846—1852)和掌玺大臣(1852—1858)。——11、62、361、365—367、422。
- 克兰沃思男爵，罗伯特·蒙西·罗尔夫(Cranworth, Robert Monsey Rolfe, Baron 1790—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辉格党人；曾任大法官(1852—1858和1865—1866)。——203。
- 克里斯蒂娜——见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 克鲁森施特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Крузенштер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为敖德萨军事总督。——608。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725。
- 克罗珀(Cropper, E. C.)——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39。
- 克梅蒂，乔治——见伊斯迈尔帕沙。
- 克萨韦拉斯(Xavellas)——希腊起义领袖(1854)。——253。
- 肯宁安(Cunningham, C.)——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加拉茨领事(1853)。——273、278。
- 肯特公爵——见爱德华，肯特公爵。
- 孔查——见古铁雷斯·德拉孔查，何塞，哈瓦那侯爵。
- 孔查——见古铁雷斯·德拉孔查，曼努埃尔，杜埃罗侯爵。
- 孔塔多尔(Contador)——西班牙将军；曾任陆军大臣(1823)。——567。
- 库埃斯塔——见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塔，格雷戈里。
- 库尔西德帕沙——见盖昂，理查·德博弗尔。
- 库拉金公爵，亚历山大·波里索维奇(Кура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князь 1752—1818)——俄国外交家，总理副大臣(1796—1798和1801—1802)，1807年参加签订俄法之间蒂尔西特和约，曾任驻巴黎大使(1808—1812)。——513。
- 库西，斐迪南·冯(Cussy, Ferdinand von)——德国政论家。——4、10—13、15、16、26、57、95、103、108、116、175、184、231、243、279、324、359—367、379、398、421、472、488、559、585。
- 奎因，迈克尔，约瑟夫(Quin, Micheal Joseph)——英国作家。——582。

L

- 拉比斯瓦尔伯爵, 恩里克·何塞·奥当奈尔(La Bisbal, Enrique José O' Donnel, conde de 1769—1834)——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 以毫无原则著称; 在反动时期(1814—1820)同自由派有联系, 同时叛变革命, 投靠政府; 1820年被派去镇压列戈起义时, 又站到革命者一边, 企图利用起义达到个人目的。——538, 555, 558。
- 拉德沃基伯爵, 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 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 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237, 251, 390, 396, 600, 685。
- 拉斐德侯爵, 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贝尔·莫蒂埃(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Roch Yves-Gilbert Motier, 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 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 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 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 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555。
- 拉格伦男爵, 非茨罗伊·詹姆斯·亨利·萨默塞特(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 1854年起为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1815)的参加者, 曾任威灵顿的秘书(1808—1814)、总司令部军务秘书(1827—1855), 军械总长(1852—1854), 克里木英军总司令(1854—1855)。——269, 295, 311, 318, 347, 350, 433, 438, 443, 444, 470, 476, 621, 623, 627, 636—637, 657—661, 666, 669, 672—681, 683, 685, 689, 692。
- 拉吉斯克兹(Radschiskz)——263。
- 拉加尔德伯爵, 奥古斯特·玛丽·巴尔塔扎尔·沙尔·佩尔蒂埃(Lagarde, Auguste-Marie-Balthazard-Charles Pelletier, comte de 生于1780年)——法国将军和外交家, 曾以反革命流亡者身分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 1806—1814年在普鲁士军队中供职,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 曾任驻马德里大使(1820—1823)。——572。
- 拉腊, 胡安(Lara, Juan)——西班牙将军, 曾任陆军大臣(1851—1853), 1854年

- 任新卡斯蒂利亚军区司令官。——385、386、417。
- 拉利-托朗达尔侯爵,特罗菲姆·热拉尔(Lally-Tollendal, Trophime-Gérard, marquis de 1751—1830)——法国政治活动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温和的保皇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利益。——525。
- 拉罗沙,拉蒙(La Rocha, Ramon)——西班牙将军。——416。
- 拉罗什雅克兰侯爵,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杜韦尔日耶(La Rochejaquelein, Henri-Auguste-Georges Du Vergier, marquis de 1805—1867)——法国政治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导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2年起为第二帝国参议员。——43。
- 拉马尔摩拉侯爵,阿尔丰索·费雷罗(La Marmora, Alfonso Ferrero, marchese di 1804—1878)——意大利将军和国务活动家,皮埃蒙特陆军大臣(1848、1849—1855和1856—1859),1855年任克里木撒丁军团指挥官,曾任首相(1859—1860和1864—1866)。——395。
- 拉莫里谢尔,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瑞绍·德(Lamoricière, Christophe-Léon-Louis Juchault de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参与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长(1848年6—12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7年回到法国,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622。
- 拉斯卡斯伯爵,艾曼纽埃尔·奥古斯坦·迪约多内·马兰·约瑟夫(Las Cases, Emmanuel-Augustin-Dieudonné-Marin-Joseph, comte de 1766—1842)——法国军官和历史学家,拿破仑第一的秘书;1815—1816年曾陪同拿破仑第一前往圣赫勒拿岛。——174。
- 拉塔什,米哈伊尔(奥美尔帕沙)(Lataş, Mihail [Omer Pasha] 1806—1871)——土耳其将军,原籍克罗地亚;克里木战争时期先后在巴尔干半岛(1853—1854),克里木(1855)和高加索(1855—1856)任土军总司令。——3、32、38、57、66、72、80、81、141—144、200、237—238、251、268、318—319、334、342、347、355、377、378、383、406—407、428、435、438、442、444、459、469、475、476、596、610、631、634、637、639、699、723。
- 拉瓦莱特侯爵,沙尔·让·玛丽·费利克斯(Lavalette [La Valette], Charles-Jean Marie Félix, marquis de 1806—1881)——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1—1853),内务大臣(1865—1867)和外

- 交大臣(1868—1869)。——87、198、222。
- 拉瓦索拉男爵(Labazora, baron de)——西班牙军官,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中央洪达委员。——530。
- 拉西,路易斯·德(Lacy, Luis de 1775—1817)——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因企图在卡泰罗尼亚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而被处死。——538、554、561。
- 莱昂斯,埃德蒙(Lyons, Edmund 1790—1858)——英国海军上将;曾任驻雅典公使(1835—1849),瑞士公使(1849—1851)和瑞典公使;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3—1856),曾任黑海舰队副总司令(1854)、总司令(1855)。——110、295、408、636、668。
- 莱奥波德一世(Léopold I [Leopold] 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714。
- 莱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1747—1792)——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0—1792)。——124。
- 莱奥波德二世——见莱奥波德-路易-菲利浦-玛丽-维克多。
- 莱奥波德二世(Leopoldo II 1797—1870)——托斯卡纳大公(1824—1859)。——635。
- 莱奥波德-路易-菲利浦-玛丽-维克多 (Léopold-Louis-Philippe-Marie-Victor 1835—1909)——比利时国王,称莱奥波德二世;莱奥波德一世的儿子。——714。
- 莱宁根-威斯特堡伯爵,克里斯蒂安·弗兰茨(Leinigen-Westerburg, Christian Franz Graf 1812—1856)——奥地利将军,曾率特派使团赴君士坦丁堡(1853)。——75、223。
- 莱亚德,奥斯丁·亨利(Layard, Auste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起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大臣助理(1861—1866),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77—1880),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1885)。——52、85、86、180、220—224、360—361、426。
- 兰开斯特,查理·威廉(Lancaster, Charles William 1820—1878)——英国工程师和武器技术领域的发明家。——660。
-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e, Marquess of 1780—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

- (1806—1807), 枢密院院长(1830—1841 和 1846—1852), 不管部大臣(1852—1858)。——53、216。
- 老米尔查(Mircea cel Bătrîn 死于 1418 年)——瓦拉几亚国君(1386), 曾为反对土耳其的入侵而斗争。——374。
- 勒费弗尔, 弗朗索瓦-约瑟夫, 但泽公爵(Lefebvre, François-Joseph, duc de Dantzig 1755—1820)——法国元帅, 1799 年任多瑙河部队指挥官, 雾月十八日政变时任巴黎卫戍部队司令, 1800 年起为参议员, 1806—1807 年同普鲁士作战时任禁卫军指挥官, 1808 年西班牙战争中任第四军军长, 1809 年同奥地利作战时任巴伐利亚部队指挥官。——519。
- 勒鲁瓦——见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
- 雷德福, 约瑟夫(Radford, Joseph)——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 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1。
-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拉特福·坎宁。
- 雷诺(Reynolds)——英国法学家, 1854 年任财政部律师。——402。
- 雷塞伯爵, 古斯塔夫·阿尔芒·昂利(Reiset, Gustave-Armand-Henri, comte de 生于 1821 年)——法国外交官和作家; 1853 年任驻彼得堡大使馆一等秘书。——38。
- 雷文特洛-克里米尼尔伯爵, 亨利希(Reventlow-Griminil, Heinrich Graf von 1798—1869)——丹麦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1842—1848), 荷尔斯泰因事务大臣(1852—1854)。——26。
- 里奥斯-罗萨斯, 安东尼奥·德洛斯(Rios y Rosas, Antonio de Los 1812—187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温和派, 议会议员, 曾任内务大臣(1856)。——480。
- 里博(Ribot, A.)——西班牙新闻工作者。——447、448、451—453。
- 里迪格尔伯爵,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Ридигер, 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3—1856)——俄国将军, 参加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和匈牙利 1849 年革命; 1854 年任波兰总督。——472。
- 里珀塔男爵(Ripperta, Baron)——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402。
- 里士满公爵, 查理·戈登-伦诺克斯(Richmond, Charles Gordon-Lennox, Duke of 1791—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保护关税派, 议会议员。——53。
- 里韦罗(Rivero)——西班牙将军。——387。

- 里扎帕沙(Riza Pasha 1809—1859)——土耳其将军和国务活动家,40—50年代曾多次任陆军大臣。——28,71,107,318。
- 理查,维森特(Richard, Vicente 死于1816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家,曾发动起义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起义失败后被处死。——561。
-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贝特(Richards, Alfred Bate 笔名一个英国人 An Englishman 1820—1876)——英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50年代曾同乌尔卡尔特派进行论战。——49,55。
- 利顿(Lytton)——英国医生。——403。
- 利法特帕沙,萨迪克(Rifat Pasha, Sadik 1798—1855)——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1853年3—5月),总理大臣(1853年5月—1854年3月)。——198,213。
- 利普兰迪,帕维尔·彼得罗维奇(Липранди,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4)——俄国将军,曾任多瑙河俄军师长(1853—1854)、克里木俄军师长(1854—1855),在黑河战役中任军长。——370,631,663,670,674,680,699。
- 利日埃,阿尔丰斯(Ligier, Alphonse)——法国外交官,曾任驻西班牙卡塔赫纳领事。——415。
- 利文公爵,赫里斯托弗尔·安德烈耶维奇(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нязь 1774—1839)——俄国外交官,曾任驻柏林公使(1810—1812),驻伦敦大使(1812—1834)。——361—362。
- 利物浦伯爵,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Earl of 1770—182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屡任内阁大臣,曾任首相(1812—1827)。——583。
- 列戈-努涅斯(列戈),拉斐尔·德(Riego y Núñez [Riego], Rafael de 1785—1823)——西班牙军官,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后被处死。——538,556—558,567,569,571,580。
- 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Baron 1772—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大法官(1827—1830,1834—1835和1841—1846)。——360,363。
- 林肯(Lincoln, J. H.)——英国新闻工作者,《每日新闻》编辑。——205。
- 林纳赫,弗朗西斯科(Linage, Francisco 1795—1847)——西班牙将军,进步党人,埃斯帕特罗的秘书(1835年起)和密友,1843年任步兵和国民军总监;埃

- 斯帕特罗的专政被推翻之后,随同埃斯帕特罗流亡英国。——449。
- 卢基扬诺维奇,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Лукьянович,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806左右—1855以后)——俄国军官和军事史学家,1828—1829年俄土战争、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和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205。
- 卢肯伯爵,乔治·查理·宾厄姆(Lucan, George Charles Bingham, Earl of 1800—1888)——英国将军,托利党人,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骑兵师长。——645、679。
- 卢纳,阿尔瓦罗·德(Luna, Alvaro de 1388—1463)——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国王胡安二世的大臣。——503。
- 鲁宾逊,阿伯拉罕(Robinson, Abraham)——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140、738、740。
- 鲁宾逊,约翰(Robinson, John)——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鲁库鲁斯(鲁齐乌斯·李奇尼乌斯·鲁库鲁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 约公元前106—57年)——罗马统帅,曾任执政官,以家产富有和举行豪华宴会而闻名。——118。
- 鲁瓦耶,冯(Royer, von)——普鲁士外交官,1829年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366。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721。
- 路汉,弗朗西斯科(Lujan, Francisco 1798—1867)——西班牙将军、著作家和科学家,温和派;西班牙科学院创始人之一,1836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国民经济发展大臣(1854、1856和1863)。——461、486。
- 路西德帕沙,穆斯塔法·穆罕默德(Reschid Pasha, Mustafa Mehemed 1800左右—1857)——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总理大臣(1846—1852和1856—1857);外交大臣(1853年5月—1855年5月)。——26、27、28、107、241、254、392、394—395、429、430。
-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504。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57、183。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 --1774)——法国国王(1715 —1774)。——721。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 —1793)——法国国王(1774 —1792),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569。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 —1824)——法国国王(1814 —1815 和 1815 —1824)。——572。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 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 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 —1850)——法国国王(1830 —1848)。——105、109、110、116、127、215、328、449、452、480、714。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莎-玛丽亚-泰莉莎-卡罗琳-伊莎贝尔(奥尔良的)(Louise-Marie-Thérèse-Caroline-Isabelle d'Orléans 1812 —1850)——路易-菲利浦一世的女儿, 莱奥波德一世的妻子。——714。
- 路易斯(Lewis)——英国法学家。——402。
- 吕德尔斯,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 —1874)——俄国将军, 1853 —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 1855年任南方军团指挥官, 1856年初任克里木俄军总司令, 1861 —1862年任波兰总督。——142、211、268、347、370、395、695。
- 吕利埃尔, 约瑟夫·马塞兰·德(Rullière [Rulhière], Joseph Marcellin de 1787 —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3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 —1849年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和陆军部长,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退职。——331。
- 罗巴克, 约翰·阿瑟(Roebuck, John Arthur 1801 —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 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29、87、713。
- 罗德里格斯, 马丁内斯(Rodriguez, Martinez)——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1823年任陆军大臣。——567。
- 罗尔夫——见克兰沃思男爵, 罗伯特·蒙西·罗尔夫。
- 罗曼纳(罗梅里亚斯)侯爵, 佩德罗·卡罗-苏雷达(Romana [Romerias], Pedro Caro y Sureda, marqués de la 1761 —1811)——西班牙将军, 1807 —1808年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西班牙驻军指挥官,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 —1814)的参加者, 阿斯图里亚斯中央洪达委员。——519、529、530、537、578。

罗斯·德·奥兰诺, 安东尼奥, 阿尔米诺伯爵 (Ros de Olano, Antonio, conde de Almino 1808—1886)——西班牙将军、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温和派,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在 1859—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军长。——387。

罗斯, 唐纳德 (Ross, Donald)——英国政论家。——286—289。

罗斯, 休·亨利 (Rose, Hugh Henry 1801—1885)——英国将军, 后升元帅, 驻君士坦丁堡代办 (1852—1853),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驻克里木法军司令部代表;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镇压者之一; 曾任驻印军队司令 (1860—1865), 驻爱尔兰武装部队司令 (1865—1870)。——96—97、198、273、278。

罗素伯爵, 约翰 (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 枢密院院长 (1854—1855); 1855 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42、53、64、75—76、87、93—96、99、104—108、115、127、128、152、156—159、161—171、179、220、223、224、227、243、279、311—316、325、359、361、367、411、420、423—426、431、432、436—438、635、701、721、724。

洛佩斯·巴尼奥斯 (López Baños)——西班牙军官,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1808—1814) 和 1820—1823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 1820 年任陆军大臣。——555。

洛佩斯, 华金·马里亚 (López, Joaquin Maria 1798—1855)——西班牙法学家、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党的领袖, 1843 年为政府首脑。——450、453。

洛桑诺·德托雷斯, 胡安·埃斯特万 (Lozano de Torres, Juan Esteban)——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1818—1819 年任司法大臣。——531。

M

马德维, 约翰·尼古拉 (Madvig, Johan Nicolai 1804—1886)——丹麦语言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1849—1874), 议会议长 (1856—1863), 文化和教育大臣 (1848—1851)。——489。

马蒂尼亚克, 让·巴蒂斯特·西尔韦尔·加耶·德 (Martignac, Jean-Baptiste-Sylvère Gaye de 1778—1832)——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律师, 保皇党人, 1823 年参加镇压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 1828—1829 年任内务大臣, 实际上是内阁首脑。——560—561。

马丁内斯·德·拉·罗萨, 贝尔迪霍·戈麦斯-阿罗约 (Martinez de la Rosa,

- Berdejo Gómez y Arroyo 1787 --1862)——西班牙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派领袖之一,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曾任政府首脑(1834—1835),内务大臣(1844—1846)。——410、568、571—572。
- 马丁内斯·圣马丁,何塞(Martinez San Martin, José)——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21年任马德里总督。——570。
- 马尔格雷夫——见诺曼比侯爵,乔治·奥古斯塔斯·康斯坦丁·菲普斯。
- 马尔利安尼,曼努埃尔(艾曼努埃尔)·德(Marliani, Manuel[Emanuel] de 死于1873年)——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1859年以后侨居意大利。——448、478、508、550、561、583。
- 马尔蒙,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德(Marmont, Auguste-Frédéric-Louis de 1774—1852)——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4年4月投靠波旁王朝,1830年七月革命时期为查理十世军队的指挥官。——112。
- 马尔切西-奥莱亚加,何塞·马里亚(Marchesi y Oleagae, José Maria 1801—1879)——西班牙将军,温和派,曾任卡泰罗尼亚军区司令官(1853—1854),陆军大臣(1864)。——416。
- 马尔滕斯,卡尔·冯(Martens, Karl von 1790—1863)——德国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4、10—13、15、16、26、57、95、103、108、116、175、184、231、243、279、324、359—367、379、398、421、472、488、559、594。
- 马夫罗科尔扎托斯,尼古拉斯(Maurocordatos[Mavrocordato], Nicolas)——摩尔多瓦军官,1854年任摩尔多瓦军队最高指挥官。——609。
- 马夫罗科尔扎托斯,亚历山大(Maurocordatos, Alexander 1791—1865)——希腊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1822年任希腊第一届国民议会主席,1823年任第一届政府主席;曾多次任驻巴黎公使(1850—1854),政府首脑(1841、1844和1854—1855)。——313。
- 马更些,托马斯·托米奇(Макензи, Фома Фомич 死于1786年)——俄国海军上将,苏格兰人,1783—1786年任黑海分舰队司令,塞瓦斯托波尔的创建人。——666。
- 马更些,约翰(Mackenzie, John)——288。
- 马吉埃罗,乔治乌(Maghiere, Georgiu 生于1804年)——瓦拉几亚将军,资产阶级革命家,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和瓦拉几亚革命军司令官。——378。
- 马罗托,拉斐尔(Maroto, Rafael 1783—1847)——西班牙将军,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期间(1833—1840)任卡洛斯派军队总司令(1838—1839)。——448。

- 马茂德二世 (Mahmud II. 1785 --1839)——土耳其苏丹(1808—1839)。——339。
-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和1874—1876)。——73—74, 216—218, 722。
- 马萨尔雷多,曼努埃尔·德(Mazarredo, Manuel de 1807—1857)——西班牙将军,曾任陆军大臣(1847),1854年为巴斯克军区司令官。——416。
- 马瑟森(Matherson)——287。
- 马图舍维奇伯爵,安德烈(Матушевич, Андрей, граф 1796—1842)——俄国外交官,曾代表俄国出席特罗保会议(1820)、维罗纳会议(1822)和伦敦会议(1830)。——302, 303。
- 马修,约翰(Matthew, John)——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马扎里尼,朱利奥·雷蒙多(Mazarini, Giulio Raymondo 1602—1661)——法国国务活动家,意大利人,罗马教廷驻法国的使节(1634—1636),红衣主教(1641年起),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际上是法国的统治者;专制制度的拥护者。——187。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的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167, 254, 425, 599。
- 玛丽-阿梅莉亚(Marie-Amélie 1782—1866)——法国王后(1830—1848),路易-菲力浦一世的妻子。——418。
- 玛丽·安东妮·加布里埃莱·冯·科哈里(Marie Antonie Gabriele von Koháry [Cohary] 1797—1862)——斐迪南·格奥尔格·奥古斯特,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妻子。——714。
- 玛丽-罕丽达(Marie Henriette 1836—1902)——奥地利女公爵,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路易-菲力浦-玛丽-维克多的妻子。——714。

- 玛丽·克莱门蒂娜·卡罗琳·莱奥波迪娜·克洛蒂尔达(奥尔良的)(Marie-Clementine-Caroline-Léopoldine-Clotilde d'Orléans)——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一世的女儿,奥古斯特·路德维希·维克多,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的妻子。——714。
- 玛丽-路易莎-费南达(Maria Luisa Fernanda 1832—1897)——西班牙公主,费南多七世的女儿,蒙庞西埃公爵的妻子,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妹妹。——127。
- 玛丽-路易莎-泰莉莎(帕尔马的)(Maria Luisa Teresa de Parma 1751—1819)——西班牙王后(1788—1808),查理四世的妻子。——504、511。
- 玛丽-路易莎-维多利亚,肯特公爵夫人(Marie Luise Victoria, Duchesse of Kent 1786—1861)——肯特公爵爱德华的妻子,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母亲。——714。
- 玛丽-泰莉莎(波旁的)(Maria Teresa de Borbón)——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的表妹,后为戈多伊·阿尔瓦雷斯·德·法里亚·里奥斯·桑切斯·萨尔索萨的妻子。——589。
- 玛丽-泰莉莎(Maria Theresia 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1740—1780);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女皇(1745—1780)。——120、121。
- 玛丽安娜·德巴维埃拉(纽堡的)(Mariana de Baviera Neuburgo 1667—1740)——西班牙王后(1689—1700),查理二世的妻子。——504。
-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Maria II da Gloria 1819—1853)——葡萄牙女王(1826—1828和1834—1853)。——714。
-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29—1833),斐迪南七世的妻子,王国摄政女王(1833—1840)。——388、397、409、413—416、449、453、461、473、480、481、586—589、600、602、719。
-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1824—1880)——俄国大公妃,1841年起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妻子。——164。
- 迈奥尔,爱德华(Miall, Edward 1809—1881)——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非国教徒宣传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40年代倾向于宪章运动,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国教会的斗争;议会议员(1852—1857和1869—1874),《非国教徒》报编辑(1841—1879),曾参加《共和国》报的出版工作。——52。
- 迈恩多夫男爵,彼得·卡季米罗维奇(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барон

- 1796—1863)——俄国外交官,曾任驻柏林公使(1839—1850)和驻维也纳公使(1850—1854)。——29、172、263。
- 迈克尔,威廉(Michell, William)——英国医生,议会议员。——53。
- 麦格雷戈,约翰(MacGregor, John 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该行董事之一(1849—1856);写有统计学方面的著作。——52。
- 麦基萨克,玛丽(M' Isaac, Mary)——287。
- 麦基萨克,亚历山大(M' Isaac, Alexander)——287。
- 麦金农(M' Kinnon)——287。
- 麦金农,安格斯(M' Kinnon, Angus)——287。
- 麦金农,威廉·亚历山大(Mackinnon, William Alexander 1789—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52。
- 麦金托什,默多(Macintosh, Murdo)——287。
- 麦卡勒姆,尤恩(M' Callum, Ewen)——288。
- 麦凯钱,约翰(M' Eachan, John)——288。
- 麦考莱,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印度总督所属参事室参事(1833—1838);曾编有印度刑法典,该刑法典于1860年被批准为法律。——52。
- 麦克阿瑟,凯特(Macarthur, Kate)——288。
- 麦克杜格尔德,唐纳德(M' Dugald, Donald)——287。
- 迈克尔赫伦,瑟真(M' Elheran, Surgeon)——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1。
- 麦克莱恩,约翰(M' Lean, John)——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麦克劳德,玛格丽特(M' Leod, Margaret)——288。
- 麦克劳林,阿奇博尔德(M' Laurin, Archibald)——288。
- 麦克唐纳,凯瑟琳(M' Donald, Catherine)——288。
- 麦克唐纳,玛丽(M' Donald, Mary)——287。
- 麦克唐纳,唐纳德(Macdonald, Donald)——286。
- 麦克唐纳,珍妮特(M' Donald, Janet)——287。
- 麦夸尔(M' Quire, M.)——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

741。

满洲皇朝——见清朝。

曼纳斯, 约翰·詹姆斯·罗伯特, 拉特兰公爵(Manners, John James Robert, Duke of Rutland 1818—1906)——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 议会议员, 屡任保守党内阁的大臣。——89。

曼斯巴赫, 卡尔(Mansbach, Karl 1790—1867)——瑞典将军和外交家, 曾任驻维也纳公使(1852—1855)。——405。

曼托伊费尔男爵, 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 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和首相(1850—1858); 1859年和1860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1864年入选第一议院。——83、160、232—233、255—257、266、267、594—595。

芒茨, 乔治·弗雷德里克(Muntz, 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 兵工厂厂主,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 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时期(1832)曾组织多次群众集会拥护改革。——304。

芒什·德卢瓦纳(Manche de Loisle)——法国军官, 曾任布洛涅兵营司令官。——632。

毛奇伯爵,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 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 1819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 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职, 1833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 1836—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问; 曾任普鲁士军事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 普法战争(1870—1871)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 实际上是总司令; 1867—1891年是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2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 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事著作。——236—238、250、251、291、295—297、338—340、345、348—349。

梅尔兰伯爵, 克里斯托夫·安东(Merlin, Christophe Antoine, comte de 1771—1839)——法国将军, 西班牙战争的参加者(1808—1814)。——521。

梅加伯爵, 胡安·托马斯·恩里克斯·卡夫雷拉(Meigar, Juan Tomás Enriquez Cabrera, conde de 1652—1705)——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内阁大臣(1693—1699)。——504。

-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 格奥尔格 (Mecklenburg-Strelitz, Georg Prinz von 1824—1876)——德国贵族, 在俄军中供职, 任将军。——228。
- 梅罗尼 (Meroni)——奥地利外交官, 1854 年任驻贝尔格莱德领事。——245。
- 梅萨, 克里斯蒂安·尤利乌斯 (Meza, Christian Julius 1792—1865)——丹麦军官, 后为将军, 1849—1856 年为炮兵旅长。——472。
- 梅塔克萨斯伯爵, 安德烈亚斯 (Metaxas, Andreas Graf 1786 左右—1860)——希腊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首相 (1843—1844), 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0—1854)。——241、245、263。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 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 (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9、104、346、360、365。
- 梅西纳, 费利克斯·马里亚·德 (Messina, Felix Maria de)——西班牙将军。——386。
- 美第奇 (Medici)——意大利贵族世家, 1434—1737 年 (有间断) 统治佛罗伦萨。——157。
- 门罗, 詹姆斯 (Monroe, James 1758—1831)——美国国务活动家, 共和党人, 曾任美国总统 (1817—1825); 1823 年发表阐明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 后称门罗主义。——478、560。
- 门斯多尔夫-普伊伯爵, 亚历山大 (Mensdorff-Pouilly, Alexander Graf von 1813—1871)——奥地利外交官、将军和国务活动家, 1852—1853 年任驻彼得堡大使, 曾任外交大臣 (1864—1866)。——263。
- 蒙, 亚历山大罗 (Mon, Alejandro 1801—1882)——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温和派, 曾任财政大臣 (1837 和 1844—1846), 1864 年为政府首脑。——388、480。
- 蒙蒂霍伯爵, 费南德斯·德科尔多瓦 (Montijo, Fernandez de Cordova, conde de 死于 1839 年)——西班牙军官, 西班牙战争时期 (1808—1814) 支持拿破仑第一。——537。
- 蒙克子爵, 查理·斯坦利 (Monck, Charles Stanley, Viscount 1819—1894)——英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曾任财政大臣 (1855—1858), 加拿大总督 (1861—1866 和 1867—1868)。——52。
- 蒙莫朗西, 马蒂厄·让·费利西泰, 拉瓦尔公爵 (Montmorency, Mathieu-Jean Félicité, duc de Laval 1767—182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

- 义者,曾任驻马德里大使(1821),1821年起为外交大臣。——572。
- 蒙庞西埃公爵,安东·玛丽·菲利浦·路易(Montpensier, Antoine-Marie-Philippe-Louis, duc de 1824—1890)——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的儿子,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丈夫,1868—1869年为西班牙王位追求者,1871年被流放巴利阿里群岛。——116。
- 蒙塔朗贝尔侯爵,马尔克·勒奈(Montalembert, Marc-René, marquis de 1714—1800)——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在19世纪被广泛采用。——191、306、309、456、491、492、625、668。
-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首脑;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拿破仑第三,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71。
- 蒙泰莫林,卡洛斯·路易斯·马里亚(Montemolin, Carlos Luis Maria 1818—1861)——西班牙王子,唐·卡洛斯的长子;50年代为西班牙王位追求者,称查理六世。——127、410。
-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525。
- 米尔恩斯,理查·蒙克顿(Milnes, Richard Monckton 1809—1885)——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9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52、147、313。
- 米哈伊尔(塞尔维亚的)——见奥布廉诺维奇,米哈伊尔。
-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909)——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的第四个儿子。——168。
- 米海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90—1848)——俄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1812年独立战争时参加义勇军,1816年起任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任步兵第四师所属旅长和第二集团军值班将军,1835年晋升为中将,任参政员兼军事书刊检查委员会主席,1839年起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845年起任《冬官军事人物志》(六卷集)总编;著有19世纪初俄国对法国、土耳其和瑞典战争的历史著作。——205。

- 米拉弗洛雷斯侯爵,曼努埃尔·德潘多(Miraflores, Manuel de Pando, marqués de 1792—1872)——西班牙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西班牙历史方面的著作。——560。
- 米洛什——见奥布廉诺维奇,米洛什。
- 米纳——见埃斯波斯-米纳,弗朗西斯科。
- 米纳,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Mina, Francisco Xavier 1789—1817)——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家,独立战争(1808—1814)时为游击队领袖之一,1814年企图发动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失败后,经法国和英国逃往墨西哥(1816),在墨西哥独立战争中阵亡。——536、538、560。
- 米尼希伯爵,布克哈德·克里斯托夫(Münnich, Burkhard Christoph Graf von 1683—1767)——俄国将军和军事工程师,后为元帅,德国人;原在法国军队和波兰—萨克森军队中任职,1721年到俄国军队供职,1728年任俄军总司令,1732年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俄土战争期间任克里木和摩尔多瓦俄军指挥官(1735—1739);战争结束后回到圣彼得堡,在政府中任要职,1762年被流放西伯利亚,1762年获释后,任波罗的海港口总监。——445。
-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米涅式步枪的发明者。——301、304、669、685、687。
- 米斯兰,雅克(Mislin, Jacques 死于1847年)——法国旅行家和探险家,写有关于中东风土人情的著作。——186。
- 缅施科夫公爵,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нязь 1787—1869)——俄国军事和国务活动家,1836—1853年任海军大臣,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战争时期(1853—1856)任陆海军总司令。——22、42、75、89、90、96—98、106、164、169、172、177、198、222、223、625、627、631、637、640、646—649、659、663—667、670、683、684、689、692、716。
- 缪尔,威廉(Mure, William 1799—1860)——英国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古希腊文专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53。
- 缪拉特亲王,拿破仑·吕西安·沙尔(Murat, Napoléon-Lucien-Charles, prince 1803—1878)——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驻都灵公使(1849—185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61年为那不勒斯的王位追求者,约·缪拉特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表兄。——4、462。
- 缪拉特,约阿希姆(Murat, Joachim 1767—1815)——法国元帅,曾参加拿破仑第

- 一的远征,1808年任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拿破仑第一的妹夫。——511。
- 莫尔拉,托马斯·德(Morla, Tomás de 1752—1820)——西班牙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曾任约·波拿巴政府陆军和海军大臣(1808—1813)。——537,578。
- 莫尔斯沃思从男爵,威廉(Molesworth, Sir William, Baronet 1810—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52,128,303。
- 莫雷诺,安东尼奥·吉列尔莫(Moreno, Antonio Guillermo)——西班牙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388。
- 莫里哀 (Molière 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戏剧家。——533。
- 莫里略,帕布洛,卡塔赫纳公爵和普埃塔侯爵(Morillo, Pablo, conde de Cartagena y marques de la Puerta 1778—1837)——西班牙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15—1820年任西班牙南美驻军总司令,率部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站在反革命方面。——448,570,582。
- 莫利托尔,加布里埃尔·让·约瑟夫(Molitor, Gabriel-Jean-Joseph 1770—1849)——法国将军,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时任军长。——580。
- 墨尔本子爵,威廉·拉姆(Melbourne, William Lamb, Viscount 1779—184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30—1834)和首相(1834和1835—1841)。——67。
- 穆尔,乔治·亨利(Moore, George Henry 1811—1870)——爱尔兰政治活动家,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领袖之一,议会议员(1847—1857和1868—1870);曾为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进行辩护。——228。
- 穆尔哈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Murhard, 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1779—1853)——德国政论家和编辑。——4。
- 穆罕默德·阿布尔·卡西姆·伊本·阿卜杜拉(Mohammed [Mahomet] Abul Kasim ibn Abdallah 570左右—632)——阿拉伯宗教界领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452,465。
- 穆罕默德-阿里帕沙(Mehmend Ali Pasha 1807左右—1868)——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1852—1853年5月任总理大臣,后任陆军大臣(1853—1854年1月)。——70,107。

- 穆罕默德-傅阿德帕沙(傅阿德埃芬蒂)(Mehmed Fuad Pasha [Fuad Effendi] 1815 左右—1869)——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48 年是驻多瑙河两公国的政府专员,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策划者之一;1852—1853 年任外交大臣,1861—1866 年任总理大臣。——376—378。
- 穆罕默德-基布里斯利帕沙(穆罕默德帕沙)(Mehmed Kibrisli Pasha [Mehemet Pasha] 1810—1871)——土耳其军事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1854 年初为海军大臣,后为总理大臣(1854 年 5—11 月)。——107。
- 穆罕默德二世·法蒂赫(Mehmed [Mahomet, Mohamed] II. Fatih 1430—1481)——土耳其苏丹(1451—1481)。——108、158、374。
- 穆罕默德四世(Mehmed [Mohammed] IV 1641—1691)——土耳其苏丹(1648—1687)。——183。
- 穆尼哀,让·约瑟夫(Mounier, Jean-Joseph 1758—1806)——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保皇派,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亡瑞士。——525。
- 穆尼奥斯,奥古斯丁·费南多,里安萨雷斯公爵(Muñoz, Augustin Fernando, duque de Riansares 1808 左右—1873)——西班牙军官,1833 年起为西班牙摄政女王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第二个丈夫。——589、601、719。
- 穆尼奥斯-贝纳文特,何塞(普切塔)(Muñoz Benavente, José [Pucheta] 1820—1856)——西班牙斗牛士,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的参加者,马德里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之一,1856 年六月事件中领导马德里的工人武装队伍,在战斗中牺牲。——473、480。
- 穆尼奥斯-托雷罗,迭戈(Muñoz Torrero, Diego 1761—1829)——西班牙神父,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加的斯议会(1810—1813)中最激进的议员之一,曾参加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550。
- 穆萨帕沙(Mussa Pasha 1810 左右—1854)——土耳其将军,1853—1854 年任锡利斯特里亚土军指挥官。——342、345、381。
- 穆斯塔法帕沙(Mustafa Pasha)——斯库塔里帕沙,俄土战争时期(1828—1829)任阿尔巴尼亚军队指挥官。——366。
- 穆斯塔法帕沙(Mustafa Pasha)——土耳其军官,1854 年任亚洲土耳其军队指挥官。——597。
- 穆苏鲁斯贝伊,科斯塔基(Musurus Bei, Kostaki 1807—1891)——土耳其外交官,希腊人,曾任土耳其驻伦敦公使(1851—1856),后为大使(1856—1885)。——56、630。

N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109、174、184、203、209、294、298、303、311—314、324、478、504、511—518、519、521、525、528、529、534、535、547、552、566、578、630—632、655、658、683—684、687、694、702—706。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4、19、39、43、45、60、71—73、77、82—84、87、92、105、109、110、115、126、127、159、179、297、302、313、314、325、327、401、409、410、418、425、434、439、462、566、600、607、622、624、630—635、639、642、660、700、715、721。

纳多,马丁(Nadaud, Martin 1815—1898)——法国政论家,职业是泥瓦匠,蒲鲁东的追随者,山岳党人,1849—1851年为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逐出法国,1859年以前侨居英国,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125、741。

纳尔瓦埃斯,拉蒙·马里亚,巴伦西亚公爵(Narváez, Ramón Maria, duque de Valencia 1800—1868)——西班牙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温和派领袖,政府首脑(1844—1846、1847—1851、1856—1857、1864—1865和1866—1868)。——387、388、409、414、448—453、461、480。

纳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曾参加葡萄牙战争(1810—1834)和叙利亚战争(1840),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64、79、110、128、189、207、213、270、291、293、393、394、402、437、471、498、635、718。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军事史学家和著作家;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206、303。

纳赛尔丁(Nasr-ed-Din 1831—1896)——波斯沙赫(1848—1896)。——10、17、25。

纳瓦罗(Navarro 死于1817年)——西班牙革命家,因企图在巴伦西亚宣传1812

- 年宪法而被处死。——561。
- 奈,米歇尔,埃尔兴根公爵,莫斯科亲王(Ney, Michel, duc d' Elchingen, prince de la Moscova 1769 — 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530。
- 奈穆尔公爵,路易·沙尔·菲利浦·拉斐尔(奥尔良的)(Nemours, Louis-Charles-Philippe-Raphael d'Orléans, duc de)——法国将军,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的第二个儿子。——29、714。
- 奈塞特贝伊(Neset Bei)——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53—1854年任驻雅典公使。——241。
- 奈特,弗雷德里克·温(Knight, Frederick Winn 生于1812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425。
- 内夫策,奥古斯特(Neftzer, Auguste)——法国新闻工作者,《新闻报》撰稿人(1844—1857和1859—1861),《时报》主编。——263。
- 内史密斯,查理(Nasmyth, Charles 1826—1861)——英国军官,《泰晤士报》驻多瑙河奥美尔帕沙司令部的军事通讯员。——341、380、382、435、441。
- 尼埃尔,阿道夫(Niel, Adolphe 1802—1869)——法国将军,1859年起为元帅;曾参加克里木战争(1853—1856),1854年任波罗的海法国远征军工程长官,1855年任克里木法军工程长官,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595。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3、5、7、11—12、19—22、26、28、37、38、42—43、48—51、57—59、63、66、70—72、74、77—79、87、88、90、95—98、106—110、114—116、127、149、151—179、198、200、206、212—219、222—225、230、247、256、258、261—264、278、280、295、326、346、348、354—357、359、371、379、389、393、394、409、411、424、431、460—462、466—468、471、477、497、498、592—594、607、641、642、655、688—690、704、714—718、723。
-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1—1891)——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的儿子;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为巴尔干俄军总司令。——595。
-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和总理大臣(1845年起)。——48、94—97、103、153、159、170、171、217—219、223、230、231、255、263、476、595。

- 牛津, 约翰(Oxford, John)——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39。
- 纽卡斯尔公爵, 亨利·佩勒姆·法因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 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 陆军大臣(1854—1855), 殖民大臣(1859—1864)。——228、317、325、360、411—412、637。
- 诺福克公爵, 亨利·查理·霍华德(Norfolk, Henry Charles Howard, Duke of 1791—1856)——英国贵族, 辉格党人。——9、53。
- 诺曼比(Normanby)——康·亨·菲·诺曼比伯爵的妻子。——403。
- 诺曼比伯爵, 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Normanby, Constantin Henry Phipps, Earl of 1797—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爱尔兰总督(1835—1839), 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 内务大臣(1839—1841), 驻巴黎大使(1846—1852)。——403。
- 诺曼比侯爵, 乔治·奥古斯塔斯·康斯坦丁·菲普斯(Normanby, George Augustus Constantine Phipps, Marquess of 1819—1890)——英国国务活动家, 康·亨·菲·诺曼比伯爵的儿子。——403。
- 诺塔腊斯, 鲁卡(Notaras, Lukas 死于1453年)——拜占庭国务活动家, 舰队司令, 反天主教派的首领, 君士坦丁堡失陷后, 根据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被处死。——108。

O

-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8。

P

- 帕迪利亚, 胡安·洛佩斯·德(Padilla, Juan López de 1490左右—1521)——西班牙贵族, 1520—1522年卡斯蒂利亚各城市起义(自治城市起义)的领袖之一, 起义失败后在比利亚拉尔附近被处死。——508。
- 帕尔凯-卡斯特里略(帕尔凯)公爵, 迭戈·德·卡尼亚斯-波托卡雷罗(Parque Castrillo[Parque], Diego de Cañasy Portocarrero, duque del 1755—1832)——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的参加者, 议会议长(1820)。——514。

帕尔马公爵——见卡尔第三。

帕金顿, 约翰·萨默塞特, 汉普登男爵(Pakington, John Somerset, Baron Hampton 1799—1880)——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 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 陆军大臣(1867—1868)。——198、412。

帕拉福克斯-梅尔西(帕拉福克斯), 弗朗西斯科·德(Palafox y Melci[Palafox], Francisco de 生于1774年)——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 中央洪达委员(1808—1809), 后因反对召开议会和企图在西班牙建立摄政政府而被开除出中央洪达。——537。

帕拉福克斯-梅尔西(帕拉福克斯), 何塞·德雷博列多, 萨拉戈萨公爵(Palafox y Melci[Palafox], José de Rebolledo, duque de Zaragoza 1776—1847)——西班牙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 萨拉戈萨保卫战(1808—1809)的指挥官。——519。

帕拉梅里(Palameri)——1854年为土耳其警察局密探。——263。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 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4、17、18、44—45、52、62—64、99、101—102、115、128、180、218、220、221、224—225、279、317、360、361、363、365、366、410—412、425、427、438、439、451、465、477、604、635、641、721、724。

帕纽亭, 费多尔·谢尔盖耶维奇(Панютин, Федо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0—1865)——俄国将军, 在克里木战争初期任军长, 1855—1856年为俄国西南部后备军指挥官。——370、384。

帕切科-古铁雷斯·卡德龙(帕切科), 华金·弗朗西斯科(Pacheco y Gutiérrez Calderón[Pacheco], Joaquin Francisco 1808—1865)——西班牙法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温和派, 曾参加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 曾任外交大臣(1854)。——461。

帕切科, 胡安, 比列纳侯爵(Pacheco, Juan, marqués de Villena 1419—1474)——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四世的大臣。——503、504。

帕塞瓦尔-德申, 亚历山大·斐迪南(Parseval-Deschênes, Alexandre-Ferdinand 1790—1860)——法国海军上将, 1854年任波罗的海分舰队司令。——495、

- 498。
- 帕斯凯维奇公爵,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князь 1782 — 1856)——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波兰起义(1830—1831)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驻军总司令,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58、251、255、318、343—347、356、370、381、395、445。
- 帕斯托尔·迪亚斯,尼科梅德斯(Pastor Diaz, Nicomedes 1811—186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参议员,属于温和派;曾任驻都灵公使。——480。
- 帕西非科,大卫(Pacifico, David 1784—1854)——英国商人,原籍葡萄牙。——438。
- 帕伊科斯,安德罗尼科斯(Paikos, Andronikos 1799—1880)——希腊国务活动家,1851—1854年任外交大臣。——264。
- 派特曼(Peithmann [Peithman])——德国教育家,长期住在英国。——402—404、412、438。
- 派西沃(Percival)——英国医生。——402。
- 潘恩,托马斯(Paine, Thomas 1737—1809)——美国政论家,英国人,共和主义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439。
- 庞巴尔侯爵,塞巴斯蒂安·若瑟·德·卡尔瓦柳-梅卢(Pombal, Sebastián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 marquês de 1699—1782)——葡萄牙国务活动家,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葡萄牙的实际上的执政者(1756—1777)。——523。
- 庞培(格奈乌斯·庞培·马格努斯)(Gnaeus Pompejus [Pompey] Magnus 公元前106—48)——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414。
- 庞森比子爵,约翰(Ponsonby, John, Viscount 1770左右—1855)——英国外交官,曾任驻那不勒斯公使(1832),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32—1841)和驻维也纳大使(1846—1850)。——180。
-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523。
- 佩茨勒,约翰(Petzler, Johann)——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音乐教师,19世纪50—60年代侨居伦敦,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39。

- 佩德罗五世(Pedro V 1837—1861)——葡萄牙国王(1853—1861)。——410。
- 佩尔泰夫帕沙(Pertev Pasha)——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28—1829年俄土战争时期任外交大臣。——366。
- 佩尔西尼伯爵,让·日尔贝尔·维克多·菲阿兰(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Fialin, comte 1808—187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和1859—1860)。——39。
- 佩克桑,昂利·约瑟夫(Paixhans, Henri-Joseph 1783—1854)——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和发明家,写有炮兵学方面的著作。——6,306,436。
- 佩莱格兰(Pélegrin[Pelegrin])——西班牙政治活动家,1821—1822年为内阁成员。——570。
- 佩勒姆,弗雷德里克·托马斯(Pelham, Frederick Thomas 1808—1861)——英国海军军官,1858年起为海军中将。——496。
- 佩雷斯·德·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埃瓦里斯托(Pérez de Castro[Castro], Evaristo 1778—1848)——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加的斯议会议员(1810—1813),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曾任政府首脑(1838—1840)。——559。
- 佩利西埃,阿马布勒·让·雅克,马拉霍夫公爵(Pélistier, Aimable-Jean-Jacques, duc de Malakoff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30—50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因攻克马拉霍夫岗而被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伦敦大使(1858);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66。
- 佩罗夫斯基伯爵,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Перовский, Лев Алексеевич, граф 1792—1856)——俄国将军,国务活动家,1812年独立战争的参加者;曾任内务大臣(1841—1852),皇室地产大臣(1852—1856)。——259。
- 佩苏埃拉-塞瓦略斯,胡安,切斯特伯爵(Pezuela y Ceballos, Juan, conde de Cheste 1809—1906)——西班牙将军和军事著作家,属于温和派,曾任海军大臣(1846);1867年起为参议员。——450。
- 蓬斯(Pons)——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费南多七世的拥护者。——566。
- 皮达尔侯爵,佩德罗·何塞(Pidal, Pedro José, marqués de 1800—1865)——西

- 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属于温和派,曾任议会议长(1843),内务大臣(1844),外交大臣(1848—1851)。——368。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67、86、151、217、228、325、360。
- 皮尔斯(Pierse)——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53。
- 皮伦茨(Pirentz)——奥地利外交官,1854年任驻锡诺帕领事。——22。
- 皮佩尔,威廉(Pieper, Wilhelm 1826左右—1899)——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3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返回德国,1892年在汉诺威一所中学任教。——713。
- 皮若尔,路易(Pujol, Louis 1827—1861)——法国新闻工作者,布朗基主义者,曾参加法国1848年六月起义和1854年西班牙革命。——473。
- 皮萨罗,弗朗西斯科(Pizarro, Francisco 1475左右—1541)——西班牙征服者,16世纪30年代征服印加人的国家(秘鲁)。——509。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722。
- 普尔,威廉(Poole, William)——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1。
- 普尔斯基,费伦茨·冯(Pulszky[Pulsky], Ferenc von 1814—1897)——匈牙利政治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人,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人,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81。
- 普拉代尔,皮埃尔·玛丽·米歇尔·欧仁·库特雷·德(Pradel, Pierre-Marie-Michel-Eugène Courtray de 1790—1857)——法国作家,圣阿尔诺的老师。——328。
- 普拉特,多米尼克·迪富尔·德(Pradt, Dominique Dufour de 1759—1837)——法国神父、外交官、政论家和历史学家。——522、533、537、544。

- 普拉特, 约翰·蒂德 (蒂德·普拉特) (Pratt, John Tidd [Tidd Pratt] 1797 — 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 合伙运动成员。——465。
- 普里姆-普拉茨, 胡安, 雷乌斯伯爵 (Prim y Prats, Juan, conde de Reus 1814 — 1870)——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派领袖之一, 曾参加 1834 — 1843 和 1854 — 1856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1843 — 1844 年镇压共和派和进步派左翼发起的卡泰罗尼亚起义, 在 1859 — 1860 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师长, 后任军长。——611。
- 普里切特, 罗伯特·泰勒 (Pritchett, Robert Taylor 1828 — 1907)——英国枪械技工, 曾改进米涅式步枪。——301。
- 普林西佩-比道德, 米格尔·奥古斯坦 (Principe y Vidaud, Miguel Augustin 1811 — 1866)——西班牙作家和历史学家, 进步派, 写有西班牙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447 — 448, 451 — 452。
- 普卢姆里奇 (Plumridge, Sir J. H. 1787 — 1863)——英国海军上将。——718。
- 普卢塔克 (Plutarchos 约 46 — 119 以后)——古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道德论者, 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 曾与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论争; 写有古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144, 304。
- 普切塔——见穆尼奥斯-贝纳文特, 何塞。

Q

- 齐德林斯基 (塞里姆帕沙, 泽德林斯基) (Ziedlinski [Selim Pasha, Zedlinsky])——土耳其将军, 波兰人; 1853 — 1854 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 称塞里姆帕沙。——38, 57, 352。
- 钱伯斯, 托马斯 (Chambers, Sir Thomas 1814 — 1891)——英国法学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200 — 201。
- 乔斯林子爵, 罗伯特 (Jocelyn, Robert, Viscount 1816 — 1854)——英国军官, 议会议员, 1845 — 1846 年在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任职。——87。
-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 — 1820)——英国国王 (1760 — 1820)。——402。
- 乔治四世 (George IV 1762 — 1830)——英国摄政王 (1811 — 1820), 英国国王 (1820 — 1830)。——477, 714。
- 切奥达耶夫,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Чеодае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死于 1859 年)——俄国将军,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1812),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军长和后备步兵指挥官。——142 — 145, 211。

切斯尼, 弗兰西斯·罗登(Chesney, Francis Rawdon 1789—1872)——英国军官和探险家, 1855年起为将军; 曾考察幼发拉底河到波斯湾的水运通道。——14。

清朝——中国皇朝(1644—1911)。——117。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律师、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领袖, 《北极星报》编辑,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出版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45、68、125—126、140、202、463—466、716、739。

琼斯, 哈里·大卫(Jones, Harry David 1791—1866)——英国将军, 军事工程师;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10—1814)的参加者; 1854年为波罗的海英国远征军指挥官, 1855年在克里木作战时负责工程勤务。——493、498、608。

R

荣格曼, 爱德华(Jungmann, Eduard 1815—1862)——普鲁士军官, 1845—1848年在土耳其军队服役, 1848—1857年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服役。——282。

若利(Joly)——法国警官。——329。

S

萨埃茨, 维克多·达米安(Sáez[Saez], Victor Damián)——西班牙神学家, 托尔托萨主教, 斐迪南七世的忏悔神父。——568。

萨德勒, 约翰(Sadle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 蒂珀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 1835年任财政副大臣; 1856年因蒂珀雷里银行破产而自杀。——10。

萨尔托里乌斯, 费南多·路易斯·何塞, 圣路易斯伯爵(Sartorius, Fernando Luis José, conde de San Luis 1820—1871)——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 温和派领袖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1847—1851), 政府首脑(1853—1854)。——386、388、413、417、451、453、461、486、487、504、586、587、602。

萨菲, 奥雷廖(Saffi, Aurelio 1819—1890)——意大利作家,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马志尼的追随者;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年流亡英国, 1872年起领导意大利共产党。——599。

- 萨加斯蒂,曼努埃尔(Sagasti, Manuel)——西班牙将军,曾支持埃斯帕特罗的独裁,马德里总督(1843和1854—1855)。——486,586。
- 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德国王朝,同比利时、保加利亚、英国和葡萄牙王室有联系。——29,116,410,439,477,483,486,713—715。
- 萨拉查——见阿连德-萨拉查,何塞。
- 萨拉曼卡-马约尔[萨拉曼卡],何塞(Salamanca y Mayol[Salamanca], José de 1811—1883)——西班牙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派,曾任财政大臣(1847)。——486,602。
- 萨米帕沙(Sami Pasha)——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52—1854年任维丁总督。——383。
- 萨默维尔,亚历山大(Somerville, Alexander 1811—1885)——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51—52。
- 萨姆纳,约翰·伯德(Sumner, John Bird 1780—1862)——英国教士,切斯特主教(1828—1848),坎特伯雷大主教(1848—1862)。——630。
- 萨塞克斯公爵,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Sussex, Augustus Frederick, Duke of 1773—184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儿子。——403。
- 萨瑟兰公爵,乔治·格兰维尔·鲁森-高尔,斯塔福德侯爵,布里奇沃特公爵(Sutherland, George Granville Leveson-Gower, Marquess Stafford, Duke of Bridgewater, Duke of 1758—1833)——苏格兰大地主,议会议员;曾任驻巴黎大使(1790—1792)。——53。
- 萨托雷斯(Satorres, R.)——西班牙新闻工作者。——447,451—453。
- 萨瓦拉-德拉普恩特,胡安(Zabala y de la Puente, Juan 1804—1879)——西班牙将军,温和派;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参加者。——416。
- 萨西,西尔韦斯特尔·德(Sacy, Silvestre de 生于1795年)——法国新闻工作者,《辩论日报》的撰稿人。——482,600。
- 萨希布埃芬蒂(Sahib Efendi [Sahib Effendi] 死于1854年)——土耳其法学家。——604。
- 塞奥昂纳,胡安·安东尼奥(Seoane, Juan Antonio)——西班牙将军,埃斯帕特罗的拥护者,1843年后成为温和派,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450。
- 塞巴斯蒂亚尼伯爵,奥拉斯·弗朗索瓦·巴斯蒂安(Sébastieni, Horace-François-Bastien, comte 1772—1851)——法国元帅,外交家;1801—1802年在土耳其、

- 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外交使节；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06—1807），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631。
- 塞拉诺-多明格斯，弗朗西斯科，圣安东尼奥伯爵，托雷公爵（Serrano y Dominguez, Francisco, conde de San Antonio, duque de la Torre 1810—1885）——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陆军大臣（1843），1854年七月革命和1856年国家政变的参加者；马德里镇守司令（1859—1862），外交大臣（1862—1863），临时政府首脑（1868—1869），王国摄政（1869—1871），内阁首相（1871、1874）。——396、414、418、480。
- 塞里姆帕沙——见齐德林斯基。
-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西班牙作家。——452、516、535、584、601。
- 塞维利亚诺，西霍拉·胡安，富恩泰斯-德杜埃罗侯爵（Sevillano, Sijora Juan, marqués de Fuentes de Duero）——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财政大臣（1854）。——388。
- 赛亚斯（Zayas）——西班牙将军，西班牙革命（1820—1823）的参加者。——573。
- 赛义德帕沙（Said Pasha）——土耳其将军，1854年为多瑙河土军指挥官。——407。
- 桑德斯，乔治·尼古拉斯（Sanders, George Nicholas 1812—1873）——美国商人、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1853—1854年任驻大不列颠领事。——602。
- 桑切斯，胡利安（Sánchez, Julián）——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时期游击队领袖之一。——536。
- 骚塞，罗伯特（Southey, Robert 1774—1843）——英国诗人、作家和历史学家，托利党人。——516、522、529、531、544、547、551、576、577。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1865年回到匈牙利。——9。
-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驱逐出法国。

——462。

沙夫纳(Shaffner, T. P.)——608。

沙米尔(Shamyl 1798 左右—1871)——达吉斯坦教长(1834 年起), 达吉斯坦和车臣教民的宗教领袖(30—50 年代), 穆里德派的思想家; 反对当地的封建领主和沙皇殖民主义者。——36、295、355、608。

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01、164、215、303、407。

尚博尔伯爵, 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 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Chambord, Henri-Charles-Ferdinand-Marie Dieudonne d'Artois, duc de Bordeaux, comte de, Henri V 1820—1883)——法国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 查理十世之孙, 1830 年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 法国王位的追求者, 称亨利五世。——29。

尚加尔涅, 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 曾参加镇压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 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 曾参加驱散巴黎 1849 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 1859 年回到法国, 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622。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47 年起为辉格党人; 40 年代是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贵族慈善家运动的领导人,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 1855 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 帕麦斯顿的女婿。——147。

圣阿尔班(St.-Albin, A. de)——法国新闻工作者。——483。

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Saint-Arnaud, Arnau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 1852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36—1851 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 1854 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79、269、296、302、318、327—331、347、351、395、438、443、470、476、596、621—623、627、630。

圣昂热(Saint-Ange)——法国新闻工作者, 《辩论日报》的撰稿人。——407—408。

- 圣费南多公爵, 华金·何塞·梅尔加雷霍(San Fernando, Joaquin José Melgarejo, dueque de 死于 1835 年)——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政府首脑(1819)。——555、560。
- 圣海伦斯——见菲茨赫伯特, 阿莱恩, 圣海伦斯男爵。
- 圣科洛马伯爵, 达尔马西奥·凯拉尔特(Santa Coloma, Dalmacio de Queralt, conde de 死于 1640 年)——西班牙国务活动家, 卡泰罗尼亚总督。——504。
- 圣克鲁斯-帕切科侯爵, 弗朗西斯科(Santa Cruz y Pacheco, Francisco, marqués de 1802 左右—188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曾任内务大臣(1854—1856)和财政大臣(1856)。——461、483、486、586。
- 圣路易斯——见萨尔托里乌斯, 费南多·路易斯·何塞, 圣路易斯伯爵。
- 圣罗曼(San Román)——西班牙将军, 1853—1854 年任陆军副大臣。——397。
- 圣米格尔-巴列多, 埃瓦里斯托(San Miguel y Valledor, Evaristo 1785—1862)——西班牙将军、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后为温和派,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和 1820—1823 年资产阶级革命; 1822—1823 年任内阁首脑兼外交大臣, 1840—1842 年任陆军大臣。——388、555—557、582、603。
- 圣特雷萨——见特雷萨。
- 施利克伯爵, 弗兰茨·亨利希(Schlick, Franz Heinrich Graf von 1789—1862)——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 1854—1859 年任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奥军指挥官;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任第二军团司令。——40。
- 施梯尔贝公爵, 巴尔布·德米特里·比伯斯库(Stirbei, Barbu Demetrius Bibescu, Fürst 1801—1869)——瓦拉几亚国君(1849—1853 和 1854—1856)。——392、430。
- 舒瓦泽尔(舒瓦泽尔-昂布瓦兹)公爵, 埃蒂耶纳·弗朗索瓦(Choiseul[Choiseul-Amboise], Étienne-François, duc de 1719—1785)——法国将军、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驻梵蒂冈大使(1753—1757)、驻维也纳大使(1757—1758)、外交大臣(1758—1761 和 1766—1770)、海军大臣(1761—1766)、陆军大臣(1766—1770)。——722。
- 斯宾塞伯爵, 弗雷德里克(Spencer, Frederick, Earl 1798—1857)——英国海军军官, 1854 年任奥伯霍夫市长。——10。
- 斯蒂芬逊, 罗伯特(Stephenson, Robert 1803—1859)——英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

- 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53。
- 斯福察,弗兰契斯科(Sforza, Francesco 1401—1466)——米兰公爵(1450—1466)。——53。
- 斯卡利特,詹姆斯·约克(Scarlett, James Yorke 1799—1871)——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1855年任骑兵旅长,后任克里木英军骑兵司令(1855—1856),1860年任陆军副官长。——679。
- 史密斯—查理公司(Smith & Charles)——英国的一家贸易公司。——641。
- 史密斯,约翰(Smith, John)——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1。
- 史密斯,詹姆斯(Smith, James)——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斯密特,弗里德里希·冯(Smitt, Friedrich von 1787—1865)——利夫兰历史学家,1859年起在俄军总参谋部供职。——205。
- 斯塔德特(Studdert)——都柏林治安法官。——403。
- 斯坦利——见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拉特福·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官,议会议员(1828—1841);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26—1828和1841—1858)。——3、10、14、26、28、40、63、66、71、75、88—90、95—98、106、110、114、141、161、176、228、240—242、254、377、468、476、597、604、636、640。
- 斯特林,威廉(Stirling, William 1818—1878)——英国历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温和的托利党人,议会议员,写有西班牙艺术史方面的著作。——52。
- 斯特奇(Sturge)——英国新闻工作者。——327。
- 斯图尔贾,米卡埃尔(Stourdza, Michael 1795—1884)——摩尔多瓦的国君(1834—1849)。——375。
- 斯图亚特,达德利·库茨(Stuart, Dudley Coumts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66、75、89、377、426、427、435。
- 斯托巴特,乔治(Stobart, George)——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斯托克奎勒,乔基姆·海沃德(Stocqueler, Joachim Hayward 1800—1885)——英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300—301。

- 斯托纳,亨利(Stonor, Henry)——英国政治活动家。——228。
- 斯温森,约翰(Swainson, John)——英国企业主,普雷斯顿的工厂主。——202。
- 苏尔特,尼古拉·让,达尔马提亚公爵(Soult, Nicolas-Jean, duc de Dalmatia 1769—185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任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1830—1834和1840—1845)、外交大臣(1839—1840)和首相(1832—1834、1839—1840和1840—1847)。——530、577。
- 苏尔瓦诺,马丁(Zurbano, Martin 1788—1845)——西班牙将军,资产阶级革命家,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8—1814)时期为游击队领袖,因企图宣布1837年宪法而被处死。——449。
- 苏莱,皮埃尔(Soulé, Pierre 1801—1870)——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外交官,驻马德里大使(1853—1854);曾试图使西班牙政府把古巴让给美国。——479、602。
- 苏里曼大帝——见苏里曼一世。
- 苏里曼一世,苏里曼大帝(Soliman I, Soliman the Great 1494—1566)——土耳其苏丹(1520—1566)。——183。
- 苏里曼帕沙(Soliman Pasha)——土耳其外交官,曾任驻瓦拉几亚全权代表(1848年7—9月)。——376。
- 苏里曼帕沙(Soliman Pasha)——土耳其将军,1854年统率在多瑙河的非正规军队。——114。
- 苏舍,路易·加布里埃尔(Suchet, Louis-Gabriel 1770—1826)——法国元帅,西班牙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12—1813年法国驻巴伦西亚的军事总督。——531。
-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俄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七年战争(1756—1763)和俄土战争(1768—1774和1787—1791)的参加者,曾率兵完成向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1799);保罗一世执政时被黜;著有《团谕》和《制胜的科学》等军事理论著作。——343—345、445、686。
- 索比斯基——见扬三世·索比斯基。
- 索拉,胡安·马里亚(Sola, Juan Maria 死于1819年)——西班牙军官,资产阶级革命家,因参加反对斐迪南七世的专制制度的巴伦西亚起义被处死。——561。

索莱达, 弗朗西斯科·贝尼托(Soledad, Francisco Benito de la)——西班牙僧侣, 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527。

索伊莫诺夫,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Сой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1853—1854), 在因克尔曼会战中阵亡。——459。

T

泰尔, 约翰(Teer, John)——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39。

泰季谢夫, 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Татищев,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767—1845)——俄国外交官, 曾任驻马德里公使(1815—1821), 俄国出席维罗纳会议的代表(1822), 驻维也纳大使(1826—1841)。——560。

泰勒(Taylor)——斯特拉斯卡伦郡长。——289。

汤普森, 泰勒(Thompson, Taylor)——英国外交官, 1854年任驻德黑兰公使。——10、17、25、40、42。

唐·恩里克——见恩里克·玛丽亚·费南多(波旁的)。

唐·卡洛斯——见卡洛斯(老卡洛斯), 唐, 玛丽娅·伊西多尔(波旁的)。

唐尼采蒂, 加埃塔诺(Donizetti, Gaetano 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256。

特雷萨(圣特雷萨)(阿维拉的)(Teresa de Jesu [Teresa de Cepeda y Ahumada] [Saint Theresa de Jesus] 1515—1582)——西班牙修女, 加尔默罗会改革者和灵修著作的作者, 1622年被尊称为圣者。——550。

特纳, 詹姆斯·阿斯皮诺尔(Turner, James Aspinall 1797—1867)——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60年代接近自由党, 议会议员; 曼彻斯特商会主席(1854)。——45。

梯尔泰(Tyrtaios 公元前7—6世纪)——斯巴达诗人。——321。

梯也尔, 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奥尔良党人, 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 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329。

天王——见洪秀全。

- 帖木儿(跛帖木儿)(Timur-i-lang [Tamerlane]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48、347。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58—59。
- 图龙,何塞·安东尼奥(Turon, José Antonio)——西班牙将军,布尔戈斯军事总督。——387。
- 图伊农特(Туинонт)——俄国将军。——38。
- 托尔斯泰,雅柯夫·尼古拉耶维奇(Толстой, Яко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1—1867)——俄国政论家,1823年起侨居巴黎,1837年起为国民教育部的通讯员和第三局的密探。——205、207。
- 托雷诺伯爵,何塞·马里亚·凯波·德·利亚诺·鲁伊斯·德·萨拉维亚(Toreno, José Maria Queipo de Llano Ruiz de Saravia, conde de 1786—184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自由党人;曾参加1808—1814年和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加的斯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和首相(1834—1835),1814年起数度侨居国外(1814—1820, 1823—1833和1855)。——521—522、525—530、532、544、549—554、567、589。
- 托斯卡纳大公——见莱奥波德二世。

W

- 瓦欣(Voicyns)——法国外交官,1854年任驻敖德萨领事。——261。
-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隆纳(Walewski, Alexandre-Florian-Joseph Colonna, comte de 1810—1868)——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曾任驻伦敦大使(1851)、外交大臣(1855—1860);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64、127、165。
- 瓦斯孔塞卢斯,米格尔(Vasconcellos, Miguel 死于1640年)——西班牙在葡萄牙的执政者萨瓦的玛格丽特的大臣,在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中被杀死。——504。
- 威尔克斯,约翰(Wilkes, John 1727—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曾著文抨击乔治三世的专制制度。——722。
- 威尔逊,威廉(Wilson, William)——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

- 者。——740。
-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52、439、611、641。
-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 William the Victorious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9—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83。
-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157。
- 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817—1890)——尼德兰国王(1849—1890)。——60。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44、67、298。
-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英国将军,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曾指挥卡尔斯保卫战,后投降俄国军队,议会议员(1856—1859)。——597。
- 威廉斯,詹姆斯(Williams, James)——英国宪章运动的活动家。——125、140、739、740。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151、155、218、270、298、299、303、309、311、332、361、363、433、444、451、531、534、578、624。
- 威斯敏斯特侯爵,理查·格罗夫纳(Westminster, Richard Grosvenor, Marquis of 1795—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大地主。——53。
- 威斯特摩兰伯爵,约翰·费恩(Westmorland, John Fane, Earl of 1784—1859)——英国外交官,曾任驻柏林公使(1841—1851),驻维也纳公使(1851—1855)。——78、467。
- 韦德尔,卡尔·亨利希·冯(Wedel, Karl Heinrich von 1712—1782)——普鲁士陆军中将,曾任陆军大臣(1761—1779)。——581。
- 韦德耳,多米尼克·奥诺雷·玛丽·安东(Vedel, Dominique-Honoré-Marie-An-

- toine 1771—1848)——法国将军, 1808年在西班牙作战时, 在拜伦附近率本部投降。——519。
- 韦尔斯利侯爵, 理查·科利 (Wellesley, Richard Colley, Marquis 1760—1842)——英国国务活动家, 曾任印度总督 (1797—1805), 驻西班牙大使 (1809), 外交大臣 (1809—1812), 爱尔兰总督 (1821—1828 和 1833—1834);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者。——534、578。
- 韦尔特男爵, 亨利希·威廉 (Werther, Heinrich Wilhelm Baron von)——普鲁士外交官, 1854年任驻彼得堡公使。——593—595。
- 韦斯特雷, 约翰 (Westray, John)——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 维达尔, 华金 (Vidal, Joaquin 死于 1819年)——西班牙军官, 自由主义者, 1819年领导巴伦西亚起义, 反对费南多七世的专制制度, 起义失败后被处死。——561。
- 维登布鲁赫, 路易·冯 (Wildenbruch, Luis von 1803—1874)——普鲁士外交官, 曾任驻贝鲁特总领事, 1848年与丹麦作战时期, 随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团前往哥本哈根执行外交任务;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1852—1859)。——10、28、63。
- 维蒂金德, 萨克森人——见维杜金德。
- 维杜金德 (维蒂金德, 萨克森人) (Widukind [Wittikind the Saxon] 死于 804 和 812年之间)——萨克森贵族, 777年起领导萨克森人反对法兰克的统治。——713。
- 维多利亚 (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 (1837—1901)。——10、17、28、43—45、56、96、157—159、170、171、179、215、298、327、370、403、404、411、412、418、420、437、439、451、476、639、700、714、718。
- 维多利亚-奥古斯特-安东妮 (奥尔良的), 奈穆尔公爵夫人 (Victoria-Auguste-Antonie d'Orléans, duchesse de Nemours [Victoria] 1822—1857)——路易·沙尔·菲力浦·拉斐尔 (奥尔良的), 奈穆尔公爵的妻子, 斐迪南·格奥尔格·奥古斯特, 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女儿。——714。
- 维吉尔 (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 (Vergilius Publius Maro 公元前 70—19)——罗马诗人。——18、499。
-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 (Vittorio Emanuele II [Victor Emanuel] 1820—1878)——萨瓦公爵, 撒丁国王 (1849—1861), 意大利国

- 王(1861—1878)。——82。
- 维里阿特(Viriathus 死于公元前139年)——古代西班牙部落的首领,曾于公元前147—139年发动起义,反对罗马的统治。——485。
- 维索茨基,约瑟夫(Wysocki, Józef 1809—1873)——波兰政治活动家、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1830—1831年和1863—1864年起义以及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起义和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克里木战争时期曾企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254。
- 温特兰德(Wendtland)——奥托一世的私人秘书,1854年起是希腊国王。——405。
-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306、493、666。
- 沃尔顿,威廉(Walton, William 1784—1857)——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外交家;驻圣多明各代表(1802—1809)。——514、534、578。
- 沃尔什,约翰·本,奥马思威特勋爵(Walsh, John Benn, Lord Ormathuaite 1798—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议会议员。——105、434。
- 沃克,鲍尔德温·韦克(Walker, Sir Baldwin Wake 1802—1876)——英国海军上将,曾任海军造船督察(1848—1860)。——435。
- 沃龙佐夫公爵,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князь 1782—1856)——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高加索驻军司令和高加索总督(1844—1854)。——249、352、356、359、433—435、438、718。
- 乌尔基霍,马利亚诺·路易斯(Urquijo, Mariano Luis 1768—1817)——西班牙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时期(1808—1814)投靠法国人,曾任政府首脑(1808—1813),1813年侨居法国。——522。
- 乌尔基瑙纳,佩德罗·德(Urquinaona, Pedro de)——西班牙作家。——558、561、581。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外交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66年起改名为《外交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855—1877)。——12—18、

50、62、71、72、180、317、325、431、469。

乌尔卡尔特,威·波·——见波拉德-乌尔卡尔特,威廉。

乌加尔泰-拉里萨瓦尔,安东尼奥(Ugarte y Larrizabal, Antonio 1780—1833)——西班牙政治活动家,斐迪南七世的宫廷奸党的首领。——559、560。

乌拉德五世(Vlad V)——瓦拉几亚国君(1456—1462和1476—1479)。——374。

乌沙科夫,亚历山大·克里昂纳科维奇(Уш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Клеонакович 1803—1877)——俄国将军,1854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1855年在克里木任师长。——211、395。

X

西班牙的卡洛斯(西班牙伯爵)(Carlos d' Espagne[Count of Espagne] 1775—1839)——西班牙将军,原籍法国。——566。

西摩尔(Seymour)——乔·汉·西摩尔的妻子。——152。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彼得堡(1851—1854)和维也纳(1855—1858)公使。——23、63、64、77、95、96、115、151—172、176、177、222、223、263、273。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518。

希尔,威廉(Hill, William)——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

希尔德,卡尔·安德烈耶维奇(Шильдер, Карл Андреевич 1785—1854)——俄国将军和军事工程师,武器技术方面的发明家,俄土战争时期(1828—1829和1854)在锡利斯特里亚领导俄军进行围攻作业。——79、144、338、344、347、382、445。

希尔德亚德,罗伯特·查理(Hildyard, Robert Charles)——英国国务活动家,议会议员,托利党人。——437。

希龙(Giron, R.)——西班牙新闻工作者。——447—449、451—452。

希思科特(Heathcote)——英国海军军官。——488。

悉尼(Sidney)——1854年为伦敦市长。——630、639。

- 席梅尔普芬尼希(奥耶的),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von der Oye,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登的斗争以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1858年迁居华盛顿,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252。
- 夏多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纳会议(1822)的代表。——116、477、563。
- 夏绿蒂·奥古斯塔(Charlotte Augusta 1796—1817)——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一世的第一个妻子;乔治四世的女儿。——714。
-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0—1861)。——117。
- 肖,马修(Shaw, Matthew)——英国工人,宪章派,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0、741。
- 肖,约翰(Shaw, John)——英国宪章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26。
- 肖·勒费弗尔,查理,埃弗斯利子爵(Shaw-Lefevre, Charles, Viscount Eversley 1794—1888)——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85。
- 谢尔万(Сельван 死于1854年)——俄国将军,1854年在锡利斯特里亚围攻中任俄军指挥官,在一次战斗中阵亡。——343。
- 谢立丹,理查·布林斯利(Sheridan, 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英国剧作家和政治家,辉格党激进派的代表。——454。
- 辛普森,莱昂纳德·弗兰西斯(Simpson, Leonard Francis)——英国作家,东方学家。——72—76。
-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约公元前519—438)——罗马贵族,执政官(公元前460年),独裁者(公元前458和439年),据传说,他生活简朴,亲自耕种土地。——451。
- 休谟,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00、101、425。
- 休史密斯(Shoosmith)——英国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大不列颠民主运动的参加者。——466。
- 休斯,特伦斯·麦克马洪(Hughes, Terence McMahon)——英国作家,长期侨居西班牙。——447—455、480、485、580、588。

许布纳尔, 亚历山大(Hübner, Alexander 1811—1892)——奥地利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 曾任驻巴黎公使(1849—1856)和大使(1856—1859)。——631、718。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 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 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 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 柏拉图的学生。——601。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59、103、478。

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治维奇(Aleksander I Karagorgević 1806—1858)——塞尔维亚公爵(1842—1858)。——430、475。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459。

亚历山大, 迈克尔·萨洛蒙(Alexander, Michael Salomon 1799—1845)——英国神学家, 1842年起为耶路撒冷福音新教的第一任主教。——188。

扬, 乔治(Young, George)——英国工人, 宪章派, 1854年工人议会参加者。——741。

扬三世·索比斯基(Jan III Sobieski 1629—1696)——波兰国王(1674—1696)。——324。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5、58、113、154、379、713。

叶列娜大公妃——见叶列娜·巴甫洛夫娜。

叶列娜·巴甫洛夫娜(Елена Павловна 1806—1873)——俄国大公妃, 尼古拉一世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的妻子。——152。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Алексеевна 1779—1826)——俄国皇后, 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478。

伊林斯基, 亚历山大(伊斯肯德贝伊)(Ilinski, Alexander[Iskander Bey] 1810—1861)——土耳其将军, 原籍波兰,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称伊斯肯德贝伊, 在土耳其供职; 1853—1854年在多瑙河、1855年在克里木、1855—1856年在高加索任土军指挥官。——469。

- 伊姆斯,詹姆士(Yeames, James)——英国外交官,曾任驻敖德萨领事(1853—1854)。——22,261。
- 伊萨伯拉一世(天主教徒)(Isabell, la Católica[Isabella I] 1451—1504)——卡斯蒂利亚女王(1474—1504)。——507。
- 伊萨伯拉二世(Isabella II 1830—1904)——西班牙女王(1833—1868)。——116,127,385—387,413,451—454,477,479,584—587,589,640。
- 伊萨伯拉·弗兰西斯卡·德·阿齐兹(波旁的)(Isabel Francisca de Asis de Borbón 1851—1931)——阿斯图里亚斯公主,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伊萨伯拉二世的长女。——587。
- 伊塞特帕沙(Izzet Pasha)——土耳其将军,1853年任巴尔干半岛驻军指挥官,1853—1854年任贝尔格兰德军事总督。——400,475。
- 伊斯肯德贝伊——见伊林斯基,亚历山大。
- 伊斯迈尔帕沙(Ismail Pasha 1805—1861)——土耳其将军,原籍切尔克西亚,1853—1854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142,143,597。
- 伊斯迈尔帕沙(Ismail Pasha 原名乔治·克梅蒂 György Kmety 1810—1865)——土耳其将军,原籍匈牙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国籍,改名为伊斯迈尔帕沙;克里木战争期间先任多瑙河(1853—1854),后在高加索(1854—1855)任土军指挥官。——57。
- 伊斯图里斯,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德(Isturiz, Francisco Javier de 1790—1871)——西班牙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曾任政府首脑(1836,1846和1858),驻伦敦公使(1848和1858—1862)。——410。
- 伊索(Aesop [Aisopos]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537。
- 伊文思,乔治·德·莱西(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克里木英军师长(1854)。——645。
- 印范塔多公爵,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德·托莱多(Infantado, Pedro Alcántara de Toledo, duque del 1773—1841)——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23年任摄政会议主席,1825—1826年为政府首脑。——514。
- 英格兰,理查德(England, Richard 1793—1883)——英国将军,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645。

尤莉娅·罕丽达·乌尔里丝, 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夫人 (Juliane Henriette Ulrice, Prinzessin von Sachsen-Koburg-Gotha 1781 — 1860) —— 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的妻子; 恩斯特第一的女儿。——714。

尤尼乌斯——见弗兰西斯, 菲利浦。

于班, 埃米尔 (Hubaine, Émile) —— 法国新闻工作者。——262 — 264。

约瑟夫二世 (Joseph II 1741 — 1790) —— 奥地利女皇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 (1765 — 1780), 奥地利君主国执政 (1780 — 1790),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65 — 1790)。——123、523、713。

Z

泽德林斯基——见齐德林斯基。

扎莫伊斯基伯爵, 弗拉基斯拉夫 (Zamoyski, Wladyslaw, Graf 1803 — 1868) —— 波兰大地主和将军, 曾参加 1830 — 1831 年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254。

詹·加斯东·德·美第奇, 托斯卡纳大公 (Gian Gastone de Medici, granduca di Toscana 1670 — 1737) —— 美第奇大公 (1723 — 1737)。——157。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330。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力斯把它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465。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之一，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407、714。

奥林匹亚——见宙斯。

B

笨伯雅克——法国农民的讽刺性绰号。——651。

D

达辛尼亚(托博索的)——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主人公唐·吉珂德幻想中的情人。——452、601。

F

弗洛里佩斯——卡德龙的剧作《曼蒂布莱的桥》中的人物。——525。

H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 12 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465。

J

珈桑德拉——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柏里亚的女儿，女预言家；特洛伊攻陷后被亚加米农当作奴隶带走；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中的人物。——164。

L

拉奥孔——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占卜者，特洛伊英雄，太阳神阿波罗和海神波赛东在特洛伊的祭司，特洛伊战争期间曾告诫人们谨防希腊人的木马，后来与两个儿子被智慧女神雅典娜派遣的两条巨蛇活活缠绕致死。——499。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大吹大擂，胡说八道。——432、631。

M

马蒂娜——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中的人物。——533。

玛尔斯——古代罗马人的战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战神亚力司。——449。

密纳发——见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

N

奈斯托尔——古希腊神话中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中最老最贤明的英雄；在文学传统中，他经常被当作饱经世故的聪明的长者的典型。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中的人物。——406—407。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主人公。——411。

挪亚——圣经中的人物，据圣经传说，是“洪水灭世”后重新繁殖的人类的始祖。——465。

P

潘多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相传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类后，宙斯大怒，为惩罚人类命火神赫斐斯塔司塑造一个女子，由雅典娜给予生命和服饰，阿芙罗狄蒂赠以妩媚，海尔梅斯赋予语言能力，诸神亦均有所馈赠。宙斯为她取名为潘多拉，意即“有一切赠礼的女人”，并让海尔梅斯把她送到地上。潘多拉降落人间后找到普罗米修斯之弟埃庇米修斯，普罗米修斯警告其弟切勿接受宙斯的赠礼。埃庇米修斯不听劝告，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美丽年轻的女子。潘多拉下凡时随身携有一盒，当她走近埃庇米修斯时，突然打开盒盖，顿时里面飞出种种邪恶、灾难和祸害，迅即散布大地，她急忙关盒，却把深藏盒底的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留在盒里。从此，世间疾病流行，灾祸横生，希望渺茫。“潘多拉的盒子”一词成为一切麻烦、灾难、祸害之源的同义语。——218。

潘塔隆——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威尼斯商人，一个富有、吝啬而又愚蠢的老头儿。——215。

S

撒旦——圣经中恶魔的专称。——364。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犬，凶暴的守卫者的象征。——101。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601。

史纳格——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细木工。——101。

斯加纳列尔——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及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说大话的庸人和胆小鬼的典型。——533。

斯库伊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中的主人公，是残忍、贪婪无知和虚伪的典型。——411。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君主著称。——188。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452、516、535、584、

601。

W

乌利斯——见奥德赛。

X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之一；据传说她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439。

辛伯达——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航海家。——447。

Y

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主要神祇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8。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305、309。

Z

宙斯（奥林匹亚）——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8。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奥地利的破产》，载于1854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3号(Austrian bankruptc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33, 22. März 1854)。——391。
- 《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载于1854年8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52号(The policy of Austria —The war debate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52, 9. August 1854)。——635、695。
- 《撤出多瑙河两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载于1854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2号(Evacuation of the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The events in Spain —A new Danish constitution —The Chartis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62, 21. August 1854)。——608。
- 《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波兰。——西班牙人民的要求》，载于1854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6号(Evacuation of Moldavia and Wallachia —Poland —Demands of the Spanish peopl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66, 25. August 1854)。——475。
- 《东方的战事。——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载于1854年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7号(The fighting in the East —Finances of Austria and France —Fortification of Constantinopl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97, 8. Februar 1854)。——47、57。
-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载于1853年6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1号(The Russian humbug —Glad-

- stone's failure — Sir Charles Wood's East Indian reform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01, 22. Juni 1853). — 58。
- 《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黑山》，载于 1854 年 2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13 号 (Russian diplomacy — The Blue Book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 Montenegro.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13, 27. Februar 1854)。——78。
- 《2 月 22 日的议会辩论。——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列强的政策》，载于 1854 年 3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25 号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 February 22 — Pozzo di Borgo's dispatch — The policy of the Western power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25, 13. März 1854)。——114、271。
- 《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载于 1854 年 3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30 号 (English and French war plans — Greek insurrection — Spain — Chin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30, 18. März 1854)。——127、271、477。
- 《菲格斯·奥康瑞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载于 1853 年 5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58 号 (Feargus O' Connor — Ministerial defeats — The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58, 3. Mai 1853)。——199、273。
-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载于 1854 年 4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045 号 (The documents on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45, 5. April 1854)。——220。
-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印度、土耳其和俄国》，载于 1853 年 6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90 号 (Affairs in Holland — Denmark — Conversion of the British debt — India, Turkey and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90, 9. Juni 1853)。——89。
-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载于 1853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61 号 (Riot at Constantinople — German table moving — The budge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61, 6. Mai 1853)。——199、273。
- 《马德里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载于 1854 年 7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34 号 (The insurrection at Madrid — The Austro-Turkish treaty — Moldavia and Wallach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34, 19. Juli 1854)。——392、428、430、695。

- 《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载于1854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6号（The details of the insurrection at Madrid — The Austro-Prussian summons — The new Austrian loan — Wallach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36, 21. Juli 1854）。——409、430。
- 《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载于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0号（The secret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50, 11. April 1854）。——159、220、270。
- 《内阁的成就》，载于1853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53号（Achievements of the minist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53, 27. April 1853）。——273。
- 《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拿破仑的计划。——普鲁士的政策》，载于1854年3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22号（Declaration of the Prussian cabinet — Napoléons plans — Prussia's polic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22, 9. März 1854）。——159。
- 《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载于1854年2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0号（The Czar's views — Prince Alber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00, 11. Februar 1854）。——56。
- 《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杜尔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内阁危机》，载于1854年8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47号（A Congress at Vienna — The Austrian loan — Proclamations of Dulce and O' Donnell — The ministerial crisis in Britai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47, 3. August 1854）。——415、419。
- 《革命的西班牙》，载于1854年9月9、25日、10月20、27、30日、11月24日、12月1、2日和1855年3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79、4192、4214、4220、4222、4244、4250、4251、4345号（Revolutionary Spai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79, 9. September; Nr. 4192, 25. September; Nr. 4214, 20. Oktober; Nr. 4220, 27. Oktober; Nr. 4222, 30. Oktober; Nr. 4244, 24. November; Nr. 4250, 1. Dezember; Nr. 4251, 2. Dezember 1854; Nr. 4345, 23. März 1855）。——388。
- 《希腊人暴动》，载于1854年3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39号（The Greek insurrec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39, 29. März 1854）。——253。
- 《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载于1853年2月8

- 日第 3686 号 (Elections — Financial clouds — 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and slave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86, 8. Februar 1853)。——386。
- 《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 载于 1853 年 3 月 1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16 号 (Parliamentary debates — The clergy against socialism — Starva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16, 15. März 1853)。——314。
- 《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 载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6 号 (The Indian question — Irish tenant righ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16, 11. Juli 1853)。——286。
- 《英国特别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战争。——经济状况》, 载于 1854 年 6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05 号 (The formation of a special ministry of war in Britain — The war on the Danube —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05, 14. Juni 1854)。——435 —436。

弗·恩格斯

- 《阿利马河会战》, 载于 1854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19 号 (The battle of the Alm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19, 26. Oktober 1854)。——664、681。
- 《波罗的海和黑海上的军事行动。——英法的作战方法》, 载于 1854 年 6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01 号 (The exploits in the Baltic and Black seas — Anglo-French system of operations. [Gez]: Karl Mar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01, 9. Juni 1854)。——299、436 —437。
-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 (第二篇论文)》, 载于 1854 年 9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82 号 (The capture of Bomarsund. (Second articl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82, 13. September 1854)。——632。
-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 载于 1854 年 10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209 号 (The attack on Sevastopol.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09, 14. Oktober 1854)。——638、660。
- 《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 载于 1854 年 6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115 号 (The siege of Silistr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15, 26. Juni 1854)。——380。
- 《多瑙河战争》, 载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52 号 (The war

- on the Danub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52, 16. Dezember 1853)。——31—32。
- 《多瑙河战争》，载于1854年7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9号(The war on the Danub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39, 25. Juli 1854)。——491—492。
- 《俄国的军事力量》，载于1854年10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23号(The military power of 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23, 31. Oktober 1854)。——699—700。
- 《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载于1854年3月18日《人民报》(伦敦)第98期(Retreat of the Russians from Kalafat .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98, 18. März 1854)。——253。
- 《俄军的撤退》，载于1854年3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40号(The Russian retrea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40, 30. März 1854)。——253。
- 《俄军在土耳其》，载于1853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0号(The Russians in Turke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0, 17. Oktober 1853)。——441。
- 《克里木的消息》，载于1854年10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1号(The news from the Crime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11, 17. Oktober 1854)。——634、636、644。
- 《克里木战役》，载于1854年1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72号(The Crimean campaig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72, 27. Dezember 1854)。——699、700。
- 《欧洲战争》，载于1854年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92号(The European war .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92, 2. Februar 1854)。——65。
- 《土耳其问题》，载于1853年4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6号(The Turkish ques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746, 19. April 1853)。——271。
-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载于1854年1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71号(Progress of the Turkish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71, 9. Januar 1854)。——31、142—144。
- 《因克尔曼会战》，载于1854年1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61号(The battle of Inkerma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61, 14. Dezember

1854)。——690。

《战争》，载于1854年5月27日《人民报》(伦敦)第108期(The war. [Gez]: K. M.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08, 27. Mai 1854)。——229、43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俄土战场的形势》，载于1854年7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25号(State of the Russian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125, 8. Juli 1854)。——437、468。

《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不列颠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载于1854年2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4号(Fortification of Constantinople —Denmarks neutrality —Composition of British Parliament —Crop failure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04, 16. Februar 1854)。——69。

《欧洲战争》，载于1854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5号(The European war.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55, 17. April 1854)。——235、253、429—430。

《欧洲战争问题》，载于1854年3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19号(The war question in Europe.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019, 6. März 1854)。——141。

《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载于1854年10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215号(The Sevastopol hoax.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4215, 21. Oktober 1854)。——657。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阿伯丁, [乔·][《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 März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15。
- 阿伯丁, [乔·][〔1854年6月19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6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2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9. Jun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2, 20. Juni 1854)。——358、361、363—364。
- 阿伯丁, [乔·][〔1854年6月23日在上院发表的声明〕], 载于1854年6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6号(Aberdeen, [G.]: [Ankündigung im House of Lords, 23. Jun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6, 24. Juni 1854)。——360。
- 阿伯丁, [乔·][〔1854年6月26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6月2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8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6. Jun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8, 27. Juni 1854)。——362—365。
- 阿伯丁, [乔·][〔1854年7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4.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0。
- 阿伯丁, [乔·][〔1854年12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12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23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2. Dezember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23, 13. Dezember 1854)。——700。
- 阿伯丁, [乔·]《阿伯丁伯爵给黑茨伯里勋爵的紧急电报。1829年9月14日》。引自1854年6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9号(Aberdeen, [G.]: Despatch from the Earl of Aberdeen to Lord Heytesbury, respecting the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concluded at Adrianople on the 14th of September 1829.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5 July 1854. London [1854]. Nach: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9, 28. Juni 1854. [U. d. T.]: The treaty of Adrianople)。——363。
- [阿伯丁, 乔·/威·格莱斯顿]〔正式通告〕。1854年4月21日, 载于1854年4月2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22号([Aberdeen, G./W. Gladstone]: [Offizielle Mitteilung.]Treasury-chambers, April 21,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22, 22. April 1854)。——274。
- 《阿德里安堡条约》, 载于1854年6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9号(The treaty of Adrianopl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9, 28. Juni 1854)。——

362。

阿尔科克,托·〔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Alcock T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5。

阿默兰,〔弗·阿·〕〔1854年4月10日的〔报告摘录〕〕,载于1854年5月1日《比利时独立报》(布鲁塞尔)第121号(Hamelin, [F.-A.]: [Auszug aus dem Rapport.] 10 avril 1854. In: L'Indépendance Belge. Bruxelles. Nr. 121, 1. Mai 1854)。——260—261。

阿默兰,〔弗·阿·〕〔1854年4月24日的〔电报〕〕,载于1854年5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39号(Hamelin, [F.-A.]: [Depesche.] Rade d' Odessa, 24 avril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39, 12. Mai 1854)。——280、283。

阿默兰,〔弗·阿·〕〔〔1854年〕5月1日的〔电报〕〕,载于1854年5月2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47号(Hamelin, [F.-A.]: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May 1,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47, 22. Mai 1854)。——294。

阿默兰,〔弗·阿·〕〔〔1854年〕5月5日的〔电报〕〕,载于1854年5月2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47号(Hamelin, [F.-A.]: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May 5,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47, 22. Mai 1854)。——294。

阿默兰,〔弗·阿·〕〔〔1854年〕5月21日的〔报告〕〕,载于1854年6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62号(Hamelin, [F.-A.]: [Report.] Baltschik, May 21,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62, 8. Juni 1854)。——332。

阿默兰,〔弗·阿·〕〔1854年9月23日的〔报告〕〕,载于1854年10月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17号(Hamelin, [F.-A.]: [Report.] Sept. 23,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17, 9. Oktober 1854)。——644—646。

阿默兰,〔弗·阿·〕〔〔1854年〕10月18日的〔电报〕〕,载于1854年11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91号(Hamelin, [F.-A.]: [Depesche.] Before Katcha, Oct. 18,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91, 6. November 1854)。——668。

埃利亚德-勒杜莱斯库,让·《关于罗马尼亚恢复的历史,或1848年瓦拉几亚事件的回忆》1851年巴黎版(Héliade-Radulesco, J.: Mémoire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génération roumaine ou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1848 accomplis en Valachie. Paris 1851)。——375—378。

埃伦伯勒,〔爱·罗·〕〔〔1854年7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7月

- 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Ellenborough, [E. L.]: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4.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1。
- 《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48年马德里版(Espartero. Su pasado, su presente, su porvenir. Madrid 1848)。——447、449、451、453。
- 《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的协定。1854年6月14日》1854年伦敦版。引自1854年7月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83号(Convention between Austria and the Sublime Porte, signed at Boyadji-Keuy, on the 14th June, 1854. Presen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4. London [1854]. Nach: The Times. London. Nr. 21783, 3. Juli 1854. [U. d. T.]: I take the chance.)。——346、347、352、356、359、371—373、391、421、422、428—431、468。
- 《奥地利皇帝陛下和法国皇帝陛下之间的同盟条约。1854年12月2日》[1854年]伦敦版(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Emperor of Austria and the Emperor of the French, signed at Vienna, 2 December, 1854.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4. London [1854])。——695、700、701。
- 《奥地利金融货币的现状》,一位帝国观察家著,译自德文原文第2版,1853年莱比锡版(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finances and currency in Austria. By an imperial observer. Transl. from the 2. ed. of the German original. Leipzig 1853)。——120—123。
- [《奥地利1854年6月3日提出的绝对要求》]。引自1854年7月6日《科隆日报》第185号([Österreichische Sommaton vom 3. Juni 1854.]Nach: Kölnische Zeitung. Nr. 185, 6. Juli 1854. [U. d. T.]: In Erwartung der russischen Antwort. . .)。——326、327、356、359—360、389、390、431。
- 奥当奈尔,莱·[《文告。1854年7月7日》],载于1854年7月17日《辩论日报》(巴黎):(O' Donnell, L. : [Proclamation. Manzanares, 7. Juli 1854.]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7. Juli 1854)。——397、409—410、414。
- [奥美尔帕沙][《给萨米帕沙的信》。6月28日],载于1854年7月9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10号([Omer Pasha.]: [Brief an Sami Pasha.]Widdin, le 28. juin.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10, 9. Juli 1854)。——383。

- 《奥美尔帕沙的报告。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载于1854年6月2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522号(Omer Pasha's bulletin. The siege of Silistria.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522, 20. Juni 1854)。——346。
- [《奥普关于维护各自领土完整和在东方问题上确保德意志的利益利益的条约。1854年4月20日》]。引自1854年4月22日《汉诺威日报》第187号([Vertrag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ßen zum Schutz ihrer Territorien und zur Sicher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teressen in der orientalischen Frage.] Berlin, 20. April 1854. Nach: Hannoversche Zeitung. Nr. 187, 22. April 1854. [U. d. T.]: Über den Inhalt...)。——244、255、312、313、319、399。
- 《奥普条约》，载于1854年5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49号(The treaty between Austria and Prussia.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49, 24. Mai 1854)。——312、313、326。
- 《奥普条约的补充条款。1854年4月20日》，载于1854年5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49号(Additional article to the treaty between Austria and Prussia, dated April 20,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49, 24. Mai 1854)。——320。
- 《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和平条约。1829年9月14日。附关于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问题的特别条款》，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4卷。[第5条和特别条款]引自迪·布拉蒂亚诺《关于多瑙河两公国问题的文件》1849年伦敦版(Traité de paix, entre la Porte ottomane et la Russie, signé à Adrianople, le 2/14 septembre 1829; suivi d' un traité spécial pour les principautés de Moldavie et Valachie, signé le même jour.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4. Leipzig 1846. [Art. 5 und Separatvetrag auch] nach: D. Bratiano;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he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London 1849)。——11、15、27、73、360—367、375、421。
- 《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和平与同盟条约。1833年6月8日》，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4卷(Traité de paix et d' alliance, entre la Porte ottomane et la Russie, signé à Constantinople, le 8 juillet 1833.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4. Leipzig 1846)。——12、26—27、57、364。

奥斯滕-萨肯, [德·][《4月23日的报告摘录》], 载于1854年5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36号(Osten-Sacken, [D.]: [Auszug aus dem Bericht vom 23. April.]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36, 9. Mai 1854)。——281—283。

B

《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的电报》, 载于1854年9月8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591号(General Baraguay d' Hilliers... [Depesche aus:] Dantzig, Tuesday.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591, 8. September 1854)。——595。

巴特, [伊·][《1854年2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58号(Butt, [I.]: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6. Februar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58, 7. Februar 1854)。——67。

巴特, [伊·][《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0号(Butt, [I.]: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92。

班克斯, 乔·[《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Bankes,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5。

[鲍姆加特纳, 安·]《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及其未来》, 载于1852年6月8日《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第137号([Baumgartner, A.]: Die Oesterr[eichischen] Finanzverhältnisse und ihre Zukunft. In: 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 Nr. 137, 8. Juni 1852)。——120—122。

鲍姆加特纳, [安·]《财政和商业大臣的命令。1854年1月16日》, 载于1854年1月22日《米兰官报》第22号(Baumgartner, [A.]: Ordinanza dei ministeri delle finance e del commercio del 16 gennaio 1854. In: Gazzetta Ufficiale di Milano. Nr. 22, 22. Januar 1854)。——57。

贝克莱, [莫·弗·][《1854年7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3号(Berkeley, [M. F.]: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3, 26. Juli 1854)。——436、437。

[《贝克普居民给议会的请愿书。1854年7月30日》], 载于1854年8月5日《人民报》(伦敦)第118期([Petition to Parliament of the inhabitants of Bacup,

- the 30th of July 1854.]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18, 5. August 1854)。——463—464。
- 贝利, [亨·] [《1854年1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35号(Baillie,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1. Jan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35, 1. Februar 1854)。——61—62。
- 彼得罗维奇, 丹· [《给黑山族首领的呼吁书。1854年3月16日》], 载于1854年4月28日《新闻报》(维也纳)第98号(Petrovich, D.: [Aufruf des Vladika von Montenegro vom 16. März 1854.] In: Die Presse. Wien. Nr. 98, 28. April 1854)。——265。
- 比安基·乔维尼, 奥·《俄国和土耳其》, 载于1854年4月12日《同盟报》(都灵)第138号(Bianchi-Giovini, A.: Russia e Turchia. In: L'Unione. Torino. Nr. 138, 12. April 1854)。——243—244。
- 比达尔夫, 迈·安·《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路线草图》1854年伦敦版(Biddulph, M. A.: Sketches of the assault of Sevastopol. London 1854)。——661。
- 比格兰, 约·《从古代到1809年的西班牙历史》(三卷集)1823年巴黎版第3卷(Bigland, J.: Histoire d'Espagne depuis la plus ancienne époque jusqu'à la fin de l'année 1809. T. 1—3. T. 3. Paris 1823)。——518。
- 比诺, 让·《帝国财政的全貌。皇帝的报告》, 载于1854年1月27日《总汇报》(巴黎)第27号。引自1854年1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51号(Bineau, [J.]: Situation générale des finances de l'Empire. Rapport à l'Empereur.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7, 27. Januar 1854. Nach: The Times. London. Nr. 21651, 30. Januar 1854. [U. d. T.]; The French financial statement)。——60。
- 《博马尔松德的夺取》, 载于1854年8月2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26号(The capture of Bomarsund.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26, 22. August 1854)。——495。
- 《博马尔松德要塞平面图和舰队的位置。1854年6月21日》, 载于1854年7月8日《伦敦新闻画报》第691号(Plan of the fortifications and positions of the ships at Bomarsund. June 21st, 1854.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r. 691, 8. Juli 1854)。——491。
- 博蒙特, [迈·] [《1854年6月26日在上院向阿伯丁勋爵提出的质问》], 载于1854年6月2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8号(Beaumont, [M.]: [Anfrage

- an den Earl of Aberdeen im House of Lords, 26. Jun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8, 27. Juni 1854)。——364—365。
- 波措-迪-博尔哥, [沙·安·]《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1825年10月16日》, 载于1854年2月5日《维也纳劳埃德氏杂志》第29号上午版(Pozzo di Borgo, [Ch. A.]; Dépêche réservée des Generals Pozzo di Borgo. Datirt Paris 4. / 16. October 1825. In: Wiener Lloyd. Nr: 29, 5. Februar 1854. Morgenausg.)。——103—104。
- [波拿巴], 约·《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十卷集) 1853年巴黎版第4卷([Bonaparte], J.: 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publiés, annotés, et mis en ordre par A. du Casse. T. 1—10. T. 4. Paris 1853)。——504, 511—514。
- 布拉蒂亚诺, 迪·《关于多瑙河两公国问题的文件。呈英国议会》1849年伦敦版(Bratiano, D.: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he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Dedicated to the English Parliament. London 1849)。——374, 377。
- 布拉姆森, 约·《关于西班牙北方的评论》1823年伦敦版(Bramsen, J.: Remarks on the North of Spain. London 1823)。——581。
- 布莱克特, [约·] [(1854年5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5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54号(Blacket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9. Ma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54, 30. Mai 1854)。——311。
- 布莱特, [约·] [(1854年3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Brigh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1. März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499。
- 布莱特, [约·] [(1854年5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5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54号(Bright,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9. Ma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54, 30. Mai 1854)。——316。
- [布兰特, 亨·冯·]《俄国近年来的政策和军队》1852年柏林版([Brandt, H. von]: Rußland's Politik und He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Berlin 1852)。——208, 343—344, 380, 655—656。
- 布兰特, 亨·冯·《两个迈纳斯和西班牙战争》1825年伦敦版(Brandt, H. von: The two Minas and the Spanish guerillas. Extracted and transl. from a work "On Spain". London 1825)。——536。
- 布鲁姆, [亨·彼·] [(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

-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04 号(Brougham, [H. P.]: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181、216。
- 布鲁姆, [亨·彼·] [《1854 年 6 月 26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6 月 27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78 号(Brougham, [H. P.]: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6. Jun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8, 27. Juni 1854)。——367。
- 布鲁诺, 乔·《论英雄热情》(Bruno, G.: De gli eroici furori)。——474。
- 布图尔林, [德·彼·] [《1812 年俄土战争的军事史》(两卷集)1824 年巴黎—彼得堡版(Boutourlin, [D. P.]: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campagne Russie en 1812. T. 1. 2. Paris, Pétersbourg 1824)。——205。

C

- 《财政大臣 1854 年 2 月 23 日公告——通报在货币关系的调节问题上同奥地利特许国民银行董事会的一致意见》, 载于 1854 年 2 月 24 日《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第 47 号(Erlaß des Finanzministers vom 23. Februar 1854, womit ein Übereinkommen mit der Direktion der priv.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ank über die Regulierung der Geldverhältnisse kundgemacht wird. In: Ö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 Nr. 47, 24. Februar 1854)。——118—120。
- 查兹, 亨·杜· [《第 18 号公报。]博马尔松德的陷落。[1854 年]8 月 12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24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28 号(Chads, H. D.: [Report Nr. 18.]Off Bomarsund, Aug. 12,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28, 24. August 1854)。——495—496。
- 察斯特罗, 阿·冯·《永久性筑城的历史或筑城艺术的最优秀体系和风格手册》1839 年莱比锡第 2 版(Zastrow, A. von: Geschichte der beständigen Befestigung oder Handbuch der vorzüglichsten Systeme und Manieren der Befestigungskunst. 2. Aufl. Leipzig 1839)。——191—192、305—306、456、492、624—625、668。

D

- 《大不列颠、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同奥斯曼帝国之间关于平息黎凡特事件的协定。1840 年 7 月 15 日于伦敦》, 载于《关于黎凡特事件的函件》(三卷集) [1841 年]伦敦版第 1 卷(Convention concluded between the courts of Great

- Britain, Austria, Prussia, and Russia, on the one part, and the Sublime Ottoman Porte on the other,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 signed at London, July 15, 1840.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the Levant. Pt. 1—3. Pt. 1. London [1841]). ——11—12, 63。
- 戴维斯, 亨·温·《19世纪奥尔穆兹德和阿里曼的战争》1852年巴尔的摩版 (Davis, H. W.: The war of Ormuzd and Ahri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852)。——565。
- 道格拉斯, 霍·《论海军炮》1851年伦敦第3版 (Douglas, H.: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y. 3. ed. London 1851)。——496。
- 德比, [爱·] [《1854年3月27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3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0号 (Derby,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7.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0, 28. März 1854)。——180。
- 德比, [爱·] [《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 (Derby,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19。
- 德拉蒙德, [亨·] [《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0号 (Drummond,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92。
- 德鲁安-德路易斯, [爱·]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致帝国驻维也纳公使布尔克奈男爵。[1854年]7月22日》], 载于1854年8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18号 (Drouyn de Lhuys, [E.]: M. Drouyn de Lhuys to Baron de Bourqueney, Minister of the Emperor at Vienna. Paris, July 22,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18, 12. August 1854)。——476。
- 德鲁安-德路易斯, [爱·] [《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通令。]1853年12月30日], 载于1854年1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32号 (Drouyn de Lhuys, [E.]: [Circular addressed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to its diplomatic agents.] Paris, Dec. 30,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32, 7. Januar 1854)。——10、12、26。
- 《德文郡的抢粮风潮》, 载于1854年1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33号 (Bread riots in Devonshir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33, 9. Januar 1854)。——10。

- 邓达斯, [詹·]〈第 172 号[报告。][1854 年]4 月 22 日〉, 载于 1854 年 5 月 13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740 号 (Dundas, [J.]: [Report.] 〈No. 172.〉 Off Odessa, April 22,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40, 13. Mai 1854)。——283。
- 迪富尔, 吉·昂·《野战实际作业教科书》1825 年柏林版 (Dufour, G. H.: Handbuch für die praktischen Arbeiten im Felde. Berlin 1825)。——629。
- 迪斯累里, [本·]〔〈1854 年 2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2 月 18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668 号 (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8, 18. Februar 1854)。——87。
- 迪斯累里, [本·]〔〈1854 年 2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2 月 21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670 号 (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93—100、315。
- 迪斯累里, [本·]〔〈1854 年 3 月 6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3 月 7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682 号 (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6.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82, 7. März 1854)。——131—132。
- 迪斯累里, [本·]〔〈1854 年 3 月 13 日在下院提出的质询〉〕, 载于 1854 年 3 月 14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688 号 (Disraeli, [B.]: [Anfrage im House of Commons, 13.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88, 14. März 1854)。——156。
- 迪斯累里, [本·]〔〈1854 年 3 月 3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4 月 1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704 号 (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21、225。
- 迪斯累里, [本·]〔〈1854 年 5 月 5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5 月 6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734 号 (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5. Ma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34, 6. Mai 1854)。——275。
- 迪斯累里, [本·]〔〈1854 年 5 月 29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5 月 30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754 号 (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9. Ma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54, 30. Mai 1854)。——315。

- 迪斯累里, [本·] [(1854年7月20日在下院提出的质询)], 载于1854年7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99号(Disraeli, [B.]: [Anfrag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99, 21. Juli 1854)。——420。
- 迪斯累里, [本·] [(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6。
- 《蒂尔西特秘密条约。[1807年]》。引自约·[波拿巴]《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十卷集)1853年巴黎版第4卷(Tratado secreto de Tilsit (1) [1807]. Nach: J. [Bonaparte]: 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publiés, annotés, et mis en ordre par A. du Casse. T. 1—10. T. 4. Paris 1853)。——513。
- 《对1820—1823年和1836年西班牙革命的批判分析》(两卷集)1837年巴黎版第1卷(Examen critique des révolutions d'Espagne de 1820 à 1823 et de 1836. T. 1. 2. T. 1. Paris 1837)。——560、566、571、582。
- 杜阿梅尔, 维·《西班牙君主国的宪法史》(两卷集)1848年马德里第2版第2卷(Du Hamel, V.: Historia constitucional de la Monarquía española. 2. ed. T. 1. 2. T. 2. Madrid 1848)。——558、580。
- 杜尔塞, 多·/莱·奥当奈尔/[安·]罗斯·德·奥兰诺《文告。1854年7月1日》, 载于1854年7月17日《辩论日报》(巴黎)(Dulce, D./L. O'Donnel/[A.] Ros de Olano: [Proklamation. Aranjuez, 1. Juli 1854.]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7. Juli 1854)。——409。
- 杜科, 泰·《给皇帝的报告。1854年2月25日》, 载于1854年2月26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7号(Ducos, Th.: Rapport à l'Empereur. Paris, 25 février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7, 26. Februar 1854)。——292。
- 《[多棱镜]。博马尔松德, 奥兰群岛》, 载于1854年8月5日《伦敦新闻画报》第696号([Panorama] Bomarsund, Aland Islands.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r. 696, 5. August 1854)。——491。

E

- 《俄国公报。(引自5月4日《圣彼得堡报》)》, 载于1854年5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40号(The Russian accounts. (From the Journal de St. Peters-

- bourg of April 22 (May 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40. 13. Mai 1854)。——280。
- 《俄国关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公报》，载于1854年7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82号(Russian account of operations against Silistria.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82, 1. Juli 1854)。——380。
- 《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密协定。1805年11月3日》，载于弗·穆尔哈德《……协定和其他重要公文集补编》(三卷集)1839年格丁根版第1卷(Convention secrète entre la Russie et la Prusse, signée à Potsdam par les plénipotentiaires de ces deux puissances, le 3 novembre 1805. In: F. Murhard: Nouveaux supplémens au recueil de traités et d'autres actes remarquables ... T. 1—3. T. 1. Goettingue 1839)。——5。
- [《俄国和土耳其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协定。1849年5月1日》，载于《俄国和土耳其政治和领土条约汇编。1774—1849年》[1854年]伦敦版([Convention entre la Russie, et la Turquie relative aux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 signé à Balta-Liman, le 1 mai 1849.] In: Treaties, 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1774—184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4. London [1854])。——376—377。
- 《俄国军队。[摘自《军队通报》]》，载于1854年9月1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50号(The Russian army. [Auszug aus dem "Moniteur de L'Armé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50, 19. September 1854)。——651—652。
- 《俄国投入克里木战争的兵力》，载于1854年11月1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46号(Russian forces in the Crimia.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46, 11. November 1854)。——695、698。
- 《俄国为失败辩护。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载于1854年6月2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522号(Russian apology for failures. The siege of Silistria.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522, 20. Juni 1854)。——346。
- 《俄军和摩尔多瓦民团》，载于1854年9月1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597号(The Russians and the Moldavian militia.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597, 15. September 1854)。——608。
- 《俄军在阿利马河战役的失败。10月1日维也纳[电]》，载于1854年10月2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11号(Russian loss at the battle of the Alma. [Depesche aus:] Vienna, Oct. 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11, 2. Oktober

1854)。——627。

《俄军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1849年伦敦第2版(The Russians in Moldavia and Wallachia. 2. ed. London 1849)。——374—378。

《俄军在亚洲的退却》，载于1854年9月1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597号(Russian retreat in Asia.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597, 15. September 1854)。——607。

F

法耳梅赖耶尔,雅·菲·《东方来信片断》(两卷集)1845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Fallmerayer, J. Ph.; Fragmente aus dem Orient. Bd. 1. 2. Bd. 1. Stuttgart, Tübingen 1845)。——148。

《法国、奥地利、大不列颠、普鲁士、俄国同奥斯曼帝国之间关于禁止各国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协定。1841年7月13日于伦敦》，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9年莱比锡版第5卷(Convention conclue entre la France, l'Autriche, la Grande-Bretagne, la Prusse et la Russie, d'une part, et l'empire ottoman, de l'autre part, destinée à garantir la fermeture des détroits des Dardanelles et du Bosphore aux bâtiments de guerre de toutes les nations, signée à Londres le 13 juillet 1841.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 actes diplomatiques ... T. 1—5. T. 5. Leipzig 1849)。——12、105、111、398、476、594。

《法国宫廷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新旧特惠条例和条约》1770年巴黎版。引自塞·法曼《基督教会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年巴黎版(Capitulations, ou traités anciens et nouveaux entre la cour de France et la Porte Ottomane, renouvelés et augmentés l'an de J. C. 1740, et de l'hégire 1153; traduits à constantinople par le sieur Deval, secrétaire-interprète du roi et son premier drogman à la cour ottomane, 1761. Paris 1770. Nach: C. Famin; Histoire de la rivalité et du protectorat des églises chrétiennes en Orient. Paris 1853)。——184。

《法国国王陛下和苏丹之间关于有条件地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的条约。1854年3月12日》[1854年]伦敦版(Treaty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Emperor of the French and the Sultan, relative to military aid to be given to Turkey. Signed

- at Constantinople, March 12, 1854.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4. London [1854]). — 111, 114, 180, 228, 244。
- 《法兰西共和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和平条约。1802年6月25日》。引自塞·法曼《基督教会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年巴黎版(Traité de paix entr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a Sublime Porte ottomane, signé à Paris le 6 messidor an X (25 juin 1802). Nach: C. Famin: Histoire de la rivalité et du protectorat des églises chrétiennes en Orient. Paris 1853)。 — 184。
- 《法兰西帝国和西班牙王国的秘密条约。1807年10月27日》。引自约·[波拿巴]《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十卷集)1853年巴黎版第4卷(Traité secrets entre l' empereur des Français et le roi d' Espagne, signés à Fontainebleau le 27 octobre 1807. Nach: J. [Bonaparte]: 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publiés, annotés, et mis en ordre par A. du Casse. T. 1 — 10. T. 4. Paris 1853)。 — 506, 511。
- 法曼, 塞·《基督教会东方的竞争和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历史》1853年巴黎版(Famin, C.: Histoire de la rivalité et du protectorat des églises chrétiennes en Orient. Paris 1853)。 — 180 — 188。
- 《反西班牙的神圣同盟。附同盟国的若干照会和声明》, 一位立宪主义者著, 1823年伦敦版(The Holy Alliance versus Spain; containing the several notes and declarations of the Allied Powers... By a Constitutionalist. London 1823)。 — 544。
- [费南多七世][《1814年5月4日的敕令》]。引自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三卷集)1832年伦敦版第3卷([Fernando VII]: [Dekret vom 4. Mai 1814.]Nach: R. Southey: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 war. Vol. 1 — 3. Vol. 3. London 1832)。 — 544, 554。
- [费南多七世][《1814年7月21日的敕令》]。引自约·比格兰《从古代到1809年的西班牙历史》(三卷集)1823年巴黎版第3卷([Fernando VII]: [Dekret vom 21. Juli 1814.]Nach: J. Bigland: Histoire d' Espagne depuis la plus ancienne époque jusqu' à la fin de l' année 1809. T. 1 — 3. T. 3. Paris 1823)。 — 518。
- [费南多七世][《1823年9月30日的敕令》]。引自《对1820—1823年和1836年西班牙革命的批判分析》(两卷集)1837年巴黎版第1卷([Fernando VII]: [Dekret vom 30. September 1823.]Nach: Examen critique des révolutions d' Es-

- pagne de 1820 à 1823 et de 1836. T. 1. 2. T. 1. Paris 1837)。——566。
- 菲茨威廉, [查·] [《1854年7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Fitzwilliam, [C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1。
- 伏尔泰《悲剧〈塞米拉米达〉和其他几个文学剧本》, 载于《论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1749年巴黎版(Voltaire: La tragédie de Sémiramis, et quelques autres pièces de littérature. In: Dissertation sur la tragédie ancienne et moderne. Paris 1749)。——215。
- [福特, 理·] 《关于西班牙战争的不变性质的历史研究》1837年伦敦版([Ford, R.]: An historical enquiry into the unchangeable character of a war in Spain. London 1837)。——582。
- 弗兰茨一世《弗兰茨皇帝陛下的法律和司法制度。适用于奥地利君主国的德意志各邦。1804—1811年和1812—1817年》1816年和1819年维也纳版(Franz I.; Seiner Majestät des Kaisers Franz Gesetze und Verfassungen im Justizfache. Für die deutschen Staaten der oes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Von dem Jahre 1804 bis 1811. Von dem Jahre 1812 bis 1817. Wien 1816. 1819)。——121, 123。
- [弗兰西斯, 菲·] 尤尼乌斯《书信集, 用不同署名写成的书信》(两卷集)1850年伦敦版第1卷([Francis, Ph.] Junius: Including letters by the same writer under other signatures; to which are added hi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with Wilkes, and his private letters to H. S. Woodfall. With new evidence as to the authorship, and an analysis by Harry Nicolas. By John Wade. A new and enl. ed. Vol. 1. 2. Vol. 1. Containing the entire work as originally publ. with ill. notes. London 1850)。——721。
- 弗洛雷斯, 何·塞·《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1844—1845年马德里第2版第1—4卷(Florez, J. S.: Espartero. Historia de su vida militar y politica y de los grandes sucesos contemporáneos. 2. ed. T. 1—4. Madrid 1844—1845)。——448。
- [富克斯, 格·冯·] 《俄罗斯帝国元帅意大利公爵, 苏沃洛夫-勒姆尼克伯爵轶事》1829年莱比锡版([Fuchs, G. von]: Anekdoten aus dem Leben des Fürsten Italinsky Grafen Suworoff-Rymniksky, Russisch Kaiserlichen Feldmarschalls, Leipzig 1829)。——344。

G

(各中立强国为保护战争时期各中立国的贸易和航运而建立武装中立体系的第一次联盟(1780—1783)和(第二次联盟 1800—1804年)的有关外交文件), 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5—1846年莱比锡版第1—2卷(*Actes diplomatiques relatifs à la première association entre les puissances neutres, pour l'établissement d'un système de neutralité armée en faveur du commerce et de navigation des neutres en temps de guerre. (1780 à 1783.) (Seconde association. 1800 à 1804)*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1—5. T.1.2. Leipzig 1845—1846)。——4、65、103、472、488。

格莱斯顿, 威·《国家及其同教会的关系》1838年伦敦版(Gladstone, W.: *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hurch.* London 1838)。——52。

格莱斯顿, [威·][《在曼彻斯特罗伯特·皮尔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的演说》], 载于1853年10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58号(Gladstone, [W.]: [*Rede bei der Einweihung des Denkmals für Sir Robert Peel in Manchester.*])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58, 13. Oktober 1853)。——98。

格莱斯顿, [威·][《1853年4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4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98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98, 9. April 1853)。——273。

格莱斯顿, [威·][《1853年4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4月1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06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8.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06, 19. April 1853)。——198、278。

格莱斯顿, [威·][《1854年3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3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82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6.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82, 7. März 1854)。——128—131、274、278。

格莱斯顿, [威·][《1854年3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3月2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95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

- mons, 2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95, 22. März 1854). — 273。
- 格莱斯顿, [威·] [(1854年4月11日在下院的财政报告)], 载于1854年4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13号(Gladstone, [W.]: [Finanzbericht im House of Commons, 11. April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13, 12. April 1854)。——274。
- 格莱斯顿, [威·] [(1854年5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5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36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Ma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36, 9. Mai 1854)。——275—278。
- 格兰维尔, [乔·] [(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Granville,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17。
- 格雷, [亨·] [(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Grey,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16。
- 格雷, [亨·] [(1854年4月7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10号(Grey,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7. April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10, 8. April 1854)。——299。
- 格雷厄姆, [詹·] [(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1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68号(Graham,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8, 18. Februar 1854)。——86、101、106、475。
- 格雷厄姆, [詹·] [(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0号(Graham,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99。
- 格雷厄姆, [詹·] [(1854年4月3日在下院提出的质询)], 载于1854年4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6号(Graham, [J.]: [Information im House of Commons, 3. April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6, 4. April 1854)。——226。
- 格雷厄姆, [詹·] [(1854年5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5月6日

- 《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34 号(Graham,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5. Ma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34, 6. Mai 1854)。——278。
- 格雷厄姆, [詹·] [《1854 年 6 月 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6 月 2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57 号(Graham,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Jun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57, 2. Juni 1854)。——323。
- 《公文集。文件汇编。当代历史画报》1836—1837 年伦敦版第 1—6 卷第 1—45 号(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Vol. 1—6. Nr. 1—45. London 1836—1837)。——50。
- 《公文集》1843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1 号(The Portfolio. (New ser.) Vol. 1. Nr. 1. London 1843)。——362。
- 《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1839 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Persia and Affghanistan. London 1839)。——61。
- 《关于丹麦王位继承权问题的条约。1852 年 5 月 8 日》。引自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 年伦敦版(Treaty relative to the succession of the crown of Denmark. Signed at London, May 8, 1852. Nach: D. Urquhart: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 London 1853)。——640。
- 《关于封锁喀琅施塔得、圣彼得堡和其他所有出海口的通告。1854 年 7 月 12 日》, 载于 1854 年 7 月 15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196 号(Notification relative au blocus des ports de Cronstadt, Saint Pétersbourg, et de tous autres ports, rades, havres ou critiques situés dans l' intérieur du golfe de Finlande. Paris, le 12 juillet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96, 15. Juli 1854)。——418。
- 《关于黎凡特事件的函件》(三卷集)[1841 年]伦敦版第 1 卷(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the Levant.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41. Pt. 1—3. Pt. 1. London[1841])。——12、62、104、106。
- 《关于联合舰队开往贝科兹的报告》, 载于 1854 年 2 月 6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2407 号(Return of the fleets to Beicos. Letter from the ambassadors. [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Jan. 19.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407, 6. Februar 1854)。——65。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III. 不列颠和爱尔兰工农业产品的出口》, 载于 1854 年 6 月 3 日《经济学家》(伦敦)第 562 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

- tion. III. Exports of British and Irish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562, 3. Juni 1854)。——326。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 1853 年 12 月 5 日为止的十一个月》，载于 1854 年 1 月 7 日《经济学家》(伦敦)第 541 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eleven months ended December 5, 1853.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541, 7. Januar 1854)。——29。
- 《关于强迫贫民迁返原住地的法案》，载于 1854 年 3 月 2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00 号(Settlement and removal bill.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0, 28. März 1854)。——180。
- 《关于圣阿尔诺元帅三次被免职。——马尼昂。——卡斯泰朗。1852 年 12 月 15 日》(*Les trois maréchaux, MM. Saint-Arnaud. — Magnan. — Castelanne*. Bruxelles, 15 décembre 1852)。——297, 328, 329, 623。
- 《关于实施丹麦君主国为议会事件而制定的法律的命令》，载于 1854 年 8 月 4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216 号(Ordonnance concernant la constitution de la monarchie danoise pour les affaires communes.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16, 4. August 1854)。——462—463。
- 《关于授权财政大臣借款 25 000 万法郎的法律草案》，载于 1854 年 3 月 7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66 号(Projet de loi portant autorisation pour le ministre des finances d'emprunter une somme de 250 millions de francs.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66, 7. März 1854)。——126。
- 《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第 1、2、5、6、8、9 卷(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54. Pt. 1. 2. 5 [u. d. T.]: Eastern papers. Communications respecting Turkey made to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by the Emperor of Russia, with the answers returned to them. January to April 1853. Pt. 6 [u. d. T.]: Eastern papers. Memorandum by Count Nesselrode. June 1844. Pt. 8 [u. d. T.]: Eastern papers. Protocol signed at Vienna on the 9th of April, 1854, by the representatives Austria, France, Great Britain, and Prussia. Pt. 9 [u. d. T.]: Eastern papers. Protocol signed at Vienna on the 23th of May, 1854,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ustria, France, Great Britain, and Prussia. Pt. 12 [u. d. T.]: Eastern papers. Convention between Austria and the Sublime Porte, signed at Boyadjik-Keuy, on the 14th

June, 1854. London [1854]). ——61、69—72、86—99、104、107、149—160、161—179、198、221—226、256、263—264、273、315、325。

第1卷:

- 第65号:《乔·汉·西摩尔致约·罗素。1853年1月7日》。——152。
- 第66号:《乔·汉·西摩尔致约·罗素。1853年1月8日》。——95、152。
- 第72号:《涅谢尔罗德伯爵致布伦诺夫男爵。1853年1月14日》。——94。
- 第77号:《约·罗素勋爵致考莱勋爵。1853年1月28日》。——171。
- 第87号:《乔·汉·西摩尔致罗素勋爵。1853年2月5日》。——222。
- 第92号:《乔·汉·西摩尔致约·罗素勋爵。1853年2月10日》。——222。
- 第94号:《克拉伦登伯爵致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1853年2月25日》。——161—162。
- 第111号:《克拉伦登伯爵致考莱勋爵。1853年3月22日》。——97、165—166。
- 第113号:《克拉伦登伯爵致乔·汉·西摩尔。1853年3月23日》。——97、172、176。
- 第118号:《克拉伦登伯爵致考莱勋爵。1853年3月29日》。——165。
- 第135号:《罗斯上校致克拉伦登伯爵。1853年3月31日》。——198。
- 第136号:《罗斯上校致克拉伦登伯爵。1853年4月1日》。——97。
- 第137号:《罗斯上校致克拉伦登伯爵。1853年4月2日》。——278。
- 第138号:《涅谢尔罗德伯爵致布伦诺夫男爵。1853年4月7日》。——97。
- 第168号:《缅施科夫公爵致利法特帕沙。1853年4月19日》。——177。
- 第176号:《克拉伦登伯爵致乔·汉·西摩尔。1853年5月16日》。——97。
- 第236号:《涅谢尔罗德伯爵致布伦诺夫男爵。1853年6月1日》。——97—98。
- 第236号:《涅谢尔罗德伯爵致路西德帕沙。1853年5月31日》。——312。

- 第 282 号：《克拉伦登伯爵致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1853 年 6 月 24 日》。——88。
- 第 311 号：《克拉伦登伯爵致威斯特摩兰伯爵。1853 年 7 月 4 日》。——98。
- 第 354 号：《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致克拉伦登伯爵。1853 年 7 月 4 日》。——90。
- 第 370 号：《克拉伦登伯爵致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1853 年 7 月 28 日》。——98。
- 第 2 卷：
- 第 71 号：《维也纳照会草案副本。[1853 年 7 月 31 日]》。——78、88、98、257、373、475。
- 第 226 号：《文告。1853 年 10 月 20 日》，[署名]：尼古拉。——66。
- 第 5 卷：
- 第 1 号：《乔·汉·西摩尔致约·罗素勋爵。1853 年 1 月 11 日》。——152、221。
- 第 2 号：《乔·汉·西摩尔致约·罗素勋爵。1853 年 1 月 22 日》。——154—156、162、164、170、222。
- 第 4 号：《约·罗素勋爵致乔·汉·西摩尔。1853 年 2 月 9 日》。——156、157、161—164、177。
- 第 5 号：《乔·汉·西摩尔致约·罗素勋爵。1853 年 2 月 21 日》。——165、224。
- 第 6 号：《乔·汉·西摩尔致约·罗素勋爵。1853 年 2 月 22 日》。——166—170、172、177、222。
- 第 7 号：《乔·汉·西摩尔致克拉伦登伯爵。1853 年 3 月 9 日》。——170—171。
- 第 7 号：《备忘录。1853 年 2 月 21 日》。——167、170、171、177。
- 第 8 号：《乔·汉·西摩尔致涅谢尔罗德伯爵。1853 年 3 月 8 日》。——170。
- 第 9 号：《乔·汉·西摩尔致克拉伦登伯爵。1853 年 3 月 10 日》。——170、171。
- 第 10 号：《克拉伦登伯爵致乔·汉·西摩尔。1853 年 3 月 23 日》。——172、175、222、224。

- 第13号:《克拉伦登伯爵致乔·汉·西摩尔。1853年4月5日》。——176。
- 第15号:《备忘录。1853年4月15日》。——176。
- 第6卷:《涅谢尔罗德伯爵的备忘录。1844年6月》。——149—153、155、177、216—219。
- 第8卷:《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普鲁士的代表1854年4月9日签署的维也纳议定书》。——232、233、256、257、391、398、405、424、592、593。
- 第9卷:《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普鲁士的代表1854年5月23日签署的维也纳议定书》。——311—312、320。
- [《关于1854年度军事管理特殊开支的第一号法律草案》], 载于1854年4月23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第95号([Erster Gesetz-Entwurf betreffend den außerordentlichen Geldbedarf der Militär-Verwaltung für das Jahr 1854.] In: 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Nr. 95, 23. April 1854)。——255—257。
- 《国民公会1793年6月24日向法兰西人民公布的宪法》, 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 P.-A. 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 加代编, 1823年巴黎—鲁昂版第1卷(Acte constitutionnel présent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24 juin 1793. In: 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 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 par P.-A. Dufau, J.-B. Duvergier et J. Guadet. T. 1—6. T. 1. Paris, Rouen 1823)。——544。

H

- 哈德威克, [查·] [《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Hardwicke, [C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16。
- 哈德威克, [查·] [《1854年7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Hardwicke, [C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1。
- 哈克斯特豪森, 奥·冯·《军事强国俄国及其历史、统计、人种和政治关系》1852年柏林版(Haxthausen, A. von: Die Kriegsmacht Rußlands in ihrer historischen, statistischen, ethnographischen und politischen Beziehung. Bes. Abdr. aus dem 3.

- Bd. der Studien über Rußland. Berlin 1852)。——206—207、210、305、651—654、664、690—691。
- 哈麦尔, 约·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根据以前未曾利用的手稿和档案编写》(十卷集)1827—1832年佩斯版第1、6、8卷(Hammer, J. vo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grossentheils aus bisher unbenützten Handschriften und Archiven*. Bd. 1—10. Bd. 1. 6. 8. Pest 1827—1832)。——108、113、324。
- 哈里斯, 詹·《詹姆斯·哈里斯的日记和通信》1844年伦敦版第1—4卷(Harris, J.: *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his missions to the courts of Madrid, Frederick the Great, Catherine the Second, and the Hague; and his special missions to Berlin, Brunswick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Ed. by his grandson. Vol. 1—4. London 1844)。——722。
- 《海军中立公约。1801年2月6日》, 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Convention pour une neutralité maritime armée, conclue à Saint-Petersbourg, le 6/18 décembre 1800; suivie d'un article supplémentaire compris dans la ratification même de l'empereur de Russie, donnée au château de Saint-Michel, le 6 février 1801*.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2. Leipzig 1846)。——4。
- 《海上非常后备军条例》, 载于1854年4月2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17号(*Règlement concernant l'armement maritime*.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17, 27. April 1854)。——258—259。
-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8年伦敦版第97卷(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Form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1803"*. 3. ser. Vol. 97. London 1848)。——62。
- 《号召1852年度征兵总额中的另一半年轻人应征入伍的法令》, 载于1854年1月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号(*Décret qui appelle à l'activité les jeunes soldats encore disponibles sur la seconde portion du contingent de la classe de 1852*.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 7. Januar 1854)。——21。
- 《和平条约。1791年8月4日》, 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Traité de paix, signé à Sistow, le 4 août 1791, sous la médiation de la Grande-Bretagne, de*

- la Prusse et des Provinces-Unis des Pays-Bas (Hollande).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 . T. 1 — 5. T. 2. Leipzig 1846). — 74, 108.
- 赫伯特, [悉·] [《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0号 (Herbert, [S.]: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 — 93.
- 赫伯特, [悉·] [《1854年7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3号 (Herbert, [S.]: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3, 26. Juli 1854). — 432 — 435.
- [赫勒尔, 伊·] [《关于在东方问题上采取的外交步骤的历史说明》], 载于1854年4月16—23、26、29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106—113、116、119号。引自1854年5月2日《新闻报》(巴黎) ([Heller, I.]: Zur historischen Aufhellung der diplomatischen Schachzüge in der orientalischen Frage. [Art.] 1—10.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1854. Nr. 106—113, 16.—23. April; Nr. 116, 26. April. Beil.; Nr. 119, 29. April. Nach; La Presse. Paris. 2. Mai 1854. [U. d. T.]: Auguste Neffzer: Aucun incident nouveau. . .)。 — 263.
- 赫斯, [亨·] 冯·《赫斯将军的宣言。1854年8月30日》, 载于1854年9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44号 (Hess, [H.] von: Proclamation du général Hess. 18 (30) août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44, 12. September 1854)。 — 610.
- 亨宁森, 查·弗·《揭露俄罗斯的秘密》1844年伦敦版第1—2卷 (Hennigsen, Ch. F.: Revelations of Russia. Vol. 1. 2. London 1844)。 — 205.
- 《轰炸敖德萨。官方电报。1854年5月11日于海军部》, 载于1854年5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40号 (Bombardment of Odessa. The official despatches. Admiralty, May 11,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40, 13. Mai 1854. 2. ed.)。 — 280.
- 怀尔德, 詹·《波罗的海上的喀琅施塔得及其要塞, 火炮的发射及射程》1854年伦敦版 (Wyld, J.: Cronstadt in the Baltic with the fortifications, batteries & range of the guns. London 1854)。 — 189—197.
- 怀尔德, 詹·《敖德萨的市镇和港口》1854年伦敦版 (Wyld, J.: Town & harbour

- of Odessa. London 1854)。——282。
- 霍布斯, [托·]《托马斯·霍布斯(马姆兹伯里的)英文著作集》, 威·莫尔斯沃思编, 1839—1844年伦敦版第1—16卷([Hobbes, Th.]: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now first coll. and ed. by W. Molesworth. Vol. 1—16. London 1839—1844)。——52。
- 霍布斯, [托·]《哲学全集》(五卷集)1839—1845年伦敦版([Hobbes, Th.]: Opera philosophica quae latine scripsit omnia, in unum corpus nunc primum collecta studio et labore G. Molesworth. . . T. 1—5. Londini 1839—1845)。——303。
- 霍斯福尔, [托·] [《1854年2月21日在下院提出的质询》]。引自1854年2月23日《晨邮报》(伦敦)第25016号(Horsfall, [Th.]: [Anfrage im House of Commons, 21. Februar 1854.] Nach: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5016, 23. Februar 1854. [U. d. T.]: We are not at all surprised. . .)。——102。
- 霍斯曼, [爱·] [《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0号(Horsman,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92。
- 霍韦利亚诺斯, 加·《马德里经济协会致卡斯蒂利亚最高王政会议的关于土地法的备忘录》, 载于《霍韦利亚诺斯全集》(八卷集)1840年巴塞罗那版第7卷(Jovellanos, G.: Informe de la Sociedad económica de Madrid al 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Castilla en el expediente de ley agraria, extendido por el autor á nombre de la Junta encargada de su formacion. In: Obras. Nueva ed. T. 1—8. T. 7. Barcelona 1840)。——517。

J

- [杰尔查文, 加·罗·] [《占领华沙颂》]。引自亨·冯·布兰特《俄国近年来的政策和军队》1852年柏林版([Dershawin, G. R.]: [Auf die Einnahme Warschaus.] Nach: [H. von Brandt]: Rußland's Politik und He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Berlin 1852)。——379。
- 《警察局长官令。1854年4月15日》, 载于1854年4月2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17号(Ordre du jour du grand maître de police du 3/15 avril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17, 27. April 1854)。——257—258。

K

- 《喀琅施塔得。俄国一瞥》1853年伦敦版(Kronstat. From the Russian survey. London 1853)。——189—197。
- 卡德威尔,[爱·][《1854年5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5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33号(Cardwell,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4. Ma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33, 5. Mai 1854)。——279。
- 卡尔尼塞罗,何·克·《合理地恢复宗教裁判所和驳廖伦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事记)一书》1816年马德里版第1—2卷(Carnicero, J. C.: La inquisicion justamente restablecida e impugnacion de la obra "Anales de la inquisicion en España" por Llorente. T. 1. 2. Madrid 1816)。——516。
- [卡尔尼塞罗,何·克·]《拿破仑——欧洲真正的唐·吉珂德,对拿破仑和他的哥哥约瑟夫的各种敕令的批判的、爱国的、讽刺的评论》1813年马德里版第1—6卷([Carnicero, J. C.]: Napoleon ó el verdadero D. Quixote de la Europa, ó sean comentarios critico-patriótico-burlescos á varios decretos de Napoleon y su hermano José, distribuidos en dos partes y cincuenta capitulos, y escritos por un español amante de su patria y rey desde primeros de febrero de 1809 hasta fines del mismo año. T. 1—6. Madrid 1813)。——516。
- 卡尔尼塞罗,何·克·《评光荣的西班牙革命的主要事件的历史》(四卷集)1814—1815年马德里版(Carnicero, J. C.: Historia razonada de los principales sucesos de la gloriosa revolucion de España. T. 1—4. Madrid 1814—1815)。——516。
- 卡拉姆津,[尼·米·]《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十一卷集)1826年巴黎版第11卷。引自戴·乌尔卡尔特《苏丹和埃及帕沙》1839年巴黎版(Karamsin, [N. M.]: Histoire de l' Empire de Russie. T. 1—11. T. 11. Paris 1826. Nach: D. Urquhart: Le Sultan et le Pacha d' Egypte. Paris 1839)。——103。
- [卡利埃尔]《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它的军队建设和军事制度》1854年莱比锡版([Carrière]: Oesterreich's Militair-Macht. Sein Heerwesen und dessen militairische Verfassung. Statistische Details. Leipzig 1854)。——705。
- 卡思卡特,乔·《评1812年和1813年的俄普战争》1850年伦敦版(Cathcart, G.: 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 London 1850)。——665。

- 康罗贝尔, [弗·塞·]《法国报纸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1854年10月17—22日》, 载于1854年11月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44号(Canrobert, [F.-C.]; French journal of the siege. Sebastopol, Oct. 17—Oct. 22,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44, 9. November 1854)。——667。
- 康罗贝尔, [弗·塞·]《给陆军大臣的信。1854年10月13日》, 载于1854年10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85号(Canrobert, [F.-C.]; [Brief an den Kriegsminister, 13. Oktobe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85, 30. Oktober 1854)。——659, 677。
- 《康罗贝尔将军的电报》, 载于1854年11月1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47号(General Canrobert's despatch.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47, 13. November 1854)。——678—679。
- 《康罗贝尔将军的电报》, 载于1854年11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06号(General Canrobert's despatch.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06, 23. November 1854. 2. ed.)。——689。
- 科布顿, [理·]《[1853年8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9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9, 17. August 1853)。——49, 91。
- 科布顿, [理·]《[1854年1月23日在曼彻斯特改革派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47号(Cobden, [R.]; [Rede auf dem Reformmeeting in Manchester, 23. Jan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47, 25. Januar 1854)。——49。
- 科布顿, [理·]《[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0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88。
- 科布顿, [理·]《[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5—426。
- [科布顿, 理·]《俄国。曼彻斯特一厂主著》1836年爱丁堡版([Cobden, R.]; Russia. By a Manchester manufacturer. Edinburgh 1836)。——50。

- 《科林·坎伯尔和苏格兰高地联军》，载于1854年11月1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47号（Sir Colin Campbell and the Highlander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47, 13. November 1854）。——677, 680。
- 科苏特，拉·〔（1854年6月5日在设菲尔德的演说）〕，载于1854年6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61号（Kossuth, L.: [Rede in Sheffield, 5. Jun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61, 7. Juni 1854）。——324。
- 克拉伦登，〔乔·〕〔（1853年4月25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4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12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5. April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12, 26. April 1853）。——98。
- 克拉伦登，〔乔·〕〔（1853年8月12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8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6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2.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6, 13. August 1853）。——176。
- 克拉伦登，〔乔·〕〔（1854年2月6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2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58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6.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58, 7. Februar 1854）。——63—64, 367。
- 克拉伦登，〔乔·〕〔（1854年2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2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4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4, 25. Februar 1854）。——115。
- 克拉伦登，〔乔·〕〔（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16。
- 克拉伦登，〔乔·〕〔（1854年4月6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4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9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6. April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9, 7. April 1854）。——227。
- 克拉伦登，〔乔·〕〔（1854年6月19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6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2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9. Jun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2, 20. Juni 1854）。——355—356。
- 克拉伦登，〔乔·〕〔（1854年7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2。

- 克拉伦登, [乔·][《1854年8月10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8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17号(Clarendo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0. August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17, 11. August 1854)。——468、476—477。
- 克兰里卡德, [乌·约·][《1853年8月8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02号(Clanricarde, [U. J.]: [Rede im House of Lords, 8.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02, 9. August 1853)。——11。
- 克兰里卡德, [乌·约·][《1854年2月3日在上院的预告》], 载于1854年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56号(Clanricarde, [U. J.]: [Ankündigung im House of Lords, 3.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56, 4. Februar 1854)。——62—63。
- 克兰里卡德, [乌·约·][《1854年2月6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58号(Clanricarde, [U. J.]: [Rede im House of Lords, 6.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58, 7. Februar 1854)。——63。
- 克兰里卡德, [乌·约·][《1854年6月26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6月2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8号(Clanricarde, [U. J.]: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6. Jun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8, 27. Juni 1854)。——365—367。
- 克兰里卡德, [乌·约·][《1854年7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Clanricarde, [U. J.]: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2。
- 《克里木远征》, 载于1854年9月23日《伦敦新闻画报》第703号(The Crimea expedition.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r. 703, 23. September 1854)。——623。
- 克鲁森施特恩, [尼·伊·][《告示。1854年8月30日》], 载于1854年9月1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597号(Krusenstern, [N. I.]: [Proklamation. Odessa, 18. (30.) August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597, 15. September 1854)。——608。
- 奎因, 迈·约·《西班牙访问记》1823年伦敦—爱丁堡版(Quin, M. J.: A visit to

Spain, detailing the transactions which occurred during a residence in that country, in the latter part of 1822, and the first four months of 1823, with an account of the removal of the Court of Madrid to Seville, and general notices of the manners, customs, costume, and music of the country. London, Edinburgh 1823)。——582。

L

- 拉格伦, [菲·詹·] (1854年9月23日的[电报]), 载于1854年10月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17号(Raglan, [F. J.]: [Depesche.] September 23,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17, 9. Oktober 1854)。——644—647。
- 拉格伦, [菲·詹·] (1854年10月23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 载于1854年11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92号(Raglan, [F. J.]: [Depesche.] Before Sebastopol, Oct. 23,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92, 7. November 1854)。——668。
- 拉格伦, [菲·詹·] (1854年10月28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第85号)), 载于1854年11月1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47号(Raglan, [F. J.]: [Depesche.] (No. 85.) Before Sebastopol, Oct. 28,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47, 13. November 1854)。——673—680。
- 拉格伦, [菲·詹·] (1854年11月3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第95号)), 载于1854年11月1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02号(Raglan, [F. J.]: [Depesche.] (No. 95.) Before Sebastopol, Nov. 3,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02, 18. November 1854)。——684。
- 拉格伦, [菲·詹·] (1854年11月8日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电报](第96号)), 载于1854年11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06号(Raglan, [F. J.]: [Depesche.] (No. 96.) Before Sebastopol, Nov. 8,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06, 23. November 1854)。——684, 689。
- 拉格伦, [菲·詹·] (拉格伦将军给纽卡斯尔公爵的电报副本), 载于1854年10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61号(Raglan, [F. J.]: Copy of a telegraphic despatch from General Lord Raglan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transmitted through Belgrade (not dated, but evidently written from the Crimea on the 21st of September).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61, 2. Oktober 1854)。——627。
- 拉格伦, [菲·詹·] (拉格伦勋爵的紧急报告。1854年10月18日于塞瓦斯托

- 波尔), 载于 1854 年 11 月 13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2647 号(Raglan, [F. J.]: The missing despatch of Lord Raglan. Before Sebastopol, Oct. 18,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47, 13. November 1854)。——681。
- 拉格伦, [菲·詹·]《拉格伦勋爵的紧急报告。1854 年 11 月 6 日》, 载于 1854 年 11 月 16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2650 号(Raglan, [F. J.]: Translation of a telegraphic despatch received by the Duke of Newcastle, on 16th November, 12. 30 a. m., from Lord Raglan. November 6,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50, 16. November 1854)。——672。
- 拉格伦, [菲·詹·]《将军令。1854 年 10 月 11 日于塞瓦斯托波尔前沿阵地》, 载于 1854 年 10 月 2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84 号(Raglan, [F. J.]: General order. Camp before Sebastopol, Oct. 11,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84, 28. Oktober 1854)。——660。
- 拉腊, 胡·《报告。1854 年 6 月 30 日》, 载于 1854 年 7 月 7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87 号(Lara, J.: [Bulletin.] Madrid, June 30.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87, 7. Juli 1854)。——386。
- 拉腊, 胡·《公报。1854 年 6 月 28 日》, 载于 1854 年 7 月 4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185 号(Lara, J.: Bando. Madrid, 28 Juin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85, 4. Juli 1854)。——417。
- 拉斯卡斯, [艾·奥·]《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拿破仑十八月言行日录》(八卷集) 1840 年巴黎版第 6 卷(Las Cases, [E.-A.]: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ou Journal où se trouve consigné, jour par jour, ce qu'a dit et fait Napoléon durant dix-huit mois. T. 1 — 8. T. 6. Paris 1823)。——174。
- 莱亚德, [奥·亨·]《[1854 年 2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2 月 18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668 号(Layard, [A.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8, 18. Februar 1854)。——85, 86。
- 莱亚德, [奥·亨·]《[1854 年 3 月 3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4 月 1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04 号(Layard, [A.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20 — 225。
- 莱亚德, [奥·亨·]《[1854 年 6 月 23 日在下院就一个提案所作的说明]》, 载于 1854 年 6 月 24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76 号(Layard, [A. H.]:

- [Ankündigung eines Antrages im House of Commons, 23. Jun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6, 24 Juni 1854)。——360。
- 莱亚德, [奥·亨·] [《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Layard, [A. 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6。
- 莱亚德, [奥·亨·] [《尼尼微城遗址: 附库尔德斯坦和亚兹德的基督教迦勒底人的访问记; 对古代亚述人的风土人情的研究》1849年伦敦版第1—2卷(Layard, [A. H.]: *Nineveh and its remains: with an account of a visit to the Chaldean christians of Kurdistan, and the Yezidis, or Devil-worshippers; and an enquiry into the manners and arts of the ancient Assyrians. Vol. 1. 2. London 1849*)。——52。
- 兰斯唐, [亨·] [《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Lansdowne,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16。
- [理查兹, 阿·贝·] [《粮食和饥荒》], 载于1854年1月28日《人民报》(伦敦)第91期([Richards, A. B.]: *Food and famine.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91, 28. Januar 1854*)。——54, 55。
- 《立法议会颁布的宪法。1791年9月3日》, 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 P.-A. 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 J. 加代编, 1823年巴黎—鲁昂版第1卷(*Constitution décrétée par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 3 septembre 1791. In: 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 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 . . par P.-A. Dufau, J.-B. Duvergier et J. Guadet. T. 1 —6. T. 1. Paris, Rouen 1823*)。——544, 564。
- 《利普兰迪将军的战况报告》, 载于1854年11月1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47号(*General Liprandi's account of the fighting.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47, 13. November 1854*)。——674—679。
- 利文, [赫·/安·马土舍维奇] [《利文公爵和马土舍维奇伯爵给涅谢尔罗德伯爵的急电副本。1829年6月13日》], 载于1843年《公文集》(伦敦)第1卷第1号(Lieven, [Ch./A. Matuschewitsch]: *Copy of a despatch from Prince Lieven, and Count Matuszevich, addressed to Count Nesselrode, dated London, 1st (13th) June, 1829. In: The Portfolio. (New ser.) Vol. 1. Nr 1. London 1843*)。——

361—362。

利物浦, [罗·] [《1823年2月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23年《爱丁堡评论》第38卷(Liverpool, [R.]: [Rede im House of Lords, 4. Februar 1823.])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Vol. 38. 1823)。——583。

《两国大使给路西德帕沙关于调用联军舰队的请求的答复》, 载于1853年12月3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376号(Reply of the two ambassadors to Reschid Pacha's application for the fleet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376, 31. Dezember 1853)。——27。

林德赫斯特, [约·] [《1854年6月19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6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72号(Lyndhurst, [J.]: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9. Jun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2, 20. Juni 1854)。——360。

卢基扬诺维奇, [尼·安·] [《1828—1829年土耳其战争记述》1844—1847圣彼得堡版第1—4卷(Лукьяновичъ, [Н. А.]: Описание Турецкой войны 1828 и 1829 годовъ. Ч. 1—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1844—1847)。——205。

《路西德帕沙请求英法联军的帮助》, 载于1853年12月26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371号(Reschid Pacha's application for British and French aid.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371, 26. Dezember 1853)。——27。

路西德帕沙《外交大臣路西德帕沙给梅塔克萨斯先生的照会的复照。1854年4月1日》, 载于1854年4月18日《比利时独立报》(布鲁塞尔)第108号(Reschid[Pasha]: [Réponse de Reschid-Pacha,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la Note de M. Metaxa. 3 redjeb 1270 (1 avril 1854). In: L'Indépendance Belge. Bruxelles. Nr. 108, 18. April 1854)。——241。

罗巴克, [约·阿·] [《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1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68号(Roebuck, [J. A.]: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8, 18. Februar 1854)。——87。

[罗斯, 唐·] [《斯特拉斯卡伦的屠杀》, 载于1854年4月20日《北方旗帜报》(威克)第203号。引自1854年5月13日《人民报》(伦敦)第106期([Ross, D.]: The slaughter in Strathcarron. In: The Northern Ensign. Wick. Nr. 203, 20. April 1854. Nach: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06, 13. Mai 1854. [U. d. T.]: Ernest Jones: Barbarians in Briton)。——285—289。

[罗斯, 唐·] [《苏格兰人当前的苦难》, 载于1854年4月20日《北方旗帜报》(威

- 克)第 203 号([Ross, D.]: Real Scottish grievances. In: The Northern Ensign. Wick. Nr. 203, 20. April 1854)。——287—289。
- 罗素,[约·][《1854年2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2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58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6.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58, 7. Februar 1854)。——64。
- 罗素,[约·][《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2月1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68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8, 18. Februar 1854)。——87、104、106、164。
- 罗素,[约·][《1854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2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3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3.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3, 24. Februar 1854)。——106。
- 罗素,[约·][《1854年3月3日在下院的声明》],载于1854年3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80号(Russell, [J.]: [Erklärung im House of Commons, 3.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80, 4. März 1854)。——127。
- 罗素,[约·][《1854年3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3月1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88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3.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88, 14. März 1854)。——156。
- 罗素,[约·][《1854年3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20。
- 罗素,[约·][《1854年5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5月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34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5. Ma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34, 6. Mai 1854)。——279。
- 罗素,[约·][《1854年5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5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54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9. Ma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54, 30. Mai 1854)。——311—314。
- 罗素,[约·][《1854年6月8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6月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63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8. Jun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63, 9. Juni 1854)。——325。
- 罗素,[约·][《1854年6月26日在下院的声明》],载于1854年6月27日《泰

- 晤士报)(伦敦)第 21778 号(Russell, [J.]: [Erklärung im House of Commons, 26. Jun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78, 27. Juni 1854)。——359。
- 罗素,[约·][《1854 年 7 月 20 日在下院对迪斯累里的质询作出的答复》],载于 1854 年 7 月 21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99 号(Russell, [J.]: [Erwiderung auf die Anfrage Disraelis im House of Commons, 20.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99, 21. Juli 1854)。——420。
- 罗素,[约·][《1854 年 7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02 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3—425、431、432。
- 罗素,[约·][《1854 年 7 月 24 日在下院对某人的质询作出的答复》],载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02 号(Russell, [J.]: [Erwiderung auf eine Anfrag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6。
- 罗素,[约·][《1854 年 7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4 年 7 月 26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03 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3, 26. Juli 1854)。——437、438。
- 罗素,[约·][《1854 年 12 月 12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54 年 12 月 13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923 号(Russell,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2. Dezember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23, 13. Dezember 1854)。——701。

M

- 马蒂尼亚克,[让·巴·西·加·]德·《1823 年西班牙革命和干涉的历史概述》1832 年巴黎版。引自曼·马尔利安尼《西班牙及其革命》1833 年巴黎版(Martignac, [J.-B.-S.G.]de: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et sur l'intervention de 1823. Paris 1832. Nach: M. Marliani: L'Espagne et ses révolutions. Paris 1833)。——561。
- 马尔利安尼,曼·《西班牙及其革命》1833 年巴黎版(Marliani, M.: L'Espagne et ses révolutions. Paris 1833)。——561。
- 马尔利安尼,曼·《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9 年巴塞罗那版(Marliani, M.: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 España moderna. Barcelona 1849)。——448、478、508、550、

561、566、567、584。

马尔蒙, [奥·弗·路·德·]《论军事机关的宗旨》1845年巴黎版(Marmont, [A.-F.-L. de]; De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militaires. Paris 1845)。——112。

马尔滕斯, 卡·冯·/斐·冯·库西《当今世界各主权国家据以确立相互关系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5—1849年莱比锡版(Martens, K. von/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sur lesquels sont établis les relations et les rapports aujourd'hui entre les divers états souverains du globe, depuis l'année 1760 jusqu'à l'époque actuelle. T. 1—5. Leipzig 1845—1849)。——4、10—13、16、26、56、65、74、90、95、103、108—109、110、115、175、184、231、243、244、278—279、324、339、359—366、379、398、421、472、488、560、595。

马吉埃罗, 乔·《给英国领事来函的复函》。引自让·埃利亚德-勒杜莱斯库《关于罗马尼亚恢复的历史, 或 1848年瓦拉几亚事件的回忆》1851年巴黎版(Maghiero, G.: Réponse à la lettre du consul anglais. Nach: J. Héliade-Radulesco: Mémoire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génération roumaine ou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1848 accomplis en Valachie. Paris 1851)。——378。

马吉埃罗, 乔·《给傅阿德埃芬蒂的信》。引自让·埃利亚德-勒杜莱斯库《关于罗马尼亚恢复的历史, 或 1848年瓦拉几亚事件的回忆》1851年巴黎版(Maghiero, G.: La lettre à Fuad-Effendi. Nach: J. Héliade-Radulesco: Mémoire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génération roumaine ou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1848 accomplis en Valachie. Paris 1851)。——378。

马吉埃罗, 乔·《马吉埃罗向欧洲列强的代表提出的抗议书》。引自让·埃利亚德-勒杜莱斯库《关于罗马尼亚恢复的历史, 或 1848年瓦拉几亚事件的回忆》1851年巴黎版(Maghiero, G.: Protestation de Maghiero adressée aux représentants des puissances de l'Europe. Nach: J. Héliade-Radulesco: Mémoire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génération roumaine ou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1848 accomplis en Valachie. Paris 1851)。——378。

马姆兹伯里, [詹·霍·] [(1852年12月6日在上院的演说)]。引自莱·弗·辛普森《东方问题: 莱宁根伯爵和缅施科夫公爵使团访问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1854年伦敦版(Malmesbury, [J.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6. Dezember 1852.] Nach: L. F. Simp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a connected narrative of events from the missions of Count Leiningen and Prince Men-

- schkoff to Constantinople,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854)。——73—74。
- 马姆兹伯里, [詹·霍·] [(1854年3月3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Malmesbury, [J.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16—218。
- 《马萨尔雷多将军……7月19日巴约讷[电]》, 载于1854年7月20日《总汇报》(巴黎)第201号(Le général Mazarredo. . . [Depesche aus:] Bayonne, 19 juillet.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01, 20. Juli 1854)。——415。
- 麦金农, 威·亚·《文明史》1846年伦敦版第1—2卷(Mackinnon, W. A.: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Vol. 1. 2. London 1846)。——52。
- 《曼彻斯特的改革派大会》, 载于1854年1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47号(The Reform banquet at Manchester.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47, 25. Januar 1854. 2. ed)。——49。
- 《“曼彻斯特学派”和罢工》, 载于1854年1月21日《新闻报》(伦敦)第38号(“The Manchester School” and the strikes. In: The Press. London. Nr. 38, 21. Januar 1854)。——46。
- 曼纳斯, [约·詹·罗·] [(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0号(Manners, [J. J.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89, 90。
- 曼托伊费尔, [奥·]冯·[(《在第一议院信贷委员会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23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第95号(Manteuffel, [O.] von: [Rede vor der Kreditkommission der Ersten Kammer.]) In: 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Nr. 95, 23. April 1854)。——255—257。
- [曼托伊费尔, 奥·冯·] [(《给普鲁士驻彼得堡公使亨·威·冯·韦尔特男爵的急电。1854年1月31日》)。引自1854年4月6日《科隆日报》第96号([Manteuffel, O. von]: [Depesche an den preußischen Gesandten in Petersburg, Baron H. W. von Werther, vom 31. Januar 1854.]) Nach: Kölnische Zeitung. Nr. 96, 6. April 1854. [U. d. T.]: Bericht der Credit-Commission)。——232。
- [曼托伊费尔, 奥·冯·] [(《给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韦伯洛夫伯爵的急电。1854年3月5日和16日》)。引自1854年4月6日《科隆日报》第96号([Manteuffel, O. von]: [Depeschen an den preußischen Botschafter

- in Wien, Graf von Arnim-Heinrichsdorf-Werbelow, vom 5. und 16. März 1854.]
Nach: Kölnische Zeitung. Nr. 96, 6. April. 1854. [U. d. T.]; Bericht der Credit-
Commission). —232。
- 曼托伊费尔, [奥·]冯· [(1854年4月27日在党团的告别宴会上的演说)], 载
于1854年5月1日《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第102号(Manteuffel,
[O.] von: [Rede beim Abschiedsdinner seiner Fraktion, 27. April 1854.] In: 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heiischen Correspondenten. Nr.
102, 1. Mai 1854)。——266—267。
- 曼托伊费尔, [奥·]冯· [(1854年4月29日在两院最后一次会议上的演说)],
载于1854年5月1日《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第102号(Manteuffel,
[O.] von: [Rede in der Schlußsitzung der Kammern, 29. April 1854.] In: 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heiischen Correspondenten. Nr.
102, 1. Mai 1854)。——266。
- 芒茨, [乔·弗·] [(1854年2月27日在下院提出的质询)], 载于1854年2月
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6号(Muntz, [G. F.]; [Anfrage im House of
Commons, 27.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6, 28. Februar
1854)。——304。
- 芒什·德卢瓦纳《法国领事馆领事给外交大臣的报告》, 载于1854年10月2日
《每日新闻》(伦敦)第2611号(Manche de Loisine: Despatch of the Chancellor of
the French consulate to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11, 2. Oktober 1854)。——632。
- 毛奇, [卡·] [(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
版(Moltke, [K.];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 1845)。——236—237、250、251、291、295—296、338、340、
345、348—349。
- 蒙塞尔, [威·] [(1854年2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8日
《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6号(Monsell,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7.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6, 28. Februar 1854)。——
303。
- 蒙塔朗贝尔, 马·勒·德·《垂直筑城即研究直线、三角、四角及各种多角形筑
城方法的经验》1776—1796年巴黎版第1—11卷。引自阿·冯·察斯特罗
《永久性筑城的历史或筑城艺术的最优秀体系和风格手册》1839年莱比锡版

- (Montalembert, M. R. de: La fortification perpendiculaire, ou Essai sur plusieurs manières de fortifier la ligne droite, le triangle, le carré et tous les polygones... T. 1—11. Paris 1776 bis 1796. Nach: A. von Zastrow: Geschichte der beständigen Befestigung oder Handbuch der vorzüglichsten Systeme und Manieren der Befestigungskunst. Leipzig 1839)。——191—192, 456, 491。
- 米尔恩斯, [理·]《希腊某地旅途观感》1834年伦敦版(Milnes, [R.]: Memorials of a tour in some parts of Greece. London 1834)。——52。
- 米尔恩斯, [理·]〔《1854年5月29日在下院提出的质询》〕, 载于1854年5月3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54号(Milnes, [R.]: [Anfrage im House of Commons, 29. Ma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54, 30. Mai 1854)。——313。
- 米海洛夫斯基, [亚·]伊·《1812年国内战争的历史》(四卷集), 卡·哥尔德哈默译自俄文, 1840年里加—莱比锡版(Michailowsky, [A. I.]: Geschichte des vaterländischen Krieges im Jahre 1812. Aus dem Russ. übers. von C. R. Goldhammer. Th. 1—4. Riga, Leipzig 1840)。——205。
- 米斯兰, [雅·]《圣地。到耶路撒冷朝圣。途经奥地利、匈牙利、斯拉沃尼亚、多瑙河两公国、君士坦丁堡、阿希佩拉哥群岛、黎巴嫩、叙利亚、亚历山大里亚、马耳他、西西里和马赛》(两卷集)1852年布鲁塞尔版(Mislin, [J.]: Les Saints Lieux. Pèlerinage à Jérusalem, en passant par l' Autriche, la Hongrie, la Slavonie, les provinces danubiennes, Constantinople, l' Archipel, le Liban, la Syrie, Alexandrie, Malte, la Sicile et Marseille. T. 1. 2. T. 2. Bruxelles 1852)。——187。
- 〔《秘密条约。1805年12月15日》〕。引自弗·穆尔哈德《关于欧洲列强和诸邦相互关系的外交协定和其他重要公文集补编。1761年至今》(三卷集), 附以前的协定, 1839—1842年格丁根版第3卷〔[Traité secret, signé à Schoenbrunn, le 15 decembre 1805.] Nach: F. Murhard: Nouveaux supplémens au recueil de traités et d' autres actes remarquables... T. 1—3. T. 3. Goettingue 1839—1842)。——5。
- 缅施科夫, [亚·]〔《给沙皇的报告。1854年11月6日》〕, 载于1854年11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906号(转载自《俄国残废者》)(Menschikoff, [A.]: [Report an den Zaren vom 6. November 1854.] (From the Invalide Russ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906, 23. November 1854)。——689。
- 缪尔, 威·《古希腊语言文学史批判》1850年伦敦版第1—2卷(Mure, W.: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Vol. 1. 2. London 1850)。——53。

穆尔哈德, 弗·《关于欧洲列强和诸邦相互关系的外交协定和其他重要公文集补编。1761 年至今》(三卷集), 附以前的协定, 1839—1842 年格丁根版 (Murhard, F.: *Nouveaux supplémens au recueil de traités et d' autres actes remarquables, servant à la connaissance des relations étrangères des puissances et états dans leur rapport mutuel, depuis 1761 jusqu' à présent, fondé par G. F. de Martens. Suivi d' un appendice contenant des traités antérieurs. T. 1—3. Goettingue 1839—1842*)。——5。

N

拿破仑第三〔(1854 年 1 月 29 日给尼古拉一世的信)〕, 载于 1854 年 2 月 14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45 号 (Napoléon III: [Brief an Nikolai I, 29. Januar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45, 14. Februar 1854*])。——77。

拿破仑第三〔(1854 年 9 月 2 日在布洛涅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9 月 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35 号 (Napoléon III: [Rede in Boulogne, 2. Septembe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35, 5. September 1854*)。——660。

拿破仑第三〔(1854 年 9 月 30 日在布洛涅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10 月 2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275 号 (Napoléon III: [Rede in Boulogne, 30. September 1854.]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75, 2. Oktober 1854*)。——630。

纳皮尔, 查·〔(第 354 号急电)。博马尔松德的陷落。[1854 年]8 月 16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23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27 号 (Napier, Ch.: [Depesche Nr. 354.] *Off Bomarsund, Aug. 16,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27, 23. August 1854*)。——495。

纳皮尔, 查·〔(第 355 号急电)。博马尔松德的陷落。[1854 年]8 月 16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23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27 号 (Napier, Ch.: [Depesche Nr. 355.] *Off Bomarsund, Aug. 16,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27, 23. August 1854*)。——497。

纳皮尔, 查·〔(备忘录)。博马尔松德的陷落。[1854 年 8 月 12 日]〕, 载于 1854 年 8 月 24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28 号 (Napier, Ch.: [Memorandum.] *Off Bomarsund, Aug. 12,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28, 24. August 1854*)。——498。

- 纳皮尔, [威·]《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 1807—1814 年战争史》1828—1840 年伦敦版第 1—6 卷(Napier, [W.]: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1—6. London 1828—1840)。——206, 303。
- 奈特, [弗·]〔《1854 年 7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7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02 号(Knight, [F.]: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5。
- 内夫策, 奥·《不符带……》, 载于 1854 年 5 月 2 日《新闻报》(巴黎)《Nefftzer, A.: Aucun incident nouveau... In: La Presse. Paris. 2. Mai 1854)。——263。
- 《内阁危机》, 载于 1854 年 7 月 17 日《先驱晨报》(伦敦)第 22174 号(The ministerial crisis.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174, 17. Juli 1854)。——411。
- [内史密斯, 查·]《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 载于 1854 年 6 月 7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61 号([Nasmyth, Ch.]: The siege of Silistria.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61, 7. Juni 1854)。——340, 341。
- [内史密斯, 查·]《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 载于 1854 年 7 月 1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782 号([Nasmyth, Ch.]: The siege of Silistria.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82, 1. Juli 1854)。——380。
- 《尼古拉皇帝的宣言》, 载于 1854 年 3 月 4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680 号(Manifesto of the Emperor Nichola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80, 4. März 1854. 2. ed.)。——127。
- [尼古拉一世]〔《帝国宣言(1839 年 7 月的通令)》〕, 载于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 年》1848 年伦敦版([Nikolai I]: [Imperial Manifesto. (Ukase of July 1839.) In: Th.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59。
- [尼古拉一世]〔《给拿破仑第三的信》[1854 年]2 月 9 日于圣彼得堡》, 载于 1854 年 3 月 6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681 号([Nikolai I]: [Brief an Napoléon III.]St. Petersburg, Jan. 28 (Feb. 9),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81, 6. März 1854)。——127。
- [尼古拉一世]《1853 年 10 月 20 日宣言》——见《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第 2 卷第 226 号。
- 《涅谢尔罗德, [卡·罗·]《涅谢尔罗德伯爵致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哥尔查科夫公

- 爵。[1854年6月29日]], 载于1854年8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18号(Nesselrode, [K. R.]: Count Nesselrode to Prince Gortschakoff, Russian Envoy at Vienna. St. Petersburg, June 29,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18, 12. August 1854)。——476、592。
- 《涅谢尔罗德伯爵备忘录》——见《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第6卷。

O

- 欧文, 罗· [(1854年1月30日在艺术协会大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4日《人民报》(伦敦)第92期(Owen, R. : [Rede auf dem Meeting der Society of Arts, 30. Januar 1854.]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92, 4. Februar 1854)。——68。
- 《欧洲战争的第一阶段。——瓦拉几亚的斗争, 俄军渡过多瑙河》, 载于1854年3月3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453号(First period of the war in Europe. — Struggle for Wallachia, the Russians cross the Danube. From a military sketch by A. Schimmelfennig.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453, 31. März 1854)。——251。
- 《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 P.-A. 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 加代编, 1823年巴黎—鲁昂版第1卷(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 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 E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 avec des précis offrant de l' histoir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 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 par P.-A. Dufau, J.-B. Duvergier et J. Guadet. T. 1—6. T. 1. Paris, Rouen 1823)。——544。

P

- 帕金顿, [约·] [(1854年3月3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3月3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3号(Pakington,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0.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3, 31. März 1854)。——198、199。
- 帕麦斯顿, [亨·约·坦·] [(1848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8年伦敦版第97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 of Commons, 1. März 184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 ser. Vol. 97. London 1848)。——61—62。
-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3年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8月2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513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August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513, 22. August 1853)。——99。
-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4年2月6日在下院的预告》], 载于1854年2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58号(Palmerston, [H. J. T.]: [Ankündigung im House of Commons, 6.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58, 7. Februar 1854)。——64。
-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4年2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0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0.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0, 21. Februar 1854)。——100, 366。
-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4年2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2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2.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2, 23. Februar 1854)。——102。
-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4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引自1854年2月23日《晨邮报》(伦敦)第25016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3. Februar 1854.] Nach: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5016, 23. Februar 1854. [U. d. T.]: We are not at all surprised. . .)。——102。
-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4年3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4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4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1. März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4, 1. April 1854)。——225。
- 帕麦斯顿, [亨·约·坦·][《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6—427。
- [帕塞瓦尔-德申, 亚·斐·][《公报》。[1854年8月]15、16日], 载于1854年8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27号([Parseval-Deschênes, A.-F.]: [Bul-

- letin.]Lumpar, 15th, 16th [August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27, 23. August 1854)。——495。
- 帕伊科斯,安·《[通告]。1854年4月17日》,载于1854年5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30号(Paicos, A.: [Zirkulare.] Athens, 5th (17th) April,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30, 2. Mai 1854)。——264。
- 《派特曼博士案件》,载于1854年7月14日《晨报》(伦敦)第19676号(The case of Dr. Peithma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676, 14. Juli 1854)。——402—404。
- 《派特曼博士案件》,载于1854年7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94号(Case of Dr. Peithman.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794, 15. Juli 1854)。——412。
- 潘恩,托·《人的权利。答伯克先生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1791年伦敦版(Paine, Th.: Rights of Man, being an answer to Mr. Burke's attac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791)。——439。
- 佩克桑,昂·约·《法国的军事制度》1849年巴黎版(Paixhans, H. J.: Constitution militaire de la France. Paris 1849)。——308。
- 《评克里木九月份的军事行动》,载于1854年11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90号(Review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Crimea during the month of September.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90, 4. November 1854. 2. ed.)。——665—666。
- 《评外国的粮食贸易》,载于1854年5月29日《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伦敦)第1170号(Review of the foreign corn trade. In: The Mark 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 & C. London. Nr. 1170, 29. Mai 1854)。——322。
- 《评英国最近几周的粮食贸易》,载于1854年4月17日《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伦敦)第1164号(Review of the British corn trade, during the past week. In: The Mark 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 & C. London. Nr. 1164, 17. April 1854)。——248。
- 《评英国最近几周的粮食贸易》,载于1854年5月29日《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伦敦)第1170号(Review of the British corn trade, during the past week. In: The Mark 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 & C. London. Nr. 1170, 29. Mai 1854)。——322, 327。
- 普拉特, [多·]《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年巴黎版(Pradt, [D.]: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Paris 1816)。——522, 533, 537。

- 普拉特, [多·]《现代的西班牙革命及其后果》1820年巴黎—鲁昂版(Pradt, [D.]: De la révolution actuelle de l'Espagne, et de ses suites. Paris, Rouen 1820)。——544。
- 《普鲁士—俄国航海协定。1871年5月8日。特别条款》, 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5年莱比锡版第1卷(Convention maritime entre la Prusse et la Russie, signée à Saint-Petersbourg, le 8 mai 1781. Articles séparés.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1. Leipzig 1845)。——5。
- [《普鲁士政府的照会。1854年6月12日》]。引自1854年7月6日《科隆日报》第185号(Preußische Note vom 12. Juni 1854.) Nach: Kölnische Zeitung. Nr. 185, 6. Juli 1854. [U. d. T.]: In Erwartung der russischen Antwort...。——326、389。

Q

- 钱伯斯, [托·] [《1854年2月28日在下院提出的提案》], 载于1854年3月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7号(Chambers, [Th.]: [Antrag im House of Commons, 28.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7, 1. März 1854)。——200。
- 乔斯林, [罗·] [《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1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68号(Jocely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8, 18. Februar 1854)。——87。
- 《轻武器管理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附该委员会会议记录、详细证明等》[1854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mall arm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2 May 1854. [London 1854])。——304。
- 琼斯, 厄·《布里顿的野蛮行径》, 载于1854年5月13日《人民报》(伦敦)第106期(Jones, E.: Barbarians in Briton.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06, 13. Mai 1854)。——285—289。
- 琼斯, 厄·《普雷斯顿的棉花巨头。谁是真正的阴谋家?》, 载于1854年3月25日《人民报》第99期(Jones, E.: The Cotton Lords of Preston. Who are the real

- conspirators?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99, 25. März 1854)。——202。
- 琼斯,厄·《亲王》,载于1854年1月21日《人民报》(伦敦)第90期(Jones, E.: *The Prince*.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90, 21. Januar 1854)。——44。
- 琼斯,厄·〔《1854年1月30日在艺术协会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4年2月4日《人民报》(伦敦)第92期(Jones, E.: [Rede auf dem Meeting der Society of Arts 30. Januar 1854.]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92, 4. Februar 1854)。——68。
- 琼斯,厄·〔《1854年7月30日在贝克普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4年8月5日《人民报》(伦敦)第118期(Jones, E.: [Rede auf dem Meeting in Bacup, 30. Juli 1854.]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18, 5. August 1854. [U. d. T.]; *Camp Meeting at Bacup*)。——463—466。
- 《取缔骚乱和动乱分子集会,更迅速更有效地惩治动乱分子的法令》(1715年)(*An Act for preventing tumults and riotous assemblies, and for the more speedy and effectual punishing of the rioters (1715)*)。——202。

R

-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见《国民公会1793年6月24日向法兰西人民公布的宪法》。
- 《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201。
- 荣格曼,爱·《埃肯弗德和1849年4月5日。德国和丹麦战争中炮兵的一个插曲》1852年汉堡版(Jungmann, E.: *Eckernförde und der 5. April 1849. Eine artilleristische Episode aus dem deutsch-dänischen Kriege*. Hamburg 1852)。——282。

S

- 萨默维尔,亚·《科布顿的政策——英国内部的敌人。和平协会和它的好战性。科布顿先生和他的隐衷。历史故事》1854年伦敦版(Somerville, A.: *Cobdenic policy the internal enemy of England. The Peace society, its combativeness. Mr. Cobden, his secretiveness. Also,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incidents*. London 1854)。——50。
- 萨西,西·德·《马德里……》,载于1854年8月15日《辩论日报》(巴黎)(Sacy,

- S. de: Les nouvelles de Madrid. . .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5. August 1854). ——484。
- 萨西, 西·德·《最近……》, 载于 1854 年 9 月 12 日《辩论日报》(巴黎)(Sacy, S. de: Les dernières nouvelles. . .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2. September 1854)。——600。
- 《塞尔维亚政府就奥地利军队侵入本公国问题给土耳其政府的备忘录。1854 年 6 月 22 日》[1854 年]伦敦版。引自 1854 年 7 月 13 日《晨报》(伦敦)第 19675 号(Memorandum addressed by the Servian government to the Sublime Porte, respecting the occupation of that Principality by Austrian troops. Presen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in pursuance of their Address of June 22, 1854. London [1854]. Nach: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675, 13. Juli 1854. [U. d. T.]: Protest of the Servian government against Austrian occupation)。——399。
- 《塞尔维亚政府对奥地利占领的抗议书》, 载于 1854 年 7 月 13 日《晨报》(伦敦)第 19675 号(Protest of the Servian government against Austrian occupation.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675, 13. Juli 1854)。——399, 401。
- 骚塞, 罗·《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三卷集)1823—1832 年伦敦版(Southey, R. :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Vol. 1—3. London 1823—1832)。——516、522、529、531、547、551。
- 舍耳歇, 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历史》(两卷集)1852 年布鲁塞尔版第 2 卷(Schoelcher, V. : Histoire des crimes du 2 décembre. T. 1. 2. T. 2. Bruxelles 1852)。——39、328、330、622。
- 《谁是西班牙的解放者?》1846 年伦敦版(Who is the liberator of Spain? London 1846)。——555—558。
- 《神圣同盟条约。1815 年 9 月 26 日》, 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6 年莱比锡版第 3 卷(Traité dit de Sainte-Alliance, signé entre l'empereur de Russie, l'empereur d'Autriche et le roi de Prusse, à Paris, le 14/26 septembre 1815.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 . T. 1—5. T. 3. Leipzig 1846)。——65、231、359。
- 圣阿尔班, 德·《西班牙革命》, 载于 1854 年 8 月 14 日《国民议会报》(巴黎)第 174 号(Saint-Albin,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In: L'Assemblée nationale.

- Paris. Nr. 174, 14. August 1854)。——483。
- 圣阿尔诺,阿·德·《[1854年]9月20日的[电报]》,载于1854年10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61号(Saint-Arnaud, A. de: [Depesche.] On the Alma, Sept. 20,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61, 2. Oktober, 1854. 2. ed.)。——627。
- 圣阿尔诺,阿·德·《[1854年9月21日的[报告]]》,载于1854年10月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17号(Saint-Arnaud, A. de: [Report.] Bivouack on the Alma, Sept. 21,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17, 9. Oktober 1854)。——644—648。
- 圣阿尔诺,阿·德·《[1854年9月22日给陆军大臣的信]》,载于1854年10月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17号(Saint-Arnaud, A. de: [Brief an den Kriegsminister, 22. September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17, 9. Oktober 1854)。——649。
- 圣阿尔诺,阿·德·《圣阿尔诺元帅关于会战的报告》,载于1854年10月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617号(Saint-Arnaud, A. de: Marshal St. Arnaud's account of the battle.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617, 9. Oktober 1854)。——644—647。
- 圣昂热《不幸的消息……》,载于1854年7月17日《辩论日报》(巴黎)(Saint-Angé: D'après les nouvelles...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7. Juli 1854)。——407。
- 圣米格尔,埃·《西班牙内战》1836年马德里版(San Miguel, E.: De la guerra civil de España. Madrid 1836)。——557, 582。
- 斯密特,弗·冯·《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1839—1848年柏林版第1—3卷(Smitt, F. von: Geschichte des Polnischen Aufstandes und Kriegen in den Jahren 1830 und 1831. Th. 1—3. Berlin 1839—1848)。——205。
- 斯坦利, [爱·乔·杰·]《[1852年12月6日在上院的演说]》。引自莱·弗·辛普森《东方问题:莱宁根伯爵和缅施科夫公爵使团访问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1854年伦敦版(Stanley, [E. G.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6. Dezember 1852.] Nach: L. F. Simp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a connected narrative of events from the missions of Count Leiningen and Prince Menschikoff to Constantinople,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854)。——72。

-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斯·《致克拉伦登勋爵。1854年9月30日》,载于1854年10月5日《伦敦官报》第21603号(Stratford de Redcliffe, S.: To Lord Clarendon. September 30, 1854. In: The London Gazette. Nr. 21603, 5. Oktober 1854. Extraordinary)。——636、637、673。
-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斯·《致塞瓦斯托波尔总督》,载于1854年1月1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390号(Stratford de Redcliffe, S.: To the governor of Sevastopol.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390, 17. Januar 1854)。——40。
- 《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致不列颠领事们》,载于1854年4月18日《比利时独立报》(布鲁塞尔)第108号(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 aux consuls de S. M. Britannique. In: L'Indépendance Belge. Bruxelles. Nr. 108, 18. April 1854)。——242。
- 斯特林,威·《西班牙艺术家年鉴》1848年伦敦版第1—3卷(Stirling, W.: Annals of the artists of Spain. Vol. 1—3. London 1848)。——52。
- 斯托克奎勒,乔·海·《英国的军官:他们的职务、义务、薪水和特权。有关军官在服役期间的义务、晋升、报酬和限额以及退役后的报酬的规章、条例、军阶委任状和备忘录汇编》1851年伦敦版(Stocqueler, J. H.: The British officer: his position, duties, emoluments, and privileges. Being a digest and compilation of the rules, regulations, warrants, and memoranda, relating to the duties, promotion, pay, and allowances of the officers in Her Majesty's service and in that of the hon. East India Company. London 1851)。——300。
- 斯图亚特,[达·][《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2月1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68号(Stuart, [D.]: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7. Februar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68, 18. Februar 1854)。——87。
- 斯图亚特,[达·][《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Stuart, [D.]: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6。
- 斯图亚特,[达·][《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有关致函维多利亚女王的预告》],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Stuart, [D.]: [Ankündigung einer Adresse an die Königin Victoria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7。
- 《[四强国大使递交土耳其政府的四强照会。]1853年12月12日》,[署名]:斯特

- 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巴拉盖·狄利埃、路·冯·维登布鲁赫、布鲁克男爵, 载于 1854 年 1 月 10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2384 号([Kollektivnote der Repräsentanten der vier Großmächte an die Pforte.] Pera, December 12, 1853. [Gez.]; Stratford de Redcliffe, Baraguay d' Hilliers, L. de Wildenbruck [vielm. Wildenbruch], B. de Bruck.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384, 10. Januar 1854. [U. d. T.]: The following document...). —10—11, 26—27, 32—34, 63, 475。
- 《四国同盟条约, 或西班牙、法国、大不列颠和葡萄牙于 1834 年 4 月 22 日在伦敦签署的关于恢复比利牛斯半岛和平的公约》, 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6 年莱比锡版第 4 卷(Traité de la Quadruple-Alliance, ou convention, entre l'Espagne, la France, la Grande-Bretagne et le Portugal, conclue à Londres, le 22 avril 1834, pour rétablir la paix dans la Péninsule; suivie d'articles additionnels, signés à Londres, le 18 du mois d'août suivant. Extrait.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4. Leipzig 1846)。——116, 366。
- 索莱达, 贝·《历史和政治纪要。揭示笃信基督教的路易十四的思想, 以使西班牙摆脱因合法国王查理三世而蒙受的不幸》1703 年维也纳版。引自[何·马·]德·托雷诺《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五卷集)1835 年马德里版第 4 卷(Soledad, B.: Memorial historial y politica cristiana, que descubre las ideas, y maximas del christianissimo Luis XIV. Para librar á la España de los infortunios, que experimenta, por medio de su legitimo rey Don Carlos III. Assistido del Señor emperador, para la paz de Europa, y util de la religion... Por Frai Benito de la Solidad... Viena 1703. Nach: [J. M.] de Toreno: 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 T. 1—5. T. 4. Madrid 1835)。——527。

T

- 《同土耳其的条约》, 载于 1854 年 4 月 7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2459 号(The treaty with Turkey.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459, 7. April 1854)。——228。
- 托尔斯泰, 雅·《俄军在匈牙利的战况》1850 年巴黎版(Tolstoy, J.: Relation des opérations de l'armée russe en Hongrie, sous les ordres du feld-maréchal prince de

Varsovie, comte Paskevitch d'Erivan. Préc. d'un aperçu historique sur la Hongrie. Paris 1850)。——205。

托雷诺, [何·马·]德·《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五卷集)1835—1837年马德里版(Toreno, [J. M.] de: 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ón de España. T. 1—5. Madrid 1835—1837)。——521—523、527、550、551。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58、59。

W

《瓦拉几亚国君乌拉德五世和奥斯曼帝国皇帝穆罕默德二世的条约。1460年》。引自迪·布拉蒂亚诺《关于多瑙河两公国问题的文件》1849年伦敦版(Treaty concluded in 1460. between Vlad V., Prince of Wallachia and Mahomet II., Emperor of the Ottomans. Nach: D. Bratiano: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he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London 1849)。——373—374、377。

《瓦拉几亚—土耳其条约。1393年》。引自迪·布拉蒂亚诺《关于多瑙河两公国问题的文件》1849年伦敦版(Treaty concluded in 1393. between Wallachia and Turkey. Nach: D. Bratiano: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he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London 1849)。——373—374、377。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陛下就行将爆发的同俄国的战争问题给议会两院的诏书。1854年3月27日》]。引自1854年3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700号(Victoria: [Message from Her Britannic Majesty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on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Russia. March 27, 1854.] Nach: The Times. London. Nr. 21700, 28. März 1854. [U. d. T.]: The Royal message)。——180。

威灵顿, [阿·]《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的公文和一般命令选编》1842年伦敦版(Wellington, [A.]: Selections from the dispatches and general orders of Field Marshal the Duke of Wellington. London 1842)。——311。

威灵顿, [阿·] [《致利物浦伯爵。1809年11月21日》], 载于[阿·]威灵顿《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的公文和一般命令选编》1842年伦敦版(Wellington, [A.]: To the Earl of Liverpool. 21st Nov. 1809. In: [A.] Wellington: Selections from the dispatches and general orders of Field Marshal the Duke of Wellington. Lon-

- don 1842)。——311。
- 威灵顿,[阿·][《致韦尔斯利侯爵。1809年9月1日》]。引自威·沃尔顿《1808—1836年底的西班牙革命》(两卷集)1837年伦敦版第1卷(Wellington, [A.]: [To Marquis of Wellesley, September 1, 1809.] Nach: W. Walton: The revolutions of Spain, from 1808 to the end of 1836. In 2 Vols. Vol. 1. London 1837)。——534。
- 《维也纳4月9日议定书》——见《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第8卷。
- 《维也纳5月23日议定书》——见《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第9卷。
- 《维也纳会议期间签订的特别条约和各种文件。附1815年6月9日会议闭幕的文件》,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5年莱比锡版第1卷(Traité particuliers conclus à Vienne pendant la durée du congrès, et documents divers, annexés à l'acte final du congrès du 9 juin 1815, comme s'ils en faisaient partie.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1. Leipzig 1845)。——16、175、243、278—279、324。
- 《维也纳照会草案副本。[1853年7月31日]》,载于《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来往公文集》[1854年]伦敦版第2卷(Copy of the Vienna projet de note [vom 31. Juli 1853.], as modified by the Sublime Porte.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Pt. 2. London [1854])。——78、88、98、257、373、475。
- 《为巩固与军队的行政管理有关的各个部门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报告》1837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ssion o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connected with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army; evidence and appendix. London 1837)。——299。
- 《我国的出口。贸易保护主义的十一年和自由贸易的十一年》,载于1854年9月9日《经济学家》(伦敦)第576期(Our exports. Eleven years under protection and eleven years under freetrade.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576, 9. September 1854)。——612—613。
- 沃邦,[塞·]德·《要塞围攻法》1829年巴黎版。引自阿·冯·察斯特罗《永久性筑城的历史或筑城艺术的最优秀体系和风格手册》1839年莱比锡版

- (Vauban, [S.] de: *Traité des sièges et de l'attaque des places*. Nouv. éd. Paris 1829. Nach: A. von Zastrow: *Geschichte der beständigen Befestigung oder Handbuch der vorzüglichsten Systeme und Manieren der Befestigungskunst*. Leipzig 1839)。——493。
- 沃尔顿, 威·《1808—1836 年底的西班牙革命》(两卷集)1837 年伦敦版第 1 卷 (Walton, W.: *The revolutions of Spain, from 1808 to the end of 1836*. In 2 Vols. Vol. 1. London 1837)。——514, 534, 545, 557—560, 578。
- 沃尔什, 约·〔(1854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提出的质询)〕, 载于 1854 年 2 月 24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673 号 (Walsh, J.: [Anfrage im House of Commons, 23.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3, 24. Februar 1854)。——105。
- 沃尔什, 约·〔(1854 年 7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4 年 7 月 26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1803 号: (Walsh,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3, 26. Juli 1854)。——434。
- 乌尔基霍, 马·德·《给卡斯蒂利亚军区司令官格雷戈里·德拉库埃斯塔的信。1808 年 4 月 13 日》, 载于多·普拉特《西班牙革命史回忆录》1816 年巴黎版 (Urquijo, M. de: *Lettre à M. Gregorio de la Cuesta, capitaine-général de la Vieille-Castille*. Vittoria du 13 avril 1808. In: [D.] de Pradt: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révolution d'Espagne*. Paris 1816)。——522。
- 乌尔基瑙纳, [佩·]德·《罗马教廷统治下的西班牙》1833 年巴黎第 2 版 (Urquinaona, [P.] de: *La España bajo el poder arbitrario de la Congregacion Apostólica, ó apuntes documentad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te pais desde 1820 á 1832*. 2. ed. Paris 1833)。——558, 561, 580。
- 乌尔卡尔特, 戴·《陆军部》, 载于 1854 年 6 月 1 日《先驱晨报》(伦敦)第 22486 号 (Urquhart, D.: *The Ministry of War*.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486, 1. Juni 1854)。——317。
- 乌尔卡尔特, 戴·《1847 年会议开幕时的欧洲。西班牙的联姻和克拉科夫的被征用》1847 年伦敦版 (Urquhart, D.: *Europe at the opening of the session of 1847. The Spanish marriages, and the confiscation of Cracow*. London 1847)。——477。
- 乌尔卡尔特, 戴·《俄国在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Urquhart, D.: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by opening the sources of opinion and ap-*

- appropriating the channels of wealth and power. London 1853)。——478、511、558、640。
- 乌尔卡尔特,戴·《苏丹和埃及帕沙》1839年巴黎版(Urquhart, D.: *Le Sultan et le Pacha d'Egypte*. Paris 1839)。——103。
- 乌尔卡尔特,戴·《我们同俄国的谈判将怎样指导我们同法国作战。第三封信》,载于1854年2月6日《晨报》(伦敦)第19540号(Urquhart, D.: *How our negotiations with Russia will conduct us into a war with France. Letter 3*.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540, 6. Februar 1854)。——62。
- 乌尔卡尔特,威·波·《弗兰契斯科·斯福察,米兰公爵的生平。兼论意大利的历史》(两卷集)1852年爱丁堡—伦敦版(Urquhart, W. P.: *Life and times of Francesco Sforza Duke of Milan with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Italy*. Vol. 1. 2. Edinburgh, London 1852)。——53。

X

- 希尔德亚德, [罗·] [(1854年7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3号(Hildyard,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3, 26. Juli 1854)。——437。
- 《希腊妥协条约。1827年7月6日》, 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4卷(*Traité pour la pacification de la Grèce, conclu entre la France, la Grande-Bretagne et la Russie, signé à Londres, le 6 juillet 1827*.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4. Leipzig 1846)。——364。
- 《西班牙君主国宪法》1837年马德里版(*Constitucion de la Monarquia española, promulgada en Madrid á 18 de junio de 1837, impresa de orden de S. M. la Reina gobernadora*. Madrid 1837)。——397、409、414、461、473、483、484。
- 《西班牙君主国政治宪法》。引自《西班牙君主国政治宪法。1812年3月19日》1813年伦敦版(*Constitucion politica de la Monarquia española, promulgada en Cadiz á 19 marzo de 1812*. Nach: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Proclaimed in Cadiz 19th of March, 1812*. London 1813)。——414、477、479、539—548、551、554、555、558—572。

- 《西班牙君主国政治宪法。1812年3月19日》1813年伦敦版(*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Proclaimed in Cadiz, 19th of Marth, 1812. London 1813*)。——414、477、479、539—548、511、554、555、558—572。
- 《西班牙危机》1823年伦敦第2版(*The crisis of Spain. 2. ed. London 1823*)。——478—479。
- [《西班牙中央洪达告西班牙人民书。1808年10月26日》]。引自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三卷集)1827年伦敦版第1卷([*Proclamation issued by the Supreme Junta of Spain, to the Spanish nation. Aranjuez, October 26, 1808.*] Nach: R. Southey;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Vol. 1—3. Vol. 1. London 1823*)。——528—529。
- [《西班牙中央洪达告西班牙人民书。1809年10月28日》]。引自罗·骚塞《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三卷集)1827年伦敦版第2卷([*Proclamation issued by the Supreme Junta of Spain, to the Spanish nation. Seville, October 28, 1809.*] Nach: R. Southey;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Vol. 1—3. Vol. 2. London 1827*)。——529。
- 《西班牙最后的日子,或关于欧洲列强的所作作为的历史简述》1823年伦敦版(*The last days of Spain; or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ontinental powers, in order to destroy the Spanish constitution. By an eye-witness. London 1823*)。——554—555、558—559、566—568、569—572。
-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论南欧文学》(四卷集)1813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版第4卷(*Sismondi, J.-Ch.-L. Simonde de; De la littérature du Midi de l'Europe. T. 1—4. T. 4. Paris, Strasbourg 1813*)。——518。
- 席梅尔普芬尼希,亚·《俄土战争。军事速写》1854年费城—伦敦版(*Schimmelfennig, A.; The war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A military sketch. Philadelphia, London 1854*)。——252。
- 《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载于1854年6月12日《纪事晨报》(伦敦)第27290号(*The siege of Silistria.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Nr. 27290, 12. Juni 1854*)。——344—345。
- 《锡利斯特里亚指挥官穆萨帕沙的电报》,载于1854年6月2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522号(*Despatch from Mussa Pacha, commandant of Silistria.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522, 20. Juni 1854*)。——346。
- 夏多勃里昂,[弗·勒·德·]《维罗纳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

- 民地)(两卷集)1838年巴黎版第1卷(Chateaubriand, [F.-R. de]: *Congrès de Vérone. Guerre d'Espagne. Négociations. Colonies espagnoles. T. 1. 2. T. 1. Paris 1838*)。——116、477、563。
- 辛普森, 莱·弗·《东方问题: 莱宁根伯爵使团和缅施科夫公爵使团访问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1854年伦敦版(Simpson, L. F.: *The Eastern question: a connected narrative of events from the missions of Count Leiningen and Prince Menschikoff to Constantinople,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854*)。——72—76。
- 休谟, [约·][《1854年2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2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72号(Hume,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2. Februar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672, 23. Februar 1854*)。——101。
- 休谟, [约·][《1854年7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4年7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802号(Hume,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Juli 185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802, 25. Juli 1854*)。——425。
- [休斯, 特·麦·]《1845年西班牙真相》1845年伦敦版第1—2卷([Hughes, T. M.] *Revelations of Spain in 1845. Vol. 1. 2. London 1845*)。——451—454。

Y

- [亚历山大一世][《1810年6月20日告示》], 载于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Alexander I.]: [*Manifesto of June 20, 1810.*] In: *Th.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59。
- 《亚洲战场》, 载于1854年1月9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9号。引自1854年1月1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639号(*Der Kriegsschauplatz in Asien.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9, 9. Januar 1854. Nach: The Times. London. Nr. 21639, 16. Januar 1854. [U. d. T.]: When Prince Menchikoff...*)。——36。
- 《1812年6月16日第174号法令》。引自[何·马·]德·托雷诺《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五卷集)1837年马德里版第5卷(*Decreto CLXXIV de 16 de Junio de 1812. Reglas verificar la aplicacion de parte de los diezmos á las urgencias del Estado. Nach: [J. M.] de Toreno: 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 y revolucion de España. T. 1 — 5. T. 5. Madrid 1837)。——550。
- 〈1812年6月28日第176号法令〉。引自〔何·马·〕德·托雷诺《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五卷集)1837年马德里版第5卷(Decreto CLXXVI de 28 de Junio de 1812. Declaracion del patronato de Santa Teresa de Jesus en favor de las Españas. Nach: [J. M.] de Toreno: 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 T. 1 — 5. T. 5. Madrid 1837)。——550。
- 〈1812年10月14日第203号法令〉。引自〔何·马·〕德·托雷诺《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五卷集)1837年马德里版第5卷(Decreto CCIII de 14 de Octubre de 1812. Abolicion del voto de Santiago. Nach: [J. M.] de Toreno: 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 T. 1 — 5. T. 5. Madrid 1837)。——550。
- 〈1813年2月22日第223号法令〉。引自〔何·马·〕德·托雷诺《西班牙的起义、战争和革命的历史》(五卷集)1837年马德里版第5卷(Decreto CCXXIII de 22 de Febrero de 1813. Abolicion de la inquisicion: establecimiento de los tribunales protectores de la fe. Nach: [J. M.] de Toreno: Historia del levantamiento, guerra y revolucion de España. T. 1 — 5. T. 5. Madrid 1837)。——550。
- 〈一位德国军官历史地、战略地论俄国〉1854年莱比锡版(Rußland historisch und strategisch beleuchtet von einem deutschen Offizier. Leipzig 1854)。——703。
- 〈议席统计。〔1853年〕12月31日下院会议〉,载于1854年1月7日《旁观者副刊》(伦敦)第1332号(Statistics of representation. The House of Commons as it stood on the 31st Dec. [1853]. In: Supplement to The Spectator. London. Nr. 1332, 7. Januar 1854)。——52—54。
-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女皇陛下的宣言。1780年2月28日》,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5年莱比锡版第1卷([Jekaterina II.]: Déclaration de S. M. l'impératrice de toutes les Russies, datée du 28 février 1780.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 . T. 1 — 5. T. 1. Leipzig 1845)。——5。
- 尤尼乌斯——见弗兰西斯,菲力浦。
- 〈友好同盟条约。1812年7月20日〉,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Traité d' amitié et d' alliance, signé à Welliki-Louki, le 20 juillet 1812. Extrait.

-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2. Leipzig 1846)。——559。
- 《永久和平条约。1774年7月10日》，载于卡·冯·马尔滕斯/斐·冯·库西《……条约、协定和其他外交文件汇编》(五卷集)1845年莱比锡版第1卷(Traité de paix perpétuelle, conclus près du village de Koutschouc-Kaynardgi, signé le 10 juillet 1774. In: Ch. de Martens/F. de Cussy: Recueil manuel et pratique de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T. 1—5. T. 1. Leipzig 1845)。——26、90、95、184、244、379。
- 于班, 埃·《一个新消息……》, 载于1854年5月2日《新闻报》(巴黎)(Hubaine, E.: Un de nos correspondans... In: La Presse. Paris. 2. Mai 1854)。——262—263。

Z

- 《直接或间接参与东方战争的列强的军队》1854年莱比锡版(Die Armeen der am orientalischen Kriege direct und indirect beteiligten Mächte und zwar: Rußland, Türkei, England, Frankreich, Oesterreich, Griechenland, Preußen, Deutscher Bund, Schweden, Dänemark, Belgien, Niederlande, Sardinien. Militärisch-statistisch zusammengest. von einem deutschen Offizier. Leipzig 1854)。——705—706。
- 《战地来信。第46号。1854年9月4日于布加勒斯特》，载于1854年9月1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597号(Letters from the seat of war. No. XLVI. Bucharest, Sept. 4, 1854.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597, 15. September 1854)。——610。
- 《战地来信。12月20日于舒姆拉》，载于1854年1月1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390号(Letters from the seat of war. Shumla, Dec. 20.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390, 17. Januar 1854)。——32。

报刊上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A

《阿格拉姆报》

- 1854年4月25日第94号:(Unser Korrespondent von der montenegrinischen Grenze…)。——265、266。

B

《比利时独立报》

- 1854年4月18日第108号:(Commençons par une nouvelle…)。——240。
 —1854年5月1日第121号:(Nous trouvons dans le Nouvelliste de Marseille …)。——264。
 —1854年5月1日第121号:(On nous communique…)。——261。
 —1854年7月6日第187号:(Cette lettre, ainsi que celles… [Korrespondenz aus:] Madrid, 1 juillet)。——387。
 —1854年7月7日第188号:(Jamais à aucune époque…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5 juillet)。——392—393。
 —1854年7月7日第188号:(Nous lisons dans le Lloyd…)。——390—391。
 —1854年7月13日第194号:(On se ferait difficilement…)。——398。
 —1854年7月14日第195号:(Beaucoup de monde… [Korrespondenz aus:] Turin, 9 juillet)。——395。
 —1854年7月14日第195号:(Nous lisons dans le Messager de Bayonne …)。——397。
 —1854年7月16日第197号:(On lit dans la Nouvelle Gazette de Prusse …)。——406。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Après avoir fait connaître …)。——408。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Au diner donné… [Korrespondenz aus:] Vienne, 14 juillet)。——406、409。

-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L'attention est presque...). —408。
-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Je vous ai annoncé... [Korrespondenz aus:]Hambourg, 14 juillet)。—409—410。
-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Le Journal des Débats resume...)。—410。
-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Le Messager de Bayonne... [Korrespondenz aus:]Paris, 16 juillet)。—411。
-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Le Messager de Bayonne, qui a des lettres...)。—410。
-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Le Moniteur du 16 publie...)。—409。
-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Le Moniteur français publie...)。—407, 408。
- 1854年7月17—18日第198—199号:(La Porte a décidément... [Korrespondenz aus:]Constantinople, 3 juillet)。—408。
- 1854年7月19日第200号:(Nous pouvons être brefs...)。—418。
- 1854年7月28日第209号:(Depuis ma dernière lettre... [Korrespondenz aus:]Vienne, 24 juillet)。—430。
- 1854年8月8日第220号:(Voici ce qui m'est assuré... [Korrespondenz aus:]Paris, 6 août)。—462。
- 1854年9月4日第247号:(Les troubles que les démagogues... [Korrespondenz aus:]Paris, 2 septembre)。—602。
- 1854年9月15日第258号:(Si l'on peut ajouter... [Korrespondenz aus:]Hambourg, 11 septembre)。—607。
- 1854年10月5日第278号:(La dépêche du prince Menchikoff...)。—640。
- 1854年10月5日第278号:(Des désordres graves ont... [Depesche aus:]Madrid, dimanche 1 octobre)。—641。
- 1854年10月6日第279号:(Même situation qu'hier...)。—641。
- 《辩论日报》
- 1854年1月7日:(On écrit de Perse...)。—24, 25。

- 1854年7月5日:(On lit dans le Heraldo…)。——388。
- 1854年7月6日:(L' Ami du Soldat, de Vienne, du 30 juin, contient …)。——390。
- 1854年7月7日:(On lit dans la Gazette de Spener …)。——391。
- 1854年8月14日:(Nous avons reçu les journaux…)。——481。
- 1854年8月15日:(Espagne. Madrid, 9 août…)。——481。
- 1854年8月15日:(La presse madrilène…)。——481。
- 1854年8月21日:(On lit dans la España…)。——585。
- 1854年8月30日:(Des bruits de modification…)。——586。
- 1854年8月30日:(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 adressé…)。——585。
- 1854年8月30日:(M. Facundo Infante…)。——588。
- 1854年8月30日:(On lit dans la Epoca…)。——586。
- 1854年9月1日:(Un mouvement insurrectionnel…)。——588。
- 1854年9月12日:(Les nouvelles de Madrid…)。——600。
- 1854年10月2日:(La prise de Sébastopol…)。——639。
- 1854年12月12日:(Une correspondance de Copenhague…)。——607。

C

《晨报》

- 1854年3月7日第19565号:(The real Prime Minister.)。——128。
- 1854年5月29日第19636号:(It is no small satisfaction to think…)。——321。
- 1854年6月9日第19646号:(Public meeting at Birmingham, and triumph of Mr. D. Urquhart)。——325。
- 1854年6月26日第19660号:(New ministerial arrangements)。——361。
- 1854年6月27日第19661号:(The Moniteur of Bucharest… [Depesche aus:]Belgrade, June 25, 1854)。——360。
- 1854年7月13日第19675号:(Dr. Peithman, formerly of Bonn…)。——402。
- 1854年7月17日第19678号:(Dr. Peithman, the alleged lunatic)。——412。

《晨邮报》

- 1854年2月23日第25016号:(We are not at all surprised…)。——102。
—1854年3月27日第25033号:(The week)。——201。
—1854年4月7日第25043号:(The prosecution of the case of Mr. Stonor…)。
——228。
—1854年4月17日第25051号:(Three thousand Greeks … [Depesche aus:]
Constantinople, April 5)。——241。
—1854年4月21日第25055号:(According to a report … [Depesche aus:]
Berlin, April 17)。——245。
—1854年4月21日第25055号:(A letter from Stockholm … [Depesche aus
Stockholm, 7. April])。——245。
—1854年4月21日第25055号:(Separated from Canada … [Korrespondenz
aus:] Quebec, March 30, 1854)。——247。
—1854年6月8日第25095号:(The Austrian intimation…)。——325。
—1854年6月8日第25095号:(The new ministry of war)。——326。
—1854年7月27日第25173号:(An order arrived … [Depesche aus:] Bel-
grade, July 19)。——430。

D

《地球和旅行家》

- 1854年6月1日第17439号:(We can only at present…)。——313,320。
—1854年6月8日第17445号:(Although we believe…)。——325。
—1854年7月6日第17469号:(We have some further information …)。——
326。
—1854年7月27日第17486号:(No form of tyranny…)。——439。

《东德意志邮报》

- 1854年6月25日第147号:(Es ist mir zwar nicht gestattet … [Korrespon-
denz aus:] Hermannstadt, 20. Juni)。——370。

《都柏林晚邮报》

- 1854年1月2日第5466号:(The palace plot)。——9。

《杜塞尔多夫日报》

- 1854年8月9日第189号:(Oesterreich hat an die kleinen deutschen Staaten
…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7. August)。——472。

F

《法兰克福邮报》

—1854年7月1日第156号：(Die entschiedene Haltung ... [Korrespondenz aus:] Frankfurt, 1. Juli)。——390。

《法兰西简报》

—1852年1月29日第5号：(Les Spoliateurs)。——330。

G

《观察家报》

—1854年7月17日：(Admiral Lyons is ... [Depesche aus:] Varna, July 5)。——408。

—1854年7月17日：(Austria has three courses to pursue)。——406。

—1854年7月17日：(Despatches were forwarded ... [Depesche aus:] Vienna, July 15)。——406。

—1854年7月17日：(It is reported and generally believed...)。——406。

H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1854年3月1日第51号：(Zur Bewachung der Dardanellenschlösser...)。——110。

—1854年3月21日第68号：(Der Commandeur des Jäger-Regiments...)。——180。

—1854年10月9日第239号：(Der Czas bringt ... [Korrespondenz aus Polen, 28. September 1854])。——651。

《汉诺威日报》

—1854年4月22日第187号：(Über den Inhalt ...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21. April)。——255。

J

《纪事晨报》

—1854年1月9日第27159号：(The combined fleets ... [Depesche aus:] Con-

- stantinople, Dec. 30)。——12。
- 1854年5月29日第27278号:(Efforts will be made to raise…[Korrespondenz aus:]Copenhagen, May 23)。——321。
- 1854年6月1日第27281号:(The Sultan has shown…[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May 18)。——319。
- 1854年6月2日第27282号:(The institution of a ministerial department …)。——317。
- 1854年6月2日第27282号:(King Otho, it seems announced…)。——319。
- 1854年6月9日第27288号:(The Communication recently…)。——326。
- 1854年6月9日第27288号:(It will be seen…)。——326。
- 1854年6月15日第27293号:(The inhabitants of Pera …[Korrespondenz aus:]Constantinople, June 1)。——350。
- 1854年6月22日第27299号:(All interest is now concentrated…)。——347、351。
- 1854年6月22日第27299号:(I have the great satisfaction …)。——352。
- 1854年7月4日第27309号:(An event has occurred…)。——369。
- 1854年7月4日第27309号:(The insurrection at Madrid. [Korrespondenz aus:]Madrid, June 28)。——370。
- 1854年7月4日第27309号:(The Senate has approved …[Depesche aus:] Hamburg, July 1)。——370。
- 1854年7月4日第27309号:(The substance of the Czar's answer…[Depesche aus:]Berlin, Monday)。——371。
- 1854年7月14日第27318号:(A great change…)。——395、398、399。
- 1854年7月14日第27318号:(My letter of yesterday…[Korrespondenz aus:]Madrid, July 8)。——396。
- 1854年7月14日第27318号:(Unless some large portion…[Korrespondenz aus:]Madrid, July 7)。——395—397。
- 1854年7月18日第27321号:(Weary of the evasions and procrastinations …)。——406。
- 1854年8月5日第27337号:(The Prussian Correspondence has the following from Galatz…[Korrespondenz aus:]Berlin, August 2)。——460。

—1854年8月7日第27338号:(The Austrian Correspondence of to-day…[Korrespondenz aus:]Vienna, August 1)。——460。

《经济学家》

—1854年6月3日第562期:(Our trade)。——327。

—1854年9月9日第756期:(American diplomatic taste and morality)。——611—615。

K

《科隆日报》

—1853年12月25日第357号:(Die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schreibt …)。——3。

—1854年1月4日第4号:(Die“Presse” schreibt…[Korrespondenz aus:]Wien, 1. Jan)。——28。

—1854年1月6日第6号:(Die Nothwendigkeit für die Uferstaaten der Ostsee …[Korrespondenz aus:]Berlin, 3. Jan)。——5。

—1854年4月6日第96号:(Bericht der Credit-Commission)。——229—232。

—1854年4月6日第96号:(Das an der südöstlichen Gränze …[Korrespondenz aus:]Wien, 1. April)。——228。

—1854年4月6日第96号:(Die beiden wichtigsten schwedisch-norwegischen Gesandtschafts-Posten…[Korrespondenz aus:]Stockholm, 28. März)。——228。

—1854年4月6日第96号:(Die heutige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228。

—1854年4月19日第108号:(Der Auszug der Hellenen …[Korrespondenz aus:]Pera, 6. April)。——246。

—1854年4月19日第108号:(Beigehend übersende ich …[Korrespondenz aus:]Konstantinopel, 6. April)。——245—246。

—1854年4月20日第109号:(Der Ministerpräsident, nachdem…[Korrespondenz aus:]Berlin, 18. April)。——245。

—1854年7月6日第185号:(In Erwartung der russischen Antwort…[Korrespondenz aus:]Berlin, 4. Juli)。——389。

- 1854年8月11日第221号:(*Nachdem so lange ...*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9. August)。——474。
- 1854年8月14日第224号:(*Aus den Mittheilungen...* [Korrespondenz aus:] Kopenhagen, 1. Aug)。——475。
- 1854年9月11日第252号:(*Der König verweigert beharrlich...* [Depesche aus:] Athen, 29. Aug)。——603。
- 1854年9月11日第252号:(*Der Kriegs-Aviso Ajaccio...*)。——604。
- 1854年9月11日第252号:(*Der Moniteur veröffentlicht...*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9. September)。——601。
- 1854年9月11日第252号:(*Nach der madrider Espana...*)。——600。

L

《立宪主义者报》

- 1854年9月12日第255号:(*Mais l'Empereur...*)。——601。

M

《每日新闻》

- 1854年1月9日第2383号:(*The Circular of the French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12。
- 1854年1月10日第2384号:(*The following document...*)。——11、27、33、62—63、476。
- 1854年1月12日第2386号:(*It no way surprises...*)。——22。
- 1854年1月12日第2386号:(*Letters from Berlin*)。——25。
- 1854年1月12日第2386号:(*To-day the Second Chamber...*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Jan. 9)。——26。
- 1854年1月17日第2390号:(*My last of ...* [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Jan. 2)。——142。
- 1854年1月17日第2390号:(*The news arrived...* [Korrespondenz aus:] Shumla, Dec. 20)。——143。
- 1854年1月18日第2391号:(*Great despots and great conquerors...*)。——40。
- 1854年1月19日第2392号:(*A Berlin correspondent writes on the 15th*

- …)。——33。
- 1854年2月6日第2507号:(If the war does nothing else …)。——317。
- 1854年6月20日第2522号:(Another despatch from Mussa Pacha)。——346。
- 1854年7月17日第2445号:(The French Emperors visit to the British fleet)。——410。
- 1854年7月18日第2446号:(Yesterday afternoon witnessed a great gathering in Downingstreet)。——411。
- 1854年9月14日第2596号:(The Madrid Diario of the 8th …)。——611。
- 1854年10月2日第2611号:(England is again …)。——627。
- 1854年10月2日第2611号:(Rejoicings at the capture of Sebastopol)。——630、632、634。
- 1854年10月5日第2614号:(We are still without any official confirmation… [Korrespondenz aus:]Paris, Tuesday evening)。——638。
- 1854年10月6日第2615号:(The Lloyds of Vienna…)。——637。
- 1854年10月6日第2615号:(At the battle of the Alma…)。——636。
- 1854年10月6日第2615号:(Translation of the exact copy of a telegraphic despatch…)。——636、673—674。
- 1854年11月29日第2661号:(The battle-eve in the Russian camp)。——698。
- 1854年12月4日第2665号:(The 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 states… [Depesche aus:]Constantinople, Nov. 20)。——700。
- 1854年12月14日第2674号:(The Moniteur of yesterday publishes …)。——698。

《米兰官报》

- 1854年8月31日第243号:(Siamo lieti di poter annunziare…)。——599。

P

《旁观者》

- 1854年1月7日第1332号:(According to the German papers …)。——19。
- 1854年1月7日第1332号:(Except in the Baltic…)。——9。
- 1854年1月7日第1332号:(The ministerial explanations in parlia-

ment)。——25—29。

—1854年1月14日第1333号:(The stories about Prince Albert)。——44。

Q

《旗帜报》

—1853年12月31日第9173号:(The latest communications…)。——11—12。

R

《人民报》

—1854年2月4日第92期:(Fellow-workmen, —ever since …)。——68。

—1854年2月4日第92期:(Great meeting at Nottingham)。——68。

—1854年3月25日第99期:(Cowell, Grimshaw, Gallaher…)。——201。

—1854年3月25日第99期:(Crowded meeting at Accrington. —Gross case of tyranny)。——201。

—1854年4月1日第100期:(Prosecution of the Lancashire leaders)。——137—139、201、204。

—1854年5月13日第106期:(Abandonment of Preston prosecution)。——290。

—1854年8月5日第118期:(Camp meeting at Bacup)。——463—466。

—1854年10月7日第127期:(War and commerce)。——641—642。

S

《圣彼得堡报》

—1854年3月2日第336号:(Nous venons de recevoir…)。——171、177—178。

T

《泰晤士报》

—1853年1月26日第21335号:(Although we cannot…)。——221。

—1853年2月11日第21349号:(The course of policy…)。——221。

—1853年2月23日第21359号:(Among the indirect consequences…)。——

- 221、222。
- 1853年3月7日第21369号:(The state of the Turkish Empire…)。——222。
- 1853年3月10日第21372号:(The Austrian mission of Count Leiningen …)。——223。
- 1853年3月23日第21383号:(The opinions we have expressed…)。——224。
- 1853年12月19日第21615号:(The following telegraphic despatch …)。——26。
- 1854年1月4日第21629号:(As there has been…[Korrespondenz aus:]Vienna, Dec. 28)。——142。
- 1854年1月6日第21631号:(The following is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5. januar 1854])。——17。
- 1854年1月6日第21631号:(In the present state…)。——21。
- 1854年1月9日第21633号:(Austria has demanded … [Depesche aus:]Vienna, Sunday afternoon)。——11。
- 1854年1月9日第21633号:(The loss of a vessel of 120 guns…[Depesche aus:]St. Petersburg, Dec. 28)。——21。
- 1854年1月9日第21633号:(The Pasha of Egypt … [Depesche aus:]Alexandria, Dec. 22)。——22。
- 1854年1月9日第21633号:(Resignation of Mr. John Sadleir. [Korrespondenz aus:]Dublin, Saturday morning)。——10。
- 1854年1月10日第21634号:(The peasants of Lesser Wallachia…[Depesche aus:]Krajova, Dec. 30)。——13。
- 1854年1月11日第21635号:(Two firmans are expected …[Depesche aus:]Belgrade, Dec. 28)。——25。
- 1854年1月13日第21637号:(The news that an important advantage…[Depesche aus:]Constantinople, Jan. 1)。——24。
- 1854年1月14日第21638号:(The intelligence which we published …)。——19。
- 1854年1月16日第21639号:(The battle of Citale.)。——37。
- 1854年1月16日第21639号:(The commander of the Russian flotilla

- …)。——37。
- 1854年1月16日第21639号:(An official despatch…)。——38。
- 1854年1月16日第21639号:(In spite of the many assertions … [Korrespondenz aus:]Berlin, Jan. 13)。——40。
- 1854年1月16日第21639号:(When Prince Menchikoff…)。——37。
- 1854年1月17日第21640号:(Although we have …)。——32。
- 1854年1月26日第21648号:(I have reason to believe… [Korrespondenz aus:]Berlin, January 23)。——48、56。
- 1854年1月26日第21648号:(Whatever answer may be …)。——57。
- 1854年1月27日第21649号:(Up to late hour… [Korrespondenz aus:]Vienna, Jan. 23)。——58。
- 1854年1月30日第21651号:(The French financial statement)。——60。
- 1854年1月30日第21651号:(In the afternoon of the day… [Korrespondenz aus:]Vienna, Jan. 25)。——58。
- 1854年1月30日第21651号:(The Preussische Correspondenz … [Korrespondenz aus:]Vienna, Jan. 26)。——58。
- 1854年1月31日第21652号:(The correctness of the report…)。——58。
- 1854年1月31日第21652号:(General Schilder, chief of the engineers …)。——80、143。
- 1854年2月7日第21658号:(A telegraphic despatch from Trieste…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6. Februar])。——112。
- 1854年2月8日第21659号:(The long-expected… [Korrespondenz aus:]Vienna, Feb. 4)。——142。
- 1854年2月8日第21659号:(When information reached us from St. Petersburg…)。——70。
- 1854年2月9日第21660号:(In consequence of orders… [Depesche aus:]Brest, Feb. 8)。——70。
- 1854年2月9日第21660号:(Count Orloff left…)。——71。
- 1854年2月9日第21660号:(The Seraskier and Kapudan Pasha … [Depesche aus:]Vienna, Wednesday, 4p. m.)。——71。
- 1854年2月10日第21661号:(It is probable…)。——71。
- 1854年2月11日第21662号:(It no longer admits … [Korrespondenz aus

- Wien, 7. Februar])。——80、141。
- 1854年2月13日第21663号:(The Russians have … [Depesche aus:] Bucharest, Feb. 1)。——80。
- 1854年2月14日第21664号:(It is announced that a telegraphic despatch …)。——108。
- 1854年2月17日第21667号:(Navy estimates)。——85。
- 1854年2月18日第21668号:(The accounts we continue to receive …)。——108。
- 1854年2月18日第21668号:(The army estimates have been printed …)。——85。
- 1854年2月18日第21668号:(Mehemet Pasha, formerly… [Depesche aus:] Constantinople, Feb. 2)。——108。
- 1854年2月24日第21673号:(The Government have…)。——112。
- 1854年2月27日第21675号:(The Emperor of Russia…)。——115。
- 1854年2月27日第21675号:(The insurrec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Feb. 22)。——114—115。
- 1854年2月28日第21676号:(The Constantinople mails …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Feb. 24)。——113、114。
- 1854年2月28日第21676号:(The French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Feb. 17)。——114。
- 1854年2月28日第21676号:(That such a letter …)。——115。
- 1854年2月28日第21676号:(The time is now come…)。——115。
- 1854年2月28日第21676号:(The new finance decree in the Wiener Zeitung.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Feb. 24)。——118。
- 1854年2月28日第21676号:(We have received by express…)。——117。
- 1854年3月1日第21677号:(The concluding words…)。——112。
- 1854年3月2日第21678号:(Negotiations relative to… [Depesche aus:] Constantinople, Feb. 20)。——111。
- 1854年3月3日第21679号:(The Emperor opened the legislative chamber …)。——110。
- 1854年3月9日第21684号:(An army will be formed … [Depesche aus:] Vienna, Wednesday evening)。——141。

- 1854年3月9日第21684号:(The notice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given …)。——146。
- 1854年3月11日第21686号:(The Earl of Shaftesbury…)。——147。
- 1854年3月11日第21686号:(The convoying steam squadron…)。——146。
- 1854年3月11日第21686号:(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loan …)。——141。
- 1854年3月11日第21686号:(We have before …)。——144、156。
- 1854年3月13日第21687号:(The sense of a very…[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March 8)。——144。
- 1854年3月14日第21688号:(On the motion…)。——147。
- 1854年3月20日第21693号:(The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156。
- 1854年3月21日第21694号:(The wages movement)。——203。
- 1854年3月27日第21699号:(The Grand Mufti … [Depesche aus:] Vienna, Sunday evening)。——180。
- 1854年3月27日第21699号:(The intelligence transmitted…)。——179。
- 1854年3月28日第21700号:(Shortly before 5 o'clock …)。——179。
- 1854年3月28日第21700号:(The Earl of Aberdeen…)。——179。
- 1854年3月28日第21700号:(The new Irish difficulty…)。——180。
- 1854年3月28日第21700号:(The Royal message)。——180、215。
- 1854年3月28日第21700号:(The Minister of state … [Depesche aus:] Paris, March 27)。——179。
- 1854年3月30日第21702号:(By a Turkish despatch…[Depesche aus:] Vienna, Thursday morning)。——211。
- 1854年3月31日第21703号:(The Preston strike)。——201。
- 1854年4月3日第21705号:(The rifle brigade…[Depesche aus:] Malta, March 31)。——212。
- 1854年4月3日第21705号:(The House of Commons was summoned …)。——220。
- 1854年4月3日第21705号:(Until now the Austrian government…[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March 29)。——211。

- 1854年4月4日第21706号:(In the Dobrudscha ... [Depesche aus:] Vienna, Monday evening)。——211。
- 1854年4月4日第21706号:(Prince George of Mecklenburg... [Depesche aus:] Berlin, Monday)。——212、216。
- 1854年4月5日第21707号:(The accounts received ...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April 1)。——238。
- 1854年4月7日第21709号:(The corn trade)。——233。
- 1854年4月7日第21709号:(Appointment of Mr. Stonor)。——227。
- 1854年4月7日第21709号:(The Isle of Aland ... [Depesche aus:] Berlin, Wednesday night)。——228。
- 1854年4月7日第21709号:(Lord J. Russell had stated ...)。——227。
- 1854年4月10日第21711号:(It was known ... [Depesche aus:] Vienna, Monday morning)。——235。
- 1854年4月10日第21711号:(The Wanderer has a letter...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April 5)。——235。
- 1854年4月10日第21711号:(During the last ...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April 5)。——235。
- 1854年4月12日第21713号:(The following is as correct ...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April 8)。——235。
- 1854年4月17日第21717号:(As your attention ...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April 12)。——240。
- 1854年4月19日第21719号:(The declaration of war... [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April 7)。——717。
- 1854年4月19日第21719号:(The following is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8. April 1854])。——718。
- 1854年4月19日第21719号:(Obedient to ministerial instigation...)。——719。
- 1854年4月19日第21719号:(We have received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s...)。——718。
- 1854年5月3日第21731号:(As far as I have been...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April 30)。——270。
- 1854年5月19日第21745号:(Attack on Sebastopol)。——285。

- 1854年5月19日第21745号:(The Turkish fleet… [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May 5)。——295。
- 1854年5月19日第21745号:(The following is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8. Mai 1854])。——285。
- 1854年5月19日第21745号:(The works at…)。——295。
- 1854年5月20日第21746号:(At the present moment…)。——294。
- 1854年5月22日第21747号:(The camp and barracks… [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May 10)。——296。
- 1854年5月22日第21747号:(The last accounts which have reached us…)。——295。
- 1854年5月22日第21747号:(Yesterday the steam-frigate…)。——351。
- 1854年5月23日第21748号:(The committee appointed to take…)。——304。
- 1854年5月23日第21748号:(We have received… [Depesche aus:] Berlin, Monday evening)。——291。
- 1854年5月26日第21751号:(The main portion … [Korrespondenz aus:] Gothland, May 16)。——351。
- 1854年5月26日第21751号:(The statement I referred … [Korrespondenz aus:] Madrid, May 20)。——388。
- 1854年5月29日第21753号:(The decree for… [Korrespondenz aus:] Madrid, May 21)。——389。
- 1854年5月29日第21753号:(The market exhibited…)。——323。
- 1854年5月29日第21753号:(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ngland…)。——311。
- 1854年5月29日第21753号:(The protocol signed…)。——313。
- 1854年5月30日第21754号:(It appears that … [Korrespondenz aus:] Madrid, May 23)。——389。
- 1854年5月30日第21754号:(The following telegraphic despatch…)。——313。
- 1854年5月30日第21754号:(Nothing can be more unjust…)。——317。
- 1854年5月30日第21754号:(The resolution of…)。——314。
- 1854年6月1日第21756号:(The commanders-in-chief…)。——318。

- 1854年6月1日第21756号:(Letters from Constantinople of the 22d...[Depesche aus:]Paris, Wednesday)。——318。
- 1854年6月2日第21757号:(The following is a summary...[Korrespondenz aus:]Vienna, May 28)。——349。
- 1854年6月2日第21757号:(Money market and city intelligence)。——323。
- 1854年6月2日第21757号:(The Oest[erreichische]Correspondenz last night...[Korrespondenz aus:]Vienna, May 28)。——349。
- 1854年6月2日第21757号:(We rejoice to be able...)。——317。
- 1854年6月9日第21763号:(Last night Count Buol ... [Korrespondenz aus Wien, 8. Juni 1854])。——327。
- 1854年6月9日第21763号:(The statement made...)。——326。
- 1854年6月17日第21770号:(Some days will probably ... [Depesche aus:]Vienna, June 13)。——350。
- 1854年6月20日第21772号:(The English funds to-day...)。——349。
- 1854年6月21日第21773号:(On the 15th[fifteenth]a sortie was made... [Depesche aus:]Vienna, Tuesday evening)。——354。
- 1854年6月21日第21773号:(The quotation of gold at Paris...)。——348。
- 1854年6月22日第21774号:(The latest intelligence...)。——290、291、350。
- 1854年6月27日第21778号:(The intelligence which reached us...)。——379。
- 1854年7月1日第21782号:(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telligence...)。——393。
- 1854年7月3日第21783号:(I take the chance ... [Korrespondenz aus:]Paris, June 30, 6 p. m.)。——371—373、421、429—431、439—440、469。
- 1854年7月3日第21783号:(The terms of the treaty...)。——370。
- 1854年7月7日第21787号:(The Moniteur says... [Korrespondenz aus:]Paris, Wednesday, July 5, 6 p. m.)。——388。
- 1854年7月7日第21787号:(Prince Gortschakoff arrived ... [Depesche aus:]Vienna, July 6)。——389。

- 1854年7月8日第21788号:(We are not sorry that M. Kossuth…)。——325。
- 1854年7月11日第21790号:(Prince Gortschakoff (the General)…)。——394。
- 1854年7月13日第21792号:(Her Majesty and the Court…)。——402。
- 1854年7月13日第21792号:(The works of the Russians…)。——396。
- 1854年7月14日第21793号:(Although for the last … [Depesche aus:] Calais, Wednesday night)。——395。
- 1854年7月14日第21793号:(According to a despatch…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Thursday evening)。——395, 399。
- 1854年7月14日第21793号:(The Oest[erreichische]Correspondenz of yesterday…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July 9)。——395。
- 1854年7月17日第21795号:(The 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 contains …)。——406。
- 1854年7月18日第21796号:(At the moment of victory…)。——441。
- 1854年7月18日第21796号:(House of Commons. Monday, July 17, [1854])。——411。
- 1854年7月18日第21796号:(Whatever may be the motives…)。——405。
- 1854年7月20日第21798号:(The appearance of …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July 15)。——419。
- 1854年7月21日第21799号:(Our own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seat of war …)。——416。
- 1854年7月21日第21799号:(According to advices … [Depesche aus:] Paris, Thursday evening)。——416。
- 1854年7月22日第21800号:(It is evident from the last intelligence …)。——485。
- 1854年7月25日第21802号:(National education)。——423。
- 1854年7月25日第21802号:(Prince Stirbey and… [Depesche aus:] Malta, July 21)。——430。
- 1854年7月26日第21803号:(In order of the day…)。——432。
- 1854年7月26日第21803号:(It would be very much …)。——441。

- 1854年7月26日第21803号:(We have received from our correspondent …)。——431。
- 1854年7月27日第21804号:(In the House of Commons…)。——439。
- 1854年7月28日第21805号:(Since the despatch…[Korrespondenz aus:] Near Devno, Bulgaria, July 13)。——438、442。
- 1854年7月28日第21805号:(We have received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442。
- 1854年7月29日第21806号:(I left Shumla[Korrespondenz aus:] Rustchuk, July 9)。——443。
- 1854年7月29日第21806号:(On the 12th[twelfth]Omar Pasha…)。——443。
- 1854年7月31日第21807号:(The events recently recorded…)。——442、470。
- 1854年8月1日第21808号:(This anchorage, which…[Korrespondenz aus:]Led Sound, South of the Aland Lslands, July 25)。——456、490。
- 1854年8月1日第21808号:(We have received the following…)。——444。
- 1854年8月7日第21813号:(Some time must elapse…)。——456。
- 1854年8月8日第21814号:(A Royal decree authorizes … [Depesche aus:] Madrid, Aug. 2)。——461。
- 1854年8月8日第21814号:(The opinion I yesterday expressed…[Korrespondenz aus:]Madrid, August 1)。——461。
- 1854年8月8日第21814号:(The Presse of to-day … [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Aug. 4)。——460。
- 1854年8月9日第21815号:(The cholera has crept … [Korrespondenz aus:]Varna, July 26)。——471。
- 1854年8月9日第21815号:(The following is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8. August 1854])。——491。
- 1854年8月9日第21815号:(Matters must be strangely managed…)。——471。
- 1854年8月9日第21815号:(The Turkish advanceguard…[Depesche aus:] Bucharest, Aug. 7)。——470。

- 1854年8月10日第21816号:(The following is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9. August 1854])。——470。
- 1854年8月10日第21816号:(The occurrences of the last day...)。——470。
- 1854年8月10日第21816号:(The time for moving the troops... [Korrespondenz aus:]Led Sound, August 2)。——490。
- 1854年8月11日第21817号:(The declaration which has recently ...)。——468—469。
- 1854年8月11日第21817号:(I have received from Rustchuk... [Korrespondenz aus:]Paris, Wednesday, Aug. 9, 6 p. m.)。——472。
- 1854年8月11日第21817号:(On the 6th[sixth]<18th>of July...)。——471。
- 1854年8月14日第21819号:(Bucharest is occupied... [Depesche aus:]Vienna, dated August the 11th)。——475。
- 1854年8月14日第21819号:(The News of the ... [Korrespondenz aus:]Vienna, Aug. 10)。——475。
- 1854年8月14日第21819号:(A telegraphic despatch from Bayonne...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3. August])。——480。
- 1854年8月14日第21819号:(Whatever may be...)。——478—483。
- 1854年8月15日第21820号:(Although the important events...)。——479。
- 1854年8月15日第21820号:(The highly important question... [Korrespondenz aus:]Madrid, August 8)。——480。
- 1854年8月15日第21820号:(I think I told you... [Korrespondenz aus:]Led Sound, August 8)。——490。
- 1854年8月15日第21820号:(The uncertainty and delay... [Korrespondenz aus:]Before the Forts of Bomarsund, August 7)。——493。
- 1854年8月16日第21821号:(Although we have not...)。——490。
- 1854年8月16日第21821号:(At 6[six]oclock this morning...)。——486。
- 1854年8月17日第21822号:(In German politics ... [Korrespondenz aus:]Berlin, August 14)。——488。
- 1854年8月18日第21823号:(The Spanish revolution...)。——483, 484。

- 1854年8月18日第21823号:(I write in the greatest haste…[Korrespondenz aus:]Led Sound, April 12)。——490。
- 1854年8月19日第21824号:(The great preparations…[Korrespondenz aus:]Varna August 1)。——494。
- 1854年8月19日第21824号:(It is reported that the two detached forts…[Depesche aus:]Dantsic, Friday evening)。——486。
- 1854年8月21日第21825号:(The attack of the combined forces…)。——489,490。
- 1854年8月21日第21825号:(On Saturday the Basiliste…)。——486。
- 1854年8月21日第21825号:(A telegraphic despatch has been received…[Depesche aus:]Admiralty, Saturday, Aug. 19)。——489,490。
- 1854年8月22日第21826号:(August 7.—The confirmation of the Bay …)。——498。
- 1854年8月28日第21831号:(The cannonade upon the long fort…)。——497。
- 1854年8月29日第21832号:(Reports have been spread…[Korrespondenz aus Madrid:]August 23)。——586。
- 1854年8月31日第21834号:(A decree in to-day's Gazette…[Korrespondenz aus:]Madrid, Aug. 24)。——587。
- 1854年8月31日第21834号:(The following is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30. August 1854])。——586。
- 1854年9月1日第21835号:(The last accounts from Spain…)。——588。
- 1854年9月1日第21835号:(The most important…[Korrespondenz aus:]Madrid, Aug. 25)。——589。
- 1854年9月1日第21835号:(Yesterday afternoon a meeting was held…[Korrespondenz aus:]Madrid, August 26)。——586—589。
- 1854年9月6日第21839号:(The new Turkish ambassador…[Korrespondenz aus:]Berlin, Sept. 3)。——593—595。
- 1854年9月6日第21839号:(As the Emperor…[Korrespondenz aus:]Vienna, Sept. 2)。——595。
- 1854年9月6日第21839号:(Russia rejects the…[Depesche aus:]Berlin, Tuesday)。——592。

- 1854年9月7日第21840号:(According to accounts…[Depesche aus:]Vienna, Wednesday evening)。——595—596。
- 1854年9月7日第21840号:(The accounts received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s…)。——597。
- 1854年9月7日第21840号:(The following telegraphic despatch…[Korrespondenz aus:]Paris, Tuesday, Sept. 5)。——593, 597。
- 1854年9月7日第21840号:(The Lloyd taking…[Korrespondenz aus:]Vienna, Sept. 3)。——596。
- 1854年9月7日第21840号:(We still live…[Korrespondenz aus:]Constantinople, Aug. 24)。——597。
- 1854年9月8日第21841号:(All that has…[Korrespondenz aus:]Berlin, Sept. 5)。——592。
- 1854年9月8日第21841号:(Cabinet council held…)。——592。
- 1854年9月8日第21841号:(Letters from Constantinople of the 30th …)。——595。
- 1854年9月8日第21841号:(This morning perfectly … [Korrespondenz aus:]Vienna, Sept. 4)。——595。
- 1854年9月9日第21842号:(The chroniclers of the reign…)。——606。
- 1854年9月11日第21843号:(The Constantinople correspondent…)。——622。
- 1854年9月15日第21847号:(The Moniteur publishes…)。——607。
- 1854年9月15日第21847号:(The Russian authorities…[Depesche aus:]Constantinople, Sept. 4)。——607。
- 1854年9月21日第21852号:(Advices from Constantinople…[Depesche aus:]Vienna, Sept. 20)。——624。
- 1854年9月21日第21852号:(The port of Sebastopol…)。——625。
- 1854年9月22日第21853号:(The long expected blow…)。——617。
- 1854年9月22日第21853号:(The Moniteur announced…)。——617。
- 1854年9月30日第21860号:(The allied armies…[Depesche aus:]Vienna, Sept. 29)。——628。
- 1854年10月2日第21861号:(Another and fuller despatch…)。——630。
- 1854年10月2日第21861号:(The Consul of France…)。——630。

- 1854年10月2日第21861号:(The fall of Sebastopol)。——651。
- 1854年10月2日第21861号:(The great and glorious events…)。——639。
- 1854年10月2日第21861号:(Proclamation of victory。)——630。
- 1854年10月3日第21862号:(The Moniteur contains…)。——631。
- 1854年10月3日第21862号:(The probability of the report…)。——639。
- 1854年10月3日第21862号:(To-day, at noon, a Tatar arrived…)。——631。
- 1854年10月3日第21862号:(The Turkish minister…)。——630。
- 1854年10月5日第21864号:(The Russian embassy…)。——640。
- 1854年10月5日第21864号:(The Austrian government…)。——640。
- 1854年10月5日第21864号:(We are still unable…)。——636。
- 1854年10月6日第21865号:(An official communication…)。——637。
- 1854年10月6日第21865号:(To say that…)。——636。
- 1854年10月6日第21865号:(We are requested…)。——637。
- 1854年10月20日第21877号:(To-day is Sunday, …[Korrespondenz aus:] From the fleet off Balaklava, Oct. 1)。——658、659。
- 1854年10月20日第21877号:(Many wounded men …[Korrespondenz aus:] Heights of the Alma, Sept. 22)。——657、658。
- 1854年10月25日第21881号:(It is tolerably plain…)。——659。
- 1854年10月25日第21881号:(So few are the actual events …[Korrespondenz aus:] Constantinople, Oct. 12)。——658。
- 1854年10月27日第21883号:(The defences of Sebastopol)。——641。
- 1854年10月27日第21883号:(Lord Raglan and staff moved…)。——657—660。
- 1854年10月28日第21884号:(The period of suspense…)。——657。
- 1854年10月30日第21885号:(Comes down to the 15th…)。——657。
- 1854年10月30日第21885号:(Constantinople, Oct. 19…)。——656。
- 1854年10月30日第21885号:(It was a maxim of Vauban's…)。——667。
- 1854年11月7日第21892号:(The Arethusa arrived…)。——668。
- 1854年11月8日第21893号:(The allied expedition…)。——670。
- 1854年11月8日第21893号:(The sum total of the disappointment …)。——669。

- 1854年11月9日第21894号:(Though the last letters of our correspondent …)。——669。
- 1854年11月16日第21900号:(There is a great simplicity…)。——681。
- 1854年11月23日第21906号:(It had rained…[Korrespondenz aus:]Balaklava, Nov. 5)。——685。
- 1854年11月23日第21906号:(Lord Raglan relates…)。——683。
- 1854年11月25日第21908号:(I have no news…[Korrespondenz aus:]Balaklava, Nov. 7)。——684。
- 1854年11月27日第21909号:(It is now positively…[Depesche aus:]Vienna, Sunday evening. 6 o'clock)。——688。
- 1854年11月27日第21909号:(The Oest[erreichische]Correspondenz…[Depesche aus:]Vienna, Saturday morning)。——688。
- 1854年11月27日第21909号:(When an army…)。——691。
- 1854年12月4日第21915号:(The following is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3. Dezember 1854])。——697。
- 1854年12月4日第21915号:(A telegraphic despatch from Prince Menschikoff…[Korrespondenz aus:]Paris, Friday, Dec. 1, 6 p. m.)。——698。
- 1854年12月5日第21916号:(By a curious, and probably an involuntary coincidence…)。——695。
- 1854年12月5日第21916号:(Of the many and great…)。——694。
- 1854年12月12日第21922号:(The Queen's speech)。——700。
- 1854年12月13日第21923号:(The rain is falling, …)。——697。
- 1854年12月14日第21924号:(The explanation given by Lord John Russell …)。——701。

《同盟报》

- 1854年7月19日第232号:(Il luogotenente cavaliere De Bürger…)。——431。

W**《维也纳医学周刊》**

- 1854年5月27日第21期:(Von der untern Donau, 14. Mai)。——349。

X

《先驱晨报》

- 1854年6月12日第22159号:(With feelings of deep anxiety…)。——360。
- 1854年7月17日第22174号:(A rumour has gone abroad…)。——407。
- 1854年8月10日第22194号:(It is amusing to read…)。——471。

《新普鲁士报》

- 1853年12月29日第304号:(Obschon die heute eingehenden Nachrichten …)。——21。
- 1854年1月1日第1号:(Wir erfahren, daß die gemeinschaftlichen Vermittlungsvorschläge)。——12。
- 1854年4月20日第92号:(Die ministerielle Correspondenz…)。——245。

《新闻报》

- 1854年1月7日第36号:(Orders have been sent out …)。——12。
- 1854年1月21日第38号:(Authentic news from St. Petersburg. …)。——42—44, 51。

Z

《总汇报》

- 1854年7月2日第183号:(Die Hoffnung daß Rußland… [Korrespondenz aus:] Wien, 29. Jun.)。——391。
- 1854年8月19日第231号:(Der König ist… [Depesche aus:] Kopenhagen, 14. Aug.)。——488。
- 1854年9月6日第249号:(Die Abberufung des Generals Espinasse…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 Sept.)。——604。
- 1854年9月6日第249号:(Verschiedene Blätter behaupten… [Korrespondenz aus:] Bern, 2. Sept.)。——599。
- 1854年9月7日第250号:(Die Pariser Journalisten…)。——607。
- 1854年10月9日第282号:(Die Stellung der russischen… [Korrespondenz] Aus dem Königreich Polen, 28. Sept.)。——651。

《总汇通报》

- 1854年1月11日第11号:(Dans un article sur le prix…)。——54。

- 1854年2月22日第53号:(En publiant les documents…)。——105。
- 1854年3月16日第75号:(N°5[cinq].—Mise en état de siège du royaume de Pologne…)。——280。
- 1854年4月26日第116号:(L'insurrection grecque…[Korrespondenz aus:] Vienne, à la date du 21 avril)。——253—254。
- 1854年4月26日第116号:(On lit ce qui suit dans la Correspondance autrichienne…[Korrespondenz aus:] Vienna, 21 avril)。——253。
- 1854年4月27日第117号:(Ukase adressé au sénat dirigeant. [Gez. :] Nicolas)。——257—258。
- 1854年5月21日第141号:(Le Gouvernement vient…)。——321。
- 1854年5月29日第149号:(On écrit de Vienne…)。——312。
- 1854年5月31日第151号:(On écrit de Belgrade, le 29 mai…)。——319。
- 1854年6月17日第168号:(On écrit de Vienne, le 16 juin…)。——346。
- 1854年6月19日第170号:(On écrit de Vienne, le 18 juin…)。——346。
- 1854年6月20日第171号:(Une dépêche télégraphique… Vienne, le 19 juin 1854)。——346。
- 1854年7月1日第182号:(Nous avons publié…)。——370。
- 1854年7月2日第183号:(On écrit de lassi…)。——369,370。
- 1854年7月3日第184号:(Des rapports de lassi…)。——370。
- 1854年7月3日第184号:(Le 22[vingt-deuxième] juin un grand convoi… [Korrespondenz aus:] Vienne, 28 juin)。——370。
- 1854年7月4日第185号:(La reine a passé…[Depesche aus:] Bayonne, le 3 juillet)。——369。
- 1854年7月6日第187号:(La tranquillité continue de régner… Madrid, 4 juillet)。——388。
- 1854年7月8日第189号:(Quelques journaux étrangers…)。——439。
- 1854年7月11日第192号:(Hier soir, est sortie de Madrid…)。——397。
- 1854年7月12日第193号:(La tranquillité continue … [Depesche aus:] Madrid, 11 juillet)。——397。
- 1854年7月13日第194号:(L'Empereur vient de passer… [Depesche aus:] Boulogne, 12 juillet 1854)。——397。
- 1854年7月13日第194号:(Ministère de la guerre. La division d'

- opérations...)。——397。
- 1854年7月14日第195号:(Le baron de Budberg... [Korrespondenz aus:] Bukarest, 30 juin)。——394。
- 1854年7月15日第196号:(D'après les ordres de L'Empereur...)。——418。
- 1854年7月16日第197号:(Le 11 [onzième] juillet, les Turcs...)。——407。
- 1854年7月18日第199号:(La Espana, 13 juillet...)。——418。
- 1854年7月19日第200号:(A Sanz, village... [Depesche aus:] Pau, 18 juillet)。——417。
- 1854年7月19日第200号:(Une dépêche télégraphique... Madrid, 14 juillet)。——417。
- 1854年7月19日第200号:(Aucun nouveau meurtre... [Depesche aus:] Barcelone, le 17 juillet 1854)。——417。
- 1854年7月19日第200号:(La municipalité s'est ouvertement prononcée... [Depesche aus:] Saint-Sébastien, le 18 juillet 1854)。——416。
- 1854年7月20日第201号:(L'agitation qui régnait... [Depesche aus:] Barcelone, le 13 juillet)。——416。
- 1854年7月20日第201号:(Les dernières communications...)。——414。
- 1854年7月20日第201号:(Les deux batallions... [Depesche aus:] Saint-Sébastien, 19 juillet)。——415。
- 1854年7月20日第201号:(Gazette de Madrid, 15 juillet...)。——416。
- 1854年7月20日第201号:(Par suite d'un bando... [Depesche aus:] Carthagène, le 12 juillet)。——415。
- 1854年7月20日第201号:(Trois nouvelles exécutions... [Depesche aus:] Barcelone, 18 juillet)。——414。
- 1854年7月21日第202号:(Le public attend... [Korrespondenz aus:] Vienne, 16 juillet)。——419。
- 1854年8月4日第216号:(On écrit de Copenhague, le 31 juillet...)。——463。
- 1854年8月7日第219号:(Lloyd de Vienne, 2 août...)。——460。
- 1854年8月8日第220号:(Gazette de Madrid)。——461。

- 1854年8月10日第222号:(L'envoyé de Russie…)。——467。
—1854年8月14日第226号:(L'échange des notes … [Korrespondenz aus:]
Vienne, 10 août)。——475。
—1854年8月15日第227号:(Journal français de Francfort…)。——475。
—1854年8月17日第229号:(On écrit de Madrid, 12 juillet…)。——483。
—1854年8月18日第230号:(Gazette de Madrid, 12 août…)。——483。
—1854年8月20日第232号:(Le corps expéditionnaire de la Baltique
…)。——498。
—1854年9月11日第254号:(On écrit de Constantinople)。——606。
—1854年9月12日第256号:(Par décret royal…)。——603。
—1854年9月14日第257号:(On écrit de Thérapia…)。——606。
—1854年10月3日第276号:(M. le baron de Hübner…)。——630。
—1854年10月5日第278号:(L'Empereur a adressé…)。——642。
—1854年12月13日第347号:(Omer - Pacha est parti ce matin…)。——
698。

〈祖国报〉

- 1854年1月9日第9号:(Une lettre particulière de Trébizonde…)。——10。
—1854年1月19日第19号:(Une correspondance particulière de Constantino-
ple…)。——40。

文学著作

A

阿巴思诺特, 约·《约翰牛传》。——305、306、651。

阿里欧斯托, 洛·《疯狂的罗兰》。——432。

奥利韦拉, 本·《东方之行》。——52。

D

狄更斯, 查·《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生平和奇遇》。——411。

H

海涅, 亨·《阿塔·特洛尔。一个仲夏夜之梦》。——160、413。

K

卡德龙·德拉巴卡, 佩·《曼蒂布莱的桥》。——525。

科克, 沙·保·德·《这位先生》。——169、177。

M

莫里哀《不得已的医生》。——533。

P

普卢塔克《凯撒》。——144。

普卢塔克《道德论丛。神谕的错误(三)》。——304。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452、516、535、584、601。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303。

莎士比亚《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407。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164。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101。

T

唐尼采蒂,加·《贝利萨留》。——257。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18、500。

X

《西维拉占语集》。——439。

谢立丹,理·《造谣学校》。——454。

Y

伊索《狮子和蚊子》。——537。

《一千零一夜》。——447。

圣经

—《旧约全书·摩西一经》。——465。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174。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5。

古兰经——88、147、180、184、716。

报 刊 索 引

A

- 《阿格拉姆报》(Agramer Zeitung)——奥地利政府机关报,1826年在阿格拉姆(今萨格勒布)创刊。——265、266。
- 《埃斯帕特罗派》(El Esparterista)——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54年在马德里出版,代表进步党的观点。——481。
-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英国的一家杂志,自由派的文学刊物,1802—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583。
-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奥地利政府的官方报纸,1780—1931年在维也纳出版,曾数度易名,如《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等;1814年1月1日起正式作为日报出版。——64、118、121。
- 《奥地利军事杂志》(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奥地利的一家军事刊物,1808—1870年在维也纳出版,每月出1—2次。——536—537。
- 《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Journal des österreichischen Lloyd)——奥地利保守派的杂志,1848年12月—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每日出版两次(晨刊和晚刊)。——104、253、390、391。
- 《奥地利士兵之友》(Oesterreichischer Soldatenfreund)——奥地利的一家军事杂志,1848—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每周出2—3次。——9、390。
- 《奥地利通讯》(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石印报纸,1850—1863年在维也纳出版。——399、406。
-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B

- 《巴约讷信使报》(Messenger de Bayonne)——法国的一家报纸。——386、397、

- 410、485。
-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俄国的一家政治和文学杂志,沙皇政府的半官方刊物,1825—186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321。
- 《北方旗帜报》(The Northern Ensign)——苏格兰自由派的周报,1850—1925年在威克出版。——287—289。
-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简称《笨拙》,1841年在伦敦创刊,主编威·梅·萨克雷。——480。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最初名称为《独立报》(L'Indépendant),1843年6月27日改用现名出版;19世纪中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240—242、260—261、264、292、332、387、388、391、393、395、397、405—411、418、430、462、470—473、480、483—489、498、602、607、640。
- 《辩论日报》(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40年由约·卡·斯彭纳创办,从1748年起被通称为《斯彭纳报》(Spenerische Zeitung),从1872年起便正式以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为政府的半官方报纸。——255—257、391。
- 《博斯普鲁斯电讯》(Télégraphe du Bosphore)——土耳其的一家周报,苏丹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政府的官方刊物,1853—1854年在君士坦丁堡出版。——106。

C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起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45、62、128、278、321、361、401、412。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的一家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102、201、228、241、247、325、326、430。

D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晚报,1803年起在伦

- 敦每日出版;1866年以前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以后是保守党的机关报。——320、325、391、439。
-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48—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370。
- 《独立报》(La Independencia)——西班牙的一家报纸,1854年在马德里创刊。——481。
- 《独立报》(L'Indépendant)——见《比利时独立报》。
- 《都柏林晚邮报》(The Dublin Evening Mail)——爱尔兰的一家报纸。——9。
- 《都柏林自由人报》(Dublin Freeman's Journal)——见《自由人报和商业日报》。
-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45年创刊,1826—1926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60年代奉行温和自由主义方针。——472。

E

- 《俄国残废者》(Русские Инвалиды)——俄国的一家军报,1813—191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816年起每日出一次,1862年起成为陆军部的官方报纸。——689。

F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665年左右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刊,1684—1903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23—1903年每日出版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1842—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640。
- 《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见《法兰克福总邮报》。
-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1817—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临时中央政府——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50年代是联邦议会的机关报;1852年起用《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的名称出版,1829—1847年编辑是卡·彼·贝尔利,1848—1849年为G.马尔滕。——390。
- 《法兰西简报》(Le Bulletin français)——比利时的一家报纸,在布鲁塞尔出

版。——330。

G

- 《革命回声报》(El Eco de la Revolucion)——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54年在马德里出版。——481。
-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英国最老的一家星期日报;1791年在伦敦创刊。——406。
-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党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安·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270、417。
- 《国民军报》(El Miliciano)——西班牙的一家民主派日报,1854年在马德里创刊。——481。
-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代表两个保皇派,即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的观点,支持他们的合并。——483。
- 《国民自卫军报》(El Guardia Nacional)——西班牙的一家报纸,1854年在马德里出版。——481。

H

-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heiischen Corresponden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31—1868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69—1923年用《汉堡记者》(Hamburger Correspondent)的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保守派的机关报,曾详细报道为反对查禁《莱茵报》而采取的措施。——180、266—267、408。
- 《汉堡记者》(Hamburger C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 《汉诺威日报》(Hannover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32年创刊,汉诺威政府的机关报。——255。
- 《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见《泰晤士报》。

J

-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12、313、317、319、320、326、347、369、370、371、396—399、406、460。
- 《街垒之声报》(El Clamor de las Barricadas)——西班牙的一家报纸,仅仅1854年在马德里出版,最后一号以《最后街垒》(Ultimas Barricadas)为名出版。——585。
- 《进步报》(Journal de Progrès)——西班牙的一家报纸,1854年在里斯本创刊。——486。
-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29、52、326—327、439、611—616、641—642。
- 《军报》(Le Moniteur de l'Armée)——法国的一家报纸,陆军部的机关报,1840—1883年在巴黎出版。——459。
- 《君士坦丁堡日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土耳其的一家法文报纸,1846年创刊,每月出六次,半官方报纸,鼓吹法国在土耳其的影响。——106、241、604。

K

-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报纸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28、232、245、246、326、355、359、389、431、474、601—604。

L

- 《劳埃德氏杂志》(Der Lloyd)——见《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

-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607。
-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英国政府官方报纸,1666年创刊,每周出两次。——179、247、636。
-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第一家画报,1842年创刊,每周出一次,曾用其他文字出版。——491、623。
- 《论坛报》(El Tribuno)——西班牙的一家报纸,进步党的日报,1853—1855年在马德里出版。——473、481。
-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 《马德里日报》(Gaceta de Madrid)——西班牙的一家报纸,1661年创刊,起初为月刊,后为周报,1890年起改为日报;1698年成为政府官方报纸。——385、386、410、417、483、535、581、603。
- 《马克巷快报和农业报》(The Mark Lane Express,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报,商界的刊物,1832—1924年在伦敦出版。——248、322、327。
- 《马赛新闻》(Nouvelliste de Marseille)——法国的一家报纸,1854年创刊。——264。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323。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W.K. 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H.J. 林肯、总编辑约·鲁滨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J. 斯·霍奇森。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一,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

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12、22—23、26—27、40、65、228、317、410、411、476、610、630—638。

《米兰官报》(Gazzetta Ufficiale die Milano)——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占领当局的官方报纸,1816—1875年曾以不同名称出版。——57、599。

《民族报》(La Nacion)——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49—1856年在马德里出版,代表进步党的观点。——388、481。

N

《南方日报》(La Gazette du Midi)——法国保皇派的日报,1830年在马赛创刊。——470。

《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斯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47、56、57、65、69、77、81、114、159、161、199、220、253、269、271、273、293、296、346、357、380、392、415、426、436、468、503、512、546、617、627、630、632、634、644、649、658、659、666、672、688、689、698。

《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O

《欧罗巴日报》(La Europa)——西班牙自由派的日报,1851—1854/1855年在马德里出版。——481。

P

《旁观者》(El Espectador)——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54年在马德里创刊。——481。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自由派的周报,1828年在伦敦创刊,后为保守派的机关报。——9、19、25—29、44、51—54、65。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ßische 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普鲁士外交部的半官方报纸,在柏林出版;编辑是沙伊德勒(19世纪50年代)。——40、245。

Q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约1917年在伦敦出版,1857—1905年曾出版晚刊《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1905年起将晚刊更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Evening Standard and Times Gazette)。——11。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见《旗帜报》。

R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2年5月由厄·琼斯在伦敦创刊;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并对报纸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周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时期,报纸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并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45、55、68、201—204、286—289、463—466、642。

《人民呼声报》(El Clamor Público)——西班牙的一家日报,进步党的机关报,1844—1864年在马德里出版。——388、480、481、586。

《人民杂志》(Boletín del Pueblo)——西班牙的一家杂志,1854年在马德里创刊。——481。

《日报》——见《马德里日报》。

S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俄国的一家报纸,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1914年用法文出版,每周三次。——149、171、177、257、262、

321。

《时代报》(La Époque)——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49年在马德里创刊,50年代中是自由派联盟的机关报。——388、481、611。

《石印通讯》(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士兵之友》(Soldatenfreund)——见《奥地利士兵之友》。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392。

《斯彭讷报》(Spencer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撒·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戴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11、17、24、57、62—64、67、70—71、88、92—98、106、114—115、117、130、144、156、166、171—172、180、198—199、203、220—225、227、232、247、268、270、275—278、311—326、341、351、359、360—361、364—365、371、380、410、419、436—438、441、456、467—471、475—479、483—485、490、586、592—595、630、635、657、681—683、694、697、700。

《天主教全国联盟报》(L'Univers. Union Catholique)——法国教权派的报纸,1833年在巴黎创刊;19世纪50年代报纸支持波拿巴派。——71。

《天主教徒》(El Catolico)——西班牙天主教会的日报,1840—1857年在马德里出版,代表卡洛斯派的观点。——402。

《通讯》(C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 《同盟报》(L'Unione)——意大利的一家报纸,意大利立宪派左翼的机关报,代表自由派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243—244,431。
- 《同盟报》(La Union)——西班牙自由派的晚报,1854—1855年在马德里出版。——402。

W

- 《晚报》(Aftonbladet)——瑞典的一家报纸,1830年在斯德哥尔摩创刊,19世纪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608。
- 《维也纳劳埃德氏杂志》(Wiener Lloyd)——见《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
-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 《维也纳医学周刊》(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奥地利的一家周报,1851年在维也纳创刊。——349。

X

- 《西班牙报》(La España)——西班牙保守派的日报,1848—1868年在马德里出版。——388,481,601。
- 《西班牙日报》(El Diario Español)——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52—1870年在马德里出版,50年代中是自由派联盟的机关报。——388,481。
- 《希望》(La Esperanza)——西班牙的一家报纸,1844—1870年在马德里出版,卡洛斯派的机关报。——481。
- 《先驱报》(El Heraldo)——西班牙温和派的晚报,1842—1854年在马德里出版。——481。
-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317,323,360,411,471,683。
- 《闲谈》(El Guirigay)——西班牙的一家讽刺性日报,1839年在马德里创刊,追随进步党。——480。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

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438。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8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佐夫,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12、21、228、245、406、478。

《新闻报》(D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1861—1862年报纸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265、370、471。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5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262、263、609、610。

《新闻报》(The Press)——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的机关报,1853—1866年在伦敦出版。——12、42、46、226。

《新闻报》(Las Novedades)——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50—1872年断续地在马德里出版,代表进步党的观点。——481。

《信使报》(El Mensajero)——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53—1854年在马德里出版。——481—482。

《喧声报》(Le 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473。

Y

《雅典观察家报》(L' Observateur d' Athènes)——希腊的一家报纸,政府的官方机关报。——240。

《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见《国民报》。

《伊比利亚日报》(La Iberia)——西班牙的一家日报,1854—1870年在马德里出版,代表进步党的观点;后以《新伊比利亚日报》为名出版。——481。

《意大利信使报》(Il Corriere Italiano)——奥地利的一家报纸,奥地利政府的机关报,1850—1857年在维也纳出版。——371、595。

《议会报》(Las Cortes)——西班牙的一家日报,进步党的报纸,1854—1857年在马德里出版。——585。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24、408、410、483、600。

《自由党人报》(El Liberal)——西班牙的一家民主派日报,1854年在马德里创刊。——481。

《自由人报和商业日报》(The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cial Advertiser)——爱尔兰自由派的日报,1763—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19世纪40—50年代支持取消英爱合并的要求,维护爱尔兰租佃者的权利。——67。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36、72、73、263。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21、54、60、105、126、253、254、260、292、319、329、359、370、383、388、398、407、408、415、418、439、460、463、467、484、498、587、606、607、630、631、642、698。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

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0、40。

《最后街垒》(Ultimas Barricadas)——见《街垒之声报》。

地名索引

A

- 阿比西尼亚 184。
 阿布哈兹 470。
 阿布鲁齐山 396。
 阿德拉米蒂湾——见埃德雷米特湾
 阿德里安堡 15、27、112、145、166、
 251、318、339、351、360、362—366、
 374、421。
 阿德纳默汉 288。
 阿迪杰河 237。
 阿尔巴尼亚 72、73、107、111、114、
 168、246、265。
 阿尔卑斯山脉 8、344、700。
 阿尔布埃拉 685。
 阿尔达汉 23、35。
 阿尔汉格尔斯克 323。
 阿尔赫西拉斯 557、588。
 阿尔及尔 66、244。
 阿尔及利亚 70、329、445。
 阿尔杰什河 212、459。
 阿尔卡拉——见埃纳雷斯堡
 阿尔科斯—德拉弗龙特拉 556。
 阿尔马登 587。
 阿尔斯特 12。
 阿尔塔 114、240。
 阿尔瓦塞特 450。
 阿尔西拉 397、410。
 阿富汗 17、18、116。
 阿格拉姆(萨格勒布) 265、266。
 阿盖尔 288。
 阿哈尔齐赫 23、35。
 阿海洛奥斯河 254。
 阿卡纳尼亚(地区) 114、244。
 阿克尔曼(别尔哥罗德) 212。
 阿拉伯 15、507。
 阿拉丁 623。
 阿拉贡 410、415、416、450、485、507、
 544、556、569。
 阿拉普尔 288。
 阿拉斯 66。
 阿拉斯加 247。
 阿兰胡埃斯 388、486、522、551、
 573、574、611。
 阿雷基帕(省) 448。
 阿利坎特 415。
 阿利马河 627—631、634—637、
 639、640、644、649、651、657、665—
 669、673、680、681、692。
 阿利马-塔马克 645。

- 阿留申群岛 247。
 阿伦德尔 53。
 阿姆斯特丹 348、370。
 阿纳帕 295、408、435、456、470、637、
 649。
 阿品 288。
 阿斯特拉罕 654。
 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511、514、
 530、536、546、556、587、600。
 阿特拉斯 647。
 阿提卡 244。
 阿维拉 508。
 阿亚库乔 448、486。
 埃德雷米特湾 361。
 埃尔祖鲁姆 40。
 埃布罗河 521。
 埃格里波——见哈尔基斯
 埃及 22、37、168、244、339、613、717。
 埃克塞特 741。
 埃肯弗德 282。
 埃劳——见普鲁士埃劳
 埃雷利 597。
 埃里温 598。
 埃伦布赖特施泰因 306。
 埃纳雷斯堡(阿尔卡拉) 369、387。
 埃内兹 111、112、115、361、362、617。
 埃内兹湾 361、362。
 埃斯库里亚尔 386、568、569。
 埃斯特雷马杜拉 396、569。
 埃托利亚 114、244。
 埃维亚岛(内格罗庞特岛) 114、
 244。
 艾德河 321。
 艾登 604。
 艾尔斯伯里 52。
 爱丁堡 52、92。
 爱尔福特 522。
 爱尔兰 45、53、54、64、67、68、70、
 129、202、228、279、286、403、463、
 466。
 安达卢西亚(地区) 396、410、415、
 418、461、514、557、567、572、577。
 安德罗斯岛 246。
 安的列斯群岛 602。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 27、57、364。
 安纳托利亚 23、35、65、168、604。
 敖德萨 5—7、20—24、36、37、48、
 55、112、142、145、200、212、227、
 249、260、261、268、272、280—283、
 285、291、296、321、394、423、434、
 470、596、608、692。
 澳大利亚, 澳洲 85、612。
 奥布——见图尔库
 奥得河 521。
 奥地利, 奥匈帝国 4—7、11、13、19、
 20、22、25、27、38—40、57、65、70—
 75、81—82、89、104、108、111、113、
 115、118—124、144、145、150、151、
 152、157、158、163、165、169—172、
 187、216、217、222、229、230、232—
 235、240—246、255—257、263、
 266、270、297、311、312、319、321、
 324—326、333、347、348、351—
 357、359、365、370—373、377、383、

- 384, 389—393, 397—401, 405—
412, 422—425, 428—440, 444, 467
—469, 475, 477, 569, 571, 592, 594,
595, 613, 631, 637, 639—640, 654,
656, 688, 695, 698—701, 704—
708, 717, 721, 724。
- 奥尔德姆 52。
奥尔登堡 48。
奥尔米茨(奥洛穆茨) 64, 263。
奥尔绍瓦 243, 371, 470。
奥尔泰尼察 3, 15, 31—33, 80, 98,
143, 169, 212, 235, 236, 337, 355,
406, 407, 441, 459, 637, 658, 677。
奥尔特河(奥吕塔河) 38, 406, 429。
奥赫阿克雷 288。
奥卡尼亚 478, 535, 558, 577。
奥拉宁鲍姆(今罗蒙诺索夫) 191。
奥兰群岛 213, 229, 262, 398, 456,
490, 491, 498, 499, 631。
奥洛涅茨 258。
奥吕塔河——见奥尔特河
奥涅加湾 471。
奥恰科夫 494。
奥塞 119。
奥属伦巴第——见伦巴第
奥斯曼帝国——见土耳其
奥斯特利茨(布尔诺附近斯拉夫科
夫) 690, 697。
奥苏尔格特 352。
奥维耶多 518, 530, 568, 600。
- B
- 巴巴达格 211, 471。
- 巴达霍斯 493, 567, 570。
巴登 83, 724。
巴恩斯利 741。
巴尔德佩尼亚斯 397。
巴尔干 14, 15, 62, 92, 211, 237—
238, 243, 250, 296, 312, 319, 333,
347, 365, 367, 717。
巴尔奇克 444, 470, 596。
巴尔塔利曼尼 377。
巴伐利亚(拜恩) 724。
巴格达 40。
巴赫奇萨赖 648, 666, 670, 673,
677, 692, 698。
巴拉克拉瓦(港) 636, 657, 660,
663, 666, 673, 677, 681, 684, 690,
692, 694。
巴勒——见巴塞尔
巴勒莫 329。
巴勒斯坦 613。
巴黎 8—10, 16, 26, 41, 60, 63, 71,
77, 82, 91, 95, 96, 107, 118, 125,
126, 127, 146, 159, 172, 262, 297,
309, 328—330, 392, 396, 405, 414,
417, 449, 462, 466, 471, 480, 560,
561, 566, 569—570, 593—594,
597, 607, 609, 618, 624, 638, 697,
701, 718。
巴利阿里群岛 415, 549, 612, 640。
巴利亚多利德 387, 415, 508, 515。
巴列卡斯 387。
巴伦西亚(瓦伦西亚) 397, 410,
415, 450, 461, 485, 514, 515, 530,

- 538、549、551、554、558、561、572、573、588。
- 巴讷特 40。
- 巴塞尔 599。
- 巴塞罗那 415—416、449、452、478、481、486、504、514、558、602、718。
- 巴塞洛内塔 416。
- 巴斯——见拉巴斯
- 巴斯克各省 416、546。
- 巴统 19、37、65、66。
- 巴西 614。
- 巴亚泽特 597、604。
- 巴约讷 386、397、410、416、485、511—514、586、587。
- 巴扎尔吉克 236、237。
- 白海 418、434、471、653、654。
- 白金汉郡 52、53。
- 拜达尔(奥尔利诺耶) 659、693。
- 拜达尔盆地——见拜达尔
- 拜伦 519、521、574、578。
- 班贝格 405。
- 包岑 648。
- 保加利亚 14、111、168、211、264、303、313、319、320、348、350、429、443、445、618、622、692。
- 保加利亚台地 339。
- 北高卢——见高卢
- 北海 德意志海 48。
- 北京 117。
- 北美 北美洲 608。
- 贝奥蒂亚 244。
- 贝尔格莱德 25、38、39、229、245、400、430、475。
- 贝尔特海峡 25、292、607。
- 贝德福德 740。
- 贝德勒姆 402、403。
- 贝济克湾 88。
- 贝科兹 4、65、227。
- 贝克普 463、464。
- 贝勒岛 642。
- 贝里 740。
- 本策尔维茨 143。
- 本塔-德尔圣埃斯皮里图 386。
- 比迪福德 22。
- 比雷埃夫斯 313。
- 比利牛斯半岛(伊比利亚半岛) 303、389、410、414、450、477、478、507、531、559、568—571、602、685。
- 比利牛斯山脉 517。
- 比利时 54、89、103、330、366、393、405、462、612、714。
- 比利亚拉尔 508。
- 比萨拉比亚 141、337、363、370、384、469、470、606、608、637、653、692、698、699。
- 比斯开湾 414、415、546。
- 比斯特里察 494、596。
-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 彼得堡垒 192。
- 彼得戈夫 406、478。
- 彼列科普 113、494、637、649、695。
- 毕尔巴鄂 521。
- 秘鲁 448、509、570、614。
- 别利别克河 636。

- 宾杰里 699。
宾利 740。
滨海阿雷尼斯 719。
冰岛 608。
波多利亚 370、383、654、703。
波恩 402、403、406、714。
波尔多 396。
波尔塔瓦 702、703。
波兰 7、17、19、26、55、57、59、92、
113、208、223、240、251、254、279、
363、383、384、460、466、471、472、
489、595、654、656、700、702—705、
722、724。
波兰的布格河——见布格河
波罗的海 6、8、20、40、48、55、79、
103、110、128、189、190、216、252、
257、270、291—293、297、322、351、
393、395、401、408、421—424、
434—437、441、462、471、521、607、
635、653、655、718、723。
波森(波兹南) 312、704。
波斯 10、17、25、40、59、597。
波斯尼亚 73、75、111、113、168、
244。
波斯湾 15。
波索布兰科 410。
波托西 448。
伯尔尼 599。
伯克郡 52、53。
伯利恒 186。
伯罗奔尼撒半岛 244。
伯明翰 323、325、327、739。
柏林 40、48、64、83、159、228—231、
270、370、391、399、402—403、406、
438、474、593。
博德明 53。
博恩霍尔姆岛 40。
博尔诺斯 556。
博罗季诺 665。
博马尔松德 395、437、456、457、
488—498、595、607、625、668、669、
723。
博斯普鲁斯海峡 12、14、47—48、
50、99、106、111、112、227、351、425、
467、606、607、618、631、716。
博托沙尼 370。
博伊察 596。
不列颠——见大不列颠
布达佩斯 8。
布恩苏塞索 416。
布尔戈斯 387、415、519、521、550。
布尔加斯 596。
布尔柳克 645、646。
布格河 142、471、597、654、700。
布格河(波兰的布格河) 703。
布哈拉 116。
布加勒斯特 31—33、66、80、81、
111、212、235、255、334、337、348、
350、359、371、376—378、395、
406—408、459、469、470、475、610、
630、631、634—637、639、640。
布科维纳(地区) 383。
布拉赫斯塔德 408。
布莱 329。

布勒伊拉 142—145、334、370、395、
596、608。

布雷斯特 70、79、292、306。

布雷斯托瓦茨 475。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布列斯特)
655、702。

布龙采尔 371。

布鲁塞尔 63、397。

布罗德福德 287。

布洛涅 401、624、630、632、635、639、
660。

布宜诺斯艾利斯 614。

布永 91。

布泽乌 406、467、596。

布泽乌河 212、383。

C

采蒂涅 265。

查尔卡斯(省) 448。

柴郡 741。

措恩多夫 665。

D

达达尼尔海峡 15、47、48、105、112、
212、361、398、467、477、618。

达连湾 509。

达里亚尔峡谷 352。

达纳迪 288。

大不列颠 3、4、5、11、12—19、21、
22—26、27—28、29、43—51、
54—58、63、64—72、74—78、83、
86—94、96—98、102—117、127、

128—131、133、134、136、146—
149、150、151—158、160、162—
170、175、176—180、188、189、
200—204、211、215—221、224、228
—231、233、240、242—249、254、
261、264、266、270、278、280—283、
284、286、289、291、292、297、298—
304、305、309、311、312、320、321、
324—331、347、351、354、356、357、
360—364、369、377、392、393、
401—408、410、412、418、420、421、
423—426、435—441、444、445、
452、454、463、464、466、467、472、
475—479、488、507、518、521、525、
547、593、630、634、636、641、663、
664、667、672、691、701、713—717、
721、722。

大贝尔特海峡 292。

大地——见南美

大卢基 559。

大马士革 186、598。

大瓦拉几亚 144、430。

大西洋 6、450、611。

代夫尼亚 334、433、621—623。

代尼兹利 604。

丹麦 6、20、25、26、48、60、69、89、
103、228、321、401、405、462、463、
472、474、604—605、612、640、714、
721。

但泽(格但斯克) 322、383、489、
595、655。

德国 德意志 4—7、17、20、82、83、

- 89、106、111、229、230—233、243、
255—257、263、266、270、306、312、
373、389、401—403、412、504、507、
522、602、688、700—704、713。
- 德黑兰 10、17、25、40。
- 德洛尼亚 114。
- 德涅斯特河 212、236、384、445、
621、654、698、703。
- 德斯佩尼亚佩罗斯(山口) 410。
- 德维纳河 702。
- 德文郡 10。
- 迪尔普利-摩尔 464。
- 第比利斯——见梯弗里斯
- 第聂伯河 471、700、702。
- 的里雅斯特 600。
- 地中海 55、103、158、361。
- 蒂尔西特(苏维埃斯克) 513。
- 蒂弗顿 52。
- 蒂雷 604。
- 蒂罗尔 707。
- 蒂诺斯岛 246。
- 东方 18、176、181、184、242。
- 东普鲁士 704。
- 东印度 614。
- 东约克郡——见约克郡
- 都柏林 45、67、403。
- 都灵 82、242、390、480。
- 杜恩 287。
- 多布罗加(地区) 211、212、227、
235 238、243、253、333—337、
342、349、370、372、394、434、442、
460、471、621、622、638。
- 多瑙河 7、13—14、24、31—33、38、
42、50、55、79—81、91、114、115、
141—145、200、211、212、235—
238、243、249、251、268、279、281、
291、313、318—320、334—345、
348、349、356、363、367、370、378—
381、383、384、395、407、421、422、
428、433、434、441—444、460、467、
469、476、596、606、608、617、621、
641、651、695、698、699、717。
- 多瑙河两公国 7、11、14、55、57、64、
73、80、88、90、97、103、104、111、
113、115、142、153、168、172、177、
212、217、280、312、319、348、349、
354、355、367、371—378、390—
394、398、405、421—425、428、430、
434、436、443、460、467—469、475、
592、593、596、603、605、606—616、
621、692、717。
- 顿河 23、36、445。

E

- 俄国 3—8、11—17、19—32、35—
40、44、48—51、55—57、63—66、
69—76、77—81、83、86—99、101、
103—108、111—113、116、117、
124、127、128、142、148、149—159、
162—176、179、180、182—185、
189、190、205—209、213、216、
218—223、225、228—233、238、
240、242—244、248、256—257、
259、261—264、268—270、279、281。

—284, 291, 294, 297, 305, 312, 313, 317, 319, 321, 324, 326, 333, 337, 342, 343, 346, 347, 349, 351, 352, 354—367, 370, 379, 384, 389, 390, 397—400, 405, 409, 420, 424—426, 428—437, 441, 444—456, 458, 462, 467, 468, 471, 472, 475—479, 488, 498, 499, 513, 559, 592—595, 603, 604, 612, 615—621, 641, 642, 651—656, 687, 690, 694, 699—704, 708, 714, 718, 721, 723。

俄属美洲部分——见阿拉斯加

F

法国 法兰西 3, 4, 6, 11, 13, 15—17, 19, 21, 22, 26—28, 39, 48, 49, 54, 55, 58, 60, 62, 64, 66, 69—71, 75—78, 83, 87, 89, 93—99, 103—107, 110—112, 113—116, 118, 120, 126—127, 150, 152, 156, 157—160, 163—175, 179, 180, 183—187, 208, 211, 216, 217, 222, 228—231, 233, 240, 242—247, 249, 254, 261, 264, 280—283, 285, 295, 297, 306, 309, 311—313, 320, 322, 327, 329, 351, 357, 364, 365, 369, 378, 392, 393, 395, 407—409, 413, 416, 418, 420, 424, 425, 441, 444, 445, 452, 467, 472, 473, 476, 477, 478, 488, 503, 504, 513, 515, 517, 523, 538, 552, 558—564, 572, 574, 582, 583, 587, 593, 597, 602,

607, 612, 615, 617, 623, 642, 664, 667, 672, 691, 700, 702, 713, 716, 718, 721, 722。

法兰克福——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法罗群岛 608。

法默斯-阿姆斯 201。

法特萨 22。

凡尔赛 569。

非洲[阿非利加行省(古罗马行省)]

15, 445, 613, 622, 624。

菲格拉斯 514, 611。

菲律宾 454, 587, 613。

菲英岛 514, 519。

腓特烈西亚 333。

费奥多西亚(卡法) 65, 113。

费拉拉 431。

芬兰 6, 8, 20, 25, 200, 262, 291, 293, 342, 351, 363, 408, 488, 489, 497, 498, 656。

芬兰湾 189, 258, 270, 291, 607。

枫丹白露 504, 511。

福基斯 244。

福克沙尼 212, 334, 395, 406, 429, 459, 461, 717。

福克斯群岛 247。

符腾堡 83。

弗拉季卡弗卡兹 24, 36。

弗勒泰什蒂 407, 419。

弗里德兰(普拉夫金斯克) 702。

富尔达河 722。

G

干地亚岛——见克里特岛

高加索 5、7、15、20、23、36、112、208、
332、352、355、356、364、637、653、
656。
高卢 449、507。
哥本哈根 18、25、40、48、64、321、
462、463、472、489、608。
哥达 713。
格拉纳达 415、507、515、521、552。
格拉纳图拉 452。
格拉萨里 288。
格拉斯哥 52、287、289、396。
格里姆斯比 52。
格利博卢(加利波利)半岛 111、
247、295、302、317、318、351、477、
617、623、716。
格利纳 459。
格陵兰(岛) 608。
格鲁吉亚 352、419。
格罗德诺 703。
格伦埃尔格 287。
格蒙登 119。
贡比涅 511。
古巴(古巴岛) 473、479、602、613、
719、
古斯塔夫斯韦恩 291、608。
瓜迪亚纳河 397。
瓜斯塔拉 82。

H

哈蒂瓦 397。
哈恩 415、418、515、640。
哈尔基斯(埃格里波) 114。

哈拉斯-耶胡德 187。
哈莱因 119。
哈雷 402。
哈利法克斯(大不列颠) 463。
哈利法克斯(加拿大) 632、649。
哈利奇湾(金角湾) 47。
哈瓦那 587。
海德 740。
海德拉岛 246。
海地 613。
海峡群岛 614。
汉堡 370、488、498、607。
汉科(角) 291、471、608。
汉诺威 612、722。
荷尔斯泰因 462、714、724。
荷兰——见尼德兰
赫尔绍瓦 31、33、80、212、236、337、
442。
赫尔松 112、469、692、699。
赫尔松涅斯角 636。
赫尔辛基(赫尔辛福斯) 456。
赫拉克利亚 673、678。
赫拉瓦——见伊拉瓦
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 556。
赫雷斯——见赫雷斯—德拉弗龙特
拉
赫罗纳 415、577。
赫曼施塔特(锡比乌) 419。
赫特福德郡 52。
黑海 3—7、12、15—16、19、20、23、
26、27、37、38、40、92、99、106、107、
110—113、115、158、208、211、226、

- 235—238、243、248—252、257、
292、294、305、333、348、351、352、
355、356、393、418、422、424、434、
441、445、456、458、467、470、471、
594、606、612、637、641、653、674、
688、694、718。
黑河 628、659、666—667、673、677、
680、684、689、697。
黑塞哥维那 73、75、111、168、265。
黑森 83。
黑山 69—76、113、146、152、157、
169、177、265、271、444。
黑石山脊 202。
红海 244。
华沙 8、57、58、79、469、471、472、
494、654、655。
华盛顿 104。
滑铁卢 174、299、621、630、638。
惠特比 53。
霍京 7、212、654。
霍沃思 740。
- J
- 基尔布兰登 288。
基辅 700、703。
基利亚 596。
基什尼奥夫 7。
基斯利 740。
吉普斯夸省 416。
加埃塔 396。
加的斯 450、477、515、522、531、539、
545、549、552、555、557、564—567、
570、571、577、580。
加拉茨 145、212、334、460、470、471、
596。
加拉塔 47。
加来 394、411、418。
加利波利——见格利博卢
加利福尼亚 613。
加利西亚 104、121、312、383、468、
479、514、530、536、549、558、567—
570、582、618、699、704。
加拿大 717。
加那利群岛 522、612。
加特契纳 42。
剑桥 403。
金角湾——见哈利奇湾
金皮纳 370。
久尔久(久尔杰沃) 42、334、337、
359、371、395、407、443、469。
旧堡 624、628、632、636、664。
旧卡斯蒂利亚(地区) 397、415。
君士坦丁堡 3、10、12、14、16、18、
25—28、33、40、41、47、50、57、63、
65、66、70、71、74、75、90、95—97、
100、106—113、141、155、158、162、
164、167—169、174、176、182、
184—187、200、211、217、222、227、
239—242、245—247、250—254、
261—264、269、296、314、318、320、
346、347、351、364、366、376、378、
394、399、400、408、413、428、430、
433、443、468、470、475、476、477、
480、588、597、604—607、620、623、

630、631、636、639、660、700、716、
717。

K

喀布尔 116。

喀尔巴阡山 378、429。

喀琅施塔得 6、20、104、189—197、
207、270、305、309、310、351、358、
393、394、398、402、436、437、456、
478、635、718。

喀琅斯洛特堡垒 193、196。

卡查河 628、666。

卡茨巴赫河 648、680。

卡恩 53。

卡尔莱特 397。

卡尔斯 23、35、36、352、604。

卡尔斯克鲁纳 472。

卡法——见费奥多西亚

卡拉法特 13、24、31—33、36—39、
42、66、79—81、141—145、169、
235、238、253、350、441、443、445、
597、658。

卡拉腊什——见克勒拉希

卡拉苏 337。

卡拉苏河 236、596。

卡腊卡尔 24、355。

卡兰亭(湾) 661、668、670。

卡卢加 680、703。

卡罗利纳——见拉卡罗利纳

卡伦(河) 289。

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 370。

卡姆奇亚河 334。

卡萨尔普斯泰伦戈 396。

卡萨莱 396。

卡斯蒂利亚 504—509、514、522、
527、544—546、568、570。

卡塔赫纳 415、515。

卡塔罗——见科托尔

卡泰罗尼亚 410、415—416、461、
485、504、549、570、611。

卡特加特海峡 351。

卡瓦丹加 539。

卡宴 109。

凯纳吉 27、95、184、243。

堪察加 247。

康斯坦察(库斯坦杰) 212、235、
236、334、348、470、622、717。

康斯坦丁堡堡垒 192、668。

科堡 713。

科多尼奥 396。

科尔贝格(科沃布热格) 383、489。

科尔多瓦 416、450、557、577。

科尔多瓦省普列戈 580。

科克斯霍 740。

科雷万 443、469。

科隆 474—475。

科鲁尼亚——见拉科鲁尼亚

科马雷 674。

科尼哈奇 402。

科普特 184。

科恰班巴(省) 448。

科特林岛 189、190、192、196。

科托尔(卡塔罗) 73、75、597。

科伊加克 288。

科西嘉 328。
 柯尼斯堡 265、306、489。
 克拉科夫 121、279、395、724。
 克拉约瓦 24、38、66、143。
 克勒拉希(卡拉腊什) 235、334、
 341、442。
 克勒萨尼 459。
 克雷迪顿 10。
 克里木 5、20、112、200、295、351、
 356、359、384、425、426、456、458、
 469、470、596、606、621、623、624、
 627、632、634、635、637、641、651、
 653、656—659、663—671、673、688
 —695、698、699。
 克里特岛(干地亚岛) 168。
 克列茨克 75。
 克林楠运河 288。
 克卢格雷尼 459。
 克鲁克 740。
 克鲁舍瓦茨 229。
 克罗地亚 111、168。
 刻赤海峡 649。
 孔泰萨湾 114。
 库尔德斯坦 23、347。
 库尔特托内 390。
 库马里——见亚历山德罗波尔
 库斯坦杰——见康斯坦察
 魁北克 247。
 昆卡 410、417。

L

拉巴斯 448。

拉德克利夫 741。
 拉多维茨 254。
 拉卡罗利纳 410、515。
 拉科鲁尼亚 519、530、561。
 拉罗谢尔 478。
 拉曼查(省) 409、418、452、558。
 拉芒什海峡 5—6、41、351。
 拉斯卡韦萨斯—德圣胡安 556、
 571。
 拉索瓦 268、338。
 拉伊 52。
 腊兹格勒 236、381。
 莱昂 415、549。
 莱昂岛 477、532、537、556、557、561、
 567、569。
 莱奥堡 408。
 莱夫里哈 556。
 莱加内斯 414。
 莱里达 415、486。
 莱尼亚戈 237。
 莱斯特郡 53。
 莱茵河 莱茵省 8、700、702。
 莱茵普鲁士 54、83。
 莱茵普鲁士——见普鲁士
 兰开夏郡 46、53、201、203、741。
 朗格雷奥 600。
 劳恩堡 462。
 雷阿尔城 397、409、450。
 雷蒂罗 387。
 雷特福德 52。
 雷瓦尔(塔林) 654、699。
 雷乌斯 410。

黎凡特 361。
 里昂 409、478。
 里海 208、352、653。
 里加 6、488。
 里斯班克堡垒 193。
 里斯本 480、486、504、586。
 里窝那 635。
 利克 740。
 利马 18、570。
 利尼 621。
 利特里姆(郡) 53。
 利物浦 102、201、203、632、663、664、
 688。
 利兹 126。
 立陶宛 395、702、704。
 联合王国——见大不列颠
 梁赞省 703。
 列杜特-卡列 295。
 列尼 460、596。
 林茨 306。
 林肯郡 53。
 领海——见科托尔
 龙达 557。
 卢英岛 288。
 鲁米利亚 23、31、36、75、111、113。
 鲁斯楚克(鲁塞) 31、80、236、238、
 334、350、407、419、438、442、596、
 637。
 伦巴第 123、124、396、431、724。
 伦敦 9、15、16、19、29、31、35、42、44、
 47、56、58、61—63、68—69、77、
 79—82、85、97、100、107—110、

119、125、126、133、134、136、137、
 144、146、149、150、151、160、161、
 165—166、172、179、198、200、203、
 211、215、221、224、227、240、245、
 249、253、260、272、285、298、311、
 317、324、327、329、341、351、359、
 361、362、369、380、385、386、393、
 394、402、405—407、411—413、
 420、428、434、444、451、456、459、
 466、467、474、483、490、503、585、
 586、593—595、599、606、608、618、
 624、630、635—639、657、672、681、
 683、688、694、698、701、705、722、
 738、739。
 伦弗鲁(伦弗鲁郡) 53。
 罗得岛 604。
 罗德里戈城 493、515、536。
 罗多斯托(泰基尔) 111、112、115。
 罗马 8、71、187、314、396、724。
 罗曼 370。
 罗奇代尔 52。
 罗瑟土姆山口 370、596。
 罗斯托克 322。
 罗谢尔——见拉罗谢尔
 洛格罗尼奥 452、640。
 洛克布鲁姆 288。
 吕岑 648。

M

马德拉群岛 612。
 马德里 116、369、385—388、396—
 397、409、413—417、450—453、

- 461、474、478—487、504、511—
514、517—524、528、537、547、
551—552、554—574、578、580、585
—589、600—602、611。
- 马尔马拉海 47、112。
- 马尔默 608。
- 马耳他 40、65、79、614、718。
- 马霍卡岛——见马略卡岛
- 马拉加 486、557、580、640。
- 马里查河 111。
- 马略卡岛(马霍卡岛) 561。
- 马其顿 107、168。
- 马赛 264、393、394、408。
- 马什 202。
- 满洲 117。
- 曼彻斯特 8、45、49、50、68、125、
134、137、201、323、326、369、704。
- 曼萨纳雷斯 409、473。
- 曼图瓦 390、396。
- 毛里求斯岛 614。
- 梅费尔 303。
- 梅哈迪亚 229。
- 梅赫丁茨 392、393。
- 梅梅尔(克莱佩达) 488。
- 梅斯 66、83。
- 梅佐沃 254。
- 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 13、49、50、
55、89、103、133、304、369、474、478、
560、588、611、613。
- 美国 美洲 美洲大陆 248、539、
544。
-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119、370、390、
438、474、714。
- 门泰谢 604。
- 蒙古 117。
- 蒙特卡西诺 396。
- 孟加拉 341、380。
- 米德尔塞克斯 53。
- 米哈伊尔堡垒 190。
- 米兰 57、466、599。
- 缅施科夫堡垒 196。
- 明斯克 703。
- 摩德纳 82、83、431。
- 摩尔多瓦 7、50、73、141、318、320、
348、354、363、370、374—377、383、
384、395、429、434、460、467、469、
476、596、608、609、613、699。
- 摩尔多瓦—瓦拉几亚——见多瑙河
两公国
- 摩洛哥 613。
- 莫德林 655。
- 莫尔顿 53。
- 莫吉廖夫 703。
- 莫吉纳 459。
- 莫雷纳山 418、557、577。
- 莫里亚山 187、188。
- 莫斯科 78、142、656、680、694、702、
703。
- 默钦 24、42、211、370、442、608。
- 墨西哥 509、549、613。
- 穆尔西亚省 415、524、549。
- N
- 拿撒勒 722。

纳尔瓦 690。
 纳普代尔 288。
 纳瓦拉 415、416、536、544、546、560。
 纳瓦里诺(皮洛斯) 15—16、18、91、
 241。
 那波利(那不勒斯) 83、187、396、
 410、478、552、569、571、613、724。
 南安普敦 401。
 南非 445、614。
 南美 448、477、479、521、544、549、
 555、560、570。
 南特 329。
 内格罗庞特岛——见埃维亚岛
 尼泊尔 117。
 尼德兰(荷兰) 54、60、74、89、103、
 401、405、612。
 尼古拉耶夫 471、597、692、699。
 尼加特 286。
 尼科波尔 142。
 尼科波利斯——见尼科波尔
 尼克希奇 265。
 尼尼微 52。
 尼什 229。
 涅曼河 521。
 涅瓦河 189、478。
 牛津 52、272、314、402—403。
 纽卡斯尔安德莱恩 53。
 纽里 12。
 纽约 632。
 挪威 489、608、612。
 诺蒂奇堡垒 496。
 诺丁汉 738、741。

诺夫哥罗德 258。
 诺萨勒顿 53。
 诺瓦拉 390。
 诺伊德特 286—287。

O

欧洲 6、8、11、14—16、20、25、27、
 31、40、43—44、50—51、54、57、66、
 70、72、82、89—91、97—99、109、
 111、113、133、146、148、150、156—
 158、159、162、167、168、174、184、
 186、206—208、211、213、221、224、
 225、229、233、243、244、248、279、
 281、297、299、321、340、346、348、
 363—366、370、371、376、382、388、
 396、421、444—446、451、456、467、
 487、503、507—510、516、522、526、
 539、544、550、559、566、568、581、
 582、593、595、602、604、611、651、
 656、685、686、688、703、704、713—
 718。

P

帕尔马 82、431。
 帕尔特奈 329。
 帕维亚 599。
 潘普洛纳 415、514、552、558、560。
 庞蒂弗拉克特 52。
 培拉特 254。
 佩拉 47、246。
 佩斯——见布达佩斯
 皮埃罗—科里尔 399。

皮埃蒙特 82、83、478。
 皮亚琴察 82。
 品都斯山脉 146。
 珀斯郡 52。
 葡萄牙 103、366、396、414、454、478、
 488、504、513、589、601、612、714、
 724。
 普雷代亚尔 596。
 普雷斯顿 198—204、290、740。
 普鲁士 4—8、19、20、25、27、48、54、
 65、71、74、82、83、89、113、122、150、
 159、160、188、212、217、228—233、
 240、246、255—257、265—267、
 270、297、311—316、321、340、359、
 366、389、397、398、399、405、469、
 474、488、592、593、612、641、655、
 701、721—724。
 普鲁士埃劳 665、690、702。
 普鲁特河 14、15、73、142、145、320、
 355、356、359、370、376、378、390、
 468、592、723。
 普罗旺斯 507。
 普洛耶什蒂 370。
 普斯泰伦戈 396。
 普斯泰伦戈——见卡萨尔普斯泰伦
 戈
 朴茨茅斯 52。

Q

奇切斯特 53。
 千岛群岛 247。
 乔伯姆 301、438。

切尔克西亚 50、294—296、358、
 419、435、470、718。
 切尔纳沃德 211、235、236、268、
 334。
 切尔尼戈夫省 703。
 切尔诺维茨 390。
 切斯特 53。
 切塔泰 24、31—33、37、79、143、
 169、343、355、406、691。

R

热河 117。
 热那亚 247、431、716。
 日本 247。
 日德兰 321、333。
 日内瓦 599。
 日乌河(希尔河) 38。
 瑞典 6、20、25、69、89、103、228、245、
 262、293、294、321、351、401、405、
 437、472、488、498、499、514、612、
 721。
 瑞士 54、714。

S

撒丁 82、122、187、395、396、613。
 萨尔马特平原 16。
 撒哈拉 622。
 萨克森 724。
 萨拉戈萨 369、387、415—417、480、
 519、525、558、577、588、603。
 萨拉曼卡 552。
 萨罗斯湾 361。

- 萨洛尼卡湾 114。
萨塞克斯郡 53。
萨瑟克 52。
萨托里(平原) 438。
萨瓦 83、395。
塞尔维亚 7、25、31、38、39、75、108、
113、146、168、235、244、245、271、
399—401、430、431、476、594、717。
塞雷特河——见锡雷特河
塞内加尔冈比亚 613。
塞瓦斯托波尔 3、5—7、12、19—
22、24、36、37、40、48、104、107、112、
113、191、207、227、261、268、283、
285、294、296、305、306、310、332、
351、356、358、359、393、394、398、
423、425、432—435、444、456—
458、470、494、592、596、597、607、
617、624、627—637、639—642、648
—651、655—669、672、673、686、
688—694、697、698、723、724。
塞维利亚 415、418、449、450、518—
519、529、532、538、551、565、570、
571、574、578、581、611。
桑顿 740。
桑河 384。
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 515。
色雷斯 168、251、334。
色雷斯半岛——见格利博卢半岛(加
利波利半岛)
色萨利区 107、111、146、168、246、
264、717。
瑟堡 191、306。
上摩尔多瓦——见摩尔多瓦
上意大利——见意大利
蛇岛 606。
舍夫卡捷尔——见圣尼古拉炮台
设菲尔德 324。
圣奥梅尔 292。
圣巴勃罗 416。
圣彼得堡 6、8、20、22、26、38、40、
43、48、50、58、62、63、69—72、77、
82、91、96、98、103、104、149、150、
152、156、164、166、171、173、177、
180、189、217—219、221、222、224、
231、256、257、258、262、263、266、
270、315、321、356、359、361、365、
377、390、398、406、424、467、488、
593—595、607、641、654、656。
圣地亚哥 543、550。
圣殿 185。
圣多明各 719。
圣费南多 719。
圣赫勒拿岛 174。
圣玛丽亚港 450、556。
圣莫里斯 395。
圣尼古拉炮台 23、35、107、352、
494。
圣佩拉日耶 328。
圣塞瓦斯蒂安 415、416、493、514。
施蒂里亚 707。
石勒苏益格 48、282、46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333、
489。
士麦那(伊兹密尔) 242。

士麦那湾 361。
 舒姆拉(舒门) 32、80、237、238、
 250、251、269、333、337、342、350、
 367、382、383、407、438。
 斯德丁(什切青) 322。
 斯德哥尔摩 25、229、262、270、488、
 608。
 斯蒂维耶雷堡 646。
 斯凯(岛) 287。
 斯堪的纳维亚 25—26、69、228、
 472。
 斯库塔里 111。
 斯库塔里(于斯屈达尔) 295、317、
 351、623、694。
 斯拉蒂纳 406、459。
 斯莱戈 228。
 斯洛博齐亚 370。
 斯摩棱斯克 702
 斯塔福德郡 53。
 斯泰利布里奇 740。
 斯坦布尔——见君士坦丁堡
 斯特拉斯 287。
 斯特拉斯堡 66、83。
 斯特拉斯卡伦 288、289。
 斯托克波特 125、738、740。
 斯韦阿堡 351、436、471、635、718。
 斯维内明德 480。
 松德海峡 35、40、48、474。
 苏阿素 556。
 苏格兰 54、64、92、129、278、286、
 314。
 苏呼姆—卡列 295。

苏利纳河 395、408、471、596。
 苏门答腊 613。
 苏黎世 599。
 苏托林纳 75。
 索非亚 32、229。
 索夫拉韦(地区) 539、544。
 索拉 396。
 索莫山隘口 574。

T

塔拉戈纳 415。
 太平洋 208、247。
 泰恩(市) 289。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738、740。
 泰梅什山口 395。
 泰晤士河 64、79。
 唐克斯特 740。
 特采 495。
 特尔戈维什泰 235。
 特拉佩宗特 10、107。
 特拉皮亚 606。
 特兰西瓦尼亚 57、123、144、296、
 468、618、699。
 特兰西瓦尼亚 395。
 特兰西瓦尼亚山脉——见喀尔巴阡
 山
 特雷维索 600。
 特里卡拉 246。
 特鲁埃尔 450。
 特伦特(特伦托) 550。
 特维尔 258。
 滕布莱克 397。

梯弗里斯(第比利斯) 23、35、352、
355、608。
帖撒利亚区——见色萨利区
突尼斯 168、169。
图尔库(奥布) 408、608。
图尔马尔 13。
图尔恰 211、471。
图尔图凯 236、342、441。
图拉 703。
图林根林山 713。
土耳其 3—7、10—19、21—22、
27—28、37、40、44、47、49、51、56—
59、65、69—74、76、77、81、86—98、
103—106、108—114、146—150、
151—169、171—183、185、211—
213、216、217、221—225、228、230、
232、235—239、241—252、256、262
—264、269、281、302、312、316、318、
320、324、326、343、347—350、352、
354—356、363—366、371—375、
378、379、388、398、399—401、408、
413—419、421—425、429、433、
438、468—471、475、476、500、503、
509、510、513、593、597、603、604、
611、613、617、632、653、693、717、
723。
土耳其欧洲部分 108、168、181、
225、232、357、513、604。
土耳其亚洲部分 605。
上伦 65、79。
托德西利亚斯 508。
托尔托萨 485。

托基 740。
托莱多 387、397。
托雷洪 417、450。
托雷洛瓦通 508。
托里什韦德拉什 143。
托洛萨 415。
托木斯克 443、459。
托普哈内 28。
托斯卡纳 157、396、613。

W

瓦尔赫伦岛 626。
瓦尔纳 226、237、238、247、250、269、
296、318、333、342、347、350、351、
401、407、419、423、433、438、443、
444、456、470、494、596、605、606、
618—623、625、630、636、647、649、
660、716、717。
瓦拉几亚 7、13、31、33、50、66、73、
79、141、146、211、318、320、334、
337、340、346、347、354、363、370—
377、389、390、392、398、399、401、
405、428、429、430、434、441、443、
460、467—473、476、479、597、603、
608、610、613、617、637、717。
瓦朗赛(城堡) 511。
瓦萨 408。
万塞讷 497。
旺代(省) 328。
威尔士 54、247。
威尔斯登 738、740。
威廉斯塔尔 722。

威尼斯 122、724。
 维丁 32、111、114、142、229、383。
 维多利亚 228、415、416。
 维尔纳 702。
 维卡尔瓦罗 386、387、585。
 维罗纳 116、143、237、396、477、478、
 539、563、646。
 维切布斯克 702。
 维琴察 390。
 维斯图拉河——见维斯瓦河
 维斯瓦河 654、655。
 维也纳 5、11、17、20、26、38—41、
 56、62、64、69、70、72、75、78、88、89、
 98、106、114、118—120、165、172、
 174、227、231、233、243、253、256、
 257、263、265、268、279、311、312、
 320、325、348、349、356、359、367、
 370、373、383、390、391、398、399、
 405、406、407、409、422、429、460、
 467、471、475、476、480、588、592、
 593、596、695、701、718。
 韦斯特伯里 52。
 韦斯特米斯(郡) 52。
 韦特 417。
 委内瑞拉 614。
 温莎 451、714。
 沃尔塔 396。
 沃罗涅日省 703。
 沃伦 沃伦省 73、383、654、703。
 乌尔姆 306。
 乌拉圭 614。
 乌雷什蒂 459。

乌特雷拉 556。

X

希布拉克 342。
 希尔河——见日乌河
 希尔内斯 79。
 希腊 15、53、73、91、97、105—110、
 146—148、167、168、172、174、187、
 212、240—242、244—246、253—
 259、263—265、285、313、314、363、
 405、408、418、419、604、613、717。
 希瓦 59、116。
 西班牙 52、103、116、127、157、299、
 332、366、369、388、389、394—404、
 409、410、413、418、446、447—454、
 473、477—488、503—562、568、
 572、577、578、580—589、602—
 604、611、612、640、645、716—719。
 西伯利亚 609。
 西普鲁士 704。
 西斯托夫 74。
 西西里岛(西西里) 396、613、724。
 西印度(西印度群岛) 615。
 西藏 117。
 锡安山 187、188。
 锡比乌——见赫曼施塔特
 锡雷特河(塞雷特河) 145、212、
 334、346—348、355、380、429、442。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拉) 33、
 235—237、249—250、268、318、
 320、326、332—356、359、367、370、
 379—383、406、435、438、441—

- 445、468、494、618、625、631、637、
658、677、686、690、691、723。
锡罗斯岛 246。
锡诺普 10、11、15、16、21、22、27、36、
37、42、65、86、90、98、107、294、426、
434、701。
锡特卡岛(今巴拉诺夫岛) 247。
喜马拉雅山 117。
下卡泰罗尼亚——见卡泰罗尼亚
下诺夫哥罗德 703。
小瓦拉几亚 13、24、141、235、249、
253、392、429。
谢罗 600。
新阿尔汉格尔斯克(今锡特卡)
247。
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见莫德林
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 614。
新卡斯蒂利亚 385、568。
新西班牙——见墨西哥
辛菲罗波尔 640、665、666、698。
匈牙利 4、7、57、104、108、122 —
124、205、207、209、229、232、242、
312、324、409、425、466、471、704 —
706、724。
叙利亚 185、613。
- Y
- 雅典 13、114、186、227、240、241、
264、286、313、314、598、604、642。
雅罗斯拉夫——见雅罗斯拉夫尔省
雅罗斯拉夫尔省 703。
雅洛米察河 337、395、459。
雅西 211、255、370、375、382、610。
亚得里亚海 72。
亚丁 244。
亚历山大堡垒 190、192、668。
亚历山德里亚(省) 306、395。
亚历山德罗波尔(库马里,列宁纳坎)
23、35。
亚美尼亚 23、35、184 —186。
亚尼纳(约阿尼纳) 114、254。
亚述 220。
亚速尔群岛 612。
亚速海 5、20、37、112、248。
亚洲 亚细亚(罗马行省) 7、15、
23、35、36、48、91、186、247、251、
355、364、456、513、539、544、597、
605、718。
耶利哥 174。
耶路撒冷 11、71、73、75、87、91、
95 —98、155、157、171、177、184 —
188、222、595。
耶拿 7、65、683、684。
叶夫帕托里亚 624。
叶卡捷琳娜堡垒 190。
叶尼卡列 113。
叶尼卡列海峡 65。
伊奥尼亚群岛 108、146、614。
伊比利亚半岛——见比利牛斯半岛
伊庇鲁斯 108、114、146、253、254、
264、717。
伊拉瓦(赫拉瓦) 459。
伊利里亚 25、38。
伊卢萨(今爱尔巴察) 114。

伊萨克察(伊萨克切亚) 211、370。
 伊万城(登布林) 655。
 伊兹梅尔 211、212、334、596、699。
 伊兹密尔——见士麦那
 意大利 4、7、19、54、57、83、84、89、
 99、103、122、186、242、243、306、
 312、390、395、425、431、507、602、
 604、613、705、706、724。
 因克尔曼 659、683—690、693、697。
 印度 24、92、117、300、302。
 印度河 303、445。
 英国——见大不列颠
 英吉利海峡——见拉芒什海峡

于莱奥堡(奥卢) 408。
 J·斯屈达尔——见斯库塔里
 约克郡 52、740。
 约萨法特河谷 187。

Z

扎布利亚克 72、265。
 爪哇 爪哇岛 613。
 直布罗陀海峡 40、351、614。
 智利 614。
 中国 110、117、613。
 中欧 703。